

# 宋斐如文集



卷 一



武力  
的領土  
時推毀了  
的權益

恢復正義  
協力制

日本強盜

更必

上海出版社

武力，四年來，  
人的領土，  
時推毀了英美的  
的權益，要阻止這  
恢復正義，必須反  
協力制裁壓抑這  
日本強盜，我國要收  
更必

责任编辑：吕莺

装帧设计：雷冬

《桃花潭》下的台语暴动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在台生活经历，结合大量史料，对台湾抗暴运动进行深入探讨的一部力作。作者以细腻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台湾同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如何一步步走向觉醒和抗争的历程。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纪实，更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民族精神史诗。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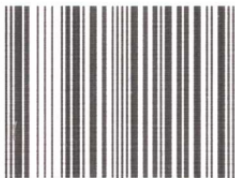
——論抗戰必勝的理論根據

如何收復失地

——論收復失地的理論根據

本書是作者根據多年在台生活經歷，結合大量史料，對台灣抗暴運動进行深入探討的一部力作。作者以細膩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筆觸，描繪了那個特殊年代里，台灣同胞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如何一步步走向覺醒和抗爭的歷程。本書不僅是一部歷史纪实，更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民族精神史詩。

ISBN 7-80141-420-9



9 787801 414205 >

ISBN 7-80141-420-9

定价：220.00元(全五册)



# 宋斐如文集



卷二



武力，因在外交所能達到  
大的領土，在對海側  
同時摧毀了英美各國  
洋的權益，要阻止這  
恢復正義，必須反  
體，協力制裁壓抑這  
日本強盜，我國要收  
更必

上海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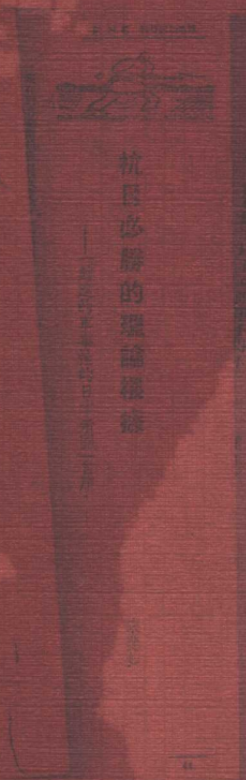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吕莺

装帧设计：雪冬

如何收復失地臺灣——臺灣於水產局應注意收復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四日

臺灣問題已上中國及國際的議程。其理由：臺灣與中國關係十八世紀開拓以來，日本強佔後，即與中國發生關係。日本人民起以抗爭，「東山」(臺灣)對外抗爭，其目的及之願，與中國一致。日本強佔後，即與中國發生關係。日本人民起以抗爭，「東山」(臺灣)對外抗爭，其目的及之願，與中國一致。



德化政策下的台灣暴動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四日

本報去年五月間發表「德化政策」的社論，指出：日本強佔台灣後，即與中國發生關係。日本人民起以抗爭，「東山」(臺灣)對外抗爭，其目的及之願，與中國一致。

ISBN 7-80141-420-9

9 787801 414205 >

ISBN 7-80141-420-9  
定价：220.00 元(全五册)



# 宋斐如文集



卷 三



上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莺

装帧设计：雪冬

本书以抗日斗争为背景，以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为主线，通过作者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实地考察，以及作者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深入采访，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艰苦历程，以及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本书是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珍贵史料，也是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生动写照。

如何收復失地臺灣

——建國於平安臺灣必須收復

呂鶯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呂鶯

德化政策下的台灣暴動

——德化政策下的台灣暴動

本書以抗日斗争为背景，以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为主线，通过作者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实地考察，以及作者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深入采访，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艰苦历程，以及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本书是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珍贵史料，也是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生动写照。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如何收復失地臺灣

——建國於平安臺灣必須收復

ISBN 7-80141-420-9



9 787801 414205 >

ISBN 7-80141-420-9  
定价：220.00元(全五册)



# 宋斐如文集



卷 四



武力的領土，空殼  
時推毀了英美的  
的權益，要阻止這  
恢復正義

體，協力制  
日本強盜  
更於

正義的完  
外交所能達到  
武力的領土，空殼  
時推毀了英美的  
的權益，要阻止這  
恢復正義，必須反  
體，協力制裁壓抑這  
日本強盜，我國要收  
更於

上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莺

装帧设计：雪冬

### 德化政策下的台语运动

本系于1945年出版，旨在普及台语，使台语成为台胞间沟通的桥梁。台语运动之兴起，实为台胞在德化政策下，为求生存而自发之运动。其目的在使台胞能更有效地沟通，以期达到自救之目的。台语运动之兴起，实为台胞在德化政策下，为求生存而自发之运动。其目的在使台胞能更有效地沟通，以期达到自救之目的。

此系台语运动之重要著作，其目的在使台胞能更有效地沟通，以期达到自救之目的。其目的在使台胞能更有效地沟通，以期达到自救之目的。

###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對抗戰前途的理論根據

### 如何收復失地臺灣

——並談於反攻臺灣必須收復

——抗戰必勝的理論根據

本系于1945年出版，旨在普及台语，使台语成为台胞间沟通的桥梁。台语运动之兴起，实为台胞在德化政策下，为求生存而自发之运动。其目的在使台胞能更有效地沟通，以期达到自救之目的。台语运动之兴起，实为台胞在德化政策下，为求生存而自发之运动。其目的在使台胞能更有效地沟通，以期达到自救之目的。

ISBN 7-80141-420-9



9 787801 414205 >

ISBN 7-80141-420-9  
定价：220.00 元(全五册)



# 宋斐如文集

卷五



上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莺

装帧设计：雪冬

德化政策下的台灣暴動

一九四一年自衛隊暴動事件，由新書社出版，共  
八種，內容豐富，大有助益，自亦非普通軍事書  
可比，計八種，每種一百二十頁，由新書社發行。

這套書是暴動事件的重大事件，其內容豐富，且  
經過實際經驗，以讀者之閱，非普通軍事書可比。

抗戰必勝的理論根據

——關於抗戰必勝的理論根據

如何收復失地問題

——關於收復失地問題

關於外邊經濟與收復

五、七、八

此種書籍係由中國及國際的著名日報、電報、中國新聞、及各種刊物、均有介紹、其內容豐富、且經過實際經驗、以讀者之閱、非普通軍事書可比。計八種、每種一百二十頁、由新書社發行。

ISBN 7-80141-420-9



9 787801 414205 >

ISBN 7-80141-420-9  
定价：220.00 元(全五册)



# 宋斐如文集

深圳台盟 主 编

杨 益 群 执行主编(特邀)

---

台海出版社

## 《宋斐如文集》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

顾 问：张克辉(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

刘亦铭(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

陈贵州(全国台联会副会长)

安宗国(台盟中央宣传部部长)

李 辰(台盟广东省名誉主委)

林东海(台盟广东省名誉主委)

张光正(台盟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台声杂志顾问)

周 青(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主 任：陈蔚文(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台盟广东省委主委)

副主任：孔令人(广东省政协常委、台盟广东省委副主委)

叶 昶(全国台联会副会长、广东省台联会会长)

郭晓青(广东省人大常委、台盟广东省委副主委)

谢志成(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广东省委秘书长)

陈俊康(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台联会副会长)

宋 亮(深圳市政协常委、台盟深圳市支部主委)

翁晓波(深圳市人大常委、台盟深圳市支部副主委)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孔令人 叶 昶 丘柏原 宋 亮 陈蔚文  
陈美芬 陈俊康 陈清良 陈惠美 张雅芳  
杨益群 郭晓青 翁晓波 梁汝雄 谢志成  
谢 莹

主 编：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深圳市支部委员会

特邀主编： 杨益群(原深圳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资助出版： 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基金会



## 作者简介

宋斐如(1902—1947)，台湾省台南县仁德乡人，抗日爱国志士，著名日本问题专家。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5—1937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抗战前夕返回祖国，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1945年10月回台参加祖国对台湾的接收工作，致力于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台湾“二·二八”事变中遇害，时年45岁。一生著作甚丰，专(译)著作24本，抗战论文200余篇。主编《少年台湾》、《新东方》、《战时日本》等刊物，创办《人民导报》。曾任《广西日报》主笔、“台湾革命同盟会”执委兼常委、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人民导报》社社长等职务。



# 民國十九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經濟學系

民國十九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



民國十九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



文化之鐘



宋 文 瑞

妻如年二十九

台灣台南

通信處：台灣台南州新豐

永寧莊二五二號

宋斐如大学毕业同学录



# 畢業證書

學生宋文瑞係福建省同安縣人現年二十九歲在本校經濟學系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准予畢業此證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弼



中華民國

十九年

九月二十日



宋斐如 1930

宋斐如大學畢業證書



教育部發給自費生留學證書 第六〇四號  
 宋文瑞年三十二歲係福建省同安縣人國立  
 北京大學畢業經本部核定准其自備資斧  
 前往日本國留學合給證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宋文瑞  
 留學證書

宋斐如赴日本留學證書



時事類編特刊 第一期 目錄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題詞

抗戰期中之時事新論 孫科 (一)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梅廷敬 (二)

英大使對日機轟擊 謝 (三)

到農村去了以後 謝 (四)

我國空軍之偉績 謝 (五)

時事漫語 (六)

論全面抗戰的內外環境 李孟達 (九)

中國是不能征服的 宋恩齡 (三)

對於兩年想願的幾句話 沈鈞博 (四)

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宋斐如 (五)

日本軍部的本質 高捷成 (六)

蘇聯軍備現狀 謝 (七)

日本人眼中的東北義勇軍 高捷成 (八)

《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目錄 (首頁)

聘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聘書

第六三六號

茲聘請

宋斐如先生為本館研究部覽員月薪貳百元整  
有效期間自民國三六年六月一日起此訂

理事長



中華民國

二十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



中山文化教育館聘書





廣西日報社委任狀

位字第七四號

茲委宋斐如為本社日報

主筆

此狀

社長黎蒙

黎蒙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八日

廣西日報社

《广西日报》委任状



1937年冬,宋斐如(右一)与其他抗日志士乘冯玉祥副委员长专车自南京撤退去武昌,途中在河南遭日军轰炸,一部分人在农村休息。照片从左至右:宣缔之、孙晓邦、冯玉祥、沈钧儒、王向辰、张申府、何容、宋斐如。



1935年夏,宋斐如请老师陈豹隐赴泰山讲课,课后冯将军和陈豹隐与众人在梅花岗合影。左起:冯玉祥、李德全、陈豹隐及夫人,徐惟烈(右二)、宋修德(右三)、李兴中(右四)、邱斌(右五)、宋斐如(右七)、刘定五(右八)。



1927年春，宋斐如（宋文瑞、立左二）与台湾在北京留学之同乡张我军（坐中）、洪炎秋（坐右）、吴敦礼（立左）、苏芑雨等创办《少年台湾》月刊。



宋斐如与冯玉祥泰山读书研究室成员。前排左起：赖亚力、蓝天照、高溱宋、田仲济。后排左起：李华卿、王倬如、宋斐如、郑志雄（1934年冬摄于泰山普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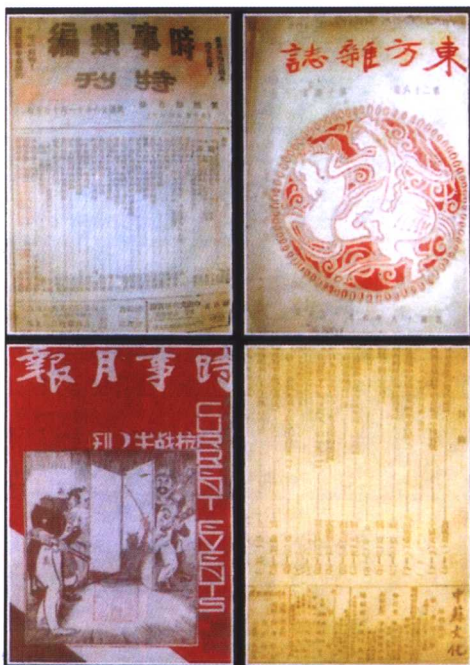




1934年宋斐如与冯玉祥泰山读书研究室部分教员于泰山普照寺西北侧冯玉祥读书楼前合影。前排：研究室主任宋斐如(右一)、苏秉琦(右二)、赵澄之(右三)，后排：陈定民(右一)。



抗战时期宋斐如(后立中)与刘思慕(前一)等好友在一起。



宋斐如撰稿之抗日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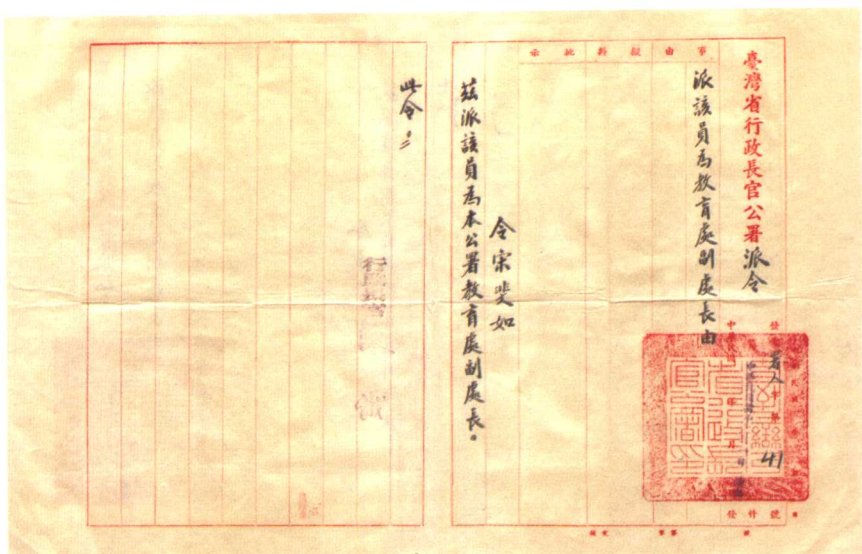


宋斐如主编的《新东方》、《战时日本》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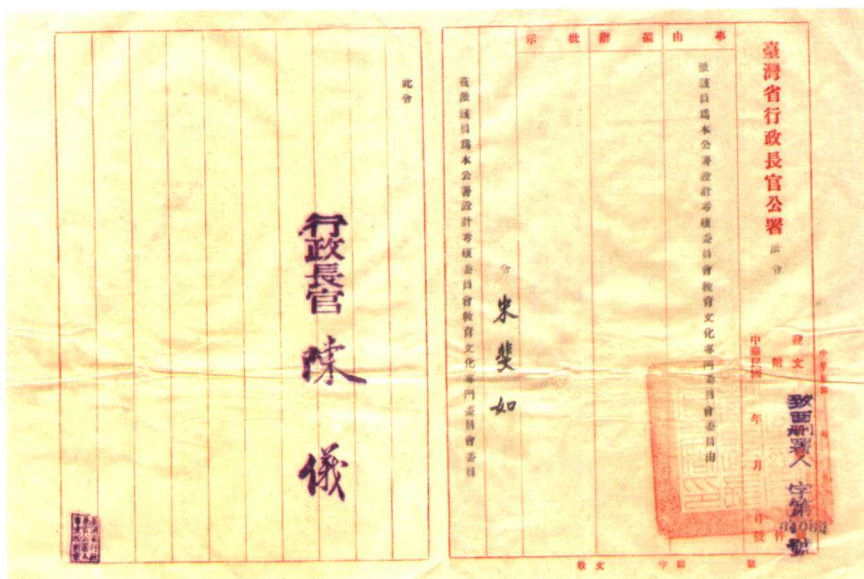


光复后宋斐如于台北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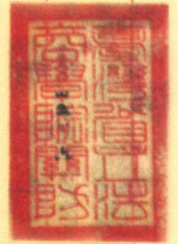


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之“派令”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派令

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聘書



不 要 辦 理 內 容

本院為修訂各科定於本月中旬開始授業二月至八月暑假期間繼續

台端為本院專任科兼任教授聘書

俞允為荷 此致

宋斐如先生

院長 周憲文

教 文 字 號 號

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兼任教授聘函



台湾光复后宋斐如(前左三)蒞临台湾省立台北商业职业学校珠算比赛大会。



1946年12月8日宋斐如(前右八)出席台湾省台北第二女子中学周年纪念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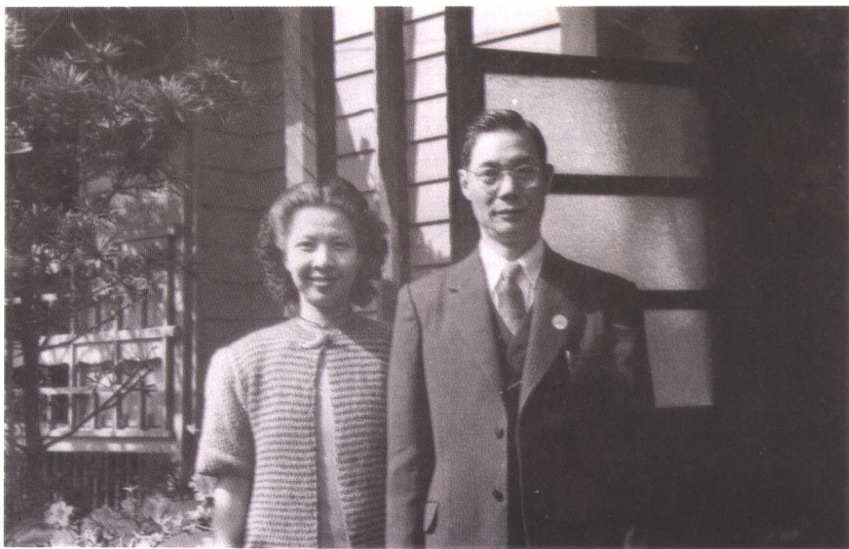




宋斐如与第一位夫人在北京。傅琳彬(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39年在北京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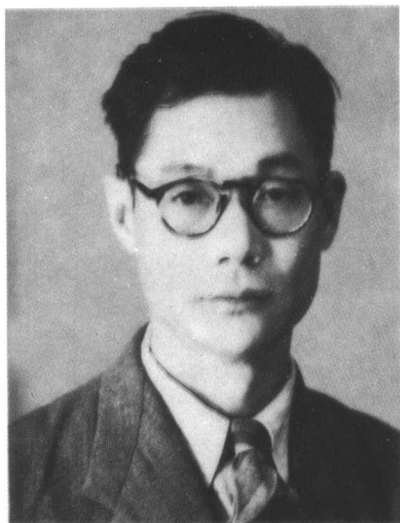
1946年，宋斐如（前右三）区严华（前右一）夫妇与高山族同胞在一起。



宋斐如与夫人区严华在台北



宋斐如被害42年后，1989年他的3个儿子相聚于香港，长子洪涛（中）、次子洪澜（左）、三子洪亮（右）。



抗战时期的宋斐如



抗战中的宋斐如



# 國民政府立法院

為

茲接證明書事：本院專員宋斐如，為在香港  
 辦理戰。半月刊事務，現由港未渝，携帶行  
 李。件，其中有日文書籍及參考材料，俱  
 係為抗日宣傳之用。茲特信予證明，仰沿途軍  
 警機關查照，驗明放行，以利抗戰宣傳。此致  
 粵桂滇黔川沿途各軍警機關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六日

院長

1939年宋斐如前往各地宣傳，立法院所开具證明



# 軍用證明書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 為

發給證明書事茲有本會設計委員宋斐如

因公 往福建

經過川黔桂湘閩粵等省沿途各地

經核准自本月拾伍日起至拾壹月拾拾日止為

有效期間特此證明書為證

主任委員

程潛

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 國曆 拾壹年 柒 月 拾叁 日

領用證明書規則列后

- 一 此項證明書僅限軍人軍屬特用軍人軍屬以外不得濫用冒用
  - 二 持用此證明書必須穿著軍服或佩帶軍章符號否則無效
  - 三 持用此項證明書不得夾帶違禁物品及違禁人物
  - 四 持用此項證明書乘坐車船須遵守車船上一切規則
  - 五 持用此項證明書如遇軍警檢查時應受其檢查
- 此項證明書限期屆滿時應即繳銷不能繼續持用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證明書

戰時日本研究會刊行

# 戰時日本

半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宋斐如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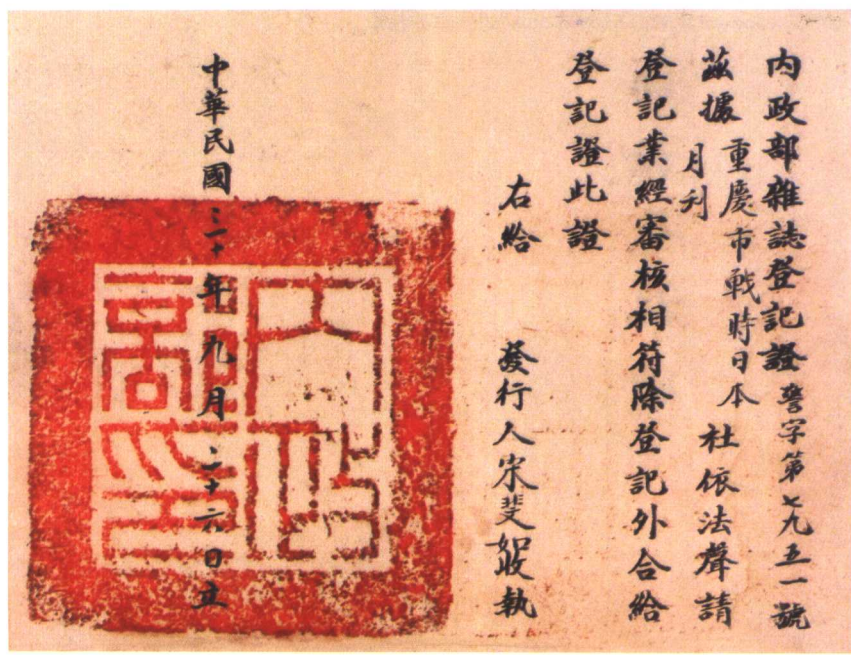
生活書店特約經售  
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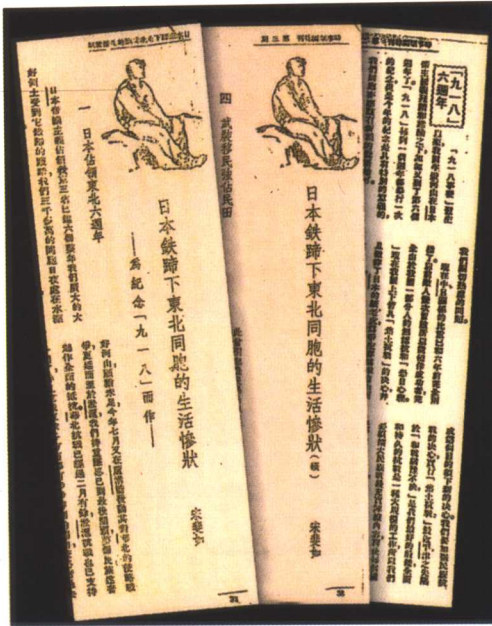




1941年6月《战时日本》登记申请书



1941年9月26日内政部发给《战时日本》杂志的登记证



宋斐如分別發表在《時事類編》上抗日寇之檄文

**本刊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畫多少為序)

王凡生	周伯健	張友誠
王芸生	周伊武	張季男
王亞南	周志文	張燕生
王紀元	胡適之	張明善
方秋榮	胡適之	陳正典
艾寶樓	胡適之	陳北鴻
池田幸子	徐繼畲	陳豹隱
杜若君	符濤	陳博生
杜國輝	符濤	曹樹銘
邵鐘麟	郭沫若	彭芳華
李學谷	郭沫若	馮祖法
李斌	郭沫若	鄭兆萬
李相夫	曹德新	劉希哲
金仲華	曹德新	劉希哲
金剛人	曹德新	劉希哲
金雲	曹德新	劉希哲

日本戰時體制	宋斐如
日本經濟與經濟制裁	宋斐如
中日實力的比較	宋斐如
日本人民統一戰陣的發展	宋斐如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宋斐如
日本	宋斐如
日本戰時體制	宋斐如
日本經濟與經濟制裁	宋斐如
中日實力的比較	宋斐如

宋斐如日本問題新書

《战时日本》特約撰稿員



1945年台湾光复后，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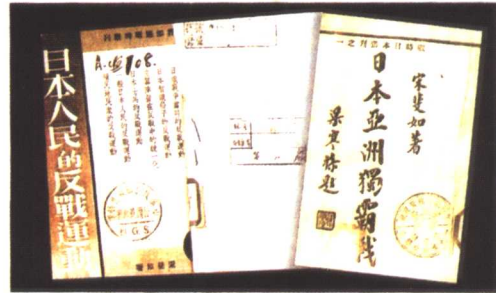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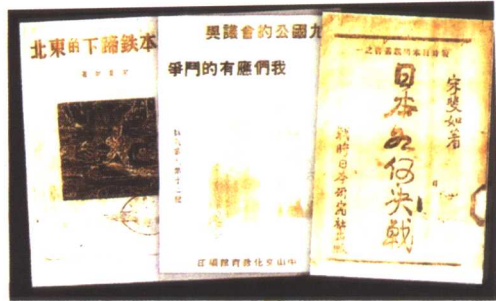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宋斐如



1947年“二·二八”事变前夕，宋斐如、区严华夫妇及儿子宋亮于台北新生南路寓所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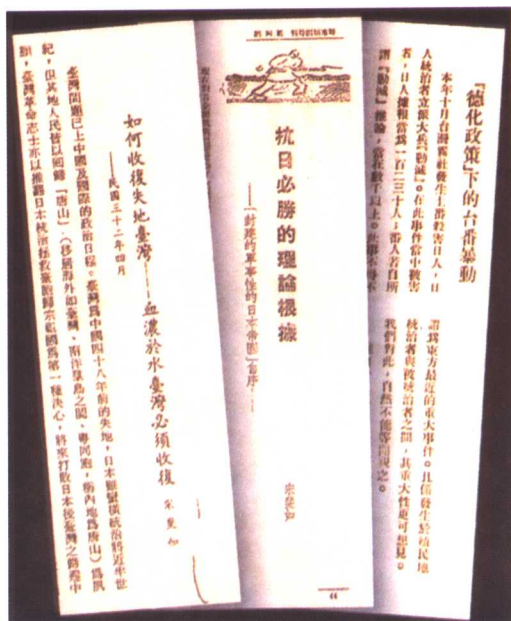


宋斐如部分著作 (一)

圖書存于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等處



宋斐如部分著作 (二)



宋斐如分別发表在《新东方》、《时事类编》及《大公报》上抗击日寇之檄文。



宋斐如部分发表文章影印件



# 序

陳映真

宋斐如先生(1902~1947)是我国台湾省台南人。少年时代在台湾商工学校,即今台北开南高级商工职业学校毕业后,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激情,于1922年20岁时,自日帝殖民地台湾西渡大陆,入北京大学就读,与负笈旅京台籍青年或投稿东京的《台湾民报》、或自办杂志,投入殖民地台湾的反日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早在1925年就以发表在东京的《台湾民报》的文章《王悦之氏之谬谈与北大台湾同人》,开始了他短暂却厚实的、以文笔启蒙与斗争的生涯。1935年,他到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直到1937年日帝全面侵华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国中国,以他深厚的日本语文能力,得以多读战中日文资料,并以他精到的社会科学训练,展开深刻的抗战研究、日本敌情研究和台湾研究,对于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对于光复台湾,对于将台湾同胞从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来,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8月日帝战败投降,台湾复归于祖国。1945年10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复后台湾政治、社会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唤省内外同胞的团结与“溶合”,不遗余力。不幸,回台后坚决站到人民群众一边的宋斐如先生,在1947年2月,台湾民众因国民党接收集团的恶政而哗变后的镇压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国民党法西斯刑场。英年而壮烈牺牲,得年仅45岁。呜呼!

## 一、抗日研究与抗日理论

就如这一本宋斐如先生文集的编辑体例所表现,自“东北事件”、即1931年日帝借机侵夺我国东北,以建立伪国家“满洲国”兼并东北地方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宋斐如先生发表了《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等文章,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方法和眼界剖析“东北事件”的本质,规定了九·一八事变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矛盾下,以对外军事扩张,走向独占资本主义,以解决其经济的内在矛盾。其他如《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1931年)、《日本帝国本质论》(1939年)都以政治经济学的眼界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之基本性质的文章,对于在抗日的历史下客观正确地认识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教育启发作用。

宋斐如先生也依据客观资料,报导了日帝铁蹄下“满洲”被恣意劫掠压迫的悲惨状况。他也报导了中国抗日战线中,觉悟、进步的日本反战和平运动,为策反日本军人而斗争的实况,也报导了同为日帝压迫的中国、朝鲜和台湾人民反对日帝侵略战争的“反战运动”的情况,鼓舞了抗日的士气。

宋斐如先生以丰富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知识,写了

多篇文章,介绍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德、日、美、英、苏和中国,轴心和同盟各国争锋的形势与归趋,使读者对抗日斗争的全球形势有清楚概括的掌握。在抗战期间,宋斐如先生也分析了南京汪伪政权必败,抗日必胜的展望。

出身台湾,在祖国大陆奔赴抗日斗争,凭借他对日语文材料的把握和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运用,宋斐如先生的文笔化为抗日的刀枪,为抗日理论、抗日形势和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全局去展望抗日必胜的理性认识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二、台湾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使台湾与祖国相分断,而在日帝统治下,日本当局极尽透过教育宣传破坏台民之汉族和汉文化认同之能事。对此,宋斐如先生为之痛心疾首。而若今日宋先生健在,眼看今日台湾在文化、思想教育上的“去中国化”,必更愤怒神伤。

自1895年割台到“东北事件”的1931年,两岸隔绝已36年,到全面抗日的1937年,海峡断绝已42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台海阻绝已51年。因此,对绝大多数的大陆同胞,台湾的历史、社会、产业、民情都很陌生。一心一意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光复台湾、解放台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宋斐如先生,在抗日期间,写了不少有关认识台湾的文章。台湾光复不久即乘程回台的宋斐如先生,很快投入文化工作,勤奋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办刊物(如《人民导报》)写文章,直到他在1947年2月事件中被杀,为重建台湾,振兴中华呕心沥血。

1950年以后,台湾与大陆又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交叠结构下长期阻隔。一直要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陆对台湾



的研究才有长足的开展。但是,回看宋斐如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以迄光复后的40年代中期的文章,竟以台湾问题始(《王悦之氏之谬谈与北大台湾同人》,1925年),以台湾问题终(《台湾心理建设问题》,1947年)!因此可以说,宋斐如先生是在大陆和台湾研究台湾问题的先驱性人物。

宋先生的学术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受其专业素养的影响,他的台湾研究表现了突出的科学性和他对故乡台湾的深厚情感。

1930年,他翻译了日本有名的左派社会科学家、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有关台湾的名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从日帝下台湾社会、经济、产业、阶级和民族诸关系,分解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的构造,解析日本帝国主义支配台湾的原理。山川均这一著作和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对当时台湾反日反帝的台湾知识界起到重要影响。宋先生也写《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分析日帝统治下台湾农民的苦情,并且以日帝下台湾社会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台湾革命”的方策。

出身台湾而为抗日斗争活跃于大陆的宋斐如先生,对于为抗日投奔祖国,却又因少数不良台民仗日人的恶势力为非作歹,为虎作伥于大陆而影响大陆同胞对爱国台胞的猜忌、疑惧、反感,使爱国台胞饱受委屈之事深觉痛心。台湾老作家吴浊流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披沥了爱国台胞在大陆生活的无限委曲,而宋斐如先生则以写文章呼吁祖国当局在抗日战争末期,尽快公开宣布胜利后台湾复省,恢复台湾作为中国一行省的地位;也要求政府及早宣布胜利后台湾同胞恢复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以稳定和激发台湾人民对自己未来地位与身份的信心,昂扬台民的民族主义感情,兼以促成抗日战争的胜利。

宋斐如先生在胜利后返台时,最关心的是台民在思想、心理

上的去殖民化工程,要同胞自觉地“中国化”,要善于分别良性(进步的)中国和恶性(反动保守)中国,并“择善而固执”之。要清算日本式小庭园格局,要进入中国长江五岳的气象。但在回归过程中,台湾人也要讲自信,讲主体能动性,自主地完成自己的中国化改造,不怨天尤人,不依赖别人。

宋斐如先生十分注重教育和心理重建。他提出改进光复后台湾教育建设的方略。他也特别关心台民因失望于国民党劣政而产生的省籍芥蒂,力言克服省内人与省外人的矛盾,彼此“溶合在一起”。

今天读他的文章最让人感动者之一,是他关于推行国语的方案。今日“台独”人士常常说光复后“外省政权”用强制教育“消灭”“台语”(即闽南语),使光复后一代人惨遭“失语”之痛。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挑拨性谎言。光复后,包括宋斐如先生在内,都有一个贤明的推行国语的政策,那就是宋斐如先生写的《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推行国语不但不应歧视,甚至消灭“台湾话”,该禁止、消灭的是日本话和日本式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并且鼓励、提倡、保存“台湾话”作为中国方言的地位,从而赋活“台湾话”中的中原辞汇和汉语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再学起国语,就容易得多!

宋斐如先生也写文章讲台湾史,讲割台时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讲台湾的爱国民族主义传统……。总之,他为台湾研究的领域开风气之先,留下丰美的研究积累。

### 三、日本研究的先锋

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少不了日本敌情的研究。日本研究,离不开日文资料和正确的研究功底。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对日本

研究有科学方法的宋斐如先生，就注定了要承担民族和时代托付给他的重要任务。

宋先生在他一篇重要文章《介绍〈日本资本主义论战〉》(1939年)评介了30年代日本左派内部就日本社会史、日本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和历史诸问题的理论争鸣(主要以“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的争锋)。这个论争，很像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类似20年代台湾党人许世昌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陈逢源之间关于“中国改造论”的争论。宋斐如先生抓住了研究日本问题的关键穴道，首先就认识了日本社会史和社会构造的基本理论，即以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掌握日本社会性质理论。以此为基础，宋先生的日本论就可免于“一般论”的误谬了。

因此，他论及日帝侵华战争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论及东北事件和上海事变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联系，论及战时下日本的进步政党，论及日本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九·一八东北事件的关联，分析战时下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谈九·一八事变的政治经济学的因素，分析日本战时下资本主义经济及相应的社会与政治危机，规定战时下日本农业的“半封建”性质，阐述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时日本统制经济的破绽，也透视日本中小企业在战时独占资本主义体制下没落的宿命……。

开放改革以后，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逐渐退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唯其如此，我们从宋先生丰富的日本研究积累中得到新的启示。1945年日本的“战败”并不曾彻底清理日本的战争机制和战争责任。时移势易，今日的日本右派再次翘起了尾巴，在我国东南海域争资源主权，擅改侵略战争教科书，坚持参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神庙”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战后以来高度恶化。此时此际，重新倡导科学性的日本研究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再度呼唤着我们。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迎来台湾人知识分子在抗日年月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丰硕的日本研究的遗产,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宋斐如先生的日本论和日本研究,为他奠定了日本研究的先锋地位。

#### 四、结论

台湾同胞有光荣、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1895年割台之后,台湾人民反占领,义不从倭的斗争,不惮以原始刀枪面对侵略军现代化武器的锋镝,至1915年屡蹶屡仆,屡仆屡蹶,留下了悲壮的光辉历史。1920年中期开始,台湾人民改变了抗日策略,改以社会、文化、思想、文学及政治运动从事反抗,至1931年东北事件,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而全面遭到镇压,但深藏在内心的抵抗之火却从未熄灭。但由于台湾是日帝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人民不能不受到日本战争政策直接、严苛的支配,比起空间相对广阔的半殖民地大陆,后者的抗日斗争比前者要“开阔”得多。宋斐如先生的抗日实践,因而能与全中国的抗日势态,甚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相依恃,眼界开阔,可以盱衡全局,纵论伪满、汪伪、华北和华南在全局中的位置,纵论美、英、苏、德、日动向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相形之下,东北事件后,台湾的抗日全面遭到严酷的打压,抗日知识分子无从得知祖国抗日的全局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推移,只能作沉默屈折的反抗,度过战争末期漫漫长夜。

其次,恰恰是由于宋斐如先生经受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全过程,他才能透彻理解“善的中国”(指进步的、民众的中国)与“恶的中国”(指腐败、反动的中国),从而善于“择其善而固执”之。他因此能免于天真地寄希望于接收当局,坚定地走符合



中国新历史归趋的道路,冒险犯难、坚持斗争,终于不幸地倒在反动派的刀锯之下。

人们应该特别感谢宋斐如先生哲嗣宋亮先生及其夫人梁汝雄女士等多年来跑遍祖国的每一个可能的角落,初步找到了宋斐如先生遗留在抗战下中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所刊文章,也在曾健民先生帮助下,在台湾搜得了宋先生滞台短暂一年许时间中留下来的文章,并且在台海出版社的支持下付梓成书,为赋活一代台湾籍爱国的思想家、台湾研究和日本研究的先驱者宋斐如先生,也为保存与集中了宋先生毕生为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留下的重要思想与研究积淀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宋亮夫妇吩咐做序,遂不憚浅陋,敬谨复命。

2005年5月26日

## 编者的话

宋斐如(1902.8.11~1947.3.12),台湾台南县人,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爱国者。其生命虽短暂,却熠熠生辉,其卓著的思想成就和突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给予应有的评价与地位。尤其是抗战期间丰厚独特的理论著作,更弥足珍贵。今年正值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60周年,出版《宋斐如文集》,更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今年1月中旬,台盟深圳支部经桂林原政协主席魏华龄老的推荐,请我主编《宋斐如文集》,我深知出版此书的意义,便欣然应允。我长期从事抗战文化研究,编这本书理应是轻车熟路,不成问题。然鉴于:宋斐如著作等身,已出版著作15本,译著8本,文章一大批。现搜集到著、译便有14本,论文211篇,共200万字,工作量大;由于战时印刷条件限制,兼之保管不善,文章的字迹模糊不清,甚或残缺不全,难以辨认;时间紧迫。顿觉压力不小,颇为棘手。为了能在短期内编好《宋斐如文集》,我朝下列几方面进行了努力。

一、力求精简集中,文集仅收论文,翻译、著作和短文概不入选。作为社会科学的佼佼者,出色的翻译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宋斐如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丰厚的理论著作、翻译、论

文,还在其主编的《战时日本》、《人民导报》等杂志报刊上,撰写了大量“发刊词”、“编者话”、“编后语”、“通信”和栏目“述评”。这些精悍的短文,也不乏生动感人之处。但因时间和篇幅关系,只好同其翻译、著作一起割爱。至于内容基本重复的论文,则取先发表者。如《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载1942年4月17日《新华日报》)和《毋忘台湾》(载1942年6月17日《广西日报》),内容大部分相同,取前者。

二、重点突出宋斐如抗战爱国思想和日本问题研究成果。作者治学严谨,视野开阔,涉猎问题十分广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层层探讨,各有建树。如在国际问题考察方面,他不仅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探讨中日关系,英、美、法、苏与日、德关系及发展趋势。还触及印度、越南、朝鲜、普鲁士等国国情及外交政策。《阿拉伯和犹太人的冲突》、《印度问题之史的考察与印度解放运动》、《东方各民族的转动及其现状》、《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满二十年的朝鲜》等文,视角独特,颇有见地。上述论文,除了与抗日爱国和日本研究有关,暂不收入。这样,较好地突出本书的主题。

三、在分类编排上,根据课题的重要性依次分类排列,共分为三大类,头类是“抗日运动”;二类是“台湾问题”;三类是“日本研究”,这一类又分为“日本军事外交”、“日本政治”、“日本经济”三辑。“军事”与“外交”,原本是不同的概念范畴,一般分类法上都二者分开。但考虑到当年日本国内的特殊情况,即在战前和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日本右翼分子少壮派军人和稳健派重臣元老之争始终未间断过,少壮派占了上风,尤其是指挥侵华日军将领更为嚣张,他们可以不受指挥控制,动辄以军事压力来左右干扰日本外交政策,使之成为不折不扣的军事外交。宋文中基本上也是按这一特殊情况将“军事”与“外交”结合起来谈论。因此

文集中，将“军事”与“外交”合为一辑。另一组不属于上述三类的论文，立意新颖，弃之可惜，故列入第六辑“其他”。有些论文如《日本战时金融统制的剖述》等虽有价值，但因太多字句模糊不清，也只好删去。同一辑里的文章，则按文章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查考。

四、尊重作者，对入选原文不作任何增删，个别字句不清晰，则尽量通过多种途径稽核，倘实难以查明，则以□表示，一字一□，暂付厥如，候待补正。存疑的错字，在其后括号内加以标明。保留原文称谓，不作改动，如“安南”、“暹罗”、“生番”、“东省”等。文章的出版日期、卷期数和百分比，一律改为阿拉伯数字。期刊原用民国年号，今按通例一律换用公历，如“民国三十二年”，今改为“1943年”。为了加深对作者生平及创作思想的理解，书末特选录了一组《有关记载、忆念、评论、年表》。

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本书缺点在所难免。上述几方面的考虑与安排，是否恰当，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杨益群

2005年5月



# 目 录

001 序 / 陈映真

001 编者的话 / 杨益群

## 卷一

### 第一辑 抗日运动

003 上海事变的检讨(1932年4月)

037 日本侵占下东省的农业生产(1932年4月)

064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1932年11月)

099 九·一八6周年(1937年10月)

102 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为纪念  
九·一八而作)(1937年10月)

117 抗日必胜的理论根据——《封建的军事性的日  
本帝国》自序(1937年11月)

122 新年·新阶段·新觉悟(1938年1月)

127 中国抗战与日本民众反战(1938年3月)

131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1938年4月)

- 139 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剖述(1938年5月)
- 151 日本反战运动的国际化(1938年8月)
- 154 七年来的教训与进步(1938年10月)
- 157 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1938年10月)
- 175 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1938年10月)
- 180 第四期抗战的敌我情势(1938年12月)
- 186 日台韩反战与《香港日报》(1939年2月)
- 189 劳动节寄日本劳工(1939年3月)
- 194 莫洛托夫的演说与远东(1939年7月)
- 197 美苏亲善与远东的关系(1939年7月)
- 200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的壮举(1939年8月)
- 204 美国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机会(1939年8月)
- 208 苏美关系进展与远东(1939年8月)
- 211 欧战与中国(1939年9月)
- 214 美国排日运动的概况(1939年9月)
- 220 欧洲大战与日本(1939年9月)
- 228 汪逆兆铭的悲哀(1939年12月)
- 232 美国孤立派波拉先生的错觉(1939年12月)
- 236 汪逆卖国与我们的觉悟(1940年4月)
- 240 英美不能再姑息日本(1940年11月)

- 243 评日人“世界四分论”(1940年11月)
- 246 欢迎居里先生与中美合作(1941年2月)
- 250 德国侵苏与远东前途(1941年7月)
- 254 本多与汪逆的魔舞(1941年7月)
- 258 欢迎拉铁摩尔先生(1941年8月)
- 262 中苏英美的共运与协力(1941年8月)
- 275 正义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1941年9月)
- 278 福建新政与抗战建国(1941年9月)
- 281 读丘吉尔首相的演说(1942年1月)
- 284 英美战略上当务之急(1942年1月)
- 287 论太平洋集体安全与中国的关系(1943年2月)
- 297 对日集中进攻罢!(1943年7月)
- 301 汪伪“参战”前后的乖谬(1943年8月)
- 308 日寇的悲鸣——所谓“一亿国民走向第一线”  
(1943年11月)
- 313 从太平洋中路进攻日寇——先射日本的阿溪  
里足踵的台湾(1943年12月)
- 320 日本失败的实况(1945年11月)
- 325 日本失败的教训(8月15日对全体学员精神讲  
话记录)(1946年8月)

## 卷二

### 第二辑 台湾问题

- 333 王悦之氏之谬谈与北大台湾同人(1925年11月)
- 336 敬神吗? 民族自杀!(1927年3月)
- 344 “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动(1930年11月)
- 347 台湾农民的惨痛——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1942年4月)
- 351 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1942年4月)
- 360 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  
复(1943年3月)
- 367 台湾在急激演变中(1943年12月)
- 372 论台湾的革命战略(1944年4月)
- 384 《人民导报》发刊词(1946年1月)
- 388 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长官公署教育副处长  
宋斐如播讲)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七日于台北广  
播电台(1946年1月)
- 393 中韩两民族的关联性——教育处副处长宋斐  
如先生的讲演(1946年1月)
- 400 论台湾基本人权——并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员  
会(1946年3月)



- 403 国家为什么要保障人民自由(1946年3月)
- 406 台胞应踊跃参加师范教育——为台湾师范教育宣传周而作(1946年3月)
- 409 “台湾日”的回忆(1946年4月)
- 412 台湾民主国对日抗战(1946年5月)
- 422 反抗满清统治的暴动(1946年5月)
- 427 我们要溶化在一起——5月12日在省训团精神讲话(1946年5月)
- 431 孔夫子的伟大(1946年8月)
- 434 报人的使命——为纪念记者节而作(1946年8月)
- 438 台湾教育施设的现阶段——全省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闭幕感言(1946年9月)
- 441 谈谈台湾农业的改进——祝中华农学会成立(1946年9月)
- 446 推行合作事业的检讨——并祝台湾合作事业健全发展(1946年10月)
- 450 成功之道——在成功中学训话记录(1946年10月)
- 457 国父与国庆(1946年10月)
- 459 回顾与希望(1946年10月)
- 461 学生深造的第一步——延平学院讲演记录(1946年11月)

- 469 如何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1946年12月)
- 472 本报创刊周年纪念感言(1947年1月)
- 474 如何推进台湾生产建设——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省训团对全体学员精神讲话(1947年1月)
- 479 台湾心理建设问题——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对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演讲(1947年2月)

### 第三辑 日本军事外交

- 489 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1931年12月)
- 522 日本军事法西斯论(1938年1月)
- 530 最近日寇的外交动向(1938年2月)
- 533 日苏最近的纠纷(1938年5月)
- 541 日本军队的莫斯科(1938年12月)
- 544 日本进攻英国吗?(1939年2月)
- 547 日本再度向苏联屈膝(1939年3月)
- 550 日本排英运动(1939年3月)
- 553 日本对第三国政策的二元性(1939年6月)
- 555 日本为什么没有参加德意同盟(1939年6月)
- 557 德意军事同盟与日本(1939年6月)
- 561 日军南侵北攻下的新出丑(1939年7月)

- 564 日本军事代表团赴德意(1939年8月)
- 567 美日斗争的新开展(1939年9月)
- 584 苏德协定与日本(1939年9月)
- 594 日本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意义  
(1939年9月)
- 597 日本对美软硬并施(1939年9月)
- 600 美日谈判的前途(1939年11月)
- 603 日本外交往何处去——亲英美可能吗?  
(1939年11月)
- 617 日本急于与苏联谈判的认识(1939年12月)
- 620 日本最近对美外交的剖述(1939年12月)
- 632 日苏谈判及其问题(1939年12月)
- 641 提防日阀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1940年4月)
- 646 日寇南进与对华策略——日寇结束中日战争  
三部曲(1940年11月)
- 660 日寇南进呢? 西进呢?(1941年3月)
- 663 日寇东亚圈外的圈圈(1941年3月)
- 667 再论日寇南进呢? 西进呢?(1941年6月)
- 672 日寇欲勾结德国平分世界(1941年6月)
- 676 美日谈判的展望(1941年11月)

## 卷三

### 第三辑 日本军事外交

- 681 东条内阁内外动向的检讨(1942年9月)  
692 日本战时外交及其动向(1943年1月)  
703 日本的军事动向与我们的警惕(1943年2月)  
713 日本最近军事动向(1943年6月)  
718 苏日会马上爆发战争吗?(1943年8月)  
728 日寇一年来的决战设施(1944年3月)

### 第四辑 日本政治

- 753 日本无产政党的研究(1930年12月)  
825 日本新内阁之前途的暗淡(1931年1月)  
834 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1931年12月)  
869 一年来的日本(1938年1月)  
878 日本右翼运动最近的狂态(1938年5月)  
889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与军部法西斯政府的确立  
(1938年6月)  
902 近卫内阁改组与今后动向(1938年6月)  
911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1938年7月)



- 919 战时日本社会危机的发展(1938年8月)
- 930 日本工潮新阶段的开始(1939年4月)
- 933 二年来没落过程上的日本内政(1939年8月)
- 946 日本外务省派阀斗争及其背景——战时斗争激烈化的秘密(1939年11月)
- 956 泥塘中的日本内政(1940年1月)
- 959 战争第四年日本政治总检讨(1940年1月)
- 972 日寇特殊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1940年9月)
- 981 日本的钦定宪法与阴性议会(1941年11月)
- 991 日本特殊选举制与官僚政党(1942年1月)
- 1001 日寇国民政治的没落——国民政治组织的纠纷(1943年12月)
- 1011 日本战时议会本质的检讨(1944年1月)
- 1024 如何铲除日本军权政治(1946年1月)
- 1029 日本军权政治终结与日本人民应有之努力(1946年1月)

## 卷四

### 第五辑 日本经济

- 1035 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1930年7月)
- 1089 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1931年12月)
- 1120 日本战时经济编制中的原料问题及其政策的动向(1937年1月)
- 1141 日本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  
(1937年9月)
- 1148 日寇对我侵略战争中的劳动问题(1938年3月)
- 1158 日本侵略战争中工业危机的发展(1938年6月)
- 1171 美国新经济恐慌对于日本的影响(1938年6月)
- 1181 日本农业经济的特质(1939年6月)
- 1189 日本货币政策的新攻势(1939年7月)
- 1192 日本帝国本质论——军阀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1939年1月~9月)
- 1236 日寇南进前的财政状况(1941年3月)
- 1246 日本半封建的农业经济——解开日本帝国特质之谜的一把钥匙(1941年6月)

- 1291 日寇通货膨胀的新发展(1941年7月)
- 1299 日寇的物产及动力总剖述(1941年7月)
- 1314 日寇战时的死亡问题(1941年9月)
- 1321 日本人口问题与移民政策(1943年5月)
- 1327 日本产业统制的三种制度(1943年9月)
- 1332 日本粮食增产政策的批判(1943年9月)
- 1341 日寇的“超重点”产业(1943年9月)
- 1347 日本战时中小工业的没落(1943年9月)
- 1352 美国雄厚生产威胁下日本船运的苦难  
(1944年1月)

## 卷五

### 第六辑 其他

- 1363 日本金解禁与中国(1930年1月)
- 1365 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1930年10月)
- 1374 中俄复交问题(1932年7月)
- 1379 东方民族运动与中国西北开发——帝国主义侵略  
的新转变与东方民族运动的新阶段(1932年7月)
- 1422 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将来(1934年6月)

- 1452 计划经济之理论的检讨(1935年1月)  
1477 抗战以来日本问题书籍总评(1938年7月)  
1489 介绍《日本资本主义论战》(1939年4月)  
1492 各国劳动力统制政策(1944年1月)

### 附录:有关记载、忆念、评论、年表

- 1519 悼宋斐如 / 李纯青  
1521 怀念二烈士宋斐如、区严华同志 / 陈文彬  
1522 杰出的思想家 伟大的爱国者 / 杨益群  
1544 冯玉祥与宋斐如相处的日记摘录 / 冯玉祥  
1576 追忆父亲宋斐如 / 宋亮  
1589 沉尸之冤何日申 / 何标  
1593 忆宋斐如先生 / 戴青田  
1594 访宋斐如副处长 / 丁文治  
1599 忆台湾民主战士宋斐如先生 / 戴青田  
1603 宋斐如殉难经过 / 宋洪涛 刘昌智口述  
1607 宋斐如著作年表 / 梁汝雄 张雅芳  
1641 宋斐如生平简介 / 翁晓波 梁汝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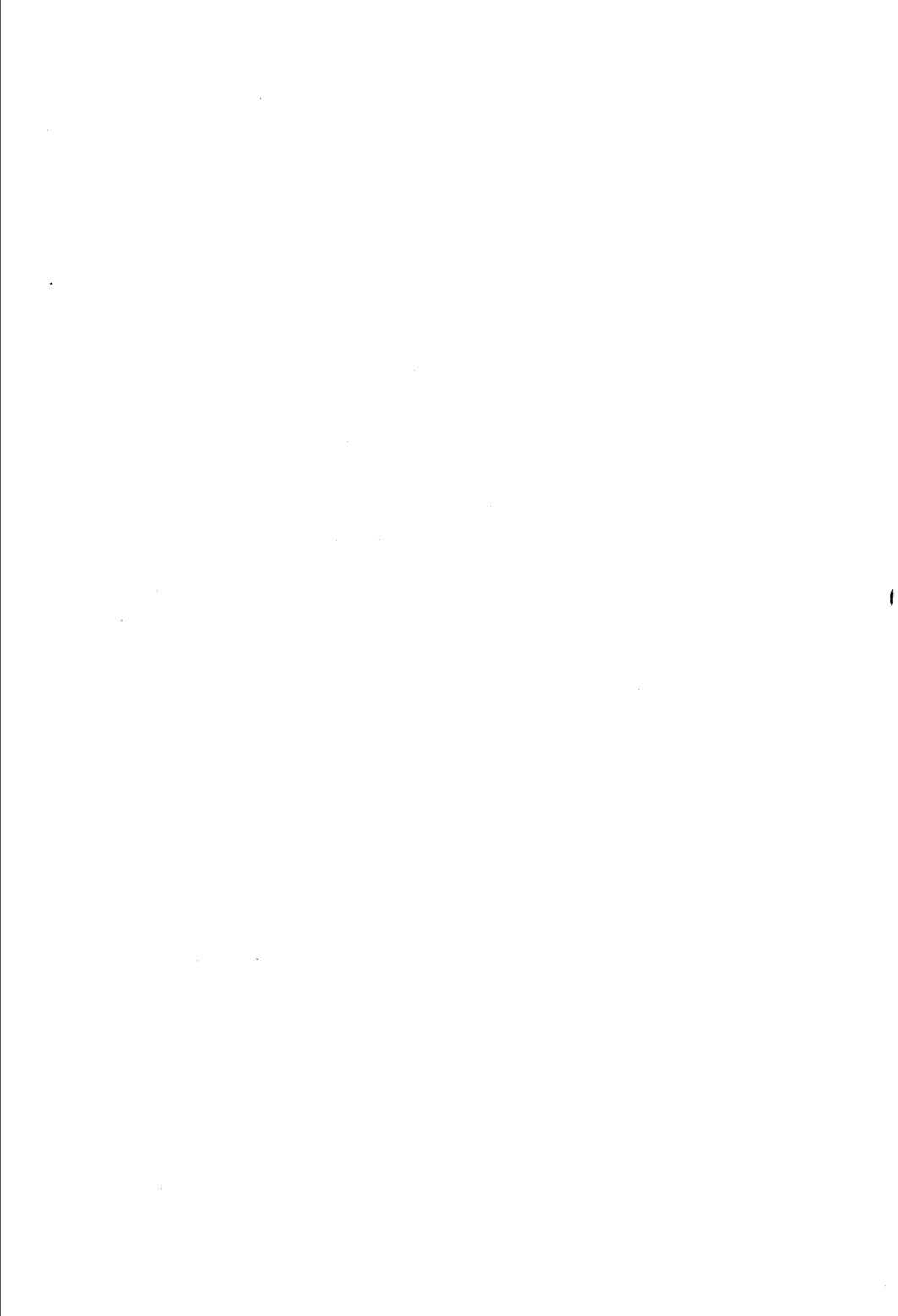
后记 / 编者



卷 一

第一辑 抗日运动

---



# 上海事变的检讨

## 一、引言

世事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在情理上不应该发生的事变往往竟然发生。此次的上海事变，可以说是一个实例。

上海事变发生的近因(或可谓为表面上的原因)，只在于五个日本人在三友实业社制造厂和中国普通民众(即依据由英法德西班牙挪威意大利等总领事所组织而成的上海调查团2月6日递送国联的报告书，也不过是，“最近组织的抗日义勇队队员”)的冲突。本来，这种冲突尽可依照国际公法和平解决，结果，竟至演成数十年来远东未有的战祸，实在出人意料之外。

尤其可怪者，上海战争的开始不在日本蓄意扰乱上海，烧毁三友实业社制造厂并提出五项要求而中国未加承认之先，却反发生于上海市当局顾虑及上海为经济的基础地点，公债的销场，财政的源泉，以及各国人命财产的猬集

地带等事项,而对于日本所提五项要求满口承受,并且节节实行的时候。当1月18日三友实业社制造厂发生过中日人民的冲突之后,日本方面不但由五十余名的“青年保卫团”的团员,纵火烧毁三友实业社的制造厂厂舍,并且由上海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秘书处提出五项蛮横不讲理的要求。上海市当局接日本总领事的的要求后,一方面立即向中立各国代表声明,准备接受,以避免双方的冲突;他方面,又努力劝告上海各界领袖,取消抗日运动,封闭民国日报,解散抗日救国会,等等。日本领事村井,对此也表示十分满意。但是上海战事却偏偏发生在这个上海市长满口承受日本各项要求,日本领事也表示十分满意的夜里,世上的事变还有比这个出奇的吗?

还有可奇之点,国联之中国调查团,27日乘奥其达亚号自法国起程的消息传到东方不久,而日本在上海的暴动就发作了。本为中日和平及远东和平而来的国联调查团,竟反成了导引战争暴乱之神。

然而,上述的不可思议,只是产生于表面的,肤浅的观察而已。大凡世上的大事变,一方面固有静的原因,他方面也非有动的原因不可。动的原因才实实在在是事变发生的根本要素。不然,不必发生的事变而偏偏大题小作地发生,没有发生理由的事变结果实现出来,发生原因可以消失的事变终不可避免,等等如上海事变者,将如何解释!

上海事变发生的动因,究竟在那里?这种原因,不在于



三友实业社制造厂前中日人民的冲突，不在于中国的身上，也不在日本“单独”的身上，而是在于“诸帝国主义”的关系上。诸帝国主义的关系，实是上海事变发生的总根源，讨论上海事变的人们，不能忽略这一点。且看上海事变的经过如何？上海事变的性质如何？帝国主义各国对于上海事变的措置如何？即可证明我人言之不谬。

## 二、上海事变的认识

各国人民杂居，帝国主义者商品集散场所的上海，居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轰毁。侨居外人最多，外国军备完全的地带，竟然难免于炮火的威胁。据《大公报》本年2月8日所载，各国在上海的侨民如下：

东京7日新联电，日本陆军省发表，昭和六年十二月侨居上海之列国居留民数如下：

英国 3,607人

美国 9,700人

法国 1,533人

意国 314人

德国 1,900人

因为侨民繁多，自然用以保护侨民的军队，也就不少。

据同报同日所载，各国驻上海军力如下：

又本月六日调查驻沪列国陆上兵力如下：

	陆军	陆战队
英国	3,400人	3,200人
美国	3,200人	3,000人
法国	2,400人	1,000人
意国	2,000人	无

外国侨民总数约近20,000人，兵力在18,000多人(事变发生后陆续调查者不计)的上海，终不能避去暴日的炸毁，非有特殊的原因不可。因为在此种地带，最容易引起更重大化的诸帝国主义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百孔千疮并且犹望繁荣”的诸帝国主义，现在最恐惧而努力避免的事情。

这种特殊的原因，谈本问题者非先有充分的认识不可。但要而言之，这种特殊的原因不外乎是诸帝国主义者“利益一致”的要求，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怂恿。此点，可以援引诸帝主义者处置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充当推论的准则。

当九·一八事变初起时，一般人即于惊慌失措之余，引用无异“空中楼阁”的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之将爆发，为失败时精神上的安慰。质言之，一般人皆引颈期待着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英、美、法、意等国对于日

本,加以有效的、武力的制裁,或变形的经济制裁。然而结果如何?诸帝国主义集团所支配、操纵的国际联盟会,对于九·一八事变怎样处理过来?国际联盟会,除了经过数日的讨论,议决了几项不着边际的议决案,或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结果外,还有什么成绩?诸帝国主义即使有时振翼一下“狐威”,也当不起日本一道抗议,马上就“噤若寒蝉”或只依然“摇旗呐喊”。其结果,当然只有(一)派遣调查团至中国考察一切,预备作成国际共管计划时用作参考,(二)他方面,要求日本“开放”东三省的门户,让他们来均沾一下。前者,距议决之日已阅四个多月的今日,业已实现了,国联中国调查团已经经由美国和日本到达中国,并且居然受到我国上下的热烈欢迎了。据说,他们对于上海战地曾详加查察,我国各界要人也曾献上热烈期待之辞,其将来的效力实未可轻易菲薄,所以暂不批判。后者则确然出于国联行政院主席保罗彭考(Paul, Boncour)之口,历历载于报纸之上,实是确定的事实,且看下列的电讯:

(日内瓦27日电)国联行政院主席保罗彭考氏,于今日上午再度与中日两国代表话谈,上海现时情势,严重性较见轻减,故或可避免讨论,彭氏拟努力令日人起草一适当之庄严宣言,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并声明无扩充领土意向,此项宣言将在行政院各开会议中宣读,作为渡过自现时至国联调查团抵华期间之一办法。

国联行政院主席彭考氏上面的要求，归纳其本意则为：日本之侵占东三省，不应该独自占领，而应该让诸帝国主义来机会均沾。日本若能宣言此种意旨并现于实行，恐怕彭考氏这种要求，不但是一种过渡的办法，或将成为永久的根本的办法。关于此点，拙作《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推测，不幸而言中了。而国联处置中日问题的这种态度，适足以引导日本帝国主义在淞沪暴动横行。国联一切的处置俟诸中国调查团的报告的议决案成立而日本积极增兵；上项彭考氏开放门户的唯一要求的消息传出不久，而上海事变即随之而发生。这就是我们说上海事变发生于诸帝国主义的怂恿的理由。

然而上海与东北，性质上根本不同。上海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是素来即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的东北所可与比。因此之故，日本不能照样将其东北的暴行，延长伸张至上海来。日本这样伸张其暴力入于英美的势力范围，岂不是故意和英美帝国主义作对，而他们所最害怕的，极力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岂不是入于一触即发的恐怖情状吗？发生这种疑问的人，当然不会没有。并且，这种疑问也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这种疑问是很容易解答的，英美等国对于日本之侵占东北，始终装聋作痴，充其量也不过假装干涉，恫吓日本对他们让步，使他们在东北染指。制裁的办法都是滑稽而空洞的实地调查，严格地说来，国联之派遣调查团来华考察，醉翁之意并不在酒，不在于考察日本侵占中

国的情状,而是在于考察日人所宣传的“非近代式国家”的紊乱状况,以为进行“变相共管”的张本。诸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和意向,日本当局观察得很清楚,透彻地明白。

日本当局已然看破诸帝国主义不积极干涉他侵占东北而只站在一边高喊(或竟可谓为“空喊”)门户开放,机会均沾,他自然会更进一步想:倘若他再充当诸帝国主义的“猎犬”,辟出诸帝国主义者计划中的变形共管的第一步局面,他们当然不会加以压制,或竟乐得欢迎。

日本决定主意之后,就先以便衣队日本浪人的暴行,试探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态度,继又以军队之利用公共租界掩护袭击中国军队,试探诸帝国主义的真意向。日本试探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诸帝国主义的态度,只是一味放任,怂恿而已。1月20日清晨,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三友实业社制造厂后,并且攻击工部局的警亭,刺杀,刀伤工部局的华警数名。但是帝国主义者当局概不追究。日本浪人结伴游行,而工部局派警保护,日本浪人击毁中国商店刺伤巡捕而工部局不过问。这种消息不但中国所有报纸皆有登载,即由上海各国总领事馆组成的上海调查团2月6日递呈国联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自然不能算是中国方面的构煽。

上述工部局对于日本暴行的优遇,若可说是放任,怂恿,那末,日军凭借公共租界以掩护其进攻华军,工部局反向我方提出抗议,就无异为虎作伥,积极帮忙了(据2月8日及13日《大公报》)。上海战争发生以来,期间经历一月之



久，日军之作战未始不以公共租界为护符，胜则猛烈进攻，败则退入租界，中国军队已不敢追击，租界当局也不许追击。日军因有此种保护和凭借，所以可以窥中国之虚，乘时进攻，以逸待劳。中国军队能保不败吗？下列电讯证明公共租界当局怎样优容日军，致使发生于我方不利的结果：

（上海24日下午7时专电）市政府24日函各领，日军利用租界，为攻击华军根据，迭经抗议，迄今租界当局，虽有愿维持中立之表示，但未闻采任何有效办法，制止其损坏中立，危害中外人生命财产行为，连日日援军又在租界当局之优容下，由虹口登陆，甚至日旗舰亦继续停泊虹口，利用租界掩护，发号施令，以攻我军民，虽明知各国船舶及其他产业，必因此蒙军事影响，亦所不恤，我当局对租界内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极关怀，惟处此情形之下，不得不重提抗议，严重声明，所有关于租界因不能制止日军利用租界为攻击根据所生一切结果，本国政府概不负任何责任，再为安全计，请通飭布告居住战区附近或日军驻在地，附近侨民，设法迁避，并转知各海军当局，勿将军舰及其他船舶，停泊于日军根据地附近。（2月28日《大公报》）

15日工部局发表的声明尤其可笑，且看其文：

(上海15日下午5时发专电)工部局总裁发表一文,说明租界中立性质,与保守中立国及永久中立国不同,仅于中国国内各派纷争时根据自律律,使租界免于受害而已,各国军队之登陆,作用不外保护本国侨民生命财产,其相互合作,亦为根据各国司令事先洽定,俾达共同目的,如此,中立之性质,全属于防卫的,并无对中国或他国攻击之用意,此次事前经各国司令之接洽,所定计划,亦纯属防卫性质,租界北区日侨较多,故划归日军防守,此防区分配,工部局不负责任,日军与他国军同,只有防卫,若其行动超出原定防卫计划以外,租界当局及各国司令均不能为之负责,工部局无权干涉各国军队,军队亦只对该国政府负责云云。

诸帝国主义者不但在上海这样优容,怂恿,帮助日本军队,同时并且供给日本以杀人利器,法国和捷克是被发觉的事例:

(南京27日下午5时30分本报专电)外部据巴黎报告,捷克京城捷克斯可达工厂,已供给日本毒气弹26,000枚,强度爆烈弹18,000枚,此仅系第一批,日本在捷克波兰所定购弹药军器等,计超过300万金元。又法国制造军器各工厂,均由日本定购大批军器,如迫击炮野战炮哈奇克斯机关枪弹

来福枪弹等甚夥，各工厂均获厚利，又自动车厂闻亦代日本制炮弹。（《北平晨报》2月28日）

根据以上所述，上海事变的根本性质，可以认识清楚了。从前在东北事变阶段中的中日问题，不是中日二国的单独问题，上海事变阶段中的中日问题，尤其不是单纯的中日问题。在这种问题当中，处处都会有诸帝国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向中国进攻的意味——虽则他们的态度，有时灰暗不明。要而言之，上海事变的根本性质，一方面日本愿为其他帝国主义当“猎犬”，他方面诸帝国主义也乐用日本为他们的猎犬。

### 三、上海事变的经过

上海事变之起，一方面固由于诸帝国主义的怂恿，他方面也由于中国自身的懦弱。诸帝国主义的怂恿不自三友实业社制造厂的烧毁时起，中国方面的懦弱也非始于上海市长吴铁城氏的宽大包容。日本陆军部至今犹常以二小时短时间内侵占了东北诸重要市镇夸示于世界。天津数次由扰乱而得到莫大胜利的结果，尤使日本的这种自负心，夸大狂，越有根据，而其暴行越发一日千里地前进。因此，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将军，才有“四小时内便完全驱逐十九路军，占领上海”的豪语。4小时二倍于2小时，上海驻军的身价固然增加不小，但是上海事变就在这种氛围气当中发生了。

由三友实业社制造厂门前中日人民的冲突，而日本青年保护团放火杀人，而日本官方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及要求，市长满口承受犹不能阻止事变之发生，而1月28日晚上军队的冲突爆发，战争一直继续到3月2日我方军总退却为止，日军在上海吴淞一带暴行，历时34日，日军最高军官易人4次，双方死伤军民共计当在数十万，物质的损失亦甚巨（详后节），悲壮固然悲壮，帝国主义狞恶的面孔，则完全毕露出来了。

1月18日，三友实业社制造厂前，中日人民冲突之后，日本方面不但聚集浪人数十，手持武器引火材料，烧毁房屋，杀伤民众及巡捕，并且由日本驻沪总领事突于1月28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下列五项要求：

（一）市长正式道歉；

（二）立即逮捕凶犯；

（三）损害赔偿及医药费；

（四）抗日运动应以适当手段取缔之；

（五）所有鼓励敌视日本，鼓励暴动，及鼓励排日各项团体，应予解散。

上列五项日方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氏固然为了所谓“忍辱求全”，而全部加以承受，实行封闭民国日报，解散抗日救国会，并且得到日方完全满意的表示，但犹不能阻止日本军阀之逞。因为事情倘若如此沉静下去，日本充当诸帝国主义的猎犬的企图无从实现，所以日方更进一步，由日本海陆军司令盐泽通谍，要求我方驻闸北的防军悉数撤

退。这种要求,倘若日军肯分与少许时间,或许不致成为问题。但是日本军阀深悉今日的中国,已经上下一心信仰“无抵抗主义”,万一我方又承受日方的要求而撤防,猎犬之志又将不得逞。所以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实于上项牒文由日总领事转递上海市政府(时为28日夜11时25分),不待市政府转送防军的仅仅五分钟的短时间之后,首由日海军陆战队在闸北天通庵等处,猛向我方军开衅。

我方不及待接上峰的命令而应战的结果,双方正式军队的战争,乃继续下去了。在战争继续的期间,因为我国军队的作战状态,有如中外人士所赞赏,勇敢万分,有进无退,能以血肉当铁甲车,以大刀当机关枪,用整个的“活肉团”抵挡大炮,其悲壮不在日本某大佐的著作“肉弹”叙述日俄战时日军勇敢之下,所以日方终不得屡战屡败,甚至不得不数易主帅,由盐泽而野村,而曾戮济南的宿将植田,而日本著名的大将白川。在这期间,我们每日只在报纸上阅读我方军队怎样勇敢,怎样胜利,怎样越打越起劲……的消息。同为爱好和平——真正和平的人类,尤其是同为被侮辱的中国人民的我们,每次阅读此种捷报,精神无不兴奋至于万分。其时的心理正与目下对于强力强权没有办法的一般中国民众,心中皆期待着日本三岛再来一次剧烈而普遍的地震,或许是一样的。每日捷音如雪片的纷飞,和赞赏的颂文,真不胜数,在一般民众的脑中自然印刻很深,所以用不着我们再来赘述重复。

这种捷报一直传至3月2日我军分路总退却为止。据当



时各报所载官方的宣布,3月2日的总退却是出于自动的,为战略上所必要的。十九路军宣传处主任王志远,曾发表我方总退却的原因四种,照录于下:

(一)浏河方面前晚有日军数千人登陆,当时我方驻于该处之军队,其数甚少,寡众悬殊,日人又用飞机投烟幕弹,使我军处于烟雾迷漫中,方向无从捉摸,致敌军得以潜自登岸。该地既为敌军占领,我军腹背受敌,在江湾庙行大场等处之军队不得不退,迟则全数牺牲。此不得不退却者一。

(二)我军左翼被压迫过甚,敌军于前日开炮达数千发,飞机不时投弹,我军军械不如敌军,只能用步枪抵抗,万难发展。此不得不退却者二。

(三)昆山方面之桥梁已被日机炸弹炸毁,不能运输,前后殊难呼应。此不得不退却者三。

(四)我方援军为数甚少,日方日有军队来沪,其兵力已达10万,以我疲乏之师,敌彼生力之军,自难取胜。此不得不退却者四。(据《大公报》所载上海2日下午10时10分专电)

就上列四项原因质言之,第一原因因为日军之袭占浏河,第二原因因为我军械不如敌军,第三原因为敌截断援军的来源,第四原因为我方援军太少,据说第一原因之由来,在于王庚之失地图(或竟传为卖地图)。王庚当此国家民族

存亡之秋，竟敢殉私情身带军略上的重要物件，至敌方势力范围内，访他那个藕断丝连的前妻，温他的美人归梦，未免太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了。这样安闲的态度，殉私的情怀，恐怕除中国人而外，没有第二个。第二原因之军械不如敌人，也未免令人怀疑。我们民众每年因治兵而被绞榨的脂血不知多少。治兵而不讲求军器，及至战事发生时乃徒叹嘘嘘。并闻中央的军队里面，新式军械相当完备，为何不拿出来对国际的敌人试试看？第三原因为后方被截，援兵不继。在此理应举国奋起，全国出动的时候，平常人民费无数金钱养饲下来的数百万军队，究竟到哪里去了？连面积不及一县的地带尚且不能扼守，致使铁桥铁路为敌人所炸毁，而援军不到。又闻津浦线援军格于日舰在黄浦江的阻碍。然则我们的海军为何不趁此机会试一试身手呢？好了！诚如名教授陶希圣所言，现在中国各地共匪作祟，全国的常备军都用在镇压共匪，使中国现势能够维持一个“平衡”。因此，军队不能轻于调动。我方真有如此苦衷，自然难怪其一时无从调动援军。因而第四原因，得以构成此次全部撤退的根本动机。

无意中，竟就我方撤兵的经过及原因，谈得太多了。但是，无论如何，此次淞沪的战事总算结束了，至少也算告一段落了。从此由战争而入于外交的交涉了。中国每次外交的交涉都有居第三者地位的帝国主义者参杂其间，此次上海事变的外交战里面，自然难免他们充当主角。且看诸帝国主义怎样处理上海事变！

#### 四、国联怎样处理上海事变

要知道诸帝国主义处理所有国际问题的态度，莫如研究国际联盟开会讨论的经过及其议决案。盖因国际联盟是诸帝国主义（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会员国，但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他和国联已有密切的关系）意向的总汇，国际联盟会员虽然不限于帝国主义，弱小国家也参加在内，当然有他们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但是事实上，国联的大权握于英法意诸帝国主义，一切皆为所操纵支配，弱小国家无非充充陪客罢了。

东北事变阶段中的中日问题，经国联开会讨论数月决议数次的结果，最后只决定派遣中国调查团到中国来考察一切情状，这是上面说过的。这种办法显然是国联对中国的敷衍，欲于掩耳盗铃的情状之下卸却他们的责任。（即使我们为避嫌疑而不断定其为国际共管中国计划的预备步骤。）但是不幸得很，东北事变未了结而上海事变即接踵到来。国联对此，究竟又要些什么把戏，改变些什么花样？！国联处理上海事变阶段的中日问题的会议，截止现在为止，共有两个大会：其一为1月25日开始的联盟理事会，其二为3月3日开始的特别会议。且分别检讨于下。

国际联盟会，因为12月10日巴黎会议闭幕至1月25日之间，果如他们所认定的，中日间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所以直至预定的1月25日，始继续举行第66次理事会。此次

会议的题目除裁军问题而外，就是中日问题占最重要，裁军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现在只就此次理事会处理中日问题——上海事变阶段的中日问题的经过略为一述。

此次理事会开会约经一月多日，对于中日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可以分为四个小段落。第一段落，联盟理事会乍开会的时候，正直日本扰乱上海，杀人放火，希图中日问题扩大的酝酿中，因此，开会的的第一天就有我国代表报告上海形势的恶化，要求国联制止日本的暴行。但是理事会继续讨论五六日，依然毫无结果。直至30日始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先组织上海调查委员会。这依然是派遣国联中国调查团的故技，依然不出于敷衍中国的意味之外。第二段落，上海战事自1月28日开始以来，愈益剧烈化，上海的秩序岌岌可危，有被破坏之虑。各国顾虑上海的经济关系，所以一变从前敷衍的态度，对于中日问题非常重视，自2日起理事会的讨论集中于中日问题上，直至9日1周间，中日双方代表舌战很剧烈。但是结果也不过是议长彭考(Paul Boncour)提出设立中立地带的劝告罢了，第三段落，一方面因为我国代表提出适用联盟规约第15条的要求而各弱小国家的代表均表赞同，他方面又因为日本植田司令在19日向十九路军提出哀的美敦书，国联始决定3月3日召集联盟大会，以讨论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理事会无能力的一种表示。第四段落，联盟理事会的情势由紧张的焦点降入于和平空气中。自19日日方提出哀的美敦书之后，上海战争越趋剧烈化，各国在上海经济基础受到极大的威胁，所以各

国希望上海战争早日完结，而中日问题全由外交来解决。于是日本的国际上的情势略变不利。而日本外相芳泽氏乃有下列意旨的声明：日本在上海并无设立专管租界及政治的野心。借以表示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的利害并无冲突。同时，又提出一种提议：上海问题由各国召集圆桌会议，讨论解决的办法。日本如此表示她与其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不冲突，并转移各国联盟代表的注意。29日的公开会议上，果然由于议长彭考氏的提议，决定召集上海圆桌会议，以解决上海问题。于是第66次国联理事会对于中日问题的讨论，乃告一结束。但是，这个结束只是不束之结，中日问题的纠纷依然存在，并且扩大。

国联理事会解决不了上海事变，其次的希望就是特别大会的讨论了。不幸之至，我国本来即未占优势的国际地位，此次大会中，更因战争的失败，越发处于不利的环境。十九路军是在3月2日总退却的，特别会议是在3月3日开的。开会的第一天，又是我国代表首先陈述日本之无理的压迫，并要求日军退出淞沪。继则中日双方代表开始辩论。4日，大会乃通过重申中日双方实行停战的决议，并且声明大会认违反此劝告为严重事情。但是严重自严重，双方的冲突自冲突，日军的压迫依然继续，国联却不能奈何她。各小国睹此情形，颇不满国联的软弱，5、6两日，各国代表的辩论十分激烈。至8日始组织起草委员会，整理各种议案，编成下列意旨的总议案：双方允诺履行条约，遵守联盟规约、九国公约及国联前所通过的决议案，并主张维持条约

的尊严,不赞成抵制日本。同时,提议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担负调停的责任。此项总议案虽在11日大会上全体通过,但其效力恐怕除“履行条约”(或许专指中国而言)及“不赞成抵制日本”藉以在抑中国而外,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因为联盟规约、九国公约及国联决议案,日本早已一脚踢到九霄云外了。于是我国人民对于国联特别会议的瞩望,也成了泡影。不信,再细查总议决案要点:(二)日本撤兵虽无限期,但于5月1日大会在开会前,必须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不特间接限期撤兵,凡九·一八以后所造成之一切形势,皆应取消。(四)此正式议决案,中国接受之后,如日本拒接受,仍从事战争,盟约第60条之规定,将自然生效。(据《时事月报》4月号)然而,日本现在已再“从事战争”了,下列电讯可证,盟约第60条发生效力了没有?

(本报苏州22日下午10时49分专电)养(22日)白川至太仓东朱家桥阵地视察,并指示敌方防务,及一切机宜,陆渡桥敌续增二千余,形势严重。

(本报上海23日上午1时38分专电)常熟电,马(21日)晚11时,太仓10余里之金木桥午桥一带有剧战,至养(22日)午3时止,我军死伤六名,敌损失颇多。

(本报上海22日下午10时专电)前线形势益见紧张,官方消息,养(22日)下午2时敌军进犯太仓与我军接触,至5时敌不支退却,浏河养(22日)由



罗店开到日军二千余，陆渡桥二百，新塘市四百余，形势严重，日趋紧张。（据4月23日《世界日报》）

要而言之，诸帝国主义意向总汇处的国际联盟，对于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是“合伙打劫”的，对于他们打劫的伙伴们，自然不会太与为难。固然，有时伙伴之间会发生分赃不均引起冲突的事相，但是这种不均自然会趋于“均”，即真有多少不均，打劫的伙伴们绝对不会替“赃的所有主”抱不平，或竟为他出力。考察国联屡次关于中日问题的处置之不着边际，可以想见。现在，一切中日问题的解决责任和希望，都集在国联调查团身上。将来，调查团的成效能不如日本外务省人员之观察，“不过旅行而已”，我们实在担心。下列电讯述之颇详，读之，且可明白各国的态度。

（东京25日合众社电）据此间外务省人员之观察，谓国联满洲调查团于数星期后抵华北各省，将发见一已完成之事实。且调查团之报告，与日本在最近之将来对于亚洲北部之政策，无何影响，外国观察者断言日本藉其所拥立之中国新政权以管辖满洲。此全然受日军阀扶植之中国新政权，于国联调查员抵达肇事地点时，已大部完成，就最近结果观之，则国联调查团之赴满洲，仅能作为旅行，将其见所得，纪之而已。日本方面仍然可进行其巩固管辖满洲之工作，深信欧洲各重要国家以及美国

之政策，将不受国联调查团调查结果之影响。美国政策业于本月中司汀生氏致中日两国政府之照会确实表示之，美国下任之政府，亦将遵守此项政策。英国之政策，虽未如美国之具体表示，惟亦极显明，大半与美国所采之方针相同。由伦敦方面简单宣言赞成司汀生氏之照会，及请日本重申驻英日大使所表示。

这种“万能”的，将要“救活我四万万中华国民”的神祇，总算巡遍了全国，我国上下的大人先生们，把他们几乎抬上天去了，但是不知道未来的事实，又将如何证明！

## 五、上海事变中中国的损失

国联对于中日问题的解决效力，现在固然只能用(?)符号表示出来，作为悬案，但是诸帝国主义之解决沪案，除国联的讨议外，尚有上海方面各国公使的调停，此种调停的发生，出于诸帝国主义的利害观，诚怕上海战争扩大，危及他们的经济基础，按诸理论，应有相当的效力。但是事实上则自英法公使出为奔走，肯特舰(Kent)上的停战以来，经过不少的曲折，而结果依然无有。这无非由于他们的根本态度。现在战事已告一段落了，再度激战的希望已经很少，他们更用不着着慌了。将来更不堪设想。上海事变要获得圆满的解决，除非中国方面“让步到底”！

事变已经告一段落了。外交交涉的前途又极渺茫不可捉摸,我们的讨论似乎无再往前推进的必要了。我们现在应该来就此阶段的事变作个结束。这好似不幸而承“回禄先生”的光顾,器具被烧了,家产、工场也被烧了,一切设备的一切尽付灰烬了。现在,当“火险保险公司”的我们民众,只好来就这个损失,作个概要的估计,以便将来准备赔偿。

此次,日本对于沪淞一带的破坏,实破1918年以来的新纪录,若就东方说,更可说是数十年来未有的事实。日本此次在淞沪的横行残杀,不但加于军队身上,并且加于无关的民众;其烧毁的对象不独限于军营,军队的驻在地,并且祸及于民房、工厂。甚至如公共医院及文化机关,也肆意加以摧残。繁华稠密的上海遭此种横暴,损失之大自是意中事。兹据上海市社会局会同市商会及会计师公会,制发简表,举办初步调查,只住户、商店、工厂、房屋四项损失,即已达十四亿元以上。

### 上海战区损失统计表(元)

#### (一) 北区

##### (甲) 住户

(a) 财产损失 486,671,169.52

(b) 间接损失 79,260,883.36

(c) 棚户损失 603,900.00

共计 566,535,952.88

(乙)商店

(a)财产损失128,593,909.06

(b)间接损失18,954,258.40

共计147,548,168.00

(丙)房产

(a)直接损失201,166,661.00

(b)间接损失1,972,222.00

共计203,138,883.00

(丁)工厂

(a)直接损失45,327,916.00

(b)间接损失22,663,958.00

共计67,991,874.00

北区总计985,124,873.88

(二)南区

(甲)住户17,568,102.60

(乙)商店161,925,198.00

(丙)房屋930,555.00

(丁)工厂5,624,657.50

南区总计188,048,513.10

(三)特区

(甲)商店

(a)公共租界193,396,208.40

(b)法租界95,267,499.60

共计288,663,708.00

(乙)工厂23,534,755.75

特区总计312,198,463.75

累计总损失金额1,485,461,854.73

附注：

(一)本表之编制，根据3月17日《大公报》所载上海市社会局会同市商会及会计师公会调查的结果。

(二)本估计表以各区受灾之轻重，分为直接受灾区与间接受灾区。直接受灾区（即本表之北区）为闸北、引翔、殷行吴淞、江湾、真如、彭浦等市区；间接受灾区（即本表之南区及特区）为沪南、漕泾、法华、蒲淞、浦东等市区及公共租界法租界。

(三)直接受灾区所受损失，分直接财产及间接两项估计。其间接受灾区仅计其间接损失。

(四)本表仅就住户、商店、房屋、工厂4项估计。至于交通事业、学校公园、政府税收，金融疲滞等直接间接损失，均未计及。

(五)住户商店之家数，根据市公安局(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份户口统计。

(六)特区商店之家数，根据本商局号调查。

(七) 损失以统一调查处收到报告表平均计算。

(八) 房屋以市政府财政局房损推算。

(九) 工厂之家数及资本,根据本局调查。

上表为半官方的调查,其方法或许有多少出入,且未包罗完尽。兹再据中央统计处调查的结果,照录于下:

(上海通讯)上海自被日军侵犯以来,损害浩大,准备统计,最为需要,中央党部统计主任,兼代国民政府统计局长吴大钧,最近来沪,向各方调查,并编成上海市区内沪变损失初步估计统计,兹探志于下。

说明:

此次日军侵占淞沪附近之面积,达2,141方里,将两倍于上海市,惟嘉定,宝山,太仓等县属之区域,因交通阻隔,无法报告,且无旧案可稽,估计亦所不能,故调查颇需时日,兹先就上海市政府管辖区域内,(包括闸北吴淞江湾真如引翔殷行彭浦及南区特区等)所受损失,作为初步估计,余俟调查齐全时,再作更详确之统计。至本项估计之材料,悉系根据各机关之报告,以及各方面主管长官,依照原有记录,加以相当之估计。

(一) 全市损失可以数字形容者,达1,560,049,871元。



(二) 全市被侵占之面积,约474方里,受直接损害人民达180,816户,814,084人,占全市人口之半数(45%)其中死亡者,6,080人,受伤者,2,000人,失踪者,10,400人。

(三) 财产 被侵占区内,住户财产价值80亿元,损失十分之七,房屋价值,2.4亿元,损失十分之八点五,全市财产,受直接与间接损失之价值,达788,173,492元,房屋204,069,438元。

(四) 学校 被侵占区内,停顿之学校,计大学及专门10,中学31,小学192,失学之学生39,735人,占全市学生四分之一,计大学及专门6,286人,中学6,282人,小学27,167人。辍业之教职员3,107人,占全市教职员三分之一,计大学及专门1,166人,中学751人,小学190人。被焚炸或驻军之学校计大学及专门10,中学17,小学49,被焚炸之资产达1,682,390元,占全市学校资产三分之一,计大学及专门12,294,736元,中学957,211元,小学431,453元,本市教育机关团体因沪变而全部停顿,亦受损失,尚未计入。

(五) 工业 被侵占区内,有工厂57家,占全市工厂四分之一,其中受损失者过半数,计67,991,874元,全市工厂受直接与间接损失之价值,达97,151,287元,此数仅就已有报告者计算,全数必不如此。全市工人,因事变而失产者达十分之

八,仅纱棉厂失业之工人,已达25万人,其因失业而损失之工资,每月375万元,如半年后复工,则损失2250万元。

(六)商业 被侵占区内,有商店12,915家,受损失者达十分之七,全市商店受直接与间接损失之价值,为598,136,074元。

(七)金融 全市银行与钱庄营业,因事变而减少十分之八点五。

(八)交通 被侵占区内铁路损失之价值,达16,893,317元,计占全路资产十分之四,计路轨与建筑,损失1,935,500元,机车与车辆损失989,030元,器具与设备损失10,974,913元,材料损失1,791,418元,营业损失1,202,456元,被侵占区内道路损失达130万元,桥梁损失20万元,全市轮船堆栈与转运公司之营业损失达1000万元。

(九)公用事业 被侵占区内公用事业之损失达1,742,025元,计水电损失10,212,000元,电气损失15万元,电话损失253,800元,长途汽车损失126,225元,被侵占区域以外公用事业之损失,达61万元,计电气损失43万元,自来水损失18万元。

(十)治安设备 被侵占区内公安设备因事变而损失者,达54万元。

(十一)财政 市府收入因事变而减少十分之四强,实减221,286元,计田赋减少21%,契税减少

24%，房捐减少81%，车捐减少53%（中央统计处制）（据《大公报》3月25日）。

据上表，全市损失超过15亿元，受损害人民达18万户，约占全市人口之半数；死伤失踪者18,000多人，此外，京沪路的损失，也达3,000万元，失踪路员130多人。且看下列电讯：

（上海24日下午6时发专电）京沪路真茹以东，现逐日由日兵自开军用车，其机车两架，系由东北运来，尚有两架系旧机车，经修理凑用者，淞沪铁路蒸气车除毁损者外，全在日军支配下，除北站各种损失外，至今客货运输损失每日70,000元，截至本月底，损失总数将达3,000万，而吴淞铁路工厂材料由日人随意取用，损失更无从统计，路员自交战至今失踪者130余人，生死不明（据4月25日《世界日报》）。

日本此次在淞沪间之暴行，可由上列各种确实报告证明出来。其暴行之特别出奇者，为肆意破坏文化机关，与超国界的文化为敌，其所破坏、摧残的文化机关，仅商务印书馆一家的损失，即达1,600余万元，并系出于故意的摧毁，即小如尚公小学的损失，也达50,000多元。

以上只是非战斗上的损失，至若因侵压而抵抗的军队作战上的损失，当更巨大，现在尚无统计。但只就日报章所

载华侨及国内各地各界的捐款,已足使我们的精神为之兴奋。据旧金山2月20日合众社电,广东银行经理宣布该地一处华侨电汇上海中国军队的捐款,2月20日截止,即已达美金100万元。各地合计总数之巨额,可以想见。而军民的生命,尤其无法估计,精神损失又将如何估算?

## 六、日本侵华的实际收获

根据上节所剖述,日本破坏上海可谓无微不至了,中国方面所蒙精神上物质上的损失,也可谓巨大了。但是日本这种举动,是有目的的,当然有所期待而始出于此举,因此,日本的实际收获,也有加检点的必要。

世界上破坏和损失的巨大,未有如战争的,故谓战争为人类最大的耗费,日本此次在沪作战,当然也不出此范围之外。不过,日本此次本身的耗费是一种投资,希望由此投资而得到利润。且先检点日方的投资情状。此种投资,约可分为二种:其一为军费的直接投资;其二为对华贸易损失的间接投资。此外,如其他的国家或他方对日敌视所酿成的损失,也可归纳入间接损失之内。兹分述之。

日本侵华的军费总额,据3月23日《大阪朝日新闻》所载,最初满洲事变的经费,即已拨用昭和六年(1931年)度第二预备金600万日金元,及陆海军岁出节约款项,约1500万日金元,总共达2100万日金元。至犬养内阁成立时满洲事变愈益扩大,上海方面的形势,也愈趋重大化,军部又决

定派兵赴沪。于是，犬养内阁乃三次要求根据宪法第七十条之紧急支出，总共支出金额，达7991万日金元。此款项是至要者。日本侵华军费总额，若全部合计，当在75,000余万日金元，其中，支出额为15,800余万元，公债发行额在6亿元以上(《大公报》3月29日所载)。

又据东京27日新联电，满洲事变费中4月经费，合陆、海、外务、关东州等处，约须6000万元，此项为提出临时议会协赞，目下正与大藏省折冲中，又满洲事变费之总额为28,500万元，分配如下(单位千元)，

外务省	2,200	陆军省	20,500
海军省	5,000	拓务省	305
朝鲜	200	关东州	300

若加入4月份之经费，则昭和七年度全部实达3.45亿元之巨额。

上列日本侵华军费包括侵略东北的军费在内。纯粹用于侵略上海的军费，虽然手内没有统计，但是上项侵华军费总额之大部分，用于攻击、烧毁上海可以推想而知。日本神户某西文报的评论，曾谓“上海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军事上金钱的耗费，日渐增高，已有倍于侵略满洲之时。……”东北各重要市镇的占领，只费二小时即已完成。其后，与各地义勇军的打战，尽可以利用东北汉奸的军队及全国第一完备的沈阳铁工厂现成的军械和子弹。上海的作战就完全两样了，全靠自己的军费。只据东京3月8日新联

电,日本政府经敕裁的第三次侵华费,用于上海事变的一部分,即有如下的数目:

(一)属于陆军省者 13,142,948日元

(二)属于海军省者 1,800,358日元

(三)属于外务省者 348,074日元

第三项固然用于日内瓦的,但也未始不可以视为日本侵华军费的间接费用,总共达1,500余万元。仅此一次的发表即已如此之巨,其总额更不用说了。

日本侵华的军费固然甚巨,间接损失的贸易上的损失,为数当不在小。此项损失目下虽然没有完全而精确的统计,但可知其概数。据日方透出消息,沪变后日商的损失,达9100万两(《世界日报》22日南京电)。

中国素来就是日本外国贸易的最大主顾,日本商店之向外输出,除美国而外,中国占第一位。再自各国对中国贸易的情状考察看,日本的百分数最高,居然占第一位。

#### 各国对华贸易比数表(1926年)

国别	贸易百分数(%)
日本	31.55
英国	29.28
美国	4.64
德国	1.92



法国 3.07  
 俄国 1.89  
 意国 0.51  
 中国本国 23.29

(注)据大西斋著《支那ノ现状》21页。

日本占第一位,其贸易额并且几乎达到各国对华贸易总额三分之一。又据《大公报》本年2月15日所载东京通讯,“日本在中国的投资额12.5亿美金,照平价换算,改为25亿日金,几占日本对外贸易之全额,其中,73%在满洲南部、上海一带之纺织及海运事业……”

这是日本侵略中国未太露骨以前的情状。但自日本侵华(如二十一条的要求,满蒙积极政策及济南出兵等等)激动中国民众的情感因出而排反日货以来,日本对华的贸易即日渐衰落,且看最近三年日本对华贸易之惨落(单位百万日金):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东北	64	35	11
华北	85	78	51
华中	188	139	88
华南	3	6	3
旅大	124	84	65
其他	3		
合计	467	342	218

据上引《大公报》所载东京通讯。

如上表所列，1930年度，不及1928年度之半数。

自满洲事变发生后，中国排斥日货的情势益趋锐化，而日本对华贸易，更加衰退，也是自取之咎呢！上引东京通讯，曾有一段言之中肯，兹照录于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贸易，更一落千丈，观于下列10月11月列国对华输出比较表，即可知之，(单位千海关两)

	10月	11月
美	25,113	29,150
英	10,582	9,173
法	1,445	1,901
德	7,671	7,372
日	17,906	10,929

观于上表，英美对华贸易，逐次增加，而日货之输入，骤形减少，日本国内工商业，几至停顿，日人忌愤之余，乃出于破坏上海经济组织之暴举，其结果乃恰相反，英美诸国为保全商务起见，出头干涉，日本丧失其国际上之地位，我国人饮恨益深，排货之举，更深刻化，日人将自食其果也。

又据日本商会的报告，日本本年度的对华输出额，比较上年度已减少64%。这个报告是在上海事变发生前发表

的,上海事变发生后,日本对华输出额之减少,当更增大无疑。因中国排日货日本所受损失金额,据上海日本商会会长远藤氏的报告,至1931年截止,已达1.85亿两。现在堆积于各码头及各货栈的日货,已在80万吨以上。日货被反日会封锁的,仅上海一隅即已达6,000万两。此项损失,还未包括几百万吨囤积于日本的货物。现在,由日本输入而停滞于上海的棉纱布匹,价格已达741.5万多两。同时,日本国内各纱厂由中国商人预定而现时不能交货的棉纱布匹,价格竟达3,342万多两惊人的数目。

日本因侵华而得到的对华贸易损失,不独限于由日本本国输出者,中国各地日本工厂产品的销场之完全丧失,也是巨大的损失。现在只就上海一隅的日纱厂的穷状言,则自最近反日运动开始以来,上海各日本纱厂所出的货物,有棉纱86,000包,棉布5,000包,其总数价值约4750万两,这些棉纱及棉布,皆无主顾而藏于货栈中。又日本人在上海他种企业所生产的价格5,000万两的货物,也无从觅得销场,徒叹唏嘘(均据上海日本纱厂主联合会所供给的数字)。

以上偏限于1931年的统计,各最近数月间的损失额,当更数倍于此。又上海日本纱厂大部分在此次事变的战区,住宅也集中于战区。此次遭日军自己的暴行,已完全被毁坏烧失。此项损失虽尚未精确的统计,但其巨大可以想见。天作孽还可逃,自作孽不可活!

此外,美国人民对日本感情之恶化,因而贸易上受到损失,以至菲律宾因怕日本人的阴险而拒绝日人的入境等

等,也都算是日本军阀侵华的果报。

日本侵华,尤其是上海的损失,根据上述可以知其大概。换言之,日本侵华的投资额算已绝大了。然而日本军阀对此绝大侵华的投资,究竟获得了什么报酬?世界上各部分人类的怨谤吗?占世界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民众的痛恨吗?日本军阀侵华的实际报酬,除非我国任何当局甘心屈辱,签订不利的条约外,恐怕不会得到什么。并且,只要中国民众能争气,恐怕结果将不出1919年西伯利亚远征之役,除耗费国帑70亿日金元外,一无所得吧?!

**附言:**

本文限于环境,篇幅和时间等关系,不能尽量发挥作者的意见,尚有几节应该加入检讨的,皆割弃不谈,或竟可以说只谈了问题的一面,实在对不起读者。但若读者能在所已检讨的字里行间去玩味,相信可以理解整个问题的大概。

(1932年4月15日)

原载1932年4月《新东方》第3卷二周年纪念特刊

# 日本侵占下东省的农业生产

## 一、农业在东省的重要性

一般人常说：“中国是农业国家”。尤其是异口同声皆谓：“东三省是一个有望的农业地方；将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农业国家”、“农业地方”，“将来农业经济的发展不可限量”等等说话，简言之，无非就是“农业经济重要性”的解释罢了。

然而农业的重要性，应以何种事实来具体证明？换言之，某一国家或某一地方的经济上，或产业生产上，具有某种特征或诸特征，始可谓该国家或地方的农业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我看来，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证明农业的重要性最可靠的事：第一，就是农业生产数量的巨大，尤其是农业生产数量在该国家或该地方的总生产量所占百分数的巨大；第二，就是农业出口数量之巨大，此项有两种含义，一方面须农产物的输出量所占总输出量百分数甚大，他方面须农产物输出额之大是“出超”而不

是入超；第三，就是现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大部分。此外，如耕地面积及未耕之可耕地面积之大，地质之优良，河流之丰富，以及气候之适宜等天然要素，也不失为证明农业重要性的事实。且逐次剖述之。

据日人的调查，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东三省输出贸易的金额为323,221千海关两<sup>①</sup>，加算对本国的移出额，110,815千海关两<sup>②</sup>，则东三省的出口总额共为434,036千海关两<sup>③</sup>。在此出口总额之中，如下表所列，只南满的大连、营口、安东三港的主要农产物及其粗加工品，即为246,876千海关两，约占十分之六。其实，精确的比率，尚不只此数，盖因下列各项农产品仅经由南满三港的主要者而已。若再加算北满之数，当在十分之七以上，普通南满的出口额数占全额85%。所以《中东经济月刊》第6卷第10期第11页，谓：“查东三省出口物品中除少数木材与煤外，其余则为农产物中之大豆、豆饼、豆油、小麦、高粱、玉米，暨其他一切之杂粮，约占十分之九有奇……”又据本年4月16日《大公报》所载《哈尔滨通信》。“东三省之输出总额，按中国海关统计，去年度（十九年度）为42,000万海关两，谷类之输出占75%，其余之25%，即占东三省之输出第二位者，乃是牲畜、木材、矿物等，价值亦达10,000万海关两以上……”《大公报》此项比率较近事实，上项《中东经济月刊》所载比率，恐系根据北满情形的忆测。但要而言之，东三省的输出总额之中，农产品之占大部分是无可疑议的事实。

南满的重要出口农产表(1927年)

品名	输出	移出	合计
大豆	82,310	17,835	100,145
豆饼	40,939	16,341	57,280
小米	20,934	305	21,139
豆油	7,850	13,290	21,140
柞蚕丝	7,093	1,492	8,585
小麦	3,214	532	3,746
高粱	2,587	16,112	18,699
麸	2,259	2	2,261
烟草	1,273	2,273	12,546
麻子	1,235		1,235
合计	169,694	77,182	246,876

(借考)本表为自己根据《满蒙事情十六讲》186及187页数字计算制成者。单位为千海关两。

重要出口农产品虽如上表所列巨额,而其他重要的非农产品的出口额,则非常之小。同年分非农产品的出口额:煤输出额占第一位,22,401千海关两;铁及其制品(包括输出外国与移出本国之额,以下各额同此)为7,515千海关两。木材及竹类为448万海关两。皮革为3,369千海关两。盐为1580千海关两。各项合计不过39,345千海关两<sup>④</sup>。与上表主要农产出口额之43,400余万海关两比较,尚不及十分之二。

然而农产品出口额虽为巨额,若他方面入口农产品也占巨额,则本地方的食粮仰给于外来农产,二者相抵,农业



的重要性仍不能评得过大。但是事实上,东三省的人民皆食用本地出产的粮食,如高粱、豆类、小米、小麦之类。自用之外尚有巨额剩余。

民国十九年谷类产消表(单位为吨)

地方	生产量	消费额	剩余额
南部	9,840,090	6,802,630	3,037,460
北部	8,536,250	5,673,110	2,863,140
合计	18,376,340	12,475,740	5,900,600

(备考)本表由《中东经济月刊》第6卷第10期《民国十九年东三省农产收获与输出之估计》一文所载表格改制而成。

据上表,东三省本地的农业消费量不过占生产量三分之二,而其剩余额占三分之一以上。但上面只就一般谷类言之,若东三省的几种特产的剩余,更为惊人的巨额。且举东三省第一特产而驰名世界的大豆为例,就其生产量,消费量,及输出额加以考察。

近四年大豆的产消表(单位为吨)

年别	生产额	地方消费额	输出额
1927	4,443,890	470,830	3,973,060
1928	4,838,040	817,620	4,020,430
1929	4,854,550	910,620	3,934,930
1930	5,268,270	940,740	4,327,530

(备考)本表根据本年4月19日《大公报》的《哈尔滨通信》。

根据上表可知：东三省本地的大豆消费量不过占生产量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二，而输出额反占大部分。即消费于本地方的大豆，大部分用于豆油及豆饼的制造，而豆油及豆饼又大多输出外国（例如日本农家所用豆饼大部分仰给于中国是一般人固知的事实），所以不能说是纯粹的本地消费，其纯正剩余额不止上表所列之数可知。

东三省主要非农产品出口额不及主要农产品出口额十分之二，而此项巨额出口并非由于本地粮食为外来谷类所代替的结果，事实上，本地生产量及消费量相减尚有5900.6千吨的剩余——东三省农业在其整个经济上所占重要性，可以由此事实窥见一斑了。

此外，如耕地面积的广大及农业人口比率之大，也为证明农业重要性的补充事实，所以顺便略为言之。据日人调查1928年东三省的耕地面积：辽宁省为5089.7千町步，吉林省为4787.3千町步，黑龙江省为3769.9千町步，合计13646.9千町步<sup>⑤</sup>。而号称“农业国家”的中国的耕地总面积，也不过92,762千町步而已<sup>⑥</sup>，东三省的耕地面积竟占中国耕地总面积15%弱。而可耕的未开垦地还有一倍有余。据日人腾冈启的估计东三省的可耕地面积当为3,000万町步<sup>⑦</sup>。又据日人高木秀夫的计算，辽宁省的既耕地占可耕地70%，吉林省占45%，黑龙江省占30%<sup>⑧</sup>，平均东三省既耕地只占48.3%，而未开垦的可耕地尚有一倍以上。耕地在整个经济上的价值，现在已就不小，能再加以集约的经营，

将来之增大实在不可限量。

现在东三省农业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率的巨大，也是证明农业重要性的一种事实。关于东三省农业人口究有多少，其在总人口所占比率又有多大，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据一般的估计，东三省的专业农家及兼业农家合算，当占全部人口80%~90%<sup>⑨</sup>。

根据以上所述，农业在东三省整个经济上所占重要性，已可以明了。

## 二、天然的农业要素

上节虽然述过农业在东三省经济所占的重要性，但其所以形成这种重要性的条件何在？自一般言之，农业的生产要素有三种：土地、劳力、资本。前一种为天然的要素，后二种为人为的要素。若自二者的重要性言，在农业生产上，人为的要素的重要性，实不及天然的要素多多。在农业经济未充分发达，集约耕种法未被采用的地方，天然要素的重要性，尤其重大。所以，在农业经济未充分发达的地方如东三省，欲究明它的农业所以重要的原因，应先阐明天然的要素，若人为的要素应视为次要的。天然要素于土地之外，尚有雨量及气候二者。因此，形成东三省农业的重要性的天然要素，可以列举如下三种：

- 1、可耕地之广大；
- 2、地质之肥沃；

### 3、气候及雨量的合宜。

“农为国本”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意思就是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然则农业经济的基本在哪里？农业经济的基本在“土地”。土地的经济价值，不但为我们农业国家的人所承认，即先进工业国家也不敢轻视。如果没有土地，根本就不能耕种。在讴歌科学万能的现代，尚不能造出土地，或同样效用的东西来。但是土地要具有农种的效用，须有面积广大的及地质肥沃的二种条件。否则，如日人一般的小庭院，如西伯利亚的大沙漠，虽有土地也于农耕无补。现在且来剖述东三省所具有的此二项条件。

东三省可耕地面积之广大，上节已详细说过，故不再作详述。这里只概括言之，东三省的既耕地面积，占中国现在耕地总面积15%弱；而其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在既耕地面积一倍以上。于此，自面积上说来的在东三省土地重要性，已经无须乎详细叙述了。

东三省的土地虽然广大，若其地质不良，多为不毛之地，则其于农耕仍不能发生效用。幸而东三省的地质并不见坏。土地大多是第四纪层，由冲积层及洪积层构成，是最新构成的土壤。并且很少沙地和砾地。藤冈启曾就满州土壤的特性，作过详细的分析，且引述于下：

（一）耕地大部分由第四纪层构成，洪积层多在奉天以北，而冲积层多在奉天以南。

（二）由太古层、古成层、及中世层构成的耕地，其分

布不广，只限于关东州内安奉线一部分，及其他北满的山地带。

(三) 农耕地土地的过半属于埴土，尤其是属于洪积层的南满北部的土壤，几乎全部由同种土壤构成。壤土及沙土多在南满南部，砂土只存在于河岸及山麓的地方，砾质土地发见于河岸山麓的一部分，安奉线的一部分关东州的倾斜地。

(四) 大体上多具可溶性盐分，在春季干燥期，阿尔加里(Alkali)的斑点出现于各地。但是纯粹阿尔加里的土壤，只在营口、白旗堡、南满铁路沿线的一部、及东部内蒙古等地方有之。其中，营口及白旗堡系由盐化物，汤冈子地方由硫酸盐，内蒙古由碳酸盐及盐化物构成。

(五) 土壤反应只有微盐基性，没有酸性土壤。

(六) 有机物及炭分含有量不多。

(七) 含水量少，但吸湿力及养分吸收力却大。

(八) 盐酸里，不溶解矿物质的含量很多。

(九) 石灰含量少。

(十) 苦土曹达含量多。

(十一) 磷酸丰富。

(十二) 加里丰富。

“满州的土壤，在理学的性质上，对于农业虽不足夸张，但在化学的性质上之良好，却是可以断言的。因为炭分及磷酸加里，对于植物的生育是最必要的。幸而满州土壤之富于磷酸，尚可以弥补炭分及有机物含有量的不足。

……”(以上据《满蒙さ新つしく见よ》37及38页)

换言之,东三省的土地大体上都不错,将来土壤学、肥料学,及土地改良论的应用,必能使其全部变成肥沃之地。

然而,土地面积尽管广大,地质尽管肥沃,若位置处于不宜于耕种的地方,如北冰洋,整天冰天雪地,则其农业上的效用仍等于零。易辞言之,气候与农耕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人皆因东三省的严寒而怀疑该地方的耕种。但是事实上该地方寒气之妨碍农种,却并不利害。东三省地处北纬 $39^{\circ} \sim 53^{\circ} 30''$ 之间,除南方一小部分留带海洋气质外,大体上都是大陆气候,寒暑之差很激烈,且寒冷时期较长。降霜时期也长,最短如哈尔滨方面也有140天之久。一年之中宜耕种的期间,北满约自5月至九十月之间,只有6个月,南满长些也只有7个月。此种情形似乎不宜于农种,而事实却不然。耕种期间虽短而温度很高,生育成熟急速的植物尚能相宜。雨量虽然缺少,但尚适于能耐干燥的农作物,如高粱、苞米、小米,各种麻类。又6、7、8、9四个月间的降雨量占全年雨量70%至80%,此期间正值耕作时期,所以利于耕种,甚至如中南部且宜于水稻的耕作。将来灌溉工事充分发达之后,浑河、太子河、辽河等大河的河水,更可以利用在这方面。满洲气候宜于农种之点,尚可举暴风雨之少。在农作物开花、成熟的期间,不像南方沿海地方那样,常有被暴雨打击之虞。

秋季雨量很少，便于收成后谷物的调制及收藏。这也是农作上优点之一。

如上所述，东三省有如是天然的农业要素，苟能再运用人为的要素如资本和劳力以开发之，将来农业经济的发展，实是不可限量。日人之夸称东三省为“农业王国”固有相当用意，但非完全无因。移民实边的政策，实有励行的价值。

### 三、农业的发展与农作的现状

#### (一)农业的发展

东三省因有上述充分的天然农业生产要素，所以农业经济自非发展不止。大凡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举：

- (1)耕地面积的扩大；
- (2)农产品生产额的增加；
- (3)农业人口的增多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三项事实为指标，而前二项尤为重要。惟是东三省现在不施行户口调查，所以关于农业人口无可靠的统计数字。关于农业生产技术，中国农民方面虽无多大进步，日俄人经营方面则甚可观，另于(二)“农作的现状”项下述也。

据日人的调查，东三省的耕地面积，1908年为8047.8千町步，至1928年增至13646.9千町步，前后20年间约增69%的耕地。



### 最近20年间耕地增加表

年度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合计	指数
1908	4,125,600	2,817,360	1,104,840	8,047,800	100
1913	4,388,400	3,408,840	1,602,000	9,399,240	118
1918	4,651,200	4,000,320	2,099,160	10,750,680	134
1923	4,914,000	4,591,800	2,556,320	12,102,120	150
1928	5,089,700	4,787,300	3,769,900	13,646,900	169

(备考)本表根据满铁调查课的调查,录自《新天地》杂志1931年3月号。上表单位为町步,每町步合16.1415华亩。

不但耕地面积有了急激的增大,即农产品的产额也有巨大的增加。

### 最近3年间农产品产额表

种类	1926	1927	1928
大豆	32,303	34,100	37,724
高粱	35,351	35,769	36,030
小米	25,431	27,503	28,491
玉米	12,983	13,058	13,371
小麦	5,864	10,940	11,235
合计	111,932	121,370	126,851

(备考)本表根据《新天地》杂志1931年3月号所载。

本表单位为千日石,每日石合1.7421华石。

前后相隔仅二年间,农产品的产额就有14,919千日石

的增加数,增加12%以上,不能不谓为急激的发展。其中,东北第一特产大豆的增产额尤其巨大。据本年4月19日《大公报》所载《哈尔滨通信》,最近四年间大豆的产额:1927年为4,443,890吨;1928年为4,838,040吨,1929年为4,854,550吨,至1930年急激增至5,268,270吨,前后约增五分之一强。

## (二)农作的现状

东三省的农业虽如上述,近年来颇有发展,但是农业技术方面,除几个特殊地方而外,实无多大的进步,农具概仍旧观,农耕法也极粗放。东三省农业民素来所使用农具的构造极其简单,是属于器具之类的耕器。又因土地过于广大,居民稀薄,用地的农民比较少的原故,农民概在比较广大的面积上,采用粗放的经营,利用天然富力。因此,深耕、施肥、土地改良等事宜,在东三省除日俄外人的施设而外,中国方面几乎可以说没有。

关于农种的改良,农具的改造,肥料的研究等等,东三省我国方面,无论是政府或是农家,皆极疏忽。农民因学识浅薄,一切生活皆操于天然条件,农耕只墨守旧法,固无可厚责,而政府方面的农政机关,早在二十几年前即已设置,成绩却完全无有,实堪浩叹。查东三省的农政机关之设置,早在光绪三十二年,以建设奉天农事试验场于沈阳大东边门外嘴矢。嗣后继续设立同样试验场于广宁、安东、盖平、海龙四县。后又设立奉天公立农事试验场于海城县及法库县,并设植物研究所及垦务公司等。吉林省城也有农事试

验场之设。光绪三十四年，更于黑龙江省，设立农事试验场一，垦务总局一，稽垦局三，清丈兼招垦局七，公署兼办荒务二。这些机关目的皆在从事于农政的实施，但其成绩却等于零。迨至现在，消灭者消灭，即不消灭也成了虚设的机关。

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三省农业技术之不进步，农种及土地之不改良，自是当然的道理。一般人以为东三省受到帝国主义的熏染最烈，认其已有相当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未免过于夸张。农业生产技术除几个特殊的地方而外，使用机器的农场几乎可以说没有。灌溉也一仍旧式的自然灌溉。东三省的农种及农业技术的进步，尚未可讴歌。

东三省的农作，完全受制于天然条件，概为“干燥农业”(Dry farming)。农作物以能耐干燥的高粱、大豆、小米等为首位。若需要多量水分的水稻，则除日韩人的经营而外，我国人耕种水稻者几乎没有。主要的农作物，就是大豆、高粱、玉米、小米、小麦、水稻等等。此外，尚有特用农作物，如棉花、烟草、甜菜、果实等等。此项，且留下节详述。

惟是，东三省中国方面的农耕虽无多大的进步，且无求进步的企图，而几个特殊地方则有很可观的施設，实地的耕种也已有相当的成绩。在东三省农业改良上最有成绩的，首推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公司，及现在已归日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当局。此二者的农业改良的目的及用意，或许与中国的略有不同，但其成绩则皆可观。

日本因其本国的人口问题，食粮问题，资源问题，工业

原料问题,被迫而不得不竭尽全力以作大陆经营,开发东三省。日本之经营大陆,除铁路事业而外,首推农业上的经营。实则,农业上的经营才是日本大陆经营的主要目的,铁路经营仅其手段则已。日本在东三省的农业经营,概由南满铁路公司行之。该公司早在大正二年(1913年)即设立农事试验场于南满铁路沿线主要农业地域的公主岭,不久又于熊岳城分设分场。大正十一年(即1922年)又分铁路公司的劝业课为农务课及商工课,农务课专掌农业经营的事宜。该课曾设立苗圃20处,试作场3处,大豆的原种圃3处,水稻的播种田3处,种羊场3处,种豚场1处,种豚饲养所四处,兽疫研究所1处,农业学校(现改农业实习所)2处,及试验场附属的实习所多处。后来又设立烟草的试作场,大连农事股份公司也随之而成立。这些机关皆锐意于农事的试验及农作的改良。农事试验场公主岭本场,内分农艺化学、种艺、病理昆虫,畜产四科,分场也置园艺、养蚕、种艺、林产4科。其他机关也皆完备,力求成绩之大。尤如农务课之雇用在美国经验水田经营多年的佐藤信元,以试用美国式机器经营于600英亩的水田,其精神实在可以佩服,非我国可比——虽其用意和目的颇有可议之处。

在东三省农业改良方面占第二位的,当然是中东铁路当局的施設。它曾于其本局内设置土地课,掌管农事试验场、土地分析业务、农具贷付业务、及畜产奖励等业务。1922年又设农事试验所于爱河、哈尔滨及安远三地方,以从事于农业改良实行方法的研究,别种有利植物种植条件

的研究,及改良该铁路主要输送谷类如大豆、小麦的研究。1923年又设研究所,从事于谷类的分析及豆类制品的试验研究。1926年又扩大农具贷与所,更加努力地改良农具的普及。中东路的一些施设和研究,实有相当的成绩。无论它的目的是在于增加输送货物的路政上,但其有利于东三省的农业生产,是不可否认的。

我国方面,近来也颇自振作,设立奉天水利局,企图引浑河之水以开辟水田。邹作华等人也作成兴安岭屯垦区的大规模开垦计划,对于将来东三省的农业生产,或许有相当成绩吧!但要促进这种事业的成就,“国内植民”(Home Colonization)是必要的。再顾及将来的民食问题,改革的国内植民法尤其是必要。此次当拟另题来讨论。

#### 四、农业生产的现状

东三省的农业生产,数量虽巨大,而农产种类却尚不多。东三省的农产大约可以分为下列两大类:

(一)普通农产;

(二)特用农产。

且逐项分述于下。

普通农业以大豆、高粱、玉米、小米为主要的,此外尚有小麦、水稻、大麦、早稻、糜子、稗子等等。特用农产是用以制造工业品的原料,有棉花、烟草、甜菜等物。此外,尚有果实也可包括在此类之中,且分项叙述之。

## (一)普通农产

### 大豆

东三省的农产之中,大豆首屈第一指。大豆产额的大部分输出外国,在国际上颇负盛名,是东三省的第一特产。它的用途很广,除充普通食粮,制造肥料的用途之外,还用以制造人造牛油、肥皂、药品,由大豆制造出来的豆粉,近来颇有取小麦粉的地位而自代之的趋势,国际的销路很广,因此,各国对于东三省的大豆,非常重视。美国商务部派人至东三省视察大豆。德国置领事于大连,据说也是专为大豆问题的研究。每年使用东三省的豆饼约近2,000担、5,500多海关两的日本,对于大豆更不能疏忽。

大豆的耕作面积,据日人的调查,1926年为26,037千反步<sup>①</sup>,同年产量约为2,250日石<sup>②</sup>。又据《大公报》本年4月19日所载《哈尔滨通讯》,1930年的产量为5,268千多吨。大豆的大部分产于中东铁路的沿线地域,而奉天南北次之。

因为大豆生产的繁盛,所以东三省的油坊工场也极繁盛。上面说过,大豆在工业上的效用很大,工业方面的消费量,比食用方面的消费量大得多多。东三省油坊工业的发达,不是偶然的。据日人的调查,东三省的油坊工场,截至1927年即已有448家,一昼夜可以制造豆饼531,500块,豆油2,656千多斤<sup>③</sup>。但是不幸,自去年来,因为世界恐慌,外国代替品的压迫,生产顿呈过胜,影响大豆栽种的前途,实在不小。

## 高粱

大豆在国际上负盛名，而高粱则为东三省本地方最必要的农产品。其产额也驾大豆而上之，实冠东三省各种农产。东三省本地方人普遍皆食用高粱，正如江南之使用米一样。高粱用途很广，除食用之外，且用以制粉、饲畜、酿造高粱酒。高粱秆用途也不狭，充作燃料、编席、制纸等等。又因为高粱适于东三省气候的干燥，所以一般农家皆栽种高粱。其栽种面积和产量，据日人统计，约为23,980千反步，28,980千日石。辽宁省占第一位，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又次之<sup>03</sup>。

高粱因其产量之丰富，所以充作本地方的食粮用等途之外，尚有巨额剩余，输出外国，每年的输出额达6,400千担以上，值价14,220千海关两有余。

## 玉米

“吃老玉米”是中国北方的一种流行话，而玉米之为北方人的主要食料，可以想见了。普通磨成粉，以制糕、馒头等物，供作食用，最近也用以酿酒，酿造高粱时参用之。北满地方就是以此目的而玉米的栽种很广。玉米茎可以充燃料，其叶充畜类的饲料。玉米之能耐干燥不在高粱之下，所以很合在东三省的气候。玉米的耕种面积为1,108,730反步，每年产量约达12,690千日石<sup>04</sup>每年且有增产五六十万日石的趋势。将来火酒制造及其他用途的研究成功，当更有急激的增产。现在每年输出额虽只有3,380千多担，值价9,770



千多海关两,将来用途扩大,当必急增。

### 小米

小米在东三省农业中的地位,自其产量言,仅次于大豆和高粱。换言之,小米是东三省的第三种主要农产。且因其输出朝鲜,以解决朝鲜的食粮问题,所以在远东国际关系,很关重要。其用途为食用(代替米),酿造用,畜类饲料等等。小米的栽种不宜于湿地,且无施肥的必要,所以很合东三省的气候及粗放耕种,小米目下的栽种面积,为19260千多反步,产额约为24,890千日石<sup>99</sup>,中东路沿线地方产额最多。小米的输出额为每年约为5,800千担,价格达2,480万海关两以上。其中,约五分之四输出于朝鲜。且有年年增加的倾向。盖因朝鲜产米虽多,大部分输送日本内地,以解决日本的米食问题,而朝鲜人则只能以次级食料的小米代之。苟无小米,朝鲜的食粮问题,将如何增加纠纷,小米在辽东国际上的效力实在不小。

### 小麦

小麦是北满的主要农产。因小麦性耐寒,所以宜于北满的栽种。小麦普通用途是制粉等等,是无庸详述的。中国用麦粉额很巨,东三省的小麦早年在英国市场很博好评。东三省的气候又宜于小麦的栽种,论理,栽种应该很发达,产额应该很巨,可惜,国人不知经营,或经营不得法,致使小麦的栽种萎靡不振。现在小麦的栽种面积只约为900万反步,产额也只733万日石。此数虽较1925年的产量727万余日石,有50,000多日石的增产,但犹不足以供当地人民

的消费，致使入口超过出口。1926年的人口额3,674千担，出口额仅为4,000多担<sup>66</sup>，超额竟达367万担有余的惊人数目。如何近年来世界恐慌，善麦拥至中国市场，其入超额当不止此数。

### 水稻

东三省农民的习性虽然不惯于水稻的栽种，但是东三省的大部分区域，尤其是南满一带，却于水稻的栽种很相宜。东三省6、7、8、9、10数月间的温度很高。一年中的大部分雨量，也在此期间降落，在水稻的开花期间没有暴风，不像东南沿岸各省常有受暴风袭击之虞。即如水稻栽种上最必要的灌溉用的河水，也很丰富。浑河、辽河、太子河等等，很可满足这种需要。将来如能讲求水利事业，利用机器灌溉，水稻栽种的希望，是不可限量的。可惜，东三省本国人皆不知经营，近年的栽种面积只有111千多町步，产额不过1,877千多日石。并且，大部份——几乎可以说全部——栽种面积，皆属之于日人及朝鲜人。其实，水稻栽种的利益，较比其他的农产如大豆、高粱、小米等大得多多，当在数倍之谱。据说，水稻每反步的纯利（自耕农经营）为18.36日元。又据日本农商务省技师的踏查概算，东三省可以辟为水田的土地，尚有百万町步以上。所以，日人计划每年开垦8,000町步至10,000町步，在数年期间达15万町步的预期数目，收获稻子540万日石，米270万日石，以救济日本内地的米荒。

## 其他杂谷

除上述主要普通农产之外,尚有大麦、陆稻、糜子、稗子等。大麦用于高粱酒酿造用的曲,造饴等。陆稻、糜子、稗子的用途,大抵限于食用及饲畜之用。东三省的气候不宜于大麦与陆稻的耕种,所以二者的品质很坏,栽种面积和产量也不多。栽种面积,大麦只有2,756千多反步,陆稻更少,只1,186千多反步;产量;大麦为3,117千多日石,陆稻为1,527千多日石。糜子及稗子的栽种面积及产量也不大:糜子栽种面积318万多反步,产量3,344千多日石,稗子栽种面积1,842千多反步,产量209万多日石<sup>77</sup>。

## (二)特用农产

东三省普通农产的种类,本就不多,特用农产尤其鲜少。这也是现代农业不发达的一证。大约有棉花、烟草、甜菜及果实。

### 棉花

种棉的期间约为5个月至8个月。宜于棉花的温度,幼苗时期为15℃至18℃,开花期为20℃至二十五六度,成熟期为15℃上下。适于此温度的地方,就是世界产棉最多的美国。而东三省的温度也尚相称。自4月20日以后,温度即急激变高。6、7、8、9月期间,很宜于棉花的生育、开花、开絮。虽自9月以后,秋冷渐烈,但能择早熟的棉种而栽种之,实在无碍于棉花的经营。自土质言,奉天以南安奉沿线地方比较相宜。辽宁省的辽阳、黑山、北镇、唐平、辽中、义县

等处,就是棉花的重要产地。近来,由铁岭至唐平一带,棉花的栽种也颇盛。关东州界内,因日人的奖励,棉的栽种尤盛。关东厅树立棉花奖励九年计划,预定九年后,于关东厅旱田面积22万町步之中,8,000町步用于棉花的栽种。东三省的可种棉地约有120万町步。中国政府如能改良棉种,加以奖励,东三省的棉产是很有希望的。可惜,目下棉花的生产额,只有棉实1,500万斤,制成棉花不过500万斤。又因本地棉质恶劣,大多用于被棉。

棉花对于人类的用处很大,其效用在生系以上。据说,世界的人口共有15亿,而服用棉衣或同类的,有12.5亿人,且其消费量与年俱增。这种刺激会鼓励世界种棉适宜地方逐渐种棉。即自现在东三省种棉的利益而言,即已在高粱、玉米之上。据日人藤冈启的计算,高粱每一天地栽种利益为1.38日元,玉米为7.44日元,而棉花即为12.15日元<sup>99</sup>。有如此巨大利益和需要,而东三省农民不知经营,必有其他的原因。这当然要归罪于农业政策的缺陷。

### 烟草

工业原料的农业不发达的东三省,烟草的栽种只是最近的事,尤其是最近数年间始有一点发达。现在只栽种于辽宁及吉林二省的几个地方。吉林栽种烟草的历史最古,而品质则以辽宁省凤凰城的出产品质为最优良。因为烟草是最新进的农产,所以栽种面积并不很大。除日人经营的关东厅而外,只凤凰城的栽种面积比较广大,大约有800天地左右,加算得利寺等地方,也不过900至1,000天地之谱。

烟草的产额估计为18万贯至20万贯,(每贯为6.25日斤,每日斤等于0.6公斤)值价约当四五十万日元。这些产量实在微之又微,无足言道,其发展惟有俟诸将来。

不过,日人经营的关东州方面,烟草的栽种情形就是不同。关东厅经济调查会曾立《十年计划》,施行种种奖励办法,以期达到栽种面积5,000町步,干叶总收量200万贯,总价460万日元。现在也已有相当的发展了。

观烟草之流行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大小男女几乎皆吸,幼年的小孩也吸用,烟草似乎不是好东西。但是,烟草现在已成社会一般的必需品,将来且有增进的倾向,已无可否认。东三省的烟草消费或许比关内少些,但其输入额也已不少。只1926年的输入量,即已超过500余万海关两,约当纸烟十七八万枝。此额换算原料,普通纸烟10,000枝需原料4贯20两,约为叶烟714千贯。此外,叶烟的输入额110万贯。东三省因为烟草的消费,每年损失500余万海关两,数额虽不大,也一漏卮哩。其实,东三省能改良增种现有美种烟草,补救并不困难。不独此也,且可以向关内开拓烟草市场,挽回利益的外溢。

### 甜菜

甜菜的栽种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气候、雨量和土质。东三省的土质,一般皆富于粘力。凡宜于高粱、小米、大豆及麦类的肥沃熟地,大概皆可以栽种甜菜。其理想的温度,第一期为10.7度,第二期为18.8度,第三期为16.5度。理想的雨量,则为97毫米 第二期为114毫米,第三期为100毫米。

东三省的气候与雨量,夏季虽然多雨而温度高,但至秋季,雨量已少,空气干燥,温度也相宜,所以大体上,宜于甜菜的栽种。各地栽种甜菜的结果,品质尚属优良,每反步收获量平均为780贯,含糖量15.34%,与其他各国的单位产量<sup>99</sup>比较,实不逊色。只自此品质之优良,也可证明东三省之适于甜菜的栽种。

然而可惜东三省的甜菜栽种并不发达。东三省的甜菜栽培事业,虽然早在宣统年间即已试行于北满。南满也于光绪三十二年,由日本技师试作于奉天本国的农事试验场,民三以降,满铁更进而试作于各地,但因后来的糖价跌落,糖业的不振,而其试作终无甚成绩可言。东三省现有的制糖公司,也只有中东路的阿什河制糖厂,哈尔滨的呼兰制糖厂及铁岭的南满制糖股份公司等处。甜菜的栽种面积,据日人的调查,早年南满有7,000多町步,北满有3,000多町步<sup>100</sup>,现在已大部改种别种农产。他方面外国糖继续输入不止,只1926年度,输入额即已达148千担,价值一百五十六万数千两。

现在甜菜的栽培及糖业虽然衰微不振,其利益却比普通农产的利益大。且世界的糖消费是与年而俱增的。所以,政府当局苟能加以适宜的奖励,东三省糖业的发达及甜菜栽种面积的增大,是有希望的。

### 果实

东三省的特用农产,除上述数量而外,最后还可以举果实。本来,果树的栽培事业,从产业上分数,究竟归纳在

林业部门好呢？归纳在农业部门好呢？是有相当讨论的余地的，不过，据我的意思，自其成果设想，还是归纳农业部门为对。所以，在本节的最后，再就东三省的果实生产说说。

对于果树的栽培最重要的，是气候、雨量及土质。东三省北部寒气严烈，而霜降期又太长，对于果树的栽培，不能算是太理想的地方。但是南部的某期间，尚能相宜。据日人藤冈启的分析，东三省有下列几种条件，适宜于果实的栽培：

- (1)春季气温上升迅速，而温度高；
- (2)夏季雨量少而湿度低；
- (3)日晒时数多；
- (4)晚霜期早。

藤冈氏并谓东三省的气候“与美国相仿佛”，是“世界的适宜地”，“较比日本内地及朝鲜的栽培地好得多多”。他对于土质也主张合宜，他以为“苹果等果实产于冲积层的砂质壤土”“尤其是味道及色泽好的果实，产于砾质壤土”，所以主张具有这种土质的东三省，尤其是关东州及安奉铁路沿线地方，栽培果实是最适宜的。

可惜，具有栽培果实适宜条件的东三省，果树的栽培事业，尚无可观的成绩。即有一点小成绩，也属于日人的经营。果树的栽培面积及果实的产量，只关东州一隅近年来略有增加。1922年关东州的果树栽培面积为11,000多反步，至五年后的1926年，即增至30,000反步；其产量也

由45,000多贯增至47万多贯；栽种面积约增一倍多，产量约增十倍。其他的地方既无成绩又无统计，所以概括说一句，东三省的果实生产是未来的事业。

## 五、结 言

总括以上所述，可知东三省的农业生产在其整个的产业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无论自其天然条件言，抑自其出产状态言，农业生产在目下占绝对的高位。惟是，东三省农业生产的发展，颇限于旧来的情状，没有多少新颖的变化。例如主要农产物只限于古来的本土农产的几种。现代式的农产，皆不发达，充其量也不过是未来的产业罢了。又如农业生产技术也然，我国农民只知一味袭用祖宗遗传下来的老法子。换言之，东三省因为农业生产的天然条件过于丰富的原故，一般的生产方法几近于自然的农种，通行非大农经营的粗放经营方法，离使用机器的现代式的粗放经营，或园艺式的集约经营，相去尚远。所以，东三省的农业生产犹不能谓已相当进步。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当局至少也要励行下列几种工作：

- ① 设立农事试验场，研究关于农业生产的事项；
- ② 将研究所得结果，推行于一般的农民之间；
- ③ 普及农业教育，增进一般的农业生产技术；
- ④ 讲求水利，采用最新的灌溉方法，俾新的农业生产得以进行；



⑤ 移植外省的农民以补充农业劳力之不足；

⑥ 由政府实施大农制的机器耕，以谋农业生产之横的发展。

本文所述只限于农业生产而已。他如在这种天然要素丰富的农业区内，农民经济的情状如何，也是我们所愿意解剖清楚的。因限于篇幅，故关于东三省的农民经济的解剖，留于下次的机会。

注释：

① 据《中东经济月刊》第6卷第10期“民国十九年东三省的输出额为2.58亿余万海关两，姑志以备证实”。

② 据《满蒙事情十六讲》184页。

③ 同上。

④ 各项皆据《满蒙事情十六讲》单项数字计算出来的。

⑤ 据满铁调查课调查，转录《新天地》本年三月号。

⑥ 据大西斋著《支那ノ现状》233页。

⑦ 据藤冈启著《满蒙ヲ新ラシク见ヨ》34页。

⑧ 据《新天地》杂志本年三月号。

⑨ 据同上杂志。

⑩ 据藤冈启同书46页。

(11) 同上。

(12) 同书52页。

(13) 同书54页。

(14) 同书56页。

(15) 同书59页。

(16) 同书64页。

(17) 同书74页。

(18) 同书77~79页。

(19) 各国甜菜的单位产量：每一反步，比利时为八百二贯六，德国为七百八十九贯六，瑞典为六百九十三贯六，法国为六百六十五贯一，奥地利为六百四十五贯二，俄国为三百七十九贯六。

(20) 藤冈同书85页。

**中日度量衡对照注：**

(1) 一町步约等17.64中亩。

(2) 一反步约等1.664中亩。

(3) 一日石约等于1.742中石。

原载1932年4月《新东方》第3卷二周年纪念特刊

##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

### 一、绪 言

自从“满洲事变”发生以来，吾人曾屡次宣告并提醒中国当局及民众：满洲事变不仅是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东方问题，是带有世界性的问题；若更确切明晰地说，它是诸帝国主义进一步宰割中国的整个阴谋之发动。要理解这种事实，我们可以就最近的国际情势，略加考察一下。诸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激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违反了“终熄战争之战争”（The warends wars）的期待，倒反促使诸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越发尖锐化，甚至陷资本主义构机于不可救药的境地，因而积极准备更激烈的更悲惨的未来战争，这种更加尖锐化的矛盾，具体表现出来的基本现象，就是普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没落，资本主义第三期的世界经济恐慌。由这个恐慌产生了诸帝国主义国内阶级对立锐化的事实，诸帝国主

义争夺商品销场投资市场独占原料供给地等对立激化的事实，各殖民地奋起反抗压迫的剥削的帝国主义的事实，以及满身疮痍的帝国主义集团与繁荣孤岛的苏俄深刻仇视的事实。这些事实无一不使诸帝国主义企图在巩固资本主义机构的前提条件之下，争趋东方尤其是中国来开辟他们的前途。陈旧的或东方别部分的事件暂且不提，即自最近的中国事情言，前年所谓国际的共同借款，所谓美国的银借款等等，都在表示这种企图的动向。但是遗憾得很，这种企图之中却未将现在帝国主义队里的主角的日本帝国主义编进去。结果遂由这种暗中利益的不均衡而爆发了具象上的不均衡之满洲事变。因此，可以说满洲事变是由诸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不均衡产生出来的，并且由此事变又重造成新的不均衡。

满洲事变既由上述情势产生，事变发生后的情势又是如此，那末，将来的趋向，也可以不言而喻了。其他帝国主义能否因此宰割之不均而自相火拼，及何时开始火拼的事情，我们虽然不敢遽下臆断，但是诸帝国主义之企图把不均衡的情势改造均衡，则可以断言。换言之，诸帝国主义都是通同打劫的伙伴，他们所企图的事情只是赃物的平均分配，至于失主的生死，他们是不会关心的。

诸帝国主义的上述企图，是由他们的集团性质规定好的，是没落资本主义第三期更加巩固好的命运，本无足怪。最可怪者，处在命运相反的环境之下的我们被压迫民族，竟有人丧心病狂地向以打劫为职务的帝国主义伙伴诉冤

去。其不能获得正当的裁判并且要上当,早在我们民众的意料之中,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声诉,早即加以反对。诸帝国主义集团的国际联盟会过去对于满洲事变的屡次评判及决议,或皆不利于中国,或于中国的利益不能发生实在的作用,都是国人有目者所共睹,并且我们已经屡次指摘过。即此次国联“假惺惺”的集大成,或“用意另有所在”的调查团的派遣,及该调查团提供国联用作解决中日纠纷的基本材料的报告书,亦都没有一句实在为中国设想的。这样的报告书,竟有丧心病狂的中国亲帝派,表示完全的满意或部分的满意。表示满意的亲帝派是否用意另有所在,姑且不谈,惟是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散布烟幕弹的狡猾手段及其烟幕内的真相,实有加以指摘和揭破的必要,俾使我们民众不受诸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毒害。

兹就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逐章加以批判。该报告书没有一项不错误,所以此种批判理应逐项详加分析。但以该报告书原文即已有二十余万言,详尽的批驳非达数十万言不可,实非定期刊物所能容受,所以这里只逐章批判其重要者,至于整个的详尽的批判,则俟诸另外的机会,或盼望表同情于此种批判的读者来共同完成。

## 二、第一章“中国近年变迁之概况”的批判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于中国的叙述及评价,有一个一贯的精神,就是抹杀时代性,倒果为因,以卸却诸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扰乱中国,致使中国社会不能安宁,不能近代化的责任。而这种一贯的精神在第一章《中国近年变迁的概况》的叙述中,尤其表现得十足。且揭穿于下。

该报告书第一章在“中国民族在进化中”的项下,叙述:“自1911年革命以来,中国之特点,乃为政变,内讧,及社会上暨经济上之恐慌。结果乃使中央政府日就衰颓。此种现象,所有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国,无不受其不良影响。倘不设法补救,势必继续危及世界和平,且为世界上不景气之助因。”

这真是丧心病狂!试问民国以来的“政变、内讧、及社会上经济上之恐慌”,是不是你们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是不是你们为宰割中国,永久占住在中国的权益而以中国社会为牺牲的产物?老实说,二十多年的民国史,就是帝国主义扰乱中国的记录。由此扰乱而受到利益的只是你们帝国主义,至若中国民众呢,只有蒙受毒害罢了。你们“无不受其不良影响”,究何所指?又,“继续危及世界和平,且为世界上不景气之助因”云云,真是颠倒是非之极致。帝国主义因为争夺中国市场,宰割中国领土之不均衡而引起自己内部的仇视和斗争,终至酿成直接的战争,或间接的中国内战。这是蒙盖不了被压迫民众及世界公平论者的眼睛的事实;帝国主义者却偏要说是中国内乱影响世界的和平。明明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产生的没落资本主义第三期的世界经济恐慌,影响经济落后的附庸经济地带——中国即为此种地带之一,发生经济恐慌,却偏硬说帝国主义一手造就的中国

不安现象，“为世界上经济不景气的助因”。其实，帝国主义未免太胆小，与其如上说法，倒不如说：“中国之不赶快完全殖民地化，以为资本主义没落的续命汤”之较为干脆。

其次，在同章“与日本比较”的项下，叙述：“当日本与泰西通商之始，其难题与中国无异。……亦遂设立外侨居留地，且订立单方面关税协约，并与以领事裁判权之权利。惟日本之解决此种问题，其方法为由内部改良，并将其种种新设施提高，使与泰西并驾齐驰，复用外交协商方式以行之。……惟日本同化于泰西科学及艺术，既如此神速而透彻……实为世人所赞美不置者也。”又在“中国之问题较为困难”项下，叙述：“然中国终须解决此项问题，实不能不沿与日本同样之途径。奈中国对于外国人士，不愿接纳，其已在华之外侨，亦加歧视，其不免造成不良之结果者势也。……”又在“中国与列强抗争之损失”项下，叙述：“关于种种权利及国际关系，中国与列强各持成见，无法融洽，势必出于抵触，发生战事，经数次战争之结果，中国主权逐渐损失，且割领土，计有阿穆尔河北岸之大地暨海滨全省，余为琉球群岛、香港、缅甸、安南、东京、老挝、交趾支那（越南诸省）、台湾、朝鲜、暨其他藩属诸国。此外尚有长期租借地数处，且准在中国领土内设立外国法庭、行政公署、及军警各机关。……且战败赔款甚巨，自此中国财政负担日重。甚至全国领土竟为列强分为若干势力范围，其本身之生存，亦曾遭危险。”

上列三段叙述，归结起来有两点：其一，日本当时充分

接收了泰西文化,所以强旺起来,中国因为不充分接收,所以日就衰落;其二,中国因为和列强抗拒,致使酿成战争,结果自己丧失权益,割让土地,赔偿款项……。我们且就此二点细加玩味。第一点,诸帝国主义对于二者所处时代性之不同,及他们当时对日本的需求与现在对中国需求之绝对迥异,故意加以掩饰,以卸却她们的罪恶。欧美列强当时对于日本所需求的,只是开国通商,所以美国水兵提督伯里氏炮击日本的结果,也不过缔结通商条约而去。其后即有多少不平等条约之订立,主要目的仍在于便利通商罢了。至若诸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呢,始则强制借地,继则贩卖鸦片毒害人民,终则企图加以瓜分或共管。到了没落资本主义第三期的现在,中国无论怎样希望“从根本上多方改良,……”已不可得了。因为诸帝国主义已经有意识的觉察中国是他们现阶段的续命汤,生命线了,故对于中国是利于乱,不利于治。再进一步说,诸帝国主义所已给与,或将给与中国的文化,都是毒害中国的文化,例如削弱中国民族精神的鸦片,培植内战的军火,吞没中国主权的借款办法,强制割让领土的条件缔结,等等。这些文化,老实不客气说,中国只好敬而远之;过去未及充分接受尚且受害到如此地步,倘若充分接受,恐怕早已完了。帝国主义者居心之险恶,于此可见。

再就第二点,中国因为和列强抗拒,致使酿成战争,结果自己丧失利权,割让土地,赔偿款项……等等。这才真正是强盗的口气!这好似说:强盗持武器企图劫掠居民时,居



民若不抵抗任其夺去财物，则必不至受伤或惨死。唉！原来泰西的文化就是如此，帝国主义的文明就是如此！

其次，叙述中国“中央政府之威权内外受敌”，“土匪遍地”，“共产党势日渐膨胀”，及“学生的政治活动，攻击政府及官吏”，等等，其结果，遂使各国不肯放弃不平等条约之一的领事裁判权，“徒使各国惊骇，对于现时藉为唯一保障之权利，更增不愿放弃之感。”又述：因此，甚至“屡有人提议，谓中国‘并非有组织之国家’，或谓中国内部‘完全紊乱，陷于无政府状态’，又谓中国现状如此，应取消其国际联合会会员国之资格，所有盟约中之保护各条款，均不适用于中国”。

这也是淆乱观听，颠倒是非之著者，请问中国那一个军阀的背后，没有帝国主义的魔手在那里排弄？军阀强盛的原因究竟何在？中央政府之威权内外所受到的敌，是不是你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军阀？并且，历次的中央政府究竟是那一种政府？它的威权是那一种威权？中国土匪之所以遍地，岂不是你们帝国主义者所制造的内战产生的吗？“共产党势日渐膨胀”的情势，是谁制造的？拉第克说得好，“革命不是能从旅行者的箱囊中带进来的，……革命是从内部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日就澎涨，岂不是你们帝国主义直接间接扰乱中国社会经济的条件培养出来的吗？帝国主义的魔手，终遮不了世界人类的耳目。又，学生所攻击的政府及官吏是那一种政府，那一种官吏？决没有清廉的官吏，革命政府而受攻击的。若像“五四时代”日本帝

国主义所排弄的政府，贪污官吏如曹汝霖，陆宗祥辈，即使打倒，打死，对于中国社会只有益而无害，表示不愿意的，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吧！至若借口于上述事实而不愿放弃领事裁判权，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本不值一驳。若因为你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局势而诬中国为“并非有组织之国家”，因而“应取消其国际联合会会员国之资格，所有盟约中之保护条款，均不适用于中国，”至少我们中国民众实在欢迎。因为国际联盟会正是帝国主义分割共管殖民地的总机关，中国之在国联，不啻富人和强盗相处，唯有被劫夺的危险。说到盟约中之保护条款，我们已经享受够了！陈久的事情不用说，满洲事变发生以来，国联之种种措置及此次调查团报告书的叙述及建议，就是这条款分外保护的表现！

第一章尚有一点直接与中日问题有关而不可忽视者。即历述共产军势力膨胀，“1932年夏间，南京政府宣布重要军事计划，以期消灭共党之抵抗力，……但直至今日，尚无重要之效果宣布”之后，遂下断言说：“大日本既为中国之比邻，又为最大之顾客，故因本章所述之扰乱情形而受之损失，自较任何其他国家为大，……日本既不能希望设有满意之安全保障以代替其条约上之权利，故自知无法可以满足中国之愿望。……日本对于在中国之人民生命财产上抱之顾虑，曾使其叠次干涉中国内战，或地方上之乱事。此项行动，向为中国人所嫉恶，而以其干涉之结果酿成武装冲突，如1928年济南事件者为尤甚。”这无异向中国民众说：“你们的中央政府没有力量一下肃清了共产党，致使社

会不安而危及外人,尤其是日本人,所以大日本屡次干涉中国内战或地方上之乱事,是很正常的。”其实,帝国主义者正可明白的说:中国若交由国联共管,那是一切乱事都易于肃清的;还可以更进一步说:日本之侵占满洲,是因为中国军队炸坏南满铁路的乱事(不管这种乱事之有无)所引起的,所以日本的措置非常正当。不过,在这段说话里面有一个极端的矛盾,竟由帝国主义者口中暴露出来。就是一方面把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责任放在中国政府之不能统一,不能“多方改良”上,但是他方面却又赞称日本帝国主义之阻止中国统一“多方改良”的干涉,“如1928年济南事件”。

本章最后建议处在这样紊乱状态之下的中国,应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方法。申言之,中国应该朱门洞开欢迎强盗进来,欢迎列强来投卖制品,来投放资本,来管理所有的产业,来支配所有的经济权,来任意剥削廉贱的劳力,结果中国人的企业都破坏,人民皆沦为贫穷群众。其实,结果恐怕不止如此。中国即使全部权益,整个领土及四万万的人民,双手捧献给诸帝国主义去任意排布,结果也未必能圆满,恐怕倒要引起分赃不均的争端,而终至火拼,以中国领土为战场,以中国人民为鱼肉。国际合作的归宿和意义,既是如此,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以为掩护,谓他“已见及此,并拟有国际参加发展中国经济之伟大计划”云云,未免太侮辱中山先生了!实则,中山先生的用意只在于利用外资及技术人才,以开发中国实业,并不是欢

迎外人来管理支配中国经济,尤其不是想把中国改成该报告书所建议的自治区而由诸帝国主义来共管。

### 三、第二章“满洲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的批判

#### (一)“满洲之状况”的批判

此节叙述满洲面积的广大约等于法德二国合并之员幅,计为38万多方英里;经济富源没有一种不备,农矿森林的富足,“遂使成为群雄覬觐之区”;且有总数约为3,000万的人口,足供开发产业的使役。这样性质的满洲,遂使该报告书在本节绪言中下断言说:“……在供应中日两国之需要上,满洲已证明两国合作之有益。若无日本,满洲不能吸引如许额人民(指‘山东河北两省之贫苦农民已经移殖满洲者,以数百万计’而言),若无中国农民及工人源源而来,满洲亦不能如此迅速发展,使日本因此得有市场,得有粮食、肥料及原料。”满洲固然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在经济发展上需要与外国合作,但是此种合作,只限于经济上,只限于保留主权的产业开发上,而不是“名为自治而实为共管”的政治经济的合作。

#### (二)“与中国其他部分之关系”的批判

此节历述满洲的沿革史及与中央多少隔离的情形,用意在于言外说明满洲不能与其他部分的中国土地并论的

意思。其中有一段说：“满洲政府在1907年间，时距清室退位前不过数年，曾决定改革满洲地方政府。中国前此视东三省为关外领地，另行设治，自具规模。……”继续又述民国革命后，“满洲各官员之不赞成共和者，令张作霖抗拒革命军之前进……”，“1921年张作霖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以及张学良服从中央后所谓“满洲与国民党之关系近名义而远事实，”等等，以证明满洲与中国其他部分之隔绝，以为日本侵占满洲造成合理的根据。这一点正是诸帝国主义共同的要求，倘若此例一开，那末，英国之侵占康藏（据最近的消息，英国已有建设所谓“大西藏”的企图），法国进迫桂滇，就容易说得过去了。然则，青海、新疆、内外蒙古、四川、甘肃、陕西等地，早晚皆非中国所有了，因为这些地方皆和满洲同样与其他部分比较隔绝的缘故。帝国主义者的用心固然周到，但其荒谬实在绝伦无比。

其次，又叙述：“满洲加入国民政府之后，因为国民党富有组织及纪律之宣传，满洲对之已经开放，国民党利用正式党刊及多数附属之言论机关，一再声称恢复已失主权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重要，与夫帝国主义之险恶。……彼辈激发并促进民族主义之思想，实行排日之煽动，并以压力施诸中国房主地主，迫其提高日本及朝鲜租户之租金，或拒绝日本及朝鲜租户重订租约。……朝鲜移民曾受有一种有系统之虐待，并曾颁布各项排日性质之命令训令。……”这似乎在说明满洲事变的远因和责任在于中国仇视“险恶的帝国主义者”，而其所以仇视的根因，则一言不提。

同时,并且叙述1931年以后大豆之归国营,以证明中国方面之控制产业;叙述中国之敷设新铁路,以证明中国侵犯日本的铁路权。美国帝国主义的学者政治家威尔逊氏对于解决欧洲的问题可以提倡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亚洲则不能“激发并促进民族主义之思想”,帝国主义者各国皆可以把特殊产业收归国营,如日本之于烟草、酒、樟脑、鸦片、盐及阿黑山的材木等等,而独中国实行国营则犯控制实业的嫌疑。又据日人方面的统计,中国新建铁路因为是直接间接由日本投资者,所以未损日本的丝毫权利,国联调查团倒反为铺张,实在多此一举(铁路的问题,请参照下章)。

### (三)“与俄国之关系”的批判

此节首先叙述帝俄强制地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及权益,后来日俄战争发生,俄败于日,“遂于1905年9月5日订立朴资茅斯条约,放弃其在满洲之特殊权利。并将租借地及与租借权连带之一切权利,长春旅顺之铁路及其支线,与在该区域内附属于铁路或为铁路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一并转让于日本。……”诸帝国主义用意固在于为同伙日本帝国主义藏拙,谓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起初得自俄国,所以很合理;但是我们且问:甲强盗劫夺乙强盗由良民抢来的赃物,是不是合理的取得?假使在你们所谓文明国内发生这种案件,你们的政府和法律是否追究?

其次,叙述满洲归附中央之后发生的不幸事件,并加以褒奖说:“满洲归附南京政府之后,中国民族精神益见激

昂,对于苏俄维持中东路优越权之努力,民情奋慨,较前尤烈。1925年5月遂有清除俄国利益范围最后残余之尝试。……”但是事实上中国政府结果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当,帝国主义者促使利用被压迫民族以进攻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苏俄(该报告书叙述苏俄革命后放弃帝俄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可以证明。)的阴谋未逞,而被压迫民族的中国,已经吃了大亏,正如该报告书所言,“中国断绝与苏俄之关系,苏俄军遂越满洲边界,开始袭击,继续进展。”满洲当局终不得不于“……解决中俄争执于既遭败北复损威望之余,迫不得已接受苏俄之条件。”

此节最后叙述苏俄革命后放弃帝俄在华取得的特权,“将日俄在满洲谅解与合作之基础,根本推翻”。并谓“苏俄政府与第三国际对于根据现存条约维持对华关系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反对政策”,并且“对于中国恢复主权之奋斗,似亦有予以赞助之可能。”由此断言:“此种情形之进展,使昔时日本对俄之忧虑与猜疑完全复活。……而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该报告书更进而加强说:“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国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苏俄之放弃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取得的特权,及帮助中国恢复主权的企图,威胁了日本;

并且近年来苏俄的发展愈使日本畏惧。而由此出发造就日本手创满洲国的合理根据。其实本意还在于造成诸帝国主义从东方进攻苏俄的基础,而以中国供作牺牲,其用意诚可谓险恶至极,尤其可恨者,故意宣传俄国共产主义与国民党之合作,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以淆乱世界的视听,并坚强诸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的信念和理由。

#### 四、第三章“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日关于满洲之争执”的批判

国联调查团先在以上二章里头,把中国涂成一个臭泥人,使世界上的人士都相信“中国不是有组织的现代国家”,“不配当国联的会员国”,“国联盟约不适用于中国”,……然后转入中日冲突的本题;第三章以后,就算叙述到满洲问题本身及其提议了。

##### (一)“日本在中国之利益”的批判

调查团在这一节历述日本所取得中国权益在条约上的根据。甚至把日本1915年诱惑袁世凯签订而未得国会通过,且为中国民众强烈反对的所谓《二十一条》,也认为使日本取得中国权益的条约。因此,断言:“由上述条约及其他协定,遂使日本在南满享有重要及非常地位……”。最后劝说中国及日本:“如此状况只有在二种条件下或可维持而不至于发生不断之纠纷及争执。此条件为:或出于双方



之自由愿意与接受；或出于双方关于经济政治事项恳切合作之政策……”。其实，强盗持手枪恫吓得来的承诺契约不能算为正当的契约而发生效力。何况有未经主人承认的契约，如二十一条在内！《二十一条》之不发生效力及许多权益之应消灭，是经华盛顿会议决定的，日本不服，竟有人谓“蓝辛石井协定（注）虽已取消，而日本之特殊利益并未动摇。日本在中国之利益，既未因国际协定而造成，故亦不能成为取消之对象。”（石井著《外交余录》）。日人早已把其他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国的威信打个粉碎；帝国主义者尚不自知而腆然大吐厥词！

注：1917年蓝辛石井协定的要点：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与日本领土壤接的地方如满洲者，尤其是如此。但又互相声明，日本不侵害他国由中国夺取的权利，及应永久遵守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的原则。

## （二）“中日在满洲根本利益之冲突”的批判

在这一节有一要点，就是：叙述日本之取得满洲权益不是无代价的，而是“日俄之役，日本军人战死者10万人，战费至20亿日元之巨。日本人民心目中以为如此巨大牺牲不应无相当代价。”不独此也，“日本对于满洲在日俄战争十年前即已发生关系。”这是指因日本企图吞并朝鲜引起中日战争结果缔结的《马关条约》而言。此节又提到日本占领满洲在防御苏俄及制止朝鲜革命的意义：“日本国内人民以为日本应在满洲占形胜，深沟高垒，预防苏俄之可能

的攻击者颇不乏人。日人无时不忧虑朝鲜失意分子与海滨省境内之苏俄共产党徒勾结,将来或招致来自北方之武力进攻,或竟与之合作。因此视满洲为对俄与中国之其他部分之缓冲地。”这样,日本的“爱国情绪,国防需要,非常条约权利,三者合而造成日本对满洲境内特殊地位之要求”。这完全是替日本帝国主义者掩护。原来,帝国主义间火拼产生的损失,须在被压迫民族来求得补偿,及以武力强占权益及领土之为合理,是命中带来的运命吗?!并且,马关条约和朴资茅斯条约,亦有占领全部东三省的规定吗?又若谓日本为抵御苏俄的国防目的而可以占领满洲,则无异说英国为防御德国的报复而可以侵占西欧各国的领地。试问比利时及荷兰甚至法国各国,能不能答应?

其次,又谈及日本因援助张作霖如打败郭松龄而取得各种特权(即二十一条关于满洲的部分),因张作霖之晚年及张学良无意履行条约,因而中日发生冲突。但是张作霖之承诺是出于日方的胁迫,所以才有张签字后发疯自喊为卖国贼,及张主北京政权,日人请求履行条约时张氏答以再迫则将日人按手盖印的实情宣布于世界的秘密。即使张氏此举出于本身利害的计算,日人也不过是助长中国的内乱罢了。因助长他国内乱而取得的权益,国联竟然加以承认,那末,帝国主义者已经披露其丑恶的真相无余了。

### (三)“中日关于铁路之执争”的批判

此节所述最主要之点,是中国敷设南满铁路并行线妨

害其利益,致使引起双方的争执。其实所谓并行线,所谓包曲线,并未达到危害满铁的程度。日本普鲁著作家说得好:“……把满铁1931年上半年减少分红的原因,归宿于中国资本敷设的铁道网之形成,完全是一种虚构,不过是企图隐藏问题的本质以避开大众的眼睛的有意识的计划而已。”又据其统计,并行线的英里数只有470.8英里,加算包曲线的总英里数为615.8英里。而日本的满铁线有701.1英里,日本资本支配下的铁路有761.7英里,合计日本在满洲所支配铁路总英里数为1,462.8英里。莫怪他说:“英里数不及一半的中国铁路,能够威胁满铁及日本系资本的铁路,究竟怎样能做出那样奇迹来呢?”(参阅《支那问题讲话》250至252页)。调查团故意将中国铁路对于南满铁路的妨害,特别标出,且认为是中日冲突的主因,实在是多余的事!并且,实际上中国也未有条约上允许日本垄断满洲的铁路权。专以歪解中日问题为能事的调查团,也不过说:“……准则是中国政府当时实际上似已承认不建筑显然无理损害南满铁路利益之铁路为华方之义务,但始终未承认日本有在满洲垄断敷设铁路之权。”

#### (四)“1915年中日条约暨换文及其关连之争执”的批判

所谓《1915年的中日条约暨换文》,就是指《二十一条》的结果而言的。所谓二十一条的结果关于满洲的主要点,约有四项:(1)关东租借地之日本所有期由25年展至99年;(2)南满及安奉铁路日本所有期,延长99年;(3)允许日本

臣民在南满内地有营业居住的自由权；(4) 允准日本臣民在南满内地有商租地亩的权限。

此外尚有关系中国内地的要点，姑不置论。仅此四点即足以决定满洲广大领土之存丧了。(1)(2)二项的规定无异于把关东租借地及南满铁路暨其附属权益，永久割让给日本。继承俄国的权益，中国人民已经含痛至于极度，加以等于永久割让的规定，当然不能承受。所以从来对《二十一条》即加热烈的反对。(3)项规定的日方用意，在于不经中国买办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之手而直接采买原料，贩卖商品，以造成日人独占的局势。(4)项的实际又是自由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二十一条》“关于南满及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二条规定：“得商租为建筑各种商工业用的建筑物，或为经营农业所必要的土地”。并且将商租二字规定为含有“不过三十年之期限有无条件续租”的意义。所谓“无条件续租”云云不啻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权”。要而言之，含有上列四种内容的《二十一条》，无异把满洲事实上割让与日本。中国民众之极烈反对，实在是应当的。何况《二十一条》因为它是由日本的武力压迫和利诱而签定且未得国会通过，所以绝对不能发生效力。国联如果对于中日纠纷，真有维公正人的诚意，对于不应发生效力的缔约应有公正的批判，用为公判一切中日问题的根据。而事实上，则噤若寒蝉，不敢吐一句是非。

中国方面曾作很大的让步，希望租期将满的满铁“取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之政治与行政任务，而使成为一‘纯

粹商务事业’”，日本方面不能答应，而国联亦没有一句话敢说是非，倒批中国的不是：“……然给价收回铁路之最早日期既经规定为1939，徒然废止1915年条约（即《二十一条》），并不足以将南满铁路收归中国。中国有无能力筹集资本以达此目的，亦极可怀疑之事”。且谓：“中国民族主义之发言人，敦促收回南满铁路之言论，足与日人以刺激，盖日人之合法权利与利益因彼而感受威胁也”。这是何等偏袒的说话！试问以如是态度，配当中日问题的调解人吗？！

#### （五）“满洲之朝鲜人问题”的批判

谈到“满洲的朝鲜人的问题”，我们站在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民众的立场上，实在痛心泪下；对于朝鲜人表无限的同情。据报告书自述，调查团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注意。但是他们所表现于报告书上的，不过下列几点：第一，叙述日本因为朝鲜之归并日本而取得在满洲的新权益，因为许多朝鲜人居住满洲的缘故；第二，中国官吏不能任意取缔朝鲜人，因为朝鲜人是日本的籍民的缘故，第三，中国官吏应该负责帮同日本取缔并压迫朝鲜的所谓“日本人视为品行不端之朝鲜人之行为足以危害日人在朝鲜人之地位者”。这些权利都规定在《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二十一条》《关于满洲与东内之条约及换文》，及《三矢协定》三种条约中，报告书亦一一加以举述。这无异为日本因朝鲜人而取得新权益的条约规定再加申述，其为判断万宝山事件的张本。要而言之，日本利用朝鲜愚民来充当日本侵

略满洲的先锋队；同时又利用中国的昏聩官吏来压迫朝鲜革命同志。我们站在东方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处在这种地位的朝鲜民众，不禁为之大哭。

#### (六)“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之暴动”的批判

日本利用朝鲜愚民为侵略满洲的先锋队，是一种有系统的政策。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的暴动，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日本人因为风俗习惯，生活程度及不惯于勤劳的关系，不能和中国人竞争，所以驱使朝鲜人到满洲来，而日人则移殖于朝鲜。受到极度榨取和压迫不得已而离去本土的朝鲜人，于是终不能免于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万宝山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事件的正体因为朝鲜人凿渠害及中国农民，所以中国农民群起驱逐并填平沟渠。结果引起日警放枪干涉，沟渠终于造成。

日本又视这次事件为千载一遇的良机，遂在朝鲜大肆中国人民虐待惨杀韩侨的宣传。受愚的朝鲜人遂在日人指导之下排斥惨杀华侨，死者达127人，受伤者达393人，财产的损失达日金250万元。朝鲜一部民众既为日本官吏所离间而排华，中国民众就不得不进行对日的经济绝交。报告书对于这项，只作平凡的叙述，而极力避免探底的剖述。

#### (七)“中村上尉案件”的批判

中村事件是日本借以激发满洲事变的近因之一。事件的经过简单说来，就是负有陆军使命的日本中村上尉，不听中国政府的劝阻，自愿在不受保护的条件下到满洲内

地公干，结果竟为何许人所杀，而日人硬指为中国军队所杀，因而构成本案。本来，军人负有陆军使命而侵入他国的内地，已为国际公法所不许；自愿不受保护而被杀，中国自然可以不负责任。关于这两点，报告书均未敢指明是非所在。再者，中国政府为求省事，竟应日方的要求，拘禁团长关山衡，赴军事法庭审判。这样处置犹不能免去满洲事变，日人的居心实在可以了熟了。报告书对于日本的此种阴谋不加明指，倒反认该案件为满洲事变的要因，说：“中村事件，较之其他之任何单独事件，实更使日人之忿恨加增，且使日人鼓吹以强权方法解决满洲中日现存之困难。”

## 五、第四章九·一八及其事变后之叙述及 第五章“上海事变”的批判

报告书第三章叙述满洲事变前的中日关系，第四章及第五章，则叙述满洲事变的情形及其后情势之扩大，并及于连续发生的“天津事件”及“上海事件”。该报告书关于满洲事变的经过及其发展情势的写法，非常巧妙，中日双方的报告尽量发表，而调查团本身则很少加以评定真伪，或故意将真情掩盖。例如天津事件虽为日本利用便衣队扰乱酿成的，而报告书则谓：“关于此项不幸事件之起源，各方报告极不一致。该地，于11月8日及26日前后，发生暴动两次，但全部事实，仍极不明了”。调查团至今犹在最优等的花车中做梦！装痴！又如上海及南京事件，只为单纯的叙

述,至于是非则一字不提。如此中日双方的报告,在批判调查团报告书的意义上,很少加以批判的价值。再因为本论文篇幅与时间的限制,关于第四、五两章不作详细的批判。

但有一点,满洲事变的责任问题,非常重要。这一点,调查团报告书曾经下一结论,很值得吾人的注意,所以摘录于下:“……本调查团曾得一种证明: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命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付日军并未集中应战,亦未奉命开火,故于日军之突击及其以后的行动,莫不认为诧异。至9月18日下午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这一段论断指明满洲事变的责任所在;在洋洋二十多万言的调查团报告书中,算是凤毛麟趾了。但是后面解决的办法,若不依照这个责任来解决,那末,责任虽然阐明,仍无补于事。如后面的解决原则,真使人对于这个责任的阐明,哑然不知所以然了!或以此点讥该报告书为“狗尾续貂”;其实调查团的用意另有所在呢?



## 六、第六章“满洲国”的批判

这一章共分三节，每节最后都有调查团的结论或评论。我人为避免繁赘起见，又在批判报告书本身的意义上，只就各节的结论或评论，加以批判。

第一节《建设新国家之历程》的结论：“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日本逐步以武力占据东三省，使齐齐哈尔……脱离中国之统治；并于每次占据之后，即将该地民事行政机关改组。故独立运动，于1931年9月以前，在满洲未尝听得；所以能有此项运动者，仅由于日本军队之在场，甚为明了”。“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有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此段明指日本手制满洲国，还算公允；但在解决上并未将此公允应用上去；其存心只在于打破现局以为共管的张本，可以想见。所以，国联调查团始终不是有爱于中国。尤其可笑者，故意叙述日本将“市政府之治权，移交于有相当资格之中国团体，以赵欣伯为市长……，并将赵的“博士”学位，特别加注，用意不在于主张博士的卖国行为是合理的，就在于讥笑博士才配卖国。——最近胡适博士极力赞称调查团报告书之合理，真是“不独有偶”，而且“堪称双美！”

第二节《现在之满洲政府》的评论：“此政府之计划中列有若干开明之改革，其实行不仅适宜于满洲，亦且适宜于中国之其他部分，……”。国联调查团居然称赞起日人一手创造而专权支配的，不合法的傀儡政府来了。这一段话，申论之可得两点深意：第一，帝国主义者手创的政府总比所谓“无组织”的中国本国政府强些，总有若干开明的改革；第二，这种含有“若干开明改革”的政府如伪满洲国的办法，也可适用于中国其他部分。第一点是在肯定所有殖民地政府的“妥当性”；第二点是在主张中国全国应该完全殖民地化。伪政府组织及其施政的劣拙，这里无暇详评，但由调查团用意之卑劣，可以推想其一斑。

然而，调查团诸君却犯了一个最大的矛盾。他们在第三节叙述《满洲居民之态度》的结论中，却说：“以上所述为我等在满洲旅行期间本地居民所报告之意见。细心研究各方所获之证据，无论公私谈话或书信文件，吾人得结论，即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助，此所谓满洲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真是日人之工具而已”。他们也知道真情终不能淹没，天下人终不能尽欺。但是一般人民所“不赞助”，而只是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的政府，怎样会有更开明的改革呢？充其量也不过朝鲜及台湾，印度及安南……等地方的成绩罢了。若谓朝鲜及台湾，印度及安南等地方的政治，是“开明”的政治。那末，也就只有帝国主义者才说得出口！请瞧吧！满洲国的民众！终岁辛苦不得一饱，以前所食用的大米被日本夺去而自己吃小米，这样犹不能免于流离彷徨于满洲或西

伯利亚的朝鲜民众,就是所谓“开明的政治”改革出来的哟!

## 七、第七章“日本之经济利益与中国人之经济绝交”的批判

此章的叙述及论断,可以分做两部分:其一为日本在中国的各种利益及日本全依这些利益以维系生命;其二为中国对日本及其他各国的经济绝交及这种绝交行为的责任。

本章开始叙述(一)日本人口过剩特别高度,(二)日本土地上的种种困难不易解决,(三)日本有更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必要;以为造成日本自人类的立场上侵占中国领土及权益的论据。但这都是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的说话,不过是分割殖民地的理由罢了。且略加剖述。(一)项日本人口过剩问题,依存于土地问题上;土地问题及粮食问题有了办法,人口问题自然容易解决。所以,我们检讨一下日本的土地问题。日本虽然时常宣传本国地狭多山,致使人满而粮食不足;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可耕地并没完全开垦完了,现在还残存四分之一未开垦的可耕地。尤其甚者,自从1921年以后,日本的耕地不但没有增加,倒反减少。放下自己的耕地不耕,而企图侵略他人的国土,没有比此再无道理者。其所以然的原因,完全在于日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冲突,也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这是制度的问题,日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制度上着想;否则,

即使一时侵占他国的土地，碰墙的时候，依然可以到来。

其次，调查团由(三)项日本有更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必须要来论断日本切要中国的商品市场。但是商品市场云云，也无非是购买力的问题。如果日本本国的购买力充分，又何必需要外国的市场呢？日本市场的现状，是一方面有过剩的商品堆积着，他方面则有劳苦群众在市场墙外饥寒，战栗。日本本国人民的购买力不充分，固然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它的购买力不充分的原因，在于日本一般的劳苦群众因受军阀资本家阶级的极度榨取和剥削，也请调查团诸君考虑一下！不管诸君愿意不愿意考虑这一个制度的问题。

调查团更自现在的实状，指明中国是日本的切要市场——商品和资本的市场——是不必缺少的。而这个问题也是从述基本问题派生的，所以基本论据既然不合理，派生出来的论据，自然没有会合理的道理。例如，放弃自己市场不推销，不投资，而侵占人家的市场；又，自己采用关税保护政策独占本国市场，而对别人的国家，则要求开放，甚至喧宾夺主。所谓先进国的文明，所谓文明国的正义，公理，就是这样解释的吗？这样适用的吗？

我们也极明白：现在的世界不是讲正义，公理的世界；只有强权和力量可以推动一切，可以抵抗一切。对付强权的压迫，也只有一个力量。这不但是当然的，并且是必然的。因此，在诸帝国主义武力的压迫及蛮横的榨取之下，必定要产生中国人民的武力的抵抗。幸而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不欲以武力抵抗武力，蛮横报复蛮横，所以采用经济抵

制的和平办法。因此,我们敢在所有人类的当前宣称:中国采用经济绝交的方法抵制武力的侵略和蛮横的榨取,是最讲人道的,最正当的办法。否认这种办法的合理性的,可以说不是人类。

然而不幸之至!调查团诸君竟于本章,对于中国的经济绝交,大肆抨击。本章开始标题即为“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并且在本章的后半部,评定两点:第一,断言加于日人或中国人民的经济抵制行为均为不合法;第二,确证经济绝交的背后有国民党在指挥着。第一点,是将经济绝交的责任,架在政府身上;第二点,直接将同样责任架在国民党身上,间接架在政府身上。这两点用意都在于便利外交上的交涉,及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关于这一部分,调查团报告书有许多牵强的论断,且略为介绍于下。

“……但据调查团所得之证据,对于此说(即经济绝交依合法方式之说)未能证实。关于此点,应将直接妨害外籍居民之非法行为,例如对日人者,与妨害中国人而显具侵日人利益之目的者划为两事。就前者而言,此项行为,非独在中国法律上显属非法,亦且违反条约上,保护生命财产,维持贸易居住行动自由之义务”。尤其甚者,对于中国代表关于妨害中国人之非法行为的解释:“吾人首欲提请注意之点,为一国之国内法律问题,外国无权提出。……总之,一国纯粹国内事件之治理,不论何国无干涉之权,此即所谓互相尊重主权与独立原则之真义”。并且加以非议,谓:

“……但其疏忽之点，在于日本人所持为称诉之论据者，并非中国人民被另一中国人民非法侵害之事，乃系所采用方法，害及日本人之利益，而此种方法复违反中国法律，在此种情形之下，而不能执行其法律，则应视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

调查团诸君评论事件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实在难解。无端而以武力攻占他国的国土，你们对之宽宏大量；对于以和平的经济绝交对付武力侵略和无理榨取的办法，则大肆严刻的，无根据的抨击。再者，若谓因取缔本国人民而影响外人不利，政府应对外人负责；那末，你们帝国主义者常采用关税等政策妨害外人的利益的场合，对于外人究竟负了什么责任？简直一句话，帝国主义者都是一鼻孔出气，无视中国的主权。你们若怕因中国取缔本国人民而蒙损害，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不和中国来往。

其实，调查团未免太过于“见智见仁”，只知道把经济绝交的责任，架在中国政府身上，对于中国政府之取缔此种经济绝交，压迫民众运动，却故意装痴作聋。我们不禁要替“含冤受屈”的我们政府表示无限的不平！

## 八、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的批判

此章先叙述满洲在中国及日本的经济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需要中日的合作。在其评论说：“满洲富源雄厚，……其发展有赖于人民、资本、技能、组织及内部安全。

人民几乎完全由中国供给；……资本、技能及组织等，在南满者多由日本供给；在长春以北者多由俄国供给……”所以，在本章前头即谓：“……实则欲充分开发满洲现有的富源暨致力于将来经济之发展，两国经济之调和实属必要也”。

调查团诸君不但苦劝“中日协调”，并且盼望国际的协作实现于满洲。在本章最后段，说：“如欲使有关系各国合作，发展满洲，则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为必要。……故在商业，投资，及金融各界中，以自由竞争方法表现真正之门户开放，于中日两国俱属有益”。

然而，我们极端反对弱者与强者的任何协调和自由竞争。你们把大炮的炮口对准我们的胸口，双手握住经济支配权而口里高唱协调；你们利用已经发达在相当程度的产业来打击我们幼稚的产业，你们利用有组织的，雄厚的资本来征服我们没有组织的，薄弱的资本，而口里高喊自由竞争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之下，弱者只有斗争始有出路。在满洲只有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始有前途；在整个的中国只有与诸帝国主义斗争，始有前途！

### 九、“解决之原则及条件”的批判

调查团包藏祸心的真面具，在九、十两章的论断及建议中完全暴露出来。在这两章的论断中，即连上面的评论略近公允的地方，也都一笔勾销。例如就中日问题的性质，

下断言说：“良以此案既非此国与彼国，不先利用国际联盟会所规定和解之机会而遽行宣战之事件，亦非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实因满洲具有许多特点，非世界其他各地可确切比拟者也”。又谓：“……又该领土在法律上虽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其地方政府实具有充分自治性质，足致日本直接谈判构成此次冲突根源之事件”。

“实因满洲具有许多特点”，“其地方政府实具有充分自治性质，足与日本直接谈判……”，这无异直说：“满洲不但可以脱离中国而实质上独立，且可为日本的实际统治国。上面所阐明满洲事变的责任在日本，及满洲国为日本所手创，到此已经完全变成毫无价值而只愚弄中国人的前提了。

调查团并且自政治军事的及经济的两方面，确言日本制造满洲国的合理性。在经济的方面说：“……我等仍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府；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又在政治军事的方面说：“日本在满洲之动作及政策，其取决于经济原因之处，或较少于其自身安全之顾虑。日本政治家及军事当局常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职此故也。常人对于此种顾虑可表同情，且亦能谅解日本担负国防重任之当局所采取行动及意旨。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



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

这样，其他帝国主义者已经完全潜伏在日本帝国淫威之下了。不，实则他们另有深湛的用意，即欲在东方造成进攻苏联的战线。因此，调查团就极端反对“恢复原状”，谓：“如仅恢复原状，并非办法。因此次冲突原系发生于在去年9月前所存在之各种情形之下，故今日如将各该情形恢复原状，亦徒使纠纷重见。……”但是恢复原状之后所以纠纷重见，问题在于帝国主义者无诚意解决这些纠纷，而不在于恢复原状。我们也相信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局势的问题。假使中国民众能争气，起来驱逐日军出满洲境外，调查团诸君以为原状不可恢复吗？恢复后仍有纠纷吗？

然而诸帝国主义不愿日本单独担当进攻苏俄的东方战线的排布，尤其不愿日本独占满洲，诚恐日后培成日本的世界霸权。因此，调查团亦表示不满意于满洲国之维持。第十章“对于行政院的建议”，就是从这个用意出发的。

然而调查团在未提建议之前，先列所谓“圆满解决之条件”十条，以为第十章建议的前提。这十条就是：（一）适合中日双方之利益；（二）考虑苏俄利益；（三）遵守规行之多方面条约；（四）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五）树立中日间之新条约关系；（六）切实规定解决将来纠纷之办法；（七）满洲自治；（八）内部之秩序与免于外来侵略之安全；（九）奖励中日间之经济协调；（十）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这十条解决的原则，不外乎是牺牲中国来将就日本，来缔结超越《二十一条》的新条约，并且插入其他帝国

主义的势力于满洲——共管，名为自治的满洲的原则。难怪提出第十章所开那样的提案来！

## 十、“考虑及对于行政院之建议”的批判

调查团建议解决满洲问题方法的第一步，就是顾问会议的召集，即“及早召集一顾问会议，讨论并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但是这个顾问会议怎样产生呢？从三方面选出代表：（一）为中国政府，（二）为日本政府，（三）为当地人民之代表团。并且双方如果同意，还可以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我们且就该会议的表决权加以考虑。在现在情形之下，所谓当地的人民代表，当然非是日本钦派的代表不可。若此，则日本可得二票，中国得一票。若再容纳中立观察员——当然是帝国主义者——则日本对于一切可操完全的胜利无疑。即使有若干争执，亦可由国联行政院来解决。干脆由日本排布就算了。含有这种性质的所谓顾问会议，实在多此一举！

调查团不但提议召集顾问会议，并且代为规定议案谓：“在顾问会议集议之前，当事双方，应以行政院之协助，对于该会议应行考量之“行政制”之方式，先行规定其大纲”。而应考虑之要点，就是

（一）维持中国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及准东省有高度之自治；

（二）以一种特别宪警为维持内部治安唯一办法之政

策；

(三)以所拟各种条约解决所争各项事件之原则。

所谓“高度之自治”，就是他们所拟定的所谓“特殊制度”，其实是国防共管。请考察其组织内部如何？“行政长官得由国联行政院所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人人员二名，监督警察及税收机关，该二员在新政制草创及试行期内，当掌有广泛之权限”。“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包括警权及军权的警察机关及一切的财政机关完全握于国籍不同的外人，不是国际共管，是什么？

又所谓“特别宪警”，就是“以外国训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内之唯一武装实力。……一俟组织完成，其他一切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外”。是则等于剥夺中国的东省驻兵权，而以外国制造的警察代之。这种办法可以称为“行政完整”吗？

又所谓“所拟各种条约”，约有四种内容：(一)东省经济上之开发，日本得自由参加；(二)日本在热河现在享有之权利，予以维持；(三)居住及租地之权，推及于东省全境；(四)关于铁路之使用，订一协定。这些权益较之《二十一条》有过无不及。(1)项赋予日本以所有满洲的产业权；(2)项将日本的权利，扩大至热河；(3)项赋予日人在满洲的土地所有权；(4)项赋予日本以铁路专权，是不用说了。

最后如《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及《中日商约》，因无具体内容，所以姑且不加批判。

总括言之，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不过是剥夺中国的行政权，驻兵权，财政权，以及宪警权，而授予国际的机关；并且牺牲中国所有的政治经济的权利，以满足日本的野欲。照这样办下去，满洲名义上虽是中国的土地，而实际上则已丧失主权。

## 十一、反调查团报告书的斗争纲领

综观以上各章所剖述及批判的实情，可以了然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叙述、评论及建议，皆非有爱于中国；而实在是一种瓜分中国，共管满洲的张本。因此，我们民众应该及早觉醒，急起对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作一番斗争。国联大会开会期已经迫在眼前，而中日问题将在这个大会上，或依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或有更不利于中国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危机已经迫切，民众的努力是刻不容缓的。且将对于该报告书应采用的斗争纲领，简列于下：

### 甲部 对于政府的纲领：

- (一) 督促政府发表宣言反对该报告书；
- (二) 请求政府即刻退出国际联盟会；
- (三) 防止政府承认国联依此报告书作成的任何办治；
- (四) 要求政府解放各种民众运动；
- (五) 督促政府早日出兵收还东省的失地；

### 乙部 民众自己的纲领：

- (六) 绝对反该报告书的建议；

(七) 组织起来,严格进行经济绝交;

(八) 组织起来,援助义勇军;

(九) 组织起来,自动收回失地;

**丙部 对于国际的纲领:**

(十) 联络东方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

(十一) 联络日本国内的被压迫阶级:破坏军阀统治;

(十二) 联络苏俄从北方进攻日本;

(十三) 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分化其势力。

危机已经迫切了!满洲要有前途,非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不可;中国要有前途,非与诸帝国主义斗争不可!

(1932年10月20日)

原载1932年11月《新东方》第3卷附录

## 九·一八6周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我国半壁河山在日本帝国主义残踏和蹂躏之下，匆匆又到了第6个周年了。九·一八每到一周年都举行一次的纪念，但是今年的纪念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同胞亦应该有新颖的觉悟始可。

今年的九·一八是民族敌人开始第二次大规模侵略及我国发动全面抗战的情势下到来的。野心在于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居然又占领了文化及交通中心的平津，企图一举而直捣西北切断中苏的联络，笼罩华北数省。又为牵制华北的集中抗战起见，复在淞沪、汕头、厦门、广州各地方大加威胁。但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的抗战异常壮烈，敌人野心终未得逞，华北抗战自卢沟桥事变起已达73天，只就淞、沪抗战言，也快一个半月了，民族敌人因未能早日偿愿，更加恼羞成怒，调动大批军队，尽量利用新式武器向我大举进攻。据最近日本军阀的安排及日本政府的宣言，大有不逼我屈服缔城下之盟不止的情势。可以说和平已到根本绝望的时期。在这种时期，我们应该

怎样重新估量“九·一八问题”，树立新决心，是一个值得我们关切熟虑的问题。

现在中日关系的比重已和6年前完全两样了。以前敌人几次冒险所以能侥幸成功者，完全由于我国一部分人的无抵抗和“恐日心理”。现在我国上下皆具“焦土抗战”的决心，并且戳穿了日本的纸老虎，为争生存为求自由而壮烈斗争，最后的胜利必在我们。即自日本方面的内部矛盾观察，日本亦无必胜之理。日本之侵略我国原为缓和它内部经济的危机及政治的对立，但是占领东四省已6年的今日，其危机和对立只有日益尖锐化。日本6年间投到东四省的资本公私总额已达二十几亿元的巨款，但截至现在尚无丝毫收获，即连资本家也都怨言载道了。工农的利益更谈不到。军部代言人与曾经作过“满洲移民大计划”的日本某名教授考察东四省实况的结果，也不得不暗中承认移民的失败，他说：日本人在满洲过的那样低级生活，即在日本内地也可以得到。日本目前在东四省实际上得到的利益只有“强盗的抢夺权”罢了。但是这种“强盗的抢夺权”是没有保障的，会因我国的全面抵抗而整个粉碎的。

因此，我们为着粉碎敌人的利益收复我们的失地，只有全面的持久的抗战一途。我们要完成这个目的须下新的决心。我们要加强民族抗战的决心，实行“焦土抗战”。最近平津之失陷于“和战犹豫不决”是我们最好的殷鉴，全面和持久的抗战是一种大规模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扩大民族战线充实阵线内容，务使每个国民皆能各尽其材，每件东

西皆能各尽其用。政府能在整个统制计划下动用分散及逃难的人民,阵线的内容就扩充了很多成份。我们还要艰苦耐劳不屈不挠才好,因为我们的民族抗战是一种艰难的事业,所以绝对不能存安逸侥幸的心理,我们或须在壮烈斗争中继续一二年后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在争这个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一面抗战还须一面立长期计划继续准备。最后我们还须确切觉悟的就是我们今日的抗战带着“历史的使命”,我们的民族抗战不但可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并且可以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的成功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东亚和平”,即如处在日本军阀、官僚、财阀的压迫下的6,000多万日本民众也可以得到解放。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除自己奋斗以外还须切实联络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别是可以和中国协作共灭日本帝国主义的苏联、朝鲜、台湾以至日本下层民众都应该设法提携的。

我们伟大而艰难的“历史使命”能否完成,要由我们的新认识和新觉悟如何来决定,尤其要由我们怎样纪念六周年的九·一八的心情来决定。

原载1937年10月《时事类编》特刊第2期



# 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

(为纪念九·一八而作)

## 一、日本占领东北六周年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三省已达6个整年，我们广大的大好领土受到它铁蹄的践踏，我们3,000多万的同胞日夜处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下。东北同胞六年来怎样忍受的穷苦的生活，家庭怎样分离失散，身体怎样受着残酷的刑罚，精神怎样受着奇重的侮辱……这一切的一切，不但是我们关内的同胞应该详细知道的消息，并且是汉奸及无抵抗主义者应深刻醒悟的当头一棒。日前北平的朋友寄来一本《倭寇在东北的暴行记》(东北文化协会刊行)，内容详述日本帝国主义六年来在东北所行种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注重事实的搜集及纪载，实在是关内不容易得到的材料。又因这本小著作不是公开的卖品，欢迎同胞介绍，所以特为利用这些材料编写本文，以供关内同胞参考。

六周年的九·一八和往年的九·一八是有截然不同的

意义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六年前占去我们东北，拆破我们的大好河山，愿犹未足。今年7月又在卢沟桥发动其对华北的侵略战争，更延而至于淞沪，我们持重隐忍已到最后关头，整个民族遂奋起作全面的抵抗，华北抗战已经过二月有余，淞沪抗战也已支持一月了，并且抗战军队各方面都有步步胜利的趋向，侵略者过去冒险成功的理想已经完全粉碎而变成了迷梦了，我们能努力继续我们全面持久的抗战，“外强中干”的日本侵略者自不难打退，我们的广大失地也可以要夺回来。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一齐奋起罢！残留在关内的东北同胞，现在正是打回老家去的时机了！

## 二、日本狰狞面目的表露

“不想穷，下关东”！这是流行华北各省的一句俗话，从这句话里，便可知道东北是怎样一个富庶的地方。

但是这句话在现在已经完全不能适用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遭受日本暴行的蹂躏，已经由“人间天堂”变而为万劫不复的地狱了。

不过这日本的种种暴行，都并不是占领东北后便大加施展的。恰恰相反，日本的势力还未打定基础的起初，他的政策却是温和的，他生怕东北的老百姓起来反抗，便用种种阴险的手段来欺骗来麻醉，口口声声平等亲爱，就是要救救东北的老百姓，用“正义团”的名义放赈，用“博爱社”

在街上赊米，借着这一点点的小利益来想买东北人的心。等待老百姓的枪多半被收没去了，日本的军警也布置好了，这才一变从来的温柔政策而横行直闯起来。

“初软后硬”日本的东北这种政策的改变，我们听了小林铁太郎所讲的“满洲建国主义”也便可以知道。

小林铁太郎是满洲高等学堂的日人教授，去年7月，日本满洲关东军军部召集伪国各重要机关公务员，聘请小林铁太郎作如下的讲演：

“在已往的经过里，知道软性的道德化的王道主义是不适用的，对于你们中国人是不能不用强硬的办法的，我们今后的建国主义，必须改为新的王道主义，这新的王道主义，建基于下面三个要素：第一，他是军事化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强而有力的去建设，非如此不能强而有效的铲除障碍；第二，他是一元化的经济的，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应该站在统治地位来领导着你们中国人来作；第三，他是精神化(?)的。他求日、满不可分，日、满一体……。自今以后，为了日、满民族彻底协合及未来双方的幸福，对于那阻碍这新王道主义实行的叛逆分子，日方是不惜严厉加以制裁的，但这是事出不得已，你们不必恐怖，也不要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日人是将自已的暴行公开的宣布了,我们看看他行的都是些什么事?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日本是禁止人民将东北的实况传告出来的,下面的消息只是漏网之鱼,在日本严密检查之下透露出来一点一滴,东北的人民有苦不能诉,实在的状况,比我们所能听到的还要加甚万倍呢!

### 三、“经济统制”下的掠夺

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一面对已有的中国人的事业强行购买,一面又限制中国人新事业的创立。在现在,重要的产业如交通上的汽车,已完全被日人强制占买,归锦州的奉天铁路局经营,电报、电话、电灯等也完全并归满铁电气公司经营。再过几年,在东北我们将再见不到中国人作的事业。

民国二十四年,“伪国”在日人指挥下,行一种商标法:任何新设店铺都要向官方登记,中国人无形中受了限制,不能注册,店铺便无法开张。反之,日韩人的商业却因之大发财源。如依照满洲年鉴统计:民国二十二年日商注册登记的为10,545家,民国二十四年则增至14,115家!

在现在的沈阳,煤炭印刷等事业,已完全操在日人手里了:如学校公共机关用煤炭,便必须到日本煤厂中去买;印一件信封纸名片,也非到日人指定的印刷局印不行。日人对商铺的独占,不但任意把东西的价钱抬得非常高,而

且因为操着经济大权，随时可置中国人于死地。

在统制经济之下，日本又行“农产专卖”的政策；对于东北主要农产的大豆小麦高粱等，日人禁止老百姓私相售卖；收获之后，一定要卖给“官家”，至于价格自然是由“官家”任意规定的。日人从中居奇，廉价买入，高价售出，一卖一买间的操纵，便使老百姓几乎不能生活。如在锦州，秋季时高粱价为8角至1元，但到春初则涨至3元还多；小麦初秋时每吨价洋40元，但到春初则涨至97元。

此外，日本为了从东北取得工业原料，又任意命令老百姓种植他所指定的作物。如去年“伪满洲国”实业部，在吉、黑交界地方设置大规模之饲羊场，购买得亚利安羊200万头，蒙古羊11,000头，强迫附近的农民饲育，不但良田改为牧场，而且老百姓代养的羊，如有死亡，还要照价赔偿呢！

在日本这残酷的操纵与摧残下，东北的农业是很快的衰落了。依照统计，民国二十一年东北产的豆共有530万吨，民国二十五年则激减为380万吨！这就等于说：从前一亩如产大豆五石三斗，现在则只能产三石八斗。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操纵与独占，从东北对外贸易的统计上也可以看出来：民国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东北总人口的70%都来自日本！

日本的排斥中国人，独占东北经济，从日本近来投资的激增上也可以看出来。自伪国组织成立后到现在，日本通过满铁组织的股东已经有12次，一共有34,500万元，直接投资有7,000万元，如再加上购买中东路债款的15,000万

元及向在东北新建立的各公司的投资300万元，则一共已有89亿元了！（伪国成立以来，日本官民在东北投资额已达22亿多元）

一切事业都由日人来作，一切经济都操在日人手里，这就是日人在东北施行统制经济的目的！再过几年，我们在东北将再不能见到中国人所经营的事业了！

自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年起，日本即实行纸币政策，老百姓一律使用纸币，有现洋的都要存入伪国银行，不得再行使用，用纸币换来的银与铜，用纸币去买的锡与铅，日本都集中合成大块运向本国，一方面使东北民众缺乏反抗的铁器，一方面好制造他们要制造的东西。

东北同胞，因为不堪日人的种种滋扰，许多便想重回关内故乡，在起初，日本在急需劳工建筑道路与军事工事，是禁止东北人回乡的，后来禁令取消但限制人民出境带款，每人只许带50元的路费，再多了是要给官家没收的，但到纸币政策已见实行的现象，“满洲国”的纸币出境后便成废纸，许多同胞简直连路费也筹不到了。数年劳苦的积蓄虽说不少，但他只能空叹“有家归不得！”。

东北与内地的汇款，也是要受限制的，东北有钱的人，要向关内汇款，必须要向银行中的日人填表声明用途，然后才准汇寄，汇寄数目，每人最多不得过500元，如汇千元，至少须化用五六个人名分汇五六次，但一旦败露便要没收。

从关内向关外汇钱，最多也不得过千元，汇款人必须说明用途，找具保状，方能领出，如果用途不明，也有被没

收的危险。

日人在东北又极力排斥中国人。现在各机关各地方日人都一天比一天的多起来。至于有职业未加排斥的中国人,也多半几乎无法生活。如拉滨线的铁路工人,去年曾一直有半年的工夫不发薪。在工厂里工作的中国人,受待遇也非常的不公平,如在沈阳,日、韩人一日可得工资一元余,中国人则仅能得三四角。

#### 四、武装移民强占民田

日本占领东北后,为了伸展他的势力,便实行“武装移民”的政策。依照日本拓务省的满洲移民计划,二十年间要移500万人到东北去。移民津贴共分作三种:集团移民平均每户五人,发给补助费1,000元;农业自由移民每户500元;其它自由移民每户200元,这些移去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都带有枪支弹药,预备镇压中国叛民,他们如需要土地,便由官厅定出价格,由日人或韩人选择着强买。这官定的价格,据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如富锦、依兰、土龙山等处,原来土地一亩可值三四十元,但日人却以每亩5元的价格强买了去。日人乐意买那块便可买那一块,中国人是不许不卖的,富锦有王姓一家,因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出卖,便举家老小八口,一齐被日本枪决,此外,日人又到处强租土地:他们见到愿意种的好地,便不管你地中是否有禾稼即将收获,立刻便租了去,辑安县因此曾引起农民暴动,但双方对打

一天一夜的结果，农民失败了，村庄被焚，有壮丁76名，一齐被日人枪决。民国二十三年的依兰农民暴动，中国人被杀2,000余人，也是由强占农民土地引起的。

强买与强租之外，更令人难堪的，还有“强占”。日本和朝鲜浪人，见到美肥的好地，时常要直接占为已有。单就吉林东部及拉滨线沿线说，日本在计划中要占取的田地便有1,000万町步（每町步约当中国16亩多）木塞一区，也有250万亩（每英亩合中国7.08亩——此消息得自西文报纸）：

例：黑龙江有个大富户，数代的辛苦经营，颇有一些资产，日人得知后，便想把该富人的财产没收，但是因为对该富户的财产真象不明，一时不好下手，后来日本官方派去日人十数名作该富户的监习生，说是为了帮忙，也顺便学一学富翁经营产业的方法，等那10多名日人对该富户的财产真象明白了，日本便派军警将该富翁抓去，财产没收。

## 五、苛捐与杂税

日本初到东北时，苛捐杂税，减免一部分；脑筋简单的老百姓，都以为真的从此能过太平日子。却没想到这完全是日本欺骗的政策，只是一种缓兵的计策。现在的东北，比从前重到千百倍的苛捐杂税，是一天比一天的多起来，如东北人民喂狗，日本便命令每只狗都须带一个铜牌子，这



铜牌由官厅出卖,每个价洋3角,老百姓饲养的鸡鸭鹅,也要上税,每5个编为一架,一架每年要纳税7角。此外如屠宰捐,每只猪4元2角,羊2元5角,牛6元,实重到空前未有。这些之外,因恐怕人民加入义勇军,又有一种“良民证”,用来证明人不是胡匪。凡12岁到60岁的人,都要用连保的办法向官厅登记,每人配带“良民证”一张;每张售价1角,适用一年,到第二年经检查之后又须再买。此外的捐税,更有所谓:地亩捐、警学捐、民团捐、户口捐、灶捐、丧捐、喜捐、大排捐、公路捐、公益捐、济贫捐、剿匪捐、门牌捐、保甲捐……千奇百怪,笔难尽述。

依照日方的统计:到去年止,东北的田税增多四分之一;畜税增加七分之一;户口税增加四倍,这因为:移民、筑路、打义勇军、……处处都需要钱,日本不能不横征暴敛以益支出。支出的预算出自田亩的,起初只占50%,去年则已增加到80%了!自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日本在东北的开支共30亿日元,这些钱无疑都要出在东北的老百姓的身上!

在现在东北的城市中,各商店所纳的定额经常捐有三种:(一)每月按照营业额纳捐5‰,这捐比从前已加重了5倍,(二)每月按照纯利润再纳捐10%,(三)估捐(?):这是任意规定的。日本宪兵对商铺先行调查,认为商铺一共值洋若干,便依之定出定额的捐,到期必须交纳。这估计的数值当然是非常之高的,据沈阳来信得知:资本2,000元的商铺,每年所应纳的估捐在百元左右。

除了这重重的定额税之外，又常有临时的摊派，如去年便曾派过两次“援绥”劳军捐；前年日本地震时，又曾派过“日本地震捐”。临时捐有时多有时少，税额任意规定，每年总要有十数次。因为税额太重，许多店铺便不免有漏税的事情。日方于是自二十五年九月起，限制各商铺都要用复写式帐簿，帐底写两份，一份存放，一份报官。这种报告，每两天一次，是不能少有延误的！呈报时手续复杂烦难，时被严行查问。

## 六、毒化政策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颁布了鸦片毒品公开售卖的命令。在各村镇都广设烟馆，说是要恢复东北人的自由。现在的东北是瘾君子的乐园，因为虽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村庄，也总有烟馆一两处。此外更强迫东北人民种植鸦片，现在已有不少地方依照官厅的命令，每百亩田便须种大烟5亩，每亩抽15元的种植税，白面、红丸、海洛因等，在东北自然也是非常流行的。

日本又怕仅只毒品一物还不足以陷害中国人，又在各烟馆中设有女招待，借其招待的力量来诱陷中国人。如单在哈尔滨市，现在的烟馆便共有80所之多，女招待共有2400人。

日本自朝鲜或本国运到许多杨梅病毒很深的的妓女，在东北广设娼馆。因为娼馆设得太多了，日本已有病的妓

女不够用，便又向东北乡村中强行索要年轻貌美的妇女去做娼妓。在抚顺东边的高家屯，驻有留守的日兵50名，见村长的女儿美丽，便向村长强索20名少女来供使用；村长无法，只好由村中公款以300元一个的价钱，买来少女20名当差，这20名少女经这50名日本兵奸污后，便充作官妓，在村中设立了一家娼馆，廉价卖淫。

在东北，赌博又是公开的，最流行的是“花会”，“花会”共分32门，好象押宝，如能押中，则赔三十倍，穷的富的因此倾家败产的不知有多少。

所以在现在的东北，任何一处都可见到许多烟鬼赌徒，这些赌徒与烟鬼是法律承认的顺民，因为他们太多了，真弄得良民也无法安居乐业，朝夕都要挂念着他们的捣乱。

## 七、奴化教育

现在东北的教科书已经完全修改了，历史由辽金时代讲起，关于中国史只字不提，将使中国人再不知道自己是黄帝子孙。如初中一年级讲本国史，第二年便讲日本史。至于修身的模范人物，也完全是日本历史上的有名人物。最近又规定以日语为标准外国语，成为每周六七小时的必修科。“日满亲善”呀，“大亚细亚主义”呀，“感谢友邦之扶助”呀……满书都是这些东西。

在校中，小学生稍有爱国行动的嫌疑，便横被毒打。但

只此还不算完,还要责罚家长,因为他们说这是大人教育小孩子如此的。

现在东北的各中小学及专门学校,都有一个日本人作副校长,学校中的教员日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副校长,对校中事务有处理的全权,有好多事经他手中办过,校长及教职员多半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在学校里任事的中国人,时常要被日兵传去问话、搜查,又时常被捕或失踪。在校中受日人的严厉监视,说不定何时会犯罪,所以一点都不敢有所动作。又因为日本排斥汉人常常大批的撤换中国人,所以他们多半抱着“五日本京兆”的心,持着“无所谓”但求敷衍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学校上课实与不上课一样——开学也不能进行课程的。

学校用的教科书,又完全由日本官家发给,他处买不到也不许买。这发来的书籍,到来总是非常的迟晚,有时学期已快结束,课本还没有到。教员编的讲义,又须先呈长春文教部的特务科检查,批准后方能使用:许多教员因恐出言伤身,所以多半不敢编写,因为这样无书可读,许多学生在校中也便只有空度光阴。

东北的高等学校如大学及专门学校之类,现在多半奉令停办了,因为照日人说来,中国人只可受小学的工匠教育,是不配受高等教育的。也正因为这样,现在东北的中小学中,劳作的科目特别加多,每天都要学生到街上去扫马路,清阴沟,校中烧饭打水许多事情,也完全由学生去作。

东北的教育,完全依照日人的意旨去办,是彻底的奴化教育,他将使中国人甘作日人的驯顺牛马,再不知道自己已是中国人。可是虽然如此,日本尚觉不足,要对现有的教育横加摧残。

(一)去年5月2日溥仪访拜日本天皇归来,有一封“回銮诏书”发表,里面完全是讲的“日满亲善”“民族协合”一类的话,这诏书凡学生都要能背诵的。该5月2日并定为“训民诏书纪念日”所有东北学校都要举行纪念。岫岩县基督教会私立之汇文小学在举行纪念时,遇到“向皇宫遥拜”一项,该校师生因为是基督教徒,不愿下跪,县政府的日人参事官便大发雷霆,立命该校停办,且羁押该校全体教职员。

(二)去年夏天5月25日,救国军第四路指挥曹国土等在凤城县境与日军接触,日人派大批军队将该义勇军打走后,即大行搜索。日军守备队长搜索到九沟峪时,到学校中去休息,见该校校门室内张贴有以下这类的标语:“青年人生当如流水,遇着障碍越过去”,“青年如夜入深林,须左手提灯右手提剑”,便问校长说:“这标语写得很好,但不知是谁写的”?校长不知他的恶意,便将写者韩佐周的姓名告诉他,该日本军官去后,不几日,韩某便被捕,下落不明,该校亦奉令停办。

在日人这样的摧残下,东北的学校是大见减少了。依照官方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中小学有21,000所,事变后则激减至14,000所,到去年则更减少至800所了!日本将使中国人都变成一无所知的混蛋!

对教育的摧残,最残忍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横行杀戮。例:

1、齐齐哈尔第一师范的体育教员王桂华,音乐教员崔士奎,第一中学校长王紫卿,体育教员王文彬,工科职学体育教员刘古学,商科职校体育教员麻秉钧,女子师范国文教员厉通纲,日文教员胡超凡,附小主任杨树德,一师附小第一部主任李保全,第二部主任张永,私立龙江中学体育教员徐君,第一师范学生刘珍等四人,女子师范学生马文鸳等二人,市政局股长刘嵩山,民报社长王甄海等七人,教育厅体育股长姜康年,科员郑炳寰,视学厉通维,这些人同时被捕,五人被枪决,其余的公务员被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学生被判六年的有期徒刑。一师学生杨洁华,北大毕业生李维周等,无缘无故,竟然失踪,不知下落。其它未被捕的学生和教员,也说不定何时会犯罪,再也不能安心上课。他们时常要被宪兵传去问话,书籍衣服也时常被日兵三番五次的检查。

2、去年夏天暑假前数日,岫岩县大石桥日人守备队长提茂经析木城路过时,到该村学校中去查看,在教员室内发现二本茅盾著的《追求与幻灭》,即以为该校教员吴某是思想犯罪,当即抓至警察分驻所,后来去落不明。

3、岫岩县教育局长王某，去年春天3月底，自北平接到同学王某的一封信，询问王君之子何以不来上学。该信不幸被该县特务指导官野口检出，即以为王某勾结反满抗日分子，当将王某捕去处以极刑。

原载1937年10月《时事类编》特刊第2、3期

# 抗日必胜的理论根据

——《封建的军事性的日本帝国》自序

现在对日全面抗战已经发动了，全国国民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敌忾同仇争取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了。只有一个问题还是大家揣测犹疑不定的，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究有多少的把握，有没有更切实的根据。这个问题一方面决定于我们主观的力量和努力，另一方面决定于敌人的物力和人力。所以分析敌人的物力和人力也就可以大约测定我们取得最后胜利所把握的程度。分析敌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还可以寻得敌人的弱点，根据它的弱点树立制胜的方策。

现代大规模战争的胜负决定于物力及人力两种条件，前者包括武器、资源及产业等等，后者包括经济组织、政治制度、及社会机构等等。后者的重要性尤过于前者，因为物力是死的，人力是活的，物力须借人力始能发生作用。假使一国的经济组织，政治制度及社会机构不合理，人民怨谤



载道,古人所谓“涂有饿殍,厩有肥马”,则虽有精锐武器、丰富资源及高度发展的产业,终久也必难免一败。敌人的物力基础之脆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力基础的缺陷则尚少有基本的分析。日本人力基础的缺陷及其与战争的关系,即连日本军部也未忽视。日本陆军省最近发表的小册子述过:“如果只有少数人享受着经济的富足,特别是享着不劳而获的收入,而同时大多数人民却受着饥寒的交迫,以至演成阶级的对立,那末就引起了一种无论自一般国策还是自国防的见地都不能忽视的问题”。事实正如塔宁和约翰所测定的“日本在战争中不仅要牺牲千百万生命,它的全国经济也必崩溃。绝大多数的人民,要变成流亡失所的饿殍,那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国内阶级斗争的极端严重化”。(当日本作战的时候)所谓“全国经济的崩溃”,所谓“阶级斗争的极端严重化”,完全是人力基础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组织、政治制度、及社会机构的问题。而物力基础在敌人的战争条件上还是附属的次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测量敌人战斗力的大小,主要的还是要从人力基础的这些方面来分析。

本书从上述的观点分析敌人人力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日本资本主义及其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特别倚靠农村的高度剥削(当然也剥削劳工大众)及对外的侵略,所以特别依赖农村及殖民地始得存立;日本资本主义又因为它的后进性,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即与封建势力妥协及结托,所以在经

济上形成地主、高利贷资本家及布尔乔亚三位一体的剥削主体,在政治上形成官僚、军阀及财阀共治的混合制。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政治经济组织如此复杂,所以内部的矛盾也特别繁多而深刻。这些矛盾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必定愈加深刻化,终必演成葬送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的战争必败于人力基础的缺陷。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完成,主要的是依赖对外的侵略战争和强盗式的掠夺。日本的现代工业在中日战争后始有急速的发展,到日俄战争后产业资本始得确立,后因欧战中的趁火打劫,始能完成了金融资本的发展。日本军阀携带着日本资本主义向世界进出向国际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性不但表现于其本国,并且表露于国际上。日本商品及资本随着日本军阀的屁股后头来到国外市场,日本资本主义首先在军阀的翼卵下发育、生长起来。这是日本资本主义与先进各国不同的特点。这种倒置的情势即至今日金融资本的阶段上仍未减退。危机性的世界经济恐慌又在逼使日本军阀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向外寻觅“续命汤”的急先锋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一串的对华侵略战争就是在这样要求下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梦想不但在图谋现状的维持,并且冀求着所谓“大膨胀”。它不但要吞并中国,还要独羈东亚,征服世界。但是这种企图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这种冒险不只是“吞炸弹”而实在等于在火山爆炸口上的魔舞,一切的一切没有不成灰烬的。

日本资本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以侵略战争起家的,

它也将以侵略战争终其寿命。社会发展法则指示给我们的道理：“日本帝国主义正等待着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战争来结束它的寿命”。日本国内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也正等待着我们的民族抗战以便发动内应，争取他们自己的解放。我们的民族革命何时成功，他们的阶级解放也就何时成功。我们对日抗战不但负着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摆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使命，并且负有解救7,000多万日本民众的任务。全国同胞应为这个神圣的使命而奋起抗战，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再从战争的历史阶段来说，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这又完全是人力基础的问题。事实告诉我们：“进步的战争必定战胜反动的战争，民族战争都是占胜利的”。当资本主义的初期，新兴布尔乔亚生长的结果要求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所以对保守的反动的封建势力作战，终于打败了封建势力，树立了民族国家。欧美各国有过许多的事例，日本也多少经过这一个阶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已经不和封建势力斗争了，它倒反在一切的方面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不但阻止本国更高层次的发展，例如农业革命，同时又利用其新式的武器，压迫着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阻止历史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反动化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向后开倒车了。但是受到压迫的我们，却正在要求着“民族国家”的完成，我们的民族意志已如钢铁的坚硬了。我们是为着民族革命而战，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一切的民族革命战争，最后必定占胜利。

根据上述可知人力基础(经济组织,政治制度及社会机构)在战争所占的重要性。希望我们的抗日同志都能努力了解敌人的这些问题。因此作者根据多年的研究,多就这些问题加以剖述,供民族抗日指导者参考。作者的计划,除本书而外还要陆续分析,继续出版,除敌人的人力基础而外还要就敌人的物力基础一并加以讨论。这在作者是一种有系统的工作,希望读者多加指正!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还盼望读者参考拙译《日本资本主义论战》。

原载1937年11月《时事类编》特刊第4期

## 新年·新阶段·新觉悟

日本以七·七卢沟桥事变至八·一三淞沪事变以后的一切侵略,不但造成了我国同仇敌忾的抵抗,其强逼我们退出首都又是逼迫我们作更新的抗战。我们的抗战已由第一阶段走进第二阶段。我们是在1937年年底退出南京的,1938年也可以说是我们全面抗战的新阶段。

在最高领袖加强抗战决心的情形下展开了第二抗战阶段,此后的发展无论自我们抗战本身,抑自敌人的动向乃至国际情势讲都和以前截然不同。敌人侵略我们的气焰更加高涨,其野心和阴谋更加毒狠。他们一方面分三路进攻内地加紧军事侵略以便逼我作城下之盟,另一方面到处组织伪政府特别是伪中央政府企图否认我中央政府以肆其“以华制华”的奸计。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更加紧密团结而对英美法等民治国家加以强度的威胁。意大利退出了国联与德日采一致行动,日本则对英美在华的军舰大肆轰炸,对于英美的利权大肆蹂躏。这种新事实一方面威胁

英美法并加以恐吓,他方面就是促进两大营垒对立的尖锐化及世界大战危机的成熟。我们的国家民族走到了危急存亡的悬崖,世界大战的危机又在日益成熟,1938年实在是一个最危险的年度。

则然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最危险的新年度和新阶段呢?我们的新觉悟必须清算过去树立将来,对于我们过去的错误和缺陷,我们不能隐病忌医,对于将来的新办法不能畏首畏尾,我们一切的办法正需要着彻底和勇气。今日清算过去,开拓未来,大公报有几句说得很中肯:“旧中国的一切一切已不能维持,必须就在这继续抗战中创造出新中国!假若没有这个创造力,中国就不能说没有亡国的危机,为什么说旧中国不能维持?因为事实上一切立国之要件许多已被敌人损害或摧毁,并且证明旧组织,旧方法,抵抗力小之故……”(12月13日该报社评)。

第二阶段抗战第一要件必须积极、彻底、主动、具体、真正全面化。敌人现在的步骤已很显明,不只是少数人所幻想的占领一省两省,而是直要亡我国家灭我民族,情势已经不容我们扭扭捏捏,更不容我们徘徊动摇了。此后的抗战已不容我们存一种“敌来我挡,敌去我停”的心理了。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求战。引敌深入延长战线使敌疲于应付是最高当局的策略,所以必须有计划地扰乱敌人的后方打断他们各部的联络。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把敌人的领土也拉进战争的范围来,不要单以我们的领土任凭敌骑的蹂躏。敌人飞机大炮惨酷轰炸我们,促戚我们的人心恐怖

社会秩序紊乱,我们也应当把这种滋味分点给日本本国人民尝试。我们希望着日本本国人民反战的空气高涨起来,就只有采取轰炸日本本国的办法。有些人对于这种办法或许认为中国飞机太少不易作到,其实要作并不困难,我们的飞机虽然少,但是法苏的飞机却是世界最多的,能否实现就要决于中国的外交方针。其次我们抗战的纲领不能再是一种标语。单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说,必须真正使有钱的人拿出钱来,有力的人有地方用力。真要自私成性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人拿出钱来,必须实施战时的非常办法。真要有力的人出力,必须一面不使现成的力量分散而能训练成为抗战的力量,一面发动潜伏的力量使变成抗战的补充力量。前者如各机关各团体的人员特别是下级人员,中等以上各学校的学生,战区流亡出来的青年和壮丁等等,都是主要的,后者如各地的农民,工人乃至知识分子若加以宣传,组织,训练,都是伟大的力量。再如物资的力量也要在具体的统制计划之下动用起来。敌人封锁了我们海口,正是我们轻重民族工业发展的机会,政府要一面以国营的方式经营最重要的一部分轻重工业而以奖励的方法提倡较次要的民营轻重工业。

抗战的积极主动的方针还须应用在外交上。俾阖纵横的均衡外交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希望用温情的个人的拉拢达到友邦援助的目的。我们须知道每一国家的外交都是它内政的延长同时又是以利害关系为根据的。我们要

观察各国的内政及其利害关系，以测定各国的外交方针，决定我们的敌或友。九国公约会议以来许多国际政治的变化，已经给予我们不少的教训和指示，我们再也不能彷徨了。苏联与我们的敌人立于对立地位，日本最后是要进攻苏联，先侵略我们也可以说是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日本视海参威为描对日本心脏的匕首，准备用当年攻旅顺二倍以上的牺牲攻夺海参威，再进而占领西伯利亚。日苏是誓不两立的，苏联和我们的利害正是一致，我们要赶快地联络苏联，苏联愿意并且能够“每二十分钟派二十架飞机轰炸日本的三大工业区”（风传是九国公约会议后苏联向英美的提议）。其次英美在华的利益也一天天地被敌威胁，敌的炸弹又不断地教训着英美，英美总有一天断然起来的时候。不过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英美本国及殖民地人民对日经济制裁，最有效力，并且立刻做得到（详请参阅拙著《日本工业的危机》），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做得太不够，对日经济制裁的声浪竟成了昙花一现了。法国因为法苏的关系，只要中苏关系切实联系，他自必帮助我们。此外这于其他各国也依上述原则来决定方针。在这次的外交上还有一点完全给大家忽略过去。总理的遗教要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日本侵略中国是为独霸东亚的第一步，亚洲的弱小民族正和我们利害相同。日本还要征服世界，南洋及中南美洲各弱小民族也和我们利害关系一致。这些民族对于日本的攻击是很有有效力的。例如印度，澳洲，东印度乃至中南美洲各国能和日本断绝经济关系，



日本工业立刻崩溃。又如台湾朝鲜及日本民众是我们抗战的主要力量,也是我们所忽略的。在抗战的第二阶段上,我们应当多注意并努力这些工作。

原载1938年1月《抗到底》第1期

## 中国抗战与日本民众反战

中国全民族已在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战；日本民众也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反战运动。前者为着全民族的解放，后者为着全阶级的解放；二者的手段虽然不同，而其目的则一。中国抗战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包括天皇，贵族，官僚，军部，财阀等统治阶级），日本民众反对的对象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二者的敌人大体上是同一个。若中国抗战，日本民众反战可以发动起来；若中国抗战到底，日本反战运动就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过来说，若日本人民反战，中国的抗战可以减轻不少的压力，若日本反战运动扩大，中国的抗战就提前达到最后的目的，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者的战场或许可有地域上的分别，但其目的却又完全一致。中国抗战与日本反战，具有极密切的关联性。中日民众携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并不是虚构的。希望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双方认识清楚的指导者多加努力。

中国抗战的理由正大，容易为一般民众所认识。日本

强盗的野心在于亡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民族。国家亡了,自己就是亡国奴;民族灭了,个人就是世界的弃民。个人的生存和幸福,全系于国家和民族之完整。日本强盗虽然厉害,我们抗战尚可以有打胜仗的希望,若不抗战就永久没有翻身的余地。何况日本强盗并不真正厉害,问题只在于我们太不厉害罢了。

但是日本民众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教育政策及文化政策的麻醉,军国主义有意地无意地,或多或少地残留在头脑中,所以除非相当觉悟的前进分子以外,不容易马上觉察到反对战争的必要。所以初期的反战必定为前进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等到战争相当持久而国内财政经济的变化影响到人民一般的生活的时候,反战的思想及运动便渐渐扩大起来,到了日本的作战碰到大钉子的时候,反战运动便由成熟而转变为国内的社会革命。一个经过正确思想洗礼的俘虏,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相信日本如果打了败仗,那时日本国内可能发生革命,日本大众可以得到解放。”(见《新华日报》《日本俘虏访问记》)。这是很正确的观察和自信。如果怀疑:日本反战的消息是否可靠,或日本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否可能?那末就请他多考虑这三个过程。

现在呢,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已经走到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界。前进知识分子的反战运动,已经相当的普遍化。知识分子经过几次的大逮捕了,据说12月间被捕的人数已达7,500人之多。其构成分子包括着学生,教授及国会议员。最近被捕的大内兵卫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美

浓部亮吉是天皇机关说创设者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儿子，其受乃父自由主义思想的熏染明显表现于著作中，有泽广己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经济资料整理者。东京帝大少壮教授皆拥护大内等，而军部代表的土方成美学长终于不得不辞职，也是反战普遍化之一证。末次内相专给被捕者戴红帽子，事实皆在反证了。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左倾各派因为反战运动而统一起来。以前日本正统派（或称讲座派）和劳农派的对立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次竟然因斗争目标之相同而统一，增强反战力量不少。这是东京警视厅的秘密报告。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并且已由知识分子的反战进展到实际斗争的地步，大阪工场的怠工及新潟近郊的爆炸虽已成了过去，但是2月28日神户码头的大流血确又决定了日本人民反战运动之踏实的展开。日本政府接受了末次大将来长内相，军部法西斯的统制更加得到了开展的地基。狭隘国家主义者的末次大将，为造成军事法西斯独裁的统治而不惜以全力压迫左倾各派及自由主义者，并且企图消灭自由主义及左倾各政党，统一于一个法西斯政党。末次的这种努力只有驱使日本民众的反战运动更加发展，更加踏实地发展。

日本民众反战运动发展到极点，就是和中国的抗战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就是参加抗战。日本俘虏曾经很坦诚地说过：“我们不是不想回家。但是现在中国正进行着争人类进步的工作，我们还是愿意留在中国工作。”他们也已在前

线做过种种工作。这虽说只是极小局部的事实,但也足以证明日本反战运动可以发展到第三阶段的现实性;中日民众携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幻想,而实在有它那由可能性发展到现实性的根据。

至于这个现实性何时才能普遍的成熟,这就要看我们主观的努力了。上述日本俘虏之觉醒过来,不是一件凭空掉下的事,而是经过苦心灌注正确思想与切实训练的。

原载1938年3月《抗到底》第6期

#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 一、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开始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不自今日始。自从日本资本主义相当发展而人民逐渐觉悟以来,日本人民即已反对无理性的无人性的战争。所以30年前日俄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日本前进的知识分子即便从事于反对战争运动。这个运动随日俄战争的爆发而实践化,扩大化。当时反战运动的指导阶级是前进的知识分子,有幸德秋水,土界利彦及内村鉴三等人,指导的主体是由明治年间最著名的万朝报社分出的平民社。平民社创立于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完全因反对战争而创立。平民社当时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发行机关报《平民新闻》,从第一号起即公然揭载反战的记事和主张。他们反对战争的三大理由是:(一)战争违背人类博爱,破坏社会主义(《平民新闻》第十号);(二)战争是为布尔乔亚而有的,其他平民只作牺牲品(《平民新闻》第13号)(三)承认战争的众议院是地主及资本家的代表,而不

是平民的代表(《平民新闻》第十号)他们并且因为反对战争而反对增税,社会主义的老先辈堺利彦,首先做了反战的牺牲者而被捕下狱。平民社还和社会主义协会合作:举行社会主义研究会,妇女讲演会,及东京近郊的小讲演会,其后还组织日本全国旅行宣传队下乡工作。在各地方还设立社会主义协会的支部,采取什么研究会,什么平民新闻读者会,其普及的地方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可说普及于穷乡僻壤,还有早稻田大学的社会学会等外围团体,也都处于平民社指导之下。平民社创立的第二年,美国日侨还在河上清的指导之下成立了日本人社会党,与国内的反战运动互相呼应。

当时反战运动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战争,所以日本人民特别和俄国前进的人民联络。在《平民新闻》第18号上掲載一篇《寄俄国社会党书》,提议日俄劳工携手反对战争。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又派片山潜出席万国社会党大会,和普列哈诺夫握手,做成反对战争的决议。日本社会党也因反战而加入第二国际(万国社会党)。日本社会主义协会当时还在反战运动当中发动普选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以为反战运动的帮助。

## 二、日本人民的反战情绪

现在,日本人民在日本军阀推进侵略战争之前,更要反对战争。因为侵略战争不但于他们无益,并且有害。他们

在侵略战争进行中,只有加重负担,牺牲生命,并且徒然延长他们获得解放的期日。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民众负担了几十万万元的所谓“满洲事件费”,死亡了20多万人,他们自己却一无所得,所以一般日本士兵都怕打仗。所以,日本士兵泽村利胜在自述中说,“来到战场总想着这些(杂念),怎样有勇气拿起枪来啊!和我同一阶级的人们,都是怀着满腔想家的心!”“越想越觉得侵略战争可恨!”另一个士兵中村敏雄在自述中,也向他们的弟兄呼号着:“远离父母妻子,来做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是为了谁呢?回想一下“满洲事变”罢!死的不尽是我们的弟兄吗?但是我们的家族得到了什么呢?除了悲哀和负担加重之外?……这悲哀的战争只为了在国内花天酒地的资本家、地主及军阀们呀!反对这为他们流血送命的战争罢!把这战争转变为反对军阀、资本家、地主的战争罢!”就是日本士兵的家属也都同样地厌战、反战,从许多家信中都可以看出。每天日报上登载的日本士兵的家信,其内容不外乎是想夫念子的情绪,甚至于诱劝逃跑。日俄战争当时的爱国精神完全丧失了,(当时日本士兵还受着军国主义的熏陶)。日本士兵厌战与反战,已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许多严重的事变,如工人怠工和罢工,破坏工场,焚毁汽油,2月初台湾矿工的大反抗,及2月28晨神户码头的大流血,尤其是重要的事实。



### 三、最近反战运动的开展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已由知识份子反战的阶段,走上了人民普遍反战的阶段。前进的知识分子反战的情形及其因反战而大批地被捕,据东京方面的特殊资料,其经过可以归纳如下:(一)最近凡与劳农派,日本评论家组合,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日本全国评议会(劳工团体)等团体有关系的人,都被内务省诬为“赤化”而加以违反“国内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下狱。(二)去年4月成立的日本无产党及最有权威的日本全国评议会,也由内务大臣末次信正加以“扰乱日本国内安宁秩序”的罪名,下令横加解散,其余认为有嫌疑的政党,交付警视厅继续侦察。(三)这次被严密搜捕的地方,非常普遍,其主要地域即有东京、大阪、京都、爱知、静冈、兵库、冈山、新潟、栃木、福岛和歌山,秋田、岐阜、大分、富山、群马、北海道及长崎等1道3府16县。(四)东京市被捕人员中的主要份子,有劳农派的理论指导者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畑寒村、大森义太郎、向坂逸郎、高津正道、冈田宗司及中西伊之助,有社会大众党党员黑田寿男,日本无产党执行委员长(人民战线指导者)加藤勘十;前无产党书记现任东京府议员铃木茂三郎,及著述家的稻村顺三。东京市议员的中岛、三轮及安平等人也在其列。其他各地方的被捕人员,则以工人领袖为多,大阪方面被捕23名,京都被捕11名,富山县被捕6名,和歌山县被捕6名,冈山被捕9名,兵库县也有5个著名的工人领袖被

捕，其一是日本无产党神户支部执行委员长木村锭吉，其二是副委员长青柿善一郎，其三是书记长桑田喜三郎（属于友爱俱乐部），其四是执行委员森口新一，其五是扇港睦会支部主事盐田真太郎。（五）自1935年夏第三国际第七届世界大会决定议案改变共产党工作方针以来，日本劳农派即与正统派合流，而大事活动，最初以社会大众党为中心而与各政党进步份子提携，图谋树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后又组织劳农无产协议会，去年4月间始改称日本无产党；中日战争爆发后遂发起反战运动。（六）去年7月战争爆发后，第三国际由美国共产党分发给日本左翼份子种种宣传品，鼓吹树立和平外交，宣传援助战死士兵遗族，出征工农大众免除纳税义务，并指示战时经济问题。

#### 四、日本政府压迫反战

这样日本的社会运动与反战运动配合起来，已经构成了日本内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反战运动上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一点，日本当局非常地重视。从日本内务大臣末次发表的言论，也可以窥见一斑：

“从来日本的社会运动，常缺乏相当的正常工作。直到最近竟有劳动政党提出种种改换日本国情的主张及主义，以企图破坏政府的国策。这次被捕的人物，不仅煽动日本人民的思想，并且积极从

事于第三国际的人民战线运动及反对日本政府对华军事。因此，内务省不得不预先防范这种危险思想的散布，特将这种中心份子拘捕，对于以后工人及人民的结社，认真严禁……”(神户《日日新闻》号外)

又据神户当局发表的文告，兵库县的左翼阵营有神户全评议协会支部及友爱俱乐部，多年即向工人团体提倡现实斗争，欲有所叛乱。去年3月和日本无产党神户支部合并后，对于煽动工人的工作，更是活跃。在5月间，他们竟也参加神户市参议会会员选举竞争，9月间神户市电所的争议，也完全是他们鼓动阶级斗争所激发的。据同样文告，这次调查的结果，他们实与美国及中国各反战团体联通一气，企图创立人民战线，反法西斯，并推翻政府。

## 五、日本在华士兵的哗变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渐渐走上了实践的途程。不但在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渐渐普遍化，即在华的将官和士兵也渐渐自动地起来反战了。在平津失陷的前后，有许多从军的日本知识分子，因厌战而自杀，许多留日学生的老同学就是这样结束自己的性命的。这只不过是消极反抗的表示。但是近来的情势已两样了。最近日本驻沪军事法厅审讯一〇二及一〇三师团的军官加藤及中野，同时也有士兵

500余名被审问,听说都是因为反战。(8日电讯)据香港电,日本一二一师团山内旅团的一营在上月28日上午8时由日本开到吴淞登岸时即全部哗变。又据美方传出消息,2月4日至8日,日本第一一师团由南京开往江北时,也有一部分因拒绝开赴前线而哗变。日本士兵的反战,已渐由消极的态度转变为积极的态度了。

## 六、日本反战运动的前途

根据我们的理论推测,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可以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进的知识分子宣传反战,或发动反战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一般民众接受反战宣传而发动普遍的实际的反战运动;第三个阶段是日本民众和士兵觉察出中国抗战与日本反战的共同性,而实行中日人民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已经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反战的行动渐渐发生效力,这种效力正在增长着。这个反战运动若再进展到高一层的阶段,那就会由反战而与我们合作抗战了,他们可以把这战争转变为反对军阀资本家地主的战争。(正如觉醒了的日本士兵所自述的)观察过去及现在的情势,这种发展实有很大的可能性。中日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抗战是彼此争取解放的同样手段。中国的抗战不成功,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了续命汤,可以缓和它内部的危机,结果日本大众的解放也就不会成功。日本资本主义从它的幼年就被决定着:

因侵略中国而生长,也将因中国的抗战而丧命。日本一般民众普遍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他们的反战就容易发展到抗战的阶段。所以改变日本人民的反战为抗战,完全要靠我们的主观努力。我们一方面要持久抗战到底,给与敌人以接连的打击,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对敌宣传,改变日本民众及士兵对华的观念,使他们明了中日民众利害的共同性。目前我们政治部第三厅已决定成立对敌宣传处,将来当有不小成效。还希望民间的国际宣传团体,也能够多作这种对敌的宣传。

原载1938年4月《世界知识》第7卷第8期

## 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剖述

### 一、第二期抗战经过的概要

自从我军事当局有计划地退出上海及南京以来，中日大战走进了新的阶段，我们的抗战开展了新的形势，整个战局及各战场，都采用新的作战方式，新的战略与战术，这是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出发点。

先就整个战局述其大概，当我军退出南京后。日本军阀满以为我国将必“屈膝”投降，万想不到我国不但军事当局决心坚强抵抗，举国上下倒反更加精诚团结。日本军事法西斯政府遂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幻想而采用开国以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的方式，决定对我继续侵略战争。于是第二期大战遂自1月间开始。敌人第一步作战计划，是一方面分路进占杭州，企图侵入江西边境，一方面渡过长江北上，企图由淮南方面沿运河两岸及津浦线北进。同时又以海军威胁华南，企图切断或扰乱我国军火的来源，但在这方面因为兵力不足分配，不久即便停止积极的进攻，而

集中全力于津浦线南北两段，意在企图打通津浦线，威胁陇海线，以便席卷中原，包围武汉。当时我军即开始利用敌人深入腹地的弱点，运用新战略，立刻予敌人以极大的打击。1月底至2月初旬，敌军在津浦线上的战略是采取南段主攻而北段为辅的办法。最初南段的日军，也曾连续占我数县，如凤阳、临淮关、蚌埠，企图渡淮河北上，但经我军扼守淮河北岸，打击渡河的敌军，同时又以淮南路截击敌人定远的后路，以考城袭击敌军后方，正面又反攻淮北敌军。经过淮河血战，敌军连遭挫折，遂彷徨于淮南南岸，不能向北再进一步。

敌军打通津浦线的计划顿遭失败之后，遂将军事重心移于豫北与山西，企图掠夺黄河以北地域，作为西窥陕甘南断陇海线的根据地。2月初旬敌军以冀南沿平汉线正面及右翼活动，攻陷安阳、汤阴、卫辉及新乡，直达于黄河北岸。同时，其左翼又攻占内黄、南乐、清丰、淮阳、淮县、滑县以达于黄河北岸的封邱。敌人原欲渡河攻击开封及郑州，并与津浦北段的敌军配合。但是我方太行山、冀南、鲁西北、及豫北的游击队（其著名的统率者有杨秀林，赵侗，范筑克及丁树本等人）却在敌人后方与敌错综交战，夺还望都、行唐、及新乐等县，攻保定后路、豫北冀南各县，也曾经得而复失者多次，形成拉锯式的争夺战。3月初，我正规军更渡黄河反攻，收复长垣、内黄、滑县，并截断入晋敌军的后路，而平汉线战局也因此得以稳定。

敌人为着西窥陕甘南断陇海线，而北沿平汉线之进攻

同时,于2月下旬分五路进攻晋南,第一路自平遥沿同蒲路前进。攻介休及灵石。第二路沿道清铁路由博爱攻晋城。第三路由彰德经东阳关攻黎城、潞城,以至于长治。第四路由太原汾阳公路向晋西前进。第五路由宁武向晋西北、河曲及保德进攻。初期,敌军曾经一度进展,南路突破临汾、侯马、运城、蒲洲,到达风陵渡,西路攻陷离石、军渡、隰县、大宁,西北到达河曲、保德,东路陷晋城、长治及襄垣,在晋敌军,原有四个师团,后增加两个师团,本来是企图迂回包围我军并加歼灭,或压迫我军退至黄河以南及以西地带。但是我军采取运动战并与游击队配合,争取主动地位,使敌军陷于僵局。敌人因欲压迫我军退至黄河以南或以西所以采用迅速的迂回战略挺进至黄河东岸及北岸。惟其采多路迂回方式,遂至各路所配备兵力非常单薄,多即6,000,少则二三百人,占地又极广阔,有些部队遂为我军各个击破,有些部队不断地被我削弱,后方被我切断,前进部队被我包围,同蒲路被我切成数段,前后失去联络。敌人终不得不用飞机运给养至风陵渡,当日军大举进攻晋南的时候,蒋委员长下大决心,禁止在晋各军退过黄河,再以地势势利,我军遂得与敌人以大打击,敌军在侯马、曲沃一带的激战,损失15,000多人,在隰县一战也损失10,000多人。目前每日的斩获都在数百以至二三千之多。

敌人因为进攻山西的计划没有完成,倒反陷于进退维谷,遂又转移方向,增兵津浦北段,猛烈南犯,企图一鼓直下徐州,与南段敌军打成一片,造成进犯中原之第一步准



备。敌人在津浦北段曾经一度吃到甜头，继续不战而陷济南、泰安，直下津浦正面达于两下店，右翼由胶东、日照进占莒县、沂水，左翼进击济宁，造成夹攻徐州三路突击陇海线的局势。但是1月上旬的济宁血战却给与敌人很大的打击，因为上次左翼的南下计划的失败，所以这次采取右翼的迂回，到达台儿庄。但是这次我军给予敌人的打击，却数倍于上次的济宁血战。这次的津浦北段的连续大战约自3月中旬开始。在3月14日以后的五日中，右翼临沂一战，敌军坂垣师3个团联队9,000多人被歼灭了5,000。正面敌攻陷滕县，通临城，进迫韩庄，但不久又即退出韩庄及沙沟。左翼我军也反攻，嘉祥、济宁，回济宁城，同时左翼又分路进击兖州，攻入大汶口，威胁敌人后路，破坏泰安兖州间的铁路数十处。右翼我军的增援部队侧来枣庄，27日击破了敌军矾谷部队3,000，临枣台线也被我军横断，台儿庄及峄县敌军各部，都被我各个包围，敌人后方的联络也被我军切断。在这种情形之下展开了可与欧战中的坦能堡大会战比美（陈诚将军之言）的台儿庄大会战，我军这次的总攻击共分三次，第一次在上月24日，第二次在30日，第三次在本月6日。第一及第二两次歼灭台儿庄敌军5,000多人，第三次歼灭敌人两万多，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关枪931挺，步兵炮77门，战车30辆，大炮多门。日军所伤亡的尽是精锐部队。敌军这次的惨败，构成日本帝国主义四十年来陆军战史上空前的耻辱，世界各国皆为所震动。

第二期中日大战中，敌人不但在津浦线，平汉线及山

西各战场上吃了极大的苦头,即在其淫威四布的江南战场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军退出上海及南京以来,敌人对于江南即采扫荡的计划,企图肃清我军。自1月初旬至3月初旬,敌人一面以芜湖为据点,一面以杭州为据点,像螃蟹的两只钳子控制着江南全线。又在大据点前面树立小据点,加以巩固。在芜湖前面以宣城和鲁港为小据点,在杭州前面以富阳和余杭为小据点,掩护这两大据点。我军则实行迂回的运动战,截断敌人据点与据点间的联络,并且积极发动游击战,绕袭敌人的侧背。我们的正规军渐改淞沪作战以来的被动地位为主动的地位,游击队又是一天多似一天地澎湃起来。游击队曾经冲到富阳、余杭、武康、吴兴公路的东西两侧,不断地破坏公路及沪杭铁路截断敌人的联络,使敌人疲于奔命。同时我军又乘敌人的空虚攻克广德,收复宣城至长兴间的公路,一面牵制宣城的敌人,一面攻击长兴和宜兴,因得保障中间通达宜兴、溧阳和京沪铁路的门户,我们的正规军队就陆续向这门户里面推进,克复了宜溧两县。3月初旬,陈师最前锋部队曾经冲到无锡、常州的南侧和金坛以东的地区,对京沪铁路线和南京,形成严重的威胁形势。我们的游击队更配合着正规军克复了郎溪、溧水等县,对秣棱关及京芜公路实行袭击。在这战场上,单就陈师一部言,即与敌人作战40多次,歼灭敌军在五六千人以上。

此外,绥远西北方面,我军也以反攻包头,马占山部收复了托克托县,牵制绥远和包头,包头与归绥交通被我截

断绥南我方游击队也很活跃。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守住克复的地方,或绝对阻止敌人前进,但是第二次的作战消耗了敌人不少,即就现势说,我们的优越地位是日益增高的。现在山西方面,我们仍然占住大部分的县份,交错于敌人的四围。沿黄河西南两岸为要点上,皆驻有雄厚的兵力,使敌人不敢轻犯。在津浦北段,我们正在继续进行着猛烈的运动歼灭战。在津浦南段和皖南江浙方面,我军也正在肃清正面的残敌。西北方面我军也正在步步反攻,节节进展。我们的游击队更散在各战场上积极活动,已经把敌人的后方做成我们的前方。我们全面的战局已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运用攻守兼施的运动战,阵地战又与游击战配合,对敌人进行着全面的歼灭。我们全军士气的振作及将士的拼命,尤其是第二期作战的特色。

## 二、第二期胜利的原因及其影响

抗战第二期胜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检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其最根本的应推军民全体精神之振作。我国对日全面的抗战促成全国大团结的实现,而抗战的继续进展更加巩固了这种团结,也是理所当然。“团结就是力量”,有强大的力量,则可以打败强敌。白崇禧将军对外籍记者谈战局,有几句话说得很透切:“……观抗战初期,我方在南京上海等处损失较敌人为重,第二期作战则伤亡顿形减轻,甚至

敌人牺牲较我为重。个中理由，无非我国军民团结一致，愈战愈强，及变更作战计划，放弃阵地以避免敌人巨量机械化部队之优越火力，采取运动战以发扬我军之机动威力所致也。……”白氏且引古训“心战为上兵战为下”，阐述这次胜利之得力于精神之振奋，实在说尽我军胜利的根本因素，非是深明我国政治问题核心的军事专家不能作这样透切扼要的分析。我们如果更详细地列举胜利的原因，就可以得下列几种：

（一）前方将士作战积极性之提高，特别是各战场最高指挥将领守土卫国精神的坚决，是胜利的第一原因。南京失陷后，敌人乘其一时的胜利不战而连占我济南、泰安、津浦正面直达两下店，右翼由胶东、日照，进占莒县，沂水左翼进击济宁，在极短期间素称天险的泰山山脉全部落于敌手，造成敌人夹攻徐州三面突破陇海线的局势。这不是战之不利所致，而是统帅不战溃退所致。但自李宗仁将军坐镇徐州以来，则不但日军不能越徐州一步，津浦南北两段都是屡建奇功，开抗战以来胜利的新记录。徐州安定一如后方，老百姓竟以姜太公称李氏，四面的老百姓帮助军队，汉奸逐渐绝迹，造成津浦大胜利的基础。这不是单纯的战术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的问题。这种条件完全靠最高领袖英明的领导和各战区将帅卓绝的指挥形成的。

（二）新战略和新战术的广泛采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在第一期抗战中，我军的战略大都宥于单纯的防御战，各战场大都敌来则战，敌停我也停甚至敌来则溃，敌退我

不进。北战场失地之迅速由于后因,东战场牺牲之大由于前因,但自我们退出上海及南京而抗战进入第二期以来,我们即采用新战略,放弃被动的单纯防御战而转为主动的攻击性的防御战。津浦南北段的连战连捷,完全出于这种主动的攻击。抗战第二期的战术也有新的改变。第一期完全采用阵地战,主力战,致使牺牲极大。第二期则以运动战配合阵地战,以游击战配合主力战。江南、山西、及冀豫各地的胜利,完全由于这种新战术,即津浦线的胜利,也未始不是由于这种战术,因为这种新战略及新战术的运用,而敌军在各战场疲于奔命,陷于进退维谷,等其总崩溃之到来。

(三)各战场军民之进一步的合作,也不失为这次胜利的原因。在第一期东战场的经验,告诉我们军民之不合作及汉奸之破坏使我们军队吃到大亏。但自入第二期抗战,各地都积极动员民众,特别是第五战区的动员工作可算相当积极。虽然因为环境的关系还没有十分开展,总算做到军民相谅解的程度,老百姓不肯为敌人收买去当汉奸(据昨日的消息)是新鲜的现象,敌人的汉奸政策在徐州一带不能发生作用,不能不算是胜利的原因之一,此外,江南、山西、太行山一带,平津近郊、冀南、豫北各地,皆有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到处与敌人作游击战,牵制敌军作战的集中。陈诚将军说得好:“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计有50余万人(在东北四省当不在内),而参加台儿庄会战者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

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攻其后方”有以致之，例如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游击队，致使敌人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南江北浙西各战场，都同样牵制着敌人。

（四）敌人弱点的暴露，也是我们胜利的原因。这种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其一，是日本兵力不足分配于日益扩大的战场，财政经济的支绌限制着军火的充分补给和任意的消耗，在沂河战役上，我军获得敌军牟田作战命令第41号支队会报一件，其中有几点重要的敌情：“①近来作战我屡挫折，常为勇敢之华军打击破，盖由于左右连络之不良；②弹药粮秣应格外节用，目下日本举行数十万之动员，其战场约当日本国大之一倍半，今战事方历半载，各物俱感接济不上，炮弹手榴弹因作业能力之关系尤感缺乏，各部队依现下情势应格外节用；③战时兵员编制之不当，每中队仅有157名，亦为失败原因之一。”其二，是日本士兵厌战与反战情绪的高涨及行动的表现，数十年来日本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重染之下，大部分人只觉得中国人野蛮，文化落后，国家不成为其现代国家，中国人不爱国，中国兵柔弱无能，不足一击，因为觉得征服中国为合理的要求，“应惩”中国为正当的行为。但自我们发动全面抗战以来，屡次给与日本士兵以大打击，他们遂改变轻视中国的念头，甚至畏惧我们将士英勇的抗战了。所以在作战下常畏缩不前，特别是在肉搏的时候。加以日本这次师出无名，完全违反正义和日本民众的利益，日本前进的民众皆起来

反对,发动反战运动,反战的情绪,深入民间及队伍,日本士兵遂由厌战而积极反战。这次津浦线上俘虏之特别多,是一种消极的表现,而上海及南京各方面日本将士屡次的哗变是一种积极的表现。因而大部分日兵作战不很努力,也是失败的原因。有一部分没有觉醒的日本将士则因为第一期战争的暂时胜利而骄傲起来,数月来日本军队纪律之败坏,已经在所谓“皇军”的名誉上烙上莫大的耻辱。古训说得好:“骄兵必败”,这样的“皇军”自然没有不败的理道。

总之,抗战第二期胜利的诸原因都是很确实的,进步的,并且这些原因都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坚持抗战下去,我们方面的优点是要日益增加,而敌人方面的弱点也更要日益暴露,我们抗战自然是要连续不断的,集小胜为大胜,最后必定驱逐日本强盗出于国境之外。

然而这次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却在于胜利对于各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更加巩固抗战的基础,增强胜利的把握。现在因限于篇幅只就各方面的影响简单列举出来。

①打破一部分失败主义者的观念,阻止中途妥协投降的倾向;

②给于全国人民胜利的信心,提高将士的战斗力;

③证明新战略及新战术的成功,保障新战略及新战术的运用;

④证明军民合作的功效及其必要,便利各方面的动员运动;

⑤对世界保证我国抗战胜利的前途,增强世界各国

对中国的信赖使各国官民更加援助我们抗战；

⑥改正日本国民轻视及鄙视中国的观念，增强他们对于战争辛苦困难的感觉，使他们更加积极起来反对军阀政府的暴行；

⑦提醒傀儡汉奸明白日本强盗终必战败，阻止他们认贼为父为虎作伥的垂谬行为。

以上所列举的都是良好的影响，但有一种反面的影响，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人所不能忽略的，就是在我们大胜利之后，敌人更将增调大批军队与我们作更大规模的决斗，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及更毒辣的手段攻打我们，敌人自台儿庄大败即自认为四十多年陆军战史上莫大的奇辱，又为稳定他们民众的反对，而必然地增援大队，争取胜利，闻上海方面最近敌人已经新到援兵五个师团。又据昨日的消息，敌人为贯彻打通津浦线的计划，连日向这方面增援军队，先后开来枣庄及峄县一带的，有由平汉线调来的土肥原所指挥的第十四师团全部及刘桂堂伪军千余人增加临沂附近的，有由上海调来的一〇二师团共三联队，此外，津浦线上18日有八列兵车过天津南下，19日又有十三列步骑兵兵车继续南下，两日共计在5,000以上，徐州的消息，沙沟的敌军装运两列车北开，临时转峄县增援，另有辎重装四十大车由公路开出。于此可见敌军继续进攻的决心和布置。第四次更大规模的会战即在目前，我们应有更沉着更积极应战的办法才可以应付这个更严重的局面，敌人也在准备采取新的战略，收买汉奸严密后方的联络，以抵制



我们的游击战,我们更须本着军民合作的精神发动广大的民众以保卫国土,才不致上了敌人“以华制华”的毒计。

蒋委员长为着这次的胜利通电全国,勉励军民,所言各点都是我们应付当前紧逼情势的指针所以节录要点于下:“……获此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阅月来全国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凡我全体同胞与全体胞泽,处此时机更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惟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以战局之久远上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责任,忍劳耐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据4月8日各报)。

(1938年4月22日)

原载1938年5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1卷第12期

## 日本反战运动的国际化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日本国内即有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在激荡着。这是因为侵略战争事实上所给予日本民众的加紧压榨所激起的。日本内地各阶层革命民众都站起反战了，台湾及朝鲜的民众也起来开始后方的破坏工作了。不过，从来的反战运动还只是个别的，孤立的，彼此之间尚无密切的联络，直至最近始渐有日韩台联成一体作更有力的斗争的倾向，日韩台的反侵略战争同志渐能集结在一起，努力建设一个推进这种工作的干部。日本朝鲜台湾反法西斯同盟创立准备委员会之成立，就是这样走向具体化的序幕。

本会最近接到《日本朝鲜台湾反法西斯同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宣言》一件，读了深感吾人从来所把握的日本反战运动更有其确实性，这种反战运动的前途更可乐观。这不是因为一道宣言的辞句而是因为这种宣言的后面确实蕴藏着莫大的动力和发展的条件。吾人近年来即已不断地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侵略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日本民众解放运动及韩台的独立运动和中国的民族革命，就很自然地联结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前年我在东京的时候，一个著名的世界政治经济杂志编辑者，曾经很诚恳地告诉我说：“只要贵国的中央政权强大起来，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强硬的抵抗，我们国内的革命势力就可以加强百倍，我们的革命就可以取得爆发的机会。”现在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力抵抗已经一年有余了，日本大众的反战力量和作用虽不算不大，但是方法始终还有多少的缺点，最主要的就是各方面的反战力量还不能团结成为一体而作有系统的行动。我们的抗战固然已经促成日本国内民众运动的各派联结成一条阵线，朝鲜独立运动派也融化成一体，台湾的民族革命势力更进一步而融化到祖国的阵营中，但是这些革命力量彼此之间始终还是隔离的，其行动还是各自为政的。这种方式削弱了不少力量。

然而联结一体的必要，已促使这几方面的力量融化动作联结，乃至发展成一个国际的大力量。上引宣言说得好：“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如果要从这极端的不安中脱离出来，要避免这惨酷残忍的战争，必须坚决保卫民主主义的堡垒，拥护真正的世界和平，对法西斯强盗侵略战线拼力抗战”。而“日本法西斯即为世界法西斯侵略战线中最阴险的主脚，是最凶暴的先锋”。因此，为要“保卫民主主义的堡垒拥护世界和平，那末非要反对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中国的侵略，拥护中国伟大的正义的抗战不可”。他们深刻觉悟到的是：“在日本法西斯支配下的我们被压迫大众，不管其为了

本国内的勤劳大众也好,为殖民地的朝鲜民族和台湾民族也好,都要明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如果不愿意做侵略的工具而极端屠杀中国的兄弟同时自己也跟着灭亡,那末我们为求自己的生存和解放,为救中国兄弟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屠杀的惨祸,必须对日本法西斯军阀开始极积的斗争。”他们特别是在方法上觉悟到一点:“我们过去都在各自决心之下,在各自斗争的领域内,各有为革命而斗争的经历,但到了现在,在我们的斗争线上仍有一个最重要而最共同的问题就要解决,就是怎样把我们的斗争力量集中在一个同一步骤下前进,怎样能够支持中国的伟大的抗战,怎样把在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下的被压迫大众发动起来,作成广泛而且强力的战线”。

我们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反世界侵略战争的前途而庆幸。我们期待着:这个“反日本法西斯军阀的联合机构”早日健全地成立,勇猛地发展!

原载1938年8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1期

## 七年来的教训与进步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转瞬又是七周年了。在这七年间,日本帝国主义是得寸进尺地侵略,我们则越打越强地反抗!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工作进到彻底拼个你死我活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有几种特点:

第一、完全把东北占为自己的独占殖民地,排斥各国利权及势力出于东北,并积极开发东北的经济,实施所谓“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什么“二十年五百万移民计划”等等,以谋它的所谓“国防经济”健全化,期于二十年后东北的日本人在东北总人口中占十分之一,巩固它的国防线,并同化中国同胞充他们的奴隶。

第二、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由华北而至华中甚至窥伺华南蠢蠢欲动。“皇军”到处烧杀奸淫掠夺,他们并在华北制造所谓临时政府,在华中到处制造伪维持政府及维持会,进行种种阴谋破坏中国统一的政治、金融、交通、乃至社会文化等等,以期完成所谓“彻底膺惩”,灭我民族。

第三、在国际上一方面加强“德意日反共协定”的侵略战线，拿东北华北及华中等占领地的利权引诱德意，甚至于英美，另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及军事工业，特别在北满的“国防线”上积极进行军事建设，图谋于最近的将来实行扩大的军事冒险，再掀起一个更大的国际波澜。

然而我们在这种残暴的蹂躏及毒辣的阴谋之前，我们全民族抗日的斗争也随着客观情势而有惊人的进步：

第一、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全民族主观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全民族紧密团结，各党派停止内争，一致对外坚决抗战。这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且已将从前的“恐日病”消除净尽，任何中国人民不复也不敢再说句对日妥协的话了，大家只在“不抗战就灭亡”的觉悟下奋斗着，民族的自信是在日益加强着了。

第二、我们抗战的力量在现代的激烈战争的磨练中日益增长而强大起来了。我们和敌人的作战将士伤亡的数量和比率渐渐接近，我们军备的现代装备也渐渐赶上敌人，我们士兵的战斗精神的进步正和敌兵的颓丧成反比例。虽说失地越来越大，抗战越来越艰苦，但是彻底的民族抗战并不能以失地之广狭来衡量胜败，实则日寇占地越大，其作战困难越增加，军队越深入，其毁灭的危险性越大。

第三、我们的战略战术都随着抗战的进展而日益进步。第二期的战略和战术比第一期进步，第二期作战的缺点，在第三期复又修改了许多。我们不但在阵地上和军队设备完全现代化的敌军作强烈的火拼，我们的游击队和别

动队也很灵巧地出没于敌人的后方,常常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正规军和游击队及别动队配合,游击队和别动队彼此间的联络,阵地战和游击战的机密联络等等,都是第三期作战的最大进步。

第四、这七年间我国最大的进步,还要首推外交路线的成功和进展。七年前我们的外交差不多是偏重于柏林罗马和东京的。后来在事实的教训下遵守了总理的遗教,渐和“平等待我的民族”及国家恢复邦交并切实合作。和平的民主的国家如英美法苏等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亲友了。他们在抗战中怎么帮助支持我们是无庸赘言的,世界和平战线及反侵略战线之日益加强不独是世界和平之福,同时也是我们全民抗战莫大的助力。

原载1938年10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2、3期合刊

# 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

## 一、九·一八事变的划时期的意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侵略,是具有划时期的作用和意义的。日俄战后日本经营东北的范围,还不过限于南满铁路附属地的局部范围,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满铁王国”支配下,统治着一小部分的地域,至于绝大部分的地域还是受中国统治权的支配,当时的东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还不以完全的殖民地统治着,它只是在经由“满铁王国”及关东军的疯狂军人伺机制造更广大的殖民地,企图把他们的所谓“满蒙”(包括东三省热河及内蒙古)整个置于它的殖民地统治之下。这不过是更大殖民地的制造时期罢了。

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情势就完全两样,我们东北行政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的控制力完全消失,日本帝国



主义者经营东北的作风,前后是截然不同判若两样的。无怪乎现任满铁总裁松岗洋右大放厥词说道:“满蒙的经济开发虽设自始即为满铁的使命,但是以前还不能够充分执行。可是此后便渐处于得以倾注全力于经济开发的环境了。换言之,现在进到了得以专念于经济开发的时代了。”(松岗《告日本朝野书》)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北还有许多顾虑和阻力,特别是自东北行政当局统一于国民政府而青天白日旗飘扬于东北各地以后。单就经济开发一点说,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的东北经营几乎可以说步着衰退的的倾向,至少可以说到衰退期的前夕。经济的开发最主要的要靠经济大动脉的交通网,但是当时东北当局则以其过剩资本投于国营铁路上,铺设满铁的平行线以与满铁及其支线竞争,日本方面觉得是一种绝大的压迫,事实上满铁的铁路经营的确受了相当的影响。此外,东北当局还积极建筑葫芦岛港,计划完成一个东北地方自主的海口。这又于日本侵略者特为东北四省民众膏血吸吮管的大连,也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葫芦岛筑港成功后,大连在华北的地位将一落千丈,而东北的物产则可以经由自营的铁路到葫芦岛出海,当时自营铁路的运费低于满铁,所以东北货运就很自然地集中到自营铁路这方面来。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于这种情势是岌岌不可终日寝食不安的,他们尤其是恐怖中国统一的局面稳定下去,不但要设法收复东北既失的权益,并且会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的旗帜下动摇侵略者梦想中的大陆政策的基础,于是依其预定的计,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 二、“事变”后海陆空交通网的扩张

交通网是经济的大动脉,同时又是军事及经济侵略的急先锋,所以日本经营东北的第一步,就是占住主要交通运输网的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在九·一八事变后更加大事扩张。“事变”后日本扩张大陆交通网上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开筑日本海沿岸的新港口。日本已不复拘于“大日本主义”及“大连中心主义”。

高喊二十年的“日本海中心论”(松尾小三即“图们江经略”)居然在这时候被日本朝野所重视,日本侵略者最近的企图竟然要把日本海改成日本的内海,缩短日本到大陆的路线,保障两地运输的安全。这在大陆政策起着绝大的作用。此外,在航空权威的时代,侵略者也没忘记航空网的敷设,这是“事变”后值得深刻注意的第一件事项。

这不但是因为交通网具有日本所谓的“国防第一主义”或仅限于辅助经济的剥削而已,在交通机关本身即有极高的剥削性,例如就铁路一项言,直接剥削东北民众的事实即可举出两项来讲:其一是经由运费之高昂以剥削东北农民,因为运费就是构成农民产品市价的一部分的,独占东北农产经纪权的商人尽可以用降低农产物价的方式转嫁给东北农民。泰安镇至大连的大豆市价当中,产地的原价只占三成(实则农民第一手的卖价恐还要低些),而运费则占七成;由

依兰转哈尔滨及三棵树而至大连的大豆，原价也只占四成而运费占六成(铃木茂三郎《日本独占日本的解剖》354页)。其二是东北本地劳工的剥削，日本资本家是以“殖民地印度以下的工资”(山田盛太郎的名言)剥削着东北同胞。同样的工人及同样的工作，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工资却有天壤之别。据《大连商工》日报的调查，大连一般工厂工资的区别是：日本人每日2元4角6分，而中国人则只有7角4分(1935年间的情形)，中国人工资不及日本人工资三分之一。在日本资本剥削下的东北工人总数究竟多少，虽尚无统计，但只就满铁公司的社员及从业员计算，1936年3月末即有17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最近增加的。这样巨数的东北工人供着东北交通网独占者满铁压榨着膏血。

现在再来检讨这七年来满铁的铁路交通网扩张的情形怎样。“事变”后东北铁路网大扩张的关键在于满铁承受伪满国营铁路的经营及增设。自1933年2月起，伪满即将从前东北行政当局所敷设而为伪满收为国营的全部铁路托满铁经营，满铁遂于同年3月设铁路总局以行综合的经营。1935年3月又从苏联手里收买了中东铁路而满铁支配下的路线，骤然大为扩张，其间满铁在伪满委托下敷设的新路线的情形更值得注意。铁路局设置以来满铁新敷设的路线截至1936年8月末止即已有32条，里程总数约在4,000公里以上。就东北铁路的发展情形考察，中东路及南满路两线接轨当时是3,700公里，其后二十年间铁路一年的延长里程，平均只有60公里，再几十年间增至300公里，而“事变”

后五年间新设的铁路即达4,000公里,平均一年延长800公里,现在东北铁路网的全貌如下:

满铁公司线	1,130.5公里
伪满国营线	7,295.5公里
民营铁路	345.4公里
总 计	8,771.4公里

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港湾的经营也有显著的发展。以前只是采取“大连中心主义”,那时的情势是北有海参威,与大连分庭抗争,南有葫芦岛筑港对于大连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日本与大陆的货运不走大连就须经由朝鲜釜山而至门司港,都是一个大迂回的路线。“事变”后日本乃积极开辟朝鲜北部的港湾,以期缩短日本与大陆的交通距离,夺取海参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放弃葫芦岛的筑港,于是决定“三港三系统主义”,除加强大连的地位外,还兴筑罗津系统的港湾,继续兴筑葫芦岛港。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罗津系统的港湾。

1932年5月11日日本拓务省指令开筑罗津港,翌年4月28日即开始动工,其工程相当浩大,分成三期兴筑:第一期在1937年完工,第二期在1942年完工,第三期在1947年完工。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其吞吐能力为300万吨,第二期吞吐能力可以增加300万吨,第三期完成后吞吐能力又可以增加300万吨,总共可达900万吨。同时,且以清津及雄基为辅助港,正如罗津港的左右翼。雄基港的吞吐能力虽然不大,每

年不过30万公吨，但是利用图们江的筏子运送木材是最方便的方法。清津港是朝鲜北部的中心点，自北鲜铁路委托满铁经营，及长图铁路完成后，已可以由长春直接到清津港，它现在的地位还在罗津港以上。

日寇经营这一新系统的交通线，在其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上有莫大的作用。它把吉林及黑龙江一带到海口的距离缩短了许多。譬如从长春到北鲜之港比由长春到大连要近三四十公里，由哈尔滨经过拉滨线到北鲜二港比其到大连要近200公里。再者北鲜二港距离大阪比大连距离大阪要近600公里以上，北鲜至敦贺及舞鹤更要近至700公里以上，这样由长春经由清津而到敦贺要比经由大连近至750公里以上。由长春乘长图线经清津到大阪比经由大连，货运时间要减少17小时，客运时间更减少21小时。日本还借这一新交通线的开辟而便利日本西部的发展，近年在日本海沿岸兴筑了不少的新港，罗津系统的港湾的意义更大，将来日本制品之消纳于吉黑各地及吉黑两省的物产之输送于日本，将必全部经由这条路线，吉林一带是大森林及矿产区域，吉海路沿线的森林面积约有7,000平方公里，木材有27.5亿立方英尺，约有5,000万吨。中东路沿线，拉哈及牡丹江流域尤为丰富，面积约占19,000平方公里，木材达100亿立方尺，约在15,000吨以上。矿产在吉敦线的额穆、舒兰及桦甸等处有500个煤田、许多金砂田、三个银铅矿。在吉林东边的延吉、汪清、和龙及浑春等县，也产多量的煤、铁、铜、铅等矿产。罗津系统三港的开港，使日寇更加掠

夺了东北的物产。此外葫芦岛的筑港完成后(1930年东北行政当局与荷兰公司订约筑港承办期五年半,自1930年4月开工经一年又半因九·一八事变而停顿,现正由日本积极继续建筑中),东三省西部、南部、外蒙古东部及热河省全部的物产将为所吸收。这一地域的物产非常丰富,热河的金银矿产之价值,远在东北各地以上,金矿区不下123处,银矿区也有30多处。此外煤矿区也有百余处,铜、铁及硫磺等矿也很多。热河的牧畜又可供日寇所最急需的羊毛。

日寇为着圆滑敏速达到东北经济的掠夺起见,特于最近由铁道总局召集所谓“日满支交通联络运输事务会议”,经二周间的磋商,规定许多具体的联络运输办法(据日本东京朝日)其于日寇对东北的掠夺将起更大的作用。

日寇在东北的航空事业的经营虽较迟缓,但是最近也已在积极进行中。九·一八事变后增设东京至长春航线,最近且准备再于东京、福冈、青岛、北平间,及福冈、上海、南京间开设定期航空路,以与东京长春线联络,目前(1936年)截止,定期航空路程已达9,000公里,其飞机场及中间站有150处以上。东北航空网是以长春为中心,北通满洲里、黑河、同江、虎林、奉宁等站,南与旅顺、大连以至平津联络,东南经朝鲜、京城而与日本航线衔接。另一方面,日寇又在积极设立中央航空研究机关,设立准备部及飞行人员养成学校,培养所谓空军第二线的飞行员(永井递相出席大阪递信病院奠基礼途上的谈话——《大阪每日》)。这不但具有浓厚的军事意义,同

时自通信之点言也是经济掠夺的一种辅助手段。

### 三、事变后东北各种产业的加紧开发

日寇经营东北再三加强其所谓“国防经济”的意义。这个“国防经济”至少有三种的含义：其一是要东北充当军需工业原料供给地，以便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生产独立自存；其二是要东北充当轻工业或基础工业区，而使日本内地变成重工业区，以调整从来工业构成的偏重于轻工业；第三是独占东北市场以消纳日本制品，减低日本商品对外的依存性。从这三点看来，所谓“日满支布洛克”，一面是经济的布洛克，一面又是军事的布洛克。所以日寇开发东北产业的政策，一贯地是开发、统制及独占并施；其实施原则就是“门户封锁”排除第三国的权益。在这产业政策下，凡所谓国防上重要的产业、公益事业、基础产业，例如京通通信事业、各种工矿业、金融业、乃至移民事业等等，全以“国营”、“公营”、“特许”、及“许可制度”等方式加以统制，其经营则委诸日本帝国主义的卸用资本。东北铁道及港湾的经营全部归满铁支配，各部门重工业的经营则交“亲军”派财阀鲇川义介独占。为实现其更有系统更有效的掠夺，而特于1933年7月组织所谓“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以“决定满洲经济开发的最高方针”。第二年12月更设置所谓“对满事务局”，充当治满的最高机关，名义上虽由陆军大臣任总裁，事实上东北政治经济的指导权及统制权，依然操于关东军特务部的手中。

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指导东北经济开发的原则,最初是“反资本主义”的,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所以伪满在1933年3月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有两点明白揭示:(一)利源之开发排除一部阶级垄断之弊,使得万民共乐;(二)为图经济各部门的综合的发达,而加国家的统制于重要产业各部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讲“反资本主义”是此路不通的,所以日本资本家裹足不前,东北产业的开发也就迟疑不进。为着吸收资本到东北来,关东军操纵下的伪满,也就不得不再于1934年4月补宣下列意旨:对于国防上重要的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及一般产业基础的产业,虽有特别的措置,但对其他的普通企业则只依其性质加某程度的统制,大体上是广泛地欢迎民间之进出及经营(据《国势图画》1938年版)。事实上,日本的国家资本因为大战以来的大消耗无力包办更大的产业经营,终使其□部代办者的军部不得不让出一部分产业给比较亲近的财阀去经营。于是“满铁王国”终于在经营“一元化”的美名下让出工矿业的经营范围给鲇川义介,日本产业会社遂被改组为满洲重工业公司而投其四亿五千万日元资本金于东北的工矿业上。满洲重工业的事业范围是满铁工业、轻金属工业、汽车制造业、航空机制造业、煤矿业、金、铅、铜、亚铅等矿业,及内外各种的事业(据《读卖新闻》8月21日所载《跃进东京的国防产业的展望》),包括着几乎全部的工矿业,日本朝野竟认其为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的“主流”,负所谓国防的使命(同上)。此后财阀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支配



的比重是更要增大的。

日本国家资本和财阀资本就在这样协调夹攻的方式下推进其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了。从来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额即占外国投资总额206,200万元的151,000万元,约当73.2%(据铃木少兵卫《最近殖民地政策与殖民地运动》19页)。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成立以来,日本投资的比率不但是绝对地增大并且逐渐排斥第三国的资本而登上独占的地位。中东路居然被收买了,各国资本也都不敢问津,而在1932年至1936年的五年间日本的新投资额竟达到116600万元的巨额。其投资事业别的分布状态如下:

九·一八以来日本对满事业别投资额(1932~1936年)

事业别	总金额(百万元)	比率
运输通信仓库	759	65.1
工业	203	17.4
矿业	43	3.7
电器瓦斯	40	3.4
农林业	17	1.5
土木事业	12	1.0
金融交易所信托	40	3.4
商业	15	1.3
杂类	37	3.2
合计	1,166	100.0

日寇投于东北的资本绝大部分集中于负有特殊使命的所谓特殊公司及准特殊公司上。九·一八事变后新成立的

这类特殊公司大小不下三四十家,其主要的公司、资本及设立年月如下表:

伪满特殊公司一览表(单位千元)

	公司名称	设立年月	资本(千元)
特 殊 公 司	满洲中央银行	1932年8月	30,000
	满洲石油	1933年2月	5,000
	满洲电信电话	1933年8月	50,000
	同和自动车	1934年3月	6,000
	满洲棉花	1934年4月	2,000
	满洲炭矿	1934年5月	16,000
	满洲采金	1934年5月	12,000
	满洲矿业开发	1935年8月	5,000
	满洲火药贩卖	1935年11月	500
	满洲林业	1936年2月	5,000
	满洲盐业	1936年4月	5,000
	满洲拓殖	1936年9月	15,000
	满洲弘报协会	1936年9月	2,000
	奉天造兵器所	1936年8月	4,000
	满洲计器	1936年10月	3,000
	满洲生命保险	1936年10月	3,000
	满洲轻金属	1936年11月	25,000
	满洲兴业银行	1936年12月	30,000
	满洲电影协会	1937年8月	5,000
	满洲拓殖公社	1937年8月	50,000
鸭绿江水电	1937年9月	50,000	
满洲合成燃料	1937年9月	50,000	

(续表)

准 特 殊 公 司	满洲航空	1932年9月	8,000
	满洲化学工业	1932年5月	25,000
	昭和制钢所	1932年5月	100,000
	大同酒精	1932年11月	1,650
	满洲电业	1934年11月	90,000
	奉天工业土地	1935年3月	2,500
	本溪湖煤铁	1935年9月	10,000
	满洲曹达	1936年5月	8,000
	日满商事	1936年10月	10,000
	满洲畜产业	1936年11月	1,300
	满洲畜产	1937年8月	5,000
	满洲大豆杆	1937年9月	10,000

(注)据1938年度《国势图画》的统计。

日寇对于东北的经济开发期望非常之大,最近计划的倾向似乎不独限于把东北充当轻工业地域并且要使重工业也一并发展了。这是适应军事的急切需要的。日本开发东北经济的未来计划表现于1936年伪满制定而实施于1937年的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上。这个计划着重于重工业,特别是煤、铁、及液体燃料。其主要的內容大约如下:

制铁以昭和制钢所(满铁事业公司)及大仓组的本溪湖煤铁公司为主体。前者于1937年完成第二次增资计划,预定1938年以前完成第三第四次增资,再续加第五六次以完成五年计划;后者为大仓组单独出资,期达制铁能力五六十万公吨。石炭液化由满洲油化工业公司及满洲合成燃料会社

经营,皆期于五年后应达10万公吨的产油能力。又满铁抚顺煤液化也期于五年后达30万公吨的能力。酒精由东洋拓殖系统的大同酒精股份公司利用高粱为原料增产,石油自昭和九年即由大连的满洲石油会社精装输入原油以成石油,制成除关东州内需用外,归伪满专卖公署。

各种工业资金统计约为13亿元,再加铁道、公路、治水及农林、畜产业,合计二十三亿元。(据日本《国势图画》1938版)

满洲产业开发五五年计划已实施一年,日寇犹以为这个计划尚不充分,于是又有所谓修正五年计划的拟议,其具体详尽的全部计划案虽然还没有发表,但据最近日文报纸所载已可知其内容的大概,其规模之大约略二倍于上述五年计划。

伪满政府于本年5月14日召集政府各部及兴业、中央银行、各特殊公司及银行,满铁主脑者提出资金达48亿元的产业开发修正案如下:

(一) 矿工业部门,倾主力于铁、煤、液体燃料、汽车、飞机等;铁钢以铣铁约五百万公吨,钢块约350万公吨为目标;煤适应铁钢、石炭液化及电力等计划,约以3,800万公吨为目标;电力则以发电力约略260万公吨(水力火力约略同样)为目标。木浆除木材之外,还要利用苇及豆秆等原料,约以40万公吨为目标。盐以百万公吨,金则加最近的开发4年累计约以3亿元为目标。铅、锰、及亚铅等金属,则尽可能地期其国产。任何项和当初计划比较,皆为倍量的扩

张。又如液体燃料、汽车、飞机及工作机器等，也期其确立为“国防”工业形成积极修正五年计划的根干。

(二) 农畜产部门，依增进贸易、确立自给自足的目标以促进生产，期望第二年度的本年，出产米40万公吨，小麦等135万公吨，大麦18万公吨，大豆450万公吨，甜菜20万公吨，小米350万公吨，高粱450万公吨，玉蜀黍230万公吨。

(三) 移民部门，努力于集团、自由、青少年的各种移民。

(四) 交通通信部门，当做产业开发的辅助部门，由政府满铁及电车公司等机关协力实行。

(五) 资金计划，资金总额约达48亿元，其中：矿工业38亿元，农畜产14,000万元，交通通信64,000万元，移民22,000万元。资金由日伪及第三国募集，其比率：(A) 满洲当地筹21亿元；(B) 日本筹14亿元；(C) 由第三国筹募13亿元(《大阪每日》6月1日)。

日寇自农业上掠夺东北的大规模计划也在积极拟议中，除上行修正五年计划案已有一部分具体计划以外，最近日本农林相有马又于8月15日召开东亚农林协议会，可以说也是东北农林计划案更具体作成的准备，其经过也很值得注意。在这个协议会上，日本农林省提出关系农林计划的十一项议案，陆军省提出农林关系的人的资源融通案，大藏省提出酒精增产案，拓殖省提出事变后农林业者保护案。其分组审议的经过及其内容约略如下，也可见日寇对东北农林掠夺计划一斑。

东亚农林协议会审议日满农产计划大纲的概要：

第一小委员会 关于伪满目下立案中的米谷转卖制创设问题,伪满已自去年制立产业五年计划,采自给自足的方针,及水田耕种许可制度。后又发表今后方针,为使伪满国内米谷配给机构彻底强化而拟设米谷管理公司(资本1,000万元)以规定适应平时及战时两样情势的价格,小麦不足部分由日本供给,其输入采许可制。

第二小委员会 关于棉花、麻及肥料问题,除就原定产业五年计划加以改善实施外,拟增产亚麻,关于中国特产茶叶则因日台输出茶的关系,大体上认与生丝同样性质而考虑其需要关系。

第三小委员会 农地关系的日满人的资源问题,采互通融办法,由伪满向山林局招聘技术人员,并作林业移民。

第四小委员会 关于畜产增殖计划,农林省技师畜产局长的计划内容:(A)饲羊——以羊毛自给自足为方针,实行内地计划与伪满产业五年计划,以35万头(现在10万头)为目标;(B)牛——以自给自足为目标,拟扩充现在头数180万为260万;(C)鸡蛋——不独供给内地且注意输出,现重改良产蛋,扩充现在的,66亿个为70亿个;(D)兔——增产军用毛货及输出毛货而拟增至现在的2,200万为5,000万头。(据《大阪每日新闻》8月18日)没有一项计划不在东北农民身上打算盘,伸着统制和剥削的魔手。

#### 四、贸易的独占与移民的阴谋

东北的商品市场由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之完全日本殖民地化而为日本所独占,更因为中国市场的完全丧失及各国抵制劣货而日本商品更加涌至东北来。日本商品之输入东北在1932~1937年间约略增加了三倍半以上。1932年日本输出东北,包括朝鲜的总额也不过197,161千元伪币,而1937年则增至666,269千元。这个数目已在各国及中国内地输入东北的总额887,411千元中占70.1%,前年的比率更占至77.4%。这不但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异例,并且超过它在朝鲜台湾的独占性,日本商品在朝鲜总输入中占75.8%的比率,在台湾只占73.2%。输入东北的日货的内容,丧失了世界市场的纺织品、食料品等生活必需品,在绝对数上是相当增加的,纺织品从1933年的125,548千元伪币增至1936年的180,042千元。但是纺织品的增加还不如钢铁、机器、电气用品等“建设材料”的增加,由1932年的96,320千元增至1936年的154,840千元。其比率的变化,是自19.6%增至22.4%。这又是日寇积极投资准备更高度掠夺东北人民的表现。

在伪满的输出上也充分表现日本独占东北贸易的倾向。1932年伪满输出日本(包括朝鲜)的商品,只有235,862千元伪币,而1937年则骤增至321,510千元。但是其他各国却几乎全部减退了。在同期间英国由11,065千元减至7,322

千元，德国也74,073千元减至59,052千元。这也是原料及食料独占的表现，东北输出日本的大宗货物以前是铁、煤、豆粕、皮货等类，此后凡东北出产的原料，特别是军需工业原料，将无例外地大量向日本输出。

日本之独占东北更有甚于贸易独占的经济独占的，那就是“军事的移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常奖励甚至驱逐朝鲜人移住于东北（现在对于朝鲜移民倒反采取限制的许可制——事变后只移住了10,000户），事变后的移民计划和推行更加积极了。日本之移民东北的目的不但在掩饰其人口过剩的侵略口实，及欺骗其内地的一般群众，更重要的是籍移民之名以收扩充军备之实。移植东北的人民武装起来，就是一部分有力的军队，这于它的“国防”上是很方便的。况东北移民，根本就是武装移民。由于这种用意，日本移民大多是在乡军人，其移殖的地点又选择佳木斯、密山等与苏联边境衔接的地方。关东军对于移民事业十分重视，两年来的敌军事设备的紧张而移民事业也愈积极。移民计划的指导机关是日本拓务省，其执行机关在以前有“满洲移住协会”，然后又成立“满洲拓殖公社”。满洲拓殖公社原是一个私人公司，其资本金为5,000万元而公司债可以□□□万元，现在已在东北购得土地——实则强占土地，面积达436万日亩之广，专用于移民的耕种。“满拓”在拓务省的指挥及伪满的辅助之下充当移民助成机关，去年起实行的500万移民二十年计划，即是满拓促成的，自去年度起实施集团的青年移民，只本年度即已移送



30,000人(据8月21日《读卖新闻》)。此后的计划将更积极,据拓务次官荻原彦三透露的消息,拓务省明年度要求预算约在7,000万元以上,比之去年度实行预算4,000万元,激增3,000万元。据说,将来大部分用于伪满的移民上。自明年4月起要实施蒙疆方面的移民(据9月2日《大阪每日新闻》)。

移民的成绩并不甚佳,1936年截止,日本向东北的集中移民虽有五次之多,合计移民户数也不过2,785万户,现在滞留人员一共有4,010人。此外还有所谓“自由移民”,为数也不过1,000户。合去年度的6,000户及本年度的青少年移民30,000及自由移民6,000(见上引《大阪每日新闻》)总数也不过70,000多人。其原因,固也由于东北义勇军之袭击,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日本农民不能和耐寒刻苦的东北及朝鲜农民竞争。

但是日寇却以所谓“国防”的目的强行“军事屯垦”式的移民,1933年7月日本拓务省,遂有上述二十年移民百万户500万人的计划,自1937年起定每五年为一期,共分四期,第一期移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预期二十年后移住东北的日本人能占当地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以下缺,编者注)……

原载1938年10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2、3期合刊

## 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

记者在汉口时曾于冯副委员长家里两次见过赵老太太及她的女儿，那是冯先生特地请她们为大家讲述她们赞助义勇军的经过的。她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赵老太太在甲午年即有先见之明，预料将来“无论男女每个人都要打日本鬼子”，所以在那时候就没有给她的女孩子缠足穿耳。今日的小妹之所以能勇敢参加抗战，即出于这一觉悟和决心。

全国都知道的“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这次恰又和记者同车南下，她是应华侨记者团和南洋妇女团体的邀请，准备赴南洋，向侨胞宣传抗战和游击队的情况的。她预定先赴星洲，继往英荷法属各地，如时间许可再赴菲律宾一行。她不失为历史人物之一，故特为介绍于下：

赵老太太那矮小的身材，天足，清爽而朴素的黑布衣服，是个北方农村中等人家的老太太的装束和神情。赵老太太今年58岁，半生为生活、为家庭而苦斗着。最近七年来的出生入死的抗日生涯，微秃了她的头发，加深了她脸上

的皱纹,但是她的眼光还是深含着光芒,她的举动安详而沉着,使人感到农民的坚韧性粘着性。她开口闭口都说“咱们老百姓”。除了会写她的姓名“赵洪文国”以外,她不认识几个字,在谈吐中还夹杂一些东北农民用的土语,不过她的话是有条理,记性更好,前好些年发生的事件,都记得清清楚楚。知识分子要听懂她的话也许颇费力,但却会打入老百姓的心坎。她的外表诚然是冷静的,然她的内心正燃烧着热情,——勤劳的农民们为着“大伙儿”拼个死活的深厚的热情。

赵老太太是满洲镶黄旗人,嫁的丈夫赵玉荣先生也是满洲人。像赵老太太一家那样抗日,才算真正替我中华民族争气。赵老太太家在辽宁与朝鲜交界的三角地带,14岁就亲尝过中日战役的滋味,二十几岁又受过日俄战争的铁蹄的践踏。她从这两次战役中体验到日寇的残暴和拼吞中国的处心积虑,使她在心中深深培植了抗日的根芽,到了相当的时机,便怒茁起来。赵老太太不单是一个毁家产救国家教儿女尽忠报国的贤母,而且本身是实践的游击战士和游击战争的组织者,她七年来过的都是抗日艰苦生活。她在家里的的时候,她的家便变成义勇军的后方,军火粮食的供应,伤病战士的收容,民众的说服和发动,都由她主持;当她跑到义勇军中间去的时候,她是年青的战士们的主脑、看护以至谋士。她又借着她的乡下老太太的身份自己做交通和情报的工作。从她的几年的斗争的实践,没有受过教育的她竟有水准很高的政治意识。她常常慷慨激昂

地说过：

“我在武汉的时候，鬼子的飞机差不多天天来投弹，不管是老百姓也好，有地位的人也好，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被鬼子们炸弹炸死。所以我们大伙儿为着国家，为着自己的家，为着自己，都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东洋鬼子赶跑。可是老百姓和好些人在火没有烧到身上来的时候，不懂得这个道理，有知识的人和吃过东洋鬼子亏的人应该向老百姓们和有地位的人们宣传，把这个千真万确的道理告诉他们听。单是宣传还是不行的，记得在鬼子第一次打我们的时候，人家就认为我们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们还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当初我到赵家，他们日子过得非常之“累赘”，可是大家一努力，日子就一点一点好起来，我相信抗日救国也是一样的，只要大家齐心努力，不分心眼，自己不乱，一致团结对外，国家就没有不好的道理。”

九·一八以后，赵老太太的历史也就是义勇军由萌芽而成长的历史。在冯先生的招待席上她原原本本地把她奋斗的经过详细告诉过大家。她告诉我们她在故乡怎样化装贫婆子在黑夜里冒险去运枪弹和军火；她怎样借神的号召来发动农民来参加抗日运动；怎样因为藏匿义勇军而被日寇把她一家几十年来心血积蓄的财产全部烧掉；她怎样开办学校来暗作抗日宣传；怎样坐了3个月的牢，因为她口供的坚定而终于被释放出来。她在“卢沟桥事变”后即在北平暗中购置军火，组织游击队，后来又在河南晖县发动红枪会加入游击队。在武汉的时候又奔走呼号替游击队筹了

3,000元的款,置军械接济游击队。

她在武汉的时候即已轰动三镇,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的名子。她的儿子赵侗又带领着游击队4,000余人,听他指挥的武装农民有10,000人分布北平附近宛平、房山八县地方,组织了五个县政府。在东北故乡岫岩县等地又有赵侗的朋友白君实率领义勇军5,000人。她的第二儿子赵连俊由苏联回来,善骑射,在吉林的富锦县也率领一支人马,都曾给日寇以很大的打击。她的女儿还能打双枪,实地参加过战斗。

赵小姐在冯先生招待席上讲演过她和敌人作战的经过。有一次敌人开来大队,运用机枪把她们的队伍冲散,她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发挥她的双枪的本领,挣扎甚久,但是敌人越来越多,几乎无法摆脱。当她讲到跳入一条丈余宽的深沟而遇到两头敌人夹攻的时候,记者曾经为她捏了一把汗。幸因敌人要活捉这个青年女英雄之故,赵小姐遂得宽裕时间从事战斗,终于跳出丈余深的壕沟,寻到了她的战友,在老百姓的掩护之下脱了险。

赵老太太最近在华南各地备受热烈的欢迎,她常作热烈有劲的讲演,鼓励大家,特为节录一二段于下:

“家乡,国家危急到这时候,我觉悟到我们只有和鬼子拼的一法。我们不要死在床上,要死在战场上,不能再等死,要同鬼子去拼死,拼死一个够本钱,拼死两个把我们儿孙的仇报了,拼死三个把

我们邻人的仇也报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东北没有亡，人民在艰苦中奋斗。鬼子在中国譬如一颗树，东北华北譬如树根，而我们的义勇军呢？就天天在吃树根，等到树根吃完了，还怕鬼子不倒吗？”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更要团结组织起来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动员起来，能行风的行风，能下雨的下雨，两毛钱能买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个敌人，我们要节省一切费用，来援助义勇军，我们的抗战是一种长期抗战，我们得准备长期和敌人拼。”

（在敌机空袭下写于广州）

原载1938年10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2、3期合刊

## 第四期抗战的敌我情势

我们的全面抗战自武汉失陷即进入第四期的阶段，中日双方的情势也以这个阶段为分水岭，带上前后截然不同的几种特征，我们可以从这些特征当中理解最后胜利的实际把握。我们除已发动集体的力量，从军力、财力、物力以及社会情况等方面，重新检讨日寇现有的实际力量以外，拟再在这里综合地剖述本阶段战争的特征，聊充本期的绪论，亦籍以简明提示我们应加努力的方向。

随抗战进入第四期而我们的斗争将更加艰苦，是不消说的。但是美国的独立及土耳其之免于亡国，都是血和肉换来的代价，我中华民国之得以产生亦莫不是革命先烈数十年继续牺牲的结果。艰苦已经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所应考虑の只在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的情势，如何增强主观的力量，及如何克服当前一时的困难。第四期中日大战具备的特征，至少有下列八点，且略加剖述：

(一)中日大战中途调和的不可能性已经完全确定。日本帝国主义倚靠对中国的侵略以长大以存立，侵略者与被

侵略者之间原即无调和的余地。我们全面抗战发动后日寇虽然一贯地努力诱降，至第三期末其对华外交且有改变，1月16日的宣言，承认我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趋向。但自宇垣下台而连续攻陷粤汉以后，这种趋向又起了九十度的急转。一部分和平妥协者虽然还在那里吊“死膀子”，但是日寇的答复却是：组织伪联邦政府，制造所谓“东亚新秩序”。月来日寇军政界有系统地连接发表宣言和言论，更是明确不含混的答复。中日战争非持续到“结算东亚近世史总帐”（日本反战者鹿地亘之言）的地步不可。同胞如希望妥协和平，就只有脱离民族抗日战线单独走向伪联邦的一条路。

（二）日寇独霸东亚的企图已由理论到实践。田中奏折及许多秘密文件虽都主张“独霸东亚”，但也不过偏于理论，其行动也不过是独霸东亚的准备步骤“征服中国”而已。现在日寇已经公然主张“东亚人的东亚”，要求欧美各国承认东亚的“新情势”。日寇军政界要人如中野正刚、土肥原贤二及河相达夫等人且更进一步著论主张划分世界为三部分，而将亚洲交由日本独占。虽说日寇还在佯言“尊重各国在华的权益”，但这只是对谜梦中的欧美人的欺骗，骨子里所含蓄的意图却是：“东亚联邦包括北自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及南洋列岛的区域”。

（三）英美法联合制日的可能性增大，共同制裁日本的联合势力要推英美法的合作，自从九·一八当时斯汀生所代表美国的主张因为英国的抽腿归于失败以后，英美的合



作即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这是由于英美在华权益所受威胁未至切身的程度。现在呢,英美权益不但被摒于东四省之外,华北及华中的地盘为日本所掠夺,即华南的英国经济根据地也已震撼,大部分货物经香港以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也有唇亡齿寒之痛,最近日寇更改对华院为兴亚院,其野心所在可以想见。英国若无意退出远东就不会任凭远东经济根据地的香港成了一个孤岛,对日势必出以积极的态度。所以美国因对日抗议得不到满意答复而采严重态度时,英国已不再抽腿,也不旁观,朝野皆一致主张对日强硬,并且明白响应美国,英美合作的积极性业已表现于英美商约的签定上。英美能合作,法国自然不成问题。

(四)苏联对日采实际行动的时机日益成熟。日寇侵略中国就是进攻苏联的准备,中苏原是休戚相关的,苏联何尝不知及早参加打倒共同敌人的斗争。其援华办法所以仅止于帮助武器及技术等点,是阻于民主阵线联合的不巩固。今也英美法合作的时机成熟,则苏联的“巨型轰炸机飞至东京横滨等地在五分钟内造成关东大震灾”(日本军事家之言)的现实性更为增大。日寇自九·一八以来辛苦建造日本海运输路线,也将在海参威的苏联潜水艇的袭击之下完全断绝,日寇在大陆的作战将增加上百倍的困难。到那时候,日寇才算真正尝到现代战争的滋味,加入本格的陆地争斗战。

(五)第四期以后的中日大战是内地的沙地战和山地战。殖民地革命战争的主要战略是消耗战,而湖沼战及山

地战最能消耗兵精器锐的敌人，我们也在这些种地方消耗了多数的敌人。以后的山地战及沙地战将更有利于我方。第一因为离开沿海或沿江地方，我们可以避开敌舰的炮击，而日寇的运输要困难百倍。第二，因为离开铁路和平原，敌人不但布防和运输困难，深入的部队且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第三，此后的山地因靠内地而瘴气浓厚，岛国生活惯的日兵患风土病的比率将更增加，沙漠的生活更使日寇的兵马疲困，重兵器失其作用。南方在两广，中部在湘西，北方在陕甘，都是歼灭敌人的好地方，我军事当局早有布置，准备在这些地方和敌人决战。游击队及别动队和正规军更严密的配合，将更增进作战的力量。

（六）战争已达十七个月，这个“十七个月”自表面看来似甚平凡，但其内幕却含有神秘的意义在焉。战前日寇参谋本部各方刺探的结果认为二年内可以在中国境内横行而不受到任何有效的国际干涉，所以预定半年或一年征服中国，一年从事于整理及准备，以便于二年后转向苏联作战。但是现在大战已逾一年之期，二年的预定转瞬即满，对华侵略战争且无结束之希望，对苏作战力量将由何处谈起？况英美的远东海军根据地建设亦将完成，在太平洋上足够包围日本加以歼灭而有余。于是日寇的政略与战略走入慌乱的迷途莫知所措了。

（七）敌人各方面力量的枯竭，促使日寇慌张的最大的动力，还是日寇的军力、财力，以至其本国天然资源及原料供给，业已达到饱和点，不久即有枯竭的危险。在军力方

面,总合现在胶着于中国战场的军力,必须留置后方的军力,及第三期以前作战消耗的兵数,统共已达可动员能力的三分之二。在财政方面,至今年夏季截止所剩现金可以输送之数不足3亿元,每年军需输入额却达20亿元以上。现存现金只够数月之用。在经济方面,实施物资总动员的结果只见破绽百出,人民的穷苦生活随日政府的加强剥削而日蹙,经济与社会交织成一幅局促不舒展的图画,同时还反映于政治上,成了各派各系乃至个人的明争暗斗。

(八)对华的依存性日益加重。日寇作战十七个月来的大部分武器取给于外邦,军需工业原材料几乎完全仰赖于各国。但是现金枯竭的今后,各国政府将更严厉警告其国民勿冒险赊货与日本,此路是行不通了。其代替的方法就是“就地取粮”,取给于中国。所以近来日寇开发华北及华中各地的资源比前积极而具体,所谓“一面战争一面建设”即指中国开发而言。然而推断其前途,必无很大的效果,因为“长期建设”的前提条件是地方的安宁,而资源地域恰为山地,是我方游击队活动的好地方。看吧,山西省的煤铁最富,被占领虽将近一年,但日寇得到了什么?

就上述敌我国内外的情形考察,抗战的客观情势依然于我有利,问题只在于如何运用这些有利的情势。我们能够坚持抗战下去,再能改善抗战的技术和方法,改革行政机构改选负责人员,真正动员民众。另一方面,民众各尽自己的责任,务实求是,不尚虚伪,不贪天功,那么第四期抗战变成我们最后胜利的转轴,就有充分的现实性。在国际

上,日俄关系将因日寇进攻陕甘,布置包围亚洲苏联的动机而更加恶化,日对英美关系也将因日寇决定关闭中国门户(有田将再发表宣言申说)而尖锐对立起来,法国也要因为安南经由问题而实际加入对抗日寇的阵营。据传,苏联最近对我国的帮助已加倍于以前,美国借款也将签字,英大使赴湘渝是与当局磋商如何援助。我们今日要下最大的决心加强民主阵营的力量,赶快建筑西北及西南的交通路线,准备与英美法苏作更密切的合作。五中全会不日开会,华南各界尽皆希望:对于第四期抗战的几多根本问题,给与适当的解决!

原载1938年12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4期

## 日台韩反战与《香港日报》

日本内部民众的反战运动,是在日益进展着了。据各方消息,自去年7月7日“日本朝鲜台湾反法西斯同盟”创立准备委员会成立后,日本内地及朝鲜台湾的个别运动,就渐汇合,其工作也有急速的发展了。最近日本国内外喧嚷着一樁事件,日本各报纸皆以“伪香港日报”的标题,揭载这一消息(见去年12月15日《读卖新闻》)。据《读卖》的记载,说是有人假造《香港日报》,揭载《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的惨败》,《国民革命军优待日本俘虏》等消息,及《日本人民为何而战?》等论文,该报又谓:“从文章的内容看来,‘非国民’的鹿地亘必与有关系”云云。这个消息引起我们的注意,调查结果,果然《香港日报》曾于12月10日用大字号刊载过《严重的社告》,1月7日又以大号字记载一段消息,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也有此项更详细记载。

归纳上引各报的记载,这一惊人事件的经过似乎是这样:日人创办而最近为台湾总督府收归官办的《香港日报》,曾经被日本反战的民众所假造,用以向日本国内鼓吹

反战运动,其宣传反战的“假香港日报”,普遍地散发于南洋各地,并曾输入日本内地,引起了日本外务省的重大注意。日方竟把责任推在中国抗战人员身上,但据本刊南洋通信员的报告,却是日本反战阵容中一枝生力军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的工作,因为假香港日报上面,闻曾署有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的字样。

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的第一点是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确实渐渐具体化了,特别是日本殖民地台湾的民众因有下列几种特别的原因,其反战的情绪更加高涨,其行动也更加积极:(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除阶级的界线外还有一种民族的压迫,这一压迫在战时更加加重;(二)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征调与苛敛百倍于日本内地,只据中文报纸的消息,台湾被征的“军夫”,即达五六万人,捐税已增加到无可再加的程度;(三)中国这次对日的抗战鼓动了台湾一般民众因压抑而潜伏多年的思念祖国的意识,增进了台民仇视日本的情绪,提高了因祖国抗战成功而自身也得“光复”的信念。台湾的革命将必在侵略者受到打击时完全爆发。

我们的第二点认识是:在全面抗战阵容中,思想战及宣传战与军事配合,敌人后方的宣传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关键在于工作人员及工作方式得当与不得当罢了。有一部分人竟以日本警察网之严密,主张敌人后方的宣传工作不可能,这完全是“败北主义者”的论调。其错误只从这次《香港日报》的事件即可证明。据我们的推测,假藉香港日报

的反战宣传品，竟然能在中日大战经过一年又半的今日，飞越日本统治者严密的警察网及苛刻的思想统治而普遍散布于日本内地、朝鲜、台湾以及海外日侨的中间，的确是一种奇迹，但是这种奇迹，在秘密宣传的能手及白热化的革命者，却是一种平凡的事情。

据《读卖新闻》，本事件曾经闹到日本外务省，掀动了内务省的责任问题，并闻末次内相之离开政府，是与本事件有多少关系。其严重性实值得注意。俟本刊南洋各地的调查报告到齐后，当另为专论，详加分析。

原载1939年2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5期

## 劳动节寄日本劳工

纯朴忠厚容易受骗的日本劳工弟兄们：

今天是1939年的国际劳动节。今年的劳动节，无论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抑自你们劳工大众来说，都是一个很悲痛惨烈的日子。我一向是研究并关心中日两民族的问题的，特别是日本劳动大众的生活状况及其斗争的动向，尤其时时刻刻抓住我的深切的注意。因为有这种机缘，所以我愿意在这惨痛不幸的今日，来向你们说几句话。

现在已经是中日大战的第三个年头了，即就实数计算，也快要满了两年。在这长期间内，中国固然被牺牲了数百万的性命及无法计算的财产，但是日本的伤亡也将近百万人，你们民众所负担的战费，也极其庞大可观。你们因为中日战争而有数百万的弟兄，离开温暖的家庭、慈爱的父母，特别是眷恋的妻子，被送到中国战场来当炮灰。你们的弟兄在中国战场上所过非人的生活，其辛苦与惨痛，可以在你们许多战死者的日记上及俘虏的自述中领会出来。在这惨苦的生活状况下，他们皆在祈祷着早死，“不死不伤，



永不能返乡”，是一句传诵于各战场的警句。世界上，那个人不想生存，你们的弟兄，竟求死求伤而不可得，他们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你们后方民众所受的痛苦也不下于你们前线的弟兄。你们因为战争负载着奇重的租税、战时公债、以及各样各式的战争献金。战争提高了物价，使你们的生活费加重了30%以上，战争又限制了你们生活上的自由。在物资总动员和精神总动员的高压之下，你们生活的齷齪不舒适已达到极度。你们国内有多少孤儿在挨着冻饿？你们国内有多少寡妇在凄切的悲怨着？哪个能说这不是你们好战军阀的罪恶？即就今日的劳动节讲，世界各国的劳工弟兄们，一定极尽欢乐与愉快，在庆祝他们一年一次的最关切的纪念日。但是你们呢？我相信你们军事法西斯的政府，一定会借口于战争时期颁布法令禁止工人集会，并且装好刺刀强迫你们绝对服从。在战争的面前，你们丧失一切的自由，你们受尽无法形容的痛苦。

然则造成这样惨局的祸首，究竟是谁呢？不消说，是你们本国穷兵黩武的好战军阀。你们的好战军阀与统治阶级，为着维持统治你们剥削你们的局面而发动对华的侵略战争。他们或者欺骗你们说：“倘能征服了大陆，你们的生活就会改善了”。但是事实胜过雄辩，你们的好战军阀占领满洲已满七年，你们劳动大众究竟得到了什么？除了锁链加紧痛苦加深之外，岂不是一无所所有吗？不但你们劳工运动的指导者详细阐明过这一点，即你们统治阶级的御用学

者也都承认：“倘若日本人要过满洲那样穷苦的生活，就不必出征了”。事实上，你们牺牲性命与财产换来的结果，只是你们敌人——天皇、贵族、元老、重臣、官僚、财阀、军阀等的统治力量日益增大。在战争过程中，你们财阀的财产是在依几何级数急速增加着，你们军阀压迫你们的凶暴，更加残酷了。

千真万确的，你们是好战军阀、对外侵略战争的牺牲者，但是同时这种战争又是你们求解放、求生存的绝好机会，你们的命运是和被侵略的中国整个民族组成一条线。你们军阀侵略中国的工作愈成功，你们被剥削、被压迫、乃至被牺牲的命运就会愈加延长。现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在英勇地坚决地抵抗着你们的敌人，并且很强韧地持久这个抵抗，以至你们的敌人完全崩溃为止。你们的敌人总崩溃之日，也就是你们真正等到解放之时。东亚真正的和平，中日两民族的真正亲善，必须到那时候才能建设成功，你们当然乐意这个日子的到来，更无疑地欢迎这个日子的及早来临。

你们现在已有许多的同志自动地参加我们这个神圣的抗战工作了。鹿地亘先生，青山和夫先生，池田幸子小姐，及绿川英子小姐，即其著例。此外，还有许多不便于发表的同志，你们国内的同志也常以世界语等种文字给我们热烈的同情与鼓励。即便曾经强悍压迫过我们抗日军队惨杀过我们无辜百姓的你们士兵，也于被俘之后，经我们的指点和优待而觉悟过来，现在成了我们最忠实的抗日同

志了。你们在中国战场的士兵兄弟们,大多数都厌恶这个侵略战争了。对于上级不合理的命令与蛮横的欺凌,已敢奋起反抗了。我们忠实的抗日同志,即在你们队伍中也日渐增加着了。

你们后方的劳工弟兄,对于我们的抗日战争,也以实际的行动表示坚决的同情与赞助。自从你们疯狂的军阀发动了侵华的全面战争后,你们的弟兄即便连三接四地罢工、怠工、烧毁兵工厂、破坏火药库等等,响应中国的英勇抗战。去年间你们罢工件数激增了不少,你们英勇的斗争是在日益进展着了。这是你们疯狂军阀的刺刀所制不了的自然的发展。川崎与千住的大队工人发动过大规模的哗变,秋田的矿工更与农民携手反抗你们的政府,最近农民的暴动皆在你们工人弟兄的领导之下连续不断地发生。你们的统治者已为这些问题十分烦恼而焦灼着。你们的铁拳已经握着你们疯狂侵略的心脏的一边了。你们能更进一步切实和中国的抗战民众携手,打倒共同的敌人,那末要挣断你们身上日益加紧的锁练,是易如反掌的。

可敬爱的日本工人弟兄们,你们的伟大的力量,正如鹿地亘先生所言,“是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只一小部分姿态现于水面,大部分身段隐埋在水。所以不但别人不能看到你们全部的雄姿和力量,即你们自己恐怕也有在怀疑自己的力量。然而你们的力量,的确伟大,你们可以压沉到处肆虐放炮杀人的疯狂侵略者的巨舰,你们还可以粉碎吞没大小鱼虾横行不羁的海上暴君的怪鲸。

日本工人弟兄们,中国整个民族伸着热烈的手,等待你们纯朴忠厚的紧握,共同打倒你我的敌人,以便缔造东亚的真正和平及中日两民族的真正亲善!

敬祝

努力奋斗!

前进光明!

(1939年4月29日于赴马尼拉途上)

原载1939年3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1期

## 莫洛托夫的演说与远东

苏联人民委员长兼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三届大会上演说的重心，集注于世界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集团斗争情势的分析。他开章明义就是说：“吾人现在不得论及一方面由各侵略列强的政策，他方面由一部分民主国家不干预政策所引起的某种结果”。他对于侵略国家尽管拼命地侵权占地，而一部分民主国家却反装哑，“假装最近期中，并未发生重大事件”，非常愤慨。

莫洛托夫的演说从侵略国家与反侵略国家对立开始，而以反侵略与远东的关系作结论，这是非常正确的立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倘若民主国家有人幻想：可以把远东由世界反侵略的联锁割离开来，那就简直是痴人作梦。张伯伦的反侵略政策，固然要把远东除外，但是远东侵略者却更变本加厉地打击英国在远东的权益。日本对主张反侵略阵线应将远东包括进去的苏联，不敢再冒险进逼而只虚张声势，但对于犹豫、让步、妥协、献媚的英国，却一步逼紧一步地剑及履及给与了不断的打击。反侵略斗争与远

东,具着如何密切的关系呀!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能尽了他反抗侵略者的责任的。中国对于撕毁国际公约、破坏和平、摧残人道的日本侵略者,英勇抗战壮烈牺牲已满两个整年。民主国家在远东的权益,也完全依靠中国神圣的抗战而得以维持到今日。中国固然是为着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而斗争,然而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受赐于中国的抗战,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固然愿意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使用自己的力量,但是拥护和平的民主国家,不应忘却,远东之拥护和平反抗侵略,能如何加强世界和平列强的统一战阵。

莫洛托夫对于中国的英勇抗战表示极大的同情,他在演说的结论上说:“我无需述及吾人对中国的态度。诸君当洞悉斯大林同志关于援助已变成侵略牺牲品的各国并为其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的宣言吧,这篇宣言对于中国及其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完全适用”。莫氏公开宣称:“吾人在实际行动中正忠实执行着这种政策”。因为这一点“正与苏联在欧洲所担当的当前任务,完全一致;这种任务就是建立一和平列强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侵略之进一步发展”。莫氏所说苏联担当的任务,中国目前已先担当起来了,世界任何拥护和平的人士,都不能否认中国是反侵略阵营中的一个柱石。

不但德意侵略者在欧洲及美洲拆撤着英法的和平屏障,日本侵略者更已在远东摧毁了英美法权益的大门了。民主国家的和平阵线根本起了震动。

安定远东的和平局面,苏联不失为一主要的力量,莫

洛托夫也宣称：“在真正反侵略的和平国家的统一阵线中，苏联不得不占据最前列的位置”，然而英法更应该为苏联谋便利，使苏联得发挥其最前列位置的作用，苏联既具热诚，英法自不容再犹豫，英苏法三国协定应早日完成。英国人民热烈地希望着，正如自由党及工党的代表言论：“英国对于苏联的要求，不论其内容如何，均应让步，以期增强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因为英国能与苏联订立协定，正可予日本政策以极大打击”（伦敦19日电）。英国不但在欧洲，即在远东也负着反侵略阵线成败的责任。

原载1939年7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4期

## 美苏亲善与远东的关系

本月初旬新任苏联驻美大使奥曼斯基,在其向美总统呈递国书时,致辞说:“在目前国际时局中,普遍和平以及文化进步,皆大受威胁,是以美苏两国相互友谊,实更觉其极端重大而重要。”罗总统的答辞则谓:“美国现正与苏联保持合作,发展两国间的友谊关系。”本月下旬美驻苏大使又通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莫洛托夫,谓:“罗斯福总统对于英苏法谈判之进行,深切关注”。这些事实都在指示:美苏之间不但外交关系日益趋于亲善;并且说明:美苏皆更进一步关注世界特别是远东危机问题,皆愿为保障“普遍和平”“文化进步”而共同携手合作。

美苏邦交之好转,是随着世界政治复什错综化而日益发展着。这两个国家不特与欧洲各国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在远东的地位,简直可以说是举足重轻,关系更为重要。苏联不能避开远东的纠纷而自立,是不消说的,即美国也正如美国议员伊顿所言:“一切中立法皆属无用,美国必须回复国际法的健全原则”。他更谓:“中立法为卑怯、贪婪、愚



昧的结晶,采取中立,有如在暴风雨中,投奔一脆弱的棚架之下”。的确的,美国是不能避开世界政治的漩涡的,更不能够摆脱远东美苏的国防关系。不能不彼此合作,自军事的观点上言,更具重要的意义。美国陆军部长任德林最近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演说上,曾自军事的观点,道破美国不能中立的情势:“世界时局极为紧张,各国竞争扩军,美国不复因大西及太平洋两洋之为屏障而得高枕无忧了,……美洲已不复成为另一大陆,实与其他各洲息息相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太平洋各国皆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个震撼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中国全面抗战的扩大,而益趋激烈。太平洋沿岸的国家都在为维护“普遍和平”而焦虑着了。

在制止远东侵略者疯狂妄动的阵营中,英法固然极其重要,但是最高的决定力量则操在美苏两国的手中,美苏两国在压制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上,并且互成犄角之势,二者能够切实合作,日本自必于南北海面上顾此失彼,陷于被包围情势下。在将来的大海战中,日本必巩固两方面的海军据点:其一是日本海,濠竹克海及日本列岛的东岸;其二是联结台湾、海南岛及南洋委任统治地鼎足而立的南太平洋阵地。前者的目的在保卫日本列岛本身,后者是在准备进攻各国的太平洋属地。美国在这里有菲律宾及关岛等属地,美国既须放弃中立,则这些属地关系非常重要。日本预定在未来的大海战中,第一步先袭击各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据点,第二步固守三岛附近的阵地而于其他部分作海

上游击战。英美法太平洋上的属地要保障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釜底抽薪,进击日本列岛。在这袭击上,苏联占特别重要的地位,不但海参威的潜艇队可以破坏日本海的秩序而日本西部,朝鲜半岛,及新占领地的满洲受到极大的威胁,并且可以由堪察加供给美国由阿拉斯加进军的根据地,美国从这方面的进军足以破坏日本列岛东部的全部。日本海军大本营发生动摇后,南太平洋上的海上游击战也自失掉根据地而陷于孤立,英美法等国南太平洋上的海军要加以围剿,自易如反掌了。美苏合作对于未来太平洋大海战关系如何重大,可以想见的。

(本文以下部分缺——编者注)

原载1939年7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5期

##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的壮举

在罗斯福总统修改中立法案被搁置,东京英日谈判中英国节节退让的今日,美国突然宣告废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条约。美国此举确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贤明果断的措置,对于维护人类正义与促进世界和平,实具有绝大的作用。

此次美国对日之废约,原为美国参议员凡登堡所提议,当时各方皆不甚注意。自我全面抗战发动以来,美国人士即多表示十二分同情,特别是罗斯福及毕德门等人,屡次提议制裁日本的具体办法,如上月下旬毕德门向外交委员会所提议授权总统禁止军械、弹药、煤油以及各种金属与金属混合品运往破坏九国公约的国家(指日本)。大家皆认为美国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空话,现在美国的雨点渐渐加大起来了,我们相信美国这次废约后的种种措置,必能如毕德门及其他爱护正义公约的人士的希望,一步步向制裁日本方向进展。

美国这次废除美日通商条约的动机,正如美国致日本驻美大使所提牒文所称:“……美国政府认为1911年2月21

日在华盛顿所签订美日通商及航海条约之内,有数项规定应予以新的考虑。……美国为求较为“有效的保护美国利益”及便利新的考虑起见,特提出通告,该商约应予废止”。美国此次宣告废约,还有一种重大的动机,就是向日本及世界宣告:“关于天津事件,英国纵可以让步,但美国的政策决不能与英国相同”(《纽约泰晤士报》华盛顿访员之言)。美国人民对此次政府宣告废约极力拥护,大家皆相信:商约废除后美国对日经济制裁可以合法地实施,而禁运令实施后,其影响正足以阻止日本侵华,甚且可逼令退出中国。美国是日本战时急需的机器、钢铁、汽油及棉花等原料的最大供给者。美国今日宣告废除商约,则可以在明年一月国会复会时讨论如何实施制裁日本的办法,即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所提禁止军火及各项原料品运往日本一案。美国政府如果能本诸原来的动机切实作去,相信废约一举,可以“敞开真正和平的门户”(伦敦的观察),依赖美国以遂行战争的侵略者是不难就范的。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至少可以发生三种巨大的作用:第一,影响日本政界及经济界大起动乱。日本素来依赖美国的心理最深刻,所以战争二年来日本政府及军阀未敢一言冒犯美国。美国废约消息传出后,首先引起了日本股票市场的大跌价。最近因为少壮派军人压迫英国的成功而窒息一时的元老重臣派,将乘此机会大举反攻,财界更要充当有力的后盾,日本政治经济界的骚扰将无已时。日本虽侈言对美报复,或称日本所受影响也不过棉织品杂货罐头等

不受最惠国待遇而已,但这都是“大和式”阿Q的胜利和自慰罢了。

第二种作用是影响进行中的英日谈判,促醒英国再多加考虑。维持远东真正和平的动力在英美法苏的合作,而其重心尤其在于英美的平行政策。美国对日本强硬,立刻使英国感觉到太平洋指导权的旁落。美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势加压力于日本,英国官场虽然还不允许任何批评,但是一般人士皆认美国废约之举为“大可称为中日战争中最大惊奇事件之一”,“以为美方的行动,定能对东京谈判发生良好影响”(伦敦的舆论)。我们相信英国得到精神上的助力不少,英国已不必一再让步了。英国倘再节节对日让步,则支持中国执行抵抗侵略的神圣任务的国际最主要的指导权,将由英国移至美国和苏联。一方面,美国已以实际而有效的办法,准备在六个月后中止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另一方面,苏联又在蒙满边境以最大决心还侵略者以加倍的痛击。这两方面制裁侵略者的作法,正需要犹豫寡断,软弱多忌的英国外交态度,加以深切的注意和考虑。

第三,对于中国悲观论者,减少东方慕尼黑局面来临的恐惧,对于中国讥笑阵线论者的人们答复说:客观情势的发展,还不容近视者遽下断言。张伯伦先生固然或许有意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局面,我们一部分悲观论者也抱着捷克命运来临的恐怖,但是事实反证着:东方不但没有英国追随者的法国,倒反有美苏强硬的反拨,决心英勇抗战到底的中国也显然不是捷克。自英国对日本表示让步开始的

时候,苏联即以打击侵略者及巨款借华的方式,不断警告英国,继之而来的是美国废除美日商约,间接表示不能承认英国所要造成的东方慕尼黑局面。我们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昨日更向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我们的态度:“我们中华民族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困难环境之下,而放弃其自卫生存的神圣任务”。另一方面,世界侵略者加强勾结,逼迫反侵略者不得不更进一步团结合作。莫斯科英法苏参谋会议已在进行,英法苏的合作有自军事合作开始的倾向。更客观的事实教训现实主义者说:不能用片断的事实解说整个动向;不能以一时的变化说明长久的前途。

偏重于现实主义的英国,处处为更客观的现实所打击,张伯伦先生应有比欧洲慕尼黑会议后更深刻的觉悟!

原载1939年8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6期

## 美国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机会

自从美国对日宣告废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条约”后，我们即已料到太平洋沿岸的政治关系，将发生一度激烈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美国与日本争雄长与兴衰的第一步。美国能否保全其在远东的权益与地位，能否保全其在美洲的领导权与泛美洲主义完整无缺，更能否保全其在本国自身的领土与权益不为侵略者所侵犯，完全视此后美国对日本斗争的决心与努力来决定。

日本强盗之侵略中国，野心固不只在吞并中国，其远大阴谋在于独霸东亚，征服世界，早在“田中奏摺”上表露过。所以除中国及亚洲国家而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美国与中日战争的关系，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密切。这正如《大美晚报》所论列：“细察情形，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固不止投资、商务、与菲律宾的命运而已，美国的正确利益，在于民族的前途。良以美国的国家命运，将必受太平洋西岸事态进展的影响与支配”。诚然，美国即令放弃在华的权益，放弃太平洋上的属地，结果所受的亏损将不只是太平

洋西岸的损失,而实际上增加了泛美主义及自身立国所受的威胁。诚如《大美晚报》的分析,“太平洋的东岸,有美国民族13,000万,加拿大民族1,000万,及文化水准较低的南美洲拉丁民族4,300万人;而在太平洋西岸,则有庞大的亚洲民族6亿人,已感到地小人稠矿源缺乏之苦。倘若这个民族在武力统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联合起来,则太平洋的血战,自所难免,美国及其较弱的邻邦,将遭遇强烈的压迫”。

然而日本吞并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尚不止如《大美晚报》的分析,日本侵略者的魔手,早已伸展到美洲,日本对于美洲移民的积极,及近年日本间谍在美国的活动,其情势之严重并不下于日本四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企图。特别是德日侵略者最近对美洲的共同进出,尤其是美国应该特别警惕的。倘若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西岸站稳了脚步,太平洋的洪涛巨浪会立刻震撼到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并不必等到“亚洲民族在武力统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联合起来”,太平洋始有“血战”,“美国及较弱的邻邦”始遭遇强烈的压迫。

自从美国宣告废除美日商约以来,日本即改变从来媚美的态度而于本国内及中国占领区煽动排美,岳州的华侨已被驱逐,美孚行油田也遭毁坏。这和它对付英国的作风完全一样。第一步大肆恫吓,恫吓成功之后再提出苛刻的要求,而其排挤则将继续到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完全达到为止。但是日本的欲壑却是个无底的深洞,永久没有满足的



时候。英国已如日本人的自白,做过意料不到的退让,但是排英的运动却一天天地增涨,即连英国不惜牺牲“正义”以图保全的“占领区内的英人权益”(有田与克莱琪的初步协定),也都依旧被蹂躏,焦作的煤矿,河南伪组织已要求将中英银公司股票缴出了。假使美国也与英国同样屈服于恫吓,日本将更得寸进尺地排挤。

对付日本的恫吓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还以“加倍的打击”,日本之一再屈膝于苏联,就是一个好对照。苏联能坚持打击侵略者的态度,所以在张鼓峰事件上,在渔约纠纷上,乃至北库页油矿采掘权的争执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即在诺门罕事件上,惯用恫吓的侵略者,依旧在继续吃着苦头。

美国今日制裁日本比苏联容易得多,他可以不动一兵,不发一炮,使崛强的侵略者屈服,因为日本在华的经济开发还没有成功,离开了美国资源及军火的供给,就无法遂行战争。日本强盗现在所以急忙实施其经济掠夺政策,原因即在于此。美国绝对不能坐大了日本,“倘若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一旦告成,则日人之向外发展,将非以武力不能制止。……在此情形下,英法荷等国,容可放弃太平洋而保守其本国及较近之领土,惟美国则无再退之可言”(上引《大美晚报》论文)。总而言之,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美国所受的影响,将较其他各国为巨大,在太平洋上实力足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也只有美国,美国今日尚可以运用轻而易举的经济制裁办法及与英法苏联合外交方法,使日本

侵略者就范,若再过些时候,到日本的毛羽丰满之时,美国即欲保持其本国之安全,也恐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代表中华民国的全部人民,以极诚恳的态度,敬告美国当局及人民:美国绝对不能坐失制裁日本强盗的机会。

原载1939年8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1期

## 苏美关系进展与远东

美国政府继废除美日商约之后又于美苏两国的同意之下延长美苏商约一年。美苏此次续约,表面上虽只是普通商约的延长,但在本质上,关系美苏两国的合作及影响远东的情势,却非常重大。因为商务的交往,常常是更高级亲善与合作的前奏曲。

近年来美苏两国的外交关系是在继续进展着,这是日本疯狂侵略者在远东“玩火”所造成的情势。日本侵略中国,企图独霸东亚,乃至征服世界,首先受其根本影响的国家,除亚洲的国家而外,就是美国与苏联了。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或者先向苏联真正来一下大冒险的尝试,苏联远东军备的完整,固然未必就马上为日本所击退,但若假定万一苏联果如《大美晚报》的警戒,“倘若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一旦告成,……苏联在东部西伯利亚的土地,将因日本之强盛而无法保全”,那末其次受日本直接威逼的,当然是美国,“日本的势力可以扩展至北美阿拉斯加省之西四十里之地”(《大美晚报》),则美国西北门户完全处

于日本的敲击之下。因此，美苏在远东具有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美苏良好关系之所以随日本侵华行动之扩大而日益进展，原因即在于此，美苏继订商约意义之重大，也即在这里。

美苏亲善的进展对于英法的远东政策，也会发生极大的影响，其结果足以促进远东反侵略阵线的缔结。维持太平洋均势的力量，在于英美法苏的合作。法国的远东政策正和在欧洲一样是追随英国的，而英国之进退又以英美平行政策的向背为转移，英美平行政策之能否继续发展，又决定于美国在远东政策上所表示的力量，美国这种力量之发挥与合作，就今日各国的情势看，正如《大美晚报》所论列，“欧洲列强将有感到领土多而实力弱之病。英帝国在今日，已感到在北海与地中海的威胁，将不能单独抵抗日本，以保护太平洋领土，法国与荷兰更无力以阻止日军侵略之进展”。结果就只有苏联的潜艇队足以切断日本与大陆的交通，也只有苏联的巨型轰炸机足以破坏日本一切的设备。日本虽然准备用当年争夺旅顺港二倍以上的牺牲争夺海参威，但是大家相信今日的海参威的坚固却比当年的旅顺港高数十倍，倘得美国经由阿拉斯加的接应，苏联在远东的强大，当足以牵制日本在太平洋作战力的大部分。因此，美国要维持太平洋的均势，最要紧的是和苏联合作。美国唯有和苏联合作，始能牵引英法积极参加远东反侵略阵线。

美国与苏联续订商约，还有一点影响远东经济的作

用。据美苏新商约的规定,苏联每年最低限度,将向美国购买货品800万镑,而对美输出的煤金,不得超过40万镑,美国则以对苏减低关税为交换条件,其新税率将与其他与美有商约关系国家的税率相同,就是说苏联享有最惠国条款的待遇。这样一来美国因废除美日商约而可能受到日本排斥的货物,一部分可以转输于苏联。这点对于美国坚持制裁日本,有很大的作用,对于远东局势的影响,也将相当巨大。

原载1939年8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1期

## 欧战与中国

希特勒学1914年德皇的故伎，以“强权即正义”(Might is Right)的手势袭击波兰，点着了欧战的导火线。德波战争是否变成欧战，固然尚有人主张各占一半的成分，但若欧战果然爆发，则对于远东特别是对日抗战中的中国，将波及极大的影响，却可断言。我们对于这种异常的影响，不愿意如一般的俗论，只说有利或无利。我们拟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态而确定我国应采的态度。

德波战事如果扩大成为欧洲全面战争，则远东方面必定发生四种变化：第一，英法为着集中力量应付欧局而松弛远东的积极性，因而对日作退让的妥协；第二，日本必须要求英法协助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但以少壮派军人的气焰，或将出以“强迫英法亲日”的方式；第三，苏联将更集中力量布置远东的防卫，并愿与远东的反侵略国家切实合作制止日本侵略者；第四，美国一方面注意欧战，先给予英法精神及物质的援助，但另一方面也更深刻注意远东情势，与远东反侵略国家合作，防止东西侵略者勾结夹攻，并

保卫其在太平洋上的权益。

今日我们最大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运用这种可能的变化。首先,我们要认清欧战爆发后太平洋的指导力量落在那一个国家。从上面的推断,到那时候维持太平洋和平的指导力量,当然是苏联和美国。特别是苏联有同时受日本威胁的可能,所以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也极完全。中国应根据这种认识,积极坦诚谋与苏美结成密切关系,共同制止日本的侵略。就中国内部看,中国和美国合作当无问题,若和苏联合作,恐怕还有多少顾虑。但观察苏联今日重视亚洲的利益及其所受日本的威胁,苏联希望中国能打倒日本,强大起来,当属诚意。我们倒不应该步英国的后尘坐失良好机会。中苏能联结一体,打击日本的力量自然增大,美国自然愿意参加,对日消极妥协的英法,也自会加入这个集体。

战争的进行时常改变各国的交错关系。在战争的初期,英法有对日消极让步的可能,苏联也因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而不参加战争,美国也因关系跨于欧亚的原因不立刻参加战争。但是战争达到德国扩大蛮干范围的时候,苏美终必参加战争而由东西夹攻德国,德意日当然也已有相当的勾结,世界分成两大阵营,英法自不能再姑息日本侵略者。那时,日本陆军要受到中苏联合的袭击,而海军被英美法包围于太平洋。另一方面,日本内部反战力量的膨胀,朝鲜及台湾独立运动的进展,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寿终正寝。到日本改变了政治制度,东洋近年的历史总帐,才算算清。

我们要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随时运用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惟有我们遵循这个大方向努力,始能够促成远东的反侵略的坚固营垒,而完成我们神圣抗战任务,得到全面的独立和自由。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2期



## 美国排日运动的概况

美日冲突的基本原因是经济,美国制裁日本的伟大力量也在于经济,排斥日货和封锁资源,就是经济制裁日本的初步。这种经济制裁主要的是爱好和平拥护正义的美国人民自动发作的,但是维护美国人民权益的美国政府,却也从旁加以正当的指导。美国这次宣告废除美日商约,更是美国人民排日援华的一个指针。

美国拥护正义和自身利益的政府中人,早就主张制裁日本侵略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特门早在我们发动全面抗战的初期即向政府提出这种主张。他在本年4月17日更向参议院提出一个议案:请求授权总统对日施以贸易上的限制,作为日本破坏九国公约的答复。罗斯福总统以次美国人士不断地指斥侵略者,如去年10月5日罗总统在芝加哥惊人的演说,及以后屡次的发言,如不承认主义提倡者的史汀生,要求政府授权总统分别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主张以经济力量制裁侵略者(4月5日华盛顿电)。经济制裁日本问题,自本年4月以来更成了美国参院讨论的

中心问题,汤姆士中立法修正案之提出,目的更集中到这一点,所以博得美国人民之拥护。檀香山中韩侨民联合会主席简氏解释得好:“汤姆氏的修正案,足以消灭日本的气焰,增强中国的士气,朝鲜人及自由主义的日人,即将努力树立远东的和平,恢复美国在远东的繁荣”(华盛顿4月27日电)。3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宣言:美国决心继续奋斗,借法治与经济关系,巩固世界和平,而事实上也惟有经济关系始能肇造和平。可见美国当局对于经济制裁的自信。

美国政府人士这种正义的言论,对于人民的行动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罗总统在芝加哥的演说,就是美国两个工会联合会和各合作社,发动抵制日货大运动的起点。这个运动先由国际劳工联合会(拥有会员3,441,000人),于10月13日大会决定发起,后得产业工会委员会(拥有会员1,718,000人)继起提倡。史汀生对于这个运动表示拥护,主张“美国人民不购买日货”。到12月19日美国五十多个普遍团体及和平团体,也通过决议案,要求全体美国人民抵制日货。当时美国外交协会主席俾尔文发出宣言,吁请全世界人民不购买日货。美国政府人士这样拥护正义及和平态度影响及于排日运动,在侵略者的日本,已感觉头痛与苦闷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只隐约地说:“美国政府对于排日运动的态度,在形式上虽然是严正的,政府绝对没有奖励排日运动,但是排日煽动者却以为政府要人的言论,有时甚至政府当局所施行了的措置,是在间接奖励他们。例如先前商务部对飞机制造者发出通牒,劝告他们对于轰炸非战

斗员的任何国家,勿卖给飞机及零件。又如司法部一面默许在美华人购买中国政府的救国公债,另一面却禁止日本政府在日人间募集战争公债”(据美国通的日人记者河上清《A Misdirected Boycott》)。

河上更谓,“排斥日货的主张者,就在这样政府的措置当中,发见这种运动的间接的道德的援助。再如政府从各方面所颁布攻击全体主义国家的进攻的宣言,也被排日运动当做暗默支援的手而加以接受着。”

美国排日运动最活动的团体,是“拥护和平民主政治联盟”(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其会员400万人,包括有四百多种的团体,其中主要的加盟团体有:监理会社会服务团(Methodist Federation for social Service),美国艺术家协会(American Artists' Union),美国作家联盟(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国际防卫联盟(International Defense League),产业组织议会(Committe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平时简称C.I.O,其总裁为有名的John L. Lewis,及美国劳工总同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这个联盟又拥有六个理事会地方分会及一个辅助机关,称为“援华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这个机关设置数万的罐和箱于酒楼、旅店、照相馆、及洗衣所等地方,募集援助抗战中国的捐款。

“拥护和平民主政治联盟”背后的推进力,是美国的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虽然只有75,000的党员,表面上好似比较贫弱,但是实际的势力,却远在其少数党员所表示的力量以

上。他们在非共产党组织中分布细胞，共产党在劳动、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的社会中，运用着潜势力。在“拥护和平民主政治联盟”内，有周知的著名共党首领勃劳德(Earl Browder)以次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及共产主义同情者。共产主义者们，提倡和平及民主政治，所以成功了能够包括了共产党以外的多数著名的男女有力者，参加排日运动。

“拥护和平民主政治联盟”还刊行着月刊杂志《斗争》，其篇幅的大多数，用在排日与排德上。该联盟曾经广泛地分发过题为《何故并怎样排斥日货》的小册子。小册子列举应加排斥的日货，包罗绸制领带、袜子、衬衫、衣服、日制玩具、养殖珍珠等宝石类，电泡、洋火、绿茶、罐头、螃蟹罐头及陶磁器、化学制品、镜子、太阳眼镜及手套等。

该联盟散布过许多小册子及传单，其中有一种特别要求青年不要和着用丝袜的女子作朋友，因为丝袜原料的九成，是由日本输入的。该联盟又常发行题为《排日的进展状态》的小册子，并附旁题：“诸位，买一双丝袜，即供给日本四发的子弹”。

该联盟会于去年10月1日，在马德森广场公园举行民众大会，到会者达50,000人，一致主张抵制日货。据去年11月1日的消息，纽约已有二十一家大商店，有名的乌尔渥斯百货公司也在内，因民众之反感已停止发售日货。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格林在奥海奥州东利物浦领导游行示威时，各街市中有不少的日货，曾在庄严的形式下，全被焚毁。

在美国的排日运动中,基督教徒占着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宗教指导者,特别是监理会教派,在上述“拥护和平及民主政治的联盟”的活动中,占着有力的部分,监理会教派的有名牧师、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前院长瓦尔德博士(Dr, Henry F. Word),就是该联盟的全国委员长。监理会教派有名的司教马考尼(Bishop Francis J. Mc. Connell),也是排日运动的主要指导者。拥护民主政治基督教徒协社,时常劝告所有男女教徒,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天主教协会更发出宣言,主张:“在现在经济互相依赖之情形下,国际社会能以断绝与破坏公约国家间的商务关系,而达到其意志。”拥有会员50万人的美国女子青年会,也曾由其董事会劝告其会员,设法使美国政府了解与日本断绝商务关系的必要。

美国的青年学生也是排日运动的中坚分子。去年11月间,美国学生联合会特别派遣代表麦迈切尔(Jack Mc Macheal)来华慰问我战区的学生,带来了伟大的同情和兴奋:“美国人民对于这次中国的抗战,比上次欧洲大战还要关心,而更深同情……美国人民极愿帮助中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据说,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时常可以看到成千成万的群众游行示威,劝告人民勿买日货,美国现在已有15个学生组织,联合起来积极援助中国抗战。美国基督教徒学生,学联会,社会主义者,以及各进步党派,对于日本这次侵华,都有极强硬的表示。美国国人尤其是中国好的朋友,他们不买日货,不给日货装船,尽力阻止资本家和政府出

卖军火给日本。在加利福尼亚的工人，曾经罢工示威，禁止搬运军火上船。更有许多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假使所制造的飞机是要卖给中国的，他们就特别得仔细经心，假使是要卖给日本的，那也不是螺丝旋松，就是用旧料配上去。

这些消息者是的的确的，最近还有美国工人在美加州朗比区港，拒绝装运1,200吨废铁上船赴日，数千工人并在码头设立警戒线(本年2月11日电)。

去年12月日本在美的商人，曾在三藩市召开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对付美国排货运动的办法，可见美国排货运动的发展，节述所报告美国人民排货运动情形于下：

美国排日运动已普遍全国，特别是荷里活及巴西他拿两地最激烈，这两地的官长也都参加排货运动。有一个小学生在日本商店购买玩具时，偶然发现了“日本制造”几个字，觉得非常可怕，立刻放下，“从前的排货运动只限于少数分子，现在即已风行全国各色人物，差不多十居其十了。许多美国教育家，都对学生说日本的“坏话”，“排日货的运动是倡自450万的犹太人”(据5月3日《中国晚报》)。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2期

# 欧洲大战与日本

## 一、欧战的认识

欧洲人和平的美梦已被希特勒对波兰的试炮所粉碎，月前我曾论断“世界大战将先爆发于欧洲”（“世智”座谈会上），果不幸而言中了，自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为时已达25天，英法参加战争也已逾半月之久。东线战事或将因为波兰军队之撤退而主力战暂告一段落，但是西线战事此后的发展，更引起了世界人士的注意。

欧战究竟从此变成英法对德的大规模战争呢，抑或英法接受希特勒的和平运动而缓和双方的激战，乃至议和停战呢，已成了一般人注意和讨论的焦点，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机械地单看战争的表象，我们应从这次战争的本质来检讨。

这次欧洲大战，表面上固然是德国侵波而英法护波所引起的，但是本质上却只是法西斯德国对民主国家的英法的正面冲突，可称为“帝国主义战争”，双方政治体制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和一般所预料苏联参加的另一种战争，

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以说战争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

此后欧战的发展与变化,要视这个矛盾与两个体制间矛盾比重如何来决定。具体言之,若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矛盾缩小而退于次要的地位,则战争将至议和结束,反之,若这种矛盾依然大过于两个体制间的矛盾并且占主导地位,则战争将须继续下去。关于这两种矛盾的比重问题,我在三个月前即已检讨过。当时许多论者皆着重于两个体制的矛盾大于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矛盾,我是反对这个意见的,我强调:“自实际的情形观察,英法与德意的矛盾,实比英法与苏联的矛盾大些。即自理论上讲,“意识要决定于存在的”,英法目前还不至敌视意识上的敌人的苏联,甚于实际上的敌人的德意”。并谓德意“一贯地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所以几年来只在拆撤英法四围的屏障上用工夫”,“他们知道英法易欺而苏联难犯”(本刊第2卷第4期134页至135页)。这个观点即至今日,依然可以适用到某程度。今日虽说德国事实上已经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希特勒也已放出和议的空气,英法原来犹豫的态度上再加上苏联军队开入波兰的影响,这几天来英德之间似由武力战转成国际的宣传战,但是各方情势尚无立即议和停战的可能。第一,法国的进兵并没有停止,英国陆军业已参加法军作战,英法确知没有永久的和平,动员与复员,需费甚大;第二,不但意大利出面调停的空气降低,罗马尼亚国社党铁卫团团员倒反暗杀罗马尼亚首相,另一方面德国又拼命拉拢



日本帮凶；第三，英德之间互以言论抨击，谋在中立国家间争取友方，这又类似大规模战爆发前的准备工作；第四，美国正在积极布置太平洋上的实力，以便应付民主国家在太平洋上所受的威协。目前战争不采取激烈的主力战而参加国双方再进一步做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倒是比较可能。

## 二、欧战与远东政局的变化

在这种情势下，远东方面在欧战爆发之后所受的影响，将照样继续下去，我们在上期几篇有关的论文上谈过的透视，将无多大变化，事实上我们所论列的形势，是在继续增长着。

英法因为欧战的爆发，不能集中大部分精力以干预远东问题，所因对于志在扫荡英法美苏的日本，势须作消极的让步，最近的许多事实，如引渡刺程案四华人，接收伪华兴钞票缴纳关税，一度移交沪西警察权，取缔香港抗日言论，放任日本及汉奸报纸自由发行，等等，已表现着这个倾向。但是英国对日退让妥协，是有极严格的限度，它会受到美国态度转强的影响。英国也有借重美国的力量维持太平洋均势的倾向。所以曾有一度风传将以美国军队替代英法军队驻扎上海。

美国此后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欧战爆发后最关重要事项之一，也是一般人所注意的焦点。美日两国太平洋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及其新开展，我在上期已详为剖述过，欧战爆发后，这种倾向更加显明，美国政府已经一再表示美国

对于各国在华的关系不能置身局外。例如9月6日日本要求英法撤退驻华军队,8日华盛顿方面即表示反对称:“相信日本此种要求,恐将加深日美间的紧张情势,倘日本企图夺取外国在华租界,则此种情势将更加严重”(纽约9月8日电)。9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更明白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密切研究上海方面局势之开展。蒙伪边境停战协定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部发言人即强调声明:中日战争继续进行,在势不能不影响及于美国的利益,故美对于其在九国公约下所享受的充分权益,不得予以保留(华盛顿17日电)。欧战发生后美国舰队集中于太平洋,航空母舰也派到菲律宾。美国驻沪的军队也有增加的准备。日本要求英法撤兵之举,终因美国之强硬态度而作罢论。美国借款援华的事情闻已在接洽磋商中,信用借款额将为35,000万美金。同时,日本政府及舆论界对美国的论调,也大为改变,旧时亲美的空气,已经变成“日美战近”(日本中将佐藤清胜的伟论)的论调。东京各报最近开始攻击美国对日的所谓“敌性行为”,指责欧战发生后美国极力保护英法的远东权益。《国民新闻》更称“美国若不改变态度,则太平洋将成战场。”美国通的日本人河上清之论美日战争,曾谓欧战爆发,美国就有发动战争的可能,我们认为美国的战争,将必偏重于太平洋权益的保护与指导权的攫取,日本政府近日更扩大宣传:“如美日关系恶化,日本准备与美国一战”。

欧战爆发后在远东方面被一般重视的国家,还有一个苏联。事实上,苏联与远东新局面关系之重要,或在美国以

上。现在苏联在太平洋上已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非常注意苏联的态度。一般的推测不外乎两种；其一加强苏联远东政策，更加积极援助中国对日抗战，且谋与美国携手缔造远东的真正和平；其二，苏联经德国之拉线和日本停止冲突，甚至缔结苏日互不侵犯协定，旁观中日的战争。我则谓头一种趋向比较可能，因为苏联与远东的关系和其与欧洲的关系不同，中日战争的性质也与英法对德国的战争两样。苏联的根本政策固然在于拥护和平，但却不会贪图无代价的和平，现在蒙伪边境的冲突虽由苏日缔成停战协定，但这不能视为苏联将置身中日战争的局外。苏联驻英新大使潘及新恰于欧局急转直下的时候赶来中国，其所递国书对于中国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极致关切与同情，谓：“苏联极端相信中华民族的奋斗，定能得到圆满的胜利”。这里具有切实内容的措词，当然和一般的外交辞令完全两样；中苏邦交将更亲善的起点，已经表现在这里。随之而来的就是苏联提供中国以无限制的信用及保障军火继续不断的来源：苏联接受中国政府用法币偿付过去供给中国的军用品，按国币每元合英金八便士计算，决定今后仍按照上述根据，予中国以军用的供给。（伦敦9月9日电）

德国为苏日拉线凑合，或者是事实，但是苏日关系之不可调和性却不能根本消灭。即在德苏协定成立后，日本陆军当局，仍宣明“所信”，强调：“帝国的最大敌性国家常是英国和苏联”（8月27日《大阪每日》新闻）。近日路透社虽然一再揭露苏日缔结互不侵犯协定的消息，但是日本对华军事仍

不忘情于进攻西北，切断所谓“赤色路线”并在伪满边境增加军备。日本虽为乘欧战机会驱逐英法权益出于中国境外，已与苏联缔结停战协定，但，事实上仍为日本对苏的再度屈膝。苏日互不侵犯协定的缔结，即令伦敦方面，也都不会置信（伦敦9月23日电）。何况互不侵犯协定随时都可以废弃。

苏德协定成立后，德日的悲欢离合，已为注意远东新情势的人所忽视。日本朝野对于德国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虽然极表愤慨，但是陆军当局所宣布的态度，依然是：“敌人是英国而断非德国”（上引《大阪每日》）。同时，罗马方面所传德意的代表意见，又是德意日的亲善关系绝对不因苏德协定而受到阻碍，意大利政府希望日本两点：第一，日本谅解德意的真意而善为自处；第二，即时废除九国公约。（《大阪每日》8月24日所载罗马特派员小野七郎的电话报告）

目下孤立于欧洲的德国，实有借重日本帮凶袭击英法远东势力的必要，装痴作哑的意大利，更是积极从中凑合，德日的堕欢重拾，是有充分的可能的。近日，一度成了海外游魂的日本军事特使大角和寺内，又有重整行装赴德的消息，据传德意日军事同盟又在积极磋商中了，德日关系此后的发展，倒是更值得注意的问题。

### 三、新情势下日本外交的难关

欧战爆发后远东新情势的发展，还可以由日本新外交政策的主观的动向，求得另一面的解答。日本新内阁一再

声言：日本政府政策的枢轴，在于处理“中国事变”；而其处理“中国事变”的某些原则，又在于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本新内阁首相阿部信行8月30日在其外交政策的广播词中，明白声言：“欢迎第三国协助建立‘东亚新秩序’，如第三国欲从中作梗时，则将断然予以排除”。陆军当局对新内阁的要求，也是同样着重于这一点（详见本刊上期拙作《苏德协定与日本》）。

然而所谓“东亚新秩序”，尽人皆知，是日本要求独霸东亚的把戏，换句话说，在东亚拥有莫大权益的英美法苏都要迫其退出东亚境外。日本这一点基本政策，是和英美法苏的利益根本冲突的。从来维持太平洋均势的力量，握于英法手中，现在英法忙于欧洲战争，自日本侵略者的眼光看来，今日是实现“东亚新秩序”的绝好机会。他们准备充分利用这个千载一遇的“良机”，排除英法乃至所有第二国，第一步出于中国境外，第二步出于东亚境外。

殊不知日本这种野心与阴谋，适足以增加它自家国际环境的困难。第一英法虽然忙于欧战，但是他们在远东还拥有相当雄厚的军备及巩固的根据地，英国东方军事堡垒的新加坡，若能让制日的国家切实运用，日本海军必将受极大的打击。好大喜功的海军派军人不愿意和美冲突，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二，美国的远东政策是随欧战的发展而日益加强着。美国不但要保持她在远东特别在会国的权益，并且深切觉察今日是美国取得太平洋政治领导权中的绝好机会。美国近年来太平洋方面的军事建设，虽然还没

有十分成功,但其决心利用可能的力量到最高度,已经表露于最近的行动上了。积极的太平洋军事布置,正与美国势必拥护远东权益的外交政策,同时并进着,美国虽也一再提议召开九国会议解决中日战争,但这种提议不能为日本所接纳,即美国本身也很了然。

至于苏联,我们相信:他们不会忘记扶助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基本原则,更不会忘却日本军阀无时不在策划同时对中苏作战的阴谋。苏联绝对不会视中国为波兰,问题只在于我们怎样运用中苏的特别关系罢了。

德意日的关系就有点不同,虽说目前他们的断耦尚未全续,但随欧战的开展与拖延,三个伙伴势必重拾旧欢,预料未至太平洋战争的前夕,他们的勾结必可完成。

然而在太平洋上,日本始终是孤立的,德意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美苏远东政策的积极进出,却一日千里。深陷千尺的日本泥足,不粉碎于塞北,也必沉没于太平洋中。我们加紧抗战,已使敌人无法再深入(李宗仁将军之言),正足以缩短泥足存在延续的时日。

(1939年9月25日)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3期

## 汪逆兆铭的悲哀

古今中外最无耻的莫过于汪逆兆铭，既叛党又卖国，但是人类中最可怜的也莫过于汪逆兆铭，既屈膝称臣还须备受玩弄。汪逆兆铭自与日本勾结以来即过着卑鄙无人格的生活，自其偷离重庆以后，就开始其甘心受敌人玩弄的生涯。

汪逆早在全面抗战前即阴谋借用外力攫取政权，逃离重庆以后，利欲更加熏心，更加放胆做它无耻的勾当。然而结果总是徒然，被奸被污而所希冀者始终未达到半点。汪逆仆仆于河内、东京、上海、北平、青岛之间，一意希图能够实现伪中央政权以偿其出卖屁股的代价，但是伪中央政府一再延宕，即连广东一地的伪府也都未能出现，汪逆的命运早已可怜极了。最近日本政府因为谣言诱和进攻及对英美调整工作的失败，遂又再放言树立“新政权”，扶植汪逆上台，汪逆竟受宠若惊，加油大锣大鼓，以逢迎主子，而无耻的丑态更为百出毕露。其尤者就是最近的许多言论的欺骗性。

汪逆总动员其机关报上海《中华日报》香港《南华日报》，一方面一再主张“全面的和平”，一方面发表其对日提出的和平条件。其中含有深刻的用意。汪逆素来对其主子是绝对服从惟命是听的，他绝对不敢提出什么“中日合作的基本原则须予以改变”的条件，更不敢要求“一切铁路，海关，及华人工厂，须全部归还中国”，“中央政权成立时日本即须撤退一部分军队”，“日本将来终须撤退华北及内蒙古全部军队，须事前提出保证”（皆据《中华日报》23日所载）。但他故意揭出此种消息，一面在欺骗动摇份子相信他的出卖还可以收回一点代价，一面想吸收一些新分子，以粉饰自己的无力，加重主人对他的垂青，减轻梁鸿志及王克敏诸逆的反对。

但是汪逆的骗局并没有做好，主子不明了他用心的周到，对汪逆的意见予以正面的抨击，否认有撤退驻军的意思（上海日军发言人谈话）。专恃日军的刺刀以为卖国横行的后盾的汪逆，一闻此项答复，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再有异议，把自己的希望打个大折扣，说什么“全面的和平因受蒋委员长的阻挠致不能实现，逼使不能不先从局部停战局部和议着手”（汪逆喉舌《中华日报》1日社评）。上海日军发言人也于同日称：“日政府已与汪兆铭成立经济合作协定，汪同意日本不撤兵”。汪逆不知挨了几下耳光呢！

日本不能看重汪逆，伪中央政权永久在搁浅中的主要原因，一在于汪逆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一在于日本侵略



者根本就不乐意有一个统一的伪中央出现。汪逆因为自己没有实力，所以低首下气奔走于梁王诸逆的门前，但梁王诸逆的迎拒又操于其背后的主人，汪逆更觉得有与另一实力派合作的必要。于是最近又托日人坂西与冈野，敦请吴佩孚出马任军事长官，陈逆中孚也从旁帮助劝驾。但是吴佩孚能识大义，予以严拒，指汪为“著名汉奸”、“捣乱分子”，厉声说：我岂能与之合作？汪逆可谓倒霉极了。

日本侵略中国利于分化不利于统一，他们所以一再企图成立伪中央，不过是用以威胁中国抗日政府及诱惑第三国。所以素来的作风是一松一紧一捉一放，闹得汪逆头昏眼迷，啼笑皆非。即就最近的事实说，日本政府一面固在扬言扶植汪逆，但又一面放出和平谣言引诱我抗日政府，时又央托英美出头调停。但自我抗日政府严拒一切诱惑，并将日本的阴谋揭布以后，日本又拾起汪逆这块法宝，甚至于对第三国宣称：在伪中央政权未成立以前，绝不和任何第三国谈判中国问题。实则日本并非不知汪逆这块法宝不很灵验，深知即令伪中央成立，仍于中日战争的结束，无大补益。日本不过借汪这块招牌耍耍，凑凑热闹罢了。日内阁首相阿部最近公开宣称：伪中央政府之成立并非即为“中国事件”之解决，主张日军撤退中国的见解，实属大谬。阿部承认“中国事件”之解决，决非如此简单；直言：“蒋介石将军现在拥有大军二百四十师，并有游击队百余万人，在后方活动。”是则汪逆的美梦，将成为漫漫长

夜的幻境,是可断言的。汪逆已再度打折扣,希望成立一个闽粤桂地方政府,聊以过过领袖瘾,其中悲哀之声已可闻于海内外了!

原载1939年12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6期

## 美国孤立派波拉先生的错觉

在美日谈判已经流产日方也自觉调整对美外交无望的时候,在美日商约的废弃行将发生效力美国压制日本的力量逐渐增大的今日,美国孤立派领袖共和党参议员波拉先生,竟大放厥论,主张美日商业关系应加以保存,反对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波拉先生或者以为中国无辜人民之被屠杀,国际公约之被破坏,正义人道之被蹂躏,尽可为着保全希斯人(指贪图小利出卖人格者)的小利而置之不顾,但就事实考察即连这点希斯人小利之不安定,波拉先生也都没有估量到。实言之,波拉先生委实犯了极大的错觉。

波拉先生的主张忽视美国人最重视的公约信义、正义人道,等精神方面的明显罪恶,美国内外已有深刻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再赘言,这里只想就波拉先生等孤立派所贪图的商业利益,略加剖述。

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美国对日的贸易固然略有

增加,但是所增加的部分完全是军火和战争原料,至于普通的和平商品则可说有减无增。处在战争重重剥削下的日本人民,已经丧失了购买外国商品的能力,日本政府对外国的和平工业品之进口,也加以极严格的统制。美国输出日本的商品,完全是供军队消费的杀人商品——在这一点上,美国对日商务的前途,已经埋伏着重重的暗礁,这只贪图小利的美国商船,没有永久安稳的命运,在极短期间即将触礁破沉。

第一,我们直觉上可以明了日本购买美国商品的增加,是畸形的、一时的现象,不必等待战争完结,即在战争进行中,即有日就低降的可能。因为日本的财政已陷入枯竭的地步,可输送外国的现金所存实在不多。日本为节制现金外流而已着重于自给自足的政策,一方面节省军火的消费(依各战地的报告可得此结论),一方面企图加强所谓“日满支”的部洛克经济,以完成日本奥大基经济的单位。若此,则美国对日本的输出是要日渐减少以至于绝迹的。即令纯军火类商品,不至完全断绝,而这少数军火商品,美国实无忧虑无处发售的必要。

第二,我们从反面来看,美国为日本极少数的不义之财,而结果牺牲了极大的在华的权益,波拉先生对于这种铁一般的事实,却装痴作聋,这是美国一般人民所大惑不解的问题。日本不但已把美国在华的权益摧残大半,即在现在日本军人仍在继续摧残中。日本自最近格鲁野村谈判搁浅后,即又加紧天津租界的封锁,阻碍华北的美国商务。

长江及珠江的封锁,也日益加严,其他仅存的海口且有全部加以严密封锁的企图,美国对华的贸易势将为日本军阀的狂暴,完全荡尽无余。这点不但菲律宾报纸注意及之(见《中国商务日报》社评《四万万生意与四万万生灵》),即连日本人民也极明白。日本人常举中国的美国商品购买力的巨大为美国援华制日的经济根据。他们举过幽默而切实的事例说:“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一个人买一块美国肥皂,则美国可以销售四万万五千万块肥皂”(《时局月报》12月份《美国远东政策的批判》),再如广大土地与丰富资源可以销纳巨大资金的事实,更值得美国人的考虑。上海及天津的美国商人已屡次电请其政府,勿与日本重订通商条约,最近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废弃美日商约的行动已获得所有美国人的赞同,赞成不再售日本以战争材料者占82%,不赞成者只占12%”(美国民意测验社的报告)。

波拉先生,你的迷梦可以休矣!“商人议员”的主张,且不为一一般商人所赞同,应当及早醒悟罢!你们政府副国务卿苇尔斯已经明白表示不再重订美日新商约,日本军部且已准备和你们决裂、蛮干到底了。自欧战爆发后,美国军火已经找着了合理与正义的销路,先生也尽可以不为军火商人的利润担忧了。即令你是为内政的争执,也无倡此种不识时务的主张的必要。霍布法主教已再公开向美国人民宣布:“美国出售军火与日本,为美国历史上最污秽的一页!”

“美国人士一面对中国表示同情，捐款救济难民，但同时又供给日本以军火，数量又超过任何国家，以供日本作破坏之用，此种行径，实为极丑恶的伪善行为！”（霍布法主教致南俄亥俄圣公会电）

原载1939年12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6期

## 汪逆卖国与我们的觉悟

高宗武及陶希圣揭布了汪逆出卖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卖身契”全文,使中国及国际洞穿日本帝国主义的毒狼与汪派卖国贼的无耻,实是一桩极重要的事件,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项,却是我们应有更深刻的觉悟和决心,来对付这个必有的趋势。

第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存着任何“中途和平”的念头。本刊年来集中精神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因,它本身的要求需要着占我全部领土,奴我全部人民,以“征服中国”完成田中奏折所开的第二段工作。在今日言和,日本是以战胜者自居的,中国如何能处于不战败者的地位,如何能不把锦绣河山双手捧送给敌人呢?汪逆固然愚昧万恶,但是事有必然,势所必至,任何人今日若欲与日本言和,结果亦必如此。

第二,任何爱护国家民族的人,都不能再有侥幸的幻想。在日本侵略者国内外危机深化的今日,已有不少人幻想着日本可以相当退让,和局或者容易谈判。但是事实排

在我们眼前，日本军阀不能轻易牺牲了一百多万的军队，白白损失了数百万万的金钱而不求一个倍蓰的代价，即如元老重臣等稳健派虽较急于结束战争，但也决不能放弃这种要求，所以汪逆宣传日本不驻兵，而卖身契上写明普遍驻兵于我国各地，近卫声明不需要陪债而卖身契上专条规定：伪中央政府“赔偿事变以来日本国臣民在华所受权利利益之损失”，这种数目又将如何之大，可以想见。国人希望日本退让的幻想，只在最后胜利达到后始能变成实现。

第三，每个中国人今日更应深切考虑如何努力始能避免这类卖身契发生效力。唯一的途径就是全国内部精诚团结，一致对日抗战到底。日本帝国主义欲以小国灭大国，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化我们内部自相残害，即所谓“以华制华”的毒计。以前极力制造汉奸，现在更加造谣离间国共合作。在敌人的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挑拨离间的消息。我们处在敌人毒计措施之前，更应该戮力于不分党派男女老幼的精诚合作，彻底排除门户与派别之见，信奉抗战建国为第一理想，以共同击退毒狠的敌人为唯一生命，关于此点，领导抗战的人所负责任尤其重大。

第四，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应有远大的理想和具体的计划。日本人尚且自己承认所谓“处理中国事变”不是十年可以完成，而需要四十年五十年的长久计划，那么我们要抵抗顽敌扫荡败类出于中国境外，也非有长久的计划与具体的办法不可。全国人民皆承认抗战建国是一桩艰巨的事业，所以一方面需要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更需要切实适



合实际的办法。因此,无论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实业、教育,乃至社会各方面,应革除的地方就须早速革除,应兴办或扩大的就须按步实施,绝不能漫然拖延,更不能因私害公,拘于派别而妨碍公事的进行。敌人诬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外人评我国有政治家无行政者,我们全国国人应知所警惕,我们抗战建国的大业始得完成。

第五,总之,我们今日对日继续抗战必须认识清楚新阶段的特性,在全面抗战发动以前联络各党各派使成一体的工作占最重要的地位,全面抗战发动后鼓励抗战的民气又占了最重要的位置。到了现在,如何使抗战坚持下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则占了第一位。所以现在应该不为以前的工作分去大部分的精神与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本诸最初各党各派精诚团结的共信与自信,在已经鼓动振作起来的精神基础上,勇往推进全民族的神圣工作。更具体地说:我们今日不能再分成党派的私见各树门户相对,使整个的抗战力量还须分出一部分,用在各党各派的联络与融化上;从事于抗战的全体国民不能减降勇气与决心,必须警戒:“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败,全国上下皆能够有此共信与决心,则建军、建国,始能事半功倍,争取最后胜利也始能有确切的把握。

最后,我们还要向国际方面进一言:日本侵略者所允许英美各国的香饵,实只是一种糖衣包装的毒药。日本最近确有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且欲以开放长江,赔偿美国的损失,以及其他对英法的引诱,拉拢英美促成“东方

慕尼黑”的局面。但是汪逆的卖身契公布后，充分证实了日本对第三国绝对没有诚意。蒙疆及华北日本要设定国防上及经济上的“日支强度之结合地带”，无英美插足余地，无可庸论，即扬子江流域也要设定“经济上日支强度之结合地带”，在华南沿海特定的岛屿，也要设定“特殊地位”，日本“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当继续驻屯”，“日本舰船部队得在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这不但是制中国于死命的问题，同时也是进出太平洋进击英美法的先声。照汪逆卖身契的规定，中国是日本的殖民地，即在通商贸易上的特惠，也无英美分润的可能。本刊早即强调日本对英美根本妥协的不可能性，本期在另文上再分析“东方慕尼黑”成立的困难，论据即在于日本此种苛刻与毒辣。现在日本侵略者的假面具已经粉碎，日本的毒素已可为英美国人所嗅到，爱好真正和平与维护自国利益的友邦，实有更确切认识与决心的必要。我们更不能已于言者，据汪逆卖身契，日本侵略者独占中国“共同防卫”的对象，不只是苏联，即连英美法等国也是同时列为它的主要敌人。

原载1940年4月《战时日本》第4卷第1期

## 英美不能再姑息日本

自从倭寇近卫第二次内阁成立德意日军事同盟实现以来,太平洋情势即千百倍紧张起来,日寇政府采取积极南进政策,而其主要的排击对象,就是英美两国。

倭寇加紧南进的步骤,目前表面上固只在于攫取南洋群岛,但其实质却为驱逐英美远退到太平洋的彼岸。自德意允许倭寇有“东方新秩序的领头地位”以来,倭寇即便放开大胆,把它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改为“大东亚新秩序”将南洋包括进所谓“东亚共荣圈”内(近卫谈话),最近日寇前任军事参议官高桥三吉海军大将更著文声言“日本将于适宜时期,占领东方的全部及澳洲全部……”高桥明白确定:“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即以‘满洲国’为起点,南伸及于澳洲、西及于孟加拉湾与缅甸,日本将依照其国力与领域的需要,逐步得由‘满洲国’、中国、越南、缅甸、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太平洋若干海岛、菲律宾、澳洲、及东印度其他若干地带前进”(见11月17日各报)。日寇朝野皆已一致狂叫“驱逐英国”(中野正刚之言),“决心与美

国开战”(如高桥之言),是则英美与日寇之间,确无调解余地,日寇且不讳言,英美更应有最后决心始可。

九十月以降,日寇朝野一齐对美挑战,虽经美国政府、军事负责人、乃至舆论予以痛烈的反击,而日寇方面表面上似稍镇静,但事实上对英美的攻击准备却更为积极。经美国反击后,10月23日日政府四相会议还决定相继以闪电术南进,松冈之流又继起狂吠,华南日军集中海南岛及台湾等地,并闻最近调兵五万人越南,有明取西贡暗袭缅甸的企图。日寇此种布置,即不立刻对英美宣战,也确是对英美的莫大威胁。而日寇的冒险若一旦成功,则立刻影响及于英帝国之建立,美民族的存在。去年上海大美报记者及其他英美人士即已精确论述过,我们且为英美担心。

英美要免除这种危险,唯一办法就是及时压制日寇,乃至予以消灭。今日,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可说已到最后关头,对于日寇,如再容忍姑息下去,英法在欧洲所受的教训,必将重现于远东,其时英美又多一后悔的历史。英美要压制日寇至少要具下列几种决心:

第一、对于日寇要有势不两立的决心。制裁日寇要积极而且决绝,不能心存幻想,侥幸,或犹豫不决,以至行一步看一步。比如最近各种禁运政策的执行,更不能够只打雷而不下雨,如废除通商条约以前的空文抗议。

第二、英美两国合作要坚决诚意,抵抗共同敌人的分化离间阴谋。敌人最怕的是太平洋有关系国家的切实合作共同制裁其南进,特别害怕英美的联防,所以对美强硬失

败后即改采和美攻英的政策，美国稍一犹豫则日寇进攻缅甸的可能性就大，英国若心存妥协则日寇将先侵占荷印。

第三、英美两国还须争取太平洋的重要盟国，例如苏联及其他小国家。日寇南进，最大牵制固为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为它所顾虑。苏联在远东不但拥有雄厚的陆海空军，足以威压日寇，另一方面且有海参威根据地及其潜水艇队，足以破坏日寇内地与大陆的联络。海参威的巨型轰炸机飞炸日寇几个大都市及工业中心区，最为方便，且和阿拉斯加接近，可为美国所共同利用，故日寇视海参威为一把匕首，这把尖对日寇胸膛的匕首，在英美则非努力争取不可。

第四、最重要的，英美压制日寇不能没有中国的协助。中国不但英勇抗战三年有余，已使蛮暴的日寇陷入半身不遂，此后还要拖住日寇的后腿。使其陆军完全失了作用。日寇东南进与英美开战，中国必开始总反攻，日寇前后受到夹攻，其败必速，故英美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我们希望美方最近谈话，“将以援英程度援华”，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更希望美方不再“一面援华一面仍供日寇军需品”（美方舆论）。

一年以前，我们曾经敬告过英国的姑息，赞许过美国的壮举，今日更希望英美共同协力，能够确实做下去。

## 评日人“世界四分论”

日寇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幻想着怎么样分割世界。数年前，日寇陆军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即著书提倡其所谓“世界三分论”，最近日人匝瑳胤次又特著论提倡“世界四分论”说，“自欧洲情势激变以来，世界经济分野将分成四大集团。”而其所谓四大集团就是德意的欧洲集团，泛美集团，苏联集团，及其以盟主自许的臭大东亚集团。（详见本刊本期拙作《日寇南进与对华策略》）

日本人这样幻想的“世界四分论”，是最近国际情势的变化促现的空中楼阁，在它本身并无丝毫更优强的主观条件，同时又是一种穷途末路的自我慰藉的表现，很明显的要走近灭亡的界线。战争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三年有余的日寇，今日竟在这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公然在它的想而未成的“东亚新秩序”上面，加上一个“大”字，敌首相近卫竟敢对中外宣布这种“大东亚新秩序”，把南洋群岛包括进去，其主要动机就是假德意余威以自壮，德意竟也为它撑腰。这是德意日军事同盟缔结后彼此互相“尊重”所谓东亚“新秩序领导地位”

的结果。然这也不过是强盗伙伴互相依赖罢了。

苏联拥有世界六分之一的陆地,正在和平合理的原则下积极建设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二十多年来健速的发展,俨然形成一个巩固的经济堡垒。美国素以富足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握住世界经济的牛耳,再以其地理的特殊性,恰好和中南美洲各国结成一个泛美集团,也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单位。这是日寇素所不敢轻视的两大经济集团,称为世界的独立经济单位,还有相当理由。至若天生贫血症的日寇,欲以东亚经济集团的盟主自任,真是太不自量,梦入非非之境了。

凡欲以一个集团的盟主自任,最低限度必须自己富强,第一足以统御本集团的附庸单位,第二足以独立不依赖外来的供给。但是日寇既不强又不富,数十年来经济上完全依存于外邦,政治上只靠纸老虎的假威风强撑着门面。这次经我国三年余的英勇抗战,已把这层纸虎皮穿戳了。以前日寇标榜什么“日满支”经济部落克,我国关内还在继续抗战,东四省的抗日联军也日益增长,我们的总反攻阶段日渐接近,旧集团的梦想且不能完成,现在又要扩大其梦境的范围,实是自挖坟墓。

日寇主张“东亚新秩序”必须包括南洋,这才真正无异于“吞炸弹”。南洋群岛为英美法荷等国的属国或势力圈所在地,其复杂错综为世界冠。法荷新败,英国牵制于欧战,因皆无力兼顾远东,但是美国自视其民族生存与南洋各地具有密切的关系,南洋各地可以维持现状,但切不能为一

野心国所独吞,因其结果足以危害美洲。英国固无力兼顾,但能以其军事根据地,供给美国使用,使美不必再为远洋轮形阵战略所苦,则英美协力正足以扑灭日寇南进的军力。

日寇现正徘徊于先结束中日战争然后再南进好呢,抑先南进然后再返戈结束中日战争好呢。事实告诉日寇:哪一条路都走不通,欲先结束中日战争,和战皆不可能,欲先南进兵力财力皆不够用。日寇现在所依仗的是德意的支撑,但德意今日自顾尚不暇,如何能爱护及它呢?且看日寇如何圆其“大东亚经济集团”的幻梦,事势已注定:日寇“东亚共荣圈”的提倡,不久即将暴露其欺骗的破绽罢了。

原载1940年11月《战时日本》第4卷第2期



## 欢迎居里先生与中美合作

在美日冲突日益尖锐化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的今日，我国今后的决心与作风，当然是各国十二分重视的。实际上英勇抵抗日寇已逾三年半的中国，今日在太平洋上是举足轻重而可以决定太平洋的命运。因此，对于侵略国家嫉恶如仇的罗斯福总统，对于进步生长中的中国又不能不有精密的认识。此次特别派遣他的私人代表居里秘书来华考察，自然也是题中应有的一着，而其重要性自不许我们忽视。

居里先生不日就可以到达重庆，我们除谨代表民众向他致最敬礼的欢迎外，愿乘此机会略尽数言。居里先生此行目的，据他对合众社记者所谈：“余希望能对中国现状获得更精确之认识”。自增进中美邦交共同制日之点言，居里先生此种目的，自然是我们所欢迎的。不过关于认识中国现状，我们应提供居里先生几点意见，供其参考。中国刻苦坚持抗战已达三年有半，过去我们是万众一心精诚团结苦

干下来的,此后我们自然还要继续既往的精神,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我们全国皆坚信,唯有精诚团结才能获得最后胜利;也唯有抗战到底始可以得到民族的解放。第二,关于我们对日抗战的国际协作,我们的领袖曾再三宣言过,最近又对合众社记者莫里斯更确切表示过:“远东之持久和平,应以中美苏三国协作为基础,此与美国对于远东方面之见解,显然一致”,并力言美国对华经济援助之重要。

我们是为远东的真正和平与国际公约而抵抗日寇的,如果没有我们三年半以来的英勇抗战,远东一带不知已成怎样的世界,英美等国的远东权益必已破坏无余,日寇的暴行日益猖獗,如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言:“华盛顿今后所建立之远东均势已遭受严重之打击”,其野心所在非至完全摧毁各国远东的立足点不可。赫尔最近已揭穿其奸:“日本全国自始即具有广大的野心,以建立日本统治西太平洋全部的地位,该国政府当局并公然宣布日本决以武力攫取并维持是项地位,俾日本成为拥有全世界人口半数区域的主人翁”(1月15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演说)。

赫尔以及其他美国人士皆具明锐的眼光,洞悉日寇的野心与阴谋,日寇外务省所宣示的国策,是欲制造所谓“远东协力组织”,把英美等国在远东的权益完全取消,并欲驱逐英美人出于远东之外。而日寇特别着重的是美国的驱逐工作,所以日外相松冈声称:“美国只应竭力在西半球

方面取得控制势力,在其他地域如日本享有稳定和乎秩序力量的东亚方面,自以避免多事干涉较为合理”(1月16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演说)。实则,日寇野心所在尚不局限于“统治西太平洋”,它的所谓“东亚共荣圈”,是有无限制的外圈的,从占领朝鲜台湾开始,扩大至东三省,华北,及中国沿岸一带,现在又公开宣言其东亚新秩序延至澳洲。是则将来美洲,非洲及其他各地,也自难免成了它的侵略对象。轰动全世界视听的田中奏折曾倡言日本的最终目的在“征服世界”。鉴察过去的事实,自非偶然的。目前的问题就是军事南进的问题了。

然而日寇要“征服世界”,要军事南进,却必须先克服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抗战拖住它的后腿。日寇军事南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中国的抗战在目前就是维护美国了。日寇一旦发动大规模南进,则中国立刻开始总反攻,中国的总反攻牵制日寇的力量非常之大,对于美国是有极大的作用:在日寇未发动军事南进之前,可以阻止它决心南进,在已开始军事南进之后,可以削弱日寇与美英作战的力量。美日矛盾之尖锐化,乃至演成美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今日的问题只在于美国应如何削弱日寇的力量罢了。美国当局现在主观上,或者在于延缓美日战争之马上爆发,即在此点用意上,美国也不能再用姑息政策了,留给美国的一个方法,就是增强“绊脚石”(中国)的力量。美国应当在经济上,在军火上,乃至在道义上,积极援助中

国抗战,使中国力量得以实行总反攻。这才是真正的美中合作。

居里先生要获得“精确认识”,似乎应该从这个真正合作点出发,并以此为归宿。

原载1941年2月《战时日本》第4卷第5期

## 德国侵苏与远东前途

22日清晨德国居然“先战后宣”侵入苏联国境，世界风云又为之变色，其影响所及当不只限于欧洲，即太平洋及远东也可能发生豹变。我们一面对苏联的正义战表示十分同情，一面也要深刻注意这一豹变。

德国之侵苏，早在我们意料中。在这次欧战爆发前，我曾估量过英德矛盾比苏德矛盾大而且切乎实际（见本刊2卷4期），但是欧战的进展和德国占地的扩大，使苏德国境比邻而彼此的矛盾加深，另一方面，德国以大炮代牛油，占地虽扩大而建设仍跟不上破坏，德国现在已不特需要汽油，同时更需要粮食了，否则无法安定大后方。苏联地大物博，特别是乌克兰的粮库，对于德国确是极大的引诱，苏德接境及附随而来的问题，终使苏德矛盾大过英德矛盾，而且前者更切乎实际，希特拉乃悍然反戈侵入苏境。

希特拉进侵苏联，蓄意已久，并且扬言六星期攻下莫斯科，三个月占领苏联的欧洲全部领土。一动手就发动百师大军，飞机数千架，暴露其采用高度闪电战孤注一掷，以

求速战速决。但是地占世界六分之一拥人口2亿以上,并已  
完成三个国防及经济五年计划的苏联,是否如希特拉所幻  
想这样不堪一击,自是疑问。大家都晓得苏联的外交政策  
是以和平为原则的,但是苏联的政府及人民同时又准备着  
加倍还击侵略者。苏联不但在物质建设上已有充分的进  
步,即在精神建设上也已相当稳固,所以莫洛托夫首先对  
苏联人民高喊:“红军与举国人民,为祖国、为邦家、为荣  
誉、为自由再度进行光荣的战争”。总之,德国这次侵苏,为  
苏联国运的试金石,苏联也必举全国力量来抵抗,这场战  
争必是一场恶斗,相当长期的恶斗。

苏德这场恶斗,对世界其他部分必起极大的影响,可  
不言而喻。德国势力不但已席卷大部分欧陆,英国所受威  
逼已喘不过气,美国也要踏上战争之路,英美与德国已走  
入最严重的决战阶段。英法虽已十二分吃紧,美国则仍希  
望参战能迟缓一天则迟缓一天。苏德战争可说救了英国援  
了美国。这正如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所言“除非  
苏联于短期间内屈服,否则英国即可充分利用是项时间,  
以美国之援助增强本身之作战实力。且苏德之作战亦可予  
美国以更充分之时间进行防御计划”(华盛顿22日电)。此  
外,苏德战争还给予被德国征服的国家,如法国,捷克,波  
兰,南斯拉夫,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希腊等及呻吟于  
纳粹铁蹄下的人民,以复国还魂的机会。

然而受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国军事同盟的远东盟  
友——日本侵略伙伴。英美各国对于苏德战争均甚泰然,

只日本官方得此消息深为震惊，此后处境也自有它彷徨失措的原因。日寇投机取巧，去年秋欲以三国军事同盟自壮，谋加紧压迫英美，今年春更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欲幸免北顾之忧，藉以加强对英美讨价还价的威风，谋解决中日战争。殊不知投机取巧者竟自食其恶果。现在苏德已开战，日本究竟履行三国军盟好呢？抑严守中立条约好呢？南进好呢？北进好呢？若准备整军南进，则英美已可以在太平洋上充分予以打击。改途北进，则不但苏联远东军可以独立作战，且英美苏之间已有了默契，扶桑三岛将陷于夹攻之下，预料日寇态度必暂观望。此时，英美在太平洋的力量增加而干涉“中国事变”的成份亦必成正比，日寇何去何从，将更彷徨于国际歧途上。

当此之时，我们愿向英美进一言。有人担心欧战会变质，成资主义包围苏联之战。但是纳粹的铁蹄已踏遍几乎全部欧洲，淫威所及多少民族与人民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远东的强盗蹂躏中国全土已达四年之久，不但中国人民的幸运全部为所剥夺，即英美在华的权益也全部为之荡尽无余。德日两强盗尚且暗约分割世界，一者独霸欧洲，一者独霸广义的亚洲。是则，其阴谋所至，不独苏联领土为所侵夺，即连美国也无可幸存，英国更无论矣。英美常在咒骂人类的盗贼，文明的害虫，但是今日之祸患种源于过去，而未来之祸患又要萌芽于今日。英美两国不能制止日寇的强盗行为于1931年，不但坐大了日本，并且养成了德意，终于暴徒横行欧亚为人类大患。未来的祸患将必更大。今日正

是中苏英美选择共同命运的绝好时机。

我们回想1939年春间欧洲一段外交史。当时英法苏原谋协力制止纳粹力量的膨胀，只因为英法的疑惑，张伯伦的因循，及反侵略的广义与狭义适用之争，而致三国协议数月无所成就，终于爆发第二次欧洲大战，不幸而又坐大了德国，法国固已沦亡，英国也狼狈不堪，逼得美国也含着苦杯要走上战争之路。今也，战争方向已经转变，苏联首当其冲，英美国可以暂时休养，得“更充分时间进行本身防卫计划”，但就远处着眼，英美似不应该专心于消极的休养，“进行本身防卫计划”。英美正应趁此良机，积极谋与正在反抗侵略的中苏两国协力，及早根本解决世界暴徒的德意日。英国能从西方进攻，则德意的两面作战，十分困难，美国能从阿拉斯加进兵与苏联远东军携手，则可使日寇陷于两强夹攻之下，消灭小丑日寇的跳梁，将易于反掌。英美果能如此，则不独英美的欧洲颓势可以振作，即在亚洲的权益也可以全部恢复。

反侵略的集体安全制，今日尤具重要性，愿英美多加考虑，英勇逼进！赶快把商议中的英苏合作，变为中苏英美的反侵略协定，战争完全变成反侵略阵线对侵略阵线的决斗，世界真正和平庶几可期，英美的权益庶几可保！

(6月23日)

原载1941年7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3期



## 本多与汪逆的魔舞

近日来东京方面不但外交界有了活跃气象，却连南京的狗东西(汪逆一批人)及其干爸爸本多，也都在二重桥、霞关与三宅坂的三角地，大献其魔舞的身手了。

日本强盗想用军事征服中国先告大败，继用政治进攻造谣诱和，又为我抗战政府所粉碎，不得已而考虑其最下乘的办法，这就是支持汪逆精卫，变抗战为内战，运用“以华制华”的阴谋，企图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目前这一场猴子戏的导演者，就是南京伪府太上皇帝的本多伪大使。

南北伪组织的背后皆有派别不同的日军势力支持者；没有这些势力南北伪府皆不得动弹，所以汪逆就拜本多为干爸爸，今日在他“益感日方对之过于轻视”(汪逆的叹语)走头无路的时候，自然央托这位干爸爸向东京的主子疏通，俾得多加青眼。本多此次东行关系汪逆的狗运至为密切，所以在本多行前，汪逆曾经一再哭诉：“还都一年以来，毫无成绩，实由日方态度模棱两可，而权又多操于日本人之手，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苦”。汪逆的处境实可怜亦可鄙了。

然而本多抵达东京初期，虽曾大肆活动但却调高和寡，肯鉴赏者尚属寥寥无几。本多离宁时曾与畑俊六、板垣及金泽等密商数度，抵倭都又极力奔走于陆海外藏各相的门下，并草呈《对华意见书》，企图折衷于亲德意派与亲英美派之间，为解决中日战争的最后决定，而着重点则在于加强南京伪府以为解决“事变”的根本办法。但是倭都各界起初并不重视，所以《东京中外商业新闻》5月11日著社评《本多所谈与事变处理》，对本多予以冷讽热刺。第一个着眼之点是：纵扶植伪府亦不足有为，称：“依本多之意见，惟有助‘新国民政府’之育成强化……但就近者而论，‘新国府’果能期待某种成就乎？揆诸眼前事实，虽予以全面之支持，然渝方抗战态度依然一贯，则‘新政府’之势力不能急速伸张，实彰彰明甚”。因此，汪逆虽一再央托本多献媚日方当局，而本多来电却婉言拒绝，逼得汪逆坦白对日方表示前途维艰，准备下野(?)，向其主子大撒其娇。最后日方召汪逆赴东京一行。汪逆受宠若惊，莫怪其见及主子面时“眼眶湿润”(据日方广播)。

日方召汪逆入京用意，一面是对汪记猴戏班施展其玩弄，我们可以联想一下斯大林对松冈之玩弄，一面对我抗战政府眩其外交手势，意存要求我中央与之直接谈判，或央托第三国出头调停，日寇仍未忘情于“东方慕尼黑”的局面。因此17日晨汪逆一行抵东京时，欢迎盛况竟为“历来赴日外宾所未曾有”(日方消息)，闻首相、外相、藏相、陆海相、以及高级官员百余人均到车站欢迎；往伪大使馆访汪

者竟络绎不绝，致汪逆几乎无休息机会。这种热闹场面，使我们联想到近卫初见汪逆时的感言，谓其秀色可餐，其手又白又嫩，直如女子。近卫去年替汪记猴戏班所作宣传，招徕这次络绎不绝的顾客，日本鬼子究竟好奇，瞻仰瞻仰汪逆的秀色，摸摸他的嫩手罢了。

另一方面，日寇见美德关系之恶化，认为国际投机的机会又将来临，但是绊脚石的“中国事件”必须结束，而逼降诱和又皆为我国政府所不理，因此再度玩弄汪猴，诱惑我政府与其言和。预料我政府严拒之后，日寇仍将继续配合军事进攻，以求一逞，当然不能达到目的。然据外报消息，谓汪逆此次赴日主要目的，当系要求日方予以统治华北及沦陷各省的全权。这点目的也不能达到，因为华北傀儡的后台也不会示弱，实质上汪逆仍将局限于更小的范围内；日方的支持是否加强，仍视国际转变为断。

日寇在不能完全征服我国的苦闷中，或者可能企图改变战争的性质，利用汪逆掀起内战，缩小范围以节省它的军力和财力，准备伺机南进或北进，以汪逆伪府排演第二“满州国”的角色。但是这种办法依旧没有解决“事件”，日军后退一步我们反攻一步，战争依旧继续，这种结果当然为日本财界与稳健派所反对，汪逆的幻梦，必无结果。汪逆离开日军将成丧家之犬，随地为人所驱逐，只是促进我们的胜利罢了。

汪逆已在沐猴而冠，居然在敌人指挥监督下编练军队，外传他竟号称五十万，这当然是无耻的欺骗。日寇则欲

利用伪军做挡箭牌,汪逆竟愿为所愚,驱同胞以为炮灰。汪逆还组什么清乡委员会实行扫荡我们的抗日同胞,以助成敌人的毒计,汪逆实该碎尸万段,以谢国人。马彦祥先生编导国贼汪精卫曾比譬汪逆为狗,郭沫若先生则曰“狗若能言将提出抗议”,意谓汪逆实连狗不如也。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应该更加坚决团结努力征伐这个国贼,粉碎日寇的阴谋。我们更希望国际真正友人,更积极帮助我们拖住日本泥脚并使溶化在中国战场上,以恢复远东的真正和平而阻止太平洋的战祸。

原载《战时日本》1941年7月第5卷第3期

## 欢迎拉铁摩尔先生

拉铁摩尔先生19日清晨抵达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拉氏来华消息受人注重之深刻及抵渝时各界情绪之欢腾,可说是罕有前例的,这表现着拉氏和中国关系的密切及其来华任务之重大。

我们不但以美国的客卿、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欢迎拉铁摩尔先生,我们尤以中国同胞的情绪欢迎拉氏回这“第一故乡”的中国。中国被日本强盗蹂躏已经4年有余,四万万五千万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英美各国的利权且已荡尽无余,拉氏这次回来当有格外的感触。我们相信:拉氏必能促进中美邦交敦劝美国更积极援华制日,协助中国,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境外,恢复太平洋的真正和平。

拉铁摩尔先生是远东问题的专家,我们常拜读过先生的大作,对于远东问题确有深湛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对于中国的了解和信念,使我们中国人读后自觉惭愧,痛感:即在认识上还需要十百倍的努力。先生自军事政治及经济各方面分析中日战局,告诉我们: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日

本虽然占领了我们广大的地区，但却不能运用我们的人力，也就不能使地力及物力发生作用。日寇的大炮轰不尽占领区二万万中国人民，而这些人民却为着保卫家乡及自己的利益而自动奋起，永久在抵抗日本强盗。这伟大的力量困死日寇，使其进退维谷，战争泥脚终必腐烂在中国战场上。

我们诚恳接受先生这种启示，我们愿意并且必须加强内部的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我们要抗战，更要建政、建军、建国、建设经济、建设社会，使大后方变成人民的乐土，使人民知政乐业，为民族而奋斗，为民主而努力，为民生而效命，以建设独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然而日寇今日野心更大，阴谋更险，它已不仅要吞并中国，并且要囊括整个亚洲，乃至征服全世界。最近勾结德意暴徒愈益露骨，他要乘英美及苏联有事于欧洲而夺取太平洋各地及苏联的亚洲领土，日寇的目标在于驱逐英国出地中海以西，美国出夏威夷以东，苏联退出亚洲的地域。根据德日最近的侵略计划，德国要建设日耳曼本位的欧洲联邦，日本则欲建设大和本位的亚洲联邦，而以美洲及非洲为其附庸。德国纳粹独霸欧洲的行动，已经硬干蛮干，毒计必露；日本强盗在太平洋的行动，则尚欲软硬并施，明枪暗箭齐用。这虽是“侵略罪恶发明家”的惯技，但是有些国家却常于无意中上了当。

今日世界情势已经十分明朗，德意日发动着世界性的侵略，而以中苏英美为其主要对象。中苏英美任何一国被

侵害,其他三国亦受其影响。中苏英美四大强国已处于共同的命运之下,同时也唯有这四大强国联合,才可以抵抗世界侵略者。中苏两国正在德日猛烈侵吞之下英勇抵抗,——这不仅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土,同时也就是维护英美及其他弱小国家。中苏的抵抗万一失败,英美的存立,即刻遭受威胁。故谓“中苏今日的危机也即英美两大国的危机,”其他弱小国家更无论矣。中苏之被侵略,英美不应坐山观望。英国已与苏联约定对德抗战到底;美国对中国更应加强援助。中苏英美四大国应即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

日本新外相登台后一再声明:“日本今后的外交政策,仍将以三国协定为依归”,今日又强制维琪政府允其占领越南战略根据地与机场,加一层对英美的威胁,纳粹更在中南美施其挑拨推翻的阴谋,其必欲贯彻侵略计划,是可想见的,但是他们还可能发动政治阴谋,日寇在大规模准备未完成以前,还有向英美献其“媚态”的可能,它想藉以缓和英美而攫取南洋的战争资源。德国也因侵苏军事受阻,又恐英美加攻其背,故特散出谰言,称:“如英国必欲继续战争,结果则将出现一布尔什维克之欧洲,真正之战争乃在东线。德国随时准备提出合理之和平条件。”(德国发言人22日讲话)。这是双簧,又是烟幕,反侵略阵线的国家,绝不能再上它们的勾当。

然要中苏英美结成巩固的反侵略阵线,必须英美先决心制抑世界侵略者,英美今日最低限度,须由西线夹攻德

意,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封存在美资金,断绝商品市场及一切战争资源(包括南洋)绝不能再事姑息观望了。

我们相信:拉铁摩尔先生来华,必能协助我国更有力的抗战,也必能促成合理的国际协作,特别是中美的协力。太平洋真正和平,全世界文明及正义,实赖世界有识人士的努力和促进。

(7月25日)

原载1941年8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4期



## 中苏英美的共运与协力

自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协定对苏不宣而战以来，欧战的性质起了一大变化，世界政治与世界战局也为之明朗化，确定化。现阶段的战争完全变成了反侵略国家对侵略国家，世界民主国对世界法西斯的战斗，总言之，世界性的集团战争形势已渐明显。

这种世界性的集团战争的征象早已存在，只因为有些堕性的国家不肯确认，或因规避现实而极力曲解事势，遂致放任坐大了世界强盗而酿成今日洪水横溢猛兽猖行的局势。往者不咎，来者可追，为今之计，凡是世界的民主国家应赶快团结协力阻止这个侵略浪头的扩大，否则世界民主国有被法西斯猛兽逐渐侵略个个吞噬的危险。20世纪50年代可说是世界民主国对法西斯猛兽实行决斗的时代，人类文明与社会进化能否存续，也完全决定于这次的斗争。

## 一、侵略罪恶的发明家

世界人士往往注意事情的结果而忽略其起因，大家只看见德国侵略的可怕，却不明察德国侵略以前已有模范存在，日本强盗在远东的劫夺，才是侵略罪恶的发明家。日本强盗的侵略，对于德意，不但是个示范，并且是个有联贯性的起点。

正如英国人拉敦先生所言，远东的法西斯强盗日本，自九·一八开始即一连串地，“事前未经宣战而突然进兵，而犹名之曰和平，明为友善而暗作敌对之准备，煽动邻邦之纷扰，以造成武装干涉之藉口，而犹曰恢复秩序，占领他国之领土，而自称无领土野心，设立傀儡政府与之发生关系”（最近上海《字林西报》所载）。这是侵略罪恶的示范，同时又是勾结世界侵略同道的起点。

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1931年）不久，即以东北的大豆换德国的大炮，竭力勾引德国。1936年德国乃派遣远东经济考察团赴日本、伪满及中国各地考察，5月1日遂有德伪缔结“商务协定”出现，德国的飞机，大炮，及机器等物，源源输入伪满转往日本。日寇就是利用我东北的富源为钓饵，极力拉拢德国。当时希特勒还发欺骗之言，谓系技术合作。但自1936年11月25日德日在柏林签订“防共协定”以后，两国勾结的政治意义逐渐暴露，德国此举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因为日本强盗侵华，始终借用“防共”的名

义以为掩饰。同时,另一个法西斯伙伴意大利更在长春设置总领事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我全面侵略,而欧亚强盗的勾结更臻密切。该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德日防共协定”,29日正式承认伪满,长春的总领事馆改为公使馆。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也剥去假面具,公开演说,不但承认伪满并且侮辱中国的神圣抗战而祝望日本征服中国,竟称:“余相信日本败绩徒利于苏联,欧洲其他各国毫无益处可言。日本若大胜,其所加于世界文明之危机,远较布尔什维克派大胜后所加于世界文明者为小,”真是丧心病狂。同年5月12日德国又正式承认伪满,签订“德满修好条约”,7月5日伪满又与意大利订立“意日满贸易协定”,用东北的大豆换取意大利的汽车、石油、水银、及铅等军需原料。德意更于最近率先承认我国人共弃的汪逆伪政权,无异于向我国挑战。

另一方面,东方的强盗也支持德意的侵略,首先是1936年11月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改驻阿京的公使馆为领事馆。其次就是承认德国侵略所得的赃物,奥地利及捷克,并承认德意法西斯扶植成功的西班牙叛军的佛郎哥政府。1938年春希特勒利用当时英法苟安的堕性不血刃而吞并了奥地利,3月13日公布了所谓德奥合并新联邦宪法,日本于15日接到正式通告后即便撤消驻奥公使,从事实上承认德国的侵略事实。1939年3月德国又以“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捷克,收为保护国,日本又即召回驻捷公使。对

于西班牙佛朗哥政府，日本也追随德意早于1937年12月正式予以承认，并介绍伪满驻日大使与佛朗哥政府代表，交换公文，正式交换承认。

日寇借“防共”的面目一面勾结德意，一面强拉他们淫威所至的国家及地方加入“防共协定”在东方强制伪满，在欧洲则拉匈牙利、波兰、西班牙先后加入。它们的阴谋第一步都是以思想联盟表演的，1939年2月20至23日，在日内瓦举行一个“国际反共展览会”，日本强盗更大吹大擂，由内阁情报部，反共联盟，及大日本防共同志会搜集资料，出品展览（以上皆据拙著《日本战时外交内幕》）。

德意日三强盗的勾结，至1939年秋几乎演成三国军事同盟，该年7月上旬德国在纽伦堡召开纳粹党大会，日本派遣陆海军及财界实业界代表团访问德意，用意即在于此军盟之缔结。后虽因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之实现而三国军事同盟暂时搁置，但必定到来的日子终必到来，德意日军事同盟终于去年秋完全实现了。

自1931年日寇占我东北以后，世界不分东西遂至一日多事一日，侵略抢夺之风日益加炽，整个世界退回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日本强盗实是侵略罪恶的发明家。德意日三强盗既可以共谋侵略中国及欧洲的小国，自然也就就会共谋侵略英美法苏等大国。可惜当时各国政府及人士宥于政治的堕性未能深刻觉察，或竟熟视无睹，迨至最近英美勇敢的论客，始从正面揭露，承认：“倘我人能于1932年时即予中国以援助，则吾人不致目睹希特勒主义之崛起于德国，

也不致目睹战争之先后扩大及非洲与欧洲。今日欧洲二暴徒所采取之每一行动与方式,事实上皆由亚洲之日本首创其例”(上海《字林西报》英人拉敦之言),真是一针见血的警句。拉敦之名言“凡此种种罪恶,日本可称得最早之发明家”,已为今日中外人士所演绎,昨日我国抗战四周年纪念日,英美各地报纸,皆从此点发挥国际反侵略的主张,侵略罪恶的发明家,已成世界舆论抨击的共同对象了。

## 二、瓜分世界的计划者

日寇是侵略罪恶的发明家,但是称瓜分世界的能手却要推崇希特勒。希特勒自1934年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大权以来即蓄意增强日耳曼民族以便征服世界,其联结意日瓜分世界的阴谋至“希特勒第二次计划”已渐暴露而具体化。这个计划泄露于1939年3月间,充发刺激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政界的神经。希特勒第二次计划详细内容虽不得而知,但据伦敦《新闻记录报》当时所揭露的,其内容,约有三个要点:

(一)希特勒此后还要公开提出要求的对象,已不独限于东欧,范围已普遍于整个欧洲,甚至于涉及非洲;

(二)德国的侵略对象已不能限于欧洲诸小国,它已显明要侵犯英法的领土;

(三)希特勒不但为自己计划,并且直接要为他的帮凶意大利打算间接则为日本壮胆,以为三国瓜分世界的张本。

略加申论,则可以说这个“第二次计划”显明表露希特勒侵略是无止境的。希特勒第一步并了奥地利,割了捷克一部分领土,在英法当局尚错觉为日耳曼民族的自决,但曾几何时德国又连续并了整个捷克,侵犯罗马尼亚,得寸进尺没有停止。纳粹东征十字军早已发动,只是英法当时满以为纳粹只要东征不会西伐,殊不知1939年9月竟反戈西向,主要的与英法干戈相见,不两年间灭亡欧洲的大小国家计有法国、捷克、波兰、南斯拉夫、挪威、比利时、丹麦、荷兰、希腊、芬兰等十六国。英国在英勇抵抗下,只保持一个偏安的局面。现在又向苏联进攻了,纳粹的野心非至征服全世界不止。

但是德国在其羽毛未丰的时候,常引意日两凶为帮手,故在希特勒第二次计划中极力替墨索里尼向英法讨价,要求英法不干涉意大利在东欧的横行。另一方面还为东方强盗的日寇撑腰,对于西班牙问题也公开以武力干涉。德意日在柏林开军事外交联席会议不久,德国即命令意大利极力帮助佛郎哥军队进逼法国边境,东方的侵略者也同时占领了海南岛。希特勒还要求日本在太平洋上牵制英国,并进出北满及北洋威胁苏联。

希特勒勾结远东强盗企图瓜分世界的阴谋,至去年9月德意日军事同盟的成立,更为具体暴露无余。这个三国同盟是在希特勒“英雄”的计划下成立的,其保证彼此在军事政治及经济上互相援助,还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德日原则上承认欧亚的分割,“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

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该盟约第二条),日本也同样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显然是默契瓜分世界。

希特勒英雄主义的计划规定了原则,而东方的强盗则跟着下注释,近来日方什么“世界三分论”,“世界四分论”,什么“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是什么“小共荣圈”,“大共荣圈”,闹得乌烟瘴气。最近日方这种注释,随着希特勒势力压倒欧洲,即意大利也自事实上成了它的附庸的发展,又提出德日平分世界的主张。日寇外务省机关报《广知时报》4月30日突向世界提出一个“和平条件”,这是代表日本战时实际支配者军部行动派的意见的。

就此和平提案的内容缕分申论,则第一,规定德国的统治区域为(一)英国海军退出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由英国与轴心国共管;(二)北非洲自直布罗陀以至索马利兰之区域,应由轴心国处分;(三)南非联邦取得完全独立,非洲其余英国殖民地交由轴心国管理;(四)欧洲大陆于德国控制之下成立合众国,各份子之政治合作须以柏林之意见为根据。第二,日寇的统治区域规定为(一)除已得领土及它所认为已归控制的中国领土未提及者外,还有(二)太平洋方面,美国势力不得逾越夏威夷,(三)美国还须允许日寇势力侵入中南美洲,(四)太平洋各岛建立共管区域,推行合理之合作,并须聘用日本顾问(实是太上统治者),(五)苏联解除西伯里亚及海参威的武装,(六)欧洲合众国的东南边境及范围尚待未来解决,实际含义是由德日共同处分近

东领土,(七)言外之意,日寇又应占领英国的全部亚洲殖民地。第三,留下来未明言分割的部分是(一)美国局限于北美,若干部分还须让与加拿大;(二)苏联不但须解除西伯利亚及海参威的武装,欧洲部分还须归入轴心本位的欧洲合众国,(三)英国完全孤悬于三岛,加拿大还要让它独立,(四)意大利实际附庸于德国。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遗留的小部分区域,随德日势力的膨胀,还须逐渐削缩,以至全归德日两帝国分别统治。

这是日寇如意算盘的计划,又是希特勒分割世界的注解,真是好一个“超民族”(意人樊士白之语)与“英雄民族”(希特勒自吹)的超等勾结。“英雄民族”的纳粹强盗现又伸出更血腥的爪牙,将纳粹十字军向东猛烈推进了。“超民族”的大和魂,将更蠢动,魔跳,是不难想象到的。

### 三、中苏英美的共运与协力

远东的法西斯强盗自九·一八以来,毒害中国人民践踏中国领土已将10年,希特勒铁蹄在欧洲之狂暴驰骋,为期虽未如是之长,但其毒害程度则有过之无不及;二者的强盗行为不但相同,并且有密切的联结,处处皆以中苏英美为第一对象。中苏英美及其他国家之被侵略,虽有前后缓急之差,但在命运上却是一致的,可说是成败相共休戚相关的。例如日寇之侵略中国,不只是侵害英美法各国在华权益而已,日本亲军派政客中野正刚已明说“这回日本



对华战争,不过欲从中国除去其抗日之瘤而已。所谓瘤者即英苏法所培养的中国抗日势力是,……日本苟能扫清抗日毒素培养者英苏法诸势力于极东天地之外则心愿始得满足”。日人骂英苏法为“覆面魔王”,为“非公开的日本敌人”。日本仇视英苏法,固无论矣,事势演变至第二次欧战爆发以后,因美国出而主持正义更诬骂美国为英法的“远东看门犬”,攻击的炮火集中到美国身上,其后一切计划皆以如何把美国赶出夏威夷以西为目标。欧洲法西斯暴徒的德国,更因为美国援英而仇恨美国甚于敌对国家。实则世界三强盗的阴谋,早已浸透及于中南美洲,威胁了美国的存在了。即自最近情势言,若无中国英勇抗战,日寇早就发动军事南进,夺取英美的殖民地,直逼美国本土——这已是英美人士所公开承认的了。

现在苏联已与中国一样,英勇抵抗着疯狂的纳粹东征十字军了。这又与中国抵抗日寇一样,不只为着自己并且为着保卫世界和平及人类文明,更确切言之,实也是为着一切被世界法西斯强盗所侵略或将被侵略的国家及民族的福利,其与中国及英美的关系尤其密切。德国法西斯如果征服了苏联,则可旋踵而跨海西平英国三岛,南下与日本强盗会师于印度洋。日本强盗若能眼见纳粹侥幸在苏联西线胜利,则必由东线发动,夹攻苏联,但是这不只是对苏联的侵害,同时也就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为苏联海滨省是与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在西部美国的军事未完成的今日,威胁尤甚大。另一方面倘若日寇从东方进攻苏联成功,

则日本海上的地位稳固而日本的大陆政策完成大半。

同时,若无中国英勇抗战拖住日寇后腿,它也可以马上北进,苏联两面受攻,为害更大;英美能切实援助苏联则纳粹不得逞,能充分援华制日则日寇立可就范。

不管中苏英美当事国,愿意与不愿意,今日的国际情势已把中苏英美及其他的被侵略国家,置于同一命运之下。诚如英首相邱吉尔指摘希特勒侵苏所言:

“彼之侵略苏联,仅为企图进侵英国之先声而已。彼希望于冬季来临之前,完成其征服苏联之计划,诚无疑义,如此则彼亦即可击溃英国矣。彼亦希望重施故技,将其敌人一一击破,然后彼乃可从容进行其渴望之征服西半球计划,故苏联之危难,即吾人之危难,亦即美国之危难”(6月22日广播演说)。

吾人站在中国的立场,应该再补充一句:“苏联的危难,也即中国的危难;中苏的危难,亦即英美的危难”。自我对日发动全面抗战以来,苏联即已不断援助我们,并在精神上一再申论其“有原则性”的外交政策赞助我们抗战,这一些过去的事实即姑不赘论,但只就此后我国抗战与苏联胜败及英美得失的关联着想笔者所提之警句,也自有充分的根据。一言以蔽之,日寇之欲灭亡我民族与国家,更急于灭亡苏联,即今日寇应希特勒之强烈要求,整军北进,其作

用也不过是先侵苏而后灭华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中国这块肥肉在日寇是绝对不会忘情的,除非我们能靠自力更生,运用有利的外交情势驱逐日寇出国境,日寇绝不会因为别种原因放过中国。日寇若灭亡中国不久即可强制亚洲十二亿人,协助德国纳粹进攻盎克鲁萨克逊民族两大国,前途实不堪设想。

中苏英美的命运既是一致的,则在反侵略反世界法西斯之点,自非大家协力共同奋斗不可了。

第一,中苏英美的协力,目前应先根据太平洋集团安全制的原则,成立一个四国的经常组织,结成四国军事政治及经济同盟。中苏英美都是民主国家,同时也是都被法西斯国家侵略或威胁的国家,四国都同样站在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立场,四国之中有一国被损害,其他三国皆要受到影响。因此,四国结成联合阵线,以反抗世界侵略集团法西斯阵线,也是非常必要而自然的。反侵略阵线对侵略阵线,民主阵营对法西斯阵营,是20世纪50年代的斗争方式。

第二,暂被侵略者放松的英美两国,不能只在消极意义上“休养”而让中苏两国去苦撑。固然英国可以利用此机会喘口气,美国也得多加充分准备,但却不能上希特勒的当,应如邱吉尔所警觉:“如希特勒以为其进击苏联一举,即可使具有作战决心之民主国家目光为之稍事转移,其作战力量,亦为之松懈,则诚一大错误”。英美最好赶快参加战争,英国自西线反攻德国,使其备偿两面作战之苦,美国自阿拉斯加策应苏联远东军夹攻日寇本土,以收早速制服

日寇之效。最低限度,英美也应积极援助中苏,压迫德意日,使他们遇到更大的困扰。英美决不能坐山观斗,坐大了德意日强盗。

第三,中苏两国应决心坚持抗战到底。中国抗战已满四年,胜利已在眼前,自然不会功亏一篑,但如有一部分人心存侥幸,只希望别个国家和日寇开仗而我们静观变化,等待“熟柿”到嘴,似不妥当。尤其如一般人幻想着日寇自动撤退,如近日谣传日军放弃宜昌之说,特别危险,我们只能多靠自力更生,建军建政,驱逐日寇出境。苏联方面也须坚持抗战到底;闻已决定“空室清野”政策,发动游击队包抄德军后路,其必能长期抵抗,已可具见,苏联能持久战则希特勒将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无疑。

世界人士都已承认;中苏两国现在是维护人类文明,保卫世界正义及民主主义而与德日暴徒撑着生死。如果英美不能共同奋斗不加积极援助,则中苏万一失败,世界文明将必倒退三百年。英美过去的姑息政策养大了世界侵略者,今日的明眼人士已皆觉察此点并已公开批评当时英美当局处置之不当。英国方面有上述拉敦氏之作,美国方面最近更有纽约时报的批评。后者之责勉美国政府尤为具体,其言有曰:

“中日战争乃历史上最重大战争之一,亦为强暴者普遍袭击自由之前奏,美国因于1931年之沈阳事变及1937年北平事件时,未能取坚决步骤,致

今日不得不令150万人民武装，不得不以工业养战，并使政府之支出与税收皆形增涨。……德苏两国陆军正对峙于俄境之平原，英国亦遭受战争之苦痛，美国则似尚未感到其本身之重大危机……”  
(本年七·七纪念日社评)。

但我相信美国当局的警觉性必相当高度，必不会再对世界侵略暴徒，施用姑息主义。英美两国现应深刻警惕侵略者仍旧采用着“个个击破逐步侵略”(蒋委员长名言)的惯技，英美即可苟安于今日，也不能幸免大祸于将来。愿英美人士多加劝进督促，使得结成坚固的太平洋反侵略阵线，领导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奋斗，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和平及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1941年7月13日)

原载1941年8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4期

## 正义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

一个月来太平洋的局势最为混沌，一方面敌对的国家彼此皆积极准备战争，颇有剑拔弩张之势，另一方面各国外交官又在繁密接触，因循姑息、妥协，和平的大门，又似未关闭。其中尤以美日间的关系特别复杂离奇、莫测高深。有些权威的政论家说美国对日本是先礼后兵，但自昨日以来却又在警告罗斯福总统了。我们对于英美态度的因循姑息，始终不敢太放心，对于东方慕尼黑的局面，始终存着戒心。因此，我们对于环境的变化保持客观的心境，始终希望以“抗战必胜”的信念与“自力更生”的决心，争取最后的胜利。英明的领袖指示我们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就是这个大道理。对于目前的情势，委员长又向国内外昭告：“在远东乃至世界永久的与正义的和平未获切实保障以前，中国必继续喋血抗战，决不畏避继续牺牲。同时，余每期望并且相信，在中国喋血抗战期中，美国及其他友邦对日的经济制裁，今后只有加强，决不松弛，这应该是太平洋上反侵略国家的精神盟约”（见委员长对合众社记者谈话）。

我们要强调一点：4亿5千万同胞应该忠诚拥护委员长的主张，争取“正义的和平”。这里愿略加申论。人类本性出于“博爱”，且应博爱，是国父中山先生指示我们的不朽的伦理指示，所以我们当然也在企求着“和平”，但在今日蛮横侵略者抢掠、屠杀、侵占的情形下，我们却非争取“正义”的和平不可。日本帝国主义者数年来的强盗行为，是违反“正义”的，非正义的横行须先打倒而后正义的和平始可以建立。但欲打倒非正义的横行，又非运用正义的武装与力量不可。我国四年余来反侵略的斗争，就是这种武装和力量。

正义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是可以划一个等号的。日本强盗一向仗用它的军力和大炮，侵并邻邦的领土，剥夺他国的主权，破坏世界的和平。这固然蹂躏了“正义”，为世界所共弃，但要拥护这正义的完整，绝对不是用口舌，用外交所能达到的目的，必须以武力答复武力。四年余来，日寇侵占我们广大的领土，宰杀我们无数的同胞，同时摧毁了英美各国在华乃至太平洋的权益，要阻止这种事势的进展，恢复正义，必须反侵略的一切主体，协力制裁压抑这个猖獗不肆的日本强盗，我国要收复领土与主权，更必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因此，我们所争取的也应该是“胜利的和平”。

然而胜利的和平——正义的和平，与东方慕尼黑的局面，是水火不相容的。东方慕尼黑的局面是现在日本强盗所求之不得的前途。因为日本目前最苦闷的是“中国事件”不得解决，致使年来不少阵“神风”皆无法利用，徒然瞪着眼睛放它过去。其结果又急得日本的盟兄，纳粹德国，不能如意

运用其征服欧洲,乃至世界的战略。纳粹德国最近的政略,乃不得不花样翻新,设法安定日本在太平洋的脚步,然后逼迫日本助彼夹攻苏联,回头再共同收拾英美,以完成其德日分治世界的阴谋。纳粹德国的策略是先牵住美国,所以一反以前阻止美国参战的政略而反处处对美挑衅,使美国依旧置重心于大西洋而于太平洋上对日本让步,打破英美分离轴心的政策。美国若果上了德国的当,看重大西洋而忽略太平洋,则东方慕尼黑的局势,或将不幸而实现。这不但是中国抗战之祸,同时也不是美国百年之福。

委员长郑重敬告美国说得好:“九·一八以来,日本政府时软时硬,在外交上有很多狡猾的行为,中国政府与美国当局均有不少苦痛的经验,我相信我友邦的政府,决不至再蹈以往的覆辙”(同上谈话)。欧洲慕尼黑坐大了德国,东方慕尼黑更将养大了日本强盗,美国的绥靖政策即令得售,罗斯福总统未来的后悔,必比张伯伦的后悔。还要大出数倍。英明的政治家必不愿在他的政治史上留下一个黑点。

我们再对国内外强调一句话:我们所企的是永久的和平,正义的和平,胜利的和平。日寇必须退出所有的占领区,始可以言和平的谈判。

原载1941年9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5期



## 福建新政与抗战建国

福建在抗战建国上的重要，是尽人皆知的；但是福建政治之被忽略，却又不可讳言。以前各任省政府，固亦皆努力于治国，但其有未尽善之处，吾人也不敢否认。一向闽人皆忠厚，守法服命，无时不引领企望福建政治更加进步，国防地位更为提高，人民生活更是舒适而乐业。因此，每逢一位新主席之更迭，吾人皆寄莫大的希望，对于这次刘建绪将军荣任福建省主席，更不能例外，同时，吾人更以热烈的乡情欢迎张秘书长开珪先生返治故乡。

兹就其主要者略抒鄙见。第一、刘主席对于国际情势深有研究，当能发挥福建地理上特有的功能。福建与日寇南进据点的台湾相隔一衣带水，而民族的历史联系更为密切，现当太平洋风云紧急之际，能以集团军司令而实握政权，将来当能于ABCD联合作战，建立伟大功勋。刘将军主闽府令发表不几天，日寇即退出福州，固与国际有关，但刘将军军威凜然亦深有以致之。福州通海口联重庆，其重要性更大。第二、福建为我国东部一屏障，旧时海军发源地，

无论在消极的防卫上，抑在积极的进取上，地位皆极重要，刘将军深悉福建的战略价值，自必能充分予以发挥，张秘书长更能以家乡关系，发动民众力量，保卫家乡争取胜利。

第三、福建为边陲省份，北洋政府时代远离首都，故其政治常为中央所忽略，即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也以集中全力先建设华中各省而福建建设又难免有所疏忽。迨抗战军兴以来，福建地位虽增高，而其建军建政，乃至社会各方面的兴革，却跟不上战时的急切需要，地方就难免有局促不安，上下枘凿的现象了。闻刘主席深悉福建年来的内情，张秘书长更明了家乡的隐痛，此后，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应革应兴，当必焕然一新。

第四、福建与华侨关系最为密切，在一千五六百万侨胞之中，福建人占十分之六七，其对海外的影响力量，更有过之。华侨对于抗战建国的奉献，既不容疏忽，则侨胞重要家乡的福建的施政，自不许轻视。就消极言，务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然后为国效命。就积极言，福建的特种产业，交通事业，物产交易，以及国际金融网的建设，等等，皆有利于新政的大加兴革。万般建设兴，则仓廩实，金库满，然后人民可知礼乐，长安久治乃不成问题。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关怀乡情，最注意此点，福建的建设事业有赖于侨胞的赞助，所以福建新政更须注重此点。

第五、福建的教育文化一向比较落后，民国以来此种趋向更为显著。其间虽有单科大学之设，侨领如陈嘉庚先生也曾捐资创办厦门大学及集美中学等学校，但仍不够好学生的需要，所以许多学生常远道负笈于上海、南京、以至北

平。基本教育单位的中学及小学,不但质坏,量更不够,这是国民教育的绝大危机,也是文化进步的绝对阻碍,福建新政也应多加注重。第六、欲建军,建政,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最主要的动力还在于“人材”的适当运用,采用人材的原则本不分本省与外地,一以适当为标准,但政治之要决在“明治”,先明地方情形而后治,而明地方情形者莫如本地人,且人各有父老兄弟,谁不特别关怀家乡,所以采用适当的本省人材,亦不失为用人的第一要则。闻刘主席决定尽先采用本省人,我们闻之,至深欣慰,但能于本省人的原则之外,再加严格抉择,适材适用,则福建新政之大举,定可拭目以待。

笔者以本社与福建省人特别是海外侨胞,具有密切关系,值兹福建新政开始之日,特就注意所及,屡述一二,以供省府当局参考。福建新政施設苟能如乡人所企望,则不但政治可上轨道,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且民可足食,省可足兵,日本侵略者亦自望风披靡,抗战与建国于此成功了。

(写于欢送张秘书长之日)

原载1941年9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5期

## 读丘吉尔首相的演说

英首相丘吉尔12月26日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富有深湛意义，今日中国所处地位正与英国相同，而中美关系也与英美关系类似，我们的感慨更为无量。

英国抗德意逾2年而有最后胜利的坚决自信，我们单独抗日已过4年有半，我们最后胜利的自信更坚如钢铁。丘氏慨乎言之：“进攻吾人之力量，至为巨大，彼等凶恶而残忍，向战争及征服之途迈进之暴徒及其喽啰，自知彼等苟不能用武力征服其所进攻之人民，则自己即将遭遇可怕之结局。彼等舍征服其所进攻之人民外，无他途可取，彼等拥有大批各种武器，彼等之海陆空三军，受有精锐之训练，彼等有计划、有策谋，而此项计划与策谋，则早已经完成而试用矣。凡暴力与诡诈之行动，彼等必行之不停。……故吾人不怀疑未来之苦痛时期，一部分土地将行沉沦且必须以重大代价，始能收复。”这是为中国四年半写实。他又说：“余能为诸君证明吾人如有适当武器与组织，即能击退野蛮之纳粹”，我们也可以向世界各国尤其东方各民族证明：“我

们如得适当的武器与技术,即可于短期内打倒人类罪恶发明家的日本帝国主义”。

日寇自其踏出资本主义的第一步即将全部国民的时间用于军国主义的修练上,以侵略战争为其国民最高的任务,乃木大将常以手枪描其幼子之额,不准稍有畏缩,已传为中外的丑谈,今日首受其毒害者已不独是中国的人民与乎英美各国的权益,英美国家的存立,也都受到直接的威胁。如果东方特别是中国酷爱和平的这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不能健在,则英美存立的屏障,也必尽废。日本侵略家池崎忠孝已公开指出:英美因为远隔重洋,故不能奈何日本。他夸张蒙古帝国东征失败的历史事实,但却不敢说日本海会如太平洋或大西洋之辽阔(见拙译《美日战争论》)。能推翻日本军阀,为英美除帮凶之害者只有中国。其意已明若观火。中国可说是反世界侵略的一员主将。

然而世界反侵略阵营,要中国这员主将完成东方的重大任务,还有待于英美以诚相见,切实作武器与技术之援助。中国可以马上实行总反攻,也可以直航轰炸日本本土,更可以出全力抄日军之背,夹攻在南太平洋上作威作福的日陆空军,但是缺欠军用物资,缺欠新式武器,缺欠炸弹,更缺欠速度的飞机。英美能在武器及物资上,切实援助我们,我们马上可以负起同盟的责任,而于此时期内解太平洋各地之围,使英美更从容作长期间的准备。英美今日应有最大的决心,使东方被侵略民族皆有与英美共存共荣的

机会。

英美对中国的援助，曾经有过某程度的踌躇与畏缩，但是日本强盗终于打到英美的大门，中国却执干戈保卫英美了。今日东方各民族之解放，已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存立，联在一起。即如日本革命民众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同样。美国曾经驱逐过日本革命人民，但是在美日人的行动纲领，却明白拥护美国为民主而斗争的指导原理。或谓英美有援助中国以军火无奈中国接受不了，如运输的问题。但这又要以积极与否为断，英美的技术和工具，尽可以解决这种困难。我们要再提邱氏一句话：“美国业已拔剑为自由而战，而不再保留其剑鞘”，我们也希望：美国援助为保卫英美利益而战的中国不再保留其存货。

同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借用丘氏一句话罢，中国“今日已较前强大，且其强大之程度，更逐月而异，然余认为最佳之消息，即团结已至前所未有之程度”。我们怎样才能接受这大时代的使命，仍有待于我们各方面主观的努力。

原载1942年1月《战时日本》第6卷第2期

## 英美战略上当务之急

英美以前的政略与战略是要引诱日本到南太平洋作主力战,使其远离本土军运给养皆感困难,并利用菲律宾及香港等据点切断其交通,集注重兵于马来、荷印、澳洲的坚固内海中,以长期消耗日本海军,然后予以消灭。在原则上这个战略是对的,但其基本要件是南太平洋每处基地上,都要有充分的兵力,足以抵御或扰乱日本侵略军,但自战争20天的今日看来,英美的这种准备并未充分,是不可讳言的了。日本军队居然可以占香港,侵菲岛,破坏夏威夷,且假泰国抚新加坡之背。军港虽好惜未集中强大的海军主力,战争爆发已三周,美国舰队未能赶到,英国也未能分大西洋舰队来援,情势不能说不危殆。

起初日本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欲以持久战困日本,现在日本也在努力争持久战的条件了。日本若能得新加坡、荷印、菲律宾等地,则其所缺乏的资源得到补偿,日本久战条件可以具备,但其弱点为劳师远征而本土相当空虚。英美此时应效法日本组航空敢死队破坏夏威夷以阻美

国舰队的战略,发动海空军进攻日本三岛,使已出动之日本海陆空军不得不驰援本国,未出动的军队不能再调。现在出动至太平洋的舰队是第二、四、五舰队各一部分,大部为巡洋舰,30,000吨级的次等战舰,其一等战舰的第一舰队(35,000吨级)尚全部留守日本沿海,特别是东京湾。英美如要震撼日本海陆军的斗志,必须直接进攻其本土击沉这一等主力舰始可。

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条路,是由阿拉斯加派空中堡垒直攻本州各地。这条路原来也可以运用海军由阿留申群岛,经千岛群岛直捣北海道及本州,但现在正当冬季,天气极恶劣的时候,尚不能用海军,美国只能积极准备,等候明年春夏两季进攻之用。阿拉斯加一带有现在的空军根据地,正可用以空袭日本本土。

比较捷近的方法,还是利用苏联堪察加的根据地及海参威、伯力等地为安全而敏捷。但这一战略须与政略配合,归结到底是美苏的外交问题,也就是民主阵线整个战略问题。相信今日苏联的疾视日本,不在美英之下,所不同者只是苏联过去四个月集全力抵抗世界第一陆军国家的德国,现在仍未可松息下来,自己目前尚无力量来充分运用这些根据地,但可在适当条件下让同盟国去利用。问题恐怕就只在(一)美苏怎样成立军事同盟(二)美国要有决心充分利用。这条路是日本致命之伤,美国应有十分觉悟始可。

进攻日本最捷快而有效的路线,还是由我中国出动。这方面可分两种攻法。第一,发动各战场一齐反攻,以收牵



制日本陆空军的大部分力量,救援太平洋各地被攻的英美据点。第二,发动神鹰部队先袭击中国战场上的日本据点,继再节节逼近沿海,终则齐向日本三岛飞袭。由此方面进攻,既可以解南太平洋各地之围,还可以收威胁日本本土之效。不过,要能发挥这一路的绝大威力,其前提条件是英美须用全力支持中国陆空军。中国为太平洋真正和平及英美权益抗日已四年又半,消耗了日本强盗不少力量,同时自己也消耗不资。中国要完成这一任务,正缺欠财力及军火,特别是军用飞机,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军火制造厂,现在为着保卫英美的自己立场也应早立此计谋。

太平洋局势确已相当紧急,英美应早作“釜底抽薪”之计,打其蛇头,其蛇身自可缩还。日本是“乌龟国”,官民皆崇拜乌龟,今日龟头已伸到南太平洋,ABCD民主集团,若设法把这个龟头牵住,然后再一刀两断,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一命呜呼哀哉!这是斩草除根的最上策。

(12月28日)

原载1942年1月《战时日本》第6卷第2期

# 论太平洋集体安全与中国的关系

## 一、太平洋集团安全的必要性

素称平稳的太平洋,现在已因日本无穷尽的野心及狂暴的侵略,掀起了洪涛巨浪,其所冲洗的国家及人民,皆于甜梦中惊醒,感受莫大的威胁。日寇前首相田中早倡征服世界之论,日寇军事参议官高桥最近又著文确定“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田中征服世界之论虽过于狂妄,而高桥之“大东亚新秩序”范围,则确为今日日本侵略者个人所企求。目前明确规定的范围虽只是南洋群岛,新近再加上澳洲,但日寇“将依照其国力及领域的需要逐步扩展”(高桥之言),不久或将宣言“大东亚新秩序”应包括整个太平洋,西及于非洲及近东某些国家,东及于中南美洲各国。这不是我们故作危言耸听,日寇苦心谋取中南美洲各国多年,其与阿比亚尼亚大谈其桃色的外交,在吾人脑际尚是新鲜的事实。总之,谁都不敢否认日寇无野心侵害太平洋沿岸所有的国家。

在这种国际现势下,太平洋各国的安全问题,已很迫切地上了国际政治的日程,凡属太平洋的国家与人民,都不能不考虑自我保卫的办法。依我看来,大盗当前只有共同抵御一途。太平洋的国家最多,关系最复杂,彼此的联系又不完全,极其破碎分裂,即令有英美两大国家的关系参混其中,但抵抗日寇期获全盘胜利,必须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精诚合作共同奋斗,并且不分宗主国与属国,各自构成一个单位,由各个单位平等联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消灭日寇,铲除太平洋的祸根,始有充分把握。这就是太平洋集体安全制的树立。

首先希望英美破除从来对立的成见,真诚携手实行合作。其次,诚挚援助抵抗日寇最有力量国家为中国及苏联,以为太平洋集体安全制的中坚。中国为抵抗日寇侵略奋斗已逾五年,苏联是有“原则性”的国家,必能真诚抵抗侵略共同维护真正和平。中苏英美能切实协力,则太平洋反侵略阵容的形成,就可以具备巩固的基础。再次,在此基础上进而结合所有太平洋沿岸的国家,由近而远,由急而缓,终至全部网罗进来,则太平洋集团安全制可以实现。

树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参加单位,不要仅限于宗主国,也不仅限于大国,凡是具一独立单位的地方,即应尊重其独特岗位的重要性,及其本身应有权益,使得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具体言之,太平洋上英美的合作,不应当只是英美两宗主国的合作,而应当尊重各属地的个性,如英国的澳洲、马来联邦、缅甸、加拿大等地,

美国的菲律宾、夏威夷等地，皆可以自成一作战单位。英美应重视各民族本身的利益，然后始能动员其各民族的力量，共同抵抗侵略者。再如越南、泰国、荷属东印度，乃至南美洲各小国，都应当尊重他们的独立自主性及各本国的权益，使他们知道是为本身利益而抵抗侵略者。此外还要特别注意两个单位，即朝鲜及台湾，这两个地方虽已被日寇侵占、统治多年，但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点，却是最有力的分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的领导者，如能帮助这两地的独立解放或民族光复，必能取得铲除祸首日本帝国的最大助力。

## 二、太平洋集团安全与东方弱小民族的联合

几年来日本强盗的阴谋，把东方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中国虽然不是弱小民族，但也是被压迫民族之一，充其量也只是弱大民族），圈进它的版图，所谓“东亚共荣圈”包括了整个亚洲及大洋州，即其例证。现在又向英美挑衅，发动了太平洋大战，所有太平洋诸民族，不是遭受其残杀掠夺，即将于未来受其侵略及毒害。总而言之，东方诸民族十亿人类，已成了日本强盗奴役奸杀的对象了。

日本海陆空军正以其最大的力量，企图在英美力量未集中太平洋以前完成这一个阴谋的基础，先占领太平洋上的各处军事根据地。在这情势下，一方面英美须急速救援太平洋诸根据地，并以进攻日本本土为牵制，但是东方诸

民族为争取独立解放，或避免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惨苛境遇，皆应急起，共同对此暴日作殊死的斗争。

过去已有一半中国同胞，2,000万朝鲜人民，500万台湾人（福建及广东移民），乃至7,000万日本人中的大多数平民，处于日阀铁蹄下。最近又有越南、泰国、缅甸、荷印、马来以至菲律宾一部分人民，沦为日寇的俘虏，即马来、荷印、澳洲、缅甸、印度，以至近东诸地，莫不在日本参谋部的侵略计划之中，而这些民族无论为其自存，抑为民主国家的共存，皆有奋起自救救人的必要，其关系太平洋战争的前途也极大。但其自救方法最有效者为诸民族共同奋斗。12年前即由韩国及台湾革命同志喊出“东方革命”的口号（详见东方问题研究会宣言及其机关杂志《新东方》各卷所载），提倡东方民族革命，第一个目标在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及纲领更可适用于今日，且须扩大而实地做去。

领导这个东方大革命运动的责任和权利，完全落在中国身上。12年前，中国有不能放心领导的苦衷，太平洋战争前也还有多少的顾虑，但在今日却可以放心站在民主立场上，领导东方诸民族打倒日本强寇了。中国为此巨大运动的天赋盟主，朝鲜民族、台湾人民，乃至被压迫的日本革命平民，都已愿意追随中国的领导。从最近中日韩台革命团体联席会议的宣言已可见一斑（见《战时日本》6卷2期）。相信日韩台革命人民有此志愿，不独今日如此，往日亦未尝不如此。当作者在东京时，日本权威杂志《世界政治与世界

经济》主编广岛与堀江二氏曾强调“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日本平民始有活路，不管中国政权怎样转变，总以强大为前提”。朝鲜、台湾及其他弱小民族，当更无庸论了。

东方诸民族，今日确实需要一个反法西斯的大联盟行动，英勇抗战五年又半的中国已有资格和实力领导这个大联盟。东方诸弱小民族必须精诚团结成一个单一体，这或者可以称为“东方民族国际”。英美民主国家也应助成这个大事业，始可共保安全，歼灭人类的罪恶发明家“日本强盗”。

### 三、太平洋集团安全制的枢轴

然而树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的最重要台柱，应该是中国。第一，因为中国在太平洋沿岸诸国之中，确是土地最广，人口最众，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大国。第二，太平洋强盗日本的第一个侵略对象，是中国，日本还要以中国为基础，完成其独霸太平洋的阴谋。第三，抵抗日本的侵略阻止日本对太平洋其他部分扩大侵略最有力量国家，也就是中国。日本发动海陆空军的全部力量，对中国实施其全面侵略，于今已逾五年有半，不但其所企图没有达到目的，其政治经济及军事，皆陷于泥淖深处，迩来最倔强狂妄的军阀首领如东条，也都时发悲鸣，警戒其全国国民勿过于乐观了。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都在证明中国现在已经是太平洋真正和平与集体安全的台柱。伦敦大学教授克伊孜赞扬

“中国为远东的枢纽”，自非偶然。克伊孜教授还期待着“中国将为有组织之国际秩序制度与远东和平制度中之支柱”（伦敦3月9日中央社专电），中国在维持太平洋和平与安全之点，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国际人士如此赞许中国，不但切合事实，且有不可磨灭的理由。中国将永久不会是侵略的国家，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民众绝无向外侵略的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自卫的，并欲以此行动原理维护其他的弱小民族，以维持远东和平及太平洋秩序。中国愿意在主权独立土地完整的原则下，真诚与世界各国善意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及技术之点，更欢迎国际协力合作。中国地处寒温热各带，有多种多样的农产，有无尽藏的矿产，有四万万五千万勤劳的劳动力，其技术的生产性虽然落后，但其发展的前途却非常远大。各国能投雄厚的资本及精进的技术以开发中国经济，并助中国政治自主如英美这次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协助中国社会进步如各国热心人士乐捐巨款救济中国难民教育中国难童等等，则中国将因生产关系之合理化而生产力之发展蒸蒸日上，各国在太平洋上将享受经济上莫大的便利。

但是不幸得很，这个可以充当世界乐园的中国，几十年来继续受着某些帝国主义的覬覦和侵袭，其中罪恶发明家的日本，对于中国尤怀叵测，企图排斥各国出境，而自己独吞独享，其阴谋所在，甚且殃及南洋群岛，危及美洲及印度。日本侵华全面战争继续了5年又半，无时无刻不在想独吞中国以为基础，以与英美苏在太平洋上分庭抗礼。最

近日又对华发动新攻势，滇西战事未停，而粤北湘北鄂南赣北各地日军，皆已开始蠢动，且为策应太平洋争夺战而于广州湾强行登陆。这些动向不但中国要努力阻止，美英盟邦更应深刻警惕，而在军事上有所策应。目前树立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第一吃紧工作，就是如何安定中国，使同盟国反攻日本的最重要据点得以巩固。必须中国战场确定，围剿日本三岛以建立太平洋真正和平，始有把握。

中国今日在美英太平洋战略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1941年12月26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称：

“中国今日所处的地位与英国相同，而中英关系，也与英美关系类似”。英美两国对于中国今日所处危局，万不能漠视。邱吉尔曾慨乎言之：“进攻吾人之力量，至为巨大，彼等凶恶而残忍，向战争及征服之途迈进之暴徒及其喽啰，自知彼等苟不能用武力征服其所进攻之人民，则自己即将遭遇可怕之结局。彼等拥有大批各种武器，彼等之海陆空三军，受有精锐之训练，彼等有计划，有策谋，而此项计划与策谋，明早已完成而试用矣。凡暴力与诡诈之行动，彼等必行之不停”（同上演说）。

日本的“暴力与诡诈之行动”，在一年前主要的是用以侵犯英美，现在太平洋战争略告一段落，并知英美目前尚



不准备与之决一胜负,故又将其炮口移向中国。日本“拥有大批各种武器,彼等之海陆空三军受有精锐之训练”,现在集中其炮口瞄准中国,企图危害这个太平洋集体安全最重要的台柱。诚如邱吉尔首相所言:“吾人不畏惧未来之痛苦时期,一部分土地行将沉沦,且必须以重大代价,始能收复”(同上演说)。但这不仅是中国一身的问题而已,其将巨大影响及于同盟国作战方面,乃至英美立国安危的问题,是无庸赘言的。

中国政府抗战到底是坚决的,中国士兵的作战也是英勇的,但是抗战5年来,中国的消耗达到相当的程度,现在缺欠精锐的武器,巨量的炸弹,速度的飞机,以至新式作战人员。这些缺陷必须英美积极予以补充,美国号称同盟国的火药库,更应对中国尽量供给,即在英美目前的战略上着眼,英美也不能忽略中国这个战场。

事实非常显明,日本战略是在于困中国以孤英美;失却中国的据点,英美难以围攻日本本土,也是日本参谋部的腹案。日本军略理论家,池田忠孝已公开说过:“英美因为远隔重洋,故不能奈何日本”。他甚且夸张蒙古帝国东征失败的历史,但他却不敢说日本海也如太平洋或大西洋之辽阔(见拙编《太平洋战略论》)。要而言之,要推翻日本军阀,为英美祛凶除害,必须依赖中国的协力,英美的存立要免除威胁与危害,必须以中国为出发点,围攻三岛,作釜底抽薪之计。

英美对日推进釜底抽薪的路线,约有三条:第一条,是

由阿拉斯加运空中堡垒直攻日本本州各地。这条路本来也可以运用海军,由阿留申群岛经千岛群岛,直捣北海道及本州,但现正当冬季,天气恶劣,不能运用海军。美国目前除继续准备实现明年用海军攻日之外,应尽先利用阿拉斯加一带的现有空军根据地,轰炸日本本土。以收牵制日本攻华之效。

其次,利用苏联堪察加的根据地,海参威及伯力等地以攻日本本土,不失为主要路线之一。但此一路线之运用,须战略与政略配合,有赖于美苏圆滑合作。相信苏联之疾视日本,不在英美之下,现又当打退德军,军威连振,已无东方后顾之忧,美国能出之以诚,有“外交原则性”的苏联,必能诚实合作无疑。

进攻日本的第三条路线,就是由中国出动,英美协同的要着,第一是派出大批轰炸机攻击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第二是赶运巨量军火补充中国军队的给养,加强中国抵抗及反攻力量;第三是英国对于收复缅甸应出以积极的战略,美国争取西南太平洋决战据点应更进一步。英美的对日战略,在今日已与中国的战略联成一片,中国的危急,也即英美的危急。我们愿意再提邱吉尔首相一句话,“美国已拔剑为自由应战,而不再保留其剑鞘”,我们更希望英美在太平洋上的作战,也能同样不保留其剑鞘。罗斯福总统最近的演说,业已显示这种意愿,最低限度希望美国能领先积极发挥其空军的威力。

先安定太平洋集体安全制的低轴,然后太平洋的秩序

与和平始得维持。传说已久的中美英苏四强作战会议应早日正式成立，对于太平洋战局作一番整个的估计与策划，更由战略政略问题而进一步深谋太平洋真正和平的久远大计。

目前，太平洋的情势已步入两大营垒争取胜败的决定阶段，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协力更加迫切。但是本年1月26日罗邱会晤于北非，其所讨论的对象，却又偏向于尽先“解决欧洲的轴心”，以便于“1943年或1944年还师远东击溃日本”。但世界危机是整个的，远东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欧洲之下，日本谋过亚洲独霸，以为征服世界的基础，其危害英美苏的存立或竟甚于德国，借今日日本在轴心的比重已驾德国而上了，所以太平洋集体安全的必要性，尤为增大，深愿有关各国更加考虑。我们希望太平洋集团安全制早日实现，我们尤其切望共保太平洋安全的协力战略尽速进展！

（2月20日）

原载1943年2月21日《广西日报》

## 对日集中进攻罢！

中国在壮烈牺牲和英勇抗战中，度过了六个整年，跨进了第七个年头。过去六年是消耗敌人防卫国土的抗战，自今年起应该是全国反攻的作战，联合国家的世界战略，已决定对日实行反攻了。澳外长伊瓦特播称：“现时已可用对德之同样力量，对付日本。战争已进入新阶段，此不但欧洲如是，太平洋方面也然”（6月14日中央电）。美国陆军副参谋总长麦克纳奈对参议院支付审委会报告也称：“吾人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已使日军进展之趋势，转变为逐渐撤出其本土根据地之趋势，战争将移至日本土，使整个日本帝国感受最猛烈、最富威胁性之震动”（华盛顿6月28日中社电）。

日军作战已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他们已开始向后败退以至退至其本土，而联合国家将在其本土实行围剿。这是此后太平洋战争的趋向，吾人更须加紧努力促使这个趋向迅速发展。

美英盟邦已由各方面开始对日加以压力，但是我们的愿望，正与澳外长伊瓦特所称“美澳纽人民之自然愿望，即

实施最大而不息之压力，此项压力且将逐步增强”。而这种压力，又应如颜露尔将军所点破，是联合国家对日实行全面进攻。

第一、中国各战场应该全部发动机动性的反攻，不分南北东西，皆能同时动作，开展有联系的反攻，使日本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应，终至步步向海岸败退，退出大陆，让给联合国家用以经常轰炸日本本土的根据地，但要中国完成这种重要任务，必须联合国家空军充分配合，必须给中国军队，以充实的配备。这项实有于美英协力作战了。今日，中国对日作战，已不是中国一国的事，而实是联合国家的共同任务了。

即从美英的远东战略着眼，从中国进攻日本，是最轻本的工作。因为在中国战场上，美英只要配以几百架飞机及多少新式武器，中国就一定可以打败日本。这次鄂西大捷就是中美陆空协力的成果，而美国所用飞机，为数并不甚多。美英此后更应普遍采用这种战略。美英供给中国以新式武器及军需品，或者运输上相当困难，但为□□轻本原利的代价，即今多使用一些巨型机，也是合算的。

其次，英印军应趁早反攻缅甸，打通滇缅路，既可粉碎日本在太平洋西边的防御壁垒，又可以打通中国的西南国际路线，有利盟邦接济的运输。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11日曾经宣称：“西南太平洋的盟军，现正准备对日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我们希望这方面的反攻，必须底于打击日本退出缅甸。

再次,美澳军协力反攻新几内亚,运用空军的最大压力与强烈的潜艇战打击日本。日本空军经过几次太平洋上的大打击,已自觉岌岌可危,所以现在在太平洋上,军事设备着重于空军根据地之建设及飞机数量之增加,其“超重点主义”的生产,集中于飞机的生产。在潜艇战上,日本也受了很大的打击,日本更有向后撤退的必要。希望盟邦更多注意于打击日本空军与潜艇,驱逐日军退出荷属东印度,退出马来亚,退出菲律宾与台湾。

美国目前对日本集中进攻,还须由北太平洋同时并进。阿拉斯加半岛的建筑须有更高的进展,阿留申群岛方面,要由阿图岛更进一步压近千岛列岛。在欧洲战场包围德军至相当程度时,苏联也须在东战场发动,由美苏共同紧迫日本的北部。以美苏雄厚的空军轰炸日本本土,可不几多时候而日本各工业区域完全粉碎,以釜底抽薪之计,截断日本归路,分散各地的日军将首尾不能相顾而归于瓦解,无疑。

美英海陆空军由太平洋新几内亚及缅甸逐岛迫进,中美英陆空军从大陆各战场逐步迫近海岸,美苏空军由北太平洋直捣日本本土,苏联陆空军配合中国陆空军,扫荡日本驻扎东四省及朝鲜的军队;这样,四方八达各战场愈益缩紧,终于衔接而布成“布袋阵”,联合国各战区愈向前推进,终于会师东京湾,迫使疯狂倔强的日寇,无条件投降。

为要达此目的,中英美苏四大联合国家,须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一个共同的战略,及一个共同的和平建设信

念——疯狂军阀挟持下的天皇制，必须打倒；任何一国非打至日本帝国瓦解，不能单独与日谈判和解；清算东方的总帐，扶助以和平关爱为外交原则，以世界大同为归宿的中国主持远东大局，共同建设东亚的永久和平，促进世界人类的发达与繁荣。

原载1943年7月8日《广西日报》

## 汪伪“参战”前后的乖谬

汪伪组织在今年1月9日“介入”世界大战，从此以后汪伪政权及其一班人马，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同时又变成了世界反侵略各国的共同敌人。其参战的经过及其前后情形，值得我们报道和检讨。

汪逆精卫一批人，自为日寇所挟持，赴南京鸣锣打鼓，认贼为父以来，即便死心塌地断送民族的命脉，求为异族的奴隶，故其一切措施，皆极乖谬反常。其初期尚未能获得主子的垂青，其伪政权常在南北伪组织及其背后抽线人明争暗斗中，动荡不宁，甚且有岌岌不可终日之概。直至1941年12月8日，日寇袭击珍珠港掀起太平洋大战，日寇始有十分决意，予以支持。于是南京伪组织始得机会，追随贼父亦步亦趋，但其沐猴而冠，异国情调，仍难免识者之讥。其最显著的变幻，就是以太平洋战争为契机而其卖身行为更为具体化。兹就太平洋战争前后汪伪组织的乖谬施設，略予剖述。



## 一、准战体制的措施

日寇自太平洋战爆发以来，即认为汪伪组织奇货可居，正是上市拍卖的好机会，所以命令加紧排演，以便锣鼓登场，终于有所谓“三大政策”的施行。其第一种政策，就是所谓“局部和平”的推进，其具体内容就是所谓“清乡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政略的重点，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占领区的物力与人力，而镇压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是该种政策的大前提，所以一面实行扫荡，一面标榜“治安第一主义”，并迫伪组织协力。所谓清乡工作，就是伪组织在日寇指挥之下，运用军事与政治的两种方式，强行各地抗日民众势力的消除。但是汪伪组织本身，并没有实力，充其量以日人的估计，也不过是一种“思想集团”（5月份《创造》梅原一雄之言），所以这种清乡工作，事实上就是日本军阀刺刀下的屠杀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发展上的颠倒程序，政治先于经济，军事行动先于政权的树立，也充分表现于此项措施上。年来华北各地遭遇日军扫荡的惨苦，汪逆等民族敌人应负其咎。

太平洋战前，汪伪组织的第二种政策，就是所谓“新国民运动”，据所宣传，其宗旨“在于昂扬国府参战讨灭重庆，以便急速促进参战的气运及体制”。据他们自己的解嘲，“从来的国民运动，无论是反共和平运动，抑是兴亚建国运动，皆只停滞于启蒙宣传及社会文化运动的领域，决无政

治运动的色彩，国府并未觅得斗争的对手”云云，实则汪伪组织根本就不能有民众的政治运动，可怜又复可笑。日本人都承认中国人民不能了解它的伦理，身为思想集团而连伦理观念都不能得到人民的了解，其空泛无力更可想见。日寇因为发见汪伪组织这种弱点，乃强迫其宣明态度，故迫他们准备参战，与英美为敌，宣言“讨灭重庆”，绝其归路，并誓言其所谓“日支共生同死”。日寇所企图的，是我沦陷区，特别是上海和南京等地，会因为这种新国民运动的实施，而敌友阵营鲜明，“希望反对者去而集中于抗日阵营，赞成者留而与伪组织同其命运”（5月份《创造》），其用心亦可谓苦矣。

汪伪组织的第三种政策，就是根本改革军事委员会的机构，以备参战后充当政略及战略的中枢机构，企图因此施設而汪逆得以树立“军事指导权”。此项改革实施于1942年8月20日，其要点如下：

一、陆军部及海军部，由行政院移归军事委员会，关于军事的一切事宜，全部置于军事委员长的指挥之下；

二、废止军事委员会的参谋本部，政治训练部，及军事训练部，另设参赞武官公署，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海军经理总监公署；

三、设总参谋长及次长，以为军事委员长的最高幕僚。

新机构的人物构成如下：军事委员长，汪逆精卫；总参谋长，刘逆郁芳；参谋次长，（陆军）黄逆自强，（海军）许逆建廷；军事参议院院长，肖逆叔宣；陆军部长，鲍逆文樾；海军部长，任逆援道；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郝逆鹏举；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叶逆蓬；航空署长，姚逆锡九；海军经理总监公署总监，何逆炳贤；调查统计部部长，李逆士群。

日寇的这种导演工作，促成汪伪的“临战体制”，据云，如此改革“可使军令军政一元化，使汪伪得于大东亚战下，与日本同甘共苦”（同上《创造》）。

## 二、参战后的把戏

汪伪组织背后的魔手，终于在今年1月9日：指挥汪逆宣言对中美英等民主国家作战，“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约一年间准备的准战时体制，到此时步入战争体制的阶段。据汪伪所宣称，此次参战的目的，在于“大东亚的解放，在于新中国的建设，并为达此目的而确保日支共生同死，一体不可分的关系”云。据日本人的铨释，“汪逆从此参战放弃以和平思想处理中国事变的观念，改为运用武力战以达成东亚的解放，新中国的建设”云（据上引同文）。据说，汪逆从此宣明他的基本立场，解除过去两年来的苦闷，而踏上新性格及战斗的路程。

汪伪组织的参战施設，几乎如上所述，在宣战前即已为日寇准备完成，宣战后仅是在其原有机构上略加调整罢

了,其宣战既不能参加实际作战,则其参战宣言,也等于多余,适足以贻笑大方。

汪伪在参战后,新设了一个国防最高会议,并决定行政机构改革办法,颁布一道国防最高会议条例。这些都是空洞不着边际的施設。其次,又召集一个地方长官会议,实行了伪南京政府机构的改革及其主要人物的异动。再次,举行过一次所谓新国民运动促进会议,召集过伪国民党第六期五中全会。许多新措施,闹得乌烟瘴气,像煞有介事似的,而日本主子赞为一切战争形态一举而完全具备。

新设作战机构的“国防最高会议”的大权,掌握“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及文化等一切的军令和政令。该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汪逆精卫自兼,秘书长为周逆佛海。地方长官会议,决定下列诸种事项:确立地方行政新体制,特别是以生产扩充为目标的战时经济政策,战时治安,精神总动员等重要政策,也为所决定。又由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第一次促进会,根据过去一年的新国民运动的实际经验与参战的新情势,重新决定了国民运动方策。据说,一般对于这个新国民运动期待甚殷,认为汪伪参战目标之一的“新中国建设”的基本动力,完全依靠于此运动。其伪国民党第六期五中全会,也于决定战时基本方针,确立根本态度之后,公开发表共同宣言,其内容肉麻不堪,惟其再三提示生产扩充及治安维持,皆以“和平区内”的再建与巩固为前提,并强调此项办法为巩固日本对美英“击灭战”的背后基地,筹备日本“压服”重庆的前进基地的先决条件,尚值

得注意。

汪伪此次于对美英宣战同时,发表一道等于誓约的所谓“日华协力共同宣言”,其誓词如下:

“大日本帝国及中华民国,为完遂对美英共同战争,而以不动的决意与信念,作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完全协力”(据日本内阁情报局公布)。

汪伪此次深以日寇未逼其签订条约或协约而以共同宣言出此,颇引以为荣誉,殊不知日本侵略者蓄意所在,正希冀能由中国侵占区充分攫夺战时物资及原料,以“遂成”其“百年战争”,日寇为刽子手而我为鱼肉,汪伪被欺犹不知。且看日本侵略者在其所谓“日华大东亚战争的协力”上如何垂涎着我国沦陷区的资源:

“在遂行大东亚战争上中国对于日本的协力关系,至为重大;即断言:若无中国资源则帝国大东亚战争的遂行不可能,亦不为谎言。换言之,中国拥有莫大的军事资源,因为中日两国地理相邻接,故可充当日本战力的重点培养源泉地”(据日本内阁情报局《周报》1月30号)。

在此经济资源的依存关系之下,日寇加紧我沦陷区各种军需资源的开发,用以培养日本的战时经济力。据调查,华北设有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充当华北日华合办公司的母公司,从事于经济开发的统合调整。现受该母公司的投资及节制的有关系公司,共有23家公司,9家合作社。又在华中方面也设有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充当华中各企业公司的母体,从事于华中经济的“振兴”及统合调整。现受该母公

司投资及节制的公司,共有14家公司及一家合作社。

汪伪对于这些有关的公司,迺来更加尽力劝诱我国民族资本参加,伪政府本身也投出一部分资本参加,以表示其对日寇的经济协力,但是奴隶的锁链已加在身上,犹不自知,诚可怜可笑!

最后,还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日寇指挥汪伪参战后所表示假惺惺的态度。

日寇在汪伪对民主国家宣战后,首先表示的,就是所谓“迎以满腔的热意”,声明对于汪伪参战目标的“东亚解放”及“新中国建设”两大方针,予以全面的支持和援助。日寇还从具体方面,表示其猫哭老鼠假慈悲,率先撤废治外法权限取消租界,日伪之间成立协定,又于3月30日取消八处租界及鼓浪屿公共租界,北平使馆区。其实,这种假慈悲及其毒计,除了汪伪而外,天下人没有不识破的,故从略。

原载1943年8月16、18日《大公报》

## 日寇的悲鸣

### ——所谓“一亿国民走向第一线”

同盟国家对日寇的总攻，不但已经开始，并且已在节节胜利，不但是一二方面的布置并且是在计划全面的反攻。日寇在此事实及动向之前，业已开始颤栗，并由颤栗而发出悲鸣了。最近日寇内阁情报局，特为这种情势著论向全国国民呼吁，在其机关报《周报》上发表社论，题为《一亿国民走向第一线》（载7月28日号）特为节译于下。

#### 一、美国决意攻日

美国最后对日反攻论，得以民主党上院议会铁特拉为代表：“余要求美国集全国兵力，即时对日开始大规模攻击。美国对日的攻击，应在继续战争的期间，与反轴心友邦共同行之。若到欧洲战争结束时，继续对日作战的国家，有留下中美两国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有其大部分军队复员的

可怕。”

其所著论的根本理由，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尼可尔逊陆军少校，申论如下：“日本军自攻袭珍珠港以来，即北自阿留申群岛的吉斯卡岛，南至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占领了全部地域。而这些岛屿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日本军的立场非常的坚强。而且日本现在的资源，已经相当丰富，占有世界橡胶90%，锡70%，米产90%，亚麻的几乎全部，铁钢及废钢数百万吨。在汽油方面，只荷印的出产，即够转动日本舰队、航空队及运输船。在人的资源上日本军也已“征服”了11,000万的住民。在日本军以占领地带为基础企图逐渐增强的期间，反轴心军究应如何处置？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若无适当措置，就等于坐视日本军逐渐强大。若俟明年或后年反轴心军击破德军而已相当疲弱以后才来攻击日本军，则将消费几多血汗和贵重品，只有天晓得。反之，若能击破日本军，则反轴心军不独拥有现有的兵力，且可以将中国、印度、澳洲、及西伯利亚的全部兵力，转用于对德军作战。对于德国，只要加以空军的轰炸，及陆海军的包围，则其要塞的四围，将由其内部日就衰弱。日本现在虽弱，但至明年或后年，或将变强。德国今日虽强，明年或将变弱。现在才实在是攻日之深秋了”。

今年6月30日在所罗门群岛的特连巴岛开始的美军登陆作战，可以视为上述计划的实证。美国不惜巨大的牺牲，而强行登陆，可证美国对日的战意，已经相当炽烈。

美国是在企图作消耗战，对于日本军的质的优势，想



以量的优势加以压倒。明知莫大战力的消耗在所难免,而实际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注入坚强的战力,他们的目的所在,可以想见。此后战局的推移,实难预断。

战场可说是“错误的连续”。一起一伏是战争的常态。吾人能透视全部战局,注意英美何时由何地出击、反攻,而坚持自主的态势。日军当局也常声言“战局的主导性,俨然在我掌中”。从此观点,吾人也应自战争的“全局观”,冷静判断百态,而谋积极果敢的对策。

## 二、四方八面瞄我心脏部

美国不独要坚守所罗门方面,现在且已开始其“中央进攻”。此路自战前即认做对日作战的重点方面,是由夏威夷到中途岛,一直线横断太平洋中心,一直到日本本土的腹部。其战略线上的要点的夏威夷,虽在开战初期受到日本的突袭,但现在已恢复旧观,完成兵力基地的整备和扩充。著名的军事记者,包尔温曾警告美国全部国民称:“中央进攻路线,断不可看轻!”而强调其战略价值的重要性。

又在以“此方进攻路线”闻名的阿留申群岛方面,由五月美国对日军强行阿图岛登陆作战,可以察知美国积极的真意。实际上,始自可称为“空中要塞”而得驻扎千架飞机的阿拉斯加的埃尔棉道朗夫飞机场,以至克捷克岛及荷兰港等基地,也经整备和增强了。关于此点,有名的飞机设计家而兼军事评论家的罗贝尔斯基,强硬主张“北方进攻路

线”，为一般所周知：“从北方轰炸日本本土，比由东方或南方有组织地夺回日本军占领地的战略，还容易逼日本屈服”。

又其“西南进攻路线”，由中国本土反攻的新路线，也被认为对日战略的重点。中国防卫第一线的基地，衡阳和醴陵等飞机场，现在已经放弃消极的立场，并改为积极攻势据点，从来专用于战斗机的桂林飞机场，最近也已改为重轰炸机飞机场了。美国驻华航空队，以前是以中型轰炸机为中心，最近也已改为重轰炸机。还确在窥伺着日本本土，特别是九州北部的重工业地带。美国空军，最近和中国空军，采取积极的共同作战步骤，其指挥系统也归统一化，更值得注意。驻华美国空军司令官陈纳德，最近大放其豪语称：“余希望明年轰炸日本本土”。

前亚洲舰队司令耶纳尔将军也称：“欲逼日本最后崩溃，除经由中国路线以外，别无他途，只靠海军的力量，尚不能够打倒日本”。

于此，同盟军对于由中国本土反攻日本，是如何重视，不难想见。他们正在“等待今秋雨季后试作缅甸夺回战”。

若自缅甸路线为中国反攻的唯一输血路考察，则此种作战方针，已于华盛顿第五次会谈决定的事实，绝不至单纯视为美英一流的夸大宣传。

如上所述，同盟国现已由四方八面，企图向日本本土的心脏部，作决定的攻击，我们一刻也不容大意。

这次的战争，好像美日两国的摔跤。最初被压在下面

的美国，现已逐渐立起，成了匹敌，一张一弛，也是当然的，忍耐至最后5分钟的人，始能获得荣冠。日本固然飞机不够，人力不够，船只不够，但惟其不够，所以要继续输送至第一线。是为“以量制胜”的道理。日本一亿人民，须有走向第一线的意志方可。

6月间，美国舆论的测验，对于“战后美国是否和德日两国国民恢复新交”的问题，美国人民答复如下：

德国67%，

日本8%。

于此可知美国人如何憎恶日本。这或许是一种宣传，但是日本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在宣传以上。

原载1943年11月26日《广西日报》

# 从太平洋中路进攻日寇

## ——先射日本的阿溪里足踵的台湾

孙院长哲生先生在今年纪念七·七时，曾著文申论从太平洋中路进攻日寇的重要性及其战略上的作用（详见全国各报七·七纪念特刊），就今日太平洋战局及美国的作战情形考察，孙院长的深远眼光及其对战略的卓识，业已充分证明。惟此中路战略，对于中美两国协力进击日寇，关系甚大，故特略抒鄙见。

### 一、美军中太平洋的攻势

在进攻日寇的中央路线上，美军业已开始攻势，其战术且已由逐岛进攻，发展至“越岛进攻”了。这几个月来，美国空军曾经屡次袭击威克岛、马尔卡斯岛、吉尔贝特岛、马绍尔群岛、埃利斯群岛，乃至台湾海峡。9月初旬之袭击马尔卡斯岛，及最近对吉尔贝特群岛的登陆，攻战尤有显明

的进展。

美军对于吉尔贝特群岛的进攻，开始于本月21日，几天前已经连续在梅金、塔拉瓦、及阿比马岛三个岛屿登陆。这是美军在中太平洋上第一次反攻。在中太平洋方面，日军占有委任统治地——马绍尔群岛、马利亚纳群岛及加罗林群岛，其海空的设备，已经相当完整。美军敢于毅然向此路进攻，可见其对日的反攻是有极大的决心与卓见。

这次的进攻中，美军业已占着绝对的优势，第一，日寇空军对于美军的进袭，没有大规模的坚强的抵抗，和先前西南太平洋及北太平洋的几场顽抗，完全两样；第二，日本战舰始终深藏避匿，不敢迎战，这与最近所罗门群岛一带的大海战的情形，又是两样。此次中太平洋攻略战的过程中，表现出几种事实，其一，美军进攻日寇情势的猛锐，其二，日本飞机在数量与质量上，皆劣于美空军，故不敢出与抗拒，其三，日本海军力量有限，既不能普遍分布于各地，也不敢随便出头应战。但最重要而应指出的是日寇用意，还在于其太平洋决战场上放置的问题，迩来，日寇非常注意台湾及其外围的军事布置，台湾屏东新竹各地之建筑飞机场，马公军港之加强，乃至日来日军在闽粤沿海及粤南东江的蠢动，皆可说明其在中太平洋的军事准备。

在这次中太平洋攻势当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中太平洋的攻势，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北太平洋及西太平洋的攻势是有密切联系的。

## 二、美军横断太平洋防线的修正

美国三大杂志：《时代》、《生活》、及《幸福》，曾草拟“太平洋战争建设草案”，主张美国应在中太平洋，建设一条“横断太平洋防线”，其具体办法，就是：“从夏威夷以西，有一连串强固的根据地及勘察站——如中途岛、威克岛、关岛、以及收回日本委任统治地各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一直到台湾。”他们主张在这一连串的岛屿上，建设美国横断太平洋的防线，用以保持太平洋的攻势，维护太平洋沿岸的永久和平。

美国人士的此种拟案，若加以适当的修正，称此条防线为“中美横断太平洋的共同防线”，则甚合正义与实际，因为在此防线上的许多站点，是中国旧时的失地，而在此次战争中必须收复，且其重要性高于任何站点，其主要者为台湾、澎湖列岛、及琉球群岛。美国应完全建起此条横断防线，非完全取得台湾及琉球群岛不可。此垺地在政治上皆已沦于日寇多年，但当地的人民仍为中华民族，其地的人情风俗一仍中国的旧惯，故其地人民为维系祖国的念头甚强，在台湾有530多万的中国同胞，20多万的生番，20多万的日本人，而以此仅仅20多万的日本人，统治着550多万的被歧视为“异族”的人民，其比数约等于一个人统治着30个人。日本虽使用权力与大炮统治着此地众人，但抵抗权

力与火炮的较有力量的武器就是血族联系之唤起。“血还是浓于水的，”郑成功反抗异族的精神，仍未泯灭，仍在530多万的明末民族的血液中浸淫、流溢着。现在中英美在开罗举行的三强领袖会议，已经决定了台湾澎湖等地归还中国。所以美国的“太平洋横断防线”，应更改为“中美太平洋的横断防线”。至于台湾的地位，在此线上占最难争取的一点，南洋委任统治地，还在其次。台湾的面积虽只有14,000方里，但此战略地位甚高。日寇早在这里，修建立了主要的海战基地。这里是日寇的大兵工厂，有着供给日本舰队使用的海港及其他必要的设备。这里有潜艇队，在太平洋对联合国军作战的日本舰船，大部到这里来加添燃料或停坞修理。这里又配合着优良的空军基地，日机从这里出战去轰炸盟军及中国领土。最近日寇已渐将海空军的主力，集中在台湾。台湾已经不仅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总督长谷川的话），且已成为太平洋上日寇最大的供应站，将来必能成为日寇对盟军决战的重要据点。

如果一旦台湾从日寇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即对日的进攻，便很有利，美国可以一反掌而收复菲律宾群岛。

### 三、中路进攻的整个战略意义

中太平洋的美军攻势，还在继续进展中。据今日各报所载24日太平洋美舰队总司令部发表公报，“美军已占领比蒂粤岛，海军陆战队刻正追击吉尔贝特其他各岛的敌

人”。另据太平洋美舰队司令尼米兹接见记者称：“吉尔贝特群岛，现已在我掌握中，塔拉瓦岛之敌即可肃清，吉尔贝特群岛中的其他岛上少数敌人，也将由吾人应付，日舰队倘出而一战，美舰队需与之周旋”（珍珠港24日合众电）。又据昨日（25日）消息，中太平洋战机继续袭击马绍尔群岛，美国海空军正严阵以待日寇海空军出来迎战，日寇委任统治地已在动摇。

最令人兴奋的情事，还在于今晨的消息告诉我们：美国十四航空队前方作战部队“米恰尔”式中型轰炸机及战斗机，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25日，自中国基地出发，轰炸台湾日军广大基地新竹机场，作历史性的感恩节奇袭。联合国的空军，1938年曾经一次去过台湾，但其大规模轰炸，乃以此次为首次，并且相当成功。这次的奇袭，是出于日军的不意，在机场及空中，其毁敌机至少47架（创远东空战胜利的最高记录）。

台湾是日寇太平洋阵营的咽喉，盟军能先射穿了这个咽喉，日本太平洋防卫，立刻瓦解。世人又譬喻台湾为日本的“阿溪里的足踵”（荷马所著《伊利亚特》史诗中的主人翁。幼时他的母亲把他倒浸于史特克斯冥河中，使他化成铜身铁骨，刀枪不能伤，可是所提握的足踵未被水浸，仍旧是肉，故后来竟因踵部为箭所中而致死）。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惨酷的殖民政策统治下，是有极大的弱点的，中美军协力克复台湾，并不困难，能克复台湾，即可立刻瓦解日寇太平洋上的整个阵线，乃至乘势直迫日本本土。



本来，进攻日寇原有四条路线：即北路、中路、南路及西路。北路自阿拉斯加经阿留申群岛，以迫千岛列岛，北海道；南路自西南太平洋南端向东北前进；中路由夏威夷群岛，经中途岛，入日本南洋委任统治地，至台湾、琉球，以迫日本本土；西路由中国大陆反攻，包围西部日本。但就目前情势观察，北路与南路，一时还不能立刻迫近日本本土，北路之最有效攻势，须至欧洲完全解决德军之后苏联加入夹攻，南路离日本本土太远，只有撤消日本新占领区的外围的作用，西路也因缅甸之克复和滇缅路之开通有待，中国总反攻上所需要的军火及物资，未克充分接济，故尚需要其他方面的协助，始克有功。

在这情势下，中路进攻占了最重要的战略及政略的意义。第一，在战略上有几点重要性：（一）中太平洋攻势之完成，可以把日军的整个阵线，切成两片，使其南北不能互相照应。（二）美国海空军可以从此路补充中国大陆进攻的力量，补足滇缅路未开通的缺陷，（三）太平洋的新占领区完全被困而孤悬海外，使其军需资源不为日寇所用，而断其作战命脉。（四）缩短轰炸日本本土的距离，便利盟军轻本厚利的轰炸战略。第二，在政略上也有几点意义：（一）中太平洋攻势之完成，可以直接影响南洋群岛及大陆沦陷区的人心，使日寇迹来所运用的怀柔政策，完全归于无用，（二）此路之完成可以直迫日本本土；而使日本国民对于战争感到惶恐尤惧出征军队之陷落海外。（三）粉碎日寇独霸亚洲的黄粱，使东方十亿人民不在为所迷惑，而日寇在政治上完全孤立。

然而中美要协力完成这条太平洋横断防线,无论如何要着重于日本南域总兵站的台湾的克复,而在克复台湾的工作上,要充分运用三民主义的原则,尊重台湾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则可以收外攻内应之效,而前为日本太平洋坚垒的台湾,变成“阿溪里的足踵”,而致日本帝国主义于死地。

原载1943年12月14、15日《广西日报》

## 日本失败的实况

### 一、引言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民国廿六年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继又对英美发动太平洋战争,暴戾残酷,一意孤行,悍然与全世界人类为敌。横冲直闯,曾经一度侵占我大片领土,毒害我二万万人民,美、英、苏、法、荷等国,也同受其害。日本侵略历时八年有余,亚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世界其他部分的十几亿人,全部陷于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其残酷、掠夺、奸淫、烧杀等等暴行,曾使数万万人民彷徨于死亡线上,日本军阀的残暴,可说旷古未有。

然而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皆对日本树起膺惩讨伐的义旗,日本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日本军阀起初犹不觉悟,还欲以孤注一掷,期望挽回颓势。他们尽量驱使日本人民于死路,最后甚至组织各种自杀部队,用日本人民的肉体,和联合国家的精锐武器拼命,台湾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此暴戾

行为，自然无不失败之理，结果终于一败涂地，终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向联合国家无条件投降了。

## 二、日本失败的原因

“事实胜于雄辩”，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之所以失败，按诸社会发展的法则，自有其真实的原因存在。我们想就这些原因，加以剖述，以促日本人民的觉醒，寻觅一条自新的大道。

第一、日本的军国主义、黷武主义，实为招致失败的最大原因。日本明治维新固然统一了日本全国，完成了一阶段的政治革命，但是维新的基础没有建筑在日本人民身上，而反把政权交给黷武成性的军阀。日本军阀没有善用日本的尚武精神，倒反把尚武精神误用于军人优越感上，误用于武力万能的原则上，结果内而军阀跋扈横行，一般人民受其压迫，外而侵略战争频频发动，爱好和平的邻邦屡受其害。在军阀统制下，日本人民不能作主，日本的执政当局也唯军阀之命是从，否则便不能为军阀所容，三·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即其明证。日俄战后的《肉弹》一书及中日战争中的日本反战运动，无一不是血淋淋的哀诉。

第二、日本的贵族主义、封建主义，也是招致失败的大原因。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贯彻，幕府时代的公卿蜕变为贵族，封建的成分遗留在明治以后的政制里面。专制思想仍支配日本政治。日本人民自己既不能作主人，日本国家的意志

势须遵循贵族专制的法则,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经济的发展不为一般人民所享受,社会上造成贫富悬殊甘苦不均的病态。贵族专制主义者为了无限制增加他们的财富,提高他们的奢侈生活,扩大剥削范围于日本国外,侵略战争之发生,即由于此种不合理不健全的政治制度。

第三、军国主义及贵族专制所培养成功的日人优越感,也是日本这次失败的原因。日本军国主义与贵族主义,要求对外的侵略战争,而初期几次的侵略战争又侥幸获得胜利,结果养成“日本人是超人”、“日本民族是一等民族”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起初只限于少数人,后来这少数的日本特权阶级,施行军国主义教育,遂推波助浪,把这优越感普遍灌注于一般人民的脑中,于是每一个日本人几乎都为了这种错误的优越感,帮助他们服从专制主义及侵略主义,驱使他们服从军阀以从事于“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迷梦了。

当然,造成这次战败的原因,除开这三点以外,还有很多,但是这三种是最基本的。

### 三、日本应受的处分

日本既然战败,自然应该接受联合国家的严重处分。

第一、自然是日本必须履行开罗会议宣言,把一切夺取自他国的所有领土,全部退回各所有国家!

第二、日本所有的军队,必须全部被缴械,所有在乡军

人,或类似此种组织的社团,必须全部彻底解散!

第三、日本人民及其财产,须全部受联合国管制。

这里,有的已经麦克阿瑟统帅下,已执行,有的却还没有,我们要求必须彻底进行,对一个残酷的敌人是不能用怜悯的,只有使他稍微有些痛苦的感觉,才是最现实的教训。不然的话,他就会忘记了,而且马上会故态复萌,这一向来本省的日军竟敢藏匿军器,即是过分宽大的结果,稍有善良的日本人民也并不同情(参阅本报23日《读者投书》大村章三君访问安藤大将)。

最后日本的战争罪犯,连天皇在内,也必须受联合国家的严厉制裁。此刻虽然已经有不少战犯,业已提审,有不少战犯已畏罪自杀,可是天皇却仍然高高在上,这是一个危机,因为野心的军阀、财阀,必然要利用天皇这“行尸”来谋“死灰复燃”的。

关于这一点,日本的开明人士,如盐见圣策(参阅本报昨今2日盐见氏所作文)等,也都认为天皇是必须同负战犯的责任。

#### 四、日本自新之路

日本军国主义迫使日本走向侵略战争,是错了。日本军阀实行对外的侵略战争,也是错了。日本人民盲从军国主义教育,从事荒谬的侵略战争,更错了。这一连串的错误,造成这次日本的惨败。现在联合国之严惩日本,正是

提供日本人民纠正这种错误的机会,日本人民正面临着一条悔过自新的大道。日本人民若能直向此条大道迈进而不走入歧路,相信日本更生的时期,当不在远。

然则日本自新之路的指标,在哪里?

即是日本7,000万人应当彻底改变过去一切不正当的观念,大家勇敢的来革除过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第一在政治方面,要承此机会革清残留在明治维新以后政制当中的半封建成分,如贵族的专制、军阀的优越地位,以便为新的合理政制铺下坚固的路基。第二在经济方面,务必消除财产分配不平等、财阀资金独占、国家官僚资本独占等等不合理的现象,使合理平等的经济制度,得以树立。第三在社会方面,务须革除阶级的不平等、男女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更应根除军国主义教育、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尤其是上述日本民族的优越感。

善良的日本人民、具有理智的日本人民起来吧!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如果这个时候您们还不能够扫除军国主义的残余,步上新民主主义的大道,那末,不仅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再次受他们的残杀,他们会再要你们的命!现在是您们把握您们自己命运的时候,您们是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们吗?

# 日本失败的教训

(8月15日对全体学员精神讲话记录)

兄弟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日本失败的教训》。大家都知道今天是8月15日，去年的今日，正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日，也是日本开国以来最悲惨的日子。

去年今日晚9点钟的时候，我在重庆大街上看见全城市民大放鞭炮，许多人集在一起，街上到处冒起烟光，我当初以为是起大火，后来看到街上房子的三楼上挂出“日本无条件投降”几个字，心里非常愉快！街上奔驰着美军公务员、市民，大家拥挤在一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声欢呼！美军车上，坐着小孩子，到处叫喊！胜利万岁！这时候我们真快乐，我想全世界国家也一定很快乐，只有一个日本招来了惨败的痛苦，日本为什么建国二千多年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惨败，无条件的投降呢？这自有原因，这种原因在今天值得我们来研究的，我想各位本来也有研究。现在简单举几项重要的原因，来分析一下：



一、日人之野蛮性太重：日本平日统治殖民地，都是施用压力的，譬如对朝鲜，对台湾的情形，诸位一定很清楚。记得我小时听说过日本人残杀台胞革命者的故事，最近如雾社事件都用飞机大炮来消灭高砂族，这是平时的事，战时日人的野蛮性更显得厉害。诸位在台湾算未受过战事直接的影响，也未亲眼见过日人的暴行，讲到我们国内情形就不一样了。日人的野蛮行动，实在令人太可痛恨了。在这八九年抗战意想之外举一例来说日军队里有一种非战斗员从军，和尚也大施杀戳。他没有枪却锄头用(ウルベシ)。见人当头即斩，他在日记中写着：一日杀死100多人。更可恨的是日军对妇女奸淫了并加杀害，即无辜小孩也用刀刺死，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多。再讲一种最不合理性的事，就是日军非但对妇女随便强奸就算了，更恣意下令叫人家父女、姊弟，实行交合，给他们看，这真是令人难堪，这就是日人野性的表现，也就是日本今日失败的原因。

二、日本国家基础不稳固：日本立国虽说有二千多年，远的不说即说明治维新说起吧，明治维新因受欧美各国文明进步的影响，并受外力的压迫，致政治社会起了变革？但这次革命并未彻底，只上层社会起些变化而已，封建势力仍旧存在，形成军国主义的国家，政府内部军阀不能统一，人民与政府不协调，致使日本政治社会不健全，这也是造成这次惨败的原因。

三、日本内部矛盾的对立：日本因明治维新，革命不彻底，内在的矛盾没有消除，主要的就是政府与军部的对立，

政府有政府的主张，军部有军部的主张，常常走两种不同的路线，譬如就外交来说，政府与军部不一致，当宇垣一成为外相时，政府想与英、美、苏联系，军部却反对，宇垣外相正与苏联商讨解决苏日许多悬案时，关东军即发动张高峰事变以为阻碍这却证明政府与军队不合作的例子。所以日本舆论常说“二重外交”。外交既是如此，内政并是一样。诸位知道日本政府欲组阁先要经元老派推荐，但未得军部支持亦不可以，例如宇垣一成受天皇之命来组阁因未得前任陆军大臣推荐继任者故组阁终成沉舰，在日本内政有个特殊情形，即陆军大臣可以帷幄上奏立在内阁之外，不但不受节制，而且有反对内阁总理大臣，日本规定继任陆相须经前任陆相推荐。

再举一例：日本军部常常反对政府二·二六事变，是一件日本最严重的事，大家都知道的，在事变前因高桥是清极端反对军部对我作战，力倡“百亿公债亡国论”即遭军部暗杀这也可以证明日本内部矛盾的对立，也就是日本遭受惨败的原因。

四、日人无远大眼光：日本人眼光短小，只顾目前不看将来，就是七·七事变，他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为战事一定胜利，至于会否能引起更大的问题，他们没有估计到，这是只看到自己，不认清别人的缘故，俗云：“眼见物，不见人”。当日本对华发动战事的时候，日本陆军参谋部预计四个月内可灭亡中国，以为不用大军，中国就可以投降了，未曾想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悠久的历史，高深的文

化,在英明的领袖,蒋主席领导之下,坚持抗战到底,不怕一切牺牲。故自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仍继续抗战,最后退到四川坚持长期抗战,直抗到八年之久,结果得到最后胜利。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又发动太平洋战争,不自估量自己国家人口有多少?土地有多大,完全是一时的冲动。在德国战争日渐失败,意大利已无力作战时,何以能单独对英美作战,这就是因为没有远大的眼光,以致遭受惨败的结果。

以上数点是日本人失败的主要原因,今天刚好是日本投降一周年的时候,我们来研讨这个问题,是多么有意义呢,今后我们对自己国家应如何努力警告,如何来检讨自己的缺点,不要再蹈日人的复辙才是。

外国人常常看轻我们中国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性,各人自私自利,日本人所以敢侵略我们,也就是看到我们不团结,日本军阀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就是着重此点才敢发动全面对华作战,所以我们每一个国民今后应消除这个弱点,大家接触,听到报告也很多,我们的人民,最显著的习惯,是只顾到自己地方的利益,不顾别人地方或全省的利益,为自己地方的事业,即肯拿钱出来,为别人地方的事业即不大肯出钱。这也就是乡土观念太强,今后应打破地方观念,以全省为前提,扩大到全国。这种观念,要从个人先改变过来,进一步全国国民才能一心一德来爱护国家。现在抗战虽已胜利了,排在目前重要的课题,就是建国。今日国内发生战乱自相残杀,社会经济不安定,一时谈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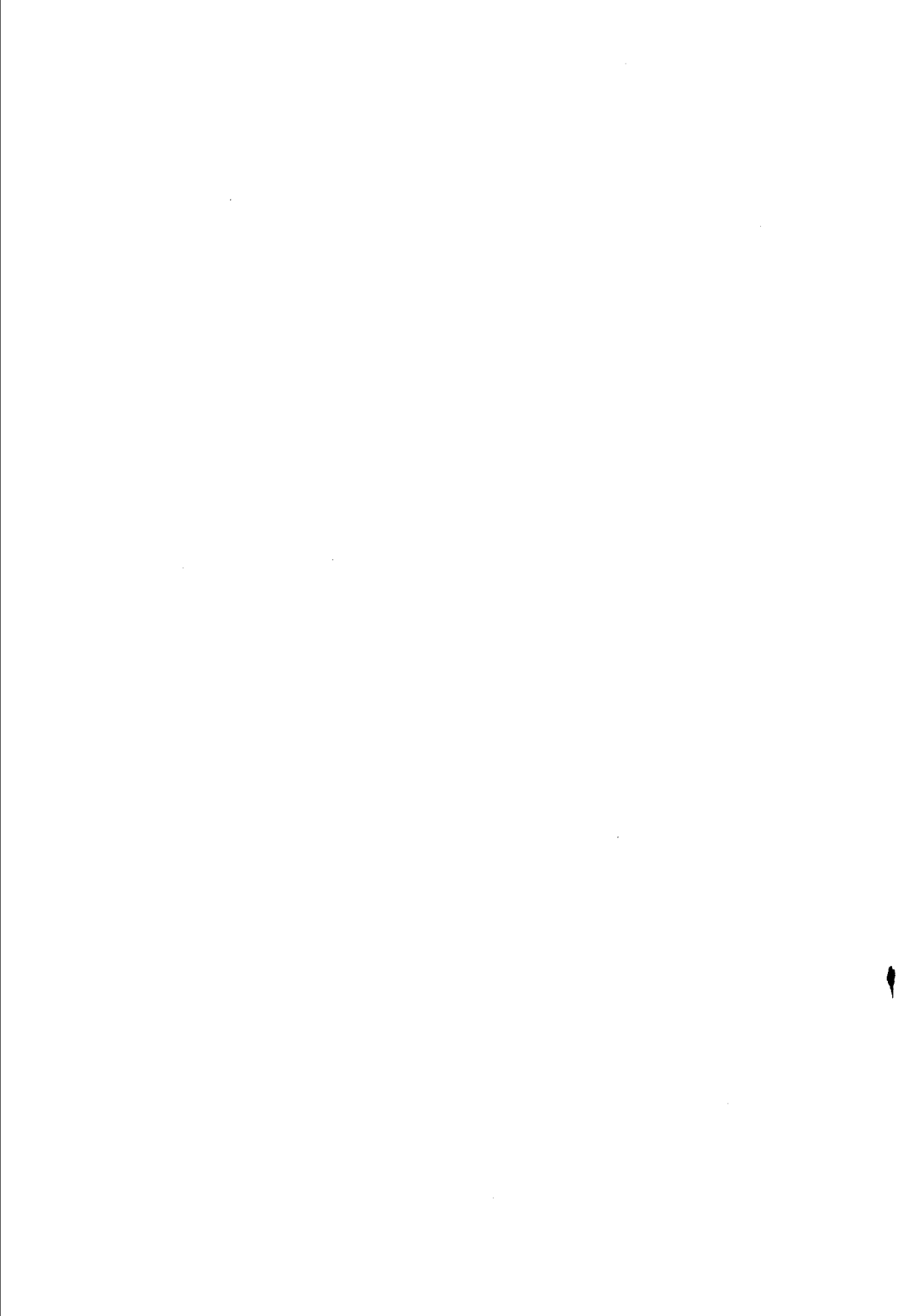
建设,没有建设,胜利也是空虚的。最近兄弟感觉到台湾更要注意这一点,大家要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来建设新台湾,为全国的模范省,使国内各省都以台湾为模范,进而使全国统一成一现代化的国家。台湾具有建设的条件,科学比其他各省发达,教育也很普遍,人民富于热情。所以大家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相信新台湾的建设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今后一切工作要积极,过去日本时代,在种种压迫之下,工作机会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要积极也不容你积极,要努力也无从努力,现在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国土,台湾人民是中国的国民,同时是中国的主人,陈长官常常指示我们说:“我们要用主人的权力来建设新台湾”所以不要像过去一样消极,陈长官欢迎人民来管理政治,有意见尽量提出,有力量尽量贡献,现在还难免有一小部分人对台湾政治及设施抱消极态度,我们要认定建设台湾,积极参加政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一定要改变在日本时代之消极态度。有一点尤要注意,即人民参政问题。台湾同胞过去五十多年很少机会参与政治活动,虽有评议会种种民意机构的设立,但都是假的。今天我们要建设真正民主政治就要大家积极负起责任(尤其是县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应该积极协助政府、监督政府,如果人人都消极起来,则台湾建设前途就没有希望了。

原载1946年8月25日《人民导报》



卷 二  
第二辑 台湾问题

---



## 王悦之氏之谬谈与北大台湾同人

台湾远离北京有几千里，台湾人氏到北京游历者寥寥。游历北京且曾实地作种种调查者，更无几。故台湾一般人之于北京各界莫从切实知晓——不只常人莫从知晓，即受过相当教育者与夫理应洞悉世界情形之新闻记者，亦黑暗然，凡所登载，亦不过耳食而已。

最近某报登载关于王悦之氏之谈话一节曰：“归自北京之王悦之氏谈云。台湾学生之留学于北京者十余人，内仅二三人受部之推荐焉，得以正式入于北京大学。然亦太无理，何则，英汉文及他诸学科，皆不相联络。欲入北京大学者，须经过小学中学高等中学，是其顺序。若以台湾公学校毕业生，而云入学于彼校者，岂有此理。此不过骗骗父母之金钱，到北京漫游漫游而已”。

此节谈话，于台湾学生之北京留学、前途消长攸关，是以不耐缄默，略而言之。其中之“内仅二三人受部之推荐得以正式入北京大学”云云者，最使吾人百思莫解其究何所指。北大台湾同人，只就13年截算，亦已有12人——或正式



考入、或受华侨特别考试。华侨特别考试，虽与正式考稍有出入，亦非王氏之所谓“受部推荐”者，乃正正堂堂按该校之入学规则入学者也。然则王氏所指者何？确为正式考入者乎？简直言之：北大之正式入学考试，乃铁面无私之入学考试委员会，用神不知鬼不觉之试卷匿名法举行者。自蔡元培先生长斯校以来，不但教育部无从周旋，即大总统、太上大总统之三鞠躬九叩头，亦未闻曾录取任何推荐生。如此论之，在信仰权威万能之台湾人士中，必有疑吾言者曰：“北大已是国立大学，自应受教育部统辖与命令，岂有部荐不行之理”。吾人宜知北大虽直隶于教育部，而教育部却无干涉其内部行政之权限。偶值教育总长，人格堕落、措施乖方时，则北大评议会且有宣告脱离教部而独立之实例。前之驱彭（允彝）驱王（九龄）与现之抗章（士钊），皆其著者也。

王氏系教部之一等部员（？）若已知某某受部推荐，得以正式入北大，则应知其确定数目，而曰“二三人”，其遁词可想见也。王氏亦苦矣！又曰：“然亦太无理，何则，英汉文及他诸学科，皆不相联络”。教育部为一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欲推荐学子，不慎重权衡其学识高博，足以与该校相联络者，反而孟浪作为，推荐不得其人，乃曰：“然亦太无理，何则……”其前后之矛盾，于理不通，其遁辞之更拙劣，已流露言表，识者自能分辩，无庸多论。唯是现当台湾一般人，对北京留学界，怀疑之际，此半节谈话，足使后进，裹足不前。愿吾台人氏考诸事实，而深察之！窃谓王氏敢出如是谈论者，非不自知其荒谬。乃料远离北京，言于幽暗之中，北京同人，无从知觉，黑白莫辩，可以伊于胡底。诂知无知

记者偏要与他作对。噫！王氏之运，何其乖欤！

今者吾人再退一步论：假定确有某某二三人受部推荐，得以正式入学之事实，则王氏正在教部占高位，某某二三人得王氏之恩赐斯大矣。凡德之不可埋没，亦奖励之方也。敢请王氏将被荐之二三人明指之，俾某某好在报上称颂大德也。

然而王氏谈话之后半节云云者，当此一般人对北大怀疑鬼胎，或曰北大程度不及日本高小，或曰北大皆录取小学毕业生，是非之论，百出无穷之际，是论庶足以解答之。于矫正是非，其功不小，亦不可抹杀者也。要之：吾人之所贵乎智者，贵乎能分辨是非取舍虚实，毋徒恃揣测而据之为参验也。愿一般人士踊跃前进，切实研究北京各界之情形以至中国各界之情形！

正当一般人对北京留学界，猜疑莫定，众难塞胸之时，顺叙几句以总括北京留学界之情形，并寄一片希望。北京留学界中，黑者自黑，而白者自白。抱满腔热血、兢兢业业者，自是抱满腔热血、兢兢业业；放荡漫游者自是放荡漫游，诚不可同日语，亦各时各地所不能免者也。希望一般父兄，毋因噎而废食，毋因有放荡漫游几辈子，遂一笔勾销其兢兢业业者。有志留京之远抱学子！其深察之！阻止子弟来京留学者，亦可以已矣！

(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午后三时脱稿于三斋

原载1925年11月《台湾民报》第77期

## 敬神吗？民族自杀！

台湾民众，自故来沾染迷信的毒素顶深。信神谄鬼的习俗，风行全岛。祀神祭鬼的行为，已成为一般社会的病态。迎神啦，进香啦，建醮啦，普度啦，清河啦……到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税轻收成好的年头，不用说，即在大战后，百业衰萎、景气不振的过去几年里，我们仍然看得见。一年中各地祀神祭鬼的次数，并不减于过去，其热闹的程度，也未尝低于往年。

然而这种病态，在往昔只发现于民众社会，官吏阶级不但没有参加过，并且因欲防绝每于迎神进香人群拥挤的时候，发生的打架、杀人等等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起见，也常常干涉过，禁止过。想不到近年来，统治台湾的官吏，尤其是总督，竟然肯下贱轻驾，出拜城隍，上供妈祖。气象一转变竟被传为美谈；因为御用新闻报纸善能替他们宣扬传布。因此民众信仰神鬼的心理，愈深切；从而祀神祭鬼的病态，愈濒于危笃。

我们仔细考一考，想这辈最高官吏阶级的拜神，果出

自何样的主意,为的是什么?若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分析之,大概可得下列三项中之一。(一)因尊敬鬼神的前身,贤圣英烈而然的;(二)因欲求神鬼庇佑他们升官发财而出于谄媚的;(三)此种行为是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且逐次推论,定出一个黑白来。按(一)项的假设,他们拜神的动机,果因尊敬鬼神的前身贤圣英烈而然的;那末,神鬼的前身贤圣英烈,那一个比得上文圣孔子,武圣岳武穆?为什么不拜文圣、武圣,不祀文庙、武庙,反来上供城隍小鬼呢?他们的本意不在此,不用多赘也就明白了。再照(二)项的假设,他们的拜神和一般的愚百姓一样,因欲求神鬼的庇佑赐福而然的。然则他们都已受过科学的洗礼;幸福并不是因谄神而可以得来的,灾祸也不是因媚鬼而可以消除的,这道理他们懂得顶深切,那有这样愚罔?(一)(二)两项的假设,既然均不合理,那末,其主意自然属于(三)项——此种行为是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这种手段是种很值得考究的问题;我们不妨也来试一试想。

要知道此种手段,须先明白他们的本职与根本目的。这辈最高官吏到台湾来的使命,是在统治台湾。台湾是块殖民地。殖民地的特质,是在供给本国以财富,调节本国人口的密度。换句话说:经营殖民地的根本义,在使本国的过剩人口,得移植于该殖民地,而除掉本国人满之患;而且从该殖民地吸收财富。所谓吸收财富,不限于政府直接的征税;汇回本国的总金额,也应包括在里头。然则欲达经营殖民地的目的,统治殖民地的官吏,自然不得不讲究手段。故

凡殖民地的官吏，莫不考虑出特绝的手段，使该殖民地的社会平静，甚至入于病态，使该地的人民稳健至如公猪，永远愚若土块，驯驯然安于现状，以任凭其本国人民宰割，榨取膏血，肉吃净血喝净，进而咀嚼骨头，然后其治绩乃大显著。台湾的统治官吏，自然逃不出本例：惨杀的手段也用过了，恫吓的手段也用过了，高压的手段也用过了。往昔民智还没受世界新潮流的洗礼的时候，强硬的手段还使得。无奈太平洋的潮流，偏要洗涤着台湾海岸；火车、船舶等交通机关，偏要把文明的空气搬进台湾岛来。致使民众的知识日渐开进，赶快要跟着潮流走；起来疾呼，要求生存在廿世纪的人们应该要求的人权——自由平等。而且这些要求又皆合乎人道，合乎正义，强硬的手段，也就使不得了。是以新近的统治官吏，自然而然地要看风势，变更其本来的面目，改用软索捆人，暗箭杀人的手段。是则近来一辈最高官吏好心裁，考虑出的拜神手段，乃应运而生的产物啦。盖他们认清台湾社会的病理，利用台湾人民迷信的弱点，从而提倡之，加重之，以施行其政策，再妙的没有了。譬如这辈官吏一拜起神鬼来，占台湾人民最大多数的无知的，而且官尊民卑的观念深已入骨的愚民们，对于鬼神的迷信中毒必愈深重；一面“听天由命”的情懒性加倍增长，反抗精神也就磨灭以至于尽；一面情懒成性，诸先进国的文物制度，就没暇顾，结果跟不上现潮流而落后，甘心安于现状。如此，他们就尽可以奏事半功倍的伟勋。这种手段也可谓妙哉！我们叫他做“拜神政策”；但也只是新改用政策中之一

而已。

我们虽然明白了最高官吏们拜神的主意，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更须进前来讨论人民方面的问题。台湾民众祈神祭鬼的动机，大别之可为下列两种（一）出自迷信心理的；（二）出自娱乐心理的。愚夫妇，因病理或其他原因，永久没产过男孩，或绝没有过生产，则必祷祈神鬼，求贵子早日降生。厌恶劳作，终日无所事事，只坐着盼望上天降黄金的懒蠢虾，也常向神鬼，祷祈庇佑他们发横财。甚至不事正业的赌徒，也向神祇立愿，求其庇佑他们赌钱必赢。其他如发白齿落的老头子，因欲延长他们的“苦命”，而向神鬼祷祝的，因近来多病多祸，而向神鬼恳祈替他们治病除祸的也大有其人。以上均属（一）种动机。下流社会，尤其是青年，因平时已缺乏高尚的娱乐知识，又没有适当的娱乐机关以供他们消遣，故每逢进香迎神的际会，均极兴高采烈地，踊跃直前以助成大规模的举行。这种动机属于（二）种。但是迷信心理，总要算为主要原因；而娱乐心理为副从原因。

我们再就信神谄鬼的误谬与其弊害，讨究一下。鬼神之不存在，科学昌明的今日，不必等我们的论长证短，其理已极明了。纵欲论长证短，也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容许，只得待后日有机会再来谈谈。让千步，姑认神鬼果然存在，照信神鬼者言，神居于天堂，鬼藏于阴界。天堂阴界这些地方均极庄正，神圣得不可侵犯；他们的职务与权能，又是在窥察人间的善恶行为以备将来做赏罚的标准。然则神鬼的不敢私偏，是当然的道理。神鬼既然神圣不敢偏私，而能答应无

理而且不义的要求,我不敢相信。不生育的夫妇,不究明其不生育的原因,是病理呢,或是交接不得其法呢,只一味傻气,向着鬼神祈祷;鬼神不是能施人工妊娠的医生,焉能包办这种事?奉劝这班夫妇,多懂些“性的知识”,看看张竞生编的《性史》。能这样做,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六七成的好成绩。厌恶劳作只盼望着“横财”的死尸,我宁咒他们早死,免多社会的担负。赌徒,如果谁都祈祷鬼神庇佑自己赌必赢,那末,赌徒众中,谁当输者?其乖谬可见。欲求长命而不讲卫生,反向人群拥挤,空气污浊的地方跑去,简直是自缩其命。还有病者,不就医服药,反乞求肮脏的炉灰泡喝,是走错了天堂的路,反向地狱去,是找死……,误谬不过。至若找娱乐于迷信行为中,蒙着益小害大的举动,殊非20世纪的文明时代所应该有的。其他高尚的娱乐,举不胜数,何适不宜?总观上述,可知迷信鬼神的荒谬绝伦的道理。

而且迷信鬼神的弊害,若滋长扩大必能使民族堕落退化。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殖民地;人民沦为殖民,沦为奴隶。既成的殖民永久为奴隶,为刀下肉。何其利害?盖一旦迷信心理坚执,则惰懒性成,苟且偷安,失却进取的精神,而甘于现状故也。其在物质方面的损失也属巨大。迎神祭鬼的行为,在片面的观察者言,似能集中市面,兴旺商业,间接于生产有益。但就大体而言,因这样行为而起的一切消费尽属着实的消费而非生产的消费。并且是“非必要”的消费。例如:烧化金纸香烛,信男信女们的南北奔驰,赛钱祭品……花费。一面停止生产工作,一面只管着实地消费,

尤其非必要的消费，财富的必然亏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关于这层我回台的时候曾得有一段有趣的谈话且引之：

有一次正值迎神的际会，到一乡绅家，寒暄之余，谈话涉及祀神祭鬼之于物质上的得失。这位乡绅则曰：“在这种行为中，农工买消商家的货，钱财虽然流入商家；但商人一旦再买农产品，制造品，其金钱则重归农工，轮回流转，终流不出岛外……”一班知识稍为开进的台人，对于迎神之于物质上的损失的评判，都因这句“轮回流转，终流不出岛外”而惹起很大的错误的观念。其实他们全不懂得现在的经济现象，其交易不限于岛内，而是岛外的，国际的。商家所买的农产品，制造品，不仅是台湾农工所出产的，恐怕大部分都不是；即里头有一小部分台湾自产的，也不是台湾人民所专利的。台湾人民只管着实地消费非台湾人民所专利的或来自岛外的货物就市面观之，好像由台人手里转到台人手里，财富终流不出岛外，而实际，台湾的财富已于无知觉之间，层层重重流溢于岛外，台人一天穷似一天了。听说每年全岛花费在迎神，进香，建醮，普度等迷信动作上的总金额，在千万元以上。这千万元以上的巨额，即是台湾岛民因信神鬼得来的“纯正损失”。岛民苟能免去这种迷信心理，这千万元以上的巨额，的确是岛民的年年的额外的财富。还可以利用因迎神所花费的时间于生产上而得更大的利益。岛民有此现成进款更大的利益不取，反偏要妄冀无有的钱财，做无谓的举动，再无意义的，没有了！

台湾岛民，傻头傻脑地只知道“求丁、求福、求延寿”，



却没留心到搬走台湾财货，榨取台湾民众的膏血的总督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策。丁，福还没求到，寿命还没延得，恐怕自身的肉，已经被人吃尽了；自己的血，已经被人喝净了；三百六十多万的死命，已被制于无形中了。俗语说得好：“明刀易避，暗箭难防”，可不是玩！

要而言之：总督们的拜神并不是出于敬意，而是手段。是政策，是用以暗制三百六十余万台湾人民的死命的愚民政策。脑筋顽固的老百姓以及土绅士们若不早些醒悟，痛快地改除去一切的迷信，则沦为更苦惨的奴隶，变成刀下肉，“民族自杀”的终局必可立待。顽固的同胞呀，快醒悟吧！即刻明白这“明若观火”的结论吧！如果你们不愿意沦为更苦惨的奴隶，变成刀下肉，目睹民族自杀的终局；避开的方法也并不难；是种最简单而且自能的。古语说得妙：“物先腐而后虫生，心先疑而后谗人”，台湾民众若没有迷信的弱点，这样愚民政策，自然归于无用。

我希望多数的顽同胞，能够自己醒悟，除去各方面的弱点，成为虫侵不入的物，谗加不上的心，健全的人！我更热烈地希望以先觉者自负的人们，竭力于文化运动的人们，谋民族解放的人们，在各方面直接多做些这类的工作，提醒顽民的弱点，以养成健全的民族无病的社会！！

敬呈張光正先生

李賢次煇誌

1991.8.23

# 少年臺灣

號刊創

錄目

發刊詞	(張邦軍) 記者
少年台灣的使命	(張邦軍) 莊君
今後的文化運動	(溫炎秋) 若
台灣史略	貽霖
一年來之中國政治與戰局	敦序
敬信嗎？民族自救	(宋文滄) 奔
老莊學說的異同	(黃偉霖) 謙
台灣閒話	(張邦軍) 謙
少年春秋	(張邦軍) 謙
編輯餘言	(張邦軍) 謙
定價：連郵費每册一角全年一元	記者

《少年台湾》创刊号封面

## “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动

本年十月台湾雾社发生土番杀害日人，日人统治者立派大兵“剿灭”。在此事件当中被害者，日人据报当为一百二三十人；番人若自所谓“剿灭”推论，当在数千以上。此事不得不谓为东方最近的重大事件。且系发生于殖民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其重大性更可想见。我们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惟自10月27日事件发生以来，为时已将二(个)月，且其经过的情形，各报皆有扼要的纪载，所以我们对于事情的经过，无需赘述。我们只就问题的所在，加以检讨，并略述我们的感想。

我们先就本事件的发生原因检点看。据视察台湾的东京帝大教授庆松氏谈话，此次台番暴动的原因有四：其一为积怨甚深，其二为国势调查引起番人的恐怖，其三为日人之欺弄番妇，其四为新换警官不谙番情，常使番人不满（据11月5日《大公报》所载门司4日新联电）。但是据我看来，上列四项皆系书生之谈，无足凭信。盖因第一项乃暴动

的要素而非其原因；二三四三项的发生非始于近日，其不能构成此次暴动，自不待言。我们以为台湾警务局长的电报所列，较切事实。据台湾警务局长发29日晨拓务省管理局长所接电报，台番暴动的原因或许如下：（一）同方面番人最近因人夫的征发频仍而有诉苦之声；（二）豪果番社出身的花冈一郎（小学毕业后目下雾社乙种巡查在职中）因其薪水等等少于其他同级生而常泄不平；（三）番妇关系（载10月30日《东京时事新报》）。若于上列原因之外，再加入一般所揣摹的“强迫移住”，则本事件发生的真因，大略可以想见。

帝国主义者之经营殖民地，目的在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剥削的方法，在于“光明的榨取”与“秘密的积蓄”并行。日本剥削台湾经济的方法，也莫不循此轨道。一般殖民工资薪水的比日人特别低下及人夫之被任意征用，是“光明的榨取”。因土地登记关系而日人取得土地（例如竹山嘉义斗六的竹林所有权的移动——见蔗农译《台湾民众的悲哀》），及以各种企业公司募资的名目取得殖民地人民的财产（台湾日本政府常以官权帮助日人资本家募资——见本刊本期《日本资本在台湾的发展》），就是秘密积蓄之显著者。若上引台湾警务局长电报所列（一）人夫的征发频仍，与番人花冈薪水之特别少，岂不就是“光明的榨取”？为着日人资本家的水电工事的经营而强迫原住其地的番人移住，“秘密蓄积”的赤裸莫过于此？

然而番人也是人，衣食住皆不可稍缺。劳动的报酬过少，则生活窘困；常被征用人夫，则本人及家族的生活失去

保障。况且强迫他们离去久住的故乡而他徙——自然迁入生活资料更不可靠的深山，生性顽固不东乔迁的番人，自然不能堪忍。不平则鸣，强压则反抗，人之通性也。莫怪受过日本教育的花冈一郎竟为此次暴动的指挥者。且他一倡，则雾社全部番人起而应之，听其指挥，其志皆在必死，更是事理的当然归宿。

日本统治台湾，常以“一视同仁”，“醇化融合”，“引诱善导”为口头禅。对于生番则标榜“抚顺”，“德化”。“一视同仁”，“醇化融和”的结果，台人的冤声布于全岛，革命之起屡有所闻。“抚顺”“德化”的结果，最近又有此次番人大暴动的发生。无论台湾的日人统治者怎样掩饰，欲使本问题不至于重大化，但是这种“优良的成绩”，却是永久留在世界的报纸上，印在关心被压迫民族者的脑海里。并且在本事件发生后，标榜“抚顺”“德化”的日本统治者，派出大队兵马，断绝番人的归路，遣飞机掷炸弹，大有灭尽台番之势。“抚顺”“德化”土番30多年尤有暴动发生，本即为文明国家的耻辱；而日军耀武扬威，自鸣战胜，不知道素以世界第一等国(!)东亚文明国(?)自豪者，将何以自解?!日本《中央公论》12月号小评中(卷头言)所言：“我们不能不在世界公义之前痛切感觉羞耻”，可谓痛快的“当头一棒”。

# 台湾农民的惨痛

——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殖民地人民以农民为最多，且最惨痛，台湾也不是例外。帝国主义者之征用物资，掠夺物资，先自农民开始；土地资本之吞并土地，自然是以农民为对象；第一期资本原始积蓄，也皆以农民为抢夺的对象。

先自土地之掠夺讲起。台湾的土地兼并最显著事实，为新式制糖会社之强买台湾的土地，该会社在十数年前所有土地面积即达78,601甲，佃权取得地也有25,237甲，合计103,838甲（每甲等于2.3英亩），约占台湾耕地面积八分之一。其中，花莲港厅盐水港制糖会社所有耕地为5,001甲，竟占该厅耕地总面积四分之一。这种土地买卖的秘密，日本作家山川均已经说得清楚：“制糖会社之取得土地，虽说是依据买卖形式，而事实上各会社都强制收买农民的耕地，这种事实强行于台湾，可以大书而特书的。”这

种强制收买,是帮助于警察力的,其卖价不决定于卖主而只单决定于买主。

就中,日本资本主义之无偿地强占台湾土地,尤为强制土地兼并的极端事例。且举林杞埔事件为例吧,林杞埔是台湾最有名的竹林,1,600户,12,000农民的祖遗产业和生活手段。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初年,还承认这些竹林是农民的产业。到1908年9月忽有一天,乡下皇帝的警察当局,召集农民,宣布把这些竹林编为帝室御料林地,硬要他们在预备好的纸上盖印划押。于是民有竹林一变为帝室御料林地,但不久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再变为三菱制纸会社的租赁林,不久又再变而为“三菱造纸会社地所有林”,旧时的竹林主人,却只充当会社的苦工,出卖劳力罢了。

日本资本对台湾农民的剥夺,第二表现在制糖会社与蔗园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制糖会社自营蔗园的农业劳工,固是一种新式的佃佣奴隶。即佃种糖业会社的土地的蔗农,也莫不是一种隶农,其会社与佃者的关系,既不是一般的主佃关系,更不是地主与农业资本家的关系,佃农租佃土地,无利用土地的自主权,而种植的是制糖会社指定的甘蔗,地主的目的在于佃租的收入,而是原料的缴纳。佃农的工作须受会社的指挥,月须供给佃租糖约以外的余闲劳动,由会社付予随意的工资,蔗农的剩余生产物,亦须卖给会社,而依指定价格决定价格,所谓指定价格自然是最

低价格。制糖会社还可以随时由军方收回耕地，佃农无主张耕作权的自由。

日本资本对于台湾农民的剥夺，第三表现于制糖会社与甘蔗生产者之间的买卖关系。台湾农民生产甘蔗，必须卖予制糖会社，几家制糖会社并且将台湾蔗园，划成区域分辖收买，阻止买主竞争并可以自由剥夺。制糖会社剥夺蔗农的方法，约有二端：其一是甘蔗的价格表明为共同规定，事实则完全决定于制糖会社单方；其二是数量多少也完全由会社商定，普通一万斤以八千斤计算，或甚至更少。这种关系不是普通“等价交换”，“而是带着强制性的不平等交换”，卖主不能以商品换取买主相等价格的货币。这里头有警察的魔手在摆动。会社普通利用“无法无天”的警察权，干涉甘蔗的买卖，强制蔗农服从会社的条件。会社并且运用预货款项的手段，束缚蔗农的买卖自由，在这种买卖关系之下，台湾自由农民沦为半封建的隶农，而只能过着低物程度的生活。

台湾被剥夺的农民，不只属于蔗农，即其他稻农及什么农民也莫不备受同样哀痛。日寇每年须由台湾征用五百万石的特种米，称为蓬莱米。台湾农民须辛辛苦苦耕种，而独自己不得一石，台湾同胞亦皆只能望粒兴叹。同时，糖业独占资本家（称沙糖国王），为保持并增大它们的利润，而愈益企图扩大蔗园的面积。于是台湾中南部的蔗园，逐渐侵占米谷的耕地。这是台湾耕地问题与朝鲜耕地问题不同



之点。而自由的台湾农民,就日益沦为半农奴的蔗农,须待台湾革命成功,始能得到解放。因此,光复台湾,是民族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

(4月3日于陪都)\*

原载1942年4月6日《益世报》

## 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

本文系台湾革命同盟会常驻委员宋斐如先生在台湾光复宣传大会的演说。其中叙述台湾人民的战斗经过,并对日寇统治台湾的方式和台湾解放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兹特刊载如下,用供内地同胞参考。

各位长官,各位来宾:

今天是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兄弟首先代表台湾革命同盟会及全体台胞,向几方面道谢。第一,今天天气不佳,道路泥泞,而各位长官,各位来宾,犹踊跃到会。第二,差不多在这两个礼拜来,陪都各文化团体为了本大会的筹备而热诚赞助。第三,今天陪都各报都为我们出版台湾光复运动专刊或揭载专论及社评。对我们这个运动表示热烈的襄助。以上三方面的厚谊隆情,都非常可感,所以在报告之前,谨致感谢之忱。

关于台湾的历史和割让后的情况,刚才主席覃院长已经提到,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台湾与祖

国关系之密切。

从地理上说,大家都知道,台湾距离福建很近。从厦门坐船到高雄只要四个钟头,两地相隔不过一衣带水,台湾实是全国的海防屏障。从人口上说,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台湾与祖国的关系更为密切。至于中国人怎样去的,可谓由来已久,用不着我多说,大家也很清楚。不过大多数是郑成功领导扶明倒清运动时带去的。现在全部人口是五百七十四万,中国人计有五百三十九万三千余人,大部分是福建和广东人。日本人占一个渺小的数字,大约三十万的样子,另外外国人有四万多,其中还包括华侨在内。所以从历史上(主席已经提到)、地理上、人口上这三者观察,都可以证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怎能让它受敌人的宰割呢?

还有,台湾除了上述三点之外,尚有一个中华民族所不能忽略的特点,就是它始终是抵抗异族统治的坚强根据地。不但是过去明朝抵抗满清的最后堡垒,四十七年来抗日运动未尝停止过,也就是将来瓦解日本帝国的一个强大的据点。民族英雄郑成功在三百多年前,为了拒绝异族的统治,带了数千同胞,尤其是福建的同胞,渡海到台湾去继续作战。虽然大功未成,但却播下了反抗的火种。所以终有清二百六十余年,民族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计大举三十余次,小事件就更不用说了。台湾的反抗使得清廷大感头痛,李鸿章就曾说过,台湾“五年一大叛,三年一小乱”,这正是郑成功播下的火种的延续。

一直到1895年甲午中日之战,清廷败北,刚才主席已

说到,当时敌人已占有辽东半岛,而清廷以为辽东半岛比台湾重要,所以愿割台湾换回辽东半岛(其实在今日看来,敌人发动南进,台湾的重要是远远超过辽东半岛的)。不过清廷虽然甘愿把台湾割给日本,而台湾人民却不愿受异族统治,所以起而抵抗,由丘逢甲先生领导,成立东方第一个民主国家。以台抚唐景崧为大总统,以号召守卒,并以总兵刘永福为帮办;自己亲任义军大将军。直抵抗到奉清廷电报:“台抗京危”,就是说,要是你们继续抵抗下去,北京便危险了。唐刘二位接到这个电报才罢手。而丘逢甲先生犹眷恋三百多万台胞不肯委弃,后作沧海诗集,词极悲痛。

不过当时官兵的抵抗虽已停止,而民众的武力抵抗,从1895年以后十余年间还是继续下去,使敌人不安寝。总计为抵抗敌人统治而死亡的计五六十万。当时台湾人口只有三百多万,五六十万的死亡,不能不说是壮烈的牺牲。后来敌人统治武力日趋强大,举义虽然不容易,但台湾同胞反抗敌人的意识依然浓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采取社会运动的形式继续进行,相信此后也永远不会消灭的,必定继续到日本统治瓦解为止。

其次,要报告敌人如何统治台湾,这可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在政治上,敌人的政治制度本来是很野蛮的,(是半封建的政治体制),而对台湾的统治尤其野蛮。割让后的台湾并不是由所谓天皇直接统治,而是由“六三法律”(1896年3月30日公布的第63号法律)授权台湾总督一手统治。在残酷的“六三法律”支配下,台湾的统治可以说是一种暴君

的专制；个人生杀予夺完全操在一个人手上。而这种专制的统治，是透过警察制度执行的。警察的权力最大，他可以随意对人民加以逮捕或殴打，随便侵入人民住宅，因此，常常酿成反抗的事件。这种事件，多到不胜枚举。

第二，在经济上，敌人不只是实施经济的剥削，而实在是超乎经济以外的掠夺。譬如砂糖、樟脑、米盐、茶、水果等是台湾的特产，而几乎完全成了日政府或日本资本家的专卖品或独占品。台湾有砂糖王国之称，就是敌人利用台湾制糖会社，日本制糖会社，强占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栽种甘蔗，造成经济王座。不过他们向老百姓收购，并不是用普通买卖的方式，数量价钱完全由会社规定，由不得老百姓作主，例如普通一万斤的甘蔗只能作八千斤或六千斤计算，所以一般蔗农都叫苦连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日本强盗统治的苛刻了。

第三，在教育上，敌人所能给我们的只是奴化教育，而待遇上尤有厚薄之分。日本人读的小学叫做小学校，中国人读的小学校叫做公学校，后者的程度比前者者低得多。而且中学以上，就很少中国人能够进去与日本人共学，因学校里有厚薄之分，所以常常闹出民族的斗争。比方日本学校，普通高年级学生的地位是哥哥，低年级学生的地位是弟弟，但是中国学生便不适用这个规例，无论年级怎样高，对日本学生来说都是弟弟，日本学生无论年级怎样低，对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哥哥。在某一个学校，中日学生曾经因此引起斗争，约定到练兵场去举行决斗，后来被侦探侦

出,才被禁止。这不过是指其一端,其实在教育上的束缚毒害,又何止待遇上的不平而已。

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看,日本统治台湾用的是半封建的野蛮的方式,我们五百多万同胞所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所以四十八年来,民族解放的武力斗争,始终没有中辍过,但大多数是地下的孤立无援的行动,很少得到祖国同胞的了解。到了今日,才能够向祖国同胞公开提出光复的口号,希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在祖国方面也正如刚才主席所说的,过去四十八年来:我们一直表面缄默着,到今天才能作公开的呼号,台胞的悲痛,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的要求(目标)很简单。台湾和别的沦陷区不同。六百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来。我们很清楚,我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更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我们也有权利要求祖国表示收回台湾的决心,宣布台湾是一块失土,和其他沦陷省份一样看待。我们还要求祖国赶快完成收复的设施,如正式成立省政府、省党部、支团部,设置参议会及国民参政员。有了这些设施才算奠定了未来的基础,集中党政军及社会文化教育各界的台湾人才,而发挥更大的力量。

不过,在一般祖国同胞心目中,常常存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台湾革命运动向来不统一,要我们首先统一起来,然后方能够从事上述各级的准备。我今天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台湾革命运动并没有分裂的事实,并没有不统一的地方;虽然表面上有许多团体,在两年前也有许多

党派的存在,但这并不是政见的不同,而是因为地理的限制,同志们不能公开集中起来所产生的现象。自去年以来,由于祖国抗战的关系,各团体已经完全统一,各党派的意见也完全一致,大家都在台湾革命同盟会这一个组织下努力进行种种革命工作,虽然还有地方组织和特殊单位,但都服从同盟会的领导,以同盟会为公开的对外的代表。因为同盟会是代表全台五百多万同胞的一个总体,所以我们主张在省政府未成立以前,它要具有政治机构的性质,在省参议会未成立以前,它应该是代表民意的机关。上次我们要求增设台湾参议员时,行政院曾经质问过我们:各省参议员是由省参议会选出的,台湾尚未有省参议会,为何产生参议员。我们的答复是:在省参议会未成立前,台湾革命同盟会就是代表民意的机关,参议员可由同盟会提出以供当局圈定。当时行政院方面也很以为然。

总之我们可以综括地告诉祖国的同胞们,台湾的革命团体已经完全统一,祖国也要设法加强这个统一。台湾革命的目标是非常单纯,就是要求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来。祖国党政当局,应当热诚接受这个要求。我们知道这种工作相当艰巨,要完成这种艰巨的工作,固然需要五百多万台湾同胞的努力与奋斗,同时也要靠祖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协助。老实说,收复台湾失地,已不只是台湾人民的责任,而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责任。我们非常诚恳的要求党政当局,及祖国同胞负起这种共同责任。孙院长曾经预祝我们:“相信到了《马关条约》50周年纪念的日子,台湾的同胞一

定可以在祖国的怀抱里,以自由平等的国民地位,享受新世界的幸福”(《解放已在目前了》)。我们恳切希望祖国当局以孙院长这个预祝为方针,推进收复台湾的工作,同时,我们相信这个预祝将来一定成为事实,使五百多万呻吟于敌人魔掌下四十八年的台湾同胞拨开云雾,重见天日。

原载1942年4月17日《新华日报》



台湾革命同盟会总会干部名册		姓名	年龄	籍贯	出身	现状
李其	等同	右四一	福建	泉州府晋江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林福	等同	右四一	台湾	台南府台南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谢坤	等同	右三二	福建	泉州府晋江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邱天	等同	右二四	台湾	台南府台南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宋斐	等同	右四一	福建	泉州府晋江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李立	等同	右三八	台湾	台南府台南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谢坤	等同	右二二	福建	泉州府晋江县	台湾革命同盟会	现任

171734

“台湾革命同盟会”总会干部名册首页

台湾革命同盟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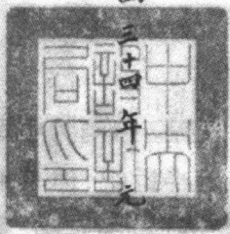
1941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团体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其创立宣言明确指出：台湾同胞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了四十多年了，现在日寇又在进行对中国的鲸吞与蚕食，“但是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绝对不能永久忍辱做驯服的羔羊”，“台湾解放运动很自然地构成中华民族革命的一部分”，“台湾现在已经不能离开祖国的反日反帝运动而求得解放”，并号召“台湾同胞要以本同盟为中心结成反日反帝的整个联合战线，参加祖国对日抗战”，坚信“祖国对日的全民抗战最后必定胜利”。由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三人任常委。

中央設計局任用書 字第 754 號

任用宋斐如為本  
局台灣調查委員  
會專任專門委員

總裁蔣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月十三日



藍印卷伯臨  
校對徐天麟

## 如何收复失地台湾

### ——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

台湾问题已上中国及国际的政治日程。台湾为中国四十八年前的失地，日本虽蛮横统治将近半世纪，但其地人民皆以回归“唐山”（移居海外如台湾、南洋群岛之闽、粤同胞，称内地为唐山）为夙愿，台湾革命志士亦以推翻日本统治拯救台胞归宗祖国为第一决心，将来打败日本后台湾之归还中国，在理在情已无可否认。且中国政府早定收复大计，国际人士亦多著论支持，如颜露尔和拉铁摩尔两氏，皆主张战后台湾须归宗中国，朝鲜须独立。

但，不幸之至，迩来美国舆论对于战后中国复土问题多有错误的主张，其谓“台湾应划归国际共管，台湾不宜划为中国领土，台湾居民亦不得投票，要求回归中国”（美国1942年8月号《幸福》杂志附刊所发表《幸福》、《生活》及《时代》三大杂志合草之《战后和平方案》中第二件备忘录）；尤为荒谬绝伦，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上，皆有极其密切

的关系，血浓于水，台湾必须归还中国，固无庸疑义，此种措置亦为法理及人情所支持，实不容国际人士因别种战略上的打算而有所变更。此点，孙院长哲生及《大公报》均已著文阐述，兹再略抒管见以告我国人士。

台湾与祖国的血水关系至为密切，谈论台湾问题，不能不先认识台湾的历史和地理，然而“血又浓于水”，民族主义在台湾问题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台湾同胞不先恢复国民资格，复土运动必大减效果。

葡萄牙人虽先发见台湾，赞赏其美丽而称曰：Formosa！但却不是台湾的主人。而正格的台湾主人，是汉民族，台湾人民是汉民族的民族先锋队。台湾与汉民族的关系，据说是自禹贡时代起，后汉孙权也曾派人至台湾勘察过，至隋炀帝，而正式占领台湾。但这些还都是消极的一时的意义，直至明末台湾始成为汉民族生存上永久而积极的根据地。明末，满清入寇，内地尽陷，万民称臣，独郑成功率八闽子弟，据台湾孤岛，布政施教，开发经济，欲借台湾以为扶明复清的根据地。于是土著生番移住深山，汉人耕于平地，其后闽、粤两省不服清制之士，皆相率而至台湾，台湾文物制度遂具备，经济大发展而蔚成文明地域。

台湾是汉民族抵抗异族统治的基地。先自明末清初讲罢，满人入关，全国披靡，屈从清制，独郑成功据台湾抵抗满清到底，终其世，清兵无可奈何，即至郑氏三世为清所降服。但台民仍武力抗争不已，故李鸿章常叹曰：“台湾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乱，”甲午年清廷无智割台湾予日本，也

半由于此。即至甲午年清廷战败于日寇，割台以求和，台湾民众并未降服，先成立台湾民主国，继而武力抗争二十余年之久，壮烈牺牲者五十余万人。近仍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抵抗日本的统治。总之，台湾人是汉人，充满着汉族的血，富有“国姓爷”郑成功的精诚与气魄，且有八闽两粤的冒险精神。

汉民族经营台湾历三百余年之久，现在番殖成了五百五十多万的大部落，经济的发展也已赶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水准，物产不但足以自给，且有剩余可供输出。大部分的米和糖输往日本，樟脑和茶叶皆大量输出世界，水电力可以充分供应现代工业之用。热带物产应有尽有。自然界皆甚美满，只在人文上残留着一大遗憾，就是二十多万的日本人统治着二十七倍多数的汉人。其统治方式的残酷与野蛮，终使台湾社会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今日，仍以民族界线划开人类的鸿沟，于是台湾的五百五十多万汉人，没有幸福可言，只过着异族统治下的奴隶生活，有时也奋起，作无后援的反抗，而以孤军全没为下场，台湾民众之抵抗日本强权，国内人士或少知其“血流漂杵”，但如余清风、罗俊之役，死亡达十万，如雾社之“征剿”，日军竟用飞机毒气烧山洗村，其壮烈与凄惨，亦足道矣。

然而台湾汉人最悲惨者，厥为徒具坚强的民族精神，而事实上却是无国无家。以前祖国因限于环境与力量，对于台湾没有关心，也不能关心，故一任日本挑拨民族感情的毒计横行于国内，台湾人在祖国的地位遂成了外人，一

般同胞皆歧视台湾人。抗日军兴后，国人尽视台人为日谍。因为这个原因，凡不服日寇统治而潜逃归国者，也不敢公开，只能借闽粤籍贯以为掩护。台人之服务贡献于祖国教育文化如许地山者，功绩不为不伟。北伐之年，为完成三民主义革命效死疆场者，以数百计。抗战军兴后，踊跃投效于党政军文化教育各界的台湾人，总在数千以上。但是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依然淡薄，表面为国人所知之台湾人，似甚寥寥无几，其固有必然之理，可不言而喻了。

然闻英明领袖早决完整国土之心，党政当局已定收复台湾之计划。尤其自太平洋战起，台湾的战略地位更加增高。台湾隔我内地仅一衣带水（海峡最狭地方，行舟四小时可达），加以血肉关系甚深，收复原属易事，日本帝国在台湾，并未立足脚步。依国父的分析，“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见民族主义讲演），其方法固在政治力、经济力，及人口压迫。日本在台湾的人口政策已经失败，其政治经济压力之成功，也只占领了台湾，并没有征服了台湾人。最初的“手枪政策”已告失败，最近乃发动同化政策，欲强制台人改易姓名，废祖宗而祀天照皇大神为始祖。其奖励汉人与日人通婚，结果无一汉女嫁日人，其同化政策将因祖国的台湾政策运用得宜，而完全成为泡沫。

收复台湾须自收揽台胞人心下手，而收揽台胞人心之妙，在于运用民族主义。国父指示过我们：“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至宗族，再然后方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

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的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容易联络得多”（民族主义第五讲）。

台湾人的宗族观念极深，每一家或一族，皆与“唐山”保持着族谱关系。用宗族关系去联络台胞，容易亲密混成一片。只是今日于宗族之外，显已形成另一个更大的单位，那就是国族。国族原构成于宗族与家族，但此台湾宗族与国族的连锁，却已为法律所阻碍，为日寇离间民族政策所遮断，故欲运用宗族关系以发挥民族主义于台湾，须先接上宗族与国族的联系。其方法就是祖国积极宣布：台湾人即中华民国国民，祖国已为收复台湾而苦心孤诣。首先要着，就是集中台人的力量。但是台人回国皆以上述关系而变成潜伏的力量，皆不肯显身说法，台湾人的国族地位不恢复，台胞的潜伏力量如何能够集中，更如何能够集中组织，集中意志？

收复台湾的第二要着，应该是争取“台胞内向”。争取台胞内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民族主义的运用。台胞受治于日寇达四十八载之久，加以政治经济的压迫，其民族精神不无多少变化，故欲争取台胞内向，必须先复活台胞的民族主义，这是国父遗教中最紧要之点。但是过去台胞宗族与祖国国族的联系久为法律所切断，祖国政府一向亦未关怀及此，缺欠正确一致的台湾政策，遂致向往祖国之士，虽有悍然冒犯日本法规毅然归国者，常抱满腔热血而来，扫兴垂头而去，大都遭遇白眼与歧视，能坚持奋斗以底与

立足者，实千万份之一而已，故今日欲争取台胞内向，须先打开国门，这就是公开承认台湾人的国族关系，确定台湾的政治地位。中国古来最重名分，以明不正则言不顺，纵有台湾志士欲为祖国效命，亦唯恐死得不明不白。若仍误认台人皆为日谍，请问台人的力量将由何出？最近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方针，一面着重于台湾岛内工作，一面又公然提出设省建政，正式设立省党部，成立台湾正规军，请设台湾参政员，自有充分的理由，其动机也十分纯洁，现在敌人不但在积极谋同化台胞，且欲利用台胞为桥梁，继由宗族关系，来怀柔我沦陷区的同胞。以前日寇驱台湾流氓，及罪犯等败类于我沿海各省，今则改变策略，收束这些败类而代以所谓善良商人，其心叵测，良可警惕，愿当局三思现势之转移，考虑适当办法，以相抵制。

台湾之政治设施，已无可顾忌，美国颜露尔及拉铁摩尔两氏，已为我国主张正义与主权了。我国对日宣战只在消极方面撕毁了马关条约，但台胞之恢复国籍，尚须政府正面的宣布。今日台胞先觉者之复籍复权运动，已成合理要求，国人应予以积极支持，不应再事怀疑犹豫。

中国宣布台湾人为中华民国国民并从实际上推进政治设施，还有一种更大的作用，就是安定国际人士，乃至各国政府当局，有错误的主张或措施，如前引美国《幸福》及《生活》等三大杂志的“战后和平方案”提议台湾归国际共管，战后台湾之归复祖国，为中国合理的要求，数年来国际大多数人士皆已极表同情，并积极支持。深愿党政军当局



透视国际的变动趋向及台湾革命的主观客观情势,对于收复台湾工作,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收揽台胞人心,以利失地之克复,并阻止国际间不正确的思想与措施之发生。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

原载1943年3月30日、4月1日《大公报》

## 台湾在急激演变中

在开罗举行的三强会议，已经决定了台湾归还中国，台湾的同胞，在战后必然是重回祖国的怀抱的，但是台湾的同胞久处于水深火热中，如何早日把他们救出，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而处于日寇宰割下的台湾同胞之悲惨，尤值得我们深切的关心。

处于日寇铁蹄下转辗半世纪的台湾同胞，其命运与环境，时常在演变中，近年的演变尤其激烈。自四十九年前，昏庸的清廷将台湾割予日寇以来，台湾同胞即处于异族随意屠杀的命运之下。后来，日寇采用愚民教育奴化教育，台湾同胞受愚弄的程度，日益加深。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台湾在日寇侵略上的重要性格外增加，而日寇对于台湾人民的愚弄，改变一种新花样，着重了同化政策，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总督府更对台湾人民实施所谓“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改名易姓，废宗祀而拜天照女神，强要台湾人民食豆浆汤、着和服、捆腰巾、履木屐，等等，不一而足。台湾人民若不照办，则其日常生活将感极度困难，如乘

车搭船,购买必需品,皆遇非常的不便,甚至如子弟的教育权,将完全被褫夺。

尤其是日寇的“战时设施”,使台湾同胞受到更惨痛的遭遇。日寇在台湾的统治专靠军警网,而以保甲连坐制度为其助,战争爆发以来,更变本加厉,日寇为防台胞革命,而实施了“保甲连坐法”,并且组织所谓“防谋团”及“保甲互助队”,加给台湾人民以沉重的锁链。

同时,日本政府还强制台湾人民,普遍组织各种反动团体,如所谓“报国勤劳少年团”、“青年团”、“壮年团”、“女子少年团”、“女子青年团”、“皇民化运动推进少年队”,及各级学生“救国勤劳奉仕作业队”等等。其用意,一面固在苦扰台胞并收以台制台之效,一面又在迫使他们参加日本强盗的阵营,给日寇增加多少力量。

台湾同胞命运的恶劣变化在服务战时工役及兵役上,开一新纪录。据年初的消息,日寇在战争初期施于台胞的军役,在台湾岛内强迫贫苦台胞,挨饿建筑各种军事工程,在岛外则抽调壮丁,派送中国及南洋各战场,担任勤务,大多死于战场上。至前年6月间,台湾总督府更公布了“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于去年2月1日,规定凡满十七岁以上(没有最高限度)的台湾人民,皆有被征的义务,是为服务兵役的进一层束缚。

“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规定训练期间6个月,每年实施两期。第一期开始于去年6月,第二期开始于去年12月,今年5月间即可毕业两期。其毕业者资格等于特种兵,须入

伍在营房生活,闻第二期毕业生,已编入第一补充队。据去年2月中旬,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载,“台湾特别义务兵的志愿者,统计总数已达二万余人。其中台胞一万九千余人,番人九百余人,女护士二千余人”(皆据《半月文萃》上本人拙作《太平洋战争中的台湾》)。

台胞服务兵期,据最近(据东京9月22日电称)“兵役制度”的实施,变成铁一般的确定,自十九岁至四十五岁的台湾同胞,皆要被用以与祖国或祖国的盟邦作战。其具体的条例,及实际施行的结果如何,现尚不得知,但是日寇此种措施,实在值得我们深虑,兹举其服务者,剖析于下:

第一,日寇在此后作战上可以增加一大批兵备。台湾汉族人口约为五百五十万,生番也有三十万,合计五百八十万。假定其半数为男性,其有服兵义务者,又假定为40%,则日寇可在台湾获得的兵补为一百六十万。即台胞百多万人,不派进来中国而分到南洋各地,其对同盟国的影响,也自甚大。

第二,此种新兵种,即能在各战场发生的作用,大堪注意。日寇的对外侵略,惯用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对我中国则为“以华制华”了。日寇之“以华制华”政策,前后方式与用意,固有不同,但已相当有效。其利用台胞于我华中及华南,前者强迫“台湾恶狗”以□□中华民族的感情,后来改用怀柔政策,利用所谓善良商人以拉拢沿途沦陷区的同胞,此后皆用以拉拢南洋华侨,又是一种新效用。

第三,征兵则对于国民宣传者的作用,亦有可注意之

点。征台民服兵役，而为对台胞的压迫之加厉者，但因半世纪的压迫，及台胞斗争的孤立无援，已有一部分人趋向于争取面子上的假平等地位，其中尤以民族叛徒及御用绅士为最，他们希望“平等”待遇，征兵制之实行时，在形式上也都平等，他们大可以借此扩大宣传，以蛊惑一般人。此种身份及地位上的混淆，再与改名易姓，移风易族联结起来想，经过相当时期，确是一种可怕的前途。

总之，日本侵略者是在采用种种方法消化占领地的物力与人力，殖民地人民的“皇民化政策”，是其一等罪。在今日台湾这片锦绣河山上，确如先烈丘逢甲先生所慨言，“东海饿蛟作人舞，万里炮云挟枪雨；相公款关奉盟语，玉斧一挥恨终古”了，现在尚可咏“去日儿童今渐长；灯前都解问台湾”，再过几年后，人民皆着和尚服、结腰带、履木屐之现象，景况完全改变，其时，才真“不堪回首论台湾”了。

我国政府对于日寇这种“民族同化”的阴谋，决不能等闲视之。日寇今日大陆政策发展到现阶段，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汉族的文化太高，中国的人口太多，若以七千万融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有继元遗亡国灭族之可能。但若其民族同化政策果能成功，则其对异民族的对抗力量可收加倍的效果。台湾皇民化政策可著效，朝鲜也埋伏着同样危机，我东北四省也不能无虑。假定日寇的毒计得售，则其民族力量在数量上增加七千多万人，正与其本国人数相等，若无适当办法相抵制，数十年乃至数年后情况则不可乐观。

若此，则我国的抗战，不会失败于上海南京、广州汉口，也不至于失败于河南河北，自较大的处所着眼，或有失败于玉山（台湾旧名）鸡笼（今之基隆）、鸭绿江畔、白山黑水之间。则国民的本质的改易，实堪吾人深思远虑。吾人非故作危言耸听，据我的所见所闻，当局实有早定民族对策，以抵抗日寇“皇民化”的民族侵略政策咧！

原载1943年12月3日《广西日报》

## 论台湾的革命战略

中美英三国领袖开罗会议决定“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算已把半世纪前的失地台湾，再度列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了。这是两年前对日正式宣战，撕毁台胞卖身契《马关条约》的高一层的发展，也就是我国当局对于收复台湾的积极措施，国际正式承认台湾为我领土的具体表示和条约保障。

惟其如此，所以台湾革命工作者负上更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其对于日本统治者的斗争，不仅必须加强努力，且须有觉悟的更新，其斗争方式不仅要在台湾革命阵营内，虚心坦怀作自我的批判，且须在祖国社会上披露，并公开讨论，以供领导台湾革命的党政当局抉择、参考。因为台湾忍痛割予日寇统治已达半世纪之久，台湾其政已不能上达，其社会情形亦有多少的变化，台湾革命者数十年来也只是作“孤军的奋斗”，所以一切未免有内外隔绝之憾。一向祖国同胞很少人注意台湾问题，正确了解台湾问题者，更是寥寥少数，深刻注视台湾现阶段的内外情势、台湾革命的

发展与症结所在的人,更是少数的少数,即在自己标榜为台湾革命者之间,恐怕也不可多得。爰特融解化合台湾革命同志的意见,撰成本文以公于社会,并供当局作参考。

## 一、应有的自我检讨

为要能够切实而有效地加强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克服或削弱内外的不利条件,我们认为创造和加强作为台湾革命可能成功而有决定作用之本质的条件,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换言之,现在第一首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巩固台湾革命的统一。然而不可否认的,到现在这种统一还未曾建立起来,虽然在祖国参加抗战的各种革命团体,曾于不久以前已经联合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而它也曾经或多或少地完成了这种“统一”性的任务,但是实际上还是非常不够,在统一上或团体上看起来,还是十分严重而可悲观的——名是统一团结,实则散漫异常,甚至进行着不应有的明争暗斗和互相攻讦,互立门户,彼此排挤。

在指出怎样去克服这种不应有的散漫、争斗而促进真正的健全的统一团结的办法以前,我们应先简要研究一下,组成或建立台湾革命统一的主客观需求,是怎样迫切。其主要方面有如下列:

### (一)内部方面

1、由于异族统治者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奴役、压迫、剥削的手段空前的加厉所促成的全台湾无分阶层的民族反



感和革命反抗,已经迅速地汇成为空前的洪大怒潮了。这很明显的无论在客观上抑在主观上都正要求着台湾的每一个革命集团以至于每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愿或不能放任这一日益高涨澎湃的革命怒潮自然的泛滥,而应该且必须使之向着正确的方面去奔流、冲撼。那末,就必须毫不迟疑地举起鲜明的无分阶层的民族革命统一的大旗来。

2、反对异族统治而日益组织化的台湾“番族”,谁都不能否认的,是台湾革命的一支相当强大的生力军,但是为要使她不被统治者所利用,而能够早一刻争取团结到革命阵营来,那末,这很明显的就只有赶快高举无分阶层并无分民族、种族的革命统一的旗帜,来作鲜明而强有力的号召。

3、日本统治者六年余来的对外战争,已大大地削弱了它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就中,对殖民地统治上所发的力量,在各方面是时常不由自主地或隐或显地暴露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在革命组织上是非常有利的条件。然毫不掩饰地说,到现在台湾革命集团所努力、所组织的革命力量,何以还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呢?这虽然不可抹杀的是受了各种客观条件所限制着,但主要的还是由于主观努力的不够,特别是在于对敌作战上十分缺乏着领导和指挥的统一性所致。如此,无疑的为要能够加强领导和指挥的统一性——加强岛内外的革命力量,而在不久之将来的某一历史的特定阶段上,能够顺利而有力地配合祖国战略上的总反攻,以便一鼓击溃日本统治者,就必须赶快建立和

巩固台湾革命的统一。但要顺利达成这一目的,还须从来出头领导革命的人们,放弃门户之见,降低过分的领袖欲望,并须运用全副精神和时间专一努力,以免革命行列松懈与失望。

## (二)外部方面

1、祖国对日寇的反侵略抗战,业已英勇坚持到将近七年,而且已经日益接近最后胜利之境。这不待说明是由于全国的无分党派、无分阶层,也就是全民族能够一致站在同一的战线上对敌作战的结果。这非常有力地而且十分正确地证明着台湾革命力量要能够加强,台湾革命要能够早日成功,就只有加紧建立和巩固无分党派无分阶层的革命统一战线。

2、此外,与台湾同命运的朝鲜,近来能够更加有力而有成绩地协助中国抗战,和更加普遍而勇敢地开展其半岛内的革命工作,未始不是得力于前年间已经建立了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这又证明着,也就是客观地要求着:台湾革命集团(包括在祖国的)如果能够更加有成绩地协助祖国抗战和更有力地推进台湾岛内的革命工作,就必须赶快建立和巩固无分党派无分阶层的革命统一战线。

3、日寇所发动的这次太平洋战争,促成了中美英苏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集团,已经能够切实地建立起来,这不待言,是正确地配合了更加有力打击并早日消灭人类罪魁的世界法西斯强盗集团之主客观需求

的。这又证明着：为要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保卫民主消灭法西斯），就必须无分国家与民族地站在同一战线上作战，才能够发挥强大的力量。同样台湾为要打倒一个共同的敌人——异族统治者，也必须无分党派、无分阶层地，站在革命统一战线上战斗，才能够发挥坚强的民族力量。

## 二、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根据上面所列几点看来，台湾革命战线必须赶快建立和巩固，已经不是观念上的研究问题，而是现实上的实践问题，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然要怎样去克服不应有的散漫和斗争（主要的是在祖国参加抗战的党派间）以便促进真正健全的统一和团结，也就是促进全台（包括在祖国的）无分党派无分阶层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加紧建立和巩固？试述一二管见如下：

### （一）消极的办法

大胆不客气地指出，在过去，而且在现在，我们的有些革命团体，特别是其负责者们，大都或多或少的或重或轻的犯着“徒事空喊”和“争夺形式”的毛病，所以才不幸地产生了上面所说的散漫和斗争。特再缕述如下：

1、徒事空喊——抗战六年余来，在祖国活动着的台湾革命团体或革命者之中，对抗战、对台湾革命作过不少有意义的宣传工作的，固然甚多，但作过并且还在继续作着无内容（指革命的）的空喊工作的也在不少，他们或许是因

为缺乏革命的认识,或许是因为没有勇气再前进,所以大都以为只要高兴时喊几句过时的口号,发几张欠缺内容的宣言,或者写几篇顺应时会攀龙附凤的文章——满想盘足安坐大后方,等待祖国抗战胜利,台湾革命也就自然地会跟着而成功!至于要怎样更加有力而有效地,切实而正确地协助抗战胜利早日来临,他们是不敢也不能过问或关心,他们甚至于丝毫没有深入考虑,也没有积极尽其应尽的力量。

2、争夺形式——换句坦白话就是争夺领导权;这个毛病是由于上项的“徒事空喊”发展来的。他们大概是或重或轻的染着“大头(领袖)病”,所以大都以为所有的革命团体,只要归于自己一人或者一派之领导下,革命就会成功,或者至少也较易成功。至于革命怎样才能成功,或怎样才能较易成功这些问题,说好听些,他们如果不是单凭主观的理想,便是专待客观的变化,而没有科学的根据。

要纠正第一项毛病——徒事空喊的空洞行为,我们对于“缺乏革命认识”的人,要十分诚恳地劝请他们除了要勇敢多多正视现实之外,尤其要取消轻视理想研究的错误偏见;“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所以,革命的正确认识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得到的,过时或无内容的“空喊”(虽然是热情的表现),结果未必有补于实际。必须有相当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修养和经过无数次的艰难的实际斗争,才有正确认识成功的希望。因为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修养,就不能了解和把握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同时,如果没有把

握客观的规律,也就不能有正确的主观行动,而就会必然的变成盲目的空洞的行为。又对于“没有勇气再前进”的人,我们也要十分诚挚地劝请他们不要只斤斤于欣赏过去的一些成就,而本诸过去的斗争精神和运用丰富的经验,重新正视和把握现实继续奋进。不然,革命也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结果,他们不但会一天一天地离开成功之境愈远,并且连过去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也必然地会终于变为泡影而消散的!

要克服第二项毛病——争夺形式的可耻观念,针对着他们的病源——不正确的领袖欲,我们又要十分恳挚地劝请他们首先去了解并牢记着:“领导权”不是一个团体或一个人所可能凭着主观的愿望而夺得的,它必须有各种革命党派,特别是要有各阶层的大多数人的真正拥护,才可获得的。这是一个很平凡但很正确的真理。因而鼓励他们改变不应有的念头,多多面对现实(革命的客观的迫切需求是什么?),以便加强主观的革命力量。也就是说,与其努力于形式的争夺,不如更实际些推进和开展在革命过程中所有的每一阶段每一瞬间的中心工作,才是正确。这样,也必须这样,对于革命良心始过得去,对于革命又比较有益,而对于“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争夺),也才有真正的希望。

很明显的,由于上面所述的这两种有联系性的毛病——空洞行为和错误观念的加剧发展,才会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散漫、争斗——不统一无团结的现象,而自然地影响到革命统一战线的未能建立,或未能健全地建立。因

此,我们再三愿望并再三强调:只要他(无论是一个团体或一个团体的负责者)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革命者——有勇气正视并把握现实(台湾五百余万同胞所迫切需求的是什么?祖国反侵略抗战所迫切需求的又是什么?——即整个台湾革命的主观需求是什么?又是怎样?)而为这现实奋战到底的革命者,那末,他也就必能为着共同的目标,自我批判,勇敢地去发见和克服对于革命无益而有害的错误观念以及空洞行为。不然,他在某历史的转变的阶段上,是不能幸免地必会被革命的大众,无情地抛掷到革命阵营外去,变为凄惨的没有军队的将军!

## (二)积极的办法

### 1、展开实际工作的竞赛。

一个具有正确世界观的革命团体或革命者,他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十分重视革命的群众基础的,也就是说,他必定是存在于或生活于群众基础上的实际工作中的。惟其与实际的革命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也就是自然的很少犯着“尚空喊”或“争形式”等的错误倾向和行动。这是稍具革命常识的人们起码应有的常识问题。由是观之,我们的革命团体间所以会产生如上面再三指出的不应有的现象——散漫(起因于尚空喊),争斗(起因于争形式)问题,不容否认的,其主要的因素,实在是“对于缺乏群众基础上的实际工作”。因此,为要克服这种不应有的散漫、争斗,我们认为最正确且最有力的办法就是广泛地积极促进

所有的台湾革命团体起来开展实际工作的竞赛。这种“竞赛”的办法，或许有人会认为不能克服争斗而反加剧争斗，不能促进统一和团结，而反妨碍统一和团结。诚然，某种争斗会加剧或不可免，某种份子的团结会受妨碍也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相信在竞赛过程中，特别是在竞赛达到激烈的阶段，这种所谓“争斗加剧”和“团结妨碍”，已经是属于很少作用的次要问题了。这一种结果的产生，当然不可不预想到，但是祖国领导者的广大包容，英明判断，乃至于此“竞赛”所企求对于统一的加紧建立，对于革命组织的加强发展，必定发生决定作用而“减少争斗”“加强团结”。具体些说，这种“竞赛”是具有现实斗争性的，所以，伪革命者固要退避三舍而不敢一试，而“空喊家”在这一竞赛中，如果不能一革他原来的空洞性，表现出他自己应有的真实力量来，那无疑问的他不是可怜地落伍在十万八千里外，便是悲惨地被无情的历史现实的绊脚石所绊倒。至于真正的勇敢无畏的革命者群，他们迟早终必达到预期的目的地——真正的统一和团结之壮丽的境地。所以“工作竞赛”，我们不但不要忌避，而且要积极地去鼓励和开展。此点，祖国领导者更应注意及之，并赋予能够专责办理的人，以专权推进工作的机会，并激励他们运用全副精神从事于台湾革命工作。

## 2、恳求祖国党政当局更加切实援助。

(1)在经济方面——自抗战开始以来，我们的各种革命团体(在祖国的)所受祖国党政当局的经济援助已经不

小,然何以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成绩,还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台湾革命团体主观上努力不够,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抹杀的是由于祖国党政当局的经济援助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其援助原则及方式也有所欠妥,以致有些团体的工作经费时常陷于支绌的状态,因而影响一些工作开展的重要机会,有时也不得不忍痛任其消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国当局或因台湾脱离祖国政制久而下情不能上达,致使“任能选贤”有时难免有不合“适才适用”的事实。诚恳大胆地说,也正由于祖国党政当局的援助原则和方式有所欠妥,以致或大或小助成了台湾革命团体散漫争斗加剧,其结果又自然地影响整个工作不能如意地开展。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台湾革命大家既然公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一环。那末,祖国当局无论在责任上、在义务上,以至于在反侵略抗战的政略上战略上,对于整个台湾革命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所必需的经费,实应有更切实援助的必要。同时,为要有效地帮助克服台湾革命团体间不应有的散漫和争斗,以促进真正的健全的统一和团结起见,对于援助原则和方式,更应重新考虑,对于此点,我们大胆地认为应该采取: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形的需要而决定全盘费用及整个的援助方式。改变一向个别的援助方式。

(2) 在精神方面——台湾革命既然是中国革命的一环,那末,在经济的援助固勿论,在精神的援助——如革命领导上的战略指导以及策略应用等方面,当然在祖国党政当局须再担负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是不待言的。过去,台湾



革命团体以及革命者直接间接所受祖国当局的指示和教导之处固然甚多,然而在祖国当局方面或许是还有着各种不得已的原因,以致对于台湾革命领导上的上层机构,还是欠着应有程度的统一性。不可忽视的,也正由于上层机构领导欠缺统一,所以自然地影响到下层组织(台湾革命团体间)散漫,甚至于争斗加剧!因此,我们认为要使这种不应有的现象能够早日消灭,台湾革命团体的真正统一和团结能够早日实现,那末,除了恳望台湾团体间自动奋起,在消极方面能够自我批判重新检点,在积极方面能够争先恐后的开展实际工作的竞赛之外,还是恳请祖国党政当局由上而下促成上层领导机构的统一,同时并对台湾团体加以应有程度的强制性的推动。这应该是较为有力且较为容易的方法吧。

### 简单的结语

现阶段台湾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明显地达到相当程度的成熟了。它正在十分迫切地需求着台湾的每一革命团体或每一革命者赶快把握和有效运用,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然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无疑问的不是空喊或等待,更不是不能也不敢深刻研究台湾革命现实或只盘脚安坐大后方的人所可完成的。而是需要准备足够的主观力量并经过无数次惊人的血的战斗,才有达成的希望。因此,在现阶段摆在台湾的每一革命团体或每一革命

者面前的台湾革命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如何去加强主观力量”这一点了。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须能发见和把握到这个中心任务,始可以妥善配合发展中的客观规律。台湾革命领导者,能够发挥这一点中心任务,祖国当局再予以有力的督导与鼓励,则台湾革命的完成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就是总理所指示的“知难行易”的真理。正因为台湾革命领导者不能正确认识台湾革命实际及不努力加强主观力量,遂致我们的革命团体间,还是缺欠应有的统一性和团结性,也就是台湾革命统一战线还未健全建立起来,以至于变成了“知易行难”的不应有的状态!

然而,“既往不咎,来着可追”,没有错误倾向的发见,也就不能有正确路线的决定,所以,我们敢大胆地再三强调:如果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革命集团或革命者,他为着协助祖国抗战胜利,为着促进台湾革命早日成功,那末,在台湾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阶段,实不可也不能再有所踌躇于抛弃不应有的偏见或错误观念,实不可也不能再踟躕于尚空喊和争形式的梦境中,而必须“我为人先”,站在无分党派无分阶层的统一战线的革命旗帜下,勇往迈进,发挥所有的力量,推进和开展对革命有决定性的工作。

原载1944年4月17、20~22日《大公报》

## 《人民导报》发刊词

五十年的惨淡反抗，八年坚苦抗战，赢得了台湾的光复。但是离开祖国五十年的台湾，许多方面已和祖国变得生疏，特别是文化方面更需要一番的调整。有人以为台湾的文化教育程度已经相当的高，但这也只是片面的观察。台湾的物质文明或已建立了基础，但是上层的精神文明却还在荒芜中。事实上，台湾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殖民地政策奴化教育的结果，充其量只完成了文化的畸形发展。台湾文化的正轨和合理的发展，还有待于此后的开拓。

我们若再具体地分析台湾的实情，则更可证明吾人立论不为虚构。第一、台湾教育虽然相当普及，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材，很少运用学识的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哪里有几个得以使用他们的高级学识？台湾哪里有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文化工作者？第二、台湾虽也有大学及不少的专科学校，但是哪里有文科、法律、政治、经济、教育、乃至哲学的合理施設？聊可自慰的教育，不只是局限于医学吗？第三、台湾虽也有日本三流以下的文化活动，但这更不足以

夸张。一来台湾人很少参加的机会,二来日本文化在世界系统中究占如何地位,尚属疑问。第四、台湾工业及科学虽也相当发达,但尚不能自满。台湾工业犹停滞于食品生产,纺纱织布工业还不能自立,机器生产等重工业只是近年的萌芽。美国人《今日之台湾》著者评论台湾工业并未发展,自为切合事实的论据。

然而台湾自有台湾特殊的文化存在,台湾文化还承续着汉明的正统。只是它的发展中途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压抑、所闭塞,终于走入歧路罢了。所以今日台湾的文化必须侧重于启蒙、发扬、与沟通。我们有鉴及此,爰特创刊本报,用以启发过去的闭塞,发扬固有的祖国文化,沟通国内外的消息与论说,宣扬政府法令,报导民间隐情,以期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本报愿为台湾文化的“扫雷艇”、新文化的“播种机”,使台湾文化走入合理的正轨。

不过,我们的力量单薄、学识浅陋,深愿省内外先进,多加指导,多加赞助。

原载1946年1月1日《人民导报》



《人民导报》社社址：今台北延平南路26号



## 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

(长官公署教育副处长宋斐如播讲)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七日于台北广播电台

诸位同胞、诸位父老、兄弟、姊妹，本人离开台湾二十四年、返台亦已三月，今日始得机会来和全省同乡谈话，觉得抱歉，又觉得惭愧。今晚想向诸位谈的话，只是改进台湾文化教育的一点小意见。因为关于台湾的施政方针及设施经过，陈长官、葛秘书长、以至各处会主管官，皆已有详尽的指示，用不着本人再来重复，今晚只提出台湾文化教育上的一些问题，供给诸位同胞研究、参考罢了。

在讲述改进办法之先，应先分析客观的现实。原来，台湾是汉明的正统，只因为离开祖国五十年的结果，致使文化正统起了变化。台湾受日本奴化教育及皇民化政策熏染的结果，其文化内容变成非常复杂，既不是纯粹汉明的正统，但也不是纯粹日本式的文化，在日本和服之内，还保留着一些汉装。这是日本奴化教育强制下，台湾同胞的民族

精神顽强抵抗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灿烂的成绩。五十一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想占领台湾，满清又以“台抗京危”的口实，劝告台胞接受日本的统治。其后日本统治者更以枪炮政策压迫台胞，运用皇民化政策，想自台民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奴化台湾同胞。固然也有小部分御用绅士曾经企图接近日本统治阶级，日本也向世界夸称其治台成绩优良，但是大多数台胞始终厌恶日本的风俗习惯、文物制度、讥之曰“四脚文化”。日本文化的优劣问题及应如何取舍问题，不是今日广播上要说的话，不过总而言之，受日本蛮横统治五十年的台湾文化，至少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在日本奴化政策所干涉、压抑、禁绝之下，汉明的正统文化，自然停滞于五十年前的地步，所以没有赶上祖国五十年来的进步。其二，日本对于台湾采取殖民地文化政策，殖民地以上的学问和事物，是不能给台湾人民学习的，所以世界五十年来的进步，台湾并没有充分吸收进来。其三，日本统治者一向的文化设施，目的只在使全国人民得以了解或接受统治者的法令和指挥。简单一句话，日本对于人民所施文化教育，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宗旨。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更不能例外。

台湾因为受到上述三种影响的结果，其文化的发展，自然走入不纯的歧路。即令我们不能说台湾五十年来的文化完全停顿了，至少可以说台湾的文化确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台湾省民自己或许有人夸称台湾教育相当普及，台湾的物质文明也已相当建立。但是我们仔细想看吧，上层的



精神文明不是还在荒芜中吗？中等以上的教育，不是给少数住民的日本人，占去了绝大的比率吗？我们若再具体分析台湾各方面的实情，则更可以证明吾人的立论不为虚构。第一，台湾初等教育虽然较为普及，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才，很少有运用学识的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哪里有几个得以使用他们的高级学识呢？台湾哪里有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文化工作者？第二，台湾虽然也有大学及不少专科学校，但是哪里有文科、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心理、乃至哲学的合理施設？只有为个人生活开一方便之门的医学界，稍为发达罢了。第三，台湾一向没有足与世界比美的文化运动，即如祖国五·四运动一类的活动，从没有发生过，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更不消说了。即有一些三流以下的日人文化活动，但这又文不对题，台湾人也没有普遍的反应。第四，台湾工业及科学虽也相当发达，但尚不能自满，台湾工业犹停滞在食品生产的低级范围，纺纱织布工业还不能自立，机器生产等重工业，更只是近年的萌芽而已。台湾工业发展的前途，还非常辽远。莫怪美国人《今日之台湾》著者，批评台湾工业并未发展。

然而上面分析，并不是拿来证明台湾人头脑低能，或无志气上进，只是说明应该充分发扬光大的台湾文化，因为日本统治者五十年来的压抑与干涉，致使停滞、衰弱、走入歧路罢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才可以正确认识台湾文化的正体，同时也才可以对症下药，考虑如何改造台湾文化教育的问题。

今日，台湾文化教育的改造问题，和国内新收复区，自有根本不同的地方，绝对不是表面的、事务的、或单纯接收的问题而已。实际上最重要之点在于本质的改造、正统的接续，世界新文化的灌注。从此原则出发，台湾今日的文化教育改造的重点，应该放在下列各点，也可以说是三大原则。

第一，应该教育六百万台胞，变成“主人翁”。台湾同胞受日本统治者五十年的压抑，差不多可以说“去了势”，即在光复后的今日，陈长官再三指示给我们“台湾已经是主人”，但是台湾人在许多方面还不能发挥主人的权能，遇事非常畏缩含糊，主管一件事又不能指挥处置裕如。至于如何学做主人的方法，一面固要台胞自觉自发，一面又要靠文化界教育家的启蒙指导应拟。具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台湾只在日本教育下保留一点儿中国的旧文化。

第二，旧文化，故须灌注国内各方面的学识及常识，使“归宗”二字名符其实。但同时还要教育台胞能辨别是非真伪，使得择其善者而学之，其不善者而弃之。世界上真理只有“近真”的程度，绝无绝对的真理，“善”的本身，也具有发展性。况祖国也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教育台胞跟祖国进步而进步，我们的古训说得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就是今日台湾教育者及学习者的指针。

第三，应该培养台胞成为“世界人”。一向台湾为岛国，又为日本统治者所限制、所压抑，所以眼光常是短小近视，眼光狭小的只顾到自己一身或一家，眼光较远大的人，视

线仍不出台湾岛外,很少考虑全国、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或想到后世百年的大计。六百万人不能团结,一家之中不能和气,都是这种“人生观”的具体表现。这当然也是受了日本“盆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社会评论家厨川白村氏对于日本盆栽文化,曾有严厉的批评,请读《苦闷の象征》及《象牙の塔を出で》),但是此种人生观必须改造、必须改变。我们教育者应以长江大河、五岳长城的雄壮观念,灌注给台胞。我们应把日本风景的纤秀观念,从台胞脑中洗涤干净。台胞也应该自觉自悟,勇敢接受新的潮流、新的人生观。

今晚只就台湾文化教育的改造,举出三大原则,台湾文化人及教育,能从此三大原则去拟订实施办法,相信不会有大的错误。台胞也必须从此三大原则去学习作人、作主人、作中国人、作世界人,然后才可以由歧路走上正轨,然后才可以避免“井底蛙”之讥,然后才不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

今晚只列举台湾文化教育改造上的原则,至若改造文化教育的实施办法,可以让文化工作者及教育技术家,或事务人员去拟订,这里暂不具论。

原载1946年1月11、12日《人民导报》

# 中韩两民族的关联性

## 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先生的讲演

编者按：这个讲演要旨是韩国同志把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韩籍官兵集训队的日语讲演速记下来的。固然这是向韩国同志的演说，但是可使我们明白抗战中的我台胞于国内为光复台湾如何奋斗过？还有韩国同志是如何与我台胞共同从事抗战工作的？然后在那期间，宋先生是怎样活跃的？这一篇文章是为了解台胞同志在抗战中于国内的活动情况最正确的资料。同时对于今后研究韩国情况也是最宝贵的文献。因此在取得韩国同志的谅解之后，登载于本报。

### 讲演要旨

今日有机会在此与韩国同志见面，感到非常欣快！  
来这里之前，我曾与贵国临时政府的要人交往亲密。

不过以金九先生为首的许多位先生几乎都回国了。所以现已中断了联络。如果你们当中有哪一位得到他们的消息的话,请告诉我。

各位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离开了祖国的。我在二三十年前也是由于日本的压迫、剥削政策而离开台湾到了祖国的。

因此今天主要就中、韩、台的历史的、地理的关联性和共同性讲一讲。之前,先简单地说说我参加中韩台的抗日工作的经过。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起初我在北平组织了“东方问题研究会”,以孙中山先生的东方革命的遗训为宗旨,开始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与独立进行斗争,其主要会员当然是中、韩、台、越南、印度等国民。我们的运动不仅是在北京,而且波及南方。在上海事变当时,完成了指向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和重光葵的“投弹事件”任务的韩国同志尹奉吉氏就是该会中优秀的实践者之一。

后来发生了七·七事变,自从日本对中国全面的侵略开始之后,在北京、南京方面我们就无法进行充分的活动。因此一时撤退到汉口,就在那里组织了“日本问题研究会”。我也做为发起人之一,特别提出战时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揭露了日本的弱点,打破了日本的虚伪宣传。其结果唤醒了众多的恐日病者,强化了抗战建国的意识,该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在该会活动的韩国战士中有众所周知的金若山氏和朴青天氏,金若山氏

是韩国义勇队的队长,朴青天氏为后来的韩国光复军的司令官。现韩国临时政府的要员——韩一来、金奎光、赵业昂等几位也都在该会活动过。

到1941年,这些人受孙科先生之命,发起了“中韩文化协会”。当然我也是该会发起人之一,会长由孙科先生担任。“中韩文化协会”至今仍然存在于重庆。这次我回到台湾,想为建设太平洋永久和平竭尽微薄之力。所以我想从新年度开始发行《人民导报》。目前在逐步推行计划。也请诸位多多投稿。

其次就“中韩两民族的历史的、地理的关联性”这一问题谈一谈。很早以前在历史上就记载着殷朝末期来自中国的名叫箕子的人东渡朝鲜建立了朝鲜国这一事实。自古以来中韩两民族之间就已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位一看地图便知,朝鲜作为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端,在对外方面得以进出,同时受外来侵略的可能性也大。过去长达五十年间东亚的纠纷全是以此地为基点开始的。如此说并未言过其实。不言而喻,其最大原因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外的途径来化解因经济发展滞后带来的内在矛盾,所选择的最初落脚点就是朝鲜。日本以“明治维新”在发展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地球上的殖民地早已被瓜分净光了。滞后的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结果只能是以低效率的家庭工业及轻工业为主。对内依靠低工资来剥削工人,对外不得不采取掠夺殖民地和国外市场这两种侵略行径。

于是其侵略对象即指向中国大陆。而做为其开端的的就是侵略朝鲜。日本所谓的“日清战争”，即我们所说的“甲午中日战争”归根结底也是以朝鲜问题为中心爆发起来的。

1882年7月，在朝鲜发生了袭击日本公使馆的事件。当时朝鲜有两个党派在互为抗争。就是以大院君为首的“亲华派”与日本的所谓“进步派”——“亲日派”。1894年的“东学党之乱”是中日战争的直接原因，而战败的清朝于1895年4月18日与日本之间缔结了《马关条约》。依照该条约，日本从中国夺走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又强迫我主要港口和长江沿岸的开放，并且强夺了三亿五千万元的赔偿金。（但是由于所谓的三国干涉，辽东半岛又归还给了中国）。日本就用这笔款项做为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日本强迫中国缔结的《马关条约》，其对外的效果，超出条约本身的内容，而且对中国的将来更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沿着日本侵略中国所开辟的道路追随而来。如诸位所知，中国曾蒙受多么大的损害。在1904年到1905年的俄日战争中，战败的俄国竟把所蒙受的损失几乎全部转嫁于中国。还有经过两次战争完全夺取朝鲜主权的日本终于在1910年八月吞并了朝鲜。就这样日本侵略亚洲与称霸世界的野心随着扩大的市场以及殖民地的获得日益膨胀起来。

下面我讲一讲关于中韩两民族的共同抗日工作。很早以来，中国的东三省就已经成为朝鲜革命志士的活动根据地了。即在1919年就有“大韩独立国”、“大韩西路军政署”、“大韩征日军”等组织成立于东三省。从那以后，朝鲜同志

一直是以东三省为中心继续活动下来的。然而九·一八事变(日本的所谓“满洲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在东三省南部的活动日渐困难,因此依次转移到北方,终于进入苏联境内。据传说这次进攻北朝鲜地区的苏联军,名义上是苏联军,实际上即几乎由朝鲜革命分子组成的纯粹的朝鲜人军队。再说在中国国内的朝鲜革命战士们于七·七事变后组织了“朝鲜义勇队”。其队员多的时候高达六百人,而且全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和训练的优秀人员。队长是金若山氏,他的功劳很大。当然他们当中已有多人牺牲了。前几天我们在重庆为这些牺牲者举行过追悼会。接着成立了以朴青山氏为司令的“韩国光复军”,该本部设立在西安。

其次在政治方面,组成了以金九氏为主席的“韩国临时政府”。不过以上三个组织都是在中国政府的援助下活动到今天的。这些人都抱着“日本必败”这样坚定的信念为贯彻初衷在迈进。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有朝鲜、台湾革命志士和少数进步的日本人参加的“日本朝鲜台湾反法西斯联盟”进行了抗战。现在介绍其宣言中的一节:“……世界人类如果想清除世界的不安宁和危机,保卫民主主义的堡垒,拥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法西斯强盗式的侵略,拥护中国的伟大抗战,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我们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日本国内的劳动人民,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台湾的人民群众,一定要认清我们目前正处于最严峻的关头。”仅看这一点就能推测到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参加这个



联盟的少数进步日人有青山、鹿地、盐见、冈野等人，我们就是这样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做斗争的。

日本的野心现已受挫。我们的抗战虽然已经取得胜利，但我想还要多考虑我们今后的问题，就是韩台共同努力的目标。目前尤其要想一想韩国与台湾的前进方向的异同处。首先关于共同点：日本对台湾在政治上加以种种压迫，在经济上进行任意掠夺，在社会方面则实行奴化、愚民化政策。占台湾人口全部的台湾人不得干预政治，而只由少数日本人在搞政治，台湾人根本没有政治发言权。在经济上最显明的例子，如制糖工业，日本人任意剥削。说“文化水平提高了，城镇变得漂亮了”，这话意味着只有日本人的幸福，而相反，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却日益陷于穷苦的境地。

从社会方面，可看到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都强行皇民化(奴化)政策。如不许穿中国服装，而强迫日式和服的穿着。还有食品和吃法也都管教用日式的。在台湾原来就有祭祀祖先的美德，可是日本置此于不顾，不仅予以废除，而且强行祭拜“天照大御神”。甚至连房屋都强制要改为日式住宅，不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木材，结果没能实现弄得啼笑皆非。在行动方面当然也要用日本式的行动模式，如行礼的方式、走路的方式，就连笑的方式都要日本化。其他例子不胜枚举。我相信你们韩国也同样受到了压迫、掠夺和奴化教育。

综观以上所述，韩国和台湾同样在过去吃尽苦头。所以将来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中也有很多的共同点，即：一、

在政治上必须确立民主政治。二、经济方面,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只肥大财阀,而应为多数国民的幸福谋发展。三、社会性方面,更加注重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其次关于差异点;韩国总是要完全独立的,至于台湾,原来是中国的领土,由于此次的抗战胜利,一定要归宗的。也可以说我们是“殊途同归”,因为前进的目的是同一的。

关于三民主义的和平政体。在现阶段不妨说,民族主义已经达到目的了,但是为民权和民生主义,应该努力去办的事情还很多。毕竟为了维护太平洋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通力合作。为此我们该做的工作,从消极方面而言,必须彻底地管制日本,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对日本人来说,多少苛刻了一些,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实行的。再者,从积极方面而言,就是培养日本真正的民主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协力进行日本人的再教育工作。而且我们为了掌握日本人的内情要经常取得联系尤为必要。总之,为了太平洋永久和平的建设,我们要做的工作太多太多,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

衷心祝愿大家顽强战斗!我的话到此结束。

原载1946年1月20~24日《人民导报》日文版

由台盟深圳支部副主委翁晓波翻译

## 论台湾基本人权

### ——并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最近中央政府颁布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办法，各省各地也都相继成立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台湾也已由台北省会首先发动了。这是一个保障“人权”的重大进步，有感及此，爰特为文申论之。

社会原是人类相互结合的总体，没有社会即没有个人，没有个人即不能构成社会。所以社会中的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同时也应当是自由的。但是自古以来的每个社会阶段中，当是不平等，一部分人当是不自由的。这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逐渐改善的倾向，至最近始臻于人民自由的保障。例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在封建社会中，贵族和地主束缚了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和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阶段，自由仍为某些人所垄断。

至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商品经济之逐渐

发展，个人的人格开始被发现，而要求尊重个人人格之独立、平等、与自由。这是历史发展中必然的结果，但初期的人权运动只限于“自然权”，“天赋人权说”之产生即由于此。

申论之，资本主义初期所要求的“人权”，尚只限于“自由权”，即人格的平等权，如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营业自由等等。后来因为这些自由，只是起码条件的“人权”，所以又产生“政治权”及“公民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由来。具体言之，民主政治就是政治的平等权，如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等。政治权和公民权的发达，也就越发充实了人权。后来更高的发展，就到了“社会权”即经济平等权的要求。

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情形，中国的人权运动，现在仅由萌芽到了成立的阶段，还须人民多加努力。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压迫，“人权”并没有伸张，加以近百年来沦为半殖民地，又受封建社会规程的束缚，而全国的民众的人权问题，曾经相当严重化过。至最近起码的人权，即上述各种自由，始被确认，即如真正的公民权也只在建设过程中。幸而我们全国上下所信仰的三民主义，是在注重“人权”的，并且是“公民权”、“社会权”也都包括在内，例如民权主义是尊重公民权的，民生主义是尊重社会权的，这些人权、公民权、及社会权的互相渗透，而始完成了三民主义的人权。必须如此而人权才算完全，同时也必须如此才能够使每一个人，负起对国家社会的义务，三民主义必须实现这种完全“人权”，才算达到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

大家都期待着台湾变成一个模范省，这应当是实现真正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我们多希望台湾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乃至社会建设，也必须从此尊重“人权”、完全的“人权”做起，深愿官民大家本此三民主义的基本宗旨，努力向人权的充分发展方面迈进。敬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健全发育。

原载1946年3月17日《人民导报》

## 国家为什么要保障人民自由

最近中央政府颁布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办法，各省各地也都成立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来推行这个办法。台湾也已首先由台北这个省会发动了，大概不久可以通行全省。这是保障“人权”的重大的进步。但是很多人还不大晓得中央政府为什么要保障人民的自由，所以兄弟昨日即在本报上写了《论台湾基本人权》的一篇短短星期论文，阐述人民自由的意义，但嫌言焉不详，所以今晚再来播讲《国家为什么要保障人民自由》，希望政府人员和一般人民，更加深切了解，免有无意中滥用职权、滥用自由的弊病。

本党总理老早就指示过我们：政治里头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自由的力量，另一种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当中有这两种力量，好象物理学当中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样。先解释物理学当中的这两种力量，就容易明白政治当中的两种力量，乃至政治当中必须有自由的道理。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面的分子分开向外，向心力却要把物体里面的分子吸收向内。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就分散到处乱飞，没有

归宿之处。如果向心力过大,物体便向内集中,而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所以物体的运行必须这两种力量平衡,这两种力量的活动能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而不乱冲乱撞、闹出问题。

政治的运用的道理也是相同。政治里头的自由力量太大了,人民无规则的滥用自由,社会便变成无政府状态。这固然不好,但是政府若束缚人民过度了,政府变成了专制的政府。专制政治下面的社会,会弄成死沉沉无生气。所以总理的结论说:中外数千年来的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种力量之往来冲动。这两种力量,应该予以适当的调节,使二者平衡不偏,而此二者调节至最合理的时候,政府与人民自然混合成为一体,而政府与人民之间再不会有什么摩擦、有什么矛盾发生。

由上述政治当中的两种力量,再加申论,则政治里头有两种人,一是“治人”的人,一是“治于人”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说过的,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就是有智识的人。劳力者就是没有智识的人。从前没有智识的人,愚愚蠢,好象一个小孩,所以需要别人来管理他、来治他。所以在无形中便形成两个阶级,即所谓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但是现代教育普及,民智已大通,人民个个都有自觉,都知道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社会便发生“人权运动”,想要废除这两个阶级,而其基本人权当中,包括了种种的人民自由,如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营业自由等等。

说到人民自由运动，中国与外国正是相反的程序，据总理政教：外国的政治以前是专制，至十八九世纪始发生人权运动而要求各种自由。而中国在古代则为尧天舜日，人民享受极大的平等自由，到后来政治愈益败坏而入于专制，自秦汉以后一直因袭到满清，至总理始大声疾呼要给人民以自由，至蒋主席始决意确立真正的人民自由。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刚刚开始推行，可见人民自由的保障运动，刚要普遍发展，此后还应要政府与人民积极协力，以完成总理的理想，实现主席的德意。

原载1946年3月19日《人民导报》



## 台胞应踊跃参加师范教育

——为台湾师范教育宣传周而作

今天是台湾师范教育宣传周的第一天，光复后的台湾，在百政待举中，如何灌输台胞正确的思想，铲除过去日寇统治下的奴化教育，实在是当务之急，本人愿为此略抒芜见：

第一，今天台湾师范教育的推行，实在要比全国其他省份来得重要而迫切，台湾沦陷了五十一年，日寇的阴谋是奴化台湾，叫台胞乖乖做顺民，因此中国话不许说，中国文字不许使用，今天我们所碰到的四十岁以下的台胞，没有一个人不是满口日本话，而对中国语文则茫然不解，为下一代着想，我们急迫需要推行中国的语文教育，但叫什么人去推行，却是个极重要的问题，今天师资问题的缺乏更显得师范教育之重要和意义的重大。

第二，过去台湾的师范教育，在日本统治下也相当重视，但自然是为日本人自己打算，所有师范学校，日本人要

占90%以上,台湾同胞很少有就学的机会,日本人生怕台胞去做人师,教坏了学生起来反对他们,老实说,那种“奴化”的师范教育,台胞不去还好些,可是现在台湾是光复了,最实际最有意义的工作莫如献身于六百万台胞的教育工作,因此我们希望有识之士,鼓励自己的子弟进师范学校,以革命者的精神去从事此崇高而富有意义的实际工作,使五年十年之内,一扫过去日化教育,建立起新的中国文化教育。

第三,我们一面鼓励台湾同胞推行师范教育,但对政府当局,却又不能不有所建议,谁都知道教育工作是最神圣最崇高,但生活却是最清苦,最没有保障。以目前教员的待遇来说,实在未能令人满意,要叫大家安心工作,首先一定要使大家肚子吃得饱穿得暖,否则徒事空喊,谁愿意来枵腹从公。公务人员的待遇,本来已经很菲薄,而教员的薪给更低一筹,当局如果不设法提高,使其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谁愿意来坐冷板凳。还有一点,教员的职业也没有保障,以目前惯例,任期是每学期或每学年聘请一次,往往和官场一样是“一任官一任人”。上面换了校长,下面的教员就不得不更动,做教员的这个学期要担心下个学期的饭碗问题,职业得不到保障,试问何能安心从事教育。因此我们建议当局,教员的职业,必须要有保障,能如此,才能谈到推行师范教育。

第四,师范生的社会地位应该提高,因为教员工作既清苦,生活待遇又低,物质生活不能满足,精神方面自应加

以鼓励。因此,我们要提高师范生的自尊心,叫社会人士尊敬他们,对师范学校的地位,自亦希望引起当局的注意。

以上数点,可说是最实际最起码的问题,特提出来,作为参考。

原载1946年3月29日《人民导报》

## “台湾日”的回忆

民国三十一年始定四月五日为“台湾日”，这是仿法“缅甸日”、“印度日”……之设定，用以纪念联合国领土之沦陷，唤起各国注意收复工作的用意。当时关于收复台湾之收复宣传，因阻于国内外的特殊情势，殊不易即收效果，曾经不少挫折，今吾台经已光复，痛定思痛，不无抚今思昔之感，特写数言以志不忘。

4年前春间旅渝台胞鉴于太平洋战争（日本称为大东亚战争）之爆发，美英法各国皆成日本的敌国，收复台湾旧失地已可公开提倡，乃由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决议扩大宣传，并向党政军当局呈请收复台湾的种种设施，陪都各界咸寄深切的同情。首由陪都二十二个主要国际文化团体，如东方文化协会，世界反侵略会，国民外交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战时日本研究会，朝鲜义勇队，台湾义勇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发起举办“台湾日”，作一周间的扩大宣传工作。其主要宣传节目，约分三部门进行。其一，召开“台湾光复”扩大宣

传大会,敦请党政军首长及各界代表参加,由东方文化协会会长覃振(司法院副院长)主席,致词《痛忆台湾》,历述渠昔偕故国府主席林森,中央委员张继及林绍庭先生莅台的感想,见台湾江山之变化,曾悲泣得饭不下咽在江山楼上吟诗,有“如此江山如此楼”之句,全篇演讲句句动人,听众皆为之泪下。继由兄弟代表台湾革命同盟会报告《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后由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立法院孙院长科,军委会冯副委员长玉祥,总政治部梁副部长寒操,及各团体代表致词,训勉努力收复台湾。其第二节目,为编刊《台湾光复运动特号》,由各报辟栏专载,陪都七大报二小报均著社论或专论,鼓吹收复台湾“欢迎台胞内向”。其第三节目为向国内外广播,由梁部长寒操担任普通话广播,由吴委员茂荪担任英语广播,林委员啸颯担任台语(闽南语)广播,由日人反战领袖青山和夫担任日语广播。结果引起各界关心台湾问题,“收复台湾”变成报刊的一般论题。

此外,还呈请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建立台湾省政府,设置台湾参政员,请求建政建军(当时台湾党部业经成立),后经各方同志继续不断之努力,收复台湾的方案逐渐具体化。大凡一事之成,于客观情势之外,必须配以主观之努力,台湾今虽已光复,而万般建设尚待振兴,愿六百万同胞继往开来,积极协助政府,以完成建设工作。特附梁部长寒操当日诗,以为同胞共勉:

## 咏《台湾日》诗

民族圣战将及五年，国人更誓志，他年必当收复台湾，定4月5日为“台湾日”，以示不忘，赋此志愤。

岭云海日久衔愁<sup>①</sup>，沦我台湾卅八秋！  
客帝颠预轻授敌，遗民沉痛不忘仇。  
国门两眼<sup>②</sup>嗟都挖，疆土千年誓必收！  
今日莫挥闲涕泪，神州光复待从头。

斐如先生正之  
弟寒操三十一年四月三日

### 注释：

① 邱仓海先生有《岭云海日楼》诗集，大半皆写亡台之痛。

② 谓台湾与琼崖也。

原载1946年4月6日《人民导报》

## 台湾民主国对日抗战

编者引言：昨日为台湾民主国纪念日，台北市参议会及台湾党部，假中山堂召开纪念大会，今日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开始，从民主国到民主政治，从下种到发芽，此后正是开花、结果的时期，民主国值得纪念，而其可歌可泣的事实，尤值得叙述，因此特向前战时日本研究社社长宋斐如先生，借得五年前撰写的珍贵资料两篇论文，掲載于此，以供青年“慎终追远”、“继往开来”之用。

世界上任何民族受到异族侵略时，皆能表演极坚韧的反抗，这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压迫的恐怖心理所促成的。台湾也自不能例外。

台湾同胞不但抵抗满清的统治，并且更坚强抵抗日本的统治。这除上述政治、经济、社会压迫的恐怖心理而外，还可以找出汉明文化本质的原因及当时文化阶段倒悬的理由。数千年高度文化的民族，自然不愿受治于文化低下的异族。固然历史上这种抗争有时归于失败，但其抵抗之

特具坚韧性,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台湾之抵抗日本,终日本统治之年,未尝中断过。本章先剖述台湾民主国的武力抗战。而此种武力抗战,目的仍在于恢复汉明的正统。

## 一、国姓爷精神的复活

甲午战争是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转机,反满清运动的终结,是反日本运动的起点。又是奴隶易主的时候,当积弱的清廷败战之时,日寇的南进论者则要求割让台湾及澎湖群岛为殖民地。台湾官民闻清廷允割台讯,即电北京政府反对出卖台湾,但是日寇的要求至为坚决,割台已为势所难免,台民愤激莫似。此时林本源乃提议以100万两赎回台澎群岛,又为日寇所拒,1895年4月17日,割台之议已成事实。以《马关条约》之一纸,将280万的台湾人与台澎群岛人一并出卖了。这是满清政府辜负台湾人的无耻的行动。

到了这个时候,台湾人的前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做日寇的奴隶或逃回祖国,另有一条路就是抗战,但在这个时候的台湾,抗战的条件一切都不够,就人力而言,人口仅有280万人,而日寇已有4,300余万人,实力相差甚远。论财力每年税收仅300万元,此时日寇的经常预算已逾9,000万元,至于武器的问题更可怜了。以情理论,最聪明的办法是做奴隶或跑回祖国,可是台湾人终局还是不做聪明人,不惜牺牲而坚决抗战,这是祖宗遗下来的不屈服精神的再生,国姓爷精神的复活。



何谓国姓爷精神？原来郑成功受明室赐姓“朱”，故台湾人专称为“郑国姓”或“国姓爷”。明亡后，郑成功率漳、泉、惠、潮四属的健儿，与满清抗战到底，明知势力悬殊，孤岛难以制胜清廷倾国之师，尚且不妥协投降，为保全汉民族的人格，不计利害，坚持成仁取义的精神，与异族抗战到底。这就是“国姓爷”精神，“三年小叛，五年大乱”的史迹。答复日寇的侵略，并不是屈服或逃亡，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抗战。是故处在绝境的台湾人，振作国姓爷精神，执起干戈与日寇相周旋了！

## 二、台湾民主国的抗战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的命运只靠自己解决，清廷再不为台湾人的后盾，又不援助台湾人的抗战，故被出卖的台湾官民，至此乃决定自力抗战以御强寇，组织台湾民主国，由新政府领导抗战，经过许多曲折，乃选定唐景崧为大总统，以刘永福副之，以“永清”为年号，采定蓝地黄虎旗为国旗，向中外发出独立通电及布告。其布告原文如下：

台湾民主总统，前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为晓谕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国，大肆要求，此次马关议款，于赔偿兵饷之外，复索台湾一岛，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屡次恳求代奏免割，总统亦奏多次，

而中国欲昭大信，未允换约，全岛士民不胜悲愤，当此无天可吁乏主可依，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以为事关军国，必须有人主持，于4月22日士民公集本衙门，进呈请余暂统政事，经余再三推让，复于4月27日，相率环吁5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印”，采用国旗蓝地，黄虎旗捧送进来，窃见众志成城，群情难拂，不得已为保民起见，俯如所请，允暂视事，即日议定改台湾为民主之国，国中一切新政，应即先立议院，公举议员，详定律例章程，务归简易。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两百余年，今虽自主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供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照常严备，不可稍涉疏虞，民间有假立旗号聚众滋事、藉端仇杀者，照匪类治罪。从此台湾清内政结外援，广利源、除陋习，铁道兵输，次第筹办，富虽可致，雄视东南，未尝非台民之幸也，此晓諭台湾知之，永清元年五月。

这就是东洋最初的民主共和的建立宣言，议会制度虽先此四年前在日本已经采用，但是民主共和的政治表现，在东洋方面自以台湾民主国为第一个。同时又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前驱。从这点立论，台湾的抗战，亦可谓虽败犹荣的。

建国宣言发表后，台湾民主国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备

战御侮，保卫新生的国家。编练壮丁队，协助官军抗战，发行纸币及邮票，以为筹募战费之手段，整理内政，加强抗战力量等，逐步推行。但是日寇的进攻来得很快，5月29日已在澳底登陆，因守兵仅100人，经接触后即告失守，战争在多忙中开始了！

### 三、基隆的炮战与密敕弃城

《马关条约》于5月8日得两国政府之批准后，5月12日，日政府通告任命桦山总督为接收台湾岛之全权委员，并限两星期内通知清廷之割地全权委员名单，至5月15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乃电伊藤博文云：“目下台湾兵勇人民极其骚扰，愿与奉天省放弃问题一并商议，故望桦山大将展期出发。”

此电乃为清廷援助台湾民主国抗敌御日寇的正式表示，日寇自然不愿接受，5月17日伊藤复李鸿章电云：“镇定台湾地方之骚扰事，该岛主权依据《马关条约》已割让日本，当不必附诸两国之协定，故在清国政府唯有将行政及官守让交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耳。”

日政府闻台湾独立之讯，乃决定以武力接收，陆军派遣近卫师团第二师及第四师团等三师大军进攻台湾，海军由有地司令长官率常备舰队协助，海陆并进。日本虽以为此雄厚兵力，还不敢从正面攻我鸡笼（即基隆）要塞，由北白川中将率近卫师团的精锐两联队，迂回澳底，采取包抄

鸡笼侧面的战术，金山卫登陆的战术早在40余年前已用于台湾澳底，此时守澳底的官兵仅100人，皆英勇抗战来犯日寇，在澳底、在顶双溪、在三绍岭、在金山顶、在金皎蒋，处处抗战，日中队长、小队长及士兵阵亡不少，至6月3日，日寇始迫近鸡笼要塞。自是日下午2时起，日寇乃开始海陆军联合总攻击，发出子弹达12,390余颗，至下午6时炮台守军始全军退往沪尾（乃今日之淡水）。此时官军总数不过5,000人，日寇所消耗之人力及时间比上年日军进攻广东为重为长，骄横无状的日寇，遂大起恐慌，军部乃督责陆奥外相向清廷办交涉，陆奥向李鸿章致电抗议云：“清国政府若不从速命令在台湾官军停止抵抗，撤回全师返国，日军将长驱直取北京。”

这个“外交弹”的威力，却比陆军三师及海军常备舰队的联合炮击，更来得利害，积弱的清廷，皆庸碌无能的清官，接得抗议惊得魂不附体，立刻以皇帝的敕令电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其电文云：“台抗京危，速班师回国”。唐景崧倒是一位清官，皇帝的命令高于民族的神圣使命，遂命收拾官兵，6月5日乘德国商船离沪尾返厦门。仅留官兵五六十人守台北城，维持治安。6月6日，英商易姆逊及美国新闻记者台维逊两人为外侨代表，赴基隆见日司令官，报告台军放弃台北城，但日军还未敢置信，至6月7日始由外侨及台奸辜显荣向导而入台北城。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一个月有余，因唐景崧坚持“民可抗官，不能违敕”的主张，遂不战而放弃台北城，民主国要

员含恨而退出首都,但仍拥护刘永福为大总统,下乡发动民众,收编未及退回祖国的军官,重整部署,继续抗拒日寇的侵略,“将一寸地一滴血”的策略付诸实行了。

#### 四、日寇三路进攻台南城

官军放弃台北城后,近卫师团乃沿枋桥、大崙坎、三角涌、新竹、安平镇、龙潭坡、铜锣塞牛澜河、龟仑等地进攻。此时守军尽是义勇军,在日寇的北部,扫荡战中可泣可歌的故事甚多,如指挥沪保卫战的女将军的故事,保卫竹塹的少年白安的勋虎扫,都是足以垂芳千载的英勇战绩。白虎队的队员皆十六七岁的少年。北部抗战中的战迹,处处表现着义勇军的勇猛善战,胜过官军。我们随便摘录几段战史,以志古人的勋迹。

##### (一)安平镇的保卫战

在北部扫荡战中,安平镇的争夺战是一个壮烈的阵地战争。此时守军是黄娘盛及胡嘉犹麾下的义勇军,阵地是一座小小的竹围,以旧式土枪的两百民兵,与日寇三木少佐的护路队及近卫师团,山根旅团的第四中队抗战,日寇于6月28日开始攻击,血战13小时,打出子弹3,400余颗,仍不能拔此小寨。至是夜8时日寇乃以烧夷弹放火烧毁四邻乡村,烧杀无辜的民众,包围安平镇,相持三日不下。至7月1日上午7时半,日寇又以优秀的炮兵队轰击安平镇,台军

沉着应战，日寇仍不得逞，9时半又增援两中队及炮兵中队，发出巨炮60弹，还不能破其坚垒。是夜日寇用15启罗瓦的炸药，由工兵炸台军阵地，亦不见效。日寇以三个中队与一炮兵中队及一工兵队，仍无法攻破安平镇，夜间又惧反攻，乃退守中坜。7月2日清晨4时半，日寇再攻安平镇，此时守军弹粮俱尽，抽选敢死队20名，冲破重围，杀日工兵17人，乘夜弃守。此役日寇打出子弹7,580颗，大炮91弹，炸药15启罗瓦，伤亡35人。为日寇登陆后最壮烈的一幕。

### (二)三角涌的大胜利

义勇军放弃安平镇后，胡嘉犹部乃退守大料坎石岸及三角涌的山地，7月13日山根旅团的坊城部队在二甲庄陷入重围，打出子弹5,980余颗，冲围走桃园，伤亡79人，路经三角涌的山径中伏，樱井小队32人中阵亡28人，4人负伤出走。此时坊城部队之兵力894人，而胡部仅700余人，台军伤34人，日寇所消耗的子弹达18,735颗，比鸡笼炮台的攻击更为困难。

### (三)大料坎的争夺战

日寇为在大料坎在三角涌及二甲庄受大挫折，老羞成怒，遂开始采用最残酷的烧杀战术，沿路逢人便杀，逢屋便烧。7月14日在高平原之战，义勇军守兵仅1,000人，日寇乃以4个中队之众进攻，义勇军分数队截击日寇为数段，并断其退路，围困于山中。日寇是日打出16,580弹，15日又打出15,400弹，企图冲破重围，但仍是失败。16日援军至，山根

部队与坛城部队联合进攻大料坎，至是日下午5时义军始弃守。日寇为欲得大料坎之据点消耗子弹62,000余颗弃粮170包，梅干30箱。

现在日寇歌有“三角涌三十士”，乃吊三角涌剧战的遗物，该歌词意云：“卿我同是日本国民，既是日本国民，怎能忘记三角涌三十士？”不但日寇不能忘三角涌的故事，一切的台湾人更未忘记三角涌的光荣历史。

日寇得竹塹(新竹)后一路南进，但沿途仍遭强烈抵抗，后方的交通线亦时常被义勇军的游击截断，枕头山导笔山，苗栗高地，葫芦墩，头家庙等地的激战，皆载于甲午战史上的战闻。他如8月26日日寇攻八卦山的炮台，守军乃刘永福麾下的黑旗军及义勇队，总数约5,000人，炮战三昼夜，日寇称为近卫师团登陆后所遭的最壮烈的战争，山根中将乃阵亡于彰化。日寇得彰化后，再向他里雾、云林、嘉义前进，10月9日得嘉义时，伤亡殆尽，已不敢再进，须得增援或补充，方能进攻台南。

日政府得桦山总督报告，知征台军损失奇重，乃命台湾副总督高岛中将率第二师及第四师来援，以高岛中将为司令官，大岛少将任参谋长，设南进司令部于台北，限各军师旅于10月8日在澎湖岛聚齐，然后分三路进攻台南城。伏见第四混成旅已于10月2日由台北出发，10月10日由布袋嘴登陆向打狗炮台推进，近卫师团残部由嘉义，南进会攻台南城，海军常备舰队又自海面协攻安平炮台及打狗炮

台。这是日寇的总攻击计划,12月13日日寇开始总攻,相持9天,安平、打狗及台南三城相继沦陷,刘永福乃乘英轮返厦门,台湾民主国至此始悲壮下场。

原载1946年5月26、27日《人民导报》



## 反抗满清统治的暴动

编者引言：台湾民主国值得纪念、但其动机又胚胎于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民族精神、此种精神即在台湾被满清征服后仍然继续存在、所以说满清的武力并没有征服了台湾人心，今日台胞的心理建设特别重要，值得同胞研究。故再揭载本文，以为参考。

郑成功逐荷人，抚番族，惨淡经营台湾，不幸中年早逝，至今犹令后人慨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幸成功后人郑经，初尚能继承父业，屡图克复内地以竟父志。永历二十七八两年（清康熙十二三年），吴三桂及耿精忠先后反清，经认为有机可乘，乃兴兵渡海而西，一时闽中旧部，望风来归，三年之中奄有东南。后以尚可信为虎作伥，引清师入闽，经师为所败，终卒于永历三十五年，克塽袭位。清以“经已死，子少国乱，时不可失”，乃于翌年出兵攻台湾，克塽屡战皆败，终率群臣纳印迎降，明宁靖王殉难，明妃遂绝。自郑成功初起，至克塽降清，明朝正朔

延续三十七年，在中国历史上，遗留不朽奇绩，唐景崧、丘逢甲曾有题郑氏庙联曰：“由秀才封王，为读书人别开生面；驱异族出境，唔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

台湾建立统一政府是在郑成功占据台湾以后。自郑氏在台湾设置延平馆，政治始渐趋统一，确立汉民族的统治权。满清入关侵占中原全土以后，反清复明的最后根据地算是台湾，直至康熙二十二年（西历1683年）始为清廷所并吞。但是“中国有志者”仍“再鼓雄风”，继续抗清，自郑克塽败亡后，至日寇侵占台湾1895年为止，先后二百二十年间，台湾人发动灭满兴汉的革命运动，共有三十二起，都是为着反抗满清的统治，现在只就主要的列表如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球的反清复明运动，拜朱佑龙为国师，因林盛告密，功败垂成。

康熙四十年（1701年）刘却率天地会起义，在诸罗发动反清复明的革命军事，至康熙四十二年被捕，遂告失败。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郑尽心由辽东率海军入据淡水，北部台湾一部响应。

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贵率天地会起义，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占凤山县，五月一日陷台湾府，称“中兴王”，震动清廷，全台湾都为汉族收复，后为蓝廷珍军及“助清义勇队”所破。

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二十八日吴福生在台

南起义，倡反清复明，宜兰方面之党人亦响应未成功。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月一日，黄教在台湾起义，与牛盗党合作，亦未成功。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严烟于乾隆四十二年来台湾，复兴“天地会”之组织，南北会党之统一战线告成，举林爽文为盟主，至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起事，十一月二十七日陷彰化城，组织“盟主府”统治收复地，十二月庄大田亦在台湾南路起事，攻台湾府，占凤山县治，几收复全岛政权，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始失败。

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十日，天地会领袖陈光爱及陈周全发动反清复明之革命运动。

嘉庆二年(1797年)杨兆在台湾台北起义。

嘉庆五年(1800年)至嘉庆十四年止前后十年间，蔡牵每年率其海军攻台湾，在陆上响应者，北有洪老四，南有吴淮四，蔡牵称“镇海威武王”虽陷凤山县及彰化县进攻台湾府，惟因与新兴地主阶级为敌，彼此未能切实合作，遂致失败。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十六日高夔在台北起事，为同志告密而败。

道光三年(1823年)三月林永春在哈仔难(即今日之宜兰街)起事，与伙伴合作，声势颇大。

道光四年(1824年)，许尚与杨良斌在南部台

湾下淡水起义。

道光六年(1826年)四月,黄斗奶在台湾起义,与台湾番人合作,组织汉番联合军与清军抗战。

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月武生郭光侯在嘉义领导农民暴动抗拒田租,此为农民暴动之始。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吴棧及林汶英起义。

咸丰四年(1854年)天地会领袖黄位在淡水起义,是年四月,李石也在台起义,响应太平天国之反清运动。

同治元年(1862年)天地会领袖戴万生,响应太平天国,发动反清军事斗争,至同治六年始失败。曾占彰化、嘉义两县,震动清廷。

同治六年(1867年)陈心妇在集集起义与清军抗战八年,至同治十三年始被捕。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藩民为台湾番人所杀,兴兵攻台湾,台湾人乘机在各地暴动。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蔡显在布袋嘴起义。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为反对刘铭传之清丈政策,施九段率农民反抗,此为第二次之农民暴动,规模甚大,波靡彰化、嘉义两县,流血至惨。

这是满清统治下的台湾实景，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到处都有汉民族的血迹，二百年间，清廷所谓大乱竟有二十余次，所以李鸿章曾警告日人说：“台湾三年小叛，五年大乱”，决非空洞的恐吓，而是铁一般的史实。

原载1946年5月29日《人民导报》

# 我们要溶化在一起

5月12日在省训团精神讲话

今天承韩教育长好意要兄弟到这里和各位讲话,兄弟感到非常荣幸!

兄弟是本省南部人,从小就离开台湾,有二十五年之久,在这二十五年中没有回来过,因此对日本政府统治台湾的一切,只由各种情报及文献上求得了解。本来像我这样的人,假如没有这次光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回来的希望,因为我们不满意日本政府,到祖国去发动抗日的工作,另与台湾方面时时取得连络,做复兴台湾的运动,日本政府很注意我们。二十五年,时间不算短,这期间在国内奔走呼号的同志们很苦,尤其在八九年抗战中受的苦很大,但一回想到台湾同胞受日本政府的欺侮压迫,其痛苦自比我们更多。本来断无再见面希望的同胞,今天见面了,而且能够聚会在一处谈话,共同过生活,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回事。

记得二十年前,我曾写一本小册子,书名是《台湾民族

运动史论》，许地山先生（许南英先生的嗣哲）为我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里说：“台湾和祖国原是一家人，好像兄弟一样，一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把小弟弟卖给别姓去，表面上算是脱离了家庭。这小弟弟在别姓管辖之下，受了很多痛苦，可是他的哥哥应该不会忘记他弟弟的痛苦的”。

而今，许地山先生虽然死了，但是这些话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今日台湾已重返祖国，亲兄弟“久别重逢”，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一回事！不幸，在这欢乐声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近来在社会上舆论上，看到本省人与外省人有些隔膜，国内同胞对台湾同胞有种种批评，而台湾同胞对外省同胞也许有多不满，两方面都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许多事往往不能如我们理想，这是难免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否让他继续存在，或是想办法来消除呢？因此“我们如何溶化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兄弟在国内二十多年工作的目的，就在要台湾重回到祖国的怀抱，因为台湾的人民，也就是祖国的人民，台湾的土地，也就是中国的版图。总理在遗教中说：“构成民族的要素，就是血统关系，国家是由家族到宗族，再由宗族到国族结成的”。我们可以说普通台胞家族的族谱中，看出从前台胞一部分是从福建漳泉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广东潮州梅县来的，我们之所谓“唐山”就是我们的祖家。我们的所谓“唐山人”就是指内地人，这就可以证明我们同胞是一个血统，同是一个民族，我们今后要互相亲爱，互相团结，更要溶化在一起！

台湾因过去五十年离开了祖国,在历史的认识上难免有一部分脱节,今后应恢复五十年的关系,二百多年前中国遭外族满清的压迫,一部分有志之士起来反抗,郑成功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图反抗“满清”恢复中国,不幸结果失败了,带了一部分有气节的人退到台湾来,继续神圣抗战的工作,我们的祖先就是从那个时候来到台湾,我们应该恢复过去的光荣,发挥郑成功的精神!使台湾变为中国的模范省,同胞为中国的模范国民。

我们欲达到这一目的应如何努力呢?

五十年来台湾在科学上物质上建设上是有进步的,谁也不能否认,另一方面就是精神文化,比较差了些,这是日人殖民地受了教育的影响,我们不要以物质建设有进步,就要自夸,相反地我们更要虚心接受祖国的文化,祖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吸收世界进步的思想,实是光辉灿烂文化,不幸在这五十年中,日人实行文化封锁政策致使大家对祖国文化不大明了,不知道祖国就在这五十年中,各方面都有进步,比如以政治来讲: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以及军政、训政、宪政的实施;不断在进步着。再从社会思想来讲:“有五·四运动”,虽是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发动的,但却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这种文化运动的成果值得我们来接受的。

再讲到日本从明治维新后,虽然在表面上看是进步很快,其实是“外强中干”,革命没有彻底,社会蕴酿着内在的



矛盾,政治表现着种种的缺点,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个专制政体的国家,社会上男女是不平等的,阶级的分化是很明显的,记得我在内蒙古张家口时,有一个日本领事会见冯玉祥,冯玉祥就问他说:“你是贱族不是?”那领事无法回答,冯玉祥接着说:“你们贵国不是有贵族吗?怎样没有贱族呢?”弄得他哑口无言,这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

再说到日本人的一切都很短浅,从生活方面讲:日人的房子多矮小,用板铺铺,房内用纸糊糊就成了,一座小小的房子,还装设有什么山水花树,不如英美用钢铁水泥建筑几十层大厦的壮大坚固。再如日人吃饭用的“御箸”也是用杉削成的,用一次就不要了,不如中国用的牙箸、木箸的坚固耐久,这虽然是些琐事,但足以表现日人没有远久的打算,处处是短浅的,就是从历史说:日本只有二千年的历史,不如中国有那般光荣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再从地理上说:日本的本土不及我们的一省大,日本的山水更比不上中国的五岳的雄壮,长江黄河珠江之伟大。

如此说来,我们受本国自然地理环境的熏陶,所以有远大的眼光,也应该有长久的计划,我们应该学习雄伟的精神。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是这般光荣悠久,我们更要虚心去接受,所以我说:我们今后要互相亲爱,互相团结,更要互相溶化在一起。

## 孔夫子的伟大

万世千秋得一人，只顾公益不行私利，只谋社会之福利，不贪个人之荣誉，不怕环境之恶劣迎困难而勇往直前，其理想即不能实现于当前亦期影响于后世者，就是孔夫子了。我国数千年来，尊奉为万世师表，不是没有原因的。

孔夫子生于战乱时代，忧世忧民，无时不想有以贡献于当时的为政者，平定天下，拯救万民，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所以周游列国，欲其理想透过当时的为政者，实现于政治上，无奈当时的为政者只顾眼前的得失，不考虑后世百年的成败，只谋巩固个人的权力，不计一般社会人民的兴衰，结果只落得浩叹“吾道不行”。

普通人如果遇到孔夫子这样的遭遇，必定失望灰心，坏的，颓丧堕落，好的，恐也只能做到“不能兼善天下，就独善其身”，退隐山林以观时变。然而孔夫子不然，其理想的抱负，即不能实现于当前，亦期有以贡献于后世。故虽退隐否蛮，犹集弟子三千，从事教育工作，不羡慕现世的富贵，不嫌弃穷陋的生活，若以时人的“世利眼”看来，必大叹息

“其愚不可及也”，但他终于得七十二贤人，著书立说，风靡全中国。虽夷狄之邦无不受其感化，其学说传述数千年之久，本人被尊奉为“万事师表”，其愚固不可及，其智亦不可及也。

时人有以孔子的学说思想不适合现世而加非难者，但若平心而论，至少孔子的精神实值得吾人尊崇。至于社会环境之变化与进展，乃社会进化必然的归宿。数千年前任何大圣大贤，都无法保其主张能通行于万世之后而不逾越。因为真理没有绝对的，只有“近真”而已，世界任何大科学家却不敢保其学说永久不变，“相对论”的价值也即在此。时人之有“以变衡定”非难孔夫子，无乃太过乎？尤有进者，有人以其出生私德批评孔夫子是非者，若非别有用心，即为丧心病狂。犹如时人动辄以私德攻击政敌者，然何况不配称为政敌，只是殷勤献媚讨好而已，孔夫子有知，能不捶胸悲愤乎？

相传孔夫子为一达观贤者，高瞻远盼，不为威武所屈，不为权利所诱，当时不染于阿附谀承，不会拍马吹牛，今日当仍值其所值，而非其所非，不怕无聊的任何中伤吧！今日台湾世景渐变，人心不古，惯造谣言中伤，密告升官，乱戴帽子以谋独占权位的风气，逐渐侵入，逐渐分布，老奸巨猾，精于“官场之游泳术”者，应扪心自问其恶影响的责任，更应知百年之后必有“春秋”出以问世。一般人民尤须“知廉耻，明礼仪”，勿为卑鄙寡廉者流所蛊惑，努力充当忠实的新台湾建设者，凡有诬蔑忠实建设者出现，必须“鸣鼓而

攻之”，举凡有利于台湾合理建设的工作，必须勇往直前。凡有沟通官民感情使得实际协力融化者，应多尊崇。凡有貌似忠于政府而实为政府摒绝人民者，政府固不易觉察，人民亦应知检举。是为“春秋之义”，孔夫子精神之伟大，即在于斯，这里特以纪念孔圣诞。

原载1946年8月27日《新生报》

## 报人的使命

——为纪念记者节而作

报业之发展,正如革命之发展,今日的成功就是过去的牺牲,过去一代报人的血汗生命,充当后代报人的脚踏石,造成今日报人言论自由的地基,吾人今日纪念记者节,切不可忘记过去牺牲血汗生命的报人前辈,同时,每一个时代,有革命自然也有反革命,所以有为言论自由而牺牲生命的报人,也有为自己权位而摧残报业,破坏言论自由的报人。过去如此,今日也是如此,纪念记者节,更不能忘记报界害虫的肃清工作。

二十多年前北京在张作霖军阀统治下,华北是一片黑暗,报界自也无光明可言,我们几个学生朋友创办《新台湾》,反对这种黑暗的统治(当时我用的笔名叫做“奔流”),坐了两夜的警察局冷板凳,幸而没有掉了脑袋。名记者邵飘萍及林白水,则因批评潘复兴张宗昌的勾结而被枪毙

了,那时候我们党的革命势力还没有到达北方,前进的报人先为言论而牺牲了生命。

前天承台湾画报社的招待,看过《风尘佳人》的影片,表演蔡松坡将军为反对袁世凯称帝推翻共和民主制,如何受难、如何冒险逃出北京,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一批阿附趋承利欲熏心的小人,制造舆论,称各方有力者欢迎帝制,用以迎合袁世凯的欢心。但是一到蔡松坡李烈钧等人举起义旗发动讨袁而各路义军逐渐迫近平津的时候,袁世凯始恍然大悟于专制勾当不可干,皇帝美梦做不得,于是埋怨趋承迎合的近臣,怒打主谋者,捏死皇娘子,不久自己亦羞愤而死。

这种对照在古今中外,不乏丰富的史实,而每一事件都有报人穿插其中,为烈士为罪人,后世均有公正的判定。吾人以为今日报人最重大而正当的使命,在于忠实报道,反映民情。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为政者,大体上皆抱有为民谋福利以巩固信望的高远理想,所不同者只在于运用政策之得当与否,但欲运用政策得当,必须先洞察实际接纳民情,而民情与实况往往不容易上达于最高当局,于是一般报纸乃有其效用,公正的报纸就是报达民情的机关。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需要这种忠实的报导,所以报人的第一使命,在于不带主观意气的忠实报导。

报人的第二重大使命,为公正善意的批评,每个为政

者大体上都想把政治弄好,把经济、社会、乃至教育文化,统统弄得合于人民的希望,因为如无好的成绩,他的政权和地位就无从巩固下去,中外古今的史实,都在确切证明这个道理。不过,当其运用政策时,常常出于正常轨道之外,结果得到相反的效果。我以为政治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应由“众人的意志”来决定,较能合于实际。俗语说得好:“一人主张,不如二人商量”,少数人商量,究竟不如多数人商量,来得确切。多数人商量的方式,除了开会讨论以外,就是透过报纸舆论的民意表露,所以现代的民主国家重视舆论,尊重舆论。所以报纸的批评,也应当公正而善意。

报人的第三重要使命,在于积极而具体的建议。报纸对于政府施設及人民言行,若单限于批评,还是消极的,更重要的,还需要积极而具体的建议,以备政府及社会采用,这也是集思广益的一种办法。常听见政府及社会方面的反批评,说报纸只会骂人但无办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所以批评要公正,并要有建设性,至若空洞的或虚构的批评,就更会犯上“漫骂”的毛病。这又正如有些官报硬说“暴民要把报人,推上断头台”,是一样的错误。所以报纸的批评,最要避忌的,就是意气的、偏见的意见。第二要避忌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的说法。一切批评要积极而具体,才能收到效果,达到舆论的目的。

总之,在此民主潮流澎湃全世界的现代,政府要洞悉

民意所在，而报纸就是民意表露的最好的机关。政府要重视报纸的报导，尊重报纸的批评，但是报人也要自重，务求报导要忠实，批评要公正并要积极的建议，方不辱报人的神圣使命。

原载1946年8月31日《人民导报》



## 台湾教育设施的现阶段

### ——全省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闭幕感言

台湾光复经及一年，教育文化虽说应该配合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但实际上确已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前头，这不是我们自吹自擂，实有许多事实可为作证。

日本固然给我们造成台湾教育文化的基础，但并未完成合理的发展，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教育文化的发展，已为侵略战争所阻碍，体育退步了，科学以至各种学科，都呈现停滞的现象，我们初来到台湾，在教育文化上遇到的困难，不独是校舍破烂而已，教育文化本质的改造，教育文化程度恢复等等，尤其成了我们推进教育文化的课题。

我们教育文化的推进工作，全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遵守陈长官的指示，以造成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培养实践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的人材。我们推进教育的第一期工作，是接收与整理，把破坏零乱的教育设备，接收过来加以整理。台湾教育的特点，就是普遍，而

此普遍恰好使我们在整理过程上，必须花费更大的精神和更多的时间。在整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一种困难，就是日人师生的撤退和我们自己的补充，这些困难因限于交通工具缺乏及人才条件不合。一直把这些问题，拖延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接收整理工作，可以说大体上业已完成。

这个接收整理工作所完成的特色，第一，把不同教育宗旨所造成的教育制度，予以废除，例如日本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可说从根本铲除了。第二，种族的差别教育，也已不存在，一般台胞乃至高山族都得受同等教育。第三，阶级差别所产生的教育倾向，也在矫正中，贫穷的学生正在设法补助奖励。第四，已往闭塞孤立的教育，已被打破，将六百万台胞带入四万万人大舞台门路，业已开辟，甚至带上国际舞台，使他们得以变成现代的世界人。第五，过去偏于维持个人生活的倾向，例如医生、律师及商家等倾向，渐被拖入为国家社会的教育修养方面。例如法政、经济、哲学、文艺，及高深技术等方面。

若举事实来说明，我们总算完全接办了日本时代的官公立学校，并且运用台胞热心教育及青年好学的优点增设了不少学校单位，现在只就中等以上学校说，省立的即有七十余所，加上县市立的，总数当在二百个以上，而地方设立私立学校的风气又很浓厚。第二，教员的配备也渐渐合理化，质地也在提高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是国语文及公民史地等有关精神文化的教员，采用外省的好教员，而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自然科学，乃至超国界的学科如音乐、

雕刻、体育等,则要多多采用本省人。初期不得已而暂用的代用的教员,及外省质地不良的教员,已渐予以淘汰。第三,教科用书,不但已由四大书局印刷提供,其不够部分也在设法供给。教科书的内容更力求其合于台湾特殊情形的需要。第四,一般教育宗旨,在于建造民权主义的基础,职业教育更求其能配合民生主义的推行,此外还专设师范学院,增加师范学校,以培养大量的中下教员,以解决台湾最严重的师资问题。专设法商学院的用意,也即在于补充过去当然缺欠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才,以铺设人民合理行使民权的道路。专设台南工学院,台中农学院,及其他种种职业学校,目的不独在于培养生产人才,更重要的意义,尤在于实际经营各种产业,以为民间提倡,例如农学院及各农业职业学校,就准备经营大农场,以为大农耕种的示范,并拟由此组织合作农场,以奖励推广,民间的合作农场,使台湾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而台湾整个产业体系现代化。

然而我们并不满意于现状,虽说台湾教育已由整理步入改进的阶段,但未做到的地方还非常之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做去,我们并且相信要推行台湾教育到理想的路上,到理想的地步,必须各学校校长及一般献身教育的人士,予以积极的帮助。我们还准备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

# 谈谈台湾农业的改进

## ——祝中华农学会成立

昨日中华农学会台湾分会成立，内地既成的团体在台湾成立分会，又多一个实例。日来中外合组的农业技术视察团，也为视察台湾农耕实况忙了一阵。这些都是很好的消息，大家都是为着改进台湾农业及农民生活。就中尤其值得欣喜的是农学会的组织就现状言是以省农林处为主干，为首脑部，所以研究所得办法想都可以应用于实际农政上。爰拟略抒意见，以贡献农业诸专家。

台湾的农业情形比之国内有点特殊，并且具备特别的基础条件，此后台湾农政实施得法，台湾农业经济确实可以大收效果而为实行民生主义的模范，但若原则尽管良善而实施办法及人事问题不能圆满配合，则或实施初期难免有离题愈远的弊病，甚至至背道而驰，是大家应该特加留意慎重从事的。所以研究性计划授权的农学会，首先应多着重于台湾农业实情的现在，并精密研究办法，使应用于

实际农政时,将与民生主义及现代农业趋势相吻合,并不致妨碍其他农业部门的发展,使不重犯过去日本偏重政策及台湾农业畸形发展的弊病始可。讨论农业问题及农政施設,应知两种不同的范围,是在互相效应,互为因果。其一是农业经营的改进,其二是农村经济的改善。假使农村经济不能改善而只农业经营进步,其成效及利益势必偏在于少数人,而社会发展变成畸形,假使单求农民生活改善而农业经营不进步,则其社会经济必成世界水准的落伍者,而农民所得福利也极有限。民生主义指示我们一个高远理想的目标,但只偏于农民生活的改善,而农业经营的世界趋向,尚有待于农业技术家及农业经济学者,来努力发扬光大。

单就农业经营言,台湾确已具备一部分良好的条件,台湾同胞之间,尚无了不起的大地主,一向也无了不起的大农耕种,而广大土地集中于日本政府及日本资本家手里,如广大无垠的官有林,及已相当集中经营的糖厂农场就是。自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以后这些农林及耕地全部归我政府公有,正提供我们以经营大规模示范农场的良好条件。我们苟能善为利用这些农林地,使其经营收获优良的成果,则再进一步鼓励农民协力经营合作农场,自可一帆风顺,普遍登台湾农耕于世界水准以上。但是问题仍在于能否获得优良的结果,假使大规模农耕,生产费意外的浩大,冗员与浪费依然不能避免,如一般公营事业那样,则虽有改进农民经济的良好动机及为民示范的德意,实际上农

民仍必裹足不前不敢效法，而改进农耕无从普遍。

所以农耕规模的改进，还要人事配合得上，经济的进步，有待于政治的革新，自非宣言或善意的建议。我国的经济建设原则，着重于国营或公营，用意至善至美，而实际国营公营事业常不能开展的原因，即在于此政治的问题上。其次，农耕的进展不能独善，经济各部门是互相联系息息相关的，假使一地方的工矿业没有相当发展之农村，人口自不能减少，都市人口再流于农村，则农耕机械化、大规模化，自属不可能。人口若集中于农村发生农村劳动力过剩时，工资自必低下，拟欲采用机器机耕种其生产费必至昂贵，机器生产费若高过人力耕种费，则机器必至无人问津。

再就其他与农业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产业部门言，亦必须有相当的配合，例如新式耕种须采用电力灌溉，台湾过去业已相当发达，但近来则因电费昂贵而弃留不用者，已渐有所闻。再如新式农具之制造及采购，也有待于工商业之发展，农业资金之运用，更有待于金融机构之合理提供。此外如农耕规模须受地势之限制，在日本本部虽具重要性而在台湾则无多大意义，尤其是南部台湾如台南高雄两县，更无阻碍。总之，台湾农耕能否改进，大体上要以政治的及别部门经济的条件来决定。

谈论农业经济之改进，不能忽视农民生活之改善，台南某县长曾晤笔者说，现在台湾人民生活若不能改善，则台湾光复自无意义，这是多么透彻的良言，实具政治家的风度。此言应用在农村建设上，也有独特的意义。假使农民

生活不能改善,农村经济不能普遍好转,则农业经济建设失却根本的意义,此点不独关系农业经营的问题,而且是农业改进成败的关键。

台湾过去大地主是日本人,日本资本家以封建的方式剥削着台湾农民,糖蔗的不等价交易,不公正的分量规定,及强制性的栽种,属于“经济外的剥削”。但是现在台湾同胞却喧嚷着。现在的大地主是政府。此点台胞固有未尽了解我国经济建设之处,但实际的运用,必须确能于农民有利,不发生日本人的经济外剥削情事,始可以证明我国经建原则的正确性。此点,陈长官经已深切关注,而其所关联的问题多而复杂,如土地制度之合理化,土地利用之经济化,乃至田赋负担及征收之公平化等等。

关于土地制度问题,一个共通理想,就是减少或消灭佃农,更理想的办法还在于土地公有制,而长官所着重之点,即在于公有土地之有利合理运用。但若自耕农的负担,大于佃农时,即欲“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现,事就不容易做到。现在已有地税负担重于地租(佃租)的传说,也堪我们注意。

台湾省五年经济建设计划中,规定:“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分配(土地)给有耕种力的农民,配地每户面积,田以三甲,地以四甲为原则,但这应当解释为分配给田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而此零细耕种更应以合作农场的奖励,来补救其缺点。五年经建计划中,也规定改善租佃关系,而此问题之复杂微妙,为各国所共同,台湾更需要实

地精密的调查,和合理周全的设计。

农业经济比工业经济复杂而微妙,这里只因农学会成立有感,略述数点,提供当局好检讨,并以请教诸专家,祝农学会健全发展。

原载1946年9月29日《人民导报》



## 推行合作事业的检讨

### ——并祝台湾合作事业健全发展

合作事业的兴衰，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同时也证明一个政府是否关心中下层人民的福利，是否在谋接近人民。

欧美先进国家的合作事业，大体上相当发展，而落伍国家则因人民缺欠合作性团结力，大规模经营的力量，而一般皆甚衰微，我国各省则为一例。但是总理遗教的民生主义却包括着发展合作事业的意义，并且是民生主义办法中主干之一，合作事业如能合理健全发展，则民生问题可以说解决大半。信奉三民主义的人们，不可不多留意于合作事业之是否合理健全发展的问题。更应督促政府奖励推进合作事业。

台湾合作事业原已相当发达，其事业单位达五百以上，其事业范围包括也甚广泛，其主要者有农会，遍立于各县区乡镇。此外尚有渔业会，信用组合等，皆有相当成绩的

表现。陈长官为推行民生主义于台湾,特别注意合作事业之改进,省公署特于最近成立合作事业管理委员会,其目标在使过去及现在合作事业得以衔接,并谋配合台湾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发展合作金融,增加生产,加强供给与增进一般人民的生活,用意至善。

建设合作事业的目的,在于改进人民生活,在于增进各部门产业,所以事业的种类包括生产的供应、运销、信用等等,而其运用又普遍及于各经济部门。所以合作事业的管理,应注意产业的健全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合理改进,特别要注意中下级产业发展的奖励和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改善。过去日本政府对于台湾合作事业的推行,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成绩,但其发展只偏于一面,就是产业的发展,而一般人民生活的改善却未完全顾到。虽说日本的社会经济政策,置重心于中坚社会层明保护,但在台湾因为民族界线的作祟,常出了轨道之外,台湾的合作事业虽然相当发达,而本省人所沾得到的利益甚少。

过去台湾是大和民族统治着汉民族,所以发生上述畸形的现象,现在已经是汉民族领导着汉民族,并且政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人民是以中下层人民占大多数,所以此后合作事业管理的第一重要方面是为改变过去此方面的缺陷,而完全遵从民生主义的教训,特别将合作事业的利益,普及于中下层民众。

我国为合作事业的后起,各省推行的成绩不算圆满,也未完全合于合作事业的宗旨。例如合作金库的放款规定

很多担保办法，须有实物抵押或殷实担保，如法放贷款，但是实际上，中下层小实业家或小资本商人，皆未具此等条件，所以合作金库的放款，大部分为大商巨贾所独占。此点在台湾今后应设法改革。再如农民银行之设立，原为放款给中小农民，以谋改进农业经营及农民生活，但其农贷的实绩，则又因抵押担保的限制，两大批放款又为大农富农所得，而一般小农则依旧叫借无门，甘心忍受高利贷的剥削。各省小实业家、小商人、及小农民所忍受高利贷的剥削率，闻高至月息20%。此后台湾的信用合作，一面要靠国家银行出力支持，一面要放到小农民小商人身上去。

更重要的如生产合作部门，如合作工厂、合作农场之举办，尤须注意一个原则，就是经营的公开化、民主化。合作工厂是集合小厂家组织成功的，合作农场是集合小农民组织成功的，大家都是所参加单位的主人，而经营者只是经理、或仆人，主权在主人，经理或仆人只是执行或听使役而已。所以经营方式要公开要民主化。政府方面，即使参加资本或人员，亦应严守这个原则，才不致有流于官僚化的危险。

合作事业落后的国家政府对于推行或奖励，初期还要先开办范模事业，例如大规模农场之经营，采用最经济而合于农业耕种潮流的经营方式，经营得法管理得法，以举卓越的业绩，对于一般人民发生示范作用，然后集合人民举办生产合作事业，始可容易组织成功。再如运用资金、生产工具（如新式农具），生产运输等等，政府都要给予相当便利与补助，以资奖励。政府能如此扶植培养，民间的真正

合作,单位始可以日益增加,而合作事业臻于健全发展的地步。

政府方面最紧要的,是要避免各省各种公营事业所犯的毛病。我的同学安昌文专门研究合作事业,曾于抗战艰难时期,在重庆南岸经营一个合作农场,经过几年惨淡经营的结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事业范围也日益扩大,后来农林部对此颇有所动,收为部营,给经营者安了三个位置。农林部的用意原是很好,想借此扩大为示范的大规模合作农场,但可惜结果却为相反,我这位帝大农经同学,现在却须跑到广西大学去当教授了,其南岸合作农场失败的原因,虽无详细资料,但其在公营之后失败的却很确实,我不是反对公营,但希望公营要为人设法。

民政处现已注意及此,特别举办合作人员讲习班,参加人员达七十二人,训练各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主要课程为合作政策,工作纲要,合作法规,合作理论,中国合作运动,乃至登记须知,组织须知等,都是重要功课,又都是偏于管理方面的,当然是目前所必需的,但于经营技术合作事业致政治意识、经济意义等等,吾人还希望再多举办些讲习班,更深入养成专门的合作人员。因限于篇幅今天仅说到这里。并以祝台湾合作事业发展。

原载1946年10月6日《人民导报》

## 成功之道

### ——在成功中学训话记录

今天承何校长的好意，请我前来讲话，我觉得非常高兴。

成功中学的前身是台北第二中学校，这学校过去有他的光荣历史，台北二中在日人时代纯系台湾学生读书的地方，当时日人歧视本省人，采差别待遇，日台分开，二中收纳台湾学生，其他一中三中四中等均招收日人学生，后来虽亦曾招收台湾学生，但为数极少，当时日人是说，一中三中四中等校成绩比二中好，但在现在按照我们立场来说，二中全系台湾生，这实实在在的保存汉族民族思想，不像其他学校少数台湾学生就在日人学生中难免受其熏染，日人的野心是想先同化学生，由学生浸透家庭，固然我汉族意识□□难为所动，然除二中外的其他学校，当不无多少受其影响，这层是二中不同于其他学校而有其光荣历史的来由。大家当然还是曾记得光复之初因学校命名曾引起

了两次争执,原第二三四等校并为第一中学校,但二中的学生,尤其学生的家长以二中有其光荣的历史,要求教育处把一中改为第二中学,其理由为汉民族思想保存得独厚的学校,这就是证明二中光荣的地方,不过校名次序的排列只不过是名义而已,求其方便而已,其在社会的地位必须以实际成绩来决定,后来这争执平息了,仍别以数而以成功来命名,我们应该认定须学生们努力读书,遵守校规,现在做个好学生,将来做个好国民,这样才是以提高其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在第一第二的名义之争,万勿存这机械的念头,须切合实际的不断努力才好。

你们学校有10,250人学生,可说是台北各中学中人数最多、设备最完整的学校,其和建国中学比较起来,社会自有定评,这因过去建国校长,用不得其人,今已另派任新校长,陈文彬先生,相信此后必收良效,可望蒸蒸日上,而成功中学亦须一本过去精神贯彻始终,和其并驾齐驱,共相比美,成为本省中等学校的双壁。

今天我的讲题为青年成功之道,人均须努力求上进,尤其青年更须及时努力,事业方克有成,这学校校名为“成功”,我们勿忘其义,凡事须存着尚未成功的念头,如总理努力革命40年尚于临终时训示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真的,民国鼎建以来,一切待我们努力的地方还多,再说,蒋主席勉示我们须继续努力,胜利之后诸多待举,举凡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建设尚未成功,国事如此,个人的事业亦莫不如此,做人由青年而壮年而老年须努力不懈,勿抱

已成功的念头,不思进取,须望一切事业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成功的境地,能如此,则社会赖以发展,国家赖以发展,全人类亦赖以发展,现在我就这成功之道,亦就是这学校校名所标揭的本旨,提供一点意见以供参考。

凡人做事欲求其成功简单说起来其努力目标,不外乎“智”“仁”“勇”三者,分析之,所谓智识、仁义、勇敢,表面看来,非常简单,但其内容涵养是多面的,有着种种的解答,愿就个人经验和瞥见所及,提出来和大家谈谈希望大家能身体力行。

(一)“智”,智识,学问包括在内,“智”,学问从学习而来,所以一个人要希望自己事业,有所成就,则必须抱定活到老学到死的态度,特别是青年学生更须全部时间放在学习上,一切以学习为重,但怎样去学习,学习应取的态度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学习不是盲目的,更不可因循走马看花的看完了一本一的书,就算数,学习首先必须有一科学学习的方法,与正确学习的态度,我们要新的智识,好的学问,除在学校,校长老师的教诲指导我们学习外,我们时时刻刻应采取主动自发的精神,才有济事。时代思潮日趋实际,过去国内习法空洞不务实际,如民国前科举时代做八股文章,做诗排好七律五绝仅从形式上做功夫,全为应试秀才举人进士,只要一举成名荣任出仕,所以这种学习是空洞的,与实际不符已分家且与时代脱节不合,此在目前,我们这新时代,新的环境,是要求我们学习的方法与态度,必须适应社会实际需求配合科学文化的思潮,在

学校方面,要注重实验实践;例如化学因素配合须要实验证实定理原则,实验农业耕法不切实际者很多,所以学农的必须到农场去实际工作,才来得切实。还须学校学理论的,要去工场实践实验,职业教育甚至管理方面,我们才能与社会配合,所以学校教育重在实验,学习必要以实践相辅而进,实践是将来做人的方法。例如你们将来要做国家的主人,我们就应该怎样去学习做主人的法度,要是现在不实践体验,出社会谋事必不合实际,例者之,此次台湾光复照我国宪政时期办法实行民主政治,选举民众代表,组织县市省的民众机关,参议员在选举过程中因为无实际民主的教育,所以初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问题所在,就是人民缺乏一种新的政治讲坛,即选出代表后,也因为尚欠民主的政治教育,所以行使职权时,也表现纠纷,这不是说参议员不好,至少可说他们在替人民说话的程度不够,在行使职权方面不妥当尚多。现在我们是在学生时代,民主实习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其实在学校可以学习学习民主的常识,与培养民主的作风,如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各种学术研究会,都可以民主以公开的方法来办理。比如伙食、居住、服务,诸问题,都可以现代民主方式来处理。这也是将来准备做国家的主人的很好的训练机会,从这机会一定可得着很好很丰富的学识和教训。更可训练自身体貌和精神。但这是在互助协力共同策动始可进步,所以“实践”这个问题在学生时代也是同样可以做到的问题,只是在工作后师生的志趣如何“智”这点在学生时代要注重在“实验”。



“实践”上面在社会也是如此,还有一点应用到教育方法,要紧不仅是接纳方法,宜以演讲方法来补助。因此古代圣贤君子许多话及外国科学先进所有的理论,固然足以学习也可以实用,但学习的方法,必须求有效果,节时间节省精力。特别要注重时间与空间限制,外国的科学文化很昌明,很发达,但不一定都适合我国。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持检讨的态度,抱怀疑的方法,研究这种办法是否适应我国。对于古代文化也应要以同样态度和看法来研究检讨,因为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目前时代环境不同,例如孔夫子学说及其治学做人的修养,我们要学习无疑。但在目前男女平摆时代,连小学生也通晓的常识如他所说“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在过去的情况说来尚可原恕,但在现代研究起来,许多妇女就起来反对的,所以古人的言行原则上要学习,但必须以检讨的方法去研究,但最终还要“实验实践”,要师法中外举贤先进,而加以现代眼光的检讨。

(二)“仁”字看起来很空洞,简单说起来,即是国父的革命精神的“博爱”照以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应用在人类社会上就是不分彼此大家推诚,相与应用在我们学生时代方面,则应革除日人统治之下的教育差别,观念第一,种族差别日人与台胞待遇的差别,对男女间待遇也是不相同,但光复后这种观念已无由存在,在国内种族无论是汉蒙满回藏——一律都平等待遇,现在在台省内地来的外省人无论是那一省也是如此要像一家人一样亲爱。对男女间丝毫无差别,只要妇女智能水准提高皆可与男人平权相等。台省与高山族同胞亦是同样同等待遇,陈长官此次出巡曾为高

山族教育文化及经费解决甚多的困难,即一明证。在政治上亦是如此,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博爱平等。但是最近常看到本省人与外省人表现若干不必要的隔阂迹象,如某学校本省人与外省人同学发生意气纠纷,本省人即呼喊打“中国人”,我们问问难道自己不是中国人吗?我们自己都是中国人应该博爱。到社会上更要博爱,只要不是坏人都要一视同仁,同样看待。尤其到了社会上所干行政事务的同胞,更要遵守这种良好原则,要博爱。假如自己一旦负责什么工作,需要人员协力,采用自己的亲友们也好,问题只要是有能力肯负责。假如他们万一有不法贪污之点,不问是亲友关系,得依然严法照办。自己要以身作则,要勇敢博爱以仁爱精神,大义灭亲大公无私去应付,现在我们学生时代也同样,要应用这种法度和精神,去学习去生活。

(三)是“勇”,简言之,“勇”就是勇敢、勇气,凡做事情,缺乏勇气,不勇敢去做,“畏首畏尾”的,事情一定做不好,是故必先培养勇气,但勇之为用,必须与“智”“仁”相配合,否则,必不得其赏,“勇”必行实于公并不能以之利己,现代世界思潮趋于重公德这一方面,凡有益于社会、国家、人民之事,要勇为之不计牺牲、利害、成败。我们八年抗战苦斗,从困难中得到最后胜利,乃系勇以致之,就日人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就彼时情形言之,我们是毫无胜算把握,但我国是站在反侵略的立场上,亦就是站在“仁”的立场上,到底在连连失败中站起身来,战争开始,未始不知须忍受绝大牺牲,但一再服从主席的领导,就要坚持到底,这乃“勇”在

“仁”的法则上发挥其力量。说到主席我们都晓得他是我国古往今来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其成功要诀不外是他能分别清楚公私利益，以国家第一的原则下领导抗战，结果成功了，历史上有他的重要的地位了。反过来说，一切勇气如不衡之以“仁”以“智”则必至得到相反的效果，像贪污、犯罪其亦算得上很有勇气，但结果是须受法律处分，身败名裂，这“勇”系自利之“勇”，不足取，正正当当的勇须要具有“勇气在仁”和“当仁不让”的精神。如学生在学校，对学校有益的事，如排斥校规制裁少数犯过学生，或于学校服务事项鼓其勇气去做是应当的。假如学校的校规规定考试学生不许看或作弊，而竟违规去作弊了，这也是勇气呀！但这恐不对了，是故勇必明是非明曲直，万不可盲目的轻举盲动。

总言之，“智”“仁”“勇”三者表面似乎不相关连，其实是相互为用，息息相关的，研究其理辨其是非订其步骤，择其途径然后去实行，实行时须起以勇气持以毅力。青年学生须好好的了解这中间的道理，切实奉行，好好的运用，这是成功的三个程序。建立健全伟大的人格，做个健全的国民，将来做个优秀的国家主人，切勿有负这个学校的名称，愿共勉之。

(10月7日)

原载1946年10月8、9日《人民导报》

## 国父与国庆

国庆为中华民国立国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多年始创造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纪念国庆不能忘记国父，尤不能忘记国父的理想及其事业。国父的理想在于解救四万万五千万生民，在于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现在抗战虽已胜利，帝国主义所加于我国的枷锁虽已挣脱，但建国头绪万端，还有待于革命同志及一般国民继续努力。先烈鲜血未干，同志不应健忘，我们尚须“和平、奋斗、救中国”，勿负国父遗志，愿与国人共勉之。

原载1946年10月10日《人民导报》

# 國慶紀念特刊

## 宋斐如題

### 國慶與辛亥革命 國民政府 正

三十五年前，當那歷史的洪流澎湃而下，在武昌城頭，第一槍響起，革命軍人，披荆斬棘，建立了中華民國。在這一偉大的日子，就是我們國慶的生日。我們把這日子，叫做國慶，這是一定的，也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的。我們把這日子，叫做國慶，這是一定的，也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的。我們把這日子，叫做國慶，這是一定的，也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的。

國父與國慶 宋斐如  
國慶為中華民國立國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多年始締造中華民國，所以我們紀念國慶不能忘記國父，尤不能忘記國父的理想及其事業。國父的理想在於解救四萬萬五千萬生民。在於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現在抗戰雖已勝利，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國的枷鎖雖已掙脫，但建國頭緒萬端，還有待於革命同志及一般國民繼續努力，先烈鮮血未乾，國志不應健忘，我們尚須一和平奮鬥救中國，勿負國父遺志，願與國人共勉之。

抗戰既勝 建國必成  
欣逢國慶 遍地歡聲  
美哉臺灣 民族之英  
張我權權 裕其民生  
富強康樂 國之光榮  
用以慶祝 國之榮光  
三十五年 國慶紀念  
葛敬恩題祝

國慶紀念述感 賈蔚芬  
國慶的回顧與前瞻 黃朝琴  
慶祝國慶

國慶的回顧與前瞻 黃朝琴  
慶祝國慶

## 回顾与希望

台湾光复皆已一年，自大体上言各种推进成绩尚称良好，自然值得我们庆祝、纪念。虽然“大战之后必有荒年”，台湾也发生过数十年来未曾有的大台风，减少了丰收不少，而此“荒年”又不只包含自然界，即如战后复员的紊乱也应算上，但是台湾各方面情形，平心而论总算不恶。比之其他各省兵祸灾连，哀黎遍地，则更值得庆祝。今年台湾纪念光复，且获主席偕夫人莅临，台湾万民得仰瞻尊仪，或且得以声诉日本军阀的压迫、沦陷时期的苦楚，及现在生活的困难，又是荣幸中的荣幸。

不过，我们也不能以现状为满足而松懈了奋发建设新台湾的意志，各部门努力未够的地方，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具体言之，政治业已开始人民参议、参政，而此参议、参政是否已经健全合理发展？经济已在依照民生主义推进中，而公营事业中是否有不合经济法则的情事？有无掺杂政治的阻力在其中？教育各机关均已接收接办，而此接办及设施，是否没有不正确，没有不合台湾实情的地方？社会也已向

现代中华国民化的道路迈进,而此迈进是否受着某些原因所阻碍而致迟滞?凡此种种实情,都还需要我们严肃详密的检讨,并研究,讨论适当办法来补救。而此补救办法尤应多多领会陈长官指示放与守适度,可放则放的原则,政府要体贴人民,人民要协助政府,双方都要尊重舆论。只就舆论一点言,政府固须多加尊重,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合理合法运用,尤要加倍热诚,加倍出力,愿各界共勉共励!

原载1946年10月25日《人民导报》

# 学生深造的第一步

——延平学院讲演纪录

本社社长宋斐如氏本月6日应延平学院之请，赴该校讲述《学生深造的第一步》，闻其内容指引学生深造之路至为正确，其分析举例详尽而恰合，其叙述深入而浅出，不但对于延平学院一处学生有大裨助，即对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亦可为求学之指针。特请讲者口述其大概，刊出以为大学师生之参考。

——编者

(前略)学生修完国民学校及中等学校，在现代国家里，还不算成功了学业，而只完成充当一个国民应具有常识的学习而已。由中等学校进入大学阶段，才算学生深造的开始。你们在深造学问的初期，对于罗列在眼前的许多学科应系先有一番的认识，从这认识中去择最适合自己兴趣



及特长的学科。此点可称为“学生深造的第一步”，也就是学生选择学科的准备。在志愿深造学问的大学生，是很重要的。假使这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妥当的解决，则他的学习及做人，会浪费很多无谓的时间和精神。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里，时常听到“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话，就是这种浪费的指证。例如中国大文豪的鲁迅（周树人先生），起初是学海军的，后来却变成文学家、思想家。另一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和抗战期间死于日人毒手的郁达夫先生，都是中国当代的文学家，他们都是毕业大学医科的，再如现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先生是学地质的，前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是学矿学的，他们所用的，和他们所学的，都相差数千万里之远。假使他们所用的为他们所学的，相信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而其效率也可特别高。即令在学习期间中途改科系，亦要吃相当的亏，例如工学系本科3年生要转文科，必须从一年级学起，文科生要转医学院也要从头入第一学年。所以志愿深造的学生，必须慎重这第一步。

选择学科表面上虽很简单，但事实上不是容易的事，要选择不错，必须认识正确。所以一个大学生在其深造的第一步，必费相当的苦心考虑深造的对象的问题，例如我个人，当北京大学预科修了时，对于将要升入的系别就费了相当的思虑，也曾请教过师长和朋友。最初想入经济系，但缘臭钱味太重，整天以数目字为对手，以打算盘为工作，未免无

聊,继想入哲学系,又以哲学虽为各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天文科学)的结论,但又嫌太过空洞,抽象不切实际,许多哲学家往往因为解决人生和宇宙的一个问题,花费一生还得不到结论,悲观自杀的人也不少;法律系呢,太古板;政治系呢,根本就没有独特的课程。最后选学经济系,以为它比较实际而有内容,但最后决定的经济学对象,却与最初决定者不同,而是包括政治、社会、及法律等部门的广义经济学,即所谓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选择一种深造的对象,要从几方面来考虑。第一要考虑自己的志趣,即志向与趣味。一个人想在这一生做些什么事,什么事业对于自己感觉有趣,也须在这时期考虑清楚。凡事“有志事竟成”,志向是作事成事的前提。作一件事若感觉干燥乏味,则如机械人生活,事也不能做得好,第二要考虑自己特长和个性。要深沉寡言的人,去当外交家、交际家,一定办不好外交;要浮躁轻俏的人,去研究哲学,人生社会就会变成花花世界;要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去当兵,要胆怯心细的人去冲锋陷阵,一定打败仗;要雄纠纠、杀气腾腾的人去讲人道主义,慈善事业结果是要唬死饥饿线上的人们。第三还要考虑未来的劳力市场,及一国一地方的情势。“学以致用”,究竟是个原则,没有不为致用而学的,虽说中国社会到处讲人情,有人事关系会夤缘苟营的人,逢迎巴结走外线内线的人,就是没有学问也可以位高禄厚,根本就用不着学问。但是无论如何主子总要有用的奴才,何况时代是在不断改进中,无用或不适用的人,终会被

淘汰。自己国家或地方未来所需要的人才,就成了选择深造对象的条件。工矿业将要发展的地方,需要各科工矿业的人才,医生满山满谷的地方,再学医学就缺少出路。师资缺乏的时代,代用教员都被用为正式教员,会计制度需要成立的地方粗通记帐的人,都可充会计师。所以未来市场也为学生深造时考虑的焦点,“学校需要”或“需要为学习之母”,即此之谓。

先仔细考虑内外的条件,即本身的志趣和特长,时势和环境,然后决定深造的对象,大体上可不致大错。但是趣味和志向有时会变化,最初认为最合适的学科,到实地学习时或应用时,有时也会和初志相违反,例如志趣淡薄的人深认当教员为清高单纯的生活且受人尊敬,也可免去趋炎附势卑恭献媚的俗技,但一到生活在赶时间,吃墨粉,领平价布,买配给米,甚至请愿发薪,索取欠津时,也会感到烦厌,所以不但要细思,并且要实地演习一下。又如想当一个政治家,以为治权可以支配一切,一道命令,可以左右全部人民的生命财产,但在民主时代,许多决定要经过几层决议,要公开讨论,公开民主的会场,有时彼此争执,公婆各持一理,也是不易处理的事,尤其到中国民主方式与美国民主方式发生争执时更难应付。所以想当政治家的人,可先试试自己有无兼收并从容应付而得公允的才能,学生可先自学生自治或研究讨论的演习做起。再如病人的伺候,人身的解剖,化学室的实验,矿山的粗污生活等等,都

可以充当决定深造学问选择上的准备工作。

然而离开内外条件的主观选择以外,更重要的,是就学问论学问的选择智识,即是选择学科的基本学识,更须先为准备,此点是深造学问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步。此点可分(A)科学的系统,及(B)各学科彼此的关系两项来分析。

(A)就科学系统言,哲学列为各种科学的前矛,学问是一元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抑为人文科学哲学的原则皆可适用。在哲学上可以求得科学方法论,本学院只有社会科学,可适用的即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正确的、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指示给学生以正确而捷近的路径。求深造的学生,往往因为方法论的错误,弄到迂回曲折,多费了很多时间与精神,才得到正确的结论,有时甚至得到错误的结论。这正如走路,走错了方向或路线,弄到多耽误时间,或终于到达不了目的地。哲学在各学科上,正如一本书的绪论,不可不先读,读了绪论可以明白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和所着重之点,就此线索去找读者在本书上所应获得的部份,读之可事半功倍。大学者大读书家博览群书,不一定每页每字都要读完,其简便方法也就是先读绪论后再选择本论的要点读之即达目的。所以哲学对于志愿做大学问家的人,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其他各学科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历史、心理等等,即可列为科学系统中的分论,但各科系之间皆有彼此相互的关系,如政治学系并无独特的学课,不属于经

济系的，即属于法律系的，又如法律系的课程不独限于条文，各种法律的来源是基本法的宪法，这又是政治系的范围。对于这些分论各人各有其不同的趣味和志向，可由各人的志趣去择定，但其欲获得分论部门的正确学问，必须先能应用正确的方法，所以和哲学皆有密切的关系，志愿深造的学生须能渗透哲学上的正确方法论于各种学科，即科学的各种分论上。此点因为科学系统的要点同时也为各学科，彼此关系的要点之一。

(B)各学科彼此的关系，若再就社会现象分析而言，则经济学又为各科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和变化，皆依存或决定于经济关系，所以各科系的学问，也要以经济学为基础。例如政治动向要决定于经济条件，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组织，或可称为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不能否认私有财产权。即法律言，其判定和运用，也要以经济为条件。例如中国法律规定女性可以捉奸，治夫罪，但因妻的实际经济力量，或更确言之，普遍的妇女经济力量不稳固，致其法律的行使仍不能健全。各地禁娼之令虽经三发五申，而娼妓之风仍长，但却无普遍的男娼出现，其原因在于经济关系上。再如教育第一的课题，若社会经济不获得合理解决，教育自无法普及或提高。其他如卫生设备以至个人卫生，更有待于经济条件。管子说过：“衣食足而后知礼荣，仓廩实而后知廉耻”，这一代的大政治家并没有轻视过经济的力量。香港一

岛上,读书知耻的列为上层,是有钱的商号,上海街及西环一带的贫民,既无力读书,也难顾到礼节体面。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的任何部门,要获得正确的认识 and 了解,必须以哲学上的正确科学方法论为出发点,而以正确的经济学为基础,运用正确的经济眼光,和正确的科学方法,去了解一切的社会现象,政治动向,法律问题,乃至教育卫生兴颓问题及其振作的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这里要保留一句话,就是经济固为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构造,但是上层构造也可以影响基层构造的经济。例如民生主义要能用以解决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民权主义先得到合理正确的运用,以民权的确立,改正人事上的错误,使政治上的运用有效,而经济上的施设才能合于民生主义的法则。民生主义的建设重点,在于公营事业能够有效而经济,其效果必须比民营为大,这正如大农经营之比小农经营,忠诚科学的管理占最重要地位,这又大半为政治问题而非纯经济问题。再举一例,现在上海等地的消费日渐美国化,吃的、穿的、住的,都用美国货。美布压倒中国纺纱厂,罐头牛肉压倒屠牛场,美国奶粉迫使上海乳牛无出路,美国活动房屋便宜而安适,一切民族工业遇到绝大的危机。这是在表面上好似是经济的问题,但绝对不能以纯经济的方法求得解决,要保持民族工业命脉振兴本国经济,必须运用关税保护政策或彼此互利的合作方法,始可做到。这是外交的问题,当然也是政治的问题。社

会的上层构造可以影响基层构造经济,正如经济学上生产关系本来左右或限制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到某程度时也可以突破生产关系的限制。不过,前者为原则,后者为变则,前者为常态,后者为变态,变态之发生,一般称为革命,是求学上值得特加注意的。

原载1946年11月10日《人民导报》

## 如何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

有一天宴会席上，国语推行委员会何副主委容，大谈其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的问题，称“反对者均为陈文彬先生镇压下去，而宋副处长为第一个反对者。”何先生刚作了结论，主人即宣告结束宴会，故令听者只相信何先生片面之词，信以为是绝妙的结论了。然而今日的问题并不在于应否恢复，而在于如何恢复，负责推行国语的何先生，似应多注意此点，不必斤斤于哀诉和表功。

凡略通台湾事情和语言关系的人，相信应该没有反对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的，何先生的主张虽曾遭《人民导报》来论之反对，但为何先生辩解、赞助的，何先生只知其为陈文彬先生而不知陈文彬先生之为导报之总主笔，所以何先生大声疾呼宋副处长为反对的第一人，未免太“神经”，正如传奇小说所载，扎好一个草人拟为某某对象而加以射杀，其用意如何虽不得而知，但未免太滑稽。

本人曾经口头反对过，在国语文的两边，一面注国音，一面注台湾字音，而主张索性单注国音。其理由是：（一）国



语文所注台湾字音并不是台湾话，如“不懂的地方”，台湾话应该是“不识的所在”（这还不正确，根本无法注出台湾话，正如广东话一样），（二）台湾话也不统一，有闽南话，有客话，也有高山话，即在闽南话当中还有漳泉、南北部之别，如“念书”南部为“读册”，北部为“读书”，且其“书”字音也各不同，（三）读书记字在专不在分，分则乱而无效，故与其叫学习的人同时记两种音，不如先记一种音，比较容易记得，我们不能以语言学者的态度叫学习的人开始就跟我们学语言的比较，（四）据熟悉国音的台胞言，用国音不能精确注台湾话，我是外行人，也姑认以为理由之一。

总之，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本人既未反对过，而重要点不在应否恢复的理论，而问题的重心，已进到如何恢复的具体办法了。负责推行国语的何先生，谅也痛感及此。在国语文旁边加注台湾话，是否可能、是否合理、能否办得通？乃至如何恢复台湾话的具体办法？我想热心的外省语言专家，还该多与本省懂得国音的人交换意见，所以我提议国语推行委员会应多采用本省人，或闽南人，或熟悉台湾话的国音家。

现在普及国语的问题，已经进入新阶段，即同时普及国文，吾人早经痛感到台胞的大多数将变成“文盲”的问题之严重，何先生也曾和本人痛切讨论过。这个问题和我在重庆所想象的相差太多，当时我以为台湾一光复，台胞都有汉文根底，一下子就可以恢复我们的文字，殊不知经过最近十几年日本政府严禁汉文与奖励日语的结果，台胞大

部分只知日语而不识汉文,甚至只知日语的意思,不知汉字的意思,有很多人看汉字不懂意思,听日语音始能了解汉字的意思,如日本人一样,如一部分日人看报纸、杂志然。现在禁止用日语日文(当然我是赞成的)。许多台胞竟然变成了文盲。这可真危险。

所以现在问题已进到如何普及国文,救济文盲的阶段了。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现在读国音热虽是很好的,但要避免死读音,不要再踏过去读日语音的覆辙。必须使学习的人,知其音同时也知其义,才好。此点我又要多余的提议推行国文的当局,多采用识汉字的台胞,或者先训练一批台胞教员,由一而十、而百、而千、而万。则问题就较易解决,目的也可达到。

问题已十分严重,我所深切希望的,是具体解决的办法,如何恢复台语的方言地位,如何推行国语文,请社会贤达专家参加讨论!

原载1946年12月2日《人民导报》

## 本报创刊周年纪念感言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开国纪念同时也是本报创刊周年的纪念日，中华民国宪法也正于今日公布，在这数重纪念庆祝当中，使人不免感想纷纭。

我们知道中华民国开国以至制宪，是经过无限无限痛苦艰难，才有今日的成就，正如本报自诞生以来，也日在惨惨经营之中，以至今日，所以本报与国家是同一样的遭遇与命运。

中华民国的开国有赖于先烈的奋斗牺牲，所以我们对于先烈应共致崇高的景仰，而本报在辛苦维持幸蒙社会人士之肘助，故今日亦应向各方深致谢意。

宪法公布后，国家已是要进入宪政时期，而人民已是国家的主人，今后宪政的成绩如何，须视人民的力量如何为断。本报于此弥感职责之重大，因为报纸是人民的喉舌，民意之伸张，有舆论于舆论力量之加强，本报顾名思义，则所以为人民服务者，亦即为国家尽一分之贡献。尤其是光复后的台湾，如何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以配合宪政的

开展,更是一件艰辛的工作。

台湾粗具的经济规模和人民的守法精神,是为宪政之基础,可是还须加紧沟通祖国文化积极推进政治训练,这样才能够发挥巨大的人民力量,从事国家建设。回顾一年来,本报的工作,我们不敢自诩成就,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为文化教育而努力,则可扪心无愧,今后更不容固步自封,当用力求进步。

时代的巨轮是在不断推进之中,中华民国由军阀专制进而为民主宪政,由被压迫民族而跻于五强之列,今后前途方兴未艾,本报由小型而扩版,由草创而长成,虽尚未达成熟期,总在不断生长之中,中国的建设有待于人民之奋斗,本报之将来亦有同人之努力,一年之计在于春,同人当益自勉再接再厉,为民前锋,所望各界,继续爱护,扶持指导批评,则幸甚。

原载1947年1月1日《人民导报》

## 如何推进台湾生产建设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省训团对全体学员精神讲话

今天韩教育长要兄弟到这里来同诸位讲几句话,我想就把《如何推进台湾生产建设》这个问题来讲一下。

台湾光复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中因为各单位都忙于接收工作,实际建设事业到现在才算开始。虽然自接收以来各种生产未曾停顿,但是产量还不够多。所以维持消费的物资,一部分还要靠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今后就需要加强自力更生的工作。大家来努力生产,不然物资就会发生恐慌。今后台湾最大的问题,还是“生产建设”扩大眼光来看,不但台湾是如此,就是全国各地也是同样情形。我们试看现在国内各大市场无论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到处都充满着美国的舶来品和罐头食物以及烟酒等物品。譬如就上海来讲,现在上海人民无论衣、食、住、行没有一件不靠外货,穿的方面如布匹、衣料,甚至裤带都是美国

的舶来品,吃的方面如面粉、牛肉,甚至鸡蛋、牛油,都是美国来的。美国的牛肉罐头,比中国的鲜牛肉还要便宜,一般人都爱吃美国的牛肉罐头。既可免起火麻烦,又不要用酱油,烹调非常利便。因此上海许多畜牧场大受影响,便纷纷停业了。住的方面现在流行一种流动房子,一辆卡车可以装载一间房子的材料,而且房子的设备又很完美,客厅、食堂、浴室、便所,样样都有,价钱又比普通房子便宜。这种房子,现在也在国内渐渐流行起来了。至于行的方面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大量的自制火车头汽车交通工具,差不多都由美国运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外货一天天充斥到国内各市场上来,结果我国无形中变为人家的销货场。据近来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抗战胜利后的一年来,入超数目非常惊人,这无异是我国每年要拿若干万万元给外国人一样,如此我们可以想像洋货倾销的情形和民族工业的严重危机了。

再说到我国输出物产,如茶叶,过去华茶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很有地位的,现在茶叶外销停滞,茶市受很大影响。其次如台湾的樟脑和蔗糖,因种种原因也无法和外货竞争,就是说香烟,美国烟,比中国烟品质好,而且价钱便宜,许多人都欢喜抽美国香烟,比如现在台湾专卖局本地制造香烟,大家都不爱抽,这么一来我国各种工厂因为不能和美国竞争,便纷纷倒闭,民族工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发达无计划的

生产,结果商品过剩,而中国又是个科学落后,产业不振的国家。所以美国货拼命的向我国市场来倾销,吸收我们的经济,这种危机我们如不加以挽救,全部民族工业,必至无法发展。国家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陈长官对这个问题非常注意。他想把台湾经济复兴起来,以减少外货的输入,所以定明年为“生产年”,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从事生产建设,比如工业方面,明年在台湾无论任何工厂都要使它开工,使生产增加。大部分的工业都由政府来合理的经营,希望能配合全国所需要的而从事生产,不需的暂时停止,需要的把它加强充实起来,使今后一切日用品能自给自足不靠外来的洋货。同时如果各工厂都开工了,许多人都有工做也可以减少社会因失业而起的恐慌。在农业方面使所有土地能发生效用,无论山地、森林地都使它尽量发挥生产力。过去台湾土地多集中在大地主手里,许多小农在大地主剥削之下,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影响农业生产很大。自明年起第一步要合理的分配土地,依照国父遗教“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去做。凡是有力耕种的,都配给他一块田去耕作,普通一家配与二甲到四甲耕地,但无能力耕地者,想经手他人坐享其成的便不配给土地,这是很合理的办法。但是我们要知道“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不是给与土地所有权而是给予土地使用权,目的在使大家有田耕、有饭吃。现在第一步工作是土地调查,这种工作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定明年一月起实行土地分配,我

想今后台湾农产一定可以增加,农产增加了,食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台湾原是产米之区,一年丰收可供三年三食,我们可以把剩余的米向外换取其他需要的物品,不必付现金。比如以台湾的米,运到国内华中、华北,去换取棉花,这是最好的办法。此外如台湾的水果和蔗糖,除本省消用外,还可以运往国内各地销售或去外国换取其他各种必需的机器来开发本省各种工业,如此我想今后本省工业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既然定明年为生产年,但为充实生产起见,最要紧的是人才问题,诸位虽不是技术人员但都与建设工作有关系,所谓建设问题,并不是单指工业或农业而言的,而是需要其他各部门互相配合的。譬如我们明年注重生产工作,我们就不能因为注重生产而把教育工作停顿下来。如果教育办不好,生产工作也就无法推进,因为生产人才就要靠学校培养出来,所以教育也不能离开生产。明年本省教育中心为加强职业教育,如农业职业学校及工业职业学校,都要重新调整与生产相配合,工业学校要有工场,给学生实地练习,农业学校要配给农场,给学生自己去耕种不像过去只注重书本上的理论,而不切实际,这是单指教育一项来说,其他如民政财政、交通……等等。都与生产相配合,然后才能促进生产的效率。总之希望大家要认清目前国家经济的危机,今后应如何努力去从事生产工作。把台湾建设起来,为全国各省的模范。那末本省前途才有发展的希望,本省能够建设起来。此后再以我们的力量



帮助整个国家的建设,诸位包括很多方面的人才,所负使命和责任非常重大,希望深切了解目前严重的危机,认清各自努力的方向群策群力,以底于成。

原载1947年1月9、10日《人民导报》

# 台湾心理建设问题

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对青年团干部训练班学员演讲

昨天接到韩教育长的通知,要我到这里来和各位谈一个问题,他给我的题目是《心理建设问题》。俗语说“一人主张,不如二人商量”,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大家共同来讨论,才有意义。因为世界上没有永久绝对的真理,只能说比较近于真理,所以对于一个问题,愈研究就会愈近于真理。诸位平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脑子里先要有疑问,有了疑问,然后才会去研究,否则“人云亦云”,盲目的附和,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现在是民主时代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做主人应当对国家的情形要有深刻的了解。过去专制时代,是君主的统治,“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是采用愚民政策,即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是要使人民知道政治的道理,同时来管理政治,然后,才能发生人民的伟大力量。

陈长官常常说“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务员既然是

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去做事。如果人民自己没有主意，公务员又不知道告诉他们如何去做？那末民主政治就不会实现了。所以做一个民主时代的国民，要认清时代的要求，知道做主人的道理才好，这是我要谈这个问题的原因。

讲到“心理建设”，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不同，我想应加上“台湾”两个字。因为在台湾谈心理建设，和内地各省又有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台湾过去五十年是在日人统治之下，在这五十年中，日人对台湾都是采用离间民族的毒辣政策，就是把台湾一切和祖国隔离开来，不但地方隔绝了，就是对人民思想、文化，和祖国都断绝了关系。所以在日人的教科书中中国地理只讲到很简单的一小部分，而且还加上许多曲解蓄意挑拨离间，比如对中国称“支那”，这就是含有蔑视的意思。又叫中国为“大陆”，“大陆”两字的意思，明明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乃是一个区域，无意中否认了中国有国家的存在。还有，日本人平日提到中国问题，总是说中国遍地土匪，人民多抽鸦片、赌钱等等不好听的话。固然中国地大人多，难免小部分有这种现象，但要知道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免有这种现象的。记得我在东京时，日本人常常问我：“中国有汽车吗？有自动车吗？”我回答他们说：“请你们到中国去玩玩好啦”，他们又说：“中国不是遍地皆土匪强盗吗？”这完全是日本政府平日对人民恶意宣传的结果。所以一般人民都受了欺骗，以致对中国印象不好。我在过去没有到过内地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后来到了北平，见到北平是个多么美丽的都城？！

从此才知道日人所讲的不是事实，而是欺骗我们的。因此，我们要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改变过来才好，这就要谈到心理建设的问题了。

然而心理建设应当怎样去做呢？照总理遗教所说“造成一个民族的原因，是血统和言语、风俗、习惯”。先要每个国民知道四万万七千万人原是为一家，要由家族扩充到宗族，再由宗族扩大到种族，由种族扩大到国族，然后结成一个国族的“大团体”。比如讲台胞血统，谁也知道不是日人的血统，强然台湾受过日人五十年的统治，相信我们血统是没有变化的，台胞的自尊心又很高，即使有台女与日人通婚，也是极少数。可以说台胞血统纯粹是中华民族的血统，回想过去两三百年前，台胞是从福建的漳泉、广东的潮汕各地迁到这地来的，任你日人如何宣传，如何改换台胞姓名，如何用种种方法想把台胞同化，结果终是没有效的。古人有一句话说“血浓于水”，这就是说不同性质的东西，没有办法化合起来。同样道理，一个种族的差异，也是没有办法变成一样的，我们试看过去日人配给物品，总是日本人民自己配给够了，然后才配给台胞，这就是很显明的差别了。所以总理说“血统是造成一个民族的原因”，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更要知道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历史，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历史的演变。中国近五十年来来的变化很多，虽然进步慢，但总是继续不断在进步中。比如就政治来讲，满清末叶政治腐败，造成辛亥革命，辛亥革

命后,又形成军阀割据,后来国民革命军起来打倒军阀,扫除国内革命障碍,由军政府时期进到训政时期,再由训政时期到宪政时期。现在宪法公布了,这样看来,中国政治是不断的进步,军阀时代比满清腐败政治是进步了,国民革命时期比军阀时代又进步了,现在是宪政时期相信将来更会进步的。这几十年来连续不断进步的历史,日本人多加以曲解,不给台湾同胞知道,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祖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五十年变演的历史),同时更要知道中国地理的国际情形。日人抹杀中国称中国为“大陆”,其实中国地广人多,资源丰富,与日本比较,是目前更多立国的条件的。中国是个资源丰富很有前途的国家,就以资源来讲,日本轻重工业的原料都很缺乏,土地也只有本洲九州,普遍称为四国三岛(北海道是后来开拓的),人口(朝鲜、台湾除外)也不过七千万人,所以日本这个国家,是先天不足资源缺乏的,只有向外掠夺一途,先前侵占我国东三省,以后又发动七·七事变,想侵吞整个中国,结果自食其果,遭受空前的惨败,这些情形下不但诸位要了解,同时要使台胞大家都能了解。我在内地二十五年走遍各地,各地方都住上一年半载,为的是做解放台胞的工作。在学生时代曾经组织“东方问题研究会”,联合东方被压迫民族如印度、安南、缅甸、马来亚,以及朝鲜、台湾等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那时就注意到台湾心理建设的问题,讨论将来对台湾心理建设该怎样做,在光复以前我常常对内地同胞说“台湾心理建设如果做不好,对一切的建设必有很大的影

响”。所以在重庆发动台湾光复宣传时，深得各界热烈称赞，《新民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为《欢迎台胞内向》，这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台湾心理建设的问题。我们很客观的讲，台胞内向原没问题，在光复初期，台胞那种热烈欢迎的情绪，是内地各处所没有的现象，这就是台胞内向心理的表现，以后这种情绪又渐渐冷淡下来了，今后应该如何加强这种内向的心理，就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了。

在光复初期，台胞欢迎祖国情绪很高涨，大家心理都以为光复后“台湾便会变成天堂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要知道民主时代是要人民自己来管理政治，绝没有天上派天使下来为人民制造乐园给人民来享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花园，要在花园里长出美丽的花树，必须要自己努力去耕种，下一番拔草、浇水、除虫的功夫。同样道理，台湾的建设也要一般人民自己来努力，这并不是看轻了政府的官吏，无论官吏或人民只要是为社会造福，为人民服务，都是一样的重要而可尊敬。为着整理花园、除虫拔草的工作，当然欢迎大家一齐来参加，倘使有人来攀折花木，或把害虫放入花园里来，把花树踏蹋了，那末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反对他。然而中心工作还是在我们自己努力，决不能存有丝毫依赖的心理。

再讲起头到日人时代与光复的不同，日人的教育是严厉的统制，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每一个国民都变成天皇的顺民，“接受政府的命令”自小学至中学以及大学，都是施行军国民的教育，不使学生了解世界进步的思想、学说，好的

书籍都在禁止之列。在日本许多前进的作家、思想家都被拘捕死在监牢里,好像日本小说家小林喜三郎,因为介绍新思想潮,便被日本政府拘捕入狱,施用毒刑而死了,还有河上肇(世界有名教授),亦因思想问题,被日本政府判处重刑,其他各种思想家和学者,被毒害的很多。对台湾更加厉害了,外面的事情一点不给台胞知道,几乎把台湾和外地隔绝起来,另外立一个世界。谈到教育,国民小学教育虽很普遍,中等学校就加限制,至专科学校的学生,多是日人。谈到工作,在台湾文化学术及政治工作,日人是不愿给,台胞多充任苦工和下级职员,因此台湾五十年来文化,造成畸形的发展,就是有少数台胞侥幸得受高等教育,也是偏重医科方面,学文法科的很少,其间有一两个读文法科的学生,毕业出来,也没有使用所学的机会,结果还是去做生意或经营小工学,在这种情形之下,台湾文化学术无疑的变成停滞的状态,完全是日本人统治的害处。

总之,在日本时代我们形式上是拘限于一个小岛上,精神上也无法得自由发展,今天大家都做了中华民国的国民,不但活动舞台扩大了,并且带上了国际性,我们的教育是国民主义的教育,大家如有才能,尽可充分发挥,学术上尽可自由研究,今后有才能的可尽量受高等教育,造成专门人才。我国有名的大学很多,如北京大学,在世界上很有声名,这原因就是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广大包容,提倡学术自由研究的风气,聘请世界各国学者教授来讲学,不论何种思想,不论什么党派,共产主义者也好、社会主义

社会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好，国家主义者也好，只要对学术界有贡献的，都聘来担任教授，如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美国教育家杜威、罗素，都是当时北大的名教授，因此北大造就了许多人才，现在北大的学生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对国家也有很大的贡献，这完全是广大包容的功效。回想台胞在日人五十年严厉压制之下，学术思想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光复了，从此大家可以自由发展才能，多多贡献于国家社会，这是和日本时代绝不相同的，希望大家要彻底的了解，还要灌注给一般台胞。

台湾最危险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悲观失望的心理，要知道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现，这事实毫无裨益的，比如栽花、植树，一旦花树发生了病虫害，就消极起来，而不想办法来改良，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加紧工作，积极地想办法，把害虫除去，把花园整理好，不让花园荒芜下去，因为花园是自己的，就要自己来耕耘，欢迎好人来耕耘，不论本家人外边人，如果自己不知努力、专靠别人耕种，想坐享其成、那就永远没有希望了。我们再来检讨过去日本时代有好的习惯，也有坏的现象，好的应当把它保留、坏的务思把他革除，好像过去的守法、守秩序、爱清洁，这都是很好的习惯。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看太平町街上的行人多么纷乱，一般人不知爱清洁，尤其在近来学生闹风潮日甚一日（学潮之起固然也有原因，但绝不能只管闹不想法子整顿），如此下去，好的没有保留，坏的逐渐增加。那末台湾前途是多么危险呢！再就语文来讲，做一个中国人，应当知道中国语文，



过去学好的日文,当然也要保留,因为文字是学术的钥匙,用在学术上,是可以的,然而大家平日讲话,偏偏不用国语或台语,爱用日语,这也是一种不适合时宜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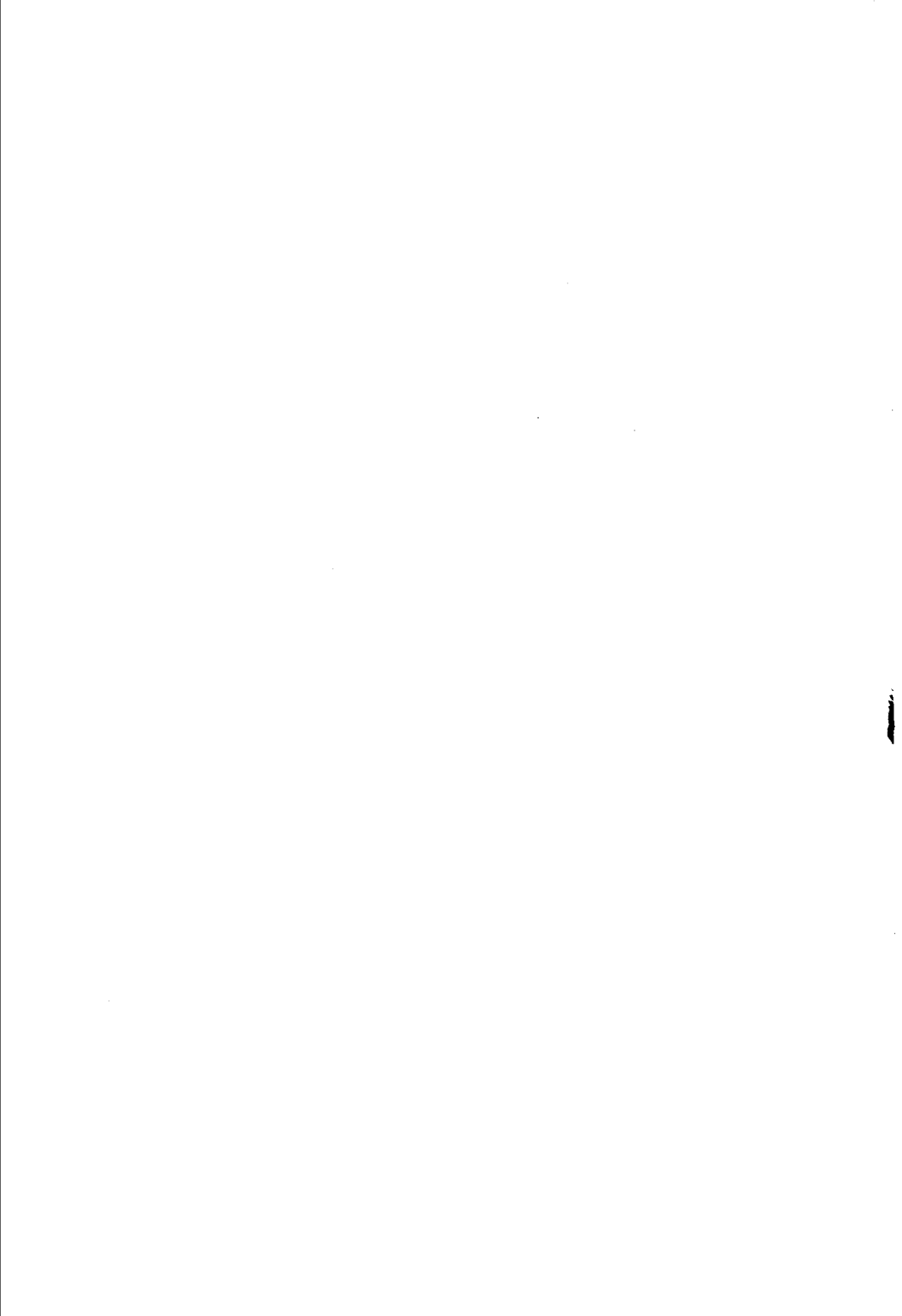
总之摆在目前的种种心理上的缺点很多,值得大家来检讨而加以改正,希望今后我们不要盲目欢喜,或过度悲哀,要尽量发挥自动、自觉、自治、自立的精神才好。台湾的青年团工作,在李友邦先生领导下做得很有成绩,李先生一向是苦干、实干的人,不悲观,不消极的,你们将来担任团务干部工作,很可效法他的精神,建设起来全台湾的正确心理,台湾建设才有希望,才有前途。

原载1947年2月23日《人民导报》

卷 二

第三辑 日本军事外交

---



# 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

## 一、帝国主义战争的俗论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断派对东北的军事暴行,震撼了全世界,它自九·一八占领沈阳以后,几乎循着直线状的发展,看看向南北猛进,占城掠地,杀戮奸淫,为所欲为。现在,居然借口于国联所授予的所谓“剿匪权”之行使,并认“中国军队即土匪”,而派遣数万重兵,于7日攻陷了中国方面在东北所保持的最后营垒的锦州,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横行,自时间上说,已将及4个月之久,自性质上说,它曾经蔑视了许多的强国和公约,简直是目无世界,实与欧战爆发前德帝的*might is right*(强权即正义)的气概无异。

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将近4个月的横行,的确震撼了全世界人类的耳鼓。在这长期间各国阴险的外交家,虽然对于这种无可原谅的事件的态度曾经几度奇突的变化,关于这次事件的处置曾经排演过不可捉摸的妙剧,但是各国人

民脑筋的紧张,依然没有一刻松弛过。各人脑筋里所烙印的深刻的观念,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了远东和平的局面”。人们因为过度的惊骇,脑筋受到奇突的震撼,遂感觉世界风云将因此骤然大作。他们直视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的暴行,为塞尔维亚暴民之杀奥国皇子及皇妃,直认1931的九·一八为1914的六·二八。在一般人看来,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迫至眉睫了,因为促它爆发的导火线已经燃着了。尤其自日本攻陷锦州,英美法协议采取什么进一步的一致行动,意国并且要求加入的消息传来以后,一般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立即爆发的自信,越发坚固。

然而我们对于这种论调,不敢完全置信。世界第二次大战,果能爆发在这时候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果能因为帝国主义伙伴的日本侵略了东三省,而骤然向之宣战吗?现在,世界的情状如何?世界一般的经济情状如何?由经济关系反映出来的世界政治现势如何?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本国的情状又是如何?这些事情对于本问题的决定,实是重要的因素。尤有更重要的先决因素,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与东三省的关系如何?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和日本伙伴,有无共同的敌人?其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在未深切考究过这些种种问题以前,遽即断定帝国主义间的火拼——帝国主义战争,有立刻爆发的可能性,我们实在不敢相信,不敢共鸣。这种论调未免过于通俗;我们对于这种俗论,只能以批判的态度来作一番的考究。

## 二、帝国主义战争论的根据

一般人皆谓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暴行，已经点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了，所以帝国主义战争之爆发已经迫至眉睫了。但是他们究何所据而云然？我们即欲以批判的态度来考究这个问题，我们应先追究他们立论的根据。

帝国主义战争论的根据，固然非常复杂而虚渺，但是归纳起来，约有下列三种论据：

- 1、道义上的论据；
- 2、法律上的论据；
- 3、利害关系上的论据。

### (一)道义上的论据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的当时，一部分帝国主义战争论者，或许以道学先生的眼光来观察，惊讶而相告说：不得了！时势变了！暴日竟敢无视“公理”和“人类的幸福”擅自侵占他国的领土。肆行无忌，这种无视“公理”，破坏“和平”的暴行，其他的列强必不能轻易放过，必不能听其肆意横行，必能根据“公理”、“正义”采取有效地制裁办法。尤其是对中国卖弄保护善意而倡缔华盛顿九国条约，又是暴日的世仇的美国，必定出来主持“公道”，加以更有效的制裁，他方面，具有充分决心的暴日，亦必不能轻易接受任何方面的善意(?)的劝告，而提出驳复。于是，帝国主义间

的直接冲突和抵触，乃臻于成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无疑。这完全是根据“道义”和“公理”以证明列强必将对日加以有效的制裁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论调，是属于第一种论据者。

然而这种论据靠得住吗？帝国主义者果能单为“公理”及“正义”的道义上的感动而轻易开启战端吗？帝国主义者能单为别个帝国主义伙伴之侵略他国而轻易花费金钱，牺牲人命，以对之开战吗？我们若就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就是侵占人国，榨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点，及帝国主义者的惯技就是“趁火打劫”，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幸灾乐祸”之点，略加考究，上述道义上的帝国主义战争论的根据，然不难加以一个“否”的断定。

否定上列论据的事实，在过去的事例中，也不难找出证据来。欧洲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趁火打劫”，向中国提出21条，1923年意大利侵略希腊的哥浦岛时，帝国主义集团的国际联盟，未曾加以半句的异议，这些事例都在证明：希望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单为道义上的原因而制裁日本，实是靠不住的，再进一步想，当此世界一般的经济恐慌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年头，那一个处在没落第三期的帝国主义，不想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寻觅一剂“续命汤”呢？！怀此抱负的其他帝国主义者，现在若对此次日本的侵略加以道义上的制裁，岂不是设法自制？“自绳自缚”吗？这样一来，岂不是断绝了他们将来同样侵略的泉源吗？怎样傻瓜的帝国主义者，也不会出于这种举动！同时，怎样戴着

道学先生的眼镜的论者，也应该不犯这种无稽的错觉！固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的期间，其他的帝国主义者曾经作过“微小”“脆弱”的不平鸣；但是这种不平鸣，并非出于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它的本身上是有极限的，只要日本的暴行不扩大至东北的范围之外，不侵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权益范围”，这种不平鸣就必始终残留为不平鸣而已。帝国主义战争从何而爆发？

## （二）法律上的论据

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种论据，就是法律上的论据。可以适用来制止日本在东北的暴行而致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的法律之中，最具体而且应该有效的，约有三种：其一为非战公约；其二为华盛顿九国条约；其三为国际联盟的约章。当暴日占领沈阳的当时，世界一部分人士，尤其是公法学者及国际条约大家，莫不皆以日本在东北的行动为实质的战争，侵占中国的领土，破坏了国联的盟约，而断定这些公约的关系国必将共起而采用有效的制裁办法，假若暴日不听，终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他们的根据就是上引三种公约的规定。盖因非战公约的意旨，在于绝对禁止任何种类的国际战争，即使国与国之间发生了纠纷也应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之，绝对不能开启战端；各条约国倘不遵守此旨，则其他条约国皆认其为公敌而加以有效的制裁。国际联盟的约章也有类似而更具体的规定。其第十条规定：

“联盟会员国应担任尊重并保持各联盟会员



国领土的完整和现存政治之独立，以防御外国之侵犯：如遇此种侵犯或此种侵犯的任何威胁及危险时，理事会应筹划履行此种义务的适当办法。”

第十六条又规定：

“联盟国中倘有任何一国，漠视本约章第十二、十三、十五各条的规定而径向他一联盟国开战，则该国当被认为即与其他联盟国全体挑衅，其他联盟国全体应即截断与该国之商务及财政的关系；……凡遇此事件，理事会应尽其职，陈述意见，通告有关系之各政府，使联盟国得以派遣任何有效的陆海军，以保护联盟约章……”又华盛顿九国条约的规定，对于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保护，犹其具体而周至。其第一条规定：“除中国而外各缔约国协定原则如下：1、当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当给与中国以最完全及无障碍的机会，俾中国得以自行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巩固的政府。”

根据上述各条文的规定，其他列强对于暴日此次的行动，实有充分理由可加以有效的制裁。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实质上是向中国开战，违犯了非战公约的规定。所以非战公约的缔约国可以视之为公敌，共同向它作战。它的

行动破坏了联盟约章所规定的“各联盟会员国领土的完整和现存政治之独立”，而且是“径向他一联盟国开战”，所以主要联盟会员国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应视日本为“即与其他联盟国全体挑衅”，“联盟国得以派遣任何有效的陆海军，以保护联盟约章……”这样一来，远东的局势立可风波大作，风云骤变，帝国主义战争真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再自华盛顿九国条约的规定言，日本也违反了该约第一条规定，破坏了“中国主权之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并且妨碍中国的“自行发展”的机会及扰乱中国“巩固的政府”，所以其他八国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制止日本的暴行，不听则以武力对付之。于是远东的风云也有立即掀起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然而事实并不如是之单纯。条文的规定自规定，有效的制裁自制裁。实际上，各种条约的规定，徒成了具文。并且，暴日可以捏造事实，利用条文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日本是个强国，又在不害及其他强国的权益的范围内行动，则无论怎样闹得天翻地覆，任何种的法律都不能奈何它！事实上，日本岂非颠倒事实，混淆是非了吗？它竟悍然否定侵略而代以“自卫”，否认破坏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而以“实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饵其他帝国主义者。其他列强会有什么办法奈何它？！

老实不客气地说，非战公约只是帝国主义者为防止他们自身的帝国主义战争，以期暂时的安定而缔约的，所以强者对弱者的战争当然不受该公约的拘束。国际联盟是帝

国主义者共同压迫及榨取弱小民族或被压迫民族的总机关，任何帝国主义者只要不侵害其他帝国主义的权益，则怎样任意蹂躏被压迫者，总不至受到若何制裁。又华盛顿九国条约之为中国保全领土及主权，用意并非真正有爱于中国，无非是防止在华权益之独占而欲由列强均沾的勾当而已，同条约第一条在规定不妨碍中国主权独立及自由发展之后，即附以(3)当协力维持并确立各国人民在中国全境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及门户开放。(4)各协约国当自行抑制，不得利用中国情势以谋取特殊权利。第四条尤有具体的规定：“各协约国协定，不得于中国境内的特定部分，设立任何势力范围，或规定享受彼此独有的机会。”于此，日本只要暂时能抑住名义上的统治权而只攫取实质的经济权，且在互相谅解之下，默认其他强国在中国别部分享受同种特殊权利，再能允许他国在东北的多少利益，则其横行当不至受到任何阻碍。帝国主义战争不知道从何方面发生?!

据以上的剖述，帝国主义战争之不能发生于法律的拘束，尤其不能发生于东北事件震撼中的现在，可以无庸我们更详尽的赘述了。

### (三) 利害关系上的论据

帝国主义战争立即爆发的第三种论据，就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利害冲突。欧美各国拜上次欧洲大战之赐，经济上陷于萎靡的状态，一般人民的购买力大为

减退，欧战前在欧洲大肆活跃的商业资本和工业熟品，竟碰到“此路不通”的高墙。自经1930年世界一般的大恐慌以来，这种高墙尤其高筑起来。于是，欧美的商业资本及工业品，就如水之下般，极自然地转向东方流注，尤其企望以中国市场为尾闾。这种流注的情势，近年来且渐由长江一带，直向东北澎湃，各国商品在东北的活跃，及各国大商人在东北的勾心斗角，已有非常显明的征象。这种征象及其愈益进展的情势，就是促使自忖“质劣难与角逐”的日本毅然出以武断行动的主因之一（参阅本专号《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换言之，日本欲借武力阻止其他列强的资本及商品在东北优势的发展。这样一来，日本的确可以阻止东北交通委员会对美英直接的购买，夺取该二国在东北的大部分销路。这自表面上看来，实在是日本与英美等国直接的利害冲突。再者，日本果真侵占了东三省，则其在太平洋上的势力可以加倍，而如顾维钧所言“太平洋的情势失去均衡”，在太平洋上与日本鼎足而立的英美，当然不寒而栗。这是间接的利害冲突。

由于这些直接间接的利害冲突，一般人遂下断定说：英美法等国必不能坐视日本之膨大，更不容忍日本侵蚀其优势的发展，他们必定起而阻止日本在东北的横行，以保持他们在该地方的利益，相持不下，最后只有一战决个胜负，所以帝国主义战争将因此次的东北事件而爆发无疑。

但是这种论断仍未可尽信。日本此次的暴行，诚然和英美法等国发生利害关系的冲突，但是此种冲突的性质非

常的复杂,不能只以表面的情状来决定内部的实质。英美法各国在东北所要求的,是些什么?日本与这些国家在东北利害冲突的性质如何?这种冲突果如一般人所臆想的那样严重吗?或者,这种冲突有无相抵销的可能?即使这种冲突非常严重,且无可抵销的可能,我们还须问问英美法各国本部能容他们因为在东北和日本利害冲突的单纯理由而即开战?这些种问题都是我们决定帝国主义战争目下有无可能性者所应加考究的。这些问题实在不是三言两语所可道尽的。至少,也应分作(一)列强在东北的利害关系及(二)列强本国现在的情势两方面来考究。详细的剖述俟诸下节的检讨。

然而,我们先提前下个断言: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害冲突,目下尚不足以构成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各国的现势,尚不容他们单为东北事件而骤启战端。

### 三、列强在东北的利害关系

且先自英美法德等国在东北利害的情势谈起。

究竟英美法德现在在东北利害的性质如何?我们不能不先加以研究。数百年来即以“日不落国”的豪语夸耀于世界的英国,没有耗费心力再来扩充领土的野心,是可以断言的。尤其是在他那“强国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的今日,他更无心于领土的扩充。各自治领及印度等地的要求独立,及因此发生的叛乱,对于老大的英国,的确已经是一种

烦闷。现在英国所要求的，只是商业资本和工业成品的销路。他所要求于东北者，当然也不过如此。

美国如何？美国自身拥有广大的资源供给地和众多的生产生力军。他本来就是一个大量生产的国家。在欧战前后，他的商品大部分输向欧洲，欧洲大陆俨然是他的好主顾。不幸欧洲各国受到欧战的影响，购买力大为减退，1930年恐慌后，这种减退尤其显著。于是，美国不能不转移目光，向东方来寻觅商品的销纳场。美国现在所需要的，只是这种商品的销纳场。而年来社会上比较安定的东北，就自然而然地中选了。质言之，美国现在所要求于东北者，也不过是商业资本和工业成品的销路。美国之疾呼“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更可以具体证明。

他如法意在太平洋上既无多大的势力，事实上且难兼顾，他们不敢问津于远东，并无侵占领土的野心，可无庸言。经过欧战后百孔千疮本身危在旦夕的德国，不敢对于东北的领土“作非非想”，也是极自然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有法德二国希冀在东北沾染些少贸易上的利益吧了。

总括一句话说，英美法德各国在东北的利害关系，不是主权，也不是领土，只是贸易上的利益而已。

我们既然究明英美法德各国在东北利害关系的性质，那末，且来检讨这种利害和日本在同地利害的性质之异同，以断定二者是否冲突，或冲突的程度如何？

英美法德各国所要求于东北的，虽只限于贸易上的利益，而日本则大异其趣。日本不但希冀东北可充其资本和商

品的市场，并且希望由东北获得他本国所缺乏的一切资源——生产原料。此外，日本的食料问题也希望在东北求得解决；日本国内及朝鲜拥挤的人口，也希望在东北觅得出口……英美法德各国在东北的利害，除了贸易和投资一点而外，皆未与日本的利害关系相冲突。

我们若再进一步，来就日本和英美法等国在东北的贸易内容加以检讨，这个唯一的冲突，尚且可以减低至非常微小的程度。

且先自量的方面，检点各国东北贸易的重要程度。且将本题讨论上有关的各国，近年在东北贸易的情况，列表于下：

全满输入贸易的国别表(单位千海关两)

年份 顺位	1913年	1918年	1923年	1928年
第一位	日 29,775	日 69,452	日 67,869	日 109,165
第二位	俄 21,346	美 11,055	美 16,598	俄 28,192
第三位	韩 3,432	韩 7,102	韩 9,528	美 19,627
第四位	美 2,503	俄 5,493	俄 9,423	韩 13,631
第五位	香港2,080	香港4,640	香港5,496	香港10,948
第六位	英2,081	坎1,107	英2,952	德8,816
第七位	德1,905	英755	德2,498	英6,647
第八位	印558	印254	印1,399	
第九位		澳洲101		

本表编自《满蒙事情十六讲》184至185页。

自本问题的观点上应注意东北的输入贸易，故只列输入表。

根系上表,可知英美德在东北的贸易地位不及日本多多。法国的奢侈品尤其绝迹于东北。1913年,在英美法德四国之间占最高位的美国,自全体贸易国言,不过占第四位,其输出贸易量不及第一位的日本十分之一,且在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之下;英本国占第六位,德占第七位。日本若与朝鲜合算,他的输出贸易量,当数十倍于英美德本国及殖民地。1918年,美国虽升至第二位,但其数额尚不及日本六分之一;1923年,没有多大的变化;1928年,一方面为俄国驾而上之,他方面日本急激增加,美国的贸易量更加相形见劣了。其他各国更无甚可说的重要地位和进展。

现在,自质的方面来考察英美法等国输向东北的商品。据《满蒙事情十六讲》187页及188页南满输入重要商品国别表(1928年)所列,英美法输向东北的重要制品,是机器类,车辆类、石油、烟草类及棉织物毛织物。再据东亚经济调查局所编《列强在中国及东三省的市场争夺战和外商在华的活动》一文(读文载《新北方》第2卷第4期),我们可以得一更具体的解释。该文关于美国在东北的贸易载:“东北交通委员会对美直通短波无线电台的建设计划中,也曾决定购买美国的无线电器,更有对沈阳的电车,电灯的扩张及水道的设备计划之投资运动……”“……慎昌洋行……专司出卖电气机器及其他机器类和药品染料等。……美孚洋行大抵专卖石油,洋腊及其他油类;……公懋洋行卖机器、金器、自动车(汽车)及其附属品;开洛及寿宁各公司卖金器,自动车附属品及机器建筑材料等;马克敦工程



建筑公司,包办各种工事及电气机器类;泰昌洋行也为贩卖机器建筑材料而奔走……”总括言之,美国在东北活动的商品,是汽车、机器、建筑材料等生产工具及石油。又关于英国在东北的商品活动,有如下一段:“……在此英商中,最主要者有怡和有限公司(各种机器、电气材料、机关车)与兵工厂,交通委员会,沈海及北宁铁路等都有连络;安利洋行,仁记洋行(均为金属器具及一般输出入品商)与东北大学及兵工厂有关系;老晋隆洋行(金属品,保险箱,保险杂货)与交通委员会及兵工厂也有关系……”质言之,英国在东北推销并希望推销的货色,也几乎同样限于机器,机关车,电气材料及金属货物等生产工具。即如目下绝对不能干涉日本行动的德国,它在东北活动的商品,也都约略相仿。此外,法国在东北的贸易活动,实无可言者,最主要的商品是铁钢及烟草,但其地位也极低下,前者占第四位,后者占第五位。

这样看来,英美法德各国的东北贸易,除了几种不甚关重要的商品而外,大体上均与日本没有很大的抵触。他们最主要的商品应推机器,建筑材料,汽车,车头等生产工具。这些生产工具在东北的销路,不但不能因为日本之占领而受到恶影响,倒反可以增加推销的数量。因为日本在东北的主权得到保障之后,即必积极从经济建设方面下手。这种经济建设,不用说,必定需要大量的生产工具,如机器,建筑材料,汽车,车头,金属货品之类。而这些货品,日本本国必不能充分供给,势须仰给于英美等国。其时,英

美等国向东北输出的贸易，必更加进展。

再自英美各国看，他们的商品卖与中国方面，和卖与日本方面，都是一样；只要在量的方面不减少，那有什么计较的必要，能够增多，岂不是更欢迎的事情吗？本来，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就是美国的一个好主顾，直至1926年截止，其买了美国12,500万元日金的货（据满铁纽约公所1929年发表的数字）。1925至1930年间，又购买了美国500万元美金的货。日人还计划在关东州设立大钢铁厂，预定向美国购买十亿元日金的机器。近年来，英国卖给满铁的货量，也不在少，且有年年增加的趋势。英美各国不会绝对反对日本侵占东北，是很显明的事情。

目下，英美各国现在所要求于东北者，不是主权，也不是领土，只是商业资本和工业制品的销路。只要这种销路得到保障，实质统治权握于谁手，他们是不过问的。但要这种销路得到保障，或能扩大，第一要件就是东北社会的安宁，政治之上轨道。凡能完成这个要件的办法，不管是直隶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或是什么新政权，甚至是复辟政府，英美大抵无不欢迎。

希望英美法等国为着东北的利害关系来对日本采取有效的制裁，因而引起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 四、列强本身的现势

英美法等国，不但不能因为他们在东北的利害关系而

与日本开战,即使他们本国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也使这种战争不可能;至少,他们也要因为顾虑目前的安全,而不愿意在破坏之后加以破坏,危机之上重以危机。且在本节检讨各强本国的现势。此项,本专号述之君所作《东北事件与国际政治》文中,已言之颇详,为避免重复起见,只用他方面的材料分别略述于下。

### (一)德国全身不遂

德国是列强的共同债务国及赔款国,英美法各强的财政能否富裕,因而具备战斗力,完全视德国能否支付巨额赔款及债务以为断。所以要究明各国的现势,以决定帝国主义战争目下有无可能性,应先检讨德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一般人皆赞德国能以战败国努力奋斗,终使危机百出的德国经济臻于安定,狂呼“合理化万岁!”“德意志国民性万岁!”但这个一般人认为所谓“复兴”的初曙,事实上却是“危机潜伏”的开端。“复兴壮观”的背后,岂不是巨大外债的堆积吗?复兴的外观进一步,岂不是债台增筑一层吗?赔款和债务,皆以借款支付。用债务支付债务。合理化的资金,也大部分由外国借款构成。一国经济若建筑于外国信用的基础上,无论外观怎样美丽而雄壮,结果也不过是沙漠上的大厦,其危机的程度实不堪言!

这种险象在道威斯案及杨格案的改订即已表露出来。再经1930年9月总选举后,因受政治不安的影响而促外国

争相收回债权,该种危机乃益深化。虽经英国极力救济,结果仍难免于成为中欧金融恐慌国家之一。外国短期信用的提取风卷云涌,终使德国一切支支付完全陷于不可能。迫得大总统兴登堡元帅不得不发出SOS的非常信号,美国胡佛大总统不得不提出战债赔款延付案。德国目下的难关,不但大地主及重工业者们所希望的“膨胀政策”不能打通,即德国国家银行总裁鲁铁尔及白鲁宁总揆所坚持的“紧缩政策”也难有补于事。简直一句话,德国目下的经济已陷入“全身不遂”的状态。

复次,且来检点德国这种经济危机影响各国若何。德国现在所负外债,长短期债务合计已达2,440亿之巨:

(贝斯尔十日亚细亚社电) 德国所负外债总额,已经核算为2,440亿马克,一切文件已送交世界银行顾问委员会附属技术委员会,加以审查。上述数额包括长期与短期债务在内,其利息以长期债务而言,在明年即须12,000万马克之巨。至于短期各债,其利息亦在82,500万马克之谱。而德国更在上数之外,更须交付道威士借款利息6,300万马克并杨格借款利息2,100万马克。依照德比世界大战时订立之条约,按此债券发行乃为救济德国货币跌价之用,以及其他美国等需求,又须6,600万马克。如此德国去年须付外债之数,将达21亿马克,而清偿短期借款与商务赔款,尚不在内。至于

德国于明年交付短期债务之数多少，当视将来各国委员柏林会议结果为定(1931年12月12日《北平晨报》)。

长期外债不说，即短期外债1931年7月中旬截止，已达44亿马克(据《改造》杂志本年新年号101页各项数目)。只此数目的短期外债，即无能力支付。各债权国终不得不听从巴捷尔委员会的劝告，缔结9月1日以后6个月间(2月底止)短期债权提取的停止协定。外债母金的清还不用说，恐连上列利息也无支付的能力。而这种支付不可能，因为缔结种种延付协定的结果，影响英美法各国财政甚巨。只就上列短期外债言，44亿之中，美占37.1%(16亿余马克)，英占23.9%(155,000余万马克)，法占6.8%，(约3亿马克)。又，杨格赔款支付金之中，法国的纯得额(1931至1932年度)在42,000万马克之谱：英国的分额也为5,300万马克。美国的影响更大。于上述16亿余马克的短期外债之外，尚有100,300万马克的战债。

德国经济不能健全的复兴起来，英美法各国的财政还有办法，使得运转裕如吗？莫怪白鲁宁在洛桑会议开会前大发表其高见：“……德国立脚点，以为世界经济生命当须复兴，则不论在现在或将来，德国均不能赔款……”(载1月11日《北平晨报》)。

## (二)英国的危机深化

年龄最老的英国,其经济危机,也随暮景之增长而愈呈颓状。现在,撇开一般经济的危机不说(因为本专号别篇论文剖述颇详),单就金融恐慌略为说说。

英国是“食利”的国家——利用他国的资金以营贷金业而从中获利。所以,金融的恐慌是英国经济的致命伤。英国之为中欧各国的金融恐慌讲求救济策,为奥地利设第一防线,为德国设第二防线,也是当然的事理。便是结果,可惜得很,皆毫无成效,第一防线,第二防线,皆先后崩溃,落得素以真正金本位国夸耀于世界的本身,也不得已于本年9月21日停止金本位。

欧战后,伦敦的繁荣可以说大部依靠于外国的资金。据伦敦银行家的报告,外国银行在伦敦的存款额及使用于伦敦的资金总额,较比伦敦对外国银行之贷款及所承受者合算,在二倍以上。据1931年3月底的计算,伦敦金融市场的外国资金总额,达4亿镑以上。现在英国就是使用着这种差额,繁荣她的国内事业,并向外放债,投资。

然而,利用外国资金以作投机事业,是非常危险的勾当。因为由外国吸引的资本,大抵是短期信用,英国自己所投资的,却是长期信用。在这当中,万一风云骤变,金融界发生了窒碍,自身难免陷于不能应付的地步。果然,这种风云先翻卷于中欧,继而波及于全世界。事势终把英国救济中欧各国金融恐慌的努力,溶化在大西洋中;而英伦终不

得不发生下列几种事实：

- 1、因为德国经济的危机而英国投在德国的资本固定化；
- 2、受德国经济危机影响的其他欧洲各国，为预防本身的金融恐慌，而继续由伦敦市场收回资金；
- 3、且因赤字问题引起的信用低减，而资金外流；
- 4、法国为救济德国而提取巨额资金。

其结果，终使英国不能不仰美法的鼻息，告贷巨额借款，5,000万镑来弥缝。他方面，凝结在德国的短期债权，105,000余万马克，及其他的长期债权、赔款均无收回希望。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财政自然窘困至万分。再加以一般经济的恐慌和失业群众，殖民地群众的威胁，英国要积极干涉关系不十分密切的东北事件，目下似乎不可能，恐也不愿意多事吧！

### (三)法国的繁荣动摇

一般的布尔乔亚经济学者，皆甚羡慕法国的剩余资金，并谓法国只要能维持他的巨额现金，无论世界经济怎样恐慌，本身的繁荣依然可以继续。但是事实果如是吗？且来检讨一下。

诚然,法国的经济至1930年四五月间始发其端,较之英美德等国之早即开始于1929年底,约略迟后半年以上,即入恐慌期以后的恐慌程度,也未若英美德各国的尖锐,1930年度生产指数的低落比率,德为23.5%,美为20.5%,英为15.5%,而法国则仅为7%。但是,这种勉强维持的景色,自入31年度以来,即以急速的速率日益恶化。生产总指数,由1月的133,低至8月的121。失业者8月截止即已近百万;短缩劳工数达就业劳工总数之33%(1月顷只14%)。股票价格也有很显著的低落,由1月的365低至8月的304。此外,普通物价的运动的情状更可以证明恐慌的深化。在30年度未大跌落的普通物价,入31年度以来也有巨大的跌落趋势。在31年度的8个月间,批发物价指数,低落10%,零卖物价指数低落8%。

法国在1930年以前能在英美德等国恐慌的漩涡中维持原来情状,大抵得力于下列三种原因:

第一,对于各种产业的保护政策,如农产物关税的提高,交附股票补助金,交附输出贸易奖励金,尤其曲尽农业保护的手段;

第二,1928年后法国经济的转佳,其余音延长至于1930年末顷;

第三,利用得自德国的巨额赔款为过剩资本,扩大国内的市场。

但这三种原因也不是永久可靠的。固然,法国农业人口占半数以上,所以法国政府采用农业保护政策,例如主



要的农产关税之提高,抵制了外国农业恐慌的袭来而得到暂时的安定,但是结果适足以引起“关税斗争”,于本国的商品输出仍归于不利。又第二项之好景气也无再续的希望。第三次德国赔款也已前后不继了;要如1927、1928、1929,三年间合计获得340亿法郎的超过收入,恐怕没有希望。良善的因素消灭后,坏的现象就跟着而来。防御世界恐慌的堡垒,终被世界恐慌的洪水冲决了。金融恐慌虽不至大作而止,31年度前半年的生产指数之低减,却近于10%。

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国所烦闷的,是商品和过剩资本的出路。法国目下仍欲以此过剩的资本来维持他的繁荣,所以目下所希冀的世界情势,就是“和平”及“投资的保障”。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不是他所愿意加入的。尤其是不愿加入与他关系不切且足以阻碍他开拓在华新市场的帝国主义战争。他宁可默认日本之侵占东省而自己获得他在中国西南部开辟市场的机会,以容纳最近由英美德收还的巨额过剩资金——本年9月初至10月20日,美国流出了7亿美金,其大部分即流入于法国。在日本侵占东北的声中,法国竟一方面派兵侵犯我国西南部,他方面和日本秘密谅解,也势所必然的。下列的消息可以证明:

(广州特约通信)最近广州国府据桂省李宗仁等报告,略云:宗仁前据龙州对泛督办韦云淞迭电报告,法国政府在安南准备军事情形,曾经随时呈报在案,兹计两月以来,越府行为,影响我西南边防,

及侵我主权事实列下：(1)前月元寒两日，法飞机两架入我领空，并到龙州侦察形势，经我抗议后，越府机师道歉了事。(2)藩案发生后，河内报论调袒日，谓日保障东方文化及条约利益，足为欧洲借镜。(3)前月江日电，法在谅山筑飞机场已完成，各边界均有增兵。(4)俭日电，越府除另募新兵外，即二十余年前之退伍兵，亦召集在河内训练，以五个月为期，准备分防各地。(5)将越境内之马路，延长至我边地平而水口各关，并拓大其路幅，又在谅山增建一师人之兵房。(6)越南本年禁止粮食出口，并废止法光洋，冀图吸收现金。(7)上月号日，法兵七八十名，无故越境攻掠我高板村农民，肆意掠略，前月又入我商店，此为向我挑衅最重之事件，已电陈部长交涉抗议，闻云南方面，亦有法兵入境骚扰。(8)昨齐辰电，法运大炮步枪弹药及军服20,000套到谅山，闻系发给民兵(按即退伍兵)。

(巴黎17日路透社电)美国某报载称法日间成立一协定，根据是项协定，日本应担保法国占领中国之一省。此间官方对此说，极为惊异，并加以正式否认，谓其毫无根据。

#### (四)世界恐慌与美国

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之由于矛盾的发展而互相争夺，而爆发了欧洲大战。欧洲大战的结果愈使帝国

主义的危机成熟。大战后的工业恐慌发其端,农业恐慌随其后,独占最高形态的金融,也终难免于恐慌,紊乱。整个欧洲各方面的经济恐慌,据以上三段所剖述,大约可得个梗概的了解,总括一句话,欧洲经济的恐慌已经无微不至,无孔不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拥有28亿美金元的金准备,全世界157亿美金元的长期外国投资,17亿美金元的短期外国投资,及77亿美金元的战债的美国,对于欧洲的经济恐慌,因而全世界的恐慌,曾经一度保持“隔岸观火”的态度。他以为欧洲的烟火绝对不会越过大西洋而烧及美洲。

但是世界经济已联成一片的现在,经济恐慌的传染性,却比空气传染的流行性感冒还要利害。美国的经济恐慌自入1931年以来,乃呈现显著征象。工业生产的缩小,农产物价的暴跌,失业劳工群众的增多及威胁,企业公司的利润的低落,大小银行的继续停业关闭,等等,迫得美国不敢再以“富强”夸耀于世界了。兹略述于下:

据美国联邦准备局的调查,工业生产指数由1930年9月的91(以1923~1925年为100基数),低至1931年9月的76,若和1929年4月之129相较,约为40%的低落。其中,美国主要工业的钢铁及汽车的生产指数,低落尤巨:钢铁自1930年9月之85,低至1931年8月的51,9月又低至45,与最高水平之155相较减低71%;汽车生产也自1930年9月之62,低至1931年8月之52,9月更低至39,与最高指数之153相较,激减74%。

美国农村的恐慌尤其厉害,农产物价的暴跌远甚于工

业制品。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的差额,随恐慌之进展而愈增大。即被视为美国农业危机的1921年,农村收受价格对于支付价格的比率尚为75%,至1931年8月则减至59%,9月又减至56%。

在这种极度不景况之下,美国各种企业的利润,自然激减。据本年新年号《改造》,美国二十重要公司的纯利,1931年9个月间,与1930年较减少55.8%,与1929年较减少74.7%。美国钢铁的纯利,由1929年的14,760万美金元,减至1930年之9,200万美金元。1931年更减至1,730万美金元。股票的价格也随之而低落。

产业一般的恐慌必定招来金融的恐慌。即在1921年度的恐慌期,停业银行数也不过501家,存款总额19,600万美金元;而1930年前9个月间即有675家,存款总额28,700万美金元,1931年的前9个月间的情势尤其可惊,停业数目激增至1,234家,存款总额达92,900万美金元。银行股票价格之暴落,也是自然的归宿,1930年1月纽约20大银行股票的价格指数(以1926年为100基数),为2114,同年12月低至1238。1931年10月更低至787。世界产业恐慌,金融恐慌的狂风终把暴富的美国,卷入欧洲金融恐慌的漩涡中,终使胡佛不得不提议耸人欢听的Moratorium。

只要世界不安定,各国购买力低减,德国经济破产,东方的市场紊乱,富甲世界的美国也不能独自繁荣。所以,美国宁愿吃点儿亏,倡议德战债延付,以维持他的欧洲市场的命脉。同样,他也在设法促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安

宁,好让他的大量生产获得出路。美国在他的经济恐慌现状之下,不但不能战,且为他的利害打算,他亦不愿意战。希望美国现在积极干涉日本,因而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直等于梦呓。日美虽然是世仇,但是利害具有“疏通恩怨”的魔力。在日本侵占东北的期间,被称为最强硬(?)的美国的态度的态度,不是已经明白告诉我们了吗?美国之所谓强硬的态度,岂不是乍硬乍软,并且声明“绝对不以武力干涉日本”吗?

## 五、帝国主义战争不可能

帝国主义战争在日下不可能的原因,除了三四两节所述帝国主义者在东北的利害关系及帝国主义者本身的经济恐慌二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者所共同“希望”的继续繁荣。由于这个希望,产生了下列几种“必要”:

- 1、避免帝国主义者自残的必要;
- 2、抑制本国社会革命爆发的必要;
- 3、反苏俄战线齐一的必要;
- 4、共同榨取殖民地民众的必要。

帝国主义者之间虽因他们自身的矛盾的尖锐化,使们自家人有时处在对立的情势之下,但是他们也有他们共通的敌人,即时时在威胁他们的存在的势力。并且,这种势力的消长,和他们的强弱,适成“反比例”。他们的强度的总

和低減多少，威胁他们的势力就增加多少。具体言之，帝国主义者少一个，则他们的势力弱一个的成分。因此，帝国主义者之间极力避免自家相互的残杀。自经验了欧战以后，这种避免就由无意识的，变成了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战争已成有意识的不可能了。

但是，他们本身的矛盾依然不断地，把他们向坟墓里推进。赢利的企业已渐不可靠；独占适足增长经济的恐慌；无产者及无业者群众的数量与年俱增。旧有的生产关系已成了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新社会的雏形孕育、生长在旧社会中。这种雏形正在准备破壳而出。这种准备就是一般之所谓社会革命的酝酿。但是新社会形成的反面，就是旧社会的消灭；社会革命的完成，也就是帝国主义寿命的终了。而社会革命又常借帝国主义战争以爆发；欧洲大战中曾经改变了两个强国的国体和社会制度。因此，帝国主义的主人常怀戒心，极力避免足以引导社会革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上述二种努力只是消极的罢了。帝国主义要维持其繁荣继续，尚须在积极方面用工夫。

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之成功，是帝国主义存立的一种大威胁。再加以标榜世界革命的潜势力，常在帝国主义国中浸淫滋蔓。二者又有密契的地方，苏俄雄厚势力之进展和确立，自然是帝国主义者的腹疾。帝国主义者自然觉得有齐一战线，向苏俄进攻的必要。他们也都明白：他们之间，或世界的其他部分，多为苏俄赤化一部分则丧失一部分的

根据,而增加一部分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就须互相原谅,齐一战线,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能。

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向威胁的势力进攻,以减少压迫的危险性,他方面还须充实内部的力量,以消灭本身的弱味。在现在,压榨殖民地民众的膏血,实与榨取本国劳农群众相拼,是无二法门的良法。不过,在压榨殖民地民众膏血的实行当中,最容易引起殖民地的争夺战,而反危及他们本身。万全的方法就是“共同的榨取”和“互惠的劫掠”。甲帝国主义对于乙帝国主义之侵略弱小民族或被压迫民族,只得在不害及自己权益的范围内,或机会均沾的协约之下,互相谅解。乙帝国主义者对于甲帝国主义者的同样行动,也以同种态度报之。于是,殖民地争夺战可以避免,而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能——除非帝国主义的分赃不能均匀,协定的内容不能议妥。

不但理论如此,事实也是如此。自经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尚未有一回用武力直接周旋过,结果都运用政治的手段完满解决。不战条约之缔结,更是此种精神的表现。近年来,任何帝国主义都未肯轻易和外国正式开战,为的就是避免本国社会革命的爆发。反苏俄的战线,已由各帝国主义分别布置,并且联系成一体系,由欧洲而近东、而中东、而远东,差不多各地皆有友方担任防御。目下已完成的联系,述之君在本专号《东北事件与国际政治》详言过了;此后恐更要加工整备。剩下的就是一个殖民地民众的共同榨取;此项在此次东北事件当中,也已证实大

半了。

英美法无论自他们本身的现势言，抑自他们在东北的利害关系言，无论自理论言，抑自实际言，他们绝对不能积极干涉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或采较“深加注意”及恫吓式的干涉，更进一步的措置。故自东北事件发生以来，行将四个月，英法为主人的国联每次的决议皆极空洞，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即最近议决的国联满洲调查团的工作——本即无工可作，有之也不过滑稽的工作罢了——也在故意延宕之中。查该调查团产生于12月10日的国联决议案，距今已将四旬之久，尚无半点踪迹。据说，欧洲的调查委员尚须绕美洲然后至远东，作个世界一周的游行，而开始工作尚须两个月之后。下列电讯，给与我们信任国联的一个总结算：

（日内瓦12日合众社电）据现在所得确息，知国联满洲调查委员团之抵远东，尚需时日。在最近将来，委员团在英委员黎顿公爵主席下，将在日内瓦举行全体会议，然后赴美，与美委员麦骜将军会合，在美作短期勾留后，渡太平洋而赴满洲。但该调查团在3月底或四月初前，不能开始其调查工作。现在中国之国联交通股股长哈斯（Robert Hass）氏已被任为调查团秘书。国联秘书处法职员皮尔特氏、柴里黎氏、及巴柴达夫氏三人，已被任而辅助调查团。该调查团系根据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所通过之决议案而产生，当时深信该团将立



即向远东出发,但因委员人选问题,延缓至今,现  
即调查团开始工作之时期,将在国联理事会通过  
议案四个月之后。

这是日美英《伦敦协定》及《日法密约》的必然归宿。他  
们之间的协定和谅解,已渐具体化,现在所差的只是协定的  
内容和谅解的程度。最近期英文《国际通讯》,曾经揭破  
此项消息,即一月号日文《改造》杂志也公然承认:

“然而在事关满洲的范围内,日本全国的必  
死的反对(反对英美大借款之将日本撇开,事实  
上的表现就是东北的侵占——作者注),系对于  
苏俄的本质的威胁,同时又促英美对于排除日本  
于支那财政共同管理之外加以考虑。在此考虑之  
下,英美自不得不与日本协定。关于此问题,日本  
与美国在不发表的约束之下,进行频繁的交涉。  
自国防的立场上,反对支那共管的日本,果与英  
美之间发见何种妥协之点,我们虽不得而知,但  
在9月以后的国联理事会的经过当中,可以想见  
之。”“例如最初在国联日本虽是刑事上的被告,  
而事势却急转直下,现在国联反为世界和平而抑  
制支那的要求。并且,实质的国际财政共管的计  
划依然在进行中。……”

1月14日《北平晨报》所载下列电讯,更足以证明日英美所进行交涉的经过,及英美所要求的是些什么东西,证实我人前言之非谬:“东京13日新联社电”关于满洲事态,美国政府7日向日本政府提出节略之意向,欲间接怂恿其他九国公约缔结国采取同样之行动。但英国及他缔约国,皆不采取任何正式之行动,已经明白,惟英国9日发表声明同时向松平大使声明,请日本证实满洲门户开放政策宣言。该声明稳健请求证实日本关于此点之担保。日政府于一二日中,将训令松平大使重为说明日本在满洲之立场,且对于英国政府对日政府表示信赖之态度,甚为谅解。业经松平大使转达西门外相。

据《日本记录报》(Japan Chronicle)载称,英美法三国政府关于锦州时局,曾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日外务次官永井已将日政府复文送交三国驻日大使。美国驻日大使福比斯氏亦曾赴外交部访问永井次官,彼等对满洲事件,谈话极久。美使力言日本在满洲之军事行动,危害满洲之开放门户主义。又谓自满洲各地通商大埠为日军占领后,致各地美国商行,完全不能取偿前政府时代所有欠款。且一切商业上往来,亦同归于尽,故美商所受损害极巨。美政府已接到各美国商业公司通电,责备当局放弃在满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权利。因此之故,希望日政府尊重此点。当时日外次答称,日本政府极力履行此种主义,并言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主义,现时尚未实行,由于满洲之纷乱状态尚未平静。日可担保满洲新政府继续履行前政府对美之义务。

美使已将日方答复转达华府，美政府对之是否满意，刻尚不明。

美国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的悬念，只是“危害满洲之开放主义”，及各地美国商行完全不能取偿前政府时代所有欠款”。英国之意也不过如是。所以，只要日本能证实近日所发表“满洲门户开发政策”，英美自无吹毛求疵之必要。

法国则更进一步，实行“趁火打劫”了。继西南部所侵入，近日在天津方面也有动作：

(天津本报电话)法兵侵占老西开后，设立岗位，并征收捐税，业经市府向法领提出抗议，昨日上午11时，法领有复文致市政府，声明法工部系在老西开，维持公共次序，并否认有征收捐税情事……(1月14日《北平晨报》)。

## 六、中国民众应有的觉悟

在帝国主义末期，帝国主义战争之不可能，是极自然的归宿，是辩证法的转变。帝国主义者之争夺殖民地，产生了欧洲大战，由于欧洲大战的经验，否定了殖民地的争夺，而代以“机会均等主义”，“互惠的劫掠策略”。在这阶段中，帝国主义战争必被扬弃(aufheben)。而将来的战争，必将采取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或以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战

争形式,或以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战争形式。

在这种辩证法的转变当中,东北事件的归趋几乎可以不言而喻。不过,东北事件的胎中,将来必定孕育更大的变化,也是我们应加注意的。我们民众不要和当局的一部分人陷于同样“不识事务”的弊病,专向国联或更有力量的美国哭诉,我们现在急应进行的,只是对付将来更大变化的“准备工作”。请大家睁开眼睛,看看现在国际情势何等的紧张!国内政治又是何等的混沌!而民众的昏迷和狭隘意识的冲动,尤使我们不寒而栗!

**觉悟吧!**

**认清我们的敌人!**

**认清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利用时机,**

**从改造东方运动中改造世界!**

(1931年11月15日)

原载1931年12月《新东方》第2卷最近远东问题专号

## 日本军事法西斯论

近年来，日本社会科学界已经公认日本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军事性。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本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许多事实更加证明这种军事性之存在。这是理解敌人的一个关键。我们要能够理解敌人的本质，才可以决定我们的抗战方式。

像日本军部那样政治地位的优越和政治行动的跋扈，在普通的民治国家里，实在找不出第二个来。日本的法典及习惯皆保障军部的优越地位。日本军部的几个重要中央机构，如军事参议院<sup>①</sup>，元帅府<sup>②</sup>，参谋本部<sup>③</sup>军令部<sup>④</sup>及侍从武官长等，都是直接辅佐天皇而握有帷幄上奏权的机关。日本陆海军部大臣不隶属于内阁政府，而是代表军部意志的资格或权威。这一点是日本和欧美布尔乔亚民治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日本的宪法上，规定许多种为各国宪法所没有的天皇大权。其中，关系军事的重要事项，例如规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的大权（宪法十二条），宣战、讲和及条约缔结的大权（宪法第十三条），皆可以不得

国会通过而直接由天皇行使。特别是颁布戒严令的大权(宪法第十四条),甚至可以剥夺宪法所给予人民的一切权利。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天皇大权的行使,事实上都是由军部的几个中央机关去决定的。陆海军部大臣不隶属于内阁,而直属于天皇,事实上与总理大臣并列;他们对军部负责,但不对内阁负责,也是最大的特点。再如陆海军部大臣不能由总理大臣选任,而必须由军部选任,也是一个当然的特色。例如政党政治色彩最浓厚的大隈内阁(明治三十一年),尚且不能由总理大臣选任海陆军大臣,而向萨派的前任海军大臣西乡请求海相,向长阀的前任陆军大臣桂氏恳求陆相,结果只有恳切地请求他们留任。桂陆相在答应留任时,且声明自己是以“异份子”入阁的。1931年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发展,军部的优越地位更加增强,甚至于军部负责的大事变,如五·一五事件<sup>⑤</sup>发生时,内阁全体总辞职而陆海军部大臣倒反泰然留任。二·二六事变<sup>⑥</sup>后,内阁总理竟须在军部的要求条件下成立,广田因与寺内磋商条件,几至流产。最近的宇垣内阁也因军部之拒绝选派陆海军大臣而中途流产。这些都是鲜明的事实。

日本军部的地位虽是如此优越,但它并不是一个架空的集团,而是有它政治经济的基础的。它是背后有所依附的一种力量。日本军部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为着某一种政治经济的权力服务或与结托的;它听命于一种首脑,而自己只充当四肢。在明治中叶以前,日本资本主义还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时代,日本军部是为官僚、地主服务

的。到了后来,独占资本(包括国家托拉斯资本及财阀独占资本)充分发展,官僚和财阀合抱,日本军部就自然地转而为独占资本服务。这里或许有两种事实值得考虑。其一是军阀支配财阀的一般看法<sup>⑦</sup>。日本军部势力的猖獗,表面上好像军部支配着一切,军权支配着财权;但是军部的任何主张并没有根本否认财产私有制,反之,他们提倡军备的大扩充,倒反增强了官僚支配下国家资本托拉斯的力量,培植了个人财阀资本的膨胀。其二是个人财阀支配军阀的另一种看法<sup>⑧</sup>。过于机械地评量日本金融资本势力的人,常把三井、三菱等财阀的力量估得过高,说事实上军阀只不过听命于几个大财阀。但这种看法忽略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忽略了日本产业资本主义及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性<sup>⑨</sup>,乃至无视了日本财阀成立过程中的特殊事实<sup>⑩</sup>。

从表面上看来,日本军部常直接间接与财阀冲突,政党与军部之间也发生不调和的事象,但是军部始终是为某一种经济权利服务的,近年来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在为独占资本服务的。从本质看来,我们说日本军部服务于日本独占资本可以,说日本军部完全服务于财阀则不可以。日本的独占资本和其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官僚操纵下的国家资本托拉斯的比重,大于个人财阀的独占资本。个人财阀独占资本又是官僚政府培成的,始终收在政府统制之下<sup>⑪</sup>。这一点就是过去充当官僚的四肢而现在充当独占资本的手足的军部所以表现为主动力量的经济根据。

日本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的土地经济基础上,在家长或政府的温床里发展的。由封建经济的递变,在极短期中确立了产业资本,紧跟着就是金融资本的成立。历史要求着日本更高一层的发展。在日本现存经济组织下,日本资本主义不能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很自然地要求着法西斯的实现。独占资本和封建势力的融化,个人财阀独占资本和国家资本托拉斯的结托,皆要求着法西斯的实现。日本几年来的政治过程,都是在这种要求下摩擦过来的。有一部分急进法西斯份子不满意财阀,也不满意官僚和政客,于是发生过多少次过激的暴动,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等。但是日本的政治机构不容许急激的改革,只能容许一个合法的法西斯。于是需要着政党与军阀的融合,还需要着政党,财阀和军阀的合抱。二·二六事件以后每一任的内阁皆努力于这种工作。寺内,广田内阁<sup>9</sup>的努力,失败于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继起的林内阁也不过成功了政党与军部的调和,而未及完成三者的抱合。到近卫内阁才算成功了这种伟大功勋(?),而日本政治就急速地向法西斯的方向发展了。

然而日本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在其开始第一步即已带上军事性,军队培植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目前的政治经济也靠军队及军备来维持下去。军部的势力依然占着优越的地位。现阶段的日本法西斯,不但需要着军队的膨胀及军需工业的发展。并且要由军部的少量来维持这个秩序,来推进这个发展。又在对外的关系上,日本经济在资



本主义的条件下必须侵略外国,独占外国的资源、市场、以及劳力,以补强它先天及后天的缺陷,于是现阶段的日本法西斯更需要着强大的军权来维持,来开拓道路。根据日本国内外客观的条件,日本法西斯承受日本资本主义的衣钵,带上了更浓厚的军事性。从本质上考察,日本资本主义是军事性的资本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军事性的帝国主义,现阶段的日本法西斯依然是军事性的法西斯。1931年以来,日本军阀与独占资本的共同要求,把日本经济渐向战时经济体制方面推进,本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军部又把日本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一切推上战争的轨道上。日本法西斯发展过程上的种种摩擦,居然依赖这个发展而消灭下去。日本政党、财阀和军阀的紧密的抱合,居然在对外侵略战争的轨道上完全实现,军部充当四肢的作用更要发挥,军事法西斯的色彩也更要加浓起来。

然而我们要深刻了解日本军事法西斯的本质,我们还须更进一步研究日本资本主义军事特质的历史条件及其经济基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迟后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各国大多完成了产业资本的发展而步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了。这个时代的落伍性就逼着日本政府采用人工来培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主观上固然是为了国内外军事的必要而建设了军警网,创设了军需工业及重工业交通工业,而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日本因为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性的决定,及其先天的缺陷(资源缺乏、市场狭小)而急激走上对外侵

略的途程，日本军队领导商品及资本向外进出是其特色，恰与英美等国相反。此外，产业，特别是基要产业(key industries)的创造和发展，皆生于军事的目的，并且是由军需工业领导着普通产业，又与通常的产业发展形成颠倒的关系，也是军事法西斯的历史条件。又如，日本近代三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等等，也都是军部的优越政治地位及今日军事法西斯的历史条件。

其次如军事法西斯的经济基础，在日本经济体制中也有许多特殊的事实可提。日本军部所以能与财阀结托的原因，即在于这个日本经济的特殊性。贯通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军需工业占着最重要的地位。日本军部要求军备的大扩充，日本官僚和财阀要求军需工业的大膨胀。所以不相称的庞大财政，皆能很容易年年增加下来。军需工业经营于国家托拉斯资本，及财阀独占资本而受到军部的统制，也是军部势力继续膨胀的原因之一。但是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经济原因，还是在于日本军事资本主义的特性，不但在其初期需要对外侵略以建造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即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今日，也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更丰富的资源，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将无法维持。日本经济要求日本军部执行这种任务，日本军部也很强硬地执行这种任务。几年来因军费急增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景气，及因军备大扩充引起的军需景气，阻止了日本经济的衰退，还进一步增大了一般工业的生产指数。这种动向，虽是军需工业资本的要求，但其发动则须归功于日本军部忠实

地强硬地执行它的任务。日本军部把日本经常的经济推进准战时的经济体制中,已有六年的期间,近卫内阁以来又把准战时经济体制带上战时经济体制的途程去了。今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作全面的侵略,就是日本军事法西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对外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性更要增加它的作用和威福。日本军事法西斯是否能受到挫折,要看我国全面抗战的努力如何来决定。所以说,中国的对日抗战不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并且带有解放日本大众的意义。中国抗日战争是反帝国主义的,同时又是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日本军事法西斯的,中国的大众和日本大众正站在同一利害关系的基点上。这是分析日本军事法西斯的结论。<sup>(4)</sup>

#### 注释:

① 军事参议院是应天皇重要军务的咨询而上奏意见的机关,是以元帅、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及陆海军将官组织的。

② 元帅府是关系军事的最高咨询机关,是从陆海军大将当中选出功勋卓越的列为元帅组织的,等于政界的元老。

③ 参谋本部是由参谋总长管辖而为天皇参划帷幄的军务,掌握国防及用兵的计划。

④ 军令部参预帷幄的机务,计划国防及用兵的事宜,军令部长直隶于天皇。

⑤ 五·一五事件是以陆海军军人为中心的暴动事件,理论应由陆海军部大臣负责的。

⑥ 二·二六事件,便是纯粹以陆军近卫师团一部分中坚份子,

发动的大暴动。更应由陆海军部大臣负责。

⑦ 目前我国所谓日本通及一般理论家，都是这种观察，普通的报章皆充满着这种论调。

⑧ 日本左翼阵营之一的劳农派就是有力的代表，开明一点的布尔乔亚学者也持同样的主张。

⑨ 野吕荣治郎、山田盛太郎及平野义太郎等讲座派，首先发现了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之一的军事性，详见《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及《日本资本主义的社会机构》。

⑩ 贯通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日本财阀不但是为军事设备的必要而抬头，为日本军阀政府所创造，并且始终得着军阀政府的维持并受其统制。

(11) 整个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史几乎可说是军需工业史，而占大比重的军需工业，不但开始为政府所创设，即在今日大部分的主要军需工业仍为政府所经营，他如交通事业及专卖品生产及贩卖也皆由政府一手经营，此外尚且拥有广大的官有土地。

(12) 二·二六事变后的组阁者，军部和元老原属意于近卫文麿，因近卫胆怯不敢出担时艰，转荐广田。但是军部提三大要求以为广田组阁的条件。广田不但组阁时接受军部的条件，其后事事皆受陆相寺内的牵制和指挥，时人遂称这个内阁为寺内广田内阁。

(13) 关于日本军事法西斯的历史条件及经济基础，原有许多资料及数目字，因限于时间及篇幅不能应用上去，只有留于另题详论。

原载1938年1月《世界知识》第7卷第2期

## 最近日寇的外交动向

日寇御前会议闭幕以后,接着又是议会的举行。在日本政治机构上,这是一重大事件,它决定了战时国策基本原则。基于这原则之下的外交方针如何?这是目前一般读者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想对日寇最近外交动向加以分析。

日寇军事法西斯一贯的对外国策,就是征服中国独霸东亚,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冒国际的最大危险。所以御前会议后的对华方针就是继续加强对华的全面军事侵略,企图藉此逼我国民政府屈服,缔城下之盟。所以在御前会议开会的前后,日寇即已做过这种尝试。我们退出南京后,日寇总司令松井大将对记者的谈话及其后短期间的军事行动即已证明过。松井竟大言不惭地声言:“……吾人殊愿予中国以充分时间,俾可考虑其态度”。但是我国政府始终不为淫威所屈,于是日本军阀乃更进一步决定一面继续做军事侵略,另一面进行分化工作,制造伪中央政府。其具体的方案早在大本营与内阁联席会议上决定好,为取得最高权

威起见遂召集御前会议，随后对华宣言就于16日发表了。其最主要之点，就是今后不以我国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并声言“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与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不以我国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就是说中日大战在目前已无法和平解决。同时，表明我国政府坚决抗战到底。这一层自从1月22日日寇外相广田宣布德国大使调解经过并揭露日寇所提最低限度的条件后，差不多可以说是确定的事实。我国驻日大使业已回国，日寇驻华大使川越也回去了，此后的动向更不难窥见一斑。至于制造伪中央政府当然也在其积极进行中。不独限于伪中央政府，还要随时随地制造伪地方政府，也在我们意料之中。因为日寇侵略中国的政治惯技就是分化中国，以华制华的把戏。在最近的将来，日寇还要在华中成立几个伪地方政府，并准备在华南方面造成设立伪组织的形势。这自然是与分化和封锁有密切的关系。

日寇既然要继续或扩大它对华的军事侵略，并且期待着一个全面控制的局面，自然要对英美各国耍它的狡猾外交手段。在御前会议后的狂暴宣言中还有两个要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是声言“日本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其二是尊重“列国在华的权益”。这当然完全是撒谎，是狡猾的辞令。关于前一点，日寇政友会领袖岛田在本届议会上说得好：“政府常常爱说什么日本对华没有领土的野心这种话，真奇怪极了。”他还说：“政府也许没有领土的

野心,可是除了日本,谁在哪里管理这个区域呢?”此后日寇不但在政治上即在军事上也要加强以华制华的手段是可断言的,因为日寇的军力原不足以对付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现在战场扩大了数倍,它只有编练华人军队打华人。但它是无暇顾到此中危机的重大性。

至于尊重列国在华权益一层,更是瞪眼的大撒谎。华北伪组织已经强夺了天津关税权,擅自改变关税率,日本军人在上海横行霸道,蹂躏租界英美的租借主权,并且随时侮辱英美各国人士特别是妇人,这就是日寇尊重列国权益的具体表现。此外,有一点我们要特加注意的,就是最近日寇为缓和它的孤立而采取缓和进攻英国的外交空气,及向美苏表示好意。最近,近卫的谈话与末次的狂言,正成一个对照。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绝对不会有任何效果。

原载1938年2月《时事月报》第18卷第3期

# 日苏最近的纠纷

## 一、日本军阀的恼羞迁怒

自从我们第二期抗战广大展开以来，踏着冒险路程的日本强盗即便一步步吃着苦头，军事损失的巨大实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自去年7月8日起至本年3月25日止，敌军伤亡的情形，在陆军方面达307,311人，在海军方面达27,030人，在空军方面也有10,210人，被我击毁的飞机数约计462架以上，被炸伤军舰共计25艘，沉没者4艘，若再加上台儿庄三次大会战伤亡的二三万人，日寇海陆空军的伤亡总数当在三十七八万人之多。日本军阀原拟用15个师团使我们“屈膝”，但是现在仅仅伤亡人数即已超过15个师团，而其作战的困难又随着战场的扩大而日益增加。中日战争遂至如日本士兵所怨叹的，“血腥的战争究将继续到什么时候呢！”（东战场俘获敌军未发的家书）。这不但是日本一般士兵的苦恼，同时也是日本军阀的苦恼。日本侵略者过去在中国所吃的甜头太多了，这次竟然碰到我们的硬钉子，致



使他们对于国内人民的诺言完全落空，激起了国内人民热烈的反战运动。于是日本的侵略者思索失败的原因。不求自省而专责他人，是侵略者一贯的劣根性，于是很轻便地把失败的责任归属于别个国家对我的援助。几年来，日本强盗一贯地借口于“防共”以遂行其对我的侵略，把侵华战争美化为“防共圣战”。但到大战爆发不能马上使我们屈服战争复又迁延不决的时候，它又嫁祸于英国，于是末次内相大倡其反英的论调，煽动反英的舆论。迨至最近中外商业新闻也作专文批评日苏关系说：“苟苏联始终对中国作有力的帮助，……苏联援华即为对日之非亲善行为。”该报还大放厥词说：“日苏关系之调整实赖于苏联方面。”尤其可笑的就是“苏联应知中日事件起源上发展之真实经过，惟有如是，苏联对日之态度始能改变”的结论（中央社东京五月八日路透电）。在第一期抗战中《由防共圣战到驱逐白种圣战》的诡诘，现在又要集中到旧技“防共圣战”的奸辞上了。

## 二、日本进攻苏联的宣传战

在日本强盗是把“赤露膺惩”和“支那膺惩”相提并论的。所以在我们抗战期中，他始终是把苏联拉进中日纠纷的问题上来。大肆其造谣和恫吓的能事。远在去年12月间，素以侵略中国及攻击苏联著名的荒木贞夫，即已“大发其粗鄙的反苏联论调，甚至直接要求对苏作战”（12月21日大公报），致使驻日苏联大使向日外相广田提出书面的抗议。

上月前日本驻苏联大使田中更进一步大造其澜言，并谓“日苏将难免发生冲突”。日本中外商业新闻也载专论说：“日苏因满蒙苏边境问题时时有纠纷，两国形势已甚恶劣”。该报更照日本政府的政策依样画葫芦说：“苏联在中国汉口方面势力日张，日苏虽不致有武力冲突，而两国对峙之形势亦将更加严重”（以上皆据4月9日新闻社电）。不消说，完全是用以欺骗欧美各国的烟幕弹。当此英法对德意步步退让的今日，尤其是当此欧洲酝酿着缔结四强协定乃至五强协定企图孤立苏联的今日，日本所以如此大造谣言以响应德意，自然不是偶然的。所以，中外商业新闻报又宣称：“如果日本再向苏联抗议（指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向苏联政府抗议苏联援华事），必仍无结果。……但日本如以武力阻止苏联援华，则结果将更加严重”（据上引同电）。其心虚胆怯也足证其恐吓之无根。

日本进攻苏联的宣传战，更由日本政府积极地发动了。最近日本情报部分送小册子给外国记者，极度指责苏联对日本的非法行为，现其“莫斯科政府于完成五年计划之后即决定肃清外人之权利”（4月9日塔斯社东京电）的措词，即可见日本企图孤立苏联的一斑。这本小册子还列举许多片面的事实以为例证。他们说苏联压迫日本驻苏联的外交机关及通商权利。并说近来这种压迫更加增加。他们说日本在堪察加半岛的捕鱼及库页岛北部的石油矿租借权受到苏联的压迫。又说日本驻苏联大使馆不仅受到严密的监视，还有12位“柏克乌”侦探在大使馆门前身穿便衣开

一商店从事于特殊工作。据日方的宣传,苏联之压迫日本人,使日本使馆的职员或武官赴苏联各地游历时遭遇没有旅馆投宿的苦境。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日本使馆及领事馆的苏联本国人职员,也常受到“无故的拘捕”。他们说“日本驻敖得萨领事馆被封的奇特原因,在其他任何文明国家内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发生”。但是所谓“奇特的原因”则未提到。这本小册子列举的片面的事实非常之多。小册子的结论加强力量说:“苏联之卑劣,无人道,其种种不合法之行为,惟有更促日苏邦交之恶化耳”(据4月9日塔斯社东京消息)。日本陆军次官加藤更加露骨地在国会中声称:“日军在库页岛日苏边境应采取之行动业经决定”(据中央社东京九日路透电)。到这时候,前此广田外相屡次宣称“政府将竭其能力使两国间关系入于常规”及日本无意与苏联启衅的声明,已不能取信于日本议会的议员及一般人民了。

### 三、日本进攻苏联的行动

日本军阀每次在向苏联挑衅之前,必先在它的舆论界散布苏联方面进犯日本的谣传,4月中旬同盟社即谓“黑龙江的冲突难免”(4月19日各报),同时日本读卖新闻也刊载谣言,称4月4日外蒙兵士20人侵入内蒙,占据斯巴吉尔地方,4月1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更称:“苏联当局曾在北库页岛一带压迫日侨破坏日方在该地之利益”,继之则又恫吓说:“苟苏联有意增加现时局势之严重性则日本必将有所报

复”(据4月12日中央社电)。其为挑衅进攻主张本可以想见。

且看日本怎样向苏联实际挑衅。记得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即便调动大军到北满,并且即速完成包围苏联远东要塞的道路。其又继今年初日本参谋部放出苏联将在3月至5月间出兵的空气后,日伪越境挑战的行动及利用白俄在苏伪边境活动,乃至反苏间谍的阴谋,就没有间断过。其中最严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年12月间苏联民航飞机及邮件在伪满被扣。2月中,日本北海道当局又非法扣留遇难的苏联商船,虽然经过苏联的严重抗议,但日本当局依然加以惩罚并捏造船员及乘客招承间谍性的情报。4月上旬以后,跟着我国第一期抗战胜利的进展及欧洲侵略者庆幸外交的成功,而日本更加大肆其向苏联的挑战。4月11日,即有日本军用飞机九架侵入苏联边境14公里,飞至格罗得可佛省波尔塔伏卡南面地方,飞翔于苏境5公里之上。数分钟后又有一架日本驱逐机两架,由伪满边境飞来,联合在一处。因受苏联飞机的包围而有一架被逼降落(据塔斯社莫斯科11日电)。最近苏联政府公布消息,日伪军队又不断地图谋侵入苏联边境(据5月11日各报)。日本最近还唆使伪满停付购买中东路款项。这正如真理报所评论的,是一种“恶意的失信”,显然表明日本反苏联的诡计,也是一种向苏联挑衅的新计划。此外,日本强盗复又加紧“侵略者一种主要工具”的间谍活动。据法文莫斯科新闻报的分析,日本反苏联的间谍的严重性:日本反苏联间谍活动,范围异常广泛,其从事间谍的费用每年约有数千万元。所用人员

达数万人。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与日本比美。日本的间谍活动有一种特别组织和人员，专管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在大多数国家内，日本外交机关，有专人主持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也有成群的流动侦探，自一国至他国企图伸入苏联。整个海外日侨都在日本驻华沙大使斋藤指导之下，又受日本驻波罗的海各国公使的实际援助，推进侦查组织工作。事实上日本在海外侨民大多参加反苏的间谍活动，几乎“每一海外日侨均为一间谍”。

日本近来向苏联挑衅的积极，于此可以想见，但是我们始终要强调：日本这种挑战完全和扩大侵略我国的战争配合着；“支那膺惩”和“赤露膺惩”始终是一谱交响曲。

#### 四、苏联怎样奉酬日本

苏联几年来虽埋头于经济建设“维护世界和平”虽然仍是苏联的外交方针，但是到领土及权益被侵犯时。苏联是不会示弱，更不会犹豫于“迎头痛击”的。自从我们全面抗战爆发而日本积极挑衅以来，苏联当局即已屡次表示强硬态度。上次苏维埃最高会议后，“不予敌人寸土”及还要“在敌人领土内打击敌人”，已经成了苏联答复日本进攻的最高原则。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日苏关系》的演说中说过：“我们相信，我们定能反对外国的这种以及其他无理的行动而保障我们苏联的利益。我们敢向诸位同志担保的，就是：凡是我们的方面所必须采取的一切办法，我都是一

定会真正实行的。”最高会议外交委员长日丹诺夫也极力抨击日本的行动,强调苏联远东政策的积极化。最近,苏联外交委员长李维诺夫在他答复日本大使重光抗议的声明中,更可看出苏联态度之强硬。

苏联对日实际行动的报复,也不弱于言论上的反抗议。当4月11日日本军用飞机侵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驱逐机即不客气加以包围,迎头痛击,日机遂被逼落一架。同时亦于5月11日封闭日本驻黑河及伯力的二处总领事馆以防日本间谍的活动和阴谋。库页岛及卡哈的日领事馆早即被封。苏联政府还以断绝邮务关系报复日本在伪满境及扣留苏联邮机;扣留日本桅船及其船员以报复桅船维姆培案;对于去苏联活动的间谍,皆不客气地加以拘捕,3月中已有8名被捕。苏联给予日本在库页岛北部的煤油开采权及其他利权,将因伪满停付中东路款而被苏联采用作报复手段吧!

然而苏联防备日本挑战及阻止日本进攻的最积极的手段,应该首推苏联远东军事设备的强化,即令日本当局也都不能忽视。但本问题限于篇幅,拟不加剖述,但是“军事冒险家”将不能得到任何便宜,则可断言。

## 五、我们应有的认识

日苏的纠纷和中日问题连着密切的关系,是无庸言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更要有深刻和正确的认识。至少下列几点是值得顺为一说的:

第一，日本最近反苏联宣传及实际行动之积极化，是由于苏联在精神上及物质上援助我们抗战。但从李维诺夫强硬反抗议之后，在日本强盗肆行之前，中苏的关系客观上是要愈益联成一块的。

第二，日本反苏联带有侵略中国的烟幕弹的作用。日本强盗之侵略中国，原是找不出适当的理由，不得以而以“防共”为辞，以为搪塞欧美各国之用。

第三，最近行动之积极化，是具有响应德意孤立苏联之作用的。因此，日本的反苏言论及行动需要积极化。

第四，日本反苏也即间接疏远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接近。现在世界和平的轴心不但建在英法，苏联特别是一个据点。日本宣传苏联压迫日本，无异于造谣说苏联破坏远东和平，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同时又极力宣传苏联帮助中国作战，结果冀望影响所及，英美各国不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到底。

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处处都在中国身上用功夫，我们对于远东的任何事变及动向都不能忽略或旁观咧！

（1938年5月20日）

## 日本军队的莫斯科

上月22日外电即传日军开五师团入陕西,日本参谋本部也同时扬言进攻兰州。近日更加盛传将以18个师团犯战陕甘宁区,切断日方所称“赤色国际路线”。日来华北各地日军的调动又极忙碌,并已开始烧毁公路两旁的民房,避免游击队的袭击,集中骆驼向西运送汽油,华北敌酋亦恰于此时更迭,敌人冒险深入西北的动向似已相当显明。

据说,这个侵逼西北的军事计划完全出于石原莞尔的杰作,日军素称石原为日本的拿破仑。他现任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日本侵华的军事计划,大部分是这位日制拿破仑领导制作的,现在又要指挥“皇军”向西北前进了。然而法国的拿破仑丧师在莫斯科,日制的拿破仑也要埋骨于西北。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好对照。日军侵进西北只有送死一途,不用说日本已无法再调如许军队进西北,即令如数调来,结果依然是要全军覆没的。我们的理论根据如下:

(一)西北一带是第八路军的政略及军略浸透的地方,一般人民的民族思想非常浓厚,对日抗战到底非常坚决,



并且全部受过政训与军训，游击战术相当精熟。当地军民已经打成一片，一旦日军到来，人民将必实行坚壁清野，全部参加军队作战，日军所遭遇到的，除游击队而外必无他物。日军深入腹地，运输已甚困难，所谓“现地主义”又无从实现，全部军队必至饿死。

(二)西北交通不便，不是山陵崎岖的小路就是地皮轻松的沙漠，军马尚难行走，何况重兵器部队。山巅溪谷联接的公路，一经破坏则不易修复，其时日军不但前进困难后退却亦不易，而我则可以利用这种自然环境袭击，加以围困，加以歼灭。平型关大战以来山西各地的苦味，日军当不至健忘。

(三)再就军队生活一项言，日军侵入西北将如迷困于北冰洋，不但饮食来源绝断，即气候亦不适宜。西北地势高燥，饮水困难，掘井要深至500公尺始能得到水源。因为西安已在海面500公尺的高原，兰州更在1500公尺以上。我们在撤退时将水井全部埋塞，即可不战而制日军的死命。当年西北军退西北时因人口骤增，饮水不足供用而人饮马尿，日军所遭遇困难当更加剧数十倍。西北气候严寒干燥，对在岛国生活惯的日军是个大敌，日军受此天然的大敌包围，其死亡率将更高于长江上游一带。

我们不是故作危言耸听，日本军阀如有决心调动大军深入西北，企图完成其隔绝中苏合作的迷梦，则西北广阔无垠的沙漠，尽够埋葬带着咸鱼臭味的一切侵略者。

然而日军进攻西北的政治阴谋却是我们应该深加注

意的。第一，日军佯为停止华南之进逼，用以缓和英美的强硬反对，避免目前更进一步的冲突，并可使英美法对日的备战松懈下去。第二，日军佯为进攻西北包围苏联，扬言切断所谓“赤色的国际路线”，用以淆乱世界的视听，离间英美法与苏联之密切合作。第三，日本公然宣称进攻西北为包围苏联防堵赤化，欺骗中国的所谓流弹论者及一部分不谙国际情势者，以收分化我内部的抗日势力。我们在日阀这样政略与战略之前，除加强西北军备的力量予以迎头痛击及包围歼灭外，还须发动国外的宣传力量，揭发敌人的阴谋，使外国人士及本国国民不为所动。

原载1938年12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4期

## 日本进攻英国吗？

日本试行更大的国际冒险，占领了英法日条约上不能占领的海南岛，不但是对法国的威胁，事实上也就是对英美的威胁。日本抓住英国名为现实外交而本质未确定方向的外交弱点，每逢欧洲发生严重问题时即向英国作进一步的胁迫。日本继占海南岛，企图包围香港，切断新加坡与菲律宾的联络，并威胁南部亚洲英国一切的属地之后，第二步的工作以几个汉奸被暗杀为理由要求掌握上海工部局的权柄。同时又向中英交界的深圳地区肆行轰炸，还有八架“怪机”飞越香港的上空。在这西班牙政府退出巴塞隆纳而德意更加压迫英法的时候，又在日本派遣代表参加柏林德意日三国会议而德意要求日本加紧威胁英美法的昨天，尤其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已至十分疲惫而急于结束的今日，日本对英国进一步的紧逼，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

日本对英国这一串的攻击，其粗暴狡猾的程度很明显地已是玩弄着英国了。最近上海方面随抗战的进展大批汉

奸连三接四地被锄奸团所枪杀，日本即谓上海工部局没有维持治安的能力而要求交出治权。这明明是笑话。试问东京也常发生“神兵事件”，二·二六事件等类的凶杀案，是不是日本失掉维持治安的能力？这不过是对英国工部局的侮辱罢了。再如日本飞机居然敢对英界肆行轰炸，并以机枪扫射，死伤英国印警及关兵甚多，为香港有史以来所未见。事后日本一方面由陆军省发表公告，声称“此事是出于炸弹一枚之误投”，并谓“日军部已向英当局道歉”，但另一方面则由日本驻港领事织田否认其遵照日本政府训令向港督罗富国表示憾意。这种反复无常的词令，当然不只是出于一个外交官的意思，而实在是日本故意玩弄英国。

日本看清楚英国能否提出更实际有力的抗议，完全决定于美国是否支撑英国的腰。就目前看，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力量确实胜过英国，也胜过美国，但是英美能切实联结则可以胜过日本，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则日本立刻处于必败之地。在去年巴纳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Leahg大将极力主张共同封锁日本则美国可不损失两只以上的兵舰而打胜日本，因为日本情形和意大利不同，这岛国孤悬海面，和世界其他国家隔离，英国派24只兵舰在新加坡，俄国已驻50多只潜水艇在海参崴，英俄很容易隔断上海与长崎间的交通，日本军队没有给养就不能生存，中国抗战又这样得力，不到3个月2个月工夫，日本经济就崩溃了（见美国时事评论家Pearson及Allen所揭露的消息——《大公报》1月7日）。今日，巴纳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太平洋上的情势还没

有很大的变化——在日本经营海南岛未完成以前。所以日本对英美法的压迫，还不过是一种恫吓。虽说日本这种威胁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日本威胁的用意，一方面固要英美停止援华，一方面又是在逼迫英国出为调人解决中日的战争。但是这种调人之难为，是英国所尝过的苦味，相信英国不会再尝试，那末抵抗日本的威胁和压迫，就只有英美法苏切实联结包围日本，至少要真正拿出一只“铁拳头”给准备扩大国际冒险的侵略者看看。

原载1939年2月《战时日本》第1卷第6期

## 日本再度向苏联屈膝

脆弱的侵略者惯用的手段是虚作手势欲藉恫吓以达到目的。但是碰到强硬的对方示以严厉的目光或还以痛快的还击时，即便屈膝跪地求饶。

日本自去年秋间的张鼓峰事件上对苏联屈膝后，这次在苏日渔约纠纷上的屈膝，算是第二次。日本对于渔约的纠纷自始即大吹特擂，态度极其强硬，甚至声言要以武装自由出击，但是结果却忍受了苏联所提解决渔约的基本条件。苏联全国人民“还侵略者以两倍或三倍以上的打击”的决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日本侵略者的“脸”却丢尽了。

在这次新渔约的规定上，日本侵略者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各通讯社所传苏日新渔约的内容概要如下：

- 1、苏日两国确已成立协定，将1928年渔业条约略加修正，并延长时效一年；

2、在苏日新渔约中，苏联为军事上之必要，保留37处渔区，不予拍卖，但另于其他海面拨出无关军事的10个渔区，以为抵充；

3、日本方面所缴租费，应提高10%即增加30万日元。

要而言之，日本在新渔约签订上，不但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并且蒙受了军事上的损失；至于政治上的作用，则更完全丧失（详情参阅本期论文）。渔区缩小了，而租费却反增加，军事上必要的渔区则为苏联所收回，进攻苏联的假威风，更为英美法乃至帮凶的德意所看穿，最近风传德国供我国以一部分军火，并缔结物物交易协定。这当然是对日本的一种威胁。日本的元老、重臣、政党乃至一部分财界有力者，反对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已使希特勒大感不快，这次再向苏联屈膝，将更失掉了德意帮凶的欢心。日本侵略者到这地步，更加暴露其国际的孤立了。

但是日本侵略者绝不肯放弃进攻苏联所只发生的政治作用。所以新渔约成立未及一周间，苏伪边境重又发生严重的冲突。据哈尔滨的外讯，这次的冲突确是日伪军先向苏联发炮挑战的，那末日军的用意是可知的了。重庆6日中央社传外讯称：日本政府又议决对我政治新阴谋若干条，电令其在华军事首领切实执行。其中有一条是要在华

军政人员极力宣传“反共侵苏”，为欺骗世人及我国的“烟幕”。日本侵略者对于苏联，依然不停其烟幕式的恐吓及虚作声势的挑衅，充分暴露其自家的无力。世界上实在没有比日本侵略者更卑鄙、更怯弱的。日本人所自夸为“超人”的真面目就是这样吗？

原载1939年3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1期



## 日本排英运动

日本自从积极侵略中国以来即已种下排英的种子,前年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发动后,英日之间的利害冲突已演至无法调和的地步,英日重盟的幻梦也因此完全打破。一方面,英国为着维护她在华的权益积极帮助中国抗战,另一方面日本则企图独吞中国排除各国,于是英日之对立遂日益尖锐化。所以在去年近卫内阁大改组而末次大将任内相的时候,日本排英的运动即带上了政府正式发动的色彩,受到日本国内外诸多方面的批评。现在末次内相虽已辞职,但最近则因英日冲突的深化,而日本排英运动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这次的排英运动依然是在极右派法西斯的指导之下发动的,政府发动的色彩比以前更为浓厚,其规模并且扩大到中国各沦陷地区。最近日本国内因为英美法亦积极援华抗日的原由,排外运动采取一般的形式,但在中国沦陷区,则采取专一排英的方式。其主要原因是英国最近又再

借与中国1,000万英镑的汇兑安定资金,积极支持中国法币。日本认法币为抗日的强韧力量之一,故日本各界皆认为英国此举为“非友谊的措置”(日报《大阪每日》的特号标题)。有田对于英国对华的借款也公开声言其为“强化蒋政权”。于是日本各报一齐著文强调:“英国若始终固执于其传统的远东政策,则今后日本在推进对英国的政策上,必须一掷从来的协力态度,加强采取新方策对付的决意”(《大阪每日》3月1日)。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发出排英最响亮的一炮,是东方会总裁中野正刚。他是排外最激烈的主帅。老早就已著作论文攻击英美法苏为日本的真正敌人,称他们为“覆面魔王”,主张把他们的势力逐出极东天地之外。中野最近更在上海大发狂言,除攻击日本的软弱外交外,还主张:“当日本占领广州时,全以为更应用带甲的拳头打倒英国。……英日两国在华势力针锋相对,如日本一退缩,英国即将扩大”(据3月7日美联社)。

同时,中国沦陷区的伪组织也皆发起排英运动。日本除指挥伪组织排英外,并且公开声言:“日军占领区内的反英排外运动乃自动者,……因各外国援助重庆方面也”。“反英运动如不侵及外人生命财产,则日方不拟加以制止”(美联社3月31日电)。日本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更就这种排英运动大吹持播,南北伪组织排英运动演至最近更加具体化。南京伪维新政府公然发表谈话,主张:“公敌的英法苏三国人,应即加以驱逐。”3月30日南北两伪联合会

又在南京发表宣言，肆意攻击助我抗战的各国，对英攻击尤其厉害，该宣言且对英国大肆恫吓，谓：“英法如果敢再对‘维新政府’采取‘反和平’的行动，‘维新政府’将放弃其一贯的‘友好’态度，不再尊重各国的既得权益。”

日本排英运动演至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情势，即在中国各沦陷区普遍地发动并且集中到英国一国身上，沦陷区到处皆组织所谓“反英会”，即对于儿童也灌注反英教育。据南京特讯，在日本的占领区内，已有52个反英会成立，沦陷区各地的妇女会，也已开始抵制英货。南京的反英会发表宣言，痛斥英国侵华，开封也开了一个民族大会，由男女傀儡大放谬论，并通过议案，警告英国协助我抗日政府。目前反英运动普遍采取的方式为二：其一是散发反英传单，其二是举行反英游行。

日本在侵华的军事及政治阴谋相继失败的今日，排英运动具有两种的意义：一为压迫英国停止援华，一为强制英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谅英国也不会上它的当罢！

原载1939年3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1期

## 日本对第三国政策的二元性

日本侵略者内部的矛盾,意见的分歧,及政策的错乱,处处表现于内政和外交上。日本资本主义组织的复杂性,甚至于表映到外交的策略上,演成日本传统的所谓“二元外交”。这种二元外交,一方面反映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又恰好适应于狡猾阴险手段的运用。

具体地说来,日本平沼政府固然提倡着“亲和万邦”的外交政策,事实上依旧“踏袭”着宇垣外相的后尘努力于调整日本与各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日本驻华军队及官宪却继续不断地排斥欧美各国的权益,最近且已由经济利益的驱逐,演至政治权限的侵夺了。天津租界问题还未根本解决,上海租界的大骚扰又继之以起。最近更于5月11日下午派遣陆战队在鼓浪屿登陆,架设铁丝网沙包等作战障碍物,随意搜查住户,大捕华人达200多人,蹂躏英美法三国的治权至于极度。后来虽得英美法各国舰队驶抵鼓浪屿,

并联合派兵42名登陆维持秩序，日军终不得不撤退一步，但是日方的态度依然强硬蛮横，要求引渡工部局所拘捕的所谓扰乱分子，声言接收鼓浪屿法庭，上海日本领事且向领事团抗议英美法三国海军在鼓浪屿登陆，情势依然很紧张。

对于鼓浪屿事件，我们首先应加认识的是：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实在构成日本对第三国政策的一方面，即军部及驻外军队的态度。他们还在各地沦陷区发动排外反英运动，声言要把欧美人的权益完全驱逐出去，更可知鼓浪屿事件确是整个性的问题。这派蛮干成性的家伙素来即不服他们政府的命令，往往他们干出了既成事实之后，其本国政府的外交方策始随之改变或与之唱双簧。

少壮派军人认为日本与第三国的在华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他们的机关报极力主张：“若一味求之于第三国的关系，则不但失掉‘事变’的意义，并且适足以永久束缚日本于第三国牵制之下”（《国民新闻》）。即对各国在华的租界问题，军部系统的《读卖新闻》也主张：“温和手段已不足以解决公共租界，政府觉有对公共租界施以外科手术的必要。”死硬派的主张何尝把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放在眼下！

## 日本为什么没有参加德意同盟

5月上旬德意两国政府一同宣布两国军事同盟的成立，其范围尚涉及政治。意国外长齐亚诺在他们的机关报《电讯》上，就其主旨宣称：“意德两国均承认彼此各有利益范围……两国休戚相关，共同负保卫责任……盖两国均明白一国的失败即别国的不幸。”这样的内容在论理上是很适应于国际孤立的日本的需要，然而素来倚重德意为犄角的东方侵略者，竟未加入这个军事同盟。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然而自我国抗战进入第二阶段以来，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均陷入于彷徨苦闷的情势下，平时以革新领袖自命的平沼上台后，一只字都不敢提到改革，对内主张“总亲和”，对外则谓：“日本不该胡乱排除第三国在华的经济活动乃至权益”（在兴亚院的训话），对于中国则梦想着：“国民政府也将达观大局，抛弃容共抗日政策而归于正道”（在精神总动会员的演说）。平沼的外交政策尤其具体表现于这么一句谈话上：“日本既不属于民主集团，亦不是极权国家集团中的一员。”这自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外交的烟幕弹，但自

其内幕看来,却又实在反映着日本一派有力分子的政治意识。日本的元老、重臣,一部分财阀乃至稳健派军人,皆感觉到中日战争延长下去的危险,希望能够早日结束。在疯狂的少壮派军人执意孤行已达22个月,而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的今日,元老重臣派的这种意识,自然要占相当的优势,再加以他们在日本宪法上及实权上的特殊地位,更很自然地形成支配的力量。这种支配的意识在对第三国的政策上就是表映为“亲和万邦”了。因此,日本对于德意的三国军事同盟的主张,就很自然地分成两派:其一是主张参加同盟的少壮派军人;其二是主张持重中立的元老重臣派。据我的观察,在世界两大营垒的集中未大显明以前,元老重臣派的主张是要占决定的胜利的,所以对于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不敢悍然参加。

然而日本元老重臣派的主观,终久是阻挠不了客观情势的发展。世界的情势已进到相当于欧战前的“同盟时代”,协约国与同盟国集中化的结果爆发了欧战,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已很逼切,各国的备战已达相当高度,各国外交的纵横捭阖正如欧战前的紧张,事实上,日本既不能中立,又不能加入英美法苏的集团。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参加德意侵略者的集团。因此,我敢断言:日本加入三国军事同盟只是时间的问题。

## 德意军事同盟与日本

德意两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已于5月22日在柏林签字成立，原是无可惊奇的，所奇的只是日本还没有加入，在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集团对立日益尖锐化的今日，在两集团双方皆深觉有紧密团结以实行集团斗争的必要的现在，特别是在世界各国积极备战，勾心斗角已到世界大战的前夕的所谓“同盟时代”，日本侵略者竟没有同时参加这一同盟的签字，确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日本为什么能够不参加这个同盟？（二）日本是否永不参加这个同盟？

据我的观察，日本参加德意日军事同盟，只是时间的问题，日本究竟何时参加？完全要看日本对外政策的步骤来决定，这又和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具着密切的关系，日本侵华军事的疲敝，不但促成日本内政矛盾的深化，并且造成它的对外政策彷徨无定，自从我们的抗战进入第二阶段而日本军队事实上没有更大的进展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即



陷于极大的苦闷中，少壮军人虽然仍梦想着武力的“征服”，但是受过较多事实教训的元老、重臣、政党、一部分财阀及稳健派军人，都为着安定日本后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起见，主张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于是所谓“亲和外交”遂又实现于新内阁首相平沼的言论上。起初，少壮军人的气焰也曾稍被压服下去，所以板垣以下的军部跳梁汉，缄默了一个时期，没有发表过意见。早日结束中日大战，运用武力既不可能，自然要采取政治的手段，但，直接与中国抗日政府谈判既不可能，自然需要一个第三国出头调停，这个第三国当然以英国为最适宜，所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到上海来和驻华大使寇尔聚谈，不过，结果完全出了日本意料之外，对中国抗战抱着热烈同情和坚决信任心的寇尔的意志克服了克莱琪所想像的不可能的期望。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对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试探的答复，又打断了调整英日关系的希望，平沼的“亲和外交”，事实上又陷入泥淖之中，日本外交又一度碰了壁。

日本所以不敢率然参加德意日军事同盟，元老重臣们所以坚决反对参加这个同盟以免开罪于民主国家，是完全受到这一阶段“亲和外交”的意识的支配的。

然而，客观事势的发展，却又使日本元老重臣等如意的算盘不得不紊乱了，因为中日大战的结束，除了日本军队全部退出中国之外，就只有彼此死拼到底，并且要把关系密切的第三国卷进漩涡去，英国既不能为日本所利用，结果还只有一个打，于是少壮派军人的手势又来得更耀目

了：华北、华中及华南各战场增加了不少的新军队，日本海军积极经营太平洋的海军新根据地，如华南各据点，日本空军又是惨无人道地到处大肆其残暴的轰炸，另一方面，日本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及《读卖新闻》等，则大做文章，先分析侵略战争的新阶段，继而讨论对付第三国的课题，终于得到既不亲和就须加以排斥的结论。近来中国沦陷区排外排英运动的普遍化，日本舆论之更积极攻击英法苏，以及阴谋对上海租界加以外科手术，悍然在鼓浪屿登陆横行，严密封锁中国海岸，干涉外国轮船等等都可证明日本对第三国的外交方针的确已在开始变化了。

最近日本屡次举行的五相会议，结果如何虽未发表，但其关心于欧局的变化，并谋确定日本新外交政策的方针是事实。依我们的推测，日本终局不能够逃出“同盟时代”的圈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各国外交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结果分成同盟国与协约国的两大营垒，到形势明朗化后，大战就爆发了。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积极准备阶段，各国自然也已“同盟”的名目渐渐集中化，最近几天这种集中过程确已有明显的变化，自德意军事同盟缔结以后，英法受了极大的刺激，而英苏的谈判有更积极的发展，相信将必奠定反侵略阵线的基础，把反侵略国家及有被侵略危险的国家集中团结起来。

英苏法军事同盟的影响将不独限于欧洲，其必然的结果势将远东卷入侵略与反侵略两集团斗争的漩涡中去。所谓军事同盟的基本条件，当然要“在绝对相互动作的基础

上决定三国共同的措施”(所传苏联提出的条件),其意思就是说: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侵略时,其他两国应即出而援助,在远东有被侵略可能的国家,已不独限于苏联,英美法的危险性尤其大,日本最近竟公开宣称对上海租界有施以外科手术的必要,英美法太平洋上的属地恐怕也要受到外科手术刀的洗礼吧!这样一来,将更促进日本与英法苏的对立。

另一方面,希特拉要求日本加入军事同盟,将更逼切,他甚至不惜对日加以威胁利诱,日本政府内迫于少壮派军人的威胁,外制于德意帮凶的威胁,“亲和万邦”的政策既不可能,在两大营垒的对立情势又不能孤立,结果将必走到应走的路程上去,加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或更广大的世界法西斯集团军事同盟。

(1939年5月23日)

原载1939年6月9日《广西日报》

## 日军南侵北攻下的新出丑

日本侵略军事自在中国内地各战场上无法再进展以后即移其枪口于中国南北的边境。其作用与其说是对中国,倒不如说是对第三国。这里含着极浓厚的国际意义,同时于军事问题之外还具有政治的成份。

在国际关系发展至同盟时代的今日,欧洲侵略首凶的德意,更觉有赶快更严密缔造侵略阵线的必要,但自德意军事同盟成立而日本竟未参加以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于日本政府特别是军部,颇感怏怏不快。另一方面,日本传统二重外交的阵营中,军部自可以不管日本政府整个外交方针如何,而另外和外国进行不同的勾结。日本军部欲讨好德意的欢心,一方面暗中与希特勒及墨索里尼进行军事同盟缔结的磋商,一方面又于南北发动军事行动响应德意在欧洲的横行。

6月间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曾与希特勒磋商日本参加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当时希特勒的要求有三:(一)日本赶快参加三国军事同盟;(二)日本海军在华南等地发动

战事，威胁英法，牵制英法的欧洲行动；(三)佯为进攻苏联以离间英苏，另一方面积极压迫英国，务使英苏法三国协定不能正式成立。闻大岛当时满口答应。然而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的消息为东京日本内阁所知悉后，引起了文治派与武功派间的极大纠纷，结果首相平沼拒绝加盟，板垣则加以威逼，小矶更从中操纵，日本政界起了一大漩涡。

但是无论东京政界如何波动，日本海军居然在鼓浪屿发动事件，果然如希特勒的要求，干得有声有色。可惜英美法海军的联合行动，倒把冀图侥幸的日本海军军人先兵后礼先军事而后外交的幻梦打个粉碎。继上海事件之后，日本在外军人又大丢一次脸。日本海军依然出了希特勒意料之外，仍旧没有用。

希特勒尤其对日本陆军失望。据说，希特勒对大岛说过一句“痛心话”！日本陆军侵华作战的失败，需要十六七年后始能恢复元气。陆军主脑自然大感不安和不快了。于是为争一口气并且响应德意，遂向苏蒙挑战。在这战争中，日方虽然大吹其牛皮，但是事实却又证明：日本皇军又是一次大出其丑。日本飞机在第一次向苏蒙侵犯中被毁了65架，第二次又发动60架去侵犯，结果又被击落25架。

日本政治和军事方针已起了相当的慌乱，“皇军”在中国各战场碰了硬钉子，其北进对苏联，南侵对英美法荷更要碰到强硬的钉子。英美苏法必须有深刻的自信，日本现

阶段的一切军事行动只是虚张声势，恐吓恐吓罢了。其间存着的唯一的危险性只是英法有时会受了日本的威逼利诱起了惶惑而已。东京谈判已在进行中，但是日本的任何酷刻要求必不能使英法美接受，是又各国自己应有的觉悟！

原载1939年7月《战时日本》的2卷第5期

## 日本军事代表团赴德意

日本侵略者最近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德意(28日抵港转欧),据日方所宣布表面的消息,其使命是在参加9月2日至11日德国纳粹党大会及10月2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罗马进军纪念大会。但据各方特殊消息及我们的推测,问题必不如是简单。这次被派遣人员当中,有前华北日军司令寺内寿一及前日本海相大角岑生,并附有陆海空军军官多人作为随员,其用意所在是不难想见的。若只为参加庆祝大会,则有驻德大使大岛中将,及驻意大使白鸟敏夫,已够资格了。日本此次军事代表团之遣派实含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寺内曾任驻德武官3年之久,有老牌“德国通”之称;大角也曾任驻德武官,也有海军老牌“德国通”之称。又在代表团起程之先,已有一批军事专家先行秘密赴欧,盖欲先着手于欧局的研究,以备军事代表团到后进行各种军事谈判。

很显明的,日本这次军事代表团的派遣,是应希特勒的要求准备加强侵略集团的勾结,日本与德意的军事同

盟,或者将由日本军事代表团具体缔结成功。观察日本内政最近的演变及少壮派军人指挥下日本外交最近的作风,日本之加入军事同盟,似是侵略者勾结更高发展的必然归宿。最近日本内部,少壮派军人与元老重臣财阀之间曾发生尖锐的磨擦,“六月暴动”在战时既不便于发动,则处于元老重臣特殊地位压抑下的少壮派军人,自然另找控制办法于外交上。他们侥幸又得于恐吓英国的策略上收了相当的效果,即秉承元老重臣财阀意旨的平沼,事实上也无可如何。

日本疯狂的军人到战争第三年的今日,也已觉出侵华战争是一樁极艰难的“事业”,而在这种艰难的后面还有更艰难的几着棋跟着,国际风雨日益加紧,希特勒劝日本勿再耗费陆军于中国战场上,因截至今日日本在华的损失非经十七八年不能恢复元气,即欲日本保存多少实力以对付英美法苏。所以,日本军人最近的作法,是缩短“板垣停战线”,而着力于应付国际纠纷的准备工作,少壮派军人所以毅然企图强化德意日的军事合作,原因即在于此。近来日军及与军人勾结最密的有田外交当局,特别与英国寻仇生非的原因,也在这里。此后,日本不但要在外蒙边境冒险,或者还要进一步在太平洋上发疯呢!

然而太平洋上的风浪并不太平,英国虽对不起为她保卫权益的反侵略实行者的中国,对侵略者的日本表示相当让步,但是日本要碰到的难关还是层出不穷的:第一,英国虽表示某程度的让步,但他能否根本放弃远东的权益,还



是绝大的疑问,我们无宁相信,英国是在运用它的政策。第二,美国不能追随英国的远东政策,已于昨日宣告废除美日商约的壮举上充分表示出来,对于决定太平洋前途及中日大战胜负,举足重轻的美国,既准备以有效的办法维护其本国在华的权益,英国谅亦不会再妄自菲薄了。第三,不折不扣而忠实执行他“给与侵略者加倍打击”的政策苏联,已在蒙伪边境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决心了。日本军人欲借对外冒险的侥幸成功镇压元老重臣财阀,但其结果倒反会因对外冒险的失败而增加国内活动的困难。

日本侵略者之加强德意日军事合作,已不成问题,吾人要特别提醒的是:民主阵线支柱的英美法苏,应有更深刻的觉悟,考虑如何去利用日本内部的矛盾。

原载1939年8月《战时日本》第2卷第6期

# 美日斗争的新开展

## 一、日本对美态度的转变

自从7月26日晚上美国国务卿向日本驻美代办送致通牒,宣告废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条约以来,日本方面虽然愤慨,日本驻外军人虽也鼓动傀儡反美,但其根本态度仍不失为慎重镇静。但在这镇静当中,逼于客观情势的发展,事实上却酝酿着一种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又足以增进美日两国太平洋斗争的剧化。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的消息到达日本时,日本各界也会一度相当冲动过,日本各报著述评论,指摘美国此举为“非友谊的举动”,经济界评为“经济竞争之开始”,甚至如外务省美国司司长芳泽,接到通牒时表示“十分遗憾”,并谓:“如美国一日继续坚持其目下对日的态度,则纵使美国提议另立新约,也难期获得满意的结果。”另一方面,蛮干成性的日本在外军人对美国侨民的侮辱事件,也是依然日有所闻。山西连续发生排美事件,霍县的美籍教士竟被驱逐

出境。岳阳的美侨也与英侨同时被驱逐而住宅被侵占,同时美孚洋行油池更被日军烧毁。河南信阳城内竟于8月5日遍贴排斥英美的标语,是为以前所没有的事例。但这些言论和行动,还是一种因一时愤慨激起的局部的疯狂行为,还不是决定的基本的态度。在这些狂妄的言论与行动当中,还包含着慎重、镇静,讨好美国,希望美国态度好转的因素。日本官方认为在东京英日谈判中,美国此举是“要英国检取火中之栗”。他们还表示:如美国愿乘废除美日商约的机会,重新确立美日的关系,则日本准备接受。日本民间也认为废约效力须6个月后,其间尚有订立新约的可能。这种情形比之数年前美国实施“限制移民条例”的消息到达日本时日本国民疯狂至于“割腹”的情状,真是镇静多了。即连驻华军人及官宪也都客气些,最近黎查斯夫人在天津被日军批颊后,日本领事及北平日本大使馆即向美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道歉。这也是日本态度持重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讨好美国的余音。

然而日本对美国所抱幻想已有逐渐消减的可能。今日东京的外讯,告诉我们:“日本现正准备对美国最近废止美日商务航行条约一举,加以有力的答复”。该项消息又称:《朝日新闻》揭载日本外务省现正与某特别委员会联合开会,讨论日本将来对美政策,该报并谓新政策将为一“有力者”,俾以应付美国的态度。当然的,疯狂侵略者总会想到:20多年来日本向美洲侵进及活动所引起美日的尖锐对立,必然促使美国设法压制日本,特别是目前日本阴谋排挤美

国权益完全出于中国之外,美国更有加以制止的必要。这是侵略者日益孤立化的悲哀的自觉,同时又是国际冒险者在无轨道的妄动中要更进一步蛮干的起点。

## 二、美国准备制裁日本的动机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虽然还不能算是制裁日本的实施,但却可以说是制裁日本的准备。此项只查察美国国务卿送致日本驻美代办的牒文及美国国务部的宣告,即可窥见一斑:“……基于目前形势之进展,美国为求较为有效地保护美国利益及为利便新的考虑起见,特提出通告……”(国务卿牒文)，“美国决废止1911年美日商航条约,藉为禁止运载原料赴日先声”(国务部的宣告——华盛顿7月27日路透社电)。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记者的谈话,也有同样的表示。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的用意在于准备制裁日本,再自废约的动机考察更可明了。美国废约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只就最近的四种动机分析看,即可理解美国准备制裁日本已经非常明显,并且这种用意目前即已发生效力,无须乎等到6个月后。

美国政府突然宣告废除美日商约的第一种动机,在于造成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提案发生效力的前提条件。毕德门是美国痛恨日本侵略者同情中国被侵略者的第一个人。自我对日全面抗战发动后,毕氏即便大声疾呼世界各

国设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要求美国早速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便于不战而使侵略者就范。最近在修正中立法案被搁置后,更加急忙地提出禁止运输军火及各项原料品供给日本的提案。但是这一提案要发生效力,其前题条件须废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条约,取消该商约所加于美国的条约义务,因为美日商约规定美日彼此对于贸易不能以歧视加之对方,而毕德门提案恰与此项规定抵触。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搁置毕德门的提案的理由,也就是这个现行美日通商条约的存在。美日商约今日被宣告废除,即6个月后的1940年1月26日以后,条约即告失其效力,明年一月间美国国会重开时,毕德门提案即可提付讨论而获得通过,并实施禁运。

宣告废约的第二种动机,可以说是对东京谈判进行中的英国提严重的警告,并劝日本勿苛求过甚。在东京英日谈判中,英国实已出于日本意料之外(港地日人自己之宣称)步步退让了。在允许引渡刺程案四华人,违反中国国权之点,第三国还可忍受,但是日本要求交出天津存银及禁止法币之使用,若为英国所承认,则第三国将受贸易上巨大的损害,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甚切,当然不能默认。在英国节节对日退让的时候,美国即再三表示不能苟同,不能置身局外,含有警告英国的意思。英国不能领会,美国遂以实际的行动表示意志。《纽约泰晤士报》华盛顿访员说得好:美国总统此项紧急措施“无殊向日本及世界宣告:关于天津事件,英国纵或可以让步,但美国之政策不能与英国

相同”。

美国此次废约的第三种动机,在于对苏联表示愿意共同制裁日本侵略者。美苏亲善关系随远东侵略者行动之日益疯狂而有加速进展的必要及趋势。美国欲根本制止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行动并消除本国及其邻邦被侵犯的危险,固然须与英法合作,但是事实上更需要和苏联合作,因为苏联还击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比较坚定,其实力也较雄厚而可靠。因此,年来美国对苏贸易关系日益进展,美国且为美苏亲善进展前奏而改进两国的贸易关系,决定延长美苏通商条约一年。在美苏商约延长条约未签订以前,率先宣告废除美日商约,其用意即在于对苏联表示好感,表示美国愿意与苏联采取共同步骤制裁日本,使苏联肯签订较有利于美国的美苏商约(新约规定:苏联每年最低限度须购买美国货物800万磅,而苏联对美输出额不得超过400万磅)。

美国废约的第四种动机,在于紧急报复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侵犯及对美侨的侮辱。一年来美国在华北的权益,特别是青岛方面的权益,日被侵略者所侵犯。这些权益最近更因日本掠夺华北经济政策的实施而有完全丧失的可能。自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而英国隐忍顺受及英美法不能联合抵抗以来,日本的狂暴军人更感觉到:不但英国软弱,即美国也未尝不可欺。所以许多暴行与侮辱不但加于英国侨民并且加于美国侨民身上。美国侨民之受辱事件就日有所闻了。7月3日驻扎芜湖的日军,曾以手掌猛掴一个美国侨民,一个美童,及一个加拿大妇人,引起了美国人士

的愤恨。这是美国宣告废除美日商约不几天前的事。因此即谓美国此次之废约为日本侮辱美侨所激成，并为美国保护在华权益的严重表示，也未常不可。《纽约泰晤士报》论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事称：“美国不仅欲维持其权利，且愿以报复行动作为日本所干犯的权利的后盾”。该报又称：“美国此举之意义即在于表示：倘日本令其在华士兵，不断地搥美国人民之颊，藉以故意令美国在远东丢脸，则远东全体人士，必须明了美人将以强硬态度保持其权威……”（纽约7月27日路透社电）。这是代表美国民意的言论。

### 三、美国宣告废约的直接影响

美国这次废除美日商约，确如我驻法大使顾维钧对新闻记者的谈话，是“一种合时与勇敢的行动”，本刊也于前两期著文，标题《美国宣告废除美日商约的壮举》，估量过它的效力，我们相信此举对于英法维持远东均势的急性打下一针兴奋剂，对于维护人类正义与国际公约，对于增强远东反侵略的力量，促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必具有重大的作用。不过我们率先要承认的是：在美国这次废约宣告的直接影响当中，精神的大于物质的，政治的大于经济的。这里只缕列重要的影响，剖述于下：

#### （一）对于英国远东政策的影响

在美国宣告废约以前，英国政府虽然依旧常在那里表

示英国的基本政策不变，但是东京英日谈判中的英国态度，却是无疑地一再退让着。在日本军队封锁天津以后英国确实对日本作过几樁显著的不合理的让步。第一，英国答应地方性质的天津事件移日本东京去谈判，这无异承认英国准备和日本磋商关于中日战争的一般性的问题，也即无异表示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有改变的可能。伦敦《泰晤士报》也赞赏张伯伦这种办法为“忍耐外交的成功”。第二，在东京谈判的开首，英国即接受日本所提条件的第一条：天津不应容许华方用作反日活动的根据地。张伯伦居然在众议院宣称：将确定天津租界的性质，维持中立，英国甚至对于天津日军当局所提“英日联合管理租界”的提议答应加以考虑，并答应引渡刺程案嫌疑犯。第三，英国在7月21日成立的英日初步协调的原则上，承认“中日战争之事实存在，及日军占领区域内，日本有特别需要，以保障其本身之安全及公共秩序”。这无异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事实，并否认沦陷区内我游击队的抗日行动了，英国竟丧心病狂至此地步。英国对远东态度的软化及对日无代价的退让，已陷远东的局势于万分的危境。

但在英国节节退让的过程中，幸得美国霹雳一声宣告美日商约的废除，英国态度遂发生九十度的转变，对日态度骤趋强化。英国方面坚持只谈治安问题不谈经济问题的立场。但是日本却谓经济问题不解决不能单独受理治安问题，东京谈判遂自7月31日起一直搁置下来，现在已成破裂的情势。这很显明地是受到美国对日态度强硬的影响，如



天津问题上,据传,英方原已有意接受经济条件至某程度,后因顾虑美国对日态度之强硬化及经济问题与各国商务关系的密切(美法驻日代办皆在英国与日本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先后向日本外务省声明美法与天津法币及存银问题具有密切的关系),遂有后来的豹变。这很显明地,英国应负改变远东局势的重大责任,而美国这次的壮举却挽救这个危局。《巴黎时报》下过正确的断言,称:“某某方面相信远东局势,因英国显然的退让,颇有足以招致东方人民受害之虞。美国采取此种有力的姿态,是为挽救颓势。”这实在是公允而正确的立论。

## (二)促进远东反侵略势力的结合及加强

这一点可以从英国与美国两方面来说明。自美国宣告废约后,英国对远东软化态度即已转强,并且图谋与美国切实合作。英美法对于天津法币及存银问题的磋商,直到八月四日始有完成具体案的消息,英美法政府决定支持法币到底,以后英国的态度遂渐见强硬。伦敦《每日邮报》著文《另一警告》称:“英美两国顷正密切合作,以反对日本在华的强横政策。……强硬的词句或足令日本政府当局发生一种印象,但欲促日本军阀省悟,则势非再进一步不可。吾人必须向日本警告:英美两国手中,握有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伦敦8月3日路透社电)。这很显明的是美国宣告废约后的产物。英国政府也于美国宣告废约后第二日决定考虑废止1911年英日商务协定问题,目的在谋与美国废止

美日商约一举保持平行政策（伦敦7月27日电《大公晚报》）。国联同志会执委会也于27日通过一个决议案，请求英政府跟随美国的领导，通知日方废止英日商约。美国对日态度强硬后，英国舆论及一般人士，更加积极督责政府对日采强硬政策，薛西尔在8月1日英国贵族院外交政策辩论会上极力主张援华制日，他说：英国若采取一种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的行动，殊属屈辱难堪。薛氏更要求外相说明关于美国宣告废止美日商约事，将采取何等的平行行动。8月19日伦敦各党派各报皆一致著论严厉警告日本并督励英国政府：英国突然有坚定的表示至为重要，如英国退让，则不啻在中日战争中有所偏袒（工党《每日前锋报》），“英国政府最后似显已决定，在远东固守根基。此种立场必须予以热烈的赞助”（自由党《孟哲斯特卫报》）。《新闻记事报》更强调：英美法各国对于天津问题应采一致的步骤。

再自美国方面看，美国宣告废除美日商约后，缔结远东反侵略的势力的第一件努力，就是和苏联重订通商条约，促进美苏亲善关系。8月5日华盛顿传来“美苏同意延长商约一年”的消息。美苏新商约的规定是于美国大有益处：苏联每年最低限度须向美国购买货物800万镑，而对美输出的煤斤不得超过40万镑。美国每年可以多销售800万镑的货物于苏联，而日本侈言对美国输日商品的报复手段，也自归于无效。美苏新订商约的最大作用还在于远东的政治意义上。美苏现在已成安定太平洋局势的重心，他们能

合作,则远东侵略者不难使其就范。特别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成立后,苏联减少欧洲后顾之忧,美苏远东的力量将更雄厚。日本军阀最近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德意,企图促成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实现,其目的在使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牵制苏联,使苏联不能兼顾东方,以便它在东亚横行,圆它“亚洲为亚洲人所有”的幻梦。但是德国早已看破了日本的纸老虎(希特勒曾对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讲过:日本在侵华战争上陆军的损失,非经十七八年不能恢复),所以站住实利主义的立场,它宁愿特派里宾特罗甫赴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它都不痛快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日本所受到的打击,将不在犹豫延宕英法苏协定的英国之下。远东苏美力量的加强,英法荷等国也自俯首加入远东反侵略阵线了。

#### 四、美日斗争的展望

美国宣告废除美日商约,固然还只是制裁日本的前提,未到实际制裁的阶段,但其影响所及,已如上述,形成了制裁日本的基础,以后美国果敢地实施制裁到如何程度虽尚不能预言,但是美国将与太平洋诸关系国家合作,在这基础上建筑制裁日本侵略者的包围阵,却是可以断言的了。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找得论据的端绪。

先自美国当局宣告废约后的措施加以考虑。美国参议员凡登堡提议废除美日商约的用意在于为毕德门提案(授

权总统,禁止向违背九国公约的任何国家(指日本)输出战用品)辟一蹊径。凡登堡的提案中,并且主张1937年的比京大会复会,以决定日本是否违犯九国公约中关于尊重中国政治领土完整的规定。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宣告废约的目的及其此后的措施,将不只限于商务的范围。美国中立法修正案虽然已因孤立派的顽迷而被搁置,但是孤立派所恐惧的是参加欧洲战争,或任何战争,美国对于日本的制裁却未必就马上变成战争;美国尽可以不战而制服日本,即连孤立派人都都明了,他们甚至不很恐惧美日的战争。这次废除美日商约的提案者凡登堡,是美国现政府反对党的共和党首领参议员,以及此案竟然得到孤立派一致的赞同诸点,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美国宣告废约的第二日,华盛顿方面即传出一种消息,美国财部对于日本进口货之以倾销方式与美国货物相竞争者,行将有所措施,而尤注重于日本棉织品进口的限制。其实施的程序是:(一)日本船舶寄碇美国各港口者,加征海港税;(二)日本货物推销员限制进入美国;(三)禁止以军械与军用品运往日本。这种消息又告诉我们:“凡此种,要当以日本在华如何对付美国利益,暨美国舆论与参议院是否决心有所作为为转移”(华盛顿7月27日电)。自此后日本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的趋势观察,日本之不能尊重美国在华之权益,当与其蹂躏英国权益一样。只要这种事实存在,美国参议院及一般舆论当然支持政府的方针。美国政府宣告废约旬日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

德门重又发表声明，称：“如日本对美国人在华的权益，不更改其排斥的态度，则美国议会将授权总统，采取报复办法。”毕氏更强调声明：不承认日本建立“远东新秩序”的要求。又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对日强硬之点，意见完全一致，国务部的远东外交活动自能顺利（8月7日华盛顿电）。

其次，美国舆论对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商约的一致拥护与制裁的督促，也是美国积极发动制裁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施政方针大部分决定于民意。华盛顿《明星晚报》曾著文作冷静之评论，美国人士视为美国舆论的代表，其言有曰：“政府此举必为国人所拥护。查美国权利遭人蔑视，迭经抗议卒无效果。美国出以非常的忍耐心，历两年之久，特吾侨民迭受袭击，吾国依据条约的合法权利迭受侵犯。凡此种种未便长此容忍，即日本掌握政权的狂热军阀，亦所念知。一言以蔽之，吾国忍耐心，已达极度”（同上电讯）。美国政府宣告废约的第二日，《纽约泰晤士报》即著文称赞为“一种坚决的政治行动”，该报且极力鼓励美国政府称：美国国务部此举是向日本及整个世界宣布：美国无意追随英国，接纳日本的要求而表屈服。美将以其全力维持其在远东的威信（7月27日纽约电）。

在美国未宣告废约前，“美国反对日本侵略委员会”主席，格林即责备美国政府，称：“美国现以原料供给日本，殊属破坏九国公约”。美国人民更时常指摘说：倘若在华作战的日本军队，更换了美国人，那末就无异美国在中国作战，因为日本军队所用的军火大都是美国供给的，美国对于日

本侵华,应负重大责任。

美国人民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对付日本,正与英国的人民一样,而美国民意之表现于政府的施政方针上,比英国来得快速而切实。伦敦《新闻纪事报》曾就英国民意研究院及美国民意研究院测验两国民意的结果,作结论如下:“日本侵略中国,是英美两国共同关切的事情,两国民意测验的结果;英方主张以强有力行动维护其在华利益者,共占59%,主张无所举动者,仅占15%;美方主张强硬对日者,占57%,主张无所举动者,共占25%”(7月24日伦敦电)。美国人民过去比较关心欧洲问题,但是此后将更关心太平洋的问题。上海英文《大美晚报》8月1日曾著文,题为《美国在远东的命运》,警告其本国政府及人民有如下的警句:“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固不止投资,商务,与菲律宾的命运而已,美国的正确利益在于民族的前途。因为美国的国家命运,将必受太平洋西岸事态进展的影响与支配。”

“试从客观上将太平洋局势的中心点加以检讨,便知其势有必然。查太平洋的东岸,有美国民族13,000万,加拿大民族1,000万,及文化水准较低的南美洲拉丁民族4,300万人;而在太平洋西岸,则有庞大的亚洲民族6亿人,已感到地小人稠与矿源缺乏之苦,倘若这个民族在武力统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联合起来,则太平洋的血战,自所难免,美国及其较弱的邻邦,将遭遇强烈的压迫”。

倘若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一旦告成,则日本人之向外发展,将非用武力不能制止。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土地,因

日本强盛而无法保全,于是日本的势力可以扩展到北美阿拉斯加省之西40里之地。

因此,太平洋问题,就是其远大处着想,有明显的三大结论:

1、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所受根本影响,比欧洲诸国为尤甚;

2、在列强中能与日本在太平洋上作实力对抗者只有美国,故美国为本身的前途计,应领导各国,抵抗这种威胁;

3、日本现任的侵华政策,尚可以用联合经济制裁及外交方法加以制止。……如果日本侵华政策侥幸成功,则美国只有准备与一更强盛的日本争取控制太平洋的地位,而争衡的结果,就历史过程看,就只有出于一战了。

第三,再就美国近年来积极经营太平洋的努力加以考察,也可以明了美国重视太平洋西岸的事态,甚于重视大西洋彼岸的事态;其决心与企图独霸亚洲因而直接威胁美洲的日本决斗,以保全其民族的存在,也可以在这里看出。“美国通”的日本人,河上清最近著论,称:“今日的美国已为扩军热所泛滥,美国人差不多90%的压倒的半数,皆要求着庞大的军备”(据《美国为什么武装?》)。即鼓吹美日亲善的埃哈斯顿也都承认:“美国陆海军全部经费的半数或

将近三分之二的金额，投在太平洋方面”（据美国《现代史料》6月号《太平洋彼岸的和平》一文）。

美国近年的军费确有飞跃的增加，1938年度为106,570万美元，1932年度只有66,780万美元，其增加数将近一倍（据日文《经济学者》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国本年度的军备费，更有惊人的增加：本年度岁出总额比上年度减少49,600万美元，而一般国防费却反增加了10,900万美元，本年度还特设“特别国防费”一项，其数目为21,000万美元的巨额（大部分用于太平洋的军事建设上，只巴拿马运河补强费即比上年度约略增加一倍——据日文《经济学者》昭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然则美国为什么需要这样庞大的军备，特别是太平洋方面的军备呢？上引亲日论客埃哈斯顿坦白承认：

“说为防御苏联横断西伯利亚以攻击美国领土而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的人，没有一个。无论怎样的恐英病者。也都不会说英国因拥有星加坡的海军根据地，或在澳洲及新西兰拥有利益，所以在太平洋上威胁美国。再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建筑空军根据地，绝对不能说是为着预防他和加拿大的纷争。然则美国为什么将其大部分的舰队及空军派往太平洋演习呢？那完全是因为美国预想着什么时候美国总须和日本战争”（上引论文）。



美国已在太平洋上积极强化了军事设备,不但美国的军舰已极力扩充,和八年前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形完全两样,阿拉斯加半岛及夏威夷的军事设备也已加强,关岛设防案虽然没有通过美国议会,但其将建筑成为美国的星加坡,却已成为美国一般人民的要求。今年4月中旬,美国总统并将大西洋的舰队调回太平洋,最近不断地演习海战及空战,其增强太平洋的威势,以便制止侵略者的疯狂行动,已可以想见;美日太平洋上的斗争,将由此渐趋尖锐化,更可以预断——除非日本侵略者因为孤立情势的发展而对英退让对美屈服,一如其对苏联的再三“屈膝”!

关于预断美日新斗争的必然开展,我们还可以追溯既往的历史。“美日战争”一语二十多年来即常挂在日本人的嘴唇上,“敌视美国”的观念,在日本人脑里并不比“苏日世仇”的观念淡薄。美国对于日本的态度,素来即不示弱。特别自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而破坏了太平洋的均势以后,美国对日的态度更为加强:当时即有史汀生不承认主义,驾英国以次各国的态度而上之,去年10月6日及12月31日,又有两次对日强硬抗议,也是太平洋抗争史上罕见的事例,结果逼得英法不得不追随美国向日提出同样性质的通牒,美国从那时候起显已取得了太平洋反侵略阵线的领导权了。美国自这次宣告废除美日商约以后,其太平洋上的威势更见振作,苏联自己忍受较为不利的新通商条约的规定,以示追随美国的美意。今后的问题,只在于美国怎样运用这个日益增高的威势。美国能够善用她那唯一足以

与日本对抗的实力(《大美晚报》上引论文的意见),则将如  
毕德门前年的预言,“日本侵略者不难就范”!

(1939年8月26日)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2期

## 苏德协定与日本

### 一、德国遗弃日本?!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已于8月23日晚上,由里宾特罗甫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宁宫,举行签字,并约立时发生效力。苏德协定的内容,极其平凡,概括一句话,就是缔约两国互保和平,所以没有什么可讲的,问题只在于这个缔约的运用。

苏德协定是在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实现的,给与世界各政府的冲动自不消说,即对于整个国际政治也给与了急角度的转变。这个协定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固在于民主阵线领导者的英法和苏联的合作犹豫不决,迟迟不前,另一方面则又由于世界最聪明而又最狡猾的侵略者希特勒,看穿了东方帮凶的日本,实已不过是只没有骨头的纸老虎,对于他在欧洲的活动不但不会有什么帮助,反足以刺激苏联对他加以压迫,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我想后一种原因占更大的成分,因为苏联虽不敢与任何国家启衅,但却坚信德国目前决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我们可知德国遗弃

日本之念,不是萌芽于今日,其由来恐已相当久了。

我们相信德国之所以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并准备订定军事同盟,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利用日本进攻苏联,牵制苏联西顾协助英法保障东欧诸弱小国家。但是日本这位不肖的朋友,并不完全听从希特勒的命令,不攻苏联而侵略中国。若改换一个说法,或者说日本相当聪明,知道这只“红鹅”的厉害,惹不得,所以进攻苏联始终是虚张声势,正和德国在欧洲声言进攻苏联一样。但是希特勒却因此大失所望。他早就再三警告日本:勿多消耗兵力于对华战争上呀!最近更不客气而坦白地对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讲:“日本在中日战争上消耗的陆军兵力,已非十七八年后不能完全恢复原状”。希特勒遗弃日本之念头早已萌芽,加之日本因其内部元老重臣财阀派与少壮派军人的矛盾,使日本不能痛快敏捷加入德意军事同盟。

## 二、轴心国家的破裂

德日不能密切结成一体,缔结攻守同盟,是客观情势所决定的。我早在四五月间即反对德日军事同盟业已确立之说,并主张日本的二元外交阻止这个同盟的实现。当时各方面皆主张德日军事同盟事实存在说,并否认日本的二元外交。我当时的意见就是:“日本和德意两国固然在军事上联结着紧密的关系,甚至在事实上彼此已有军事合作……但是这些事实还只是军事意义的合作,还与其他没有

军事同盟的国家间发生的事实一样,还不能够遽行认为军事同盟的事实。……日本对于德意还没有负着军事同盟的条约上的义务”(详情参阅本刊2卷4期134页)。同时,我又主张:“日本没有参加德意军事同盟的原因,虽如大家所阐明的,是因为日本对英美法玩弄外交手段使然的,但这只是一面的观察,此外还有一面的原因,就是元老,重臣,稳健派军人及一部分财阀极力的阻止。这种事实反映着日本政治的复杂性和外交的二重性。……日本的二重性外交,已是日本数十年来的外交传统。这次日本少壮派军人极力排除英美法,主张立刻加入德意军事同盟而另一方面稳健派则仍在调和日本与英美法的关系,保留立刻加入德意军事同盟的作法(同上)德意的裂痕早即埋伏在这里。”

希特勒窥破日本这种政治机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又看穿了日本陆军兵力贫弱化的事实,所以打定了主意:与其追求一个进攻苏联扰乱美法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倒不如设法缓和强有力的压力,便于自己对英法来个较为自由的行动。于是希特勒断然主动要求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即令这个协定的内容非常平凡,但总比日本一个虚张的声势还来得有力量。于是德日的轴心,开始破裂了。

德国准备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事前并未与日本盟友商量,只于“德外长赴莫斯科之前,曾告日驻德大使大岛,声称苏德不侵犯协定,乃为对付英法进行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对但泽所加压力的紧急措置,事出仓卒,不及向日本通知,极为抱歉”(平沼首相8月24日向内阁参议会的

报告)。德国目无日本，自然难怪被弃的日本极度愤慨。苏德协定签字的当日，“日本即决定打消参加德意军事同盟之议”(8月23日下午平沼首相与陆相板垣及枢密院大臣近卫讨论对欧政策的结果)。24日东京各报即盛称“德国出卖思想同盟”，比较纯洁的《朝日新闻》也抨击说：“德国现已显明地违背了反共协定之纸面与精神使其变成废纸”。25日平沼首相更加极度愤慨地宣布：“由于苏德缔结互不侵犯协定，德国肺腑已经洞悉，6月5日阁议所决定强化防共轴心的对欧政策，应予废弃”。同日《读卖新闻》称：“德国不顾反共协定之存在，事先亦未与日本磋商，冒然与苏联缔约的行为，其破坏国际信义的罪名，实属无可逃避，现反共协定已毫无意义”。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更悲愤地加以攻击，称：“苏德缔约的结果，使反共协定变成废纸。反共协定为集团反对苏联者，故与苏德缔约内容相抵触。意国今后的政策，自将步德后尘，故德意两国现已不复为日本的同盟国了。”

素来主张轴心政策最积极的日本陆军当局，不但对德意完全失望，陆相板垣听到平沼首相宣布“决定打消参加德意军事同盟之议”时也垂头丧气，唯唯称是，并且更过一步拉拢反对参加德意军事同盟的海军当局，接受海军军务局长井上“自主态度”的主张(8月23日陆军军务局长町尻访问井上的结果)。

德日轴心的破裂，已成确定的局面，这自然不是日本政府对德国政府的抗议所能挽回的。

### 三、苏德协定对远东的影响

苏德不侵犯协定，对于欧洲局面发生极大的影响，但对于远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尤大于欧洲的局面。而对远东的各种影响皆直接及于日本。

苏德协定对于远东的第一种影响，当然要首推日本内政外交的激变。这个协定首先改变了日本依赖德意的政策为缓和英美法苏的立场。这不但是对欧政策的新姿态，同时也是远东政策的新起点。苏德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分歧对立的日本五相的意见，竟然趋于一致，赞成平沼所主张“以独自的立场应付新事态”。日本不但放弃了德意两国轴心国家，并且亲英法的倾向相当浓厚。8月24日东京外讯即传日本政府已向英国提出保证，谓：政府已训令日本在华各当局，压制各地反英运动。已经破裂的英日东京谈判，且有由日本政府要求再开的消息。日本以前的政策，想利用德意在欧洲的捣乱，牵制英法，以便他在远东尽量压迫英法势力，使英法与他协力，收拾“东亚事变”，圆他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梦。但是现在已为德意所遗弃了，其收拾“东亚事变”的手段，自须改采新方式，已不能对英采取压迫的手段而须改为拉拢的手段了。这是由排斥英法变成拉拢英法的由来。

然而日本内政却要因为外交的这样激变引起莫大的矛盾与纠纷，平沼内阁原来就是秉承元老重臣稳健派的意旨的亲英美缓和苏联的政府，苏德协定成立后他即于口头

上把依赖轴心政策一扫而光,主张“独自”的立场,但是结果终难免于内阁总辞职的悲运,这不消说是少壮派军人逼成的局面,也即在说明:亲英美缓和苏联的前途还不平坦。平沼内阁在其总辞职的声明书里称:“今欧洲形势突然变化,苏德缔结互不侵犯协定,为适应新情势,日本政治必须‘更始一新’。”同时,新首相阿部信行的广播演词及谈话中的所谓“日本将以彻底的‘自主立场’应付万变”,“对复杂多歧的国际现状,日本坚持‘独自’立场,向‘自主所信’迈进”,和平沼在苏德协定成立后的主张,乃至以前所宣告“日本既非民主集团的国家,也不是极权国家集团的一员”,并没有两样。

日本目前的政治主潮,确实需求着亲英美缓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在新内阁的构成分子中,表面上也不少亲英派,但是阿部内阁却和大改组后的近卫内阁不同,虽然“对外施政以阿部个人为中心”(东京8月30日外宣),但是阿部未必就是宇垣一成、文治派亲英人物的重光葵,虽有出任外长的呼声,但是本人迄至现在尚未接到任何正式的命令。另一方面,阿部30日广播的外交政策,也只说:“欢迎第三国协助建立‘东亚新秩序’,如第三国欲从中作梗时,则将断然予以排除。”陆海军人对内阁的要求也称:“对欧政策基调,须彻底以自主见地,促各国协力。如妨碍日本事变处理,则应断然排除。”这无异要求英美法无条件退出远东,要求苏联旁观侵略者的气焰高涨,自然是此路不通的。

依我的观察,日本少壮派军人仍将要求政府以迫英的



手势亲英,换句话说,压迫英国来亲日。素来无视政府方针的在外军人,将更本着原来的意志前进,北平日本军人的代言报纸,现在仍在主张“反共反英”。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外交意识,依旧不能和元老重臣派的外交方针相吻合,新阁亲英的空气只弥漫于伦敦(8月30日伦敦路透社电)。日本新内阁的特色,是用军人老前辈调和稳健派军人与少壮派军人的对立,因而调和军政界各派的斗争,同时又欲藉接近元老重臣财阀的军人,稍为压抑少壮派军人的气焰。但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困难情势之前和少壮派军人不甘屈服的压力之下,日本内阁的前面横陈着两条路:不随少壮派军人无轨道地蛮干,就必激起稳健派与少壮派更激烈的斗争。阿部内阁既无赫赫的人物,此后依然是荆棘满途呀!

苏德协定对远东的第二种影响,是促太平洋情势起新的变化。从来执太平洋政治的牛耳者为英国,英国完全靠英美的平行行动及安定欧洲局势,以取得太平洋的领导权。英美的平行政策,已因英日东京谈判而发生了裂痕。英国欲安定欧洲,必须苏联协力。英法苏谈判竟经数月而未能解决,实在是英国外交的一大失败。希特勒近更扬言:修改凡尔赛和约,但泽和波兰走廊须先返还德国(希特勒复达拉第函);昨日德国军队更分三路进攻波兰,华沙已成夹攻之势。无疑地欧洲的战幕已经揭开,此后要视英国保证波兰的程度,决定战争的消长。但无论如何英国对远东的态度必至稍为软化。

在英国(因而法国)退场的反面起而代之的国家,是为

苏美两国，苏德协定后这种情势更加进展。美国制裁日本还在准备中，苏联打击日本的意志已有加强的可能。这正如华盛顿方面的批评：“希特勒减弱反共协定的力量，并在远东方面将日本抛弃，使蒙受中苏抵抗增强的威胁”（8月22日路透电）。

英法苏谈判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所提扩充反侵略阵线至远东的主张为英法所拒绝。苏联重视远东的政治意义，所以断然放开对他不利的英法而谋加强远东的反侵略力量。许多论者已经承认苏联视远东利益为第一位，而视欧洲利益为次要。苏联因为远东领土的广博多产，所以将视线集中到远东，史塔林（斯大林）的政策是要“把那荒芜和冷落的中亚和西比利亚改造过来”，他为了要加强远东的领土必须加强远东的外交政策。有人说苏联今日欧洲政策的限度“只及于足以保安他的欧洲边境为止……欧洲没有一件事能够使史塔林牺牲他在远东的计划”——据裴士（Demaree Pees）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史塔林宁择西比利亚》。这次苏德协定所表现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偏重欧洲政策的李维诺夫的辞职之下。

列强中，远东的地位及倾向类似苏联的国家，只有美国。美国人民现在注意中日大战远过于过去欧洲大战（参阅本期《美国排日运动》），美国近年来的军备偏重于太平洋的建设（参阅本期《美日斗争的新开展》）。美国人现在虽仍重视欧洲，甚至如罗总统之言，美国国防线在莱茵河，但是美国对于远东情势的发展，也特别注意，因为亚洲事态

的进展关系美国民族的兴亡与消长太密切了。因此,美国反对英国远东政策的妥协能度,政府和人民皆声援中国抗战,最近更宣告废除美日商约,借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美国近年已选择苏联为其合作的对象,逐渐推进美苏的亲善关系。上月签定了美苏修改商约,这次苏联加强远东政策,将更促进美国远东政策强化,而渐与苏联取一致的步骤。

苏德协定对远东第三种影响,是中国抗战的力量将因远东国际情势的转好而增强起来。固然纳粹东征十字军已对波兰试炮了,牵制着英法积极兼顾远东,英国对日消极妥协的可能性多少存在着,但积极的英日合作,可断定只是日本片面的单恋而已。英日消极的妥协即令成功,也于中国抗战无多大损害。反之,苏美两国远东政策的加强,却实在是中国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苏联既重视远东的利益,自要设法防卫远东的领土不为侵略者所侵犯。日本侵略者现在已在步步侵略中国的领土,对于苏联是个极大的威胁。日本并且一面常唆使许多“越境将军”向苏联挑战,一面又主张“对中苏同时作战论”,苏联事实上已和中国处于同一境遇之下。苏联不得不积极准备反抗日本,这次因签订苏德协定而巩固远东的防卫,用意也即在此。裴士说得好:“史塔林曾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从他的政策上说,这是一种必然的举措,苏联欲在远东建立新的根基,自然不能对日本的行为,视若无睹。中国能协助苏联去扫除他的劲敌,自然是他的愿望。(上引同文)”过去苏联的领袖常宣言:对侵略者的侵犯,必还以“加倍的痛

击”；苏联远东红军也已屡次对日军的侵犯，加以迎头痛击，相信苏联此后将更积极帮助中国抗战，倍蓰于以前。

或许有人怀疑苏日互不侵犯协定也有随后实现的可能，但以今日苏联远东政治立场的重要，我们敢断言：苏联必不会接受日本的提议。苏联将更积极以军火及其他方式帮助中国，是很可能的，问题只在于中国怎样接受苏联的帮助而已。

#### 四、怎样运用这个情势

苏德协定实现后的远东国际情势，确实于我有利，我们能善为运用则抗战胜利更有把握。简述其主要方针常不外乎三种：第一，奉苏美为远东的指导力量，谋与切实合作，特别是苏联更应与采共同的行动，当然也不放弃英法的友谊。第二，设法促进日本内部矛盾的发展；其主要的力量在于坚持抗战到底。第三，团结我们内部执行抗战到底。这是最重要的动力，实现有利于我的国际情势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要以这个基本条件作基础，利用远东国际情势的好转，建设远东反侵略阵线，缔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共同制裁孤立化的日本侵略者。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2期

## 日本设置“支那派遣军 总司令部”的意义

敌大本营陆军部已于9月12日下午公布所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编制，其总司令官西尾大将及总参谋长板垣前陆相，也已于26日抵沪。敌军在国外设立总司令部，在其过去的历史上只有过一次，即日俄大战当时，而这次的设置，算是第二次，其意义之重大，是不容忽视的。

吾人对于敌军在华设总司令部，第一种认识就是敌人前此的“政治进攻”已告失败。敌军自从去年10月间攻占粤汉以来，蹉跎年余，军事没有丝毫的发展。经鄂北的惨败后更觉无力前进，所以积极改采政治进攻的方策。出走重庆背叛中华民国的汪逆精卫，始得由被忽视而再被重视，拥（用）汪的空气略为增涨，汪逆登临伪中央首位的幻梦，经过一度粉碎，现又幻现，开始组织猴子班。伪六中全会8月28日在上海召集，就是这个猴子班开演的序幕，他们准备

在双十节正式开演,但未必能够实现。

据说敌军对于汪记猴子班的瞩望本来很大,汪班长给与日本的支票也非常堂皇。汪逆最初对日夸言可以拉拢到中国所有各党各派开个国民代表大会,产生伪中央政府,但是各方面拉拢收买的结果,离预定的计划仍太远,终不得不改为伪国民党六中全会,希图草管人事伪造一张招牌。然而结果完全暴露了汉奸的无力,敌人非常失望。

吾人的第二种认识,就是敌人仍欲依靠武力进攻,来结束中日大战。这次阿部新内阁的政治纲领,竟以所谓“处理事变”为枢轴,自非偶然。其“处理事变”的方式分为两方面进行:(一)调理日本的国际关系,(二)再用武力进攻,策应国际政策。依我们的推测国际的调整尚有重重的难关,日本与各国的根本矛盾绝对无法解决,所以少壮派军人的蛮干,依然要继续下去。最近敌军的连续惨败及此后新进攻的前途,让我们在“日本对华新军事攻势”短评中去评论,只是这一事进攻的重演,却已确定,并且非常的焦燥。

敌人眼看欧战暴发大可以发点儿横财的机会到来,非常地眼红、焦急,很想再温习上次欧战中以参战国得到政治利益以中立国得到经济利益的美梦。日本上次欧战中获得出超额14亿元,贸易外国际收入141,000万元,所以战前与战后比较,偿还外债3亿元,在外债权增加174,000万元,日元正币增加18亿元,共计获得385,000万元的经济利益(据田中庚夫《战争史》41至42页)。经济利益远胜政治利益多

多,现在日本特别急于获得这个经济利益。但要获得经济利益的基础在于和平工业的振兴,也即在战争的停止及备战的和缓。但是现在的情势已与上次大战时不同,日本自己已先陷于战争的漩涡中,自己要先自拔于战争之外始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日本要自拔于战争之外,在日本军阀眼中看来只有“用战争结束战争”一途,因为日本今日已不接受“三国干涉”的条件,所抱野心超过客观的情势所允许的范围太远。他们幻梦着运用更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来和世界各国周旋,但这却是一种危机百伏的恶性的幻梦。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3期

## 日本对美软硬并施

日本侵略者对美亲善的幻梦，第一因为美国废弃美日商约而起了裂痕，第二因为欧战爆发后美国积极拥护第三国在华权益而达到濒于破碎的境地。日本现在所感觉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和美国斗争，日本朝野所采方法，不外乎是软硬并施，一方面竭尽恫吓的能事，另一方面企图调整美日关系。这自表面上看，似乎是唱着双簧，但实际上又是日本二元外交的作祟。

日本的军人大多主张对美强硬，如中将佐滕清胜，竟用惊人的标题“美日战争期近”，历指美国对日“非友谊”的作法，更如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坚决声言：“美国如不改变其对日态度，则太平洋将成为战场”（东京9月29日外电），最近日本方面，甚至纷纷宣传：“如美日关系恶化，日本准备与美国一战”（香港9月23日各报）。

日本稳健派对美的措置，就缓和些，如阿部新阁首相谈国际情势时，虽谓：“英法参加欧战后，援华之手或将缩



回,但尚有他国可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援华国”,但却又谓:“余作此语,并非相信美国迅速出以援华行动”(阿部9月9日军中谈话)。闻阿部这次选拔野村吉三郎担任外相,主要目的即在于调整美日关系,采取对美修好政策,因为野村是以“知米家”及“亲米家”著名的。长久任驻美领事多年的松冈洋右被任驻美大使呼声之高,用意当也不外乎美日亲善的调整。

但自美国方面考察,则美国素来对日本持强硬态度,一切措置皆有特殊见地,既不怕任何威胁,如美国国务卿赫尔之言,又不受秋波的诱惑,如日本特别尊重美国在华权益的声言,美国置之脑后。日本的双簧对于美国,是唱不响亮的。

东京的舆论非难美国对日采“敌对行为”,指责欧战发生后,美国在远东为英法保护权益。其实,美国是对贪婪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屡次作善意的警告;美国不是为英法保护权益,而实是为自己的权益作最大的努力。欧战发生后,日本已不把英法放在眼下,排除英法权益已成日本最近外交政策的基干,但是排除英法权益,自然也害及美国。今日在太平洋上有保护权益的实力的国家,只有美国,美国要保全太平洋上的权益,也自不能忽视当前的危机。美国加强远东政策及太平洋的军备是一种自然而必要的趋势。

只有一点是美国今日应该觉悟的,就是:美国每每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战争,绝对不能获得日本的同意,所提条件必不能为日本所接纳,今日,只有中国对日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中日问题始有解决希望,各国在华的权

益也才能有保障,太平洋的真正和平才能实现,美国民族的安全才能置于磐石之上。美国为维护她在华的权益计;为保障美国民族不受威胁计,只有积极帮助中国抗战一途。吾人欢迎美国海军部派遣大批军舰驻扎“太平洋直布罗陀军港”的珍珠港!我们更欢迎源源而来的信用借款!

原载1939年9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3期

## 美日谈判的前途

日本目下调整国际关系的关键完全在于亲美政策能否成功,英法日关系之决定于美日关系固无庸言,即苏日关系也与美日关系具有关联性。但是美日关系的调整又是最难打开的一关,因为美日关系的调整又须决定于中日战争。最近日本对美调整工作之忽冷忽热,忽急忽缓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吾人在《日本外交往何处去》论文中,所断定日本目下的外交方向集中于对美外交的调整及其前途的暗礁重重,近日已渐渐表面化,日本当局已否认了对美积极谈判的意向,并且把这个问题作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后的主要课题,不但完全暴露了日本外交的无力,并且预告:日本此后外交的困难,将与其对华侵略的困难一样,与日俱进。

日本最近之急于诱和,求和,并且在求和的工作中抓住英美作媒介,但自我抗日政府把日本的和平提议一脚踢开并揭穿其谣言进攻的阴谋后,日本即使失掉了与英美谈判的根据。上月底日方正对于不久将与英美谈判兴高采

烈,但曾几何时,11月1日日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又对记者声言:“日本目前仍未有与英美两国举行正式或非正式谈判之意”(东京1日外电)。须磨这个谈话,又指中日直接谈判为谣言,为绝无根据,其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不言而喻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固然已于4日与日外相野村会晤过,但其所谈判内容却更明显暴露了美日两国在中国境内利害之不可调和性。据《都新闻》透露的消息,美国对日本表示三点意见:(一)美国希望日本尊重现存的条约;(二)美国不但不能承认日本的所谓“新秩序”,且极力加以反对;(三)美国人民极度不满日本破坏美国在中国及远东的权益。格鲁大使更率直指明:“美国绝对不能让日本将美国踢出于远东之外”(接近日本政府人士所透露消息)。

日本能够尊重美国这三种意见吗?更能够把这三点原则实施于对华政策上吗?我的答案是一万个“不”字。日本今日所要实行的工作是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所要破毁的束缚,是在国际规范上阻碍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一切公约,又在日本独霸东亚的程序上,自然要摒除美英法第三国在华的权益,美国人民的意见,自难为日方所接纳。正如美国外交协会的断言:“目前仅有两条途径可循,一为恢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门户开放,一为任令日本建设远东新秩序,而欧美各国退出远东”(5日华盛顿电)。日本不能接受前者,美国不能屈服于后者,美日谈判即令开至100回,美日关系的调整,依然残留在出发点上,或将更为增大美日间的鸿沟,恶化美日的关系。

日本目前已开始采取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了。第一，欲把美国在华权益问题的交涉，委之于未来的伪中央政府去处理，日前外相有田对记者之言“目前尚非改进美日关系的时候，在伪中央政权未出现以前与第三国进行谈判，实属徒劳无功”，实堪吾人玩味。第二，军部极力主张缓和苏联，成立苏日协定，醉翁之本意固不在酒，他们盖欲抬出苏联以威胁美国，离间美苏关系，使美国退让，美日关系易于调整。然而日本的企图依然是此路不通。伪中央政权的问题尚属未知之数，日本要苏联对于中日战争袖手旁观，也只是片面的幻想。

今日，我们不得已于言者，美国应有坚持解决更大问题的决心，防止日本前进政策，如美国外交协会所言。无论《读卖新闻》怎样鼓吹“对美关系比对苏关系尤为重要”，但是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却强调：“莫论根本的调整，即个别悬案，也极困难”（皆见东京7日外电）。美国应有深刻的觉悟，始可！

原载1939年11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4、5期合刊

# 日本外交往何处去

——亲英美可能吗？

## 一、我国论者对于日本外交的论断

日本外交的彷徨动荡，自其开国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这固然是日本政府主观力量的薄弱所致，正如日本人自己所承认，自明治政府以降日本从未有过自主的外交。但是国际政治最近变化的多端与日本国际环境的特别困难，却也是陷日本政治家于低能的主要原因。惟其如此，所以我国全才全能的国际政论家，对于日本此后外交方针的推测，也就呈现了光怪陆离的现象，甚至于有些论断几近于幻想。因此，我也无妨来谈谈日本外交究竟将往何处去的问题。

最近我国国际政论家对于日本外交方针的观察，固然极为纷繁歧离，但归纳起来可以得两大主张：其一，论断日本将加入英法集团，酿成反苏战争（香港青年记者学会座谈会的结论）；其二，日本将由德国的斡旋加入所谓德意苏

集团结成所谓“独裁国家阵线”(苏德协定成立后通行于重庆的一种主张)。但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两种推论者的考虑,皆过于深刻,后者固然是近视眼,但是前者也不过是远视者,对于目前的现实,认识皆不正确。其实,日本政界所吵闹争执的问题,也不是缔结“独裁国家阵线”的问题与参加英法集团形成反苏阵线的问题。目前他们所争执的焦点,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目的问题。他们所争论的方式及所表现的斗争,只有两种:(一)趁欧洲大战的良好机会断然扫荡英美法等国在华乃至在亚洲的权益,以便直接了当完成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大业;或(二)调整日本的国际关系,亲英美以结束中日战争,安定局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基石。第一种方针为日本疯狂军阀特别是少壮派军人所要求;第二种方针则为日本元老重臣派所代表稳健派所坚持。日本这两种不同外交方针的斗争,最近演成“一元化外交问题”,掀起了日本政界的大波。

## 二、日本外交彷徨的起点

日本各派关于外交方针的争斗虽然极其复杂错综,但就其总的情势看,却仍未离去动荡彷徨;而其彷徨的起点则始于苏德协定的成立及第二次欧战的爆发。因此,欲讨论日本外交往何处去的问题,似应自这个彷徨的起点谈起。

日本外交在苏德协定成立后彷徨起来,在欧战爆发后

更加深化,自有其划阶段的意义存在。日本几年来的外交方针是:一方面强调反苏反共以为侵略中国的口实,一方面加强所谓轴心集团的结托以威胁英法。苏联在日本侵华进攻之前是主要的敌人;而德国却是它的盟友。日本军阀或者相信:只要日本坚持反苏反共的政策,德国将必永久是日本的靠得住的盟国。殊不知希特勒早即窥破了日本纸老虎的弱点,自从德国军事代表团赴日探得日本军力的虚实以后,希特勒警告大岛大将“日本陆军在中日战争上的损失,非经十七八年不能恢复”的信念更加深刻。日本军阀尤其不能明了希特勒政治手腕微妙的所在,《我的斗争》(《希特勒自传》)尚且已在修正之中,日本之被遗弃当然不算稀奇。日本没有看清希特勒的葫芦底,所以苏德协定成立后大失所望,日本外交的彷徨与苦闷,也自从那时候开始了。

迨至紧跟而来的欧战爆发,日本外交的彷徨更加深化。因为欧战的爆发激动了日本的利欲,焦急于结束中日战争,恢复和平工业的生产。但是结束中日战争的方式,二年来即成了日本政界各派斗争的主因,现在更加急躁争执起来,致使日本的所谓“国策”莫知所措,在这际会成立的阿部新内阁的外交方针,也只能停顿在“以处理中国事变为枢轴”上面,而其具体的办法仍然“头头死道”,“此路不通”,和平沼内阁所宣布“日本外交回到一张白纸上”,事实上尚无任何区别。索性乘欧战的机会扫荡英法的势力,既为美国所阻梗,拉拢英美得罪德意又为军部所不惬意。事实上,英美法既不容易拉拢,更不容易排除;德意的旧帮手



虽无可爱惜,但也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时候的国际情势,真正苦死了日本外交当局。阿部首相的初旨未始不想调整一下日本的国际关系,但在其组阁的过程中即便受到了军部的压迫,渲染一时的亲英美派重光葵之回长外相,终于流产了,军部要求阿部任命革新派外交首领白鸟敏夫为外相,逼得阿部不得不自己兼摄,但不几何时,也终于不得不以木偶的野村尸其位而以曾与革新派结过姻缘的谷正之实握外相的大权。军部分割外务省的权限“一元化对外贸易”的企图,却又来得不顺利,素来对三宅坂(军部大本营)怒目相对的霞关(外务省),终至抬出“一元化外交”的招牌拼命招架,日本外交阵容遂以贸易省设立问题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巨波。

现在盘据霞关以为最重要堡垒的日本官僚,虽然获得了一时的胜利,军部对于阿部内阁向美国献媚向英国拉拢,虽然还没有什么断然反对的具体表示,但是军部不但没有积极的支持,并且唆使着他们的直系机关报及旁系的言论机关,对美国大肆抨击,甚至提倡“日美战争论”。解决所谓“中国事变”的成败,是阿部内阁存续与坍台的决定点,要解决“中国事变”又须以调整日本的国际关系为第一头关头。现在到达解决事变的第一个关头的路途原即不平坦,喜欢蛮干到底的军部作风,又在增加这条崎岖险阻的路途上的荆棘,而第二以次难关的难渡,将百倍于第一关。日本舆论界评为“废物收容所”的阿部内阁,能够打通这难关重重的外交前程吗?

### 三、英日妥协可能吗？

自从日军在湘北惨败而西尾与板垣的下马威大受挫折之后，军部的外交主张似稍为消沉些，阿部政府之进行其亲英美的外交方针，已在军部愿意与不愿意之下开始积极进行着了。东京英日谈判已有断藕重续的倾向，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也向记者称：“英日谈判的前途未致十分决裂，英日两国如愿解除前此的误会，亦非极难的事情”（据10月29日东京讯）。日本政府因为英日谈判之成功与否将决于美国的态度，美国宣告废除的美日商约又将于两个月后满期，所以急急于要求美国与之谈判，近闻野村外相与美大使格鲁的会谈，也将与英日谈判同时在下周举行。这是欧战爆发以来，日本对于英美的外交作法最积极的表现。

然则日本与英美的谈判能够获得日本所期待的效果吗？前途依然是不可乐观的。这点即连日本政界自己也都预料到了：“日本政界对于日本与英美谈判的前途，颇觉悲观。日方的意见，认为英美两国显有联合对日的趋势”（29日东京外讯）。是的，日本与英美的谈判，确有许多困难的原因与事实横陈着。

先自英日谈判的困难说起罢。自欧战爆发后日本对英的政策即陷于举棋莫定的苦闷中，军部主张索性采高压手段逼英国屈服，所以曾经一度风声鹤唳有进攻香港的声势，日本政府也曾以试探的手势，一方面宣言对欧战守中

立,一方面又对英法要求撤退驻华的军队。在这情势下,英国也曾被迫作过多少让步的妥协,如刺程案四华人的引渡,税关接收伪华兴票,沪西警权的一度让出,乃至假道运兵等等。日本更加得寸进尺,甚至对香港政府提出许多无理的要求。同时,日本对于法国也有同样过分的要求。但是英法在远东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与美国在远东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英法对日的退让,日本对英法远东权益的侵夺,马上损及美国本身的利益,所以日本与英法的问题,还要从日本与美国的关节上来观察。阿部首相在他初次谈国际情势时即谓:“英法参加欧战后援华之手或将缩回,但尚有他国可取而代之,成为新援华国”(9月9日军中谈话),盖指美国对日积极干涉而言,日本舆论一致攻击美国替英法保护他们在远东的权益,也就是在说明这种新趋向,即连不久将要重开的东京谈判,伦敦方面也都不能不声明其谈判内容只以天津事件为限(伦敦10月28日路透电),英国没有忘记上次东京谈判中美国的有效警告,更可证明英国与美国的联系。日本最近也已深刻觉察出这一点来,所以外交上的努力集中到对美的方面,而调整美日关系的困难,将十百倍于英日关系的调整。

#### 四、日本亲美能成功吗?

说到美日的外交调整,更是困难。在欧战爆发前美国对太平洋的积极政策,即已有坚决的自信。最近华盛顿可

靠方面已经证实一种消息：罗斯福在欧战前即向英首相张伯伦提出保证，谓：“英国对远东事件虽在欧战中，仍可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美国愿对远东采取有效的步骤”（罗斯福答张伯伦函——《珠江日报》10月30日所载）。美国的有效的步骤，自欧战爆发后即已节节发动，如太平洋舰队之西调，海空军在太平洋上之演习，日军扰乱上海租界的镇压，美日通商条约的宣告废除，最近美国大使格鲁对东京政府的强硬演说等等皆是。

美日冲突最近的展开，我在本刊前两期已经详为剖述过（参阅3卷2期《美日斗争的新开展》，3卷3期《欧洲大战与日本》及其他短论），其间确有一个不能调和的基本原因存在着。美国为要保持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能坐大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如《大美晚报》所论列），姑且不讲，即在远东权益的争执上，美国也不能旁观日本封锁起亚洲的大门来。日本现在所强调及所努力的，是“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但是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具体内容就是排除英美法苏的权益出于东亚之外，第一步也就是否定九国公约所规定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列强机会均等原则。所以最近日本的舆论集中论锋于九国公约的破弃上：“‘中国事变’爆发之后，前年11月在勃拉赛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过规定‘中国事变’为违反九国公约的议决案。……对于去年11月3日帝国政府所声明的‘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英美法提出共同抗议，也是这个九国公约违反论。”“既然决定‘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为‘中国事变’的最终目的，则把旧秩序

从国际上规范化的九国公约,当然非予以否定不可”(10月5日《国民新闻》社评)。

日本新阁首相阿部在其政纲中也明白声言:欢迎第三国协助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否则断然予以排除。这也就是说:日本既要建设“新秩序”,就须破坏旧秩序,废除“把旧秩序规范化的九国公约”。但是九国公约是美国领导下的华盛顿九国会议所缔结的,不但美国在远东的权益不可侵犯,美国的国际威信更不容污损。日本方面也明知个中道理,所以近来一方面声言废除九国公约,一方面又集中火力攻击美国。9月下旬以降东京各报皆指摘美国“非友谊”的作法,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坚决声言:“美国如不改变其对日本的态度,则太平洋将成为战场”(东京9月29日外电)。最近东京《都新闻》尤其大放厥言,其反美的激烈,一般视为多年来所未见,据称:“日本若对美作战,定有胜利的把握,故日本绝不因为美国的虚张声势而让步。不论美国采取何项步骤,日本对于东亚的政策,绝对不加以变更”(10月28日东京讯)。该报又讥讽美国说:“美国似在睡梦之中,误信可以战胜日本,但若美国向日本横加压迫,则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惟有上帝知之。”疯狂好战的军人更加纷纷著论倡言“美日战争期近”。旧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甚至早在9月20日即已公开发表意见,谓:“日本国民不满美国对日的非友好行为,日本政府对此种舆论,不能无视”(对外国记者团谈话),这是日本政府借口于民意恫吓美国,以为外交交涉的张本,讨价还价的准备。

日本政府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依然固执着原来的方针，外相野村最近在地方长官会议席上的报告，重申九月四日日本政府的声明，表示日本对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不变；日本的国际关系及对第三国的态度，以此政策为基础进行调整（10月2日外电）。这个不变的政策，特别适用于对英美的调整。野村10月20日更以书面具体申论这个“不变政策”的内容，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对策仍称：日本决意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于第三国的反对乃至干涉，将不予顾虑；关于日美关系称：“日本为百年之计，将以不退转的决心，从事于再建东亚的‘大业’，余愿美国正确理解日本的目的”（野村由伊势神社回东京晚对记者发表的外交政策）。日本在其集中全力调整美日关系的前夕，竟由外交最高当局发出这样坚决的声言，虽可视为讨价还价的作用，同时美日关系之不可调和性，也已具体表现无遗。

然而美国素来的态度是不恐怕日本的恫吓的，自九·一八事变当时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精神及中日大战以来罗总统及赫尔国务卿屡次发表的主张，将必能贯彻下去。过久的事实姑不提它，只就最近格鲁由美返任所作演说考察，仍充分包含着软中硬的骨骼在，可注意的要点如下：

（一）反驳日本对美基本观念的错误，格鲁大使先举事例指摘“日方认美国处理东亚问题的方法，拘泥于纯法理观点的态度”，为根本错误。大使谓若所谓“纯法理观点的态度”是“指尊重条约正

式约束以及国际公法,则此种解释自属正确;条约正式约束及国际公法的尊重,始终为美国政策的一大原则”,继之,大使转达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及其目的,谓:“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美国人民渴望举世各国之间,俱能和平相处。”他更引用美国国务卿之言:“国际和平欲求其维系于不堕,须赖国际交涉中力守具有一定法则的程序,始克济事。”

(二)抨击日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谬误,格鲁大使声言“美国政府及人民对于所谓‘东亚新秩序’意义了解的程度,并不下于日本”,但是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中竟有取消美国人民久已在中国取得的权利,此则为美国人民所反对者也”。大使更具体指出:“今日日本人竟谓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不能适用,若不然者,亦须大加删改。”大使反驳说:“世界经济的基础建于国际间的购买能力及自由竞争之上,绝非每一国家独占的条件所能维持。余顷所发表的意见,在任何场所均一律适用。”

(三)指摘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及日本独占大陆的企图,格鲁大使率直地说出:“现时美国人民对于日本军队在华的行动及其目的的愤慨之心,日益加深……美国人民对于日本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滥施轰炸,确极震撼,认为不但有违人道

主义，亦且予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以直接的威胁”。继之，大使更谓：“美人对于日本在华军队不顾美日间的条约及其他美日两国共同参与的条约及协定，肆意干涉及破坏美国在华权益，认为严重程度日益加甚。”最后，大使指出：“美国人民已接到各方面的确实报告，深信日本现正努力在亚洲大陆上大部份土地内设立日本独占利益的统制，并在该区实行封锁经济制度。凡此种事实，再加之以在华的滥施轰炸，侮辱美侨及注意干涉美国权利等事件，遂至形成今日美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态度。”

格魯大使的演说，他自信“完全由衷之言，足以代表美国政府及人民对于日本在远东行动的观感”，则其将影响美日关系调整上的重要性，自可不言而喻，只就上举之点言，在日本与美国的远东关系上，确已形成一条鸿沟，其调整的前途，无论阿部与野村是有多大的本领，恐也难以沟通。第一、美国坚持国际公约的法理根据，而日本之侵略中国必须破坏这个法理根据；第二、日本要建设“东亚新秩序”，关闭东亚的门户，而美国则要维持东亚旧秩序，开放东亚的门户；第三、美国要求日本军队停止暴行，尊重美国在华的权益，而日本军队的暴行已非任何日本政府所能制止，破毁美国在华的权益是日本独占亚洲的最主要内容。美日关系调整的失败，已经明显决定在这里了。



## 五、日本的调整政策急转直下

日本与英美在远东的权益根本冲突,实无根本调和的办法,所以日本对英美关系的调整虽经阿部及野村最近乘日军在湘北惨败的机会努力进行,但是难题依然照旧残留着,日本外交这几天又在开始180度的急变。日本新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已向外国记者声言:“日本政府向不拟与英美两国举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以期解决与英美两国有关的悬案。前传日本将与英美会商之说,不过为报纸的揣测”。他甚至否认外相日前与美使格鲁会见为“美日谈判的开端”。他更将日本与英美谈判第一关节的“日本开放长江及珠江”的传说,诿为报纸“揣测之词,日本政府并未有想及过此事”。他把日本与英美调整关系的问题,一脚踢开,而要求人民多注意行将成立的伪中央政权问题(见10月30日美联社东京电)。这不能单纯视为须磨亲军少壮外交家的纵谈,这个180度的急变的原因实已不自今日始。日本外交的再转变,至少可以归结到下列三种原因:

- 1、日本与英美法各国在远东的利害冲突,已发展至无法调整的地步。这在上面及以前吾人的论述中,已详细断定过,无须再重复。

- 2、日本的外交命脉握在中国的抗战手中。日本无法圆满解决所谓“中国事变”则无法调整它的

外交关系。最近日本狡诈全国的脑汁，继军事进攻惨败后发动出来的“诱和谣言进攻”，又遇到了全面的挫折，各种谣言已云消雾散，诱和的条件更不为我国当局所顾盼。我国一日抗战到底，英美不能单独和日本谈判远东的调整问题。

3、日本外交阵营内的暗斗始终无法解决，日本国民“一元化外交”的希望，依然是幻想，日本二元外交永久是在赛跑。秉承老重臣意旨的阿部内阁的外交方针，不但在成形胎中既已受到了限制和改变，最近一度回转旧辙的企图，又碰到少壮派军人的大打击。

日本军部始终坚持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主张，不断地由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表示这种“决意”。西尾寿造10月1日由南京发出所谓指挥“全支的号令”，狂言要“粉碎蒋政权”，“向新秩序的建设迈进”；10月12日又由所谓派遣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长声言：“决无与抗日蒋政权妥协的意图”；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皆以特大号字渲染出来。最近，日本军部更加利用《国民新闻》的社评，正面向阿部内阁的外交政策，集中炮火，大加攻击。先自“事变解决与借用外力”的依赖观念开始，继而主张“日本应与德国坚固提携，东西相呼应，向排英一路迈进”，终而公然攻击阿部内阁的变节与媚态外交（见该报10月10日、12日、20日、21日的社评及主张）。《国民新闻》所代表日本军部的意志，现

在正强硬要求着阿部放弃对美媚态外交,采取对美强硬外交,以打开对美外交,列为阿部内阁的重大课题。

在日本两大势力夹持下左右为难的阿部内阁的外交,毕竟亲英美好呢,抑或索性扫荡英美势力好呢?谈到日本外交往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不禁为阿部内阁捏把冷汗!

(1939年10月30日)

原载1939年11月《战时日本》第3卷第4、5期合刊

## 日本急于与苏联谈判的认识

自从美国对日采取积极政策不为日本所威迫利诱以来，日本政府即转变方向，欲与苏联言欢，缔结通商条约，谈判其他苏日间的悬案。日本军阀已在梦想着一个苏日互不侵犯协定能够继诺门罕停战协定而实现，日本一般人更沉醉于1928年“渔约协定”已有修改的希望及北库页的矿权等问题也有适当解决的可能。但是日本朝野的这种空气不自今日始，实则早在10月上旬日本军部行动派的喉舌《国民新闻》，即已公然提倡排英美联苏联的政策了。军部对于政府的对英美外交调整工作，原即不感觉兴趣，军部虽未便正式反对，但却一再唆使他们的机关报评为“媚态外交”，并极力强调“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与九国公约的不可调和性。其中早有日本军部的一个主潮潜伏于其间；日本政府最近始有追随的倾向罢了。

然则日本军部为何必欲向苏联讨好，希望苏日成立更积极意义的协定呢？我们可以列举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日本军部梦想乘欧战爆发的机会排除英法乃至

美国在华的权益。欧战之爆发,在日本各阶层之间各有不同的感觉;贸易商人认为“神风”到来可以再发一次战争的横财;政客和普通人,认为减轻解决中日战争的困难,可以早日拔出深陷泥淖中的战争泥足;但在军部则认为可乘英法无力东顾的时候扫荡英美法在华的权益出于中国或东亚,以完成其“独霸东亚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第二,日本军阀欲效法希特勒来一次投机,想利用苏联的势力驱逐英法的势力出于亚洲。《国民新闻》自己暴露出这种阴谋,主张:“如果日本与德国坚固提携,东西相应迈进于排英一途,则苏联的陆军或将由中央亚洲,向印度及波斯进出,永久苦于英国桎梏下的弱小民族的解放战,或将因此而展开。苏联这样作法,牺牲小而收益大,是种思想战配合现实政治的良策。”(10月12日该报社评),年来日本时常散布一种空气,说要替傀儡收复租界及失地,现在又梦想借苏联之手以驱逐英法的势力,真可谓为想入非非之境啊!

第三,日本军阀仍不忘情于讨好德意,近来更希望德国拉线以与苏联接近。在苏德协定成立当时,平沼内阁尽管指斥德国,但是军部则仍咬定日本的敌性国家依然是英苏,到最近因为德国从中的斡旋,更加梦想着德意日能与苏联共同结成一个集团,以与民主国家对抗。日本军部已经开始讴歌着“苏德合作”的成功;德国“解决了波兰问题,陆上的优势更加确实,采取由巴尔干近东威胁英国的姿势;苏联也得参加波兰的分肥”;还说苏联这种作法“当是

一种不卷入欧洲战祸而强化其地步的良策……，在其外交政策之点，的确别具独特的眼光”（《国民新闻报》社评）。日本军阀对于德国的斡旋，早则一再表示好感，最近更直接向苏联频送曲线的秋波：“苏联固是世界有数的陆军国，但是苏联的陆军无论怎样整备，若与东西的德日两国的陆军抗争，必至两虎具伤，苏联虽愚也必不出此”（同上社评）。

第四，日本急于对苏联讨好的一个最具体而有把握的期待，就是想藉苏日关系的好转以威胁英美法，特别是美国。美国近来对日本态度的强硬，已使日本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藉第三国的力量，逼迫美国退让。这是以退为进的办法。只就日本政府发言人须磨在上月初旬屡发否认进行日美谈判的言论而最近却在上海再三表示其讨好美国的谈话，及日本所谓驻华特使加藤活动于平沪之间，略加考察，日本葫芦底的药味，就不难猜透。这又告诉世人：日本决不能以苏联代替美国的作用。

日本军部强调亲苏，索性排除英美法，但是元老重臣等稳健派，则尚不能盲目于现实，所以我们敢断言：日本之亲苏不但不能获得积极意义的成功，倒反徒然引起内部外交主张的斗争。

原载 1939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6 期

## 日本最近对美外交的剖述

### 一、日本调整对美外交的主因

日本最近各界的注意皆集中到美日邦交的发展上,这一个多月来美日关系的演变也演出了有史以来未有的曲折。阿部内阁在它的形成过程上,即已对元老重臣等稳健派负了调整美日关系的使命,专任野村为外相的目的,就是在于顺利完成这个使命。另一方面,日本舆论界也被这个美日问题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即连老气横秋的苏峰翁,也都谈起了日本外交问题(见《国民新闻》11月8日《八方美人式的外交是最不安全的外交》),美日问题的重大性,可不言而喻了。

几乎阿部—野村外交的全部姿态,是在调整日本与美英法的关系,但其结果,问题却归结到对美关系的重点上。换言之,日本不能打通美日关系的难关,则对英法的调整,完全不可能。这不但是我们这样观察,即日本当局也是这样承认了。日本当局屡次指摘美国为欧战爆发后“新援华国”;

屡次攻击美国出头为英法保护远东权益，为英法充当远东利益的“看门犬”，就是这种事实的证明。但是日本现阶段对外关系之所以结集到调整美日关系上，自有国际现势的客观条件为之决定，且先就这些条件或主因，加以剖述。

（一）欧战爆发以后日本急于结束中日大战 欧战的爆发，在日本一般人皆认为绝好机会，甚至认为是“神风”，眼巴巴地望着第一次欧战时爆发的38亿元横财，能够再飞来一次，所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政府即便宣告中立。但是日本要能够获得“中立国”的经济利益，自己须先摆脱了战争。它们又认为欧战爆发后“援华国家的手已经缩回”，中国自较容易“屈膝”，所以集中全力于结束中日战争上。最初采取谣言的进攻，并欲诱惑中国讲和，继又发动长沙军事大进攻，欲以战争结束战争，现在又抬出头号汉奸汪精卫来，欲借伪中央政权之成立结束中日战争。虽说这些进攻全部失败了。但在日本任何节奏上，都极自然地参杂上英美法的关系。对英美法邦交的调整，自为应时的好戏了。

（二）日本欲乘欧洲大战的机会排除英法的权益 自日本看来，欧战这阵“神风”不但要送来上次欧战时那样巨大的横财，并且要吹走“事事为难”的英法的“魔手”，能乘这个千载一遇的好机会，把英法在中国甚至在亚洲的权益扫荡出去，确是最聪明不过的打算哟！日本当局认为英法的力量完全被卷入欧战中去，再无能力兼顾远东，它尽可以为所欲为。日本这种气势充分表现在欧战爆发前后的许



多事实上。殊不知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唇亡齿寒，与英法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挺身而出，先给日本一个响亮的耳光，宣告废除美日商约，于是日本上下感觉到：“现代日本的最大障碍物，就是美国”（载《时局月报》11月号）。英美太平洋平行政策不可分的苦味，乃浸透到日本人的心坎里去，于是日本不能不急忙设法调整对美外交。

（三）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和积极化 欧战爆发在日本固认为是制抑中国的好机会，但在美国也未尝不认为是制裁日本的好机会。欧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经济制裁实施上的许多阻力随之减退或消灭，例如军火商人可以不反对禁运军火给日本。美国更视欧战为清算二年余来美日总帐的绝好机会：废除美日商约，增强太平洋的军备，格鲁大使更率直说出了美国国民不满日本的情绪，还有其他美国事事皆对日本提出最强硬的抗议，这些表示美国最近远东政策的转变，不只是更强硬，且有更积极作用含蓄在内。日本人对于美国过去的强硬，认为是“正义感”的播弄，“小孩气”的玩耍，但现在却认为“真干”了。这样，日本对美国自不能等闲视之了。

（四）日本军阀湘北的惨败，使日本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得以加强 日本军阀素恃武力蛮干，对于什么政治的谈判，什么外交的调整，全都不看在眼里，简直看做扭扭捏捏的儿女把戏，所以当谣言诱和的戏法还未闭幕的时候，即便发动七个师团的大兵，三面包围长沙，并以迂回部队企图抄袭后背，以期完成“打过折扣”的板垣停战线。但不幸

结果归于惨败，暴露了全恃武力蛮干已不可能的总破局，于是日本军部行动派的蛮干外交又稍为失势，而元老重臣等稳健派的调整外交，又占了全盘的优势。军部对阿部内阁所要求任命外交革新派领袖白鸟敏夫为外相，终被鄙弃，另任“知美家”的野村大将为外相，后又接受元老重臣暗中委派的谷正之为次官，对美外交的调整遂得公然以大阔步前进。最初，军部虽未支持调整外交，但也未敢明显反对。

## 二、日本的双簧与曲线

数月来日本对美国的外交关系，极尽复杂曲折之妙，一面政府与舆论界唱着双簧，一面又由政府走着曲线前进。10月间日本政府对美调整外交的调子唱得最高，阿部内阁任命了野村为外相，日本有些报纸也曾一度自吹自擂说：美国人民也皆企望野村外相上台，得以圆滑解决美日悬案，改善美日邦交。美国宣告废除商约，再有3个多月即要生效，日本政客自不得不慌忙起来。不过最大的作用还在于日本欲借美日关系的调整，以增加对华的压力，结束战争。所以那时候日本对中国的谣言进攻特别厉害。殊不知我们坚持抗战的铁石意志，丝毫不起动摇，美国支持我们当然更加坚强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演说的强硬，自非偶然的。所以10月底以前日本政府最积极进行的美日关系的调整工作，到了11月初即便起了180度的变化，急转直

下，一面急忙于召集兴亚院会议，讨论树立伪中央政权的具体办法，一面更由外务省发言人再三声言：“日本目前仍不愿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日本目前仍未有与英美两国举行正式或非正式谈判之意”“日本从未与美大使格鲁接洽，表示欲调整美日邦交之意”（11月1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须磨对记者谈话）。阿部首相更于2日晚会见近卫文麿后对记者发表谈话如下：“日本对英美的关系虽有调整之必要，但目前（伪）中央政权正在成立中，日本未及考虑此事。”这很明显地表露出日本政府因诱和的攻势失败，乃改采树立伪政权的办法，欲将调整各国在华关系的难题委卸给伪政权去办理。所以11月4日野村与格鲁会见后，日本各报所透露的消息，充满着悲观的论调，甚至如《国民新闻》所言：“美日关系，更见殆危”。前外相有田更慨而言之说：“目前尚非改进美日关系的时候。在伪中央政权未出现以前，与第三国进行谈判，实属徒劳无功”（《大公报》上海5日专电）。

自那时候起，日本伪中央政权的妄动盛极一时，兴亚院的决议案也经日皇批准，军部方面更欲以武力威胁我抗日政府。于是一方面上海群丑集议纷纷，南北三大汉奸且有集合青岛的预定；另一方面日舰集中粤南海面，大举进攻广西南宁。但是日本各派军人大都轻视汪精卫，华北及华中的汉奸也暗中挡驾，汪精卫的幻梦遂陷入漫漫长夜之中，伪府正式成立之期一再延改。但是美日商约转瞬即便满期，对外贸易几乎专靠美国的日本，自不能不另图与美

国谈判了。本月20日前后起,日本的作风更加微妙,一方面加紧天津租界的封锁,逼紧英国以孤立美国,另一方面又向苏联讨好,进行苏日谈判以威胁英美,但以我们的观察,日本因为美日贸易关系之密切,必不能断然与美国为敌,美日关系的调整工作,是日本现政府所不能够忘情的。最近更经由美联社透露出日本将由汪逆居间以与“重庆政府”言和,日本作风的微妙与虚幻,实无以复加了。

在日本对美外交调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讨好美国,另一方面则又总动员舆论拼命恫吓美国,攻击美国人。

最近日本舆论对美最大最具体的攻击,就是对格鲁大使所集注的炮火。日本论客全部评论格鲁的演说为“不辩场合,不识时务”的“放言”。他们对格鲁大使演说所起反应的代表意见,大约有如下数点(10月21日《国民新闻》记事):

(一)日本应该努力于改正从来的媚态外交,率直表明自己的意见,促醒美国的正确认识;

(二)美国虽强调法理主义及九国公约,但是现在无宁是应该交涉改订九国公约,使得适合“东亚新秩序”的理念;

(三)日本政府应早决定“新秩序”的内容,趁着伪“中央政权”实现的机会付诸实施;这不但是

对美外交的出发点,并且是世界政策的出发点。如果美国不能同意日本的“新秩序”,则应强硬对抗,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格鲁大使未演说以前,日本舆论界的谩骂与狂喊,即已充满各报纸及各种杂志。自9月下旬以降,东京各报即皆指摘美国“非友谊”的作风,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进一步警告说:“美国如不改变其对日本的态度,则太平洋将成为战场。”二·二六事变前充当高桥前藏相的喉舌,攻击过军部的“都新闻”,今日也附和军部,对美大放攻击之词,其激烈的程度一般认为是日本多年来所未有:“日本若对美作战,定有胜利的把握,故日本绝不因为美国虚张声势而让步。不论美国采取何项步骤,日本对于东亚的政策绝对不加以更改。美国似在睡梦之中,误信可以战胜日本,但若美国向日本横加压迫,则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惟有上帝知之”(10月28日东京电)。

自格鲁大使第一次晤见野村外相正式表达美国政策的主张以后,日本报纸对美国的攻击更带上积极性,对政府提出具体主张。《国民新闻》首先倡言:“莫论根本的调整,即个别的悬案亦极困难,盖因美国不承认中国大规模战争状态存在也”(东京11月7日电)。该报更于翌日论列“日本对华的‘新次序’与未来控制太平洋的计划,息息相关,美国势孤力薄,其人民缺乏精神上的力量……如美国执迷不悟,对日仍采取现时的敌对态度,则或有被摒于东

亚之外之可能。”东京各报同时主张争夺荷兰在太平洋中的殖民地,以为对美作战时的资源供给地。上次抨击美国最激烈的《都新闻》,本月中旬以后更大放厥词,谓:“美国久以远东之警卫者自居,对于英美在华的利益,愿意同样予以保护;据传,美国在远东将任英国的“看门犬”,此说或非完全无据”(上海15日电)。

然自汪逆的梦幻做得不顺利以后,日本政府及在华军人又改变口吻。上海日军司令藤田15日谈话,谓:“在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内,对第三国利益的限制,逐渐予以放松。”“东京谈判的结果,相信许多美日间的问题可获得解决。”17日须磨更对记者称:“美国固然极关切日本对华行为,但不能谓其远东政策,将来不会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极愿与任何国家调整关系……我以为美政府或人民方面,均不欲将美日关系恶化。”日本的双簧已经唱得更微妙,对美的讨好仍为日本政府所牢记不忘的哟!

### 三、美日外交的前途

阿部一野村外交虽然着重于对美关系的调整,甚至于这种调整工作的成败可以决定阿部内阁寿命的断续,但是日本现时政治实际支配者的军部行动派,对于这种调整工作并不十分感觉兴趣。自阿部和野村开始对美调整工作时,军部即未表示支持,自始即由代言者的《国民新闻》著论反对。该报在九月间即大唱其对美调整工作的悲观论,

入10月以来,又以“解决事变与依赖外力”的标题警告政府,特别督促人民注意中国所谓“新中央政权”的树立问题(10月10日的社评)。

《国民新闻》嗣后更从正面批评政府对美调整工作,10月27日用“所谓美日国交的调整”的讽刺标题,10月31日用“美国干涉‘事变’的可能”的警惕标题,一方面攻击美国,一方面也就是拆阿部内阁的台。其具体主张是:“在两国关系不但停顿而且实已极端恶化的现状下,即令两国敞开怀抱,进行率直的讨论,国民对之究竟应抱多大的期望,不能不说是一大疑问。”它指摘美国的态度,采取反对日本的‘事变’处理方针及‘新秩序’的建议,已经挺身而出,从正面充当日本外交的敌手。”它更攻击美国“自愿勇敢为英法实践远东‘看门犬’的职务。”它对于调整工作的前途,强调悲观论,说“一部分人所想像或所希望太平洋两沿岸国民可以即刻握手言欢,还是未知之数,或竟可以预想其有更恶化的危险。”甚至于认这种调整工作为“近于不可能而又徒劳的努力,倒不如迈进于‘事变’的处理,较为贤明”(11月27日社评)。

《国民新闻》对于正在举行中的美日谈判,认为不能得到结果,因为美日双方所希望解决的对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说“在华权益问题及美日通商问题,当然成为谈判的主题,谈判成否也决定于这两种问题”。“然而不幸在中国问题和通商问题上,美日两国的利害关系正完全相反,因而美日谈判的前途极其暗淡”(10月31日社评)。

日本军部对于美日外交的认识，倒比现政府正确些。美日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令阿部和野村怎样努力，恐怕也无法圆其幻梦。只就目前美日谈判的主题讲，美国所坚持的是如何解决美国在华的权益被损问题，美国要求日本有以圆满解决的方法及保障其权益安全。但在日本方面则视此问题为不关痛痒的问题，它们认为“在现在大规模战斗行为进行中的实情下，第三国在华权益问题是第二义乃至第三义的东西。”甚至认为是“极其讨厌的问题”所以“可谈也可不谈”（《国民新闻》社评），极力避免提它。日本政府已把这个问题委卸给未可知的伪中央政权去处理；日本舆论主张美国不能提出在华权益问题，他们认为美国如果坚持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主义，则是“美国干涉中日战争”，“对于中日战争的解决取得某程度的发言权，乃至采取干涉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破坏日本始终排斥第三国干涉的对华根本方策”。总而言之，日本已视中国为其禁脔，不能尊重第三国的权益，各国在华权益问题自无谈判的余地了。

反之，美日通商条约再订问题却是日本的生死关头，无论在生丝等特殊商品的输出上，或在军火及军需资源的输入上，日本现在更非依赖美国不可，在这问题上，日本固欲借苏联以自重，欲以苏日商约代偿美日商约，但是事实上则不能收丝毫效果。日本每年输往美国的生丝价值，可以抵偿由美输日军需品一半以上，但是苏联却没有生丝市场。美国既不销纳日本生丝，即就自由通商而论，军需却也自不会输



去日本,加以政府禁运军火的实施,更无庸言了。美国现在很显明地,拿不再订新商约的法宝,抵制着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侵犯,日本若依旧坚持其不谈第三国在华权益问题的方针,则美日外交的调整,自必不会发生任何效果。

日本重订美日商约的期望尽管焦急,但是美国方面却非常安闲,且自日本加紧封锁天津以来,美国商务部更加一再提出强硬而严重的警告。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发表谈话,明白表示“明年一月间美日商约满期后将不再续订新约”;威氏并强调“美国政府并未有任何训令致格鲁大使,涉及将来缔约成为可能的特点”;否认“有试求与日本重订新约的活动或谈判”(华盛顿11月22日美联社电)。据报,威氏这次发表乃依据事先草就的备忘录宣读的,其重要性足以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宣言,更值得我们注意。毕德门复又倡议于美日通商条约废除后实施对日禁运军火案。在欧战爆发的今日,这种提议已具实施的条件,因为美国军火已可供给英法而犹感不足,军火商人既非特别有爱于日本,也就不会反对禁运案之实施了。

美国今日所企求的是如何恢复被破坏二年余的和平工业品的中国市场,是如何把日本行将严密关闭的亚洲大门打开。美国现在不但不怕军火无处销售,且可乘欧战期中英帝国属地所供给工业原料品来源断绝的机会,对日本侵略者施以更大的压力。倘若日本坚持所谓“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并欲否定九国公约,则美日关系的调整工作,将实实在在地成“徒劳无功”的把戏了。老气横秋的苏峰翁也已

替军部向阿部内阁高声警告说：

阿部外交啊！“尽管八方美人，尽情撒娇，或说尽谄词，努力使无一敌存在，也绝不是可嘉的事情哟，在无一敌存在的背面，则有无一友的事情潜伏着。无一友的结果，即为四面皆敌”（11月8日《国民新闻》论文）。

阿部内阁的对英美法苏外交调整工作，亦可悲矣！

（1939年11月28日于香港）

原载1939年12月《世界知识》第10卷第5期

## 日苏谈判及其问题

### 一、日本外交作风的“大旋转”

内部意见分歧主张不一致而步伐始终在彷徨歧路上的日本外交，最近又起了一度的“大旋转”。

10月整整的一个月中，日本政府的外交作风完全集中在调整日本对英美的关系上，因为第二次欧战的爆发造成美国在太平洋情势，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的情势上，不但占了最重要地位，并且占了决定地位的结果，日本为着便利结束中日战争而自然将其调整外交关系的重点，置于对美外交的调整上。日本政府在十一月四日以前特别忙碌于对美频送秋波，日本的舆论也与之同唱交响曲（即令是双簧之调，也自有其特别的作用），就是这种趋向的具体表现，美日谈判的消息，曾经引动全世界的注意。

但自10月与11月之交以后，日本的外交作风又起了一个大变化，11月4日野村外相与格鲁大使会晤的不圆满，在表面上就是这个变化的近因。日本侵略者原欲藉美日关系

的好转,以为对中国政治进攻的助力,殊不知美国对于自身在华权益的拥护,坚持不折不扣的主张,日本对中国抗日政府的谣言引诱攻势,又完全为我中央政府所揭穿,美日外交的调整自然难期有什么效果,即令必欲与美言欢,也觉有凭借另外的力量或情势的必要。因此,日本政府自11月初起,暂时放弃对美积极调整的工作,而改向素来认为最主要“敌性国家”的苏联讨好言欢。在日本军部影响下最疯狂的报纸,如《国民新闻》及《都新闻》等,对于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会议的演说,不但反对看做“赤色秋波”,并且主张日本政府应即采取积极联苏的政策(见11月3日《国民新闻》社评)。

日本联苏的趋势在其调整对美关系的过程上,即已潜伏着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潮流。一方面远东的情势严格限制着美日关系的调整达到圆满的结果,另一方面日本军部对于日政府的这种工作并不予以支持,无宁是讥为“媚态外交”,其外交的意向是在联苏方面。关于前一点,我在上期本刊,已有详尽的剖析,关于后一点,且在这里略加介绍。

日本军部喉舌的《国民新闻》,早在九十月间严格批评日本政府的亲英美外交,自10月中旬以降,即又积极主张亲苏的外交政策。自那时候起,该报一面继续强调“日本外交方针,必须脱离亲英美的传统”,一面则开始讴歌苏德协定的成功,并促日本外交当局省悟,其言有曰:“外交与思想问题,遇到目前的困难,在一国的存立上,已对世界指示

新的意义了。这种事实对于日本当局者之愚昧,混同自主独往与孤立独善而对世界舞台掩耳闭目,加以冷笑了”(10月12日社评)。

在日本军部行动派之间最近由于德国从中的斡旋发生了一种幻想。第一、他们认为:“最近的苏联是以打破国际现状维持派的一种势力而登场,并以对抗旧势力的新势力而出现,这一点正与日本的国际地位具有类似性”(《国民新闻》11月3日社评)。第二、他们还推测:“如果日本与德国坚固提携,东西相应迈进于排英一途,则苏联的陆军或将由中央亚洲向印度及波斯进出吧!”(同报10月12日社评)第三、他们又以为:“诺门罕事件上彼此的重大损害……已促使苏联认识了东方日本的权威。”并谓苏联“……确认了日本排英政策的具体化……”(同上社评)。于是他们更幻想着一个所谓“日德意苏集团”的出现。对于日本当前的外交,排斥“八方美人主义”,主张“对苏对德关系的好转与对英美国交的调整,是完全不相容的。”“日美国间的外交调整与日苏关系的改善,不能同时期待,不牺牲一方则决不能成功一方”(同报11月8日社评)。

日本政府对在美调整工作碰壁后,在军部行动派外交意识的影响下,自不得不积极开始其调整苏日关系的工作了。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已继其否认“日本与英美两国举行正式或非正式谈判之意”(11月1日谈话)之后,一再表示愿与苏联调整两国关系,解决苏日间的悬案。在东京方面由日本外相野村曲尽卑恭之礼一再邀请苏联驻日大使

史密丹宁,进行谈判,在莫斯科方面则由日驻苏大使东乡大事活动,求与莫洛托夫磋商苏日关系的改进。

## 二、日本联苏的手段与目的

然则日本何以要在这个时候积极亲苏呢?关于这一点,就是我国权威评论家之间,也是议论纷纷,难下结论。这里有两种原因使观望者迷乱:其一、日本外交方针素来即不一致,日本是以二元传统外交著称的,革新派外交主张与稳健派外交主张,常在赛跑;其二、日本各派外交主张的主观要求,时常为客观的情势所阻碍而起旋转状态。这两种原因迫使日本外交常在彷徨动荡中,忽而亲英美忽而亲苏德,一方面主张“亲和万邦”政策一方面则又排斥“八方美人”外交。现在日本处于美苏两大之间更暴露出它那举棋莫定的姿态与其内部矛盾的尖锐了。

我们对于日本外交,不能做单纯的观察,特别在目前对苏外交上,更须辨别它的手段与目的,认清各派主张的偏向。日本目前对苏外交的戏法,包括着目的与手段的两重性,这在两派不同的外交主张里面,又有重轻。日本亲苏外交,在军部行动派所代表的革新外交上,是目的重于手段;但在现阿部政府所代表稳健外交上,却是手段重于目的。日本军部的外交主张始终是偏向于德意的,所以即在德苏协定成立后日本朝野大多愤恨德国出卖思想盟友的时候,日本军部还是缄默,以至反乎一致,声言日本的敌性

国家不是德国。后来经由德国从中斡旋,日本军部外交主张的偏向对象中,于德意之外再增加了苏联。欧战爆发后,这种外交意识,逐渐具体化,表面化。日本军部认为欧战这阵“神风”送来发财的机会,日本可以乘机扫荡英美法在华权益乃至亚洲的势力,以完成其“独霸东亚征服世界”的第一步。但是他们也自知力量单薄,在目前的阶段上必须联结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共同控制亚洲,于是河相达夫的《世界三分论》,变成苏日平分亚洲的主张。这固然是一种梦想,但是他们却偏要梦入非非,具体主张:日本应早接受德国的周旋,和苏联坚强携手,使苏联无东顾之忧,派遣陆军由中央亚洲向印度及波斯进出,替“永久苦于英国桎梏下的弱小民族”,达成解放的目的。他们更梦想着:“日德意苏的独裁集团”能够实现,整个世界就在他们掌握之中了。

反之,日本现政府代表稳健派的联苏外交主张,却偏向于手段的运用。在他们的眼中,英美在远东的关系不能忽视,目前日美关系重过日苏关系多多,苏联是代替不了美国的。他们很重视欧战爆发后美国若废除美日商约则日本将遭遇两重的劫运,日本的对外贸易姑不提它,只军火来源一项已够制日本的死命了。军部对于这一点固然也不轻视,但是他们企图在所谓“日满支”布洛克内谋自给自足,所以《国民新闻》极力反对“没有基本生产的军火”的输入。日本现政府的联苏外交戏法,是欲藉苏日的接近威胁英美,特别是美国,对日本让步,使日本得以结束中日战争,使欧战“神风”得以吹来横财,与英美妥协,结束中日战

争,再发欧战财,才是日本稳健派的目的,至于苏日关系的改进,在他们只用做达到此项目的手段罢了。

我们在日本政府的联苏戏法上,可以看出几种和军部的主张不同的作法。日本政府虽自对美调整工作挫折后,不得不追随军部偏向于苏联的工作,但却同时对英美频送秋波。即在11月联苏最热烈的月份中,日本外务省一面再三邀请苏联大使史密丹宁,谈商苏日各种悬案,一面又将对英美的调整移至中国境内,进行更加频繁。特别自苏日谈判已发觉不很顺利的11月中旬以后,中国境内的对英美谈商更加积极,日本政府的外交无宁是偏向于英美方面,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须磨之来上海,日本“驻华特使”加藤于11月21及22两日连访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商中国问题等等,皆在证明日本政府外交之多边的活动。11月16日须磨在上海的谈话,更加有趣:“日本希冀与美国订立一新商约,……至于苏日关系。日本固企求解决苏日各项悬案,但若谓现时‘平滑关系’的目的,在于缔结一互不侵犯条约,则未免言之过早。”尤其值得注意的,日本同时还透过美联社的电讯,散布日本欲由“汪政权”以调整第三国在华权益,并欲由汪逆拉线以与我抗日政府言和(11月16日美联社电)。

另一方面,亲军的革新派外交家,却更加拼命吹起号角,主张排英美而亲苏联。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著文称:“日本当前最切要的问题,乃在调整日苏关系,及如何促使苏联中止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英国及美国均不愿苏日



成立谅解，但正因此故，日本更应加紧与苏联缔结协定。……英美两国现均不能以实力阻止日本建立‘新秩序’。美国欲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而已。依余所信，美国既必须考虑有与德国作战之可能，自无真正力量应付日本”（11月16日日本《报知新闻》所载）。日本前驻德大使大岛昨日在横滨对记者谈话，排英美亲苏联的主张尤其露骨，据称：“德苏将来之关系，对日本将来之外交政策，影响甚大。就目前情势而论，德国如肯维持现状，则德苏关系仍不致破裂。苏联在亚洲，愿与日本保持友谊关系，日本应敦促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日本之外交政策，应为一元的，不应对苏对英对美，分途并进”（12月12日《大公报》上海专电）。

军部机关报的“都新闻”最近公然揭出军部对阿部内阁的外交政策不满的消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据称：“军部方面已逐渐感觉现内阁对于国内各种问题与对第三国复杂关系之调整及‘中国事变’之解决，皆无力应付，故预料陆相不久即将提出强硬交涉”（12月12日东京外讯）。这是苏芬战争发生后日本政界新趋向的第一次表现。苏芬战争所引起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难，即军部的外交主张也到了重新考虑的新阶段，他们会不会再来一次嫁祸倒阁的手段，如苏德协定成立后滚走平沼内阁，要看此后国际情势的旋转角度如何决定。但是日本亲苏外交的真正目的，即不容易达到，用以牵制英美的手段，也不能发挥，则日本外交依然在泥沼中，徒然加深其内部

的纠纷罢了。

### 三、苏日关系的展望

日本各派亲苏联的如意算盘所以不能打得顺手，自有两国的基本症结存在：第一、日本的最终目的在于独霸东亚，苏联则须阻止这种趋向的发展。第二、日本要求苏联中止援助中国，苏联则要更加积极援助中国。第三、苏联只希望和日本订一个空洞的原则上的协定，而日本则要求具体解决各项悬案。第四、日本在经济上希望着苏日通商关系得以代替美日通商，但是事实上绝对做不到，日本的态度也自不能舍英美以亲苏联了。第五、日本在政治上幻梦着德意苏关系更为密切，使日本当真可以加入一个强有力的“独裁集团”，但是国际情势的微妙变化却阻碍日本的美梦难圆。

日本联苏亲苏工作此后的进展，主要的还是要由国际情势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自从苏芬战事爆发后，日本对苏的政策，又到重新考虑或暂时观望的阶段。欧洲新情势的发展，是有重要的决定因素。自苏联进兵芬兰以后，欲据芬兰以为反苏联据点的资本主义诸国，皆同样感到威胁，德国虽然因其与英法的矛盾的深刻还不敢声张，但是黄连的苦味已上了心头，对苏的警惕不知增高了几多哩！至于惯于投机的意大利的态度呢，日本报纸揭载早在11月1日《意大利内阁大改造》及《党军首脑部更迭》的消息，认为亲德

派巨头（指宣传相亚尔非里及法西斯党书记长斯泰拉司）退阵，亲英法人物（指陆军总参谋长格拉齐尼等人）东山再起，暗示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将大起变化。而苏芬战争爆发后意大利的反苏狂叫，当然更使日本的忧虑加深。今日国联限时警告苏联，虽然只是一个空架子，但在胆小如鼠的日本外交当局，自然已在战栗不已了。何况美国早以“打草惊蛇”的手势，藉对苏联的抨击以警告日本勿与苏联接近了。是以日本外相野村特于12月4日邀请美国大使格鲁解释一番，同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宣称：“余欲肯定声言，与苏联订定一不侵犯条约，绝非日本的计划；吾人仅思将各项悬案予以解决而已。”九日野村更加邀请外交界的元老5人，谈商调整英日、美日、及苏日关系。这又使吾人觉得日本外交似又要回到“白纸外交”（！）。12日东京方面已传野村外相不久又要与格鲁大使作第三次会商，是则日本外交又有回到十月间姿态。这里已经证验了，我们的预断“日本不能以苏联代替美国”，日本利用苏联的如意算盘并不能够如意打下去，是又可断言的了。

（1939年12月13日）

原载1939年12月《世界知识》第10卷第6期

## 提防日阀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

日本侵略者对华2年又半的作战，已经消耗实力至饱和点，数十年来压榨9,000万日本民众的脂膏堆成的积蓄，差不多已经完全荡尽，日本国内普遍发生饥饿与冻寒的现象，即其统治阶级与御用学者也都高喊：日本今日所遭遇的困难十百倍于当初预料的程度。日本民众甚且埋怨日本政府浪费国民的财富与力量至比原来预定程度多少倍以上，所以日本侵略者朝野皆痛感“中日战争有早日结束”的必要。所以日本元老重臣财阀等稳健派，指使末期近卫内阁以后每任内阁，执行结束中日战争的工作。虽然因为疯狂好战的军部行动派加强“鲸吞政策”与“武力主义”，致使历任战时内阁几乎全因外交问题而坍台，但是元老重臣派的阴谋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认为欲“征服中国”采用“蚕食政策”较为有效，这是更为毒辣的阴谋。

的确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企图灭亡中国，“蚕食政策”实较“鲸吞政策”毒辣得多；日本若贯彻其“鲸吞政策”，则将如日本币原外相所自认，“等于吞炸弹”。日本更狡猾的

元老重臣及财阀有见及此，所以主张一步步地前进，认为以小国吞灭大国，必须稳扎稳打始有效力。所以每逢日军占我一个重要据点而战争告一阶段即便努力谋毒计之实现。其所施用的方策就是“诱惑的进攻”与“外交的进攻”，质言之，即为努力制造“东方慕尼黑”的局面。

日本侵略者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随其战争泥足的深陷而益加积极，自第二次欧战爆发以后，他们更认为千载一遇的“良机”不可遽失，所以对英法加紧压迫，殊不知英法之外还有一个劲敌的美国挺身以出，遂至阿部内阁4个半月的努力，终归变成泡影。倘若美国在华的权益不能获得“安全的保证”则美国必不能白白为日本所利用，日本政府也自觉出此点，所以最近佯做更大的退让，欲以开放长江钓英美上钩。阿部内阁虽然因为此种阴谋的执行没有成就而终于总辞职，但是继之成立的米内内阁却带着更积极的同样使命，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困难，尤其送给米内内阁执行这种使命的必要，米内政府将更央英美出为拉线。

这次，日本首相的交椅授予一个海军大将的米内政光，首先的意义就是企图积极拉拢英美解决中日战争。元老重臣稳健派推出米内海军大将，一方面是用以孤立陆军继续蛮干的政策，一方面又欲以海军威风帮助对英美“积极调整”。第二，米内内阁任用远离德意轴心而亲英美的有田为外相，其对英美积极拉致的倾向，更为明显。元老重臣等稳健意识更为强烈的米内内阁的阵容，将必助长这种阴谋的实行。米内内阁第一次的宣言所称三要点（一）决心建

设“东亚新秩序”，(二)以解决“中国事件”为基本政策，(三)协助“汪政权”，完全表露了日本政府此后的外交方向。米内对记者所说明日本现内阁“鼎足而三”的政策，列解决“中国事件”及调整国际关系为首要，有田外相强调“自主外交”，米内更侈言新内阁“独立立场”的特殊性，有田又夸张“目前日本正极力准备开放长江，并愿与美国解决各种悬案”(皆见1月17日东京外讯)，更加具体指示了日本新内阁外交的着重点。

战争泥足深陷财政经济十二分困难的日本侵略者急图结束中日战争，并欲利用英美出头帮凶以完成其毒计的第一步，确是真的，但是所谓开放长江，愿与美国解决悬案等等，尽是一片佯言，绝对没有诚意，只日本政府本身也无此种力量与把握。不幸，素来同情我抗战最深的友邦，已有被日本蒙蔽的危险，英国过去曾经节节退让，美国今日竟也开始希望日本对保全美国在华权益须先有确切的保证，英美两国大使仆仆于南北，虽只是普通事务的接洽，但却容易被缺欠东方特殊情形透视力的人，误认为积极与日本接洽，替日本奔走。敌人更用做“和平进攻”的资料，总动员通讯社及报纸，极力渲染“和平的消息”。

日本现政府显然欲以扶植“汪政权”，分化我内部，并诱惑我抗战政府言和，甚至以疏通在华军人保全英美的权益，诱引英美，作为“外交进攻”的拉线。日本侵略者制造“东方慕尼黑”的毒辣，可说无以复加了。然而我们认为远东的情势既和欧洲局面不同，我政府与人民的同仇敌忾又

非捷克可比,则日本侵略者的美梦,终必变成幻想。我们的论据是:第一,英美与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利害冲突根本无法调和,军部喉舌的《国民新闻》屡经强调“建设东亚新秩序与九国公约”的不能调和性,日本内阁虽屡有更迭,但其坚持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却无二致。这无异说英美法各国必须退出中国。这是英美各国所不能忍受的。第二,日本现内阁或有代表元老重臣等稳健派的意思,尽可能对英美退让以完成结束战争的工作,但是疯狂的军部决不能让政府对英美付与过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华军人拥有横行不羁的特性,政府对英美的退让,如开放长江,未必能行得通。第三,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所消耗的财力与人力,正希望着极大的代价,既不能对英美退让过大,更不能接受汉奸如汪派撤兵还地的要求。第四,日本即欲利用国际新形势佯充东方反苏先锋以欺驱英美,或者英美也有利用日本的意向,但是日本既无力量和决心去进攻苏联,英美也自不会轻易帮助日本制服中国。第五,日本佯言保障英美法等国在华的权益,开放长江及珠江,但事实上并无诚意,完全是与英美讨价还价的作法,所以即令表面上果然开放,事实上美英各国商务利益的享受也必受到种种阻碍。

世界上帝国主义体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矛盾存在,我们不否认,在远东方面情形也复相同,但是两体制矛盾之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在远东方面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似乎还大过两体制间的矛盾,因为英美法与日本的冲突是目前逼切而又实际的问题。整个国际情形的演变,虽

有改变这两种矛盾的比重的倾向,但在目前尚无演至英美法帮助日本侵略者制压中国的可能,“东方慕尼黑”自难形成的可能。

然而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坚持抗战到底。中国为求生存与自主必须对日抗战到底,中国能坚决抱定抗战到底的意志,则英美各国即令一时为日本所诱惑或有放松制日的倾向也有其严格的极限。纵令日本扶植“汪政权”,其无实力为英美各国所洞悉,决无多大的作用。今日我们要提防日本制造“东方慕尼黑”,更要排斥抗战意志的动摇。内部若能精诚团结,信奉“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则敌人“东方慕尼黑”的阴谋自不得逞。

原载1940年4月《战时日本》第4卷第1期



## 日寇南进与对华策略

### ——日寇结束中日战争三部曲

#### 一、日寇军事南进的内因

自今日的国际情势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向看，现在确是日寇军事南进的绝好机会，如果日寇放过目前的机会，或许不久的将来，“大东亚新秩序”的美梦，就会幻灭了。日寇的狂暴侵略者正为此事十分焦急，遂致军部激烈派走卒的中野正刚，甚至主张：“由中国撤兵一部分兵去侵占荷印及新加坡等地，并对英美强硬”（见日寇东洋经济新报社座谈会纪录）。

日寇军部激烈派为着它那“大东亚新秩序”的美梦，竟至不顾内部可能的纠纷与破裂而断然接受希特勒的指令，缔结“德意日军事同盟”。日寇与轴心国家的进一步的勾结，不实现于英法苏三国商谈最热烈的时候（1939年9月前的一段欧洲外交史）。也不实现于英法对德战争爆发的当

时,而却恰恰实现于对我侵略战争经过三年四个月而一切方式的进攻皆告失败的今日,自然不是偶然的。换言之,三年有余的中日战争,警告了日寇朝野人士及一般民众:英勇抗战的中国,是不能征服的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言论最疯狂乖谬的中野正刚,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也已完全改变了观念和态度。他最近对别人“打倒国民政府”的主张答道:“这件事情不可能,我看也不必要。日本人大体由国民的感情上说,并不想再向中国内地进兵去征服×××,打倒国民政府乃次要的问题,我们只要与国民政府协力,使它不为害即可”(同上座谈会纪录)。中野更坦白地承认:“迄现在为止,榨出国力,舍诸沟渠,越发进入泥淖之中,现在必需加以纠正”。这不是中野等疯狂侵略者代言人主观上愿意“加以纠正”的,而实在是日寇一般人民已不能再忍受侵华战争重负的客观事实,逼得他们不能不“加以纠正”,日寇政略已因为三年来侵华战争的徒劳无功,酝酿着激烈的政变,对于发动战争的祸首,已渐有追问的倾向了。这种事实表现在近来日寇两大势力倾轧加强的动态上。侵华战争的祸首,如无办法对付,则必发生激变。

然而战争的祸首绝对不会悔过的,他们惯用的伎俩,是“以毒攻毒”,是用战争移转对于战争的视线。日寇陆军侵华战争的失败,已成朝野攻击之的,结果给了海军及元老重臣派占上风的机会。所以目前在陆军激烈派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转嫁战祸给海军,怎样在政治上压服元老重臣派的优势。前者的手段就是强制海军随它南征,后者的

办法是加强其与轴心国家的勾结。所以率先决定催近卫第二次内阁早产，逼走吉田海相，强制近卫，松岗签订“德意日军事同盟”。军事南进，准备到有声有色，煞像有其事的样子。

## 二、三国同盟与日寇南进

三国军事同盟对于日寇的军事南进，一方面是一种前提条件，同时又是一种刺激。三国同盟虽只是普通的协助条约，并没有攻守同盟的内容，但是日寇的帮凶却依此同盟允许了日寇南进，事实上也因为这个允许而日寇始得南进，才敢南进。在三国同盟未缔结以前，日寇即已对南洋各地蠢蠢欲动，其最大的动机在于英法的战败与荷兰的亡国，乘火打劫无主的越南和荷属东印度，确为最大方便。在日寇心目中英法荷固无可顾虑的必要，但是越南和东印度却换了新的宗主国——德国。所以日寇的南进发生更大的阻力，必须先打通德国这一个关头。此时又值德意对英国作战碰到必需改变策略而欧战有扩大成为世界战争的倾向，德国遂决定强拉日寇入其圈内，用牺牲亚洲的一部分利益，被征服国的亚洲殖民地权益，以作日寇军事南进的条件。于是三国同盟始至完全实现。而日寇第一步，才得占领了越南。据某些消息，最近又暗中增兵五万，以为军事南进，侵占新加坡的基点。三国同盟广泛地给了日寇独霸东方的默契，其第二条规定：“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

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德意还在积极方面给日寇撑腰：“三国并保证：签字国之一，苟被目前尚未参加欧战或中日争端之国家攻击时，彼此应用政治，经济，及军事各种方法，互相援助”（第3条）。

在德意这样积极及消极优容怂恿之下，又在侵华战争无法再进展的环境中，日寇军部遂决定军事南进的原则。军事南进是陆军所极力主张的，但又分成三大派：其一主张先孤注一掷，用军事总攻结束中日战争，闻板垣即其代表者；其二，主张先与中国讲和，然后撤兵南进，陆军的元老派属于此派；其三，主张先撤退一部分据点，缩小占领区，分兵南进，如杉山及东条等人，皆如此主张。总而言之，日寇军事南进的步骤虽未一致，但其南进的原则却已确定。

在这种确定之下，日寇政府遂对阻其南进的唯一力量的美国，大作其外交手势了。近卫首相公然称：“美国如继续拒绝对日本在东方的地位表示适当的谅解与同情，并坚认日本轴心国家签订的军事同盟，为对美的敌对行为，则除日美战争以外，别无他途可循”。松冈外相更谓：“德意日所以缔结公约，其目的即在防止美国卷入欧战”。这是应酬德国的辞令，其实松冈的本意却在于：“日本对于美国的态度及威胁太平洋和平的禁输办法，已感不耐。……日本要求美国国务院须承认远东的新秩序，否则，即须担当太平洋以及世界战争的责任”（皆据10月15日京都路透电）。

日寇狂暴政客及报界，也皆极力攻击美国，并扬言不

惜与美一战。中野正冈10月7日对日日新闻记者公开宣称：“日本必须在东亚各部分采取建立‘新秩序’的有效措置”。中野主张“请英国退远东”，并谓：“英美两国似已在幕后进行谈判，以期使用‘大东亚圈内’的海军根据地，此种计划如将付诸实施，则日本必须先占领具有军略上重要性之各据点以击破之”。中野甚至狂言：“吾人在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东京10月7日路透电）。日报初则叫嚣切断滇缅路（10月中旬），继则主张武力侵占荷印，如谓“荷印一向依赖英美，为使之转移于日本计，……或应诉诸武力”（东京朝日10月23日专论）。终则对美恫吓，如中外商业新闻称：“最近一切报告，皆显示美国极力对日备战，但日本早已准备就绪，一旦美国向日挑衅，日本必立即应战”。

最值得注意的：松冈的狂言经美国还击一度沉默后复于10月13日扬言：“日本必须准备与阻挠吾人努力之任何外国势力作战”（在东京日比谷公开向民众讲演）。诚如日日新闻所载：“日本缔结三国同盟后，日政府在外交方面之意见已趋一致，现已决心积极推进南进政策”（10月14日东京合众电）。

### 三、“世界四分论”的梦想

日寇急激军事南进的世界观，是所谓“世界四分论”。这又和前日寇情报部长河相逢夫所唱的所谓“世界三分论”大异其趣。这里先介绍日人主张的大概内容于下。

“由于欧洲情势的激变而将来的世界经济分野,或将分成四大集团,这已成各方面的有趣话题了。其中,因为英法阵营的总崩溃而欧洲新秩序以德意为中心,出现了一个计划经济下的一大广泛经济圈。与此对立而东亚集团,泛美集团,及苏联集团的成立,似乎是世界秩序当然的形成。从前,占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先诞生,继之,大英帝国自奥大瓦会议以来也形成一大集团。此外,法国也团结其准保护国及殖民地,谋成立法国集团,美国也努力于统一南美各国,结成泛美集团。

然而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德意日,苟欲结成集团,无论如何必须先把世界领土,重新编制。英美二大集团的存在,一手垄断了世界经济的通商,金融,保险,及信用。其他的80大小国家,若离开这个集团的联系则其经济关系立陷于破局。例如就世界贸易的统计看,大英帝国集团即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2%,但是这次欧战的结果,这一大集团中核的英本国已归消灭,其后若果出现了德意中心的欧洲集团,则世界经济阵线,势必发生大变动。

.....

于是世界各方面受其影响,企图制造广范围地域的经济圈以相对抗,形成在新时代自己保持的新倾向。因此,美国努力加强哈巴那泛美会议以

来日益强化的泛美集团,而日本也声明:“于(日满支)之外再包括南洋,以建设广大地域的经济圈的意旨。……”(匝磋胤次《东亚共荣国的确立》——载《改造》时局版9月号)

日寇太不自量,梦想着和苏美及欧洲国家分庭抗礼,形成独立的经济集团。这正暴露了它的经济弱点。日寇表面上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经济上却是世界几个大国的附庸,它若离开中国,英美,及其势力圈,换言之,其经济若离开这些联系,实在马上“陷于破局”。现在,中国这块肥肉噎在喉咙上,依存英美的关系又不可靠,若不及早夺取新的广大商品市场及资源供给地。以代替英美的广泛地域,则日寇经济势必整个发生动摇。今日问题的关键完全系于美国,所以美日冲突和缓则东京股票大涨,美日关系紧张则又暴跌。

今日,日寇当局所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去夺得代替英美广泛地域的领土,其最理想的对象就是南洋群岛。南洋群岛从来对日的经济价值尚低,在日寇总贸易中,只占9.3%,较之亚洲大陆占37.4%,北美占27.6%,实低微之至。但因其现在低微所以将来大有希望。日寇地理学专家评定南洋在日本将来发展上的关系说过:“南洋有1亿以上的消费者,尤其日本为获得军需资源,南洋实有日本贸易代替地的价值”(佐藤弘《太平洋经济学》——《日本评论》8月号)。

因此,日寇决定脱离依存英美的关系决心争夺南洋群岛,南进成了它的国是。

#### 四、日寇南进的绊脚绳

日寇要军事南进,必定和美国正面冲突,以至掀起美日战争。美国非弱小国家可比,日本欲与美国作战,必倾其全国的力量;欲倾其全国的力量必须结束其他部分的纠纷,使无后顾之忧。而拖住日寇战争泥脚的中国及拥有庞大陆海空军的苏联,都是日寇南进的绊脚绳。海参威的潜水艇不但可以截断日寇与大陆的联络,其航空队更可以在数小时内毁灭日五大都市。日人也畏称为一把尖对其心胸的匕首。所以日寇在其决定南进以后,附带地决定亲苏外交,特派建川驻苏联,其使命为向苏联送秋波,并央托德国从中斡旋,欲求苏联与它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达此目的,日寇不惜作最大的让步,据说,甚至有人主张奉还南库页岛,放弃北库页岛的各种矿权及海业权。开放中东路及南满铁路与苏联共用,以为缔约及利用西伯利亚铁路的交换条件。日寇一般民间应声虫,也皆主张:“强化其与德意轴心的协调,调整其与苏联的外交”(《改造》时论版9月号)。以梦想一个德意日苏集团实现。

自经苏联对于日寇先要以外交手段,继又否认史塔林与建川美次的会谈(塔斯社公报),最后且对我国表示继续援助中国抗战争取民族解放以来,日寇的幻梦已经做得不



甚圆滑。这姑且不谈，日寇军事南进最大的绊脚绳，却是拖住它的后腿的中国抗日战争。中日战争恰好经过了40个月，已使日寇上下朝野束手无策，即最狂暴的军阀也不得不主张暂移阵地南进。这因为日寇兵力实在有限，不能鱼与熊掌兼而有之。据白崇禧将军所发表实情：“敌人可能动员的兵力，最大限为75个师团到80个师团。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敌人在华所使用的兵力，最多的时期竟达到42个师团，如果敌人在东北的九个半师团计算在内。那末敌人侵略战争所动员的兵力，已有50个师团之多，达到可能动员的兵力总数三分之二了。在这庞大的动员数字之下，敌人的消耗数字，却更表现得惊人。据敌人自己陆军省的公布，三年以来他们死伤的官兵已有百余万，其中四分之一是死者，四分之三是伤者”（11月4日在中枢纪念周报告）。

日寇在侵华战争上，已动员可能动员总兵数三分之二，欲以所留三分之一的兵力，用在镇压国内民众及朝鲜台湾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再策动军事南进，是绝对不可能的。未来的太平洋大战虽说偏重于海战，但是日寇要争夺新加坡需要相当雄厚的陆军，袭击香港及缅甸等地，更需要陆军。即令其他财政，经济，资源等问题不加考虑而只讨论这兵力的问题，日寇若不收束中日战局，也是绝对无法军事南进的。日寇陆军目前三大南进派之中，据说是以局部放弃占领区，扼守要点之说占着优势。若假定其缩小的范围为板垣停战线打通粤汉路以后采取守势，则10,000公里的铁路和15个大据点的守兵，也需要95万人（铁路守备队每公里20人，

以九·一八事变前南满铁路的警备力的倍数计算,15个据点是绥远、张家口、平津、济南、太原、徐州、郑州、西安、武汉、长沙、广州、南昌、杭州、宁沪等地,平均每一据点以50,000人计算),则可移用去南进的兵数,依然极有限(以上计算根据本刊一卷四期吴平阳之作)。

日寇消费百余万的死伤军队,160亿日元的战费,及3年4个月的时间,(皆据白将军的报告),艰难得来的肥肉,必不轻易放弃。日寇只有在结束中日战争与军事南进中选择其一途,鱼与熊掌已不兼而享之,此点日寇一般人士颇有自知之明,所以外交协会干事田村幸策驳中野正冈的主张说:“应该言行相符,须由打倒国民政府入手。日本人从前看不起中国,并且否认国民政府,要打倒它,现在打了3年,国民政府还没有打倒,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和英美为敌呢?”(上引座谈会记录)

美国大选的结果完全出了日人的希望之外,罗斯福中选连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备扩充将更来得迅速。11月8日伦敦合众社电传“英美澳进行谈话后已缔结太平洋上主要根据地联防协定,俾在接获紧急的消息时,立可采取应付的决策”。华盛顿合众电又传美国财部要求国会批准发行150亿美元的公债,以为完成国防计划之需;摩根索财长并称:“吾人正开始重整军备”。这些事实和消息,真要急死了日寇军部的南进派,但是中日战争这条绊脚绳总是要设法解去的,否则无法南进。

## 五、日寇结束中日战争的三部曲

日寇内部关于怎样结束中日战争的意见,据说分三大派:其一是主张发动军事总攻击,运用军事攻势使中国完全屈服;其二主张放弃广田三原则及近卫声明,运用和平攻势引诱中国上当;其三主张缩小战场坚守据点,抽一部分军队去南进,待南进成功后再来结束中日战争。听说,第三派主张占优势,我国有些人士还误信敌人撤退龙州及南宁为此种策略的第一步,并妄信敌人或将继续撤退若干据点,但是以我的观察,敌人在军事南进前的对华策略,绝对不会如此简单。日寇要军事南进,必定先谋结束中日战争,自目前的国际情势看来,美日战争又无立刻爆发的可能,且美日双方均无立刻开战的必要,则日寇之谋结束中日战争,依旧占其最主要的对外政策的地位。上述日寇的三种主张,可能的轮流采用,甚至同时并用两种或三种。

这三种策略运用的方式,是:(一)谣言攻势(二)和平攻势(三)军事攻势,敌人将轮流采用,可以名之曰日寇结束中日战争的三部曲。

谣言攻势及和平攻势,已经开始,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在10月与11月之交,敌人运用谣言攻势最起劲,东京方面拼命散播中日和平的空气及日寇国际关系的好转,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来华调停中日战争;说苏德意日将结成四强集团;说苏日关系好转,日寇驻苏大使建川与斯大

林曾商过：说苏联将出头调停中日战争，中国将加入所谓轴心集团，甚至于连中日和议的条件也都假拟，载于报上，等等。这些谣言攻势，自经国际上有苏联当局发表公报辟谣，及美国方面罗斯福两次的谈话，指为“全系某某方面所散播；以期分化中美英三国自滇缅路开放后对日本的关系”以后，敌人的阴谋已渐失其效力。上海日文报每日新闻10月24日曾称“德意法三国驻渝大使曾向中国政府建议与日本讲和”。我外交当局即于11月8日发表声明称：此种消息毫无根据，并以抗战以来德意大使迄未来渝相印证。日寇谣言攻势一时始归消灭。

然而继之而来的是和平攻势，此种攻势迄至现在还在继续中，此后恐尚有一个时期与谣言攻势配合进攻，和平攻势开始于部分的撤退，佯示求和诚意，其起点为龙州之放弃，南宁之退出，其后尚有小据点之撤退。此段和平攻势有四方面作用：其一是引诱我国政府，分化我们内部；其二是诱惑英国，欲使其与日寇妥协；其三是分化英美，使不得联合压迫日寇；其四动摇美国选民对罗斯福的信任，使不选举罗氏任总统。但这些苦心丝毫没有发生作用，我国团结抗战愈加坚决，英美太平洋上的联防日益具体化，如英美澳联防办法决定，英国已经开放了滇缅路，罗斯福也被选，连任总统，美国对日的种种设施更可以驾轻就熟，钜款军备费及公债之发行皆已有适当的决定，日寇的狡计已不得逞。

日寇的谣言攻势现在已经完全失败，和平攻势也没有

发生效力，而美英的太平洋合作日益积极化，结果急坏了急激的南进派，这几天日寇政府各方面赶开各种会议，甚至于御前会议非常繁忙，阿部特使已回去，驻美大使堀内，赴南洋的小林，甚至如驻华的军事重臣板垣征四郎，也皆相继返国，日寇此后的对华动向，当决于这几天会议。亲美巨头野村前外相已被派驻美，日寇并没有忘情于对美妥协，英国也要受其影响，和平的攻势还要继续相当期间。

但是日寇的阴谋在我们坚决抗战之前必不能发生丝毫作用，最高领袖告诉中外：我们中国明白这一点，所以不仅决心抗战来粉碎他征服中国的野心，且要以抗战来打破它征服东亚的妄想。……无论敌人南进或北进，均是危害我中国的生存，我们为了自卫及建国，必尽力之所及，来彻底打击敌人征服东亚的暴举，我们中国与所谓“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决不两立（国庆日告军民书）。

日寇谣言进攻及和平总攻失败后，随后来到的必是军事进攻，这是目前对华策略的第三部。敌人虽已无力量作总的军事进攻，鉴于八九月间的事实即可证明，但其集中一点的进攻还是可能的。如果欧战的情势没有激烈的变化，英美太平洋的联防没有更具体的成就，美国对日的压迫对华的援助，没有更积极的作法，日寇收拾“中国事变”就会从容些。它就无须消极的立刻退出太多的据点，抽兵去南进，更无须施用单纯的求和办法。它可能的采军事配合政治的办法，进攻与诱和并用。前此撤退南宁等地，用意若是“以退为进”，那末最近将来的手段，可以的是“以进为

退”了，是为着撤兵去南洋而作一度大进攻，一直到军事南进时机迫切始于无可奈何中真正撤退，而实行其扼守据点的政策，专心去南进。

因此，我们目前还须警惕日寇再来一度军事的进攻，并是其未南进以前竭力予以消耗。正如白崇禧将军的预计，“我们现在只要每一个战区每日能消耗敌人300人，合计一日可消耗敌人约3,000人，一月可消耗敌人90,000人，一年可消耗敌人100万人”。则到日寇南进的时候，其可能留驻的军队就极其有限，我们就可以总反攻，一鼓而驱逐日寇出于我国境外了。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于陪都）

原载1940年11月《战时日本》第4卷第2期

## 日寇南进呢？西进呢？

自去年九十月以来宣传已久的日寇军事南进问题，据我个人的观察，最初日寇还不过是想用外交手势和军事恫吓，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目的——占领南洋各地的资源和市场，以代替日本对英美的经济依存关系。日寇所以悍然和德意缔结军事同盟，表面上虽是军事问题，但是实质上则为外交作用占更大成分。日寇原想藉此手势，威胁英美对它让步，在消极方面缓施对日经济压迫，在积极方面让它得在荷印、越南及泰国等方面设定经济关系及军事根据地。

然而日寇强硬手势的纸老虎为英美所看穿，英美用军备的积极布置与对日的经济制裁，答覆了日寇，日寇主张军事南进的激烈派军阀，逼得没有办法，开始作种种的军事措施，越南及华南沿海的施設，乃至近日在粤南各地的进攻，我们都可以认为是这一动态的具体表现。这是在准备着春季可能的军事行动，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实行正格的军事南进。

但是日寇正格的军事南进，取决于三方面的条件。第

一，德国对英的进攻胜利或已有胜利把握，是最大的决定条件。日寇一向的侵略，是野心大过实力，所以进攻的方式是投机，是选择最弱的部分进击的。德国不占优势，英国反击日寇自可裕如，美国安定太平洋力量更加充分，所以德国没有达到胜利把握以前，日寇对英美的正面突击，还是要观望的。第二，英美对日寇的制裁，若真正积极而有效，日寇冒险发动军事南进，也有可能。日寇之急于南进，在经济而不在于政治，这是日本侵略者觉悟到：从中日纠纷中派生的日英及日美关系，很难有圆满调和的可能，日本对英美依存关系，不是永久可靠的，所以急于夺取南洋群岛以代替英美。但若英美还可以和日寇妥协，则日寇为着“中国事变”的拖累，自不愿也不必要急于多树劲敌，英美对日妥协成分存在一日，则日寇一日不采取正格的军事南进政策。第三，日寇内政上陆军南进派是否占绝对优势，也是日寇正格军事南进的决定条件之一。日寇的政治势力原分两大派，元老稳健派与军部急进派。两派的对外政策很有急缓之差，在军事南进政策上亦然。自去年九十月间第二次近卫内阁出现前后，军部急进派很占优势，所以正格的军事南进的声浪日益增涨，在越南的军事准备更为积极。但是军部急进派无论怎样狂妄，每一行动也要几成胜利的把握，始敢发动，也始能得到全国的支持。迩来因为轴心伙伴意大利军事的挫折及德军进展的停顿，日寇军部急进派很受打击，日寇正格军事南进政策也难免起了动摇。参证近来日寇对美政策委婉及重光葵对邱吉尔一再保证“日本无



进攻大英帝国任何领土之企图”，并称：“太平洋危机业已消散，”斤斤于解释“三国同盟之目的，在防止战争延及远东”。已可想见日寇推进正格的军事南进，以至和英美发生正面冲突，还在踌躇不前的阶段。

国际问题是整个的多方面有联系的，正如我们不能孤立地观察欧洲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孤立地论断日寇军事南进问题，乃至太平洋战争问题。日寇不能专注意南进问题而忘却了“中日战争”，英美也不能专为抑制日寇南进而忘却了欧洲情势的新发展。因此，最近松冈外相才又照会英相邱吉尔，开始对英施其花言巧语。日使重光与邱吉尔谈话25分钟，专讨论英日关系以及远东时局问题（3月6日各报）。日寇提议泰越调解条件，法国承认越南割土，英美也没有什么特别表示，此后太平洋问题的新动向，更值得注意。不过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是，轴心国家的春季大攻势中，日寇或者在正格的军事南进前，先以进攻我们各地特别是重庆，用解决“中国事变”配合德意在巴尔干的行动也未可知。再重复一句话，在上述三种条件未妥善具备以前，日寇正格的军事南进以至掀起太平洋大战，恐还有待，而中日问题仍占重要地位。

日寇今日的内外情势，已逼得它的对外政策，须谋以政治配合武力，对华政策与对英美政策并驾齐驱。

## 日寇东亚圈外的圈圈

迩来日寇朝野皆以建设“东亚共荣圈”为其口头禅，但其阴谋所在，全世界有眼光的人士，没有不洞悉其奸的。东方文化协会会长于右任先生即曾以幽默有趣的口吻批评过：“日本人的这个圈那个圈，事实上都是我们死它们活的毒圈”，而日寇今日的毒圈，又不只限于东亚，据他们自供，要随实力与需要扩大这个“圈”，我们可以说日寇要无穷尽地在其圈外加圈圈，终极的目的非至圈完整个世界不止。

“欲征服世界，须先征服中国”的陈话（据《田中奏折》），姑不提它，即自最近的几樁事实加以考察。其野心也已毕露于世界人士之前了。日寇朝野以前所谈的是“东亚新秩序”。而自去年九十月间德意日军事同盟成立前后，近卫政府即便在“东亚新秩序”上面加个“大”字，这是日制“东亚共荣圈”的扩大，但是这个“共荣圈”不只是扩大，事实上还在圈外加圈。近卫政府一面加一个“大”字于“东亚

新秩序”上,另一面又宣称其范围包括南洋群岛。

继近卫政府的宣言之后,在“共荣国”外再加圈的,是日寇前任军事参议官高桥三吉海军大将,他确定道:“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即以满洲国为起点,南伸及于澳洲,西及于孟加拉湾与缅甸,日本依照其国力与领域的需要,逐步得由满洲国、中国、越南、缅甸、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太平洋若干海岛、菲律宾、澳洲、及东印度若干地带前进”。东亚的圈绝对圈不了这么广,圈外的圈又多了几层,大了几倍。日本不但退伍军人如此主张,即其负责人的外相松冈,也曾一再公开宣称过。松冈1月26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演说,要美国“竭力在西半球方面取得控制势力,在其他地域如日本享有稳定和秩序力量的东亚方面,自以避免多事干涉较为合理”。2月24日又在众议院决算委员会上答福田干次郎的质问说:“……南北1,200哩,东西一千哩之大洋洲,务必成为亚洲民族移民之地带,……本人认为白种人既不易于大洋洲依照其理想实际上推行政务,故务必以此转让与亚洲民族”云云。

日本侵略者圈来圈去,非把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全部圈进去决不停止。然则日寇圈进去这么广的地域,做什么呢?日寇外务省的一种秘本,主张组织“极东协力组织”,说道:“诸民族经过这一联合,放弃其利己的立场而归着于极东的立场。日本则先于极东努力于实现理想的协力组织。及其实现后,如有自发参加的国家,则欢迎其参加,或在实力

所及的范围内扩大组织,渐次努力于‘掩八纮为宇’的建国理想之实现”(据本期孙哲生先生大作)。

日寇野心要建设一个世界联邦,但这又是以日本帝国为主人的世界帝国,他们的指导原理就是所谓“日本主义”。他们对国际宣传,说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主张一切的土地与资源,皆属于神或天皇所有,日本领导下的协力组织,有权限变更各国的领土,分配各地方的资源,他们虽然常说尊重欧美各国的权益,但又主张“极东的立场”,以与欧美各国的立场对立。他们对欧美各国谈亚洲问题时主张民族主义与民族解放,但对亚洲诸民族谈同一问题时则又主张“爱他主义”,而所谓“爱他主义”就是“内政干涉主义”。这很显明的,日寇欲以自己为主人而以其他亚洲诸民族为奴隶,来建设所谓极东联邦,同时持此联邦以与欧美对抗,驱逐欧美人士于亚洲之外,然后再“依照实力所及的范围”,逐渐侵吞世界其他各部分。

日寇的东亚圈,已由中国一部分失地圈到中国全国,又圈进了南洋群岛,最近又加上整个大洋洲,要求白种人退出去。今日最严重的问题。不独是英美两国与日寇争霸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英美两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存亡的问题。英美法等国过去曾经坐大了日寇,现在再不能予以姑息了。这是本刊两年半来向世界正告,乃至大声疾呼的。我们英勇的战士已在日寇所画的圈内抗拒强权垂3年又半,此后还要精诚团结抗战下去。凡此种固然要靠我们自力更生,但是英美法荷也应知援助中国以自助,并且及时给

与日寇以迎头的痛击。希望国内外人士精读本期所载孙哲生先生大作《日本极东协力组织大阴谋》，以窥日寇野心毒计的全貌。

原载1941年3月《战时日本》第4卷第6期

## 再论日寇南进呢？西进呢？

去年八九月间我国大部分人即喧嚷着日寇立刻南进（当然是正格的军事南进），笔者则主张日寇当时只能做经济南进（见“中苏文化”座谈会），果然迄今八个月日寇对英美战争还没有爆发。三个月前大家又嚷着日寇此次必定南进，笔者则在本刊上撰一“日寇南进呢？西进呢？”的短评，后来事实证明了日寇加强封锁我们的沿海，进兵北线，同时对我军事与政治的攻势并施，尚无决心与英美一战的意向。现在又到大家嚷着日寇正格南进以与英美决斗的一个新阶段了（5月4日政治部文化界辩论会的风光，就是一个例证）。事关抗战甚巨，故特更检讨一下。

自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以来，我国各方面皆起了莫大的冲动，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断言日寇立刻整军南进以与英美比个高低，而我们的挨揍，可以缓和一下。因此所谓“塞翁失马论”遂为某些方面所主张，而一向富于侥幸心理的一部份同胞，鼓掌附和。

然而我们应该知道苏日协定不是日寇军事南进的决条件，而日寇一贯的外交策略(包括政略与战略)是“重点主义”。日寇带着先天的贫血症，它的人力，财力，物力，乃至各方面的条件，皆不许他们的野心家作全盘的统筹的计划，他们尽管标榜什么“大东亚新秩序”怀抱什么“征服世界”的野心，但是实际的作风究竟不能如希特勒的咤叱风云，大刀阔斧地干；他们只能够一点一滴地干，偷偷摸摸地做，每一阶段的目标总是集中在某一极小局面之内。过去四年的对华作战是如此，此后应付世界变局，也将更是如此。

日寇现在希冀南进，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它主观上的希望，正和它企图“征服世界”，有百步与五十步的相似。但是客观的情势怎样呢？这一阶段的国际情势还没有具备充分的条件，使日寇实行正格的军事南进，去夺取新加坡及荷属东印度(请读者注意“夺取新加坡及荷印”一点，因为日寇现阶段的南进目标，应当在于完成“大东亚共荣圈”，完全控制太平洋，欲达此目的，不夺得新加坡及荷印，则在军事上不能破坏形成中的英美的“澳亚地中海”的坚固根据地，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自给以支持长期战争)。

第一，日寇自己也觉悟到美日战争是一场恶斗，长期的战争，所以需要充分的物质准备，以前所积蓄的物资不幸已全部消耗在四年的侵华之战上，在新的物资积蓄未成功以前，掀起更大的战争自要十分戒慎。日本海军法西斯

代表言论者高桥三吉,就是这样主张的。固然日寇也可以对南洋施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夺取荷印以为补给地,但这又如高桥三吉所讲的,“荷印并没有和日本在地理上联在一起,在夺取荷印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中途被截断;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荷印未拿到手,其他各部分如印度,马来半岛,菲律宾,澳洲,美国,中南美洲等地的资源,先已断绝来源。这于日寇在立国上是一种最大的致命伤。日寇不能不充分考虑最安全的办法。换一个角度来看,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远东最大海军根据地无恙存在一日,则日寇一日不能轻易夺取荷属东印度,侵占荷印固是目的,夺取新加坡却是必经的手段,而这又是一种绝大的难题。所以能够“和平南进”,就和平南进一日。

第二,英德的地中海,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德国集中力量以期达到扫荡英军的目的,但是英国因为欧洲立足点所系,欧亚联系关键所在,也集注全副力量在保持地中海的两头据点。因为北非的关系,英国在这里还拥有相当的方便。在这场的恶斗上,德国要获绝对的胜利,似乎还有相当的时间。而在日寇呢,正期待着德国切断苏伊士运河,把英国舰队困在这个运河以西,不能经印度洋驶来远东的时候,才好发动正格的军事南进。这次松冈见希特勒时,就是拿这个理由,做日寇搪塞不敢贸然军事南进的口实。在德国未获得绝对优势以前,日寇还不敢冒险得罪美国而自陷于绝地。何况英美对日寇,尚无采取断然的手段的意向?!

第三,日寇尚未忘情于“东方慕尼黑”的收局,希望中



中国中途屈服，使它得以拔出深陷的泥足，恢复全国的元气。最近日寇逼迫我国屈服的策略是军事与政治并施，一面攻陷我闽浙海口，进兵北线，一面则散播和谣，以行其政治攻势。日寇此刻在外交上又施用缓美吓英的手段，对美国极尽其谄媚能事，对英国则要求其再封闭滇缅路。就这几天英美的态度考察，日寇的外交战似已失败，但对中国的阴谋，则相信还要排演下去。即今日寇主观上急于南进，但是这一把戏至少也要排演到地中海战争告一段落的时候。简单一句话，结束“中国事变”才是日寇本阶段政策的“重点”所在。

第四，日寇现政府不是军事南进派而是强调结束“中国事变”的现状维持派。陆军死硬派虽然倡言大规模南进，但是一般资产阶级，特别和输出贸易有关的财阀，及他们支持下的政党，元老重臣派等，皆反对军事南进，他们代表者的近卫政府，愈加改组愈是维持现状的成分占浓厚而反对太平洋战争更激烈，所以在日本现政局未大变动以前，日寇绝无决心与美国一战，尽管日来日本报纸又在鼓吹，狂叫。

日寇对于苏日中立条约发挥的作用，就是外交的神经战，而尚无决心作正格的军事南进。这正如蒋委员长敬告英美诸友邦的演词中所分析的：

“自中国抗战以来，将近四年，实已将日本国力消耗大半，目前日本实无余力可遂行其预定侵

略之计划与其侵略之野心，而达成其上述政略战略之目的，(指侵略太平洋处分美国)。因此今后将采一种买空卖空，卑劣手段来挑拨离间太平洋上各国之关系，而以种种威迫利诱之行动，间接的仍想达到其各个击破，依次侵略之目的，此则为太平洋有关各国所尤应特别警戒者”(欢送詹森大使致词——5月12日各报)。

领袖的分析非常正确，日寇目前“依次侵略”之“重点”在解决“中国事变”，太平洋各国仍只是其“威迫利诱”的对象而已。中央社伦敦5月1日国际电所传“据此间日方高级当局称，此后日本外交上第一重要步骤，当为企图改善对美关系，并设法成立谅解，维持太平洋上之和平，日本现益感不愿参战，并设法获取保证，不再参加此后之战争”，不见得完全是烟幕吧！领袖更正确地结论：“……因此，可知日本今日之战略政略，与其侵略之传统计划，以及其实际上所采取之行动，实无一不暴露其先处分中国再来处分美国之阴谋与野心”(同上致词)，我们如何能存侥幸之念，而不深加警惕呢？！

(5月10日)

原载1941年6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2期

## 日寇欲勾结德国平分世界

日寇在侵华战争达四年的今日，陷入一个极端矛盾的苦闷中——即一方面食欲非常亢进而消化则极度不良。日寇在“东亚新秩序”上加一个“大”字，把南洋的几乎全部包括进去，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情，现在又提议取消美国在美洲的霸权，限制美国权力不得越过夏威夷群岛以西，限制苏伊士运河上英国的控制权，以便利它侵夺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并欲解除苏联在西伯利亚与海参威的武装，使它得在亚洲大陆上肆行无忌。质言之，日寇对英是要尽夺其亚洲的殖民地，对美要夺去太平洋属地的大部分，对苏要侵占亚洲的全部领土。这是日寇外务省机关报《广知时报》4月30日所提议的“和平条件”里所列的一部分，可见日寇现在的食欲如何亢进了。

对于日寇的这一和平提案，我们首先应该认识的，是日寇欲勾结德国平分天下。提案中虽屡言“轴心”，但是意大利则被列为德国的附庸，事实上是主张德日分别独霸欧亚两洲，对于美英苏暂允其偏安于极小部分，留为第二步

的侵吞对象。若就其和平提案的内容分析,可以分三方面来考察:

(一)德国统治区是:1、英国海军退出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由英国与轴心国共管;2、北非洲自直布罗陀以至索马利兰之区域,应由轴心国处分;3、南非联邦取得完全独立,非洲其余英国殖民地交由轴心管理;4、欧洲大陆于德国控制之下成立合众国,各份子之政治合作须以柏林之意见为根据。

(二)日寇统治区是:1、除已得领土及彼认为已归控制的中国领土未提及者外,还有太平洋方面,美国势力不得逾越夏威夷;2、美国还须允许日寇势力侵入中南美洲;3、太平洋各岛建立共管区域,推行合理之合作,并须聘用日本顾问(实是太上统治者);4、苏联解除西伯利亚与海参威之武装;5、欧洲合众国的东南边境及范围尚待未来解决,实际意思是由德日共同处分近东领土;6、言外,日寇应占领英国的全部亚洲殖民地。

(三)留下的,只是:1、美国局促于北美,若干部分还须让与加拿大;2、苏联不但须解除西伯利亚及海参威的武装,欧洲部分还须归入轴心本位的合众国;3、英国完全孤悬于三岛中,加拿大似乎还要它独立;4、意大利实际附属于德国。

以上剖述,日寇的野心如何扩大可知。但是这种提议当中却表现着一点,日寇外强中干及言不由衷,日寇这种提议,依旧是试探英美的态度,想借日苏中立协定之成立

对英美来一下神经战,提出较高的价格,让英美来还价。从反面来看,日寇如果视为今日是军事南进以夺取英美的太平洋殖民地的最好机会,则必偃旗息鼓整军而奔,自无再多此一举,提出莫须有的所谓“和平计划”的必要,从此点可看出日寇胆怯力量不够,还冀待着一个“不战而胜”的结果。

这个“不战而胜”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是日寇海军法西斯代表论客海军大将高桥三吉所说的“和平南进”。日寇希望在英美允许的前提下管理南洋群岛,享受南洋各地的特种资源,英美主权外的地方,如安南及泰国等地,则归它控制与操纵。这是经济的南进,偷偷摸摸的南进。第二,是要英美停止援助中国,以便它逼迫中国屈服。这就是所谓“东方慕尼黑”的局面,迩来日寇一面媚美吓英,一面进攻我北线封锁我沿海,再一面又加紧散布谣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当然不是偶然的。

然而日寇的阴谋是徒然的,对于英美的试探已得到美国的反击,赫尔国务卿已于30日公开重申美国的态度,称“在极权国实行军事征伐之期间,并无和平可言。”继之而来的就是罗斯福总统及斯汀生陆长拥护民主反对侵略的演说及加紧美国军火生产的实施。日寇欲“不战而胜”的第一目标,显已失败。但是第二种目标却要更加紧进行。我们除警告国人加深警惕以外,切望英美两国政府及远见人士明察日寇的整个阴谋。

我们的领袖说得透彻,《广知时报》4月30日发表的世

界和平计划，其性质与民国27年11月3日日本近卫首相对中国所宣布的“东亚新秩序”，实有同样的意义，亦可说此即日本对美国所宣布的“太平洋新秩序”，日寇将“先处分中国再来处分美国”，“此后更将采取一种买空卖空之卑劣手段，来挑拨离间太平洋上各国的关系，而以种种逼迫利诱之行动，间接仍想达到其各个击破，依次侵逐之目的，此则为太平洋有关各国所尤应特别警戒者”（欢送詹森大使致词）。

今日，德日平分世界的阴谋能否成功完全取于英美能否及时打击侵略，积极援助替他们打击侵略者的中国。此点，至盼英美两国人士多加考虑！为今日太平洋的权益，为将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存在而多加考虑！！

（5月13日）

原载1941年6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2期

## 美日谈判的展望

美日谈判在乍松乍紧一推一拉的情形下继续两个多月，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论者或谓此种变化由于日本内阁的更迭，我则谓其动机已开始于若杉之赴美，近卫内阁坍台已于其时露其机微。更具体言之，国际情势新变化及其趋向，促使日本改变策略而这又改变了对美的态度，若杉赴美前后，日本对美的态度，可能完全不同。

近卫第三次组阁及其所执行政策，可说是现状维持派（以元老重臣力量为背景）的最后努力，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在于“和平”解决暴力造成的“中国事变”，所以当时对美是央托的，依赖的。但是3个月来苏德战争的变化，也使日本的对外政策起了变化。当希特勒使用最大的力量一再冒险进攻苏联而得到多少进展的时候，特别是到德军迫近莫斯科的时候，日本更大冒险的冲动骤然增大。另一方面3个月来，日本又眼看英美苏联合对德的步伐并不十分紧凑，只见雷声大而雨点却小之又小，它遂对于反侵略阵线的压迫发生轻侮之意，而其追随德国进行更大冒险，终于下了决

意。第一个步骤就是攻苏的冲动。其次当然要看德国炮口南转后的情势如何,再决定其在太平洋上的实际行动了。

外交常走在战争的前头,日本目前对美的外交,已不复是央托的依赖的了。若杉赴美后,对美姿态自然是战争的,强硬的,试探的了——为着战争而持强硬的态度玩弄试探的手段。日本目前确实需要更大规模的战争,但又须看看美国的颜色以决定步伐,所以必须试探清楚日本扩大战争到何程度,美国仍可忍受。若日本北攻苏联而美国仍可旁观,则日本攻苏必早,若日本南侵泰国而美国准备仍未充分对日作战尚无决心,则日本也可以再向南前进一步。在美国方面也洞悉其奸,认清美日的根本矛盾已不可调和,美日战争或终不可避免,所以一面对日委蛇,拖延时间,一面则积极准备,求其预定的军备早日完成。日本要美国允许它继续由美洲及南洋获得战争资源,所以对美虚与委蛇,同时它又要攻苏希望美国不要因为援苏而起冲突,故又对美用其恫吓的口吻。东条内阁成立后外务省机关报英文广知时报即向美国提出警告,软硬并施,称:“美国倘仍利用海参威为运输美国物资赴苏之路线,则战争有延及远东之虞”,但接着又谓:“美国如欲对苏实行有效适当之援助,则太平洋关系之改善,当于美方有利,此种关系之调整,应以正确理解“东亚和平机构”中之日本政策为基础,美国倘欲有效的援助苏联,并欲使援苏物资经由海参威运苏,则善意的日本,自极重要”(10月20日社评)。

日本现正有求于美国,为着安定其在中国的立场,为



着确保其来自美洲及太平洋的战争资源。但其对美的要求,到央托依赖的手段不能得到结果的时候,就改用强硬的恐吓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加强,正与莫斯科战争的紧急程度,成正比例,因为德军逼近莫斯科一步,则日本北进的冲动增高一分,而对美的上述要求加紧一尺。东条内阁虽然不一定就是战争内阁,但最低限度总是“暴躁的”临战体制。“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的幻想,到了东条才算变成了现实的希望。新海相岛田繁太郎10月19日向全国发表谈话,竟称“日本海军已完成一切准备,不仅拟解决‘中国事件’,且拟应付当前局势中之任何变化”。继之而各报应声加强日本对美强硬的主张,可谓极尽其恐吓的能事了。

谈到这里,我们自要敬告美国一句话:日本已急切需要战争,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美国对日的谈判必无结果,应该及早放弃与日谋和平的幻想。即令日本仍称“竭力解决中日事件”(岛田之语),但其手段却是欲以战争结束战争,以更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中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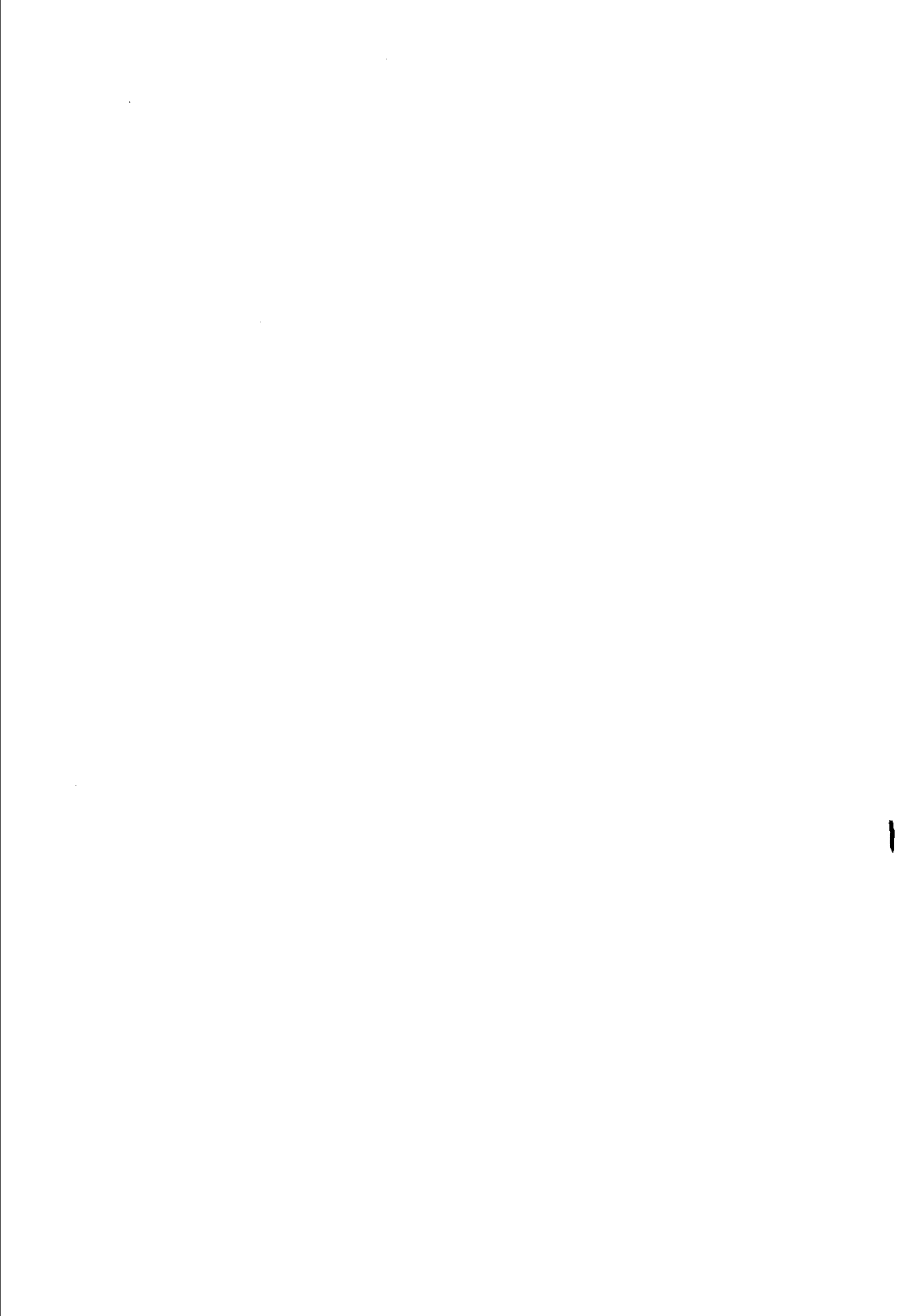
(10月23日)

原载1941年11月《战时日本》第5卷第6期、第6卷第1期合刊

卷 三

第三辑 日本军事外交

---



# 东条内阁内外动向的检讨

## 一、为何先南进

当近卫将首相交椅让给东条的时候，日本的临战体制已被推到参战的前一步。当时剩下的问题就是北攻好呢？南进好呢？当然，这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日本朝野，持北攻之论者有之，主南进之论者也有之。前者以荒木贞夫为倡导者，他回想当年“出征”西伯利亚的经过，常以日本功亏一篑，深感遗憾。去年8月15日他还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日本应贯彻攻苏的主张，意谓：“……忆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吾人出兵西伯利亚时所获经验，不论多大抱负，满腹经纶，即有一定方针，若无贯彻始终之决心与奋斗到底之毅力，终至功亏一篑，当时情形即是如此，吾人出兵西伯利亚，即缺乏其最后之努力，为未收如期战果，今仍引为遗憾。历史不断循环，此理今仍不变”。言下嘘嘘，大有无上感慨之况，但事实不如是简单，荒木尽管作其北攻未圆的美梦，但南方资源的引诱，更为强烈。日本北攻的前提，是南

进的成功，即其内部的稳健派，如元老重臣派及财阀等，也皆反对北攻。日本北攻苏联，为一极大冒险，即令不于短期内为苏联击溃，其作战也必拖延很久，军需必不能继续。欲作长期战须先安定战争资源。当时美国对于日本北攻，也监视甚严，日本在未探得美国真意以前，北攻更为冒险。美国要求日本根本改变态度，始逼日本内阁更迭，东条虽然武装了内阁，事实更不能不考虑美国态度，故须先解决南方问题而后北攻。是以东条内阁一面喧嚷北攻，同时又加紧对美的谈判。

在美日谈判进行中，日本军部一再对美故作恫吓之词，自非偶然。上海敌军机关报，《大陆新报》，以《德军胜利所给予国际政局之影响》为题，大发厥论，称：“美国亟切盼于苏联未被德军击溃以前，由美日会谈求得对日和解；日本此时无须亟亟期待美日会谈有何成果。德军在苏之胜利，已最令日本在国际政局中之地位，趋于有利，英美此际不如重新承认远东之事委诸远东人之原则，方为得来”（去年9月22日）。

该报更于去年11月7日倡言：“东条内阁之成立即以大胆打破此僵局（指美日谈判）为目的”。当时，日本的外交重心在南方，南方政治问题不能解决，北进攻苏自是失其理论的根据，没有北攻的经济基础而倡言军事北攻，终于变成空论。南进的理论终究赢了北攻的空谈。日本军事评论家及经济专家，提供了更确切的理论根据。

## 二、南进的理论

日本朝野自前年以来因侵华战争旷久不决，乃高唱其“东亚共荣论”，企图扩大战争范围，欲于“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其公开倡言征服的地域，已经扩大甚多，但想深虑切之士，尚不敢明言西伯利亚，而限其“共荣圈”于包括南洋各地。当时日本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自己的经济关系须依存于英美及其势力圈，但受英美的经济制裁日益加紧，又须摆脱英美以自立。这才是北攻的界石南进的推进机。所以日本一般盛倡：改变从前的经济观与世界观，以确立包括南洋的东亚共荣圈。日政府当局也一再声明南洋为“东亚新秩序”的一环，南洋已非单纯通商外交的对象，甚至扬言南洋为其生命线，而欲排击第三国势力出于线外。当时，日本对外行动的代表指出如下：

- 第一，日本的经济机构，摆脱依存英美的体制；
- 第二，强化德意日轴心的作用，调整苏日外交；
- 第三，如不得已时，日本须有对英美行使武力的决心。

——日本军事评论家匝瑳胤次，去年《改造》时局版9月号。

匝瑳氏于是提出世界经济四分论，以为未来的世界经

济,必将分成欧洲“部落克”,东亚“部落克”,英美“部落克”,及苏联“部落克”。当他论所谓东亚“部落克”时,也不过主张:“东亚国防体制的确立,必须荷印、安南、菲律宾、泰国及马来亚的参加”。日本必欲先得南洋,经济的动机大过战略的动机。

### 三、南洋资源的引诱

日本经济对外的依存性,还尚极其强烈:原料须由外国输入,制品又须推销于外国市场,近年来依存美国的程度,骤然增高,1939年日本对美洲的贸易总额达185,500余万元,在日本对太平洋贸易总额中占至37.9%。只就美国及加拿大言;即占至36.7%(据佐藤弘著《太平洋经济学》)。美国及加拿大的资源极其丰富,对日贸易年年出超,其输出物品,为战争、工业生产乃至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棉花、石油、钢、铁、机器及零件(包括飞机)、木浆、木材、镍、及制品、铅及其制品、半制品、全制品。美国对日出超为36,000万元。加拿大出超也约11,000万元。日本输美加的物品,以生丝为大宗,属于奢侈品。于此可知日本经济机构如何依存于美洲,一二年来,日本经济学者高声呼叫:日本须急速改变其对美洲的依存关系,而美国敢于对日表示强硬,原因在此。

日本欲改进对美经济依存关系的方向,在于开拓西太平洋以代替东太平洋,质言之,即确立日本的西太平洋经

济圈,包括香港、安南、海峡殖民地、菲律宾、荷印、澳洲及新西兰。这些地方,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止,在日本对太平洋贸易中占很低的地位,12.4%。但是这些地方的资源,却强烈引诱着日本。安南及泰国的米产,澳洲的羊毛,海峡殖民地及菲律宾的铁、锡及橡皮、荷印的石油、金鸡纳霜、胡椒、橄榄油、橡皮、椰子、茶、咖啡、砂糖、烟草以及各种矿产,都是世界的名产。单就荷印讲金鸡纳霜年产10,0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3%,胡椒产额占世界82%,橄榄油占世界第一位(22万吨),橡皮年产30万吨,椰子年产38万吨,皆占世界第二位,茶、咖啡及糖,占世界第四位,米占第五位,烟草占第六位。又在矿产中,锡年产740万吨,占世界第三位,原油产740万吨,占世界第六位。其中尤以苏门答腊、婆罗洲及爪哇,石油藏量甚丰,其年产量约当日本产量36(?)万吨的21倍,约当日本年消费额388万吨的两倍(以上均据佐藤弘同著,载日文《日本评论》1941年8月号)。

此外,南洋各地还拥有13,000万以上的人口,对于日本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品,如人造丝织品、棉织品、生丝及人造丝、纤维原料,都是一个大主顾。这么多的人口,以前对日货的购买,虽不算太大,但若其市场归日本独占后,情形自必两样。此种情形若与西伯利亚比较,直如小巫见大巫。南洋的气候,又为日本人民所喜欢,西伯利亚的寒冷及干燥,日本人民大多视如畏途。所以日本北攻的意义,军事重于经济,仅就军事战略一点言,南洋地位也甚重要,西隔印度洋可与欧洲非洲毗连,东临太平洋而与南北美洲混成



一片,日本欲与英美争霸,南洋为必得之据点。

企图独霸亚洲而又处于资源饥饿线上的日本,自然不能不注视此经济军事重点的南洋,日本攫取此地资源的方法,原有战争与政治两种方法,日本政府未尝不想以政治方法达到目的,故在年底以前日本的南进武力只推至安南,一举一动,都要看看美国的脸色。

#### 四、对美谈判无结果

日本垂涎着南洋各地的资源,认为这些地方没有抵抗力量,即其宗主国的英法荷也已暴露无力,支持颓势的唯一柱石,就是美国。美国已成日本南进的眼中钉,而必须拔去,其方法不是亲和就是战争。

希特勒用尽种种的方法,要拉日本北进夹攻苏联;强迫维琪政府割让安南给日本,率先承认伪汪政府;但日本为其自己打算,始终保持观望态度,努力首先解除后顾之忧,美日谈判遂至断断续续拖延了两个多月,日本对美外交,在近卫的任期,没有放弃亲善的幻想,美日能否媾婚至东条上台前夕,达到非要决定不可的阶段。东条内阁对扩大战争,在其上台时虽已弯弓勒马,势在必发,不能北攻也须南进,自日本看来,其关键完全在于美国的真意与虚实。日本已非迅速确定此真意与虚实不可了,于是,继野村之后,增派来栖,用意已略与以前不同,再遣若杉□,态度暴露出更积极而焦急。

走在战争前面的日本对美外交姿态，吾人早即论及，日已不复是对美依赖、央托或恳求，而是刺探的、强硬的、战争的了。日本必须以强硬的手势，刺探美国的真意与虚实，以决定战争的步伐与方向。日本的腹案是：德国若能很快攻到莫斯科，则可发动国军北攻苏联，否则不暂观望，亦须改变方针。同时美国若肯袖手旁观，并由它在美洲南洋等地采购战争必需品。则日本北攻的勇气，也可以增加，因此，东条上台后对美的态度，仍是硬中带软。例如日本外务省机关报，英文《广知时报》当时曾对美国提出警告如下：“美国倘仍利用海参威，为运输美国物资赴苏之路线，则战争有延及远东之虞，美国如欲对苏实行有效适当之援助，则改善太平洋关系，当于美方有利。此种关系之调整，应以正确理解‘东亚和平机构’中，须以日本政策为基础。美国欲有效的援助苏联，故欲使援助苏物资，经由海参威运苏，而善意的日本，自极重要”（1941年10月20日社评）。

但以美日的根本矛盾无法调和，终致日本所希冀的美国姑息政策落空，实际所表现的，只是态度强硬而包围日本又日益加紧，渐显经济制裁到军事包围的姿态。美国虽无意即与日本战争，但其愿以经济制裁及军事包围两把刀夹迫日本屈服，却是事实。日本方面由海军出头应变，东条的海相龟田繁太郎，10月19日向全国发表谈话，竟称：“日本海军已完成一切准备，不仅拟解决‘中国事变’，且拟应付当前局势中之任何变化”。这不但是对美恫吓，并是对日本国民的警告与暗示，所以日本各派均应声强调对美战争

的准备。

美日谈判露出无改善结果的希望时，日本完全确定了狡猾的手法，一面继续侦察太平洋的情势，一面准备伺机而动。所以在美日谈判还打得火热的时候，日本海军节节向南太平洋集中，狐嘴向北嚷，而魔手却向南伸进。前缅甸总理宇素向日本第五纵队，供给秘密资料，加强了日本海军发动的勇气，太平洋战争终于在英美军人还在安乐过周末的时候，突然爆发了。

## 五、“战争”与日本内政

日本采用自杀的手段南进，特种潜艇、特种飞机等等的采用，直以日本人民为战争机器，由于这种莫大牺牲与非人道的自灭政策，赢得了太平洋上暂时的胜利，武力南进获得了意外的成果，东至阿留申群岛的北端，西至孟加拉湾，南至澳洲中部，皆为兽蹄所践踏。同时，在自然条件上也算占住了南洋丰富的资源，特别是战争资源。

日本南进的一时成功，是军部冒险家的成功，直接影响日本两大官僚势力，起了决定的变化。元老重臣派不愿意扩大战争，而军部悍然为之，并且得到一时的胜利，于是军事官僚的气焰大涨，贵族官僚及其他的稳健派，在政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近卫辈人几乎完全退到后台，本届总选举的结果，民政与政友等有关的议席大为减少，而亲军派政党的议员，占了压倒的多数，政党的力量渐以大政翼赞

会为桥梁,建立起军阀支配的单一政党,今年5月20日已经正式成立了翼赞政治会,今后日本政治动向更加显明。

翼赞政治会的宣言,强调“政治力结集”。这个口号自第二近卫内阁末期革新派即已提出,他们原想以政治新体制为号召,以大政翼赞会为帅领,组织单一政党。当时大政翼赞会已为革新派所操纵,现状维持派乃起而攻击,指为“违宪”“赤化”,结果革新派的计划失败而退出了大政翼赞会。革新派被驱出翼赞会之后,一面攻击“大政翼赞会革新性的褪色”,一面则进行新组织,欲用以代替大政翼赞会。

革新派早即企图组织革新的政党,乃拥当时的首相近卫为总裁,但近卫对于组织新党,并不积极,只称:“翼赞会是公事结社,是推进翼赞政治的议员机关,无团体意识”。后来革新派的施設又为稳健派所攻击,大权终又落入稳健派手里,革新派觉悟出欲由大政翼赞会完成“政治力的结集”,已不可能,于是重新发动“第三政治力结集”的组织。

大政翼赞会是拥护近卫文麿的团体,翼赞政治会却是东条政府及战时内阁时代的产物,时代性不同,意义也就不同。翼赞政治会推阿部信行大将为总裁,石渡庄太郎及旧政友会及民政党的重要分子,任该会常任总务,会内设事务局,遇必要时尚可设立其他机关。除陆海军大臣外各省大臣皆参加,贵族院及众议院两院议员,除参加其他政治结社者外,也可参加。此外,尚有大政翼赞会重要分子,

皆在网罗之列，据同盟社5月20日电，被邀参加翼赞政治会的人数，达1,044名，迄举行成立大会之日止，确实参加者共932人。翼赞政治会全是东条政府支持下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正与近卫政府支持大政翼赞会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东条没有任总裁，而以阿部信行代为其名，而自任实际的总裁，这固然由于东条名望不如近卫，但作风却比近卫之为半傀儡者又胜出一筹。东条较重实际，翼赞政治会规定由首相担任监督，由各省大臣担任会内各种运动团体的指导。据5月15日，日本情报局正式发表的政治会内部机构，包括了各种“国民运动团体”，如“工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以至“妇女”及“青年”等团体。

## 六、南进后的北进问题

“战争”的一时胜利，不但决定了日本政治的动向，并且决定了外交的行使，这确是日本近年史上一个划期的发展。

军部梦想多年的“公武合一体制”，实际上得了第一步的成就，东条对外政策的决定，可较为自由了。于是北攻苏联的空气又弥漫于远东，据说问题只在于东条政府与关东军之间的磋商，日本北进的可能性，确实增大了。

日本在未武力南进或南进而未得告一段落以前，日本军阀的北进论，自然受到元老重臣派及财阀们的反对，他们诚恐日本会因北进而经济体系瓦解，今以南进占了南洋

的资源,精神上已得到安慰。东条在未经选举及议会未召开以前,也不敢轻言北攻苏联,因恐遭元老重臣派的反对与抨击,乃峰选的结果,亲军派政党占了绝对的优势,“无风带”的战时议会,更是风平浪静地结束,闻日军已集中重兵于北湾,进攻苏联确实跃跃欲试。

但是日本在北进声中存在着一个难题,那就是中国这块“绊脚石”,还没有安置妥当,我国英勇抗战已满五年,日军用尽所有的方法不能解决,武力南进扩大战场至两倍之广,仍不能解决,北进战场与我国□□□关系更为密切,故应考虑之点更多。在德国攻苏未占全胜以前,日本决无北进的勇气,而在此犹豫观望之间,可能为安置这块“绊脚石”而用其力量。曾经施用过和平攻势,但在英美参战的今日言和,这足证明日本政治家的低能。实则,只有用兵。为防御其本部的空袭,打通大陆与南洋的陆运,节省船只一二百万吨,也有必要。这是我们应该警觉的地方。我曾强调英美联军目前的战略上的重点,应当是在于加强援华,因为加强援华,才可以打退日军,围剿匪穴。

原载1942年9月20日《广西日报》

## 日本战时外交及其动向

### 一、五年来的日本外交

在这五年的战争过程中，日本内阁就有过七次之多的变动，而且一变不如一变，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可说是日本政治上最脆弱的表现，而日本外交的变幻微妙，也可想见。

在中日战争之前一个月，1936年6月7日第一次近卫内阁的时候，日本国人乃至近卫也并未料到全面战争会爆发，尤未料到中国会自动抵抗以至拖得这么长久。当时的外相广田，是欧美派，与币原出渊、佐滕等人同伍，一般称之为日本外交阵营的元老。日本外交在九·一八以前是欧美重于亚洲；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当局看到新形势的变化，亚洲的重要性大过欧美，于是亚洲派日益抬头，政府亦视亚洲重于欧洲，日本外务省的亚洲派，遂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势力，而此两派的斗争更见激烈。总而言之，欧亚两派斗争的发展，传统派主张偏于维持现状，继续与元老

重臣接近；革新派主张偏于“革新”，所以与少壮派军人接近。传统派在外交阵营有其悠久的传统力量，在未有激烈变化以前，对于新兴的革新派，仍是欧美派占着优势的地位。

中日战争虽经过南京的退却，而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并未动摇，反而给日寇的和平幻梦予以粉碎，这是敌人战略与政略脱节，面背相反，于是远东形势日益严重，而日本的外交重心也集中到亚洲问题方面来了。

迄1938年5月，近卫内阁经过一番大改造，换了宇垣当外相，首相级的大臣有五个之多，宇垣即其一。当时的外交方针，在宇垣是主张调和英美苏的，这样便不受少壮军人峙视，终于因为兴亚院的权限问题，少壮军人便唆使革新派鼓动风潮，推波助浪，被称为“惑星”的宇垣外相，不久即愤愤然“吞五熊之泪”，挂冠而走了。

继任外相的是有田。他一面以牵制苏联的理由加入了空泛的“德意日防共协定”，并以不加入具有实际内容的三国军事同盟，避免中苏同时作战，很得到国内一般的好评。但是侵华战争的发展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难，日本加入防共轴心，正与苏英美法正面冲突；反之，为要完满推进对华外交，又非与英美法苏周旋不可，有田虽然巧妙地以苏联为日本的假想敌，但不敢强化“防共协定”至缔结军事同盟的程度，所以另与英美法进行国交的调整。可是这种微温的作法始终为军部所不满，这便是有田外交的致命伤。

近卫内阁在1938年底，因不能对付新事态的发生，官僚之间互相倾轧，各不相下，终因池田财相与末次内相的



冲突不已,致使近卫内阁不得不于1939年1月4日总辞职宣告下野。

接着是平沼组阁(时在1939年1月5日),名虽革新,实际毫无新的内容,日本论客评为“废物收容内阁”。这时的外相仍是有田八郎,故依然无所建树。可是驻德大使大岛,却本着军部的意旨,在外活动甚力。然有田却想加以控制,不愿日本加入轴心军事同盟,自然的,平沼这等外交方针,很难令军部满意。

1938年8月28日“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成立后,此事传到东京时,日本统治者内部惊慌失措,一时朝野对于德国之作风大加抨击,稳健派与革新派亦互相攻讦,彼此怨恨,军部乃借政府不及早加入德意军事同盟,致令德国奔向日本假想的敌国苏联为口实推翻了平沼内阁,有田也跟着遭遇“树倒猢猻散”的命运。

平沼内阁仅7个月24天,便倒台了。接着是阿部信行组阁,先是他自兼外相,不久便任命野村大将为外相,而以谷正之为次官,野村自称为“知美家”,他曾想尽力调整日美间的关系,此时美国对日的压力渐渐加大,野村之空洞途径,自然毫无办法,于是,骂声四起,阿部也只有垂头丧气,在任4个月零16天,不仅外交无生气,即内政也是没有一点成就,军部更在报纸上大肆攻击,于是这被指斥为“最不孚人望”的内阁就在议员276名联名反对中总辞职了。

继之,米内组阁(1940年1月16日组成),仍旧拉有田来当外相,米内此次出马,满想调和军部与元老之间的裂痕,

可是“中国事件”的解决,还是无望,战争还是在漫漫长夜中,国内经济困难日增,陆相与米内也不能合作。当时日本国内正闹米荒,故讥米内内阁为“无米内阁”。米内尸位6月,终于无所成就,废然下台,而有田“调和”外交的希望也落空了。

那个时候,日本政治舞台,没有人敢于尝试,西园寺公亦不得不再度拍出“最后一张牌”,闯下祸来的近卫,再出来收拾这个“僵局”——不能解决的“中国事件”。于是近卫第二次上台组阁,当时外相是松冈洋右,他是再作冯妇的近卫之最大成功者,松冈曾亲自出国到欧洲访问德意,回头来到莫斯科,而与苏联订立了一纸“中立条约”,感到“生平最大荣幸”,日本举国上下也大吹大擂,称赞为外交上的伟大成就,他曾与斯大林接触,并说过:“日本如侵苏我即切腹”,然而口水未干,而关东军已“秣马厉兵”,所谓“北进”问题,虽未敢轻易动手,始终是军部所向往的目的物;而且还是影响着德苏战争爆发,希特勒希望日本从远东方面夹攻苏联,因之常常有扩大而转为事实的危险,正因为德苏战争发生,松冈便再也站不住脚,先第二次近卫内阁之坍台而被滚开。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德关系起了一度变化,日本对德态度比较观望,其原因在于德国失去了控制日本的法宝,在德苏战争之前,德国是引诱日本维持日苏和平关系,以便利用苏联的西伯利亚铁道,好运输从远东输德的物品而供给日本以扩充的军需品,日本遂处其控制之下。但自苏

德战争爆发后,此种情形便无可能,德国已无法强迫日本追随其外交,于是德国又要别种花样,逼迫维琪政府把安南让给日本,并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样拉拢日本来帮自己的忙,但这于日本是一种“糖衣毒药”,日本反战士青山和夫称为“毒馒头”。日本贸然吞下这个“毒馒头”,然德国当然就要负响应之责。当时,德国所要求的是日本北进,第二近卫内阁既然不能做到,就须有一种办法酬应“盟国”,于是第二近卫内阁终又坍台了。新的国际局面日益紧张,日益逼迫日本作战,但是日本这时只能备战而不能作战,这时的政治极其紊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孚众望的人物可以接替近卫,在军部方面似乎感觉尚无需亲自出马;在元老重臣看来,也是除了近卫再来扮演外,再没有唱得更好的角色,于是近卫再倒台后3天,马上第三次粉墨登场。

这次日本内阁的更迭,完全在于敷衍德国,其所玩的把戏有如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宣告破产了,重新组织新公司,可以声明:“一切旧欠概不负责”。巧之近卫下台不过3天,重新打鼓开场,可想其大半。本来近卫那“最后一张牌”是已经输掉了,试想第三次出马,又怎会医好满目创伤,所以在他第三次组阁中仍是矛盾重重,困难与阻力,仍加在这位“公子哥儿”的身上,而其丑态更加百出无穷。

这时的外相是改换了丰田,他在就职后第一次讲话中说道:“我在3个月前当海军次官时,对国际形势很熟悉,其后则不甚了然”。

当海军次官时,日本参加了“德意军事同盟”,其谈话

目的完全在于敷衍德意，这更可说明第三次近卫内阁的外交方针了。

第三次近卫内阁除了组织大政翼赞会，有表面之成绩之外，其他是谈不到什么的，这次内阁正当日本准备“介入”世界大战的时候，故其本质是所谓“临战体制”的“临战内阁”，当时为了加紧挥师军事准备，与军事的积极活动，就不得不再强化外交的活动，用以配合军事上的阴谋，野村使美，目的就是一面要制止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准备，一面为着缓和并松懈美国人民的戒心，故其开始，日本未尝不是带着诚意，希望和平取得美国的让步。但是，由于美国态度的强硬，对日制裁一天天加紧，日本外交就不断地演变，从野村的向美讨好到若杉的对美试探，最后到了来栖赴美，则除了阴谋麻痹美国备战的警觉外，就只剩了一片敷衍，装腔作势以拖延时间，好让军部积极准备闪击战争了。总之，我们从野村、若杉、来栖所活动的基本性看来，都不外是表现着日本外交完全为着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掩护。因为，我们不管日本外交与军部有几分之几的分峙和对立，而日本外交终是执行它的最终目的——强化帝国主义的力量，扩大侵略的猎物。

当我们很紧张的看着日本一套又一套地耍着“外交把戏”的时候，——正当日美谈判中——有一点值得吾的回忆的；我们国内当时的论客皆推测日本必北进，而荒木贞夫也有过极力鼓吹北进的言论，但是事实上日本选择了南进，这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第一、日本元老派是要制止战争继续扩大的；但临到不能制止时，就同意南进。

第二、由于北进仅有政治上的价值；而南进更兼有重大的经济上的价值。

我们知道日本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原料，乃至军火，多从美国输入，制品及某些种特产的销售则更要依靠美洲市场，如日本生丝品等等，是以美国和中南美及加拿大为市场，因而离开了这个重大的美洲市场，更无办法。可是自来栖赴美以后，日美形势日趋紧张，日本在美洲的市场几乎要全部断绝。这样，它不得不另寻出路，于是日本就选择了由东太平洋市场移到西太平洋市场的方向了。如此在经济上是有其重大的意义的，转移经济上的依存性，划出所谓“经济圈”“共荣圈”，企图达到自给自足，而冲破包围，杀开出路。

我们知道香港、安南、菲律宾、泰国、新西兰、澳洲这许多地域都是实在的“天富之国”，物资矿产都异常丰富，从这里可以取得石油、锡、橡胶、金、羊毛、米粮、茶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富裕的出产。为着抢夺这样丰富的资源，日本就不惜冒着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危险，而日本也唯有“介入”这个世界战争的“火坑”，它才能够满足经济上的要求，因此我们了解南进对日本的诱惑力是超过北进的。

就在这个喧扰和酝酿中，日本内阁又演了一次倒台与登场的悲喜剧，那是1941年10月5日近卫第三次辞退，10月17日东条英机继之组阁，外相东乡，他曾做过驻德驻苏大

使，而负起调整对德对苏关系的主要任务。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日本外交在如何积极地由英美转向德苏，而开始加紧布置南进的姿态，太平洋战争终于在1941年12月8日轰然爆发了。

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至现在，日本外交几乎可说等于停顿，“霞关”两大派阀之争表面上也是暂时休息，而由“军事行动”代替了外交。

## 二、日本之新动向

推测动向是困难的事，那些“算流年”先生的推测，廉价的断言，“某月某日某时日本如果不怎么样，可以砍下我的脑袋”——这种卖膏药式的作风，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预测动向，必须要有相当确实的依据，把握许多复杂的因素，分析主要及次要的基本条件，而从实际情况的涌进中，观察其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战局形成整个的，敌人的外交退回后台，而战争进到前台，所以我们主要的要推测敌人的军事动向。然而敌人最近的动向，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有几种呢？我们分别起来，可以说军事方面有四种：（一）东进（二）北进（三）南进（四）西进，现在分开来作简略的叙述：

（一）东进——日本想东进由夏威夷打美国，目前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胆量。俗语说：“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在

日本恐怕还不作此梦想,但是目前也有最大的可能,而事实上已经在进行着的,就是日本要把东南太平洋上某些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岛屿加以占领。

(二)北进——今年七八月以前,北进的军事准备,是很积极的,日本以30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驻屯于“伪满”的边境,真有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姿态,可是过了七八月以后,这种紧张的形势是逐渐消沉了,这里可以找出几个原因:第一,日本看见德国侵苏战争并不顺利,特别是去冬希特勒在东线挫败的教训,日本一向贪小便宜,不肯下大本钱,现于斯大林格勒两三个月攻不下,现在更吃了一个大败战,德国在东线的军事将要全部动摇,要在这时去做纳粹的呼应虫,就是急躁的少壮派和关东军,也怕没有这股勇气,何况东条过去已经尝过了张鼓峰及诺门罕两次的败仗,现在苏联虽然打一年又五个月,人力物力固然消耗甚大,可是他在远东方面强大的军队,仍是没有什么调动,而且可以随时打击日本进攻。日本北进战争一开始,东京、大阪、九州北部等处,就有被炸毁的危险,其本土所受的损失,必非常之大,恰好给中、美、英、苏同盟国“釜底抽薪”的机会,何况苏联即令退出海参威,甚至退至哈巴诺夫斯克,日本拿到了这方面的一角,也无法继续进军到西伯利亚大森林,在冰天雪地里要想拖着这个大“白熊”的尾巴,实在是不容易的。其次英美在南太平洋发动反攻,牵制日本,日本已受到相当的损失。美国在所罗门岛及瓜岛的进攻,使日寇感到穷于应付,哪里还可能同时分兵进攻呢?

第三自英印纠纷发生以后,日本就认为有机可投,而不暇顾及北进了,何况希特勒还在促日本会师印度呢!

(三)南进——南进的目标有二:一是攻澳,一是攻印,目前日本对于攻印似乎在观望,如果英印问题愈闹得利害,印度内部党派争执愈激烈,英国对印度不合理的镇压手段所激起的反抗愈深,则日本认为夺取印度的希望愈大,将来花费的力量就愈小,日本目前已在充分运用政治手段挑拨英印感情,大肆欺骗宣传,使印度方面愈有机会可乘,但却避免过度刺激英印,反而促成英印问题合理解决,这就是所谓“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站在我们同盟国胜利的立场,我们绝对不希望英印不幸的局势演进下去。因此,我们为阻止日本南进,打破敌寇的占印野心,希望英印双方重开谈判,本着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使它适应于印度,承认印度的独立与自由,才能如尼赫鲁先生所说“倘若同盟各国认明而且确实予世界道德及革命的领导,那么侵略各国就要被迫放弃掩饰它们多数诡计的假面具,而一支庞大的新力军也要兴起制止它们的诡计。只有自由的号召以及人民能深信他们是为自己自由而战才能使一个民族能象中国人与俄国人那样拼死作战。”

南进第二方向是澳洲,数月来英美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发动反攻,谋于此方面巩固总反攻的据点,而日本为保持同方面的据点,以便得于远离本土的地方决战,免致危及本土的安全,故此方面战争也不必继续下去,但此方面的战局,目前尚不能发展至如北非,日本的行动自也着重于



南进第一种方向了。

(四)西进——西进不是方向,而是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我们中国。日本要解决“中国事件”是它一切所要解决问题之基本问题,我们不要以敌人经过了湘北浙赣的溃败就再也不会进攻中国。自然,我们不是自己泄气,过分估计敌人;敌人的力量已大灭,确是事实。但若因此即认为敌人没有进攻中国的阴谋,那就大错特错,敌人在最近的过去曾企图打过粤汉铁路以至湘桂铁路,通安南泰国以至马来半岛,虽未成功,但现在又已在真准备蠢动,我们大后方各地又时常遭到空袭,亦足证敌人想有所行动了。敌人自占领南洋富庶之地以后,即从事调整,企图能于短期间恢复元气,再继续打中国,而于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滇边战事正与现阶段世界战局联着密切关系,此方面问题的发展,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国人常有一种错觉,事实上我们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主角,我们在演戏,但是许多人的心境却是在观剧,是一种观众的心情,如果这样大意下去,敌人一来攻,我们即遭严重打击,我们应该随时提高我们的警觉性,准备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敌人痛烈的还击,并准备于总反攻情势成熟时,立刻可以发动全面的反攻始可。

## 日本的军事动向与我们的警惕

自从日本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我国人士所最注意的问题，不消说就是日本的军事动向。这个问题不但吸引了军政界的注意力，并且为一般国民时时刻刻所关心。但是我国人士所注意日本军事动向的问题，有时难免是变态的、错觉的，关注日本北进或南进反比关注进攻我国的心切。当敌人在中国战场暂时停止前进的时候，一般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日本何时北攻苏联或何时南进攻英美的问题上。一二年来，许许多多的国际问题座谈会，皆以日本南进或北进为讨论的题目，从未有以日本将如何西进为讨论专题的。这固然是我国人士对于国际问题的注意力之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就是忽略自身问题的暴露，在大家热烈讨论日本南进的时候，我们挨过几次攻击，日本南进已一年了，我们仍继续不断遭受日军的进攻。现在留下一个北进的问题，仍不失为讨论日军动向的最主要题目，许多人尚沉醉于这一个问题，但是世界上没有比实际情形更为现实的，日军在北进方向之外，还有一个更可靠的方向，这就

是西进,因为日本扩大战争范围,发动世界大战,其终极目的仍在于解决“中国事变”,以为独霸东亚的基础,征服世界的前奏。我们是对日抗战的第一个主角,但是许多人的心境却是在观剧,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故不惮麻烦,简单为文,提醒我们的警觉。

## 一、日本北进与西进问题

自近卫内阁坍台而东条组阁以来,我国的论客判断即颇为分歧不一,有谓日本“马上”北侵苏联的,有谓东条内阁为近卫内阁之续的。但是前者太过于急躁,后者则玩忽了日本统治阶层的变化。近卫第三内阁,是现状维持派(元老重臣的政阁)重点内阁的终了,而东条内阁则为革新派重点内阁的开始。东条内阁无论如何总是“急躁的”临战体制,其主观完全和前内阁不同。但若谓东条内阁马上北进,无条件北进,则未免重视一面,而忽略一面。日本加紧准备北侵苏联,故无问题,但却不能无条件的发动。

因为日本欲北进必须安定南方,便无后顾之忧,当时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立即参战,或严格实施经济制裁。日本的战争资源依赖美国及其势力圈的供给,自美国态度强硬以来,日本虽也曾加紧积蓄,但尚不足以支持长期大规模战争的消耗。因此,日本欲北侵苏联须先确实探到美国不加干涉的腹案,若杉赴美的使命,完全在此。美国不能帮助日本结束中日战争,已为日本朝野所了解,再派若杉,用

意自另有所在，当然是在试探美国能默许日本再蠢动到何程度。换言之，日本北进不会引起美日间的重大问题，日本就会决心北进。所以一面成立东条内阁，积极准备战争，而一面则仍继续与美谈判，以求得一个决定点。

时间的经过果然证明了客观论断之正确，一般卜卦式的国际问题专家的预言完全落了空。

1941年12月8日拂晓，狡猾的日本军阀突向美英的太平洋诸据点，发动袭击，“日本精神”的自杀飞机及自杀潜艇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舰队，首先遭受最重的创伤，香港及菲律宾等地，也皆同时遭遇奇袭。英美政府及英美人士，或许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突变，我国北进论者更加哑口无言了。太平洋的突变已经证明日本并没有北进，而是南进了。

但是时间的经过，不几何时又将日本北进的论调鼓煽起来。太平洋战争在很短期间给日本军舰稳定了脚步，日本几乎完全占领了香港、菲律宾、安南、缅甸、马来半岛，乃至荷属东印度群岛，南至新几内亚中部，西至孟加拉湾。珍珠港的空前大破坏，直至一周年之后的1942年12月，始完全恢复了元气，东方第一大军港的新加坡，即完全资助了敌人。日本军队在太平洋上休息7个月之后，一般又重新讨论日军北进攻苏的问题，自非偶然。

去年六七月间，日军北进的传说，复又盛传一时。据各方面的报告，日本确实集结30师团以上的大军于伪满边境，两个健全的机械化部队是为攻苏而准备的，日本海的

日本海军,准备着占领海参威,风声鹤唳,大陆的东北面,已有草木皆兵之感。

其时,许多卜卦式的日本问题专家,纷纷讨论日本几时即必进攻苏联,有的断言:黑龙江冻冰的第一周的周末拂晓,日军必先发动,甚至于赌脑袋、赌大菜,据笔者的观察,其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在于轻视敌人谋我的心情,说敌人不会再向我进攻;一在于重视德国攻苏的一时胜利,以为苏联败退至莫斯科附近,日本必乘势大举北进,但是时间已过了半年,日军依然没有北进,其间且曾向我下一次浙赣路的大攻击,晋南、鲁西,豫鄂等地也皆时常骚扰过,其打通“大东亚铁路干线”(从粤汉路接湘桂路,出安南、泰国、以联马来半岛)的幻想,虽然终被我们所粉碎,但其谋我的心情始终未泯灭。一时传说日军北由豫陕南下南由腾冲经大理入西康,以完成南北两头大包抄的阴谋。此阴谋的战线过长,南北共约3,000多公里,日军之运输与给养,自然极度困难,自无成功的可能。不过,两月来,日军确已一面集结军队于滇边,企求南抄之计得逞,另一方面又于皖鄂等地蠢动,发动空军到处狂炸我大后方,以为牵制。这一连串的事实,皆值得我们沉醉于北进论者的玩味与猛省。

我国北进论者所着眼的,是苏联之一时败退与德国的侥幸胜利,但亦未能完全言之成理。去年11月以前德国的一时胜利与苏联的退却,固然是日本北进的绝大的冲动机会,但是苏联败退的程度如何?还是日本等候考虑的问题,张鼓峰及诺门罕两役,已给日本以绝大的教训,何况海参

威及伯力等地空袭力量的威胁，更非局部冲突所可与比。日本发动侵苏，自非承担与世界陆军第二强国作战不可，日本陆军泥脚一只已陷于中国，另一只担当得起对苏作战吗？苏联虽于抗德战争上损失不少，但其元气并未损伤，对付一个半残废的陆军国，总还十分够资格。苏联有飞机三两千架，则对于日本各地的威胁，自然非常之大。日本几个工业区，如东京、横滨、大阪、神户、九州北部等，皆在海参威轰炸半径之内，日本虽说也有地下隧道之设备，但究竟容不了多少，况如东京隧道非常浅薄，容易炸穿。

或谓日本之欲北侵苏联，是买德国的账，但是德国当时企图南转而攻高加索，下伊朗而略中东近东，德国与其要求日本北进，倒不如要求日本南进，夹攻英美。德日相约会师于印度洋，曾经一度传为德日侵略者的幻想，是则日本与其独担对强苏作战，倒不如帮德夹攻英美之为愈，现在德已大败于苏联，北非第二战场开辟以来德国地中海的地位甚且岌岌可危，其要求日本夹攻英美之需要加大，日本攻苏的勇气更为削减，北进的可能性更为缩小，而于别方面用功夫了。这就是西进的问题。

## 二、释日本西进

日寇西进问题的严重性最大，而国人误解者又最多，且其关涉所及，并不只限于中国本身，而实是整个太平洋的问题，是反侵略各国关系密切的问题。

自1940年秋德意日军事同盟成立而日本南进问题成了讨论的焦点以来,日本“南进”也同时以另一种姿态成了讨论的对象。我在《论日本南进呢?西进呢?》《再论日本南进呢?西进呢?》两文中曾提出此问题,但剖述最精确的应推孙哲生先生之《国际动荡中的日本动态》(均见《战时日本》第五卷各期)。现在又因为日本北进可能性的扩大而更加严重成了讨论的焦点,在战时日本社召集的座谈会上,几乎集中论点在此“北进呢?南进呢?西进呢?”上面。然而,今日之所谓“南进”已为梁寒操先生所提醒,“是美日的战争问题”,意义却不若以前的含糊,只是“西进问题”的意义,还有一部分人不甚明了,西进与我国关系严重密切,故不惮麻烦,特为解释并加申论。

第一,有人把西进解为方向问题,故当我提出“日寇南进呢?西进呢?”的问题时即有人责问我所指定的是否就是日本由湖北直攻重庆,当时我的答复是“否”,并举敌军在福建浙江海口的封锁,及由豫南进攻郑州指向西安为例,质问者终于大笑曰:“先生错了,封锁闽浙应为北进,豫南之役应为南进”,像这样以局部决定整个,以方向混乱问题者,实是误解“西进”根本意义之尤者。

第二,有人把“是否想进”与“能否前进”,混为一谈。当我写《日本南进呢?西进呢?》的时候,就有人说我太把敌人力量估量过大了,说敌人今日已无力量再向西进了,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是敌人的动向,推测敌人想向那里打,并不要确定敌人是否再进,或前进到什么地方,我们抗战所争

取的是最后的全民的胜利,不是偏安的一时的愉快,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敌人进攻则迎头痛击,要时时刻刻注意敌人,想不想再西进,绝对不能武断敌人无力再西进,就自己沉醉下去。其实,在许许多多过去的乐观者沉醉着日本立刻南进去与美国打仗的时候,我们已经挨过几次揍了,幸得英名的最高领袖,指挥得法,终把冒险来攻的敌军打退。

第三,许多人忘却太平洋整个问题的联系。日本对我侵略阴谋,非出一朝一夕,即对我全面侵略战争,也已达到5年又半,其目的不外乎想灭我民族亡我国家,完成独霸东亚的基础。现在这种工作并没有完成,自日本野心家惯用的“重心主义”讲,必先完成这一工作告一段落,自利害得失讲,它也不会因南进或北进而放弃中国,最高度也只同时并进。如此主张,或许有人以为我为敌人增威风,就敌人今日泥脚深陷,如何能够南北西并进呢?但是问题并不谴责此机械的看法,日本再三狂言要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件”,不就是这种意思吗?敌人集中军队于安南、广州及台湾,南侵缅甸,切断滇缅路,一面侵英一面攻我云南,岂不就是南西并进了吗?再如日本在华北的“扫荡”,据说目的在于准备北进,那末,这岂又不是北西并进了吗?总之,太平洋危机是整个的,并不能因为敌人西进、北进、南进,依时间的先后采取各个击破的诡计,而分成几个部分。

第四,许多人混同了可能性与现实性。1940年秋间讨论日本南进及1941年讨论日本北进的人们,皆过分注意日



本南进或北进的可能性的问题,但却忘记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那是西进。自日人川岛浪迷上书“对华管见”以后,侵拼大陆野心即已形成,自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以来,妄想灭亡中国以为独霸东亚基础的阴谋算已立定,虽说五年来碰了我国的英勇抗战,阴谋已不得逞,但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却未曾稍减,所以任何政变发生乃至任何派人出组内阁,其政策的第一条,总是结束“中国事变”。即临战体制的近卫第三内阁,及现在的东条军事内阁,都没有忘记了这个纲领——结束中日战争。不但东条如此宣称,即在华日军也曾如此蠢动过。1940年10月30日军委会发言人宣称:日军“似有南北一齐蠢动的模样,北方昨已发动,南路刻尚在调遣中”。这是当前最现实不过的现实问题。当时日人显然有视国际势力新变动而有北进或南进的冲动及准备,但以当时情势观测,北进与南进还是可能性的问题,在北进与南进的可能性未更高发展以前,准备工作才是日本的“现实问题”,而在准备工作当中,“结束中国事变”仍是最重要的纲目。太平洋整个危机开始于九·一八,而日本的西进固可以扩大到北进或南进,日本无论何时总不能放弃“西进”企图袭击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的今日,日本西进结束“中国事变”的心情仍甚急躁。

### 三、应有的觉悟与努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从国际上看,太平

洋的危机是整个的,不是割裂的,从中国本身看,日本不会因北进或南进而放弃侵华。

就日本不放弃侵华言,日本必继续西进。无论日本北进与苏作战,或南进与美作战,但其主要幻想是在征服中国。即在日本南进或北进以后,日本仍要继续侵略中国,要努力作到用中国的资源补充美国及南洋资源的断绝,并实行在“世界范围内谋解决中国事变”,无论那一种场合,日本总想“西进”。但须重再声明一句话,日本是否西进得了,是另一个问题,结果的问题。

今日为保障抗战前途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必须更加提高警觉性,配合各方面的力量,更加积极准备,随时可以给予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以达抗战的终极目的。

再自太平洋危机系整个的一点言,英美苏各国,绝对不能因日本“西进”是攻中国,而满不在乎地等待变化,英美两国特别要再三玩味“太平洋危机始于九·一八”的□□,更应该认识“世界罪恶的发明家”(英人拉敦之言),体会其侵略中国只是独霸东亚,进侵美洲,征服世界的序曲而已,英美苏同盟国家更应记着:中国是总反攻的最重要的据点,日本西进愈积极急切,乃至该种企图愈益得逞,其对于英美的威胁也愈巨大。同盟国家的反攻失去根据,太平洋完全为日本所控制,英国势须退出亚洲,固无庸言,即美国之立脚于美洲,亦会受到基本损害。

今日美国固已于所罗门岛向日本反攻,英国亦已发动反攻缅甸的军队,但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动作究竟不如在欧

洲之积极。美国之争所罗门岛仍未愿开巩固将来反攻的据点,英国甚且宣称克复缅甸,今日尚非其时。于此我们更应敬告英美不要放纵太平洋上的侵略者。更确切言之,日本在侵略阵营中的比重,现已驾德国而上,日本不及早打倒,同盟国将来作战必非常困难。世界危机是整个的,东西战场不可□□,亚洲的第二战场也应赶快开辟。英美愈应一面在缅甸及新几内亚等方面积极反攻,以收牵制之效,并早收复缅甸重开滇缅路,一面大量供给中国以飞机及其他军火,加强中国反击日本的力量。同盟国家正准备着围剿日本船只,但不能忘记中国在此围剿中所占的地位。1月23日华盛顿中央社电转英国的消息称:“据可靠消息,伦敦方面若干人士相称(开罗会议的)主要讨论事项,乃联合国家如何以全力在本年或1944年进攻欧洲之轴心,然后回师远东,大举进攻日本及其帝国之每一部分”。如果这种决定成了四强ABCD最高作战会议的作战方针,被放纵的日本必更加猖獗,其时不但远东风云变色,或许整个世界战局也受影响。此点,深愿我们的同胞多加考虑,同时忽略日本西进的国人,更应猛省。

原载1943年2月7日《广西日报》

## 日本最近军事动向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日本最近的军事动向》。日来日军北进攻苏的推论，常发现于报上，所以要先检讨日军的北进可能性，然后再分析其他方面的动向。

日本最近会不会北进攻苏呢？北进攻苏的问题由来甚久，至前年秋间成了日军北进与南进的争论，有人论断日军将在黑龙江冻冰第一个礼拜日的清早，日军北攻苏联。去年夏间又传出日军北进的消息，说日本在我东北的军事布置非常积极，集大军在30师团以上，但是结果日军没有北进，倒反南进了。现在南进战争休息年余，故又引起各方面日军北进的推测，自然不无理由。但是今日的战争是全面战争，日人称为“总力战”，战争本身没有目的，是为达到政治经济的目的而执行战争。所以现代战争是以军事战配合经济战、外交战、思想战，等等，所以要推断一种战争的爆发可能，应从政治、经济、战略，以及国际关系各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考察吧。日本进攻苏联的经济意义

一向甚低,现在尤甚。西伯利亚是一片沙漠,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北库页岛的油矿权,现在又已不值得重视,因为日本占南洋群岛,煤油年产量在日本消费量两倍以上。再说北洋渔业的利益也很薄,不够几日战费,更不值得。其他的战时资源,已有南洋群岛来补充,而苏联亚洲部分皆甚缺乏。日本现在不能因为经济的原因进攻苏联。

其次,政治的原因比较值得重视。以前日本经常宣称:日本愿为资本主义国家攻苏的先锋队,日本欲借此题目对英美法各国讨价还价,但是现在日本已与英美法宣战,已无再作此种宣传的必要,更无佯作攻苏手势的必要了。况且攻苏会引起日本国内的社会危机,正如元老重臣稳健派所忧虑的,苏日爆发战争,日本国内引起社会革命的可能。所以日本现在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进攻苏联。

再次,考察日本现在的战略,日本虽有几分攻苏的理由,但是反面的理由尤其大。日本怕美国借用苏联领土为进攻日本本土的空军根据地,故有先占苏联领土的必要。但是目前时机未成熟,而其他方面如太平洋上英美的反攻准备,中国战场上的军事发动的需要更切。今日适值德国惨败之后,日本若贸然攻苏,无异于自愿担承与世界第二陆军强国作战,贪小利避大亏的日本,必然不敢出此。

最后,考察一下德国命令的效力。现值德国惨败被困之际,德国固要求日本北进分苏兵力,但是德国命令已无以前的效力,日本要先打自己的算盘,自德国物资不能供给日本以来(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对日强制力已大减少,

即令日本须敷衍德国，作军事策应，但有其他的地点，可以牵制美英。南洋群岛的经济消化，虽有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政治及军事施設并未完成，日本尚须在此方面用工夫。所以在整个世界战局中，日本亦无攻苏的胆量和决心。

然则日本军事最近可能由那些方面发动呢？这个预测是一件困难的问题，但大体上可以找几方面来分析一下：

（一）进攻印度——英印问题纠纷甚久，未得合理解决，是鼓动日本攻印的有力动机。日军最近又在缅甸集中不少兵力，其用途不外乎两方面：一、总攻中国，二、进攻印度。很早，各方面即有德日会师印度洋之说，地中海沿岸英美对德意战争正烈时，日军更有攻印可能，但是现在北非战争，已结束，地中海的控制已归英美掌握，德日会师之梦已粉碎，日军单独占领印度这块土地，亦无力量。日本认为英美尚无积极地反攻的准备，故对印度，似仍以运用政治战略为得策。日本尚不会攻印。

（二）进攻澳洲——日本半年来在太平洋上吃了两次大亏。所罗门岛和新几内亚之战，深觉英美从西南太平洋反攻日本的危险性。所以最近集中大量军队于澳洲附近，并且建筑许多飞机场，可容1,500架飞机，这是日本攻击的手腕，日本攻澳可能性较大，其目的在于破坏英美太平洋上反攻日本的据点。并切断美澳的联络。但其战略是“以攻为守”，考察西南太平洋沿岸日本各据点的积极建设可知一斑。

（三）包围我国——日本此次作战的第一目的，在于所

谓“征服中国”，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亦有着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所以六年来日本始终未忘情于“征服中国”。只要有机可乘，日本无不乐意进攻中国，现在对我国来一个更大规模的进攻，可能性相当的大。这里有政治、战略各方面的意义存在。日本或者预料英美始终着重于欧洲，将来对日或将以政治方式来解决。那末日本可能乘英美未完全解决德意而不能用全力于太平洋的时候，先谋稳定主要的侵略目的物，更多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和会上的谈判，这是日本最近可能加强攻苏的政治理由。至战略上说，现在情势已与太平洋战前两样，日本以前是为着解决“中国事变”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是太平洋战争于今年又半，中国没有被解决，中国抗战倒反成了英美对抗日本的生力军，从前是为了解决“中国事变”而发动太平洋战争，现在已变成为着圆满解决太平洋战争而预先“征服中国”了。

再自日军最近在各战场的蠢动看，三个月前兄弟这样判断（详见《广西日报》星期论文）即在今日仍可适用。日本对华在目前又有根本解决的幻想，其策略在于包抄，缅甸集中军队，如用于攻华，则或前由胜衡出大理，入西康南部。最近进攻我太行山之激烈为数年来所罕见，皆可窥见日军野心所在。但是南北包抄战场须延长3,000公里，日本陆军力量是否够用，大成问题。洞庭湖畔和鄂西的猛攻，与粤南等方面的蠢动，都是这个主流中的波动。

总之，日本今日欲乘英美尚不至对日总反攻的时候，

努力巩固它独霸亚洲政治的基础,与抗拒英美反攻的军事防线,其要点在中国大陆及西南太平洋。从科学的分析可得这样的结论。至于苏日基本矛盾之存在亦是事实,能否爆发成为战争,尚是疑问。

(在曲江记者公会演讲,宋斐如讲,区严华记)

原载1943年6月2日《广西日报》



## 苏日会马上爆发战争吗？

### 一、希望与现实

苏日的纠纷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范围日益扩大以来，两国的正面冲突，曾经延续了很长的期间。再加以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两国的外交原则亦互异，苏日的矛盾和纠纷，当然是不能根本解消的，战争也自不可避免。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今日讨论苏日战争问题，应该以苏日两国何时爆发战争？或者可能爆发战争时会如何？为问题的焦点，否则该项讨论变成空谈了。

数月来中外论坛上，对于苏日会不会爆发战争，或何时爆发战争的观察和主张，很不一致。但有一点颇为西南人士所深刻注意的，即重庆的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极言日本即将对苏发动军事攻势，甚至如龚德柏先生断言6月25日日军必发动，《大公报》记者子冈也期望着称：看这一炮能否发得响？但是6月25日已经过去了，龚先生这一炮没有

响,一般人更想明了苏日战争究竟什么时候能爆发?这个解答相当的难,只要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神仙,不是疯子,就不敢讲日本将于那年那月那日进攻苏联。

固然我们希望苏日战争能够早日爆发,使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受到腹背夹攻,以促其早日崩溃,这正与苏联方面希望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夹攻德国是一样道理。又站在整个世界战略的立场讲,我们更希望中英美苏能因为对日包围战而协力作战臻于更密切更调和的地步。但是希望究竟是希望,社会科学家除了追求理想之外,还要凝视现实,使自己的论据不致失掉科学性。听说,军事专家杨杰先生曾论断日本尚不至于攻苏,而龚先生指责称:此人若执政,其国家必倒霉。这也是非科学的态度,但其希望之切,倒可钦佩。

日本进攻苏联的准备,确已相当积极,且有某程度的完成,最近更因美苏合作愈趋密切而大起恐慌,所以对苏又作恫吓之辞,说:苏联若借空军根据地给美国用以轰炸日本,则日本不辞对苏一战。另一方面日本更积极的动作,是攻入新加坡的山下奉文,最近调任关东军司令,现驻东三省边疆某地。此次虽未公布,但有相当的确实性。闻日本海中,现有日舰巡逻于美苏之间,大家更加乐于谈日本即将进攻苏联了。最近,日本又于仓皇间召开临时议会,蛛丝马迹,难免令人加深注意苏日战争行将爆发的问题。

五月初,笔者在曲江记者公会及岭南大学政治学会讲演时,曾经论及苏日的关系,当时断言:苏日两国目前尚不

至于爆发战争(区严华两次记录载于桂《广西日报》、《曲大光报》及《曲江新建设月刊》)。现在过了两个月,苏日战争果然还没有爆发。而《半月文萃》的主编,又来要我谈这个问题,笔者仍旧依据客观的观察,略抒所见,能否切中事实,自为另一问题,因为吾人究竟不是神仙,也没有军事情报作根据。且从经济、政治、战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检讨苏日关系最近的趋势,会不会马上爆发战争。

## 二、苏日战争的客观论据

任何战争的爆发,都不是偶然的,而战争本身并没有目的,其终极目的在于达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希望而已。所以检讨一种战争能否爆发,何时爆发?首先要从当前的政治及经济等原因加以考察,而为达此目的的战略及与有密切关系的国际现势,更须深刻注意。

(一)政治经济方面 自政治经济上考察,日本目前无须要北进攻苏。苏联亚洲区的经济价值并不很高,西伯利亚是一片沙漠,经营亦不容易,就是滨海省各地,现有经济价值也不很大,北库页固然有煤油矿,也会酿成苏日的争执,但在日本占领太平洋群岛一年又半的今日,在资源供给之点已不成问题。最近日本轮运统制局局长曾在其播讲中谓:“日本现在已有丰富的原料,只是轮船不够运输到日本工业生产地,以制成军用品。”南洋群岛的资源确实丰富,安南及泰国产米,海峡殖民地及菲律宾产铁、锡及橡

皮，荷属东印度产石油、金鸡纳霜、胡椒、橄榄油、橡皮、椰子及各种矿产，产量皆占世界第一、二位。只就北库页岛能产的煤油一项讲，苏门答腊，婆罗洲及爪哇的煤油年产量，约当日本产量的21倍，在日本消费额388万吨的2倍上下。在战时三牲之中，日本必定顾猪头不会弃猪头而取鸭蛋了。

再如北洋渔业的利益，在今日看来也微乎其微。苏日的鱼约纠纷虽说是常年的争执，在平时北洋渔业的利益及其经济价值也相当大，大约一年可有4,000多万元。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每日的战费平均在5,000万元以上，日本现在不会因为每年收入不及一日战费的经济原因，对苏发动战争，也是自明之理。

在政治的意义上，现在日本攻苏也已失去作用。以前日本常以攻苏为对英美法讨价还价的手段，它之侵略中国也以防共为口实。但是今日，日本已与英美破了面实干起来了，这种口实完全失掉根据，对于外交政策的运用上，已无用处。日本攻苏的政治运用，不但于外交无益，且反于内政上有害。自从南侵太平洋年半而战争不能结束反而日益扩大，困难也日益增加以来，国内稳健派反对扩大战争的情绪，复又增涨起来，所以在这次临时议会上，东条受了议员严厉的抨击。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厌恶，随战争之延长而益增长，重臣及财阀等稳健势力，已由潜伏而逐渐抬头的了，观此次翼赞政治之内讧，可知东条年前由元老重臣派夺过的国民组织指导机关，今日又起了动摇。日本稳健派

诚恐日本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会激发潜伏的社会危机，表面化为社会革命，所以极力避免与苏联作战。

总之，日本政府今日在经济上宁可努力于保持其已获得的资源，并设法使得充分发挥其效用；在政治上宁可减少国内人民及反对派对于战争的恐怖心理，不会再以对外战争的方式而促内部分裂。

（二）在整个战略方面 日本现阶段的战略，应该是“防守的”，而不是进攻的，即令有时也会使用进攻的手势，但也只是为守而攻罢了。自经5月下旬罗邱会谈以后，美英的世界战略已有划时期的变化。“联合参谋部的意见，固仍遵从先击败希特勒的一般政策”（5月22日华盛顿讯），但其同时注重远东战场，则也甚明显；英美盟邦已屡次扬言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的反攻，澳外长伊瓦特声称：“联合国现时已可用对德的同样力量，对付日本，战争已进入新阶段，此不但欧洲如是，太平洋方面也然”（纽约6月11日中央社路透电）。澳洲官方乐观空气的弥漫，反映着太平洋英美军备的加强，所以华盛顿邮报敢于“逆料盟军将向缅甸长驱直入，重开缅甸通至中国的道路”（6月11日中央社电）。

因此，日本官方已起极度恐怖，在日前召开的82届临时议会上，东条极言“战争已至严重阶段，日本须提防英美的积极反攻”。于此可见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占领地位，已经动摇，他们的心理已在岌岌危惧的状态下。所以日本当前的急务，应该是如何防卫这块侵占地，使不为英美夺回而用以进攻日本本土。尤有进者，日本现在专靠太平洋群岛

的资源以维持战争，日本一旦失掉这方面战争资源的供给，将无办法推行战争。如何保持这些太平洋资源及如何加强运用，是日本当前最急要的课题。日本上下皆已觉悟今日战争已成“长期性”，而此后的胜负将决于双方生产力的比赛。故今日将更竭尽全力于一方面防卫所有占领地并加紧其资源的消化；其重点在中国沦陷区及太平洋诸岛，而不在于未必占领到手的西伯利亚沙漠；日本此时未必攻苏。

再自日本攻苏胜负的前途估计，日本也尚有充分考虑的必要。日本之所以屡次主动地准备攻苏，原想乘德国攻苏的胜利，投最小的资本收最大的代价，所以每逢德国猛攻而苏联危急时，日本必更积极准备发动，其指标就在于德军攻至莫斯科。但事不凑巧，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挡驾，更不幸今年春季以来德军大败于苏联，日本终于按兵不敢动。这次日本攻苏德论据之一，仍在於德国将发动夏季大攻势，但是论者并没有看到德军夏季攻势之不能有把握。事理很明，因为北非德意失败以后，英美进攻欧陆自是确定的战略，不但意大利已经岌岌可危，即德国本身也不能不考虑南欧与北欧方面英美之大规模进攻。据这几次的信息，“德方已派兵十师团，开入意大利北境，以防卫伯伦纳要隘”（6月25日华盛顿讯）。又据巴黎电台军事报告员6月28日晚声称，“轴心当局顷正沿欧陆海岸，集中大军250师，以抵抗盟军登陆，每一要塞均有重兵防卫”（6月28日伦敦讯），再据伦敦每日快报讯，德国元帅季德尔的指挥部，已

移至德国西部(7月1日路透电)。这些军队当然不只是意大利的军队,德国作战的重点,似已由东战场移至西战场,是则夏季对苏攻势,已成了过去。

这次日本之所以积极准备攻苏,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华盛顿方面传出罗斯福总统曾向斯大林提议借用苏联的根据地,用以进攻日本本土。所以日本一方面对苏联放出恫吓的空气,另一方面责令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于6月13及18日连访苏外长莫洛托夫,谈话内容如何,虽无详细报道,但可想得到的,可能是试探苏联对罗斯福的提议的态度。当时正当德国企图大举再攻苏联的时候,莫洛托夫的答复可能是:大家还是严守苏日中立协定为佳。所以这几天,日本的态度比较沉静些了。日本攻苏在最近还尚有待。同时也可看出日本现时对苏只是严阵以待,还只是防备性的备战,而不能马上采取进攻的战略。

现在日本若冒然进攻苏联,其危险及负担必大。德国既须防卫英美大举来攻,东线所留军队必不甚多,是则日本必须觉悟单独对世界第二陆军强国的苏联作战,而另一方面日本还须分出大部分军队防守太平洋,结果战局倒转过来,苏联可以用全副力量对日,而日本则须两面作战,日本之溃败必更迅速。日本一向最会打算盘,虽急躁疯狂必不出此。

自远东整个战局考察,日本现阶段战略的重心,必在於太平洋,将于太平洋各据点加强布置,在新几内亚方面防御美澳军反攻,在缅甸方面防御英印军反攻。日本最近

的产业的超重点主义,集中於轮船及飞机的制造,其用意即在准备于不久将来抵抗美英。日本现战略的第二重心,当在于中国战场的所谓“扫荡战”。日本为要加紧重心主义的生产,正有待于中国资源更多的供给。去年日本由中国沦陷区运走的原料,已达1亿吨以上(据蒋夫人在加拿大国会的讲演),因为中国原料供给地,距离日本工业生产地最近,可省轮船运输的困难,所以自经济的战略意义讲,日本要用一部分军队于中国各战场上。日本现阶段战略的重心,既在上述两方面,自然要分大部分军力于这些方面,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抗陆军强国的苏联。

(三)国际关系方面 日本攻苏的军事感受性最强而变化亦最激烈。日本曾经一次大规模准备进攻苏联,弯弓勒马一切皆准备完全,只欠一个最高峰的命令,但是临时却变成了“演习”。前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经有些部分的军队被派送到东四省某地,候命北攻苏联,但是结果这批军队没有再北进,所得的命令,反是南进参加太平洋战争了(皆据俘虏口供)。

这些事实是在说明日本受国际变动的影晌太大。今日在远东战场上,急激变化可能性最大的,是太平洋战场,而北方战场的变化当较和缓。美英大规模反攻日本,已在积极准备中。虽说邱吉尔首相昨日演说仍称:“他时倘若德意两国在苏联打击下以致崩溃而德国工业被英美飞机炸成粉末,则欧洲方面每一艘军船,每一架飞机,每一个士兵,



凡能够动员者，将全部调往太平洋参加当地军事行动，直至日本屈膝然后已”（6月30日对基尔特会党演说），但是英美对日的反攻，将来得更迅速些。日本为应付太平洋上的激变，自不敢对苏联轻启事端。

或尚有人认为德国对日本的指挥相当有效，而德国又在大声疾呼日本援救。但须知道日本今日的军事行动已相当自主，它要先打妥自己的算盘，然后计及盟邦的厉害，况日本在太平洋上发动以攻为守的战略，自日本看来，也未始非救援德国之道。所以今日日本也不会因为单纯的援德而北进攻苏。

综合以上的剖述，日本为畏惧苏联而扬言进攻苏联，其战略自然是守而非攻，美国海长说得好：“日本不欲与苏作战，现在努力避免意外之事猝发”（6月23日对记者谈话），苏日双方虽皆整军秣马，据传双方各置大军100万于东三省边境，但其实际情形，则又如华盛顿观察家的论断：“攻西伯利亚殊属不可能，因苏军处于易守，而日军处于难攻的地位，”“苏联在无充分把握以前，不致在远东有任何行动”，“如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美国即可在该地获致基地，”“又如希特勒夏季攻势成功，日本将进攻苏联，惟希特勒现在已无成功的可能性”了。这些论断可以充当吾人上面剖述的结论；他们更坚定地说：苏日战争“今夏难有爆发的可能。盟方认为日本或将在冬日莅临时进攻苏联，但就眼前的迹象观察，本年似仍不至发生”（皆据华盛顿6月23日中央社合众电）。伦敦方面也是同样，“一般相信，目前尚

不致有所发展。苏日两国暂时维持正常关系,而在西伯利亚边境,互陈重兵,以资守望”(6月28日重庆电),笔者5月初旬讲演的论断,并不算奇突了。

(1943年7月1日于湖滨)

原载1943年8月《半月文萃》第2卷第2期

## 日寇一年来的决战设施

### 一、战局变化与施政总则

日寇虽然自称1943年为“决战年”，但其实际对外只是保障占领地，消化新资源，对内则为东条努力于加强军事独裁，并多少容纳现状维持派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对于新旧占领地实施怀柔政策，加紧剥削战时资源，为前者的表现；实行政治特别是生产行政的一元化，并频频召开议会，吸收稳健派份子入于内阁及有关系的系统中，为后者的表现。

我们要检讨这1943年日寇的一般设施动向，须先了解这一年中太平洋战局的本质上的变化，因为这一年设施，完全在于适应战局。日寇在1942年的战争中，可以说走了战争的最高红利，并乘其侥幸胜利的余威，竭力图谋其国力的“膨胀”，这个余音一直延长到1943年的上半年。在这个期间，美英荷的太平洋诸据点，几乎全部为所占据，美国太平洋上最重要据点的珍珠港，也遭到重大的损失，日寇势力席

卷了整个南洋群岛，且有进迫澳洲及印度的企图。这一阶段日寇的战略处于进攻的地位，其膨胀可说已达到顶点。

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周年，美国珍珠港的军事设备完全恢复旧观，澳洲的防御渐趋于巩固以来，日寇的作战态度，就起了一大变化。至太平洋战争第一年，日本黷武主义者，还是任性地扩大侵略范围，无时不在幻想着侵澳侵印，其战略是攻势的，但自太平洋战争周年以后，日寇的态度开始惶惑彷徨。其上半年的战略，即已由进攻改为防御性的进攻，至下半年即今年6月以后，几可以说完全变成防守战了。这是日寇太平洋战争第二年的主要变化，在最近期内将仍沿此路线演进，而日军节节退却以至于总站的台湾，所以太平洋战争的重点，就在于西南太平洋。至若中太平洋方面的重点作用，最近也开始其序幕，其重要性的比重，或将与日而俱增，但据12月上旬盟军讯，西南太平洋日军备业已被迫而退守内围新防线，盟军且更步步进迫。又据美海长诺克斯称，中太平洋方面，美军已可以利用塔拉瓦岛的机场及重要根据地，袭击中太平洋的日军。

总之，在战略上日军已处于盟军准备四方八面进攻的威胁之下，即日寇当局也都痛切感到此点，并时常发出悲鸣。据《新闻纪事报》战地记者勃朗之分析，进攻东京有5条路线，而目前的比重在中太平洋及西南太平洋3条路上。不过事实和需要，还指示我们从中国实行总反攻的战略价值，日益增加，且亦必须日益增加。

日寇这年来的国内政治及施設，也随应此太平洋战局

的演进而变化。

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阶段,为着完全运用其战果而对于突然膨胀的新占领地,采取消化政策与怀柔政策,后者应用于政治上,前者应用于经济上。日寇在占领南洋群岛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新占领地的人民驯服,及如何恢复新占领地的生产状态,所以日寇当时运用于南洋各地的政略,就是鼓煽南洋各地人民的所谓民族仇恨及反对白人统治者的反抗心理,提出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同生共死”,所谓“亚洲人的亚洲”等纲领及口号。甚至于在细小的实际行动上煽动各该地人民对其宗主国人民的复仇行动,例如当安南人面前殴打法国人,驱使缅甸人凌辱英国人,最近且又挟持印奸包尔斯等人组织印度的伪组织等等,皆出于此原则。

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上,日寇拼命利用南洋现成的物资及生产设备,并使其破坏的都市,尽速恢复旧观。在南洋群岛上,各种战争资源占世界生产总额很高的比重。自全体上言,树胶占世界90%,锡产占世界70%,钢及铁有数百万吨之多。亚麻的生产几乎占100%。在日本粮食方面居第一位重要性的米产,占世界产量的90%。汽油的生产量,据日本人佐藤的估计,在日本消费量2倍以上,据著名军事评论家尼克尔逊陆军少校的评量,也足以转动日本舰队、航空队及输送船。再如新加坡、马尼拉、仰光、香港等地的科学技术,原即不低,日本能够充分利用,当于日本的军需生产,有极大的帮助。

在这一时期，东条政府的内政方针，就乘其初胜的余威，极力增强其军事独裁的权力。但在此时期的作法，尚只限于新旧占领地的统一，利用与统制，所以首先增加大东亚省，以促进新旧占领地的行政一元化，除纯粹的外交事项以外，所有一切关于新旧占领地（台湾、朝鲜及琉球除外）的行政设施，一概移交大东亚省处理。在产业行政方面，东条政府强调其所谓“百年战争”的生产，但终1942年一年之功，尚只停留于空洞的讨论，并无新的具体办法。

东条政府内政控制与生产政策的加紧，开始于太平洋战争一周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的周年纪念日，美国官方公布珍珠港被奇袭的损失，业已完全恢复原状。此外，美国和平工业改变为战时工业的优异的成功，及军需生产的突飞猛进的消息，充分刺激了日本军事当局。东条政府感觉到本国生产质量之低劣，尤其是飞机一项，更畏惧“美国挟其数量上的优越压倒日本”（日本官方的警句）。故自太平洋战争第一周年的前后，东条政府即开始加紧军需生产的统制，其历程为统制会社的设立，营团制度之增设，及统制会社制度的实施，是在步步加强军需生产的国家管理。在生产行政上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生产指导权及管理法的一元化。这是本年春间确定的“战时行政职权的特例制度”，其法律根据在于本年一月颁布的“战时行政特例案”及3月81届议会通过的“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法案纲要”关于生产方面的规定。

东条政府除于战时行政的集权化外，还实施战时军需

生产的集中政策,规定制铁炼钢工业、煤炭工业、轻金属工业、造船工业、航空机制造工业五种,为所谓“超重点工业”。同时实行所谓“企业整備”,第一次,将不需要或次要的产业设备及劳力,移用于最重要的工业生产;第二次,更进一步将同种工业中的中小规模生产设备及劳力,再度裁减或撤废,而移用于规模大而生产力高的生产单位,以从事于所谓规格化合理化的生产,以增加生产数量,提高生产品质。

东条政府的战时行政特例制度,不只实施于生产上,且又贯彻于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制度上。在中央方面,乘此动机极力谋少数阁员制之进展,及其职权的增强;在地方方面提高地方行政官的权限,裁汰骈枝机关,派驻地方的中央机关从属于地方行政官。先就中央有关战时生产的机关说罢,原来各部门分属于各省,彼此不相联系,至于重复对立。例如主要军需生产,大部分属于陆海军两省,一般生产资金属于大藏省,生产资材属于商工省,运输流通事项,又属于铁道省及递信省,各省各有独立职权及运营方针,不但不能统一,甚至互相对立。原来,日本的内阁制度,是国务大臣平等存在,总理大臣不过是名目上的代表而已,并无绝对的指挥权。

东条政府为着加强其权利,乃借口于分立重复的弊病,一方面建立战时行政特例制度。另一方面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减少阁僚数目,推进军部年来所要求的少数阁员的集权制度。11月合并农林省及商工省为农工省,合并铁道省及递信省为运输通信省,废兴亚院,设军需省,并由东

条自兼大臣,即其最近的实例。东条代表军部以建立日本军阀独裁步骤,至此已由披甲荷枪而至实弹,此时才算实实在在全副武装了。

日寇一年来的内外施设,充分表露了军阀独裁政权的特质,虽说日本的傀儡议会,也曾频频召开,但皆是战时的“无风带”,只充当了东条政府法令及预算的追认机关。高喊多年的所谓“国民政治”的加强,也适得其反,日益衰退了。太平洋战争第一周年的日本议会,称为“总力战议会”,第二周年的议会,称为“决战议会”,前者乃东条政府要求日本国民为其黷武主义而全体动员,后者更进一步而要求所谓一亿国民,齐赴前线作无意义的牺牲。

在日本军阀的侵略下,日本国民被用作肉弹炮药,而日常生活的幸福被剥夺殆尽。日军惯用“特种”的名称,奖励生命的贡献,例如特种飞机、特种潜艇、特种部队,其意不外乎要其人民自杀,特种与自杀划一等号。但是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在生活管制之下,降低到动物的程度以下。日人主要日常消费品的糖,被定为奢侈品,米产不够分配,专用杂粮代替,其粮食增产计划,已置重点于“日满支共同体制”,想依赖我东三省的粮食去弥补,但恰巧东三省自今年夏起大闹旱灾,其日暮途穷之状,业已暴露无遗。

## 二、增强战力与集中权限

东条政府因迫于国际情势及联合国家对日作战的决



意，终于觉悟到战争的长期化，而决心准备对付这个长期战争。其所谓决战的意志早即决定于1942年年底，所以在去年12月26日即便召开第八十一届的所谓“决战议会”。这一届议会，因为日本稳健派（另称“现状维持派”）对于决战，尚存观望，最初没有完全支持东条政府的方针，遂致东条费尽精神，从事疏通，耽延很久，举行开幕典礼后即宣告休会。至今年1月21日始再复会，而其讨论议案，一直拖至3月26日，始告完结而闭会。其间，东条本人甚至称病一次，其执行决议的分歧及结束之困难，于此可见一斑。

日本议会原自去年4月30日总选举以后，即已完全为军事法西斯急进派的御用单一政党，翼赞政治会所把持，称为“翼赞议会”，对于东条政府所提出的议案，本是无条件拥护的，去年5月25日召开第八十届临时议会，即已有显明的表现。但在这届议会上，东条政府为着上述的内外情势而有与稳健派调和的必要，所以事前和事后，皆曾从事相当的疏通，而其会期也得特别拖长。这些皆在证明东条政权本质的变化，其上半年的政治施設，也表现于这一届议会的决议上。

第八十一届决战议会所通过议案，大别之可得两大类：其一是所谓“增强战力”的决议；其二是加强政府尤其是东条首相的权限。前者为总纲，后者为执行的细则。故又可分成几个部分：第一是“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法案”，第二是“战时刑事特别法修正法案”，第三是“非常军事支出预算案及1943年度收支预算案”。本届议会所通过法案共有

89件,但是特殊而主要的,不外乎上述几种。

先就东条所要求的总纲讲,3月6日,众议院通过的“增强战力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基于宣扬八统一字的大义,击灭英美,建立世界新秩序,乃皇国的使命。为谋实现真正举国一体的国家总力,集中于战力的增强,确立必胜不败的体制。”其提案的理由,据众议院议员小泉又次郎的说明,是:“近代战争乃连续的消耗战,欲在庞大的消耗战中获胜,则必得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始克有济。”其重要目的仍在于加强人力和物力的搜刮,完成所谓“决战的态势”。

在执行这种加紧人力和物力的搜刮政策上,东条第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生产行政的分歧重复和生产行政必须一元化的问题。从来日本内阁对于生产行政,是分立不统一的,例如生产资材属于商工省,劳动力属于厚生省,资金属于大藏省,交通运输属于铁道省及递信省。又如战时生产的总计划又属于企划院,新占领地的物力及人力的征调又属于兴亚院,后来移交大东亚省。东条就借口这种理由而要求生产行政的“临时措置”,于是日皇以敕令颁布“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案要纲”,议会通过“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法案”,其内容包括中央及地方行政的一元化,但最重要之点则在于生产行政的集权化。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在大东亚大战中,对于铁矿、煤炭、轻金属、船舶、飞机等重要军需物资的生产扩充,遇特别必要时,内阁总理大臣,得令有关各省大臣,予以

必要的支持。

第二条：在大东亚大战中，遇前条所述物资生产扩充的特别需要时，对于劳务、资材、电力、资金，内阁总理大臣得将有关各省大臣的职权的一部分，亲自执行，或令其他各省大臣执行之。

第三条：在大东亚大战中，遇日常物资生产扩充的特别需要时，于前条所述场合外，内阁总理大臣，对于劳务、资材、电力、资金有关事宜的行政官厅或官吏的职权，得亲自执行，或令其他行政官厅或官吏执行之。

以此规定，东条总理大臣在生产行政上，无异是一个独裁者，原是平等并立的各省大臣，都要听从他的“指示”了。

另一方面东条政府又谋加强其对于一般人民的压迫与控制，向这届议会提出“战时刑事特别修正案”。该特别法原只规定：“在战时，凡以企图变乱国政为目的而杀人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七条）。而修正通过的结果，这一条规定增加了三项：“以变乱国政为目的，危害、逮捕、或监禁他人，及以同样目的所为的暴行威胁等罪”（第二项），“以变乱国政为目的所犯会议宣传及扰乱治安等罪”（第三项），及“凡以企图变乱国政为目的而妨害治安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四项）。战时的日本人民，满身加上锁链，几无自由可言。

议会既通过准备决战议案，自须供给政府以充分的经

费,故又通过空前的庞大预算案,预算总额为4,741,060万日元,其中一般会计部分,13,275百万日元,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270亿日元,此外还包括其他各种特别会计,所以预算总额,共达4,741,060万日元的惊人数目。日本人民形容这个庞大的预算,称道:“470亿元的预算,若以10元一张的钞票平铺起来,长可达千里,若堆积起来,便要高过富士山。”

第八十一届议会,除了内政之外,对于外交方针也有划期的新决议,其一面正如东条所宣称,是“帝国现正从事于可决定世界命运的大战……官民一致为击溃宿敌英美,而向身为东亚10亿民众的先锋之途迈进”,“将用一切可能想像的办法击溃‘重庆政府’——指我中央抗日政府”,另一方面强拉伪汪组织“介入”世界战争,以与日寇“同甘共苦”继续长期战争。本年1月19日汪伪对英美宣战以后,日本即假慈悲,宣称“尊重中国地位”,对中国不干涉政治,“交还租界”,“交还产业”,还要“帮助建军”。这是日寇对华侵略政策的转变,是一种怀柔伪组织的作风,加强“以华制华”毒计的阴谋,同时想借我国的丰富资源以维持长期战争。

### 三、加强生产的设施

第八十一届议会,日本朝野虽宣称为“决战议会”,事实上只是决战的积极准备,或更严格地说,只决定了继续战争的总原则罢了。到八十二届以次的议会,才算讨论到

决战的具体办法。日本长期战争的要点,着重在生产战,英美对于日本的最大威胁,在目前也就是生产的突飞猛进,数量上的优势。所以在这届议会上,除了永井柳太郎提议并得通过的“一亿国民决意打倒英美决议案”外,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增强战力的具体办法上。

这一届议会是临时召开的,6月15日开幕,经过16、17、18三日的正式讨论。东条在开会的报告上,即便强调:“盟国行将由缅甸及新几内亚实行总反攻,”并称:“战局已益见紧张,战事也将更为惨烈,”要求议会通过议案,增强作战力量(6月16日讲演)。东条为增强战力而要求整备企业,称:“在决战下,为急速增强直接战力,特扩充从来的企业,使产业的各分野,得有彻底的整备,”其实施原则,就是:“举凡普通产业和平时营业,与增强战力无直接关系者,应在综合计划之下,将其一切设备、资材、劳力、运输等力量,全部转移于所指定的重战时产业。”

关于企业整备的具体办法,6月17日,岸商工相在临时会议的答辩,说过:“纺织工业的整备程度,其方针在于棉花、人造丝、纺织各部门,四成左右继续工作,五成或四成暂时保留,其余二成转移使用或废止。又关于相同的织物工业,四成乃至五成,也继续工作,二成保留开工,其余四成则予废止。”

但是这次的企业整备,是全面的,即战时重要产业部门,也同样予以刷新的处置,所以岸商工相又称:“整备的对象不独限于和平产业,整备的最大重点乃在整备重要产

业部门,为使有效活用自其他部门转来的工厂设备及劳力等,对于重点产业部门的内容、组织,加以根本刷新,实为当前急务”。

日本此次的企业整备,包括两层的办法,其一是战时非必要部门的整备,而将其生产设备、劳动力及资材,移用于别部门重要产业,其二是同一重要产业部门的整备,即将中小规模的产业单位,加以整备缩小,而将其剩余的设备、资材及劳动力,移用于大规模的产业单位。严格地说来,后一种同样产业部门的调整与刷新,才是这次企业整备的重心,日本朝野非常重视这次的调整,在临时议会召开前,5月28日东京广播即便宣称如下:

“政府已决定召开临时议会,为生产增强的前提的企业整备,是议会的中心课题之一。此次的企业整备,并不似从前,仅使生产配给机关合理化而已,凡非战时紧要产业,一切皆予以整理,并将由此所得的劳力、资材、电力、资金等,全部倾注于紧要产业部门。

“此次极大规模的整备,即谓为将我今后产业,完全涂成战时色彩,亦不为过。不但为产业态势之再编成,且间接改变经济产业的本质,其所企图者,为一产业革命。”

日本工商省整备课长,桥井真对于这次企业整备的特

色,也有如下的叙述:“从来的企业整备有置重点于和平产业部门,但是此次企业整备的办法,却要贯彻于所谓“重点产业部门”,即所谓第二种工业部门。在航空机、造船、机械工业、或某种金属材料工业等,不复再采取消极的办法,而想以某些方法使得繁荣发展。当然,其办法自与前异,是为战力增强的直接目标,为此次企业整备的特色”(据8月号日文《实业之世界》所载)。

又其企业整备实施的目标,大约如下,重点在于重产业,这次的整备对于钢铁业、煤炭业、及非铁金属矿业,也采取裁并办法,甚至可以说明这次企业整备的重心,正与下面所剖述矿物增产问题相关联。钢铁业,只保留日本制铁会社及钢管会社两家私营公司,其余中小制铁业公司,悉数裁废。煤炭业也只保留三井、三菱、住友、贝岛、及明治等大公司,其采掘办法,采用地域集中制,以肥筑、筑丰、及盘城三地为中心,其余小煤矿全部停止工作。非铁金属矿业,指定矿山245处集中开采,其余小矿山均予以停止。这些事实是重产业整备的一实例,至于轻工业部门的整备。尤为彻底。例如日本支柱工业的纺织业,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原即停闭90%以上,经此次的整备,所残留者将更寥寥无几,决定仅保留纺机百万锭及织机300架以上的大公司八家,且该八大公司,又只保留原有机器30%。其他如人造丝工业、食糖工业、制纸工业,乃至水泥工业等,莫不加以大规模的整备。

第八十二届议会上,除了企业大整备案以外,还有“粮

食增产案”，及“重要矿产增产案”等，也是重要的议题。

关于粮食增产对策，议会只决定一个“日满支粮食自给自足共同体制”，而据农林省企划课长木村武的剖述，日本当前的“粮食紧急增产对策”约分三层(8月号《实业之世界》)：

第一、输入外米，拟由泰国、安南、缅甸、及台湾朝鲜等地输入米谷，以济日本本土食米之不足，据说将于缺乏不够应用的船只中，分割一部分充作运米之用。

第二、提前食用下年度米谷。昭和十九年的产米，原须自本年11月开始收成，而此次计划提前于18年度食用，再掺以杂粮，如春季马铃薯及满洲大豆的配给，也归于此段对策。

第三、此后的应急增产对策，其最主要的是不耕作地的解消，大体上可得田5,000町步及早田50,000町步，我东三省所谓“报国农场”的开拓，也归入此类对策之中。其次农耕技术及组织，也为增产的重要手段。“粮食增产协议会”，关于今后的增产，规定两项原则(拙作《日本粮食增产政策批判》《大公报》)：

第一、关于米谷增产上的重要改善事项，及其指导者及方法；

第二、提高兼业的低位收获农家所耕作田园



的收获量。

其次,关于“重要矿物增产对策”一项,日本商工省曾于第八十二届议会开后,特地著文强调其重要性及其增产方法如下:

“对于消耗莫大物资的大规模近代科学战,必须有雄厚的物质与生产力,无论一机一舰,都要输送更多的兵器,赴前线应用……”

“而制造这些兵器弹药,航空机,舰船的源泉,是铁、钢、铅及亚铅等金属矿物,不能确保这些矿物,即连一辆战车或航空机,也不得造出。换言之,战力基础的这些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增产,是贯彻决战的至上命令”(内阁情报局《周报》第365号)。

其矿物增产新对策,第一是“国内自给态势的确立”,因“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输入完全杜绝,而他方面国内需要却反而年年增加”,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开发国内矿物资源而期增产,而自给自足必要的数量”。第二,是国内增产与新占领地开发并重,“在南方地域,固然拥有占世界总产额90%的锡,以次几多的丰富资源……日本也正动员优秀的技术从事开发”,“但同时目前还须付出任何的牺牲,以彻底开发并增产国内矿山,使之变成战力”(同上)。

总观这一届议会的主要议题及其后具体对策所反映的施設事实,可知日寇自去年下年以后,才算进入积极准备决战的阶段,在四五月间还向国际及我国,放出和平空

气的刺探(见笔者在衡阳青年会演讲笔记),自非偶然。联合国军自五六月以后准备总反攻,已经威胁及于日本重要据点,乃至日本本土,日寇遂致慌张万分,手忙脚乱,急急于长期战争及大规模战争的应付。此时日本政局,已不但反映日本政治动向,并且反映太平洋时局的新趋向。

#### 四、虚张决战与军阀集权

自五六月以来,太平洋对日反攻的局势,日紧迫一日,澳印两方面也都屡次发出乐观的空气,自信盟军已由防守转为进攻,盟军已经取得主动的地位,并且不久即可向日军大举反攻。八九月以后太平洋各路盟军,皆有更积极的发动,西南方面作战的再接再厉。不消说,即北路方面也已经克复吉斯卡及阿图两岛,轰炸及于千岛列岛。中路方面也曾克服马尔卡斯岛,轰炸及于台湾海峡。西路方面,中美陆空的协力作战,完成湘北鄂西的大捷,并且屡次出击日军阵地。这样四方八面的围攻,业已震撼日本政府的心脏,故第八十二届临时议会开会仅逾四月余,而东条又以召开第八十三届临时议会的消息,惊动世界,且其加紧集权,具备特别性质。

这次临时议会召开于10月25日,开会仅3日之短促,其目的在于:“俾政府提出预算及各立法案件,使在现有情势下,能与国务执行相配合,借求国内外明白政府具有有效进行作战及再度加强全国团结之不变决心”(据东京9月28

日广播)。我们于此可以明了两点：一、东条政府因迫于外来情势而须呼吁议会以至人民，追随政府从事于决战。二、要求其他党派服从政府，全国团结一致，一任东条政府摆布，以遂行决战工作。

因此，这次临时议会的重要议案，除了年度的预算案外，就是政府对于议会所要求的“紧急措置”的案件，占最重要的地位，如：一、机关预算手续简单化之议案；二、关于司法行政简单化之议案；三、关于军火公司之案件（此条应为求得军火财阀谅解之议案）；四、关于加强空防之议案；五、关于议员应征服役，其职责继续问题之议案；六、关于修改兵役法之议案（即为扩大征兵制的议案），等等；无一不是政府要求议会及人民绝对服从的案件。

东条政府在决定召开临时议会的前后，即已屡次宣告情势之急迫而呼吁人民加强防御，其情急现于言表：

“各阶层人民必须认识国内外情势之严重及其任务之困难。全国力量必须集中于军火工业，尤应扩充日空军，加强其实力。日本及满洲国的粮食，必须实现绝对之自给自足。广泛加强日本本土防务之计划，必须立即拟成。全国人民将全体动员，兵役将予扩充，妇女工作将予扩充，空防将予扩充，尤以工业区为然（9月23日德国无线电台报告东条广播）。

日本递信省大臣寺内在日本航空日广播也称：“吾人

不能松懈，因美国方面有更好更新式之飞机出现，美国近来制造有继续的进步，一旦挟其数量上的优势进攻时，吾人自不免忍受贵重的牺牲”（旧金山9月27日电）。

东条更在议会的开幕中瑟缩陈词，从其演讲中也可可见其施政方针的一斑。东条首述太平洋一般的情势：

“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倏忽二年了……现英美以绝大决心，发动攻势，骎骎有凌压吾人之势。……此项责任，决非轻易，过去之思想与作法，实不足以完成此项艰巨。唯吾1亿人民确应放弃不合时宜之旧习惯，而以全力图之，方有可为。且局势瞬息万变，时机不容稍纵，此即政府所以决定采用“国政运营大纲”之理由……（10月26日东京广播）

从东条的演讲中还可以窥见日本最近施政方针的具体情形：

第一、国内行政机构的大改造。这届临时议会的召开，政府之向国民报告此项改造及要求追认，几占最重要的题目，所以东条声称：“政府目前改革行政机构运用的首要目标，在于增进统帅部与国政机构之关系，以加强领导作战方面之效力。同时实行有力与及时之对外措施，作为致胜之道……”

在临时议会召开前，东条政府即已准备好内阁机构的大改组，并定自11月1日起正式成立新机构，废去旧机构。其主要者为合并商工及农林两省为农商省，合并递信及铁道两省为运输通信省，另外废除企划院而新设军需省及通信院。其改造的主旨，据说：在使设计与执行合而为一。这就是东条所称“政府已实行增强全部机构之计划。为求行政事务之处理，与目前进行之大战协同一致，政府乃对行政机构加以调整”（同上演说）。

第二、迅速扩充军需工厂，尤置重于空军之扩充。此项实际行政改革，就是军需省之新设。军需省所管理的事务约有数种：一、关于国家总动员的基本事项；二、关于矿业的一般事项；三、关于矿产及工业品的生产配给及消费配给等事项；四、关于主要军需品的原料与材料，及特定军需品的生产管理发货定货与筹办等事项。尤堪注意的，就是东条首相身兼军需省大臣。

第三、日本特别加紧空防，决定成立一个防空总司令部于东京，以统一管辖国内防务。同时，颁布疏散首都及重要城市的居民及机关的命令。日本最近还决定疏散重要工业生产于朝鲜、我东北四省、及华北、华中等地。

第四、东条为加强总动员，而扩大征兵制及征役范围。东条宣称，“关于国家总动员方面，政府已

加速推行募集学生服役（前曾规定暂行征募学生服役办法），并扩大军事及工业征募范围之方案，”决定有关教育之战时紧急施政方针。同时，扩大应用征兵制于朝鲜与台湾。

这一届议会所反映最重要的政治设施，首推行政机构的改革。东条对于这一点，非常注重，且再三夸示于议会，在他的报告讲演中，下有力的结论称：

“余深信国内机构之增强，目前之是否能得迅速执行成功，将决定大东亚建设之成败”。

此届议会对于外交事项，没有新的决定和宣示，只东条略为提到德国，称：“日本期望德国盟友，于未来新战事中，获得理想结果”。对于加紧侵华，当仍维持上届议会的决议。

## 五、1944年的展望

我们应深加认识的，就是东条此时是在与稳健派调和协力之下，谋决战之遂行。他已渐与急进的革新派疏远，急进革新派的疯狂代表者，中野正冈之自杀于此时，自非无因，其遗书中有“余凝视日本而死，死亦无所恋”等语，深堪玩味。此后日本施政方针，也将沿此线路前进，何时开始“决战”虽难断言，但其1944年度财政预算之“打破日本财

政记录”，业已预告我们：日本更将孤注一掷，走向战争的深渊。据12月10日东京同盟社广播内阁情报局的消息，称道：“日本阁议通过大藏省所拟1944年至1945年会计年度的总预算（笔者按，应为一般会计预算之误），将提交行将举行的第八十四届议会讨论，下一财政年度预算，自1944年4月1日开始，总计1,504,300万日元，较本年度总预算（包括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届议会通过的补充拨款在内）增加1,219百万日元，较本年度原有预算增加5,248百万日元。此数之巨，打破本国财政记录。……”

本年度预算总额共达4,741,060万日元。就上列一般会计预算的增加类推，下年度预算总额，当膨胀至500乃至600亿日元，或竟过之。日人评定本年度预算总额，若以10元钞票堆积起来，则可高过富士山，是则下年度预算总额或可高过新高山（位于台湾中部），日本用以高过新高山的预算从事于下年更激烈的战争，我们可以联想到这场更激烈的战争，可能就在包容新高山的台湾揭开惨败的序幕罢。

综括地说：1942年全年及1943年上半年，是日本举国陶醉于侥幸胜利的时期，大部分日本人皆在昏昏沉沉地作他们独霸亚洲的迷梦（详情参考拙著《日本亚洲独霸》——桂林三文出版社版），但是这个美梦到了1943年秋间，即已完全变成了恶梦，盟军太平洋各路的进攻，空袭日本本土的威胁，首先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台湾新竹机场之蒙受惨烈轰炸，马绍尔群岛基地之被占领，更使他们胆战畏缩。日本军阀虽在此胆战畏缩中，手忙脚乱地积极准备“决战”，而此一

年的一切施設，將於1944年盟軍大反攻中，完全化為烏有。

代表日本“革新派”言論的《公論》雜誌，曾於去年新年號的社說中，警惕日本國民稱道：“昭和十八年是我國國民‘奮起第一’的年头，同時也應該是舉國反省的歲次。昭和十七年的正月，曾經因為過分光輝的緒戰的大戰果，而全部國民大小皆沉醉於戰勝的氣氛中，其懷抱美英容易對付的心理，有不可否認的。但在開展第一年間，國民之間漸次認識美國決非容易應付的對手。美、英，特別是美國，之為不可厚侮的敵手，在熟知對方的人們，早已明了並不是新奇的事情，在一部分國民之間，精神上，尤為美國生產的偉大所壓倒，在資源上，在生產設備上，乃至在生產技術及工作機械的進步上，若以日本與美國比較，則至少在今日是一對十之比。……美國的生產力，今年一年中，仍將處於上升期。”

日本在今年年头坦白承認生產設備及生產技能的劣勢，而特於這一年竭盡所有能力及方法，擴充生產設備，謀生產數量之大增加，即如內政施設及外交措置，也莫不如此挽回生產頹勢而努力。但是1943年全部過完了，日本的生產設備及其能力，依旧處於拙劣的地位，或視年頭的情形更不如。日本軍閥就以此更為拙劣的“戰力”，迎接決戰第二年。

關於此後情勢的展望，因與日本締結“中立協定”而保持緘默已久的蘇聯，最近曾經評論稱：“日本已陷於不利的形勢無疑。日本雖仍保有廣大的領土，但不能採取進一步的動作，刻英美軍已為繼續太平洋戰爭，而不妨礙其在歐洲對德作戰，太平洋戰鬥力的比率，已有利於盟國”（據柏



林12月6日广播,《战争与阶级》周刊的评论)。同盟国已可以兼顾欧洲及亚洲的战争,这是盟国生产之进步,是日本生产劣势的加深。美国业已开始“超级航空母舰”的制造,欲用以轰炸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据点,美海军航空署署长蓝漠塞少将,最近宣称:“进攻日本外围阵地的行动,将自美国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发动,美国准备在海军决战中,以一舰对一舰制胜日本海军”(12月15日伊里诺斯制造厂商协会演说)。这不能视为美国的宣传,而实在是美国生产设备优越的豪语。蓝氏还称:“吾人愈早迫令日方出而作决定的战斗,结果愈佳。”不知一年来集注精神于航空机及军舰的制造的日本当局,将如何答复蓝氏,更不知1944年的日本施设,又将如何推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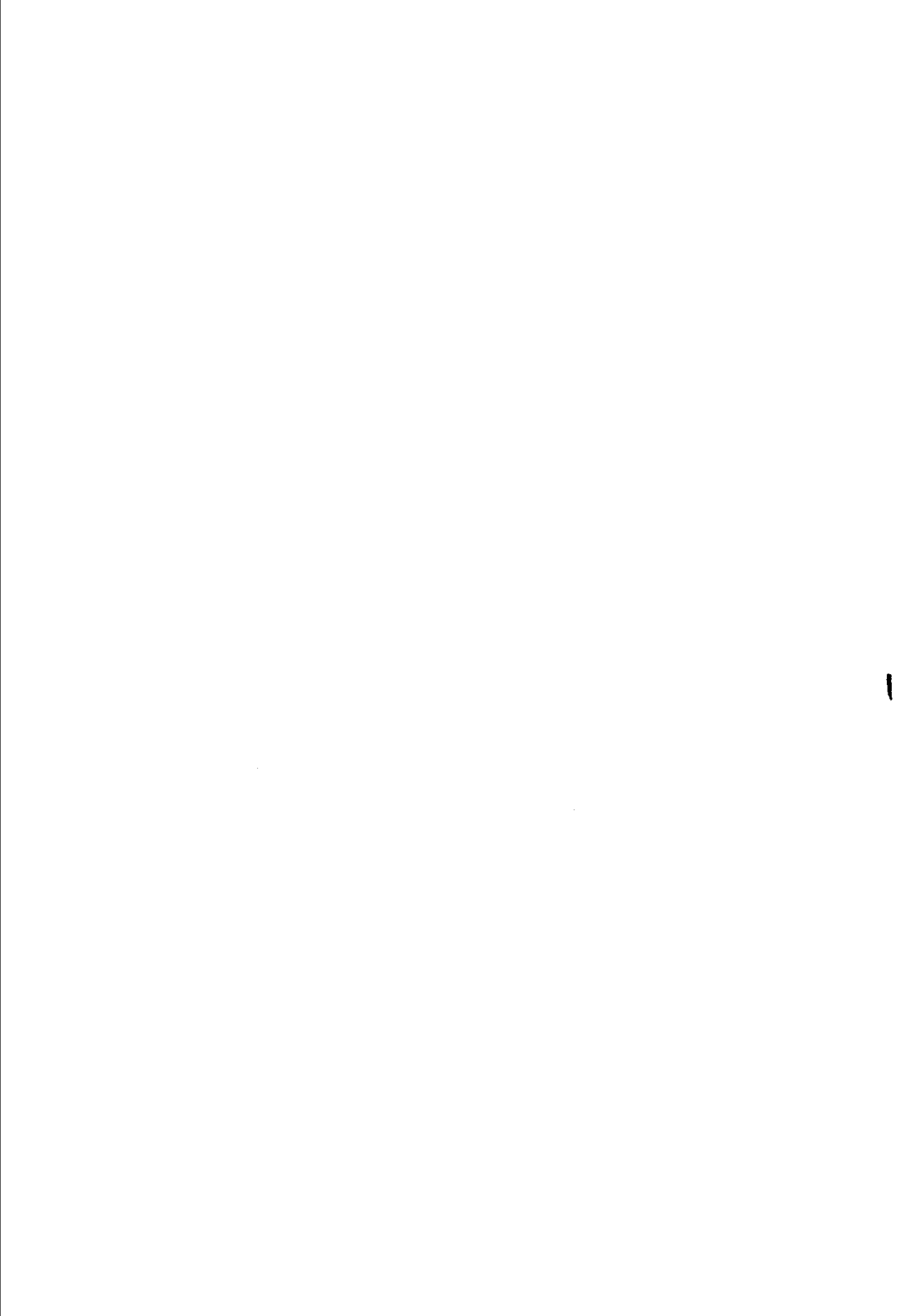
(1943年12月31日于桂林)

原载1944年3月《新中华》复刊第2卷第3期

卷 三

第四辑 日本政治

---



## 日本无产政党的研究

日本的无产政党,早在六十多年前的明治初年,即已产生。例如借金党、佃户党、贫民党、东洋社会党及车界党<sup>①</sup>皆是。明治中年更有东洋自由党、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出现,而日本平民党、日本社会党、国家社会党继之。重以大正十四年三月,日本普通选举案通过国会,日本无产政党更以蓬勃之势增加起来,并且添加活跃的气象。其后屡经合并、分裂、协同、轧轹等等演变,而日本一般人士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加以充分的注意。这个日本无产政党的问题,现在已经是日本社会或政界——如从东方全体的立场看来,自然也是东方社会或政界——的重大问题之一。尤其是最近,什么无产政党全体合并问题,什么部分的合并问题,什么劳农党的取消问题……,闹得日本社会满城风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实有充分加以检讨的价值。我们就想在本文,就此重大的问题加以概要的讨论。

我国著作界很少关于无产政党的论文,致使大多数人对于无产政党之为何物,尚缺明了的意识。所以,本文在未

检讨日本无产政党以前,先就无产政党的意义或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略加叙述。

## 一、无产政党的意义

无产政党是什么?对于这个问话的答语,如就字面说,本是自明的。正如字面所指示的,无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加以更为精确的定义,那末,无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的政党”了。这种定义,若从字面说来,固然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对于无产政党的概念,依然不大明确,它的性质依然模糊。所以,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来究明它的内容和性质。

或谓:正如有产阶级的政党,是有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无产政党,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这种说法,是甚合论理的。这种说法,还可以区别无产政党的性质与其它无产群众的组织的性质。盖因其它无产群众的各种组织,是带着经济的性质,而不是政治的性质。例如劳动组合与农民组合等等无产的团体,都是经济的组织。它们的举动大都局限于经济的范围内,即使它们的经济的举动,常与政治的行动具有相互的联关性。

然而,只说“无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我们只能理解它的形式,至若它的机能似有加以更为明显的说明的必要。换句话说,到这时候我们必会想到:无产政党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但其目的究竟何在?至少,也可以

想到：无产政党是在那一方面进行它的工作？对于这种疑问，我们应该在无产政党的意义之上，加上“目的限制”，说：“无产政党就是目的在于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组织”。

这种解释，或许有人以为是冗杂而非必要的，但是事实并不然。许多人在其观察一切的事物，常于有意识或无意识之中，注意其事物的现象而轻忽事物的机能。其实，事物的研究者，尤其是我们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与其注重问题的现象，不如加力注意事物的各种机能。所以上述那样关于无产政党的解释，实是必要的。第一层，我们可以在构成无产政党的概念时，握住无产政党的目的，或其“机能”。即无产政党的目的，在于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这一点实是无产政党整个问题的枢要部分(Vital Part)。

谈到这里，我们的讨论就要关联到“无产政党的构成要素”上头。如上所述，无产政党既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那末，它的基本的构成要素，自然是无产群众——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上的工人和农民。如无无产群众的支持，无产政党就失其所根据。但是，此外尚有其它必要的构成要素。在现代，若无这些次级的构成要素，无产政党也就不容易成立，次级的构成要素云者，就是无产群众之外的诸社会群。例如中间阶级和过渡阶级的各种分子。这些无产群众之外的诸社会群对于无产政党的成立，在现在不但理论上是必要的，事实上的无产政党，也都包括这些分子在内。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下列的事实。无产政党固然必需无产群众以外的诸社会群,而且事实上也都包括这些社会群,但是无产政党绝对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本来的目的——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因为这种工作是无产政党的根本目的或机能的缘故。无论那一种无产政党,如以非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或政治行动以外的工作为目的,它就成了“伪无产政党”,或非政党的无产阶级团体。这种伪无产政党,实际上固有许多的存在,但是事理却是如此,事实且在昭然证明这种事理。“伪无产政党”,名义上固然仍是无产政党,但若自其实质说来,却已不是无产政党了。反之,无产政党只要是以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为目的,即使它的构成要素包括非无产群众在内,它仍不失为无产政党。

## 二、无产群众的经济行动与政治行动

上面我们固然已就无产政党的性质和内容约略述过。我们固然述过:无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组织;并且这种组织又是以无产群众——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上的工人与农民——为主要的构成要素。但是,无产群众因何而构成无产政党?换句话说,无产群众为什么要支持无产政党?这个问题就是无产政党的行动与其它无产阶级团体的行动的关系。且在本节解剖这个问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在经济上被榨取的社会群

之反抗榨取的社会群，虽然性质上和过去各个时代的反抗，完全没有差异的地方，但是在量的方面就有很大的异处。现代的各被榨取的社会群，都以极大的规模和积极的方法，对抗其对方的榨取群。例如包括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构成分子的劳动组合之对抗工业资本家。又如同样大规模的农民组合之对抗地主或农业资本家。思想左倾的知识者的团体，从思想方面反抗现代支配阶级及其附庸集团，也可以充当一例。这些都是显著的例子。而这些集团（如劳动组合、农民组合及思想左倾的智识集团）之反抗榨取阶级的形式，常是为着达到增加工资、减少佃租、改良工场设备、缩短劳动时间等种目的而采取的怠工、罢工及抗租等等，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的农工群众，实已学得这些大规模而且积极的反抗了。因为他们为着最低限度的生存。这种反抗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产生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的事实那样，它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然而，上述无产阶级群众的反抗，若只限于采取怠工、罢工及抗租等方式，以达到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良其它的劳动条件及减少佃租，那末，它的性质还是单纯的，初期的反抗罢了。这种单纯的、初期的无产群众的反抗，常是短期的、一时的行动，并且又常限于某一特殊的地方，或某一特殊的无产集团。例如某一工场的全体工人，甚至专限于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他们专为要求增薪而罢工，所以，一旦增薪的目的达到，这种反抗马上归于消减。其它



的缩短劳动时间、改良工场设备及减少佃租等等的反抗，也都同样，一旦目的达到，即便停止，或消灭。所以，这样的反抗只能说是“经济的行动”，而不是“政治的行动”，固然，“经济行动”与“政治行动”之间，有相互的关系存在。但若这种行动的目的，只限于一时的、一地方的或某一团体的范围，那末，它就不能称为政治的行动，是很明了的事理。然则无产群众对榨取群的反抗，要具备什么样的性质，始能称为“政治的行动”？

上述无产群众之对于榨取阶级的反抗，若只限于经济的范围内，那末，即使他们的反抗仍以集团或阶级为单位，这种反抗还是不能称为完全意义的无产者全体的行动。必须上述无产群众的反抗，由短期间的、某一地方的、或某一团体的范围，扩大到永久继续的、无产者全体的范围，更须由某一特殊集团，例如熟练工人，或甲工场的工人的特殊利害关系，扩大到无产群众全体的利害，它始能称为完全意义的无产者全体的行动。如未达到这种程度，它就只是所谓“对于全体资产阶级的对立”；而这些无产群众，也只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Class in itself)罢了。

然而，无产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抗，要由某一特殊集团的利害关系的打算，转到全体无产者的利害关系，其间必须经过一种“意识”的媒介。在榨取者与被榨取者对抗的过程中，被榨取者渐渐觉出他们的这种反抗非以团体协作的方式不为功。换句话说，他们觉出团体的利害关系了。

这种意识先由个人而团体,由团体而阶级,逐渐扩大,便成了阶级意识。到了阶级意识普遍地形成之后,无产群众的行动,就会由暂时的、一地方的、或某一特殊团体的利害关系,转而以永久的、阶级全体的利害关系为目标。到这时候,他们就已不是上述“与资本阶级对立的阶级”(Class in itself),而是“为着自己阶级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了。此时,他们完全处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地位,意识出他们自己之历史的任务,而一切的行动全受这种意识所指导。此时,他们的行动就已不是个人对个人、或集团对集团,而是阶级对阶级了。因此,他们此时的行动,已由单纯的经济行动,转入“政治行动”了。

### 三、无产政党与其它无产阶级的团体

上面述过无产群众的经济行动与政治行动的关系,而进行政治行动的,就是无产政党,然而它的形成究竟经过什么过程?本节且就此点加以略要的解释。

无产政党的行动,固然专以无产群众的全体利益为前提。但是它的形成却有待于无产者的别种团体,普通,概由无产政党之外的其它各种无产团体,如劳动组合、农民组合、无产青年同盟、无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机关,及编辑无产阶级的新闻杂志等团体,促使无产政党的产生,而这些无产团体就在无产政党与无产群众之间,充当上述二者的连锁。到此时,劳动组合、农民组合以及其它的无产团体,在

其政治的行动上,听无产政党的统一指导,变成无产政党的协助机关。但是这些无产团体的这种协助的任务,却非非常重要。他们传达无产群众的现实的要求于无产政党,广布无产政党的决议及行动的意义于无产群众,借以完成他们的中间的、媒介的机能。

实际上,无产政党与其它无产团体的关系,还不止于上述那样单纯。普通是由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无产团体选送本团体的指导者,或斗士于无产政党,以便将本团体的精神代表于无产政党中。而属于这些无产团体的无产群众,经由无产团体的媒介,而对于无产政党,加以极力的支持和援助。惟其有这种无产团体,或无产群众的支持和援助,无产政党始能完成现实的政治行动的效果。同时,各种无产团体也因无产政党的统一的指导,而其政治的行动始克进行。总而言之,二者之间实有“相互信赖”与“相互支持”的关系存在。

上面我们虽然述过无产群众到了意识出阶级整体的利害关系时,就希望、并且必需一种统一的指导,要求全国单一的无产政党出现。但是事实上,这种必需和要求,常因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均一性”,或有产阶级的“分裂政策”的作用,而在某一阶段常有许多的无产政党同时并立。诸如上述,无产政党是以数个无产团体的支持和援助为前提的。而这些无产团体又各有某种特殊的利害关系,于是受到这些无产团体支持或援助的无产政党,就非以同样利害关系为目标不可。同时,又有其它几个无产团体,另以别种

不同的利害关系为目标而组成别个无产政党。于是这两个代表不同利害关系的政党，就对立并存，而各自进行步骤不同的，例如急进缓进的政治行动。其中，更有折衷主义的无产政党成立，于是许多的无产政党就违背无产群众的单一政党的要求而群立。不过，这种现象也只是在某一阶段应有的现象罢了，经过种种淘汰和刺激之后，自会归趋于一致。关于这层，不想加以深进的讨论，只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略为触及罢了。

#### 四、无产政党的发生

无产群众的反抗，渐由经济行动的形式，趋向政治行动的形式。换句话说，随着无产群众的阶级意识的普遍化和深刻化，而无产群众的运动，渐由组合主义的行动，转化为全体阶级的政治行动，这是上节所已述过的。无产群众的运动达到这个阶段时，他们之间就必然地要求无产政党的出现，这也是上节所已述过的。

然而到这阶段，无产群众为着进行阶级整体的政治行动，何必一定要有政党呢？要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不必经由国会，岂不是也可以吗？或者，不在具有永久的组织体制的政党指挥之下，政治行动岂不是照样可以进行吗？这样质问的人必定不少。例如法国的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或美国的世界工人会(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World)所主张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也不失为一种全体

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表现。即使这种行动是在“否定政治”的标榜之下进行的,但其行动的本质却毫无改动。

这样一来,无产政党岂不是永远没有发生的必要,而且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吗?不过,事实上全体无产群众的政治行动,如要长久继续进行,就非有统一指挥的政党不可。否则,这种政治行动,就不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继续进行的效果。且将其理由叙述于下:

无产群众,虽然同样处于被榨取的地位,名虽为被榨取阶级,但其内容却非常的复杂。无产群众既不是从天降下,从地流出者,也不是一模一型印就的。事实上,这种群众的洪炉里头,劳工、农民、精神劳动者、无产妇人等等尽都包括在内。即单就劳工一层检看,也就分子复杂错综之至,既有来自农民层者,也有来自手工业者的,更有来自都市的小市民层者。其技能和智力也都参差不等。不熟练劳工与熟练劳工的地位,既不能尽同,生长于工场内者与长至中年始为劳工者的意识,也决不能一样。

依据上述的情形看来,无产群众的内部,实有很多不同的特殊集团并列存在,各集团的意识,也各不同。存在不同、意识又不同的各个集团的行动,即使是依从阶级的立场,也必不能尽同。必定或为地方的、或为集团的,时间也

不能永久继续。这种状态就构成“无产群众内部的不均一性”的现象。而这种“不均一性”就促使无产群众内部的各集团，自以长链的一环连结构成一个长链。各无产集团的独环所构成的这个长链，就是无产政党。所以，无产政党之必然的发生，是以无产群众“内部的不均一性”为其最基本的条件。简约一句话，“无产政党产生于无产群众内部的不均一性”。

这里，我们还须补述几句话。上面所述，只是横断某一阶段，以说明无产政党的产生过程。我们固然叙述过：无产政党的产生由于无产群众的阶级意识的需要。但是，正如无产政党之构成，专赖于现实的无产群众，同样道理，无产群众也绝对不是凭空掉下的怪物，必有其所以构成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经济的转变。若自次序说来，近代经济关系的转变，产生无产群众，而无产群众构成无产政党。于是无产政党之成立，根本倚赖于经济关系之转变，即无详细的解释，也可以判明了。

然而无产政党的成立，于经济关系的转变之外，事实上，尚须倚赖于政治关系的转变，在其初期且须社会思想的培植。例如在封建的专制主义高压之下，无产政党是不能发生的，这和有产政党之不容易发展，是同一道理。又如社会主义思想还未充分发达的时代，各种无产团体如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等，就不会有赫赫可观者出现。（这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被动的，人为的地方，尤其可以适用。）这些无产团体尚未产生，或未充分发达

以前,无产政党自然没有产生的基本条件。所以,政治关系的转变和社会思想的进步,也是促使无产政党发生的动机。

近世经济关系的转变之为无产政党发生的基本因素,和近世政治关系的转变及社会思想的进步之为促使无产政党发生的动机,不但理论上如此,即各国的事实也莫不如此。解明这一点,始可以明了无产政党与一般社会进化的关系。本文既要讨论日本无产政党,就要先就日本近世经济关系的转变,近世政治关系的转变,近世社会思想之进步三者与日本无产政党的关系,各别加以相当的考察。以下,就依照这种次序,往前进行我们的讨论。

## 五、近世日本经济与日本无产政党

我们在以上四节,略就一般无产政党的意义、性质、内容以及它的成立过程,叙述过一个大概。相信读者对于无产政党,大约业已构成一个概念,所以关于一般无产政党的说明,就停止于此,此后,专就日本无产政党的研究,进行我们的讨论。

本节先就日本近世经济发达——即日本产业革命的开始,日本资本主义的急进,日本资本主义的转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以及产业的衰落穷绝等等过程——与日本无产政党的关系,加以概要的考察。

前面已经述过，无产政党的发生，由于无产群众的阶级意识的需求，而这种阶级意识的形成，又全赖无产运动的尖锐化与普及化。所以，无产政党的产生，须以无产运动的尖锐化与普及化为其前提条件。在无产运动尚未发生，或虽发生却未达到尖锐化、普及化的地方，无产政党必不能产生，即使产生也不是真正专以无产群众为基础。例如在无产运动并未尖锐化普及化的明治初年，日本虽也发生了许多的无产政党，但是这些无产政党，却与现在的无产政党大异其趣。

然而，正如无产政党之产生有待于无产运动的尖锐化和普及化，无产运动的发生专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要谈日本无产政党的产生，因须考察日本无产运动的情势，要谈日本无产运动的情势，更要研究它所自出的母体，即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泰西的产业革命是经过二三百年的长期酝酿成功的，而日本产业革命却只以四五十年的短期完就了充分的成功。这是一桩闻名于世界的事实。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产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不循由自然的主动的过程，而只是人为的，受动的罢了。切实一句话，日本产业革命的开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急激的发展，完全是在当时官僚政府的保育干涉政策(Paternalism)的指导、诱掖、奖励之下进行的。它绝对不像泰西的资本主义之以自由竞争主义为培养的原素。这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色之一。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自所谓“欧风美雨”刮破了,冲开了日本的锁闭的关门以来即已开始。但是它的充分的发展,还是在中日战争之后。且就当时的都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变迁检点看:

日本人口都市集中表

年次	人口实数(千人)		百分比(%)	
	一万以下的镇村	一万以上的市镇村	一万以下的镇村	一万以上的市镇村
明治一二年	31,805	3,965	89	11
明治二〇年	34,609	4,901	88	12
明治二三年	34,882	6,087	85	15
明治二六年	35,538	6,521	84	16
明治二九年	36,272	7,128	84	16
明治三一年	37,360	8,043	82	18
明治三六年	38,494	10,049	79	21
明治四一年	38,884	12,899	75	25
大正二年	39,707	15,224	72	28
大正七年	39,535	18,552	68	32
大正九年	37,921	18,036	68	32
大正一四年	37,884	21,853	63	37

(备考)一、本表的实数根据《明治大正产业发达史》1929年版。

二、假定一万人以上的市镇村为商工业区,借以推论商工业的发展。

根据上表,明治二十九年以前商工业区人口的增加,还非

常的迟缓，其在人口总数所占百分比，是由 11 增至 12,15,16,16,18。其增加状态若与其后的 18,21,25,28,32,37 比较看，那是极其缓慢了。

这种商工业发达状态的迟缓，是在证明日本当时尚未充分资本主义化。依据“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必定并兼，资本必定集中”的法则的推论，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达的地方，无产群众必不至激烈增加。无产群众不激烈增加，无产运动就不至普及化尖锐化，而无产政党就无由产生。所以，日本明治初年的无产运动极其幼稚，以与现代的无产运动比较看，性质上实有霄壤之差。真正无产政党的出现，更是谈不到的事。其时，即使也有借金党、佃户党、贫民党、东洋社会党、车界党的出现，但是这些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无产政党。其所以产生的原因，完全在于政治的转变的影响，或为一时的经济行动罢了。当时有一部分失意的藩士，为要抵抗攻击得意的官僚政府，便倡导所谓自由民权主义以为武器。上述那些无产政党——不，这些只能称为无产政党的先驱——就以这种自由民权主义的倡导的余波而产生出来。于此，即可知道，这些政党和现代无产政党之以无产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普遍的、尖锐的觉醒为基本条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道理。即如那时候的无产者的团体，也都一以无产者“相互扶助”的感情为宗旨，和现代无产团体之对抗资产阶级，完全异其旨趣。

然而日本资本主义在明治初年的发达，虽然非常迟缓，但其早已萌芽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自从明治维新以

降,日本资本主义即在官僚的保育干涉主义的产业振兴政策的温床里,日渐发育起来。经过中日战争之后,它的发育就以一日千里之势,增长到相当的程度。

中日战争的结果,日本因胜利而由中国取得2亿两(约当时日金36,000万元)的赔款,并且夺得台湾,势力及于朝鲜,而日本国富大为增加,原料供给地和制品贩卖市场,也都充分扩大。他方面又因为官僚政府对于军国主义的经营愈有自信,极力扩张军备,振兴产业。于是,日本经济界发生普遍的企业热,公司、工场等企业机关,正如雨后春笋那样急激增加。这种情势表现于中日战争前后各种企业公司银行及私营铁路数目及其资本金的差数上面。请检点下表:

	明治二六年六月	明治二九年六月
股份公司的数目(家)	1135	1473
同上的资本金(元)	108,190,719	189,383,092
银行的数目(家)	135	1197
同上的资本金(元)	62,916,100	211,432,042
私营铁路的数目(家)	28	40
同上的资本金(元)	7,312,300	121,138,000

(备考)本表参照赤松克磨所著《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所载。

(注)中日战争始自明治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年,公历1894年)二月,至二十八年四月双方的媾和始告成立。

根据上表可知经过中日战争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怎

样急激地发展起来。这一点参照上掲都市人口集中表,更可以深切地确信。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自经中日战争之后既有那样急激的增进,若自理论说来,自必惹起无产运动的普及化和尖锐化。然而事实上,却只成立了比较多数的劳动组合,经过短期的斗争之后,立即衰落下去。明治三十年劳动界同盟罢工的件数达 32,参加人员达 3,517 人,明治三十一年件数 43,参加人数 6,293,但至四十二年,件数倒反减至 15 件,参加人数 4,284,三十三年又减至 11 件,2,316 人,其后更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参照赤松克磨所著《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

上述情势,日本的一般论者概将其原因,归结于明治三十三年三月所颁布的“治安警察法”以及其它警察犯处罚令、行政执行令等等恶法。治安警察法等法令固是压抑国民的行动自由的恶法,尤其是取缔无产者运动的最著名的恶法。所以对于无产者运动的衰落,这些恶劣法令的制定,固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从经济发展的方面,也未尝不可以找出另外的原因来。中日战争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初期的,且是激进的,所以对于劳工的容受量非常之大,劳动界不至发生失业的恐慌。乍由农村进城的工人,又比较能够安于低级的生活,对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尚不至发生不满。因此,本期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只是比例地增加,无产者运动只是比较地增进罢了。那时候的日本无产者,尚无阶级的觉醒,阶级意识的分量几等于零。

在上述情势之下，一般的无产阶级，即连“与资本阶级对立的阶级”(Class in itself)还够不上，至若“为着自己阶级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那更是谈不到的事。所以，“觉醒了无产阶级全体的利害关系，而长久继续地进行无产阶级整体的政治行动的组织”——即无产政党，不能够产生赫赫可观者，也是当然的道理。固然，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曾有“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出现<sup>②</sup>，明治三十九年也有“日本平民党”和“日本社会党”的出现<sup>③</sup>，但都不几何时即归于消灭。

然而，日本产业革命开始于中日战后，再经过日俄战争(明治三十七年，公历1904年)，迨至欧战(1914年)，已经约略完成，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达达到相当的程度。再因欧战中欧美各国忙于战争，无暇兼顾东方贸易的经营，而日本独占东方的市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乃达到最高峰。日本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结果，当然同时也激增日本的无产群众，而孕育激烈的普遍的无产者运动。

此外，尚有一种社会的原因，足以促进日本无产群众的运动激烈化、普遍化。日本的工资固然也随商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增加，尤其在欧战中因为巨大数量的劳工的需要，而一般的工资增高了许多。但是，一般物价的暴涨，房租、公税等等负担的增大，在比例上实是数倍于工资的增额。工人的私人财政之“入不敷出”，降低他们的生活程度，至于水平线以下。工人这种穷苦，自然促使他们极力反抗

资本家,增加劳资争议的件数,普及无产群众的阶级意识。且就无产劳工反抗运动之表现为同盟罢工者的件数列如下表:

年次	件数	参加人员
明治三七年	6	879
明治三八年	19	5,013
明治三九年	13	2,037
明治四十年	57	9,855

(注)本表数字,根据上引赤松氏同书。

这种同盟罢工的趋势,虽自明治四十一年后,略见下降,其停滞的状态继续到欧洲大战前的大正四年,但自大正四年后,无论欧洲大战的好况尚足调剂,它的激烈的增进,更非过去任何时期所可与比。且将欧战中五年间的日本同盟罢工的件数,列表于下(根据赤松氏同书):

年次	件数	参加人员
大正四年	64	7,852
大正五年	108	8,413
大正六年	398	57,309
大正七年	414	66,457
大正八年	497	63,137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大正时代的日本的劳动运动,已经达到普遍化、尖锐化的境地。尤其因为产业的发达的停

顿或衰落(例如明治末年和欧战后)影响多数劳工失业时,一般的无产而又无业者,更能渗透于阶级的意识,觉醒自己阶级的利害关系。

这种无产群众之阶级的觉醒,还可以由日本农村方面,找出另一事例来。日本农村,一则因为日本商工业发达而受到农业凋弊的恶影响。再则因为近年日本商工业的不振,而农村发生人口过剩的恐慌。于是,日本农村的农业劳工、佃农以及农民,普遍地发生生活不安的恐慌。这种恐慌同样促使他们渗透于阶级的意识,觉醒于自己阶级的利害关系。(这里,作者为避本文之过于冗长起见,关于日本农村的衰落的过程及日本农民运动的进展,一概从略。欲知其详者,请参照高桥氏之《明治大正农村的变迁》,杉山氏之《日本农民运动的现势》及庄原达之《农民与政治运动》!并望参照本刊本期所载《日本农民问题概观》下篇之(七)日本农民斗争的趋势!)

上述日本的劳工和农民普遍的觉醒,造成两方面从阶级全体的立场,开始提携,而无产群众之负起历史的使命进行阶级的斗争,就要从此开展。代表阶级全体的政治组织的无产政党,就要在这个阶段产生出来。完全意义的日本无产政党之所以产生于大正末年,且于其后继续健全的发育,原因完全在这里。

促使日本无产政党产生的因素,既然充分成熟,那末,如得相当得机会,它立即诞生,是理论上应有的事实。所以,大正十四年三月,普通选举案一旦通过国会,完备的日

本无产政党立即呱呱落地,并且蓬生不已。日本第一个全国的无产政党——即农民劳动党,就是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5时,成立于东京神田青年会馆的<sup>④</sup>。它的生命虽然很短,只继续二三小时之久,即被日本政府所解散,但是此时已非明治时代的情势所可与比。阶级意识既然渗透于日本的全体无产者的社会层,全体阶级的政治行动,自必再接再厉,时势所趋当然不是人力所可阻抑的。

因此,继上述农民劳动党之后,而第二个全国的无产政党的“劳动农民党”,又于十五年三月五日下午1时,在大阪市土佐掘青年会馆,举行结党式<sup>⑤</sup>此外,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无产大众党、以及由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无产大众党及四个地方无产政党结合构成的日本大众党,也都前后继续成立。我们于此已可以明了:日本全体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已经达到灿烂开花的时期了!关于日本无产政党的成立过程及其演变,想在本论文详加叙述。

## 六、日本政治与日本无产政党

无产政党的产生和发育,固然有待于经济关系的转变。换句话说,无产群众(包括劳工与农民)的解放运动,要由经济的行动转入政治的行动,固然必在资本主义经济完成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有些地方因为其它的原因和刺激而经济界陷于穷途)之后。但是事实上,无产群众要以完备



的、长久的政党组织在政治舞台上活动，政治制度的转变也是一个主要的动机。至少，也可以说是媒介的原因。这个道理，只看普通的政党都在“国法许可的范围内始得产生”，或看“无产政党的存续专以合法的活动为依据”，即可知其一斑。固然无产群众的进行政治行动，不一定要依据政党的组织，或者不一定要在“合法的”范围内。例如法国工团主义者及美国世界工人会所主张的依据同盟罢工的形式，或否认议会政治的直接行动，或如苏俄之以暴力夺取支配阶级的政权，就是实例，但是，前者仍宥于一时的行动，而后者在普通的场合是不可行的。所以，无产群众要以和平的手段，适用政党组织以攫取政权，政治制度的转变，就成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以自然的情势发达起来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列强，既是如此，在以人为的保育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者，更应是如此。这里，只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政治关系及政治制度的转变的基础，依然在于经济关系的转变”。

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末期，因为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及受到欧美各国情势的击动，社会大转变的酝酿，即已成熟，明治维新的改革，只是这个社会转变的酝酿成熟的政治表现罢了。

其时，实际从事于改革运动的人们，一方面提倡“复古”，他方面又倡导“维新”。“复古”与“维新”，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主张，但是事实上二者都是时势的反照，可以并行不悖。盖因不提倡“复古”不足以造出“倒

幕”的根据，不倡导“维新”，不足以步欧美列强之后尘，实行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中日、日俄两战后，更加进步而成军国主义）。这两点，就是当时日本，政治改革的二大目标。

然而，要“维新”，必先“倒幕”，废除封建制度。所以，第一步抬出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以便努力于推翻德川幕府。幕府既倒，政治大权名义上也已收回天皇手里，第二步就是“维新”的进行了。

所谓“维新”，只是“欧风”的模仿罢了。那时候，欧风崇拜的思想，支配了日本的全体社会。上自政治改革，下至思想界，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在取法于欧美。这种模仿西欧的风尚之极浓厚表现于日本政治制度者，参照著名的《五条誓文》，及引用福泽谕吉氏所著的《西洋事情》为改革官制参考书之一，即可知其一斑。更如“政体书”的官制之效仿北美，以三权分立为根底，实是这种事实的具体证明。

然而政治上的“欧风”，也有种种不同的体制。至少，也有英法的自由民权派，与普鲁士的偏重国权者之差别，日本之改革政治制度，究竟效法于那一种？

明治初年，日本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表面上好似自由民权说占优势，国家基本法律的宪法，很有采用法英制度的倾向。且有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及沼间守一等人，极力唱导自由民权论。甚至有西园寺公望者充任社长，而松田正久担任记者的职务，发行《东洋自由新闻》。而板垣退助氏终于明治七年一月，提出“设立民选议会的建白书”。

那时候的民权论者，只是依据卢骚的《民约论》

(Rhussau, Contras Social), 唱导民权的崇高, 歌颂法国革命的光荣合理。他们的根本论据在于“社会是由民众缔约结合的, 故主权在民, 法律应以人民的意向为依据。这种思想, 若自现在看来, 固然极其单纯, 但在当时算是进步的思想。日本当时如果采用这种思想于政治制度的改革上, 日本政治关系的进步, 或许更为急速。

然而, 被派赴欧洲研究宪法以为日本立宪准备的伊藤博文氏, 偏偏眼看当时普鲁士隆兴的趋势和俾斯麦“Bismark”的运用灵敏, 觉得眼热, 马上回国进行立宪事宜。讨论研究的结果, 日本宪法草案所取法者, 已不是法国式的宪法, 也不是英国式的宪法。它却千真万确地, 是偏重于国权的当时普鲁士式的宪法。于是, 初期自由民权运动, 遗留给后继的有志者, 充当继续努力的目标。

我们就明治年间日本政界的实况加以考察。

日本自从德川幕府末年, 财力即已登上政台, 倒幕诸役得力于三井家的援助非常之大。庆应三年(1867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三井家的主人三井高福氏即被召于京都御所的“全谷出纳所”, 以掌朝廷的财务其它如三菱系的财主, 地方的富农豪绅的势力, 也莫不尽与其时的政治结成关系, 而政界各派也与这些财主富豪, 各别互相勾结。萨长藩阀, 是以三井的金权为背景, 大隈派则以三菱系为背景, 板垣派则以地方的富农豪绅为后盾。这三派在明治初年各依自己的利害明争暗斗, 形成三角关系的政争。

根据上述日本明治政府之倚靠财阀, 自理论推说, 日

本布尔乔亚汜早应操纵政权了,然而事实并不然,政权仍握于官僚手里,那些财阀只为他们所利用。即使官僚之利用财阀,仍须顾全财阀的利益,但是财阀并未取得多大的实权。这有两种原因:其一,布尔乔亚汜的内部不一致,例如三井系与三菱系之争,地方布尔乔亚汜与中央布尔乔亚汜之争;其二,官僚的残势尚属雄厚。所以在明治二十年以前的长期间,日本财阀仅供官僚的利用。即在三井系与三菱系媾和后之20年前后官僚仍以双手两缆的手段利用他们。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由民权之不能发达,自是当然之理,无产群众要参与政权更是无望的。

迨至明治二十三年一般民众所企望的日本国会,好容易成立了。但是议员选举的结果如何?清一色的布尔乔亚汜的议员!所差者地方布尔乔亚汜增大一点势力罢了。正如《国民之友》所言:“日本政权分配于四五十万的地主之间”(载于明治二十二年3月号,转录木村毅所著《日本社会主义史》再经中日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达,和日俄战后它的增进,而日本官僚的势力日渐消退,日本布尔乔亚汜的全阶级的势力,适成反比例日益扩大。自明治二十三年以至大正的初年,日本政界几乎尽为布尔乔亚汜占个全盘,政权操纵于财权。正如尾崎行雄所说:“如果日本实行共和政体,大总统自然不是三井就是三菱”(见白柳秀湖所著《日本民权发达史》124页)。这是日俄战后的事实。所以日本史家均称此期为财阀时期。

在这时期,无产群众要插足于政界,也是无望的。一切

的法令，尤其是取缔压迫无产群众如治安警察法，警察犯处罚令，及行政执行令等等，概由布尔乔亚汩任意规定创制；所有的选举权，尽因财产上的限制而分配于有产者；无产政党的成立须得他们所豢养的政府许可，政府尚且可以任意解散。这样，日本无产群众从何以进行政治行动呢？不消说，这期间的无产运动，只能在建造基础之上着手！就是从事于训练无产群众。这层想在下节“社会思想的进步”，再加详细的叙述。

然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在日俄战后即已逐渐踏上早衰的途程，再经欧洲大战至大正末年而达到穷途。在这种经济情势之下孕育、酝酿多年的日本无产群众的运动，就臻于普及化、尖锐化。这种情势，就是执掌大权的布尔乔亚泛汩的政府，也未敢太加轻视。所以明治四十三年之所谓“赤旗事件”、“大逆事件”发生时，对于幸德秋水等人的秘密裁判（这次的裁判欧洲报纸多加攻击，称为野蛮的侮视人权的裁判），不至再有第二次的产生。他们终于大正十四年三月，心虽不愿但迫于事势不得不把“普通选举案”，通过于国会。这层就是大正年间日本政治制度改革之最大者。

日本普通选举法施行后，日本所有 25 岁以上的男子，不受财产的限制，都有选举权。选民的数目立由 3,000,000，增至 13,000,000。而在这 13,000,000 选民之中，当然是由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占大多数。于是，从这次的改革，我们可以发见下列两种的意义：

(1)日本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成立宪民主主义的勃兴;

(2)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抬头。

这两种意义,都于无产群众的政治运动的进行有利。无产群众的政治运动,要有充分的进步,普通有待于立宪民主主义的充分发达。因为立宪民主主义,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害关系,以与大资本家、大地主及官僚对立。在这个阶段,无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是可以合作的(不过,无产群众自己的阵营坚固,精神上不为小资产阶级所吞并,是个必须的条件。)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将必对于日本无产政党的健全发育,大有帮助。

不但理论如此,事实也是在如此证明。大正十四年以后,成立的日本无产政党,不至如明治中年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那样,容易被政府一压绝命,就是由于这次的政治改革。又如大正十四年成立的社会民众党与明治中年的社会民主党,宗旨相同,目的也相同,而前者可以健全地存在,后者却立被解散,原因也即在于这次的政治改革。现在的日本无产政党,已有相当的战斗力的。且有许多的无产政党并存。只要它们不是伪无产政党,这种现象就未始不是无产群众政治运动进步的表现。

## 七、日本社会思想的进步与日本无产政党

无产群众的政治行动,须以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达为

基本的条件,且须适宜的政治制度的培育而日本无产政党的发育正是一例,这都是以上二节所述过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忽略无产群众的运动,要进到这个阶级,阶级意识的普及,也是一个要件。我们在前头数节述过,无产群众的运动,要由暂时的、地方的范围,进到永久的、阶级的程度,必须阶级意识普遍化、尖锐化,意思就在这里。不过,这个意识的深浅广狭,就是社会思想的问题。

社会思想的进步云者,作者认其有两种含义:其一,社会思想的量增大;其二,社会思想的质的改进。社会思想的量的增大,也可以说是意识的普遍化;社会思想的质的改进,也可以说是意识的尖锐化。据此,无产群众的运动,要进至实行政治行动,就有待于社会思想的量质两方面的进步,自可不加以详细的解释,也得明了。我们且就日本的情况,加以考察一下。

日本自从嘉永六年七月,锁闭数百年的关门,被美国的水师提督,伯里氏(Perry)冲开以来,即与欧美各国开始交往,而日渐熏染于欧美的文明。尤其自明治维新后,更进而在各方面加工模仿欧美。明治十九年(据《日本社会主义史》,但是《日本文化之史的研究》却载为二十年)鹿鸣馆的舞蹈会,就是这种欧风模仿的最著名,而又最皮相的有趣插话。<sup>⑥</sup>然而,欧美各种的社会思想,也就是在这时候流入日本海,浸润了日本一般人士的精神。

明治初年流入日本社会的欧洲思想,约有四派。一为法国派的自由民权思想,二为英国派的功利思想,三为德

国派的国权思想，四为基督教的思想。在这四派之中，对于后来的社会运动，或无产者运动最有关系的，就是法国派的自由民权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倡于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等人，尤以中江氏为代表。他对于后来指导社会运动的思想，即社会主义，留下二种的贡献：其一，从它门下出了幸德秋水、酒井雄三郎等有力的社会运动家；其二，他极端主张无神论，在日本思想史上树立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更如自由党的左派分子，后来也都加入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至若基督教本即标榜平等博爱，主旨和社会主义思想接近，初期的社会运动家，大多首先浸润于这种思想。例如安部矶雄、村井知至、岸本能武太等初期社会主义研究者皆是。即如中期的建设者，如山川均、高巢素之等人，也都肄业于上述基督教思想的摇篮的同志社。更如大杉荣、山口孤剑、石川三四郎、木下尚江、片山潜等人，也都受过洗礼。关于此项再引大杉荣的一段说话，更得明了：

“平民社<sup>⑦</sup>……但是援助该社得安部矶雄，木下尚江及石川三四郎，都是热心的基督教徒。聚集于此的青年大半也都是基督教徒。在当时的思想界，基督教是最进步的思想……”（大杉荣氏《自叙传》212～213页）。

明治初年的日本社会思想，既如上述那样浅薄幼稚，



不能产生或组成伟大的社会运动团体，自是当然的道理。例如明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的东洋社会党，规定如下的纲领：

第一条 我党以道德为言行的规准；

第二条 我党以平等为主义；

第三条 我党以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

明治二十三年以前，有一部分志士克尽莫大的牺牲以与官僚战，不分昼夜极力从事于自由民权运动，意在民选议会成立时，能由平民多占几席议员的交椅，以增进平民的福利。二十三年十二月，第一回帝国议会果然开幕了。然而，结果如何？堺利彦氏说得非常痛快淋漓：

“自由民权运动志士的梦醒矣。已经明白：自由党及改进党，实都只是地主党、资本家党而已。指导自由民权运动的士族等，实只尽了新兴财力阶级的先驱的任务；一般的下层阶级只被利用于资助财力阶级的崛起：这种事情，也为识者所看破了”（原载《社会主义小史》，转录《日本社会主义史》36页）。

其后，从事于政治运动者，放弃本来的步骤而转向社会思想的研究或传播；未及从事于政治运动者，也裹足不前，不约而同趋于同样方向。从此直至日俄战争截止，是为社会思想成长的时期。

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即有“社会主义研究会”产生，发起人初系一神教的信徒(Unitarian)，其目的在于“考究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应用于日本的可否”。

社会主义研究会实是后来社会运动思想的摇篮，大多数的日本社会运动家，都与该会有多少的关系。即如明揭无产阶级解放的旗帜的日本第一个无产政党，社会民主党<sup>④</sup>，也是由该会转变来的。社会民主党虽然立被解散，但是不久又重以社会主义协会成立为一个名义上的学术研究团体。这次的会员已与社会主义研究会时的会员之为一神教徒者不同，都是劳动运动家和新闻杂志的记者。于此，可知社会思想的进步与社会运动及无产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

然而社会思想须有分化，始有进步。源出于社会主义研究会的诸位日本社会思想家，再经平民社的组织和《平民新闻》的刊行之后，分裂为基督教派(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与唯物主义者(堺利彦等人)。其后，乃有《直言》周刊、《光》半月刊、《新纪元》月刊及《社会主义研究》、《火鞭》等杂志，各以雄硬的笔才吐露宣传各种的社会思想。其中，尤以《光》为急进，是为幸德氏由美回日后创刊的。其时幸德氏的思想上已有巨大的变化。他在《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的演说辞里，表露否认议会政策的意向，是为后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分裂为议会政策派与直接行动派的预兆。同时堺利彦也于《光》上登载《关于阶级斗争论》的评论，批评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熟到分化的起点。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思想,虽自明治三十八九年顷分裂为两派,但是各派却各振刷他们的精神,极力从事于思想的宣传,并且参加实际的无产运动。例如西川光二郎等人之组织日本平民党,堺氏等人之组织日本社会党,及各派合刊之《平民新闻》日刊等等。尤其是日本社会党,宗旨虽限于“国法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却与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之只有纲领政策而无实际行动者不同。它实实在在进行工作或领导无产群众的运动。党员虽未及二百名,而演说、讲演,地方游说的进行,以及研究会、谈话会的举办皆极力推行。日本社会党最初领导的实际运动,就是东京电车费增加的反对,共开市民大会三次(一次被禁于事前未及开成),集会者每在 1,500 名以上。结果虽因群众有毁建筑物之玻璃者而被起诉为凶徒啸集罪,被检举者有大杉等十名;但其激动日本社会非常之大,影响后来的社会运动的尖锐化一定不小。

上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分裂,至日本社会党成立一周年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更加表现得分明。结果却归后者占得胜利。把最初结党时的党则第一条,削去“国法范围内”,只留“本党主张社会主义”。然而他们两派因为思想的尖锐化终于不能不分离。自从平民新闻停刊后,即各分途:议会政策派独自创办《社会新闻》周刊及《东京社会新闻》;直接行动派则各分头到各地方活动,如《大阪平民新闻》半月刊、《日本平民新闻》的刊行。

后来,直接行动派因为明治四十一年赤旗事件及大逆

事件,被处死刑者十二名,无期徒刑者十二名,十年徒刑者一名,八年徒刑者一名,而此派的势力大挫。但是他方面,日本社会思想的前进却不因为政治的限制而止步。近年来经济恐慌更为助长它的猛进。并且在它猛进的过程中,处处都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发生密切的关系。这层不是这里所能尽述,我们只得作个结束。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思想的进步及其传播,唤醒了日本的农工群众;而农工群众实行解放的运动。以后的农民组合、劳动组合等等无产运动团体,大多是依照上述的过程成立的。其中的指导者和领导者,都是那一派先觉者。即如现在或停止或尚存在的日本无产政党,事实上也都由那一派最前进的先觉者组织而成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农民劳动党、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等等固是如此,日本大众党、社会民众党、劳农党、全国民众党等等也莫不如此。而且,近年来日本的社会思想家,渐有组织政党,欲藉此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的倾向。这或许正如赤松氏所言,是“日本社会运动的转换”(“转换期的日本劳动运动(?)”),也是日本选举权普遍化使然的。然而,惟其如此,更可知道日本无产政党正方兴未艾也。其勃兴,成立的过程及其现势,再加详细的讨论。

不过,我们于此明白:日本无产群众的解放运动,已由经济的行动进入政治的行动。并且,政治行动也在日益紧张,其情势似乎已非日本现在的经济制度所得抑制,也非“大陆侵略”及“南洋发展”等手段所得缓和得了。日本无产

政党将必于不远的未来,对于日本的无产群众,由训练而组织,由组织而造成良美的政治效果吧?!

## 八、日本无产政党之史的考察

我人欲检讨日本无产政党的本身问题,且先自其发展开始。日本无产政党发达时期的区分法,因人而异,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区分法。但据我人的主见,则以下列三期的分法,最为合宜:

(一)先驱时期;

(二)成熟时期;

(三)发展时期。

### (一)先驱时期

**借金党 佃农党 贫民党** 日本早在明治十年(1877年)顷,即受民权运动澎湃的影响,而参混于当时的政党,尤其是自由党之中的急进分子,乃从无产群众的立场,进行下层社会的运动。他们眼看贫富悬隔的事实,地主与佃农对立的事实等等,乃自实际方面进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运动,自是自然的形势。同时,他们又由风传,学得欧洲社会党的名目及其活动,他们自然出于模仿。于是,借金党、佃农党、贫民党、社会党等等名称,出现于当时的日本社会。

**东洋社会党** 在上述酝酿之中,具体出现的,是“东洋

社会党”。明治十五年五月，由樽井藤吉、赤松泰助等人发起，成立于肥前岛原的江东寺。参加者有数百人之众。该党的纲领有下列三条：

- (1)我党以道德为言行的规准；
- (2)我党以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
- (3)我党以平等为主义。

他们且在其立案请愿书中说：“太政官的告谕文中，亦曾有“平均上下，齐一人权”等语，其根据通义，即社会主义也。”

在日本政党中使用社会主义为主义者，或许以此为始。但其所谓社会主义的内容，则与现代的社会主义，意义各异。此点只据其纲领所列：“以道德为言行的规准”，“以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及“以平等为主义”，而关于社会的经济组织，一言未及，则可充分明了。尤其是他们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只限于“文书及游说的宣传”。因此，“东洋社会党”的思想，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思想，无如说是“东洋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较合实际。该党在未有若何完就以前，于成立后仅过二月，即被政府解散。

**车界党** 继东洋社会党发现的，是明治十六年成立的“车界党”（或称车会党）。该党成于反抗东京市马车铁道会社的运动，先集市内的车夫，结合而称为“马车铁道反对同盟会”。在该党活动的中心人物，有自由党的少年，奥宫健之氏，及原为根津花柳巷的车夫，后为自由党的名士，三浦龟吉氏等人。

车界党先在神田明神，开过车夫大恳亲会，次于两国的井生村楼，开过车夫演说会：是为该党在当时所得进行的工作。但因车夫演说会上，会众用烟盆飞打干涉压迫开会的警察，车界党遂为日本政府所禁止，并加严重取缔于车夫组合。不久，奥宫氏又因名古屋事件入狱，这个运动乃归于自然消灭。

惟是，这次废止马车铁路的运动，正与产业革命初期，英国旧式织工之破坏新式纺织机器，约略相似。它虽属初期的幼稚运动，但其以劳工的团结反对资本势力的压迫，却较比上述东洋社会党，带有更为浓厚的社会党的意义和实质。其名称车界党(Shakiato)之寓社会党(Shakiato)的意思，实非无因。

**东洋自由党** 正如我人在本论文前面已述过，日本明治初年自由民权运动盛极一时，其时有志之士概皆奔波于这种运动。但至明治二十三年日本国会开设后，一般奔走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志士，目击自由党及改进党之实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御用党，遂觉醒于自由民权运动的痴梦。他们自从发觉上述情形以后，即改途他向。例如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学者，且以清廉奇侠之士闻名的中山兆民，因愤于议会的情势，决意辞去议员之职。东洋自由党就是这种情势所产生的。

自从国会开设后，本是比较革命的自由党，渐渐保守化，专为地主及资本家而存在。同时，该党左派如大井宪太郎等人，大抱不满，遂于明治二十五年八月，成立了东洋自

由党。该党的政纲，标榜“保护贫民劳动者”。党内分设“大日本劳动协会”、“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及“小作条例调查会”，以从事于实际的活动。由“小作条例调查会”着手于农村间；由“大日本劳动协会”组织“车夫组合”、“木匠组合”，启日本劳动运动之始。该党且创办机关报《新东洋》及《吾妻新闻》，常载社会主义的作品。于此，可见“东洋自由党”，名虽为自由党，而其实质则带有社会党的色彩。可惜其时因为日本资本主义未大成熟，社会主义的运动未有充分发展的地盘，而东洋自由党也终消灭于无声无臭。

**日本社会民主党** 以上所述自由党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实是日本无产政党先驱的先驱而已。严格地说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实始于中日战争以后。盖因中日战争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始有急速的发达。而劳动运动也随之而扩大，再经明治三十四年的全国金融恐慌的压迫，经济界陷于极端的恶况，劳动运动更以河决之势澎湃起来。但是他方面，日本政府却以苛刻的压迫政策（如明治三十三年三月的治安警察法的制定等）酬应劳动运动，欲使其消灭净尽。然其结果，运动的中心却由劳动运动转向社会主义运动，终于激成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政党运动。社会民主党则在此种机运之下，由片山潜、幸德秋水、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四郎及安部矶雄等人发起，成立于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以前的日本无产政党，大都没有具体的纲领和政策，有之也多于社会主义的宗旨零碎不全。至社会民主党，始有长文详尽的《宣言》、具体的纲领及政策。该党的《宣言



书》发表于其机关杂志《劳动世界》的临时号,其中论列《理想》八条,《实际运动的纲领》二十八条。可惜乍成立后即被命令解散,揭载该党宣言的各报,如《每日新闻》《报知新闻》《万朝报》《新总房》(千叶)及《东海新闻》(千叶)五家,均被禁止发卖,罚金二十元。

社会民主党的宣言,日本政府虽然禁止揭载,但据其判决文尚可窥见梗概:

“……是否应该打破贫富的悬隔,实是二十世纪的大问题……本邦今日的政治机关,全为富者,即贵族、富豪或地主、资本家所独占;占国民多数的无学无识的劳工及佃农,使役于富者,几不值得富者之一顾。但使他们获得应得的地位,实为增进社会全体福利的所在。所以我党负多数人民的休戚而产生。我党欲藉纯然的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以打破贫富的悬隔,使全世界得到和平主义的胜利,并期向左揭理想着着前进……”

且将其理想节述如下:(一)撤废人种差别;(二)全废军备;(三)全废阶级制度;(四)生产机关如土地及资本悉归公有;(五)交通机关公有;(六)财富的分配公平;(七)人民的政权平等;(八)人民的教育平等,国家负担全部教育费。

此外,尚有政策二十八条,因其过于冗长,所以此处从略。惟是,社会民主党虽有完备的纲领和政略,但却没有无

产群众的支持,在实际运动也未留下若何的功绩。

**国家社会党** 明治中年日本出现一个标榜怪论的无产政党,该党为山路爱山、中村太八郎、山根吾一及斯波贞吉等人所组织,成立于明治三十八年八月。该党标榜“压抑富豪的专横”为主义,至其理由则曰:“古代日本皇室是某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实行者,所以,我国国民宜藉皇室之力,以抑止富豪的专横”,据此或知该党所信奉主义,也与国家社会主义异其旨趣,实为他们独创的理论。但它也有其所以产生的背景。盖因明治三十八年八月,适值日俄媾和的结果,日本举国皆愤慨于当时所缔结的所谓“屈辱条约”。是以带着国家主义气质如该党之产生,实非无因。

国家社会党的宗旨,虽然“非猫非虎”,但在实际运动方面,却曾与下述日本社会党合作。而召集过市民大会,帮助无产者反对东京市电车费的增高,开日本无产政党从事于实际活动的先例。惟是,该党自从明治四十三年所谓大逆事件发生后,即受政府的压迫而无形消灭。

**日本社会党** 日本资本主义虽自中日战争以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即有急速的进展,劳动运动也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他方面政府的压迫却反增大。一般的无产政党的成立,政府概加禁止,或立刻解散。例如社会民主党创设者提出“日本平民党”的结社稟,也未达到结党的目的。至明治三十九年一月,西园寺内阁成立时,如稍反于前内阁(桂氏内阁)的言论压迫,采取稍为宽容的政策。于是西川光二郎及樋口传二人,乃试为提出“日本平民党”的结党

禀,纲领只在“普通选举的期成”。同时,堺利彦及深尾韶,也以“实行社会主义”为纲领,提禀“日本社会党”的结党。政府皆不加压迫。不久,此二党复又合并而成别个“日本社会党”。该党成立于明治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同月二十七日在其事务所开评议员会,共订九条党则,第一条规定“本党在国法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

以前的日本无产政党,具备完全的组织,且会参加实际活动者,除上述国家社会党应日本社会党之提议参加市民大会者外,尚无前例。所以,真正而积极从事于实际活动的日本无产政党,谓以日本社会党为始,也无不可。日本社会党的党员,数目虽然不满二百,而其实际的活动却极活泼:演说、讲演、地方游说、主办研究会、谈话会等等,均有极大的成绩。其中,该党所召集举行的反对东京市电车费增高的市民大会(前后共集三次,开成二次,一次被阻),尤为日本社会运动空前的壮举。但其结果,西川、樋口、山口、大杉等共十名被起诉为“凶徒啸集罪”。

日本社会党至次年(明治四十年)二月十七日开第二次大会时,党的内部乃起左右翼之争。问题在于“议会政策论”与“直接行动论”的冲突。在此次大会中,党纲的提案有三:其一为评议员会的原案,规定普通选举运动为党员的随意运动;其二为田添氏所提修正案,主张普选运动为有力的运动方法;其三为新由美国归来而思想上大有变化的幸德秋水的修正案,主张议会政策为无能为。第二修正案,即所谓议会政策论,第三修正案,就是直接行动论。当日,

此二种主张的提议者，曾经非常激烈的辩论，尖锋相对，实放日本社会运动界前此未有的光彩。表决的结果虽以二十二票与二十八票之差，维持原案；但是议会政策论二票与直接行动论之二十二票之差，实在指示前者之惨败而后者之大胜。会议记录在其机关报，《日刊平民新闻》上登载过。其结果，政府遂以幸德氏的演说及大会议决案为紊乱朝宪，禁止平民新闻的发卖，编辑发行人被起诉，二十二日日日本社会党，终被禁止结社。

其后，日本社会主义的运动，重由实际的活动，转向主义的宣传。但因日本政府严厉的压迫，而他们所用为中心的“平民新闻”，也终以四十年四月中旬悲壮的废刊辞为最后一期，被令解散。

再经明治四十三年夏轰动日本全国的所谓大逆事件发生而被难者有幸德氏等人（详见七、《日本社会思想的进步与日本无产政党》节内所述）以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及无产政党运动，皆显中止之状，直至大正七八年间因为欧战所造成的种种原因的刺激，始见复活的曙光。相距约十年间的时期，称为日本社会运动的“黑暗时代”。而日本无产政党运动的先驱时期，也就终止于此时。

总观以上所述，日本无产政党先驱时期的运动的特色，若自大体上说，可以归纳出下列三点：（一）因为资本主义的成熟不充分，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不普遍，致使各个无产政党，皆无无产者团体的支持；（二）各个无产党皆由于社会思想的进步份子发起组成者；（三）因为民主制度实质

上尚未充分发达的结果,政府的压迫厉害,致使各无产政党的寿命,皆极短促。

## (二)成熟时期

日本各种工商业,自经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之后,即已有充分的发达:再经欧洲大战中的“趁火打劫”,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登峰造极。而日本的劳动问题,乃成日本全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在大正七八年顷,一方面日本劳动组合的运动异常勃兴;他方面无产群众也渐觉醒于自己的地位及利害关系,其阶级意识也渐普遍化、尖锐化。于是,他们的斗争就渐由经济的,转向政治的了。在这时期,日本无产群众的政治运动,先由组合劳动者与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提携,以民主政治为基调期望普选的实施,继而有社会主义同盟及政治研究会等组织,更进而结成农民劳动党、劳动农民党,建下日本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基础。略述于下:

**社会主义同盟会** 日本自从大正七八年顷以降,因受欧战后经济界的影响,遂于以前的意识社会主义者之外,产生了实质的社会主义者。更因受苏俄革命的刺激,而政治运动的气势愈益加强。因要实行政治的运动,故觉有将各种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如种种劳动团体、学生团体、思想团体等等,团结在一起的必要。因此,大正九年十二月九、十两日,社会主义同盟就在东京神田青年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入会者达 3,000 多名。且在政府重压之下,继续了活泼

的活动。不幸终因内部思想的对立炽烈——大体上是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而十年夏乃与其内讧同时遭受政府的解散命令。社会主义同盟的寿命，虽只不过半载，但其为新兴无产群众的实质的第一个政治团体，是值得注意的。

**政治研究会** 大正十一年八月，山川均氏在《前卫》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无产阶级的方向转换》，主张政治运动的必要，提倡由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由少数运动变为群众的运动。其后，日本无产群众的政治运动，乃渐具体化，而无产政党的树立问题，乃成当前急要的问题。同时，又有山本内阁施行普选的宣传，直接刺激各种无产团体，群趋于政党的组织。遂于大正十二年十二月，由于高桥龟吉、铃木茂三郎、青野季吉及岛中雄三的介绍，而劳动总同盟、关东机械工组合、农民组合、社会思想社等团体的代表共二十七名，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其后，更继续进行六次会议，遂以组织全国无产政党筹备会的目的，在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举行政治研究会的创立大会。

政治研究会的目的，只在“依据无产阶级的立场，调查研究政治、外交、财政、经济、产业、劳动、社会的各种问题，以确定对策，促进群众的政治组织，藉以期成日本社会的合理改造”所以它并不是政党的组织，而只是促现政党的准备团体罢了，其活动的范围也都限于群众的政治教育运动。政治研究会虽因当时有组织劳工的畏缩，致使它的运动不能注入于劳动组合与农民组合，而只以组合外的无产

群众为对象,但也颇有可观的成绩,大正十四年是其全盛时期,全国的支部总数达五十三,会员六千余。

但至大正十四年六月,日本农民组合突然而出而单独提倡无产政党组织准备会,因此政治研究会的发议权遂为所夺。更因劳动总同盟的分裂,影响政治研究会内部的对立愈益尖锐化。在第二三两次大会上,左右派因以无产政党的纲领及组织问题为中心,引起很大的争论,终于酿成右派干部的退出,而左派干部独揽该会的情势。其后该会完全变成最左倾劳动组合的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的别动队。至劳动农民党成立后,内部之解散非解散之议起,而左派分子于大正十五年五月召集支部代表,提议“大众教育同盟”的组织,该案可决后,政治研究会始归于消灭。

**农民劳动党** 上述政治研究会的政党组织准备运动,势力虽未侵入有组织的劳动团体如劳动组合及农民组合之中,但是这些有组织的劳动团体,并未忽略政党组织问题,大正十三年所开组合大会,尤以该问题为重要的议题。就中农民组合尤其重视政党问题,对于地方的选举,早即着手参加斗争。因此,拥有劳动组合指导势力的劳动总同盟,早即计划组织以自己组合为中心的政党,且以包括劳动者,农民及一切反资产阶级的份子而组织政党为其目标。日本农民组合终因农民群众的要求——进出于政治运动——所督促,而于六月二十一日,对于组合员在千名以上的全国劳动团体,提倡无产政党组织准备机关的设置。

根据上述提议,组织了无产政党准备委员会,设立纲

领及规约的起草委员会。设委员会前后共开四次，评议会、政治研究会与总同盟等组合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议，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最后纲领委员会上，由于政治研究会及无产青年同盟的可否加入政党的问题，而总同盟脱离准备会。于是，政党组织的运动一时陷于极大的危境。但终因评议会的自动的退出，及解散政治研究会的承诺，这种纠纷乃得告结束。十二月一日，“农民劳动党”的结党式，乃得举行于东京神田基督教青年会馆。不幸，经历万重难关而始成立的“农民劳动党”，成立后仅三十分钟，即被日本政府命令解散！

**劳动农民党** 农民劳动党虽在结党后即被解散，但是此时日本无产政党的组织运动，已与先驱时期不同，是由无产团体自身长大的，所以只要无产团体存在，它永久是不会消灭的。因此，农民劳动党被解散后，日本农民组合马上表示再起的意向，就商于官业劳动总同盟，提议无产政党组织准备谈话会的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开于东京玉姬俱乐部，议决新党组织方针六项，是为有名的“玉姬俱乐部的声明”。其第一次声明：“新政党完全排除共产系，而以现实的政党组织前进；导无产政党的创立入于难境的组合，积极地加以拒绝，消极地请其谦退。”于是在农民劳动党的组织中脱离关系的劳动总同盟，又再加入新准备委员会。新准备委员会，且因鉴于农民劳动党之被禁止，修正以前的纲领，改“行动纲领”为“政策”。终于大正十五年三月五日，举行结党大会于大阪土佐掘青年会馆，定名为“劳动农民



党”。新纲领约有下列三条：

(1)我们希期依照我国的国情,实现无产阶级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

(2)我们希期采用合法的手段,改革关于不公正的土地、生产、分配的制度;

(3)我们希望打破专在代表特权阶级的利害的既成政党,以完成议会之彻底改造。

劳动农民党虽然免于政府的解散,外观虽似极其稳固,但是内部却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玉姬俱乐部声明所列第一项,可以分为二种解说:其一,只要共产系等团体谦退政党准备委员会;其二,即属于这些团体的个人,也无充当党员的资格。劳动总同盟的见解,属于后者,而日本农民组合即固执前说,因此,中央机关对于各地的支部的承认发生犹豫,总同盟更因感觉前途不安,踌躇于支部的组织。致使党本身陷于“半身不遂”的悲境,不能进行活动。

然而各地的支部大多主张开放门户,日本农民组合也于该党第四回中央委员会之前,先在扩大委员会议决开放门户。因此,十月二十四日劳动总同盟等团体,在党的第四回中央委员会声明脱离,安部、贺川、三轮等人也都连袂辞职。所残留者,仅日本农民组合及制陶劳动总同盟。分裂后的劳动农民党,以细迫兼光为书记长,更迎大山郁夫为党首,而阵容一新。且由评议会指令组合员,积极劝诱入党,

所以此时该党可谓为清一色的左派分子的党了。然而其后却能以左派政党而着着进行各种工作,不似前此之徒具形骸者大异其趣,也是研究日本无产政党者所不能忽略的。

总观以上所述,本期的特色如下:无产团体的各党各派,皆急于组织统一的无产政党,所以均能牺牲本团体的意见,甚至牺牲本团体的地位以完成政党之实现者也有之,例如评议会之自动退出无产政党准备委员会,及政治研究会之承诺解散,是其显例。即如最固执的劳动总同盟,大体上也算坚忍到劳动农民党第四回中央委员会。

### (三)发展时期

日本的各种无产团体,在其政治运动的初期,因急于促成政党的实现,所以在短期间尚能左右各派互相逊让容忍。但至政党实现后,进行实际活动时,或在其确定立场时,各派主张和立场的不同,忽又复活表现于党的争论之上。这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的趋势,是无可奈何的。盖因各个无产团体所代表的无产群众性质不同,利害也有多少的差异,无产团体自然各自采取不同的立场。并且无产群众的政治运动愈益发展,这种分化的情势必定愈益尖锐化。非到某种刺激或外界的压迫发生,这种情势必定不能转移。所以日本无产政党运动,自从劳动农民党固定之后,不久即起复杂的分裂,各派又据各自的主张和立场,组织各种无产政党,分立并存。这种现象既是无产政党运动发展到某阶段应有的现象,所以我人称此时期为“发展时期”。

**日本农民党** 前此，日本农民组合的右派分子，因不满意农民组合之政党组织方针的急进，终于大正十五年三月日本农民组合的第五次大会上，声明脱离日本农民组合，另合日本中部的大和农民组合及群馬，□木、茨城、埼玉、静岡等县的农民组合，成立了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日本农民组合即以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为支持团体，创立于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七日者。

该党的宣言中有曰：“日本农民党为着放射光彩于三千年日本历史上而产生出来！”它且于其纲领中载着，“振兴日本国本”。于此可知日本农民党，在日本无产政党中，是以“农民加入农民党”为标语的、极右派的政党。

**社会民众党** 当劳动农民党议决对共产系四团体——“评议会”、“政治研究会”、“无产青年同盟”及“水平社无产者同盟”——开放门户时，劳动总同盟、官业劳动总同盟、市电自治会、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及司厨同盟五团体的代表，即与安部矶雄、贺川丰彦等人，于十月二十四日第四回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同声明退出。嗣后，以劳动总同盟为基础，进行“现实主义的无产政党”，遂于十月四日发出树立新党的声明。结果，劳动总同盟和独立劳动协会——政治研究会右派所组织者——提携，在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组织了“社会民众党”。该党的特色有二：其一为明了采取右派的立场说：“排斥无视社会进化过程的急进主义的政党”；其二为不采用“无产阶级”的字眼，而以“勤劳阶级”代之，明示其包括劳工、农民及中下层阶级。

**日本劳农党** 虽如上述，劳动总同盟因不满于劳动农民党之向共产系四团体开放门户而退出该党；但在劳动总同盟内部，对于此举也有极端反对者。同时，日本农民组合内部，也发生左右派的分裂，右派终于退出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劳农党”即由此二派——劳动总同盟的左派，及日本农民组合的右派——结合组织而成者。它成立于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该党的纲领，约与劳动农民党的纲领略同。只其所声言的特色，在于“小儿病的左翼及以排斥左翼为名而日益增高反动化程度的右翼，一并排击，以树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

**无产大众党** 劳动农民党自从各右派因不满于其“开放门户”而相继退出以来，左倾分子愈益集中，而日益向左倾前进。此时之劳动农民党，正如大山氏所言：“立于纯粹无产阶级的立场，从其时高速度地继续展开果敢的斗争”。又如同氏所言：“党已不认议会为获得政权的手段……只认其为党的演坛——尤其是暴露政治的演坛”。

然其内部，也有因此而抱不满者，此派以大道宪二氏为首领，后因无产政党合同问题的争论，毅然退出。继之而发生日本共产党的大检举（昭和二年三月十五日），劳动农民党因受牵连被命解散。其后旧劳农党内部愈益分散，而大道宪二及黑田寿男等人，乃以杂志《劳农》为理论的工具，与旧劳农干部派对立。大道氏一派更与旧劳农党外的各种分子结合，而于昭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组织“无产大众党”。无产大众党虽非如旧劳农党的左倾，但也非右倾的

政党,它正处于二者之间,其特色在于:“主张代表同一社会层的所有全国的及地方的无产政党,依其合同而组织单一政党”。换言之,它是实现战线统一的过渡政党。

**新党组织准备会** 旧劳动农民党,如上所述,因受三一五共党大检举的牵连,而被政府命令解散。其后,干部派依据旧劳农的主义、主张及指导精神,以重继劳农党为目标,组织了新党组织准备会。其间,或者主张再组合法的政党,或者主张组织非合法的劳农协议会,虽然一时曾陷于飘摇不定的状态,但是结果应群众的要求,决定重组合法政党。于是新劳农党的成立大会,乃于昭和三年十二月,举行于东京本所公会堂。然而新劳农党依然难免于被解散的命运。同时,新党组织准备会也被命令解散。

经过此次的压迫后,准备会的指导者,决心放弃组织合法政党的意向,而于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另外组织非合法的斗争实体,“政治自由获得劳农同盟全国准备会”(简称为“政获劳农同盟”)。然而不赞成非合法的活动的分子,相继脱离“政获劳农同盟”,分散各地另组地方的无产政党。其重要者有劳农大众党、中国无产党、大和无产统一党、岩手无产党。

**日本大众党** 日本大众党是由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无产大众党及四个地方无产政党合并而成者。

自从劳动农民党的内部分裂后,日本无产政党即已发生复杂的分化及对立的情势,是上面所已述过的。但是他方面“统一无产政党战线”的呼声,也未尝绝于耳。尤其自

经第一回普选日本无产政党尝过失败的苦味以后,这种统一的呼声,更加嚣于尘上。昭和三年十二月一日,乃有日本农民党、无产大众党及民宪党(地方无产政党)各派代表同访日本劳农党,提议合同。日本劳农党,因此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统一委员会,议决赞成合同。于是,十二月五日,举行第一回合同协议会。其后继议六次,遂于十二月二十日在协调会馆举行创立大会。此即“日本大众党”之诞生也。参加者如上所述,有全国无产政党三——日本劳农党、无产大众党、日本农民党,地方无产政党四——民宪党、中部民众党、信州大众党、岛根自由民众党。

然而,如此大规模合并后的,前途似甚有望的日本大众党,不幸又于成立后未及一月,即复于内部发生“清党运动”。清党的原因在于大众党干部,有与政友会及资本家发生金钱的关系,而福田狂二一派因拥护大众党的阶级性而发起弹劾。其后旧日本劳农党旧日本农民党干部与旧无产大众党干部之间,发生激烈的暗斗。其结果,旧日本农民党系,退出日本大众党;旧无产大众党的分子,有的被除名,有的自动退出。到这时候,日本大众党,实质上,只是旧日本劳农党的扩大罢了。

日本大众党分裂后,日本旧存的无产政党消失全国无产政党的势力者,有旧日本农民党及旧无产大众党。退出日本大众党的旧日本农民,失去组织全国无产政党的能力,而从来充当日本无产政党最右派,几乎不能认为无产政党的日本农民党的残余势力,消灭净尽。即如旧无产大

众党,虽曾短期组织过反对日本大众党分裂的“统一战线同盟”及“反对分裂实行委员会”等团体,以与日本大众党的干部争,但终毫无结果而孤立无援,不获已而分散各地组织地方无产政党。其主要者有东京无产党、秋田无产党及大阪无产党等。

**劳农党** 旧劳动农民党的干部,愤于新党组织准备会及新劳农党的被命解散,政府的压迫臻于极端,乃放弃“合法政党主义”,组织“政治自由获得劳农同盟”,以实行非法的斗争。因此,日本政府对于此派的活动,严重取缔,极端的压迫。致使他们的活动,不得不采取潜行的方式,处处感受不便。日本政府关系者,甚至采取不公正的压迫,昭和四年三月五日,该同盟的会员山本宣治代议士之被杀;即其一例。尤其经过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共党检举后,该同盟的活动愈陷于穷境,几无存立的余地。因此无产群众乃复有组织合法政党的要求,即该同盟干部分子,也觉有此种必要。

“政获劳农同盟”,以非合法的形式,继续了约有八月的运动。至昭和四年八月八日,中央委员长大山氏、书记长细迫兼光,及中央委员上村进,因得河上肇及小岩井净的赞同,发表树立新劳农党的提案书,历述树立合法的左翼无产政党的必要,以求无产群众的批判。据该提案书,则新劳农党的性质、任务及组织的原则如下:

(一)为着不断地、强烈地、现实地、有效果地

拥护伸张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其它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起见，而以大众的日常生活斗争主义为全活动的基础。

(二)且把各个场面的斗争，联结于政治的要求及其必要的关联上，把整个斗争集中统一于政治的自由获得斗争，而强烈地展开。

(三)他方面，根据这种立场，努力于战斗的战线统一之决定的实现。

(四)为着遂行以上的目的而(1)在完全“党的平民主义”的基础上，(2)拥有独自的指导师，(3)确立恒常的政治组织，(4)以合法的左翼政党，进出于公然的舞台上(《新劳农党树立提案》33页)。

新党组织的筹备着进行，终于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举行成立大会，该党于强烈进行被压迫民众日常利益的保护及政治自由获得的斗争以外，且以扩大加强劳动组合及农民组合，为其重要的任务。

但当新劳农党组织的提案发表后，左翼阵营内部，对于该提案之赞成与否，发生很大的争论。甚至如政获劳农同盟，且以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大意如下的声明书：“这个提案是种企图左翼阵营分裂的破坏阴谋，是对劳农同盟的直接挑战。因此，应该断然反对这种计划，同时重起大众的运动，以破坏他们的策动。”

继之，乃有十四日上列大山等五人的除名和放逐。



至最近,新劳农党的内部,又以“解消与非解消”之争,轰动日本无产政党运动界。

**全国民众党** 劳动总同盟从前即已有过二次的分裂。自去年(1929年)四月大阪联合会大会举行以来,其内部更发生“反对现实主义”的一派,以松冈驹吉及西尾末广等人为领袖。于是劳动总同盟内部左右派的对立愈益激烈化,遂至酝酿同年九月第三次的分裂。因分裂而脱离劳动总同盟的一派,另外组织“劳动组合全国同盟”。

劳动总同盟的分裂,自必影响及于社会民众党。其结果,遂致1929年12月的第四回党大会上,发生大阪府联合会选出代议员的大部分脱离。同时,东京方面又有宫崎龙介一派,组织“社民党反动化防卫全国协议会”。于是,上述二派合作而组织“全国民众党”,本年1月15日,举行成立大会于东京帝大基督教青年会馆。

总观以上所述本期日本无产政党的分裂与对立,可知本期的日本无产政党运动,反乎成熟期之因急于实现统一的无产政党而各党各派暂以自己的意见供作牺牲。本期的特色在于各党各派皆为实实在在遂行本党本派的使命与任务起见,概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这种坚持,而表面上形成四分五裂的情状,甚至互相轧轹对立。然而这种分裂,是无产政党运动发展到相当阶段,所必有现象。如无此种现象而永如前期,苟合忍容,则其发展必无进步,可以无疑。所以,分裂对立的情状,是发展期必然的特征。不过,无产政党的分裂与对立,也须有相当的限制和标准,否则,有

时也足以妨碍本身的发育。

## 九、现存日本无产各党的纲领及政策的比较

成熟期以后日本无产政党的发展过程，若概括言之，则第一个“农民劳动党”，仅存三十分钟而消灭；由农民劳动党，重再脱胎而成“劳动农民党”；复由劳动农民党前后分化而产生“日本农民党”、“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及“无产大众党”；因分化而独立的日本农民党、日本劳农党及无产大众党，复与其它四个地方无产政党重合而组成“日本大众党”；旧劳动农民党被解散后，经过新党组织准备会的酝酿而重组“劳农党”；最近，因不满于社会民众党的反动化而产“全国民众党”。于此可知现存日本无产政党，只有社会民众党、日本大众党、劳农党及全国民众党四个。究明这现存四个无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即可明白过去日本无产政党运动各派的大势及其异同。盖因现存各党对于过去各派，均有历历可寻的系统关系故也。

### (一)现存各党的纲领

#### (1)社会民众党的纲领(1926年12月5日)

a、我们确信建议勤劳阶级本位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树立健全的国民生活的方法，而希望其实现；

b、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分配方法里

头,有阻害国民生活者,而希望以合法手段加以改革;

c、我们排斥代表特权阶级的既成政党,及无视社会进化过程的急进主义的政党。

### (2)日本大众党的纲领(1928年12月20日)

a、我们希望根据我国国情,以实现劳动者,农民及无产市民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

b、我们希望采取合法的手段,以改革现在不合理的关于土地、生产、分配的制度;

c、我们代表无产阶级的利害,希望有产阶级所垄断的政治上各种制度的彻底改造。

### (3)劳农党的纲领(1929年11月1日)

a、我党为拥护伸张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其它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日常利益而战;

b、我党以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的扩大强化为重要任务;

c、我党希望无产阶级战线的统一;

d、我党为全体被压迫民众之获得政治自由而斗争。

#### (4)全国民众党的纲领(1930年1月15日)

a、我党代表劳动者、农民、小卖商人、小工业者、商业使用人、薪水生活者等全体勤劳阶级的利益；

b、我党希望建设勤劳无产阶级本位的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的各种制度，并解放勤劳阶级；

c、我党运用勤劳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依照合法的手段，为达上述目的而斗争。

总观上以四党的纲领，其共通点如下：

(1)各党皆不满意现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社会的各种制度；

(2)各党字面上所代表的分子约略相同，只有社会民众党及全国民众党，标榜“勤劳阶级”或“勤劳无产阶级”而已；

(3)各党皆欲为“勤劳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4)无论明文规定与否，各党皆具有反抗既成政党(指有产政党)的意旨。

各党的差异点，大约可以列之如下：

(1)劳农党未曾明言“合法的手段”,其它三党皆有此规定;

(2)社会民众党特别明言“排斥无视社会进化过程的急进主义的政党”,其它各党则无此规定;

(3)只有劳农党明言(a)我党以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的扩大强化为重要任务,(b)我党希望无产阶级战线的统一,其它三党则皆无此规定。

## (二)现存各党的政策

我人以上已就现存各党的纲领比较过,理应再在本段,就各党的政策详加检讨比较,以见各党为实现理想而采取的手段。但是,这里因限于篇幅,致使各党所列的政策,不能全部列出,只得采用归纳的方法,把各党的共通点及相异点,介绍于下。

日本无产政党各派从来所列的政策,大异相同;即现存四党的政策,也莫不如此。不过在此“大略相同”之中,也有小异,急进缓进皆有分寸之差。就大体言之,在现存四个无产政党之中,社会民众党最右,而全国大众党次之,日本大众党居中,而以劳农党为最左。我人在这里已限于篇幅,不能把各党的政策全部列出,我们只得把居中的日本大众党的政策,举为例示,然后再就各党的相异点略加解剖。

日本大众党的政策(1928年12月20日)

(1)政治方面

- ①普通选举的彻底(实行);
- ②压抑无产阶级运动诸法令的改废;
- ③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 ④缩小军备,缩短兵役年限,改善兵卒待遇;
- ⑤把民众军阀主义化的一切政策,如学生的军事教育,青年训练所等等,一概排除;
- ⑥制定对于因战死、征兵、废兵而起的本人及家族的穷困的扶助规定;
- ⑦撤废殖民地的政治差别;
- ⑧打破秘密外交;
- ⑨对于冤罪,不当拘束,及官吏的非法处分所产生的损害,确立国家赔偿制度;
- ⑩由国库支付无产者诉讼费,改正陪审法,及改革其它的裁判制度;
- ⑪对于矿毒、烟害、土地陷落以及其它矿业、工业等所生损害,确立赔偿制度;
- ⑫地方自治制的民主化。

(2)财政方面

- ①财产税的创设,所得税及承继税的高率累进赋课;
- ②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关税及其它的民众负担,一概撤废;
- ③地方税制的彻底的改革;

(3)经济方面

①团结权、罢业权的确立；

②禁止立人、禁止假处分及立毛抵押，制定以确立耕种权为基调的佃种法；（“立人”为“进入”之意，指地主之侵入佃地刈取谷物而言。）

“立毛”指在田中尚未收成的“作物”而言。

③制定最低工资法；

④确立八小时劳动制（矿山劳动则为六小时）；

⑤禁止妇人及少年的夜间劳动、船内劳动、炕内劳作等危险劳作；

⑥改正工场法、矿业法等等，制定交通劳动者、自由劳动者的保护法；

⑦船员法、海商法、及船员关系法规的改废；

⑧肥料的国营；

⑨养蚕保护及其它小农保护设施的国家经营；

⑩存款部资金运用的民众化，产业组合制度的改正，其它无产阶级的金融制度的确立；

(11)重要农产物专卖制的实施；

(12)重要食粮的价格公定制度的确立。

(4)社会方面

①男女之法律上、社会上的权利及机会平等；

②女子人身买卖的禁止；

③封建的贱视观念的打破；

④职业介绍制度的民众化；

⑤健康保险法的改正，船员保险法的制定，失业保险及其它劳动保险制度的确立；

⑥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费的国库负担，教育制度的改善；

⑦居住权的确立，借地借家法的彻底改正，及公营住宅的建设；

⑧诊疗机关的公有化；

⑨农村文化设施的普及；

劳农党、社会民众党及全国民众党的政策，大致与上列相同。惟是其它三党，皆有“对支干涉绝对反对”的明文规定。社会民众党又有“社会制度的改革”一项的规定，开列如下：

(a)广止富族院的预算修正权；

(b)延长议会的会期；

劳农党的政策与上列日本大众党(其与社会民众及全国大众党也然)的异点，无“劳动法及佃种法”的要求，而多出下列数项：

一九，废止劳动争议调停法；

二三，废止自耕农创定法，彻底改正佃种争议调停法；

二八，废止农会、产业组合及渔业组合，改废耕地整理法及森林法。

尤其可注意者，劳农党之下列二项政策，是超越其它三党的特色：

三四，确定学生、生徒的研究自由及校内自治权；

四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三十四项为注重学生等思想方面的无产运动；四十五项带有国际化的意味。

## 十、现存各无产政党势力的比较

无产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专以其实力为断。而实力云者，无产群众的支持是也。实力的雄大与薄弱，又全以支持拥护它的无产团体的多寡，及这些无产团体本身实力的大小为标准。此外，没有组织的无产群众的向背，也有多少的关系。由这两方面构成的各无产政党的实力，检点(a)选举上所得票数，(b)加以支持的无产团体本身，即可具体地明白地表现出来。我人且从此二方面，窥察现存日本各无产政党的实力，并加比较如下。

(a)就选举观察的各党的势力。

现在四个无产政党所经过的全国的选举，就是本年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二次普通选举。此次普通选举的结果，无产政党候补者中选者的数目共有五名，列表如下：

党别候补者当选者数目表

党名	候补者数	当选者数	次点者数
社会民众党	33	2	4
日本大众党	23	2	5
劳农党	13	1	2
全国民众党	4	0	0
地方政党	21	0	2
合计	94	5	13

此次普选的结果,当选者各党合计五名,较比第一次普选,减少三名。自大体言,实是无产政党运动的失败。各党当选者数的比较,以社会民众党与日本大众党为最多,各有当选者二名;而劳农党次之,有当选者一名。若与第一次普选的结果比看,则社会民众党上次当选者四,此次正减其半数;日本大众党的前身的日本劳农党,上次当选者数只有一名,本期则增至二名,增加一倍。再者本期次点者数,社会民众党只为四,日本大众党尚有五。于此,可知极右的社会民众党实力之低落,而居中的日本大众党实力的增大。劳农党虽是经过许多波折而始草创成立者,且在所有无产政党之中,是受压迫最利害者,但在本期普选尚得一名当选者,次点者数二。全国大众党与地方各政党,则毫无成绩可言。

只据当选者数的比较,尚不能确实决定各党在普选上的实力。我人应该再就各党所得票数,及候补者每人平均票数,以决定其实力。且看下表:

党别得票数比较表

党名	得票总数	候补者数	每人平均得票数
社会民众党	170,385	33	5,163
日本大众党	165,297	23	7,187
劳农党	78,538	13	6,042
全国民众党	19,695	4	4,923
地方无产政党	68,389	21	3,256
合计	502,304	94	

据上表,社会民众党所得总票数最多,日本大众党次之;每人平均得票数,以日本大众党为最多,而劳农党次之。此外,全国民众党及地方无产党,为最低。

本期普选无产政党各派所得票数的总计,为 502,304,若与上次总票数之 492,221 比较看,增加实属有限。二年间日本无产政党运动的宣传,殆等于零。况且当选者数,反比上次减少三名,这不是无产政党运动的失败,是什么?不过在这失败里面,可以反证:日本有产政党,尤其执政党对于无产政党,尤其左倾派的压迫愈益厉害。更如素来战斗力最强最为有产政党所忌的劳农党前身的劳动农民党,在上次普选得票总数,尚为 193,028,本期劳农党得票总数减至 78,538,减少过半,尤其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于此,我人预言:日本无产政党运动,要占得胜利,非日本无产群众的势力压倒地增大,则须日本的政治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

(b)就支持团体观察各无产党的势力。

实质的无产政党,必拥有无产团体——尤其是经济斗争团体,为其后盾。而这种无产团体的多少及其本身实力的厚薄,对于所支持的无产政党的消长,具有极大的关系。本节再就支持日本无产政党的无产团体,检点日本各无产政党的实力看。

此类支持无产政党的团体,本来包括劳动组合、农民组合、思想团体,及学生团体。但因思想团体及学生团体,极其散乱变化无定,尤其是学生团体更不能明露公然地加入,所以不容易得到确实的统计。因此,以下所列支持团

体,大多以劳动组合及农民组合为主。

### (一)社会民众党

团体名称	团员数目
日本劳动总同盟	30,000
日本海员组合	81,000
海军劳动组合联盟	43,000
官业劳动总同盟	14,000
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	15,000
合计	183,000

以上所列各团体,是代表日本右翼势力的劳动团体,由这些团体组织“劳动立法促进委员会”,在实质上作成联络的形态。其中,劳动总同盟尤其是社会民众党的主要支持团体,该组合的有力的干部分子,同时参列于社会民众党的枢要机关。日本劳动总同盟原来的势力更大,但如上述,自经1929年9月总同盟的第三次分裂以后,其势力大有减缩,影响社会民众党,也非常之大。日本海员组合,在支持社会民众的各团体之中,是组合员数最多者,其关系该党的消长非常之大,故由该组合派送米洼满亮、堀内长荣等人于社会民众党的最高干部,参与该党的最高权。他如海军劳动组合联盟及官业劳动总同盟,都有直接统制的地方无产政党,例如海军联盟佐世保劳爱会的。佐保民众党、海军联盟横须贺工友会的民众进党、官业八幡同志会的社会民政党、官业名古屋向上会的劳农民众党等等。而这些

组合皆指使所统制的地方无产政党,和社会民众党合并,表明积极拥护支持的态度。

除上列五大团体之外,尚有食薪水者协会、借众人组合、社会青年同盟、社会民众妇人同盟等支持团体。

## (二)日本大众党

上面述过日本大众党是日本劳农党、无产大众党、日本农民党及其它四个地方无产政党合并而成者。所以,合并当时,除从来支持日本劳农党的各团体之外,重新加入旧日本农民党的支持团体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及支持旧无产大众党的各种劳动团体。然而后来又经过数次的分裂、脱党、开除等变化,而其支持团体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自大体上说,正如日本大众党之殆为旧日本劳农党一样,其支持团体,与旧日劳党的支持团体,实无多大的变化。且看下表:

团体名称	组合员数
日本劳动组合同盟	27,000
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	7,000
日本海员组合	5,600
(旧司厨同盟系)	
全国农民组合	22,000
(旧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系)	
日本窑业劳动总同盟	3,000
神戸市电从业员组合	1,600
横滨市从业员组合	1,300
合计	67,500

除上列七团体之外,尚有东京交通劳动组合的旧日劳  
党系、旧全国农民组合同盟的一部分及全国妇女同盟。

### (三)劳农党

劳动农民党是旧劳动农民党经过许多的波折转变而  
成者。旧劳农党的支持团体及组合员数,约如下表。

团体名称	组合员数
日本农民组合	68,743
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	35,080
关东电气劳动组合	1,200
关西电气劳动组合	450
东京市从业员组合	2,500
在日朝鲜劳动总同盟	1,753
全日本铁道从业员组合	5,000
日本交通总联盟	14,988
矿工组合九州联合会	6,000
京都陶瓷工组合	700
海员刷新会	100
总计	136,519

但是劳农党成立后,受到左翼各派的排斥,所以它的  
支持团体,不能如旧时的雄厚。且在其成立当时,表示拥护  
的团体,大多出于部分的,出于整个者尚少。所以,我人只  
能从下列表示赞成各团体,推想其大概。

东京交通劳动组合有志分子,东京市从业员组合有志  
分子,大阪金属劳动者组合,大阪木材劳动组合,京都陶瓷

工组合,全国农民组合新口县联合会有志分子,全国农民组合京都府联合会,筑波地方无产团体协议会等。

#### (四)全国民众党、劳农同盟

全国民众党是1929年9月脱离劳动总同盟的分子结合而成者。其支持团体,只有劳动组合全国同盟一个。该同盟的组合员数,约在八千至一万。

此外,尚有一个“政获劳农同盟”。它虽然不是公然的、合法的政党,但是它是表现日本共产党之政治活动于外表者,并且拥有许多善于斗争的团体。所以,在此范围内,它是有举出说说的必要的。加盟,或拥护“政获劳农同盟”的团体,大约如下。

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无产青年同盟、无产者新闻社、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等等。

### 十一、日本无产政党运动与中国革命——结论

我人在以上各节所述,算已就日本无产政党运动本身,解剖叙述过一个大要。要而言之,日本无产政党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往前发展的时期,将来的成功正未可限量。然而,日本无产政党运动的发展和成功,究竟对于中国有何关系?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有何损益?我人想在本节,就此问题略加论述,以结束本论文。

日本帝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虽被列于“一等国”,但是它本国的经济条件,却非常的薄弱。日本资本主义的发

展,未及三五十年即已步入“早衰”的途程:各种资源的利用,殆已达到“饱和点”;经济恐慌一年比一年尖锐化,失业者数一年比一年增大,社会思想一年比一年左倾化,因而贵族财阀本位的政治,日益动摇,一般的支配阶级都在战栗,绞榨脑汁思有以安定这种危局的方法。

然而,安定日本现在的危局,只有下列二种方法:

(一)根本改变日本现在的经济制度;

(二)采取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向外发展。

第一种办法是要推翻现在支配阶级,夺去他们不劳而食的特权的,所以日本现在的支配阶级当然不会赞成。结果,日本现在的支配阶级就只有采取第二方法,牺牲外国的土地及人民,以为他们缓冲。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早即以意识的必要,而其军国主义的剑锋及于琉球、台湾、朝鲜;后更迫于客观条件,而其侵略及于满蒙,尤其在欧洲大战中,趁火打劫,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他方面,且乘各种机会助长中国的内乱,阻止中国革命的完成,以期达到他们转嫁的目的。要而言之,日本现在的支配阶级,是不希望中国革命成功的。

上述是日本现在支配阶级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本论文的讨论对象的日本无产政党,对于中国所采的态度如何?日本各无产政党的政策,大多明文规定“绝对反对干涉中国”,这是反对日本支配阶级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乱,延宕中国革命的意思。

事实上,不但反对干涉中国内政而已,并且积极反对



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行为。当 1927 年,日本政府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向北进展,采取对华积极干涉政策时,日本各无产政党即共起而反对。所以,同年 1 月 16 日,当时的日本无产政党、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众党及其它的无产团体,即应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招待,举行日华恳谈会,讨论反对日本政府对华干涉政策团体的组织。其时,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众党,及劳动农民党的代表,皆表赞同之意,愿赞助对华不干涉同盟的设立。

就中,尤以最左倾的劳动农民党,最为努力,各方奔走于这种运动。同年 4 月 21 日,遂成立“对华不干涉同盟准备会”。东京、长野、青森、岩手、静冈、名古屋、大阪、京都、神户、奈良、三重、冈山、九州等地方,也都成立“对华不干涉地方同盟”。同年 5 月 28 日,日本政府出兵山东的时候,对华不干涉同盟准备会的活动,更加炽烈化,立即召集全国协议会,得各地方同种同盟会及无产团体的加入,乃于 5 月 31 日成立“对华不干涉全国同盟”。标榜“对华不干涉”、“反对出兵”、“立即撤兵”等等口号。这种运动,一时普及于全国。

日本无产政党之反对日本对华的干涉,自它们的立场说,是当然的。日本无产政党的宗旨与目的,是在推翻现在充当日本支配阶级的贵族和资本阶级。而日本帝国主义向外的的发展,愈益成功,则日本贵族和资本阶级的地位愈益巩固,这对于他们的运动,是极端的不利。所以,势须对于日本之积极对华干涉,加以反对。

反过来说，中国现在受到国际帝国主义重重的压迫，就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最。数十年来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完全成功，莫不由于这些帝国主义的作祟。所以，近年来的中国革命，至少在口头上也就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否，实际上，非至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绝对不会完成真正的革命。

然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则日本无产政党运动，可以达到完全的成功，日本无产群众得到真正的解放。我们于此，发见：中国民众和日本无产群众，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国革命和日本无产政党运动，在某一点，必然地采取共通的进程。日本的无产群众和中国的民众！起来吧！共同携手，向共同敌人的阵地冲锋！这才是“日华共存共荣”的真正意义!!!

#### 注释：

① 车界党的读音为 shakiats 与社会党同音盖含社会党之义于其中也——参照山川均氏作《无产政党的先驱》（《改造》大正十四年6月号）。

② ③ 参照山川均氏的论文，《无产政党的先驱》（载《改造》杂志大正十四年6月号）

④ ⑤ 参照茗荷房吉所著《日本政党的现势》昭和二年日本评论社版。

⑥ 该会为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召集，举行于伊藤的私邸。到会者有贵族显官男女四百多人，各作各样不同的化装以取乐。轰动全国。

⑦ 平民社在民治三六年十一月由幸德秋水、土界利彦、石川三四郎及西川光二郎四人所创,是当时社会主义研究者及社会运动家德团体,刊行机关报《平民新闻》。

⑧ 社会民主党的理想有废除人种差别,各国的军备,及阶级制度,生产机关及交通机关归公有,财产公平分配,人民政权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各项。

**本文参考书:**

- 1、茗荷房吉著《日本政党的现势》(1929年版)
- 2、木村毅著《日本社会主义史》(1926年版)
- 3、腊山政道等著《无产政党论》(1930年5月版)
- 4、施无量著《日本无产政党研究》(民国十八年1月版)
- 5、大山郁天著《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1925年版)
- 6、日本《改造》杂志及《中央公论》各期
- 7、大山郁夫著《无产政党论》
- 8、全上《政治的社会基础》(第3篇)
- 9、山川均著《无产者讲话》
- 10、高桥龟吉著《明治大正产业发达史》
- 11、白柳秀湖著《日本民权发达史》
- 12、赤松克磨著《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
- 13、山川均等《无产政党研究》(《改造》大正十四年6月号)
- 14、(著者忘记)(钱氏藏书)《日本文化之史的研究》。

## 日本新内阁之前途的暗淡

(一)前日本内阁总理滨口氏病势之转重,牵动了日本政潮。先而代揆问题重器尘上,继而若槻礼次郎被推戴为民政党的继任总裁,终而滨口内阁不得不由若槻新内阁起而代之。于是若槻新内阁成立于4月14日。

然而继滨口新内阁而起的若槻新内阁的内容,究与前内阁有无多少的差异?实在没有多大的差异!阁僚之间,除了陆军,商工,及拓务三大臣易人而外,其他八部大臣皆仍其旧,只有一部分行政官员,略为撤换罢了。

大凡政治舞台上,改变了角色,必定有一番新花样的表现,眩示政策给世人看,以取得一般民众的信任,即不大擂大鼓宣示政策政纲,也必有多少的表示。此次,若槻新内阁关于大政方针,只是“现内阁的施政方针,原则上踏袭前内阁的主义政策”(见东京4月15日的新联电,新阁最初之阁议)而已。若槻在就民政党总裁的致辞中,也有“……政治犹生物,确守既定之方针,顺应情势,实为其要谛……”等语

(见东京4月14日新联电)。再就其旧阁蝉联及若槻先就民政党总裁然后组阁的意义玩味之，则新内阁的政治方针之“继承前内阁彻底实行紧缩政策”，也可以断言矣。

读到“实行紧缩政策”，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滨口内阁成立时日本的经济情势。日本自从欧战告终以来，失去趁火打劫的机会，而经济景况急转直下。当时的政友会内阁，睹此情势惊慌失措，马上采用膨胀政策，想在脓血流注的疗疮上紧贴橡皮膏，期其脓血自行消尽。但是疗疮究竟是疗疮而不是小火疥子。所以细菌只在内部潜伏地大肆繁殖，腐烂之势与日而俱长。其终结，乃促政友会内阁塌台，而民政党的滨口内阁起而代之。

滨口内阁在未上台以前固已诊察出日本的症结在于“用橡皮膏封贴疗疮的烂口”，治疗之法非施手术割治不可。但在其上台之后，却只“割而不治”。采用紧缩政策，解除金币出口禁令之后，只见脓血四流，内部的腐状完全暴露，而症结所在依然无补于日本的经济景况。不幸又适逢1930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际会，滨口内阁的手术愈陷于无能的状态。终于引起刺客的窥伺，一枪打塌了滨口的高台，牵动了日本的整个政界。而众目睽睽的若槻氏，终不得不屡诵“余跳入火坑以维此极重大之难局”的咒语，而出来组阁了。

(二)“余跳入火坑”！不错，若槻氏此次挺身而出当难局，“勇固勇矣，其奈难关重重何”！滨口氏昭示十大政策，奋勇断行的结果，也只落得1930年度的财政收支发生4,800万元

日金的不足,而一般的经济界却愈有衰落趋势。仅就财政上言,当此极端的不景气,这4,800万日金的措置已就不易,加之1931年度的预算又有更改之虞(据东京17日新联电),1932年度预算案的编制,就非更加紧缩不可。这样一来,势将使现在的不景气愈益尖锐化,深刻化。于此,若槻内阁的政策,恐怕难免要发生破绽了。不知道勇敢的若槻氏,采用何种手段,来打通这第一个难关!

若槻氏在其就职的当初,即屡宣称继行滨口内阁的“行政,财政,税制的三大整理案”。据此,若槻氏之欲以彻底实行此三大整理案以解决日本现在的僵局,可以想见。据东京19日的新联电,若槻首相18日在招待民政党所属议员席上,关于金解禁后的对策,萧条打开策,财政巩固策等,曾主张逐渐推行从来的主张。又据同电若槻氏三大整理政策的内容,约略如下:

“……此次整理方针及范围,关于行政及财政者为各省(即各部)继续费之根本改订,补助费之整理减额,官吏减奉案之断行,恩给法改正,各省及各局的合并,行政事务联合统一,以及改革军制之督促。又关于税制则为当国税,营业税,杂税及地方税杂税之全废时,自社会政策的见地,期负担之均衡,同时刷新地方财政。……”(录自4月20日大公报)。

据上电所述约言之，三大整理政策的内容，就是“裁并行政施設”，“撙节各种支出”，“调和国民在租税上的负担均衡”。我们再来检点此三大整理政策的施行方法如何。若槻内阁之施行上述三大整理案的步骤，先设“行政”、“财政”、“税制”三种调查委员会，充分调查研究，政府即依所研究的结果决定具体的方法。

关于行政改革方面，仕立铁次郎研究有素，所以4月23日在首相官邸所开的行政整理第三回准备委员会，专由他发表主张，听政府采用。仕立氏的行政改革意见如下：

“……为防止各省预算之争夺，及政务之统一，而整理各省大臣，设置无任所之大臣，合并陆海军改为国防省，谋航空陆海军之教育，及其运输维持卫生等之统一合理化，排除帷幄上奏，设立军部大臣之文官制，农林与商工，铁道与递信均各合并，废止文部省，而于内务省设立教育局，以处理其事务，废止司法省，设置检察院及大审院，并废止保障其地位之警视厅，使直辖于东京府，其他又行局课之废合，换言之，即从来外务、商工两省所处理之通商事务，一概整理，文部省之情报部，对华文化事务局移管民间，扩张大藏大臣之权限，设置各省直辖之会计官，以负经理监督之责，预算款项之流用，须得大藏大臣之承认，废止陆海军之委任经理，改正恩给法，设立养老院及保险制度，保

險金定 10%，延長恩給年限，廢止各種調查會，擴張會計檢查員及法制局之權限，排除教育之劃一主義及官立學校之廢止，現在之軍隊，定為十個師團，地方行政定為十府縣，廢止府縣制改為町村制，要之因現在國民之所得為 115.4 億元，對於國民之負擔，應取其所得之一成為宜。”（據東京 4 月 24 日的新聯電錄自 4 月 25 日《大公報》）

後經梶原仲二、矢野恒太、松本丞治等人調查研究的結果，合財政行政兩案，擬就成案，發表於 4 月 26 日，其要旨如下：

（一）財政經濟 政府及地方自治體之一般會計歲出，整理至總額 15 億元之程度，訂立官業漸次移入民業之方針，改正會計法規，劃分既定費及未定費，結算依據年度末之現計，擴張會計檢查院之權限，對於政府及保護事業施行嚴格的會計檢查，各省之會計主任受大藏大臣之指揮監督，改正日本銀行條例及兌換銀行券條例，完成中央銀行之金融中樞機關之機能。

（二）行政 內閣除置總理大臣及各省大臣外，再設置無任所國務大臣若干名，以謀政務之統一，內閣設立政務局，掌管政務，廢止政務官，中央之行政官廳為內閣之外務、內務、大藏、國防、產



业、交通六省，并于各关系省监督下，设置官业外局（例如邮务院，林业院等，）废止司法省，设立检察院，废止文部省，设置文教员，对于检察员、文教员、经济监察员及殖民地之长官，为安固其地位，不滥为更动，废止警视厅，司法警察属于检察院，而行政警察则属于警保局，废止拓务省，对其事务则分属各关系机关，与以适宜处置，废止桦太厅，使隶属于北海道厅，缩小关东厅，废止教育之划一主义，对于官立大学，取渐次变成私立之方针，设立官立大学院于东京及京都，以为最高之学府，常举行帝国经济会议，以供政府之咨问，废文官任用令，而于各省规定铨衡制度，俾得广开门户，登用人材，废止府县，分全国为十数行政区域，而各区域则设置中央政府之支派机关。（据4月27日东京新联电，录自4月28日《大公报》）

他如“税制改革”的具体方法，截至现在虽尚无成案人手，但只据4月28日新联电，也可知其方针之大概，且照揭如下：

东京28日新联电，大藏省27日午后2时；于官邸由青木主税局长，重泽国税课长，石渡书记官等参集，对于国税整理案加以审议，闻当局之意向如下：

提高累进加税，以谋负担之均衡，减轻消费税，而加重直接税，宅地税曾经贵族院决议，然于实施后一二年拟

讲求激增缓和之法，对于公产税，则委让诸地方，又对于财源如果有余裕，则减低烟草税，目下正进行调查中（录自4月29日《大公报》）。

又据东京4月25日新联电所称，民政党对于政府的财政整理，有独自作成对案的意向，其基本方针：

一、当此次财政整理之际，为均衡国民之负担，使其纠正不公平的地方；

二、依据累进课税，以加重富裕阶级的课税，并实行减轻中产阶级以下的负担；

三、税制的整理，分国税、地方税、及关税三方面。

此三项可以说皆属于税制改革的提案，政府将来必定采用。据报，他们尤其注意所得税的修正，并欲由社会政策的见地，为保护筋力劳动阶级起见，拟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率提高，废止国债等之免税，改正承继税，依综合课税主义，而提高资本家之累进课税率。

(三)总括上述若槻氏的三大整理案，其要点约有二项：

第一、想依行政财政整理的彻底实行，减少岁出；

第二、想依税制的改革施行社会政策。

然而第一项的实行,当前就有重重的难关。即使打通这些难关,结果也未必能振作日本经济界的不景气。且详释之。裁减官员,减少薪俸,本来就是一件难事。滨口内阁曾行之而遭司法官之反对终归失败。所以,若槻内阁此次欲于“绝对秘密”之中行之,且不涉及恩给法的修改而以暂时的性质行之(据东京4月18日新联电)。但鉴于过去的事实及社会的趋势,恐怕不容易实现。上面述过,1930年日本的财政发生4,800万日金元的不足,所以若槻内阁编制1932年的预算时,须由此筹出一亿二三千万元,好得收支相抵。但是此数欲专求之于行政设施的裁并尚不能办到,势须扩大至于军界及教育界的整理。教育经费的撙节或尚可以办到,但各军费的撙节,当此列强岌岌于军备扩充,日美积极备战的际会,恐怕万万不能办到。况且,要筹出此数巨款,无论如何非发行公债不可。到发行公债增加人民的负债时,若槻内阁的政策,就难免发生破绽了。

再者,日本今日难关的所在,是“失业情势之增长”及“经济界不景气的尖锐化”。而裁减官员适足以增长失业情势,减少薪俸和裁员同时作用,也能缩小一般的购买力,而使不景气的经济界愈益消沉。于是,若槻新内阁的政策效力,就完全归于乌有了。若槻新内阁前途的黯淡当不在滨口内阁之下。

第二项,想依税制的改革,尤其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税率(减轻劳动者的负担),提高资本家的“累进税率”(增重资本家的负担),以断行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但

是这种政策的施行,在资本家阶级支配下的日本社会,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工商业资本家阶级所支持的民政党,绝对不能让他所使役的政府,施行不利于工商业资本阶级的政策。因此,若槻新内阁即欲断行这种社会政策,也只能在某种严格的限度内行之。如果必欲如其所宣言,“彻底实行”,那么,恐怕政府的主人翁就会请他们下台享享清闲吧!

根据以上所述,若槻新内阁的终局,不但是原则上继行滨口内阁的主义和政策,即其所谓“彻底施行”,将来恐怕也不能出于滨口内阁范围之外。若槻新内阁不但“踏袭”前内阁的主义和政策,而且是“惟妙惟肖”地踏袭。我们曾谓滨口内阁的手术,“割而不治”,而若槻新内阁的手术恐怕也只能终于“割而不治”吧!若槻新内阁的前途,是多么“黯淡凄凉”哟!

我们认为日本经济的萎靡及其派生的种种问题,是一个日本经济制度的整个问题。如果这个整个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其他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在此整个问题未解决以前,无论那一个“三头六臂”的内阁,或怎样抱有“跳入火炕”的大决心的内阁,也不能打通这些重重叠叠源源不绝的难关。无论那一个内阁登台,也终必难免“黯淡凄凉”的。

原载 1931 年 1 月《新东方》第 2 卷周年纪念特刊

## 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

### 一、引言

记得陈翰笙先生在拙稿《日本近世产业史论》序言中曾有一句话,说道:“日本经济的衰落,能否求得一条出路,须视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为断”(大意如此)。这里所谓“一条出路”,当然是指日本经济现阶段的出路而言,而日本经济现阶段的出路,又当然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其次阶段的出路,简单一句话说,就是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成功。换一个立场来说,中国革命倘能成功到可以拒绝日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型的发展的程度,则日本现阶段的社会革命可以成功。盖因中国若不能办到这一项,则日本帝国主义尚可以恃“大陆经营”的效用,以延长日本帝国主义的寿命,而日本现阶段的社会革命,就会无期延宕下去,于此,可知日本之“大陆经营”与其本国的社会革命,二者的成败实有正相反的密切关系;而此次东北事件与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关系之密切,也可以想见。

事实上，日本一般的无产群众对于这次的东北事件，也非常的留心。社会民众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曾派三个会员到满洲视察此次的情形（据 The Trans-Pacific）。日本无产阶级各党各派对于此次的东北事件，皆有相当的表示；属于各党各派的理论导师以及自由的论者，皆作鸿篇大论，对于东三省的日本权益问题，发表意见。《东洋经济新报》派，长谷川如是闲等自由派，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赤松克麿一派及“普罗科学”派……等人的此项论作（这些作者都站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内，所以成了本文检点的对象），就是最显著的代表。尤其是社会民众党的论战健将，赤松克麿氏，专撰《满蒙问题与日本无产阶级》，阐明东北事件与日本无产阶级的关系，并提示本人的见解（此见解参阅后节《赤松氏的错觉》）。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关系之密切，更可以自事实方面求得证明。

河野密氏曾就此次东北事件的本质说道：“今日，对满蒙问题之武断行动，只是帝国主义布尔乔亚犯的世界恐慌对策之一连锁……”（见《东亚》11月号《满蒙问题私议》）；我则更干脆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之积极行动，实是日本布尔乔亚犯为排脱日本现阶段的社会革命，或缓和它的必然计划。东北事件舍日本现阶段的社会革命不能求出根本的解释。

## 二、日本群众的言论

然则自从东北事件发生以来，日本的舆论如何？尤其

是日本无产群众及其代表的舆论如何？

据河野密氏的解剖，关于东北事件的日本舆论，约可分为二大派：其一为帝国主义论；其二为自由主义论。前者主张榨取满蒙，后者反是。帝国主义论又可重分为强硬论及稳健论。前者以军部的理论及森格、中野正纲、松纲洋右等私人的理论为代表；后者是以币原外交方针为中心的理论及一部分学者的理论。前者主张以武力保护并扩大满蒙的所谓特殊利权，故又称帝国主义的武断派；后者则欲以和平手段达到同样目的，故又称为帝国主义的文治派。但是二者的目标完全一致。自由主义的代表者，有长谷川如是闲等私人，主张偏重于经济的开发。

依据上述的分类，很难求出本论文所追求的分类，盖因何者为无产阶级的主张，何者为资产阶级的主张，很难下个界线。但据我个人的观察，日本无产阶级或其代表者对于满蒙问题的舆论，可以归纳成二大派别：其一为国际主义的主张；其二为国民主义的主张。前者主张放弃日本一般之所谓“满蒙特殊权益”；后者主张保护该种权益，为达此目的，甚至主张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据我个人所知，前者应以“普罗科学”派的主张为代表，而劳农大众党的主张也属于此派。

日本《普罗科学》杂志 10 月号所载《怎样观察对满侵略战争？》的剖述，完全否认日本此次武力侵略的合理性。该论文否认日方关于东北事件所宣传的所谓真相说：“但是，日军所攻击的对象，不仅只是犯有暴行的（实际是否如

此,尚待证明)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而已,与之全无关系的驻守沈阳城内的军队(距北大营约6英里),也遭受炮击,更可惊的是:距事件发生地遥远的长春(距沈阳北90英里),安东(距奉天东南百七十英里)各地,几乎和沈阳同时突被袭击;出其不意,中国军队完全被解除武装。……”(见《青年与社会》第二期《日本劳动大众对满洲事件的态度》)。该文继续阐明该事件发生的真因,其结论就是“坚决反对对满侵略战争!”又The Trans-Pacific 载曰:The Farm, Labour Masses Party, which is the other leading Proletarian Party; is more communistically inclined and demands that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Manchuria in favor of China. 劳农大众党之反对日本主张“在满特殊权益”,是无疑义的。

与此相反,主张保护日本“在满特殊权益”的日本无产阶级代言者,第一可以举社会民众党,而《东洋经济新报》派的论者——即上引河野氏所谓“帝国主义的文治派”——也可归入此类。社会民众党对于东北事件虽极注意,曾派专员至满蒙视察实情,但其所得的结论是保护该地的日本特殊权益。该党的书记长(General Secretary)赤松克磨(Mr. Akamatsu, Katsumaro),尤其风头出得十足,在Trans-Pacific 发表根本意见,保护满蒙的特殊权益。他开口便说:“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urging the workers of the world to unit in a common cause ……”其次大发其主张,兹节译一节于下:



“日本的经济情形是特别的,而其国家正在企图改进本国劳工的生活状况。日本在满的权利正是日本经济生命的主要部分(vital part)。因此之故,在此范围内,日本应受正当的保护。我们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将来国际主义理想的基石。一旦社会民众党当权——相信可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劳动政府必将保护日本在满的权利,如英国劳动政府保护英国在华的利益。”

赤松氏还在《东亚》发表专论《满蒙问题与日本无产阶级》,剖述尤其详尽,此项拟在后面设专节加以批判,故从略。

此外,《东洋经济新报》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武断派的侵略论据(1)满蒙是日本经济上的生命线;(2)满蒙是日本国防上的必要地带;(3)满蒙是日本对赤俄的缓冲地带,加以反驳。其言曰:“……例如彼等因日本人口多,土地狭而主张求寻出口于中国大陆。但是人口问题不能因领土之扩大而得解决……彼等又移转论锋。日本缺欠煤铁等原料,故确保满蒙为供给地,是国民经济不可准备的准备。此点仍与过去的事实相反。满洲并未赋予日本以原料供给的便利。即假令右说为合理,也无伸张我国政治权力至满蒙的必要,只以和平经济关系即可达此目的。第三,尚有论者说道:无满蒙则我国国防危。……但此无异英国为保全国防而主张在对岸的欧洲大陆占有领土。作者不能相信此说”

(见《东洋经济新报》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如何》)。

此派虽反对武断派的武力行动,但不反对特殊权益的保护,故有“帝国主义的文治派”之称(河野密之言)。

上面二大派别的言论,只介绍个大概,详细之点俟后面批判时,再来详加援引。

我们介绍日本无产阶级对于满蒙问题的二大言论之后,我们已可以进入本论,来检讨东北事件与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关系。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即已经过一度的社会革命。现阶级的社会革命与当时的社会革命,性质上虽有不同之点,但其转变的契机,则无异处,并且认为同类变革,比较容易推进我们的理论。前度的社会革命,在此意义上,实有略加剖述的必要。

### 三、明治维新的社会革命

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革命,是东方近世著名史实之一。但此著名史实的发动,并不是凭空掉下的;实在有它发生的原因及其演进的历程。而此发生原因及演进历程,给予我们讨论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示范。因此,要讨论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问题的我们,且先来考察明治维新的社会革命。

日本的封建社会继续至德川时代,社会内部即已发生种种的矛盾和颓状,而孕育新社会的种子。大凡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土地是主要的生产手段,而农民是唯一的生产

阶级。在农民阶级之上,有特权阶级施政统治生产者的农民阶级。日本当时构成这种特权阶级的,就是所谓“武士阶级”。日本的武士阶级,在整个封建时期之中,虽然处于统治者,支配者的地位,但至德川时代,武士的本质业已发生了变化,即和镰仓时代的武士已大异其趣。他们离开了土地,堕入不生产的阶级,完全仰养于农民阶级。并且,一般的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奢侈日益增大,而国费日益增加,收支终陷于不能适合的状态,幕府和各藩皆陷于财政的困难。统治阶级为欲挽救此种困难,自然根据从来的治农政策,即“在农民不生不死的程度徵税主义”,对唯一生产者的农民阶级,实行苛敛诛求。农民不堪重负,连袂相率而入都市,或于乡下改营小商业,于是封建社会倚为柱石的农业经济日就衰落,封建社会乃不得步入崩溃的行程。他方面,商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勃兴起来,货币也渐通行,都市日渐发达,而从来被鄙视的“町人阶级”一日千里地抬头。简言之,货币经济和商业资本,成了新兴的经济势力。

经济上既然发生了变化,建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构造,自然也非随之变化不可。自经济变化之后,从来仰养于农民的武士阶级,终不能不屈服于新经济势力之前,仰养于新兴阶级的町人阶级,或自己町人化,潜入町人阶级之中。反之,町人阶级则利用其雄厚的财力,握住社会的实权,挤武士阶级的势力出于农村,而自己取其支配地位而代之。此时,统治权也因当时的财政之仰赖町人阶级而为所操纵。这种趋势,再重以“黑船”来袭,日本封建社会的颓

势一旦和新兴的欧美资本主义晤面，欲保住社会不变革，势在不可能。果然，经过多少波折之后，经济组织改变了，政治制度维新了，社会革命乃极自然地完成了。

我们且来考究日本封建社会崩坏而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原因，以为后面讨论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张本。根据上面所述，可以约略领会日本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在于武士阶级的腐败，但是客观的条件仍应归结于当时封建制度的熟烂化而丧失了效用。具体地列举起来，可得下列各条：

(一)当时封建制度下的经济组织，已不能与发达至相当程度的生产力适应，因而封建制度丧失了本身的机能；

(二)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极端腐败，丧失了支配者的能力，因而社会上发生紊乱的情状；

(三)已无能力化的武士阶级，且又穷奢极侈，浪费一国的财富，而全国愈陷于穷状；

(四)武士阶级为保持他们的奢侈生活，乃对当时唯一生产阶级的农民，实行暴敛诛求，而一国生产力的泉源，臻于涸竭；

(五)他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胚胎，已在封建社会的腹内，逐渐生长起来。

德川时代的日本封建社会，因其内部具备上列各项客

观条件，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生命，乃终至破壳而出。这是极其自然的演进。

不过，在此演进的行程中，日本资本主义的生长曾经经历过一度的遏制，和相当的挣扎，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日本资本主义在德川时代的初期即已种下胚胎，倘得调顺的发育，它必定早在明治维新以前，突破封建社会的皮壳无疑。不幸，德川三代将军，家光，鉴于欧美势力之东渐，诚恐本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势受到影响，毅然在 1639 年宣布“锁国令”，严禁日本国民与任何国人交往。此锁国时代继续 215 年之久。日本资本主义的生长，即因遏制于此锁国情状而中途停止。直至 1853 年“黑船”来袭，日本的锁国状态始为美国百里提督所击破，而被遏制 200 多年的日本资本主义，乃得破壳的机会。

其次，日本资本主义在其生长的过程中，曾经经过相当的挣扎。在其初期表现出来的形态，是打倒德川幕府，打破现状的企图。而此企图当时又分成二大派别：其一是复古派，其二是进步派。否定现状虽为二者所共同，但前者憧憬王朝的古代，后者则欢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二派在倒幕的过程中斗争的结果，终归进步派占了胜利，德川幕府崩溃后之所谓明治维新的大业，皆成于进步派之手。这样，明治维新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同时又是一个带着社会革命性质的资本主义革命。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一事：各派社会运动斗争的结果，日本社会不返于复古，而趋于维新，并不是进步派对复古派的胜利，而实是时势的归趋

使然的。盖因当时，需要资本主义革命的各种社会情形，已在国内外成熟至相当的程度。时势的潮流到底是不可遏制的！

#### 四、另一社会革命的前夜

日本自从经过明治维新的资本主义革命以后，经济组织由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转变为自由的交换经济，在封建时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到此时乃变成助长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完成了最近 60 多年日本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但是历史是前进的，历史的演进是依据“相反而成”的形态的。它循着“由肯定而否定，复由否定而肯定”的无穷的途径往前猛进。因此，明治维新以来，被肯定的日本经济组织，到了现在已经步入被否定的线段，无穷进步的历史又在示意：日本又应从新重建一个肯定的经济组织了。换一句话说，明治维新以后；由封建经济改造过来的新生产关系，虽然在此五六十年间与生产力适应，帮助生产力发展下来，但至现在因为生产力无限发展的结果，这种生产关系又与生产力发生桎梏了，不但不能如日本资本主义初期之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反成了桎梏。日本现阶段又在需要一个新的经济组织。这个新的经济组织，将如德川封建社会之转变为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由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且其转变过程中，也将如当时之经过一个社会革命

一样,再度经过一个新阶段的社会革命。简单一句话,日本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又处在另一社会革命的前夜。

且先自经济方面加以考察。指示日本资本主义现阶段经济兴衰的指标,莫如输出工业制品数量的增减。此项数量增减线状,已在拙作《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第一节《日本经济的衰落》详细解剖过,这里只述其结论:明治二二~二六年代,日本每年平均输出工业制品,占全部输出品25.4%,与明治初年之7.8%相较,增加17.6%;再至三二~三六年代又增至33.0%,就经过年数的比例言,增加率约与上期相等;但此急激增加之势,至明治四二~大正二年代,即已呈现停顿的征象。尤其是明治四二年与大正二年相较,不但没有增加,倒反减少了。经过欧战中幸运时期后,日本经济的衰落一直步着低落的线状,现在正尝着1930年恐慌后的辛辣滋味。

不但工业经济如此,农业经济尤其呈现一种可怜的状况。日本耕地面积指数,自1921年以后,竟会绝对减少了,由1921年的100减至1926年的98.5;同时,日本主要谷产米麦的单位产量,也自1921年以后,年益减少,由1916~1920年代之每反步实数1,884日石,减至1926年之1,809日石。简单一句话,近年日本农业经济的质和量,皆有退步,这种情形经过1930年恐慌后,尤其显著(关于日本经济衰落详情,请参阅本专号所载拙作《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他方面,农村及都市的劳动力日形过剩,失业的问题威胁着日本的现社会;各种物价日益低落,1930年

后的低落率自 40%至 60%不等，此项使一般的企业家破产的破产，停业的停业，结果只有一个整个产业界的不振。

但是这种情状并不是日本经济此后的发展绝对不可能的意思，它只是世界资本主义没落的一连锁而已，只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现阶段，才没有发展的可能性。

充当社会构造基础的经济组织，既然丧失了机能，建筑在其上面的政治层，自然不会出于例外。明治初期——甚至德川末年——日本全以国家的权力培养幼稚的工商业：把国营企业无偿地赠送给资本家；运用关税政策保护幼稚的粗工业；利用产业补助金办法，奖励并培植资本家的企业等等。诚然，当时这种利用政治权力于产业上的 Paternalism，获得了相当的效果，资本主义的基础一日千里地扩大而坚固。但是这种政策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又如当时的官僚政府之集中全力于“富国强兵”，努力于巩固日本国家的基础，也莫不采用以所谓“指导诱掖”为基调的政治的 Paternalism。诚然，当时这种政策果将分裂的衰萎的日本，造成了军国主义的日本，现在列入世界三大强国的日本，但在现在这个处方又已不灵验了。目下日本总岁出预算约 50%的海陆军费及有直接关系的各费（据 1 月 20 日《东京朝日新闻》），现在已成了重压日本国民，使不能翻身的负担，已不复能振刷日本军国主义的威风了。日本国家对于资本的蓄积直接间接保护的各种费用及高抬的关税政策，现在不但不能培植日本产业完成更进一步的发展，倒反增加无产大众的穷化程度，助长资本家的奢侈生



活,简单一句话,日本政治上的 Paternalism(保育主义),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本来的效用和机能了,而只适足增高现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柄凿的程度。

同时,在日本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内部,业已种下他种社会的胚胎,经济运行的法则并未完全依据资本主义经济为根本法则,自由竞争。独占资本的势力,已经支配了日本现在经济界的全局。政治上也然。真正民主政治的理想,固然压根儿就未在日本政治上实现过,而时至现在,财阀的权力更加支配了整个的日本政权,官僚只是他们的傀儡罢了。他方面,日本社会上,憧憬着未来社会的新意识,也已相当普遍;受到这种新意识所薰染,及为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所驱使而潜行着的新势力,也已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相当的地位了。

总而言之,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及在其腹内孕育着的新雏形,已把日本资本主义推到另一社会革命的前夜了。日本现在的统治阶级虽在战慄着,但是下列的事实依然陈列在我们的眼前。若依照上节所列举日本封建社会崩溃原因的样本,把现在日本资本主义将要崩溃的事相列举之,可得如下:

(一)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组织,已不能与发达至相当程度的生产力适应,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本身的机能;

(二)统治阶级的资本家阶级极端腐败,丧失

了支配者的能力，因而社会上发生紊乱的情状；

(三)已无能力化的资本家阶级，且又穷奢极侈浪费一国的财富，而全国愈陷于穷状；

(四)资本家阶级为保持他们的奢侈生活，乃对于现在唯一生产阶级的农工，实行直接间接的暴敛诛求，而一国生产力的泉源，臻于涸竭；

(五)他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胚胎，已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腹内，逐渐生长起来。

## 五、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

马氏在其《经济学批判》的序文中，把历史演进的法则，指示给我们：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实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整个生活行程。……”

“然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其发达的某一阶段，必与现存的生产事情互相矛盾。……即由此生产力发达形式的事实，一变而成生产力的障碍物。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

“某一社会形态，非至其内部所包容的一切生产力充分发达之后，决不会灭亡。更进步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非决定此种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既在旧社会之翼下孵化着不可。……更精密地考察看，

凡问题之发生必由于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既已存在，至少也已在发生着，可以想见。”

若将此公式应用在日本社会的现阶段，则“日本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已与现存的生产事情互相矛盾了”。“其生产发达形式的事实，早已一变而成生产力的障碍物了。”因此，“日本社会革命的时期”必定开始无疑。又据上节的剖述，“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既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之翼下孵化着，”所以“更进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可以说是决定之数。再自一般所常引证的所谓“日本资源之涸竭”而论，“日本社会内部所包含的一切生产力业已充分发达了，所以日本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必定灭亡。”

发展至现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必定灭亡，而只具躯壳的日本现社会，必定向更进步的社会主义转变，这虽是历史的过程，但谁来完成这种“历史的使命”？自然，非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者不可。在明治革命时代，布尔乔亚派新兴阶级，完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使命。同样，现在日本的普鲁列大利亚新兴阶级，也非完成日本现阶段的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不可。事实上，日本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已随日本经济情形之转变，而着着发展下来了。

日本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产生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内，并且随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烂熟而生长。所以，欲理解日本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应先理解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生长及烂熟的过程。日本资本主义受孕

于德川封建时代,出生于明治初年。因为它的出生时代,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已步入壮年时期,所以不得环境推动,在最短期间完成了长足的进步,经过中日战至日俄战期间的充分生长,即呈现衰老的朕兆。大正初年,幸得欧洲大战的庇佑,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登峰造极。但是登峰造极反面的意义,就是不复再有更高的发展。所以,欧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大起恐慌,病症几乎入于膏肓,虽经政友会内阁“膨胀政策”的兴奋药针,结果也只不过加重了民政党内阁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病症的危险程度罢了。

日本资本主义的生长过程如上所述,而日本无产群众的社会运动又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生长,互为表里。正如日本资本主义之受胎于封建社会一样,日本无产群众的社会运动,也受胎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可以申论说:日本资本主义烂熟之日,即日本无产群众社会运动勃兴之时。所以日俄战后的劳动争议及无产者的团体,即有急激的增加;而在欧战后的大正七八年顷,日本无产群众的社会运动转换了一个新形势:一方面,日本劳动组合的运动异常勃兴;他方面,无产群众渐觉醒于自己的地位和利害关系,而阶级的意识逐渐普遍化。他们的斗争渐由经济的,转向政治的了。其后,公开的无产政党的政治斗争和非公开的共产党潜行斗争,乃有可观的成绩。

日本无产政党的公开政治斗争和日本共产党的潜行斗争二者之间,不无多少差异之点;但其由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欲以政治手段达到日本无产者的建设,企图完

成历史的使命,却是二者共通之处。于此,他们的政纲和策略,乃成我们检点的对象。日本共产党所采用的手段,是非合法的,潜行的,所以他们的政纲和策略,我们外行人无从知道;但若公开的,合法的无产政党的政纲和策略,就有详载的文献可据。且先就最近日本无产政党的政纲和策略加以考察,以窥见日本无产群众社会运动所向的一斑。

日本无产政党的政纲和策略,随其各党各派的差别而有多少条文的不同;处在发展时期的日本无产政党且常变化分合,数月间即有几次分裂与合并。但因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相同,策略上自然也无多大的出入。现在根据去年12月号本刊所载拙作《日本无产政党的研究(下)》,摘录一二为代表,以供我们讨论的根据:

### 劳农党的纲领(1929年11月1日)

(一)我党为拥护伸张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日常利益而战;

(二)我党以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的扩大强化为重要任务;

(三)我党希望无产阶级战线的统一;

(四)我党为全体被压迫民众之获得政治自由而斗争;

日本无产群众为要达到上列的目的所采用的策略又如下列(录自上引拙作,但删去无大关系者):

## 日本大众党的政策

### (一)政治方面

- 1、普通选举的彻底实行；
- 2、压抑无产阶级运动诸法令的改废；
- 3、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 4、缩小军备……
- 5、把民众军阀主义化的一切政策……一概排除；
- 7、撤废殖民地的政治差别；
- 8、打破秘密外交；
- 10、由国库支付无产者诉讼费……

### (二)财政方面

- 1、财产税的创设，所得税及承继税的高率累进赋课；
- 2、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关税及其他民众负担，一概撤废；

### (三)经济方面

- 1、团结权、罢业权的确立；
- 2、禁止立入，禁止假处分及立毛抵押，制定以确立耕种权为基调的佃种法；
- 10、存款部资金运用的民众化，……其他无产阶级的金融制度的确立；
- 12、重要粮食的价格公定制度的确立；

**劳农党又有下列二条特别规定：**

34、确定学生、生徒的研究自由及校内自治权；

45、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此外，大多数日本无产政党尚有“对支干涉绝对反对”的明文规定。

以上所列的纲领及策略，可以归纳成下列三项要旨：

(一)否定现状，企图打破现状；

(二)努力于剥削资本家阶级的权益，扩大无产阶级的权益；

(三)反对帝国主义型的发展。

## 六、布尔乔亚的解救策

日本的无产阶级社会运动家，看透日本经济的没落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机能的退化。诚然，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里，刺激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是营利。所以在营利比率日渐低落的日本经济界，百业皆呈现不振之状，甚至如农业经济上，竟会耕地面积绝对减少，单位产量绝对减低。救济的根本方法就是以有效的制度代替无效的制度。因此，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纲领的第一要点，就是否定现状，第二要点就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权益。

然而否定现状就是打倒现在支配阶级的资本家地主阶级，扩大无产阶级的权益就是消灭有产阶级权益的第一

步。日本资本家地主阶级，站在他们自私的立场上，自然不能容受，自然背道而驰。所以，一切日本有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严格地加以考察，皆与日本无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形成正反。

然而，日本有产政党各党各派的纲领及政策，与日本无产政党的纲领和政策之大体相同者迥异。有产政党各党各派，或因政权的争夺战，或因缓和无产阶级的反抗，以保持有产阶级的现实支配，所以难免在他们的纲领和政策上，掺杂多少欺骗的成分，因而发生策略上巨大的差异。但若考察各党共通的要点，则又非出于偶然。实有根本的精神在焉。日本有产政党各党共通的要点，大体上可以举出下列各项：

- (一)维护现存的经济制度；
- (二)标榜超阶级的或全阶级的利益的代表；
- (三)采用社会政策；
- (四)保护在华既得权益。

日本现存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下的支配者及统治者，是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日本一切的有产政党，皆直接间接受到资本家地主阶级的支持——否，无宁说是受到资本家及地主阶级的指挥，以代他们执行统治权。一切的有产政党的纲领及政策的第一要义，先举“维护现存的经济制度”，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又，有产政党所代表的是支配阶级，统治阶级。支配阶级及统治阶级的反面，就是被支配阶级及被统治阶级。由



兼备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有产阶级,统治并支配着兼被支配阶级兼被统治阶级的无产群众。这种情势实质上,确是阶级的对立,阶级利害关系相反的对立。但若将此阶级对立的情势,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有产阶级立即发生危险。所以,他们的纲领和政策的第二要义,标榜超阶级或全阶级的利益,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日本一切的有产政党,虽然皆以维护现存的经济制度,标榜超阶级的或全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为基本纲领,而各种社会事实却往往否定它们。日本有产政党尽管维护现存的经济制度,而现存的经济制度偏不作脸,处处暴露出它的缺陷来。日本有产政党尽管标榜超阶级的,或全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而实际的情形却往往是阶级利害的相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对立,在日本资本主义没落的现阶段,社会情势尤其是如此。这种情势虽说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然的,且为保全有产阶级的利益更不得不然,但若这种社会缺陷和欺骗一任其暴露而无所蒙蔽,统治阶级马上会被污损了威风,而影响其基础的动摇。于是,采用社会政策,以在缺陷及欺骗上蒙盖一层薄膜。有产政党之施行社会政策,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然而薄膜究竟盖不过赤焰焰的光辉,欺骗的社会政策结果无补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日本一切的有产政党虽皆标榜社会政策之采用,并且实际上一直施行下来该种政策,但是结果仍不能为农村都市的数百万失业群众找出工作,数千百万的无产大众的生活,不但无改善的希望,倒反日

益危殆,进入没落第三期的日本经济的衰落,毫无打出一条出路的曙光,而只随着世界经济恐慌的尖锐化而物价愈益暴跌,各种企业愈陷于不振,耕地面积愈益缩小,单位产量愈益减少,失业群众的数目愈益增大。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可谓达到危急的年头了!

此时,日本有产政党要救济这种危机,使临危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苟延,站在兼支配者及统治者的有产阶级的立场,本有二种方法。其一,就是不顾大多数民众的生死,索性采用保护培育资本家企业的政策,以造成假的良好市况。其二,就是侵略他国的领土,侵夺他国的利权,以其所得弥补本国的缺陷,简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型的发展。不过,第一法之保护并培植资本家的企业,实质上就是巨大费用的转嫁和一般无产群众的剥削。这种方策,各用于资本主义初期,实甚合宜,但施之于日本资本主义末期的现阶段,则未免“倒行逆施”。此时,日本资本主义越发施行这种策略,越为它本身挖坟墓。欧战后,政友会内阁施行膨胀政策之无效,可以证明。

此外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型的发展了!保护并培植资本家企业的方法,是对危病者打兴奋药针,充其量也不过发生兴奋作用而已,甚至是“饮鸩止渴”的方法。而帝国主义型的发展,却实在有延长残喘的效用。于此,日本一切有产政党的政纲之列“保护在华既得权益”为其要点之一,我们不难寻出理由来。惟是,日本保护,或扩大在华既得权益,实与日本资本主义存立的绝续,有密切的关

系,同时和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成败,也有极重要的因果关系。

## 七、东北事件与日本资本主义

我们且转回头来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何以衰落?”的问题,略加探究。若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前提,则可列出四种要因(详论,请参阅本专号拙作《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

- 1、生产原料的缺乏;
- 2、商品市场的狭隘;
- 3、投资市场的狭小;
- 4、粮食问题的尖锐化。

本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重心是营利经济;刺激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自然是利益。企业家为追求利润而经营企业;股份资本家为得红利而购买股票;金融资本家为得利息而购买公债及公司债并建设银行;……总括一句话,莫不在于追求利益。利益率大的产业,一般人争趋经营;利益率小的产业必定萎靡,甚至灭迹。但要企业的利益率大,至少要具备(1)生产原料丰富;(2)商品市场广大,二大要素。若生产原料缺乏,生产费必定格外增大;若商品市场狭隘,商品价格必定跌落。二者夹攻,即使不至利益全无的程度,但自以追求利益为目的资本家而言,利益率减至某程度,该种企业终须停顿,或缩小范围。所谓不景气,经济恐慌,市场紊乱,经济衰落等等,就发生在这时候。其结

果,也就是投资市场的狭隘化。日本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情状,现在正尝着这种辛辣滋味。因此,日本倘仍欲以资本主义的立场打开这个难关,第一必须寻觅生产原料供给地,第二必须开拓商品市场,第三必须扩大投资市场。

日本企业界利益率的低落,并且影响到日本全国国民的粮食问题。农业投资的不合算,促使日本农业资本家或地主,不肯开垦新耕地,或增投资本作更集约的耕种。其结果,日本耕地面积不但没有增大,倒反缩小;谷物的单位产量不但没有增多,倒反减少——但对于现在日本耕地面积600多万町步,未垦的可耕地面积尚有165万町步,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他方面,日本人口却以急速的比率繁殖下来。欲其不闹粮食问题,似乎不可能。于是,日本的帝国主义型的发展,又增加一种理由。

日本既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又迫于上述各种经济贫困的威胁,日本资本家地主的统治权执行者的在朝官僚,自然急于向外发展。这种向外的的发展,本自日本开国以来,即成了以“富国强兵”为基据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但在日俄战前,此种发展尚非经济上的必要;经日俄战争后——尤其是欧战后,这种必要始具确实的内容。

然而日本的帝国主义发展,往何方前进?诱于天然富源及贱价的人工,牵于国际情势及地理的关系等等,没落线上的日本积极经营中国大陆,是必然的行程。故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即先以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挑发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又继之。占得台湾及朝鲜各地,犹不知足。及

至今日,受到世界恐慌及其内部缺陷的夹攻,再加以日本在华的经济活动,若一任自由,则日本必败的示意,日本遂焦急于把在华的势力范围,完全殖民地化。

日本在华的主要势力范围,是东三省。东三省经济价值之大,又冠于中国全部。东三省的面积约3倍于日本内地,而人口反不及日本内地二分之一,人口的包容力尚有三四千万人之谱。土地多肥沃可耕,气候又相宜,即现在的农产量每年就约近2,000万吨,除去自用尚有600万吨左右的剩余。生产资源有铁和煤,有各种的金矿,有天然的森林,有肥料原料的大豆,有棉织业原料的棉花,有毛织业原料的羊毛。主要农产的水稻与小米,可以直接间接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每年64,700多万海关两的贸易能力,可以销纳日本的工业制品。过去日本对华投资占对外投资81%,对东省投资又占对华投资72%强。现在尚有广大的企业场面,可以充当日本的投资市场。具备这些条件的东三省的经营,足以弥缝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的缺陷于一时。因此,日本早即握住东三省的经济实权不放。近年,复因世界恐慌一环的本国恐慌加重,及英美等国向东三省之进出,遂更觉手忙脚乱,恨不能把东三省活剥生吞下去。而有计划的,强夺的东北事件,遂发生于本年9月18日晚。

然若日本果能把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独占东三省的一切,则于日本全国前途,将有何种影响?“日本吞并东三省,无异吞炸弹”的情势,姑置不论,但若日本果能以东三省独占者的权力积极经营东三省,现在正在日本资本主义

面前示威的上列四项问题，总可以得到多少程度的解决，而现已病入膏肓的日本资本主义，可以减去几分的危险性。东三省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续命汤”！事实的确如此！此次日本在东三省的暴行政策成功之日，就是日本资本家，地主及其政权执行者“弹冠相庆”之时！步入没落第三期的日本资本主义，或将得到暂时的“安定”。但是此种安定，必然地影响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退却。日本资本家地主及其政权执行者“弹冠相庆”之日，也即是日本无产群众“抱头大哭”之时！日本无产群众的聪明领导者，当不至昧于这个明确的归宿吧！

## 八、赤松克磨氏的错觉

然则，日本无产群众及其运动的领导者，对于此次东北事件的态度如何？本文第二节，业已述过，日本无产群众及其代表者对于东北事件的主张，约可分为二种：其一主张放弃日本在满特殊权益！其二与此相反，坚持拥护日本在满特殊权益。本节批判对象的赤松氏的主张，属于第二种的拥护论。

赤松氏素来即以日本社会运动家著名，并且是说过“国际主义的理想是可称赞的……”（The ideal of internationalism is landable……见 The Trans-Pacific）的社会主义者。他这次以社会民众党书记长的身份，向日本无产群众表示关于东北事件的态度，并且在各杂志发表专论，自然

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现在愿以最冷静,最公平的态度,来领教这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日本无产群众忠实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论。

赤松氏在 The Trans-Pacific 周刊里发表的主张,已在本文第二节介绍过,其要点就是“……日本在满的权利正是日本经济生命的主要部分。因此之故,在此范围内,日本应受正当的保护。……”他还在 11 月号《东亚》杂志上,发表本问题的专论《满洲问题与日本无产阶级》,兹介绍其要点如下。他先确定“各国的经济情况不同,所以各国的无产阶级皆站在国民经济的立场上,进行他们各自的斗争”的大前提,然后申论如下:

“日本无产阶级非先于日本国民经济机构中求得自己生存权的确立不可。现在,欲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上确保日本无产阶级生存权之无望已暂明确化。在此现状之下,企图国民经济机构之社会主义化,是极当然的路径。但欲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本国民经济,则此建设非能允许日本大众生活上进者不可。社会主义日本,若资本家地主榨取阶级灭亡后,大众生活水准依然低下,则不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但要贫富的悬隔绝灭,尚须大家的生活水准上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本国民经济应具备的条件,第一,最大条件之一就是生产资源的确

保。资源薄弱的日本本土的经济机构，即使社会主义化，也不能藉此充分提高日本大众的生活。于此，满蒙资源正如资本主义日本所必要者一样，对于社会主义日本也是必要的。……满蒙的权益即为日本大众生存权所必要者，则不问其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与否，无论如何可以主张确保的正当性。可以说：一民族为着确立自己的生存权而拥有一定量的必要资源的权利。”

赤松氏上列各点主张，可以归纳为下列二要点：

第一，满蒙是日本经济生存上绝对必要的因素；

第二，日本拥护日本在满蒙的利权，则日本大众的生活可以上进。

赤松氏第一见解的论据，在于日本经济的衰落由于日本“资源的薄弱”。此种“资源薄弱的日本本土的经济机构，即使社会主义化，也不能借此充分提高大众的生活”。所以，具备丰富天然资源的满蒙，乃成了日本国民生存上必争的地带。

然而赤松氏未免太过于信仰“资源决定说”。资源之决定经济的兴衰，是有“极限”的，不是可以漫无限制的适用。其实，资源常随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化。且举燃料来说吧！产业革命以前的燃料皆用木材。当蒸汽机关乍发明而使用之的初期，一般人莫不忧虑燃料的缺乏。但是后来却发见了煤来代替。其后又发见瓦斯，石油，



电力接踵而来,以后科学愈益发达更当无穷尽。又如由石器而铜器而铁器;由人力而蒸汽力,而电力;又由最近织物界之由真丝而人造丝,等等,莫不是资源随生产技术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实例。再就日本明治维新革命说吧!维新前正当日本封建社会发生破绽的时期,日本经济界未尝不苦于生产资源的缺欠,但经明治维新的社会革命而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一变之后,资源缺欠的缺点马上消灭而完成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进步。同样,日本资本主义发达至现阶段,生产关系上已经发生了障碍,所以觉有资源不足的缺陷。但若聪明的日本社会改造家能注意及于此点,先把拘束生产力发展的现在生产关系改造过来,把日本大众的种种重负,由资本家地主的奢侈方面,移于生产方面,则科学可以更加实用化,生产技术可以进步;而发见新的资源,并非不可期待的。即就现有的资源而言,并非完全用尽,而实只限于“利益率小”致使不能开辟利用罢了。不然,现在日本未耕地尚有 16,000 多万町步放置不开垦,既耕地面积且日益缩小,而他方面却大唱“日本土地饥荒”以为侵外的论据,必定探求不出正当的解释。(关于本段的详细讨论,请参阅拙作《日本果非侵外则不能存立吗?》)。

复次,再就赤松氏的第二见解,“日本占得满蒙,则日本大众的生活可以上进”,略加批判。赤松氏对于日本无产大众,许下一个大愿:“一旦社会民众党当权——相信可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劳动政府必将保护日本在满的权利,如英国劳动政府保护英国在华的利益。”(见 The

Trans-Pacific)。因为他相信日本苟能保住其在满蒙的权益,则日本无产大众的生活可以上进。然而赤松氏这种确信,只是一种幻想,它的误谬比第一见解尤甚。

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组织,是以支配阶级的资本家地主为重心的。其社会的荣辱消长,均以这个支配阶级的荣辱消长为转移。因此,不但资本家地主们希望施行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即他们的统治权执行者的政客官僚,也秉承主人的意旨,施行同种的政策。资本家地主阶级统治权的执行者,往往板着面孔,似乎大公无私地标榜“一国的产业无论如何,国家应极力讲究政策加以保护”的意旨,而不问产业权握在那一种人手里,及施行保护政策之后对于民众会发生何种损害。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日本资本家地主的统治权执行者,处在外部的世界恐慌及内部的资源缺乏两重铁板夹攻之下,应用这个原理尤其“惟妙惟肖”。因此,即使侵占了他国的领土,横夺了他国的权益,依然无益于日本的无产群众。不信,且看过去的实例。日本无产大众负担巨大的军事费及军事公债(据猪侯津南雄《帝国主义财政的危机》,1923年日本国民的军费负担额占国民所得8.1%——间接负担尚不在内,日俄战至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事公债占国债总额80%至60%),侵占了台湾及朝鲜等殖民地,但其结果,也只落得称为殖产公债的资本家培植公债,称为拓殖事业公债的殖民地公债,及称为金融调整公债的资本家救济公债,等等的增发无己(详见《帝国主义财政的危机》)。例如就台湾殖民地,不但一切的企

业权及各种利益落入三井、三菱、铃木等大财阀手里，甚且到他们的企业失败时，日本民众还要负担救济的责任，救济铃木商店，调整台湾银行的舆论骚扰，无产大众的脑中，当然残留着深刻的印象。日本扩大殖民地对于日本无产群众的利益，充其量也不过多造几十万“乡下皇帝”——各殖民地的警察，及资本家大嚼时由口角落下的“食屑”。

日本经营殖民地尚有一个主要的效用，就是延长日本资本主义的寿命。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因为本国资源的缺乏早即呈现衰状而孕育社会主义经济的种子。但是后来侥幸得台湾朝鲜等殖民地经营的缓冲，延长了 30 多年的寿命以至于今。日本现在虽处在世界经济恐慌的漩涡中，但能独占满蒙为其殖民地，其可再度苟延残喘，是无可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喘苟延一日，日本资本家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巩固一日。我实在怀疑赤松氏所标榜的增高日本无产大众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将由那一点出发。社会民众党——赤松氏就是该党的书记长——的政纲，究将如何实现出来？日本拥护在满的权益则日本大众的生活可以上进的话，不知究何所指而云然！

论赤松氏的聪明，应该不至昧于上述客观的当然归宿，即使无暇顾及空虚的“正义”和“公理”，对于这种明若观火的客观归宿，也当不至昏聩至此。并且，社会民众党的政策中，曾列“对支干涉绝对反对”的明文，我们更加怀疑。然若赤松氏“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就无厚责的必要了。赤松先生！君之真意因怕“资本主义日本拥护满蒙权益时，中国必

视为‘帝国主义政策’，日本将蒙此宣传的不利”，而假借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护身符，是不是？！

## 九、日本无产群众应有的觉悟

然而赤松氏的主张，究竟没有帝国主义武断派代表论者松冈氏的爽直。松冈氏主张拥护日本在满的权益的论据有三：其一，满蒙是日本经济上的生命线；其二，满蒙是日本国防上的必要地带；其三，满蒙是日本对苏俄的缓冲地带。实则，此三项论据骨子里的意思如下所列，上面只是客气一点的说法罢了：

（一）满蒙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生命线；

（二）满蒙是日本侵外的必要地带；

（三）满蒙是日本进攻苏俄的预备地带。

1930年以后的世界大恐慌，促使日本资本主义欧战后经济衰落愈益尖锐化。他方面，日本的工农无产群众的社会运动，愈益革命化。同时，英美各国又着着向满蒙方面进出。这些种内外的威胁，迫得在现阶段社会革命前战栗着的日本资本主义，不容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企图把半殖民地的满蒙，完全日本殖民地化。再者，本国天然资源缺乏而帝国主义的野心又无限大的日本，它的希望实非只限于满蒙，其“得陇望蜀”的野心，路人皆见。日本倘能侵占满蒙，则其进略山东、河北、内蒙古之特别区，实甚容易。所以说：满蒙是日本侵外的必要地带。归结起来，日本侵占满

蒙,不但可以延长日本资本主义的残喘,同时且可以增高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气焰。

但是,在日本延续其资本主义的残喘,维持其帝国主义的存在的内部,潜藏着一种不可蔑视的赤化势力。而苏俄又是此种赤化势力的推动机,企图延续资本主义命脉的日本,自然要进攻苏俄。满蒙又是进攻苏俄最便利而且必经的地带。欲战栗于现阶段社会革命之前的日本资本主义,不侵占满蒙,似乎有点不安心,而且不甘心。

上面所述,才是日本此次在东北暴行原因的正当解释。将来,借暴行侵占的结果——假定“无异吞炸弹”的侵略果然成功——也将如其原因所指示的,仅仅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续命汤而已。只就满蒙问题的前半段历史而论,我们也不难举例来证明。据帝国主义理论家松冈氏之言,“……我国因为日俄战争,牺牲了十万生灵,20亿国帑,以赌国家的存亡……”。又此次东北事件发生后的费用,只据《东亚》杂志4卷11号69页所载,即已费去138万日金元。但是所牺牲的生命和国帑,究竟是那一部分日本国民的生命和金钱?所得来的权益,又落在那一部分日本国民的手中?关于此层,日本《普罗科学》杂志替我们解答得非常透彻:

“……由中日,日俄二次大战获得的‘日本特殊权利’,明明白白地是牺牲劳动者,农民的血与肉换来的。用劳农的血肉换来的‘特殊权益’——关东洲租借地,大满铁,世界第二大煤矿等,都落

在资产阶级的掌握里，成为支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台柱，而反成为现在对日本的劳动者，农民实行压抑和榨取的原动力。所谓‘满蒙特殊权利’，果真的话，至少不在劳动者和农民的手中。”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满蒙的特殊权利’，决不是国民全体的”(据《青年与社会》第2期)。

既然“用劳农的血肉换来的‘特殊权利’，不但“都落在资产阶级的掌握里”，倒反成了“支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台柱，现在对于日本的劳动者，农民实行压抑和榨取”，那末，日本无产阶级何苦拥护日本在满的权益?! 自以日本无产阶级利益代表者自许的赤松先生，何苦极力主张日本在满权益的拥护论?!

回想日本封建制度的机能，早在德川初期即已退化，倘无德川三世家光之200多年的反动的锁国状况，日本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必定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成功了。又如德川末期，对于日本封建制度的革命势力分为“进步”与“复古”二派，斗争的结果终归进步派获得胜利。家光的锁国令只禁止200多年间日人与外国的交往，却阻止不了“时代的进化”。结果，只落得200多年封建颓势之延长吧了!“复古派”争执的结果，也只落得被撇在潮流之后的惨败!

现在，“日本在满的特殊权益”，可以譬之家光的锁国令；该种权益的拥护论者，可以譬之复古派。希望日本社会进步的日本名达！声言代表日本无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日

本社会主义者！何苦与进化的潮流逆行？何苦为无数的日本无产群众，造下一笔“大冤债”？

日本的无产群众！无产运动的领导者！你们不是在否认日本现状吗？你们不是在努力打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吗？“压抑榨取你们的日本阶级”，现在又为扩充“支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台柱”，而赋使你们来拥护非你们所有的“日本在满的特殊权益”。你们聪明的朋友说得好：“……然而，现在日本资产阶级，认为这是全体国民的事，强迫我们‘誓死保护’，甚至驱使我们于残酷的战争之中”（《普罗科学》杂志）。拥护或扩大日本在满的特殊权益，只能巩固“支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台柱”，只能削小日本现阶段社会革命的客观势力。请充分吟味下列一段话的意义吧！

“某一社会形态，非至其内部所包容的一切生产力充分发达之后，决不会灭亡。更进步的生产关系的出现，非决定此种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既在旧社会之翼下孵化着不可”（《经济学批判》序文）。

日本侵占东三省成功之日，即日本资本家地主阶级弹冠相庆之时；日本资本家地主阶级弹冠相庆之日，也即日本无产群众抱头大哭之时！

原载 1931 年 12 月《新东方》最近远东问题专号

## 一年来的日本

1937年是中国多难的年头,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多事的年头。在这一年中日本国内究竟发生了那些事件,演成了那些问题,这种事项的正确了解对于我们的全面抗战是很大的补益的。因此,应时事月报之征求,草写这篇论文。

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日本,是怎样一种形态?这一年日本的动态如何?这一点若概括地一句话说来,这一年的日本是法西斯日本更加急速上升的一年,并且可以说是“军事法西斯”实力发动的一年。为使事态特别明了起见,我们可以区分这一年为上半期及下半期两期。这两期的变化非常明显,若拿来和去年比较看,就有特别的趣味。1936年的日本,是上半年严重(二·二六事变)而下半年沉静,但是1937年却正相反,上半年比较沉静而下半年严重,终于进入了对我侵略战争的时期。若上半期可以称为文治期,那末下半期就是战争时期了,但是文治中已充分含蕴着军



治的性质,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军事性使然的。这一年的主要事变就是寺内——广田内阁的瓦解,宇垣组阁的流产,林内阁的夭折,二·二六事变以来各方所瞩目近卫内阁的成立,在近卫内阁成功了军、政、财合抱的情势下发动了对我的全面武力侵略,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摩擦和牵制等等就贯穿着这些事变而演继下来。经济也随着军事的发动由准战时体制步入战时体制,教育文化政策也带上战时的意味,和军事行动配合起来。

我们且先从政界的变化讲起。1937年的春间正是日本第七十回议会开会中,政党和军部冲突表面化到最高峰的时候。众议院议员滨田国松竟以70多岁高龄奋勇向陆相寺内肉搏,终于因为“……请查速记录,若余有侮辱军队的言语,余当割腹以谢君,否则君应割腹自杀”的酸辣,激动了寺内不可一世的雷霆之怒。于是寺内陆相要求广田首相解散议会,其理由是说政党送党员入阁但又反对政府,这是阻碍广田当时所负一致肃军与庶政一新的二大使命之行使的。这些议员是二·二六事变前选举的,不适于二·二六事变后的情势,故须解散重新选举能代表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总意的议员,赞助现内阁的二大使命。但是查检议会速记录的结果,不但政党方面没有侮辱军部的言语,倒反发现了很多军部侮辱政党的言语。这虽足以表现军阀的气焰,但一方面海陆相的态度却未能一致海相主张维持举国一致的现状。因为阁僚意见的不一致,于是广田断然地决定内阁总辞职,二·二六事变几经难产的广田内阁于

是寿终正寝了。

寺内广田内阁倒于政党与军部之冲突，于是为着调和政军而十数年来被视为“惑星”而潜居朝鲜多年的宇垣前总督，遂以军人政治家的声望而被推荐组织内阁。官僚、财界、政党乃至一般人民也都表示欢迎，只有军部不快意。军部拒不派送陆军大臣。照例陆海军部大臣是由军部选派的，而这次军部要人皆一致罢工不参加组阁。宇垣自己虽然可以兼任陆相，作个破题儿第一遭，但宇垣闭门考虑三天的结果，因为没有断然的勇气，终于奉还大命。集元老、重臣、财界、政党乃至舆论于一身的宇垣内阁也只因为军部的不赞成而流产。军部反宇垣组阁的原因，说来历史很长，据说是因为宇垣前在陆相任内签订军缩条约，和裁减了陆军二师团，军部就认他为叛徒。这是的确的，宇垣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是和政党有密切来往的军人政治家。以军人政治家的宇垣终因被认为军部的叛徒而被拒绝，可见日本政党政治之如何没落，军事性质之如何浓厚与上升动向。广田内阁的总辞职并不是因滨田国松的一席严酷批判，而因由军之内部自己不调和的原故。

继宇垣之后出而试为组阁的就是林銑十郎，他是军部以意外的好感欢迎上台的，宁可说是军部的总意逼他上台的。但是林大将组阁的过程中也充分表现着军部意志的支配力。他先拜访前任陆相寺内，磋商本任陆省的人选，但是结果寺内所推荐的人选不是他自己所属望的人，而是军部之长官会议预先决定的中村孝太郎中将。海相方面，林大

将原是瞩目于末次大将,但海军方面也以从来惯例推荐海相是海军的特权为理由拒绝了林大将的要求而荐米内中将为海相。海陆相除外的大臣皆如林大将之推荐。不得前任陆海相推荐,就得不到本任海陆相,不得海陆相就不能组阁,最终大权操之于军部。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权性质的问题。中村中将曾被宇垣列入所希望的四个陆相候补者之中,并且是三长官慎重考虑的结果,但却加以拒绝,在林大将组阁时并没有为组阁本部所属望,但却未加拒绝,这完全是出于军部的立场。

林内阁虽然组织成功了,但是它的施政却是意外的失败。林内阁鉴于第七十回议会前后政党与军部的冲突,而抱着融化政军为一体的大志愿。它努力的结果,政军的抱合,或许有了某程度的成功。但却出乎意料之外的;还有一个财军的对立。这个对立早即演变下来而至二·二六前夕演成一个大激变。财界最有力代表者高桥是清就死于这个对立的最高峰。高桥虽然死了,但是对立仍未融化。林内阁即倒塌于这个“仍未融化”上。林内阁虽然成功了政军的抱合而失败于财军的对立,这里又留下了题目让各方最期待的近卫文口来做。

近卫公爵在二·二六事变后即为各方面所属望。且为西园寺公所爱护。但因西园寺太过于爱护,自己担任大变后重担的勇气不足终于坚辞而荐以广田。然而日本型法西斯的发展,到目前已不容各方所推重为法西斯领导的近卫再作辞退了。于是勉以衰弱的身体起来组阁了。普通阁员

都是无法推定，陆海军大臣也依军部的希望由杉山及米内留任。近卫内阁算是一帆风顺地成立了。成立后政军财三者抱合的工作，果然经近卫之手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于是日本型的正格法西斯遂突飞猛进地奔腾起来。清算对华外交的过去，树立强硬外交的决定和进行，都是这种表现之一。而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全面侵略，也就在这种军事法西斯突猛奔腾的情形下发动了。

随着几次政局的转变而行政机构也有多少变化，在广田内阁取消了内阁审议会。到林内阁改革内阁调查局为企划厅，到近卫内阁又与资源局合并成企划院，对华全面侵略发动以来为利于军事之行动先设参议会，后因觉得力量不够又设大本营，大本营问题成了1937年年底各方的讨论问题。这种演变也是军事法西斯一日千里向前发展的一表现。

日本军事法西斯的猛进另一方面也很自然地表现于外交方针上。日本法西斯外交第一步，表现于对华政策上，由佐藤外交起180度的变化，急转直下地变为积极要求，要求不成加以恫吓，恫吓没有效果终于在卢沟桥发动武力，由华北的局部扩充至上海，而成为全面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全面侵略是带有国际性的，所以另一方面又加紧日德同盟，扩大成为日德意防共协定。日本对于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交方针，是拉德意以牵制英法，对于美国则极力疏通，对于苏联则佯作准备进攻，始终以“防共”的假题目欺骗英美，引诱我们。日本最近的强硬外交尖

锋完全对准着英国，最可怜的也就是老大的英国绅士，且看 1938 年 4 月间英国绅士果将如何对付这个远东的强盗（据说，英国须 4 月后始能对日强硬！）。

日本经济，1937 年的变化也非常急激。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准战时经济体制到近卫内阁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序幕。战时经济体制在林内阁即已逐渐具体化。林内阁时代即已着手于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什么扩充生产政策，安定社会经济政策，管理对外汇兑，等等都是在林内阁时代制定的，到了近卫内阁时代更加积极化。不久，对华全面侵略发动了，日本社会经济就在总动员的名目下被军事强拉着向前迈进。政府强逼人民服务于战争，可怜的就是人民的生活随着战争的展开而日益恶劣。他们的负担是一天天的加重。一方面租税随着战争日益增重，另一方面物价随着战时通货膨胀而日益高涨。日本的预算随战争而急增，所谓“对华事变费”一会儿 5 亿元，一会儿 7 亿元，一会儿就是 12 亿元、25 亿元了。这些重担加在民众身上，民众喘不过气来，就用反对侵略战争来回答政府，反战的宣传散发在各地，军需工厂的工人怠工、破坏、炸烧煤油等等，都是反战的表现。军需工业工人的需要增加了数倍，可是工资却不但没有增加倒反减少了。1931 年日本经济走入准战时体制以来，不到六年间人民生活的负担加重了 32%，下层大众的负担更增加了 46%。但是劳工的斗争的件数在侵略战争发动前急增很多，发动后倒反沉静起来。这或许是工人力量的潜伏化，日本统治阶级的刺刀素来是尖对着一切劳工

的,战时更要加严了。

但是感受性灵敏的知识分子及共产党人,却更加增强他们的活动。日本左倾社会运动家去年被检举过一次,左翼各派差不多全部被逮捕了去,下了狱,这一次又来一次大逮捕,一共捕去 370 多人,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

1937 年上半期的日本工潮是急增的,但下半期倒反沉静,但是前进知识分子的多事多难却起来代替了。日本政府自开战以来就很重视国内一般大众的反动,特别是重视前进的知识分子。所以政府就借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名义,由政府人员总动员向日本民众扩大宣传,组织日本文化中央联盟于首都的东京,而于各地成立分会。但是日本的文化宣传纲领实在太空洞,“日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受过二十世纪潮流洗礼的人不能领悟;日本政府的精神宣传也太不切实际,要人民幸福和战争配合起来,也是日本现代人民所不能领悟的理想,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效力终不如刺刀的威力来得有劲。在战时戒严时期中,日本大众的反抗力量,完全潜伏了,变成了地雷。但是前进知识分子的感觉却依然是那么尖锐,日本政府对于他们依然不能放心,于是出以一网打尽的逮捕办法。日本社会的动荡,是用 370 多人左倾知识分子的逮捕送走了 1937 年的。

残暴的战神强拉着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亚细亚大陆,早就准备在大陆上横行直撞,并且也已局部地发挥过它的威福。1937 年下半年携带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神,居然又大发起淫威来了。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于预定好的

阴谋而掀起了卢沟桥事件。五六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即已在华北安排好炸弹,准备把华北几省一下炸变了颜色。6月底我在北平即已察知各方面的倾向。果然地,回到南京不到一星期,卢沟桥事件即已爆发,但是我们没有整个的打算,地方也没有十分的决心,依然想苟安于二年来的均势上。殊不知日本国内的情势已和二·二六事变以前的,截然不同了。二·二六事变前是军部财界及政党对立最尖锐的时代,但自经过林内阁财军抱合政策及近卫内阁财政军抱合政策的成功以来。军事法西斯已就上了轨道。这种内部统一的成功,在侵略性日本帝国主义很自然地必转而向外侵略,所以佐藤外交完全被清算后又回到广田外交的方针。于是日本军事法西斯开始向我们动蛮了。他的意思满以为恐吓一下我们就屈服。就答应他所要求的种种条件,殊不知我们竟给硬钉子碰,我们竟由华北局部的抵抗变成全面的抵抗,并且他吃到不少苦头。单就上海一隅的抗战言即已维持了3个多月,日本军队增加到20多万。整天整夜专靠着猛烈的炮火依然没有打退了誓死抗战的民族英雄。直到11月初我们为着作战的新计划而退却,但是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勇士还能决死奋斗于日本军队的重重包围中,屋顶的青天白日旗直飘扬至11月20几日,所谓“皇军”的威风不知道存在哪里?

随着上海的退却,日本帝国主义又分路进攻我首都,我们为着抗战到底计,遂决计迁都,军队也于12月13日退出了南京。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的全面侵略战争,遇到了

新的难关,以后的打击更要加倍起来。第一,我们的迁都表示抗战到底更坚决的决心,我们的最高领袖在退出南京后的几次宣言,皆充分代表着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坚决意志。第二,我们引敌深入内地,日本军队将因战场之扩大而不足以分配,因为交通不便而陷于窘境,因为山地战而被包围。第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的侵略已经打破华中的均势,更要进而扰乱华南,英美各国还能否隐忍下去,是很大的问题。国际问题日益使日寇陷于窘境,最近英日的纠纷,美日的纠纷,苏日鱼约纠纷等等,都是在国防上增加日寇的难关。而日寇自己的种种蛮干也正在促进这种难关,英舰及美舰的被炸,类皆如此。日本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年度改为 1938 年,1937 年是这种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蛮干送走了的,长此蛮干下去,1938 年就有挑起第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世界在东方强盗的横行下迎来了 1938 年,且看这个强盗能横行到几时!

原载 1938 年 1 月《时事月报》第 18 卷 1 期



## 日本右翼运动最近的狂态

日本右翼最近的大活跃,可以包括在“日本主义运动”的旗帜之下。

最近的日本主义运动,自二·二六事件以后起了一大转变。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当时,政府当局所表示断然的态度,对于日本主义阵营给予了两种大的教训。其一是少数恐怖主义者行动的界限,也即所谓上层革新派的革命性的界限;其二是脱却军部依存主义,而向大众中间建造基础,以成为国民一般运动的必要。这又是昭和七年“血盟团事件”以来所深刻经历的内部动摇和分化的教训。“血盟团事件”以后,日本主义运动渐由原来的单纯“反共产主义”而趋向所谓“革新运动”的进展。最初以酝酿的运动是“树立单一维新政党”,这个题目在昭和十一年下半年即已获得日本主义阵营各派的拥护,向战线统一的方向开展。现在先来追述其转动的来历。

这时期的“维新政党树立运动”最初的柱石,是“三月会”(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的),和“八月会”(昭和

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成立的),前者是以赤松克麿(国民协会)等人为中心,而于二·二六事件之后成立的,主要的活动方面是关东区域,后者是以吉田贤一(皇国农民同盟)等人为中心,在关西地方的友谊团体之间活动。“三月会”不久即变成有名无实的存在,而“八月会”的中心势力却是10年4月3日成立的“爱国劳动组合全国恳话会”(该会是以高山久藏等人的总联盟,西山仁三郎等人的产业劳动俱乐部及小林顺一郎主持的爱国劳动农民同志会等团体为中心的)。但至维新政党树立运动开展为全国性的时候,吉田贤一和其他指导者之间,即又发生意见的分歧,他终以“皇国农民同盟”为中心而于11年7月5日重新成立了“皇国农民团体关西准备会”。其次,又和由全国恳话会分裂出来的关西诸组合,另外组织“关西皇国劳农协议会”(8月25日)。这个协议会到其他各派统一为“时局协议会”的时候,又发展成为“大和联盟”,以与“时局协议会”对立。

“八月会”所以向上述方向转动的机缘,在于同年5月19日成立的“五月俱乐部”。据说是以大日本生产党的吉田益三等人为中心而活动的,5月29日即已在关西地方结成“全国爱国团体统一联盟”,其后渐得生产党,新日本国民联盟,爱国政治同盟,国民协会,皇道会,国体拥护联合会等关西方面支部的支持,而于6月20日结成“维新政党准备会”。另一方面又有纠合各派青年份子的“纯正维新共同青年队”(关东方面,成立于10月24日),及“纯正日

本持义青年运动全国协议会”(关西方面,成立于11月3日)等团体同时成立,并行发展。10月27日,桥本欣五郎的“大日本青年党”终于举行成立会了。但至同年年底12月15日举行成立会的“时局协议会”成立后,以上的战线统一运动才算告一段落。此外,虽然尚有小林顺一郎等人的“三六社”及“爱国劳动农民同志会”系的进行,总而言之,除上述“大和联盟”以外,日本主义阵营的统一联络机关总算成立了。现在试举统一联络机关的“时局协议会”的常任理事的人物及所代表团体来看,则有入江种矩、增田一悦(国体拥护联合会)、桥本欣五郎(大日本青年党)、高山久藏(总联合)、渡边良三(明伦会)、吉田益三、葛生能久(生产党)、前田虎雄(神岳队)、赤崎寅藏(新日本海员组合)、杉浦武雄(东方会)、岩田爱之助(爱国青年联盟)、永井了吉、西乡隆秀(直心道场)、小林顺一郎(三六社)等人。于此可见其网罗各派范围之广泛。

但就这一年的合并及分裂的经过加以考察,则距离“拥有国民大众为基础的组织”,还相当的远,从来日本主义团体特有的缺点的排他的小派分立主义,还没有克服。所有的只是战线统一的形态略为整齐罢了。“维新政党的树立即在目前”的呼声虽是当时阵营内外的任何人所想像的,但是去年发生的两件事件,却把这种期待一扫而尽。

第一事件是三月的总选举。在日本主义阵营中对于议会的态度分成数派,若就其政策看,大体上可以分成二大

派：其一，肯定议会而主张议会内部的革新政策；其二，根本否认议会本身的机能。观此次的总选举即可明了其情形，2月10日正式成立的“政治革新协议会”，表面上是对付总选举的共同政治斗争机关，时局协议会的加盟团体大部分都参加；但是这个机关却是以江藤源九郎议员（淡交会）为委员长而与“时局协议会”独立创设的。此事从头即暗示着前述二派的分离。果然，“政治革新协议会”和小林顺一郎等人选举消极派所指导的“时局协议会”对立，变成“议会派”的选举中央机关，推选江藤等五名议员主指其事，至6月11日即因其机能完了而解散，但其当然的归宿，7月8日又以江藤为委员长，创立了“日本革新党”。

小林顺一郎等人之所以对选举抱消极态度，是基于这种理论的：“议会不是下党上达的机关，而必须是翼赞天意的机关”。

第二件事件是中日事变的爆发。在继林内阁总辞职之后，宇垣内阁流产，近卫内阁成立的过程中，日本主义阵营内的各派的活动颇为复杂，这里避免一一的分析。在近卫内阁成立的当初，日本主义阵营内的一部分人，虽然评为“公武合体”。（原为公家与武家，朝廷与幕府合作之意，现在指皇室与政府合作之意，因近卫为权贵之族，但这是带着讽刺的意思）。但随中日大战的进展，而这些日本主义阵营的各派皆加以支持，对于这次提出议会的“国家总动员法”及“电力国家管理法”。也自议会的内外给予绝大的声

援,这时候,“维新政党”已经成了陈旧的纲领了。

最近日本主义阵营的新动向,的确在于响应,援助政府内外政策。也即参予具体的政治问题。其主要而显著的活动,有下列几种:第一,在中日事变爆发之后,以造成所谓“国民精神战时体制”为目标,而在政府指挥之下,以“时局协议会”为中心创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其主干人物有小林顺一,即入江种矩、松本勇平、井田磐楠(贵族院)、高山久藏、中川佑(纯正青年协会)、西乡隆秀(同上)等人。其次又以“时局协议会”为母体在议会开会前后,继续成立了“国际劳动会议脱退促进同盟”,“电力案促成国民同盟”,及“国家总动员促进国民同盟”等团体,“日本革新党”更加单独地发出声明,支持政府的各种国策。此外,各派各团体的年会及紧急大会的决议和声明,更是不遑枚举,真是极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光景。

但是日本精神各团体自认为最得意的杰作,却是他们对左翼各派的“落井下石”。在去年12月15日及今年2月1日日本政府两次检举左翼分子及解散日本无产党和全国劳动评议会的过程中,这些日本精神团体即与政府相呼应,加强他们对于人民战线派的攻击。甚至在1月17日开会的“时局协议会”系各派的紧急时局问题协议会上,决议要求社会大众党即时解散。贵族院的井田磐楠男爵及菊池武夫男爵的“国体拥护联合会”,则更猛烈地或在议会上,或发行种种刊物,对于左翼及自由主义的言论大肆批评和攻击。

最近日本主义阵营中更有展开树立新政党的倾向。但这与以前树立“维新党”的情形不同，这个动向最初的表现是去年12月16日满山头，一条实孝公爵，及山本英辅海军大将连名发表的“举国一致一国一党”的声明。这个声明虽然没有立即具体成立组织，但是日本主义阵营各派对于军部官僚，反政党的一部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则是的确的事。至少有两种新政治运动，是因为呼应而产生的。其一是“举国一致联盟”及“防共护国团”的政雁解消运动；其二是2月11日开成立会的“大日本运动”，现在就此二种新政治运动略述于下：

“大日本运动”是在贵族院，军部，官僚及一部分政党之间推进所谓举国一致的新党树立运动的。开始不久即因为包含的阶层过于广泛，所以进展至为政治的实际运动时，各人的立场难免发生障碍，于是中途转变成为发挥日本精神的一种精神运动。据其成立会当日的趣意书，则有盐野法相、永井递相、秋田及荒木两参议等在朝的要人及上书日本主义团体的代表者共500多人，为发起人及赞助员连署签名。现就其发起人及赞助员中的著名人物，摘要分类如下：

(一)军部：今井信夫、林銑十郎、川岛义之、荒木贞夫、岸本绫夫、阿部信行。

(二)官僚系：横行助成、斋藤树、皆川治广、唐泽俊树、吉田茂、白鸟敏夫。

(三)贵族院系：井上清纯、一条实孝、三室户敬光。

(四)政党：政友会方面有东武、宫田光雄、川村竹治、津云国利、滨田国松、熊谷直太；民政党方面有软母木桂吉、小泉又次郎、樱内幸雄、俵孙一、富田幸次郎。

(五)日本主义团体：有各派主要人物。

观察以上所列人物，实在网罗着大日本运动名目下的各派代表分子；其中甚至如政友会解党派的宫田光雄及川村竹治等人，也与统制派的滨田国松及东武等人并列，并且是抱着相当的热心参加的。所以这一运动的将来。是有相当加以注意的必要，同时，其内容的复杂也可以想到。“大日本运动”在政党分子的看法和企图，正和下述“政党解消运动”相反，是欲假藉这个“日本精神运动”以图谋“政党更生”，其活动中心是“常盘俱乐部”。但是这种运动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所谓上层革新派及新官僚位置的移转。随着时局的进展而上层的所谓新势力逐渐发展。近卫内阁的补强及改造的政局动向，就是反映这种动向的一面，因为“大日本运动内部包容着这种政治势力的代表者，所以政治上的进展当然浓厚。这个运动全体或者可以说是既成政党和上层革新派二者关系改造内阁的抗争之缓冲地带。这一点是和“政党解消运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地方，因而运动的全体正缺欠着与真正的“国

民形态”。

其次,政党解消运动的内容则比较确实,其背后有军事法西斯主义者在指挥着,有全体转动的中心存在着。这种运动一方面为所谓上层的革新派走上了政治舞台,另一方面由所指使的民间左翼团体表现为暴动,负内政责任的政府当局,居然加以公然的袒护(例如内相末次大将的谈话)。这一运动正与“大日本运动”同样在所谓日本主义运动营垒中占重要的地位。若自其本身的确实性,即与政府当局的实力派所结成为一体说,或比“大日本运动”还值得注意。而充当这一运动的有力中心,是所谓“防共护国团”;在这一运动中最显著的事件,是该护国团占据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党本部的惊人事件,现就其经过及其内部情形,略加分析;而其归宿点的政党解消运动,也可明了一斑。

2月17日“防共护国团”占据政民两党本部的事件,因为时局的关系,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被害者的两政党,追究内务大臣的帝都治安责任。19日的众议院本会议上,民政党的松田议员即指此事件为“民间的二·二六事件”;在同日的政友会议员会议上,强硬派也主张:“事件虽小,但其实质则为民间法西斯企图压迫议会政治的事实,政党在这时候须以必死决心排击法西斯,拥护立宪政治”。但是使人惊怪的,“防共护国团”的大部分构成员竟是三多摩地方的政友会院外团,以院外团而占领本党的本部,强制“既成政党的解消”,自政党方面看来,至少是一种关系政党存亡



的事件。

政党方面更宣称：“防共护国团的政党解消运动，在内相与某参议之间，传有联络，并传因图国家总动员法案之通过而有一部官僚诱起这事件”；认为这事件的背后有一种政治的阴谋而攻击末次内相。但是主使者的末次内相则答谓：“这不过是政党内部的纠纷”，而一脚踢开毫不在乎。

防共护国团事件确有政党内部纠纷的一面内容，但惟其如此，所以问题更值得注意。政友会的一部分“有志者”2月16日举行了“现状打开恳谈会。”它是由川村竹治未、下成太郎、熊谷值太三发起的；其决议事：“关于时运的推移与稀有的重大时局，应广泛与忧国之士推进一大国民运动，图谋迅速结成强力政党，以行举国一致之实”。在会上除三位发起人之外，宫田光雄及津云国利也公然主张解消政党，说：“政友会应即解散，结成法西斯的强力政党，从事于时局的克服”；并谓：“这与东武和滨田国松等会合主唱者异其意识形态，即绝对反对法西斯拥护议会政治的人们，也终于不得不服从多数作前记决议”。防共护国团的委员长中沟多摩吉，大家认其为津云国利的乾儿，所以占据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津云国利即以紊乱党规的罪名而和西方利马同时被政友会所开除。这是防共护国团事件的政党内部纠纷的经纬。

但是“护国团事件”另一面内容的政党解消运动，则更值得注意。自1月中旬即有叫喊“解消政党”的一队人，历

访政民两党,乃至社会大众党的干部及所谓有力者,促膝谈判解消政党问题。这一队的一部分就是以中沟为委员长的三多摩地方的政友会院外团千余名组织的所谓“防共护国团”。另外一部分是下泽秀夫(国体拥护联合会常任委员)所指导“要求解消政党青年队”(1月12日成立,24日改称“举国一致联盟”),其主要人物及代表团体如下:须藤理助(护国青年党)、铃木勇(勤王联盟)、壁经平(东西联盟、下山治平(国土会)、西村泰藏(勤王自由同盟)、平野小剑(内外更始俱乐部)、上村专之丞(天军会)、马场园义马(真日本社)、内用刚藏(池勇日本社)、皆川三陆(政教社)、佐藤信胜(信统会)、川口政好(明德会)、松浦应(国粹大众党)、友纳早一(洗心社)、深泽源造(南北会)、若狭胜次(国威宣扬会)。占据事件发生的当日,一个多月的历访工作告一段落,而另一方面即于於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难突破紧急国民大会”,其决议如下:“甚于肇国之大本,期昭和维新之断行,既成政党应即解体而恭顺以行举国一致之实。”大会的召集者用“举国一致各派同志联合会”的名义,代表者则为贵族院的一条实孝公爵,同久我通显侯爵,参议秋田清,海军中将小林省三郎,陆军中将崛内文次郎表孙一等人联名。

日本反动的右翼势力所反映的上层军事法西斯,促成了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种战争又必然地激发民间右翼运动的进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运动起了一个大转变,许多左倾团体的代表也都向右转了。“中日战争”爆发

后,在军阀政府高压之下,许多左翼的指导领袖完全投降了,或竟从理论上把侵略战争合理化、大众化,和军阀政府狼狈为奸。但这只是日本社会一面的转变,随着侵略战争的进展,日本反战反法西斯的势力不独增强了左翼营垒的力量,并且日在侵透于民众之间。日本反战势力若如鹿地先生所譬喻的是个“巨大的冰山”,那末,日本军事法西斯在这侵略战争中,将必如鹿地先生所说的:“法西斯主义者继续打仗吧!他们坐上这样巨大的冰山而粉碎成为微尘,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注:本文资料大部根据日文《改造》杂志4月号

原载1938年5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2卷第1期

#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与 军部法西斯政府的确立

## 一、近卫内阁改组的前后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已经一周了，国内外的报纸也皆著论评释过，但是所论列的限于偶然性和近因，至于其必然性和远因则很少提到，所以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更深入的检讨。

近卫内阁的去留问题，数月来的日本朝野宣嚷已久，综合其看法不外乎三种：其一是维持现状，其二是总辞职，其三是充分改造。各种看法都有相当的理由和根据。但是结果第一及第二两种的看法完全落空，而第三种猜测倒反不幸而言中。特别是改组的情形有些地方使一般人不能了解，例如断然“割爱”了广田，拉进了宇垣，将素来对立不相容的军部各派于一炉等等。但是日本政权之如此演变及近卫内阁之如此改组，是有其必然的归趋。本文之剖述，打算

着重于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的经过。故首先就有关近卫内阁改组之前后诸事故说起。

近卫内阁改组的浪头可以说开始于中日大战第二期作战,决定扩大的当时,这是我们抗战到底及中日纠纷之不可调和性使然的。广田前外相早在本年一月下旬揭露了德国调解中日纠纷的经过,并宣布中国已拒绝德国调解的消息(据东京1月22日路透电),这种方针正和最近广田对日本国协会会员演说中所述:“今日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时期,……日本现在决心与中国政府从事于长期的战争”,是先后响应的。一方面表示着日本的侵华战争已到骑虎难下的关头,另一方面表示日本侵略者准备拼死地横冲过这个大关头。于是日本政界行为的摩擦和激荡,就在这种要求下开展了。

第一件磨擦是右翼新势力与既成政党的大纠纷。2月17日“防共护国团”数百人分别攻占“政友会”及“民政党”的本部,3月3日“社会大众党”党首安部矶雄为匪徒殴伤。这是右翼新势力向政党的进攻,不是末次内相所推诿而一般人所附和的“党内本身的问题”。攻袭党本部事件之发生,事前得到政府当局的谅解,所以内相末次成了众矢之的。政党议员在议会中公然指摘说:“防共团之暴行,据云和内相及某内阁参议(暗指秋田)取有联络,显然是一部官僚企图藉此压迫政党,以使动员法案得以通过,实在是政府的政治阴谋。”又殴伤安部主使者也只是右翼团体“风云俱乐部”。据首犯万年东一的自白,“认为社会大众党去

年冬虽声明转向,但仍不彻底,故有予以严惩的必要”。这两桩事件发生后,政党员在议会上对政府大加攻击,并逼内相末次负其责任。结果惹起右翼总帅的末次大将大发雷霆,要求内阁采取“适宜方针对付政党”。对付政党的适宜方针就是解散议会。这一场风波虽然因为末次“担保帝都治安的安全”而告一段落,但是右翼势力与政党的磨擦已种下根基,右翼势力是在日益加强了。

日本政界第二桩风波是总动员法案及电业国营法案引起的纠纷。这两种法案在军部法西斯主义是认为最得意的所谓“革新政策”的。但是当政府提出议会的时候劈头即碰到政党坚决的反对。政党反对的理由是:(一)全国总动员法的内容大半可以依敕令行使而这种委任命令不独无视议会的立法权,并且,蹂躏宪法第 31 条的非常大权,国民的自由也要被削减殆尽;(二)总动员法对于金融产业施以极端的统制对于财界及产业界的发展加以过度的压抑;(三)总动员法第一条所规定施行动员时期中所谓“战时或事变”的事变二字,缺乏明确解释,若在事变的时候滥用非常立法则危险极大。至于电业国营法案,即在贵族院也曾经热烈的辩论,议员松本丞治攻击这案最厉害(3月8日路透电),政友会及民政党则更以“官僚统制”为理由极力反对,最低限度也要大加修改这是因为政党背后的财界及电业资本家认为国家统制与他们的利害相反。这两种法案经过两个多月的长期纠纷及再三磋商,总动员法案经过部分的修改,电业国营法案经过更多的修改,始在军部强硬

要求及政府解散议会与右翼团体暴动的恫吓之下通过了。政府及军部与政党及财阀之间的对立激烈可以想见。总动员法案虽于3月16日通过众议院,24日通过贵族院,电业国营案也于3月26日最后通过贵族院,但是众议院方面斋藤(民政党议员),牧野(政友会议员),乃至池田、樱井、植原等人的攻击,贵族院方面土方及松本等的抨击,已使政府及军部感觉施政之棘手。特别是公子哥儿的近卫本人感觉最深刻,最不愉快。

近卫因处事棘手而萌退志,4月初旬遂称病以示态度。近卫之去留,初在政党各方面并无挽留的表示,一部分自由主义甚至希望他及早去职。近卫本人及他的亲友也都这样相劝。只有军部和右翼势力,要近卫勉为其难。4月7日内相末次即希望近卫留职,4月12日陆相杉山更进一步要求近卫改组内阁,并组织拥护政府的新党,4月12日中外新闻称,军部又通知政府,反对首相走职。同时军部及其他各领袖皆力劝近卫打消走意。近卫到此时已经欲罢不能了,于是派文相木户幸一往访西园寺,听取时局的意见以为改革政府的根据。4月15日内相末次,法相盐野,及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等又先后往访近卫,切实磋商,4月16日近卫遂向阁员声称:彼并未提出走职,而4月18日民政党党首町田在其重要演说中,希望近卫努力为国效劳。5月2日,近卫更决定改革议会制度,其范围包括选举制度,众议院制度及贵族院制度之改革。近卫内阁加强的态度于此确定,而补强的腹案也从这时候逐步成

就。近卫之留职及阁员一定标准的更动，在5月上旬即算定不易，迟至5月26日始完全表面化，其苦心孤诣，实非偶然。

## 二、军事法西斯政权确立的经过

5月26日下午外相广田与财相贺屋同时提出辞呈，近卫首相即予照准，并任命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继任外相，前日本银行总裁池田成彬继任财相，前陆相荒木贞夫也同时被任为文部大臣。替代陆相杉山的板垣征四郎也已于6月4日就职了。此时近卫内阁的面目完全一新，虽然只是改组，但其实质则等于组织新阁。现在就其阁员的面目看，海陆军人占5把交椅，并且都是重要的位置，颇有令人生军部内阁之感。宇垣在陆军方面自成一派势力，财界及政党也都相当倚重，去年组阁虽未成功，而其威重依然尚在。荒木与真崎在肃军前是军部的绝对势力，此次被任为文相，将更发挥他的极端狭义的国家主义思想，总动员所谓日本精神。板垣的上台正足以增强少壮派军人的力量而有利军部所谓正统派政策之遂行。这些人将来的作为，正好和内相末次的狂妄配合，而对国内外推动军事法西斯政策。财界巨头的池田成彬此次毅然允许出任财相兼任商工大臣，当有坚决的新计划，必将增强近卫内阁的力量不少，其将调和军阀与财阀乃至政党间的矛盾，是可以想到的。递信大臣永井是主张电业国营的人，甚至欲以去留争，



其为统制经济政策的意味，正与军事法西独裁互为表里。厚生大臣的木户也是近卫的亲信，在近卫为军部竭诚服务的心境，当不会有出入的意见。其余各相如司法大臣鹿野，铁相中岛，拓相大谷，及农相大马就无足重轻了。酝酿多年的军部政府，到今日始完全实现，军事法西政权也因战争而完全确立了。

但日本军事法西斯政权的演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政权的内容也不只是军部上层的意识。日本法西斯的活动，无论在朝抑在野都是用“革新”两个字作招牌。所谓“革新”者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反对共产主义与政策，其二主张修正资本主义组织。当然日本这样革新只是为军部、官僚地主及财阀的统治者张目罢了。日本“革新”的历史可以说开始于1932年“血盟团事件”及五·一五事件的当时。事件的主使者在法庭上公然提出“革新”的陈述。日本政府所加于血盟团主犯的判决书明言彼辈为谋“革正”及实现君臣共治，而企图打倒政党、财阀及特权阶级等旧势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则又以国家主义鼓吹者的权藤成乡所著自治民范，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桔孙三郎的所谓王道国家建设论及大川周明的所谓国家革新论为其意识的内容。即其后的“神兵事件”也同样持所谓“革新的理想”。

日本民间右派的这样“革新思想”及行动终为军部及官僚统治者所利用，自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即以“革新”为各种政策指导原理。二·二六事变是日本上层政权一大转变的关

节。所谓革新的指导原理首次具体表现于广田内阁的施政方针,同时日本的国家指导部也走上统制化的路程。当时代表军部意识的寺内陆相声明书的要求,是:“任打开这未有的时局新内阁,对于内外时弊的真正根本刷新及充实国防等积极的强力政策,须有遂行的气魄和实实力,这是绝对必要的,决不能依然带着自由主义的色彩,或专依维持现状或消极政策而得妥协退婴为了。所谓依积极政策以一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要求。妥协退婴不是收拾时局之道,反足使事态纷纠,具将贻大祸根于将来。不合于上述趣旨的内阁果能克服这贯通内外的时艰吗?”当时军部推进法西斯统治的气焰是这样咄咄逼人,几经难产的广田内阁也就不得不想依样画葫芦姑且试试看。广田在七大政策上就列行政机构的改革政策为首要。他在第六十九回议会上宣布施政方针,极力强调:“相信行政机构改革的目标在于适应时代的要求,俾便多举实绩。因此,当然努力于改订应加改订的各种机构,用以调节统合社会情势与机构之间所产生乖离之点,消除因制度固定所产生各种弊害。……全面地综合地树立一切的国策,使得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这是当前的急务,……”但是二·二六事变后日本政界的情势,不容广田对于这种支票全部兑现。广田内阁当时成立的根据在于维持各方势力的均衡和恢复安定的状态。所以,以破坏均衡为前提的机构改革政策,到底不能实施。这就是广田内阁对于国家指导部的统制没有成功的原因。

广田内阁的国家指导部的统制政策,在一般上虽是失

败了，但却在另一方面为军部建筑成功控制内阁的基础，军事法西斯就是在这基础上更加健全地发展起来。这个基础就是“军部大臣现役制”的恢复，日本在 25 年以前就是实行这种制度，陆海军部大臣非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不可，平常人不消说，就是预备军人及后备军人也都不能充任。这于军部控制内阁是极有力的方法。明治末期的西园寺内阁曾经因为这种制度而不得不倒溃。当时陆相上原勇作主张增设两个师团，事为阁议所不容，他即直向天皇辞职，其后因为军部内部的统治，西园寺又不能在非现役的军人中找得陆相，所以终不得出于总辞职一途。当时正值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走着上坡的时候，遂引起第一回宪政拥护运动，排斥军阀的横暴，而桂内阁终因这运动的压迫而辞职，这是有名的“大正政变”。继之又有山本宪兵卫内阁的再接再厉，终于在政友会的援助之下竭尽绝大的努力，好容易废除了这种制度。这种助长军部统治的“现役制”的恢复，虽说是日本资本主义向下期必然的归宿，但助其实现的却是广田内阁。“陆海军部大臣现役制”的恢复，第一步就在广田内阁倒溃宇垣组阁的当时，发挥了军部控制整个日本政局的威力。日本政界惑星的宇垣终因军部拒绝派送陆海军部大臣而不得不流产。其后的内阁都在军部的指挥之下施行内外政策。

“革新”的字样，到林内阁的时候更进一步被用于首相的政纲宣言上：“排矫激，戒因循，必断行适合时世的革

新”，“披沥赤诚一意讲究革新的方策”（去年2月8日的宣言）。林銑十郎组阁当初完全秉承军部的意志，打算拉住财阀与军部结托以降服既成政党，满以为只要这样做去，军事法西政权即可巩固，庶不知日本客观的条件还未完备，所以林内阁解散众议院之后，虽有另组新党的意志，欲拥近卫为党首。不幸选举的结果，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议席依然占压倒的多数，遂逼不得不总辞职。林内阁当时的革新意见，正与二·二六当时的军部意见符合，军部的意识是：“否定由占议席多数的政党组织内阁的政党内阁制。改革现在议会对政府的对立抗争的制度，而以相互协力的日本精神为准据。”林内阁推进军部法西斯政权的工作，可说心有余而势不足，终不得不失败于政党联络工作的不足而挂冠以去。

掩饰于所谓“革新”的名目下的日本军事法西政权，到了近卫内阁才具备了确立的条件，各种“革新”政策才有真实施行的可能。这是由于中日战争的机会，近卫内阁为对付这种空前的难关，而向各方努力要求举国一致，采用全国的战时体制。所以近卫内阁自其成立以来，不但步步努力于政军财之方面势力的切实结合，并且不断地向战时体制的建造途上猛进。近卫内阁正好适逢其时，可以公然要求与政府为难的各方势力服从战时的要求、命令和施設。战时体制的建筑是一步步地完成，军事法西政权的基础也随之而一步步地巩固。只就目前说，政府不但可以左右议会（上述总动员法案，电力国营法案，及其他的许多法案之

强制通过议会即其实例),许多太上内阁,或内阁指导机关的新设,已使政府完全听命于军事指挥部了。名为补强近卫内阁,实则加强军事法西的统治。各种行政机构的新设,随着中日大战的开展而日渐完备。近卫在7月23日开幕的第七十一届特别议会上即提出过“以事变为中心”的新方针。9月4日开幕的第七十二届临时议会上,关于此点又有热烈的讨论,引起了补强内阁的注意。近卫终于在“对外强硬对内协调”的标语下先改革了企划厅为企划院,增设内阁参议及大本营。

企划院的出现,由于10月1日的阁议,虽说只是过去的企划厅和内阁资源局合并而成的,但其性质则二者完全不同。企划厅只是抽象的研究机关,即资源局对于军需动员的推进也不够用。但是企划院则在“谋平时战时国家行政的统一”,“谋国家总动员计划的树立和遂行上的调整(据其组织大纲)。其组织设总务、民生、产业、交通、财政及调查,虽是赞助内阁的机关,但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统制却有集中的力量。企划院设立的另一面意义就是军部所要求的“统制强化”,可以说是“国策树立遂行之综合的统制机关”了。自二·二六事变以来,军部即要求着改革行政机构,设立强大的统制机关,以便否定政党内阁制,消除议会对于政府的牵制。这就是设立内阁调查局,又由内阁调查局转为企划厅,再由企划厅转为企划院的由来,而军事法西斯的统制政策一步步进展了。

其次是内阁参议的设置。企划院虽可以补强内阁但尚不足以指挥内阁,还不足以满足军事法西斯更集权化,更统合化的统制机关的要求。于是第二步就设置不处于“内阁总理大臣管辖之下”(企划院的规定)而于内阁指导地位的内阁参议。“临时内阁参议”制度是在10月13日由枢密院正式可决,而于15日公布后成立的,其任务在“参与内阁筹划工作”(条文第一条),内阁参议官受国务大臣的礼遇(第二条),其构成点的分配,是由军部选送四名,政党选送二名,财界二名,外交界一名,无所属一名。现任参议是宇垣一成,荒木贞夫(陆军),安保清种,末次信正(海军),前田米藏(政友会),町田忠治(民政党),乡诚之助,池田成彬(财界),松冈洋右(外交界),及无所属的秋田清。观此阵容,可知军部及政府的用意在于包罗万象。

第三出现的是太上内阁的大本营。内阁参议制虽则增强军部的力量不少,但究竟不是一个纯粹独立的集权机关,还不能充分适合军部更集权化和更统合化的要求。在中日战争日益扩大的今日,军部所要求的是一方统辖军事一面垄断政治的最高统治的主体。于是中野正刚九月四日在第七十二届议会上提议,大本营的设立,11月16日的阁议即便可决,17日晚由海陆军大臣上奏裁可,而于20日正式成立了。依新大本营的条令,新大本营是天皇大勳之下的最高统帅部(第一条),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各为其幕僚之长,任仕帷幄机关,参划策战,稽终局之目的在谋陆海两军之协同策应(第二条),这个条令不但适用于战

时,并且适用于“事变之际”(第三条)。新大本营的组织是把参谋部及陆海军两省人员全部统合在一起,一切的军令,军事动员,及军事编制全部统一于这个最高统帅部。特别重要的是“使平时陆海两省各自分掌着的统帅关系一元化”(大本营成立当时陆海军当局发言人的谈话)。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各种新闻的解释。东京日日新闻说,“这次所要设立的大本营……必然地须扼成政治、外交、经济及思想的总动员……可以看做跃进的日本划期的纪念塔”(11月2日)。日本自由主义者的宫泽俊义也说:“大本营的设置决不能单纯地视为参谋本部(陆军)与军令部(海军)一时的合并,实在是统帅部对行政部关系的强化,统帅部处于实际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更就政治体制言,这是含有以统帅部为指导的势力的集权化、统合化的作用”。军部指导部统制化的要求,到此时算具备形体了。

但是国家指导部统制权的行使,脱离内阁而处于超越的地位,就实际言到底不如在内阁本身上谋完全变质之为愈。由内阁以外的一个军事法西斯机关来统制内阁,倒不如内阁本身完全军事法西斯化,对于军部的统制来得便当,来得有劲。于是军事法西斯政权仍然不忘于内阁的改造。这又是这次近卫内阁大改组的动因。在一个弱体内阁中配以五大员强硬的海陆军人,其阵容已无须详细考虑,也可明了这个内阁性质之为何了。近卫新内阁的阁员,上面已经介绍过。这里总括一句话,日本军事法西斯的政权不但

随着战时的扩大而日益增强,军事法西斯内阁也渐渐完成了。以善于适应的近卫文麿当此内阁的首相,即是说现在日本内阁已经完全战时内阁化,完全军部内阁化,也非过言罢!此后日本政界的问题或将展开一个一党运动的新形势罢!

原载 1938 年 6 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 2 卷第 3 期



## 近卫内阁改组与今后动向

### 一、局部改组的原因

喧嚷很久的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的问题，现在竟以部分的改造了事。这于一般人或许是一桩奇怪的事情，但自问题的本身考察，却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日本军事法西斯政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今日，打着灯笼找遍日本全国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近卫文麿还合适的首相。这不但是因为他有那高远深刻的政治评论家的条件，并且是因为他有那不坚决好商量的实行家的弱点。在对外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总是要求所谓“举国一致”的政府，按诸过去中日战及日俄战当时的事实，政党及议会是对政府让步的。这次日本议会对于全国总动员法案，电力国营法案以及其他许多法案照样通过，也是证明了同一步伐。所以近卫内阁容易稳定。同时，近卫又能尽力服务于军部，折衷周旋于军部，政党与财阀之间，所以军部也自乐于利用。出身贵族为唯一元老的西园寺公所着爱的近卫文麿当然可以安定于

首相的交椅了。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局在今日扩大军事冒险的情势下，在对华战争日益棘手国内财政经济日益艰难，外交政策硬软皆非的当前，却又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弱体内阁”所可以担当这个空前的大局的。近卫内阁虽然通过了第七十三回议会的难关，但是它在所谓非常时的“革新政治”的强烈要求下，此后还须继续更多更艰难的苦斗，解决许多更根本的问题。例如贵族院的改革，选举法的修改，行政机构的改革，乃至任用令的改废等问题，都是近卫内阁改造前的弱体所不容易胜任的。断行贵族院的改革则与贵族院直接发生冲突，修改选举法又须与既成政党起一大冲突，若再实行改革行政机构或改废任用令，则更须与官僚大本营的枢密院相周旋。再如对华侵略战争中的日本外交也陷于硬软皆非的苦闷中，也是需要一确定而有力的新方针的。究竟继续排英好呢，抑或强行对苏联的军事冒险好呢？“日美亲善论”乃至缔结日美互不侵犯条约的梦想，既是一场单相思，对苏军事冒险，又无十分把握，那末日本外交不能再长此下去了。这也是近卫内阁所以不得不求补救而必以宇垣易广田的原故。

日本军事法西斯现政权竟以年来军部所排斥的宇垣大将任外相，而驱逐了二·二六当时出任时艰切实履行军部所提所谓“革新”要求的广田，似乎也是奇怪的事。但是我们要认清两点：其一是广田外交的过渡性，其二是宇垣的军人政治家的本质。广田本人在日本内阁的地位只有由

准战时的阶段过渡到战时体制的阶段,其本人的外交方针是不是以适合狂妄的军事法西斯战时的要求的,所以纵令他是近卫的好友也终于不得出让出外相的交椅来。至于宇垣一成呢,他虽然曾经开罪于军部,但其原因只在他和政党勾结以与军部摩擦而已。若其外交的方针,我们相信必不会与军部有多大的出入。这就是去年这时候宇垣不能组阁成功而却在今日被请出任外相的主要原因。

## 二、改组后内外政策的动向

日本内阁这次的变动虽只是局部的改组,但其意义之重大则等于新阁之成立。改组后近卫内阁的容貌完全一新,新旧阁员的背景完全调和起来。近卫内阁经过这次的改组,而其军部的意识形态将随其军人内阁化的外貌而愈益增强。所以此后近卫内阁施政的内外方针将有一种新的发展。对于近卫内阁此后内外政策的动向,我们可以从其国内政权的方面,中日战争的方面及日本外交方面来概括地加以分析。

### (一)军阀政权的强化

这次近卫政府以宇垣一成长外相,以荒木贞夫长文相,以池田成彬长财相。今日的消息又传:确定以板垣征四郎易杉山陆相。新内阁第一次阁议闻将合并大藏省及高二省为经济省而以池田成彬任经济相,是又一身而兼两相。日本内阁最主要的位置可说全部易人,而这次更易的方向

却是和军部的要求一致的,是和留职的诸相配合的。近卫内阁是在向加强的途程努力,它又是在竭力谋以适应军部的政权的,换一句说话,也就是在向军事法西斯政权的前途奔进。近卫文磨去年组阁的最大任务,是在于调和军部,政党及财阀的三大势力。若在平时,近卫内阁初次的阵容或即可以发生作用,但在中日战争的今日,近卫内阁即令不至于总崩溃,但也难免过于孱弱不能支持这非常时的大局。所以近卫内阁成立不久即有第一次的改组,这次又来一次更积极的改组。而其改组的方针都是在适应军部的要求强化军事法西斯的支配的。第一次改组吸收了末次及木户,这次改组又吸收了宇垣、荒木、池田及板垣,其动向更显明了。近卫内阁中已有5个海陆军人,1个财阀的代表者,宇垣一成又集政党及财阀的属望于一身,这是应加注意的一点。

## (二) 侵华战争积极化

在军事法西斯政权日益膨胀的情势下,日本对华的方针是更加强硬的。英国各报评论日本内阁这次的改组为欲以宇垣大将的威力“阻止少壮军人干涉日本外交事务”,似乎是在说此后日本的外交将有一程变化,乃至改变对华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日本政府在任何对外战争时期,总是各党各派化除成见得成立所谓举国一致内阁,以完成其侵略,何况军部各派的对立,此时更是不成问题的。宇垣过去虽曾以一派军人的领袖与少壮派对立,但是这次的被吸收

入阁,并不是要用以抵制少壮派,而是在于接受少壮派的主张,运用他的手腕融合各派,使对华的侵略行动更来得顺利与有效。我们如果再就荒木贞夫,池田成彬及板垣征四郎的入阁考察看,其动向更为清楚。板垣是少壮派军人的首领之一,其入阁的意义只是补强了杉山的老弱而使少壮派的军事行动更来得有劲罢了。荒木贞夫是个大陆政策暴论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的狭隘国家主义思想反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精神,远胜于末次大将。他之长文相的意义只在于推进日本全国精神总动员,把人民反战的思想压制下去,使日本没有觉悟的人民绝对为军阀所驱使。池田成彬之入阁也只在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此后对华侵略更要积极化。日本侵华的第一难关就是财政的危机及政党财阀的不积极赞助政府。在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的当时,因为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向上期,所以“举国一致”的情势容易成立,但在今日情形就有点不同,所以在中日战争进行已将一年的今日,虽经近卫后方的折衷周旋,政党和财阀仍未见积极支持政府的方针,甚至许多议员还在议会上抨击政府的作为。虽说第七十三届议会通过了全国动员法案,电业国营法案,及其他许多有关战争的法案,但是此后这些法案的实施,更要遇到更艰难的关头,需要更大的努力。池田为实业界及财界的代表者,他是财阀巨头三井的掌柜。他还为一部分政客所倚重。他的入阁将于弱体的近卫内阁解决不少财政上及经济上的问题。即如宇垣一成之入阁也有调和政府与政党及财阀的作用,因为多年来在动荡的日

本政界，宇垣颇得大部分财阀和两大政党的拥护。这些条件都是愈加增强日本军阀对华的蛮干政策的补品。这又是我们对于日本内阁改组应该认识的另一面。

### (三)外交政策强硬化

近卫内阁改组后的日本外交方针将必竭力破除从来的苦闷，将以积极强硬为此后外交的方针了。广田前外相原与近卫友善，并且在二·二六事变后曾经替近卫出任撑持了危局，作了近卫的先驱，但是今日竟为素来见恶于军部的宇垣一成所代替。但这是日本外交新动向产生了这样必然的结果。因为广田外交只有过渡的作用而绝对不能完全满足军事法西斯的外交要求。某大报的社论以为广田之失脚原因在于“圆滑投机之性能，迎合少壮派之意旨”；并以为他的作为“胥为倭元老重臣及一般民众所痛恶”，这不见得合乎实际。广田的失脚由于他那过渡性已经失了作用。在数月前广田还唱着调和日本与各国的关系的论调，甚至于主张调整日苏的关系。但是在日本军事法西斯积极侵华的过程中，日本和其他各国的关系是无法友善的。特别是在日本军部认为对华军事的失败完全由于苏联英国及其他各国的援助的今日，日苏关系乃至日英关系只会日益恶化。日本对苏联只有很自然地采取积极进攻的方向。又有人以为宇垣之得长外相是因为“宇垣之对外主张向倡南进而重视经济发展，对于北攻苏联以引起无胜利把握之战争，不欲尝试，”也只知其半面。日本军部的大多数有力

者主张进攻苏联,宇垣必不会反对“北攻苏联”而被吸收入阁。宇垣这次入阁除了调和各派融成所谓举国一致的局面之外,对外就是适应当前法西斯军阀更大冒险的要求,以更有力地更强硬地推进外交政策。欧洲的法西斯侵略者,正在疯狂地进行着他们的军事冒险,并且步步得到英法的让步,节节不费劲达到了目的,加入“反共协定”的东方法西斯主义者眼看着西方法西斯主义者的冒险步步成功,非常的眼热,更加增强了它的狂暴性。此后日苏关系及日英关系的演进是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的,然而在德意先后承认“伪满洲国”,德国外交部更又召回驻华顾问团的今日,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的外交动向,也已确定了,东方的法西侵略者或将响应西方的法西进行更高更扩大的国防的军事冒险。

### 三、我们该如何对付?

然而我们对于近卫内阁这次的改组,不但要深刻注意,并且要采取积极的防备。中日大战在日本政府的军事法西力量加强的今日,更是新法妥协了。近卫内阁的补强就是为着这个新法妥协的原因。宇垣可以阻止少壮派军人而使战争即速结束的看法,未必可靠。日本帝国主义是要以加强的军事力量使我国“屈膝”的。而我们就只有更广大地更周密地筹划办法,来对付此后更扩大的局面了。无论敌人只在我们身上作更大的军事冒险或更进一步和其他

的国家同时作更扩大的军事冒险，一切的一切都要归结到我们身上来。我们需要更彻底的觉悟，及更周密的建国大计。我们要在抗战中建设新中国，同时也要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完成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实则，近卫内阁这次的改组，固然一方面是补强了日本政府的力量便于更强硬地侵略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了。第一，近卫内阁这次的改组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力量的脆弱。日本侵略者容易“征服”中国的预期完全落空了，所以才有补强政府力量的必要。但是这一补强只能使日本军阀在一定的限度内加速使用力量罢了，例如池田经济相将更要加强压榨日本大众，其结果适足以促进日本人民反战运动及反政府运动开展。第二，近卫内阁这次的改组证明了日本统治者内部及其与人民的矛盾的尖锐。因为财阀及实业家还不能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所以强拉池田成彬入阁。因为政党及财阀还有反对政府的政策的，所以军人政治家的宇垣大将才和池田一同入阁。又因为近卫政府去年冬发动的所谓全国精神总动员未克发生效力，日本人民大多反对这侵略战争，所以抬出“日本精神主义”大帅的荒木贞夫来。更因为日本侵略者内部的对立阻碍少壮派军人蛮干政策的遂行，所以确定了板垣代替杉山陆相。但是这种调和将因对华侵略战争因扩大而增加的困难，及日本与各国不可调和的国际孤立关系达到更尖锐的对立。单就侵华的路线言，目前即已



分成三派，互争雄长：其一，内阁及□俊六主张进犯武汉，其二，关东军主张西侵陕甘；其三，海军派则主需南犯以夺取太平洋战争发生时的伏势据点（据《扫荡报》5月30日香港电）。我们可信近卫内阁这次的改组，将因对华战争的挫折而完全崩溃。

原载 1938 年 6 月《时事月报》第 18 卷第 11 期

##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在成千上万的名词当中,意义最含混,最矛盾的,莫过于现在通行于日本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所谓“革新”。什么“革新主义”,“革新思想”,“革新运动”,乃至“革新派”等等,充满于杂志及报章上。但若从字面来玩味这两个字,就无法理解它的本义。在右派势力狂暴发展的今日,日本所谓“革新”,差不多可以和右派一切的玩艺儿联在一起。“革新主义”就是“日本主义”;“革新思想”就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思想”,“侵略的军国主义思想”;“革新运动”就是排斥左派及自由主义者的保守运动,“革新派”也可以和“国粹派”及“保守派”打上一个等号。在这种现实之前,即连占日本国家主义者一派指导者交椅的林癸未夫,也都不能不承认:“革新派在某种意义上,不但是国粹主义,甚至于是复古主义…”,而拒绝某杂志问题“赞美日本主义”的征文(据《日本评论》5月号)。

因为这个缘故,所谓“革新派”的人物,也极其庞杂,上自政界,下至实业界和民间指导者,蔚然大观,极尽光怪陆

离的情景。现在要谈这一派人物,(其实在右派侵略者狂吠的今日,革新派也不是独成一派的),也只能选出几个主要的来简略论说。我们也只能就其行动作简单的介绍,至于“革新主义”的深入剖析,及“革新运动”的有系统叙述,则又须另辟专题来讨论。

一般的所谓“革新主义者”,是指那些既不是社会主义者,又不是自由主义者,而只浸淫于帝国主义,右翼主义,对外强硬主义的人们而言的。在这意义上,我们首先要推崇狭隘国家主义者的现任内相末次信正了。他之被指为所谓“革新派”,不是今日始,早在他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代,即已脍炙人口了。当时,他常发出“美国不足畏”的豪语,他对于政治改革的意见,常为主张维持现状的重臣所不寒而慄。自中日大战爆发后,他随日本政治机构的增设而出任内阁参议时,更大放厥词,说:“即与英国一战,也在所不辞。无论香港怎样巩固,在我空军所到地方,将成完全无用”。末次是这样富于排外的夸大狂者,而右派皆支持他,所以在他大发狂言的3天后,他即被近卫请去当内相。他这排英的精神,大引起欧美各国人士的注意,他之被请为内相,完全是弱体的近卫内阁欲利用为所谓“革新政治的推进力”的用意,所以他就职后第四日,即对日本无产阶级大加压迫,实施人民战线派的检举,其锋芒且及于自由主义者,以后日本的大检举事件连续发生,直至于今日。当时一般称之为“革新时代”之到来。即连民政党及政友会外围组织的防共护国团暴行占据两党本部的事件,也是这位内

相暗中指使的，所以很受议会各派激烈的攻击。然而那样抱着彻底“革新性”的末次，也终于扳不过现实。决心振奋“日本精神”的末次，却不能断然取缔被认为颓丧大本营的跳舞场，倒反为舞女辩护，在野时代的强力政治，即其倾向也都无从认出。第一个强力的革新人物，也不过如此。不过，长州军人的强蛮及海军观念急进派的特色，依旧在作祟着。最近共产党检举之厉行，无非是他那强暴性的表露。

现在掉转头来，在纯粹的政客当中找所谓革新派，那末中野正刚，可算第一个。他是一个彻底的革新主张者，自从去年赴欧洲会晤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以后，他的法西斯思想，更加尖锐化。在中日大战前，政府及政党，由他看来，甚至于连军部也都还在固守着依赖欧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却在四五年前即已一贯地反对追随欧美的外交方针，提倡抗英的外交。中野可说是一个激烈排外的革新者。中野不但理论是飞跃的革新，行动也是飞跃的革新。大家都预料着：若有“革新党”出现，那末先登台的一定是中野正刚。

另一方面，松冈洋右却是右翼分子的景仰者，他在出席国联以前，集军部各派的支持于一身的时候，即已被数为右派的巨头之一。他在办理脱离联盟手续上，色彩更加鲜明，归国后奔走于政党解散运动，立场遂大确定。当时的政党嘲笑松冈的消灭政党思想，但是现在的政治现实，却照他的预想进展着，他的预言竟不幸而中。松冈洋右是现在南满铁路公司的总裁，他计划将日本的重工业移植于满洲，他还在阴谋开展华北，可以说是一个对华经济侵略的

急先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军部和财阀都相当器重他，他的革新思想将在日本上层起相当的作用。

2年以前曾经轰轰烈烈地发表过革新理论，而现在不得不沉默的久原房之助，也值得略为一说。久原是日本二·二六事件的关系者，以前极力主张过“皇道经济论”，及“一国一党论”，但自得参与二·二六事件的嫌疑以来，即持谨慎的态度。他今年已经70岁，当此右翼势力膨胀的今日，也未必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日本议会方面的革新者也有几个，众议院的江藤源九郎和贵族院的三室户敬光及菊池武夫，就是代表者。江藤是个陆军少将，是军人出身的代议士，他现在是以某个国粹政治团体的理事长，发挥着右派主义及行动。三室户敬光及菊池武夫的革新性（实际上也就是保守性或复古性），特别可笑。他们是主张熟读古书的人，不管什么书，只要是古的，就必须读，他们甚至于连文字的使用和书法当中，也要贯彻他们的“国体明征主义”。

日本外交界也有一二个可称为革新派的人物，前驻瑞典公使白鸟敏夫就是。白鸟自己也宣言他是革新派，所以老早即以强力的右派外交家著名于世。他曾经在英文《现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3月号上发表一篇论文《法西斯主义与人民阵线》，极力赞称法西斯主义，攻击民主主义。他甚至断言：“民主主义，究其本质，即是共产主义”，似乎有点近于开玩笑。但他现在却已是日本霞关(外务省所在地)的强硬柱石了。他排斥依赖英美的所谓弱体外交。他

有手腕,有机略,同时脾气非常奇特。有一次在外交官的宴会上,竟因小故飞啤酒瓶打自由主义者的前驻土耳其公使的小幡。中日大战爆发后,他的“革新”外交更加交了好运。他现在积极活动于我国的南北各地,是值得注意的。革新派的外交官,还有一个值得一述的,就是伪满洲国外交官的大桥忠一。现在伪满洲国对外的方针和措施,几乎完全握在他手里,就说是伪满洲的太上皇也无不可。

现在考察一下实业界的情形。要在实业界寻觅主张修正资本主义,排斥财阀的“革新派”,似乎有点滑稽,但是实际上却也有几个站在对外企业的立场上表示强硬的伙伴。第一个我们应举津田信吾。津田原是自由主义资本家曼乞斯特派武藤山治的“干儿”。他之变成“革新派”,固由于武藤之死,但也未免有点奇突。他是在由英日棉业战产生的日印会商的当时,突然变成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者。1932年日印会商的时候,他一变其拜英主义的面孔,而痛击日本外交界之软弱,主张对英强硬,直至今日依然坚持着他的主张。因为“革新派”就是侵华主义者,所以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政府,财界,乃至军部的一部分主张“现地解决”“不扩大主义”的时候,这个家伙的态度却完全两样,他在事变的第三日即向全国的工场宣传事变的扩大必然性,并促他们觉悟。以后又继续执笔写《华北经济的展望》、《列国干涉与中日事变》、《需要中日全面的决战》及《国民殉国是奉公,是我国民的觉悟》等煽动的论文,他特别狂喊:“百亿军费不足畏”,俨然是一个军部的代言人!他还把年来的抗

英言论再三应用于这次的事变中。他还提倡在华北确立日本的棉花国策及羊毛国策；主张于纤维工业以外，还进行多角的经营，大倡其“为国策不计损益”的假慷慨论调，大拍军部的马屁。

其次，还可以举兴中公司社长的十河信二来说。十河的活动方式，和津田信吾有点儿不同。他的“革新”行动的据点，安置在日本政府上，是其以实业家活动方式的特点提起兴中公司不过是满铁公司的子公司；以前说到十河信二，即连新闻记者也都少有知道的。他之成了记者的常识，是林銑十郎组阁的时候起，当时十河是林首相组阁本部的参谋。普通组阁的参谋都是由政客或官僚充当的，而十河却以实业家而当了林大将的组阁参谋，一般人皆吃了一惊。但是当时十河是以关东军及军部一部分强硬派军人为背景，企图强行所谓革新政策。他曾经企图以陆相交椅授板垣，海相交椅授末次，欲林銑十郎迫当时的军部承认。但是软弱的林銑十郎的提议，完全为寺内驳回；在林銑十郎倒无所谓，气愤的是十河，认为“这样的弱体内阁不足与谋”，愤然离开组阁本部，据说从没有再见过林銑十郎。这个家伙态度的强硬和侵华的急进，竟然实现在今日，板垣当了陆相，末次更是当了内相。他现在专以华北为活动舞台，兴中公司将成了积极经济侵略的大本营，是无可疑义的，这个家伙的“革新”动向，更是值得注意。

日本政界及实业界都有元老，“革新派”也难免俗，头山满就是大家周知的革新派大元老，而山本英辅及一条实

孝,也几乎和头山满齐名。头山满这个老头虽不很说话,也不常演讲,但凡有右翼的爱国主义的集合,总是少不了他,他总是以他那缄默沉着的姿势出席,所有右派的活动,也莫不抬他出来。山本英辅及一条实孝也和头山满一样,凡有国家主义的集会,也总必有他们的份,他们也乐于和右派团体发生关系。头山早在明治初年,即已组织过玄洋社,鼓吹日本的国粹,后又设立国权党,刊行《福陵新报》,提倡帝国主义,各方称之为“浪人元老”山本英辅是山本权兵卫大将的后裔,是海军大将,时常发表强烈的革新政治论,一条实孝是一个公爵,以公爵之身而倡革新,近卫文磨可说“德不孤”了。

日本少壮派军人,可以说全部是“革新派”的人物,不过因为“军与政分离”的关系,他们很少说话和行动的机会,只有退伍军人是例外。退伍军人以右派运动指导者著名的,就是建川中将,九·一八事变后右转的赤松克,听说即常奔走于建川门下,其次,以军人资格而作右派政治活动的,还有桥本欣五郎大佐。记得前年我们还可以在东京各车站站台的卖店柜上,到处发见大红封面的《大日本青年党》的宣言。署名领导者就是这位大佐建川,在中日大战爆发前每有演讲会及座谈会,总必发挥他那右派的怪调,现在不知何故,据说已少听到他的消息了。桥本大佐曾被召参加炮兵队,来中国作战,去年在芜湖轰炸美舰巴纳号,就是他干下的事,因此他又被召回国了。

谈日本革新派的人物,原应再加详细介绍革新派理论



家,如北一辉、权藤成卿、安冈正笃、桔孝三郎、大川周明以至大学老教授的蓑田胸喜,小说家的仓田百三等人,但是为篇幅所限,只好留在另篇来详述了。

原载 1938 年 7 月《世界知识》第 8 卷第 2 期

# 战时日本社会危机的发展

## 一、黑暗的日本社会生活

有一个法国作家(Laude Farrere)游历日本回国后著写论文指称日本为“永久封建”的社会。这个形容词以科学的观点说,固然不正确,但自其形容日本人民的贫苦之点说,却有他的准确性,其意义就是说:中世纪黑暗的社会状态,还很浓厚残留在日本社会生活上,并且不是最近的将来可以消灭的。日本社会研究专家山田盛太郎也指日本的劳动状况为人间地狱的工人生活及印度殖民地以下的劳动条件。(据《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苏联的日本问题专家萨伐洛夫对于占日本劳工大多数的农村女工,指称为妓院式的卖身式的劳动者,更可以印证上述法国作家所言非无根据。

日本人民的贫苦到了对外作战的时候更要深刻化。9,000多万的日本民众(包括1,700多万的朝鲜及台湾民众)在战争继续一年后的今日,已被重重的重担压得喘不

出来气息,被种种的铁蹄践踏得遍体鳞伤了。战费的巨款远非日本统治者在战前所梦到的,更非日本人民所能担负,物价的高涨和收入的减少,正是夹攻一般日本人民的两把刺刀,租税的加重更使他们一阵阵地叫苦。日本军阀政府屡次全国性的逮捕和所谓全国精神总动员的实施,也要使日本民众精神苦闷,颓丧以至于窒息。现在日本文化界已经奄奄一息毫无生气了。

但是日本民众在事实的教训之前是要觉醒的,他们有一部分不明了战争之意义,不能积极支持侵略战争,有一部分已经觉悟侵略战争之非理且于他们无益而积极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了,觉醒的日本人民大多数已经奋起企图以实力来挣断侵略战争所加于他们身上的铁链了,前进的知识分子起来领导并鼓吹反战运动;工农阶级及士兵则已开始反战的实际行动了。朝鲜及台湾的反战运动更带上民族革命的深意。日本侵略者,开始挖掘着他自己的坟墓,而其人民的反战运动就是准备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说得好:“法西斯主义者继续打仗吧!……他们粉碎成为微尘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吧了。”

## 二、侵略战争的重负

侵略战争所加于日本人民最大的重担就是巨额军事费的负担。在平时日本军费即在国家岁出总额当中占很大的比重,近年来占了将近一半的比率。对我全面的侵略战

争发动后因为所谓“对支事件费”的激增及新设，而军事费一次增至 61 亿余元，而间接军事费还不计算在内（1938 年度包括特别军事费和普通军事费）。单就侵略战争的特别军事费言，即已达 74 亿元，（包括去年度半年份的 255,000 万元，及本年度的 481,000 万元）。到明年 3 月底止，日本人民所负担侵华战争的特别军事费，每人平均要负担到 106 元之多，单就一年份的全部军事费言，每人平均一年要负担 87 元多。日本人民的负担还不独限于军事费，行政费也是可观的，1938 年度日本的普通预算，追加预算，及特别军事预算共计 836,000 余万元，这样一来，平均每人一年的负担额达 120 元有余。反过来看日本人民负担的能力如何，实在非常薄弱，日寇的国富只有 1000 亿元，仅及美国国富八分之一，即以日本内地人口 7,000 万人计算，每人只分得 1,400 余元。每年国民所得的总额也只有 100 亿元，每人只分得 140 元，仅及英美人十分之一。日本人民以这样贫穷的财力负担上述过重的负担，每一个人每年只剩下 20 元可用以维持生活。日本人民的生活怎能不低下，怎能不痛苦呢！

日本政府加负担于人民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增加租税，其二是滥发公债。自从全面的侵略战争发动以来，日本政府对于人民的课税即渐增加，单就 1938 年度言，在普通预算及特别预算中，租税收入之项则是 22 亿元。每人平均负担 31 元，连地方税加算上去，则每人至少要负担 40 元，关于公债之项，日本人们的负担更为奇重，其影响且不只

限于现代的日本人，即其子孙的膏血也都准备着吸吮了。日本公债截至本年6月15日止总额已达137亿元，每人平均负担196元许，到明年2月底截止，预算日本公债须发至200亿元，每人负担286元多的巨额。日本人民的子子孙孙将永为债奴，已故日本财相高桥是清的《百万公债亡国论》或将证验于未来罢！（以上数字均据国新社特稿）

然而日本政府滥发公债在目前即已加重大的负担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费上。那就是物价的高涨，日本政府无穷尽地滥发公债，但另一方面消纳公债的能力却非常薄弱。去年一年国家收支短缺很多，原拟发行339,400万元公债来弥补，后以扩充生产力需要资金及金融市场硬塞的结果受了极大的限制，结果只发行了15亿元。而这15亿元的公债也只有日本银行销售了28,700万元，由银行团摊派1亿元，邮局又零星推销了6,800万元的爱国公债，共计45,500万元。所余的10亿多元则皆存于日本银行的金库里（据对敌宣传委员会资料第一辑）。侵略战争逼着日本政府增发公债，上面说过，到明年2月底止日本公债将发行至200亿元，这个巨额的公债的绝大部分，当然还是要日本银行来消纳。日本银行就利用这些公债作准备金不断地发行纸币，于是纸币的流通额超过市面的需要，再加以纸币准备金基础的动摇，而币价大跌，物价高涨。

日本侵略战争所以加于日本人民的物价负担不自今日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年）至1935年一般人民的生活费增加了34%（据《时事类编》特刊创刊号拙作），全面侵略战

争发动后其物价上的负担更加逐步增高。据日本银行的调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物价的高涨情形如下：去年8月98.3,9月99.9,10月99.0,11月99.5,12月101.0,本年1月102.7,2月104.4,3月105.3,4月103.3(去年7月为100)。3月以后似稍跌落,但这是受人民购买力减低的一时的影响,事实上日本十三都市4月份零售物价,却比2月份再高了0.7%(据日本商工省发表),5月份的出售物价更上涨了1.8(据东京商工会议调查,1930年平均为100)。但是日本物价截至今日的涨价还不算厉害,准备增发的公债发行后其涨风当更可观。侵略战争给与日本人民的影响将如何惨苦,是任何人现在所形容不出的。

### 三、日本人民的反抗运动

在侵略战争加重的种种剥削与压迫之下的日本人民,厌恶战争,咒骂战争,甚至于奋起反对战争,反抗穷兵黩武的军阀,自然是事理中的事,日本人民上自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士兵及殖民地民众,大多浸润于厌战与反战的思想中。他们的一部分勇士已经起来实行苦斗了。日本有觉悟的人民写过不少反对侵略战争的论文,而包含日本所有的职业会社,劳工组合,农民组合,宗教团体及其他一切的反战组织的日本反战人民阵线所提出的要求最为干脆扼要,现在介绍于下:

(一) 保卫和平,立刻停止对华战争,撤退在华的日本

军队,尊重大中国的独立,与中国人民树立真正的友谊;

(二)反对扩大军备和增加军费,拥护裁军,减少并移用军费及其预算于救济事业上;

(三)粉碎“战争是创造之父”及“战争是文化之母”的理论,要求保障个人权利,出版,集会,演说等自由。

日本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不但提出要求,并且为争取所要求的事项的实现而实行斗争了,日本的左派分子及自由主义者因为反对侵略战争而被逮捕了多少次了,日本工人因为反对侵略战争而屡次发动罢工和怠工运动,农民也和工人配合暴动了几次。去年普遍于东京、大阪、京都、爱知、静冈、兵库、冈山、新潟、福岛和歌山。秋田、岐阜、大分、富山、群马、长崎及北海道等一道三府十六县的大逮捕,今年2月18日死伤数百人逮捕1,000多人的士兵和家属的大骚动,中日大战爆发不久神户海员工会罢工的酝酿及新潟近郊丸新制油所的焚毁,2月中旬东京重工业中心即川崎和口住士兵的哗变,等等事实,都是日本人民实际反战的证据。反战运动更是风行于台湾及朝鲜两地,台湾民众怀念祖国心切,朝鲜民众要求独立的情绪更高,这两地的民众都和我国取得密切的联络,以实行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今年3月3日台湾工人领袖高斐在宜兰袭击日本司令部,约略同时台湾共产党暴动炸毁久留米储油池,及桦社一郎兄弟领导雾社番人的暴动,都是我国关系方面联络台湾革命党人发动的,即如我国英勇空军之轰炸台北的日本空军根据地,也是得自这样的联络,台湾民众的反战

运动,对于全面抗战有莫大的作用,朝鲜民众的反战斗争远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即已开始,当日本侵略者运兵由朝鲜赴东三省的途上即被朝鲜革命党人所领导的农民炸翻了一列兵车。现在朝鲜人民反战运动更为具体化,扩大化了,看他们民族革命战线的统一化和与中国反帝国主义革命切实联结的觉悟,已可窥见一斑。最近还有朝鲜人参加我们的军队共同抗战,这些事实和经过都在拙作《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一书中叙述得非常详细,为节省篇幅起见拟不详述。

日本政府对于反战运动是采高压手段的,虽说日本人民的反战随着日本社会危机的深化而日益进展着。日本1937年全年份劳资纠纷的件数达2,106件,参加人员达211,611人之多。和1936年份的件数1,975,参加人员92,724人比较增加了很多。(据6月29日《新华日报》所载)分析劳资案件的时间分布,战争前占去绝大部分,自战争爆发的7月以后即渐减少。7月129件,8月100件,9月65件,10月59件,11月46件,12月44件(据上引《新华日报》),这些事实,一方面是在证明日本社会危机不因九·一八以来的侵略而减轻,一方面又在说明日本侵略者假借战争之名高压劳工的事实。

然而日本军阀政府的这种高压,并不能削弱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高涨,它适足以增进日本社会革命的发展。潜行数年的日本共产党,最近更趁日本政府对外作战的机会活跃起来了。根据日本官方宣布的侧面的资料,前年12月



5日全国大检举的第四次共产党事件,在中日大战中更发展成为日本全国的严重的问题,日本共产党自昭和八年(1933年)在东京解体以后即未再建成功。至昭和十一年始建立“泛日本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但不幸该年12月5日即为日本政府所大批检举。被检举的地方是北海道、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福岛、茨城、千葉、埼玉、群马、东京、神奈川、新潟、富山、石川、静岡、爱知、三重、岐阜、京都、大阪、兵库、冈山、广岛、鸟取、佐贺和歌山,高知、德岛香川、爱媛、福冈、大分、熊本、冲绳,共一道口府三十四县,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无不波及,被检举人数达一千三百余人,造成昭和八年以来的新记录。

日本共产党的反法西斯运动自中日大战爆发后即又加上侵略战争运动一并进行,去年12月中旬的大检举正可以和上述检举联结起来考察。去年12月15日晨,东京警视厅及全日本各府县警察部密令所属警察人员总动员大举搜捕,仅东京一地即已逮捕108名,日本全国被捕者共达370名,其中以左翼运动指导者及工人领袖占大多数,特别是从来和共产党正统派相对立地位的劳农派几乎一网打尽。日本政府当局公开承认劳农派的积极活动及其正统派的合流。东京警视厅,警保局长富田提出日本议会的报告书中也可找出日本共产党最近发展的线索:

“最近日本共产党与从前的共产党不同,他们目下已混入大众团体中,做非法的活动,此种转向是昭和十年(1935年)受第三国际第七回大会所变更的方针指导的,

日本共产主义者照样地采用，这种方针在于把反独裁政体，反帝国主义及反战运动等主张传播于工农大众，以为根据而组织大众。其实证就是标榜拥护劳动生活，树立和平政策等等口号，使大众向着反战运动进行”（据拙作《日本人民反战运动》20页）。

富田更谓自从这次中日事变以来，日本共产主义者热烈支持第三国际的反战方针，阴谋百出，的确的，日本共产党是在策动日本的大众起来作反战的工作，他们利用的口号是：“援助出征士兵的家族”、“照付出征士兵的工资”、“免除出征士兵的税金”、“援付出征士兵的债务”、“树立和平政策”等，表面上是温和的，而其实效却很大。这次的大检举和前年的共产党大检举案的联络关系，富田也指明过：政府在昭和十一年曾经检举过一次，那时被捕者虽达1,000名之多，但仍不能一网打尽。这些漏网者就是所谓：“劳农派”又据国新社6月7日东京通讯，上述全国共产党检举事件直延至去年年底始将最后一批的新兴佛教联盟友及文化运动者柴田等19人全部检举，始告一段落。

日本政府屡次逮捕的政治犯不见得尽是共产党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和冲绳县（以前的琉球）小学训育员大批被捕的两宗事件，新兴佛教青年同盟自昭六年以来即已开始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即在其委员长尾妹义郎被捕后，其他盟员仍努力活动。直至去年10月该同盟书记长林灵法研究部长小本昭顺及其他干部26名一同被捕。冲绳县因此事件被捕12名，其中由小

学校的训育员占大部分。他们公然自己编印教科书,在课堂里灌输反法西斯的思想。日本反法西斯的思想如何深入民间可以想见。

日本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思想,不但深入民间并且达到队伍了。自从中日大战爆发以来,南北各战场军俘获不少的反战宣传品,目前我军又于克服汾城之役,在俘虏身上检出日本无产党等七政党共同印发的告同志书及反战传单多种,内容充溢着反对侵略战争,促日本士兵觉悟,起来打倒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及乘战争加强直接榨取的财阀,在所获反战作品中是最简洁而又具体(参阅本期抗日文献)。日本反战宣传在军队中业已发生效力。各战场上日本军队的哗变和士兵的厌战自杀,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驱使,另一方也是反战运动促成的。

#### 四、日本法西斯政府防范的加严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是在日益发展中,从日本政府当局继续讲求防止的方法即可证明。最近日本政府又要发动所谓“优良警士恳谈”,由内务省警保局就全国各县府警察中每个府县挑选1名至3名共69名,定于7月11日至13日3天集合内务省开恳谈会。将由各地警士报告各当地民众的厌战情形,尤其重视农村方面的实况。听说警察局就要斟酌各地现状指示应采取的方针和手段,例如欺骗,诱胁,镇压等等。对于反战运动的有力分子,决定随时

加以逮捕和监禁。同时内务和文部两省并已拟定警务机关及地方行政机关与教育机关合作的办法,将更厉行愚民政策。等待上述恳会开过后,所谓“优秀警士”回归原驻地,将经由当地的町村长及学校校长等,以对一般人民和学生灌注荒木所狂吹的所谓“日本主义精神,”日本法西斯侵略政府对付反战运动的手段,到此时又高一层了。

但是日本人民反战的激潮,决不会因为日本侵略政府一时的欺骗或压迫而减退;这个激潮将随日本人民生活穷苦深化及我们抵抗的进展而发展。这里蕴藏着一个社会革命的火药库,它将以日本军阀疯狂的侵略战争为导火线而爆发,它将在我们坚持抵抗消耗敌人至相当程度时而爆发。

原载 1938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1 期

## 日本工潮新阶段的开始

日本政府非常时的法令及右翼劳工团体妥协的政策，依然阻止不了日本的罢工运动的发展。据最近东京四月九日塔斯社电，日本工潮的澎湃，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代言机关报的《日日新闻》，也不得不予以揭载。据云：1938年2月间，东京的罢工工人人数是7,996人，但今年2月间的参加工人人数，激增至10,213人，该报并且承认受战时剥削最厉害的兵工厂工人的罢工次数尤为激增。

依照战时日本的统制推论，日本的罢工次数是应该减少的。其原因约有数端：其一，日本政府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即颁布种种非常时的法令，严厉取缔工农及一般大众的骚动；其二，反抗日本政府的高压或被认为有反抗可能的左翼劳动组合（即工会）及无产政党，全部遭遇解散的命运；其三，右翼的劳动组合及干部右倾化的社会大众党，皆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采取不罢工的政策。因有这些原因，所以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罢工次数曾经一度减少过。1937年下半年逐月的罢工件数如下：7月，129；8

月,100;9月,81;10月,59;11月,46;12月,44。

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变态的现象,日本工潮的潜流,是随战争的扩大及一般大众生活的低下而继续增长着,它终于冲破了日本政府及反动化无产党的堤岸,工运由衰退而日益增长了。详细的情形虽然还没有得到报告,但只就上列电讯,即已可明了这一大势的趋向了。

日本工潮之急速增长,在战时日本已达到十分疲敝的阶段上,毋宁说是必然的归宿。在日本侵略者总动员各种力量以进行“孤注一掷”的侵略战争下,日本劳工所受的痛苦绝对不是日本好战军阀所能领会万一的。日本军阀赐与日本人民的重要恩惠,首推物价之高涨。与工人阶级关系最深刻的零卖物价,竟从1927年7月的116.2,增涨至1938年12月的145.8,(据商工省的调查。)在这一年半的期间,约略增涨30%。其负担之加重可知。对于日本物价高涨,所加于日本工人的负担,日本政府或许以欺骗的语调,说“工资并不低薄”(最近日本陆军省代表之言)以为搪塞罢。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需工业尽管急激需要着熟练工人,并且相当提高工资以为钓饵,而工人的实质工资依然是低下的。日本零卖物价虽如上述激涨,但是工资的增加非常迟缓:其指数只由1937年7月的107.6,涨至1938年12月的120.7,尚不到2.0%(据同上调查)。此外还因为战费负担,国民献金,乃至家族从军引起的种种负担,等等,逼得日本工人不能不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收入,实收工资比定额工资多的原故即在于此。惟其如此,所以日本工人

的死伤率增高了 15%(1927 年比 1922 年)。

在这种情势之下,日本工潮自然要增涨,日本政府高压下的日本工运的反涨,可以认为是战时日本工运新阶段的起点罢!

原载 1939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2 期

## 二年来没落过程上的日本内政

在我们全面抗战的两个整年的期间，日本内政因为我们英勇坚持抗战的促动，发生过急激而又复杂的许多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敌人在主观上虽然急于加强其政治力量，但在客观上则愈改革政治机构，调整行政人物，其政治的危机倒反日益深刻化。日本内政这二年来的演变，就其大概的节目来分割阶段，则大体上可得三个时期：（一）行政机构的调整时期。这个时期适当于中日大战爆发后至近卫内阁大改组的期间。在这个时期，日本为着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连三接四地增设战时行政机关，故可以称为“行政机构的调整时期”。（二）行政人物的积极调整时期。这个时期适当于近卫内阁的几次大改造至近卫内阁总辞职的期间。这个期间的改革皆偏于行政人物的更动，并且相当具有积极性，故称为“行政人物的积极调整时期”。（三）行政人物的消极调整时期。这个时期适当于近卫内阁总辞职而平沼上台以至现在。在这个期间，人物的更迭，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在人物本身一代不



如一代,在动机上也不过调和各派的冲突,或拉甲派抵制乙派而已。所以称这时期为“行政人物的消极调整时期”。

自消极的人物调整时期开始以来,日本内政所蕴蓄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就显明暴露出来,并且日益深刻化,各派的对立和斗争,演至最近大有剑拔弩张短兵相接的情势,已经不是什么“总亲和”,或“举国一致”的空头口号所能掩饰的了。以下分述其各期的特征,并推断此后的动向。

## 一、行政机构的调整时期

七·七卢沟桥事变原是日本侵略者想以恫吓逼中国屈服的把戏,但是事实出了他们意料之外,吉星文将军先给与疯狂军人以迎头痛击,继之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国民的同仇敌忾,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了全面的抗战,终于粉碎了日本的侵略者的整个迷梦。自八·一三以后,日本侵略者始认识清楚:远东情势已起了90度的变化。于是日本政府急忙谋适应日益扩大化的情势,忙煞于战时行政机构的增设了。

首当其冲的近卫内阁,成立于准战时体制的末期,由准战时到战时,自然是一层由量变到质的变化,日本政府为适用这个变化的需求而手忙脚乱地增设了不少的内阁补助机关。其中最主要的有内阁参议制之创设,企划院、厚生省、企划审议会,乃至战时太上内阁的大本营的设置。这些设置一方面,是战时的需要,他方面也就是军阀的要求。

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是一意追随军阀忠实服务的。近卫在七·七事变后不久的7月23日开幕的日本第七十一届特别议会上,坦然宣告“以事变为中心”的新方针。9月4日开幕的第七十二届临时议会上,又有更热烈的讨论,近卫则强调“对外强硬对内协调”的主张,并在这种主张下谋加强他的政治机构。

首先出现的补强机关,就是内阁参议会,其创设法案在1927年10月13日照原案通过枢府本会议15日经内阁阁议发布的,任命陆海军界,政界,财界,及外交界的十大巨头为参议;其目的在补强现内阁,其任务是参预内阁关于“中日事变”的重要阁议的筹划,参议受着国务大臣的礼遇。参议的人物分布如下:宇垣一成,荒木贞夫(陆军),安保清种,夫次信正(海军),町田忠治,前田米藏,秋田清(政界),乡诚之助,池田成彬(财界),松岗洋右(外交界)。内阁视参议为“头脑托拉斯”,但事实上,适足增加了“一国二公”的难局罢了。

内阁参议会事实上的作用只是联络与疏通,对于设计方面当然不能有什么贡献,所以近卫内阁又于10月间合并企划厅及内阁资源局为企划院,并扩大其职务如下:(一)起草扩大并运用平时及战时综合国力的法案,附加理由上陈于首相;(二)审查各省大臣提出阁议的案件中关于扩充并运用平时及战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大纲,附加意见经由首相以上陈于内阁;(三)审议关于扩充并运用平时及战时综合国力的重要事项的预算,附加意见经由首相以上

陈于内阁；(四)就国家总动员计划的设计及执行，图谋各厅务的调整和统一。于此可知道这个企划院，比较是有实际的“头脑托拉斯”的本质，并且是为处理一切战时计划统制而设的，在它直属于首相之点，更是有集权的作用。正和内阁参议制事权分散之点不同。企划院因有其具体的性质和内容的要求，所以至今年平沼上台后1月12日又有七局大扩充案之实施：在其事务方面统合了现在的大藏省主计局，内阁法制局及内阁情报部；在其职权方面强化了总动员业务的一元的统制，企划院总裁并得以不管部大臣而列席阁议。

在日本战时政治机构的增设上特具意义的机关，要推大本营。它不但统合海陆军两省及参谋部的人员，充当一切军令，军事动员，及军事编制的最高统帅部，并且是强化陆海军两大臣的权限，使得实际上指令战时内阁的一种大改革。依据大本营条令，新大本营是天皇之下的最高统帅部(第一条)，这个条令不但适用于战时，并且适用于“事变之际”(第三条)，可见其权限之庞大，在军权指令政权的日本，正是强逼政府听命于军人的一大改革。所以自大本营成立以来，内阁许多施政方针，特别是外交方针，取决于军人，或由在外军人肆行不羁。

此外，如以所谓“保健卫生”及处理社会事业的任务而于1938年1月增设的厚生省，也是加强战时内阁的一个机关。

在日本战时政治机构的增设上，有一点不能忽略的地

方,就是加强内阁的力量的反面,寓有削弱议会的监督力量及既成政党活动力的作用,使立宪政治实质上完全变成军事法西斯独裁。

## 二、行政人物的积极调整时期

以贵族养尊处优的身份而担当“前所未有的难局”的近卫,最初也抱着决心谋由加强内阁以适应战时状态,但是我国全面抗战的扩大与增强,却更急速地增加日本政府的艰难。自我弃守南京以后,中日大战变成持久战,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梦完全为所粉碎,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财政的困难益发倍蓰于以前,引起了许多国内的政治纠纷(例如总动员法案及电力国营法案遇到第七十三届议会,政党乃至财界各方面的抨击)及社会的骚动(例如去年2月17日防共护国团占领政友会及民政党的本部,3月3日社会大众党党首安部矶雄为暴徒所殴伤)。公子哥儿的近卫对于这种内外交迫的危局感觉十二分棘手,他原不在乎这个首相的位置,所以去年4月初旬即称病表示消极。当时,政党,财界,对于近卫之去留不加可否,近卫的亲友且有劝其早退的人,但是利用近卫为理想傀儡的军部及右翼势力,却强要近卫勉为其难,不但未次内相恳切挽留,《中外新闻》掲載“军部通知政府,反对首相辞职”的消息(4月12日),当时的陆相杉山更承军部之意进一步要求近卫改造内阁,以谋加强。

近卫在这欲罢不能的情势下,决定了腹案:(一)大改造现内阁,补充有力人物;(二)改革议会制度,以削弱议会的牵制。近卫内阁的大改组至5月26日始完全表面化。经这次大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增加了四种力量:(一)任命日本朝野年来所注意,拥有军人系财政界相当力量而被称为惑星的宇垣一成成为外相;(二)任命日本银行总裁并在日本财界负代表声望的池田成彬为藏相,后又兼商工相;(三)任命曾经一度负少壮派军人领袖并与真崎共握日本军界一系牛耳的陆相荒木贞夫为文相;(四)接着又以当时少壮派军人所推戴的领袖,板垣征四郎,代替了比较老成稳健的杉山为陆相。近卫内阁到这时候面目完全一新,并且由陆海军人占了5把交椅,俨然军人内阁,特别是拥有三个首相级的阁员及一个财界代表,弱体内阁骤然增强了许多,近卫以下日本政界要人,或者大都庆幸近卫苦心孤诣溶化各党各派的势力于一炉,及“举国内阁”的成功罢,他们满以为各派彼此的冲突可以避免,战时政策的施行可以顺利无碍。但是崎岖路上的荆棘,依然满布着,绝对不容日本政界主观上的幻想。

近卫内阁大改造后,又组织了什么五相会议,及内政四相会议。前者的份子为首相,陆相,外相,及财相;后者的份子包括首相,内相,文相及财相。组织这两个会议的动机,一方面在政务的分工,一方面又是在内阁集权化。五相会议的讨论对象偏重于军部与外务省及财界的协议;四相会议则集中于内政的调整。然而日本当时内外的危机与矛

盾,并不能允许日本政界如是乐观,横陈在眼前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动荡,财政的枯竭,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衰退,国际关系的日益孤立化,侵华军事及政策的碰壁,等等问题,又把近卫内阁一团的和气吹得四散,把日本政界及社会的波涛重新掀起。

近卫内阁主观上夸耀的坚固城壁的坍塌,开始于宇垣外相之辞职。近卫内阁五相会议之设,固在收集权化的效力,但少壮派军人的狂妄却亦随此集权化而益加增进,无论在内政抑在外交,自不容少壮派以外的人插嘴了。于是宇垣外相尽管主张调整日本与各国的关系,和苏联进行悬案的谈判,而关东军却偏偏挑发张鼓峰事件,造成了日本传统的二重外交最暴露的局面,丢尽了日本外交当局的脸。宇垣与少壮派军人的冲突,到对华中央机关设置问题时完全爆发。兴亚院的设立,依军人的要求剥夺了外务省的权限不少。陆军当局的意见是将处理中日问题的权柄,全部交给兴亚院,由兴亚院会议来处理,甚至于主张:五相会议只处理国内问题。事实上,兴亚院的行政人员几乎全部是军人。宇垣对于这种措置非常愤慨,终不得不继侵华战争停止线的根本冲突而借口于兴亚院的权限归属问题,率然挂冠而去。

宇垣之争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代表着元老重臣及一部分财界的要求。故宇垣去后,池田颇为怏怏不快;池田与末次的冲突日渐成长。少壮派军人与元老重臣的水火,因粤汉占领后军事的停顿与军部扩大战争的冲突而日益深

刻化。军部欲借扩大战费的问题及总动员法第十一条实施问题，以压迫元老重臣派及财阀，但是他们的答复却是：（一）“战争究竟到什么时候始能结束？到什么地方始能停止？”（枢密院对近卫严厉质问）；（二）当情报部发表实施总动员法第十一条的消息时，财界大起恐慌，各种股票皆大跌价；（陆军）次官东条发表同时对中苏作战的主张时，财界更为之哗然。去年12月30日，东京即传近卫内阁不再加以大改组，就必须总辞职的消息。近卫也在其宣言中声称：“加紧政府统制”的必要。又日本政界也盛传：“日本改造东亚的重大工作，需要日本政府获得人物上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妥协，就是军部等财政当局能与负外交责任者和衷共济，始可。”这些都在证明近卫内阁内部的冲突已相当激烈及日本各方面政见的不统一。近卫内阁终于因为末次内相与池田财相的主张无法调和而全班卷铺盖，滚蛋大吉。

### 三、行政人物消极调整的时期

近卫断然辞职后，在匆促间继之登台的是“最不负众望的”平沼内阁。平沼内阁虽说是近卫内阁的延长，平沼内阁的阁员虽说有6个是近卫内阁的阁员留任的，但是实质上总令人兴“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和近卫内阁大改造后的阵容比较，实难免相形见劣之讥了。平沼首相的人望与魄力不如近卫，姑不说它，即阁员方面，现外相有田不如宇垣，内相木户也无末次的魄力，藏相石渡只是一个庸碌的

财界技术家,较之财界代表人物的池田,更是一个小巫见大巫的对照了。此外,樱内农相及前田铁相代替了永井柳太郎及中岛知久平,只是政党阁员的更迭,没有多大的意义。于是可知平沼内阁的弱体远甚于近卫的弱体时代,所以这次的变动,只可以说为行政人物消极的调整罢了。

近卫内阁既为军部与财界的冲突,右翼法西斯与元老重臣派的对立而总辞职,平沼内阁自然是为调和军部及右翼法西斯与元老重臣派及财界的对立而登台。平沼在未登台以前是一个著名的“革新政治思想家”,所以元老重臣派及财阀对之非常猜忌,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原因在于他秉承元老重臣派的密旨,答应履行元老重臣派所给予的条件。因此,他上台后什么政策纲领都没有具体发表过,而只发表一些空洞的“对内总亲和”,“对外亲和万邦”的口号,随后而来的是“日本既不是民主集团的国家,也不是极权国家集团的一员”,并且在兴亚院联络部官长会议上发表“不要胡乱排斥中国沦陷区第三国的权益”的训词。他对于内政,不但没有比近卫内阁更积极的“革新”,即连近卫内阁当时提倡的议会制度的改革,乃至新党运动,也都推开不敢再说一句。在财政与外交的方针上,平沼之得财阀方面的暗示,只就正月初近卫内阁总辞职之后,池田即赴湘南金泽访问平沼两次,及平沼受命组阁回国东京后,首先访问平沼的又是池田。据传,池田对于财政方针及藏商相人物问题,皆有相当的进言,即关于欧洲的外交方针,也有相当意见提出。我们相信:平沼之接受池田的进言,后来作



为池田接受就任物价委员会委员长的交换条件。池田左右财界的魄力,表现在他泰然发表“强制储蓄”的意见——这种意见,在石渡财相口中还觉得十分羞涩。平沼因他全盘接受元老重臣派及财阀的意旨,所以军部相当的愤慨,甚至骂他为“奸通首相”。

另一方面,在军权指导一切的战时日本,平沼又自不能不接受军部方面的更严格的条件。陆军最初希望近卫就任外相,未得近卫的同意。关于政治方针,则提出三大原则:

(一) 强化防共协定——决定并遂行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的外交方策;

(二) 踏袭近卫内阁所决定处理事变的方针尊重设置五相会议的趣旨;

(三) 为扩充生产力,振兴贸易,及使物动计划完全而扩充强化企划院。

平沼处于两大之间实在左右为难,其中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外交方针的决定,自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前夜起,日本政界即为是否立刻加入军事同盟问题引起了大波澜,平沼弄到头痛额烂,几至辞职。当时,平沼秉承元老重臣及财阀的意志不愿立刻加入这个同盟,但是少壮派军人却极力主张加入。代表少壮派军人在外意志的驻德大使大岛中将,贸然答应希特勒加入同盟,而“平沼内阁经3月考虑对付欧洲情势的方针”(马场恒吾之言),终不得不暂时观望,因为元老重臣之观察,疲于侵华战争的日本,已不堪再开

罪英美法，所以绝对阻止政府加入德意军事同盟。即强悍如板垣，也无可奈何，遂致受了少壮派军人加以“叛徒板垣”的唾骂。右翼法西斯及少壮派勾结，大大进行其“反板垣，倒平沼”的运动，甚至恫吓平沼说：平沼若不答应参加德意军事同盟，则将以对付犬养及冈田的手段（暗杀）对付他。

军部机关报的《国民新闻》屡次著论对平沼内阁大加抨击，最近更将日本“丧失政治”的责任加在平沼内阁身上，言里言外皆含有平沼辞职之意：

“事变由武力第一的阶段到促动综合政治强力的阶段已有半载之久。遂行战争的外交断非一外交当局的官僚事务，政治的最高责任者的总理大臣应在军事、经济等一切的要素上，自己决定根本原则。但自组阁以来，召开所谓五相会议前后凡六十余回，国民所听到的结论，却只不过‘关于欧洲情势对策已得意见一致’的区区十数字罢了。我们固然不是像低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把政治的全部发表给国民。若是有责任心的为政者真正持有指导国家与国民的方策，那末有时掩国民之眼，塞国民之耳，或许是不不得已之事。但若此种做法是为着掩饰为政者自己的无能及优柔，那末事情就不能宽恕了”（5月27日社评）。

真正的，气死了平沼老头子，干不上去，又不能下台，没办法，只好学近卫去年五月的故智，来一番什么补强改组，强拉小矶国昭和田边治通再上台。但是小矶上台后，倒反增加小机、板垣之间的新对立，平沼内阁的前途更加难关重重，岌岌不可终日了（参阅本期《东京政权问答》）。平沼现在虽是一个日本政治的最高责任者，但是行政方针即不能决定于自己，在元老重臣财阀与少壮派军人的夹持之下，左右袒皆不可能，元老重臣财阀尽管阻止平沼政策的急进于国内，而少壮派军人却发动在外的力量，寻事生非，欲以在外行动的胜利压制元老重臣财阀在国内的优越地位。

两个月前，西园寺元老虽有舍身救国“即倒于少壮派枪下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但是少壮派却要以蛮干的办法强奸平沼内阁的外交方针，追随他们。事亦凑巧，英国近来对日态度的剧变，供给了少壮派军人压制元老重臣及财阀的良好条件，日本加入德意军事同盟，已在进行中，英日谈判万一于日本有利，少壮派军阀的气焰将更高涨。然而日本政治机构的复杂性，国内外客观情势的艰难，及日本军人政治家的低能，绝对不能造成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独裁，事务的演变只增加日本内部派阀的对立和纠纷，“难为冯妇”的平沼，勉强支持的日子，大概也是不会长久的。

处于战时军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军人的猖獗是要日益增大的。平沼上台当时声言放弃的议会制度改革案，及全国一党连动，最近似又不能不再度抬头，所谓“国民再组

织”的问题,现已成了元老重臣派与少壮派军人明争暗斗的标题:元老重臣挟天皇以令军部,而军人则专以暗杀相恫吓,昨日的消息告诉我们:右翼法西斯与军人的勾结,又在企图暗算内大臣汤浅,宫大臣松平,及牧野伯爵等重臣了。西元寺也在他们窥视之中,平沼老头更是战战兢兢不可终日,日本政治上层机构此后的多事,正可以逆料。此外还有两种的压力,促进这种纠纷的进展:(一)日本下层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及(二)中国英勇持久的抗战。政友会内部的分裂,民政党对法西斯的应声,反映既成政党的瓦解,民主政治的衰落,但是独裁政治在日本,也不是立刻可以生长的,旧的政制已没落,新的又未建立,此后日本政治将如侵华军事,一直徘徊、动荡到总崩溃为止。

原载 1939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6 期

## 日本外务省派阀斗争及其背景

### ——战时斗争激烈化的秘密

—

日本最近外务省的纷争问题，引起了日本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的确是日本外务省有史以来未曾有的轩然大波。但是日本国内外一般人士的推断与分析，都不正确。我国论客大多视为单纯的贸易设置问题，日本论客则又视单纯的外务省内部派阀斗争问题，这两种观察者的脑筋，都太过于简单，前者所犯的毛病是近视眼，后者所犯的毛病是“见树不见山林”。吾人不否认日本外务省内部历来派阀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斗争，但其派阀的斗争演至最近，其所受外务省外“特种势力”的促动，却已不是那么单纯了。

然则所谓特种势力，究竟所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指导日本全政局转动的几种上层力量。因为日本政治机构内

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存在，所以指导日本全政局的转动，也就产生了复数的力量，又因为是复数的力量，所以自其动的形态看来，也就形成了复杂错综光怪陆离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且浸透于日本政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次外务省的“骚动”，自然也不能是例外。具体地说来，日本论客所论列的什么欧美派对亚洲派，什么传统派对革新派等等的说明（如平河道雄及岩渊辰雄等人的论文——皆载《改造》11月号），若不能道出各派在每一个时期转动的动机及其背景，则徒然使读者读后莫名其妙。再如马场恒吾等人，只管责备阿部内阁，也未把握住问题的核心；《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借题对阿部内阁大肆攻击，倒是巧妙地并又老实地供出军部狡猾阴谋的一面来。

简单一句话说，在二元性的日本外交局势下，每一种日本外交问题的背后，总有两种力量交手的“黑影”在摆动。因有这种力量交手，所以外务省派阀的斗争就变得非常怪异微妙，有时竟有不合常识的事实发生。例如这次志在调整日本与英美关系的阿部首相及大家指为传统派而非军部的理想人物的谷次官（他替野村外相握外交实权，承元老重臣派的意志佐阿部进行英美关系的调整），竟答应军部要求，决意设置贸易省，而结果倒反为现由传统派占压倒势力的外务省全体官僚所反对，这种事实只从表面上是不能了解的。

## 二

日本外务省派阀的存在,我们不否认,但更重要而必须认识的,是派阀斗争背后元老等稳健派与少壮派军人的交手。这两派的交手所反映外务省的明争暗斗,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外交陷于“无路可通”以来,尤其呈现错综复杂的现象。

日本外务省的主要部分是政务局。所以外务省官僚的斗争就集中于这部分肥田上。自政务局分欧美局与亚洲局以后,日本外务官僚,也就因此分成欧美派与亚洲派:前者的主干是币原、出渊、佐藤、及广田等人,一般称之为外交阵营的元老;后者的主干是有田、重光葵、谷正之、及白鸟敏夫等人。这两派拥有悠久的斗争史,亚洲派的少壮分子,对于欧美派升官发财的迅速,常存不满,图谋挫其优势。在田中内阁当时,谷与白鸟即勾结政务次官森恪,以东方会议为中心舞台,大事活动,并打击欧美派。在以前日本外交上,欧美重于亚洲,外交界也自以所谓欧美派占优势。九·一八事变以来,亚洲重于欧美,亚洲派遂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势力。但是外务官僚的斗争也随之集中到亚洲派的阵营中来,重又分成传统派与革新派。前者的意识偏于维持现状,而后者偏于革新;前者的派系较靠近元老重臣系,而后者较接近少壮派军人。

九·一八事变和五·一五事件,造成有利于亚洲派的情

势，币原外交退阵的结果，欧美派降于次等地位；在斋藤内阁，广田虽以玄洋社出身关系及中立态度被任为大臣，但当时的次官则为有田，并由谷正之任亚洲局长，白鸟敏夫任情报部长，革新派占实际的支配地位，所以终于不能不实行脱退国联会。

但自那个时候起，白鸟的作风太过于骄傲，视广田，有田及重光等前辈为无物，引起他们的恶感，导致演成亚洲派的分裂。这次外务省骚动中心人物的谷正之次官，当时加入了有田的阵营中，今日已和白鸟成了敌对。于是，有田，重光及谷等人形成一派，一般称之为传统派；白鸟虽觉孤立但也不示弱，遂努力组织革新派与之对抗。这两派遂成了今日支配“霞关”的两大派阀。

### 三

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孤弱的革新派发展的机会，白鸟乘战时各方都要求革新的时会，培植自己的势力，遂得栗原正和松宫顺两支生力军。白鸟先放逐当时东亚局长的石射而提供位置与栗原，栗原就任东亚局长后，即便大刀阔斧，驱逐传统派而布成清一色的革新阵营。松宫是当时的会计课长，当然也是革新派的柱石。当时，外务省内高等官的半数（在46名以上）听从革新派的号令，可说是白鸟派的全盛时期。当时甚至于期待着白鸟外相，栗原次官出现，其威势之浩大可知。



革新派势力之膨胀已足与传统派分庭抗礼，外务省外的某种力量，就摆弄起魔手来了。关系日本外交的斗争问题，早在近卫内阁时代，即以兴亚院问题出现过，问题在于割裂外务省关系对华外交的几乎全部权限，移归兴亚院。这是军部用以对抗稳健派军人外交家宇垣外相的一种作法。当时反对的意见充溢于外务省，反对运动的中心在于直接受害的亚洲局长栗原，所以他的态度也特别强硬。少壮派军人更乘此机会，唆使革新派鼓动风潮，推波助浪，以期赶走宇垣外相。栗原等人的强硬反对，虽未阻止成功兴亚院的设置，但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赶跑了“惑星”的宇垣，得以进行拥护白鸟为外相的运动，白鸟原被宇垣放逐，将赴意大利，也以此故退回船票，奔走于外相争取运动。但是近卫对于革新派头目的白鸟敏夫不甚惬意，反把外相椅子交给传统派的有田八郎。白鸟终不得不怏怏然赴任罗马，收渔人之利的是少壮派军人。

#### 四

宇垣挂冠去后，继任外相的传统派头目有田，开始培植传统派势力，以向革新派进攻。当时受革新派压迫的外务官僚，大都集中到有田方面来，重光及谷等人的直系，不消说，即来栖，掘内，天羽，及吉泽等欧美派的残余，也都加入，形成一个扩大传统派，有田大可以阔步于外交舞

台上了。

中日战争爆发后,军部要求日本外交一面加入防共协定,一面对中苏实行两面作战。有田曾经运用巧妙的手腕,以牵制苏联的理由加入了德意日防共协定而避免了对中苏同时作战,很得到国内一般的欢迎。但是侵华战争的发展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难。第一,日本加入防共轴心,正与英美法正面冲突;第二,为要圆满推进对华的外交,非与英美法周旋不可。日本主张打开现状,在理论上须与德意协力,但在东亚的实际情形下,又须与英美法调和。有田虽然巧妙地以苏联为日本外交的假想敌,但不敢强化防共协定至缔结军事同盟的程度,一方面又与英美法进行国交的调整。可是这种微温的作法,始终为军部所不满,有田外交的致命伤也就存在这里。革新派遂乘机进行猛烈的活动,驻意大使白鸟和驻德大使大岛,在外策应,甚至武断地答应德意加入国事同盟的提议,曾经引起日本政界的巨波大浪,在吾人脑中,自然还是新鲜的事实。

当时,军部正极力主张加入德意军事同盟,所以暗助革新派向传统派进攻。革新派虽是势孤力弱,出席外务省干部会的人数不满十人,但却态度非常强硬,栗原及松宫对有田、泽田、□西、吉泽、松岛及三谷等传统派,无时不在伺机进攻。当时日本国民的视听固然为英日东京谈判所吸引,但是加强防共轴心的运动,也未停止过。

## 五

日本军部始终利用外务省派阀的斗争，削弱与之对峙的官僚的力量，日本官僚据以对抗三宅坂的霞关也常因为内部的争执而提供军部得渔人之利的机会。在苏德不侵犯协定成立后，传统派与革新派遂至两败俱伤。军部借政府不及早加入德意军事同盟致使德国奔向假想敌国的苏联为口实，推倒了平沼内阁，有田也自遭遇“树倒猴孙散”的命运。传统派阵营虽起了动摇，但是革新派的加强轴心的主张，更以德国联结苏联为日本人民所愤恨，一时断绝了活动的机会。

平沼内阁垮台后，在两大力量挟持下成立的阿部内阁，幸因欧战的爆发而得以一面宣告中立，对苏联成立诺门罕停战协定，一面进行亲英美的外交，以满足财界及稳健派的要求。但是军部始终认此种调整为“媚态外交”。在阿部组阁当时，军部即畏忌稳健派力量的膨胀，曾经要求任用白岛为外相，阿部不得已暂停外务专相的任命而由自己兼摄，过后始任命野村大将为外相而以谷正之为次官。这或者可说是稳健派对军部斗争的胜利。

由革新派转变为传统派的谷正之，过了多年埋没的生活，有田任外相时候曾经一度任为驻法大使，又为法国所拒绝。这个时候幸得因原田熊男（西圆寺元老的秘书）的斡旋。被任为次官，自然喜出望外，恨不得粉身碎骨以

报答传统派。所以上台后即便派天羽为驻意大使，放逐栗原以承天羽后任，命令大岛归国，并派来栖驻德，升栗山为驻比大使，而放逐松宫于比利时。即连素来持中立态度的河相达夫（情报部部长），也都被贬走。然而日本外交最高当局的这样办法，是又要惹出乱子的，因军事失败压抑的军部正找着了出气管了。野村外相自命为“知美家”，有许多知交的美国人士，谷次官又是这样大刀阔斧地干，亲英美的积极做法固已准备发动，但是军部眼看很多稳健派势力如此膨胀，当然大起妒忌，恰好湘北军事的惨败，正需要移转国民的注意，以图藏拙掩丑。于是，军部发动贸易设置问题，以离间外务官僚，削弱稳健派主要营垒的霞关。

## 六

军部一面要求阿部内阁设置贸易省，以威胁外务省官僚，一面则又暗中唆使心怀愤恨的革新派，破坏稳健意识的传统派的全面统制，贸易省问题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外务省对此问题认为“省外势力”分割外务省权限的一种阴谋，所以率直表示反对。10月3日阿部内阁的阁议，虽然绝对拒绝了外务省的希望，通过了贸易省设置要纲，但是军部却更加油鼓动这个风潮。先由山松岛通商局长，山本及水野面敕任事务官以次五课课长提出辞呈，而全部课长及事务官继之急起，大喊“拯救外交的危机，外政一元

化”的口号,主张:“通商外交与政治外交的分离,是外交的毁灭,非国家之福”。问题不但震撼了全国,甚至于闹到枢密院里去。无论阿部内阁的议决案怎样坚决,谷正之的推断怎样有自信,议决案终不得不犹豫执行,甚至于闹到谷正之的饭碗,几乎打破。“废物收回内阁”(日本论客对阿部内阁之评语)更加飘摇动荡起来,军部行动派(一名少壮派军人)机关报的《国民新闻》,遂乘此机会向阿部内阁集注纸弹的炮火,攻击阿部内阁威信的失坠,至体无完肤,其结论竟谓:“官界即起未曾有的纷争,责任的归属仍未能了然。主义和政策,极轻易变更,官场内的派阀肆意跋扈,处此情势下的政府,果能圆滑处理未曾有的大事变吗?国民非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不可。惟其是在处理‘事变’之前,一内阁一大臣的命运,总是不成问题的”(10月20日该报社评)。军部行动派对企图执行稳健派政治意识的阿部内阁,袭击的毒辣与推翻的阴谋,已活跃于纸面了。

在贸易省设置问题上,军部行动派对重臣稳健派的进攻,收到了双料的胜利。贸易省设置纲领虽然修正过,现在尚无立刻设置的象征,但是贸易省不但仍在必设,而阿部内阁又起了动摇。军部行动派的阴谋,不但达到分割外务省权限的目的,并且因为外务省风潮掩饰过湘北军事的惨败,尤其重要的,是阻止着他们指为“媚态外交”的进行——可以说“一石三鸟”的收获了。

战时日本行动派军人,实在是天之骄儿。去年兴亚院的纷争上,即令日本军政界的“惑星”宇垣仍终于不得不吞

“万斛之泪”(平河道雄之语),愤愤然挂冠以去,军部的力量可谓大矣!

在军部得天独厚的战时,尤其是在军部行动派力量已经形成的今日,外务官僚派阀的格斗,将时常被利用做进攻稳健派的工具,但其纷争也将永无已时!

原载 1939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

## 泥塘中的日本内政

漫谈日本政治非我所能，只是战争中的日本政治，宛如一潭泥塘的景色，是人人所共见，我也看清这一点罢了。

自从侵华战争发动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即便意气万丈地大改革其内政，大增设其政治机构。自近卫内阁大改组以来，更觉得日本政府已包括了日本各派的力量，政府基础十二万分的巩固，颇有扬扬自得的气概。其后更加继续增设机关，增加人员，什么“庶政革新”啦，什么“协力政治”啦，闹得三岛乌烟瘴气，“新官僚”乘势进出，推波逐浪，甚至于日本论客也承认近年日本官僚的进步，很有自尊心了。

然而混杂在泥塘中的日本鱼群，都不过是“自我盲目”，自己看不见自己，至于泥塘外的人，总是旁观者明，只看见泥塘中的鱼虾愈吵闹，泥塘的水愈混浊，紊乱无条理罢了。瞧罢，近卫内阁大改造曾经有了什么样的成绩呢？岂不是徒然加深了宇垣外交与军部行动派外交的矛盾了吗？元老重臣倚为“最后一张牌”的近卫，岂不是已于最大努力之后骤然决定去职了吗？其后的内阁，由近卫到平沼，由平

沼到阿部，岂不是一蟹不如一蟹了吗？即在首相的主观与抱负上，也是愈来愈失了自信。在平沼本人，所谓“革新”的内心火，似乎还是相当的热烈，但轮到阿部，即感觉空虚没有生气，在组阁途上几至流产。阿部内阁性质的杂什，几乎可说是日本内阁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于是日本好事的评论家，给他起个绰号“废物收容内阁”，也算得可怜极了。

阿部内阁自其呱呱落地以来，所遇到日本内外难关，确实在以前内阁的恶劣环境以上。战争中的日本任何内阁，都要遇到的惨淡命运，在阿部内阁更为加深了。第一，外交方面即须打通对美英法外交调整最难的对外外交调整一关，还须维持德意轴心的旧关系，亲苏的课题逼得阿部和野村更加头痛。第二，在对华侵略上，虽然需要赶快结束战争，但又遇到不中用的日军到处“败战”，英美法维护在华权益的决心更为坚决。军部虽有形成所谓“独裁国集团”的幻梦，但是苏芬战争又给了一盆冷水；政府虽欲与英美妥协，以收拯拔泥足的代价，但又不能投下过大的本钱。于是美日关系未调整好，苏日关系又急转直下。第三，虽然一面不能不接受军部的强蛮要求，但是“革新”内政又似无从着手，少数阁僚制的流产，挨了军部机关报多少的臭骂。第四，阿部内阁恰又遇到日本政治的“例礁”，第七十五届日本议会的开会，除了照常的几多难题之外，还加上一个战争以来未有的政党政治运动的抬头。民间右派法西斯的加油活动，又多添阿部一层夹板，战争以来几次“无风”的日本议会，这次似乎不能太平静吧！在苏芬战争发生后军



部外交主张的根据被削弱后的今日，阿部内阁所挨的臭骂，已由“媚态外交”、“八方美人主义”，发展到“请早辞职罢”了。军部会不会再像弃去平沼内阁那样，借“调整外交无力”的口实来赶走阿部，是谁都不敢保险的了。

原载 1940 年 1 月《世界知识》第 10 卷第 7 期

# 战争第四年日本政治总检讨

## 一、日本战时的官僚政治

日本现在的政治是有史以来未曾有的紊乱,现在的政府,是有史以来未曾有的无力——这是二年余来日本政局的动荡所告诉我们的实情,同时又是日本国民所公认的事实。现在到了日本“官僚政治”的一个分水岭。

日本官僚政治的存在不自今日始,但自侵华战争发动以来,日本政治的官僚性质益加浓厚,并且随着战争的进展而日益加强。这里有两种条件:其一,是日本政治的基本特质;其二,是战时统制的强化。日本政治原即带着极浓厚的官僚性质,立宪,议会,及至政党政治,等等,只是民治政治的招牌而已,事实上日本政治没有一个时代不在官僚的直接间接统制之下。但是日本的官僚政治又是一种复合物,包括着贵族主义的官僚成分与军国主义的官僚成分。二者相成而又相克,只在其帝国主义性之点;是一致的,无论自其对国内民众的统治言,抑自其对外的侵略言,贵族主义官僚与军国主义官僚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因为统治

阶层的矛盾,再加上日本政制的复杂性,如军部之独立于政府之外及非法律所规定的内阁总理大臣的推荐特权等,贵族主义官僚与军国主义官僚二者,遂至相克,对立。日本这两种官僚势力的相克,自入战争时期更加尖锐化;同时相克而又相成的日本官僚力量,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日本政治无论怎样带着极浓厚的官僚特质,但在平时尚有议会与政党的节制,到了战争的时候,日本的议会与政党完全变成有名无实的“赘物”。日本政府既不受议会的有力的牵制,自然也就完全脱离了政党。政党内阁在战时日本,早已被埋葬了。日本自入战争以来已经召开过三届的议会,但是每一届议会上,任何艰难的复杂的问题,也都“一帆风顺”地通过了议会的难关,以前日本政府认为风浪险恶的议会,居然变成了所谓“无风带”了。战前某届议会上滨田国松与寺内陆相赌“切腹”的“奇迹”,在战时的日本议会上是没有的。日本朝野皆以“战时”两个字堵塞日本议员的嘴,像“物资总动员法案”和“电业国营法案”那样严重而又受到议会最大非难的提案,也都终于不加多少修改,全盘通过议会。日本议会牵制政府力量的减低与政党政治的退场,意味着日本官僚政治性质的加厚,日本官僚政治的发展,几乎达到绝对支配的程度。

## 二、日本战时政治的无力化

日本战时政治几乎完全离开了议会监督的结果,一方

面固然减轻了政府顾忌国民直接指责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却推进官僚内部的斗争,贵族主义官僚与军国主义官僚的斗争,再加以内外情势的困难,于是逼出了“官僚独善主义”的显著发展了。

日本在侵华战争发动的初期,日本军阀也曾企图造成军人法西斯独裁的局面,例如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人之努力谋政府政权集权化,设置太上内阁的大本营,以至前年5月间近卫内阁的大改造,皆或多或少具有这种倾向。然而日本元老重臣集团特权的存在,阻断了军部阴谋的进展,大改造后的近卫内阁,更加采取偏向元老重臣等稳健派的政策(参阅拙作《战时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基调》——载《世界知识》第8卷第7号)。后来,虽说宇垣大将的“协和外交”未得完成就被军部所滚蛋,西园寺元老“最后一张牌”的近卫公爵也终于离开了首相的交椅,但是,继近卫之后出头组阁的“革新”政治家平沼,也未脱离元老重臣派的政治意识,其次的阿部内阁更是元老重臣派所选择出来的稳健意识执行者。军部尽管要求阿部内阁实施“少数阁员制”,要求这个一元化那个一元化,但是直至今日,阿部内阁的行政依然是多元的,其兼摄的阁员也要补充足数了。军部的喉舌,固然无日不在责骂“阿部内阁丧失威信”,事实仍于日本政治的改革无补。要而言之,近卫内阁以后日本政府的贵族主义官僚的色彩,不但没有稍减,倒反加深。

然而战时日本的贵族主义官僚政府,却受到军国主义官僚的压迫最厉害。日本军部平时即拥有独特的地位与实

权,到了战争时期,其独特的权限更加膨胀,所以加于政府的压力,也特别强烈。日本贵族主义的官僚政府,为着逃避责任而极力采取“官僚独善主义”,于是战时日本政府,日益无力,由行政机构的改造到行政人员的调整,再由行政人员的积极调整到消极的调整,而其政府遂每况愈下,一蟹不如蟹了(参阅拙作《二年来没落过程上的日本内政》——载本刊第2卷第6期)。

日本战时最强的内阁,盖棺论定算是近卫内阁,它成立于中日战争前,持续了一年又半之久。其后为时刚及一年,内阁已两度更迭。去年1月4日晚是近卫内阁总辞职的日子,今年1月4日又是阿部内阁最后考虑去留的日子,现在1月4日虽已过去,阿部依然在恋栈,奔走疏通各方的有力者,但是今日日本政府的危局十百倍甚于去年。去年今日的近卫只要决心继续干下去,没有一个人敢请他滚蛋,但是今年有力量的方面几乎全部反对阿部内阁。军部对于阿部内阁,初因力荐白鸟敏夫为外相未蒙接受,已不快意,后又看出阿部内阁不但未履行组阁当时军部所提的条件,实质上倒反日益走向相反的方面,如外交之亲英美,如内政之放弃“少数阁员制”的集权准备等等,更加厌恶。另一方面,2年来官僚独善政治的无力,唤醒了一部分日本人民的自觉,不少政客及论者又拾起政党来作活动的招牌和作文的题目。日本既成政党在议会开会皆着力于恢复应有的权力,对于阿部内阁一边加以攻击,一边不接受参加的要求。阿部内阁处在这样夹攻之下,一方面多少追随起

军部的指令,如加强对苏德外交的工作,一方面再三恳求五个既成政党党首予以支持。但是日本政局的动荡,不只是阿部内阁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战时内政外交一切艰难的集中表现。“官僚独善主义”,是不能打通这个难关的。

日本政局动荡的基本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困难,不但是孤立,并且孤立不住;其二是内政上的困难与复杂已经超过日本国民所预期战时艰巨的程度多多。日本的侵华战争造成了自己的国际孤立,欧战爆发后虽宣言“不介入”的方针,但以远东问题的复杂性又无法完全中立。同时,单独拉拢苏德既不可,调整其对英美法关系又不能有诚意,徒然苦坏了日本政府。日本国民在内政上所花的代价,据日本论客的估计也已超过了战时应花的程度。日本军部对于本年的财政预算,也破例地以“警戒预算的膨胀”的标题攻击政府(见《国民新闻》社评)。此后财政物资的困难将更十百倍于今日。这是日本官僚政府的力量所不能挽救的,阿部内阁既无三头六臂,只好滚蛋了。

### 三、日本官僚政治的分歧点

日本自从斋藤内阁(1932年)以来的历任内阁,虽皆标榜“举国内阁”,事实上只是一部分官僚与贵族为中坚的政府。这是日本国民所承认的。但是中日战争以来的官僚性更加浓厚,而这样官僚性质加厚的日本战时内阁的无力,也为日本国民所共认:“‘中国事变’以来,日本迎送了三任

的内阁,他们没有例外地,没有做了值得称为政治的任何事件”(见津久井龙的论文——载《改造》新年号增刊)。日本国民更加看见了阿部内阁就任以来,为着贸易省问题或专任阁员补充问题而流着脂汗而苦闷着(同上)。日本战时官僚政治完全碰了壁。

然而日本政治的退化绝不是日本政府单独的无能。一部分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它是“日本国民全体的无政治自觉与无政治能力的综合的缩图”(津久井龙雄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但是更须注意的问题是:日本官僚政治无能的深化确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结果。日本侵华战争增强了日本官僚政治的性质,同时又促日本官僚政治到没落的途程了。最近日本各方面对政府不满的强烈,是战争以来未有的情形,同时既成政党政治复活运动与右派法西斯运动的积极化,也是战争以来未有的情形。

政友会总裁町田等政党党首虽然备受阿部首相的央托,但是他们的态度皆是观望,据传,“在现内阁没有好转的事实依然显明以前,是无意参加内阁的”(据上引《改造》杂志)”。政党议员毋宁是准备在议会上攻击阿部内阁;马场恒吾及山浦贯一等自由主义论客,更加鼓吹政党政治的复活,今中次磨更自“政治的国民基础”之点,强调议会政治的必要性(见《中央公论》及《改造》新年号)。政党政治居然成了日本文人论客及一部分民众所憧憬的对象。这不是日本国民对于不完全的日本议会政治的留恋,而实在是日本战时官僚政治太无能力了。

另一方面，日本右派法西斯也以“革新政治”的标题，企图日本政治的新开展。战时日本右派法西斯的组党运动与团体活动，以末次信正任内相的时候为最高涨，其后步着下坡的趋向。迨至最近右派结党的运动，又随既成政党的政治复活运动的开展而再开展了。前年年底、曾被瞩望为右派法西斯首领的末次大将，已再出头，召集日本右派政党的党首；如“国民同盟”总裁的安达谦藏，“大日本青年党”党魁的桥本欣二郎，及松井石根大将、建川、中野、德富、三宅等人，积极筹备新右派政党之缔结。他们所标榜的共同目标，是“建设新东亚”的外交刷新与庶政革新；企图缔结“东亚建设国民联盟”。

然而右派法西斯政党运动的发展，却与政党政治复活运动，走着相反的方向，它毋宁是反贵族主义官僚的政治力量的发展。这种力量是与军国主义官僚配合着，同时又是战时官僚政治没落的必然产物。在战争中急速膨胀起来的军部力量，一方面极力排斥既成政党政治，他们视议会为赘物，他们欲使内阁集权化。但是另一主面，又厌恶贵族官僚的迂腐无力。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最希望军事独裁政府的实现。贵族主义官僚自战争以来，既利用军部的这种心理，尽量采用大中将级的军人。但是日本不是德意，日本又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人物，军人独裁政治一时不能实现。

然则日本政治往何处去呢？日本国民尽管因为官僚政治的无力而憧憬着政党政治的复活，但是战时特殊情形却



遮断了这种希望。日本政治的将来,毋宁是走向军事法西斯独裁的方向,不过日本未来的独裁人物,决不是希特勒及墨索里尼那样普通的平民。日本将来的独裁者,必须具备两种条件:一方面是皇族阶级另一方面又须是军事的领袖。近卫只有贵族的条件,故不能继续强化他的内阁,战时内阁的历任陆相,只有军部代表的资格,也不能绝对支配内阁。将来或者须有军事领袖的亲王级人物出来收拾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的残局。

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日本的政治还不能够发展到上述的地步,恐怕还有一个时期继续“官僚独善主义”,同时又是徘徊在政党政治与军事独裁的歧路口。

#### 四、日本新内阁的展望

意图恋栈的阿部内阁,终于在1940年1月14日提出总辞职,继任的米内内阁也已于1月16日组织成功,表面上是一新日本的政局了,但这是不是日本官僚政治分岔的决定点呢?不是的。日本官僚政治还须一个时期徘徊于贵族主义官僚与军国主义官僚之间。只要考察这次阿部内僚总辞职的情景,几乎和去年8月间平沼内阁总辞职当时的情景完全一样,就不难解答我们的断言。

阿部内阁总辞职的第一个原因,应首推他们办理外交毫无成就。阿部上台的最主要使命,虽然表面上标榜为处理“中国事变”,事实上就是打破国际孤立的僵局以拯救深

陷的泥足。所谓“中国事变”既不是3年5年,10年8年可以根本解决的问题(如津久井龙雄所言),又不只是中日两国的问题,所以日本侵略者自己也承认日本欲结束中日战争,必须依赖日本国际关系的调整,阿部和野村终其任期,可以说集注全力于这个国际关系的调整工作。但因日本政治组织的复杂与外交的二元性,致使外交大权行使者的外交方针,与“政治推进力”(军部自称)的外交方针,不能一致。再加以日本因侵华战争引起的国际困难,日本外交的能否发展,完全操于中国抗战的手中,遂致多边外交既无开展可能,单方面的偏向又受阻碍。日本政府的稳健意识,固欲积极调整对英美外交关系,甚至不惜投下相当代价,如现金赔偿美国种种损失及允许开放长江及珠江,但是事实上外格于中日问题的复杂与中国抗战的持续,内又阻于军部幻想外交的“推动”,结果终如军部喉舌的指责:“八方美人外交”陷于四面楚歌的情势下。阿部内阁的外交到了末期完全紊乱起来,彷徨无措,实质上已又回到“白纸外交”,“无主外交”的原点上,这正和苏德协定后平沼内阁辞职前的情形一样。

阿部内阁辞职与平沼内阁辞职情形相同的第二点,在于两任内阁同为日本政治实际“推动力”的军部所推倒。阿部这次逼不得已而出于总辞职的一途,表面上似乎是政党议员不信任内阁运动所促成的,事实上却是军部逼宫造成的局面。自远因看,军部自始即不喜欢阿部内阁的外交与内政方针,因为阿部内阁既未任命“革新”外交家白鸟敏夫

为外相,野村又未执行军部所要求的幻想外交(亲苏联),在内政方面,阿部后来更不遵从军部所提条件,实施少数阁僚的集权制。自近因看,军部1月8日指令陆相畑俊六逼迫阿部总辞职,其咄咄之言有曰:“你不应该利用军部决定处理‘中国事件’之原则,来做延长内阁寿命的工具,全国民情均反对现在内阁,故应立刻辞职”。(畑俊六与寺内杉山两大将会商后)。畑俊六且以辞职相挟逼。自此以后,阿部始决定不再恋栈。这又与平沼内阁总辞职当时的情形,没有两样。阿部内阁总辞职而只陆相得以留任,更值得玩味。

两任内阁第三点类似的情形,是元老重臣对于内阁的去留,没有多大成见,不加可否。日本元老重臣去年对平沼内阁,初虽怀憎恶与疑虑,但因后来“革新”政治家的平沼并不实行“革新”也就放心了,后见有田外交不“迈进”至参加德意军事同盟,德苏协定成立后更欲放弃轴心外交采取所谓“自主独往”外交,更无逼迫平沼滚蛋的必要。元老重臣对于阿部内阁的支持更为积极,所以到狂妄的军部必欲阿部总辞职而无知的议员为所利用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遂变成无所谓的灰色。只就近卫文麿坚拒军部再三力逼出马的经过考察,也可知其大半。近卫对人称:“‘中国事件’与国内事件,同样重要,但就日前政治经济的情状而论,对于国内事件尤应加以更大的注意。今日国内之情状确比我任首相时,困难得多……我希望将来的首相,能够组成‘内阁,既完整,又有能力’(东京1月12日电)。所谓国内困难

的事情,当不仅指着财政经济,毋宁是说政治的紊乱不统一,暗射着军部干涉政治致使政府难于施政。这正与阿部内阁总辞职的宣言“……但时至今日,欲求意见之一致,显不可得”,正相吻合。近卫坚拒阿部及畑俊六之请,称:“鉴于此次政变的程度,经济问题极关重要,余对于经济问题的知识没有自信,当收拾时局的大任,实为良心所不许”(1月13晚在华族会馆)。这又暗示着:军部必须尊重财界意见。组阁大命不落于宇垣、寺内、荒木、池田,而落于米内海军大将,元老重臣不甚支持军部这次的发动,可知。

再就米内内阁与阿部内阁的阵容对照,则其相傲之点更浓厚。阿部内阁坍台后,组阁大命既未落到陆军代表者手里,也未为政党所拾得,就其阁员个别考察,也可看出日本新内阁丝毫没有政党政治的气味,但军部也不能收完全统制的效力。其间依旧供给贵族主义官僚施政而军部从中捣乱(军部虽美其名曰“推动”)的地盘。质言之,日本新内阁依旧是日本两派系官僚的斗争场,米内内阁位置的分配,有代表稳健外交意识的有田外相,有几个次等的政党阁员但不能代表政党的意志,有几个接近财界及实业界的阁僚但又不是代表人物,加之,军部依然在背后摆弄,很显明的,米内内阁依然没有脱离“官僚独善主义”的旧套,此后行政仍旧不能够“自主独往”。今日完全体现后的米内内阁,完全和我们所设想日本独善主义官僚政治分岔后任何方面的政治性质,都不相同。具体言之,说是政党政治的复活,实质上不符合。虽说米内内阁也拥有几个政党阁僚,如

藏相櫻内幸雄,递相胜正宪民(民政党),农相岛田俊雄,及铁相松野鹤平(政友会),但是民政与政友会两党首皆拒绝入阁,其力量亦可想见。至于军事独裁的倾向却更比前阁阿部内阁更为稀薄。

只是米内内阁的构成力量,在元老重臣财阀稳健派与军部行动派的斗争上,无疑地略为偏向于元老重臣等稳健方面,比之平沼与阿部两阁的稳健意识或更为强烈。第一,米内为首相,有田八郎任外相,指示着日本此后的外交方针,一方面将放松“德意轴心”的倾向,一方面加强对英美的工作。有田在平沼内阁时极力阻止日本的轴心外交发展至参加德意军事同盟,而积极谋与英美接近并解决中日战争引起的诸问题。但是此后日本对英美的工作将不只限于“一味谄媚”(军部对阿部、野村外交的攻击),而出以积极的态度,此次以海军大将的米内任首相,既带有此种意味。第二,日本新阁此后的对内政策,将较看重财政界及实业界的意见,以富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实业界的櫻内为藏相,以三井财阀的掌柜藤原银次为商工相,以信托事业及电力事业老板的岛田为农相,等等,即其具体指示。此外,如以历任贵族议员的儿玉秀雄为内相,更是指示着米内内阁对元老重臣稳健意识的偏向。至于日本新阁之解决“中日战争”将努力于英美两国身上找出路,或将更加积极制造“东方慕尼黑”的局面。

但因远东国际关系的复杂与我国抗战的坚决,“东方慕尼黑”的局面也不易形成。即自日本本身言,最初呼声最

高的宇垣一成既未上台,军部又不能赞成政府对英美的更大让步,则“东方慕尼黑”的发展未必就达到形成的地步。日本新阁仍不能置军部意见于不顾,其以小矶国昭为拓相即其一证,那么米内内阁“处理中国事件”,自不容易顺手。即在内政方面,由于军部扩大作战的固执而统制经济的加紧实施自难避免,虽有几个财界及实业界的阁员,结果也只徒然增加军部与财界实业界的纠纷,因而加深日本政界的斗争罢了。在更艰难的局面下存在于两大势力倾轧之间的米内内阁的危机性,实较以前的内阁更为深重。

(1940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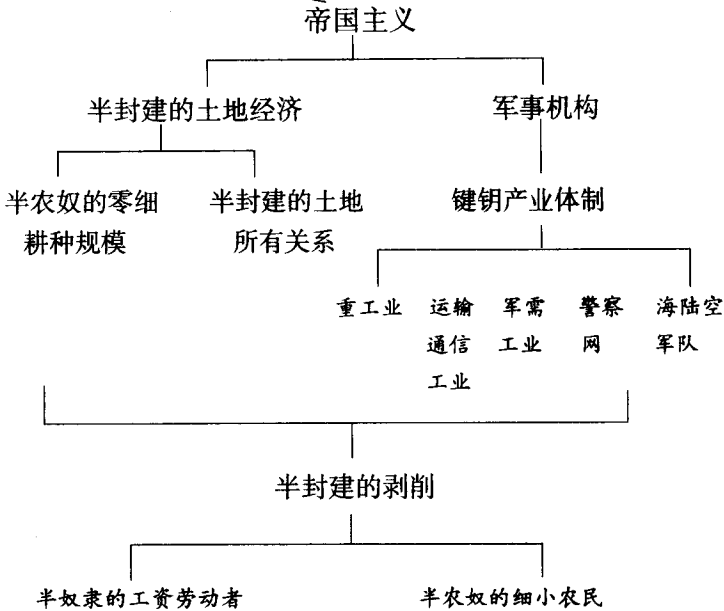
原载1940年1月《战时日本》第4卷1期

## 日寇特殊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

从拙作《日本帝国本质论》(见本书第二卷以后连载)分析日本帝国的经济基础可知: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由(一)军事机构——基础产业体制,及(二)半封建的土地经济两面构成的。军事机构和基础产业联着密切的关系,结成一个体制,其具体的内容就是海陆空军队、警察网、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半封建的土地经济,也囊括着两面,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农奴的零细耕种。而构成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军事机构——基础产业体制及半封建的土地经济又都是在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上树立着,其顶上一层就是地主资本,商业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独占资本,金融资本,财阀,及国家资本托拉斯的一串。半封建剥削的对象有两种,半农奴的细小农民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归结起来说,日本地主资本。商业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独占资本,金融资本,财阀,国家资本托拉斯,完全依存于半农奴的细小农民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身上。这层关系如果更显明地表示出来,就可以画出下列

的图表。

日本资本主义→土地资本→商业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财阀→国家资本托拉斯



具备上列构造和特质的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其形成及发展上必然地带上不彻底的，不调和的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并且贯通于各方面。

### 一、政治上的反映

日本帝国的特质在政治上的反映，还可以缕列下列



事实：

(一) 明治革命的不彻底。日本德川末期虽有农奴抗争的革命条件,但是由下士发动的布尔乔亚革命却不能彻底利用这有利的情势,明治政府倒反因为外逼于先进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惧于劳农大众的骚动,而中途停止了“民主革命”的进行。旧时的封建诸侯终以明治六年的“地税改正”为转轴而解消,但这只是布尔乔亚氾与大土地领有者的妥协,大土地领有者在瞬息间转变为地主阶级,寄生于土地上,后来又寄生于债票上——当然没有脱掉对于土地的寄生性。地主阶级的权限依然站在很重要的地位。布尔乔亚氾与大土地领有者的妥协,布尔乔亚氾与地主阶级的融化,必然地产生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结果。明治年代的民主主义运动,结果只制定了一道不三不四的“宪法”,大正年间较切实的自由民权运动,也不过得到一个不彻底的普选制度。在这普选制度下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是以财产所有额为标准。这是第一种特色。第二种特色就是妇女没有参与的权限,既无被选举权,也无选举权。第三种特色是选举时候的压迫和收买,受贿和弃权等等丑态百出无穷。有这三大特色的日本普选制度所包含的民权气质实在太少。实质上,我们可以说日本的民主革命到今日还没有完成。

(二) 布尔乔亚氾与官僚的妥协。二者妥协融化的结果,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及实权的比重上。封建势力不但残存着极强大的力量,同时也得到法律的保障。以下列三点可以看出。

1、不纯洁的政治机构。反映布尔乔亚氾与地主阶级妥协的宪法(表面上是民主政治的宪法),第一保存天皇地位及其大权。其次还有枢密院和贵族院落之设置。元老和重臣的实权之遗存,也是封建特色的一种。更其可笑可惊的,内阁不对政党负责而对天皇负责;同样阁僚的海陆军大臣不隶属于内阁总理之下而直辖于天皇,天皇充任海陆空军大元帅。

2、绝对势力的膨胀。日本封建的绝对势力因为受到基本法律——宪法的保障,同时又有坚固的经济基础(广大的官有地及巨大的官营产业),所以树立了巩固的基础。军阀的气焰,近年来更加增高。日本军部的跋扈并不是偶然的。天皇政权之神权说,近来更加具体化。通行三四十年的《天皇机关说》居然在前几年发生了空前的大问题。这种学说的创设者,前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博士,居然被判“不敬罪”(在日本是一种严重的罪名)。另一方面,民间右翼法西斯团体的势力,日益汹涌膨胀起来。

3、布尔乔亚氾与绝对势力的结托紧密。当此工农大众的势力日益增长的时候,原可站在支配地位的布尔乔亚氾,不但要利用绝对势力,利用官僚和军阀,并且要密切与之联结。绝对势力和布尔乔亚氾,表面上有时虽表现对立的情势,但这是内部的对立,其在对外的关系上却是一致的,而形成一种对立物的统一。在阶级的关系上,绝对势力与布尔乔亚氾是有愈发紧密化的倾向。九·一八事变以来划一新时期的日本法西斯的发展,只有在此二者紧密联结的基础上

始能步上德意的后尘,而现在正在开始这个新阶段。

## 二、社会上的反映

日本帝国特质在社会上的反映,也可以从几方面来分析:

(一)社会制度上的反映。明治维新后,日本封建的身分制度表面上虽似废除,而实质上则尚遗存,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身份制度的调整而已。把旧时的公卿诸侯列为华族,诸侯的家臣闾列为士族,农工商及“秽多非人”(未列入士农工商的贱民)列为平民。现存的身分制度就是皇族,华族,士族,平民。这不只是形式上的遗存,皇族、华族、士族且有他们适应的实权,宁可说是特权。其次,男女之间是极度的不平等。男尊女卑虽说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一般现象,但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未有如日本悬殊之甚者。

(二)生产技术上的反映。生产技术发展的不凋和不平衡,第一表现于现代高级工业与零细农业耕种的并存。大阪东京一带的大工场生产与一般农业经营上的畜耕及人耕,相差有几百之感。即在大都市工业之中,亦有高级现代工业生产与低级家庭手工业(例如一般妇女在家庭兼作的所谓“内职”之中,有抒解旧丝袜及所谓“馱果子”(手制的糖果点心之类)的手工业的对照。东京丸之内一带的宏大建筑物与郊外的小板屋,也是对照之一。总之,都市有急速的进步而乡村则很落后。这里存在着都市剥削乡村的事

实,形成了农民境遇劣于都市工人,农村与都市对立的情势。

(三)文化教育上的反映。在上述不调和、不均衡的发展情势之下,一般的教育只能以接受官方的指导及命令为最高限度,可说是一种变态的奴隶教育。此种奴隶教育尤其是表现在妇女教育上。妇女教育普通以所谓“高等女学校”(不及男子中学的程度)为最高度,男子专门学校或大学完全不收女生,女子大学及专门学校全国只有几个,并且只限于医科及师范科而已。因此,文化仍未脱离素来“盆栽文化”的气质,一般人民虽有“亲切”之美风,但是器量还是小。日人信教非常虔诚,到处可以见到大小庙寺及神社,时时可以见到许多男女恭恭敬敬地参拜。宗教的信仰并且由神而及于人,时常发见许多乡下人乃至绅士在皇宫前的二重桥边跪拜祈祷。一般皆崇拜英雄。

(四)革命斗争上的反映。在经济的政治的特殊情形下,日本的革命势力也很不健全。受到高度半封建剥削的工农在革命上皆有他们的弱点。农民素来保守,很少革命性。吸收了新空气而最有革命性的现代工业,尤其重工业的工人,却又处于严密监视及高度压迫之下。日本产业之最大特质就是官营工业之庞大,一百多万的工人皆在刺刀之前劳动着。其余大小财阀经营的工场中,同样地布满着军警网。日本农民因为农业生产的单纯化而有其“同一性”却无“共同性”在革命上不能密切联络。现代工人也因严密的监视和高度的压迫而不易坚固团结。站在革命前线的,

仍然由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占多数。这些革命者主观上虽然很清楚,但却容易动摇。所以在表现上看得到的只是理论斗争多于实际行动,而理论阵营又极分歧。又如经济斗争多于政治斗争,又在表现一个缺点:个别势力虽已充分存在,但是组织化的整个力量还是不够。

然在日本的政治客观上,最近有一种极显明的倾向,就是阶级势力之集中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法西斯的膨胀逼得自由主义者消声匿迹,中间革命份子不能再徘徊于歧路上,不左倾就须右倾。而左倾势力在这高压之下,几乎可说完全潜伏化了。不潜伏化的的份子就须“转向”,投降军部政府。结果,日本的政治秩序及社会秩序,更加完完全全依赖严密的警察网及庞大的军队始得维持。社会的危机愈发潜伏化和扩大化。

### 三、国家对外行动上的反映

日本国家机构的特质不但表现于国内各方面并且表现于对外的各种关系上。日本资本主义特质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可以由颠倒的经济程序及滑稽的二元外交来说明。日本资本主义在它未及健全生长的时候即已跨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是军事的帝国主义,是军队领导着商品和资本前进的,资本和商品跟在军阀的屁股后面。先进帝国主义之国际的进出,是商品和资本先到,在某一地方树立了商机,然后军队和政权才跟着到来。英

国之于印度即是一个显例。若日本帝国主义之于台湾、朝鲜、关东州、东三省等地方，都是先用军力及政权掩护商品及资本前进的。即在金融资本的势力相当强大的今日，资本家稳定市场的要求仍为军阀侵占领土强化军力的行动所压服。结果，资本家和政府仍不得不跟着军部亦步亦趋，采取一致的步伐。

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表现于经济关系上，并且表现于外交上，日本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和民治政治的不纯洁，保存着封建官僚的统治权及军阀的优越地位。日本帝国的外交方针不能完全决定于内阁，有时政府的外交行动竟为军部所不齿。于是演出二元外交的滑稽把戏，日本政府倒反要屈服、遵从军部的路线。但到战争失势图谋收场时则又以军人的责任来作结束。我们单就最近的事实考察，即可了然。九·一八事变当时表演过，这次大战爆发前后皆表演过。日本军阀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代表日本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的民政党政府是反对事态之扩大的。币原外相强调其“吞炸弹”的主张就是实证。但是军阀蛮干下去的时候，政府也就不得不支持军部的路线，甚至于利用政府与军部外交方针冲突的理由欺骗国际减轻政府的责任。及至日本军阀及金融资本家一致于结束战争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把侵略战争的责任推在一部分少壮军人身上。在这次全面抗战的过程中，我们也常见到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对立，唯一的元老西园寺被毒害，带政治家意味的前陆相宇垣大将被暗杀的消息。但是近卫政府仍为军部帮忙。迨至

日本军队的作战相当疲惫而希望着收场了。所以军部与政府又唱起双簧来。一方面军部的代言人大肆其强硬主张，煽动反英反美的空气，另一方面驻英美的大使却又频繁奔走于各国外交官之间。日本政府一向放任军人蛮干，而外交官周旋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他们善于运用两面外交。但是我们不能忘却：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促使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外交步骤有急缓之差，而其对立的统一，却是一样的侵略，始终是不利于我国的。即远东政策徘徊不定的英美各国，也容易上日本这种两面外交二元外交的当。

此外，日本帝国的国家行动还常表露残暴、阴险、卑鄙等等中世纪的色彩。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因要占国际的便宜而竟惯用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在两国战争上居然假冒敌人的国徽，真是鸡鸣狗偷的技艺。英人拉敦最近著评日寇为侵略罪恶的发明家，称：“事前未经宣战而突然进兵，而犹名之曰和平，明为友善而暗作敌对之准备，煽动邻邦之纷扰以造成武装干涉之借口，而犹曰恢复秩序，占领他国之领土而自称无领土野心”（上海《字林西报》）。日本人个人是谦恭诚恳的，但是封建的军事性的日本帝国却极其残暴而卑劣。自我们全面抗战发动以来，这种卑劣和残暴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日本帝国主义已为人类所共弃了。

# 日本的钦定宪法与阴性议会

## 一、日本宪法反映日本国体

日本的所谓《帝国宪法》，正和各国的宪法一样，在其国家的政治上占着重要的地位。日本政界的各党各派即令互相倾轧，互相对立，但是他们之提出政见和主张，都是在所谓《帝国宪法》的名目下提出的，这是各党各派绝对一致的地方。尤其可笑的，即连所谓“无产政党”也在这一点上和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党完全一致。无产政党所标榜的所谓“合法性”，或“合法主义”，就是宣告不违反《帝国宪法》的意思。日本宪法还制定“治安维持法”及其他种种法律及命令，防卫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固然，日本也有企图反对《帝国宪法》的事件或人物，但是这种企图和人物立刻被判定为反对日本国家乃至反对天皇的叛逆，而被处极刑。除了根本反对日本国家机构的所谓“叛逆”之外，上自自由主义者的尾崎口堂下至法西斯的强硬派，乃至合法的无产政党，都是标榜“宪法主义”，一切行动上表明皆要遵循“帝国



宪法”的规定。

然则日本宪法的本质究竟如何？它的基本主义是什么？值得我们研究。日本宪法之为十足的钦定宪法，是大家所知道的，这就是说：要理解日本宪法的基本问题，须先究明君主主义在日本宪法上所占地位的重要。关于此点，美浓部学说的解释是：

“就大体言之，第一是君主主义，第二是立宪主义，这是日本宪法的二大根本主义。日本宪法可说是结合调和这两种主义的东西”（据社会科学辞典）。

美浓部博士的这样见解，在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虽曾被尊重为解释《帝国宪法》的标准，但至近年因为日本主义之猖獗，而被日本主义者及国体明征派，诬为有伤君主主义乃至“天皇大权”的尊严，终至酿成所谓“天皇机关说问题”。实则，美浓部是把日本宪法上近代布尔乔亚民主主义的成分，故意评得超过实际多多，他的用意是在于美化日本宪法丑恶的本相，想不到学说风行数十年后竟终于因此而获罪。

关于日本宪法的本质问题，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曾经赤裸裸地表示过，其言有曰：

“君主亲握立法行政之大权，不得君主之认可，不得制成一法，不得君主的钦诺，不得有任何施设的主脑，可以说：‘国家即君主，君主即国家’。但与擅政（专政）者不同。在立宪君主国，立法组

织,行政组织,以至百般政治,皆有一定的组织,依纪律以运用”(《伊藤博文秘录》292页所载)。

伊藤博文之起草日本宪法,完全取法于普鲁士宪法,从他上面简单的叙述,已可见到他完全应用君主主义贯彻于日本宪法上,日本宪法的根本特色,也即在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十足的钦定宪法”。

我们从日本宪法的本质尚可了解日本的国体,因为一般的宪法同时也就是“国体”的简解,日本国体的解释问题,在五六年前掀起了一大风浪,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变成国体明征派众矢之的,竟然被提起公诉,即在此时。

当时的冈田内阁专为这个问题,特请枢密院顾问官金子坚太郎伯爵,到文部省撰成宪法讲义(昭和十年,1935年7月18日),以为代替美浓部解释的标榜,而满足日本主义者及国体明征派的要求。金子把日本宪法与日本国体弄得更密切,他说:“宪法之制定根据我国体的本义”;即是所谓“国体本义的明征”。冈田内阁就根据金子的国体明征主义发表《明征国体的声明》(昭和十年七月十八日),更具体强调君主主义,申论日本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于此更可了解日本宪法如何反映日本国体。究竟日本国体怎样?我们先从日本宪法的制定形式,求得一般的论据,详细的剖述则留在以后各章。

日本宪法所反映日本国体的第一种特征,是“帝国宪

法”的修改,是非常严重而困难的问题,事实上日本宪法可说是不许修改的。日本宪法的修改,不但需要帝国议会的协赞(只是协赞而不是主动的修改),尤其重要的,须有两种条件:其一,仅依敕令始得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换言之,只有天皇的动议始可以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人民代表的议会并没有提案权;其二,在议会方面的决议,也与通常的立法手续不同,必须两院议员都有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始可以构成议案,日本宪法的这种固定性,决定了宪法在日本政治上的重大作用,使日本的政治制度长久固定没有改进的机会。

日本宪法形式上的第二种特征,就是上面提过的,属于钦定宪法。在民主政治的各国中,宪法的制定是依国民一般的投票,或由国民代表会议举行的。反之,在君主政治的国家,则由君主大权制定宪法,这种宪法称为“钦定宪法”。而日本宪法是纯粹的钦定宪法,在其制定上专由天皇大权制定而颁布的。在这两种制定的不同手续上,就确定宪法本身的性质。若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定的宪法,自可随时代的变化而为人民会议所修改,但是日本宪法因为是钦定宪法,又其固定性极强,所以一般认日本宪法为日本国体的成文化,或谓日本宪法的规定指示了日本国体的本质。在此点视日本宪法同于日本国体,在我研究日本政治构造者,首先应该深刻予以注意。

## 二、天皇的大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了日本宪法是纯粹的钦定宪法，其固定性甚强，全部贯彻着君主主义。现在再就其条文的规定研究其君主主义的具体内容。

日本宪法是由 7 章合计 76 条组成的：第一章天皇，第二章臣民的权利义务，第三章帝国议会，第四章国务大臣及枢密顾问，第五章司法，第六章会计，第七章补则。天皇大权占着第一章，天皇咨询机关的枢密顾问也占了专章，可知日本宪法内容的一斑，但其特殊而值得首先深刻注意的，就是“天皇大权”的广大。

日本宪法上的“天皇大权”的第一种特质，是不需要人民代表议会协赞，并且包括极其广大的范围，这里举其萃萃大者则有如下三类：

(一)在实际政治上演最大作用而关系军事的重要事项，全部属于天皇大权的范围内，绝对不需要议会的协赞，更不许议会过问。日本宪法规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的大权”(第 12 条)，“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大权”(第 13 条)，专属之于天皇。日本资本主义正如以前拙作所剖述的，具有极浓厚的军事性，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与对外的侵略战争具有特殊的关系，更增强了日本天

皇的军事大权的作用。

同时,超然独立于日本内阁之外的陆海军部,因其帷幄上奏直隶于天皇,也正可以利用天皇的军事大权,肆行无忌,甚至压倒政府及其他的政治力量。日本现代民治主义的成份更为削减,增加天皇大权之实际的扩大。

(二)日本宪法规定:关系皇室的一切事宜均依“皇室自律主义”。换言之,皇位的继承,摄政的设置,及其他关系皇室的事项,完全归皇室自己决定,政府及人民皆无过问之权。这些事项,即令同时又是关系国家大事及人民生计者,如皇位的继承,摄政的设置,皇室财产的处分等等,也是一样无须经过议会的协赞,一概由皇室自己决定。

(三)日本宪法特别规定戒严令的大权属之于天皇(第14条),在这一道命令之下,全国人民的权利,即令是宪法所赋与的权利也立刻全被停止,或受到限制。这种命令既不是代表民主的议会所可颁布,更不是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固然日本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所可颁布的。天皇的这样大权,即令施行时违反日本宪法其他的规定,也以天皇的命令为依归。所以日本宪法后又规定:“战时或在国家事变的场合之下,不妨碍天皇大权的施行。”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天皇大权的绝对性,日本政治的绝对主义,也充分流露于基

本法律上,谁能肯定日本政治的现代性或民主性?

### 三、女性议会的权限

凡立宪国家的议会,都是代表民意的机关,不但可以颁布基本法律及代替法律的法令,并且指令政府,监督政府。但是日本议会则无此大权,许多应具大权皆受到限制,日本政府又不对议会负责,几乎可说是虚设,或是日本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我们无以名之,称之为“阴性议会”,谅不为过。

日本宪法是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关于议会的规定自然也以普鲁士国会为蓝本,明治初年日本政府为着准备制宪而派伊藤博文赴欧调查各国的宪法。当时,伊藤博文所师事的,是德国守旧派宪法学者格耐斯特及斯泰恩。格耐斯特关于议会的设置,曾经指示伊藤博文如下:

“闻日本有开设国会的计划,关于外交、经济及兵制三项,绝对不可容许议会置喙”。

“若赋与议会以过多的权限,则政府将被议会所使役。如关于财政事项,若归议会专权,则政府必成议会所豢养者而受其使役。……规定岁入之权,若全部赋与议会,则自己不能行使政治,终必酿成负责大臣辞职再依议会之多数,以任命大臣。”(《西哲梦物语》——明治文化全集宪法篇)

格耐斯特的意见,完全站在官僚的立场,自然大使明治官僚的巨头伊藤博文等极度喜悦而钦佩,又以当时日本封建性的浓厚日本根据格耐斯特的精神规定日本议会的地位,自非偶然的。于是日本宪法适应当时的环境而充分发挥绝对主义,严格限制议会的权限。日本议会与各国国会不同,所受到的严格限制有下列重要事项:

(一) 没有修改宪法的发言权;

(二) 没有讨议关系皇室事项的权限;

(三) 众议院(人民代表机关)没有修改贵族院会的权限;

(四) 没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权限;

(五) 不得干预陆海军的编制,常备兵额的决定,及军队的统帅派出。

(六) 预算审议权极受限制,几乎变成有名无实的虚设。

再自日本议会的组成上考察,更可看出日本民意在议会上表现的薄弱,也就是日本议会无力的所在。日本议会是由特殊的二院制组成的,即众议院与贵族院。贵族院议员完全不适用选举制度,完全是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因此,日本的二院制又与美国的二院制(元老院与代议院)之全部依公选制度选出者,不可同日而语,即连保守意味相当深湛的英国二院制,也且不如。英国的贵族院(上院),议员虽然不由于选举,大多是世袭贵族议员,终身议员,形成英国的保守势力,但在英国的二院制下,凡经过下院(众议

院)三回以上可决的议案,上院(贵族院)即丧失其否决权,这样明文规定着众议院的优越性。但是日本的二院制则完全与此异趣,甚至于颠倒过来,贵族院对于众议院的决议案,无论多少回,无论何时都可以予以否决。甚至在两院发生冲突时,通常是众议院被解散重新改选。反之,贵族院则无所谓解散。日本的二院制这样规定着贵族院的优越性,所以在日本的议会史上充满着众议院对贵族院妥协屈服的史实,绝无众议院对贵族院斗争的事件。在日本民主主义全盛的大正时代,一部分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虽也曾一时提过改革贵族院制的主张,但不几何时复又消声匿迹,无声无嗅了。近年来虽以“革新”声浪的高涨而又有人主张改革议会制度,但即如贵族代表者的近卫文磨假借“国民再组织”的大题目,也没有成功议会制度的改革。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者固然无法促成,法西斯派也觉十分困难,这是由于日本宪法规定:贵族院制的改革必须经过贵族院自身的赞成。

因为贵族院如此稳固,所以众议院永久处于贵族绝对主义的控制之下,而现代议会中心的众议院的权限,非常薄弱,日本众议院等于虚设。虽然每届议会也曾有几许勇敢的议员发挥过指责政府政策的言论,但结果皆成空喊,特别对于重大事件如预算案,皆是忍气吞声地服从军部的意志。

日本众议院只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就是“预算案先向众议院提出”(第56条)的规定。但是宪法又例外的规定:



“在紧急必要的场合,政府得依敕令为财政上必要的处分”(第70条);又“帝国会议不能成立预算案的场合,政府可以施行前年度的预算”(71条)。这些都是便利政府而削弱会议的规定。

日本议会完全是普鲁士型的议会,当时的普鲁士议会完全是官僚政治的附属物,会议作用只是在官僚政治上施以代议制的粉饰,同时结合官僚政治与布尔乔亚社会,使官僚政治不至孤立而已。日本原是半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布尔乔亚的生长不健全,官僚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日本资本主义虽已发展到金融资本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官僚主义势力(包括贵族官僚与军事官僚)却也随着增加,所以日本议会之附属于官僚政治依然如故,特别是在战时军阀大势力膨胀的今日。预料此后即令法西斯的“革新”势力发展后,日本议会的权限将更低降。日本政党的作用原即不大,在议会占多数的政党,未必能取得政权,事实上日本就不是政党政治的国家,近年来日本政党的势力尤为没落,既成政党即不散也四分五裂了。这和英美典型的政党本位议会政治比较起来,真有隔世之感。

原载 1941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6 期、第 6 卷第 1 期合刊

# 日本特殊选举制与官僚政党

## 一、日本式的“普选制”

不论中外古今,一个国家有何种宪法,即有何种议会制度,有何种议会制度即有何种选举制,日本不能例外,因有纯粹的钦定宪法,才有女性的议会制,也才有不健全的选举制度。

在典型的议会政治的英国,是依无差别的平等选举法选举代表人民的议员的,他们以国民的代表资格支配立法机关,监督政府。但日本的选举制度,却又与日本独特的议会制度相适应,又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日本议会开设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选举法也同时颁布,规定拥有选举权者只限于缴纳直接国税15元以上的人民。这种限制,至明治三十年改为十元以上,大正八年(1929年)改为3元以上。但即使为3元以上,缴纳这么多直接国税的人,仍是日本国民中的极少部分,大正八年当时有选举权者不过300万人左右,不及日本人民总数二十分之一,对于这样

过度限制的选举制，终于掀起了大正七八年以来猛烈的“普选运动”。普选运动又与当时渐渐抬头的劳工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轰动过一时。日本政府则加以严厉的取缔，大正七年因为普选运动而被投狱或被检举的，竟达 1,800 人之多，但在这种猛烈澎湃的情势之前，即连顽固的官僚势力也终于感到有对于普选运动做若干让步的必要，其限度止于容纳布尔乔亚派的选举扩充权，其目的在于分离布尔乔亚政党的普选运动与工农的彻底普选要求。大正十三年（1924 年）始于清浦官僚内阁瓦解之后，实现了主张“普选”的政党联合内阁，加藤高明内阁。所谓普选法也始得于大正十四年五月与枢密院制及贵族院制的修正同时得到可决，而于同年 12 月颁布实施。

但是日本的普选，始终是名目上的普选，实际内容是等于限制选举制，其限制条件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完全限制妇女的参政权。在实施普选的文明国家中，把妇女除外的国家非常之少。

第二，设年龄的限制。欧美的普选法大多对 20 岁以上的国民赋与选举权，而日本的选举年龄则定为男子 25 岁以上。日本男子到 21 岁即有当兵的义务，选举又是每 4 年始实施一次，所以实际上须到 30 岁左右，始得行使选举权。

第三，现役的陆海军人除外，也有重要意义。这不是削弱军人政权的意义而是军部集中统制的

用意。

第四,限定在同一市镇村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始有选举权,这是把因为生活而须时常移动的大多数劳工除外的用意。

第五,候补者须缴纳保证金千元。这种规定对于贫穷者,劳工,及农民代表的候补者,加以极度的限制。

在这种限制选举规定之下,实际有权者中有 1300 万人,比之大正八年时代的 300 万人,不过增加了 1000 万人,在日本总人口 9000 多万人之中,不过占 14% 强,再就普选制实施以后举行的总选的总投票数加以考察,昭和元年约 950 万,昭和三年约 1000 万,昭和七年约 970 万票,这种普选实施的作用并不很大。

## 二、买收与干涉

自选举开始以来,日本的议会选举即有一个原则,政府党必胜。固然严密地说来,政府方面并没有完全胜过,但是几乎全部是政府方面的政党占到胜利。只在当时的政府与有力政党的关系不协和的时候,政府方面始归于败北。为什么说政府党必胜呢?政府干涉选举的效果是第一原由,第二是政府党有丰富的选举资金,便于收买投票,是一般承认的公开秘密。即自普选实施以来,这种情形仍毫无

改变。第一次普选的昭和三年的选举中，政府党政友会，由田中义一经手使用了 1000 万元。这种例子相当的多。政友会及民政党等政党每次选举至少也要使用 500 万元以上。若就候补人平均分配，则普通每一个使用 3 万元至 5 万元，多的使用 10 万元。

这种收买的选举须政党与巨大财阀勾结始有可能。此外尚且用尽种种不正的手段。现举一例，则有尾崎行雄所提起的“机密费”与政友会选举的关系：

第一，没有比事实更正确的东西。我国使用机密费，使用过军事关系的机密费的事例，是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及西伯利亚出兵即大正三年事件以来的事。……中日战争当时陆军使用的机密费只有 369,000 元。日俄战争是 320 万元。今日的西伯利亚是无人之地，没有敌人。在没有敌人的西伯利亚，无人之地，倒使用了 2400 万元，对于此点有不怀疑的人吗？……若就这 2400 万元的用途分析看，则大隈内阁 15 万元，寺内内阁 340 万元，原内阁 2000 万元，都是在无人之地使用的，所以发生使用于何处及如何使用的疑问也是当然的。……在寺内内阁的时候，发生过众议院的解散。议会解散则如前述，选举费是要特别用得更多，也是事实。这样看来，这 15 万元突然增加到 300 万元，和此次的解散有某种联系，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样，在原内阁的时代，也发生过为阻止普通选举法而解散议会的事件，此时解散后的选举上，军用金极其富裕。……既有 2000 万元的机密费用于西伯利亚无人之地的事实，则这里也必有某种的联系

……(大正十五年众议院议事速记录——尾崎行雄)。

当时原内阁的陆相是田中义一,原氏与田中有特别关系,后来田中当了政友会的总裁。机密费有种种的种类,在其支出上,有大臣可以自由支配的,有须得军事课长同意的。田中陆相时代的军事课长是以后的教育总监,某军派巨头,当时的大佐真崎。他认为所要求机密费的一部分为不合性质而拒绝之。所以惹得田中大怒说:“真崎这个家伙实在不懂理,免掉他。终于不久滴为联队长。”

收买既是选举的常识,为着费用的筹划,通常不但要与财阀勾结,即连上述不正手段也都采用。日本选举毫无布尔乔亚民主主义的成分,于此已可明白了解。

日本政府干涉选举也是公然的事实。其适当的事例,我们想起依普选法最初的选举而实行的昭和二年府县会选的实例。

政友会内阁在成立后不久即于昭和二年五月十七日经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之手,免掉民政党系的知事 20 多人,而代以政友系的浪人。其后又大更动内务部长,及警察部长级,并在府县会选举时要求依照命令行动。这样,在选举的时候出于无限数的干涉,终至宫崎县古宇田知事引起了司法问题。关于这位知事的干涉态度,可充一个典型:“知事室恰如参谋本部”,“选举当时的古宇田氏完全超越政友会支部顾问的地位而有支部长之观。知事家里架设专用电话,召唤茂山高等课长,授与高等政策,努力引导友方于有利地位”(昭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京日日新闻》)。

对于政友会及政府的这种干涉态度,民政党也会发挥其对策。他们派遣前警保局长,前警视总监,被田中内阁免职的民政党系的知事,前警察部长,前高等课长,充当所谓选举干涉监视委员,使他们挨户访问他们前部下的现任警察部长,而加以威胁说:“你们若干涉民政党候补者的选举运动,到民政党内阁的时代就罢免你们”。对于政府党之发动官僚行政机构而出于干涉,反对党也发动官僚的要素与之对抗,真是分庭抗礼无独有偶了。无论如何,日本的选举权,与布尔乔亚民主主义要素的民众选举绝无关系,是可断言的。

这些事实是同样布尔乔亚地方党,同样官僚势力相互干出的把戏,但若与真正反对势力的劳工农民的选举运动接触时,则其干涉又采取特别的方法。单单剥夺言论的自由,压迫集合,还是不够的。

### 三、政党与财阀

从来政友会及民政党是以所谓二大政党而压倒其他的中间党的。单看这两个政党的情形,即可明了今日布尔乔亚政党的性质。这些政党如上所述,是立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官僚机构的下位,是在政党的首脑部拥戴着许多官僚主义的政治家的布尔乔亚地主的政党。虽然带着极浓厚的官僚色彩,但是政党自身却不是官僚机构。又在伊藤博文创立政友会,桂太郎创立宪政会前身的立宪同志会的当

时,这些政党不过是官僚的一种工具,只是官僚机构的附属物,但随上次世界大战前后布尔乔亚势力的强化,而服务于其要求的政党势力也随之而强化,终至拥有较独立的活动力。此项,若就政友会检点看,则在伊藤博文及西园寺公望的总裁时代告终以后,三井的原敬时代的大正初叶以前,经过中日及日俄两战役而膨胀起来的布尔乔亚派的支配权已经确立,三井财阀对于政友会的支配尤其明确。别方面,几乎同时期的宪政会总裁,也已经不是肥后藩阀的参议大隈,而是三菱系的加藤高明了。这些金融资本已不复如前,专靠官僚巨头的庇护以获得利权,已经积蓄了可以派政党为代理人而活耀于政治舞台上的实力,因为他们觉得如此办法更为有利。固然布尔乔亚记并没有放弃其与官僚势力的勾结。这样,随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确立了两大财阀资本的支配权。于是二大政党的对立,遂至占政治的重要地位。但是一个政党不能单为一个巨大财阀的利益而行动。政友会不独服务于三井财阀的利益,不与对立的许多中间财阀的利益,也同时服务,即对于三菱财阀的利益,也不能绝对忽视。若离开布尔乔亚政党应尽的全般行务,则不能维持政党的生命。虽有激烈竞争和对立,但这始终是同一阶级内的竞争和对立。不过,政友会是较为关心三井的利益,而民政党是较为关心三菱的利益罢了。

政友会与民政党之间政纲上或政策上的对立,只反映当时各自背后的势力关系,并不是一贯的原则上的对立。

有些论者或谓:“两党政治任务之相异,在于两党各自



劳动者农民政策的相异形态之点。民政党比之政友会是较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之遂行者，而政友会则比之民政党反动色彩较强的政策之遂行者，云云。”但这是非常的错误。只就两党之间些少的一贯政策遂行上的差异，不能作如此主张。治安维持法是在民政党内阁制定的，而滨口阁的强行合理化；强行劳动化，不能说是对于劳动者农民的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固然政友会的田中义一总裁及铃木喜三郎总裁等人的反动色彩较为露骨，官僚的倾向较为明显，但是民政党之与反动官僚勾结，也是传统的强固，竟至承认自己为斋藤及冈田两次官僚内阁的“准与党”。

这种混乱，不独限于政党，即支配者政策的本质，也不能由他们的口头禅来下判断。在民政党内阁有币原主张平和外交；同样，在官僚内阁有广田主张协和外交，但是对华的侵略工作则没有一个放松过。民政党常使用似乎自由主义的言辞，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但是民政党前身的宪政会的总裁，又是币原的盟友加藤高明，却就是以有名的二十一条压迫中国的责任者，同样的政策无论在民政党或政友会，乃至官僚的诸内阁，也都采用过。必须充分理解这种地方，始可以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 四、政党与官僚

表面上虽说是布尔乔亚的政党，但是日本的这种政党都和官僚主义有非常紧密的结社。

继伊藤博文之后任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公爵不消说，即田中义一大将等等也都是极典型的官僚巨头。即如原敬及高桥是清等人，虽不若他们之为纯粹官僚，但也都是官僚色彩浓厚的政治家。

只有继田中义一之后的犬养，是政党的政治家，但他也不过是一个最新实权的总裁，至于后来的铃木喜三郎又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再就他方面的民政党考察，若口和滨口不消说，即上自构成民政党首脑部的山本达雄，币原喜重男以至背后的指导者伊泽多喜雄等人，也都是官僚的政治家。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占住贵族院的议席而没有众议院议席的家伙。日本的布尔乔亚政党拥戴官僚为其头目，换言之，上半身为官僚的要素所占，又是日本政党的重要特色。

又在既成政党内部的统制及指导，也完全看不到党内的民主主义，而总裁及其周围的总裁式及官僚式的支配，却笼罩着全党。无论是政友会或民政党，当初伊藤或桂氏这两官僚巨头发起结党的传统精神，即至现在仍然强烈支配着。政友会之服于田中义一之下，民政党之欲拥戴军部官僚的宇垣一成为总裁，都是这些政党内部没有党内民主主义的证明。即如政友会及民政党的党则，也都规定：干事及委员等皆由“总裁指令”。固然不是总裁个人决定的，但是既有如此规定，也足以反映总裁及其周围主脑部的专制，且又保持其专制的法律地位。日本政党经由这种官僚主义的构成而一任首脑部的命令，以奉承官僚机构上层的

意旨。

这种情形再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日本政党带浓厚的私党色彩的意思。即如尾崎行雄等也说:“日本政党事实上不是公党,而与私党无异”这可以视为支配政党的官僚倾向产生的一种趋势。

无论在任何国家,布尔乔亚政党经由首脑部以服务于金融资本,虽是事实,但在日本政党上层部分则由官僚或政治家占支配的地位,再以其党内官僚主义的统制,而全体经首脑部以与全官僚作深固的结托。因此,政党立于官僚机构的下位。

原载 1942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6 卷第 2 期

# 日寇国民政治的没落

## ——国民政治组织的纠纷

### 一、一体化问题的提出

在第八十一届日本议会中(本年3月),最生动而引起国民关心的议案,就是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的一体化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在国民,抑在政府,都是日本现阶段政治的某种必然趋势,构成最重大的课题。

日本政治的动向,正要求着一种完全的全体性与强力性。企图于此基础上,开展其所谓决战的政治。但直至最近,现实的政治并未表现出一种十分完全的形态,这当然基因于日本政府之遂行国策尚难获得国民的协力,而日本国民还在到处表示愿意和政府做更高一层的政治协力,以发挥其所谓“举国的政治力”。这些事件皆在证明日本年来结集政治强力的企图,并没有成功;而其失败至最近反映成为所谓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一体化的问题。在上届

日本议会上,日本政府及议会对于此两团体一体化问题的意见,固然互有径庭,但惟其如此,更足以看出日本政治力集结运动的前途,暗礁尚多,其不可乐观可知。

在上届日本议会上,金光庸夫首先提出这个课题,质问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的异同,日首相东条曾作简单的答复,但其内容依旧是政事结社与公事结社的旧话重提,而肯定翼政与翼赞两团体并存的现状。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残留为未来的宿题。日本朝野一般的印象殆皆如此。

随着东条所代表日本军事法西斯政权的强化,日本国民愈益丧失了参予政治的机会。所以日本一般国民,皆认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一体化的问题,为日本国民要求强化“政治协力”的反映,对于两个团体内部的问题,反视为次要。因此日本政治评论家,对此问题提出如下的意见:

“如果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的一体化,不能达成国民更高政治协力的要求,甚或招来更恶劣的效果,则此问题完全变成愚劣的结果,徒然终结于为论议而论议,甚或更坏,堕入一部分议员的恶作剧。其时,推进日本政治全体性与强力性的炽烈冲动,失掉了意义,而对于适切解决的途径,应另做周到的考虑”(据津久井龙雄《政治力强化的本义》——《改造》本年3月号)。

日本政治上议会比重的减退,已是近来不可掩饰的事实,过去的日本政治,即未以议会为政治的中心,现在议会的政治地位更加低落,这是日本政治基本制度的问题,据日本宪法的规定,议会并未单独成为政治的中枢,实际上

也从未有过这么一回事。枢密院、军部、及财阀的势力,时常构成日本政治的指导力量。起极大的作用,形式上即为议会中心,事实上并不是政党政治。此种倾向至最近更加显著。其原因有二:一为自由主义没落的世界现象的反映,一为日本畸形国体的加深反映。空前深度及广度的大规模战争,就是这种倾向的动力。

## 二、翼赞会与政治会的历程

大政翼赞会原设立于第二近卫内阁时代,曾经经过许久的酝酿与演变,当时原以国民再组织的意义,欲与会议并行以补其缺陷。但至其拥有广义的,或高度的政治性时,自难免有与议会对立之感。但是实际上,翼赞会的性格确与议会不同,其用意原在于直接指挥民众,例如最近将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及其他职业或地域团体,收归管辖,而进行其所谓“奉公运动”的指导,并及于经济再编成的领导,是为大政翼赞会特别显著的特色。日本统治者原欲借此地域及职业代表团体,补强单纯的地域代表团体的议会,以发挥议会所不能完成的机能和作用。

日本政府之组织大政翼赞会,既出于此种用意,所以后来又新设调查局,调整调查委员会,用以充实协力会议。其用意据说是在于加强“下情上通”的意图,也即上述原意。即其设地方事务局,由民间选出局长,也说是出于同样意向。后来更与所属部下组织,如部落会及町内会,加强有

机的结合,其用意所在,尤为显明。大政翼赞会的这种新姿态,据日本政府代言人的解释,是欲立于国民运动的立场,图谋精神与物质两种生活的全面重建,称赞其新作风愈与本来的意图接近云。

大政翼赞会这样新的发展,尚未至侵及议会的独自的立场。议会形式上依然是宪法所保障的国民参政立场,据日本论客所夸耀,议会开院式上,日本天皇必定莅临,赐予圣旨,未改旧观。尤其是预算案及法律案,仍经议会审议,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对于地方选出的代议士,仍有恳切答复质疑的义务。

造至东条组织临战内阁集中职权,及军部南侵冒险的一时胜利,日本政治就渐起质量的变化,数十年来贵族官僚与军事官僚的对垒,渐有归趋于军部独裁的倾向,贵族官僚及其他稳健派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其代表格的近卫派人物,几乎完全退至后台,上届总选举的结果,民政党与政友会的议席大为减少,而亲军派政党的议员,占了压倒的多数。军部及亲军派的野心,在于组织军阀支配的第一政党,至去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翼赞政治会”,其动机即在于此。

翼赞政治会之成立,在军部及其革新派,确有两种用意:消极方面,用以抵制先行成立的大政翼赞会,积极方面,则在于增强所谓“政治力的结集”。而在日本两大派势力的对抗上,前者尤重于后者。

“翼赞政治会”的宣言,强调“政治力结集”。这个口号

自近卫第二次内阁末期革新派即已提出，他们原想以“政治新体制”为号召，以大政翼赞会为阵营，组织单一政党。当时大政翼赞会已为革新派所操纵，现状维持派乃起而攻击，指为“违宪”“赤化”，结果革新派的计划失败而退出了大政翼赞会。革新派被驱出了翼赞会之后，一面攻击“大政翼赞会革新性的褪色”，一面则进行新组织，欲用以代替大政翼赞会。

革新派早即企图组织革新的政党，乃推当时的首相近卫为总裁，但近卫对于组织新党，并不积极，只称：“翼赞会是公事结社，是推进翼赞政治的议员的机关，无团体意志”。后来革新派的设施又为稳健派所攻击，权终于落入稳健派手里，革新派觉悟出：欲由大政翼赞会完成“政治力的结集”，已不可能，于是重新发动“第三政治力结集”的组织。

大政翼赞会是拥戴近卫文麿的团体。翼赞政治会却是东条政府及战时内阁时代的产物，时代性不同，意义也就不同。翼赞政治会推阿部信行大将为总裁，石渡花太郎及旧政友会及民政党的重要份子，任该会常任总务，会内设事务局，遇必要时尚可设立其他机关。除陆海空军大臣外各省大臣皆参加，贵族院及众议院两院议员，除参加其他政治结社者外，也可参加。此外尚有大政翼赞会重要分子，皆在罗网之列。据同盟社去年5月20日电，被邀参加翼赞政治会的人数，达1,044名，迄举行成立大会之日止，确实参加者共32人。翼赞政治会全是东条政府支持下的一个



政治团体,这正与近卫政府支持大政翼赞会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东条没有任总裁,而以阿部信行代肩其名,而自任实际的总裁。这固然由于东条名望不如近卫,但作风却比近卫之为半傀儡者又胜过一筹。东条较重实际,翼赞政治会规定由首相担任监督,由各省大臣担任会内各种运动团体的指导。

“战争”的一时胜利,不但决定了国民政治方式的动向,并且决定了内阁职权的一元行使。的确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划时期的发展。

军部梦想多年的“公武合一体制”,实际上得了第一步的成就。最近东条内阁且更以“行政职权特例案”,在内阁攫得总理大臣的专权处置的地位,在地方也已实施行政一元化制度,即在疯狂的“超重点产业生产”上,也得以一元地处置了。

在军权统治一元化得全面推进中,只国民政治运动一项,未获圆满的成就。于是大政翼赞会和翼赞政治会一体化的问题,终于上了日本政治日程。

### 三、国民政治力集结的没落

自从翼赞政治会成立以来,日本国内即不许再有第二个政治结社存在,换言之,日本军阀确认翼赞政治会为唯一的政治团体,而其构成议员当中,大多为大政翼赞会的干部,或内阁各省部的委员,或为其□国策机关的构成员,

皆于议会之外占重要地位。要而言之,到这时候,日本议会算是以翼赞政治会为中心,此种性质的议会的存在,已无可否认,日本政府即欲以此政治会,为结集国民政治力的机关。

翼赞政治会只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它本身没有直接的党员,没有巩固的组织。于是第一需要地方支部的组织,以为弥缝;第二,需要与大政翼赞会合流。上述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一体论的根据,也即在此。这也是日本强化国民政治力的当然归趋。但是这种合一论的主张,与国民自身所希望的政治团体,未必完全一致。日本政府想以现在的议会为中心作成一元的组织,究竟能够吸引日本国民多大的关心,尚有疑问。在议会政治全盛时代,政党势力的增大,可以左右政府的运命及国策的方针,另当别论。若现在基本国策业已确定,任何政治党派,皆不能左右国策动向的今日,以议会为中心作成政党组织,对于日本国民,能有多大魅力,实属疑问。

政治的活动,原须以客观条件为前提,绝不能蔑视此客观的条件,而提出抽象的主张。若陷于这种抽象论,则大政翼赞会,乃至议会的废止论,或将实现。日本现在的论客等业已退让至此地步,而主张以现在的政治环境为前提条件,以寻求解决或整理国民政治结社的途径。

从此主观的要求出发,日本政论家逐渐承认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渐次加强其密切关系,为当然的趋向,并谓两团体的最高干部共通者居多数。但是实际的情形,并

未允许二者立即合并为一体，故又有人主张二者固可协力，但彼此之间尚存有不同的区别。若就日本今日的政治情势分析，大政翼赞会支配于元老重臣稳健派，而翼赞政治会则操纵于亲军的革新派，则欲此两团体马上混合成为一体，会徒然先掀起日本政局的波澜，而促其动向愈益混乱。日本明眼之士亦皆注意及此。

日本现在一般国民所希望的，似在于更加努力地调和军部、官僚（狭义的官僚）、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政治协力，这种努力又不必拘泥于大政翼赞会，或翼赞政治会。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军部与官僚云云，其间的政治气流，究竟不是单纯的东西，所以想以囫圇吞枣的办法，依抽象的概念论，予以处理，结果必定失败。故今日日本盛唱大政翼赞会与翼赞政治会的合流，或者可能使日本政界起一番的兴奋，但欲期其效果甚大，则似尚困难。

日本政府虽以设立翼赞政治会，庆贺所谓举国主义的政治体制一度完成，但是问题依然存在。除机构性质区分不明之外，尚有更严重的人事问题存在，要日本国民在此不义的作战过程中及军权愈益独裁化的情势下，全体拿出勇气和努力，尚不可期。於是日本一般政论家，将此勇气和努力的原动力，寄托于少数的所谓有志者身上，而不敢期待于全体国民。他们称赞德国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并不是开始即有今日的态势，最初是靠少数先驱者，拓开道路的。他们只希望翼赞政治会会员，奋起登高呼喊，使日本国民予以响应，至于形式上的组织尚属次要，并称国民政治力

不是先有形式或组织而后形成内容，反之必须先有先觉者出为领导，集结而成整个力量。甚而至于有些人，竟将此先觉者，囑望于军事独裁者的东条英机。日本国民政治力的集结，已可见其暗淡的前途了。

津久井龙雄对于东条英机的礼赞如下：

“议会席上的东条首相，虽以病後衰弱而其元气则甚泼辣，其行动言论大有压倒议场之风。首相在其病中或者有所深思远虑，或者已得新决意及构想。故其对议员的答辨，处处表现着确定的信念。并且其信念的根底，完全根据日本国体的本义，以贯彻臣民之道，若反映于政治面，则上承陛下的信任，下想国民的爱国心，欲超机构与制度而着重于人类的工夫和努力。若东条首相深切贯彻此信念，则日本的政治氛气，将急速振作，净化，高扬罢！想像不到的政治力，也将浸透，普遍于日本全国吧！”（据上引《政治力强化的本义》）

津久井所代表的日本政客，显欲奉东条英机为独裁领袖，但是日本的政治制度，却与德国纳粹及意大利法西斯党不同。津久井自己也承认：“日本的总理大臣，与外国的独裁者大异其趣，且非民众投票所可左右的；总理大臣既无党的背景，其命运自然不受党的支配云云”。但也惟其如此，日本总理大臣的地位，究竟是架空的，他没有民众作他

的后盾，欲以无党组织基础的首相，领导举国一致的国民组织，集结全体国民的力量，自无多大希望。

日本的国民政治力集结运动，已经退步至期待于“贤人领导”，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固已失掉意义，即连年来近卫文磨等人所主倡的“国民再组织”，也渐失其根据。日本的军权政治愈趋集中强化，而自由民权主义萎缩至无以自存的地步，日本军事独裁尚有它一时期继续进展的可能。日本自由民权首倡者的福泽谕吉有知，不知将如何捶胸懊恨其子孙后辈的不肖哩！

原载 1943 年 12 月《半月文萃》第 2 卷第 5 期

## 日本战时议会本质的检讨

日本称去年为“决战年”，而在这一年中，前此业已匆匆召开过三次议会，最后于12月24日召开第八十四届议会，是为第四次议会了。第八十四届议会，经过休会期间后，业于本月21日重开。日本的战时议会，多少总反映着日本作战的姿态，因此对于议会的召开，也值得我们注意。而对于日本议会的本质，我们更拟乘此机会进而略加研究。

东京12月20日广播告诉我们：“日本议会已定于24日举行第八十四届常会。现已有种种迹象，证明此次会议会期将大为缩短，议案之讨论并将以迅速方式进行。政府已决定将27种方案及10项议案提出大会，尽先讨论，1944年至1945年财政年度之概算，亦在尽先讨论之列。……政府之准备既顺利进行，贵族院及众议院方面，亦希望实现政府缩短会期之政策，俾使政府集中力量，从事作战”。

从上项消息的报告,我们已可以了解日本战时议会的本质及本届议会的使命。

第一,日本议会的根本性质,原即不能代表日本 7,000 万人民的意志,原即为贵族官僚及军事官僚所把持的所谓人民代表机关,从来只是听取政府报告,追随政府的施政方针罢了,故常称为“无风带”的议会。

第二,日本无风带的议会,到战时,特别是到东条军阀政府出现以后,更是风平浪静,所以屡次会期皆甚缩短,甚至有仅讨论两日的,这次更加以短缩宣告国民,其为形式机构,尤可窥见。

第三,有些议会为宪法所规定,所以不得不按期召开,所通过的议案也是形式议案,如每年的财政预算,也有些议会是临时议会,因政府业已实施或将实施的“措施”,在宪法规定上须经过议会通过,其为形式仍无二致。

## 一、日本议会的本质

凡是一个立宪议会制度的国家,一切政治设施的总原则,皆须通过议会,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皆在议会上公开讨论。日本的议会制度,虽不完全。带着极浓厚的封建的绝对性,但只要形式上议会其物存在则其政治外交的总动向,必经由此议会的决议表映出来。更严格地讲,惟其日本议会,是个傀儡机关,是个形式组织,是个追随政府、追认政府设施的机构,其讨论及决议,更可老老实实在地反映日本政府

的特质及其施政方针。日本议会,本质上就不是完全的民治议会,不能代表民意,而只追随政府的屁股走,自东条政府出现,全副武装的军阀政权登台以来,战时日本议会的“无风带”,更是惟妙惟肖地反映东条政权的本质与施設。

日本议会之反映政府的施設,在其为傀儡机构及形式组织,故先就其议会的本质,加以分析,当更有助于吾人了解日本议会与日本政治的关系。

日本议会之为傀儡机构,应涉及其宪法规定的特质。日本宪法是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而判定的,其关于议会制度的规定,自以普鲁士国会的规定也为依归。日本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曾为准备立宪而赴欧洲研究各国宪法,在德国拜两位保守派学者,格耐斯特及史太恩为老师,得他们的指示,而将普鲁士的宪法精神,编织于日本宪法。

格耐斯特关于议会的規定,指示伊藤博文,几种重要的原则如下:

“关于外交、兵制及经济三项,政府绝对不可容许议会置喙”。

“若赋予议会以过多的职权,则政府将为议会所使役。比如关于财政事项,若归议会专权,则政府变成议会所豢养而受其使役——规定岁入之权,若全部赋予议会,则政府便无法施政”(《西哲梦物语——明治文化全集》宪法篇)。

日本宪法关于议会的規定,在这指示之下,使它丧失欧美先进立宪国家议会享受的权利,其主要的有下列几点:(一)没有改正宪法的发言权,(二)没有讨论关系皇室



的权限,(三)没有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权限,(四)不得干预陆海军的编制,常备兵额的决定,及军队的统率事宜,(五)预算审议权,极受限制,几乎变成有名无实。议会最大权限的预算审议权,在日本特别赋予日本政府,以便宜的处置,规定:“至紧急必要的场合,政府得依敕令为财政上必要的处分”(70条)。最近东条要求议会预算审议手续简单化,自非无根据。日本议会制度的残缺,尤在于贵族院权限超越于众议院的二院制,这正与英美的实情完全相反。日本众议院与贵族院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众议院解散,而贵族院根本就无所谓解散。众议院没有议决改革贵族院条例的权限。日本议会之为非民意机关,于此可以了然(以上均据拙著《日本帝国本质论》)。

日本傀儡议会到了战时,尤其到东条军阀政府时代,更充分表露其弱点与缺陷,而更老实地反映政府的意志和施設。东条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也即他上台的前期,乘其战争初期胜利的余威,对于议会满不在乎,简直不放在眼下,但自太平洋战争第一周年以后,因为东条革新派政权与现状维持派调和的必要,而其施政必需假手于议会,所以在今年中频繁召集议会,其开会期间虽此日甚短促,讨论经过也仍为风平浪静,但其所反映政府施設及政权性质,更为充分而具体,但是我们若欲从根本了解日本议会之为政府的傀儡机构及其为军阀政府的分罪组织,则我们更应从日本的选举制度及军阀政府之成立过程,予以适当的分析,然后始可得一基本的了解。

## 二、日本的特殊选举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制，各有其特殊的性质，表面上虽同为立宪国家，而其宪法所规定表达民意的内容与方式，皆有各自不同的规定，因而国会议员的选举制度，东西皆有悬绝之例。

英国可以说是典型的议会政治的国家，采用无差别的平等选举法公选国会议员，议员则以国民的代表资格支配立法机关因而支配内阁。所谓无差别的平等，固然不是绝对的，但各阶层的人民，至少可以公开而广泛地、自由而又自主地主张自己的利益，并且督责自己的代表，向政府主张自己的利益。各阶层人民的志意能否表达，关键完全在于选举制度的合理与否。

日本的普通选举制度，正与其国体相适应，有其特殊的形式。日本选举法颁布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规定有选举权者只限于缴纳直接国税15元以上的人，至明治33年放松限制，改为10元以上，大正八年（1919年）又改为3元以上。这种限制表面上虽似甚轻，但在日本能缴纳3元直接国税的人，究竟仍为少数，大正八年当时的有权选举者，不过300万人。为着消除这种限制，而在日本民权运动最高潮的大正七八年间，曾经发动过猛烈的“普选运动”，其影响且已浸淫于农民间，与农民运动结成一体。日本政府为着压迫这个普选运动而逮捕人民，达1,800人之多。日本顽固的官僚势力（当然包括贵族官僚与军事官

僚),对于一般人民仍不稍放任,他们认为:日本即令必须实施普选制度,其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也须设法分开。其结果,大正十三年底继清浦官僚内阁之后成立的四党联合内阁(加藤高明内阁),虽然主张“普选”,其普选法且也通过于大正十四年五月(经贵族院与枢密院的修正),但是这个高潮仍阻止不了“农民劳动党”的解散(尤其不可思议的,这种解散是在该党成立的刹那执行的)其普选制度,始终只是名目上的普选,其实际内容仍等于限制选举制。

要而言之,日本现在的普通选举制,有如下的特质:

第一,完全否认妇女的参政权。在实行普选制度的文明国家中,除掉妇女选举权的国家,非常之少。

第二,设下年龄的限制。欧美各国的普选法,大多数对于20岁以上的国民,赋予选举权。反之,日本则规定为25岁以上的男子始有选举权。但是日本男子到21岁即有服务兵役的义务,选举又是每隔四年始实施一次,所以实际就等于日本男子须20岁,始有机会行使选举权。

第三,规定现役军人的没有选举权。此点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日本大多数的士兵,来自工农群众,此项规定,就等于限制工农的选举权,故有上项结果。

第四,限定在同一市町村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始有选举权。这种限制很显明的,是加于工农及一般小市民的,因为这些人须为生活问题而时常迁移。

第五,被选举人候补者,须缴纳保证金1,000元。此种规定对于贫穷者、劳动者及一般农民的候补者,发生很大

的限制作用。

由于上列各种的限制,而日本普通选举法所规定选举权者,只有 1,300 万人,在日本总人口 9,000 多万人之中,不过占 14%。因为日本普选的畸形,致使一般日民对于选举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其总选举的总投票数,离选举权者总数也很远,昭和三年约 950 万票,昭和七年约 970 万票。简单一句话,日本的普选制度,可以说只适用于资产阶级及大地主。对于一般人民,无论在制度上,抑在实际施行上,皆无多大关系。

### 三、双重压迫下的普选

日本的普选制度,除开不完全的规定以外,还在实际的选举投票上,加以收买与干涉的两重不正当的阻碍,于是日本普选制,更成了四不象了。

因为日本普选制上表现出半公开的收买与干涉办法,所以一向的普选结果,皆归政府党胜利。此项已经成了日本普选的一个定则,其例外非常之少,过去如此,战争过程中的今日,尤其是如此。前年的总选举归东条法西斯政党获得压倒的全胜,自非偶然的。政府党之所以能够获胜的原因有二:其一,为政府拥有实权,干涉选民的投票,此项干涉在前年东条政府,最为显明;其二,为政府拥有丰富的秘密费可用作选举资金,便于收买选民投票政府党议员。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上,已成公开的秘密,即

自普选制度实施以来,情形也未稍变。就收买一项言罢,在第一次普选中(昭和三年),政府党的政友会,由田中义一(即上奏日皇,条陈大陆政策阴谋者,我国人当牢记)经手使用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同时,反对党也使用金钱收买,惟其数目不能如政府党之多。据调查,政友会和民政党以次日本各既成政党,在每次的选举上,至少要使用选举费在500万元以上,各就候选人平均分配,即每一个人要使用三至五万元之谱,多的则使用至10万元。如此情形,日本的一般人民,如何能得有力量被选为议员呢?

日本选举费的来源有二:其一为政府方面的所谓“机密费”,其二为大财阀付出的支持费。前者曾经几次暴露了日本政府的秘密,后者造成既成政党必须与财阀勾结的主要原因。关于日本选举上使用机密费的事例,日本议员尾崎行雄,曾无情地暴露于下,处处与普选联着关系:

“事实胜过雄辩,我国使用机密费,使用过军事机密费的事例,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及西伯利亚出兵(即大正三年的远征)以来即继续发生。……中日战争时,陆军使用的机密费,只有369,000元,日俄战争是320万元。今日的西伯利亚是无人之地,也没有敌人,在没有敌人的西伯利亚,倒使用了2,400万元。对于此点,能有人不怀疑吗?若就此2,400万元的用途分析看则大隈内阁15万元,寺内内阁340万元,原内阁2,000万元,

都是使用于没有敌人的地方的。若此,人民对于此种款项之使用于何处?如何使用?发生疑问,自是当然之理。在寺内内阁的时候,发生过众议院的解散事件,在议会解散后的选举,照例需要特别多的选举费。‘机密费’突然由15万元激增至300万元,自与议会的解散,联着某种的关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同样,在原内阁时代,也发生过为阻止普通选举法而解散议会的事件。此时,在解散后的选举上,军用基金正极丰富,2,000万元的机秘费,就用于没有敌人的西伯利亚沙漠上了。这里也当然有某种的联系”(大正十五年众议院议事速记者——尾崎行雄)。

事实也如尾崎翁所暴露,从侧面也可以证明。原内阁当时的陆相,是田中义一,原与田中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田中既为原系政友会尽了力,后来政友会的总裁交椅,就给田中坐上了。又,田中当时的军事课长奇崎(后来的陆军总监),因为反田中的机密费的用途而被辞为联队长,也是一种佐证。

另一日本选举的弊病是政府的干涉亦为日本政界的公开事实,政府党所以获胜的原因。其适当的事例,我们可以想起昭和二年为实施普选法而举行的府县的选举事例。政友会内阁在成立的不久即于昭和二年五月十七日经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之手,免掉民政党系的知事20多人,而

代以政友系的浪人。其后又连续更动内务部长,及警察部长,是为准备府县会的选举的措施,故至实行选举时,要求依照命令行事,在这种命令之下,各地对于选举出以无限次数的干涉,终致宫崎县古宇田知事触犯了司法问题。日本报纸也有披露:“知事恰如参谋本部”,“选举当时的古宇田氏,完全超越政友会支部顾问的地位,而有支部长之感。知事家里架设专用电话,曾召唤茂山高等课长,授予高等政策,努力引导,友方政党候选人于有利地位”(《东京日日新闻》昭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选举干涉的斗争,发生于反对党(在野党)的抗争的同样干涉行动上。民政党也发挥对策,他们派遣前任的警保局长,前任警视总监,被田中内阁卸职的民政党系的知事,前任警察部长,前任高等课长充当“选举干涉监视委员”,挨户访问他们以前的部下,现任的警官,予以疏通,甚至于加以威胁说:“你们若干涉民政党候选人的选举运动,到民政党内阁的时代,就要免掉你们。”于此便知对于政府党之发动官僚行政机构行的干涉,反对党也如何发动官僚的要素,与之对抗,彼此分庭抗礼,真是无独有偶,日本的普选制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意义。

#### 四、日本议会的推移

从上面的剖述,可知日本议会完全没有民意的表现,也不可能民意表现的机会,它只是日本政治特质的官僚

意识,乃至各派官僚斗争的演武厅而已。

日本议会是被日本宪法的特殊规定及官僚势力所阉割的机构,在平时完全归贵族官僚把持,在战时则为军事官僚所支配,而决定其推移的力量,则在于国际情势的变化与两派官僚因缘时会的转变。

日本资本主义素患外强中干的枯血症,其政制又是立宪其名而封建其实,所以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向外侵略,那一个当权的人,能够顺利遂行其对外侵略,则可以掌握政权,控制议会。但是同时,任何一个或一派当权的人,到不能支持或开发侵略战争时,他或他们都要受到议会的问难,或更确切些说,遭遇反对党的反对,甚而至于兴问罪之师。

过久的不讲,只就东条军阀及亲军派政权说罢,东条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初胜的时期,很少遇到议会的问难,1942年一年的经过如此,即1943年一年还是风平浪静。但在1943年,东条因鉴于时局日趋困难,对于反对派采取了缓和的态度,在过去一年中一连召开过三次会议,报告案皆尽歪曲陈词之能事,议会几乎完全为亲军的空气所笼罩,仍然是一片“无风带”。

在过去一年中,日本在野的反对派,还能忍耐听取东条政府积极准备决战的呼吁,但经过一年,今日,日本不但没有决战,并且没有决战的能力的准备决战的前程,甚且非常渺茫。而中美英盟军总反攻的举动,日益浩大,苏联也有参加围剿的可能。“一亿人民”皆战慄了,现握攻权而负



其责的东条政府,也已起了畏惧其在野的反对派乘势起来活动,也是当然的趋势。

今日各报揭载日本“第八十四届议会,定于一日起召开”的消息,又据接近议会的人士指陈:“该次议会开会的特点,乃因局势的发展,将决定议会本身在战争状态中的何种地位。”日本政界人士也宣称:“此次议会所讨论者,并非政府的议案及预算,而是造成此项议案及预算背景的较重要问题。”这些消息提供我们对于日本议会及政局推移,许多可以深切吟味的资料。

议会尚未披露所讨论的内容,其实际情形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预料的,日本战时议会的本质,已在变化,随着太平洋战局的演变及可能更大的演变而在变质。日本战时政府已面对着多事多难的时期,议会将如何对于战争的责任,兴问罪之师,是可以预想到的。此后的日本议会开会情形,或将较有声色,或将不复为“无风带”。议会“所讨论者,并非政府的议案及预算,而是造成此项议案及预算背景的较重要问题”,已经告诉我们:此后日本议会所讨论的对象,将不是单纯的内政的技术问题,而是与战局有关的全面的问题。据笔者的观察,日本议会讨论的着重点,将有两方面:

第一,偏重于外交。在现势下如何重新估计轴心外交的比重及其推行技术,如何重新确定苏日关系可能的演变及其应付的手段,对于日益加紧攻势的美英,应如何设法应付,乃至如何个别对付,对于独霸亚洲最主要对象的中国,

应该如何加紧其侵略阴谋，或有无更新对华外交的必要，……这些将成为讨论的题材。

第二，偏重于如何决战，而不是如何执行决战的单纯的内部问题。不错，1944年将是日本更重要的决战年，但是决战不能只在准备，决战也不只限于使用武力。日本究竟能否决战？是否应当决战？可否采用武力以外的决战，结束战争？这些已为日本一般人士所留心，相信关心“大东亚战局”的政府反对派，必不能放松这些问题。

总而言之，日本在“大东亚战局”中的地位，已开始走下坡的路程，执政权的东条军阀政府，已走完红运，不但对外处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的境地，即其对内也以荆棘满路，不能如意算盘上下其手了。反对派将运用议会的场面，向政府下攻击令，至少也将酝酿进攻。日本议会此后将更热闹无疑。

（元月 23 日）

原载 1944 年 1 月 23~25 日《广西日报》

## 如何铲除日本军权政治

参予此次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都成了战争罪犯。这不但是表面上的法律问题,而实际上毋宁是日本政治制度的基本问题、本质上的问题。换言之,想根绝日本军人的侵略性,必须从根本铲除日本的军权政治。

日本军权政治在日本宪法上及实际政治上占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日本的政治制度问题之一。所以想根绝日本军人的侵略性,必须先了解日本军权政治的实质。

今日,日本军人,尤其是上级军人虽然成了战争罪犯。但是根本铲除日本军权政治,还有待于此后日本政治制度的改革。所以今日尚有彻底认识日本军权政治的必要。这不独为联合国家所关心,并且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深愿关心改造日本的台湾日本人士,特加注意。

日本社会科学界早已经公认日本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军事性。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许多事实更加证明这种军事性之存在。这是理解日本的一个关键。

像日本军阀那样政治地位的优越，和政治行动的跋扈，在普通的民治国家里，实在找不出第二个。日本的法典及习惯皆保障军部的优越地位。日本军部的几个重要中央机构，如军事参议院、元帅府、参谋部、军令部及侍从武官长等，都是直接辅佐天皇而握有帷幄上奏权的机关。日本陆海军部大臣不隶属于内阁政府，而是代表军部意志的资格或权威，这一点是日本和欧美民治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日本宪法上，规定许多种各国宪法所没有的天皇大权，其中，关于军事的重要事项，例如规定海陆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的大权（宪法 12 条），宣战、讲和及条约缔结的大权（宪法第 3 条），皆可以不得国会通过而直接由天皇行使。特别是颁布戒严令的大权（宪法第 14 条）甚至可以剥夺宪法所给与人民的一切权利。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天皇大权的行使，事实上都是由军部的几个中央机关去决定的。陆海军部大臣不隶属于内阁，而直属天皇，事实上与总理大臣并列，他们对军部负责不对内阁负责，也是最大的特点。再如陆海军部大臣不能由总理大臣选任，而必须由军部选任，也是一个当然的特色。假如政党政治色彩最浓厚的大隈内阁（明治三十一年）尚且不能由总理大臣选任海陆军大臣，而向萨派的前任海军大臣西乡请求海相，向长阀的前任陆军大臣桂氏恳求陆相，结果只有恳切请求他们留任，桂陆相答应留任时，且声明自己是以“异分子”入阁的。1931 年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发展，军部的优越地位更加增强，甚至于军部应负责的大事变，如五·一

五事件发生时,内阁全体总辞职而陆海军部大臣倒反泰然留任。二·一六事件后,内阁总理竟须在军部的要求条件下成立,广田与寺内磋商条件,几至流产。这些都是鲜明的事实。

日本军部的地位虽是如此优越,但它并不是一个空架子的集团,而是有它政治经济的基础的。它是背后有所隶属的一种力量。日本军部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为着某一种政治经济的权利服务或与之结托的。它听令于一种首脑,而自己只充当四肢。在明治中叶以前,日本资本主义还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时代,日本军部是为官僚、地主服务的。到了后来,独占资本(包括国家托拉斯资本及财阀独占资本)充分发展,官僚和财阀合抱,日本军部就自然地转而为独占资本服务,这里或许有两种事实值得考虑。其一是军阀支配财阀的一般看法。日本军部势力的猖獗,表面上好像军部支配着一切,军权支配着财权;但是军部的任何主张并没有根本否认财产私有制,反之,他们提倡军备的大扩充,倒反增强了官僚支配下国家资本托拉斯的力量,培植了个人财阀资本的膨胀。其二是个人财阀支配军阀的另一种看法。过于机械地评量日本金融资本势力的人,常把三井、三菱等财阀的力量估得过高,说事实上军阀不过听命于几个大财阀。但这种看法忽略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忽略了日本产业资本主义及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性,乃至无视了日本财阀成立过程中的特殊事实。

从表面上看来,日本军部常直接间接与财阀冲突,政党与军部之间也发生不调和的事象,但是军部始终是为某

一种经济力服务的，近年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在为独占资本服务的。从本质看来我们说日本军部服务于日本独占资本可以，说日本军部完全服务于财阀则不可以。日本的独占资本和其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官僚操纵下的国家资本托拉斯的比重，大于个人财阀的独占资本。而个人财阀独占资本又是国家资本的附庸，那么现在充当独占资本的手足的军部就表现为主动力量。

日本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的土地经济基础上，在家长式政府的温床里发展的。由封建经济的递变，在极短期中确立了产业资本，紧跟着就是金融资本的成立。历史要求着日本更高一层的发展。在日本现存经济组织下，日本资本主义不能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很自然地要求着法西斯的实现。独占资本和封建势力的融化，个人财阀独占资本和国家资本托拉斯的结托，皆要求着法西斯的实现。日本几年来的政治过程，都是在这种要求下摩擦过来的。有一部分急进法西斯分子不满意财阀，也不满意官僚和政客，于是发生过多少次过激的暴动，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等。但是日本的政治机构不容许急激的改革，只能容许一个合法的法西斯。於是需要着政党与军阀的融合，还需要着政党、财阀和军阀的合抱。二·二六事件以后每一任的内阁皆努力于这种工作。寺内、广田内阁的努力，失败於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继起的林内阁也不过成功了政党与军部调和，而未及完成三者的抱合。到近卫内阁才算成功了这种伟大功勋(?)，而日本政治就更急速地向法西斯的方向发展了。

然而日本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在其开始第一步即已带上军事性,军队培植政治经济向前发展,其政治经济也靠军队及军备来维持。军部的势力依然占着优越的地位。日本法西斯,不但需要着军队的膨胀及军需工业的发展。并且要由军部的力量来维持这个秩序,来推进这个发展。又在对外的关系上,日本经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必须侵略外国,独占外国的资源、市场、以及劳力,以补强它先天及後天的缺陷。于是日本法西斯更需要着强大的军权来维持、来开拓道路。根据日本国内外客观的条件,日本法西斯承受日本资本主义的衣钵,带上更浓厚的军事性。从本质上考察,日本资本主义是军事性的资本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军事性的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更是军事性的法西斯。1931年以来,日本军阀与独占资本主义的共同要求,把日本经济渐向战时经济体制方面推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军部又把日本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一切推上战争的轨道上。日本法西斯发展过程上的种种摩擦,居然依赖这个发展而消灭下去。日本政党,财阀和军阀的紧密的抱合,居然在对外侵略战争的轨道上完全实现,军部充当四肢的作用更要发挥,军事法西斯的色彩也更为加浓,其前途是只有毁灭的一途。这次日本的战败,自是注定的命运,深望日本人民自己反省,力谋根本改革政治制度。

原载 1946年1月8、9日《人民导报》

## 日本军权政治终结与 日本人民应有之努力

我们分析过日本军事法西斯的本质,我们须更进一步研究日本资本主义军事特质的历史条件及其经济基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迟后的,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各国大多完成了产业资本的发展而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了。这个时代的落伍性就逼着日本政府采用人工来培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主观上固然是为了国内外军事的必要而建设了军警网,创设了军需工业及重工业交通工业,而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日本因为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性的决定及其先天的缺陷(资源缺乏、市场狭小)而急激走上对外侵略的途程,日本军队领导商品及资本向外进出是其特色,恰与英美等国相反。此外、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Key-industries)的创造和发展,皆产生于军事的目的,并且是由军需工业领导着普通产业,又与通常的产业发展形成颠倒的关系,也是日



本军事法西斯的历史条件。又比如,日本近代三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等等,也都是军部的优越政治地位及今日军事法西斯的历史条件。

其次,为军事法西斯的经济基础,在日本经济体制中也有许多特殊的事实可提。日本军部所以能与财阀结托的原因,即在於这个日本经济的特殊性。贯通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军需工业占着最重要的地位。日本军部要求军备的大扩充。日本官僚和财阀要求军需工业的大膨胀。所以不相称的庞大财政,皆能很容易地年年增加下来。军需工业经营于国家托辣斯资本,及财阀独占资本而受军部的统制,也是军部势力继续膨胀的原因之一。但是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经济原因,还是在于日本军事资本主义的特性,不但在其初期需要对外侵略以建造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即在帝国主义阶段,也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更丰富的资源,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早已无法维持。日本经济要求日本军部执行这种任务、日本军部也很强硬地执行这种任务。几年来因军需急增引起地通货膨胀的景气、及因军备大扩充引起的军需景气,阻止了日本经济的衰退,还进一步增大了一般事业的生产指数。这种动向,虽是军需工业资本的要求,但其发动则须归功于日本军部忠实地强硬执行它地任务。日本军部把日本经常的经济推进准战时的经济体制中,在中日战前既已有六年的期间,近卫内阁以来又把准战时经济体制带上战时经济体制的途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作全面的侵略,就是日本军事法西斯经济发

展的结果。日本法西斯是否能受到挫折,原要由中国全面抗战的努力如何来决定。所以说,中国的对日抗战不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并且带有解放日本大众的意义。中国抗日战争是反帝国主义的,同时又是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日本军事法西斯的,所以中国民族和日本大众正站在同一厉害关系的基点上。这是分析日本军事法西斯的结论。

现在,由于日本军阀的败战,日本军权政治倒台,而日本历史开始另一个阶段的新页。日本人民能运用此历史的转变,制造一个合理的和平的政治制度来,日本军权政治就可以断定,确已寿终正寝。

不过,中国军民及联合国军队,对于日本人民的贡献,只是提供一个历史转变的机会,日本此后历史的趋向,固也已奠定基础,但其转向的角度及其迟速问题,就有待于日本人民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了。

相信、日本人民不愿意战争,他们与中国人民一样、酷爱和平、他们就必须选择人民自己决定政治措施的政制,民主政治运动已在迈进中,但愿百尺竿头进一步,贯彻到底罢?

原载 1946 年 1 月 27 日《人民导报》



卷 四

第五辑 日本经济

---



# 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

## 一、日本帝国的勃兴

日本原是蕞尔小国：本土于一般所常提及的三岛（本州、九州、四国）之外加以北海道（或称虾夷），总面积也不过 25,151 日方里，约当我国满蒙地方总面积三分之一；其本土的人口总计，即在开国维新后已将二十年的明治十九年度，也不过 38,833 千人，其在明治维新前锁国时代，总人口尚不及此数，据一般的估计，必在 3,000 万以下，不及我国总人口十三分之一。

然而，原是蕞尔小国的日本，自从开国维新后仅及 60 余年，拓地北及库页岛，南及于南洋群岛中之一部分，朝鲜、台湾成其良好的殖民地，关东州成其心目中的无期租借地，满蒙地方也成其心目中的领地，他的势力尚且西及于中国内地，尤以福建为甚，走南弥漫于南洋群岛间。现在他居然一跃而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宁可以说是先进帝国主义国家——的英、美、法、意并肩齐立，称曰世界五

大强国。不惟如此，他的势力，若仅就东方而论，实足占据盟主的地位，自列强的眼光看来，也是推他为东方主人翁。不数十年间，竟能这样的突进，这种变化和膨大，不算不急激强烈！我们既想在本论文中讨论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现在的情势，那末，我们对于日本这种急激而且强烈的变化和膨大，换言之，即日本帝国的勃兴，自然不能不加以详密的认识，将其变化膨大的经过，概述一下。

自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开始向海外的发展，其势渐及于远东。当时称雄于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自16世纪初叶，即已继续要求中国开港通商。入17世纪以后，欧人之来往中国者日益繁杂，和中国发生国际上的关系的国家，也日益加多。即远处北方的俄罗斯，也经由西伯利亚南下而至于远东。随着欧人的东渐，而基督教也日益普遍传播于东方。日本睹此西力东渐，基督教渐渐蚕食东方旧有的宗教——在日本尤其是佛教——等等情势，恐其影响将及于政治上、国势上。于是，当时执掌日本国政的德川三代将军，家光，即于1639年，即明末崇祯十二年，颁布“锁国令”，严禁人民和任何外国人的交往。这种政策，一般的称“锁国政策”，这个时代，一般的称“锁国时代”这种锁国状态，竟达215年之久，一直继续到日本永嘉六年，即1853年，日本史上之所谓“黑船”的袭来（1853年美国提督白里统率军舰迫至日本浦贺，说服日政府开国，日本君民对此未曾见过的军舰，就称为黑船），始首先和美国缔结日美条约为止。不久，英、法、俄各国，也都接续和日本缔结了

同样条约。于是，自从 1639 年，继续下来的日本锁国状态开始打破，而约略继续了 215 年之久的日本锁国时代終了。从此以后，日本就加入了国际上国家团体的队里，而日本勃兴的头绪，即在于此。

日本自从海禁开放以来，即受欧洲资本主义的熏染，第一在产业方面，先步欧洲诸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而普遍地起了产业革命。惟是日本产业革命的萌芽，虽始于德川幕府的末期，但其充分发达，却是在于明治维新之后。这是因为明治维新以前，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的熏染孕育起来的经济上的新的关系尚未成熟，而旧封建势力尚为产业发展的桎梏，法制上，尚有许多束缚产业自由发展的条例。例如禁止土地的自由买卖，限制农作物的种类，社会阶级关系的因袭固定……。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权收归天皇掌握，日本君臣锐意于解除束缚产业自由发展的各种因素，以顺应世界资本主义发达的趋势，于是日本的经济势力，就日渐发达，终于达到现代的产业阶段。

日本产业革命，先自农业的发达始。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顺应时代的要求，先将束缚农业自由发达的各种限制全部解除，例如承认农业的经营自由，完全承认土地的私有权，田赋的改革和税金的减少……皆是。其结果，农业完成了长足的进步。兹就主要农产物的米蚕产额的发达数字，以为代表，列表于下：



米蚕产额发达表

年次	米产五年平均(千石)	蚕系产额(千贯)
明治一三年	29,811	533
明治一五年	29,958	661
明治二〇年	34,577	1,013
明治二五年	40,355	1,619
明治三〇年	39,265	2,167
明治三五年	44,643	2,558

(备考)本表根据《明治大正农村经济的变迁》编制成的。

明治十三年以前,虽无统计材料,可用以证明农业的发达,但是明治十三年以前,只可视作发展预备期,仅以明治十三年后的数字,也就足以充分证明产业革命后日本农业的发展。明治十三年后的米产额,只有 29,811 千石,蚕系产额也不过 533 千贯,其后则如表格所指示的,年有增加,至二十二年后明治三五年,米产额竟达 44,643 千石,约增二分之一,蚕系产额也达 2,558 千贯,约增 5 倍之多。此外,农业基本要素的耕地面积,也有巨大的增大,明治十三年耕地总面积,只有 4,313 千町步,至明治三十六年,就增至 5,267 千町步,约增五分之一有奇。

以上所述明治维新后农业经济的发达,只是日本帝国勃兴的产业基础,还不是充分发达而足为日本帝国主义构成要素的产业的全部形态。我们要知道日本产业发展的全部形态,还须求之于近世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具条件的工业

情状,要应求之于资本主义成立要素之一的公司制度发展的情形。根据《明治大正产业发达史》所载日本农商务省每年底的调查,明治十七年各种企业公司的总数目,只有2,392所,资本金总额,也不过100,951千元;及至8年后的明治二十五年度,各种企业公司的总数目,则达5,644所之多,约增一倍半,其资本金总额,也增至289,334千元,约增两倍之多。其中,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业公司及水陆运输公司的增加,尤其厉害。明治十七年,工业公司的资本总额,只有5,048千元,至二十三年竟增至77,530千元,约增半数之多;在十七年,仅占各种企业公司资本金额4.96%,至二十三年,竟升至占各种企业公司资本总额24.67%。水陆运输公司资本金的增加:明治十七年,只有6,892千元,至二十三年则增至103,631千元,其增加尤其厉害,在明治十七年,仅占各种企业公司资本总额6.82%,至二十三年,竟占总额32.98%。

根据以上所列数字,即可知道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急激,而这种急激的经济发达,才是构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要素,有了这种经济的基本要素,再加以内政的修明和外交上、战略上的胜利,于是蕞尔的日本,就一跃而挤于世界五强之列。以下再谈谈日本帝国勃兴的战略上、外交上获得胜利的经过。

促使日本帝国勃兴的战略上的胜利,最主要的就是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促使日本帝国勃兴的外交上的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恢复国权。且分述于下。

中日战争是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开始的，其结果，即自我们推想当时双方的情形，自然中国是要失败的。中国战败后，两国间成立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确认韩国为完全独立自主国。

(二) 中国割让左列地域及该地域内的城垒兵器工厂及一切官有物给日本。

1、奉天省南部，即自鸭江、溯江至平安河口，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为止。所有折线以南地方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省诸岛屿概为割让地。

2、台湾全岛及其附庸岛屿。

3、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 2 亿两。

(四)中日旧约作废，新约均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现行约章为基据。

(五)中国于现今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又新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得置领事官，且享有中国已开市场之同一特典与便利。

(六)自宜昌至重庆，自上海入吴淞江，入运河至苏州间之航路，准日本汽船自由航行。

(七)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从事于各种工业制造。

上项马关条约缔结后，日本所得利益与权利非常巨大。已认韩国为独立，又割辽东以断中韩的联络，而朝鲜则实已落其掌中。日本从此可以根据旅顺大连为海军根据

地，以制黄海渤海的海权，因而扼中国北部数省的命运，又据澎湖群岛为海军根据以制南海海权，因而扼中国南部数省的命运，这二处海军根据地，且于未来太平洋战争，及其南侵向南洋群岛发展上，大有帮助。此外，尚享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机器工业的制造，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财富，而中国工业则被制于死命了。

嗣后虽因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放弃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权，即将马关条约第二款所规定奉天省南部割让地全部返还中国，而由中国偿与库平银 3,000 万两，以为代价。虽则如此，而日本由中日战争的胜利所获得领土与利权，尚属巨大。

如上所述，日本因中日战争的胜利而获得的领土与利权虽属巨大，但尚不克因此而挤于“一等国”的地位。再经日俄战争获得胜利之后，始完成了世界强国之一的实质和资格。

日俄战争基本原因，不消说，一方面是因为远处北寒带的俄国急于向南发展以便打通出海的道路，而经由满洲也是通海之一路，一方面是土地狭小的日本企图西向经济大陆以为发展帝国的张本，于是两个强国，就在中国的东北部碰个满怀，利害处处相冲突。在这种情势之下，再加以昏庸不识时务的中国政治家，运用什么“以毒攻毒”的外交政策，而日俄两国的战机，就一触即发了。

日俄开战的结果，出人意料之外，长久期间称霸于欧洲的大俄帝国，竟败于新兴蕞尔的日本。惟有一事，正如我

们所推论得到的那样，大约那时代的人们也豫想得到，日俄两强作猛兽斗的结果，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负的赔偿义务，就完完全全转嫁在我们这个善于运用“以毒攻毒”的外交政策的中国身上——实在只是中国民众的身上。我们且检点日俄的媾和条约看。

波子玛斯媾和条约(也即我们所要检点的日俄媾和条约)中所规定日本由俄所得种种的利权及土地，以为战败国的赔偿条件的，实质上莫不是中国的所有物。且列举有关的款项于下：

一、俄国承认日本对于韩国有政治上、军事上、及经济上的卓绝利益。日本对于韩国，认有指导保护及监理之必要处置时，俄国不得加以阻碍，或干涉。

二、俄国经由中国政府之承认，而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地领水之租借权，及与租借权相关联而组成的一部或全部权利、或特权，让与日本。又租借权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及财产，也全部让与日本。

三、俄国经由中国政府的承认，将长春(宽城子)旅顺间的铁路，及所有支线，以及附属于该地方的一切权利、特权、财产，及其所经营的一切煤矿，无条件地让与日本。

日本因日俄战争而由中国所获得权利和土地，在上列各项之外，尚有协定满洲铁路守备兵附约中所规定。

“两缔约国为保护满洲铁路起见，允许日本得于每基罗米突，置守备兵二十五名”。

此外尚有满洲善后协约的缔结，且举其中有关于日本

获得利权的条项于下：

一、中国政府允将安东奉天间的军用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

二、中国政府允许南满铁路所需各项材料，豁免一切税捐厘金。

三、营口、安东、奉天府各商埠，由中日两国派员划定日本租界。

四、中国政府允设一中日合同材木公司，以采伐鸭绿江右岸的森林。

五、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之条款待遇。

根据以上各项所规定，日本不但承继了俄国原来在中国所有的一切利益和权利，并且迫开东三省千余处的商埠，以便其向满洲做大规模的移民，又取得陆路通商的最惠待遇，及安奉铁路的经营权。

日本除由中国所获得利权和土地之外，尚有俄国取得土地和权利。波子玛斯条约，尚有下列二项规定：

一、俄国将桦态岛（即库页岛）北纬 50° 以南的半部，及其附近的一切岛屿，以及该地方内的一切公共房屋财产的主权，完全让与日本政府。

二、俄国允许日本臣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领沿岸，有渔业权。

诸如以上所述，日本因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得到种种的利权和土地，由这时候起，世界各国始看上远东的岛国，而承认其列入于世界第一等国的班次，推其为亚洲盟主。并

且,日本此次战争所得,尚不止上列利权和土地,其后合并韩国及经营满洲,实皆发端于此。日本帝国的勃兴之得力于日俄战争者,诚属不小?

然而日本虽因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而由中国获得的种种利权,和广大的领土,但其与欧美列强在国际上的对待关系,仍然有很多不平等之处,如是又积极的进行取消先前和欧美各国所缔约的不平等条约,恢复国权,这一层,对于日本帝国的勃兴,也大有关系,且概述其经过于下。

1853年,美国提督,白里氏(Perry)率领美国舰队航行至日本,对于当时掌握政权的德川幕府,解说世界大势,力劝日本开国,翌年始缔结日美条约。不久,俄、英、法等国,也都和日本缔结略与日美条约相同的条约。这是日本和列强缔结条约之始。

然而因为这些条约太过简单,关于交通贸易上的规定,还是不充分,于是至安政五年,即1858年,重在江户(其时的首都),与英、美、法、俄、荷五国改订新约,称之为安政五国条约,或称旧约。这个安政五国条约的缔结,因为当时日本的外交家,正如清季的昏庸外交家一样,致使所订者皆为束缚日本税权和法权的条款,即置日本国民于不平等的国际地位的“不平等条约”。

在上述称为安政五国条约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最详细的,就是日英条约。日英条约第三条,规定:日本开放神奈川、长崎、函馆、新潟、兵庫、江户、大阪等港口,并且在这些港口,创设了“居留地”制度。同约第四条、第五条、第六

条及第七条,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关于关税,起初虽因美国公使的周旋,限定输出税为从价五厘,输入税最高为从价三分五厘,但后因日本抛延了条约上的开港义务的履行,于是被迫而以输入税的减低为其代偿,重于庆应二年(即1866年),在英、美、法、荷等国的关税修约上,规定输出输入概以从价五厘为基准的从量税率。这是日本对于欧美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的大概。

日本要强盛起来,在理论上非先撤废这些不平等条约不可;即自实际上说,日本也因为这些条约的废止,费了不少的努力和苦心。日本政府在上述条约的改订期的明治四年(1871年),特派岩仓等人为特命全权大使,到欧美和列国接洽修改旧约。所提议的大意,是:三府五港允许外人杂居,撤废居留地和治外法权,允许外人自由旅行内地,日本法庭采用外国法官,委托外人以编纂民法和刑法。但其结果,除美国略与同情外,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倾听这种提议。

日本不但明治四年所企图的全部改约,终归失败,即明治十年(1878年),外相寺岛宗则的计谋,先单独恢复税权,废止协定税率,自主地提高税率,也一样总归于失败。

继寺岛之后,外相井上馨,也曾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向各国提出法权与税权的部分修改,但也未得各国的承认。井上氏又于明治十五年(1882年),在东京和十二国代表会谈,开了条约改正预备会,提议开放日本内地,而以



恢复法权和税权的一部分,为其交换条件。但所恢复的程度,极其轻微,反惹日本国内的反对,于是这个谈判遂成无期延期。

其后,复经大隈重信、青木周藏、榎木武扬等外相,热心活动于恢复国权,当中也曾几次微露过成功的希望,但也终于毫无效果。

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日本的特出的外交家,陆奥宗光,始一扫过去的条约改正谈判的悬案,树立相互的、对等的改正案,以进行单独交涉,先与英国谈判成了功,其后,美、意、德、法等国。也都相继而签字于这个改正条约上。且举这个改正条约之关于法权各项的要点于下:

一、日本允许开放全国;外国人要受日本司法权的支配。

二、在日本的外国租界,编入所在地的日本市区,为日本地方组织的一部分。其属于租界的共有财产和资本,概交日本官吏。

三、自新约实施之日起,以前所订修好通商条约,作为无效,领事裁判权完全撤废。

上列三项是关于日本所收回法权的部分。这次修正条约,是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各国一同实施的。到此时日本关于法权方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完全撤废。惟关于税权,则尚残留着部分的协定,至最近年始完全恢复;但也可说大部分税权是自主的了。

日本的取消不平等条约运动,恢复国权,虽大费苦心,

并且得助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也属不少，但是这个国权恢复的成功，大为资助了日本帝国的勃兴，也是不容疑义的事实。

日本帝国勃兴的条件，除去上述经济的、战争的和外交的三条件而外。内政的改革和修明，也大有关系。日本至明治初年，始废除封建的诸侯制度，而采取中央集权制，国家大权收归天皇，创定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顺应时势的转移，利用新兴的民气。而名闻东西的明治天皇及其一代的良臣，始得从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改革内政，完成了日本帝国的勃兴。但是关于这点，想加说明未免太过于笼统，且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平凡的观念，所以这里为节省篇幅起见，只得从略。

## 二、日本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经济解释

近代无论那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勃兴，尽都采用富国强兵的政策；即在现在，还是在极力加浓军国主义的色彩。日本在明治初年，即已极力奖励人口的蕃殖和国富的增加。

日本政府极力奖励人口蕃殖的结果，日本国的人口，居然以急速的增加率膨胀起来。自明治初年以迄大正末年，为时未及 50 年，其膨胀的程度，几乎增加一倍。且看次列表格：

日本人口增加实数表

年次	实数(千人)
明治十二年	35,769
明治二〇年	39,510
明治二三年	40,969
明治二六年	42,061
明治二九年	43,500
明治三一年	45,403
明治三六年	48,543
明治四一年	51,741
大正二年	55,131
大正七年	58,087
大正九年	55,963
大正十四年	59,737

根据上表,明治十二年的日本人口,只有 35,769 千人,至日俄战争前的明治三十六年,则已增至 48,543 千人,几乎增加了半数。

国富方面,也年有急激的增加。只就耕地面积说,在明治十三年,只有 4,313 千町步,至明治三十六年,就增至 5,267 千町步。日本主要农产物的米和蚕系,其产量也各有飞进的增加:米产量在明治十三年;只有 29,811 千石,至明治三十六年,就增至 43,985 千石;蚕系的产额在明治十三年,只有 533 千贯,至明治三十六年,竟增至 2,592 千贯。(附注——此节数字,是根据《明治大正农村经济的变迁》书中的附表的。)在近世国富增加的源泉之中,第一要

推各种企业公司的经营为首位,所以各种企业公司经营的发展如何,也可以间接证明一国财富的增减,且将日本各种企业公司经营发达情形,列表于下:

年次	公司数(所)	资本金(千元)
明治十七年	2,392	100,951
明治二十五年	5,644	289,334
明治三十五年	8,612	878,763
明治四十一年	10,856	1,337,283
大正元年	13,887	1,756,610

备考:本表根据《明治大正产业发达史》编制而成的。

根据上面所述,再参照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获得胜利,可知日本富国强兵的成绩的优良。但是我们再反过来想,“兴国之力,即亡国之力”,至少,也可以从某方面说是威胁国家存在的势力。若从社会学上推论说,则无论那一个国家,都因为某种环境的压迫而兴盛起来,因为她的兴盛而受到国家存立的威胁。促成日本帝国勃兴强盛的急速的人口增加,和急激的产业发达,到后来,事实上已经成了威胁日本帝国的存在及其继续发展的势力。换一句话说,日本如不另谋“向外发展”的方策,则在其帝国的存立和发展上,是很危险的。所以,日本帝国自从明治中年以来,即已汲汲于向外的发展和殖民地的经营。

日本帝国之所以急于向外发展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

在强盛日本帝国的最基本的动力，即经济的动力求得之。这种日本帝国之急于向外发展的经济上的原因，大约可以分为下列三种：

- 一、人口的极度膨胀；
- 二、本国资源的缺乏；
- 三、产业发展的停顿。

日本人口的膨胀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占着相当高层的地位。且将世界各国的人口增加率，列表于下：

国 别	人口增加率(%)
日本(本国)	13.1
奥地利	20.1
加拿大	20.0
丹麦	17.1
荷兰	14.5
意大利	10.6
瑞典	6.7
英吉利	4.4
瑞士	3.5
德国	2.3
比利时	00.3(?)
法国	5.5

(备考)参照本刊第2期《朝鲜问题的真髓》。

根据上表，日本人口的增加率，在世界上算占第五位。再根据朝日常识讲座之《人口问题讲话》的统计数字，

编成下表,以示世界各国人口的密度:

国 别	面积 (千平方秆)	人口(千人)	密度 (人/平方秆)
日本(本国)	379.9	59,737	157.2
中国(本部)	4,168.8	407,253	97.6
暹罗	518.4	9,618	18.5
阿富汗	635.0	10,000	15.7
波斯	1,647.0	9,000	5.4
土耳其	1,280.8	10,000	7.8
英国(本国)	244.0	44,314	181.6
印度	4,722.2	319,693	67.6
法国(本国)	551.0	39,198	71.8
意大利(本国)	309.7	39,693	128.2
比利时(本国)	30.4	7,744	252.6
荷兰(本国)	34.2	7,315	213.9
西班牙(本国)	505.2	21,763	43.0
葡萄牙(本国)	92.0	8,033	65.5
丹麦(本国)	43.0	3,268	76.0
瑞典	448.5	6,036	15.0
德国	472.0	63,309	134.1
苏俄	26,876.7	139,761	6.7
美国(本国)	7,839.1	105,711	13.4

根据上表,可知日本人口的密度,在世界各国中,占第四位。于此,我们可以理解,日本人口问题已达相当紧张的程度,而成为日本帝国急于向外发展的一种原因。

无论那一个国家,想在世界经济市场,占相当位置,第一必须“资源丰富”。盖因想在世界市场争胜,先要具备“货美价廉”的条件;而要具备这些条件,非国内,或在势力范围内有丰富的资源不可。例如:英国、美国及大战前的德国,因其国内及其殖民地,各具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煤、铁、棉花、羊毛、食料等物——所以就能够世界经济界占优势。至若缺乏这些资源的大战前的法国及意大利等国,就不能够在经济方面充分发展了。

现在回看日本的情状,他近年来的生产技术,虽然进步些,但其本国的资源却极其缺乏。近年来日本铁的生产,几等于无;煤虽有多少出产,但也因其生产费的昂高而被局限着。这二种近代产业的基本资源的缺乏,实是日本帝国的经济发展的中命伤。其他,如棉花和羊毛,要完全仰给于外国,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苛里,也绝对缺如,食料也感不足。即如从前资助日本工业发达起来的微乎其微的矿产,经不几何时,也已几乎采掘净尽。

日本的资源,既如上述那样缺乏,日本帝国不想企图经济上的发展,或维持其帝国的威势便罢,否则,必须另找出路。日本帝国君臣所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充领土,经营殖民地。日本帝国的君臣,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即已觉得本国领土狭小之岌岌可危,和国内资源缺乏,高级的经济发展之无望,而急于扩充领土和经营殖民地的企图。其结果,乃发生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而夺得台湾、朝鲜、关东州、库页岛等地,获得满蒙地方的经营权。

然而日本第一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短命?

日本的产业革命的完成,是被动的,而其于短期内完成了第一期资本主义的发达,是基于下列三种原因:

一、欧美在数百年间费多大心血而始完成的科学和技术,日本则于数十年间,照样模仿过来;

二、假借关税的壁垒及保护政策,以限制外国产业的竞争力,所以容易在本国内,完成本国市场的产业发达;

三、利用工资低廉的劳力,容易战胜外国产业的竞争力。

然而日本帝国的第一期资本主义所赖以发达的上述三种条件,是极靠不住的。例如第一项的模仿,不久就会达到饱和点。后进的产业国家——尤其是中国——容易起而以膏血工业(Wealing industry)与之竞争;第二项的保护政策,只限于专以国内市场为销售地,始能有效,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用多少时候,就会进至以世界市场为销售地的地步,尤其是地狭人少如日本者,其达到这个地步的距离,更加短促。日本产业,在日俄战争前后即已停顿,非转换第一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进而采取第二期的精工业化的方针,转以世界市场为销售的对方,则无向前发展的希望。日本农业的发展,也自那时候起。发展率日渐低落,到近年,其耕地面积和产量,甚至竟绝对地减少了。第三项的低廉工资,也是靠不住的,社会环境一进步,工人的生活程度,也就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费也自然增多,而维持



他们的生活的工资,也自非增加不可。并且,工人们的生活费的增多,大部分是由于地主、资本家、贷金家来的,这层容后再谈。

我们虽如上述,把日本帝国的企图向外发展,侵略外国领土,经营殖民地的原因,归结于(一)日本人口的极度膨胀,(二)日本国内资源的缺乏,(三)产业发展的停顿;但是这三种原因,只是表面上的吧了,至若潜在的基本原因,则另有所在。我们敢断言:日本帝国之所以这样急于向外经营,是因为充当日本支配阶级的资本家(包括地主、贷金家、企业资本家)的“营业利润减少”的缘故。这层的详细理由,使到《日本帝国僵局的正当解决策》的章里,再来讨论,这里不过先略为一提就是了。

### 三、日本帝国与朝鲜

日本之吞并朝鲜的经过,不是作者所想叙述的范围,并且在《日本帝国的勃兴》章里,读者已可得到一个概念,所以在本章里,只就日本吞并朝鲜的原因,及日本经营朝鲜殖民地所得报酬,叙述一下。

日本吞并朝鲜的原因,约可分为:

#### (一) 战略上的原因

日本地狭人稠产物缺乏,其向外发展,经营殖民地,既是决定之数,且因地理上、人种上、文化上的种种关系,自以经营亚洲大陆为第一策。日本第一就注意到朝鲜,想占

朝鲜以为蚕食亚洲大陆的军事上的根据地。

## (二) 经济上的原因

日本自经产业革命后,完成第一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以来,各种产业即陷于停顿。因此,日本就急于扩大领土的企图,第一步先征服了琉球,第二步就轮到朝鲜的命运上。

但将上列二种原因归结起来就只有一种,即经济上的原因。至若战略上的原因,归根起来,也无非是经济上的原因:这是自明的道理,无庸多加说明。以下且将日本经营朝鲜所得的成果,分别叙述一下。

朝鲜全境的面积,约有 14,312 日方里,较比中国之辽宁省大些,约略等于日本的九州(日本九州的面积 14,571 日方里)。各种物产均极丰富。农产物,于五谷外,尚有麻、苧、烟草、番椒、棉、蔬菜等物。此外,白芋、马铃薯遍产于全韩,栽培容易,桐产也遍于全韩,品质优于日本国产。矿物、金产量最为丰富,石灰、铁、铜的产量次之,他如重石、水铅、石棉、云母、银、铅、花岗石、石灰石、石版石、腊石等物,也出产不少。朝鲜正当寒暖二流的交界,所以水产种类,特别多,产量也极丰富。鸭绿江,图们江上流的森林,迤延数十里,面积共有 15,883 千町步,林木计有十数种,也是朝鲜丰富物产之一种。此外,尚有一种朝鲜的特产,即一般人所称为高丽人参者,价昂量多,每年的收入也属不少。

我们再来检点朝鲜在日本帝国所占的重要性和日人在朝鲜所经营各种产业状况看。

朝鲜因为是处在殖民地的地位,所以其本土的各种产业愈益发达,而朝鲜人民则日益贫穷化。但其反面,却替日本帝国解决了许多种的困难问题。

朝鲜替日本帝国所解决的难题,第一就是“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

朝鲜因为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所以处在日本自由移民目的地的运命之下。

且将明治四十三年以降,日本移住朝鲜的数目,列表如下:

年次	实数(人)
明治四三年	171,543
大正元年	243,729
大正五年	320,938
大正十年	367,618
大正十四年	424,740
昭和元年	442,326

备考:本表根据本刊第3期。

于此,朝鲜替日本帝国解决了不少成分的人口问题,可想而知。但是朝鲜,一方面由日本及其他外国移入人口,他方面本土人民却被挤向外移出,例如移向满洲、日本内地,而成了失掉家乡的漂泊者。这是处在殖民地运命下的人们所最痛心的一件事。

朝鲜的农业,自经日本经营以来,的确有了充分的进步,但是这种充分进步的成果,大部分是为日本帝国的人

民所享受,换句话说,替日本帝国解决了不少成分的粮食问题,且将近年,占朝鲜农产物最重要地位且为日本国民所最需要的米的出口量列示于下:

年 次	明治四四年	大正 七年	大正十四年
总出口量(石)	544,063	2,120,152	4,758,068
指数	100	390	857
移出量(石)	308,982	2,119,803	2,745,026
指数	100	686	1,537

上表“移出量”是指移向日本内地而言的。朝鲜每年的移出量,占总输出量半数以上;且其移出量的指数,呈示着愈益增高的趋势。

朝鲜全土适宜于农耕,南部的气候温暖,更适于农作物的发育。冬季宜于种麦,夏季宜于水稻,发育均极顺适,产量也极丰富。自经日本极力经营以来,其进步顿加猛进。且将表示农业经济发达最显明的耕地面积,列表于下:

年 次	耕地面积(町步)
明治四三年	2,464,904
大正九年	4,450,099
大正十年	4,466,766
大正十一年	4,452,217
大正十二年	4,469,079
大正十三年	4,482,729
大正十四年	4,501,646

此外,未开垦地面积,大约尚有:河边荒地 74 千町步;海滩地 207 千町步;山麓倾斜地 800 千町步。

根据上述,可知朝鲜是多么重要的农业地带。但在这个重要的农业地带,其耕种形态怎样?朝鲜的耕地面积,过半数是为大地主所有;并且愈益表示着土地兼并的趋势。在大正八年,大地主的数目,只占农家总户数 0.6%,至昭和元年就增至 0.7%。地主也由大正八年的 2.8%,增至昭和元年的 3.1%。只这个数字尚不足以充分指示土地兼并的全貌。因为这个数字,只是地主数目的增加,而事实上,每个地主所有土地面积的增加,恐更甚于此,是极明的道理。

并且,上述土地的兼并及耕地经营的形态,于阶级的集中之外,还带着民族的色彩。这种民族的色彩,才是日本帝国经营殖民地的代价。且依照日韩种别,把各种农户在农家总户数中所占百分比,列表于下:

	自耕农(%)	自耕兼佃耕农(%)	佃农(%)
日本人	31.1	41.4	27.5
朝鲜人	20.6	34.5	44.9

根据上表,可知自耕农和自耕兼佃耕农,是日本人占多数,而佃农则归朝鲜人占多数。

朝鲜矿产也极丰富,兹将日韩合并以来的矿产全部产量所值金额,列表于下:

年 次	金額(日金元)
明治四三年	6,067,952
大正九年	14,204,688
大正十年	15,537,225
大正十一年	14,503,781
大正十二年	17,326,894
大正十三年	19,176,462
大正十四年	20,876,964

他如日本本国所缺欠而又是近代工业上最需要铕铁、石炭、铁矿的丰富产量,尤于日本帝国的经济发展上,有更大的益处。此三种矿产,大正十四年度产量及其价格金额:

	数 量	金額(日元)
铕铁	101,933 吨	5,386,489
石炭	622,304 贯	4,548,535
铁矿	351,444 吨	5,179,778

日人在朝鲜所经营产业之中,渔业与水产制造业,也占重要地位。且参照下表:

#### 日本人在韩渔业与水产制造业的状况

年 次	渔业产量(日元)	水产制造额(日元)
大正十二年	26,606,290	12,284,853
大正十三年	27,169,883	12,724,888
大正十四年	26,707,607	12,753,152

而且这些数目,均占朝鲜全部水产量的过半。

自一般说,日人在韩所经营各种产业之中,规模最大而利益又最丰富的,要算是工业。且将几种主要的工业,列表于下。

日人在韩所经营主要工业概况表(大正十四年)

种 别	工场数	资本金(日元)	生产额(日元)
制棉业	34	5,246,400	6,928,107
棉纱业	3	5,050,500	1,285,941
生丝业	26	3,706,600	7,135,726
制材业	52	2,957,300	4,387,832
制铁业	1	25,000,000	11,405,091
碾米业	484	17,442,300	126,273,342
制糖业	1	27,250,000	8,694,843
瓦斯及电气业	42	23,057,357	5,277,524

在上列工业之上,再加上其他所有工业,则其合计总数:工场数 2,085 所,资本金 232,868,599 元。若将次数目,拿来和朝鲜全部工业的数目比较看,则日人在朝鲜工业界所占势力,实出我们意料之外:

朝鲜工业的状况(大正十四年)

	工场数(所)	资本金(日元)
全体	4,238	265,853,369
日人所经营者	2,085	232,868,599

根据以上所述,日本不惜开启中日战端、日俄战端,牺牲不少生命和财产,所得来的代价,可想而知了。

#### 四、日本帝国与台湾

台湾面积,本极有限。与其十四个属岛合计,面积只有2,324,128日方里;澎湖群岛的面积更小,只8,230日方里,二者合计也不过2,332,390日方里。

然而台湾在日本帝国所占的重要性,并不在乎它的面积的大小。台湾在日本帝国所占的重要性,约可分为:

- 一、充当日本帝国的海军根据地;
- 二、充当日本帝国经济发展上的续命汤。

澎湖群岛的形势,最适宜于驻扎大批战舰。日本帝国藉此,北转可以扼制中国的东南部,南进可以侵占南洋群岛及澳洲等地。即中东(近东,远东的对称)全部,也莫不在其虎观之下。在这世界的政治中心,既由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来的时代,太平洋一旦有事,日本帝国很可凭藉台湾而得伸张战略上的势力。

台湾在日本帝国所占重要性,最基本的,而又是最现实的,还是第二条的经济条件。台湾地处热带地带,物产极其丰富,而大部分物产的种类,属于工业的原料。现代无论那一个帝国主义者,都是假藉工业为榨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具。尤其是地峡如日本者,更不能不以工业立国,以在经济上企图向外的发展。而台湾正是她发展工业的适宜



的地带。本章预定先就台湾的主要物产概述之后,再就日本帝国经营台湾殖民地所得的酬报,分析说明一下。

台湾虽是个形如白芋的小岛,但是农产、矿产、水产、林产等,均极丰富,而农产尤为各种物产之冠。

农产中,砂糖、米、茶、樟脑,是最主要的。砂糖 1918 年的产量,是 57,300 余万斤,米近年来每年的产量,约有 550 余万石,值金 9,000 万元左右;茶每年的产额,也有 2,300 余万斤,值金 1,400 余万元;至若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约当五分之四的樟脑,1926 年的产量,就已达 530 余万斤,值价 2,300 余万元。此外,如白芋每年产量,也在 165,000 万斤以上,落花生的产量,约有 356 千余石,豆类的产量也有 107 千余石,素以台湾名产闻于世界的香蕉,每年产额也在 25,000 余万斤以上。此外,尚有麦类、黄麻、胡麻、苧麻、烟草、柑、桔、龙眼等农产,真不胜枚举。

台湾全岛的矿区,大小计有 1,000 余所,面积共有 200,008,500 余坪(每坪六尺四方),每年产量值价,达 1,550 余万元。其中,以金产为第一,煤产次之,银、铜、煤油等,也极丰富。

水产的每年产量,值价约在 2,000 万元之谱。此数,仅就捕鱼与水产制造而言,主要盐产尚不在此数之内。

台湾因有上述丰富的物产,莫怪 1925 年《台湾年鉴》的绪言里说:“山有乔木,海有鱼鳖;穰穰五谷稔于野,而百木离离。富源无尽藏,宝库任人开发。进可以伸张经略南方之大志,退亦足为子孙谋定百年之计……”

更莫怪自明治三十年至大正十年仅 24 年间，日台间的贸易纯益，约有 300,481,848 元，约略 10 倍于日本领台以来所投资金（详见本刊第 3 期 135 页）！

以上述过台湾物产的丰富，以下再就日本帝国由台湾获得了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日本帝国经营台湾的意义，也即台湾对于日本帝国的价值，详加分析一下。

殖民地对于本国的经济价值，在于消纳本国的资本及制品，供给原料和粮食，充当本国的移民地。在消纳本国的资本的反面，也供给本国以资本；与供作本国投资经营地，同时，也供给企业者以廉贱的劳力。

台湾因为具备下列各种条件，所以最适于日本国民的投资：

(1) 气候是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质又极肥沃，换言之，即土地生产力大；

(2) 本地居民勤勉而生活程度又低，工资比日本内地低贱；

(3) 农工两阶级的团结力量薄弱，资本家容易利用其资本的独占力，而肆其榨取的能事；

(4) 日本政府对于日人企业，特别加以保护。例如对于制糖公司的奖励金，对于台湾银行及电力公司的创设加以保护，对其分红也加以保障，更如昭和二年，由日本国库拨出 2 亿万元，以救济台湾银行的恐慌。

因有上列四种原因，所以日本人自然极力投资于台湾各种企业上。据一般的估量，昭和二年底，日人在台的投资

总额,约达 13 亿元。台湾较比朝鲜,面积仅占 15%,人口仅占 31%,而公司资本的总额,就绝对地大于朝鲜,工矿业尤其如此,换句话说,台湾的资本家型的企业化的程度,比朝鲜高得多。看下表:

	公司数	资本金(千元)	既缴资金(千元)
朝鲜	1,276	447,282	216,361
台湾	647	537,230	336,607

即与日本内地相较看,台湾投资的速度,也高于日本内地:大正十四年底日本全国的投资额,8 倍于明治四十二年底的投资额;而在同期内台湾的投资额,就有 11 倍之多。

#### 既缴资本或投资额

	明治四十二年底	大正十四年底
全国	1,367,164 千元	10,890,000 千元
台湾	31,093 千元	350,531 千元

台湾不但供作日本内地的投资地,并且在他方面供给资本金,以便日本帝国转投于外国或日本内地,日本吸收台湾资金的方法,约有三种:募集国债、郵便储金及银行储金。大正七年底截止的国债募集金总额,就有 10,176 千元。郵便储金,即就昭和元年底的统计,台湾的储金额,就有 2,713 千元之多。经由银行的吸收量,即就下表参照看,也可知其昭然显著的形迹。

昭和元年底	总计	台湾	日本	在外国
银行放款额(千元)	737,681	249,194	419,364	69,123
同百分比	100.0	33.8	56.8	9.4
银行存款(千元)	155,965	96,205	29,411	30,348
同百分比	100.0	61.7	18.9	19.4

在日本内地银行放款指数,占总数 56.8%,银行存款却仅占总数 18.9%;在台湾,银行放款仅占总数 33.8%,至其银行存款,就占总数 61.7%,这就是说:日本内地的放款数目大于存款,反之台湾的存款却大于放款。

台湾在日本帝国所占重要性,第二点就是贸易上的价值。从前台湾的主要贸易对方,是中国,但自明治四十三年废止输出税及出港税,实行日台间的关税同化,四十四年日本税权的自主运动成功,协定税率完全撤废,而提高输入税率以来,于是日台间的贸易,遂因更高的关税障壁而得到市场的保护。且看下表:

年次	明治三十年	昭和元年
输出(千元)	412,752	49,315
移出(千元)	2,105	202,110
输入(千元)	12,659	62,008
移入(千元)	3,724	121,405

明治三十年,日本与台湾间的贸易额,若和其与外国的贸易额比较看,仅占四分之一;但至日本领台三十年的昭和元年,前者反三倍于后者。并且这种急激增加起来的日台间贸易额的内容,大约如下:

(1)供给食料品及原料品于日本,而销纳日本的工业品(织物、肥料、重工业制品及其他杂货)。

(2)即在同种商品,也以上等商品进日本而下等商品转回台湾的步骤进行着。例如蓬莱米出口而外国米入口,桧木出口而松杉入口。

详言之,台湾对于日本,充当工业生产物与农业产物的交换市场,这就是殖民地与本国间贸易关系的特质。近年来,台湾本岛内的工业,虽然也因资本主义的刺激而渐有进步,不但如前充当一部分工业品的经纪地,并且积极向外输出本岛的制品。但是这些处于工业生产者地位的,几乎可说全是日本人,这也是殖民地工业的特质。

台湾在日本帝国的第三种重要性,就是人口的移植,正如随着国家及资本的活动而商品的移出入贸易进行,人口的移植,也随国家及资本而进行着。日本向台湾的移入速度,近年虽不很高,大正二年底是 133,937 人,昭和元年底是 195,769 人,在此十三年中仅增 61,832 人。但其移民之繁在于明治末年,并且现在也已在台湾各种住民的比例中占第二位了。

台湾住民的比较表

台湾人(即华人)	3,702,813 人
日本人	215,761 人
生番	172,654 人
外国人	6,896 人
合计	4,098,124 人

在台的日本住民,如上表所示,实属少数,但是这些少数人对于多数的台民,却握有绝对的支配权,在政治上施行压迫,在经济上肆行榨取。由少数人支配多数人,强行压迫榨取,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然而自古的人类社会,就是如此演进下来,现在不分东西中外,这种情状还在继续着,这是多么不理想的、罪恶的社会呵!

## 五、日本帝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

在未写本章之先,应先对读者声明:本章因为下列二种原因,只从大体上概述大意,详细的讨论和统计材料的证明,要俟诸后日:

(1)因为本论文所限定的篇幅,所剩无几,若将本章细述,势必超过限度数千字以上;

(2)因为本章可以另立一题,且问题甚关重要,所以拟留于专论详加讨论,此处只得暂从概述。

言归正文,我们要概述日本帝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应先理解:中国是实质上的殖民地,国际的殖民地,至少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中国处在诸帝国主义者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性质上,和名实相符的殖民地,例如朝鲜、台湾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可以专用政治势力来培植其经济势力,而前者则不可。固然,前者也可利用半殖民地的不肖的官吏和军人,以收对于真正殖民地所得的效果,但这也无非是暗中的勾结,和明目张胆的方法,自然不同。换句话

说，帝国主义者之对于半殖民地的侵略和剥削，大多是依赖经济势力的。日本帝国之于中国，也是如此。

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或剥削半殖民地的形态，大约有下列几种：

(1)利用既得各种特殊权利，以投放巨额资金于各种企业上；

(2)利用关税协定的单方义务的条约，以推销帝国主义者的工业制品，同时吸收其所需要的原料及食料。

上列二种形态，且由法权上的不平等条约，得到保障；甚至由这种保障，而大肆其移民的能事。以下且就依照上列二种形态的日本帝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略加叙述一下。

先就投资额检点看。铁路投资只就南满铁路公司所投资金，就达 44,000 万日金元。工业方面的投资，虽无具体数字，但只就最发达的纺织工业，日本在各国中，无论是工场数，或锤数都占第一位想看，也可知道其所占势力之大。矿业投资、航业投资、电政投资以及私人企业的投资等等，实占巨大数目，兹不详述。至若银行投资数目，更是巨大了，只就所创设银行说，就有正金、台湾、朝鲜、住友、三井、三菱这些家。

上述概属于直接投资，此外尚有依据借款办法的间接投资。共分政治的借款和经济的借款二种。日本借与中国的政治外债，达 60,620 万元，占全部外债 34%。若经济的外债，如铁路借款、电政借款、地方团体借款以及向私人及私团体的投资等等，因为数目浩大，种类繁多，本文中只得

从略。

各国与中国贸易最盛的，当推英日美三国。且就下列1926年主要国对华贸易，及其对华贸易船舶吨数的比例表检点看：

国别	船舶	贸易
英国	35%38	29%28
日本	28%92	31%55
美国	4%85	4%64
德国	2%23	1%92
法国	1%72	3%07

于此可见日本对华贸易额之大，昭和二年日本对华贸易的实数总额，约达42亿日金元。其内容如下：

#### 输出(由日本输出中国)

第一位	生丝	740百万日金元 37%
第二位	棉织物	384百万日金元
第三位	绢织物	140百万日金元

#### 输入(由中国输入日本)

第一位	棉花	625百万日金元
第二位	铁及钢	128百万日金元
第三位	羊毛等	120百万日金元
第四位	木材	104百万日金元



就上列中日贸易的内容考察看，即可知道中国为日本充当工业制品的销纳场，日本则仰赖于中国的工业原料品。此外，尚有粮食的供给问题和人口移殖问题，未及谈到，但也不过是具备殖民地性质的东西，惟后者有直接移殖，（如日本之移住各地），和间接移殖，（如日人之移入朝鲜迫朝鲜人移住于满蒙地方）的区别，我们要特加留意。

## 六、日本帝国在南洋群岛的形势

欧洲大战的结果，日本由德国承过德属南洋群岛的一部分。这部分由马利安那、加罗林、马绍尔三群岛组成，大小岛屿共有 623 个，总面积约有 140 方里。东加罗林群岛之普那拍岛，面积稍大，适宜于农业移民。西加罗林各岛，鱼介及其他的物产丰富，宜于渔业经营。马利安那各岛，人口稀薄，富于海产及椰子树，适于农渔两种经营。

年来贸易虽渐发达，但数目也极有限：

	出口(千元)	进口(千元)
1923 年	2,344	2,454
1924 年	3,535	2,513
1925 年	5,864	3,647

此外如商业、工业、林业、牧畜业等，都同样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所以，这一部分群岛对于日本帝国的现实价

值,并不很大。而所谓日本帝国在南洋群岛的形势,实另有所在,也即非殖民地的经济势力。

日本帝国在南洋群岛的经济势力,可分两种来谈。其一,日人在南洋群岛的栽种事业,其中以橡树、可及砂糖为大宗。其二,为南洋群岛与日本间的国际贸易,范围普及于荷领东印度,英属海峡殖民地,菲律宾,甚至及于暹罗,法领印度支那等地。

据大正十五年的调查,日人在南洋群岛间所栽种主要植物的统计:

种别	栽种面积(英亩)	生产量	投资额(元)
橡皮树	121,359	20,861,015 磅	76,637,874
可可		5,408 担	8,872,540
麻			8,877,570
砂糖		257,897 担	4,338,937
茶及其他			10,775,871
合计			109,502,792

再与其他的椰子、甘兰、金鸡纳霜、马铃薯、香料等物合计,其投资总额,已近 2 亿元之多。

其栽种地带,普遍于英领马来、英领北婆罗洲、沙捞越王国、缅甸、爪哇、苏门答腊、荷领婆罗洲等地。其中以英领马来的栽种面积为最广,有 70,339 英亩,而苏门答腊次之,栽种面积为 15,237 英亩,英领北婆罗洲又次之,其栽种面积为 13,124 英亩。

我们再就日本在南洋群岛栽种事业,在列国同种投资之中,占什么地位查看。根据 1923 年的调查,南洋橡树栽种事业各国投资额的比较如下:

英国	980,000,000 元
荷兰	260,000,000 元
日本	70,000,000 元
美国	64,000,000 元
法国	60,000,000 元
比国	33,000,000 元
其他欧人	94,000,000 元
其他亚洲人	550,000,000 元
计	2,101,000,000 元

只就南洋最大宗栽种事业的橡皮树栽种检点看,日本的投资额即已占各国投资额的第三位,其他栽种事业日本势力之大可以想见了。

其次,日本帝国在南洋的贸易,也占重要的地位。日人在南洋的贸易,在大正初年以前,为数无几。至大正三年,南洋开过大规模的博览会时,因为欧洲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务,无暇兼顾南洋商品市场的广告,所以在这个大规模的博览会中,日本商人就大为发挥其广告技术。日本对南洋的贸易额,也以此为划分期,而急速地增加起来。这固然得力于欧战中欧美各国无暇顾及商务的经营之处很多,但其广告技术的效力,也实不小。大正二年(即 1913

年),南洋由日本输入各货,约值荷币 6,769 千盾,向日输出米,糖及原料,约值荷币 35,812 千盾。但至大正九年(即 1918 年),由日本输入货物金额,就激增至 134,137 千盾,向日本输出货物金额,也增至一他 140,014 千盾之巨额。这种贸易状况,后者约略 7 倍于前者。

再将近年日本对南洋贸易发达的情状,列成简表,以示其趋势。

日本对南洋贸易发发表

年 度	出口(日金元)	进口(日金元)	合计(日金元)
1914	22,745,000	52,731,000	75,476,000
1917	87,111,000	59,367,000	176,478,000
1920	184,997,000	126,035,000	311,032,000
1923	84,441,000	135,315,000	219,756,000
1926	48,696,000	82,818,000	131,514,000

根据上表,在欧洲大战中急激发达起来的南洋贸易,虽然大战终息后,因为欧美各国的竞争,而呈跌落的情势,但是现在所占势力也尚不小。即就在贸易品中占第一位的砂糖贸易额检点看,日本还是占住优势,实驾从来在南洋砂糖贸易界占优势的英荷商人而上之了。且参照下表:

南洋砂糖贸易额

年 度	欧商贸易额 (千担)	日商贸易额 (千担)	华商贸易额 (千担)
1918	6,800	4,200	3,700
1919	9,100	4,400	4,600
1920	10,800	6,500	3,900
1921	8,600	7,100	7,200
1922	7,500	9,900	6,600
1923	7,900	9,900	5,500
1924	8,600	10,400	7,500
1925	11,519	11,520	10,150

日本帝国对南洋的贸易内容,也照例带着帝国主义的色彩,换言之,即工业制品输出,而原料品及食料品输入。日本向南洋输出的大宗货物,有棉布、汗衫、陶瓷器、绸缎等种。1924年这些种输出品的金额,约计11,220万日元。日本由南洋输入的重要货物,是:砂糖、米、橡皮、苧麻等物。根据1924年的统计,这些种输入品的金额,计约178,054千日元。

我们从前在本刊第二期所载《英美帝国主义者与远东关系的考察》文中,曾经说过:现代帝国主义的特色,在其为“工业国”;而工业国所赖以存立的前提有二端:一是工业原料产地的确定,二是工业制品销场的独占。根据以上所述,南洋群岛兼具上列二种条件,尤其热带及亚热带地方(不消说,南洋群岛是处在热带地方的,关于南洋群岛

地理方面的详情，且参照本刊本专号，《南洋殖民地的研究》一文！）的产物大多是工业的原料，所以日本帝国如想向外发展，以打开近年来本国经济上的僵局，她自然要于中国大陆的经营之外，第二注意到南洋群岛来。

## 七、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停顿

日本自日俄战争前后，第一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已达到顶点，而必须进入第二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要讨论日本帝国第二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困难，应先理解日本帝国经济发展停顿的情状。这种情状可以由下列二种表现观察出来：

（一）粗工业及矿业发展的停顿；

（二）农村经济的疲弊。

本文第二章里已经说过，日本近世产业的发展，专靠下列三种原因：

（1）模仿欧美的科学和技术；（2）利用低廉的工资，以开发从未开发过的资源；（3）依赖保护政策，以培植幼稚的各种产业。因此，其时所发达起来的，只限于“粗工业”及“粗矿业”，例如纺织业的粗纱、洋火、胰子、玩具、刷子、扇子等粗工业，及输出生铜、铁块、石炭、硫黄等粗矿业。

然而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第一期发达的上述三种原因，自明治末年即渐失其效用，反而成了第二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这种情势，经欧洲大战后，尤其扩大，尖锐化。欧洲科学和技术的模仿，达到了饱和点，低廉的工资也因资

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例如劳工阶级生活的改进,资本家阶级奢侈生活费对劳工阶级的转嫁,劳工阶级对于游食阶级扩大的负担增大,因财政的膨胀——发展帝国主义的军费,保护资本家的政费——而对于劳工税租的增大,以及由于保护资本家而提高关税的转嫁),而日渐升高了。保护关税也已失了效用,因为现在的日本工业已经经过不以本国市场为工业制品的销纳场的阶段,而已达到必须向外寻觅市场的阶段了。

因为上述三种效用的消灭,所以资本家和地主的各种经营,已不如从前那样合算,换句话说,各种利润率没有从前的大了。在满足资本家和地主的求利欲的情势之下,日本的各种产业,都已发达到饱和点,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工业如此,矿业也如此,生产组织和生产技术,如无相当的改革,其向前发达是无望的。即如金融机关的银行业,也莫不日就停顿,银行组织,如无相当的改革,资金的利用效率,也是日就低落的。我们且就几种主要工业的生产量检点看:

几种主要工业生产价值表(单位:千元)

年次 种别	明治 四二年	大正 三年	大正 八年	大正 十一年	大正 十五年
纺织工业	388,009	620,261	3,295,900	2,481,227	2,872,117
金属工业	17,070	47,965	328,248	253,258	447,058
机器工业	40,974	110,906	716,241	545,447	538,917
化学工业	86,414	175,849	776,943	572,136	813,404
瓦斯电气业	—	25,252	66,649	43,998	150,016

上列纺织工业,金属工业,自大正三年以后,不但其生产量不增加,并且绝对的减少了,大正八年的产量价额不如大正三年,大正十一年还在继续减少,虽至大正十五年产量价额又略有增加,但也都不及大正三年的数目。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量价额,也自大正八年以后减少,大正十一年的生产价额都不如大正八年的生产价额,至少如机器工业,即至大正十五年,还是在减少的进程上。即如正在蓬蓬勃勃地发达的瓦斯电气工业,大正十一年度的生产价额,也是少于大正八年的生产价额。

我们再就矿产的产量的增减情状检点看。

重要矿产数量增减表

种别 年次	石炭 (千吨)	石油 (千石)	铜 (千斤)	铁 (千贯)	铅 (千斤)	硫黄 (千贯)
明治二十	1,746	353	18,440	4,072	643	2,875
明治二五	3,177	13	34,660	5,031	1,480	34,143
明治三十	5,188	231	33,982	7,464	1,285	22,637
明治三五	9,549	878	48,391	8,568	2,741	30,479
明治四十	13,804	1,514	64,523	13,851	5,132	55,549
大正一	19,640	1,458	104,037	18,497	6,222	90,928
大正六	26,361	2,509	180,064	37,073	26,341	31,494
大正一一	27,702	1,799	90,210	20,924	5,399	9,239
大正一四	31,459	1,637	110,812	23,649	5,561	12,726

根据上表,可知除了石炭而外,各种重要矿物的产量,都自大正六年以后绝对地减少,大正十一年比大正六年都有急激的减少,虽即大正十四年的产量,较比十一年度略



有增加,但尚不及六年度的数目。其中,尤其如石油的产量,自大正初年即已减少,大正六年度虽曾再一度增高,十一年复又减少,一直减至十四年还在同样过程中。石炭的产量,虽然没有减少,但自大正六年以后,其增产比率,就大为降低,这是因为生产费增高而资本家的营业不合算的原故。兹引入由采煤股份公司的生产费为例子,大正三年上半期每顿煤采掘费只2元98钱,至大正八年即高至12元12钱,其后虽略有增减,也只在12元左右。

根据以上所述,日本工矿业实已陷于停顿的命运,而这种命运正在指示第二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苦闷。而且,这种命运,也同样可以应用到农业经济上来说明。不,日本农业经济的衰落,因为资本主义末期的影响,其衰落的程度,恐怕比较工矿业,尤要利害得多。

日本农业经济的衰落,表现在耕地面积的缩小及单位生产量的减少。关于这两层,我们还是拿统计材料来证明。且依照猪侯津南雄先生所制统计表,以大正十年为基点,来比较比较日本耕地面积绝对减少的情状。

日本耕地面积的增减表

年次	实数(单位町步)	指数
大正十年	6,162,232.7	100.0
大正十一年	6,154,087.1	99.8
大正十二年	6,102,973.1	99.0
大正十三年	6,065,164.9	98.4
大正十四年	6,067,015.0	98.4
昭和元年	6,073,797.0	98.5

根据上表,日本耕地面积的指数,自大正十三年即已减少,十四年依然如故。至昭和元年,虽比大正十四年增加些,但犹不如大正十二年之广呢,以与引为基点的大正十年较比看,还减少 88,000 余町步。

日本农业经济的衰落,不但表现于耕地面积上,并且表现于单位产量上。且举日本最主要农产物的米,充当代表,以考察其发展情势的停顿。

米每一反步的收获额(五年平均)

	实数 (石)	与前五年平均比较的 增减
自明治三四年至明治三八年	1.536	——(增)
自明治三九年至明治四三年	1.686	0.150(增)
自明治四四年至大正四年	1.756	0.70(增)
自大正五年至大正九年	1.884	0.128(增)
自大正十年至大正十四年	1.842	0.42(减)
昭和元年	1.808	0.34(减)

根据上表,米每反步的收获量,在明治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的五年平均,是一石五斗三升六合;而日俄战后次期的平均,是一石六斗八升六合。此二期间约有一斗五升的增加。但其次之世界大战之前五年的平均,就只增加七升。即在欧战中五年间,虽然刺激其增加的力量非常强烈,但其实际上的增加率,终不能不低于日俄战后的五年平均期。这是在证明:日本农业经济的发展多么无力,而此后的

绝对减少,就断定于此时了。欧战后五年平均的单位收获量,果然绝对地减少了四升二合,昭和元年期,又再减少三升二合。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日本帝国在经济上的发展,确已陷入停顿的命运,日本资本主义的生长年龄,虽尚年轻,但实已到早衰夭折的征象了,换句话说,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已成了“僵局”了!

## 八、日本帝国僵局的正当解决策

我们想在本章,关于日本帝国僵局的解决策,略加讨论,以充本论文的结论。

要解决日本这种经济的僵局,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原有下列两种办法:

(一)帝国主义型的向外发展;

(二)由粗工业向精工业前进。

帝国主义型的向外发展的意思,就是侵略外国的领土,经营殖民地,以充当原料的供给地和成品的销售场。但是,现在世界各地尽都各有其主,绝不容第三者伸手,就是原来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众,也都逐渐觉悟起来,极力挣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日本帝国想再扩大领土,恐怕比什么都要难些。要打破现有的国界,除非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幸而重再发生,但是日本有这种觉悟和力量吗?固

然，一般人也都推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大战的结果，国界的变动能否有利于日本帝国，还是个疑号。或许因为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众的觉悟，遂促日本帝国的灭亡，也未可知。即不至灭亡，或许因为日本帝国本国内觉悟集团的积极行动，终使日本帝国的国体以及统治关系，完全发生变化，也未可知。这是日本帝国的经济发展，要依赖帝国主义型的向外发展，绝对走不通的证明。

其次，依照精工业的办法，未解决日本帝国的经济僵局，有无可能？

日本的粗工业，固然因为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后进国——尤其是中国——粗工业发达的竞争，已经达到必须依藉精工业化，以继续其帝国的经济寿命。但要依靠精工业，以竞存于世界的商品市场，有二次事实，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

第一、精工业化，要有充分的资源和精熟的技术；

第二、精工业化，要有自由销售制品的独占市场，至少世界市场上，也要以“自由竞争”为原则。

关于第一项，日本国内资源的缺乏，上头已经详述过，是无庸引证赘述的。本国资源缺乏的日本，想在国际市场上，和资源丰富的其他各国，作商业战，这岂不是困难的事吗？要在自由竞争场占得胜利，必须具备“货美价廉”的条件。但是日本的技术决不能优于欧美各国，实在是劣些，从那里造出“美货”来呢？日本国内的资源，比其他各国都缺

乏得多，资源缺乏的国民，怎样能够造出可以在世界市场占得胜利的条件“的廉价”来呢？

我们即使让一百步，假定日本可以专靠其大国民的自负心，极力从事于制造技术的造就，和极端过其刻苦的生活，务使“货美价廉”的条件，都完全具备了；但这还是不足以与其他各国在世界市场争胜。唯一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已经达到末期，一切的经济活动，已经不象资本主义初期那样，尽以“自由竞争”的法则为依据了。现在世界各地，那一个地方不高筑了保护关税的堡垒？那一个国家不象日本帝国采用保护政策以压迫外国产业竞争力而培植本国的产业那样，也以保护政策敬酬日本帝国？因为印度提高绸缎的输入税，取消土布的消费税，而日本的各种织物，岂非受到极大的打击吗？最近，澳洲的关税堡垒，又高筑起来了，日本货物之销售于澳洲者，此后岂不又要碰个大钉子？虽然，此外实有一个老在病中不死不活的我们贵国，暂可充其制品的销售场，但是第一，日本犯了上列第一项资源的缺乏和技术的幼稚的毛病，不足以与欧美各国竞争，第二，中国民众也渐觉悟过来，本国工业也渐发达，尤其因为历来日本对于中国的积极政策太过露骨，大惹中国民众排日的情感和运动，中国大陆的市场，也是不大可靠。

然则日本帝国经济上的僵局，再也没有办法了吗？那也不然！办法是有的。不过，全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策略。例

如,提高保护政策的效用,降低农工的工资等等办法,是不会走得通的。这些办法,无非是把真正生产者的农工二阶级,供作蚂蚁般的牺牲,以达一时肥大闲游阶级的目的吧了。然若牺牲了真正生产阶级,则其社会的经济必更加衰落。这点,古代的希腊、罗马等国,因为牺牲了生产阶级的“奴隶”,而其经济日就衰落,终至亡国灭族的事实(详情,请参照《三民半月刊》近期所载《古代社会的经济史论概要》!),足以证明。这种办法,一定碰到“此路不通”的命运。

我们应从别方面,追求日本帝国僵局的正当解决办法。在未谈正常解决法之先,应先理解日本帝国的经济发展停顿的真正意义。

日本帝国果真如他们帝国主义者所用以为侵略领土的口实那样,地狭人稠,资源缺乏,耕地已经开垦到不能再开垦的程度,各种资源也已经开发到再不能开发的地步了吗?我们不愿意凭着主观的揣测,以冒故意捏造煽动的罪名。我们还是引用数字,尤其是最得信任的政府当局的调查数字,来证明。

即举农业耕地扩大(是农业经济发展最基本而且显明的指标)的停顿,充代表事实来说明吧!据大正七年日本政府所设临时产业调查局的调查,“目下还可以扩充的耕地面积”,还有 1,650 千町步。明治三十六年日本耕地的总面积,是 5,267 千町步,大正十四年的耕地总面积,是 6,067 千町步。在此 22 年期中所开垦的耕地面积,也不过 531 千

町步。那末,上述“还可以扩充的耕地面积”的 1650 千町步,岂不是还可以充当四五十年长期的开垦吗?况且,还可以利用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增加单位生产量呢!谁敢说日本农业经济,已到了绝对停顿的阶段?其所以停缺,所以宁把 1650 千町步的未开垦地搁置,岂不是完全在于农业资本家的营业利润不高的原故吗?换言之,岂不是由于“生产制度”的原因吗?

上述日本农业经济发展停顿的真正意义的解说法,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工矿业的发展停顿上来。换一句话说,工矿业发展停顿的真正原因,在于工矿业资本家的营业利润不如从前的丰富。例如上面所提及煤产量的比例减少,在于采掘费用的升高而煤矿业资本家的算盘不能打得合算,就是一个证例。日本的经济社会,若能节省资本阶级无用的浪费,以从事于科学的研究,技术的锻炼,现用的资源即使缺乏,但也未始不可以另外发见代替物,例如以电力代替煤燃料。

其实,在这个蒸汽将要没落而电气取而代之的时代,电力富足的日本,实由自然蒙受特别优厚的恩惠!蒸汽的时代,农村完全为着都市的隆兴而做了牺牲品。到近年来,一般经学者,也都觉有复兴农村的必要。即把工业收回农村,使农工业成了农村产业的两翼,用以救济都市的失业人口,农村的失业问题,也可以同时解决。然要办到这层,第一必要的条件,是电力的丰富。盖因蒸汽工业只能集中

于一处结成都市,要把工业收回农村,工场散处各地,蒸汽力是不适用的,非应用电力不可。日本既富于电力,自宜于把农村电气化。不但工业上应用电力,即农耕上也可应用电力。我这样说,免不了有人要质问;农村电气化后,节省了许多人工,岂不是更要扩大失业问题?说到这一点,就完全归结于“分配问题”了。如果经济关系经过正当的改革,分配公平,再能因为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多数人反受到灾祸,这于我是不敢相信的。

我们再把日本经济发展停顿的原因,更具体地列举于下:

(一)日本资本阶级腐败,而丧失了充当一国经济支配者的能力;

(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营利主义”的经济制度,达到顶点,反而大为阻碍生产的发达;

(三)充当支配阶级的资本家阶级的生活,日益奢侈,为要保障他们的奢侈生活起见,自要利用种种政策,对于生产阶级的农工,极度加以苛敛诛求,其结果愈使本国的生产力的泉源涸竭。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知;日本经济的停顿,不是绝对停顿的问题,而是经济制度的问题。如能规定出一种革命的,合乎时代的经济制度,以代替颓废的旧经济制度,日本经济的发展前途,尚不可限量。

我们所谓革命的经济制度,就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



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根本原则,如下:

(一)撤废以丧失了机能的资本家为本位的制度,而以生产阶级本位的制度代替之。

(二)撤废现已阻碍生产的营利本位的自由交易制度,而以全体国民福祉本位的有计划的经济制度代替之。

社会主义制度的具备办法:

第一、要先确定有能力的产业经营者和更完满的产业经营方法,以代替资本家和营利制度。不消说,产业经营者就是社会,把产业社会化,全由社会共同经营;所谓更完满的产业经营方法,就是在生产及消费皆于一定的预算之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办法。

第二、极力应用已发明的科学于有益民生的方面,使一般民众皆得沾润科学的恩惠。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就是有益于全体民众的科学,也都因为资本家的营利关系而被埋没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把这些有用的科学极力发挥,使其克尽实用化的任务。此后,再加以继续研究,科学的用途真是不可限量的。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专为游食的资本家而课诸大多数国民的牺牲,把它运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这一条是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渡过办法,例如:利用租税政策没收不劳所得,重课财产进款,绝对没收遗产,减轻对于勤劳所得的各种课税。又如改革金融制度,降低利息,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地租,把各种基本产业社会化,以缩小资

本家游食奢侈的来源。

我们站在解决东方全体问题的立场上，站在世界连带关系的立场上，替日本帝国经济发展的停顿，想出了社会主义的出路。这种意思，即在日人中，也有一部分人提倡过。的确，除此社会主义的出路外，恐怕是没有办法的。什么依靠社会立法的劳工保障啦，什么产业合理化啦，什么资本家型的产业保护政策……，自论理上、事实上，结果是不会有有效力的。

然而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固须倚靠日本有志者的努力，但一方面，还要看中国革命成功的程度如何。假使中国革命不能在正当的方面，完成相当的成功，则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醉心的中国大陆的经营，尤其是满蒙地方的经营，还可以充当日本帝国存在的支柱，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续命汤，这样一来，本已迫切的日本社会主义革命，也能因有中国的躲避场的原故，而丧失其客观的革命条件，而其现状再往下延长。中国革命的成败，对于日本革命的成败，实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民众，为着东方全体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计，努力干下去吧！

然而日本的民众，也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成败，也与你们的努力和帮助，有极大的关系。盖因中国革命所以不能早日成功，大半也是因为被压迫在帝国主义者之下，不能尽量如意活动。日本民众如能在其国内，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是军阀，官僚及其爪牙），使其不压迫中国的

施設,摧殘中国民众的活动,则中国革命也可以早些成功;因而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早日成功。日本的民众,请加倍努力吧! 东方革命的同志,请加倍努力吧!

原载 1930 年 7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5、6、7 期合刊殖民问题专号

# 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

## ——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

### 一、引言

自从九·一八连三接四的“东北事件”发生以来，我国同胞莫不愤激填胸，积极筹划对付的方法。但凡欲筹划对付某种事件的方法，第一步须先认清该事件的发生原因。这正和治病之先诊病而后开方，是同—道理。东北事件的发生原因固有种种，而经济的原因确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由。故自经济上来解释东北事件的发生。

东北事件发生的经济原因，本可以由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日本帝国经济的衰落；另一方面，是东三省丰富资源的引诱。阐明这两面的曲折，即可明白东三省所以被蹂躏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原由。

自经济上来解释东北事件的论文或不少，但皆零碎不全，或言之不详。为贡献此方面材料于研究该问题者，故不

顾浅陋试为剖述之。不逮之处仍愿读者指正！惟是，本文只从经济上解释东北事件，至若日本是否必须侵略东三省，及应该如何对付的问题，则专于《日本果非侵外则不能存立吗？》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方法》二文中分述之。本文并希望与本专号所载拙作《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参照读之。

## 二、日本经济的衰落

日本现在是世界三大强国之一，在现代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与英美鼎足称雄。此三雄近年来角逐于太平洋上，英且有后退而由日美直接对峙之势。于此可知日本在现代国际上确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巨物”。

日本不但是个大巨物，并且是个“大怪物”。它虽然在国际政局上好似占很大的优势，头上戴着霸者的头盔，但其内容却非常空虚，基础并不稳固，头上的霸者盔，只是纸质的罢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年龄幼小，并且“外强而中干”。它在五六十年中，居然完成了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数百年而始完成的一大变革——社会经济组织的变革。它被迫而促急产业革命，被迫而加入国际队中，被迫而当早熟的帝国主义者，被迫而……发育未完的小孩，竟当了百岁的老人，难怪其将“早衰”，“夭折”也。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达，始于明治初年（约当 1870 年），盛于中日战后（约当 1895 年后），而渐衰于日俄战后（约当

1905年后)。其后,欧战期虽曾以一度不自然的发展而达至“最高点”,然而惟其是“最高点”,所以更高的发展似已不可能,从今而后也就只有一落千丈了。这种情势本可以由各方面来证明,但为节约篇幅起见,只拿日本输出工业制品为证。

日本输出贸易内容百分数

年代 \ 品类	食料(%)	原料(%)	其他(%)	合计(%)
明治二~六平均	32.9	59.3	7.8	100.0
明治二二~二六	22.2	52.4	25.4	100.0
明治三二~三六	12.1	54.9	33.0	100.0
明治四二~大正二	10.7	51.5	37.8	100.0
明治四二年	11.8	57.5	30.7	100.0
大正二年	9.8	60.0	30.2	100.0
大正六年	10.7	50.4	38.9	100.0
大正七年	10.7	43.8	45.5	100.0
大正十年	6.3	50.4	43.3	100.0
大正十三年	6.0	51.4	42.6	100.0

(注一)本表根据高桥龟吉《资本主义末期的研究》330页第四表数字。

(注二)本表所列“其他”项目,即代表“工业制品”者。此项数字之增减,可以充当日本发达及衰落的指标。

(注三)明治二年即1869年;大正元年为1912年;其他类推。

根据上表，明治初年日本每年平均输出工业制品，仅占全部输出品 7.8%。但至二二年至二六年代，就激增至 25.4%。相隔二十年增加 17.6%。再至三二年至三六年代，又增至 33.0%。相隔十年间，增加 7.6%，其增加率约与上期相等。但是此种急激增加之势，至明治四二年至大正二年代，即已呈现停顿的征象。明治四二年至大正二年代工业制品之输出总额所占比率，只增至 37.8%，较诸前期只增加 3.2%。即自其每年平均增加数看，也不及上期，更不及上上期。尤其是明治四二年与大正二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倒反减少了 0.5%。大正六年以后，虽因欧战而又急激呈现增加之势，但自欧战终熄之大正十年后，即已急激的速度逐渐减少。其低落之势一直继续至现在，尤其是 1930 年恐慌的现在。此项且参阅本文第四节。

日本经济的衰落不但表现于工业上，并且表现于农业上，农业上的衰落较比工业上的衰落，还表现得早，大约在工商业逐渐发达以后，即以下坠的现状表现出来。此项，可参看《日本近世农业的发达》（载《三民半月刊》“农村社会问题专号”）及译文《日本现代土地问题》（载《三民半月刊》第 4 卷第 23 期），剖述之甚详，故从略。

要而言之，日本经济早已步着向下的现状。虽然侥幸遇着世界大战，而其濒危的经济没落，得了苟延残喘，但也不过是“苟延”罢了。这种刺激不过是兴奋药针之于病危者的效用而已。日本政府且为维持，加强这种兴奋药力而于

战后,不顾一切居然采用“膨胀政策”,但仍无补于事。最近民政党政府采用“紧缩政策”后,日本经济界所表现急转直下的潜势力,就是兴奋剂无力的表现。此项,参阅拙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及拙作时事述评《日本新内阁前途的黯淡》(皆载《新东方》《周年纪念特刊》)。欧战后的日本经济如何急转直下,1930年恐慌后日本经济如何加紧直下的情势,且以下各节的叙述。

## 二、最近一般的经济恐慌

日本经济本自日俄战后,即步衰落的途程,这并不是蔑视“日本帝国”的话,且看日本经济学者自家的说话:“然而如上所述,我资本主义的第一期的繁荣,大体上自日俄战后即渐呈颓势,欧洲战后乃直面于其穷途……”(上引高桥龟吉同书第四编《资本主义末期与日本经济的研究》336~337页)。幸而,得欧洲大战的绝好机会,日本乃得在远东及世界其他部分“趁火打劫”。其结果,许多日本企业家发了横财,而其临危的经济界乃得一番的苟延。

但是,欧战终熄后日本经济之一落千丈,又是事势所趋,难以幸免的。我们且用数字来证明这种事实。证明经济界兴衰的事实,未有如“价格运动”之真确者。且看下表所列战后日本的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表(以大正八年为基准——欧战中)

年次	物价指数(%)
大正三年七月	40.7
大正八年	100.0
大正九年	110.0
大正十年	85.0
大正十一年	83.1
大正十二年	84.5
大正十三年	87.6
大正十四年	85.6
大正十五年	75.9
昭和二年	72.0
昭和三年	72.5
昭和四年	70.5

(注)本表据猪侯津南雄《立于没落转向期的日本资本主义》第十表。

据上表,大正九年即1920年,日本的物价指数为110.0%,至翌年即降至85.0%,以后继续低降,至昭和四年降至70.5%,前后相差约40.0%。再据本年《中央公论》四月号所载《恐慌一年ノ展望》,本年(昭和六年)又较去年低落如下:昭和四年十月的日本银行指数(以大正三年七月为基准)为171.9%,昭和六年一月为126.0%,降低45.9%。若以大正三年七月为基准计算之,则大正九年与昭和六年一月物价指数,前后相差为146.8%。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动,而

日本经济的恐慌深度可以想见。

证明经济兴衰的第二事实,就是公司银行利率率的增减。日本全国工业公司的利率率,大正九年为 20.9%,大正十年即减至 15.7%,至大正十五年竟减至 12.1%。银行利率率也然,大正八年为 25.0%,大正十年低至 21.8%。昭和二年竟低至 11.8%。昭和二年后,公司银行的利率率虽皆略有增加,但是昭和五年经济恐慌后又大减低。此项,手内虽无统计可凭,但检点上列物价之运动也可知之。

再就欧战后日本的生产指数加以考察。“若以 1919 年的生产实数为基准,则 1919 年的消费生产指数为 100,至次年之 1920 年减至 93,其后虽有多少增减,但皆未超过基准以上,至 1927 年竟激减为 89”(拙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载《新东方》杂志《周年纪念特刊》292~293 页)。即其主要食粮的米和麦,也有同样减少的趋势。据上引同文,“……同样,以 1919 年为基准,则同年米麦的生产指数为 100,至次年 1920 年的指数,就减至 86……”

欧战后日本经济恐慌的发作,一时虽因政友会内阁的“膨胀政策”略为潜伏着,致使不至大为发现出来,而其程度略低。但自民政党内阁断然采用“紧缩政策”——金解禁政策以后,其情势就难免一落千丈。此项上面已略言之了。这里,再引 1930 年恐慌后日本工商业衰落的情势为证。这种情势征引生产资料消费量之减少来证明,最为可靠。据上引拙作所列表格,1930 年 1 月至 3 月极短期间,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的消费量,或输入额的减少率如下:

品 名	减少比率(%)
石炭(消费额)	19
钢铁(供给额)	12
铄铁(输入额)	37
铜(消费额)	32
洋灰(消费额)	21
美材木(横滨入口额)	82

以上所剖述各种事实，既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一般经济恐慌的深度了。但为更透切明了起见，再在以下二节解剖农村恐慌及殖民地的穷尽。

### 三、农村的恐慌

明治年间日本农业经济由于工商业畸形发达而生的衰落，与最近日本一般经济的没落无多大关系，且其情形已于拙作《日本近世农业的发达》详为剖述过，所以这里只就欧战后，尤其是1930年恐慌后，日本农业经济的情状加以检讨。

农业经济衰落的速度，及其恐慌前进的步骤，普通较比工业来得纾缓。但即如此，近年来日本农业经济的衰落情状也已很可观了。欧战后，日本的农耕地面积及单位产量皆有急激的减少——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绝对减少。

### 日本耕地面积绝对减少的趋势

年次(年)	面积指数(%)
1921	100
1922	99.8
1923	99.0
1924	98.4
1925	98.4
1926	98.5

### 欧战后日本米麦单位产量趋势表

期 间	每反步实数	与前五年平均数的比较
1916年~1920年	1.884 日石	0.120 日石(增加)
1921年~1925年	1.842 日石	0.042 日石(减少)
1926年	1.809 日石	0.033 日石(减少)

(注)以上二表皆据上引拙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根据上列二表,1921年至1926年五六年中,日本农耕地指数减少1.5%,1916年~1920年期米麦的平均单位产量,与1926年的单位产量较,前后减少七升五合(按每反步=1.764中亩计算)耕地面积的绝对减少,是农业经济之量的退步;单位生产量的绝对减少,是农业经济之质的退化。生产上量的退步和质的退化!这岂不是农业经济破产前夜的事相吗?!

日本农业经济的衰落,再经1930年的恐慌而愈益尖锐化。此种事相具体表现于农产物价的暴落上。据本年7

月 21 日日本农林省所发表调查，日本三种主要农产米麦茧昭和五年度的总生产价格，共为 1,625,352,089 元（米 1,117,916,180 元，麦 230,223,135 元，茧 304,212,774 元）。若与前年较，则各种价额减低数如下：米为 466,812,668 元（29.5%），麦为 67,875,383 元（25%），茧为 350,787,419 元（52.6%），合计 885,476,470 元（35.3%）。况且，生产数量上只麦略有减少，1,800 千余石（5.2%），米和茧反有增加，米增收 7,310 千石（12.3%），茧增收 4,370 千余贯（4.3%）（以上数字皆据最近《改造》10 月号，河西太一郎所作《恐慌农村的动向》）。这是何等激烈的暴落！又据猪侯津南雄的估计，他种非主要谷物 1930 年底价格的低落比率如下（据本年 1 月号《改造》所载《农业恐慌与日本资本主义》）：

六种谷物(米除外)	跌落 24%	与六月比较
蔬菜七种	跌落 51%	同上
果物三种	跌落 52%	同上

此外，农业副产如茶、日本席、养鲤、鸡蛋、苗木、木炭及林产物等等，也约跌落 30%。

日本的农业恐慌已经经过一年多的岁月，到现在有无转好的曙光——这是一般关心世界经济及日本经济者所切望明了的。在此恐慌的过程中，日本为政者及所谓农业大家，固然也会改换种种农耕的新方针，例如农业经营的多角化，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的自给主义化等等，极力改桑园为水田，增加豚鸡等家畜的饲养头数等等，但这也不过是一种

退化的表现罢了。本年农业经济的情状也不过如下：

“……上半期主要农产物的茧，数量虽仅比去年，预想为 10% 多些的减少，而其价格（谅为额之误——焦农按）则约为 50% 的低下。……其价额为 13,970 万元，与去年的春茧实收价额较，相当于 7,066 万元（33.5%）的减少。”

“……即就蔬菜类看，截至现在，其运转略与去年同，而市价则比去年略示低落。茶也然，由去年五六月的市价（中味，新，一贯目，皆系茶之品名——宋按）3 元 60 钱，低至今年的 3 元，约有 2 元的低落，数量也约减 20%，故其总价额与去年之 2,419 万元较，可得 490 万元减少的预见。”

（节译本年《改造》10 月号 85 页所录载《日本经济年报》第五辑——昭和六年第二季）

#### 四、日本殖民地膏血的涸渴

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急迫，还可以从日本殖民地——台湾及朝鲜——民众膏血之涸渴来证明。

大凡帝国主义者皆恃殖民地民众的榨取，以维持或加强其自身的存立。日本帝国主义也然。上面述过，日本的经济早在明治中年即已步入衰落的途程。这种情势促迫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向外发展”。甲午战后日本居然割据了台

湾；日俄战后又吞并朝鲜及租借旅顺大连。果然因此而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延长了本身的寿命。

关于日本由朝鲜及台湾等殖民地所获得的利益，换言之，朝鲜及台湾等日本殖民地在日本帝国存立上的价值，请参看《日本支配下满二十年的朝鲜》、《朝鲜问题的真髓》、《日本资本在台湾的发展》、《日本的台湾土地政策》等论文（载于《新东方》及《国闻周刊》等杂志）里，剖述之颇详，兹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再赘述。但简约言之，正可以应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假使英国丧失印度，大英帝国立即降为世界三等国”说：“若日本丧失了朝鲜和台湾等殖民地，日本帝国立即降为世界末等国。”具体说来，朝鲜及台湾等殖民地在日本帝国存立上的重要性，约有下列各端：第一，消纳日本国民的资本；第二，供给日本工业的原料；第三，消纳日本的工业制品；第四，解决日本内地的粮食问题；第五，解决日本内地一部分的人口问题（此项不但要注意移住殖民地的人口数目，并须注意由殖民地输送于日本内地的财富）；第六，提供日本国民以财富秘密积蓄及公然榨取的源泉；第七，充当日本帝国海陆军的根据地……前六项为经济上的价值，帮助日本经济上的维持甚大。日本经济之所以能继续繁荣到如今，说是大半依存于殖民地的压榨，谅非过言。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及台湾的压榨，已经达到饱和点；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续命汤的朝鲜及台湾两地群众的膏血，已至涸竭的程度了。据《朝鲜问题的真髓》，昭和元

年(1926年度),百元以上日人纳税者数目竟较本地韩人同种纳税者数目,多出140人。又据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所编《朝鲜经济的研究》,昭和元年度百町步(1町步=17.64中亩)以上的地税及市街地税纳税人数目,日人为543名,韩人为391名,日人约当韩人一倍半。这种事实是在证明韩人资产家的没落,而一般群众的膏血也将涸竭了。此项比较尚须注意当地日韩人口的比率,据昭和五年《朝鲜要览》,在韩日人仅占总人口2%强。他方面,韩人的食米量一年减少一年,质也有激变,以小米代精米。这是韩人的没落,其结果乃不得不携老招幼向我国东省及西伯利亚前进,以过饥冻的生活,或连袂而至日本内地,威胁日本的劳动市场,过流浪无依的生活。

朝鲜的情状如上所述,而台湾的悲惨也不在其下。日本经营台湾已逾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一切的企业经营殆为日人所独占。政府专卖的酒、盐、烟草、樟脑、阿片、半专卖的糖及专营的铁路业,林业不用说,即普通事业的经营,也莫不皆然。据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118至119页,银行业资本日人为44,804千元,台人仅为6,572千元;小铁路业日人资本为1,362千元,台人仅为875千元;制糖业日人为15,067千元,而台人则仅为1,950千元(实则现在台人资本唯二经营的林本源制糖及新兴制糖已尽为日本的制糖公司所合并);石炭业日人为14,535千元,台人仅为780千元;他如造船铁工业,电力电灯业,新闻印刷业等皆为日人资本独占。即如残存为台人



谋生的企业如米贸易及茶贸易,近年来也已渐归日商所独占,最大米商的瑞泰(台人)已达破产境地,茶商也已无可言者存在。大多数台人所倚以为生的土地的兼并也颇利害,不久也将尽归制糖公司的绝对支配。他方面,台湾人大部分被迫而由平地冒险向番地的山里移动,不能同化生番则为生番所同化而還元于半原始生活,其小部分逃至中国南部及日本内地。

朝鲜和台湾群众膏血的涸渴,再经此次1930年的恐慌,更臻于极点。据价格的运动以检点恐慌的深度最为可靠。1930年9月,朝鲜米价每石尚为20元,至12月即跌至12元,约跌一半(据1930年12月号《朝鲜》杂志所载《关于米价调节日本政府的应急施設》)。不但主要农产的米价如此,其他的农产物价也然。台湾农产物价的暴跌也不在朝鲜之下。据台湾友人的私人调查,1930年日本米(日本种的稻米)每石由16元跌至9元,蜜柑一斤由1毛4分跌至6分钱,芭蕉每斤由1毛左右跌至2分,跌势自百分之四五十至80%。现在印度豆每斤只值2分钱,洋白菜每斤只值7分钱,蒜每斤值1分钱。农产物价虽然暴跌而各种公租公课的负担却毫不稍减。该二地方占本地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其生活之苦真非殖民者的日本人所得体验出来的。台湾台南州下的农民(台南州因失收而益穷)因为收获额不足以纳税,致使所收成的稻全部为政府征去充当税金。朝鲜也因年益贫穷化的结果,而韩人犯罪的件数激增。据1931年3月号《朝鲜》杂志所载《朝鲜生活

与犯罪》一文，朝鲜犯罪件数，1921年只为82,901件，至1929年就增至168,806件，增加一倍以上。而其犯罪的内容，猥亵、奸淫、重婚这些所谓“文明罪”减少，而因“生活问题”激发的犯罪却反增加，犯罪最多者为盗窃犯，而诈财及横领罪次之。

朝鲜及台湾本地群众的经济已至山穷水尽的关头，一般群众的压榨已达饱和点。但是日本犹在加紧压榨膏油，于是两地民众为谋生存而自然起来反抗。去年朝鲜的“光州事件”，就是一例。即如处在高压之下的台湾社会运动，表面上虽减退，但却是一种潜势力的滋延。纵使他们不积极反抗，一任日本加紧压榨，他们也不过是一堆“枯骨”，大量脂油的获得当然无望。这又是日本帝国危机急迫的另一关头。

## 五、日本向外侵略的必然性

日本帝国的经济因其本身资源的缺乏，不足以应付资本主义型的继续发展，所以到中途即呈停顿。虽然后来幸得朝鲜和台湾两殖民地的压榨，使它得以发展到帝国主义的现阶段，但是近年来朝鲜及台湾两殖民地压榨之达饱和点，似已不足以供其苛求的情势，已经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陷入苦闷的境地。日本要维持其经济上的存立，似非先打开这种苦闷的难关不可。

日本要打开当前的经济难关，本有下列二种方法：第

一,社会主义的方法;第二,资本主义的方法。

社会主义的改造方案,日本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曾有详尽的提议,若节述援引于下,既可避免烦杂,且可避去代庖僭越之嫌。

“……今日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就是(一)撤废  
  充当支配者而已无能力者化的资本家本位的制  
  度,改为生产阶级,新兴阶级的无产阶级本位的制  
  度;(二)建设厚生本位,国民福祉本位之有计划的  
  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以代替现在阻  
  碍生产的营利本位的自由交易经济制度。……”

高桥氏把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停顿的原因,归罪于经济制度的束缚。故谓:“……同样,在今日资本主义经济之下,为须直接间接保护资本家阶级的既得权利及既得利益,而可以充分利用的科学的进步,遇到不少的阻碍。现在若将此等科学移用于以国民的厚生为直接目的的有计划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之下,且能利用得法,则可由从来阻止发展的资本家型的束缚解放出来,于是得如我们在明治维新后所经验的,助成生产力的一大发展。……”

高桥氏的具体方法如下(节录并申述其意):

第一,要先确定有能力的产业经营者及更完善的产业经营方法,以代替资本家及营利制度。而产业经营者就是社会,把产业社会化,全由社会共

同经营；所谓更完满的产业经营方法，就是在生产及消费皆于一定的预算之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办法。

第二，极力应用已发明的科学于有益厚生的方面，使一般民众皆得沾润科学的恩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就是有益于全体民众的科学，也因资本家的营利关系而被埋没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须将这些有用的科学极力发挥，使尽其实用化的任务。

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专为游食的资本家而课诸大多数国民的牺牲，把它运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例如利用租税政策没收不劳所得，重课财产进款，绝对没收遗产，减轻对于勤劳所得的各种课税。又如改革金融制度，降低利率，改革土地制度以降低地租。并将各种基本产业社会化，以缩小资本家游食奢侈的来源。

以上，据《资本主义末期的研究》368至372页。

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至独占阶段，政府大权操于财阀手中的日本，高桥氏所拟不利于资本家的打开政策，必不能为所采用。而现在日本布尔乔亚政府的难关打开策，必定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无疑。此种方法本可分为由粗工业向精工业前进；帝国主义型的向外发展。而前者须依后者始有可能，其具体表现就是扩大殖民地。且申论之。

日本的粗工业因为后进国,尤其是中国粗工业的发达与竞争,而必须进展至精工业的阶级,日本工业经济始有维持的可能。但欲以精工业竞存于世界的工业界,须有下列二种条件:

第一,须有充分的资源和熟练的技术;

第二,须有自由销售制品的独占市场,最低限度也须世界市场以自由竞争为原则。

关于第一项日本资源的缺乏,我们已当作文述过,一般人的脑中印象也颇深刻,故无须详细引证。要而言之,日本没有羊毛和棉花,没有铁产,煤产的艰难也已达极点。即如农业尚占重要位置的农产,尚须仰给于其殖民地和其他外国。至若技术上的能力更不能与欧美各国对立。日本货物之得在世界市场上占一点地位,全由于“价廉”非由于“物美”。

第二项自由销售制品的独占市场,除完全归其统治的朝鲜及台湾两处殖民地而外,似无绝对可靠的。东省市场近因英美德俄之进出,日本贸易已渐陷于悲境。即如朝鲜及台湾,也因其压榨程度达饱和点的原故,购买力已有激减之势。且举朝鲜为例,朝鲜由日本的人口量,1929年尚为315,325千日元,1930年减至278,194千日元,本年度截至5月为86,891千日元,有更减的倾向(据《中央公论》9月号《日本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况且,朝鲜和台湾也已相当资本主义化,需要外来制品的程度必愈减低。不但日本没有独占市场,他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且皆

筑有坚固的“关税垒壁”。

日本的资源既不丰富，劳工的生活程度又越增高，技术且不能与欧美各国争竞，欲以“物美价贱”的二优点争逐于世界市场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再加以现有的独立市场已渐不可靠。日本现在的统治阶级自必采用“帝国主义型的向外发展”的策略。且须此策略完成，而向精工业的前进始有可能。因此，日本之向外侵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现阶段之必然性。

## 六、东省适当日本侵略的第一线

日本三岛位于北太平洋中，北连俄国，南跨海可至南洋群岛，西接中国大陆，东隔太平洋而与美国遥遥相对。在此环境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之向外发展，除向西线前进以外已无他路，盖因此而不但格于强俄而且经济的价值也小；东边的美国不但领土的取得绝无希望，即连移民也已因美国《移民律》的禁止而不可能；南方因为领土皆被英美荷等国分割净尽，除非重再分割已无觅得片土的可能。所剩的只有西进的一路。因此，西进的所谓的“大陆经营”就成了日本帝国统治阶级向外发展的传统政策。

自地理上说，陆地最与日本接近的就是我国东三省。日本与我国东三省隔日本海一衣带水，数十小时即可抵达。由朝鲜过鸭绿江更近，只需数小时。就现状看，日本由大阪经由安奉路及南满路进至长春腹地，只费 92 小时。若

万一日本久年所企望的吉会铁路完成,即由大阪经由该路只需 51 小时即可直达。这是地理上的密切关系。若再自东省的经济价值加以考察。则日本帝国数十年来之急于开展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也是意料中事。

概括言之,东三省的面积的广大达 64,253 日方里,而人口只有 23,459 千人。面积约 3 倍于日本内地,而人口反不足日本内地二分之一(据大正十四年十月一日日本的国势调查,日本内地面积为 25,151 日方里,人口为 59,736,822 人——皆据大西斋著《支那的现状》271 页)。若自人口密度比较看,则日本内地每一日方里有 2,417 人,而东省约为 374 人,约当日本七分之一的密度。据说东三省的人口包容力尚有三四千万人的可能。土地且多肥沃可耕,气候也相宜,即现在的农产量每年就有 18,376,340 吨,除去 12,475,740 吨自用量外,尚有 590 余万吨的剩余(据《中东经济月刊》第六卷第十期《民国十九年东三省农产收获与输出之估计》)。此外,尚有铁的埋藏量 7 亿吨<sup>①</sup>,煤的埋藏量 20 余亿吨<sup>②</sup>,全矿区数百处<sup>③</sup>,天然森林面积 12,420,060 余町步,材积量达 445,000 万余石<sup>④</sup>;……。且每年有 647,583,017 海关两的贸易能力(约占中国全国贸易额三分之一)。具有这些种种良好经济条件的东三省,自然构成日本帝国向外侵略对象的第一线。

上述只是概括的解释而已,至若东三省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展上的各别价值,则另设专节详细解剖于下。

## 七、东三省与日本粮食问题

日本帝国存立上第一个险象，就是原以农业立国而本国的粮食问题却日益险恶。日本国民的主要粮食的米麦，年来因为农业经济的衰落（正如本论文第一节及第三节所述）而其产量渐有减少的倾向。米麦的生产指数 1919 年度 100，次年的 1920 年即减至 86。其后虽有多少增减，但仍未突破基数，即至 1929 年的指数，也只与欧战前 1914 年的 91 相等。主要粮食的生产量虽然日益低减——至少也在停顿中——而人口的繁殖却日益增大，日本人口的增加指数 1919 年为 100，1929 年为 111。即就现状而言，日本内地人口约有 6,000 万，其增加率每年自七十五万至百万。所以 1926 年的米进口量超越 9,530 千日石（据上引藤冈启同书 71 页）。这在日本帝国的存立上，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种缺陷虽然可以由殖民地的米产来弥补，但是殖民地的民众也须自己消费，即使台湾人可以铁钉样的“白芋干”充饥，朝鲜人可以小米代替精米，但其提供力究竟有限。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于东三省的农产。且分水稻，小米，两项分述之。

**水稻** 据日人的调查，东三省大体上甚宜于水稻的栽培。只 1926 年的水稻的栽种面积已有 111,730 町步（约当 200 万中亩），其产米量为 1,877,800 日石（约当 327 万余中石）。又可开为水田之地尚有百万町步。即据日本农商务



省技师的调查概算(士林及间岛除外),可开水田之地即有 58 万町步,其中 33 万町步比较容易开垦。据日人的预计,若奖励得法每年可开垦 8,000 町步至 10,000 町步,不数年而增加 15 万町步,决非难事。而每反步平均收获额若假定为稻子三石六斗,可得 504,000 万日石,以平均 50% 计算,可得 270 万糙米。再加算现在 75 万日石的剩余,合计可得 350 多万日石(约当 609 万中石)。日本国民正渴望着此项米产的救济呢!(本段数字皆据上引藤冈启同书 66 页、68 页、72 页)

**小米** 日本每年由朝鲜移入鲜米在 2,745 千日石以上。而这些米量并不是朝鲜人民消费的剩余,鲜米出口的反面,就是低级食粮的小米的进口。昭和元年朝鲜的小米进口量达 5,243 千多日石(此二项数字据《朝鲜问题的真髓》)。此项小米进口量的大部分皆来自东三省。昭和元年东三省小米向朝鲜输出量约为 4,443 千担,值价 21,189 千多海关两。于此可知东三省小米间接解决日本食粮问题有多大作用。而小米在东三省农产上又占很高的位置。即就失收的昭和元年度的耕种面积及收获量言,已有 1,926 万多反步,2,489 万日石(约当 4,336 万中石)。自产量言,小米为东三省的第三重要农产。东省小米对于日本粮食问题的救济力何等巨大!(以上数字据藤冈启同书 58 页、59 页及 60 页)

## 八、东省与日本生产原料

日本之立国于世界上,以资源之缺乏著名。日本工业之所以早衰,主要原因也即在于资源之缺乏。前节述过,工业上最重要的生产原料,如铁、煤、棉花、羊毛,日本皆无之,或产量很少。即农业生产上必要的肥料大豆,日本也多仰给于外国。而这些日本切要的生产原料,东三省皆甚丰富。且分述于下。

**大豆** 大豆在东省农产上首屈一指;其国际上的商品地位也颇负盛名。大豆的栽种面积为 2,603,700 町步(昭和元年度——据藤冈同书 45 页);其产量为 5,268 千多吨(1930 年,据《大公报》本年 4 月 19 日《哈尔滨通讯》)。东省的大豆产量除本地自用外,尚有很多剩余。据《大公报》上引哈埠通讯,1930 年东省大豆输出量 4,327 千吨,占同年产量五分之四以上。又据藤冈氏书,昭和元年东省大豆输出量约为 22,426 千担,值价约 7,660 万海关两。其中输向日本者仅南满三港即已达 3,949 千多担,值价 14,318 千余海关两,莫怪藤冈氏说:“……输送大豆不独为增加运费收入,实为繁昌本国系(日本系)油坊,提供廉贱豆油及豆饼于母国(日本)工业及农业,以获某种利益。以豆饼为肥料的我国(日本)农民(昭和元年输向日本及朝鲜者达 19,159 千担=54,635 千海关两),满洲大豆的高低,直接影响自身的计算”(同书 44 页)

**棉花** 目下东省的棉产量虽然不大,年产额棉实仅为

1,500 万斤,似乎不关重要。但是可以种棉土地,约在 120 万町步(约当 2,300 万中亩)以上。且日本在关东州栽种棉花已有相当成绩,关东厅特为树立“棉花奖励九年计划”,预定九年后于关东州旱田面积 22 万町步之中,将 80,000 町步用于棉的栽种。如此前途有望的产棉地,自然难逃缺欠棉产的日本的注意了。

**铁产** 煤和铁是近代文明的资源。此二者在近代国家的存立上颇占重要。但以强国自豪的日本却很缺欠此二种资源。日本目下铁的需要年额。钢材在 200 万吨以上,换算铁当在 310 万吨以上。而日本内地的供给量,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超过 150 万吨,约缺 200 万吨非求之于殖民地及外国不可。为满足这种需求,东三省也逃不了日本的视线。盖因东三省的铁埋藏量在 7 亿吨以上。与日本全土(包括朝鲜)之 12,200 万吨比较,正五倍于日本全土(本段数字据藤冈氏同书 108 页、124 页及 125 页)。

**煤产** 日本煤的埋藏量也有 90 余亿吨,埋藏量不算不大。但是近年来的采掘费非常增高,已在证明日本煤产的困难。反之,东省煤埋藏量虽然不大,而为日本独占的抚顺煤产,正足以救济日本的这种困难。抚顺煤矿的埋藏量约为 10 亿吨,占东省全部埋藏量之半。而该煤坑尤以坑层之深厚及其“露天掘”著名。采掘容易,生产费低微,实日本产煤界的一大救星。昭和元年度的产额即约达 614 万吨,且有昭和十四年度出产 1,100 万吨的预定(以上数字据藤冈启同书 126 页、128 页)。

**羊毛** 日本每年的毛织物产额虽然约为 20,239 万日元,但其所用原料的大部分,皆仰给于外国,每年输入额达 12,107 万日元。需要大量羊毛原料的日本,其饲养业却微不振,仅北海道一隅。反之,东三省的牧畜业颇盛,羊毛的产量也多,除本地消费外,每年尚有 2 万担,值价 37 万多海关两的输出。况且,此数仅就南满三港计算而已。对俄输出尚不在此内。而此三港的输出量几可以说全部输向日本。日本并且直接投资于此项企业。约自 1914 年,满铁即设置公主岭试验场,从事此业的经营,希望二十年后产毛 1,500 万磅,值价 1,500 万日元(以上数字据藤冈同书 165 页、167 页)。

## 九、东省与日本投资及商品市场

与东省之帮同日本解决粮食问题及供给生产原料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就是东省之销纳日本投资。大凡企业实权之归宿皆视资本之来源为转移。日本已投资于东省各种企业上,则直接间接可以操纵各种产业的经营实权,使有利于其母国无疑。据“满铁”的调查,日本之国外投资(殖民地不计)22 亿日元中,对中国的投资为 18 亿日元,占 81% 强,而对东省投资又占对华投资 72% 强,约为 13 亿日元。日本之东省投资额即自对外投资全数计算,也约占 60%。日本支配东省经济的实力如何雄厚!同时,东省为日本投资市场的意义,又如何深浓!(本段数字据《中央公论》本年

9月号《日本资本主义与殖民地问题》)

东省不但是日本的巨大投资市场，并且是巨大的商品市场。据上引同文 1930 年日本向中国的输出总量为 39,900 万日元，其中向东省输出者为 12,200 万日元，占 31%。又据藤冈氏同书 250 页，欧战中，日本向东省的输出贸易额，占全部输出额 52%。即自东省方面说，在日本商品略受列强商品压迫的 1926 年，在东省输移入总额之中，日本商品尚占 43.4%。同种比率，英为 5.7%，美为 6.7%，仅及日本比率约八分之一，或约七分之一。即我国所占比率也只 31.1%，犹不及日本比率多多。

自经济的立场上看来，东省输入商品的内容，也有加以考察的必要。在输入品中最占重要的，就是棉织物。1926 年该项商品输入额达 5,800 万两，约当总输入额 24%。其次为麦粉，1,900 万两，再其次为棉纱 1,600 万两，麻袋 1,100 万两，……此中之绵织物，绵纱，及麻袋，几乎全部为日本输出品。同时，又皆为工业制成品。其在日本经济上的意义，不独限于商品销纳的意义，并且具有很大的工业发展的意义。

输出贸易的反面就是输入贸易。此项固不应在本节题目之下讨论，但因其有密切关系，且有特别的意义，故姑述之。日本由东省输入的数目额也颇巨大。据上引同文，在 1930 年中国输向日本的金额 17,800 万日元当中，东省的输出额占 16,300 万日元，约占 85%。此项巨大数目另于生产原料的供给上具有特别意义。换言之，日本由东省输入

的物品概为生产原料,如铁、煤、肥料(豆饼)及大豆之类。故在日本工业上,与上述制成品之销纳正相映照,而有特别的意义。

## 十、“东北事件”的发生

总括以上各节所述,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危机日益急迫,现已由工商业蔓延于农业经济,他方面东省具有充分的经济价值,可以充当食料及原料的供给泉源,可以充当资本及商品的销纳场所,并且可以充当所谓“大陆经营”的媒介物。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软的东三省,乃有十二万分的必然性。因此,保护所谓“满蒙的特殊权利”,扩大满蒙的利益和权限,甚至主张“满蒙积极政策”,等等,乃成了数十年来日本任何内阁的主要政纲之一。虽其方法有急进与缓进之差,但其为侵略东三省的根本计划,则无二致。果然,9月18夜终于发生了近代史上异例的“东北事件”。

然而“东北事件”何以偏偏发生在这时候?日本经济岂不是早就衰落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三省,岂不是早就垂涎万丈了?东北事件之所以不发生于过去任何时候,而偏偏发生在此时,非有何种特别的原故不可!我们且就东北事件的近因检讨看,以作本文的结束。

东北事件发生的近因,大体上可以分作下列四项:

第一、日本殖民地问题的急迫;

第二、列强向东省的积极进出；

第三、中国经营铁路的压迫；

第四、中国内部统一的威胁。

且逐项分别剖述之。

日本自经明治维新以来，每代政府皆极力施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强兵的要件之一，就是奖励人口的繁殖。日政府不但不肯节制生产，反而禁止生产的节制，奖励人口的复生产。长久的过去姑置不论，即最近十年间的人口繁殖，已有惊人的成绩。1919年的人口指数若假定为100，则1929年为111，增加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人口总数约为6,000万，而每年的增加自七十五万至百万。这个比率比较1919~1929年期，反为增大。这样大比率的人口增加，本即地狭人稠的三岛将如何容纳？！移向朝鲜和台湾吗？以25%（朝鲜）及18%（台湾）的年增率增加下来的这两个地方，似乎已无收容能力，除非将上二处的本地人挤出境外。此外，唯一的方法就是移向东三省。但是东三省究竟不是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日人之移住东省多少总须受制于“适者留”的竞争原则。日本人生活程度高而不耐劳苦的工作，故不容易在东省生存竞争场里占得胜利。过去二十余年努力的结果，也只不过20万的成绩，其中之15万且系住于日本租借地之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者。日本果欲施行殖民政策于东三省而获良好的成绩，自非完全独占东省为殖民地不可。这是日本近年来急于进出东省的第一原因，也就是东北事件发生的近因之一。

东三省惟其不是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所以美国乃有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权限。过去只是口头的主张而已，近年来则进入实行的时期。美国是以大量生产著名的国家，它的商品销售于世界各地，且以欧洲为主要市场。但是欧战后欧洲各国的经济皆极度疲弊，一般人民的购买力大减，而美国商品乃不得不另觅销纳场。中国固为适当的地方，而东三省尤为其理想地。美国近年向东三省进出的猛势，竟驾日本而上焉。1913年至1926年期，列国对东三省输出贸易增加率，日本只为3.37%，美国则为6.6%。不但美国的此项增加率可惊，即东方贸易渐呈颓势的英国，其同项增加率也颇可观，同期增加率约为3.0%。最近年英美等国的增加率，恐尚不止此。各国不但积极输送商品，并且投资。这种急转的情势自使日本不寒而慄，终出以先发制人的手段。这是东北事件发生的第二近因。

日本之经营东三省，不但受到本身问题及其他列强的威胁，即以病夫国著称的中国的国内统一与夫所谓经济建设等等，也增高了日本惊慌的程度。

铁路为经济的大动脉，且为政治侵略及军事侵略的急先锋。故欲侵入国者第一步必先攫取铁路权；而欲恢复国权者第一步也必先收回铁路权，或进行同样性质的运动。俄国早年之侵略东三省，先铺设中东路，继而延长南满线。日俄战后南满线虽由俄国移归日本，而东省铁路二大干线及其支线的路权，仍握于外人手里。觉醒路权之重要的东北当局，虽有恢复路权之意，碍因格于条约与强权而未得



实现。其结果，乃采行第二办法，自己敷设平行线。东北自敷铁路工程始于1925年的开丰（开原至西丰）轻便铁路：次之者为沈海铁路，再次之者为呼海铁路及打通支线，鹤立铁路，吉海铁路，齐昂铁路，及齐克铁路等也皆先后敷设。现在新旧各线之联络，俨然形成东西二大干线：西有洮昂，四洮，打通，郑曰等线，洮南至通辽一段若完成则成一完全的干线；东有吉海及沈海三路，向北可以延长至伊兰，而成一完全的干线。此二干线皆可直接与北宁路联络而与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平行，且可通至建筑中的葫芦岛新港口以出海。中国有此二线一港，即不收还南满铁路，南满路将必成为废物。于是，日本大起恐慌了。反对平行线之敷设已无效力，自然出以武断的，暴力的方法。这是东北事件发生的第三近因。

中国方面不但要恢复路权，并且要恢复一切旁落的国权，排脱外国的羁绊。日本素来对于东北所拟定的帝国主义型的侵略步骤，第一先使东北独立，第二由独立而收揽为保护国，第三由保护国而合并，终使成为朝鲜第二。这是显而易见的阴谋。在此阴谋酝酿未成熟以前，东省当局即断然归顺中央，促成中国统一的局面，而由中央负责处理对日的一切交涉。于是，从来万事皆由地方政府专权交涉的东北问题，一变而为中央直辖的交涉问题，二国中枢的直接交涉问题。中央政府为全国的中央，为全国力量的所在，军力姑置不论，即国际上的地位也与地方政府的势力有霄壤之差。日本的交涉自然格外感觉棘手，包藏祸心的

阴谋乃不得逞。但却因此而日本恶恨东北当局至于极点，必欲改换“俯首听命”的地方当局，以便实行其传统的“满蒙吞并政策”，而偿其帝国主义型的发展。这是东北事件发生的第四近因。

因有以上所述正面的原因和背面的原因，远因和近因，而轰动世界的东北事件乃发生于本年9月18夜。于此我们获得东北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此种“必然性”是在某种前提条件之下成立的。其理由剖述于《日本果非侵外则不能存立吗？》及《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二篇论文中。

**注释：**

- ① 据藤冈启《满蒙的新估计》108页。
- ② 据同上126页。
- ③ 据同上145页。
- ④ 据同上154页。

原载1931年12月《新东方》第2卷最近远东问题专号

## 日本战时经济编制中的 原料问题及其政策的动向

日本帝国正和其他的帝国一样积极在准备战争；在首都戒严中成立的准战时政府的寺内——广田内阁，在其树立“国策”时，特别周密讨论到的就是原料资源的问题。原料资源的问题现在已经不但是平时工业生产的问题，并且同样是战时军需原料的问题了，即战略资源的问题了。日本自其开始资本主义的第一步即为原料问题所困恼，所以每一发展阶段上皆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但是战争又增进原料的需要。处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帝国正在焦虑于这个日益逼切的原料资源的问题。且看它的内容如何？企图解决的方策又是如何？

### 一、一般原料资源的重要性

现代工业的兴衰及消长，主要的决定于三种条件，贩卖市场的广狭，资本的多寡及原料资源的丰啬。特别是后者

关系尤其重大。原料资源丰富则可以减低工业的生产原费，增加工业制品的国际竞争力，保持一国工业之继续发展。原料资源缺乏则工业生产须依赖外国供给原料始能进行。这不但增加生产原费，提高制品的价格，削弱国际竞争力，有时甚至因为外国供给的断绝而生产陷于不可能。例如不能生产羊毛及棉花的国家，她的纺织工业无论怎样发达，其前途仍是岌岌可危的，即连目前的现状，都要千辛万苦专赖剥削极廉贱工人的所谓“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 姑以维持。日本是个典型的事例。又如缺乏现代资源的石炭和铁矿的国家，他的重工业的发展也要划下极严格的界限，万一因为战争及其他的原故资源的供给完全被切断时，就不但重工业生产要停顿，即连仰赖重工业供给生产手段的轻工业，也须关门大吉。在这点日本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面只是从平时的工业生产说明而已，若更深入从战时的场合着想，则原料资源的重要性更为显著而增大。今日之世界，因为经济的联系与政治的决裂无法调和，遂陷各国野心家于战争的梦境，现实上整个世界已经逼至战争的前夕，各国皆在疯狂似的备战了。在这疯狂备战的前夕，一切平时的生产全部战时的生产化，一切的生产都为战时的需要而进行了。然而战时工业生产最大的威胁就是原料资源的断绝。而战时各国又皆以封锁敌国断绝一切经济来源为取胜的重要手段，例如欧洲大战中协约国之于德国。因此，疯狂备战的各国目前的经济斗争，就很自然地集中到原料供给地之获得及占有上。这时候平时的原料资源，

也变成了战略资源了。这种斗争最近很显明地表现为两面的事实，资源丰富的强国努力坚固她的资源地的独占，如英、美、法及苏联，资源缺乏的强国则相反的，主张实行世界的再分割，以便自己占领新的原料材源地，如意、德及日本。在这种情势之下，半殖民地特别成了缺乏资源的强国争夺的对象了。

原来，殖民地的作用有三：其一、充当宗主国过剩人口的尾间；其二、提供工业制品的贩卖市场；其三、充当原料资源的供给地。各国侵略他国的领土者也皆列举本国这三种条件缺欠为理由。但是宗主国移植殖民地的人口，事实上皆非常低率，这因为生活程度及生活方式不同的原故。侵略者并不能由事实来证明第一种理由为正当。第二种制品贩卖市场的理由虽较重要而合乎实际，但是任何国家若能提高工业构成则国内市场也可以增大。例如生产手段部门的发展速度高过消费资料部门，则国内市场自然扩大，并且原料国以至其他的工业国亦都很自然地与之相交易，制品市场自然扩大，无须乎殖民地的侵占。归结起来，侵占殖民地最大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原料资源的获得。在自由经济时代，因为各国彼此之间皆遵循着世界经济关联的自然法则，所以这种占领原料资源地的必要并不很大，但自近年来特别是1931年世界经济会议决裂以来，经济的国际主义益向国家主义转变，各强国皆努力于造成经济集团，原料资源地的占领欲就尖刺着野心家的心胸。特别是在逼至战争前夕的今日，每个野心家都时时刻刻在吟味德

国在欧战中受到经济封锁而致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于是占领殖民地的根据全部集中到原料资源的独占上,而原料资源的重要性更加涨大了。

日本是一个缺乏原料资源的国家之一,原料资源的问题在目前的日本就很自然地成了他最关心而又最重大的问题了。准战时的寺内广田内阁苦思焦虑的结果,也终于榨出了关于确立原料资源的许多政策,并且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原料资源的重要性在目前的日本更加表面化了。

## 二、原料资源的世界分布

讨论各国野心家争夺原料资源的问题,第一点应当首先分析的,就是造物者究竟对于这些野心家怎样与原料资源的现状。但是更应首先决定的问题,还是什么是原料,特别是战略原料。这里当然只能举出最重要的来讨论,有人说现代工业的基础原料是石炭、铁、石油、棉花、橡皮及铜。这几种原料之为最主要的现代原料,大约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在工业充分发达,并且战时经济包罗着整个经济范围的今日,战略原料也不能单限于这几种。所以更加扩大而得下列几种主要原料。兹据《皇家学会国防事情》(Royal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调查,主要原料的世界分布,约如下表。这里又有一个应加说明之点,就是所谓原料资源分布的问题,应当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不能是有无的问题。大凡普通的国家对于普通的原料资源都拥有多少。所以这里只就占世界供给量 10% 以上的生产国,按

其顺序列举如下。

原料资源的世界分布表

原料种类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国家	百分比	国家	百分比	国家	百分比	国家	百分比
石炭	美国	34	英国	20	德国	12	——	
铁矿	法国	27	美国	21	苏联	18	——	
石油	美国	59	苏联	12	委内瑞拉	10	——	
铜	秘鲁	20	美国	16	加拿大	13	北洛勒西亚	12
铅	美国	19	澳洲	17	墨西哥	12	加拿大	12
硫黄	美国	72	意国	20	——		——	
棉花	美国	49	印度	16	中国	10	——	
铝	法国	42	美国	13	意国	10	——	
亚铅	美国	28	加拿大	10	澳洲	10	——	
橡皮	马来联邦	46	荷印	37	——		——	
锰	苏联	61	印度	14	黄金海岸	12	——	
镍	加拿大	84	——		——		——	
铬	苏联	28	土耳其	18	新加勒洛尼亚	12	——	
钨	中国	33	印度	23	美国	13	——	
羊毛	澳洲	27	美国	12	阿根廷	10	——	
加里	德国	59	法国	19			——	
磷	美国	29	突尼斯	22	苏联	12	法领摩洛哥	12
锑	中国	65	墨西哥	10	布里维亚	10	——	
锡	马来	31	布里维亚	19	荷印	17	——	
水银	西班牙	35	意国	32	美国	17	——	

(注)本表录自《中央公论》9月号53页。

从上表看出世界主要原料生产上占最优越地位的是美国。他在几种最重要的原料,石炭、石油、棉花、铅、亚铅、磷的生产上占第一位,在铁、铜、铝及羊毛的生产上占第二位,在钨及水银的生产上占第三位。美国所缺乏的原料只有橡皮及二三种非铁金属的原料。美国可谓得天独厚。但可以与美国对抗的,尚有大英帝国。从上表看来英本国的原料资源并不丰富,但若合自治领,殖民地及委任统治地以观,则其地位并不在美国之下,其各种原料的生产额占世界总额的百分比如下:橡皮 58%,锡 42%,镍 86%,铅 43%,亚铅 32%,铬 34%,锰 30%,铜 30%,石炭 25%,羊毛 51%,棉花 24%等等。大英帝国的原料资源的特色还有多样性的一点。从这量和质看来,或许胜过美国。在英国领土内只缺欠一种重要的资源,石油,难免美中不足之感,但是这个缺点却又由资本的支配补偿过来。英国资本支配下的石油生产主体,有世界数一数二的英波石油公司,土耳其石油公司,及英荷壳牌集团。若加资本支配的成分,则世界原料生产的情形略与上表所指示的多少不同,但是其结果,英美的地位只有越发增高而不降低。次于英美的国家就是苏联。他是铬及锰的第一位生产者,同时又领有铁矿、石油及磷矿的丰富资源。再次就是法国和荷兰。

### 三、日本欠缺的原料资源

在上面所分析的原料资源分布上,最引我们关心的,就



是称霸于东亚跃进于世界的日本帝国,竟然落在孙山之外。这一点就是现今的准战时内阁所以急于确立原料国策的基本原因吧!但是我们尚须更深入的分析各国原料的需要量始得明白问题的实际。所以再就世界七大强国主要原料生产的自给程度加以比较。

七大强国主要原料资源自给程度表

	美国(%)	英国(%)	苏联(%)	法国(%)	德国(%)	意国(%)	日本(%)
石炭	104	136	103	71	122	3	108
铁矿石	98	70	107	140	30	76	65
石油	106	2	134	3	5	1	17
铜	118	0	62	0	11	2	92
铅	96	6	28	7	29	70	6
窒素	67	250	37	61	130	83	68
硫黄	132	25	89	14	19	150	102
棉花	215	0	86	0	0	0	4
铝	54	3	28	211	2	88	0
亚铅	111	0	54	5	60	265	25
橡皮	0	0	0	0	0	0	0
锰	8	0	270	0	0	15	43
镍	2	0	0	0	0	0	0
铬	0	1	132	0	0	0	100
钨	24	3	0	1	1	0	110
羊毛	55	22	82	7	10	26	0
加里	29	0	99	253	148	26	5

(续表)

磷	137	44	87	51	50	0	14
锑	0	0	0	53	0	51	1
锡	0	8	0	0	0	0	13
水银	40	0	86	0	0	506	0
云母	91	0	102	0	0	0	100

(注)本表根据上引《中央公论》54~55页。100%以上的生产额始得为自给自足。这个比率单就各国本国的生产计算的,殖民地皆未包括在内,所以严格地说来尚不足以指示自给程度的正确性。例如英国没有橡皮和镍,但若从大英帝国全体看,则橡皮又产于马来联邦,镍产于加拿大,并且是世界顶大的资源。

根据上表,现代七大强国之中得天独厚的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的原料资源的生产,大体上都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石炭、铁矿、石油、铜、硫磺、棉花等重要原料的生产皆能自给而有余。其次,英国若合其殖民地及自治领以观,则其原料资源之丰富当不至如本表所指示的缺乏,其得天独厚仍不在美俄之下,检阅前列原料资源的世界分布表即可明了。再次,法国尚能于现代最主要原料的煤铁保持自足的情状。德、意、日之大国的原料生产就未免相差太远了。特别是日本帝国,除了石炭、铜、硫磺、云母及稀有金属的铬钨尚能自给自足以外皆极缺乏。即连石炭的生产也因为采掘费的高涨而渐觉困难。今后石炭液化政策一旦实施,其需要量当更增加。特别有趣的是日本帝国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原料的棉花和羊毛,本国完全不产;目下成

了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的石油的产量远不及其需要。日本帝国原料资源对外的依存性,是特别浓厚的。

#### 四、日本原料缺欠的数量

日本国内生产不足以自给而须仰给于外国的原料资源,还可以从输入品的内容,检出更具体的情形。据日本输入品的内容,日本每年由外国输入的原料及其半制品,约有下列几种:

(一) 纤维工业的棉花及羊毛。

(二) 金属矿油的采油原料,原油重油、石炭、铀铁、矿铁、铝、铅、铜、锡及亚铅。

(三) 肥料化学原料的粗制硫曹、粗制硫安、磷矿石、油糟、曹达类及合成染料。

(四) 杂种原料的生橡皮、皮革、牛脂、木材及木浆。

上列各种原料及半制品之中,固然也有一面输入一面输出的,例如石炭及铜,但是大体上可以视为日本所缺欠的原料资源。这些原料及半制品每年的输入量是非常巨大的。此点,分析日本原料资源者更应加以注意。1935年度日本全部输入额 247,200 万元之中,原料及原料用的半制品竟达 215,000 万元,占 86%以上。日本原料及原料用半制品的输入额,并且是与年而俱增的。昭和四年以来日本工业构成的增高,特别是昭和九年所谓经济“大膨胀”以

后,日本原料的输入更是步着激增的路程。今年比去年又增加了不少。

日本原料缺欠的数量

	十一年上半期(千元)	十年度全年分(千元)
纤维工业	657,076	969,678
金属矿物	262,388	549,767
肥料化工品	80,153	100,061
粗生食品	101,918	147,496
杂类	105,482	192,640
其他	104,585	198,019
合计	1,311,603	2,157,661

(注)根据日本《Economist》本年8月11日期。

日本帝国以纤维工业而发展也因纤维原料之缺乏而脆弱。在输入原料之中以纤维工业原料占最大宗。在1935年全年分原料输入总额之中占45%，本年上半期更增至50%。其中棉花及羊毛又占纤维原料全部的90%以上。棉花的输入额1935年全年71,426万元(数量12,284千担),本年上半期45,249万元(8,421千担)羊毛的输入额1935年全年19,176万元(148万担),本年上半期16,747万元(153万担)。其余的制绢木浆及其他纤维则占极小部分(数目据日本《Economist》本年8月11日期,千以下四舍五加)。

其次,日本金属及矿油等资源对外的依存性,也不下于纤维原料。从金属矿油等资源的军事性看来,积极备战中的日本政府,尤其重视这些资源。政府当局的原料政策第一步先着手于这些资源的获得,是其事实的佐证。日本

石油、铁矿、石炭、轻金属以及其他的重要军需资源，目下每年的输入额已达五六亿元以上，这种输入并且随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推进而愈益增加。兹将本年上半期及上年全年分金属及矿油的输入数量及金额列表于下：

金属油类及半制品输入表

	价 额		数 量	
	十一年上半期 (千元)	十年度全年 (千元)	十一年上半期	十年度全年
采油原料	26,248	43,088	305,954 (千斤)	572,496 (千斤)
原油重油	66,229	106,826	207,622 (千加仑)	918,737 (千加仑)
石炭	24,813	48,970	2,025,515 (英吨)	3,984,824 (英吨)
矿	20,294	44,542	2,553,506 (千斤)	6,104,835 (千斤)
铤铁	21,511	41,180	838,850 (千斤)	1,603,190 (千斤)
他种铁	56,621	165,979	1,181,119 (千斤)	3,724,763 (千斤)
铝	9,463	18,362	12,771 (千斤)	22,336 (千斤)
铅	12,466	20,292	75,279 (千斤)	150,344 (千斤)
铜	14,717	36,444	36,752 (千斤)	108,768 (千斤)
锡	5,460	15,581	2,701 (千斤)	7,087 (千斤)
亚铅	4,566	8,503	27,523 (千斤)	54,606 (千斤)
合计	262,388	549,767	—	—

(注)本表之编制,根据上引《Economist》同期。

再次,肥料、化学原料及其半制品也随日本近来新兴化学工业的发展而渐增加其输入日本的金额和数量。日本近来化学工业的发达及其本国原料生产化的厉行,虽然渐有促成化学工业原料自给的状态,例如硫安、硫曹、苛性曹达及曹达灰等生产日益增加,企图能够自给自足。但是每年的输入额还非常之大,并且输入额的增加速度甚至高过金属及矿油等原料。日本肥料、化学工业原料及其半制品的输入情形如下表:

	价 额		数 量	
	十一年上半期 (千元)	十年度全年 (千元)	十一年上半期 (千斤)	十年度全年 (千斤)
粗制硫曹	6,583	5,423	123,679	104,209
粗制硫安	29,762	21,069	440,515	397,663
磷矿石	11,044	20,060	688,762	1,262,800
油槽	25,719	38,678	641,999	660,218
曹达类	2,245	5,492	45,914	97,075
合成染料	4,800	9,339	1,074	2,095
合计	80,153	100,061	——	——

(注)本表之编制根据上引同志同期。曹达类包括苛性曹达、曹达灰及天然曹达。

除了上述原料之外尚有几种杂类原料,也为日本所不产,或不足自给的,如橡皮、皮革、牛脂及制纸用的木浆等。

日本完全不产橡皮，国内工业上所使用的全部仰给于输入。日本每年生橡皮的输入额达 51,636 千元(1935 年度)，本年上半年期的输入更为增加了，已达 30,654 千元。战时经济体制中的汽车工业的勃兴，更要增加日本此后对于橡皮的需要量。皮革牛脂的输入额也属不少，1935 年全年达 2,864 万元，本年上半年期又增加了，已达 15,583 千元。畜牧业不发达的日本，此类原料之仰给于外国是无可如何的。特别有趣的，富于森林的日本，尚且仰赖外国每年供给 5,510 万元以上(1935 年度)的制纸用木浆；木材的仰给额每年也在 49,775 千元。

## 五、日本输入原料的来源

日本大多数工业原料皆仰赖外国的供给，并且这些种工业原料的大部分皆被输入的比率占了去，本国生产数量却占小部分，甚至有完全不产的。这个原料资源对外依存性之质量及数量的问题，威胁正在积极确立战时经济体制的现政府当局忧虑、焦躁。他们正在企图确立所谓“原料国策”，特别是“燃料国策”。这些国策的详情虽未公布也未至完全具体化的程度，但其大概的动向则可以推想而知了。上述缺欠原料从那里来，这些国策就要向那里去，或改变可以去的方向。因此，现在先来剖述缺欠原料的来源。

日本纤维工业上缺欠的原料，是以棉花、羊毛及人绢木浆为最主要的。棉花在日本完全不产。据农业者说是：因

为日本的自然环境不适于棉作。但社会的原因也不能没有,这里不讲。棉花的来源是美国、印度、埃及及中国。最近(昭和十年度)这些国家输入日本的棉花,美国是 37,200 万元,印度 25,900 万元,埃及 4,300 万元,中国 2,100 万元。羊毛在日本也是完全不产,现在虽已努力于绵羊的饲养事业,但目前尚无成绩可言。羊毛的大部分仰给于澳洲,其次就是纽西兰、南非及南美。去年输入日本的羊毛,总额 19,176 万之中,澳洲占 18,200 余万元,纽西兰占 400 万元,南非占 200 万元,南美占 200 万。又,人绢木浆的输入,美国占 1,500 万元,挪威占 1,300 万元,芬兰占 300 万元,加拿大占 200 万元。纤维原料的大部分来自亚洲以外的地方,只有中国供给不多的棉花,满洲也可以供给木浆。

其次,重要军需工业原料的金属及油类的来源,更加复杂。在这一点,亚洲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国本部、满洲、婆罗洲、印度及海峡殖民地等处皆为主要的供给地。特别是铁矿、铄铁及石炭,几乎全部仰给于中国。石油则依赖美国和荷兰。兹为节省叙述而将去年金属及矿油的供给国及供给量列表于下:

#### 1935 年金属矿油供给国一览表

一、原油及重油:美国(8,100 万元)荷印(1,200 万元)婆罗洲(500 万元多)满洲(100 万元多)。
二、铄铁及铁矿:中国本部(2,200 万元)满洲(1,900 万元)印度(1,600 万元)澳洲(500 万元)。



(续表)

三、石炭:满洲(3,100万元)法领印度(1,000万元)中国本部(800万元弱)。
四、铝:加拿大(600万元)挪威(300万元)瑞典(200万元)。
五、铅:加拿大(700万元)美国(500万元)印度(400万元)。
六、铜:美国(3,600万元)。
七、锡:海峡殖民地(1,000万元)中国本部(300万元)
八、亚铅:加拿大(300万元)澳洲(300万元)美国(200万元)。

再次,肥料及化学工业原料的供给地,除了满洲而外就是美洲、德国、英国及其殖民地。兹就最近的输入国及其数额列表于下:

1935年化学原料供给地一览表

一、硫安:德国(1,300万元)满洲(600万元)。
二、硫曹:美国(500万元)智利(也500万元)。
三、曹达类:英国(300万元)东非(100万元)。
四、磷矿石:埃及(600万元)美国(500万元)海峡殖民地(150万元)。
五、合成染料:德国(600万元)瑞士(200万元)美国(100万元)。

最后,几种杂类原料资源的供给地,大部分集中于南洋及美洲,也列其一一览表如下:

一、生橡皮：海峡殖民地(2,400 万元)荷领印度(1,200 万元)法领印度(200 万元)。
二、皮革牛脂：中国本部(900 万元)美国(700 万元)印度(300 万元)澳洲(300 万元)。
三、木材：美国(2,800 万元)加拿大(800 万元)菲律宾(500 万元)英领婆罗洲及荷领印度(各 200 万元)。
四、制纸木浆：美国(2,300 万元)斯干抵那维亚(2,100 万元)加拿大(600 万元)。

(注)本节所录用数目皆据上引《Economist》同期。

## 六、日本原料政策的动向

日本原料的外国供给地自大体上说，可得三大集团：其一是美国及其势力圈；其二是英国及其殖民地；其三是中国本部及满洲。日本大部分原料皆仰赖这三个集团供给的，本国的生产只限于少数的种类和不够自给自足的数量。这种情形无论自平时的工业生产说，仰自战时的军需生产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奔忙于战时经济体制的建设，现政府，集中精力于所谓“原料国策”的树立，也是当然的。原料国策的树立固然不是自今日始的，但是现政府逼于内外的情势正在企图树立一个周密的原料国策。这种国策现在已可大略窥其动向了。

日本的原料国策可以从两方面来检讨，一方面是国内原料的增产。另一方面是国外资源的开拓。从来表现在产业政策上的大多偏于国内原料的增产，但是事实上开拓国

外资源的努力并不下于国内原料的增产。现在先就国内的原料的增产方面加以剖述。

最近日本政府树立的所谓“原料国策”约有四大纲目：(一)燃料国策；(二)铁矿国策；(三)纤维国策及(四)杂类原料国策。日本商工省为着实现这些原料国策，特于昭和十二年度的预算上增加 2,700 万元的新规要求，约占该省全部预算 4,000 万元的四分之三，而这新规要求的金额由原料国策费占去大部分。在上列四大类原料国策之中，日本政府最感逼切而提案较为具体的要算燃料国策。燃料国策的经费预算 6,183 千元，占原料国策的总经费 8,466 千元的大部分。决定设立大燃料局以充当关系燃料问题的最高咨询机关。大燃料局是横断有关系各省的统一组织，由内阁调查局、资源局各长官，各省次官局长及富有学识经验者充构成分子。但是大燃料局还是一个研究机关而已，施行政策的权限不消说依然握于商工省。商工省最近决定的具体案是(一)创设代用燃料事业及(二)强制混用酒精。关于(一)项闻将制定代用燃料事业奖励法，统一燃料研究机关。统一燃料研究机关表现于上述燃料局的设立上。至于代用燃料事业奖励法的内容，主要的是对于石炭液化事业，低温干溜事业及汽油合成事业，生产量达一定量时免除或减少所得税、营业税及营业收益税，同时又给与补助金。关于强制混用酒精之项，闻将制定强制混用法，以混用 20% 的无水酒精为内容。同时施行酒精专卖制度。日本政府并且计划创办官营石炭液事业，以收代用燃料政策的急速

效率。

日本铁产政策尚未成立具体案,属于商工省的经费预算也不过 182,000 元。目的只在促成青森及岩手两县砂铁矿的开发罢了。因为日本国内铁矿资源的缺乏,日本国内增产政策恐怕也只能如此。主要政策是集中于开拓国外资源上的。

纤维政策的国内增产办法,在商工省方面专以化学纤维的技术研究为要目,将以 934,000 元的预算扩充横滨绢业试验所,设立综合的纤维工业试验所,并积极奖励化学纤维的使用。除了商工省的政策以外,尚有农林省的绵羊增殖计划,其羊毛自给设施费预定为 2,601,000 元。这个计划是预定于 10 年间用 2,100 万元增殖绵羊 120 万头。这是为满足平时军部的需要的,完全是军需的目的。此外还奖励民间的绵羊输入,对于每一头输入给与 50 元助成金,预计一年增殖 2 万头。

杂类原料国策,目下只有人造橡皮的制造试验,及大豆的利用两种项目。其预算经费也有 1,167,000 元。

日本国内的原料资源原是十分缺欠,所以它的原料国策的国内增产部分,远不如国外开拓的重要。特别是军需资源几乎完全依赖外国,准战时的日本政府自然要重视这一点。他们绝对不会满足于以上所述的原料国策的。九·一八事变以来常在“非常时”的名义下进行的许多政策皆含有这种意义。此后的方向也很显明。从前面所分析日本外来原料的供给地,就可以推定日本此后开拓国外原料资源

的政策方针。

日本此后对外的原料国策，将不外乎两大原则：（一）独占及开发半殖民地的资源；（二）保持并新拓友邦的资源。上面说过，日本外国原料的三大来源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美国及其势力圈，中国本部及满洲。次要的是德国和荷兰。日本在这情势下为防备战时的封锁，第一步必先以政治的军事的手段企图独占中国及南美的半殖民地的原料资源，第二步以外交的协调的方法企图保持英国殖民地及德国的供给来源。重工业的铁煤及轻工业的棉花将由中国本部及满洲供给。日本最大制铁公司的“日本制铁”的增产五年计划（预定至昭和十六年顷生产日本全国需要的铸物铁百万公吨）中的铁生产已改由满洲供给，决定了所谓“日满制铁业提携案”，确立“日本铁钢一贯作业及满洲铁中心主义”的两大原则（东京朝日 8 月 18 日）。不独是满洲，即如扬子江流域特别是湖北的铁矿，也已成了日本铁矿国策的对象了。日本国内煤产固然不少，但是由满洲输入的数量还是巨大。除了东三省以外，煤埋藏量丰富的热河也在日本的囊中了。山西的煤产及山东的“焦炭”也已摆脱不了日本帝国的魔手了。棉花的第一位供给国虽是美国，但这个来源在战争爆发后是靠不住的。除了用外交的协调的方法保持占第二位的印度棉花的来源以外，就是开拓满洲及华北的棉作事业。据日人的调查，奉天以南的满洲及华北五省皆适于种棉，特别是华北居然是优越的产棉地，将来可保日本棉花来源安全无虑。

日本还可以用移民拓殖的方法,谋获南美及南洋的资源。最近日本拓务省的预算中有南美移民及拓殖事业指导奖励费 321 万元及南洋经济提携方策费 366 万元,也可以说是一半为着这个目的。南洋及南美的石油资源的引诱力也颇不小。

其次,日本将以协调的外交方法取得英国的欢心及德国的合作,保持各种原料的来源。德国化学原料来源的问题,虽较容易对付,但是澳洲的羊毛,英属婆罗洲的石油资源,英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石油,印度的棉花,加拿大的铝、铅、亚铅、乃至海峡殖民地的锡等等就不是本国国内所可以设想的了。日本最近树立的燃料国策固然理想,但自生产原料着想则又不能立刻发展,战时的生产必更不足以供给需要。绵羊增殖计划固然有望,并且可以扩充至满洲和蒙古,但是目前仍须仰赖于澳洲,是不能否认的。满洲及华北的棉作还是未来的希望,目前除了美国之外还须仰给于第二位的印度及第三位的埃及。铝、铅、亚铅及锡等轻金属,也随日本帝国装甲坦克车、汽车及飞机等军事工业的发展而增大其重要性。自工业原料及战略资源之点说,日本帝国几乎可说是依存于大英帝国集团的。英日同盟的复活,近来已不仅是李滋罗斯的单调,日本方面最近的鼓吹不是没有原因的。

此外,北库页的石油资源,马来半岛及荷属印度的锡矿,以及法领新加勒洛尼亚的稀有金属,早为日本帝国垂涎焦虑的对象。“无论怎样退让日本也不能放弃北库页矿

物开采权”，是最近日本政府对付苏联最感棘手的叹声。其他的地方就较易运用它的手腕了。但是最使日本帝国焦思苦虑而难于“打开”的，还是美国。美日的积怨再加以目前日益扩大的在华纠纷，增大了图谋免去国际孤立的日本外交家的苦恼。这个问题就须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来解决了。不过，将在美国方面失去的原料资源，日本必先由中国及南洋等地求得补偿。日本西进政策及南进政策，即自确立原料国策之点说，也有并驾齐驱的必然的趋向。

原载 1937 年 1 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春季号

## 日本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

富于军事性的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了。这次的战争随其规模的扩大而增大了它的危险性，好战的日本军阀却不知道这种危险性的深大，一步步地在促进这种危险性的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固然侵占了我们广大的领土，奴役了我们不少的同胞，但其结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危机的克服丝毫无补，只有加深了各种内在的矛盾罢了。六年来日本财政困难的增大，产业畸形发展的加速，社会生活的极度动摇，固不消说，即如专恃工农的血肉姑以维持的国际收入也会因战争之爆发而破坏无余。侵略战争正在为侵略者挖掘坟墓。

日本的侵略战争必然地会为它带来许多不能克服的危机。其中一般大众社会生活的动摇就是最根本，最危险的危机。现代战争已经带上了大众的性质，必须动员一切的人力和物力以作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要归到动员人力及物力最大的国家。所以一般大众社会生活的安定，几



乎成了战争决胜的根本因素。即如漠视一切客观情势的日本军部也都看重这一因素(详见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小册子《国防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然而日本一般大众生活的动摇却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展适成正比例。

1931年以来,六年间日本全体国民的生活费负担总平均约略增加20%。而下层大众的负担尚不只此数,月收40元未满足日收1元5角以下的人,负担增加33%,月收50元未满足日收2元以下的人,负担增加26%~29%,即月收100元未满足日收3元5角的人,负担也增加了24%。这只是准战争时期的增加率,现在日本军阀已在制造中国全面的抗战,将来日本民众生活负担之增大将不能知其限界。日本大众生活负担之增加表现于物价之暴涨,而物价暴涨的主要原因约有两种,一为国际一般物价高涨的影响,二为国防费的急增,都不是日本目前所能克服的。日本不能提高汇兑就不能阻止国际物价高涨之影响,此后的国防费只有日益增加绝无减少的道理。富力薄弱的日本民众在这种重压之下绝对不能够维持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消说的,日本社会经济也会因此而根本动摇。

根据上述的事实,可知直接影响日本社会经济动摇的根本原因是,财政的膨胀是所谓国防费的增大。日本的陆海军费总额自1931年至本年约略增加了三倍。1931年的陆海军费总额只有47,000余万元,本年度则激增至141,000多万元。因而日本国家岁出的总额也由149,700万元激增至287,200余万元。这个国家支出的膨胀在国家收入薄弱的日

本,每年表现为入不敷出的结果,而专靠“赤字公债”的发行姑以弥缝过来。1937年度一般会计负担的公债(特别会计的部分除外)即已达82,200万元,预想明年度公债的发行额将必增加3亿元,只就一般会计而言,最低限度也必突破11亿元。日本赤字公债这样急速的膨胀,已使日本一般社会无法销纳,自昭和七年(1932年)以来,日本公债销纳力量已告不足,昭和十年度不足之额竟达46,700万元,十一年度更增至72,000万元之巨(据エケノヨケト)。

此后日本财政必随战争之开展而愈发膨胀。预想明年度的岁出总额将达34亿元,其中所谓国防费占17亿元,约占一半。但是华北事变发生以来,所谓华北事件费已由2亿元增至4亿元,增至5亿元,据昨日的消息或将增至20亿元,则明年度的岁出总额达到50亿元是很可能的。至少也将如8月14日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载“战时姿势的明年预算总额将突破40亿元。”这已突破了所谓恶性通货膨胀的防线(即马场财政的所谓“火灾保险费的界限”)40亿元了。日本筹划财政的办法仍只有两途:其一增加租税,其二继续增发公债。其结果皆能愈使一般国民的生活动摇以至濒于危境。日本近年来的国民所得已远不及财政的负担,特别是军事费的负担。若以昭和六年(1931年)为基数100,则岁出总额指数昭和十二年增至195,预想明年度将增至230,军事费昭和十二年增至310,预想明年度更将增至375,而生产总指数昭和十二年不过增至176,消费财生产指数更低,只有162(据《改造》8月号)。若以消费财

生产指数与军事费负担指数相比,昭和十二年度即已相差几及一与二之比。日本一般国民这样纤弱的富力如何负担得起急增不知底止的军费重担呢。筹款的办法依旧须求之于赤字公债的增发,一般社会销纳不了时集中到日本银行手里,充当通币的发行准备量。但增发通币的结果。流通过程上的通币数量大增而增大通货膨胀的危险性,物价之高涨更要突飞猛进,一般社会生活的动摇将不知发展至如何程度,日本要支持一个长久的战争,简直是梦想。

或许日本政府将以调整国际收支及发展产业的政策来克服财政的困难及社会生活的动摇,也未可知。但是到了战争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国际的收支只有愈于日本不利的前途,产业的发展愈趋于畸形化,其结果将愈使财政陷于破产而人民生活更加动摇。日本平时固然专恃“社会倾销”以调剂国际收入,但到日本对外作战时一方面因为中国广大市场之丧失,他方面又因为军需品生产及输入的必要,不但平时的输出额减少,且须由外国作巨量的输入,国际收入将必一落千丈的不利。日本势须输送大批现金以清还贷款,否则将变成外债的奴隶。再如扩大生产增加产量以降低物价,在理论上固然不失为救济社会生活动摇的一策,但是实际上到了战争时期一切生产自然偏向于军火等破坏的生产,而与一般社会生活毫不相干。只看准战时的产业政策已可知其动向,例如兴业银行之优越放款只限于矿业、金属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业、窑业(特别是洋灰)及交通运输几种军需工业,即其证据。日本政府发展

产业奖励生产的结果，将愈牺牲一般大众以增大军需工业资本家的利润罢了。各种军需工业的股份资本虽有急速的增加，但是固定资产则未扩大。这在说明生产的增大及利益的增大，并不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只是资本回转率增加的结果。这不是生产性的增大，而只是劳动强度的增大，榨取率的高度化而已。1931年以来各种军需工业的生产总额增加了数倍，劳工每日生产量的增加率虽达40%~96%，但是工资却无多大的变动，制铁工业每小时工资1931~1935年只由2角7分增至2角9分。有些工业部门倒反跌落，如电气工业，机器制造业自2角7分落至1角7分是个极端的例子（详见《改造》8月号）。专以劳工大众的血肉充满军需工业资本家的腰包，这种生产的扩充绝对不能救济濒危的社会生活，只有增大其危险的程度罢了。

日本财政的困难与社会生活的动摇是步入准战时体制以来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各方面矛盾的集中表现。最近历任的日本内阁都在努力克服这个基本的矛盾。现在的近卫内阁尤其是着重于这一点。所以标榜出财政经济政策的二大目的及三大原则，所谓二大目的就是（一）国防力的扩张及充实，（二）国民生活的安定。为达这二大目的而树立财政经济政策的三大原则：（1）国际收支的适合方策，（2）生产力扩充的具体方策，（3）物资需供的适合方策。然而二大目的根本上就是冲突的对立的，三大原则的实施在准战时期即已不易收效，到战争时期当然更是此路不通了。自日本国际贸易的内容及战时的需要看来，战时日本

的国际贸易只有入超增加的一途，国际收支自然不能适合。生产力扩充之不能救济社会生活，上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即连物资需供的适合方策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安定社会生活，因为战时所加紧的是军需生产而一般大众所需要的是日常的消费财。二者不但风马牛不相关，并且会因战争的特别需要减少普通消费财的生产，增高物价，倒反会陷社会生活于危境。

近卫内阁的准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已到根本改换的时期了。据最近日文报所载消息，已决定随对外战争之发展改换财政预算的编制方针，各种经济政策自然也随之更动，以改成纯战时经济体制。其将影响日本社会经济更陷于危境以至不可收拾，是可拭目以待的。

日本军费与国民生活的矛盾，日本侵略战争与社会经济的对立，不但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简直会导日本帝国主义入于灭亡。日本的侵略战争或许可以多造几个战时暴发户，膨胀军需财阀的财产，但是一般民众只有益发陷于水深火热的悲境，终必觉醒过来，认清他们的真正敌人。现在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监视之下不得不继续极高强度的劳动的日本劳工，到战争扩大的时候，特别是在日本稍受挫折的时候，自然会醒悟过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和利益的，平时蒙受日本政府欺骗愚弄的农民，早即因农村恐慌而濒于破产的农民，也会同样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和利益的。日本农民觉醒之日，就是大多由农民构成的日本军队叛变之日。日本战时社会经济的动摇将必决定日本工农的正确

意识,日本工农的正确意识造成日本前线的溃乱与后方的骚扰,日本帝国主义于是寿终正寝。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其向上期是以侵略战争而起家的,在其向下期也很自然地会以侵略战争而灭亡。“善战者服上刑”实在是古今中外不泯的定理,日本民众总有审判并处刑他们的祸首的一天,头脑清楚的日本民众不难觉醒过来,只不知好战残暴的日本军阀作何感想呢!

原载 1937 年 9 月《时事类编》特刊第 1 期

## 日寇对我侵略战争中的劳动问题

我常说过，日本一般大众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官僚军阀及资本家，是对立的，两者的利益是无法调和的；反之，日本一般大众的利害，倒和被侵略者的我们是一致的，侵略我们的战争愈是进展，日本一般大众的损害也愈增大。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常用改善日本国民生活的假招牌欺骗日本大众，但是事实却比任何无耻的欺骗政策更雄辩。且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全面侵略战争发动以来，日本大众究竟得到了些什么？依照事实的表象看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战争上得到最优越条件的，应该是一般产业工人，特别是军需工业及几种键钥工业的工人，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收获，却只是实质工资的降低，劳动时间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高，因而健康也日益衰退。

### 一、产业工人的争夺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以来，就

很自然地增高各种基础工业(如煤炭业、铁矿业,乃至炼钢制铁业等等)及军需工业的需要程度,各重工业工场的生产力竟不能够适应外界的订买,外界的订买额超过了生产量数倍以上,现在就日本几个巨大重工业公司 1937 年 6 月底结算的情形列表指示如下:

	上半年订货额 (A)(百万元)	半年生产额 (B)(百万元)	(A)对(B) 的倍数(%)
三菱重工业公司	178	33	310
日立制作所	33	33	98
芝浦制作所	22	18	145
池贝铁工所	10	5	200
新潟铁工所	10	7	145
东京瓦斯电气公司	12	6	200
浦贺船渠所	30	10	300
石川岛造船所	25	9	270

(注)据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6月25日所载。

单就上半期订货未付额,即已超过半年可能生产额二倍以上,下半年的订货额若再增加,其需要倍数当更可观。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已自7月8日发动了战端,8月13日更将侵略战争扩大到淞沪,华北及华中也全部牵入战争的范围。日本对我战争范围之扩大,也就在同样程度增加日本基础工业及军需工业的需要,而各种工业生产的增加,也就同时提高了产业工人的需要。于是各种产业的工厂主遂曲尽各种方法搜罗工人,甚至于互相争夺工人。



他们搜罗并争夺工人的方法,约有三种:其一,就是各公司在各报登载广告征求工人。近数月来各大报的所谓“求人广告”栏中,除以前常见的保险外交员、小店员及女招待的广告外,还添上许多种新鲜的“求人”广告,例如日本光学会社、自动车工业会社、东京自动车会社、东京电气会社、东京瓦斯电气会社等等,登报征求的人数在二三千人以上,除了熟练工人而外,即连童工及见习工也都在内。其二,是利用工厂门口,电杆,墙壁,电车等地方招贴募工广告,满街满巷,五花八门,无不光怪陆离。其需要工人的人数,较之报上广告有加无减,种类更为复杂。其三,是由本厂工人以乡亲及朋友等关系,拉拢别个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工头,企图以一人关系拉来一帮工人,这种阴谋横夺的结果,暴露出许多技师或组长带走部下全部工人的收买事情,卑鄙的丑态,实不堪以形容,工厂彼此间也受极大的扰乱。于是,有些大工厂遂不得不彼此协定,禁止此种阴谋的手段。例如川崎、三菱、藤永、幡磨、三井物产、玉造造船、神户制钢及大阪铁工所等大阪神户间的关西七大造船所,共同组织所谓“二日会”,彼此缔结“绅士协定”,约定:“退出加盟公司三个月乃至六个月以内的工人,以不雇用为原则,在职中之工人更不消说了。万一必须雇佣时,也必须先通告对方公司而得其承诺。”又大阪市的住友伸铜,住友制钢,汽车制造,大阪制锁,日本染料,及大阪铁工所等大公司,也组织“二水会”,缔结同样绅士协定。东京方面也有东京铁工机器同业组合在去年9月25日的评议员会上,决定了《关于雇佣工人的协定》,发表声明书,阻止工人的争

夺战。但这更如何反证着工厂方面彼此争夺工人的丑剧，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上，各大工厂明争暗斗的工人争夺战，并没有因为这种绅士协定而停止，工人需要的急增和逼切，更可想见了。

## 二、准战期劳动条件的恶化

照上述的情形看来，日本产业工人在需要的剧增和逼切的情势之下，劳动条件是应当日益改善，工资是要日益增加的，但是事实却不尽然，甚至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日本工业生产的增进，开始于准战时经济体制实施之初，这种工业生产又都集中于军火工业及与有密切关系的重工业部门。兹分准战时期的劳动情形，及战争时期的劳动情形，来加以分析：前者自1931年下半期至1937年上半期，后者由对我发动侵略战争以至现在，现在先来检讨准战时期的劳动情形。

日本帝国主义自从1931年开始占我东四省以来，即更加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应付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他们积极参加备战的结果，扩大了军火工业及重工业的生产至数倍以上。现在拿1931年作为基准年度，1935年重工业的生产指数，增至364，超过三倍半；兵器工业的生产指数更加增至450，超过四倍又半。但是普通轻工业生产，即在所谓“跃进的”生产过程中，也不过增至227，还不到二倍半。详情且阅下表。

## 兵器工业及重工业的发展

	兵器	重工业	轻工业	化学工业
1935年	450	364	227	163
1934年	279	289	183	151
1933年	254	192	157	139
1932年	167	129	115	110
1931年	100	100	100	100

(注)根据去年7月1日号日本 Economist。

兵器工业乃至重工业的生产虽然日益发展,但是产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却日益恶劣化。第一,劳动时间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日益延长;第二,工资总额也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而有多少的增加;第三,工资增加的比率,并不及劳动时间增加的比率。这些事实,若稍加考虑,则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表面工资虽是增加了,但是实质工资却大减少。这种劳动情形的恶劣化,在兵器工业方面尤其是显著。

## 日本全国兵器工业劳动情形的发展

	劳动时间指数	工资指数	每一小时的工资
1935年	437	353	24钱
1934年	265	333	24钱
1933年	262	212	21钱
1932年	190	161	23钱
1931年	100	100	27钱

日本全国最近的劳动情形就是：劳动时间虽是增加了，但是实质工资却由每小时 2 角 7 分钱降到 2 角 4 分钱。这是全国平均的情形，主要地方，更要恶劣。爱知县兵器工业工人每小时的工资由 3 角 1 分钱减至 2 角 2 分钱，而兵器生产甲于日本全国的东京，更为利害，由每一小时 2 角 7 分减至 1 角 9 分。但另一方面，一般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却随军事景气的发展而日益增高。1931 年 ~ 1936 年间日本人民生活费，平均增加 26%，而下层民众的负担更增加至 42%（参阅《时事类编》特刊创刊号拙作）。

### 三、战争爆发以来劳动情形的恶化

日本对我全面侵略战争发动以来，军需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更加总动员起来，对于工人需要的急增及迫切已如上述，而各工厂所采用的方法，第一就是延长劳动时间，第二就是募集临时工人，第三就是促成承揽工场。结果造成不熟练工人的雇用，现有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在工人外拉工人，在劳动时间上加时间。这于工人是多么优越的条件，论理工人是要多赚钱的。表面上工人也是赚钱的，因为工资外加工资，至少在表面上是的确的事实。

但是事实却又未必尽然。这里有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的魔术在作用。普通重工业的工资制度，约有二大种类：其一为定额工资制，其二为论件工资制。定额工资普通是依时间计算的，也就是论件工资制的基准，但其绝对额非常之

低。在论件工资制中,有个人承揽办法和团体承揽办法,还有单价承揽和全额承揽等等,真是千差万别,极其复杂。此外,又加上按时加钱办法,奖励加钱办法,及罚金办法等等参杂在一起。这些工资计算法,在工厂方面称为科学的工资计算制度,是所谓合理主义的魔法之一,但在工人是绝对不能理解的,结果只有全凭工厂的会计课去决定。定额工资原来是有一定标准的,劳动时间无论怎样延长,总是不能超过这个标准,到某限度以上时,论时工资额就须减低。论时工资的减低,也就很自然地影响论件工资额。对于承揽工场的付价自然也就低落,于是工资是全面减少的,不管名目的工资有多少的增加,而实质工资则反大减,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日本工人的劳动状态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愈益恶劣化,即连平时法律所保障的条件,也完全丧失了效力。煤矿资本家曾向矿山监督局陈请缓和深夜工作的禁令,撤废矿内劳动十小时的限制,缓和矿夫的保护条件,允许未满十六岁的童工人矿工作,允许妇人入矿工作。这种陈请虽然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政府在他方面却于卢沟桥事变过后颁发命令,缓和军需工场的工人保护条件,例如废除星期休息日。根据这个命令实施的,自7月15日以后一个月间即已有53件以上,其中,机器工业40件,化学工业6件,其他7件。截至最近,件数当在100件以上。此外乘着政府的缓和和意志而违反“工场法”的件数,也大增加。军火资本家常利用军需品的紧急必要而发挥利己主义。资本家所知

道的只是高率的利润。于是日本工人在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乃至工人保护条件缓和的情形下,最大的收获就是健康日益损坏。于是日本内务省社会局遂于11月间颁布政府保护劳动方针于全国府县,其旨趣是:“际兹事变,对于军需品工场,为着维持劳动力,增进生产率,增加生产力并图其持久,须努力于抑制过长的劳动时间,防止产业灾害保持劳动者的健康。”这正反证日本各工厂如何压榨工业工人的实情。

#### 四、惨苦的临时工制度

近年来日本劳工在积极备战的情形下最感受惨苦的,就是临时工制度;而这种惨苦自入战时阶段以来,更为加剧。

临时工制度是日本工厂主逃避损失,转嫁亏损最好的雇佣制度,同时也就是降低全体劳动条件,使其迫近奴隶生活线的好方法。第一,临时工制度可以因为临时的自由劳动工人寻求工作的竞争,而极度降低工资;第二,工厂主可以随时解雇旧工人,雇用新工人,以避免工资递增的负担;第三,工厂主可以在解雇时省却解雇津贴的负担;第四,工厂主还可以利用工资计算法,早上工,迟退场的劳动办法,加重榨取劳工;第五,工厂主可以避免工人有组织的进攻和交涉;第六,同时避免国家保护劳工法律的监督,例如工场法,健康保险法,及灾害补偿法等等法律的适用。而在工人方面,除却工厂主直接的压迫和榨取以外,还要加上

包工工头的中间剥削（普通临时工都是经由工头包揽的），所得的工资少而付出的劳力大，即连恒常工作也都没有保障，所忍受的劳动条件，可以说极尽现代劳动制度的惨苦。

日本工业界一方面因为经济恐慌的不断的袭击，他方面又因为军需景气的需要，所以广大地采用临时工制度，以避免亏损而保障高率利润，自从 1932 年顷以降，临时工制度或所谓“人夫雇用制度”即已普遍通行于各工厂。这并且不独限于民营工厂，即在官营工厂也是通行的。据加藤勤十的估计，采用“人夫制度”的民营工厂，当在 800 多处，临时工人数达 90,000 多人，若加算官营工厂的临时工人数，总数当在 30 多万人（据《统一战线的展望》）。临时工人大多集中到军需工业及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临时工人在固定工人的比重，更为惊人。兹举几家民营重工业公司为例：

	固定工人数(人)	临时工人数(人)
住友伸铜钢管公司	880	778
东京瓦斯电气公司	1,547	1,305
日本车辆制造公司	1,369	1,420
火车制造公司	843	1,382
广岛日本钢管公司	653	1,640
大阪机器工作所	427	1,130

（注）据加藤勤十上引同书 13~14 页。

临时工人数竟与固定工人数并驾齐驱，有时甚至超过固定工人数数倍以上。日本临时工制度正和陆军当局逼令

兵工厂工人宣誓退出工会，脱离无产者统一阵线的办法，是夹劈一般工人的两把大斧头。日本官僚托拉斯资本的手段的惨酷，并不在个人独占资本之下。

原载 1938 年 3 月《世界知识》第 7 卷第 7 期



## 日本侵略战争中工业危机的发展

作者小引拙著《日本工业的危机》(文教馆去年9月版)承国际宣传委员会译成英文拟案国外扩大宣传因而要求我补述中日大战爆发后日本工业危机的发展本文即为应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要求而作,读本文更可知日本工业的脆弱性和各国对日经济制裁的效果增强我们国际宣传的努力。

日本工业经济的三种特殊危机,(详见拙著《日本工业危机》),到了对外侵略战争爆发的时候更将加深。关于原料资源之项,不但敌国及敌国的友邦封锁来源,即中立国也因拥护正义、和平,及不信用日本商人而停止供给。关于市场三项,也必因为日本国内外的原因而销路大减特减,甚至有些国外市场完全崩溃。到了战争时期,劳动者生活状态之更加恶化,也是无庸讳言的。日本工业的这些危机在中日大战中已经完全暴露无余了。实际上暴露出来的危机比平时所规定的,更加复杂、更加深刻。如果分成项目来讲,至少有以下几点。

## 一、输出激减引起的危机

战争对于日本工业的第一种影响，首推外国市场的全部丧失或大部分丧失。据苏联《新闻报》10月10日所引用《中外贸易新闻报》的消息，“在华北事变的影响之下，7月份日本对华的输出比6月份减少了20%，而8月份则完全停顿了。日本在上海的纺织工业因为契约的取消及贸易的停止，只8月份一个月损失即达5,000万日金，因为军事行动而预定输到中国去的价值3,600万日金的日本商品，重行运回日本。”

战争对于日本输出的影响还不仅以中国一国市场为限。在中国行商所采用的抵制及海运困难的影响之下，日本输到太平洋南部诸国的商品也减少了。例如日本输到暹罗的商品在这个时期也减少了60%，菲律宾减少了10%，荷领印度也减少了10%（据《中外贸易新闻报》9月2日）。又据《中央日报》9月24日所载，开战后不久，日本对荷印、暹罗、菲律宾、安南及马义半岛的货运减少了62.2%。在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内，日本和太平洋南部诸国所签订的商约被取消的达52%。日本对英领印度的输出也是大减的（据上引《苏联新闻报》）。

这个输出激减和输入相对增加的两重原因，在日本国民经济上造成一种严重的事实，就是异常的人超。依据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统计，1933年输出入的差额，是人超

8,540 万余日元,1934、35 及 36 年的人超每年平均也不过 1 亿余日元。而 1937 年的人超额竟达 64,801 万日元之巨。日本因为战争的影响而致去年一年的人超竟超过了过去四年间的人超总额一倍以上,而为战争前一年人超额的五倍(据中宣部所刊行《敌情研究资料》第 1 辑)。日本这种因为输出激减而引起的人超之增长,即至今年春季还在继续。据路透社东京电,本年 1 月份日本的输入总额为 20,895 万日元,输出总额为 17,227 万日元。去年同期间的输入总额则为 31,993 万日元,输出总额为 20,849 万日元。又据最近的消息,本年为首三个月间日本对外贸易仍有 6,000 余万日元的人超,输入固然减少,输出更加锐减,去年的输出入总额当为 50 余亿日元,每月平均在 4 亿日元左右,而今年三个月输出入则不过 6 亿日元(据《时事月报》18 卷 8 期 129 页)。这不但是日本输出入贸易全部呈现衰落状态,输出额数之激减尤为日本工业界的大病,按这情形看来,日本本年输出额的减少将较去年为钜,我们要注意每年下半期才是日本的输出时期,所以本年输出的减少当在上述 1 月份的标准以上,是可断言的。

我们分析日本输出额减少的事实,必须注意到四种的原因。第一,各国人士因为同情中国而排斥日货;第二,各国商人因为不信任日本商人而停止订货;第三,各国工人因反对日本侵略战争而拒运日货;第四,因为日货价格绝对地,或相对地涨价,而转用别国商品。这四种原因又随着我们全面抗战的进展而愈加发挥它们的作用。例如世界援

华反日的情势是在日益开展着，自从“国际反侵略和平大会”广大地发动援华反日运动以来，排斥日货的风声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普遍潮流。此后日货在世界市场上更要碰壁，是不消说的。

因为日本工业原料依存于外国市场的原故，而输出的激减，自然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工业生产。据《社会运动促进报》9月17日的记载，日本许多县份已经完全停止或极度减缩为着输出的企业生产。例如新潟(Nibigata)县因为对华输出的减少而有二百个以上的人造丝工厂完全停止了生产。又据《读卖新闻》(Yomiurishinbun)的消息，盐釜(Liogama)地方的许多纺织公司宣布破产。日本纺织业联合会于9月8日宣布本年冬季纺织工厂中没有动用的机器达27.5%。日本工业生产的减缩，不独限于为外国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即日本本国消费品的制造工业也受其波及。例如京都(Kioto)丝的棉制造厂，从8月份起生产减少了20%。同时，日本国内市场的商品流转率也降落了。如8月17日《中外贸易新闻》所传，在战事开始的为首半个月内，大百货公司的流转率减少了8%。此外，日本在华的企业受到打击尤为严重。只上海一地直接的损失估计即在1亿日元以上，青岛的直损失更在5亿日元以上，日本对外的资本市场几乎丧失殆尽。

带着世界经济新恐慌之序幕性质的美国经济恐慌，又已于去年秋冬之交开始了。此后日本许多种一向大量输往美国的特殊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罐头、玩具、帽子，将更失

去绝大部分的销场。这不但影响日本这几种特殊商品的工业生产,日本许多专靠这些种生产来维持其经济的存在的农村,及所谓“澳村”、“山村”也要掀起绝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 二、原料问题引起的危机

战时工业原料的来源问题,是日本工业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日本和平的及军需的原料,都是依赖外国供给的。棉花来自美国、印度、埃及及我国。羊毛的绝大部分仰给于澳洲,其次为纽西兰、南非及南美。重要军需工业原料的金属及油类的来源,亚洲占着最重要的地位,中国本部,东三省,婆罗洲、印度、海峡殖民地及苏联的北库页,都是主要的供给地。特别是铁和煤几乎全部仰给于中国,煤油则依赖美国、苏联及荷兰的属地。此外如铝、铅、铜、锡、亚铅及化学原料的硫安、硫曹、曹达类、磷矿石、合成染料。乃至杂类原料的生橡皮,皮革牛脂,甚至制用的木浆等等的供给地,不是中国就是英美荷等及其殖民地。其中,加拿大尤为日本军需原料的仓库,1936年产铝供给日本71%,产铜79%,去年1月至9月间铜供给量比前年同期增加七倍,铁增加四倍,线增加两倍(据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加拿大代表在2月12日援华反日大会上的报告)。平时供给原料给日本的国家,不是它的敌人就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国家。所以自从日本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这些国家几乎皆在有计划地推行封锁

资源的供给，不但各国主持正义的人士极力主张封锁资源，各国工人更是出於实际的行动，严拒搬运原料供给日本。莫斯科的《消息报》论及目前日本国民经济的时候，特别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所有资源趋于枯竭”之点（据塔斯社莫斯科 2 月 11 日电），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

日本军需工业原料随着战争的扩大而对外的依赖性大增，其危机也更加深。日本帝国主义虽说在战前即有相当数量的储藏，战争爆发后不久又即施行贸易统制及外汇分配制度，来保证军需工业原料的供给。但因战争已经延长了九个月，何时战争始能结束，即令侵略者也都没有把握，所以原料完全用尽是很有可能的。其中最感为难的就是煤油。日本煤油消费量在平时是每年 350 万吨，对华战争已使煤油的需要额增加到四五百万吨以上。其本国的生产至多不过 33 万吨，页岩提炼及煤炭液体化等人造方法也只能增产十多万吨，所以每年日本本国的产油量只够供战时消费量百分之五至十。日本陆海军方面虽有巨量的屯储，民间煤油商也以前年以来的严令而有相当的储存，但充其量也只够六个月至八个月之用。日本现在已经大感煤油缺乏的威胁；对于汽油的使用已严加统制了。汽油之出售须经特别许可，私人汽车每日用油至多不能超过两加仑，煤油由一城运到一城，须有特别许可证。据东京 5 月 2 日路透社电，5 月 1 日起，更将实行汽油购票制。其次，钢铁也同样感到缺乏。最近日本图谋开采菲律宾铁矿为奎松总统拒绝后，又在“尽量收买私人所有菲岛各矿所产的生

铁，是见日本需要生铁之急逼”(据1月22日马尾刺合众社电)。据中央社澳洲柏斯5月3日合众社电，“日本因为生铁不足，一切工业计划均无法实施，现已与澳洲矿商商妥，在澳洲采取生铁100万吨，其办法是由日本出资开采古兰岛铁矿”，但是开采问题还多，尚不许乐观。又日本最近购买铜货已达3万吨，使世界上跌落铜价突然上涨(据1月24日伦敦塔斯社电)。这种情势终于逼使近卫内阁急忙起草充实全国资源的四年计划；首相强调极力节省军需原料的主张(在七十三届日本议会演说)，并劝人民节省消费(近卫对人民宣言)。最近，日苏冲突的尖锐化将更使日本在库页岛北部各矿的开采更加困难。

其次，日本和平制品原料也感缺乏，这更是由于日本政府为保障军火及军火原料采用输入统制政策所致。去年10月间禁止入口的原料及产品即有260多种，棉花、羊毛及木料等原料也在被限制之列。上述新潟等县许多纺织工厂之倒闭，就是受到原料来源的限制。据统计，商业方面有2,000万元的工程全因铜铁的缺乏而陷于停顿，酒厂、砖窑、大百货公司、酒店及旅馆的改建及扩张也受了限制。现在，日本各大百货公司的华丽包装纸也因木浆原料之来源困难而停止使用了(据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生的报告)，如果各国停止供给原料与日本则不但日本工业危机完全暴露，即破坏世界和平的对华侵略战争也必立刻停止。特别是加拿大一国关系最大。据国际和平运动大会援华反日会加拿大代表麦克雷沃德的报告，“加拿大所产的军需原料，几乎全部供给日本使用，加拿大

实乃日本的兵工厂”(2月13日各报所载)。

### 三、劳动力问题引起的危机

日本劳动力问题到了战时更加复杂化。第一,许多工场的劳工被调入伍输往中国作战,有些工场难免发生劳力新分配的问题。第二,劳工全体分配的纷乱。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工业有些部分如纺织工业是停顿或减缩的,而有些部门如金属工业、机器工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军需工业,却是扩充的。结果,一方面产生许多的失业工人,另一方面又在需要大批的新劳工。但这两方面的需供,又因为技术与熟练的关系不能够调和。第三,因为日本进步劳工的反对侵略战争,而许多工厂也大起恐慌。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大阪各大工场即已发现过反战的传单、标语。神户海员工会10月间即已酝酿罢工表示反战(据中央日报)。据东京朝日新闻所载,新潟近郊的丸新制油所突被工人纵火焚毁,损失达一百多万元。最近日本劳工的骚动更加扩大。据大阪1月9日电,大阪海军船坞工人三百人在进坞后,即集会停止工作。当管工的趋前诘问时,各工人即以反战的传单向他掷去。其中还有一部分工人毁坏锅炉,高呼罢工,与到场弹压的警察发生冲突,又据上引鹿地先生在武汉十一团体欢迎大会上的报告,2月间他得其本国朋友的消息,川崎和千住的士兵叛乱了,川崎一带是日本最大的重工业心脏部,是日本革命劳动运动的摇篮地。“他们出征



兵士才是手握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者的心脏的劳动大众”（鹿地之言），第四，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事的及经济的原因加深日本一般劳工的生活状况的恶劣。直接间接影响于工业生产。日本劳工生活在作战时期即受到物价高涨的影响。日本自1931年侵华战争发动后，至1935年止，即已增加一般工人生活费负担34%（据拙作《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所引用日本 Economist 所载指数——《时事类编》特刊创刊号）。中日大战爆发以来，日本物价更加高涨。据“日本银行”调查，日本最近的物价指数如下逐月高涨：1937年7月172.4；8月173.9；9月177.6；10月179.2；11月179.9；12月182.4；今年1月又涨至184.6。若和1937年1月的169.8及1936年1月的156.8比较，其高涨更为显著。日本物价的高涨不但更使日本工人的生活恶化，且足以增长劳工的反战运动。相反的，日本工资却日益低减，不但实质上减低，即定额工资也减少。1934年为82.9，1937年1月即降为81.5（据日本 Economist 去年6月1日期27页）。最近在日本政府总动员令之下，在“节省消费，……期望一般国民经济生活与战时财政协力”（中日大战后不久日本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口号）的要求之下，日本劳工生活自然只有日益低下的前途。第五，中日大战爆发后，日本劳工的劳动条件也自然要日益低下。日本侵略主义者对华作战九个月，愈发陷入泥泞，随中日大战的扩大，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需要的军队也日益增加。现在日本征调到中国来的军队已达五六十万人，此后是更要增

加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影响日本工场缺欠工人（自然是偏于与军需工业有关的方面），而使厂主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厂主更可以借口于所谓“非常时候”而加紧工人的压榨。这不但影响工人工作的质量，并且增长工人反战捣毁工厂及怠工罢工。近来日本反对侵略运动已由前进的智识分子的领导深入工人群，去年12月中旬，日本政府大逮捕四百人当中，工人领袖占大多数。即自中日大战爆发后劳资纠纷的案件说，即已发生了1,455起，参加工人的数目达18万以上，造成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的新纪录，这对于日本工业生产是多大的影响，自不消说。

#### 四、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危机

除了上述三大原因之外，还有几种原因也足以危害日本的工业生产，例如物价高涨直接影响的问题，资本缺乏的问题，关税加重的问题，畸形发展压迫中小工业的问题，都是战时日本工业的严重问题。

“物价的高涨”不但如上所述影响工人生活，因又间接影响工业生产，并且直接影响商品的国内外的销路。物价尽管高涨，而一般人民的收入不增加时，一般人民的购买力大减，因而工业产品的国内销路缩小，工业生产自然大受影响，另一方面，日本物价尽管自己高涨，而世界物价没有价涨甚至跌价时，日本商品的输出即无各国为正义排斥，日货也要减少。以1913年1月为准，则日本物价自去

年7月的128.9涨至今年1月的138.7(据日本《东洋经济新报》),而英国在同期则由127.0跌至117.3(据The Economist),美国更由118.3跌至96.6(Bradstreet)。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商品是不能和国际商品竞争的,其输出之激减更是当然的归宿,因为物价高涨有减低国内外销路的作用,所以无论是供给本国消费的工业生产,抑或专为输出的工业生产,都如上述缩小的缩小,停顿的停顿了。而日本物价因为《赤字公债》的滥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增长,是更要高涨的。

其次,日本资金自中日大战爆发以来即大困感,上述赤字公债的滥发,不但提高物价,并且吸收游资而使工业生产感到资本的周转困难。据日本大藏省的发表,截至1937年年底止,日本公债总额共达1,189,300万日元。日本第七十三届议会又已通过了包括287,000万日元的普通政费及485,000万日元的对华特别军费的空前的巨额预算,则此后公债的增发是必然的。公债的增发和私人资本的国家统制已使日本资本感到极度的缺乏,据捷克《布拉格报》的东京通讯,只在开战后一个月内,日本银行的存款即便猛减8,000万元。此后,在总动员之下,日本增发的公债必将向各银行,各保险公司及各生产公司摊派更将影响工业生产萎缩。本届议会又通过华北开发会社的法定资本35,000万元及华中“振兴会社”的资本15,000万元,此后日本资金之外流,也是必然的。日本实业家曾向美国交涉信用借款美金5,000元及9,000万元棉花借款,“满铁会社”急激向瑞士接

洽借款,这些都是日本资金缺欠暴露。

再次日本增税的种类随战争的进展而增加。最近第七十三届议会又通过了多种增税案。就专门委员会初次审查财政法案的规定如下：“所得税及其他汽油、糖、茶、咖啡、酒各种税率俱较前增高，至于珠宝及专卖奢侈品之商人，则必须缴纳特别税。日本国内每一纳税人，建造新屋时，其建筑费若超过 10,000 日元，也须缴纳特别税，即如看戏娱乐，亦须纳娱乐捐，同时个人收入，营业收入银行存款，股票赢利及企业资本，也将于明年度起加税（据 2 月 27 日东京路透电）。这样繁杂的增税直接间接皆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很大。

再次，日本工业的畸形发展，素来即为日本工业界极大的危机。其详细的情形已于上引拙作第二章述过。而这种危机性在战时更加增大。日本政府战时一切的措施，都在有意中或无意中，直接或间接以中小工业为牺牲而保全大工业的生产以和平工业为牺牲而增高军需工业的利益。例如制丝工业之崩溃因是由于美国市场之丧失，而纺纱工业及毛织工业的萎缩，特别又受政府限制原料之赐。和平工业的原料输入，不是被限制着，就被课高率关税。政友会议员，小笠原攻击日本政府的财政经济法案说：“……官僚派的国家统制主义者，专以保护大资本家的利益为任务，致使中小商家及中小工业家目前均被逼陷于困难中”，他并主张：“政府不得借取缔消费而以压力施于中小工业”（据 2 月 24 日中央社香港电）。

日本政府又于第七十三届议会通过了全国总动员法案,电器事业国营法案及许多种的增税案,日本工业生产要更加受到全面的打击,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固然,日本军阀政府也曾想尽所有的花样,掠夺天津及秦皇岛的海关,并擅改税率,以开拓日货增加输出的前途,但在中国社会因为全面抗战而未得宁静以前,日货在华的商场是无法恢复的。日本强盗又在加剧它的走私行为,在上海海关方面也在强攫夺支配权,但是无论如何是不会有有效的。日本强盗又在企图开发华北及华中以补救资源缺乏及被封锁的危险。但在我们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以及在华北及华中各地的游击队及别动队机巧扰乱破坏的情形下,日本的一切办法都不会发生效果,日本工业生产的危机只有一天天地加深罢了。我们还相信:各国政府及人民为正义公理而加日本以经济的制裁,必能发生效力,美国议员毕德门说得好:“世界各国停止与日本商务关系,不需一兵一卒即可使日本就范,”实在不是过大的夸张。又如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加拿大代表麦克雷沃德在援华反日大会上所言,“日本若无加拿大接济它以军用原料。则无法开始侵略,且亦无法继续侵略,”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理名言。

原载 1938年6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2卷第2期

## 美国新经济恐慌对于日本的影响

终必到来的事象，总是要到来的。在危机性的恐慌后安定几年的世界经济，并不能够永久安定，更不能够继续向上好转。在全面的世界经济恐慌还没有全部恢复常态的时候，次期的全面世界大恐慌，又在世界黄金国的美国展开它的序幕了。我们不能忽视美国这次经济恐慌的世界的意义；我们更不能够忽视美国经济恐慌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

现在先就美国这次经济恐慌的概况来解剖一下。

美国这次的经济恐慌，在去年3月底，即已一度有过警报，到了9月以后才算进到了正当的恐慌的阶段。去年3月底美国的股票和商品的价格，即已发生过一次相当强烈的跌落。不过，当时一般人皆看做以前半年以上的暴涨的下跌，是一种必然的反动，毫不在意。所以生产活动依然是活泼的，股票也于夏间反涨起来。但是到了秋冬之交，经济恐慌的袭击突然随着紧急警报而来到了。这次美国的经济恐慌，确有几种值得注意的征象，其转变的角度，甚至超

过上次的恐慌。

第一种征象是生产活动的急速萎缩，其速度比较1929年还来得快些。据《分析》杂志的调查，去年9月至12月之间，美国的事业活动减少了27%；据联邦准备局的调查，工业生产的指数减少34%。美国主要工业的钢铁生产额，8月间是488万吨，12月间已减到142万吨；作业率更由83.8%减到25.4%，12月最激烈的时候是19%。汽车的批发减46%，零售更激减了一半。大众消费品的生产的萎缩，也相当厉害。只就12月说，即比上年同期有如下的减少：棉花的工场消费量减38%，羊毛消费量减64%，生丝消费量减49%，人造丝减74%，皮鞋生产额减46%（均据日本《中央公论》4月号所列数字）。

第二种征象是破产与失业的激增。工业生产及事业活动的萎缩，必然地产生大批的破产者及多数失业工人。今年1月份的破产件数，达1,320件之多，比去年同期增加510件；其债务额达1,500万元美金，比去年同期增加700万元美金，约增一倍以上。失业工人在去年9月至12月之间已增加了293万人，到今年1月间总数增加到1,400多万人（据4月30日《新华日报》所引《纽约工人日报》）。现在每周三日工作的办法普遍于全国，大多数未失业的工人也已是半失业者了，即未失业的工人的收入，也减少了20%以上。

第三种征象是股票和物价的跌落。素来股票行市的感受性最锐敏，所以跌落也相当厉害。去年3月间美国股票

指数是 194,到 11 月上旬竟跌到 125。按去年 10 月 25 日的价格计算,股票所有者因为行市暴跌所招致的财产损失,在 250 万金元,约等于美国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一。批发物价去年自春间到年底跌 24%。又,其 15 种主要商品的价格跌落了 30%。

第四种征象是贸易的衰退和存货的过剩,对外贸易的衰退是经济恐慌爆发的一因,同时也影响仓库的存货增加。据《国联统计月报》的数字,今年 1 月份国际贸易总额,比去年 12 月份减少了 11.3%。去年 5 月至 8 月之间,美国的存货指数由 99 增至 114 (以 1923~1925 年平均为基数)。恐慌爆发后,各业的定货额更加减少;特别是原料的存量随生产之萎缩而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五。

日本经济素来和美国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兴衰,直接影响日本经济,自必非常深刻而广泛。现在试就可能发生的影响,剖述于下:

### 一、日本对美贸易更加恶化

日本经济界近年来受到对美贸易恶化的影响很大,特别自我们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其恶劣的影响更加增大。其主要的症结,即在于输出减少而输入比例的增加。若按之过去的情形来推测将来,则日本对美贸易,此后的打击必有非常的增加。日本输出美国的主要商品是生丝、丝织品、罐头、帽子和玩具,都是消费品,当然第一步要受美国一般



购买力减低的影响，特别是奢侈品的生丝及丝织物等商品。生丝是日本最主要输出品之一。曾经占过日本输出品的王座，输出额最多的年度达 87,700 万元。其输出的绝大部分，则又是在美国。就最近几年情形看来，输出美国的成分，自 83.7% 至 96.6%，其重要性可知。但是此后美国一般大众购买力的减低，首先就要夺去日本生丝的销路。最近每年输向美国的 33,000 多万元（据日本大藏省发表昭和十年度）的日本生丝，当必减去大部分。此外如日本特殊输出品的罐头（每年输出美国约五六千万元），玩具（约 1,000 多万元），及帽子（约 350 多万元）的输出额，也必大减。反之，日本由美国输入的商品，则为必需品，特别是军需品，主要的有铁、钢、机器、汽车、铅、铜、皮革及棉花等类。日本每年由美国输入总额在 8 亿元以上，而输出则只有 5 亿多元，常年即已有 3 亿多元的入超（据大藏省统计）。此后这些入超额必将激增而使日本沦于国际的债奴地位。

## 二、日本对外的汇价将更跌落

日本近年来对外汇率是在一直跌落下来。对英镑的汇率由 1921 年的 2.05 先令跌至 1936 年的 1.02 先令。即就对美金的汇率言，也由 1921 年的 48.022 美元（一百元日金为单位）跌至 1934 年的 29.714 美元，再跌至 1936 年的 28.896 美元。在平时日金对外汇率的降低，被日本对外贸易业者利用做增高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输出的最有效的手段。但

在战时这种手段不但因为作战国消费品生产的停顿而失去作用,并且徒然减低了货币对外的信用。这就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政府拼命维持对外汇率(欲使汇率固定于一先令二便士)的主要原因。但是汇率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除了输送现金之外,就必须增加输出,或借外债。输送现金在日本现势之下是不能办到的。告借外债也非常困难。有力量借款给日本的,只有英、美、法等国家,而其法西弟兄的德意则自顾不暇。英法因为利害关系,不会借款给日本,前者不愿意日本独吞中国,后者反对日本的侵略。在美国本年1月间曾有过传说,说摩根将借款5,000万美金给日本,但美国人民反对的声浪很高。据说,最近日本又向美国政府交涉9,000万美金的棉花借款,但也将因为日本本国棉业的停顿和转卖的不可能而不能实现。最后一法的增加输出,则将因美国经济恐慌的发展而绝望。此后日本对美贸易只有入超日益增加,而日本对外汇率也将随之降落。因为对美输出额减少,世界金融市场上对日汇票的需要更加减少,日本在外抵账的资金也更加减少,日本外汇不能维持现状,当必继续跌落。

### 三、日本国内物价之继续高涨

日本既不能增加输出或借外款以抵偿入超,在外所设的外汇准备金又在前年初即已用完,则自必输送现金以维持其国际的信用。最近日本输送国外的现金,据各方估计,当

在 6 亿元以上。日本银行的金准备原有 52,000 万元,后为增加其效用而提高估价,现在变成 15 亿多元,其中一半用作外汇平衡基金。此外又限制金用途,奖励产金,搜刮国内及东四省的现金,每年可得 2 亿元。但若此后输出美国的 5 亿多元的总额,或至少 33,000 多万元的生丝输出额,因为美国经济恐慌而减去大半,则将更需要外汇平衡基金,需要输送更多的现金到外国去。其结果,日本银行的金准备额必大减少,而其发行的纸币的准备率也将大减,直接影响到货币价格的跌落,间接为提高物价。日本物价已自去年 7 月的 128.9(大正二年一月为基数)涨至本年 1 月的 138.7。此后日本物价将因币值的无限跌落而继续增高。相反的,英美的物价却在跌落,英国物价自去年 7 月的 127.7 跌至本年 1 月的 117.3(据《The Economist》),美国物价在同期间也由 118.3 跌至 96.6。所以日本物价的高涨,适足以减低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输出,因而反过来影响外汇低落。日本对外的信用将随这样交互的影响而步入崩溃的途程。

#### 四、对于日本国民经济的影响

日本资本主义虽然有了高度的发展,但其工业生产的中心,依然在于轻工业。例如纺织工业,在美国工业构成上只占 14.1%。而在日本则占至 37.2%。其中特别是制丝工业,在占全体工业将近一半的比重的纤维工业中,占很大的比重,工场数在纤维工业总数 22,194 家中占 3,365 家,

工人数在总数 938.6 千人之中占 311.2 千人，生产额在总额 3,017 百万元中占 510 百万元。而这些制丝工业，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为美国人而活动的（日本每年生丝产量，只有 20% 左右，归自己消费，所余部分皆输出外国，绝大部分输出美国）；如果因为美国经济恐慌而减去大部分的销路，则日本帝国主义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将必崩溃主要的一角。此外如大量输出美国的丝织品工业，罐头工业，制帽工业及玩具工业，也都是日本的主要工业；单就包括罐头工业的食品工业看，即占总工业构成 16.2%，这些工业将因美国的经济恐慌而受打击，也是当然的。（以上据有泽广己的《世界经济统计图表》及日本商工省的《工场统计表》）大部分制品销售于美国的这些工业，还有一种特质，就是所用原料都是日本自供，其影响的严重，在原料来自外国的工业以上。再自工业利润上看，制丝工业的重要性更大，其所雇用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女工，在总数 311,200 人之中，占 288,200 人（据三菱经济研究所编《日本产业与贸易的发展》239 页）。日本资本主义原即对于一般的工人施行半奴隶的榨取，而对于女工的压榨，又加倍于男工，其利润率之高，正如萨法洛夫所引用欧脱莱女士的话：“投于妓院的资本和投于纺织工业的资本，从那一方面的统计看来，在日本诸条件之下，都是得着最高的利润（Lancashire and Far East）。”这句话特别可以应用在制丝工业及养蚕业上。如果美国因为经济恐慌而停止大部生丝及丝织品的购买，则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实不独限于对外贸易，而专在女

工身上找利润的日本资本家,更将陷入泥泞之中。

## 五、影响日本农村经济的崩溃

日本生丝工业的停顿,不但是工业经济的问题,同时也是农村经济的问题。这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第一,日本农家专靠养蚕为主要副业,以补贴农业经营费的,为数约有 200 多万户(约占农家总户数 550 多万户的半数——据《日本农业年鉴》),桑园面积 623 千町步,产蚕额在 20380 多万元。在日本农家养蚕是仅次于米作的主要产业。在米作费用增高的近年,日本农家专靠养蚕的收入来补偿。第二,日本农家素来即依靠女儿们入工场做半典卖的劳动,姑以维持重重压榨的农业经营。有人把这种事实美化,说:日本女工的劳动,是为着自己的嫁妆。但是他们忘却了:日本女工之取工钱,不是在初入工场的时候预支,就是在其父兄支付肥料钱及其他农业经营费的时候。将近 30 万的制丝工场的女工,在日本农家经济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第三,养蚕和产丝是日本主要的家内工业,这不但是农民副业的问题,同时也是地主得以继续高率地租的剥削的问题。农民为地主养蚕,而地主则由贩卖金扣去大部分的地租。这种半农奴的零细农与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互相规定的体制,如果因为美国经济恐慌而崩溃最主要的一角(养蚕和产丝)。则不但日本支柱工业的丝业有崩溃的可能,即“其社会的金字塔也必从其根底颠覆过来”(萨法洛夫语)。

而兼做玩具副业的所谓“内职农家”，及兼营渔业的所谓“渔村农家”，因美国经济恐慌可能发生的破产，更可以证明萨法洛夫的这句话的确实性。

## 六、激发农民的革命性

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准是比较落后的。在日本军部政府一贯麻醉政策之下，日本农民在革命上也是最落后的。但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则不在工人之下。这不但是因为日本农业人口在职业人口中占 48.4% 的压倒的多数，（据《经济统计年鉴》），并且因为日本资本主义建设在半封建的农村地基上。日本法西斯的爪牙的军部，把他们的喽啰散布在乡村，农村遂成了在乡军人活动的根据地。运用暴力维持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生力军——包括军队和警察——大部分是由农村供给的；来自田间的军人约占总数百分之八九十。但是日本农民久处于世界特例的高度压榨之下，经济恐慌更足以激发他们的觉醒和拥护本身利益的斗争。在过去所有的农业恐慌中，日本农民皆已发生过暴动，我们全面抗战发动以来，农民负担的加重，也已激发了秋田县农民和矿工联合的大骚动。因为美国经济恐慌所影响日本农村经济的破产，更将促进日本农民的自觉。

从美国经济恐慌的本质考察，很有当作世界大恐慌的推进曲而发展的可能，那末，因为高度压榨的“社会倾销政策”强制维持下来的日本经济，将在美国经济恐慌的吹号

之下加速爆发,是非常可能的。伐尔加说过:次期的世界经济恐慌原该由英日两国爆发。日本虽因加强压榨的“社会倾销政策”,一时弥缝过来,但是这种弥缝只是更加加深恐慌的深度罢了。

原载 1938 年 6 月《世界知识》第 7 卷第 11 期

## 日本农业经济的特质

在资本主义发展至最高阶段的日本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农业经济究竟带着那一种阶段的性质,依然是封建性的呢?或者已经是资本主义性的呢?抑或是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性质呢?决定这个问题不但是研究日本农业经济最重要之点,同时也是研究日本整个资本主义最重要之点。这个问题是研究日本农业经济应先把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研究同种的归宿之点。日本学术界讨论这个问题,早即各派的意见分歧不一,迨至最近的论战更加尖锐化。各派不但努力于新资料的发见,并且特别注意到方法论的问题。其所以不容易解决的主因,据我看来,在于一般人眩迷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度之点。日本及其他各国——中国在内,还有许多有权威的学者坚持下列几种理由主张日本农业经济的性质为“近代的”,即“资本主义的”:(一)明治六年“地租改正”后,土地所有关系已由封建诸侯的大土地领有变成私人的所有。(二)同时封建时代的贡租亦已变成赋税,且由物贡形态变成货币形态。(三)封建诸侯及领主全



部撤废,封建的身分制度已不复存在,不自由的农奴也皆得到解放。(四)土地的贷借关系可以专依“自由契约”缔结,封建时代的“经济外的强制”已经消灭。(五)农民可以依照职业自由的原则选择职业,不必被束缚于土地,(六)农村的生产业已相当受到市场需要供给关系的支配,等等。

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皮毛的看法。实质上欲决定日本农业经济的性质,正和决定其他一切的问题一样,须从本质方面下手。决定农业经济之为“封建制”,抑为“资本制”的本质,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土地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即直接的剥削样式。从这根本原则,我可以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者列宁的意思列举四点标准:(一)自然经济或货币经济,(二)直接生产者事实上被束缚于土地或已得到解放,(三)受到不自由的经济外的强制,或缔结契约的完全自由,(四)技术的应用程度高级或低级,即应用新技术的大规模经营或旧式的小规模经营。

现在且依上列四点检讨日本农业经济的本质,究为封建,抑为资本主义的。

第一,“地租改正”后缴纳政府的赋税完全改用货币单位,一部分地主亦由佃农征收货币地租。又近年来日本的农业生产,有为供给市场的需要的,有为供给外国的消费的。这些现象很近于货币经济。但是事实并不尽然。货币地租只是地租形态的转变而已,并不足以证明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论》著者说得好:“现金地租是指那由现物地租

的单纯形态转化而成的地租而言。在这地租形态上,直接的生产者,必须支付生产物的价格而不是生产物于土地所有者(不问其为国家或私人)。”“这种地租的基础,与成其起点的现物地租的基点是同一的。换言之,生产者由于继承或其他的传统,依然是土地的占有者(不是所有者,作者按),必须依转化为货币的剩余生产物的形态,支付强制的超过劳动,即不受等价而支出的无偿劳动,于这个最重要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地主(《资本论》第3卷第6篇第四十七章《资本制地租的发生》),况且货币形态的地税,亦不过只通行于地主与政府之间,若直接生产者的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之间,却尚通行着现物地租,甚而至劳动地租的惯例——即令亦有一部分收着货币地租。维新政府之改用货币单位的地税,实际上只是减少地主的负担,在日本资本主义向上期农产物价高涨的时候,地主由佃农征收现物地租而缴纳政府以现金地税,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又如除去自己消费而尚有剩余以供应市场的需求的,大多限于地主及富农。若占日本农民大多数的佃农及小自耕农,除去缴纳地主及自家消费,乃至还本纳息外,已无多少剩余可以送出市场去了。即令近年来亦有多少专为供给市场需要而经营专门化的农业生产,例如养蚕栽种水果等等,但其比重毕竟很小,不足以代表全部。更严格地说来,仅仅农产品的变换尚不以说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必须具备工资劳动者雇佣关系的本质,必须直接生产者使用农业经营者的劳动工具及劳动对象以

耕作土地。若就直接生产者而言,日本农业生产还是停留于半封建的阶段上,农民大部处于隶农的地位。此点与次述三种特质联结,阻止日本农业经营之资本主义化。

第二,明治维新后法律虽已规定人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的职业,不必被束缚于土地上。这似乎封建的农奴已经得到了解放。但是事实上日本的细小农并无行使这种自由权的能力及环境。一般的小农受到两重地租(直接缴纳地主的佃租及间接缴纳政府的地税)的异例压迫,加上高利贷的高度剥削,他们实在没有法子摆脱隶农的地位。再加以一般恐慌开始以来,资本主义向下期都市工业的萧条,小农更难断然离开农村而走入较富裕的生活之路。只有法律上的自由而没有经济上的自由,结果是一种驾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罢了。

第三,明治维新后法律虽已允许直接生产者的农民可以与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依契约原则自由决定土地的贷借关系。表面上,“经济外的强制”,似已不复存在。但是佃农因为经济能力的薄弱,复又处在占总收获额 68% 以上的双重地租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剥削及压迫之下,绝对没有能力可以行使其契约的自由权。反之,他们只好处于人格的隶属关系之下,忍受着种种“经济外的强制”,例如佃租滞缴时所受的种种封建制裁,地主所加种种的临时义务,佃种争议发生时政府的武力镇压,政府帮助地主征收佃租,乃至佃农人格地位之隶属关系等等,不遑枚举。

第四,在关系农业经营技术之点,我们更容易证明日

本农业经济的封建性。日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除去新开垦地的北海道情形略有不同者外,从一般说来是不足一提的。大多数(在80%以上)的日本农民的耕作面积,皆在半町步至二町步之间(一町步约当我国16亩),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营,加以一般工资的廉贱使机器生产费高于人力生产费多多,所以新技术的应用几乎完全不可能。日本细小农经营又是一直发展下来的倾向。所以土地所有权虽有集中的情势而农业经营则愈益分化。封建的隶农制阻碍着农业经营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资本论》的著者说过:“过小农的土地所有(乃至农业经营——作者按),其性质上排除劳动的社会生产性之发展,劳动之社会的诸形态,资本之社会的集积,大规模的牧畜,科学之累进的应用,等等”(《资本论》第3卷第四十七章资本制地租发展)。

上面四种标准的分析已经决定了明治维新后乃至现在的日本农业经济之为封建性质,同时并且反驳了,各国(中国在内)许多有权威的学者,所主张日本农业经济的近代性。更确切地说来,“地租改正”虽然改换了土地所有的主体,但是土地所有者之为国家,或封建诸侯,抑为私人,并不改变土地所有者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剥削样式,无宁更加强化了同种的剥削。所以与其说是近代化了,资本主义化了,倒不如说是后退了,半农奴的制度重现了。贡租之由现物形态变成货币形态,不但没有贯彻于地主与佃农之间,即以货币形态之转变言,尚不足以说明土地经济的现代性。因为货币单位的地租形态仍未脱离封建地租的范

畴,再如封建诸侯及身分制度之撤废,事实上不过以秩禄公债和现金补偿他们,使他们得以变成寄生的地主,而法律更加明显保障他们的权利罢了。日本的土地革命并未完成,农民并未得到彻底的解放,依然处于隶农的地位。

还有一部分人持中间主张的。他们一方面看见日本农林的许多资本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略日本小农的惨苦地位,因而主张日本农业地租为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事实上,构成农业经济性质决定点的地租形态,只能有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能有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性质。所谓“前资本主义”的概念,实在包括着封建的,奴隶的,及原始共有的范围,而在地租之点并无这种范畴。又有人主张日本地租兼有封建的及资本主义的两重性质。但若主张两重性质的话,就只能从其地租剥削强化之点来说明,即从征收佃租的地主及征收地租的政府之点来说明。即在此点也不能说是封建的及资本主义的两重性,而只是封建剥削的两重性。

要而言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土地所有关系,巩固了地主的寄生地位,世界无比例的高率佃租,阻止农业经营利润之产生,阻止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促进过小农经营之发展。日本一般的过小农只有累积负债而等待着破产的一途。这才是日本农业经济的基本特质——封建的特质。

不过日本资本主义早已胚胎于德川幕府末年,明治维新后只有划阶段的变革,废除封建的身分制度,解除了土地自由买卖的禁令,因而社会构成的农奴制度解消,割据

的分权的领主制度变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工业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掩护之下急速发展,终于达到资本制生产样式成为全社会的支配定则,货币经济及商品的流通浸透于农村,把农村经济包罗于其经济网内。因此,这时候的日本地租与封建构成下的封建地已多少有不同之点,可以说是“半封建的地租”。规定日本半封建地租的特质,约有两种条件:

(一)这种地租充当资本原始积蓄的源泉,在资本主义全部生产关系之下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构成因素。树立于商业及高利贷资本及独占资本的基础上的日本主义,特别显明指示这种条件。唯其有此条件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如日早熟为独占资本主义。同时,亦因为这种原因而独占资本主义倒反妨碍农业上的半封建的生产样式转变为资本制的生产样式。因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不能够随布尔乔亚革命之完成而解消。

(二)在由封建制生产样式转化为资本制生产样式的过程中,封建制只是妥协的融化的解消。在这两种生产样式的转化过程中,日本的土地革命并未彻底完成,土地所有关系残留于封建的状态下,而只妥协地顺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已。农业上的资本主义经营,受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的妨碍。即有极缓慢的部分的工资雇佣关系产生,但仍带着半农奴的特征。

最后尚须声明一点,日本近代的农村经济无论怎样被包罗于货币经济,浸透于商品流通,但是直接生产者与土

地所有者的关系,依然是决定原本性质的根本原因。因此,“半封建的”地租,究结到底还是属于封建地租的范畴。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范畴,更不是第三范畴的前资本主义的范畴。

原载 1939 年 6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3 期

## 日本货币政策的新攻势

在对日全面抗战的阵营，法币的强韧性，即令敌人也都惊骇，日本侵略者强调中国的抗战力量是在英国金融的支持之下，自然不是偶然的，日本政界及舆论界数月来即热闹讨论如何抵制，破坏，乃至利用法币的问题，最近逐有急剧进攻的新趋势。

日本最近进攻法币的新方略，约有三种的形态；其一，搜集华北及华中的法币，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套换外汇，使外汇市场上法币供过于求，用人工外科手术的方法降低法币的汇价。其二，大量发行华兴银行的伪币及军用票，并以军权强制使用，藉以扰乱法币的流通，限制法币的交换价值。其三，在特殊的地域内，特别是上海这样容易受经济封锁的国际金融市场，更加运用“经济外强制”的政治权力，利用物质来源的封锁性，强制伪币的使用，以期达到降低法币的交换价值的目的。

在上列三种的形态中，第二种形态在华北及华中过去



施行的结果,并无多大的效力,一般人民皆愿意保藏使用法币,法币的价值依然高过伪币,乃至日币一二成以上,所以日本侵略者发挥它伪币政策的效力,就不得不再乞灵于政治权力和军力,并用起第三种的方法来。但是这种“经济外强制”的方法,截止今日尚未发生大的效力,它必须和“租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日本军阀对于租界问题的蛮干,不能达到所期目的以前,相信这种伪币经济外强制的力量,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力量。所以在日前伪币的前途还是暗淡的,虽说所采用伪币的敌人阴谋,相当的毒辣。

现在已经发生多少扰乱作用的日本货币进攻政策,只有搜集法币套换外汇一法。法币黑市的跌落,开始于二三月前,至最近更大转剧:由4月的“55.78”(以每百元值港币计算)跌至5月的“54.60”,再跌至6月初旬的“54.52”,甚至于14日的“42.90”。这种跌风确实相当剧烈,其主要的原由,在于日本倾出大量的法币于上海及香港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购买外汇。据说,日方在江浙强制搜集了不少法币,这次先倾出九千万。我们遂不得不采紧急对付策,由香港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命令上海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等暂停出售往日价格的外汇。在这里可以看出在法币的跌落上,我们还是占着主动的地位。相信一阵暴风过后,法币仍可安定于某一阶段上。

这一问题不只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英美法的经济利益都有密切的关系,英国与法币的关系更密切。他们不维护

在华利益便罢,否则他们会和中国设法共同维持法币的经常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保护,奖励本国的生产及贸易上,增进国际收支的好转,而从根本上提高法币的外汇价值。

原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4 期

# 日本帝国本质论

## ——军阀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

### 一、绪论

欧洲大战后日本一跃而登世界三强之列，近年来经济界也有更急速的畸形发展，几个大都市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户及福冈等也皆涂上不少现代的新色彩，东京丸之内一带的大楼虽其高度并未插入云霄，但也还可以供东京游客观瞻一阵。日本帝国表面上居然可以称雄于世界了，俨然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治政治国家了。但是事实上日本帝国只是一个“纸老虎”，揭破了外皮，内部就是不调和的丑态，严格地说起来，日本帝国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国家”，尤其不是一个“民治政治的国家”我们打一个譬喻，日本就如同穿上欧式大礼服的乡下绅士，不但形式上有许多不调和的地方，即其行动作为也都充满着“土气”，再加上横冲直撞起来，更活像一个劫掠都市的胡匪，封建的气氛十

足,凶残的蛮性更十足。远东的胡匪现在已经侵入我们的堂室,大肆其中世纪的残暴和劫掠了。我们要抵抗这种胡匪,就不能不认清它的真面目,剥去用以吓人的假面具和用以欺骗世界的绅士大礼服,细加分析,以便决定我们对抗的方策。

我们要了解远东胡匪的本性,须从它的本质探讨起。究竟“日本是什么东西”(某文化机关出版物的标题),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不是日本人短小难看的问题,更不是他们的人种恶劣的问题(上引著作及有些作者专重这些方面攻击日本)。我们要决定日本的本性,须就它所赖以生成发展及存在的基本条件的经济基础及经济基础上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结构的丑恶加以分析。

关于日本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本质,日本及外国的学者各持不同的见解,彼此对立,莫衷一是,但据作者年来研究的结果,山田盛太郎下列的几句话,已经揭破远东胡匪的外衣了。

“英国资本主义表现为自由竞争的祖国,德美资本主义表现为集中独占的本家,俄日资本主义表现为军事的半农奴制的典型国,那一种表现都带着世界史的意义”(山田盛太郎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3页)。

日本军事机构的设备,在半封建的半农奴制的地基上促成日本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发展。带有划时期意义同时又是从上而下的日本明治维新革命,是一种不彻底的

布尔乔亚革命,这次的革命只是一方面创造了半农奴的细小农民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以充当资本原始积蓄的泉源,他方面整备军事机构,发动重工业,以促进工业资本及金融资本的发展。于是日本资本主义带上了军事性及半农奴性。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性及半农奴性,并且是自其出发点即已规定好的。

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了德川封建制度的隶役机构,束缚于德川封建制度下的零细耕作的农奴的隶役关系。是双重的剥削关系,一为封建的大土地领有者(当时的诸侯及领主)的苛敛,一为高利贷资本式的寄生地主的诛求。这种双重的隶役关系的内容,就是贡租 37%,地主租米 24%,农奴应得比率 39%的总收获米的分配(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4 页)。明治维新并没有改变这种苛刻的隶役关系,以前的零细耕作的农奴没有得到解放。明治维新变革的结果,不过把从来的零细耕作的农奴转化为两种本质上没有变化的东西。第一就是半农奴的零细耕作农。他们对于继承半封建的隶役条件(封建的大土地领有权的妥协解消形态)的高利贷资本的寄生地主,缴纳 50%乃至 68%的高率佃租。第二就是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他们在强力的原始积蓄过程上正与那由社会生活资料及生产手段转化的资本同样重要。由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转变的半农奴的零细耕作农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之间,并且依然保存着互相规定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培养半农奴制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世界市场上活动

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要特加注意的要点。

日本资本主义在上述半农奴的零细耕作农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互相依存的土壤上,又受到军事机构整备的推动及促进。明治维新的事业首先注重军事机构的整备,是当时的国际情势,国内经济的特殊性,及农奴解放的不彻底等原因所急切要求的。换言之,军事机构的整备及强化,适应当时日本的特殊情形,在其资本主义的诞生及发展上,具有对内及对外的两重作用。对内的作用就是镇压由德川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转化过来的半农奴的零细耕作农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的反抗或骚动,乃至由这反抗及骚动,集成的地方各藩的叛变。对外的作用就是一方面抵御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侵略保全自己的安全及发展,他方面侵占中国及其属国的商品市场,攫得近代工业生产的主要原料的煤铁,以补强纤弱的日本资本主义的贫血症。在这种两重作用及逼切要求之下,军事机构的整备及强化,成了日本资本主义诞生及发展过程上的无上的命令。这个无上的命令促成日本资本主义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颠倒发展,先由重工业尤其是军事性质的重工业发展起来:军事性工业生产,处于一般工业生产的指导地位。军事性的重工业首先是以制造兵器的军器工厂,海军工厂,制造兵器材料的制铁所,及军事输送机关的铁路种种形态发动的。其次,又促动键钥产业(key industries)如矿山、造船、机械工业的发生及发展。于是,不但提供了产业资本健全发展的条件,并且创造了巨大的金融资本。日本资本主义

在极短促的期间由纤弱的产业资本急速转变到金融资本，而且大阔步地登上世界的舞台，根本动力即在于这个军事机构的整备及强化。

## 二、半封建的土地经济与日本资本主义

### 半封建的土地经济

日本土地经济在其资本主义的构成上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此点自其农民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犹占总人口60~70%的量的方面，及其资本主义依存于半农奴地基上的质的方面即可以证明。日本农民在总人口所占比率之高，是各方面的统计材料所指示的既定事实，用不着详细的剖述，问题只在于明治维新变革后的土地所有关系及耕作关系的性质及形态上。

日本德川幕府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经济，有两种特征，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组织及零细耕作的农奴经济。这种土地关系经过明治维新完成了的妥协的解消和转变。但是这次的解消和转变却未根本脱却从来的封建本质，而只全凭经济外的强力，在军事机构及键钥产业体制下树立了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农奴制的零细耕作。此点是军事性的半农奴制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定。我们拟以本问题的性质及形态两方面来检讨。

#### 1、明治维新后的土地所有关系。

日本近世的土地关系的变革是以明治六年“地租改

正”(地租改正就是地税或田赋的改正,因明治六年日本的地租改正几乎是一个普遍使用的名词,故仍旧名,而附注于这里)为转轴的,这是军事性的半农奴制的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基本过程。在这过程上,日本的土地关系发生一度的再编制。此次编制的特征,简要言之,就是由旧幕藩的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零细耕作的农奴经济转到半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及半农奴制的零细耕作。

现在先从“地租改正”所产生的土地所有关系的变革加以检讨。德川幕府后期日本土地的分配是“御料地”(皇室用地)0.5%,幕府领有地 25.8%,藩侯领有地 72.5%,庙寺领有地 1.2%(据山田氏上引同书 184 页)。明治政府的第一步政治改革是“奉还版籍,废藩置县”,这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的一大变革。明治政府如何处分这占日本土地总面积 98% 以上的幕藩领有地及其后的动向如何,构成我们检讨的对象。关系此点值得我们注意的,至少有三种事实:第一是幕藩领有地的有偿的处分,第二是官有地面积比重之增大,第三是民有地的分配关系。明治政府之处分幕藩领有地,不是无偿的,是有偿的(承受巨额的藩票及补偿,发行巨额的秩禄公债),所以明治维新的农民解放不是法国大革命后独立自由的农民解放,而只是由农奴到半农奴的转移而已。在废藩置县后的日本土地所有关系上,官有地仍占着绝大的比重,并且年益增大。明治十四年官有地总面积为 5,289,850 町步,(每町步约当中国十六亩),民有地总面积为 11,752,095 町步,到明治二十三年官有



地激增至 21,401,241 町步,而民有地则只增至 12,509,986 町步,无大变化(据上引同书 185 页。),这是官僚军阀的封建势力残存的基础之一。民有地的绝大部分的利用者,不是没有寸土的佃农,就是所有地过小的半自耕农。早在 1875 年,日本全部耕地面积的 36% 就由佃农所耕作,其后这种过程益发加大,至 1931 年佃作面积竟达全部面积的 47% (据几曼著《日本经济》日译本 31 页)。

在上述情势之下,日本农民对于土地愈觉饥荒,结果只有归宿到半农奴的一个途径。“地租改正”后日本农民的实质地位并未优于德川时代,甚至于比镰仓时代还坏。“地租改变”前后耕作者所得收获米的比率变化如下:

中田每一反步耕作者所得米的部分及其在总收获额的比率

镰仓府法(1186 年以后)	0.561 担	56%
文禄田法(1594 年)	0.386 担	33%
贞享田法(1686 年)	0.645 担	50%
明治六年地改正(1873 年)	0.512 担	32%
自明治四十一年至大正元年平均	0.782 担	47%
自大正五年至九年平均	0.928 担	49%

(注)据上引山田氏同书 186 页第一表,日本一反步约当一亩半中亩。

“地租改正”之后的日本农民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并且是七百多年来最恶劣的情形。日本资本主义的佃租,高过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数倍甚至十数倍。日本每反步佃租(大正十年)一季作田 31.746 元, 二季作田 39.597 元, 旱田 9.710 ~ 19.941 元, 桑园 23.275 元以上。其他各国的耕地佃租(有的包括草地佃租)的平均, 每反步, 英国在战前为 2.00 元, 苏格兰 2.00 元 (1912 ~ 1920 年平均), 爱尔兰 1.80 元 (1881 ~ 1920 年平均), 德国 1.92 元(1913 年), 奥地利 2.46 元(战前), 法国 1.20 ~ 1.60 元(战前), 美国 1.00 ~ 15.00 元(战前)(据泽村康著《日本农业及农业问题》, 及山田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188 ~ 189 页的换算)。

这不但是量的问题, 实在也是质的问题。“地租改正”后的日本农民, 一方面负担着占收获米 34% 的公租, 他方面又须缴纳 34% 的佃租, 自己只得到 32% (尚且包括着种米及肥料等费用)。日本农民处在这两层的隶属关系及高度剥削之下。

日本大多数的农民 (据苏联几曼的估计当在六百多万) 所处上述的两层隶属关系及高度剥削, 不但证明日本大多数农民的半农奴性, 并且阻碍日本农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耕作中田一反步的佃农须纳公租 1.632 元 (经由地主之手) 及地主佃租 1.632 元, 再除去种米肥料约 0.720 元, 自己只能得到 0.816 元, 但若自耕农则可以得 2.448 元。换言之, 佃农得一, 地主得二, 自耕农得三, 这是在证明土地所有权的压倒的优越。一町步佃农十人份的所得正与寄食于五町步中地的地主一人的所得相等。所以与其耕作十町步的土地不如租出五町步的土地。于此, 自耕的阻碍,

土地所有者的寄食化,由自耕至寄食化的倾向,是当然的归宿。(以上数字皆据山田氏同书 189 页的列表)在这种两层隶属关系上,几乎收夺了日本佃农的全部剩余劳动,没有利润成立的余地。因此,货币的所有者自然不愿当收获利润的租地农业经营者,而愿当寄食于佃租的地主。日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被局限在这程度上。这里,同时还可以握住下述日本半农奴制的零细耕作的根源。

但是上述佃农所缴总收获额 34% 的公租及 34% 的佃租的两重隶属关系的规定,却是“经济外的强力”的强制所促成并为其所维持。明治维新以来继续不断的农民骚动及其镇压,都是证例。于此,又可以看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农奴制度的耕作,和巨大的军事机构及键钥产业体制的关系。此二者事实上是互相规定的。要之,日本资本主义的土地关系的特性不是布尔乔亚的,而是带着寄生地主性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它又是为军事机构所保障的土地所有关系。

## 2、明治维新后的耕作形态。

明治维新后日本土地经济的半封建性,更具体表现于①劣于德川封建制度下的农耕规模的零细耕作的形态及②以现物地租及徭役地租表现的剩余劳动的征收形态。

上述 34% 公租及 34% 佃租的两层隶属关系,必然产生半农奴的零细耕作,而明治维新后的农业经营规模的零细,较之德川封建时代,有过无不及,德川时代农耕的规

模,约略如下:宝历三年(1753年)仙台藩内的中等以下农民的耕作面积,是田六反步,旱田四反步,共计一町步:宽政三至四年(1791~1792年),每个农民的耕作面积约自五六反步至七八反步;安政二年(1855年)“夫一,妻一,农繁时雇用短工一人计共三人”的耕作面积,是田一町,旱田五反合计一町五反步。而“地租改正”(明治六年西历1873年)后三府三十六县的情形如下:农家每户平均的耕作面积是0.88町步,不足一町步,其后也无大变化。明治三十七年北海道及冲绳县两处极端地区除外的内地农家每户平均耕作面积是0.93町步,大正八年是0.99町步,昭和四年是0.94町步,皆未超过一町步,其零细程度之高于封建的德川时代,可知。这不能证明明治维新后日本农业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指示零细耕作和别种条件结合,停滞于半封建的土地经济上的事实。

关于日本农业耕作零细问题尚有三点有趣的事项,值得吟味:(1)资本主义发展较前进的地方的农耕零细程度甚于资本主义发展较落后的地方,(2)在农耕零细化的速度之点,前者亦速于后者,(3)前者只有土地所有零细化的单一倾向,而后者则有巨大所有增加及零细所有增加的双重倾向,资本主义发展最前进的地域,若以近畿区为代表,则资本主义落后的地域,可以东北区为代表,这两个区域的比较,可以列出下列两表的对照:

(A)耕作规模及其倾向的对照表

	东北型			近畿型		
	明治四十一年(户)	昭和六年(户)	增减率	明治四十一年(户)	昭和六年(户)	增减率
总数(户)	540,109	624,823		610,898	583,029	
半町未滿	165,393	169,188	(+)2%	271,950	244,198	(-)10%
半——町	134,487	169,608	(+)27%	234,321	257,760	(+)1%
——二町	126,903	172,617	(+)36%	89,845	94,883	(+)4%
二——三町	68,526	79,246	(+)15%	10,815	5,785	(-)46%
三——五町	38,108	29,618	(-)22%	2,968	782	(-)39%
五町以上	12,692	4,786	(-)62%	1,000	121	(-)87%

(B)所有面积及倾向的对照表

	东北型			近畿型		
	明治四十一年(户)	昭和六年(户)	增减率	明治四十一年(户)	昭和六年(户)	增减率
总数(户)	500,548	534,236		525,599	537,867	
半町未滿	192,386	215,754	(+)17%	288,665	309,492	(+)10%
半～一町	110,271	107,305	(+)16%	135,372	134,275	(-)1%
一～三町	127,661	125,374	(-)8%	79,482	76,761	(-)1%
三～五町	38,316	34,973	(-)8%	14,128	11,294	(-)20%
五～十町	15,771	14,827	(-)6%	5,843	4,639	(-)20%
十～五十町	5,627	5,430	(-)3%	2,011	1,389	(-)31%
五十町以上	516	633	(+)22%	97	57	(-)41%

(注)两表均据山田氏上引同书 197 页及 198 页。

(A)表指示资本主义发展较高地方的农耕零细程度及其零细化的速度高于资本主义发展较迟后地方的事实。(B)表指示资本主义发展较高地方的土地所有零细化的单一倾向及资本主义发展较迟地方土地所有零细化及巨大化的双层倾向。从此申论,又可得到两种典型地域土地关系上两种不同的性质,东北型的农业经营是雇用半农奴的半隶农主的经营,而近畿型的农业经营,是寄食于半隶农佃租的高利贷的寄生地主的经营。此点又在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促成(1)地主之都市生活者化,(2)都市资产者之寄生的地主化,及(3)此二者的融化及结托的事实。三町步以上耕作者户数在三町步以上所有者户数所占比率,东北区为60%,近畿区则只有10%,寄食于佃租的生活者数在三町步以上所有者户数中所占比率,东北区只有8%,而近畿区则为56%(据山田同书196页列表)。然而二者的剥削形式虽然不同,而其为半农奴的半隶农的半封建的土地的经济则一。

日本资本主义的土地经济的半封建性,除表现于上述零细的耕作以外,还很确切地表现于现物年贡(生产物佃租)的缴纳上,现物年贡表现为日本佃农(占大多数农民的比率)的剩余劳动的征收形态。日本农业经营是以“米作”为主,米作是以决定的地位通行于全国并且已经固定化。此点阻碍日本农业生产的分化及发达,排除土地之自然产物的多样性,使封锁的孤立的零细耕作农奴之间只有利害的“同一性”而没有“共同性”,奠下封建专制的巩固基础。

这是后篇要剖述的问题，现在且先就普遍于全国的佃租关系略加检讨，根据大日本农会编《本邦小作惯行》（大正十五年刊行）日本水田的佃租惯例如下：（1）明治十八年水田的佃租关系，几乎全国是米租，（2）大正元年的水田佃租关系也是同样，“水田的佃租普及全国，几乎全是米租，”（3）大正十年的水田佃租关系依然无变，最近并且普及于朝鲜。

日本的现物佃租，除了主要的普遍的米租之外，还有谷租，小米租，麦租，及豆租等等，若钱租及价钱租则为特例，是少数地方所通行的。其中的价钱租，本质上依然是现物地租。所谓价钱租也者，即日文之所谓“代金小作料”，是预先以一定额的现物决定佃租的数量，在其缴纳时则按照时价换算金钱而以货币支付的一种变相的假装物租。货币地租之不通行，更可以想见。

在日本这样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及资本主义的农业设备不完全的情势之下，由物租向钱租转变，自然是极其困难。关于佃租之以钱租，物租或价钱租的何者为适宜的问题，兵库县产业部曾经征得各方的意见如下：

	地主	自耕农	佃农	共计
赞成物租者	422	422	396	1240
赞成价钱租者	76	84	121	281
赞成钱租者	11	8	10	29

一般所以赞成物租的理由是：“定为钱租时须先卖却米谷及其他收获物始能筹得，所以能扰乱缴纳期，增加滞

缴,又因米价的变动过甚,不但标准价格的决定及损益的预想困难,并且米价的腾落对于双方经营上的影响甚大,特别能发生佃农在同一期间投卖的结果米价跌落招来农家的非常不利,因此,在农业仓库的设备未普及,米谷贩卖未改善以前,仍以物租为适宜”(兵库县产业部《关于农村问题的一般意见》大正十二年刊 18~19 页),可知日本现物地租之通行,货币地租之不发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经济阶段性限制着。

较比现物地租还原始的地租形态的徭役地租(或称劳动地租),在日本现在也还存在,并且通行于全国各地。这里典型的农奴制的剩余劳动征收形态,迨至最近还发现于岩手县九户郡大野村,表现为所谓“名子制度”。例如“现在在晴山家有名子(按名子,即在名子制度下耕作徭役地的佃农)三十五六户,地主分出宅地,一町内外的旱田及山林若干面积给名子使用,而课以每年 30 日乃至 40 日的赋役。赋役也者是在地主的田地或山林上劳动之谓。此种赋役若换算成金额,则每反步旱田为四角,又宅地一坪约当二厘五毫。又名子除此种赋役之外尚须以报恩之意在旧历十二月贡送薪柴二担给地主。此外,在丧喜事及大清扫时还须帮忙地主……”(据同书所录东京《朝日新闻》昭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消息)。

日本徭役地租的名目非常繁多,不下几十种,其通行范围也不限于局部而实普遍于全国各县。

然而日本目下通行现物地租的另一面,公租的征收



则完全一律采用货币单位。这里蕴蓄着一个相克的矛盾，是由上述双重隶属关系产生的矛盾。农产收获额 34% 的公租和 34% 的佃租二者之间并不是调和的平行线，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相克线，现在由公租的货币形态及佃租的现物形态，更确切地表现出来。公租的货币形态是一定额的货币，佃租的现物形态是一定量的现物。一方是货币，他方是现物，一方是价值，他方是使用价值，二者的范畴完全不同，因而二者各受不同的条件所限制，其运动法则亦各不相同。此点在社会经济上指示着一点很重的意义。地租不能脱离现物形态向更高位的形态转化，是指示一般社会生产的低下及隶农制的半农奴制的关系之存在。反之，公租则以公力和强力摆脱了现物形态而向货币形态转化。前者是半农奴制的规定，后者是“军事性质”的规定，于此可以明了日本军事机构及键钥产业的体制与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隶农制的零细耕作，是相成而又相克，更可以把握住日本资本主义之军事性及半农奴制的特质。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土地经济的封建性，苏联的日本问题专家萨法洛夫的论断，尤其是痛快明了：“日本农民改革的布尔乔亚的内容，即比之 1861 年（俄国）帝制地主的改革还要贫弱得多。1868 年（明治维新）的日本改革，第一就是更生地主阶级事实形成上的土地所有的公式化。那是农民附属于土地的新束缚容易实施，并且维持最高度的旧封建要素的极端的农民土地丧失的是认。缴纳给农奴主的贡物额数达到莫大的程度”（《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第一

章)。事实上,这次的大改革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变更而已。“诸侯及武士的建封特权,以国民大众(宁可说是农民大众——宋按)的牺牲而得收回。树立基础于军事的封建的隶农制上的旧关系,再现于适应布尔乔亚发达的各种要求的新基底上。身份的封建的隶农制,为将军的废止,地主买收土地封建权利的形式手续,职业自由,迁移自由,商业自由,文化吸收自由等等所隐蔽的农奴制高利贷的隶农制所代替。面目一新的君主政制,统治着从属于改组后的地主阶级而无尺寸土地的农民。其后的发达虽为小数农民开辟了二三获得土地所有权的途径。但是大体上农民大众只残存于贫弱的分割地,这种分割地又束缚农民于地主的土地上(据同书45页)。

### 三、半农奴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经过明治维新改革的日本土地制度依然保持着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隶农性的零细耕作规模。日本资本主义就是在这半封建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为世界史最近阶段的时代性所规定的,明治维新的变革遂以“由上而下”的形态开其端,以妥协融化的终局殿其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及发展为这种历史的条件所规定,所以从其诞生以至生长过程,完全依存在半封建性的半隶农性的土壤上。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隶农性的零细耕作规模,虽然限制了日本农业生产性

的发展,阻止了日本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但却提供了后进的纤弱的产业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条件。萨法洛夫说得好:“如果 1868 年(明治维新改革)后,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如果因此产生了几千有力的资本主义的经营,就不但由日本工业收回大半不付代价的劳动力,并且将由根底推翻了社会的金字塔……”(上引萨氏同书 70 页)。

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与产业资本主义的交错,表现在下列三种事实上:(1) 日产业资本主义的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的来源本在于近世农民尤其是隶农的转化,(2) 半奴隶性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与半封建的半隶农的细小农民的联结性,或相互规定的关系,及(3) 日本农村充当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蓄的地基。兹分(A)半农奴制与资本主义的互相规定及(B)农村地基上的资本原始积蓄两项来剖述。

### 1、半农奴制与日本资本主义。

日本资本主义特别依存于农村的根据,第一应先举日本各种企业尤其是纤维工业的大多数劳动者是农民转变的事实。大阪市社会局曾于 1923 年就纤维工业、化学工业、食料及酒酿造业、机器及器具工业、特殊工业(瓦斯及电气)乃至其他杂类,工业的六个工业部门,90,189 人的劳动者的先前职业,作过调查,其受过教育与未受教育的比率如下:

工业部门	受过职业教育者	完全未受教育者
纤维工业	22	78
机器及器具工业	70	30
化学工业	22	78
食品及酒酿造业	36	64
电气及瓦斯等	54	46
其他部门	30	70

(注)根据上行萨法洛夫氏前书 79~80 页。

完全未受教育的劳动者的前身，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之中，农民亦占一部分。农民在各种企业的劳动者中所占比率，除机器器具工业，及电气瓦斯工业两部门以外，皆占绝对多数，又据另一同样调查，在所调查 41,490 人的劳动者之中，18,090 人是农民，占 44%，这个估量恐怕过小，但也已可观的了。

其次，日本资本主义产业尤其是纤维工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是农家的妇女充当的，这也是日本资本主义依存于农村的最大根据。1925 年日本各部门工业中女工所占平均比率是 52.9%，在 18,781 家工场当中，有 9,830 家，拥有女工寄宿舍的设备，而在这寄宿舍住着 529,588 人的女工。其中 524,202 人是从事于日本帝国主义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的劳动的。从事于纤维工业的劳动的女工总数，达 791,599 人，约占 81.3%。在这女工总数之中，591,815 人是 16 岁以下的幼工(据上引萨法洛夫氏同书 76 ~ 77 页)。

这两种事实不外乎证明：日本资本主义分解了旧时零细耕作农民的农业与农家日用手工业的结合，由农家夺去了自家消费用的手工业而代以养蚕业，赁机纺纱工业，制丝业，及纺织工业。这四种新兴工业的从业者，皆出自农民而与农民有互相规定的经济关系。养蚕业的从业者是由中农重编的，目的在于农家生计的补充，明治三十二年约有32万户。赁机纺纱工业的从业者是由贫农重编的，目的在于半隶农的生计补充。织物职工数在明治三十二年达81万人。制丝业工业及纺织工业的从业者，都是由贫农的家族重编的半奴隶工资劳动者，目的大部限于半隶农的生计补充，前者服从于纯粹日本型的特殊劳役制度，后者服从于工资低于印度殖民地的工场手工业制度，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从业者，因其本身或其本家受高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十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高率佃租的剥削（参阅本文第一节中各国佃租的比较），自不得不在别一方面寻找补充生计的来源。找到上述几种工作的农民的目的，因为是在于补充生计，所以能甘于极低贱的代价。过高的佃租逼迫半隶农性的日本农民兼当没有他例的极低工资的劳动者，又因为日本农民兼当工资劳动者所以佃租才可以格外高昂，高率佃租与低贱工资，因而半农奴性的农民与半奴隶性的劳动者，二者遂形成互相规定的关系。

日本资本主义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依存于农村的剥削。明治维新变革后，纤维工业的发展是最显著最急速的，在日本各部门工业中占最要的地位。日本

总输出额四分之一是纤维制品,纺织工业(包括棉纱及布匹的生产)的地位,在生产价额之点占第一位。日本纺织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正步着活跃优胜的前程。日本帝国主义的存立,依赖于这世界竞争力最雄厚的日本资本主义支柱的纤维工业,而纤维工业的则又依赖于半农性的农民家族,尤其是全靠农家的女儿们的剥削。

日本零细农因逼于过高佃租的支付,自己不兼作工业体系的劳动,就必遣送女儿到资本主义的工场去。第一,养蚕是农家生计补充最重要的来源,普通是由细农的妇女或幼童服务的。其次,赁机纺织工业,同样是由细农的妇女在自家操作的工作。再次,制丝工业及纺织工业的绝大多数从业者也都是农民的妇女。日本纤维工业是专靠农家妇女而发展起来的,纤维工业资本的利润和妓业资本的收入有同样高度,也有同样的性质。其具体的条件就是工资的低廉及监狱式的寄宿制度。日本女工的工资不但极低,并且不及男工三分之二,甚至一半,“雇农每日三角二分,女雇农二角,养蚕女工每日得二角三分。其时(指1915年)到都市作工的人每日可得四角二分,制丝男工三角四分,女工一角八分。”(据 Joseph D. Autermer,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Its Economic Condition*)。细农为着支付肥料或不得已而把女儿的劳动力贱卖。普通是由资本家工厂主借到百元、五十元、三十元、十元不等,而以女儿每月的极微工资摊还,也有每月分拨一部分工资给其父亲的。女工工资的支付期普通在肥料或支付期,不是偶然的。为父亲还债而

以身体作抵押的细农的女儿,以借贷及劳动契约成立的时候开始,就步入一种特殊的生活过程。每日劳动时间达 11 时以上,没有外出的权利,拥挤在小寝室的宿舍内。束缚在极不卫生的工场设备及强烈的劳动强度下的日本女工,普通经过一年半,至长二年即失去劳作能力而被解雇。即不死亡亦多堕落。日本死亡率之高在主要资本主义各国中占第一位;东京郊外暗娼的 70% 是以前的女工。(每千人的平均死亡率日本 21.4 人,意大利 16.8, 美国 12.0, 德国 12.9, 英国 12.4, 法国 17.4。以上引萨法洛夫氏同书 100 页,“暗娼的情形,为东京警察的调查” )。

日本女工的这种劳疫制度,或许有人以所谓家族主义,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特点夸耀世界。甚至有人主张日本农家妇女之佣工不是为帮助家计而是为着她自己的嫁妆。这当然是掩饰和错觉,是无根据的欺骗。实则日本女工在一工场连续劳动期间平均为一年半,在其开始工作以前厂主借与其父亲的金额平均三十元以上,女工每月摊还二元多,至期满时除去回家的车钱所剩实在太有限。

## 2、农村地基上的资本原始积蓄。

日本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隶农性的零细耕作,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蓄的源泉,日本产业资本主义乃至金融资本主义就是从这种源泉吸收养分发育起来的。

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布尔乔亚革命,虽然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途径,但其主要的因素却是商业的高利贷资本。那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划时代的质的变化,

因此,日本欲确立产业资本以与先进资本主义对抗,势须特别需要强力的原始积蓄的准备。明治维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关系的废除,封建身分的解放,封建家臣团的解散,法律承认的农民自由,及农民土地共有耕地共有林野之官有及民有的分割,就是资本的原始积蓄的前提条件。其后,又因为保持国内市情及开拓国外市场的必要而与先进帝国主义对立,因而日本资本主义,更加压抑国内劳动者及农民加强其封建的剥削,在日本资本主义初期,农村的剥削尤其是重要,大体上可以分成四种形态。

### (1)土地资本剥削下的原始积蓄

前节所剖述的日本土地所有关系,一方面被利用作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蓄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因为封建的高率佃租而再生产了封建的剥削关系。占绝大多数的日本佃农,支付着占总收成 68% 的佃租,佃租的高率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国的特例。这不外乎是封建的剥削形态的残留。日本佃租的基本形态,又如前面提过的,是“现物地租”,甚至于是“徭役地租”。这种地租形态,不但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的表现,并且随农业生产性的发展而增高其封建剥削的程度。因为地租的现物数量即令没有变动,亦可因为市场价格的增涨而实质上增大地主所得的货币价值(但在农业恐慌期及农业生产向下期,则又当别论)。

日本的高率地租不但表现封建的剥削形态,并且保持或加深封建的剥削程度。过高的佃租造成日本农业的零细耕作的基础,形成过小农制。过小农制不足以容纳都市工



业资本不能全部吸收的农村过剩劳动力,愈发促进农民的土地饥馑。地主独占土地,佃农争夺土地。结果高率的佃租愈发增高,地主征收了佃农的全部剩余劳动,有时甚至收夺工资的一部分。于是过小经营的佃农愈发贫穷化,愈发争夺耕地,其半农奴的地位也因而益发巩固。

另一方面,高率地租又有促进地主“寄生化”的倾向,高率地租的存在,阻碍土地所有者或土地购买者的自己耕作,而只寄食于地租。因为寄食地主的利益比自耕农的利益大(参阅前面的分析)。地主的寄生形态还表现在工商业方面。地主由高率地租榨取所得的金钱,不利用于改良耕地改善经营上,而投资于都市的工商企业上,因而地租变形为银行存款,债券及股票。即有投入农业的资本,也不是农业资本,而只是“土地资本”。这种情势阻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农业劳动者的增大。农业布尔乔亚不出现为农业资本家而出现为地主,过小农民不转变为农业劳动者而停留于佃农的地位。过高地租不但维持着零细耕种并且加以扩大再生产。日本半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依然以支配的力量而存在;地主在资本的支配权力下继续封建的剥削,堆积资本的原始积蓄,造就产业资本的基础。

## (2)商业资本剥削下的原始积蓄

农业部门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工业部门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矛盾,分解了农村的家内工业,而促农业经营变成商品生产。利用机械及动力的工业生产及殖

民地的资本制大规模经营的压迫,由农民夺去了酒、烟草、酱油、纺纱、制丝、菜子油等生产。贸易的发展也分解了从来的复合农业机构,使之单纯化。国外资本主义的重压,驱逐了原始产业的日本农业生产产品,尤其是明治二十年(1887年)以后输入品的压迫,越过政府的农业保护壁垒而更使日本内地的农业机构单纯化。例如棉花、蓝靛等工艺皆直接间接为国外的输入所压倒,而米及生丝的生产因为是大宗输出品,所以为日本农业所集中。一般过小农经营的最适应市场条件的农业,遂至最发达,转化为兼营养蚕的“主谷农业”。

这种农业机构单纯化的过程,就是农村生产狭隘化及购买消费相对地扩大化的意义,也就是自足自给经济崩坏而变成交换经济的意义。固然商品生产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进步的过程,但是土地面积的严格限制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却使商品生产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采用不可能。农民虽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中,而农业却依然停滞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下。其结果,农民一方面充当别种商品的购买者,他方面充当剩余生产物的贩卖者而参加于价格的竞争,陷于市场经济的剥削之下。尤其是在过小农制下,农业生产物不但不能保持平均利润,其收入除扣各种费用之后尚不足以支付自己的工资。土地的耕作者,只由生产物价格中得相当于工资的部分。过小农经营的生产物价格,把工资部分评得极低。换言之,在过小农制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农业生产物的价格必

然低下。

经由市场经济的日本农民剥削，到金融资本阶段上，更加强化。这在国内是由于卡特儿及托拉斯，所造成生产协定，价格协定乃至生产统制所产生的独占价格，在国际上是由于抵御国外资本主义的高率税壁垒。卡特儿及托拉斯的市场支配，保持工业生产物的价格于农业生产物的价格以上，益加扩大二者的差额，置过小农民于高率的独占价格的剥夺之下。肥料的卡特儿组织就是独占资本剥削农民的显例。

### (3)高利贷资本剥削下的原始积蓄

日本农业上信用一般皆集中于“土地信用”，换言之，只有高率地租的剥削者，才有告贷的信用，日本不通行农业信用。因此，拥有土地及家屋抵押力的中农以上的富农阶级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但在过小农经营者则必然地不得不依存于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资本，其结果农村的信用几乎完全投于不生产的非农业方面。因为土地的投资只是地租剥削权的移动，而不是农业的投资。根据明治四十五年日本大藏省(财政部)理财局的调查，在负债总额 746,033,311 元之中，银行及保险公司的放款占 27.98%，产业组合(即我国的合作社)的放款占 2.92% 其余的部分占 6.91% 都是前资本主义金融业者的放款。其中，贷金公司及个人贷金业者占 16.69%，私人放款又占 37.54%。前资本主义的放款，尤其是私人的放款占绝大的比率。农村的利率自然难免过高：

利率	在总金额所占比率	在总债务者所占比率
一分未滿	25.2%	21.2%
分半未滿	44.9%	42.1%
二分未滿	15.6%	21%
二分以上	4.3%	15.7%

当时一般银行的放款利率是九厘，而农村则大部分在一分乃至二分以上，虽说近年来农村的负债内容，有渐由前资本主义的放款改变为近代放款的倾向，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克服了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事实上，一般过小农依然束缚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下，屈服于半封建的隶属关系之下。

日本金融资本经过欧战期中的积蓄，登上了日本主义的支配地位，同时，也急向农村猛进，根据昭和九年（1931年）7月关于全国负债实例的调查，各种放款机关的比重如下表：

	对负债总额的比率	对负债总户数的比率
信用组合	34%	85%
特殊银行	20%	23%
赖母子讲	18%	73%
个人贷借	14%	54%
普通银行	6%	6%
商店贷金业	6%	36%
道府县镇村	2%	10%

(注)“赖母子讲”就是我国的摇会、月会、银会等金融通融约组织。

这在指示日本农村金融业的近代化，金融资本的进出。金融资本渐渐经由地方银行及大地主以确立一般农民的政治支配。但是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必然强化资本的集中，资本的独占过程就是在各种产业及企业的不均衡发展上以落后的产业及企业为牺牲的。于此，金融资本遂得以土地的抵押压迫整个的农村。这里含有都市剥削农村的最高阶段的意义。农村终以“延付实施运动”及其他农村救济请愿运动，向金融资本反抗。在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剥削之外，再加上金融资本的压迫，日本农村充当原始积蓄对象的作用，有加无已。

#### (4)明治初期的租税与农村的剥削

近世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工业资本的急速发展，是以农业为牺牲，以农村为最大的剥削泉源的。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上的这种事实特别显明，日本资本主义对于农村的原始积蓄，不但发动于私人，并且发动于拥有绝大强权的国家。日本资本主义政府运用租税征收方法以遂行其原始的积蓄，明治政府的“地租改正”就是原始积蓄的强力手段。明治六年地租改正后日本各税比率如下：

中央租税大类别五年平均百分比比较表

(年)	实数 (千元)	地税 (%)	商工税 (%)	所得及相 续税(%)	关税及吨 税(%)	其他 (%)
明治八 ~ 一二	51,904	80.5	3.1	—	4.3	4.3
同一三 ~ 一七	60,352	65.6	4.4	—	4.4	3.8
同一八 ~ 二二	71,753	69.4	3.8	0.7	5.2	1.4
同二三 ~ 二七	113,323	74.3	2.7	1.1	4.4	0.3
同二八 ~ 三二	129,257	58.1	5.5	1.9	7.2	0.1
同三三 ~ 三七	151,875	32.5	6.8	5.7	11.7	—
同三 ~ 四二	300,204	28.8	9.8	10.0	13.9	—
同四三 ~ 大正三	344,061	21.8	10.1	11.4	16.2	—
大正四 ~ 八	456,708	16.1	10.9	22.8	11.7	—
同九 ~ 一三	1,817,471	9.0	10.6	26.7	12.1	—
同一四 ~ 昭和四	898,523	7.6	10.2	26.2	15.8	—

(注)根据《日本经济年报》第二辑 82 页以后。

“地租改正”后的地税（日本称地租）占日本国税 80.52%，一直到明治三十二年尚占 58.1%，农民负担的多大，可以想见。市町村税的地方税亦有同样情形，地税后来虽渐减轻，但所得税、酒税、关税、糖消费税、营业税、布匹消费税，则反激增。这指示都市商工业的发展及财富所得额之集中于都市，所得额虽然集中于都市，但其租税负担率实质上却还是低下。农村并且负担上列渐增的间接税，地税的轻减即令于地主有利，而一般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地增大，随帝国主义阶段而来的财政膨胀，更加以种种形式转嫁负担于农民，都市商工业者与农民的负担率的差额益加增大，农民每人租税负担比率由明治三三年至三七年平

均的 100% 逐渐激增，明治四三年至大正三年平均为 180.2，大正九年至一二年，平均更增至 456.8。同时期的米价则只由 100% 涨至 142.8，涨至 286.8。收入渐减而支出渐增，相差几达一与二之比。（据《日本农业恐慌》113 页）。日本农民及商工业者的租税负担悬隔之大，更可证明经由法律的农村剥削。

#### 福岛县农工商负担调查(大正十一年)

	农业者	商业者	工业者
租税负担总额	1,980(元)	835(元)	571(元)
对收益的负担	0.3365	0.1489	0.1026
负担率的比较	100	45	13

(注)木村靖二《农业恐慌论》140 页。

在奇重的农民负担的租税当中，特别加重贫农的负担。地方税(包括道府县税及市町农税)不但在总税额占很大比率(自耕农 81.2%，自耕佃农 85.1%，佃农 97.3%)，佃农的负担又大于半自耕农，更大于自耕农。因为地方税包括着贫农所负担的家屋税、家屋附加税、杂种税，及“户数割”的项目在内。地主及富农负担的地税虽然实质上轻减，而下层贫农负担的“户数割”<sup>①</sup>倒反增加(对于全道府县税的比率，自耕农 2.37%，自耕佃农 24.8%，佃农 35.2%，对于市町村税的比率，自耕农 5.96%，半自耕农 61.2%，佃农 69.7%)，(以上两项数目皆据小池基之著《日本农业问题，

生丝问题》28页计算的)。日本资本主义之依存半隶农的细小农,经由政府的剥削更有力量。

#### 四、军事机构促现的日本资本主义

欧美先进资本主义打开了锁国三百多年的日本关门时,日本各种的资本主义关系,尚未充分成熟,尚不足以自己破开封建的外壳。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虽然已有高度的发展,但其自身却缺欠转变为产业资本的各种条件。因此,封建的日本要在仓惶间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然需要人工的催生及补强。所以军事机构所完“催生婆”的作用特别显著。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当时,内因于布尔乔亚力量的纤弱,不足以自身生长为健全的资本主义,外逼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变质所伴来的先进资本主义的侵犯,时时刻刻阻碍着后进资本主义日本的发育,并加以沦陷为殖民地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之下,明治政府终不得不自己负起遂行资本的原始积蓄的任务,创出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工业。换言之,从其胎身即已发育不完全的日本资本主义,企图一跃而与先进资本主义分庭抗礼,并驾齐驱,就不但需要人工的催生,并且需要人工的培养。明治政府就是专靠军事机构的强力完成了这种任务。这点就是日本资本主义之所以带上军事特质的原因。

日本资本主义是在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半农奴



的零细耕作的土壤上,完全依靠这种强力的军事机构的催生而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从其母胎即已带来许多弱点及矛盾,为补强这些弱点及克服这些矛盾,无论对内或对外,皆需要强力的常备军,严密的警察网,乃至军备警察机构上所附带的各种现代设备。由这种动机自然首先发动军事工业。由军事工业的发生促进了基本动力基本原料,及其他现代工业的发展。即如包括衣料工业及食料工业的轻工业,也在同样激发之下发展的,并且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史,不外乎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史。

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性,还可以举日本几次对外的战争及国家权力与财阀的结托来说明。日本每经一次对外的战争,例如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及供给日本乘火打劫的机会的欧洲大战,则不但获得了巨大的赔款,用以补强帝国主义财政的缺陷,增进军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成神速的资本集积和集中,堆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他方面,最初由政府官营而现在仍以官营占巨大比重的日本军事工业,经由官创民承,及政府保育的关节,又创设了民间独占资本乃至巨大财阀。军事工业即在创设了独占资本及财阀之后,相互间依然以工业的军事统制与独占资本互相依存的形态结着不解之缘,日本政府永久加以培植及扶持。

## (一)军事机构的必要及其创设

### 1、军事机构的必要性。

世界各国为着维持资本主义的秩序皆常备着庞大的军队及严密的警察网,而在日本资本主义,这种需要更加逼切,这种设备也更加显著。这是因为日本资本主义自其诞生即已充满着复杂的深度的弱点,需要外力的补强。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弱点当中,至少可以举出下列最主要的几点,而军事机构的必要性也即由此产生:

(1)布尔乔亚的纤弱 上面说过,日本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虽然在德川幕府末年即已有高度的发展,但其本身力量则尚不足以自己转变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前提条件是巨大的资本积蓄,而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布尔乔亚并未充分具备这种力量,所以日本要由封建的生产关系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势须经过一度强烈的人工的资本原始积蓄,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条件。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明治维新时“由上而下”的革命方式,封建势力的残存,及布尔乔亚和地主的妥协。

(2)半封建制的地基 因为日本布尔乔亚的纤弱,所以日本资本主义不能根本摆脱封建的本质而反再生产并且扩大了半封建的剥削关系。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及零细的过小农经营,造就了半农奴大众;由农村流出的农奴在未得到解放以前即又被编为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日本在这种半农奴的半奴隶的剥削关系下树立了,并且维持着资本主义。他方面,由明治政府领得补偿金的封建领主

及富裕的商人变成两层寄生虫——寄生于地租及债票。

(3)国内市场的狭小 日本国内市场之狭小,与其说是限于面积及人口,不如说是限于半农奴的过小农及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的购买力过小。一国商品的最大消费者是工农大众。而日本工农则过着动物程度的生活,日本著名的消化器病,即胃肠病,据说是由于粗恶的食料;以食糖国民著名的日人砂糖消费量尚不及美国每人消费量八分之一。日本国民消费力因其购买力之如此微小,日本商品安得不过剩,日本市场安得不狭小?

(4)国内资源的贫乏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依存于丰富的资源,铁煤之有无几乎成了近代重工业兴衰的标准,羊毛棉花之丰歉也为纺织工业的决定因素。日本的煤藏量极少,铁藏量几乎没有,羊毛完全仰给澳洲,棉花则仰给于中国及印度。在日本现代资源之中只水电力比较丰富,但是动力生产量,无论自总量说抑自比率说,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最低的地位。每人一日的动力生产量指数,美国 13.18,英国 6.65,德国 6.04,法国 4.35,日本则只有 1.75 (据博博夫著《日本之技术的经济的基础》38~39页)。

(5)工农不断的骚动 资本的原始积蓄不够,国内市场狭小,天然资源贫乏的日本资本主义,只好同人力方面来求补偿。德国人力的每日生产量在总动力生产量中只占 5.6%,而日本则占至 19%之巨,反之,日本工资之低微则为世界的异例。在资本的原始积蓄的苛刻剥削下的日本工

农,自然要不断地发生骚扰,尤其是明治改革的初年。

(6) 资本主义发展的迟后 日本资本主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后的,至少要迟后一百多年。在日本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已渐由量的发展到质的变化,带上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进资本主义日本终于受了四十多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关税自主权的旁落,从 1858 年继续到 1899 年。欧美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更加增大日本资本主义的弱点,逼着日本不得不急图反抗。

## 2、军事机构的创设过程。

从上述几种弱点产生(1)镇压国内工农群众以维持并增强半封建的剥削关系,(2)反抗先进强国的侵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3)侵略落后的民族,镇压殖民地民族运动,以扩充市场保持资源的三种必要。日本资本主义逼于这三种必要而欲达其健全的发展,最先要求庞大的严密的军事警察机构的整备。军事警察机构的整备表现于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上的就是军事性工业的创出过程,细分之可得军事工厂的开设,输送运输机关及重工业的发展。现在分述于下。

日本明治维新政府首先收用幕府及各藩的造兵制舰的设备而加以统一,再在近代的装备之下加以编制,建筑了军事工厂的基础。幕府末期的造兵设备,是以幕府直辖的兵工厂为最宏大而且完备,各藩之中以反抗幕府的雄藩,萨、长、土、肥四藩的兵工厂为比较发达。制舰设备有幕

府直辖的工场及萨藩的工厂。明治政府则以幕府直辖的工场为中心集中各藩的设备,以创设军事工厂,形成日本军事工业的枢轴,陆军工厂之中,最先着手创设的是东京炮兵工厂其前身是幕府直辖的小石川关口制造所,明治元年并合各藩各所的造兵设备而成今日的炮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完成于西南战(讨伐西乡隆盛之役)之后。日本政府又于明治三年,选择幕府长崎制铁所的若干机器为基础,创设了大阪炮兵工厂。东京炮兵工厂生产小枪及其他轻兵器;大阪炮兵工厂则生产大炮等重兵器。其次,就海军工厂加以考察,明治政府对于造舰方面的经营较迟于选兵,即在西南战争之后,造舰计划实质上仍未就绪。当时,只有鹿儿岛的大炮制造所(明治四年收用,后来改建海军造船所),横须贺造船所(明治元年收用,后来的海军工厂),长崎制造所(明治元年收用,后来转卖人民营),兵库造船局(明治四年收用后来卖给私人),石川岛造船所(后也转卖私人)等。至若吴兵工厂及佐世保兵工厂竣工而造舰设备实质上略为整齐。无疑是中日战争以后。

输送传远机关以铁路、电报及电话为最重要,都是军事警察的国家强力发动的中枢机构。明治政府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自与创设军事工厂同时,在官营形式之下创办了输送通信工业。铁路虽说在明治初年即在官营与民计营行的形式下发展过来,但是整个铁路计划皆在军事的考虑之下作成的。这自东海道线铁路计划之采用军部的建议之点即可了然,电报及电话事业,更不消说,自始即自军事警

察的观点由政府经营,并处于军事统制之下。

日本政府即创办了常备军及警察网等国家强力的物质基础的军事工厂及输送通信工业,自然更需要充当基本工业的重工业。明治政府首先集中幕府及各藩经营的重工业,加以改筑而创设了庞大的官营重工业的系统,完成了重工业的资本主义的改编。矿山虽在明治二年曾经一度解放给民营,但到明治五年又以“矿山心得书”集中采矿权于政府手中,其次再断行重要矿山之原始的收用及官办。他方面,在工业工场的一般部门,运用由农民收夺的巨额地税收入,在广泛的范围输入最新的设备而由政府官办。制铁工业附办于军事工厂内,机器工业也附设于军事工厂及官营模范工场。

## (二)军事性工业的比重及其统制

### 1、军事性工业的绝大比重。

日本军事性工业适应半封建性日本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其后又在半封建的剥削土壤上急速发展起来,终于构成日本资本主义产业的骨骼。日本资本主义首先引人注意的特殊性,就是主要的产业资本直接间接为军事性工业所培育所促进,即如现在处于日本经济支配地位独占资本乃至金融资本,也未始非在军事性工业的摇篮中生长的。因此,日本军事性工业的神速发展,其在日本工业构成上所占过的大的比重,及其与独占资本乃至金融资本的结托,又形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最大特殊性之一。

占工业生产的绝大比重的日本军事性工业，固然有官营工业与民营工业的两大种类，但是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官营军事性工业。日本官营的军事性工业，首先引人注意的，就是官营军事工厂的扩充及其发展的神速。明治政府在维新变革后，运用由农民剥削得来的巨额地税，锐意扩充军备，创办军事工厂。明治十年受到日本西南战争的刺激之后，日本军备更加急进。明治十五年遂树立了“军备大扩充计划”奠定了神速发展的基础。中日及日俄两次战役获得巨额赔款及主要资源，其发展遂赶上世界的水准。日本官营军事性工业发展之神速，单就军事工厂的发展即可窥知大概。中日战争前(明治二十六年，1839年)，与日俄战争后(明治三十九年，西历1906年)，日本军事工厂的发展状况如下：

	中日战前	日俄战后	增加率(%)
军器工厂职工数(人)	9,584	89,286	831
陆军工厂职工数(人)	3,832	38,629	908
海军工厂职工数(人)	5,752	50,657	780
军舰工厂原动力(马力)	2,084	80,728	3773
陆军工厂原动力(马力)	954	48,072	4938

(注)根据《帝国年鉴》第十三回及第二十六回本。

军器工厂(包括海军工厂及陆军工厂)的职工数增加了八倍多，原动力的增加，尤其是神速，约达三十八倍。其中，陆军工厂的发展速度高于海军工厂。这种神速发展，后来因为民营军事工业之部分的民营化，及海军工事之归民

营工业承办,而于发展比率上略呈缓和状态。但是欧战前后犹有相当的发展,即在欧战停后至最近期间,官营军事工业的发展仍未停止。欧战前至战后期间,陆军工厂职工数的增加率是 34%,海军工厂增加率是 40%(据《帝国年鉴》第三十三回及第三十八回)。又欧战停战后直至昭和六年,军事工厂(包括海陆军)的职工数,又增加 51.5%(据园乾治《日本军需工业论》45 页)。

其次,带有军事性的运输通信工业的最重要之点,是国有铁路的发展及电报电话事业的官营,日本铁路在明治初年非常幼稚,明治五年(1872 年)铺设的东京横滨间的铁路,除货车及客车车皮外,一切技术,轨条,及车头皆仰给于英国,至明治十二三年始渐能自己建筑路线,轨条及车头的生产,至明治四十年始能自给自足。这完全由于明治三十九年颁布的《铁路国有法》,把一切的铁路经营收归国营。日本铁路的发展状况如下(单位基罗米达):

(年)	国有铁路	私设铁路	合计	每年增加数
1884 ~ 1885	292	130	422	—
1894 ~ 1895	934	2,474	3,408	2,986
1904 ~ 1905	2,351	5,201	7,552	4,144
1914 ~ 1915	9,194	2,324	11,518	3,996
1924 ~ 1925	12,162	4,595	16,757	5,239
1932 ~ 1933	15,372	7,143	22,515	5,758

(注)根据苏联几曼《日本经济》95 页列表。

日本铁路运输从 1906 年《铁路国有法》颁布始完全而



且彻底地军事警察机构化,其后的发展亦始急速。除上列路线的延长外,蒸汽车头的数目更由 1905 年的 1,644 辆增至 1931 年的 5,174 辆,约增 5 倍,旅客运输数由 1905 年的 10,400 万人增至 1931 年的 125,300 万人,约增 12 倍(据同书 96 页列表)。

至若日本的通信事业(电话,电报),因其自始即归国家经营,所以独占性及军事性特别强烈,其整个发达即为整个军事性的比重。

充当上述日本军事工业及运输通信工业发展基础的煤铁工业,也是在国家经营下发展起来的,占军事统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制铁工业的生产,从八幡制铁所的创设始有显著的发展。明治二十六至二十八年日本从外国输入的铕铁约占国内生产的 1.7 倍,钢铁输入额更达 75 倍,明治二十九年八月始得官办的形式创设八幡制铁所。其后更利用中日战后获得的大冶铁产及日俄战后获得的满鲜铁产,而官营的八幡制铁所不但占日本铁产的压倒地位,其生产额占日本内地总生产额 80%,且能供给日本需要的大部分。八幡制铁所的出产 30% 为陆海军所采用,并且制造兵器及爆炸物原料,宛然是一个准军事工厂。八幡制铁所的军事意义及日本制铁工业之军事统制,于此可知。

日本煤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最初由日本政府以官营形态开始,也是键钥产业带着军事性的更明显的证例。明治六年日本政府如官营三地及高岛两处煤矿,前者在明治

二十二年卖给三井,后者在明治十四年卖给三菱,都是几乎无偿的官卖。明治二十一年以后筑丰煤矿创设后,日本煤产始有飞跃的发展,再经过中日及日俄两战役殖民地煤矿的占得,日本国内煤产更激增了将近四倍。日本煤产的特色是军事统制与财阀的独占。

日本军事性工业的重要性的另一面,就是在日本一般工业生产乃至全部产业机构上占压倒的势力和指导的地位。从纵的量方面来检讨日本军事工业与民营工业(其时大都限于纤维工业的)发展情势的比较,则中日战争直前(明治二十六年)到日俄战争直后(明治三十九年)的期间,民营工场的职工总数,只增加 114%,而同期军器工场的职工总数则增加了 831%,陆军工厂的增加率尤其大,约为 908%。再从质的方面看,日本军事工业又在产业资本确立期占一般日本产业生产的指导地位,一般生产的技术皆依存于军事工业,形成颠倒的关系。这不但是陆海军工厂的制铁业尤其是机器工业的优越,并且是一般民营工业的生产机器皆依存于军事工厂生产的证据。

日本军事性工业的比重还可以由官营工业在民营工业中所占比率看出。国家资本在全国企业资本中所占比率即在日本一般产业已经充分发展的今日,还是很高,平均为 30.4%,其中,金属工业占 49.7%,机器器具工业占 20.6%,印刷工业占 31.1%,铁路占 79.0%(据森喜一著《日本金融资本政治的解剖》166 页所载昭和五年度预算参考著书及会社统计表)。官营军事工业的资本总额,因为

是秘密性,有不发表的部分,所以难知其确数,下表只指示其大概而已。

陆海军直营工场的资本规模

陆 军	陆军造兵厂(千元)	142,259
	千住制绒所(千元)	4,712
海 军	海军工厂(千元)	29,805
	火药工厂(千元)	7,735
	燃料厂(千元)	11,543
合 计		196,054

(注)根据铃木茂三郎《日本财阀论》427~428页的数目编制的,海军工厂的资本未发表,不得已姑以作业费充当。

从上表可知官营军事性工业规模的大概,但此外尚有国家资本与财阀资本合办的特殊公司:南满铁路公司,公称资金 80,000 万元,满铁资本系统的昭和制钢、满洲化学、奉天造兵所、及日本航空输送(公称资本金,1,000 万元)、国际电话(1,000 万元)、日本无线电话 2,000 万元、北桦太矿业(1,000 万元)、北桦太石油(2,000 万元)等公司及日本兴业银行系的川崎造船所,神户造船所等等(据铃木同书 428~429 页)。

日本军事性工业的庞大,从其官营产业的收入亦可推知一斑,若拿来和资本主义各国比较,其为政府的统制事业益加明显。日本国有财产的总额是 859,300 万元(据铃木同书 55 页昭和九年资料)而 1931 年各国官业及官有财

产的收入在岁入总额中所占比率，日本是 39%，意大利 18%，英美德法 6—2%（据园乾治著《日本军需工业论》142~143 页），日本在各国中占第一位。日本官营产业的主要部分是由陆海军军事工厂、国有铁路、国营通信事业、及八幡制铁所构成的，完全是军事机构。于此，既可见日本军事机构的庞大，又可见政府后制之周密。同时，也可发见官僚的封建势力存立的基础。

## 2、财阀军事性工业的统制。

日本军事性工业不只限于官营工业，民营军事性工业也占很大的比重。日本目前整个经济系统是在几个巨大财阀的支配之下；而财阀资本除了三两个少数财阀（例如川崎、山口、根津等）此外，都以军事性工业的经营为主体。国家权力对于财阀工业，尤其是军事性工业，最初加以培植，其次加以援助。巨大财阀就是在这过程中形成的，民营军事性工业也就是在这过程中被收罗于政府的统制网之中的。

前面述过，明治初年，日本政府运用由农民剥削得来的巨额地税，使用由农奴转变的半奴隶的工资劳动者创办成功许多军事工厂及其基础的重工业，不久大多以极廉价钱——几近于无偿转卖给三井、三菱、古河、藤田、田中、川崎、浅野等人，创造了巨大的财阀。这是日本资本原始积蓄的又一特质。日本政府一方面以极廉价钱贱卖官营基本工业乃至军事工业给民间，或予以莫大的奖励金的援助（如最近山下、冈崎及岸本等财阀的海运业的船舶都是日本政府以非常时的准备为名目赋与巨大的造船奖励金造成的）

创出巨大财阀军事性工业资本,他方面又把他们收罗在军事统制的系统之下,造成整个军事机构的伸缩性。

日本政府不但创造军事性工业的巨大财阀,并且时常加以援助。日本政府对于财阀军事性工业的培植,大体上采取三种形态:①免税及奖励金的援助,②输入品高率关税的保护,③经管上警察及军队的监督。在这种优厚的培植之下,日本资本遂得以原始积蓄的形态膨胀起来,终至形成今日这样不相适应的庞大财阀资本及其支配。

日本巨大财阀的军事性工业,以三菱财阀及住友财阀所经营的为典型。三菱完全支配的军事性工业,包括矿业、机器工业、及化学工业,公司总数为 19 家,公称资本为 42,550 万元。此外尚有海运业,三家公司,公称资本 11,925 万元(据铃木茂三郎《日本财阀论》434 页)。住友财阀尤其把生产的整个基础置于军事性工业上。住友财阀第一种资本(即直接隶属的资本)11 家公司,可以分为两大部类,其一为金融业,其二为军事性工业。金融业(住友银行、住友信托公司、住友生命保险公司)的公称资本合计,不过 9,150 万元,而军事性工业(包括铁钢铜工业、煤矿工业、化学工业)的公称资本总额,竟达 10,550 万元(据铃木氏同书 445 页)。住友财阀更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而更加活跃起来。其次,三井财阀对于军事性工业的支配,也不在三菱及住友之下,同样地普遍支配着军事性工业的各部门。尤其是大部分煤矿的支配(资本 20,050 万元——上引《日本军需工业论》,握于三井财阀之手,是三菱及住友所不及者。所不同

者,只在于三井财阀对于军事性工业的支配是以支系资本的形态进行的罢了。此外,还有久原、古河、涩泽、森、大仓、大川、田中、浅野、藤田、安田、川西及中野,等等财阀,皆以军事性工业为其经营的主体。日本财阀不但个别地支配着各部门军事性工业,并且在相互之间结成卡特儿的独占组织,以行其完全的支配。日本几种主要的民营军事性工业,可以说几乎完全在几个巨大财阀的支配网之中,这种情势在九·一八事变后更加发展。例如铁钢工业,政府打算联合以前的制铁资本再网罗所有的大财阀加入,以成立一巨大组织,以与“满洲昭和制铁所”并立,形成日本军事统制的骨干。又如金银铜的生产。只三菱、住友、古河、藤田及日本矿业公司五家即已占绝大比率:金占总生产 73.2%,银占 79.1%,铜占 91.3%(饭田清三《日本主要产业论》109 页)。机器工业总资本的 60%及占全国造船力 80%的八大造船公司,皆为财阀所支配。此外,新兴的化学工业,及基本重工业的煤业上,财阀的支配力量尤其大。

#### 注释:

①“户数割”是日本特有的地方税,是的量所得额及财产赋课的一种人头税。

原载 1939 年 1 月至 9 月《战时日本》  
第 1 卷第 5 期至第 3 卷第 3 期

## 日寇南进前的财政状况

自最近日寇的外交手势及军事布置看，日寇军事南进的野心更加暴露，但是再自日寇本身的力量加以检讨，则问题不如是简单，柏林的司令台固然连三接四地催促日寇军事南进，日本陆军行动派及其支持下的政府，亦要藉军事南进转移内政的危机，但若德盟的攻势未必有必胜的把握，日寇军事南进后将更深陷其另一“健足”于如何地位，且看日寇目前的财政状况，也可以明了大半。

### 一、战时财政与公债

战争是国家的最大开销，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浪费。这正如病痛之于个人，往往将数年乃至十数年的积蓄，全部花费于医药上，有时甚至于要向戚友，告贷巨债。所以病痛在个人是非常时，同样，战争在国家也称为非常时。

非常时的财政是逸出轨道之外的，所以入不敷出的赤字，常以意想外的大数目出现。个人的财政原则，是“量入

为出”，到人病痛这样的非常时期，也就不能不改变原则为“量出为人”以随应个人救急的必要，销费过去的积蓄或借债。但是个人财政，无论怎样变通，还要受“量入为出”的原则的严格限制，借债力还是有限。而国家财政平时的“量出为人”的基本原则，在战争时期更要发挥到极度。再者国家的积蓄与个人的积蓄不同，除国家经营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外，所谓国富的积蓄大部分皆集中于人民手里，平时都是需要多少岁出，就预算好多少岁入，积蓄非常有限，所以入不敷出的差额，达到意想外的数目。在这个时候，国家就要以非常的手段，筹划岁入的增加。其方法固非常之多，如增加租税，强徵人民财产，鼓励人民献金，增强法币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方法，要推发行公债。

发行公债是国家非常时候筹划财政的最主要而且最有效的办法，其他的方法皆有极严格的限度。例如增加租税，一来因为原有租税项目不能违背过去的惯例而无所限制的增加，二来因为新设的税目不能过繁，所以租税的增加在非常时也自有限。再如徵用人民财产，虽说和增加租税，性质稍为不同，其对象只限于一部分人民与一部分物质，但惟其如此，所以数目不能太大，再加以私有财产制度的限制，强制征用就无法尽量发挥，除非是在制度不同的国家或决心实施非常时国策的国家。劝诱或鼓励人民献金，虽然也是战时筹划财政的有力办法，但是人民献金只限于战争初期爆发时或战争胜利时比较有效，绝对没有持久性，且因为没有强制性，效用就不能太大，特别是人民觉



出战争的不合理性时,献金的作用就完全消失,如在日本强盗这次之对我侵略战。又如增发法币,以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各国所常用的方法,但法币增加超过市面的需要时就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若准备金过度减少时就会酿成恶性通货膨胀,倒会影响国民经济及人民生活。贻害及于作战力量。况且战时增发法币,普通皆以公债为准备金,这又有待于公债的作用了。因此,无论那个国家,在战争时期总是发行多种巨额的公债;公债之中虽有内债与外债之分,但在战时因国家对外信用的降低,故皆集中于增发内债。以加重本国人民的负担,素患贫血症的日寇,也莫不采用公债政策,以为筹划战时财政的主要方法。

## 二、日寇侵华战费

战时费用之膨胀,主要的是由于战费的激增。日寇的侵华战费虽不若大规模闪电战及拼命抵抗的欧洲参战国,特别是英德战费之巨,但较比过去的甲午战役,日俄战争,乃至上次欧战,却又多得多。据白崇禧将军的估计,日寇这次的对华战费,已达 160 亿日元(11 月 14 日在中枢纪念周报告)。只据已发表资料,日寇此次战费累增如下:第一次先从大藏省第二预备金项下支出 1,000 万元。随后又向第七十届临时议会提出 9,600 万元的临时费的预算。迨八一三全面战争开始后,又向第七十一届特别会议提出 4 亿余元的临时军事预算。但是战争愈益扩大,“现地解决”与

“不扩大”的希望完全幻灭，遂又于9月间提出20亿余元的预算，1937年（战争第一年）三次战费共达25亿余元这是用到1938年1月底截止的预算，是则六个月间（8月至翌年1月底，因八·一三以后才算入于大规模战争阶段），每月平均共费4亿余元。以后每年的战费大略以此数为标准。

日寇侵华战争的第二年度（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底），战费预算超额又达485,000万元。日寇原定最低限度，在这一年度内逼迫中国屈服，所以孤注一掷，通过如此巨额战费，但是战争并不如其幻想结束，而且战场愈弄愈大。日寇政府此时已觉到战争之持久化，又为欺骗其国民及安定社会计，特在1939年度预算内（1939年2月至1940年1月底），虽把战费预算减至465,000万元，1940年度（1940年2月至1941年1月底）的战费预算，又减至446,000万元。但是这个数目是不够开销的，所以本年度战费预算（即所谓军事特别费），又增加至488,000万元。（据2月11日东京路透电）。实则战费还不止此数，因为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费用皆较前增加，即预算新规增加的主要项目如军事充实费（4亿多元），伤亡兵之医疗抚恤费（1亿多元），生产力扩充费（21,700多万），乃至海运振兴费，民航事业振兴费，等等，皆是准战费，三年半的战费尚不只160多亿元咧！

日寇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不但战费与年而俱增。即一般会计的岁出预算，更是飞跃的增加。兹列战争以

来一般会计岁出累年比较表如下(单位千元)。

1937 年度	2,709,157
1938 年度	3,288,029
1939 年度	4,493,833
1940 年度	6,097,331
1941 年度	6,863,000

据日文《国际经济周报》12月21日。

上面数字加上所谓特列军事费，才是日寇战费真实面的暴露。

### 三、日寇国富与国民所得

国家的支出，不消说都要靠国民负担，在战时财政庞大而当时的国民所得负担不起时，就动用过去的积蓄与未来的债务，前者与国富有密切关系，后者就完全是公债的问题了。

日寇一向的国富与国民所得，皆不甚充裕，国富总额是 1,101 亿元（1930 年）而美国国富总额为 8,803 亿元（1932 年），英国为 1,776 亿元（1930 年），苏联为 1,237 亿元（1924 年），法国为 1,266 亿元（1925 年），日寇列第五位。若自每个国民的所有额言，则日寇又降为第七位，每人只有 1,710 元，比之加拿大每人 8,770 元，美国每人 7,052 元，英国每人 3,873 元，实在相差太远了。

至于国民所得总额 1935 年为 1,453,200 万元，不及美

国 18,746,500 万元,(同年度),苏联 16,115,000 万元,乃至英国的 6,701,100 万元(1935 年)多多,固不必说,(皆据日本内阁统计局编《列国国势要览》,即只就其本身近年来的国民所得考察,也不过如下表:(单位百万元)

1930 年	10,636
1935 年	14,532
1936 年	14,016
1937 年	16,298
1938 年	21,292
1939 年	25,422

(注)据上引《国际经济周报》。

九·一八侵占东北以来,日寇国民所得虽然年益增加,但是国家经常支出的增加速度高出国民所得一二倍以上,加上战费,日本国民自然负担不起了。本年度的预算总额共达 1,287,000 万元(2 月 11 日路透电),若以 1939 年度的国民所得总额 2,542,200 万元充用,所剩不过 100 多亿,但是国民又不能不吃饭不穿衣服如“仙人吃霞衣树叶”(日人之言),日寇的财政怎样能不亏空呢?若以 1939 年度的国民所得总额 2,542,200 万元为标准,由 7,000 多万的日本人来分配,每人只能分得 363 元 1 角多。若用以充当生活费,每人每月平均也不过 30 元,这不能不算是动物程度的生活了,如何能有力量去负担巨额战时财政呢?好在日本帝国主义有其压榨的妙方与阶级剥削的存在,战时财政

始能勉强维持下来。但是任何天才的财政家,皆无办法变无为有,所以日本近年来的财政无不年年亏空,其亏空数目并与年俱增。这就是日本的公债问题及由公债派生的许多问题的核心所在了。

#### 四、激增中日本公债

日寇公债问题自九·一八以后就年益严重,同时也就上了日寇的政治日程。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公债总额已达60亿元,其后因为财政每年亏空七八亿元之多,一般人皆觉得日本国民不能继续负担下去,所以很多人主张紧缩政策,加以调节,最著名的事实就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公债以60亿元为最大限度的民政党内阁的主张,及著名财政家高桥是清藏相的百亿公债亡国论。但在军事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部常占优越的地位,并常制造“事件”以威吓并强制政府执行他们的政策。所以民政党公债政策的60亿元最大限度,为九·一八事变所冲破,其增加情形如下(百万元):

1931年	5,955
1932年	6,187
1933年	7,054
1934年	8,139

(续表)

1935年	9,090
1936年	9,854
1937年	10,389
1938年	12,817

(注)据日本金钢钻社《经济统计年鉴》。

九·一八事变突破了60亿元的最大限度。七·七事变又突破了亡国的百亿公债线。其后更以大数目累年增发如下：1937年增发15亿元，1938年增发43亿元，1939年增发53亿元。1940年又增发67亿元。本年度因预算额激增至1,287,000万元，预计发行公债额，将达787,000万元(2月11日东京合众电)。这些的数字的累积，都是日寇侵华战争的成绩。日本太平洋风云又急，外传三二星期内香港就要发生激变，假定日寇另一只脚再伸入太平洋去，海军战费当更较陆军战费为多，公债的急激增加，更无可避免。

日本战费的激增逼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拼命发行公债，但是战时费用不独限于国家预算案上的特别军事费，所以可能增加公债的原因，还有直接间接与战争有关的项目，其中以生产扩充费为最显著。为着支持战争而加紧生产，特别是军火工业的生产，军火工业生产虽有官营与民营，皆受政府的支持或奖励与补助，于是生产扩充费大增。日寇此项支出，自侵华战争发动后却有显著的增加，1936年为1,608,024千元，1937年就急增至3,747,200千元，1938

年为 2,834,680 千元,1939 年又增至 4,053,287 千元,1940 及 1941 年虽尚无资料可稽,但仅 1937 年、1938、1939 的三年间,即已达 100 亿元以上。日寇若果发动军事南进,则此项生产力扩充费将更增加,因为海战需要军火生产更多。

军火生产在日本,固然过半是归陆海军部官营,正惟其如此,所以生产扩充费的国家负担,更要巨额增加,直接的战费的增加,将益超越日本国民所得额,其结果将更倍蓰日本的公债发行额,陷日本未来国民,于债奴的地位,或甚至逼亡日本帝国。高桥老藏相因为主张百万公债亡国论而被杀(二·二六事变时)但今日的日本被这批军阀们拖入泥泞深处,公债总额已增加将至 300 亿元(去年年底截止 282 亿元),高桥有灵,不知将如何捶胸痛哭呦!

日寇在战争初期为鼓励献金与加征租税、剥削人民至于无力再担负的程度。因为此次战争为侵华的无意义不合理的战争,所以终至掀起厌战与反战。因此,人民的所谓献金运动热,已随战争之进展而日益低落。人民在社会经济上的负担也日益增大,中下层人民的压榨已达到饱和点,加税与募债皆已感觉十二分困难了。筹款政策自不得不改变方式。日寇的募债与筹款,到前年即发展至实施全国总动员法第十一条的问题,即国家征用特种资金及过分利润为国家之用。最近且又决定大资本家的出钱办法,最低限度要 100 万元起码。我们固然要群策群力,但是战时的花费极大,更需要大富家捐输,始可有济于事。

日寇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筹资金购买外国军火。英国之得以支持战争于不堕,均拜美国供给军火之赐,但这又是英国肯允美国封存在美存款,以为无限抵押,不能不说是更要原因。日寇前年也有动用三井三菱等大财阀在外资金的拟议。但是这在反动的日国内,恐怕很难实施,前年日寇财阀之反对总动员法第十一条之实施,最近反对战争之扩大,主张快结束“中国事变”,皆反映日寇财政的困难及其当前的财政危机了。

原载 1941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6 期



## 日本半封建的农业经济

### ——解开日本帝国特质之谜的一把钥匙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特质及其适宜的气候,规定了日本农业在其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最重要地位。日本农业经济的特别比重之形成,不外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和自然的原因,但是社会的原因却占指导的地位。日本列岛一般气候的温暖,日光和雨量的丰富,固然供给了日本农业充分发展的自然条件,但在日本资本主义之产生及发展,大部依存于日本农村的剥削之点,更可以使我们理解日本农业经济特别重要的社会原因。假使日本农业离开了目前的土地所有关系及农业经营状态,更确切地说,假使日本农业经营充分资本主义化了,那末充当日本资本主义支柱的纺织工业,乃至其他的工业,即有立刻崩溃的危险。即说后进资本主义日本能够急速发展乃至维持着现状,皆得自目前农业经济机构的赐与,并非过言。

日本虽因地势的关系耕地面积比较狭小,但是农业人

口却占全国人口的大半,其比率在世界主要各国中占绝高的地位。据 1930 年 10 月 1 日日本国势调查的结果,在有职业者总数 2,922 万人之中,农业从业者的数目是 14,156,000 千人,约占 484‰,这种比率在各种职业人口中是绝高的,参阅下表(据 1936 年度金钢石社《经济统计年鉴》):

日本职业人口的千分比率表

总 数	1,000
农 业	484
水产业	19
矿 业	8
工 业	181
商 业	153
交通业	38
公务自由业	70
家事使用人	28
其他有业者	19

然而实际的农业人口的比率,恐怕还要高些,因为农家的家族繁多,所以家族的从业者容易被忽略,其次兼作工资劳动者的农民及其家族,亦容易被算入别类职业人口之中。再从人口的动态来看,过去日本农业人口的比率尤其巨大。在明治初年占 814‰,以后因为工业的发展而向都市集中,但至大正元年(1912 年),尚占 581,即半数以

上。至最近几年因受农业大恐慌的影响而始大减。

日本农业人口比率之巨大，若与世界各国比较看，更有趣味。

国名	农业及水产业人口(千人)	比率
日本(一)	14,724.6	50.3
美(五)	11,109.5	26.7
英国(四)	1,513.5	7.8
德国(三)	9,762.4	30.5
法国(二)	8,205.9	38.4
意国(四)	10,276.0	55.7
比利时(五)	617.5	19.9
荷兰(五)	642.1	23.6
瑞士(五)	482.8	25.9
英领印度(四)	105,689.0	72.2

(注)本表根据 1935 年《经济统计年鉴》编制的。日本之项据 1930 年日本国势调查，其余各项均据德国统计年鉴。括弧内的数字，(一)表 1930 年，(二)表 1926 年，(三)表 1925 年，(四)表 1921 年，(五)表 1920 年。

其次，日本农业生产额的巨大，亦是指示农业重要性的重要事实之一，1933 年度日本农业生产总额达 2,872,764,000 元。农业恐慌爆发前的 1929 年，还多出 508,161,000 元。莫怪日本人盛称：“农业是我国民经济的根干。其纯富生产额依推算约占生产总数四分之三……”(本段数目及引语，皆据 1936 年度《日本农业年鉴》157 页)。

然而日本农业经济最重要之点,还不在于上述表面的现象。日本资本主义之产生及发展大部分依存于农村的剥削,才是日本农业经济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所尽最大的任务,也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所占最大的重要性。第一,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上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的积蓄,绝大部分得自农村的剥削。特别是所谓明治维新后,都市对于农村的剥削,得到政府的法律保障——例如“地租改正”(即地税改正)的结果——这种剥削尤其强化,日本始得在最短期间积蓄了现代工业发展上必要的巨大资本,大阔步地追赶先进资本主义,终于达到目前巨大资本的独占阶段。明治六年(1873年)“地租改正”后,日本农民的租税负担占全国人民负担总额80%以上。又在“地租改正”过程中明治政府赋与封建诸侯的偿金及秩禄公债,完全课在农民的两肩之上。此外,农民随商品经济之侵入农村而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贱卖贵买,受到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在农业经营上因为需要小资本而又受到高利贷资本的高度剥削。商业及高利贷资本由农民剥削所有的积蓄几乎全部转投于都市的产业上,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消说的,即如政府由农民征收的租税也都用于官营军事工业的经营上及民间普通工业的培植上。这是日本资本主义产生最初的过程。

日本资本主义产生上所需要的另一要素的劳动力,也是大部分由农村供给的。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工业,矿业,商业及交通业的人口逐年急增而农村人口相对地激减,就是

有力的证据。关于这方面因为没有更详尽可靠的资料,所以姑且摘用土方博士的调查。

日本本业职业别人口比率增减表

业别	明治五年	明治三十五年	大正六年	昭和二年
农业	814	652	541	451
工业	48	136	183	221
商业	35	89	111	130
矿业	0	7	15	16
交通业	7	17	33	50

(注)本表摘自《社会政策时报》108号。原表除所列职业外尚有水产业,公务自由业,家事使用人,其他及无职业者的人口比率,因与本问题无关,故省去。

日本农村的劳力供给,特别助成资本积蓄的原动力,尤须举述农民的兼业劳动者,季节的工业工资劳动者,及农民家族的女工。这些工资劳动者不是本身经营农业,就是家族兼营农业。他们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和目的,就是为着补贴家计而出来兼当工业劳动者。日本的佃农,半自耕农,乃至小经营的自耕农,因为农业收入不足以开销农业经营费及家计费,不得不利用农闲时出来都市充当工业劳动者。其中特别是农家的妇女,大部分逼于父兄的困穷而出来充当纺织工场的女工,他们都在父兄支付肥料钱的时期支取工资,或在入厂的当初即先由其父兄预领长期的工资。这种农民或其家族之充当工业劳动者,因为是出

于补贴家计的目的,所以工资特别廉贱。纺织工场的女工几乎充当抵押品预支异例的低贱工资。女工约占工人总数90%的纺织工业,就是在这种剥削基础上发展成为日本的支柱工业。日本因有这种异常廉贱的劳动力供其各部门工业的剥削,所以能行其社会倾销政策,各种商品能侵入世界各国市场。

## 一、日本土地所有制度

### (一)现代土地制度的性质

关于近代土地所有关系的转换,各国皆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换言之,在由封建制生产样式向资本制生产样式的转换过程中,有彻底完成近代性的土地革命的,有在其中途妥协解消的,这是一个决定近代土地所有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根本条件。在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生产样式转换过程中,彻底完成土地革命的有两种典型。第一是农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取着均衡发展的英国典型。英国在这生产样式的转换过程中,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随着布尔乔亚革命的完成而起适应的变化,不但把土地完全改变为商品,并且促进了大规模的资本家型的农业经营。第二就是大革命完成后的法国典型。法国在这大革命的过程中推翻了大地主制度,分割土地授与农民,农民因得进行其自由独立的经营。这两种典型的近代土地革命,虽其结果的形式不同,但其性质为则同为资本主义化,

农业经营由农奴制及封建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土地所有权的桎梏到自由的农业企业经营。

反之,若在生产样式的转换过程中,土地改革未能彻底,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不能扫清,只随应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起妥协的融合的变化,则土地所有关系停滞于半封建的情态下,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妨碍,即令农业上发生多少工资劳动的关系,也依然带着半农奴的特征。旧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即其一例,日本也属于此类。关于日本之项,野吕策太郎氏的几段话说得很透彻。

“地租改正固然是‘维新政府土地政策’的枢轴,但这并非就是封建地租的废除的意义,事实上不过是缴给旧封建土地领有者的产物地租(现物实租),转化为缴给现今唯一最高独占者的土地领有者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货币地租(现金地租)罢了。这个变革不但在其租税负担的实额上几乎没有轻减,即其地租的前资本主义的性质亦毫未扬弃”(岩波书店1935年版《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297页)。

“我国小农如此享得的土地所有的自由,实质上倒不过是为着封建的榨取条件之国民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因而为着资本原始积蓄的自由遂行的——土地处分的自由,即土地的买卖,分割及

兼并，租赁及典质等等的自由罢了”(同书 296 页)。

“地租改正的结果，在从前的榨取样式上是毫无本质上的变革的。现金地租不过是现物地租的‘单纯的形态转变’罢了。……”

“充当地租改正的前提又是结果的土地处分的自由，实际上不过是为着封建的榨取条件之国民规模的集中，因而是依国家权力强行资本的原始积蓄的手段罢了。在这种场合之下，严格地说来，即令有土地之私的或共同的占有者及使用权存在，但是任何种的土地私有，则未存在。”《资本论》明治维新土地改革的结果，虽然承认了土地之私人处分的自由，而从事于耕作的占有者，事实上不过是单纯的佃农，尚未可谓为自由独立的土地私有者。(以上同书 300~301 页)

若再进而考察日本惨苦的佃农，负着缴给土地所有者的佃租及缴给政府的地税的双重义务，则实是世界异例的奇重义务，约占农业收入的 68%，明治维新对于土地的改革如何无力，造成这样倒退的结果，更可以想见了。因此从一般地说来，日本改革后的土地所有关系，依然继续着维新以前的本质，国家变成中央集权的大地主，旧诸侯领主在实质上依然是土地的领有者，不过形式上有多少变化罢了。因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关系阻碍农业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经营不能大规模地集中化。



## (二)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

在日本近世的经济发达史上,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依照封建的,经济外的掠夺,及前资本主义的剥削而造成土地所有权集积的基础,迨至明治维新后土地所有权愈益集积而农业经营却愈益分散。明治时代的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本质上只继承以前的本质,所以剖述日本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须溯及明治以前的时期。兹分三个时期,(1)明治以前日本土地集积的特色;(2)明治维新促成的土地集积;(3)资本主义成立后土地所有权的集积,来加以分析。

### 1、明治以前日本土地所有权集积的特色。

先行于明治时代的德川幕府时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时代,所以一方面有种种封建的拘束阻碍土地的私有化,因而束缚土地之自由的集积,另一方面诸侯的土地领有权观念随着实际的变化而渐稀薄。当时阻碍土地极端集积的原因约有四端:(1)武士阶级势力的强大及其阻止土地兼并的志向,(2)关系土地所有权的封建的禁制,如土地永世买卖及所有权细分的禁止等等,(3)关系土地使用权的禁制,例如禁止桑茶及烟草等特种农作物栽种于本田,(4)土地所有者公租负担的奇重,是最有力量的原因,因为公租的负担过重则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不能有中间榨取的余地,土地所有不能保障其经济利益而失去引诱性。

然而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变动却又助长土地所有权

的实际的集积。即就形式而言,当时农民阶级之中有“地主”、“地亲”、“小名”、“大名”的区别,又有所谓“本百姓”的特异名称,用以区别单纯的耕作者(即佃农)或土地所有者(即地主),或自耕其地的自耕农的本质。事实上,土地所有关系已超越各种禁制而暗中通行着买卖。抵押典质等习惯。单从上述各种禁制之申明,亦可得到土地交易实已发生的反证。在永代买卖的禁止令的背后,人民既以典质的形式进行土地的交易,弱小农民的土地自然,渐为非耕作阶级所收夺。土地兼并违反当时支配阶级的意志而愈益进行,当时虽然尚有大土地集积的阻力,但是土地小所有的基础却已存在,当时的土地集积大体上已从两方面进展:豪族阶级的土地集积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土地集积。

德川时代明令禁止土地的兼并,而其反面则有各地方拥有势力的豪族(即我国之所谓土豪),利用经济外的方法侵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土地兼并最初的形态,也是后来商业及高利贷资本侵入农村而兼并土地的基础。土豪的来历很远,可以溯至战国时代,经过织田及丰臣两时代而至德川时代的过程中,地方豪族互相斗争的结果,胜者为“大名”或“小名”,败者则充其臣下,而为土豪。土豪当时不但未受到压迫,且任以乡村的要职。于是利用这种社会地位及势力侵占农民的土地,终至变成大地主。

土豪的资本及土地的集积,随生产力的增进及地方商业的发展而愈益发展。土地的兼并再经由商业高利贷资本更加增长。在德川锁国时代以前,海外通商的发达促进商

业资本之急速的积蓄，在镰仓及室町时代，商业的发达即已产生了货币经济，因而又产生了高利贷资本的活跃。商业高利贷资本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因为当时土地投资较为稳固，故复又转投于土地上，收买田地及山林，增进土地的兼并。到德川末期虽然锁国 300 多年之久，但是当时国内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基础业已稳固。当时的诸侯领主之依赖富豪，及其逢迎富豪保护他们的利益，使商业高利贷资本多得假借政治势力压迫农民。且因海外商业之衰退，商业资本全部集中到农村，特别是土地上。农民不堪其压迫而终于□□□□□□运用经济及政治的两重力量以后得完成其土地的急速集积。当时脍炙人口的政商势力即含蕴此种机密□在德川锁国时代增进土地兼并的另一原动力，就是耕地的开垦。当时因为锁国而海外通商被禁绝的结果，商业资本的活动场所仅限于国内，再加以幕府的劝农政策及垦荒政策之施行，大部分资本转移于耕地的开垦上，较大的土地所有逐渐形成。

## 2、明治维新促成的土地集积。

在德川幕府以前潜伏酝酿下来的土地所有关系的变革，至明治初年始得形式化，法律化。明治维新革命，关于土地所有制度的表面的改革，约有几种主要事实。第一、撤废封建诸侯的领有制而改为国民的私有制；第二、以前关于土地所有及使用的各种禁制完全取消，而土地买卖及农业经营得到法律上的自由；第三、以前的现物实租全国改成货币单位的地税；第四、地税的税率无地方的差别，改成

全国一致的制度。

不过,在这土地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明治政府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政策,其收回封建诸侯的领有地是以“有偿”的办法施行的。对于丧失土地领有权的封建诸侯,公卿,及武士阶级,交与秩禄公债及现金,公债总额约达 19,000 万元,现金达 2,200 余万元。这种大负担不消说是以租税的形式转嫁给一般民众,特别是当时负总税收 80%以上的农民。这是明治维新土地改革的第一特色,同时也就是决定其后土地所有制度的性质及其方向的基本原因。根据这有偿的基本原因,而以后的土地所有关系上发生几项特殊变化。

(1)第一重要的特殊变化,就是国家(包括领有“御耕地”的皇室)变成绝大的大土地所有者。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的当时,从来的藩有地所有权及其他的土地所有权之认为不明的全部收归国有。同时复又收夺山间部落民的既得权。明治初年没有统计可以引证,但是单看明治十四年的官有地共计为 5,289,823 町步之广而民有地不过为 11,752,095 町步,前者约当后者之半,已可知其梗概。官有地的集积,其后更加增进,到明治二十三年已达 21,401,241 町步,增加四倍,而民有地则只增至 12,509,986 町步,几乎没有变化(据山田氏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184 页)。这是多么巨大的集积,后来这种官有地复又无偿地转给民间有力者,亦是助成土地集积的原因之一。

(2)巨大官有地无偿转给民间的土地所有权的变化。

拥有上述广大面积的国家,后来常随其必要而无偿地转让巨大面积给民间的有势力者。此类事例大多发生于新垦地的北海道及库页岛。日本大土地私有制之发生集中于北海道及库页岛,可以说完全基于此因。日本农地 50 町步以上的土地所有户数 40,050 余户之中北海道约占 20,000 户。这是在说明日本土地国有的特质及其大土地私有形成的过程。

(3) 诸侯及上级武士保存巨大的土地私有权。明治政府当时之废藩置县,对于辅佐幕府的诸侯采取比较严格的办法没收其藩有地。但是对于勤王的诸侯则非常宽助,许多巨大的藩有地皆变成他们的私有地。现在华族所拥有的巨大不动产,大部是在这过程中形成的。他方面,诸侯又利用藩有财产依照极低价格收买农民的土地。这也是巨大土地集积的原因之一。

(4) 下级武士的土地收夺。明治变革的结果,武士阶级突然离开俸禄,立刻陷入穷途。明治政府为救济他们而采用的土地政策,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亦起很大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就是以“土族授产”为目的的开垦事业的奖励政策。这种政策的用意在于确立下级武士的生活基础。使不再为乱。例如在津轻藩,出云母里藩等处,强迫一般农民贱价提供土地,以备土族归农之用。下级武士概皆利用这个机会收夺土地,自成巨大的地主或自耕农。这种政策的施行,同时也成了有力量的武士及资本家乘机获得巨大土地所有权的机缘。

(5)资本家及土豪劣绅非法地获得土地所有权。当此明治变革的机会,部落的有势力者利用部落民对于新社会制度的无智而将部落公有地占为自己的私有,债权人也径将抵押地据为已有,确定其所有权,或于永佃关系的土地上设定新所有权,使永佃人丧失土地的共有权,等等,都是当时盛行过来的事例。而新的土地所有权的集积,就在这变革过程中形成了。

### 3、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土地所有权的集积。

明治维新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急速发展,迨至明治四十年前后算已完全确立了。日本土地的所有形态亦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而有相当的变化,土地所有权更有显明的集中,现在以明治四十年为界线分成资本主义确立前及确立后两期,而就其情形分析一下。

#### (1)明治四十年以前的土地集积。

明治维新后日本土地所有权集积的基础,一半在于所有权的确立,具体的事实就是明治改革当时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各种禁制之废除。这是上面详细分析过的。另一半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向上期土地经济占较有利的地位,即土地所有的经济利益较大。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土地集积的事实以前,应先剖述这些土地的经济利益。当时的土地经济利益,约可举出下列几端:

①土地所有的负担之相对的减轻 明治维新后为着财政的目的,确立了现在的租税制度,最主要的就是明治六年“地租改正”。这次的改正有两种特质,即现金税

制及全国划一制。这两种特质对于地主有利。全国划一的地税额是地价 3%，地方税额是 1%，这些都是转嫁于直接耕作者的佃农的。定额的现金地税更于地主有利，因在米谷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腾贵的场合之下对于地主是相对的减轻的，因为地主征收现物地租而缴纳现金地税。但是直接耕作者的佃农不但因为“土地饥馑”而佃租额有增无减，并且因为突然参加货币经济倒反受到商业资本更大的中间剥削。当时农民暴动的繁多即其实证。至于地税改正后地税负担额之多少的减轻（明治五年较之天保七年减 39 万石，七年减 140 万石），更加肥满了地主。在这种情势下，土地的引诱性极大，土地集积是必然的趋势。

② 佃租额的绝对的增高 地税改正当时的佃租虽互有增减，但其后则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农民过剩人口对于土地的逼切要求，而佃租日益增加。这种增加又宥于土地资本的特性而愈益进展。这自然又于土地所有者有利，也是刺激土地集积的要因之一。

③ 农产物价的急速腾贵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展而都市对于农产的需要大增，而农产物价急速增高。仅就东京米价而言，明治七年一石为 6.16 元，十三年至十七年平均增至 8.47 元，至二八年至三二年又增至 11.09 元，三八年至四二年更增至 14.63 元。地税改正后三十五年的期间，农产物价约涨一倍半。另一方面土地的负担却没有增加，故于土地所有者是有利的。这也是刺激土地投资的一因。

要而言之，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度之确立，

土地的封建的负担之相对的轻减及渐减。首先刺激资本家购买土地的欲望。又资本主义技术的进步增进了农业生产,其利益则以佃租高涨的形态肥满地主的荷包,资本主义向上期农产物价的继续的腾贵及其倾向,更是引诱资本家及地主投资于土地的双重原因。因此,在这期间土地集积到少数人手中,是必然的动向。地价之急速腾贵正可指示此时土地投资的激烈及土地集积的事实。

年 次	每反步价格(元)		同上指数	
	田	旱田	田	旱田
明治 六年	47	16	100	100
明治 二三年	62	26	134	163
明治 三二年	132	58	281	363
明治 四一年	196	90	417	563

(注)据东浦庄治《日本农业概论》96页第十八表。

这里留下一个可能的疑问:就是在这样土地的经济利益膨胀之下小农民岂不是同样可以购买土地吗?土地就不一定是集积的情势了。但这问题是很容易解答的。小农民不但从来的经济力量不足以购买土地,并且在这经济制度的变革过程中经济地位只有愈益动摇,逼迫小农民放弃土地。特别在农业恐慌期中农民之放弃土地更加显著。例如在明治十四至十六年的纸币整理及紧缩政策的强行,引起十七八年间的农业恐慌,由小农民手中夺去了不少的土地。当时虽无正面的统计资料,但尚可由侧面的事实找得



证据。明治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之间,缴纳地税五元至十元的府县会议议员选举权者,由 930,263 人减至 648,161 人,减少了 282,102,约减 30.3%。同时期 10 元以上的同种选举权者,由 879,347 人减至 814,022 人,减少 65,325 人,约当 7.4%。这是在说明这八年间缴纳 5 元以上 10 元以下的地税的小土地所有者阶级,约减了三分之二。10 元以上的缴纳者,虽其减率较轻,但仍不免于放弃土地。因此,明治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间,十八县的佃种地的比率增加了 13.7%,以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全部耕地约八分之一,因抵押而丧失了所有权。土地的兼并是很明显的。此种动向即在农业恐慌后依然继续。明治二十年 18 县的调查,佃种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是 38.9%。至明治四十二年全国总耕地中的佃种地,水田占 50%,旱田占 38%,这是指示本时期土地集积的总结果。(绝对数根据上引东浦氏同书 99 至 102 页)。

## (2)明治四十年以后的土地集积。

资本主义确立后日本土地所有权的集散,虽是曲线状的发展,但是一般的情势依然承继以前的动向,向集积的方向进展的,这种情势表现在①自耕地面积的比率减少而佃作地面积比率增加,及②耕地总面积增加而土地所有者户数减少,等事实上。

这期间日本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盛衰而呈曲线的情状。明治四十一年至大正二年的期间完全承继以前资本主义向上期的景气,农产物价腾

贵,所以农业尚有发展的余地,耕地面积大增而地主的数目大减,佃种地的比率增加而土地大形兼并。大正二年至七年之间正值欧战时期日本工业的发展登峰造极,工业物价超过农产物价,产生米价指数低于他种物价的倾向。这对于农业一般是不利的,但是尚无土地所有权分散的基础,所以土地还继续集中的情势。反之,农业的萧条倒反容易造成土地集积的原因。其次,大正七年至十二年之间,日本资本主义尚继承欧战期的景气,工业还在发展时期,所以土地的所有既未有显明的集积,亦未有分散的情势。但至大正十二年~昭和三年之间,日本资本主义碰到欧战后景气的倒降,农产物价低落,土地负担增加,再加以承继上期以来的佃租减轻运动(例如每町步佃租,明治十七年与大正十五年的变化如下:东海岸三县由 1.12 石减至 1.04 石,近畿六县由 1.41 石减至 1.37 石,中国五县由 1.30 石减至 1.27 石,北陆四县及关东七县仅能维持其原状,其他增加的地方仅东北六县及九州五县。促使地主放弃土地。这时期地价的急速低落,使地主方面高唱自耕农创定及维持政策,甚至主张土地国有,都是具体的证明。迨至昭和四五年间,日本资本主义业已备尝一般恐慌的滋味,农村恐慌特别深化,细小自耕农的没落已经不是单靠政府“自耕农维持政策”所能阻止的了。于是土地所有权完全依据资本制的资本集中原则,急速集中。此时,小农的经济困难逼使他们不能留恋于土地所有权,不管地主及商业高利贷资本家愿意与否,土地是急向他们的手里集中的。下表可以证明:

## 资本主义确立后日本土地集积的动向

时 期	自耕地		佃种地		总面积 (町)
	面积 (町)	比率 (%)	面积 (町)	比率 (%)	
明治四一~大正元年	3,138,941	55.0	2,569,457	45.0	5,708,398
大正二~六年	3,233,610	54.6	2,692,820	45.4	5,926,430
大正七~十一年	3,318,445	54.1	2,819,502	45.9	6,137,947
大正十二~昭和二年	3,289,276	54.1	2,897,445	45.9	6,078,406
昭和三~七年	3,157,251	52.9	2,813,853	47.1	5,967,506
昭和八年	3,186,804	52.9	2,841,959	47.1	6,028,763
昭和九年	3,179,831	52.9	2,816,059	47.1	6,005,841

(注)本表之编制根据 1936 年度《日本农业年鉴》52~53 页。

日本自耕地之渐减及佃种地之渐增,是一直线的发展,直至昭和四五年间这种情势始略为停顿。而这种停顿并不是自耕农的增长,只是昭和五年以后农业恐慌逼使中小地主沦为自耕农,佃农沦为工资劳动者的反证。这时期的土地集积有一特色,就是土地集向银行资本及国家资本之手,是值得注意的。

### (3)最近土地兼并的动向。

1930 年日本农业恐慌爆发以来,日本的土地兼并发生一个新动向,农业恐慌爆发以后一般农家皆收入激减,金融梗塞,其穷苦达到极度。农家的负债,不要说还本,即

连利息也都无法偿还。结果,不动产抵押借款的债主终不免于抵押竞卖的执行而丧失其土地的所有权。当时,不动产抵押品的土地之集中,约有两种动向。其一就是融通各种农业经营资金给农家的各种银行。其二是融通低利资金的政府。国家资本及银行资本即欲竞卖抵押品的土地,也碍于无人购买,而农家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不集中到他们的手中。于是发生所谓银行地主及国家地主的新形态。关于这方面尚无全国普遍的调查,但只从部分的及侧面的新资料也可以证明一般的情势。

长野县农会曾就长野县全县作过最近土地所有权移动的调查,得到银行地主产生的结论。兹据帝国农会报第25卷第3号所载“长野县银行土地所有增大的倾向”,节译于下。

长野县下银行地主发生的情形:恐慌以来地方银行的农村放款资金大为凝固,其收回年益困难,担保物的土地的价格低落激甚。加之,地方银行的存款激减,地方银行完全濒于破产,昭和六年的金融恐慌中,四银行竟至停业。存款方面,本店在县内的普通银行及特殊银行皆大减少,而本店在县外的银行倒反增加;放款方面本店在县内的银行减少,反之本店在县外的特殊银行大为增加,由于县外本店的普通银行的放款特别减少的原因而地方普通银行窘于存款的减少及放款的固定

化。反之，县外本店银行则因存款之增加及放款收回的进展，乃至特殊银行的存款及放款的增加而农村资金愈益流出县外，更加助长地方金融的梗塞及地方银行的恶化。

由于这种地方银行营业的不良，促进了银行的合并，县内本店银行 45 家，在昭和七年合并整理成为 17 家。因此，债权集中的结果，对于农家负债的支配力强化，促进了负债的整理。银行对于农家负债的提取激烈，成了临时县会的问题。

银行放款整理，运用其抵押权，在地租征收不可能的场合竞卖担保物。现在农家处于不能支付利息的状态下，其抵押品的土地自不得被竞卖。此时银行即将土地付诸竞卖，亦因极少购买土地的人，这些土地自然要归到银行手里。

这样登场的银行地主固然不愿死守其土地至于最后，但是这种土地即令利用小农的土地所有欲一时加以分割的处分，也因连年的萧条，农家经济不得好转，而再因债务的不履行，土地重回银行手里。土地所有制渐次变成银行土地所有权增大的情势。

银行土地所有权增大的实状：根据县农会的调查，昭和五年以降逐年银行的土地所有面积如下表。

### 长野县银行土地所有面积

	昭和五年	同六年	同七年	同八年	同九年
水田面积	1,492,100	1,699,727	1,832,013	2,484,425	3,029,100
指数	100	114	123	167	203
旱田面积	1,859,506	1,932,826	2,101,224	2,676,625	3,202,015
指数	100	104	113	144	172
山林面积	3,832,101	4,397,126	4,968,820	5,227,529	15,970,702
指数	100	115	130	138	418
原野面积	1,819,204	1,870,016	1,719,200	1,851,310	2,085,800
指数	100	103	95	102	115
宅地面积	703,905	687,416	810,701	923,221	1,133,103
指数	100	98	114	131	161
合计面积	9,695,816	10,587,301	11,423,028	13,208,320	25,420,720
指数	100	109	118	136	262

(注)调查根据每年1月1日的土地地帐所载面积。

如上剖述及数字所指示，农业恐慌以来长野县的土地所有权逐渐集中到银行手里，并且不是地方银行，而是县外的巨大银行。其中，特别是田地山林的集中尤为显明。其结果，最初不愿意死守其土地所有权至于最后的银行，也终于不得不专设所谓“土地公司”，以专门处理所有地，于是银行的土地所有权遂得其永续性，而银行地主的地位固定化。

其次，国家资本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支配实况如何虽无详细的统计，但只据政府低利资金之巨额的放出亦可知其大概的情势，国家资本之雄大是日本经济机构的特色，而其侵入农村亦与年而俱增。这是由于低利资金的放出。低

利资金可以分为两个体系,大藏省储金部资金及简易生命保险积立金。这是由国家的金融机构吸收民间的零细资金再转放出去的一个路径,由此建立国家的金融支配权。储金低利资金又分为普通资金及特别资金。普通资金在农村方面贷与耕地整理组合,产业组合,森林组合,渔业组合,及畜产组合等,特别资金则以特殊的目的,例如救济灾害,米谷应急等目的而放出。

普通资金之贷出如于明治四十三年,现在截止的贷出总额达 37,000 万元。这种资金特别是在近年激增的。明治四十三年至大正四年之间每年的增加平均不过四五百万元,大正十四年以前激增 1,000 万元,昭和六年以前更增加 3,000 万元,7 年以后也有 1,300 万元。

储金部特别资金发端于大正十二年的赈灾救济资金,至昭和九年十月截止合计放出资金十亿元。这种资金从昭和二年以降始增加。昭和元年不过 2,200 万元,昭和二年度则为 21,000 万元,残额的 67,000 万元是昭和五年至九年的五年间贷出的。

简易生命保险积立金的融通额虽然不多,现在截止不过 11,600 万元,但有一种特色,即融通给自耕农的资金,占绝对多数,约为 11,000 万元,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以上数目皆据 1935 年《日本农业年报》380~384 页)。

日本国家资本在农业恐慌期向农村急增的进出,与农民之破产而促进另一种的土地兼并,是极其自然的情势,所以今年来国家地主的新发展,是不待数字之证明而可以

相信的事实。

## 二、日本农业经营形态

### (一)日本土地制度对于农耕形态的规定

那一个国家的农业经营形态,皆为其社会经营的条件所规定。其中、土地制度特别是规定农业经营形态的第一原动力。日本自然也不能出此例外,日本是以过小农经营著名于世界的国家,大部分的农家皆耕种着不满一町步的土地。并且这个细小经营形态是承继封建末期下来的,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变动之后,其细小形态只有愈益普及化。这一点是日本农业经济的主要特色之一。

大凡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变革的国家,其农业经营形态普通皆向大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始祖的英国及后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是如此,固不消说,即如德俄也莫不如此。即以小农经营著名的法国,本质上也与日本有异。考茨基所主张的大农优越性,是有其普遍的适当性的。然而日本的农业经营形态,何以能够独异其趣呢?经过长期资本主义特别是独占资本主义的浸淫而不能改变其细小农业经营规模,其原因何在?简单一句话,主要原因在于细小农忍受饥饿冻馁的特性——考茨基所允许的唯一的小农经营的优越性。日本的土地制度正好逼迫着一般的耕作农民发挥这一点优越性。换言之,日本土地制度的特性已把农业经营的细小形态规定好了。



1、日本佃种制度对于细小农耕规模的规定,关系土地制度对于农耕规模的规定,首先应该分析的就是上文一、日本土地所有制度所述日本佃租制度对于农业经营规模的影响。日本的佃租是异例的高率,这就是阻止农业经营大规模化及资本主义化的第一原因。一般佃农的负担(直接缴给地主的佃租及间接缴给政府的公租),占农业总收入一半以上,甚至于68%。自己的所得额不过32%,再除去种籽及肥料等费用,所剩实在无几。(详见本书序论)这个68%的绝高率的负担额,并不是单纯的地租成分,其中不但包括着利润的全部,并且包括着工资的一部分。在佃农的收入当中,适当于工资的部分极为低微,其单位工资较之一般的工资廉贱得多。

佃农资与一般工资比较表

年 度	充当工资 收入部分(元)	自家劳动 日数(日)	自家一日 工资(元)	普通工 资(元)
大正十一年	11.87	21.3	0.56	1.60
同十二年	11.43	20.5	0.75	1.56
同十三年	29.93	20.2	1.47	1.61
同十四年	35.04	20.8	1.68	1.56
昭和元年	27.89	19.5	1.34	1.44
同二年	27.48	19.1	1.43	1.52
同三年	23.04	21.0	1.09	1.43
同四年	22.58	23.7	0.95	1.28
平均	24.16	20.8	1.16	1.50

(注)本表节录上引东浦氏同书 129 页。

以佃农的总收获额减去全部经营费(包括佃租)剩下的部分,假定为自家劳动报酬部分。这部分换算为单位工资,则佃农自家的一日工资在大正十一二年间仅及普通工资三分之一,即如最近的昭和四年度仍尚差很远。固然其间亦有近于普通工资的年度,但是以大正十一年至昭和四年八年平均数,尚且相差很多。在昭和五年以后的农业恐慌期间,其差值恐怕更要增大。

地主不但以佃租征收地租,并且掠夺经营利润的全部及工资的一部分。拥有土地的地主,与其自己耕作不如出租土地较为有利。租地经营既无利可图,资本家及企业家也就不会投资于农业经营上。因此,日本近世史上,只没有土地资本家的显著的发展,而却没有农业资本的膨胀——除去北海道的情形略异者外。日本农业经营规模的细小,就是为这个异常高率佃租所规定的。

2、自耕农经营对于细小农耕规模的规定,在日本的农业经营上,不但佃农的经营规模不能扩大,即自耕农的经营也无法扩大。自耕农的经营现状亦是规定农业经营规模细小的动力。这乍一听来好像是矛盾,其实处在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机构中的细小自耕农,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日本一般的细小自耕农本来的实力即极其薄弱,再加以高率租税,强度的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不但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即连单纯的再生产也须在兼营副业,充当工业劳动者,及累积负债的情势下始得勉强维持过来。

日本资本主义是在极度剥削农村的一贯的路线上发展下来的。第一应先指出的，“地租改正”后的地税负担额，在全部国税收入当中占 80% 以上，其后的比率虽然随着都市工业的发展而渐减低，但是农民负担的绝对额仍未稍减。这种奇重的剥削。自耕农自然也不能幸免。其次，就是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日本的现代金融机关，虽然随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已相当发展，并且侵入农村。但是在农村方面能够利用这种现代金融机关的，只限于拥有巨大土地抵押品的地主及富农。至于佃农及细小自耕农，则依然忍受着前资本主义的高率剥削，即连信用组合的放款，他们尚且无法享受。第三，细小农民所受的剥削，就是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农民因受季节需要的逼迫，不得不以低贱的价格出卖农产品而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工业制品。肥料的独占价格，即其主要的例子。这是近年来产业组合运动始发的原因，但是产业组合运动仍无更大的效果。

处在超重重凌辱剥削之下的细小农民的农业收入，当然不足自家的费用，必须兼营副业及充当工资劳动者，始得维持生计，扩大再生产简直是他们所未梦想的事情。且看农家的收支的情形。

昭和七年	自耕农家的总收支(元)
农业所得额	544.22
兼业所得额	118.73

(续表)

家事收入额	39.84
共计	720.79
家计费	631.57
剩余	71.22
六年度剩余	10.34

(注)本表的编制根据 1936 年《日本农业年鉴》。

上表所指示的，单以农业收入尚不足以计费的开支，加上兼业收入(包括工业工资)及家事收入始稍能收支适合。单以农业收入不足开支亏缺一百元之多，即加上兼业收入及家事收入，开支后所剩的也不过七十一元二角二分，若六年度的剩余更少，只有十元三角四分。尚须注意之点，这个调查是以较为富裕的农家为对象的。

3、规定农耕规模细小的其他原因除开上述两种关系土地制度的基本原因以外，阻止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副因，尚有几端值得顺为分析一下的。第一，农业以外的资本利润较为优厚。不但阻止都市资本流入农村，倒反由农村吸收资金。第二，日本农耕上特有的主要米作，隔离世界市场，受到价格竞争的影响较小。第三，一般的工资特别低廉，使用机器的生产费大于使用劳动力的生产费。第四，日本的地势富于山岳，很少大平原，故不宜于大机器的耕作，这些原因在社会经济机构变革后固然可以克服，但在农村经营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阶段上，依然不失为阻止农业

经营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

要而言之,日本的农业经营规模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质,特别是土地制度的特点规定好的。日本农业经营之停滞于过小农的状态,在现阶段上是无可奈何的。

## (二) 过小农耕的发展过程

日本半农奴的过小农经营的发展,正和现代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步着相反的方向。各国的农业经营规模,愈远离封建的时代愈加扩大,而日本则适得其反,其整个的社会经济愈益资本主义化,其农业经营规模愈益缩小。日本农耕的过小规模,不但承继着德川末期,甚且比之德川当时更为缩小,是极有趣味的事情。

1、德川时代的农耕规模,就一般的动向看来,日本农业经营规模是年益缩小的。即如明治初年的规模亦不及德川时代之大。德川幕府当时有几种原因阻止着农业经营零细化。第一是土地买卖及分割的零细化的禁制。因有这种禁制所以当时虽然很少大地主,而十町步及五町步的中小地主却占多数,并且这些地主都由自己经营。第二,当时的负担过重,所以土地所有者单靠“作德米”的佃租不足以维持,故须自己耕种较广的土地。第三,德川时代的政策及当时的风尚,认不劳的地主为寄生虫而加以排斥,故大部分地主皆不得不自己耕作。第四,当时的人口是相当过剩的,政府的政策又将过剩的人口束缚于土地上。习惯上次男以下的子女不能分产,终于流为农村的劳动者,供给较大规模的农业耕作者使役,容易促成较大规模的耕作。第五,当时耕地面

积相对地较为广大。农村人口虽然相对地过剩但却绝对地减少,所以每人的耕地面积可以增大。当时的政府又极力奖励垦荒,较大规模的耕作,更有发展的可能。

因有上述几种特殊的原因,所以德川封建制下的零细农耕面积较大于明治六年“地租改正”之后。据山田氏搜集的资料,德川时代的农耕规模约略如下:

宝历三年(1753年)仙台藩内以“中民以下每一农民”的计算为基础而推想的耕作面积,是田六反步,旱田四反步,合计一町步。又宽政三年至四年(1791~1792年)当作“一切耕作农民的耕作亩数”规定的耕作面积,约当于六反步至七八反步。又安政二年(1855年)“良夫一人妻一人,农忙期日佣一人,全部三人”的耕作面积,是田一町,旱田五反合计一町五反步(《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194页)。

然而明治六年(1873年)“地租改正”后三府三十六县每一农家的平均耕作面积,不过0.88町步,明治三十七年北海道(最大区域)及冲绳县(最小区域)的特殊地域除外,一般内地农家一户的平均耕作面积,是0.93町步,大正八年是0.99町步,昭和四年是0.94町步(据上引同书的罗列)。

2、明治维新后农耕规模的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农耕规模,大体上是继承德川时代的。上面述过明治初年的农耕规模比之以前不但没有增大倒反减少。至少,我们可以相信明治初年资本主义经济未充分发展以前的农耕规模,是绝对不会增大的。因为根据一般的通例,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大体上是随着一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只

就资本主义确立以后的发展情况加以考察,则可明了明治维新后全部时期农耕规模的动向(因为明治初年没有具体的统计,所以不能用数字来证明)。

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明治四十年前)以后的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动向,大体上是愈益零碎化的。固然亦有几个特殊地方,因为特殊的情形而有扩大化的事实,例如北海道及东北区。但是这些地方的大规模农耕,是国有荒地无偿授与民间的特殊原因促成的,所以比较上采用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经营。反之,这些特殊地方的农耕大规模的反面,半段(段同于反十反一町步)以下的极小农耕却也同时增加,冲绳县方面更加停滞于极小农耕的状态。这些事实都是全局推定上应加注意的事实。

耕地广狭别农家户数比率增减表

时 期	五反未 满(%)	五反以上 一町未 满(%)	一町以上 二町未 满(%)	二町以上 三町未 满(%)	三町以上 五町未 满(%)	五町 以上 (%)
明治四一 年	37.3	32.6	19.5	6.4	3.0	1.2
明治四一 年以后五 年平均	37.3	33.0	19.5	6.1	2.9	1.2
大正二年 以后五年 平均	36.5	33.4	20.1	6.1	2.7	1.2

(续表)

大正七年 以后五年 平均	35.6	33.2	20.7	6.1	2.8	1.6
大正十二年 以后五年 平均	35.0	33.8	21.4	5.8	2.5	1.5
昭和三年 以后五年 平均	34.6	34.3	21.9	5.7	2.4	1.1
昭和八年	34.2	34.2	22.2	5.7	2.3	1.4
昭和九年	34.2	34.2	22.2	5.7	2.3	1.4

(注)本表根据 1936 年度《日本农业年鉴》，实数参阅同书。

根据上表可以了解几种事实。(1)五反步未满足的小农是一直线地减少下来。但这事实并不是说明农耕规模之扩大化,而只是过小农之无法维持而没落为工资劳动者的说明。(2)五反以上一町步未满足的及一町步以上二町步未满足的小农,都是一直线地增加,这才是小农年益增加的具体说明。(3)二町步以上三町步未满足及三町步以上五町步未满足的中农,却是一直线地减少。这和(2)项事实联结更加证明农耕规模的缩小。(4)五町步以上的中农经营略有增加。这是加算北海道及东北区的特殊地域的结果。在本项五町步经营者当中,北海道占去 80%。因此,资本主义确立后日本一般的农耕规模,确是一直线地愈益缩小化。这种倾向完全和土地所有权的集积,步着相反的方向,是饶有兴趣的事情。



### (三) 过小农经营的现状

1、农耕规模一般的现状 日本农耕规模是世界有名的过小农制。关于此点，由田盛太郎曾在其《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199页上，作过各国的比较。

这里为检讨日本农业的零细性而来试作农家每一户平均耕地面积的内外比较，在日本农业上，昭和四年(1929年)度，近畿区是0.73町步，东北区是1.46町步，北海道是4.45町步，内地总平均是1.06町步，朝鲜是1.58町步。反之，英国是12.3町步，包括附属地27.0町步(农业劳者等场合的关系除外)(1895~1923年)，爱尔兰是2.9町步，包括附属地14.0町步(同上)(1905~1918年)，法国是4.2町步，包括附属地8.7町步，(1892年~战前)，德国是5.5町步，包括附属地7.5町步(1907年)，美国是31.7町步，包括附属地58.0町步(1925年)，苏联是3.6町步，中国是1.2町步(Woytinsky, Die Welt in Zahlen. III 1926.S.22, 100, 104.帝国农会“中小农保护策”明治四十五年刊，第2卷，18~19页，那须皓《农业》，现代产业丛书第1卷所辑昭和三年刊，30~31页)。

日本目前农耕规模的情状，如下表所指示的，1934年度全国总耕地面积是6,005,841.4町步，农家总户数是5,572,000户，每一户农家的平均耕地面积水田及早田合计是一町步多些。这是包括北海道等特殊地区平均所得的，否则更小。

		1933 年	1934 年
耕地总面积(町)		6,028,764.4	6,005,841.4
农家户数		5,619,266	5,572,000
农家一户的耕地 平均面积(町)	水田	0.574	0.556
	旱田	0.499	0.505
	合计	1.073	1.061

(注)本表根据 1936 年度《日本农业年鉴》。

每户平均的农耕面积是 1.061 町步(约当我国十六亩),这是多么细小的规模。但是其规模之细小更有远过于此数的事实。这一町步有余的规模是一般的情形,若仅就佃农检讨看,其细小更堪惊骇。如下表所指示的。50 町步以上大地主的佃农每户的耕地面积平均不过是 0.66 町步——还须特别注意这是大地主的佃农之点!

阶级别(町)	每一佃户租地平均面积(町步)
50~100	0.46
100~200	0.57
200~300	0.78
300~500	1.02
500~700	1.09
700~1000	3.79(?)
1000~以上	1.93
合计	0.66

(注)转录东浦氏《日本农业概论》所载农林省的调查,(?)——宋附注。

又,农耕规模区别户数的比重,如表下所指示的,一町步未的农家占总户数 68%以上,而三町步以上的农家不到 4%,这是多么加强日本农耕细小的事实。

农耕规模别农家户数及其比重(1934年)

	户数(户)	(%)
五反未	1,932,721	34.2
五反以上一町未	1,906,800	34.2
一町以上二町未	1,244,149	22.2
二町以上三町未	317,764	5.7
三町以上五町未	121,365	2.3
五町以上	77,413	1.4
总计	5,610,943	100

(注)本表根据上引《日本农业年鉴》断载各府县农会农事调查后的推定。

2、地方别的农耕规模 日本农耕规模在地方的分布上极其不平衡。例如北海道特别区域每户农家的平均耕地面积,竟达四町步有半以上,东北区地约为一町步半,其余的区域除关东区及北陆区尚能维持一町步的以外,所余七区皆为一町步以下。

### 农区别农家每一户的耕地面积

总 数	1.06 町
北海道	4.54 町
东北区	1.42 町
关东区	1.08 町
北陆区	1.02 町
东山区	0.76 町
东海区	0.83 町
近畿区	0.73 町
中国区	0.74 町
四国区	0.69 町
九州区	0.93 町
冲 绳	0.63 町

(注)转录《日本农业概论》所载农事统计表(1931年度)。

从农区别看来可以得到四种典型:(1)巨大农业经营的北海道,(2)略大农耕地域的东北区,(3)细小农耕的近畿区,及(4)殖民地经营的朝鲜区。各区的农业经营的区别,不但在于其规模之大小,其各自的特质更是应加注意之点。

北海道的特质是经由明治十九年的“土地拂下规则”(转卖土地给人民)及三十年的“国有未开垦地处分法”创造成功的半农奴制的寄生的大农场组织。所以三町步以上的经营农家竟达 11 万以上,占总户数 20 万的过半数。其次尚有五反町未满足的农家 33,300 多户,占 15%以上,其余五反以上一町未满足,一町以上二町未满足,及二町以上三町

未满的农家，则皆占较小的成分，这是大规模经营及半工资劳动者的贫农掺杂存在的证明，同时亦是该区域的特色。

1933 年度北海道耕地面积别的农家户数 (户)

五反未滿	33,332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12,889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17,421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24,735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46,615
五町以上	64,283
总 数	200,266

(注)本表根据《日本农业年报》1935 年上半年期241 页。

其次，东北区在日本本部算是农耕规模较大的地方。这个区域和北海道同样，带着半隶农制的性质，只是阶级大小的构成略有不同罢了。北海道是以五反未滿的极小农及三町步以上的中大农占绝大多数，而东北区则以五反未滿的过小农，五反以上一町未滿，及一町以上二町未滿的小农，占 81.96% 的绝大多数。但在其二町以上的农家比重大于近畿典型区多多及其零细化较为缓慢之点，是其特色。

1933 年东北区耕地面积别的农家户数及其比率

	(户)	(%)	明治四一年至昭和六年的增减率(!)
总 数	630,863	100	

(续表)

五反未滿	168,023	26.63	(+)2%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173,614	27.52	(+)27%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175,475	27.81	(+)36%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79,584	12.61	(+)15%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29,574	4.69	(-)23%
五町以上	4,593	0.74	(-)62%

(注) 本表之编制根据《日本农业年报》1935年上半期244~245页,其中有(!)的注号之项,根据山田氏《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198页。

再次,以高利贷寄生地主为其特质的近畿区,其农耕规模不但极度的零细,一町步未滿的农家占82.38%的绝大多数,且其零细化的速度也极急速。在日本资本主义最发展的中心区,而其农耕规模则愈益步着相反的方向,是本区的特色,也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色。

1933年近畿区耕地面积别的农家户收及其比率

	(户)	(%)	明治四一年至昭和六年的增减率(!)
总数	577,873	100.00	
五反未滿	240,903	41.69	(-)10%
五反以上一町未滿	235,157	40.69	(+)10%
一町以上二町未滿	95,040	16.45	(+)4%
二町以上三町未滿	5,859	1.01	(-)4%
三町以上五町未滿	787	0.14	(-)39%
五町以上	127	0.02	(-)87%

(注)本表之编制根据上引年报 244~246 页,(!)注号根据上引山田氏同书同页。

最后的一个典型就是殖民地农业经营的朝鲜型。这区域的特质在于带着民族界线的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在这里,东洋拓殖会社“土地王国”,拥有土地 70,000 町步,管辖鲜人佃户 15 万家(大正七年度)官有土地 12 万町步,管辖佃农 26 万户(大正八年度),都是本区域的殖民地特质的证据。台湾殖民地的农业经营形态,(例如所谓砂糖王国的大农场)也可归纳到这一典型之中。但因不是日本内地的范围,故不加详细的剖述,俟后章页为细述。

#### (四)日本的佃种制度

由于日本土地所有制的特质及农业经营的细小,确立了细小的佃作制度,是个集中的表现。

##### 1、细小佃作制度的特性。

日本的土地所有权向兼并集中的方向发展,地主所得的剩余价值转投于土地上,都市的资本也有一部分集注于农村的。但是这种投资的性质是土地资本的投放,而不是农业资本的投放。因此,日本佃种制度特别发达,并且发展成为过小农佃种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于三种事实上:(1)大地主很少而中小地主较多,(2)每一佃农的耕作面积过于细小,(3)佃作大多兼营于小自耕农。

阶级别地主户数及佃作地单位面积

地主阶级别	30 町步以上 大地主	10 ~ 30 町步 中地主	10 町步未 小地主
地主户数(户)	76	126	229
佃农户数(户)	15,107	7,500	5,469
佃作地面积(町)	5,863	2,146	1,216
地主一户的佃户(户)	198	59	23
一佃户耕作面积(町)	0.3881	0.2662	0.2224

(注)未表根据上引东浦同书 118 页。

三十町步以下的中小地主占最大多数,佃耕地的单位面积也随其地主之细小而愈益细小,30 町步以下地主的佃户每人耕地面积平均在 0.22 ~ 0.26 町步之间。即如 50 町步以上的巨大地主的佃户耕地面积平均也不过 0.66 町步而已(详见东浦氏同书 117 页表)。

自耕佃种别农家比率表

	自耕农		佃种农		半自耕农户数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明治四一年	1,799,617	33.3	1,491,733	27.5	2,117,013	39.2
明治四一年以后五年平均	1,814,957	33.2	1,502,760	27.5	2,149,264	39.3
大正二年以后五年平均	1,777,416	32.1	1,531,794	27.6	2,235,871	40.3
大正七年以后五年平均	1,741,528	31.4	1,558,117	28.0	2,253,304	40.6



(续表)

大正十二以后 五年平均	1,728,418	30.1	1,520,959	28.5	2,295,242	41.4
昭和三年以后 五年平均	1,767,488	31.3	1,488,223	26.3	2,364,379	42.4
昭和八年	1,745,847	31.1	1,499,855	26.7	2,375,833	42.2
昭和九年	1,737,411	31.0	1,506,362	26.9	2,368,279	42.1

(注)本表的编制根据 1936 年《日本农业年鉴》61~62 页。

从第二还可以看出日本全部农民的约略 70% 处于佃种关系之下。再从上节列表,又可看到日本耕地约有一半以上是佃作地。在日本佃种制度中有一特色,即半自耕农比率特别大及其年益增加的趋势。这些事实都在说明日本佃种制度的重要性及佃租异常高率的秘密。

## 2、异常高率的佃租。

佃租之异常高率也是日本土地制度的特色之一。这种异常高率的地租是日本土地经济的封建遗制之一种证明。同时它的本质是承继德川时代的遗物,更足证明其所具的封建气质。从形式上说,德川时代的租税有由地主缴纳的,有由佃农直接负担的,在后者的场合,就是以佃租形态代替从来的公租。但是无论哪一种场合,在佃农负担公租及佃租(即所谓“作德米”)之点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明治维新后的佃租完全继承德川时代的遗制。再从佃租之高率说,明治的“地租改正”对于佃租之减轻毫无影响。当时的佃租大半未加改正,即有一部分改正的,也是以地价标准

的米收获额乘 60%至 85%，以决定佃租额，可说都是以旧时佃租为标准的。

“地租改正”前后佃农负担及所比率

	租米占收获米 比率(%)	佃农所得占收获米 比率(%)
镰仓府租法 (□年以后)	44	56
文禄田租法 (1594年)	67	33
贞享田租法 (1686年)	50	50
明治六年地租改正 (1873年)	68	32
明治四一~大正元 年平均	53	47
大正五~九年 平均	51	49

(注)本节录山田氏《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186页，详解参阅本书序论。

佃农的负担在当时是有增无减的，即至最近仍占甚高的比率。据东浦氏所引最近的调查，一季作田的佃租四十五县平均为 0.972 担，占收获米总额 1,908 担的 50%，二季作田的佃租，三十七府县平均为 1.195 担，占收获额 2,169 担的 55%。这样高率的佃租，无怪其与主要各国比较在数

倍、数十倍以上。例如每反步佃租日本大正十年一季作田为 31.746 元，二季作田为 39.597 元，而英国战前为 2.50 元，苏格兰 1912 ~ 1920 年平均为 2.00 元，爱尔兰 1881~1920 年平均为 1.80 元，德国 1913 年为 1.92 元，法国战前为 1.20 元 ~ 1.60 元，美国战前为 1.00 ~ 1.50 元。

### 3、佃租形态。

日本的佃租形态之封建性，即如东浦氏亦从事实说明着：“在日本现行佃种制度上，现物制是压倒的。旧时的赋役佃租乃至‘从属佃作制’的遗物，现在尚存在于各地方，而支付着劳力地租”（见《日本农业概论》119 页）。这样，我们即不引用所谓左倾作者的举例，单援用东浦的著作即已证明日本地租形态之如何停留于封建的地租形态上。

日本现代的地租形态，约可举出劳力地租，现物地租，现金地租，及代金地租四种，而前二者为压倒的，后二者仅限于特殊农作示其倾向而已。地租形态大体上依其耕地的性质，地方的习惯，及农作物而异。据东浦氏的推定，可分述如下列三种（《日本农业概论》120 ~ 121 页）。

（1）水田 水田的佃租几乎全国皆以米租为通例。山梨及长野等县，也有纳稻子的，但其社会意义并不引人注意。只是近来由于各种情形而采用钱租的渐有增加的倾向。

（2）普通耕田 耕田的佃租普通以来，麦、大豆，现金的单一租或参杂数种者为多。但其中仍以米租为最多，麦租次之，大豆及现金又次之。这里有一应加注意之点，即以

米为旱田的佃租。现物地租大体上是以纳本耕地生产物为原则,而不产米的旱田佃租则用米者占大多数。其故安在?这是旧幕府时代从一切的土地征取米产以为贡租,不使米留于农民手中的制度,换言之,是经由旱田的支配关系征收水田作物的制度的遗留,这照实指示着农民生活之隔离米的状况。

(3) 园地 园地的佃租通行全国的以米和货币为最多,而麦及大豆等物次之。园地佃租多通用米的原因与耕田相同,而钱租特别多之点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园地的生产物(桑茶及果实)不适于用作现物佃租,又园地生产物大多是近代的商品生产物也是一因。这些皆是园地经营完全转化为货币经济的结果,园地佃租之急激转变为现金地租的原因,也在于此。

关于上列三种耕地的现物地租,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物租种类并不限于米麦大豆等主要农产,且有陆稻、小米、白薯、大麻、纸、桑、茶等,有时甚至混用两种以上的作物。其次就是一般的佃农尚处于地主繁忙时提供劳力帮助地主的惯例。

日本农村业已相当货币经济化,被编织于货币经济网之中,而地租却尚停滞于封建的形态上,最大的原因是便利地租的剥削。这层上面已经详细述过,无需重赘,不过,因此而明治维新的“这个过程,本质上不是由自耕农到工资奴隶的创出过程,而是到借款奴隶的创出过程,不是‘近代性’的创出,而是佃作形态上‘封建性’比重的增加”,“布

尔乔亚革命的维新革上的封建性比重之增加”(《明治维新史研究》157页)。

原载 1941 年 1 月至 6 月《战时日本》  
第 4 卷第 3、4 期合刊至第 5 卷第 2 期

编者注：文中数字统计可能有误，为尊重原文起见，未作更改。

## 日寇通货膨胀的新发展

—

欧洲战局的扩大与激烈化,势将延及亚洲,战神的魔手摸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这情形下,好战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深陷中国战场的泥足,无法自拔,此后还要觉悟更大威胁及更困难局面的到来。日本目前最悬念的问题,仍是根本矛盾无法解消的苏日关系与美日关系。苏日矛盾丝毫不因为苏日中立协定的实现而解消,苏联用继续帮助中国及禁运军火过境的事实,粉碎了日寇当局一时“得意忘形”的幻想。所以日本论客仍谓“苏联虎视于日本背后”。苏联国防建设的成功与积极推行,更使日寇畏惧担心,近年来苏联加速度地增加国防费。中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只是175亿卢布,但是去年1940年则增至570亿卢布,本年度预算更增加至708亿卢布。美国现在的重点虽然在于援英击德,对于日本则暂采缓和手段,但是美日在太平洋上争霸的冲突,是与日而俱激进的。

日本朝野现在莫不以美国太平洋军事的增强为忧。他们对于美国本年度军事费的增加即已十二分畏惧，所以说道：“近年来加速度增加军事费的美国，今年度通过大国防预算 67 亿美元，明年更决定膨胀至 108 亿美元，此外又据对于武器贷与法再增加 70 亿美元的特别预算，总计 178 亿美元——约当日金 760 亿元。美国决定这样空前的超国防费，皆证明其用意不仅在对付欧局，而且是在准备太平洋战争。”（《东洋经济新报》1969 号）

在这种恐怖笼罩下，日本自不得不在贫困的国民经济上加紧压榨，并动员各部门经济，企图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准备应付未来更大的战争。但是这种办法，不仅是剜肉医疮，并且是饮鸩止渴。日本经济界将走上更高度膨胀及统制的途程。

## 二

随着世界各国军备的扩大而日本的庞大岁出已达到全国生产力不能全部消化的程度。现在为着筹划临时军事费而每月必须发行公债四五亿元。这笔款先由日本银行或储金部承受，以后逐渐转给普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乃至一般大众去消化。但是结果，不能全部消化，所以逐渐增加日本银行的（法定钞票）发行额，而致通币的流通量大大增加，去年 3 月中（15 日）的日本银行券发行额只有 382,100 万元，但在这一年中增加的数量竟达 92,800 万

元。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一年间停滞未消化的公债，又增加 138,800 万元。（日本银行普通以未消化出去的公债为准备金增发银行券）。若和以前的情形比较，其趋向将更明了，去年 3 月中（16 日）以前约略一年间日本银行券发行额增加了 83,300 万元，停滞公债增加了 80,500 万元；而前年 3 月中（18 日）以前约略一年间，日本银行券发行增加额，只有 49,000 万元，停滞公债也只增加 33,900 万元。公债未消化部分愈来愈多，本年度内还有不少不能发行的公债。日本银行也自随其比例而增发银行券。政府已放弃去年秋季以前的抑制膨胀政策；而走上通货膨胀之途。

### 三

日本当米内内阁当时曾经采用过抑制膨胀的政策，即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以后，这种政策还继续下来，一直到去年秋，都可以说是膨胀抑制的时期。

第一是国家预算的减少。自去年春七十五届议会，减少预算即成为日本政界的问题，政府也被迫答应极力紧缩。这个宿题在米内内阁没有得到解决，直至去年 9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才实现了节约，预定减少 11 亿元，其纯节约额是 64,000 万元。其紧缩的方式采用停付军部的预支，停止政府部分的支付，半强制金融机关购买公债，对于流通资金的贷出则励行报告主义等等。

日寇的膨胀抑制政策，不只实行于日本内地，同时也



采用于伪满。伪满比日本还率先断行财政的节约,即产业开发计划,也都紧缩至某一程度,银行的借款也采取紧缩方针,由日本到大陆的旅行者也受到极度限制,阻止旅行者之撒布资金,即连军事关系的支出,也尽可能采取节约主义。

日本一方面采用日元系通币的膨胀抑制政策,另一方面又强制实行其流通圈的扩大政策。在华北方面,去年8月强制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缔结通用伪联合准备银行券,加强了伪联银行的输出汇票集中政策,而扩大伪联银券的流通范围。在华中方面自去年年初即禁止日票的流通而专用军用票,即腹地的交易也完全以军用票为标准,断行了相当彻底的军用票流布政策。这完全是打击法币,抑低法币价格,提高日元的策略,终于引起了上海的金融问题。

然而日本的膨胀抑制政策,在通币方面虽有多少效果,但在物价方面则几乎没有积极降低物价的能力,再自生产的角度看,除重点事业以外,一般产业界都是愈加增高困难的程度。日本一方面集中军需部门的生产力,提高货币购买力,一方面却加膨胀抑制于金融界,自然不会发生很大的效果,倒反愈使产业界增加困难。因此,日本当局又不得不缓和膨胀的抑制,而自去年秋后急转直下,走向相反的方向。要而言之,去年春至秋间的膨胀抑制政策,只是日本高度国防体制推行中的一大波动而已。

## 四

日本自去年春至夏间，因为采取膨胀抑制政策的结果，无论是产业部门或是金融部门皆由停滞而入于萧条，百业不举，迫使日政府重新考虑新政策问题。再加上欧洲局势的激烈化，德国强拉日寇加入德意军事同盟，日本军部乘机强制日政府实施所谓“高度的国防”，而日本政府的膨胀抑制政策，遂一变而为金融缓和策，急速地再度走上膨胀的途程。

日本政府首先采取的应急办法，是由储金部放出短期贷款资金 5,000 万元，公司债抵押贷款资金 9,700 万元，购买证券业者现有公司债约 3,000 万元，总共约有 2 亿元的新资金出现于流通市场。同时，政府方面也再对军队方面实行预付办法及政府纳入品的部分付款等办法。其结果政府对民间的支付超过额，遂逐月增加，由 9 月的 9,600 万元到 10 月的 35,600 万元，11 月增加到 35,600 万元，12 月份更激增至 116,300 万元。在这 3 个月间的政府支付超过额共达 188,500 万元，比去年 171,000 万元，增加 17,500 万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这种金融政策的目，在于供给军需工业及其基本工业，以充分资金而刺激增产，促进所谓高度国防。

日本政府又经由日本银行实施其信用大膨胀政策，其途径约有两端：其一是对政府给予信用，增加公债的投资；其二是对民间给予信用，增加对民间银行的放款。日本银

行的公债(短期的政府证券除外)投资,在去年9月是倒卖出1,100万元,但自10月以后则反购进,10月份28,700万元,11月份23,200万元,12月73,800万元,3个月间累计总投资125,700万元。在同期间,政府发行26亿的巨额公债,而其半数为日本银行所承买。上年同期,公债发行总额165,000万元之中,日本银行只承受47,500万元,可见去年特异之点了。

日本政府膨胀抑制政策缓和的效果,首先表现于民间银行由日本银行借款的减少,去年8至12月期间正和前年同期间,走着相反的方向。此外由日本银行的一般往来存款的增加,也可看出日本金融紧缩情形的缓和。但是这种金融新趋向的发生,完全由于日本银行担受的公债增发,其结果又表现为银行券(钞票)的增发。自去年10月以后,日本银行券的增发额即开始激增:8月只有353,300万元,9月也不过是360,500万元。10月增至375,300万元,11月又增至387,400万元,12月更增至477,700万元。(皆据日本银行日报)

## 五

日本政府虽靠发行公债政策来筹划国防建设资金,来阻止金融界及产业界的颓势,但是公债的消化成绩并不很好:公债发行额尽增加了,可是消化率却反降低了。去年夏季的消化率尚有93%至冬季则降至51.6%,逼得日本政府

不得不减少公债发行额（由去年冬季的 26 亿元减至今年春季的 158,200 万元），另一面又强逼各界承销（财阀的承销额以百万元为最低度），才得到 100% 的成绩。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并没有因为日本政府的膨胀政策，及日本银行的信用政策而有活跃的发展。这点可从产业公司的股票价格的低落看出，据东洋经济新报社的调查，三十种产业公司股票平均价格的变动，是以去年 4 月的 96 元 90 钱为最高点，其后一直跌落下来，到去年 10 月竟突破 73 元 70 钱的纪录。以后虽有多少反涨，但直至今今年 3 月底，也不过恢复到 80 元。并且这次的反涨，并非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主要的是由于政治的刺激。第一，是日本政府的经济统制的缓和，其具体事实是近卫内阁的所谓新经济体制的实施，碰到一般财界的激烈反对而停顿或修正。第二，是昭和十六年度（即本年度）政府庞大预算的通过，这给予了一般经济界，特别是军事性工业界，以很大的刺激，形成战争景气再高一层发展的前期状态。第三，是德国在巴尔干的胜利，给予伙伴日本的人民以不少的慰安与幻想。第四，日本国内现状维持派（稳健派）势力的抬头，财界代表人物及有关人物之入阁，所给予日本投资者的兴奋等等。

日本去年秋以后再膨胀政策的反应，还可以从日本的输出贸易的变化上，求得一部分解答。日本去年 8 月以后的对外贸易，若与上年同期比较，则为相当的衰退，其输出贸易额的减少，8 月份即达 5,983 万元以上。甚至如 12 月

份竟达 11,857 万元，其减少率是：8 月份 15.9%，9 月份 27.6%，10 月份 10%，11 月份 14.9%，12 月份 25.6%。反之，输入方面并没有减少，更可说明日本经济界的动向了。

原载 1941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3 期

# 日寇的物产及动力总剖述

一国的动物,植物,以至矿产,动力资源,对于那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及兴衰,是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主张“地理决定论”,但是一切的自然条件在同样生产关系下决定种种不同的经济动向,却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在同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国中,检讨各自的动物、植物、矿产、动力资源,乃至其他的自然条件,也可以看出那个国家的工业、农业、渔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盛衰。

这里拟就日寇本国的动植物界、矿产及动力资源,作基本的检讨,以便了解日寇产业界的特殊情形,及对外的依存关系。

## 一、植物的分布

日本植物界的主要特色,就是种类繁多及数量丰富。日本的植物种类达 1,500 多种以上,其中由住民栽种的即有 400 多种。在日本的森林中也有 168 种以上的树木。这

比其他的地方多出很多。美国也不过 150 多种，欧洲仅有 85 种。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日本列岛之延长亘于寒带，温带，亚热带及热带。日本动物界的特色，就是陆上动物的缺乏及水栖动物的丰富。日本不但一般的陆上动物缺乏，即如家畜及家禽也极贫困。反之，日本的水中动物却极旺盛，占世界各国的最高位置。这是由于海岸线之富于曲折。1933 年度日本的渔业产额为 5,095,000 公吨，同年英国的产额却只有 994,000 公吨，挪威的产额（1932 年度）为 1,004,000 多公吨，美国的产额（1932 年度）只有 834,900 公吨，据金钢石社《经济统计年鉴》所载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每公吨为一千基罗格兰，略大于美吨，略小于英吨）。

日本植物的种类虽然多，数量虽然丰富，但于国民经济具有普遍意义的，则为数不多。其主要的，只可举出米稻、茶树及甘蔗、若海草、桑树及木材类等，则不过占次要的地位。再如棉、亚麻、小麦及豆类，虽产于日本各地，但是产量极其微小。这些主要食料及染料倒反仰给于外国。只棉花一项，每年由外国输入总额即达 14,099,000 俵（每俵一百日斤，据日本纺织联合会 1934 年度的调查）。日本植物的地理分布，约有四种区域，即热带，亚热带，温带，及寒带。其中以亚热带及温带的意义最大，约占全部领土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并且包括日本最重要的地方。热带地方占北纬 31 度以南的日本领土、台湾、琉球、南洋委任统治地，及九州南部皆属之。主要的植物有甘蔗、樟脑、竹、米、马

铃薯、烟草及种种果树和木材,其中特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当推樟脑(全部产于台湾,占世界总生产额的大部分),竹、米及甘蔗。亚热带的领土包括北纬 30 度至 37 度地方,本州的大部分,四国全部,及九州的中北部皆属之。这部分的代表植物,有米、茶树、桑树及种种果树。木材之中有日本松、常绿櫟、山茶、矮棕、杉、竹及日本枫树。温带地方位于北纬 38 度至 43 度之间,包括本州北部,朝鲜全部及北海道的西南部。这部分是日本最重要的森林区,所产木材供给全国的需要——特别是日人家用的燃料如木炭。农业植物之中有大麦、燕麦及各种豆类,在南部区域,果树的栽种极其普及,有梨、桃、梅、苹果及樱桃等。寒带地方仅占日本领土的极小部分,只有北海道的北半部、南库页及千岛列岛,位于北纬 43 度至 50 度之间。这部分的植物和同纬度的别个国家比较贫弱得多。这是受到寒流及暴风的影响的。只有针叶树的森林略具重大的经济意义,至若栽种植物的燕麦、马铃薯、亚麻、麻及食用草并无多大的重要性。

在日本的植物产品中具有相当的经济意义而又值得特别提出的,尚有木材的生产。日本的森林面积占日本领土的大部分,约当 54%。这种高比率仅见于斯干第那维亚各国(芬兰为 73%),在南部亚洲的热带地方,日本占第一位。森林及原野的面积(据日本农商务省的统计)达 43,575,000 公亩。不过,日本森林之具有工业意义的几乎可以说仅限于热带地方的台湾,其面积约为 2,200 公亩。故较有价值的木材资源在森林全部面积的一半以下,其他



部分的生产用作普通燃料。日本森林的地理分布,最密的为台湾,其次为北海道,再次为日本三岛。日本森林的所有关系也富有意味,约当 34% 的面积为官有(即国有),19% 归市村公有,7% 为皇室及寺有,民有面积不及一半,约为 40%。

## 二、动物方面

日本动物可以分为二大类别,即陆上动物与水栖动物。陆上动物极其贫乏,家畜及家禽尤其是缺少,是上面说过的。家畜之中仅有牛、马、豚、羊等,并且产量不多。这是日本肉类消费量微小的原因。1932 年牛的宰屠头数为 155 万头,豚为 274 万头,1932 年以前为数更少。此数若与美国的牛 1,280 万头(1932 年),豚 7,115 万多头(1931 年),羊 2,300 多万头(1931 年)比较,实在乎微其微(据 National official Statistics)。日本的羊毛更不得不全部仰给于外国,大部分是澳洲。

在日本昆虫之中只有蚕特具重要的经济意义,值得特别一提。生丝的生产在大正末年达到 95,000 多万元,最近还有 4 亿元内外的生产(1934 年度)及 38,000 多万元的输出(1935 年)。

然而日本水产动物却与陆上动物相反,特别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日本的水中动物可以分为海水动物与淡水动物。近年来海水动物的重要性之增大非常急速,已取淡水

动物的地位而代之了。淡水动物大多产于琵琶湖等湖沼，产额极其丰富，主要的有鲤鱼，鳊鱼等。养鱼业近来颇为日本国民所重视，特别普及于濑户内海各海湾，其次为东京湾、伊势海及北海道。鱼类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食物，聊可补偿肉类的缺少，故于日本的民食问题特具重要性。

日本海水动物的特色在其多样性，南自热带地方北至极北所有一切的代表动物大概皆有，日本的海水动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1)鱼类，(2)海栖动物，(3)软体动物及蟹。鱼类特别繁殖，所以日本渔业特别发达，不但用作食物，并且利用作肥料。

日本渔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极高的地位，其产额在世界各国中占第一位，每年输出额在 6,329 万日元以上(据日文《外国贸易月报》所载)。

世界主要国家的渔业产额

国别	产量(千公吨)	年度
日本	5,099.5	1933 年
英国	990.4	1933 年
挪威	1,004.2	1932 年
美国	834.9	1932 年
德国	409.0	1933 年
加拿大	339.0	1933 年
法国	298.6	1932 年
爱尔兰	212.7	1932 年
荷兰	212.4	1934 年

(注)据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日本的渔业近年来日益发展,其作业范围也日益扩大。日本的主要渔业区约有五个区域:(1)日本领土的沿海,(2)北海道近海,(3)中国近海,(4)朝鲜近海,(5)与苏联缔结协定的极东渔区,及(6)北美海岸区域称大洋区。日本渔业区近年来渐由濑户内海移向北方渔区的北海道及本州北部,更进而移向大洋。日本渔业的膨胀逐渐侵入苏联极东的领海及美国海岸的近海,年来纠葛不断的日苏渔业问题即可证明。其向南的发展也更加侵入我国的领海,所不同的只在于没有引起纠纷罢了。

### 三、动力资源

日本的现代资源是一般的缺欠,这个原因促使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即踏进帝国主义的阶段。羊毛的全部及棉花的大部分仰给于外国,铁矿的需要亦须依赖外国的供给。即如主要动力的煤及煤油的出产也都列于第二流国家之伍。远不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白煤(White coal指电力)在动力资源的比重较大于其他的国家,尚得补偿别种动力资源的缺陷。日本的发电量 1933 年是 18,160 百万基罗瓦特,在主要资本主义各地中仅次于英美,美为 82,379 百万基罗瓦特,英为 18,886 百万基罗瓦特(据日本

经济统计年鉴)。日本电力产量约占世界全部产额的9.8%,列为世界第三位。这是日本动力生产的最大特色。但若就其水力的潜藏资源加以检讨,则又不过3,000万吨,仅占世界储藏总额2.5%,降为第十位。日本的水力电气业已充分发展,同时日本水力资源之开发也已达到全部储藏量的62%(据博博夫著《日本》第一篇第六章)。日本动力资源的前途,与此自煤资源的渐减及其生产费的增高相联结,依然是重大的问题。

日本的基础水力电区,是本州的中央部。那里有占全国71%的潜在水力资源,可以利用的成分为74%。全国几处最大的发电所皆集中于此部分,而供给其电力于日本全国最主要的工业区,如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及神户。日本电力的基础生产区,大体上与电力的需要区域接近,这是日本动力资源上的另一特色,更加增大白煤在日本工业上的经济功用。供给水力最主要的河川,在日本海岸方面有首占第一位的信浓川,其次有发源于猪苗代湖的阿贺川及黑部川;在太平洋海岸有木曾川、根利川、天龙川及富士川等。此外尚有几处著名的湖水,如琵琶湖、諏访湖及猪苗代湖等,皆为天然巨大储水池,良好的发电所。日本水力资源之地理的分布,列如下表,其功用随年来远方输送法之发展而愈益增大,更加促进日本工业之发展。

## 日本主要的水力资源

地名	利用可能量		实际利用量	
	最低	六个运转时	最小	占可能的比率%
东京横滨	1,027	1,793	396	37.6
名古屋	437	1,081	150	34.4
大阪神户	189	343	112	59.2
中部地方	1,711	3,203	418	24.4
西部地方	160	370	52	32.5
北部地方	791	1,526	236	29.9
四国	129	313	32	28.8
九州	376	805	174	46.3
北海道	310	625	82	26.5
合计	5,130	10,058	1,652	32.2

(注) 单位千基罗瓦特, 资料根据《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 Japan》, 东京世界动力会议上前原及森技师的电气部报告(报告书第十四号)这表的统计似未加算台湾的部分, 若再加上台湾日月潭的藏量及实际利用量, 日本的水力资源当更增大。

日本动力资源中占重要地位的尚有黑煤。日本黑煤的埋藏量尚无定论, 但据日本著名的地质学者井上禧之助教授 1913 年在第 12 回国际地质学会上的报告, 总量当为 872,700 万公吨, 其中业经开采部分为 31,500 万公吨, 当时截止的推定埋藏量尚为 841,200 万公吨<sup>①</sup>。1929 年渡边万次郎教授在东京世界动力会议上的报告, 又追补北海道及库页岛的资料, 推定 1928 年的埋藏量为 827,500 万公

吨<sup>②</sup>。又日本黑煤的采掘早即相当发展。1928年全国产量即已达36,799千公吨，近年来虽因生产费之昂贵而略为减少，但尚为32,484千公吨(1931年)。殖民地的产额且又年益增加。所以日本过去曾经长期充当过煤的输出国，近年输出量虽渐减少但尚足供本国之用。

日本目前黑煤的问题在于(1)生产费，即技术组织的问题，及(2)特种煤如焦炭的问题。这两种问题正和满洲的煤产及华北特别是山东的煤矿联络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黑煤资源之地理的分布，占最大比重的是北海道，其次为九州，再次为南库页，而本州的比重很低，仅高于台湾。这是日本经济比重上的例外事实之一。

日本黑煤埋藏之地理分布

地方别	现在埋藏量(百万公吨)	所占比率%
北海道	3,100	37.5
九州	2,635	31.8
南库页	1,584	19.1
本州	645	6.6
台湾	369	4.5
朝鲜	42	0.5
总计	8,275	100

(注) 本表资料根据《东京世界动力会议议事录》(1929年中)“Coal Resources of Japan The Imperial Geological Survey of Japan”P. 317。推算时期为1928年截止，朝鲜的埋藏量仅包括无烟煤及半无

烟的煤矿。

日本动力资源一般的特色,要而言之就是动力资源绝对量的微小及其种类的多样性。日本动力资源的种类除了上述的电力和黑煤而外,尚有煤油、泥炭、天然瓦斯、可燃性片岩及木材。但是日本全体动力资源的总量,在各国中占很低的地位,仅略高于意大利而已。

日本及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力资源

国家 \ 资源		总动力	黑煤	水力	木材
日本	百万公吨	15,778	6,820	5,188	3,493
	比率	100.0	43.2	32.9	22.1
法国	百万公吨	18,318	14,818	2,380	1,020
	比率	100.0	80.9	13.0	5.6
德国	百万公吨	225,120	218,794	3,000	1,231
	比率	100.0	97.2	1.4	0.5
英国	百万公吨	170,270	164,566	618	711
	比率	100.0	96.6	0.4	0.4
意大利	百万公吨	3,179	138	2,400	640
	比率	100.0	4.3	75.3	20.4

(注)本表资料根据 Popov 著《日本之技术的及经济的基础》第一篇第一章第三项。总动力之项包括煤、煤油、泥炭、木材及水电力,煤油及泥炭因其在日本所占比重过低故未列出,德国之项除去萨尔不加算在内。

日本天然动力资源之缺乏, 逼使日本尽量利用现有天然动力近于饱和点, 同时又高度压榨人类筋肉的劳动力。但是总的动力生产量依然低下, 远不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但是指动力生产的绝对量, 并且可以适用于人口的比例上, 是极有趣味的问题。日本的人类筋肉劳动力在各种动力中占很大的比重, 即如德国尚且远不及它。德国筋肉劳动力的比重为 5.6%, 而日本则为 19%。又其总动力生产量之薄弱如下表:

各国一日的动力生产量(单位时间及百万马力)

国家 生产量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劳力	40	15	21	14	21
黑煤	1,001	270	333	127	52
煤油	481	28	10	12	7
水力	121	4	13	24	30
总量	1,643	317	377	177	110
人口(百万)	122.77	47.71	62.34	40.74	62.94
每人一日生产量	13.38	6.65	6.04	4.35	1.75

(注)本表资料根据(《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33年 No.1 )美国的煤油项下包括天然瓦斯。



#### 四、矿产方面

和上述动力同具重要性而为日本列岛所缺欠的现代资源,就是矿物资源。日本的矿产量虽然随日本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年益增加,由 1877 年的 340 万元增至欧战前 1914 年的 15,610 万元,更增至战后的 64,130 万元。但其需要量的大部分仍仰给于外国。欧战后因为生产原费的高涨而日本矿物的生产又呈渐减之势。

年度生产实额(百万元)

1919 年	641.3	据博博夫《日本》
1921 年	332.6	
1931 年	282.2	据《经济统计年鉴》
1934 年	529.5	

1931 年以后是所谓日本“跃进”的年度,日本军事工业有急速的进步,但是矿物的总产额也不过如此,并且在这总额当中,朝鲜,台湾及南库页的产额约占去六分之一,日本本土的矿物资源之如何贫弱,可以想见。

在矿物中具最大经济意义的铁矿,在日本列岛偏又十分缺乏。据斯德哥尔摩地质学会的老资料,日本铁矿的储藏量不过 5,600 万吨,只占世界全部储藏量的 0.19%,纯铁储藏量 2,800 万吨,占世界的 0.23%(这是因为日本铁质较好,铁成分较多)。即据日本地质学协会的资料,铁矿的储藏量,也不过是确定部分为 4,500 万吨,潜在部分为

8,000 万吨。日本铁矿区大部分集中于北部,即北海道的南部及本洲的东北海岸地方——岩手县,那里有日本最老的铁矿山、釜石。日本铁矿只在其矿质之高及其位置与煤矿接近之点,可称为优点。但其仍须依存于太平洋沿岸其他各地的铁矿,却依然无变。因此,日本近年来愈益急向中国大陆及南部亚洲诸国侵入,构成太平洋问题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有色金属的矿物资源中,日本铜产占突出的地位。铜矿几乎遍于日本列岛,而集中于本州的北部及中央部,特别是茨城县、□木县。那里有最著名的铜山、足尾。其次为秋田县。四国的爱媛县,九州的东南部,台湾及北海道的小部分,亦有铜矿。据博博夫的著作,日本铜矿的埋藏量约为 15,000 万吨。日本铜产在矿产中占很高的地位,1930 年的产量为 79,033 公吨,1933 年尚为 69,000 公吨,足供其自用五分之四(1933 年的消费量为 839,000 公吨)。此外尚有铅和亚铅,贵金属的矿产中也有金和银,但是地位均不甚重要。1934 年的产量,金为 466 盎司,银为 6,804 盎司。铜、金及银的产量皆据 (Year—Book of American Bureau of Metal Statistics)。

在日本矿物中具最大经济意义的,须推非生矿矿物,例如粘土、硫黄、黄铁矿、砷素及磷。粘土之丰富造成日本为世界陶磁器的最大生产者之一。据日本商工省的统计,日本陶磁器 1933 年的总产额为 85,246 千元,1934 年的输出总额达 41,877 千元。又因为日本富于火山性而置日本

硫磺生产于重要地位。据 1926 年全世界地质学会的资料，日本硫磺的储藏量非常之大，仅次于两个地方，西班牙和荷属东印度。

世界硫磺储藏量(单位千吨)

地方别	实际量	推定量
西班牙	173	212
荷属印度	—	167
日本	83	157

日本硫磺的主要产地，是北海道(12~15千吨)，岩手县(20~25千吨)，福岛县(6~8千吨)，及群馬楯木二县(5~7千吨)。日本的硫磺生产有年益增加的趋势，以 1927 年的 47,775 公吨到 1932 年的 84,512 公吨，再增至 1934 年的 128,423 公吨(据《经济统计年鉴》)。

日本黄铁矿之丰富，亦与硫磺同样，促使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生产者之一。此二者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是重化学上根本生产的硫酸的原料。日本黄铁矿的生产也年益增加，以 1913 年的 114,000 吨到 1926 年的 417,000 吨，及增至 1929 年的 619,000 吨(据上引博博夫)《日本之技术的经济的基础》。

日本砷素的采掘，近年亦呈急速的发展。其产区集中于北海道、九州及朝鲜。日本砷素的总生产量已达 4,000 吨，几占世界总额 5%~6%。此外，磷亦有重要的意义，其产源亦为硫磺一样起因于火山的活动，日本磷的出产，更

有急速的发展。1913 年仅为 25,000 吨,自 1925 ~ 1930 年之间已增至 17 万吨左右。磷的用处在于充当化学工业,特别是军事性的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

日本运输机关的发达,更使上述非生矿矿物的经济意义增大,使在现阶段的日本经济占重要地位的化学工业能够完成其普遍的发达。非生矿矿物生产的增加,和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互相联结着。在这日本经济愈趋于军事工业化的时代,这些矿物,特别硫磺和磷的消费者,第一就是军事工业,其次为电气化学、染色工业、陶瓷工业、制纸业及冶金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扩大的今日,日本有色金属及非生矿矿物的生产,将更引人注目。

**注释:**

①《第十二回国际地质学大会议事录》第 1 卷井上教授的报告。

②“Transaction of the Tokyo Sectional Meeting World Power Conference” Vol,PP,307—317。

原载 1941 年 7 月 1 日《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3 期

## 日寇战时的死亡问题

中日战争发生以后，日本统治阶级痛切日军的精神道德颓丧堕落。特别是日本军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体格的衰弱，死亡率的激增，肺结核病、花柳病、眼病及其他各种职业病的普遍流行，致影响征兵不易，兵源缺乏。此种现象，连“天皇”也看不过眼，去年在他生日那一天，特赐 50 万元，作为“灭癆”基金。军部和厚生省感谢浩浩“皇恩”之后，发狂似的提出了改善青年健康，增进国民体格，强化民族，和保护婴儿，多多生子等运动。日本军阀这样表示对青年的关心，并非出诸慈悲，主要的是为了保证兵源的补充。它以为这样就可扑除各种社会流行病，增进军队的来源，殊不知此种病态，完全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

日本资本主义是一个什么制度呢？简单一句话，是一个吃人制度。

早在 1935 年 7 月，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氏在第三国际会议上，作了一个尖锐的政治报告，就以“日本现存的制度，是进行战争，制造饥荒，和蹂躏人权的制度”为题。在报

告中,冈野指出日本大众在日本国内所受的剥削,也正如在殖民地一样:“工农在日本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在地主的奴役下,在警察的暴力下,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人民随便遭受暴虐的警察逮捕毒打,以至成为残废;饥饿与疾病,威胁每个人的命运。

这样的血腥统治,造成了日本国民精神的丧毁,体格的衰弱,死亡的增加,自杀的日多,疾病的流行,这是天然的结果,我们知道,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建筑在对外输出的轻工业上。所谓价廉物美(?)的日货,泛滥着全世界。这完全以榨取日本大众为基础,来造成日本资本主义的繁荣的。

九·一八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又变成了半军事的编成,疯狂的备战,使得国民体格加速度的衰弱。在所谓“准战时体制”之下,扩大军备与扩充生产力愈益进行,劳动力的供给就愈感不足,因而强化劳动愈益加甚,而国民体格衰落的倾向就愈趋严重,日本人的死亡率也就特别增高。这里试把日本国民的死亡率和各国比较一下吧。据《改造》所载,1933年,日本每千人的死亡率为17.8%,法国为15.8%,意大利13.5%,英国12.3%,德国11.2%,荷兰只有8.8%,由此可见日本的死亡率,比任何国家都高出许多。

但这个资料,还未够说明日本统治制度的“文明”。请再看看日本人口问题专家上田贞次郎于《经济学者》杂志上所著《时局与人口问题》一文吧:

“日本人口死亡，以幼儿之死亡者最多，所谓多产多死倾向之严重，乃其第一特征。多产多死，在文化低落的国家，其倾向最甚。日本国内也是一样，像在文化水准被称为低落的东北地方（包括北海道），幼儿——只要为满五岁以下者——的死亡率，特别来得高。……现在日本全国平均未满一岁之婴孩，其死亡率占出生数 12%；再根据生命表，满 5 岁以下死亡者，约占出生者四分之一（即 25%）。”

“其次，日本人口死亡的第二个特征，是 20 岁左右的年龄层死亡数特别多。其原因就是肺病。假如把日本和英国的死亡率比较一下，英国幼儿和 20 岁左右的死亡率很低，自然，再以任何年龄层比较，日本人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结果，日本人平均寿命为 42 岁，而英国则为 54 岁，竟发生这么大的差别。……”

“妇女的死亡率，在她的年龄之某期间，特别来得高，这又是日本人死亡之一特征。40 岁以上，妇女的死亡率比男子为低；但从十五六岁至 40 岁为止，则以妇女的死亡率为高。”

请看日本帝国主义者“文明的”统治吧！一岁至五岁的幼儿，其死亡率竟那么高！此种现象，御用学者每每以欺瞒的遁词，归咎于自然现象，而一笔抹杀了资本主义机构的罪恶。上田贞次郎也把日本北海道地方死亡率的特别高，

归咎于文化水准的低落。但我们知道,日本封建残余势力最雄厚的地方,正是北海道一带。自九·一八以来直至现在,那个地方连年饥荒,农民们受不了饥饿与贫困的袭击,迫得把成千成万的女孩出卖给工厂主和妓院,有什么办法不使妇女的死亡率不高?又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高度榨取之下,妇人因肉体劳动过度,多陷于早产及流产。据 1936 年调查,以“包身工”姿态受雇而从农村大批流出的低廉工资的女工,占了日本全体工人 43.7%,而纺织工业的女工更占了 80.2%。自从战争发生以来,男子因多被征当兵,女工数目“尤其重工业”更骤增起来。去年 3 月为止,重工业中,男工增加率仅为 37%,而女工增加率则高至 51%,现在重工业部门,已有一成是女工(轻工业为 62%)。女工数目所以增加,除因男工缺少外,贪图女工工资低廉,柔顺耐劳,易于榨取,尤为最主要原因。例如自去年 3 月至今年 3 月,重工业部门男工的定额工资增加 3.4%,而女工则仅增 2.9%。从生理上说,女工本不能担任重工业的劳动,加以强化劳动结果,女工的死亡率只有激增,这便说明日本 40 岁以下的妇女死亡率为什么比男子高的根本原因。

其次,根据日本秀峴教授的调查,更可明了日本 20 岁左右的死亡率,其中尤以十五六岁女孩的死亡率为什么特别高。他说:不到 16 岁的童工,估工厂工人 52% 以上,而在这些未成年的童工中,女童工又占 97% 以上(即约 50 万人以上)。这些女童工的数目,几乎等于日本全体女孩的半数了! 因了生活条件的恶劣和过度劳动关系,这般不幸的女



童工,现在患着悲惨的肺病,驼背,及其他职业病的,已为数不少。由于这些事实——秀峴教授自问自答道——不由得我不恐惧:“这些未来的母亲所生出的孩子,能够负得起保卫国家的责任么?我们国家是在走进牛角的尖端了!”

日本人的死亡率所以比各国为高,自然由于国民体格的衰毁。而体格衰弱的原因,则又由于国民的贫乏,生活条件的恶劣,和一切的职业病。疾病中最主要的,要算肺结核病了。例如去年4月29日,东京朝日新闻就有这样的记载:“据厚生省调查,最近日本的肺结核病死亡者,一年达145,000人;患肺结核病者,则有150万人,其中过半数是青年,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死亡者,结核病占了一半。结核病的蔓延,是如何削弱了现下日本国民的体格,阻害国力的增进,可以想见了。”

同时读卖新闻亦以同样的口吻说道:“日本国民的死亡原因中,以结核病占第一。1918年结核病死亡者,达140,747人……破最高记录。后来虽渐减少,但最近又增加起来,1936年增至145,160人。如果结核病的患者是死亡者的十倍,那末,日本便有140万人以上是患着结核病,即每50人中便有一个。”

但这个还是1936年的数字,近二年来,结核病者究有多少,报纸是秘而不宣的。可是去年4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又登出这个消息:“据最近报告,今年日本国内的结核病者,达去年的三倍了!”由此推论,那末,恐怕现在日本至少有几百万的结核病者了。

这样日益增加的结核病患者，当然是削弱壮丁的体格的。这一点，我们从日本的征兵检查中，也可明显地看出来。据《改造》所载：1925年的应征者，每千人中有250人不合格者；1931及1932年，不合格者便增至350人；1936年再增至450人乃至500人。1936年的应征兵役中，有一半是患着肺病，眼病和花柳病。陆军省弄到无办法，只好再举一次复验，降低入伍标准，但是仍不能减少因病不能入伍者的数目（1936年军部《新闻班》调查）。

以这样的体质组成的日本军队，它的战斗力当然是很不可靠的，所以秀峯教授曾说：“从1931年起，我就研究关于保健问题，……我从研究中得到一个结论：日本军队在极快的将来，会发现体格非常脆弱的队伍。”弱体的队伍，必然影响到政治道德的堕落，军队素质的低坠，与士气的颓丧。这一点，连松井大将也不能不对于日军摇头叹息。

松井“凯旋”归来，《现代》杂志的记者唐岛基智三氏曾向他询问：日俄战争时的军队与今日的军队之间有何差异？他说：“今日的军队与日俄战争当时的军队之间，可以说本无何等变化。”但他接着又说：“只是所谓个性的修养，社会的道德，与乎武士的嗜好诸点，我觉得象是颇有不同，即是我觉得今日的，要来得较劣。此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当然有着种种原因，……要之，这是所谓国民的精神与社会的道德于这四十年间自然地趋于堕落所造成的结果。……”看啊！松井只是说“自然地”趋于堕落所造成的结果。但既是“堕落”，这堕落当然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机构

所造成的“恶果”。

这次中日战争，“堕落的恶果”充分暴露了出来。“皇军”原来，就是奸淫抢掠，军纪荡然，士气颓丧的队伍。以“反共”自任的皇军，在这次蒙伪边境冲突中，见了红军，也抱头鼠窜。1905年日俄战争当时，日军那种“日本精神”，今天已不知往那儿去了。

日本军阀十分清楚此种堕落现象，并且非常恐惧军队政治信念的动摇，所以拼命向青年宣传：日本主义是至高无上，征服世界的主义。“忠诚的日本人”应提高爱国精神。但是，这种教育政策，显然已失败了。现在正有不少觉悟的日本青年，都了解日本主义的宣传者真意何在，他们已和中国的弟兄们肩并着肩，在向着日本军阀作殊死的斗争了。

原载 1941 年 9 月《战地党政月刊》创刊号

# 日本人口问题与移民政策

## 一、日本移民政策的欺骗

“当做民族发展源泉的农业人口”！这是日本官方及其农业人口政策理论者的大标题；且将如何运用农业人口的移植以遂行其对外侵略，已可想见一斑了。

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地狭人稠”为口头禅以演绎它的侵略理论，这当然是欺骗之辞，日本的人口密度并不比我国江浙的人口密度高，日本过去向我内地移民没有显著的成果，固无庸言；即其移殖于朝鲜及台湾的人数，也并不多。日本移民国外的动机是侵略性的移殖。与普通因人口稠密而移住者，自异其趣。过去移殖于朝鲜及台湾乃至我国东三省的日人，大多是帝国主义先锋队的军人、警察、及专门以剥削为事的前资本主义型的工商业者。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发展是与英美诸先进国家，颠倒其程序的；英美等国先移其商业与工业生产者（经济的），而继之以政权如商权之确立（政治的），最后始殿之以军队的保护（军事

的);但是日本则先发动军队,最后输送工商业者。日本的武装移民,是世界移民史上最丑恶的事实。

然而日本这种最丑恶的移民政策,最近已扩大其应用范围,除工商业者之外,还更大规模实施其农业人口的武装移殖。这是日本侵略者更露骨的更尖锐的移民政策之运用。日本政府仍旧以日本地狭人稠为口实,但是事实却由正面反证了日本侵略者的狡猾。日本侵略者一面在积极推进其“满洲百万户开拓移民计划”,另一面却在实施其“本国农村确立十个年计划”,并成立所谓“皇国新农村确立运动案”,其主要目标在于努力维持日本农业人口40%的存在。换言之,日本本国的农业人口是在年年减少过程中,日本政府还须设法维持其比率不再减低到40%以下,而其侵略政策则又欲武装输送大批农业人口于国外;侵略者移民政策的荒诞与欺骗,已可于此洞悉其奸了。

## 二、日本农业人口问题的苦闷

日本在明治三十年代,还是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明治三十年以后逐渐步着低降的步伐,但其激减则自发动对我全面侵略战争的时候开始。日本为着侵略战争而动员二百多万的壮丁到前线,日本军队又是大部分构成于农业人口,其农业人口自然大为减少。据樱井武雄的统计,日本农业人口在中日战争前(1936年)尚占总人口43.1%,其后每年约减三万多户,每户若以七人计算,

每年减少农业人口当在 21 万人以上。日本农业人口的比率至中日战争四年后的 1940 年,竟降至 40%以下,39.88%。这与明治三十年间的 80%比率比较,已是大半的激减。这种减少,并不是日本农业生产性提高的结果,日本农村现在动用妇女劳动力,补充男子劳动力,其农耕机器化的程度尚无显著的进步。于是日本侵略者自己,也已大起恐慌,想设法维持其农业人口 40%以上的比率,这个决议案已明定于所谓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的“大东亚农业纲领”之中,但若再就日本农村近来出现了许多所谓“职工农家”,名为农家而实非纯粹的农业人口推敲,则日本侵略者的恐慌,当更深巨而急剧。日本农业经济理论家,也以“皇国农村确立的指导精神”为题,喊出“日本农村再编制”的呼声了。

日本农业人口是在激减过程中,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其原则在于预想日本内地总人口至 1950 年增到 1 亿,而其农业人口必须维持 4,000 万的程度。然而今日日本内地所保持的农业户数,只有 548 万户,每户人口以 6 人计算(据樱井),则其农业人口总数只有 3,268 万人,离 4,000 万人颇有距离。同时,日本政府,又在积极进行其所谓“适正规规模农家”政策,欲使每户农业人口减少而农业生产性增高,四千万日本农业人口的维持,当更困难,所谓“膨胀日本”现阶段的国外移民政策,陷于非常苦闷之中,也是当然的。

### 三、日本现阶段的移民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上述人口问题的苦闷中推进着对外侵略性的移民政策。

日本的占领区域,确已飞跃的扩大了。这些区域正需要着更多日本人口,去作侵略性的填补。日本军队已经开到我国东北四省,开到华北,开到华中,开到华南,还开到安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乃至荷属东印度等等地方,日本侵略性的移民政策,随其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的前进而分成两种方面:其一是以朝鲜、“满洲”,及我国内地为对象的大陆移民;其二是以台湾、南洋群岛,及我华南沿海为对象的海洋移民。这两种方面的移民政策,又可就其性质分成两种典型,即旧殖民地典型与新占领区典型。前者实施于朝鲜及台湾,后者实施于我东北四省、关内各地、及南洋群岛。而二者现在皆以农民移殖为特征。

日本新占领区移民政策的最主要对象,为我东北四省。日本政府规定“满洲开拓农村计划”,预定自1937年向后二十年间移殖100万户农家500万农业人口入我东北四省(日本称曰满洲)。此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五年计划预定移殖10万户,其立法的程序是先制定所谓“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其后以此要纲为基础而又制定“农地开拓制度”,“开拓与行政经济机构”,及“青年义勇队指导要领”。第二年复又制定“开拓团法”、“开拓协定组合法”,后又制定“开拓农场法”等等。

日本对我东北四省的农民移殖,至 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其粮食问题之严重化,而更加加紧推进,盖欲以我东北四省充当工业原料供给地同时又充当粮食供给地,自 1942 年开拓其“满洲”农民移民的第二期五年计划。日本满洲移民第一期五年计划实施的结果,共移 40,000 余户,102,000 多人,兹就其统计列表如下(1941 年底):

种类	户数	人数
集团开拓民	23,205	72,104
开拓团义勇队	10,784	10,789
集合开拓团	3,208	9,158
分散开拓团	2,902	10,699
合计	40,099	102,750

据日文《外交时报》昭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日本为着强行其所谓“日满一体”的农业政策,复由其“满铁总局”,“满洲拓殖委员会”,“满洲开拓义勇队训练总部”及“开拓”等关系机关,组织一个综合机关——“实行委员会”,继续研究移殖政策和办法,以期第二五年计划达到移殖开拓民(包括义勇队)22 万户青年义勇队 13 万户的成果。

日本旧殖民地移民的典型,就是对我旧领土台湾的移殖,日本一向对于台湾的移民,还是消极的态度,所以统治台湾 48 年移住台湾的日本人,包括统治上直接必要的军队警察及工业生产支配者,也不过 30 万。但自中日大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即一面为着加强“对岸政策”(对我华南沿海的侵略政策)的必要,一面又为着确立战时粮食政



策的必要,而开始实施其名符其实的移民政策。日本为衔接台湾旧殖民地与我华南新占领区而强迫或奖励台湾人中的青年及壮年农民,移住我国的被占领区,就中尤以海南岛为显著,然后让出肥沃富庶的地方,给予日本内地的农民移住。年来台湾人的田地无代价被强迫移交日本农民的,不知已有多少;日本农民移向台湾的数目,遂有飞跃的增加。据 1941 年度《台湾农业年报》所载,战争以来台湾日本移民数,只台南高雄两州及台东花莲港两厅这四个地方,即已超过 48,000 人,估量其全岛总数当在 12 万人以上(至 1942 年止)。此外,对朝鲜旧殖民地的移植,当亦一样。日本一面赶出朝鲜及台湾的住民,逼迫他们来大陆及南洋群岛当国际的流浪者,一面移植日本内地的农民,以期安定日本本身的粮食问题。只台湾一地,每年即可掠夺七八百万担,约占台湾米的年产量五分之四。

日本的农业人口,虽是年益减少,日本政府虽已焦急欲维持其农业人口的比率在总人口占 40% 以上,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于旧殖民地及新占领区,仍将积极推行其侵略性的移民政策。这是日本侵略者的一种矛盾与苦闷,同时这种少数民族国家大规模向外移植,也就是其本身瓦解、分崩、离析的一大前提。这是日本侵略者现阶段农业人口问题的真相。

## 日本产业统制的三种制度

最近在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上，最引人注意的事项，除了生产行政权的加强与一元化之外，就是统制会制度的成立。但是统营团制度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其先尚有“营团制度”及统制会社(公司)的先行制度存在，此三者现在虽成鼎足，但是彼此之间又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三种制度已为一般日本人视为产业统制界的三台柱，故特就其发展过程及其关联性和异同之点，略加剖述。

日本政府虽自“中国事变”爆发后即着手加强经济的统制，但是统制会社、营团及统制会制度，却是最近进入战时经济阶段以后的产物。在此三种制度当中，首先成立的是统制会社。其成立的原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国物资来源断绝，日本政府以统制物资分配为目的。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物资的缺乏问题就已日益严重，渐自一般的重要物资，扩大至于粮食。日本为增加粮食而率先施行统制于肥料的分配上，早在1937年7月，即先根据“临时肥料配给统制法”，组织了“磷酸肥料配给会社”，是

统制会社的嫡矢。继之,1938年复又相继出现饲料、硫安、洋灰、铁屑、旧铜、皮革类及橡胶鞋类的各种统制会社。至1939年更据“米谷配给统制法”而设立日本米谷会社,其次又出现汽油共赈会社,1940年更制定“特别会社法”,组织日本煤炭会社、日本肥料会社、日本输出农产会社,商工省及农林省也依其各别的统制法令,组织各自的统制会社。至此时,日本统制会社制度算已具体化。

但是日本统制会社制度的急激发展,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1年依“特别会社法”组织特殊会社,1942年更有根据“物资统制法令”成立了各种统制会社,无论在中央抑在地方,大有雨后春笋之概。尤可惊奇的,此种统制制度不独出现于物资方面,即在文化方面也都出现。统制会社是依“特别会社法”、或“一般会社法”组织的股份公司的形态,其根本性格为营利的财团法人。

其次,营团制度是根据1941年第七十六届议会日本政府所提“住宅营团法”、“帝都高速度交通营团法”及“农地开发营团法”,开始组织的,其后朝鲜及台湾方面,也都各依“住宅营团令”出现了住宅营团。至第七十八届议会,又通过“产业设备营团法案”,第七十九届议会再通过“重要物资管理营团法案”、“粮食管理法案”,而重要物资管理营团,及中央地方各种粮食营团,随之成立。后又根据“国民医疗法案”,成立“日本医疗营团”。本届议会又提出“交易营团法案”,日本有价证券交易所,且有组织日本有价证券营团之议。

该种营团的性格，自其出资之点言，有全部由政府出资的与官民共同出资的两种。所以出资者没有股东总会之设，完全由官方指派的理事机关，采取独裁主义，推行商务，是一种强有力的统制机关。这是营团与统制会社不同之要点。但其事业仍为经济事业，故其发展形态，为吸收统合民间出资者的一种企业协同体。

再次，统制会是最近成立的一种制度。固然，该种制度早在1940年12月制定的“经济新体制确立要纲”之中即已萌芽，但因日本政界的意见分歧，致使迟迟未能实行。至1941年8月，始以“重要产业团体令”的公布，而于同年10月第一次的指定统制会产业部门，1942年4月再追加指定，8月又有第二次指定合计指定二十二种产业，即须成立统制会。

其后，日本政府为着加强统制会制度，而由商工省委设该省有关的权限，最近则由厚生省委设其所辖权限，现在此种统制会已不独限于“重要产业团体令”所指定的范围，其他的新统制组织，也成立不少。

统制会的性格，在其统制组织上，虽然允许产业团体独立存在，但对于这些团体则强制其为会员而置于统制之下，所以会员总会，只不过是一种咨询机关。此点正与营团性质相同。

统制会的会长由主管大臣任命，其所管辖的会社或组合的社长、理事长、副会长，以至理事，皆由会长委任，总会的最后决定，是由会长的责任执行的。完全是一种独裁管

理制。其事业活动，限于统制事业，但不进行生产及配给等经济活动，此点与营团的性质不同。其为国家机关，并为条文所明白规定。

关于上述三种制度的性质，若作一综合的比较，则营团与统制会比较相近，纯然是以国家的目的组织的，其经营采独裁主义。而统制会社则尚保持营利主义的构成，政府只是尽可能加以统制，使得适合于国家的目的。

统制会与营团，也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允许企业团体的独立存在，而后者则否。至若统制会社，则又有允许的与不允许的两种形态。同时，营团带财团的性格较强，而统制会及统制会社，则为社团的性格。又营团及统制会社，是一种企业组织，而统制会则为统制组织。

从以上的剖述，吾人应该把握的一点，就是日本政府对于产业统制，愈想加强，而其实际则愈须放松，这无疑的，是由于日本产业组织的基本弱点，一时无法克服。日本的重要产业，一向采取严格的统制政策，在平时因大多局限于军需工业，并因其军需工业大部分归国营，故其统制比较容易。其他产业部门，如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等，其统制效率就非常低微。故自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急进派即主张扩大国营制度，或实施全面的国家管理。

但是实施国营制度，日本国家无此力量，即退而采取全面的国家管理，行政费负担及亏损的赔偿，也非日本政府财力所得办到，不得已而仅能于产业团体本身转念头。故于设立统制会社之后，为矫正其缺陷，也只能设立媒介

性的营团,从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乃至生产诸团体之间的介绍工作。期于其中获得统制的效果。至营团制度不能举全面的严格的效果以后,日本政府也只再设一种统制会,并由内阁有关各省委设各自有关的权限。于此,日本产业政策,愈离国营或国家管理愈远。这在充分暴露日本产业政策的现实与理想违背的实情。

日本关心产业问题的人士,迩来对于国营与民营争论甚烈,利润与增产的矛盾性,也已表露无遗。一般人对于日本政府较剧烈的国家管理,也都大表不满,以其政府所设限制与阻力太多,如关卡、租税、办理手续等等。日本统制政策,终于导致统制会的地步。

原载 1944 年 9 月 3 日《广西日报》

## 日本粮食增产政策的批判

### 一、粮食增产政策的两种意见

日本侵略者因其粮食的需要增加，外米的供给困难，近来增加农产的急躁，已闻名中外，而其农业政策的强化，愈益增加其重要性。

日本政府最近已实施其所谓“超重点的生产”，但此问题不只限于二三种类的重要工业，其根干的农业问题，也在其中。因为离开农业，则其他工业政策的推进，也不可能。如粮食不够用，则劳动效率不能向上，劳动力的不足问题不能根本克服，则工业生产的增强不可能。农业在补充劳动力之点，具有极大的作用。此点即自过去的经验，也自不能置于度外。

自历史考察，农业所完成的任务极大，其作用不自今日始，各国皆然，日本也莫不然。据日本人的解释，在明治维新当时，日本之得以抗拒先进资本主义各国，而促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实拜农业部门之赐云。即如军需工业及输

出产业的发展,也皆以农业部门为牺牲品。此种论说实有相当的根据。日本之所以登上资本主义的途程,大部分依赖农村的“资本原始积累”,即举租税负担为例,明治初年,农村的租税负担占至总税收 80%以上,而都市的负担竟在 20%以下。固然,日本农业在今日在作用与明治初年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日本经济之依存于农业,在某一角度上,依旧无变,在战时统制经济上,此种依存性尤其浓厚。故其农业对策,自然带上很重要的地位。

在今日日本粮食不够用的意义上,日本农业对策,自以粮食增产及农业技术高度化,为其主要内容。在外米的来源日益困难的今日,日本粮食增产的必要性,已为日本朝野所共认。即令日本政府指定超重点生产于运输技术,但是问题的根本克服仍不可能,外米的来源仍然淤塞。所以究根结底,农业对策的重心,在日本一般仍认其在于粮食的增产。

又如日本年来急躁于考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补给泉源问题,认其在战时经济所占地位极高,则解决劳动力泉源的农村生产问题,也是当然的归宿。农村生产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性,以增加农村劳动力更多的过剩,以供给工业部门更多的劳动力。这又是改革农业组织及农业技术的问题。日本政府虽然强调其“精神昂扬”政策,但其实际内容则在于技术的改善与经营规模适正化——这当然只是就目前日本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组织而言的,所以日本议论粮食增加政策者,也只注意于此点。



日本方面关于粮食增产政策,有两种见解,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现状改进对策”,其二是“现状加强政策”。前者主张农家适正化,经营机器化,用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性,积极图谋落后的农业高度化,而将其剩余的劳动力,移用于工业部门。此时,生产性比收获量,更占问题的中心。反之,后一种则主张:□□的情势不许急激的改革,即令强行农业的改革,在各种反逆条件存在的今日,反能阻碍粮食的增加,所以农业的改革,应留作后来的课题,现在只能就目前的情状,谋节约经营更加彻底;多产一粒米也都是目前当务之急。

## 二、日本政府的农业政策

日本的粮食问题,自去年外米来源发生问题而其国内需求增加以来,确已相当严重而上日本政治的日程,就去年米谷生产实状考察,1942年度的生产目标,原为71,639,000石,但其实产额尚不足428万日石,日本农林省虽夸为次于1919年及1925年的丰收,但仍难免其聊以解嘲之讥。不得已,日本政府又于去年11月底发表第二次预想实获额6,736万日石,其全年收获额始比前年实收额,增收12,272,000日石。

但其粮食问题的严重,日本官方也都不能否认。其所举原因为(一)外米输入困难,殖民地米产移入困难;(二)因国内人口增加而其需要急速增加。外米因船运不足用及各当

地军米的需要增加而来源已渐杜塞。即从来日本所倚为谷仓的朝鲜及台湾两处殖民地的粮食供给量,也已减少。朝鲜去年大闹旱灾,在播种期(插秧期)雨水不足,致去年的米产量,比平年减收七八百万日石的巨额,只实收 15,687,578 万日石,据日政府估计,本年度朝鲜米之移入,已不可能。又如台湾产米,据说第二期产不能比平年丰收,而日本内地从来榨取台湾产米,已超饱和点,台湾平年产米 1,000 多万日石,而输往日本内地五分之三至四,此后即令再加强压榨,恐也不能于无中生有。

再就其本国情形考察,日本本年度的旧米存量,比上年度减少,但其米的需要,却反增加了。日本人口近年大有增加,食米的需要也大增,据估计,本年度米的需要增加七八十万日石。再以劳务者及青少年孕妇的临时增加配给量,也需要一百数十万日石,所以本年度日本米的需供关系尚不可乐观(皆据日本农林省发表,内阁情报局《周报》330号)。

日本政府于是对于增加米产问题,大起焦躁,苦心孤诣地考虑农业对策。农林省经于召集全国道府县主务课长,举行“粮食增产协议会”,协议具体方案,计划本年度粮食的“飞跃”的增产,其时决定两项原则:

- 1、关于米谷增产上的重要改善事项,及其指导者及方法;

- 2、提高兼业低位收获农家的耕作田园的收获量,及放弃耕作解消耕地。

其中第一项关于增产米谷的重要改善事项,特别规定于1943年度的完成,故其为农业对策,更有其意义与作用,若抽出其具体要点,则有如下:

① 关于米谷增产上的重要改善事项:增加种植密度,稀薄播种,扩大秧地面积,确保除草次数,增施自给肥料,实施淡素质肥料的使用,稻热病及浮尘子的驱除;

② 关于指导方法:动员各种团体,活用有系统的指导组织,彻底发动明信片、印刷物、讲习讲话,实地研究会,及座谈会等。

据日文经济杂志《金钢石旬刊》2月1日号

上面具体方案,皆限于技术方面的增产办法,即其指导方法的活用全国的团体,及有系统的指导机关,也与一般没有两样,只本次会议所决议“农业团体统合法案”,若付诸实施,则本来四分五裂的指导统制,将趋于一元化,日本朝野也正如此期待,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日本农业团体先统合成功始可。

### 三、土地改良与机械耕种

日本目前的农业对策,大部限于技术的提高,所以此次会议,特别考虑到兼业低位收获农家的对策,其理由就

是：以获得自用粮食为目的的农家的单位面积收获量，一般低劣，不能协力于其农产物的供出，是决战下粮食增产确保上的“大障碍”。此种农家在日本佃农耕作中，也是最脆弱的一环，一向构成日本农业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固有施以根本对策的必要。但是日本政府的对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谋得解决，而只着眼于其收获物的增加，其具体办法如下（据《金钢石》杂志所掲載）：

- 1、昂扬农民精神，以举增产的实绩；
- 2、组织粮食生产实行共励委员会，以参画耕种设计，且由市町村农会以一人一户办法指导农家；
- 3、种苗消毒，育苗，肥料分施等作业，由部落农业团体，共同或一齐实施；
- 4、对于劳力不足的农家，施以劳力服务；
- 5、若希望缩减耕作面积，则先与农地委员会取得联系，而实行再耕作或共同耕作、
- 6、图谋妇女劳动力的利用，及其技术向上。

又为防止此种农家因劳动力不足而弃耕田地增加，并考虑两种事项：①为图增加生产力，而急速完成暗渠排水及土地改良方法；②普及农具，特别是水田畜力中耕除草机，旱田畜力中耕机，畜力挖薯机，以补劳力之不足。

日本政府固置农业政策的重点于土地改良及普及机械耕种上，但是实际上的效果，不会甚大，因为农业经济上的阻力甚多。只就所谓土地改良一项说罢，问题也极复杂。

日本的土地改良费，一向占很低的地位。例如每一日

石的生产费,在自耕农的总额为四十元四十六夷,而其土地改良设备费,则只有七夷,占 0.2%,每一反步的生产费总额一百零七元六十一夷,而其土地改良费则只有十八夷,占 0.16%。土地改良费,在佃农尤其低微。以如此低微费用,如何能够改良土地呢?日本一般通行的地力剥削问题,在战时仍无解决希望。

因而,最近日本各方面提起土地制度的改善问题,但是他们所注意的,仍在于技术方面,即土地交换分合的提倡。在日本现存的经济制度,实行集体耕农,既不可能,则此项土地交换分合政策,自也不能有过大的效果。

再如提倡使用机械耕种,以提高农业生产性,固也不失为增加生产的一种方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调整,也是一种解决策。但在日本现在的情况下,此种政策仍是此路不通行。战时日本正集中全力于所谓超重点主义的直接军需品的生产,无暇顾及农耕机械,姑不具论,即自农民本身言,也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镜花。单就经济情形比较优厚的自耕农说,以占生产费总额 0.16%的土地改良费的农家,如何能够付出巨额农业机械购买费,以从事机械耕种呢?

#### 四、日本政府的本意

日本农业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粮食的增产,尤其是食米供献量的增加,其所注意的对象,第一是增产,第二也是

增产,第三仍是增产。日本农林省的粮食补给政策,尤有更露骨的指示:

第一、增产麦类、番薯、马铃薯等杂谷,以增加米供献量;

第二、更彻底实施一般的消费规正办法,此后尽可能实施综合的配给;

第三、节约农家的消费,强化米谷的供献。

第一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很容易明了,毋庸赘言,其第二项及第三项农家消费规正与节约,则有如下内容:“业务用米及加工用米,如酿酱用米、酿酒用米及制糖果用米,除十分必要者外,皆极力禁用”。对于一般日本国民的食品消费,去年阁议决议普及“糙米食用及捣精限制”,如七分捣、半捣或三分捣(根据内阁情报局《周报》330号)。

总而言之,日本政府今日的粮食增产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迫使农村增加米的供献量,羊毛还要出在羊身上,日本“百姓”对于战时的压迫,将何以堪!?

日本政府 1943 年度的米产预思量,是 7,159 万日石,不足以应付需要,乃求之于杂谷的番薯,马铃薯,及麦类的增产。从单位生产量言,番薯占第一位,米占第二位,马铃薯占第三位,而麦类最劣。所以日本政府所希望番薯及马铃薯本年增产三四成,番薯 176,300 万贯,马铃薯 78,100 万贯,并又特别注意麦类的增产。自本年 1 月 21 日发动一个“麦类增产完遂运动”,其生产计划为耕种面积:大麦 423,466 町步,小麦 906,668 町步,裸麦 543,466 町步,总计

1,876,717 町步，生产数量：大麦 9,026,408 日石，小麦 13,601,354 日石，裸麦 8,326,210 日石，合计 39,153,972 日石(据内阁情报局所发表)。

日本政府显欲以杂谷代米产，而移食米于军用，而其粮食增产政策的“穷途末路”，于此可以具见，毋庸多加剖述。

原载 1943 年 9 月 5 日《大公报》

## 日寇的“超重点”产业

自从美英在太平洋上对日发动反攻并得节节胜利以来,日本朝野即开始在联合国总反攻之前,恐惧战慄了。六月间,日本政府匆匆召开第八十二届临时议会,其主要议案集中于如何加强对美英决战的各种设施,自非偶然。

原来,日寇早已规定今年为决战年,而以上次议会为“决战议会”,早在决战即将来临的觉悟下,通过许多关于应付决战的法案,此届临时议会,不过是企图再将上届议会通过的各种法案,更加加强施行罢了。但是所谓决战的意义,不只是军队对军队的战斗而已,尤其不是一次作战即算完了的工作。日本当局亦已觉悟及此,故重申此次战争为“百年战争”,并呼吁国民发动全面的总力战以应付一个跟着一个不断而来的决战。

在其与美英决战的许多连环当中,日寇感觉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生产战”,美国产业近年来不断的飞跃的发展,及其生产量的天文学数字的增加,已使产业生产性落后的日寇发抖而痛感将来战争的胜负,决于其与美英作生产比



赛的结果。所以在决战议会中通过的决战议案大部分与如何加紧生产,尤其是军需生产有关,其产业政策如此,即其政治上的决战,也莫不如此。日寇产业政策的新决定,是指铁钢工业、轻金属工业、煤炭工业、造船工业、及飞机制造工业五种,当所谓决战阶段的“超重点产业”,计划自本年起集中生产于此五种产业部门,以期提高最重要战时物资的生产性,增加生产数量,以便充分补充前线至于“无憾”,完成所谓“决战的趋势”。

但在日寇加紧决战生产施行超重点主义产业政策上,最关重要的产业行政指示,我们应先予以剖述,因为这个行政的新措施,是日寇施行超重点产业政策的关键,这就是本年1月28日,日本内阁情报局所发表的“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案要纲”的颁布,其概要内容如下:“凡关于钢铁、煤炭、轻金属、船舶及航空机等重要物资的生产扩充上,有特别必要时,内阁总理大臣对于关系各省大臣,得予以必要的指示;”“在前项物资生产扩充上有特别必要时内阁总理大臣,将关于劳务、资材、动力及资金,接受各省大臣的职权,应自己执行,或指令各省大臣执行”;在上项场合之下,总理大臣还将“行使一切行政官职,或其官吏的职权。”日本首相东条的独裁权,已由政治伸入经济,乃至产业界了。

从来,日本的内阁组织由于其经济组织及政治制度的多元性而采取各省独立自由主义,各省各有独自的权限,不相联系,故而至于互相对立,即总理大臣也都无权管辖全体阁僚,统一号令。1939年日皇虽已颁布敕令,规定内

阁总理大臣,得以命令各省大臣,但在事实上并未发生效力。直至今今年1月公布“战时行政职权特例案要纲”,又于上届议会(本年3月)通过“临时措置办法”,而总理大臣的产业独裁权,始算确立,日人称为“生产行政一元化”。

日寇即在东条的产业独裁政策下,加紧推行其超重点的产业政策,首先推行的部门,是制铁炼钢工业、造船工业、及飞机制造工业,因为这三种工业,在今日的战时体制当中,日寇认为是超重点中的重点。

关于制铁炼钢,日寇集中生产于五六家一流的重点公司,其最主要的公司,就是日本制铁公司,日本钢管公司两家。日寇的超重点政策,不但一流重点公司的集中,并且实行重点地域的集中,例如在关东地带,集中生产资材及劳动力于日本钢管公司。日本的钢铁工业,从来是利用海外的矿石,以供其内地的生产,大部分集中于官营的日本制铁公司。但该公司的成绩并不甚佳,生产能率不能比民间中公司高。为提高其效率,特于去年12月在八幡实施所谓“增产周”,最近又与钢管公司提携,日本制铁公司采用钢管公司的汤马士制钢法,而供釜石的矿石给钢管公司,放弃从来的官管臭架子,谋与民营公司合作。闻本年的新扩充,需要新资金,在五亿元以上。

在战时的制铁炼钢工业中,最为重要而困难的就是特殊钢的制炼,日本将特殊钢的制炼,集中于特殊制钢公司,该公司自七·七以来即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及战时下的特殊需要,而连续实施扩充计划,首先实施的是军用工场的扩

张。其次又建设新工场于川崎横滨,该公司以前因为生产资材及劳动力的资源枯竭,生产能率没有充分发挥,至最近日本政府予以奖励。定为超重点公司,正企图充分供以资材及劳动力,强令该公司积极扩充。

制铁炼钢,若说是重军需工业的基础产业,则造船造机及枪炮制造工业,就是该国基础工业的加工工业了。日本近年来造船的扩充甚强,因其需要迫切。自对我发动全面侵略以来遂感大量船运的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运输船更感不够用。所以日本近来以强制的办法,通令造船公司增加生产,现在日本的造船已由普通机的制造,扩充到木船的制造了。最近又指定超重点主义的造船公司,加紧其生产,其最主要的,就是三菱重工业公司、川崎工业公司、及浦贺船坞公司,就中尤以三菱重工业公司为超重点中的重点。

三菱重工业公司的生产范围,不独限于造船,即飞机及机器,也为其生产对象。三菱的机械、规格、精度,皆为日本工业界的代表,普通公司不能制造的,该公司都可以制造。三菱重工业是以三菱财阀的雄厚资本为后盾,故其生产设备,随战争之发展而日益扩充,日本政府也即利用此点,更加通令该公司大事扩充,一方面令该公司各造船工场扩充设备,一方面令承受江南船坞的委托经营,增设朝鲜重工业及台湾船坞。三菱重工业公司拥有制造大型船舶的特别技术,日本政府尤为器重。长崎以次各造船所已在锐意扩充中,最近又受昭南(日方资料只打××岛,据笔者

推测或即为昭南岛,即星加坡)的经营委托,积极于复兴工事。此外,川崎重工业公司及浦贺船坞公司,也都有积极的扩充;前者与三菱重工业齐名,号称日本造船界的双盛,后者因其位置于东京湾并与特殊方面有关系,在其扩充上有特殊的便利。

日本的钢铁制造工业,集中于三菱重工业公司、川崎重工业公司、住友股份公司、及中岛股份公司。三菱重工业公司,即因扩充飞机的制造工程,而于1942年10月,征收加倍增资的第一期消纳6,000万日元,其不足部分的资金,尚以公司债或借贷的方式汇通过来,其资金总额,已突破15亿元,各种事业皆在继续扩充中。

川崎重工业公司的造机部门,也属日本第一流的地位,其造机人材及技术,比较丰富,日本政府期望甚殷。日本政府对于川崎重工业公司的扩充,第一步先检验其资金部分,此次又加指定为超重点公司,而供以丰富劳力与资材。现在资金达20亿元,全部销清,日政府还敕令以公司债、借贷及特别资金的办法,扩增资金而扩大机船各工场的设备。

浦贺船坞公司,在造机工业之点,也是日本有数的公司。闻该公司以其造机部门,为造船的心脏部,以推行联贯性的制造。且以其拥有汽机、汽罐、蒸气扬航机等制造技术,而采用生产合理化办法。日政府一再奖励该公司扩充设备,如浦贺工场大扩充,青岛船坞能力的增加,四日市工场的建设等等。此外还对于该公司的子分公司的名古屋

造船公司,要求连续的扩充。

要而言之,日寇自入本年决战年以来,更加集中全力,以“必死”的狂态,从事于超重点主义工业的生产,其超重点中的重点产业,更谋其飞跃的发展。在日寇作战参谋部的估计中,美英本年或明年秋以前,当不至于对日实行总围攻政策,苏联向有与日本维持中立关系的可能,中国只能作局部的反攻,故总决战尚有待,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期,赶紧军需生产,以备未来。日寇现阶段的政略集中于此点,而贯彻于其本国及占领区。改军事战为生产战,是日寇作战上的进步,惟其如此,联合国家更应赶快设法破坏它的生产设备,勿坐大了日寇的战争工业生产。

原载 1943 年 9 月 8 日《广西日报》

# 日本战时中小工业的没落

日本工业生产性的低下，保持着普遍的中小工业存在，日本社会的特色就以此中小工业制品的消费，中等阶级为中坚，日本统治者曾将此特色夸示世界，其社会政策也以维持此中产阶级为方针。大凡住过日本的人，总可觉出中产阶级衣食住行的便利。

出自战争的需要，逼迫生产要素缺乏贫弱的日本，必须集中生产于战时必需品，尤其是军用品以来，日本中小工业就难免步入没落的途程。而日本社会失却调和，日本社会动荡不宁的一部分原因，也即孕育于此。兹述其中小工业的没落必然性及情形如下：

## 一、日本中小工业的内容

日本的中小工业一向在日本工业体系中占很高的比重（详见拙著《日本工业的危机》——中山文化教育馆版），直至中日战前，还都普遍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别

之可分为三大种类：(一)以农林产物为原料的农村家内工业，如各种织物、陶瓷器、制材、木制品、日本酒、豆酱、酱油、竹制品、茶叶、柳条制品及藤制品等，以至稻草制品、麦秆等；(二)大都市贫民街的家内工业，如席类、橡皮制品、珐琅制器、火柴、电泡等类；(三)农械及器具工业的承揽手工业，如各种机器零件工业。

日本此类中小工业，皆有其存在的社会经济的原因。例如第一类的农村家内工业，因其原料受到现地的约制及农家副业与兼业的经济关系，而致其生产技术不能脱离手工业的区域，其中尤以日本农家经济机构的缺陷，为最大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农业高地租的压迫，佃农乃至半自耕农的家族，必须兼营副业，以至充当廉价的劳工，另一方面又为平时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过剩，而小资本的厂主，得以就地经营中小工业生产。是以日本中小工业在都市高级工业发达的今日，尚得以普遍存在于日本农村，形成一种畸形的的发展。

再如第二类的都市家庭手工业，也几乎以同样经济机构的原因，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压迫，逼使日本都市生活者的家族，尤以需要为著，从事于生利□□，另一方面有些工业如制鞋、席类、□□等制品并不需要高级的技术。所以日本都市的贫民街住民的家族及农村的兼业劳动者，遂为小资产工厂主所利用，以经营此类中小工业的大工场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如电泡及火柴工业等，原可以大量生产，但事实上则为中小工业所代替了。

再如第三类的承揽工业,生产各种机器的零件,原可以由大工场从事于大量生产,但是在日本也以社会经济的原因:第一,日本的机器市场不大;第二,大工厂主愿意避免扩充设备费的增加;第三,在萧条乃至恐慌时期,可以转嫁其亏损于中小工业者。是以普遍地成立承揽工业者可以转而极度剥削农村兼业者及都市的过剩工人,故其经营方式为□□的行会制度。

## 二、中小工业的地位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日本中小工业是以日本家族劳动力及农村过剩劳动力为前提,而以低廉工资及高度能率为条件,其生产范围,普及于一般消费财的生产部门,以至侵入生产财的生产部门,而大量生产的大工业的发展受到相当高度的阻碍。但这是日本高率地租地税压迫下的农业经济及高度剥削下的都市低廉劳工制度所产生必然的现象。而其于日本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也可以想见。

然则上述中小工业,在日本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中,又具有如何的作用呢?

第一及第二类的中小工业,属于消费财的部门,日本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皆仰给于此类中小工业的生产。日本一般人民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布匹、杂货、粗物类、金属类、乃至酒和玩具,都不能离开此类中小工业,日本一般国民对于此类中小工业制品的□□者,已具有一种□□性。



其次,日本中小工业生产,在日本输出业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中日大战前,此类工业制品,占日本工业品的输出总额三分之一以上。日本即靠此输出以购返金属、金属矿石、废铁、工业用盐、汽油等日本所缺欠而急需的重工业及化学工业的原料,乃至重化学工业制品、高级机器类等。在日本国民经济组织之中,消费财的生产部门与生产财生产部门,缺欠彼此的连系,更不能相互依存,所以在其再生产过程中,必须依赖外国贸易,始得进行无阻。换言之,日本工业生产,在某一方面必须输入,但欲输入继续不断,又须继续不断的输出。再换言之,日本必须输出中小工业制品,始可以得到外国的重化工业制品。中小工业生产在日本国民经济上的地位,尤其重要。

### 三、中小工业没落的命运

日本中小工业生产,在其国民经济中,虽具有上述重要的地位,但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其所以存在的一面原因,渐因外国市场的丧失而渐减少。尤其自1939年9月欧洲发生第二次大战而畅销于欧洲市场的玩具、罐头等工业生产,失去大部分根据。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的生丝及丝织品,再丧失了美洲的最大市场,日本的中小工业,已走入没落的决定阶段。

自今年日本黷武政府决定“超重点主义”生产政策,决将所有的人力、物力、及生产设备,集中于战争必需品,特

别是军需工业,如制铁、炼钢、造船、造机等,日本中小工业,没有充分存在的理由。日本中小工业没落的命运,已决定于日本现阶段的工业政策上。

例如日本支柱工业的纺织工业(它完全采用了中小型的家庭工业或工场等工业的生产方式),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即已减少 90%的生产,现在日本政府更欲以此种手工业为牺牲,对于纺织工业,仅保留纺机 100 万锭及织机 300 架以上的大公司,其他中小工场全部命令停止生产。又如制丝工场原有数千,今只允许保留 150 家工场,家庭的制丝业,悉被禁止,自是必然的归宿。

日本政府的超重点主义的生产政策,对于中小工业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且又是日本一般消费者,特别是中坚业主的一大厄运,这是日寇对外侵略战争所赐予的恩惠。

原载 1943 年 9 月 23 日《广西日报》

## 美国雄厚生产威胁下 日本船运的苦难

### 一、美国造船的压力

在西南太平洋方面逐岛退却，在中太平洋方面受到“越岛进攻”，在北太平洋方面美国“空间要塞”日益加强，尤其在中国大陆上中美陆空军协力反攻日益加紧的情势下，日寇的“决战”心情，日趋慌乱而手脚皆忙了。

1943年，日寇将之称为“决战年”，春间召开的议会，也称为“决战议会”，但是事实上在军事方面并没有决战，也不能够决战。因为日寇一切的准备，皆不充分，且在决战准备的诸多条件的苦难中挣扎。日寇决战的姿态，延至1943年秋出关时，渐渐觉出苦头，1942年间作成的决战准备议案，已不大适用了。其基本原因，就在于船只的缺乏与海运问题的困难。

日寇的船运，不但目前处于劣势，同时且为美国雄厚

生产所威胁。据日方所披露,去年4月中美国造船所所交出的新造商船,即已达157艘,160万吨,破了美国造船的新纪录,一日平均造船五艘(据352号日本内阁情报局《周报》)。又据美国战时海运局长蓝爱漠所发表,1939年~1942年年底4年间,美国陆海军所征用的船只,共达356艘,500万吨。而1943年,美国的造船目标,定为1,800艘,2,000万吨以上。日寇终于喊出“战局的现实,常与输送船结着深切的关系,即在睡梦中也不应忘记”(同上)。

日寇大本营海军报道部秋间所发出的悲鸣,尤值得我们吟味:

“战斗的火花,确实在第一线散漫着。但若飞机以次的兵器、弹药、食粮及人员等后方的补充力,不能跟上前线的要求,则第一线非遭遇非常的苦战不可。美国正在蜿蜒5,000海里的广大海上,为克服万难而狂奔于第一线战力的补给增势,形成其根干的,不消说,就是船舶。近代战的兵站补给线的确立与否,就是胜败的决定要素,其原因也即在此”(同上《周报》)。

日寇已在美国船舶的飞速的生产之前,开始战栗了,且又为着赶紧制造船舶而手忙脚乱,其各部门战时生产也受了致命的打击。日寇大本营海军报道部的结论,称曰:“酬报在黄热瘴疠的第一线奋战的将兵的方法,只有‘铤

后’战力的增强。敌方现为统后战力增强而拼命，此次战争，即为美日统后战力的决战”，而日寇一切的“统后战力”又须决定于海运，故就此海运问题予以概要的剖述。

## 二、制海的重要性

近代海上交通的发展，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个节节相联的网，而整个世界之如此打成一片，又在海运交通上增加了重要性。

“制海即可以制世界，”这是世界舞台活动者的一个信条，但是“制海”的武器，就是船只。船只的制造数量和质地，愈发达进步，就愈能制海，因而又制世界。岛国民族的这种信念，通常是非常坚决的。日本素具对外侵略的野心，近来更想独霸整个亚洲（包括棋布于大洋洲的无数岛屿），其所具这种信念，尤为坚强。

日寇的船运事业，原已相当发达，但自发动侵华战事及太平洋战争以来，运输增加数十倍，船只及海员的需要，也骤增数十倍。太平洋战争演至现阶段，同盟国家对日作战，已由防御改采进攻战略，日寇为着保持其广大的占领区而须加强西南太平洋的防守，从日本本土经由日本、中国海、以至西南太平洋，绵延数千海里，所需船只甚多。日寇对此已感觉头痛。

日寇要继续作战，必须保持西南太平洋的新占领区。日寇是以资源贫血症闻名世界的，而西南太平洋那里，正

可以给日寇输血。关于此点,笔者曾经发表过详细的数目字,现在只据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尼可尔逊陆军少校简单的估计日本在这个地方已经“占有世界橡胶 90%、锡 70%、米产 90%、亚麻几乎全部,钢铁及废钢数百万吨,至汽油方面,只荷印的出产即够转动日本舰队、航空队及运输轮船”。日本丧失西南太平洋即丧失几乎全部的战争资源,也即丧失几乎全部的战争能力。所以日寇必定拼命企图保持南太平洋的新占领区,而船运的重要性更为增大。

日寇称今年为“决战年”,已为决战的执行召开过三次议会,现在又要召开第四次议会,其手忙脚乱的丑态,已可想见。再考察 10 月 26 日东条在八十三届临时议会的致词,更可窥见其应付太平洋战争的焦虑内情。从大体上说,日寇今日与其说是“决战”,不如说是“加强备战”之为愈。日寇目前最大的严重问题有三:其一是防空问题,其二是粮食问题,其三是输运问题。而此三者的关联点,集中于航运。要加强空防必须增产飞机及汽油,而绝大部分汽油在西南太平洋,须赖航运始得达目的。日本本土素缺粮食,而绝大部分的米产,在泰国、越南、缅甸及台湾,日本要搬回这些米产,目前舍船运以外,尚无他法。

日寇固也企图完成其“大东亚纵目铁道”的建筑,以补救其船运的缺欠。这个计划的实现而即连日本人也承认是一个“未来的梦”(8 月号《扬子江》),日寇目前仍不能求救于船运的加强。

### 三、船舶需要激增

船运的基本条件,就是船只的增加。日寇在同盟国家总反攻之前,已经觉悟到问题的严重,他们承认:“以夸耀庞大资源的美英为敌的大东亚战争,是资源的战争,生产力的战争”。“海上输送力,绝对必需船只,若只拥有大东亚共荣圈内物资丰富,还只等于月球世界的物资,对于战力的增强,没有丝毫的帮助,船只,也只有船只,才是增强战力的关键,才是大东亚战争必胜的武器”(日本内阁情报局《周报》本年7月28号)。

另一方面,太平洋上船只的需要,骤然增加,一方面英美荷的船只全部撤退,他方面战争的需要增加,这些补充的责任,加在日本黷武主义者肩上。

据日本自己的统计,1936年爪哇、马来、菲律宾、泰国、乃至安南的入港船只,约80%为美英荷兰的商船,其吨数约在数千万吨以上。现在这些船只全部需要日本船只来补充。

增大太平洋上日本船只的需要,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线及补给路的延长。现在,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线,北自阿留申群岛,南至孟加拉湾的安达鼓岛,西至印度洋,广袤数千海里,并且这个广大的海原是距日本本土很远,故其补给船舶更需要大量的补充。

然则至此广大的海面上,究竟需要多少的船舶?现在

假定日本在我东北、关内及西南太平洋各地域的同量补给物资,是以日驶 250 海里的船舶输送的,则一年间的航海回数及所需要船只的比数如下:

地 区	一艘一年航海回数	日本与我东北间为 1
日 ~ 东北,华北,华中	约 35 回	1.0
日本 ~ 华南间	约 21 回	1.5
日本 ~ 爪哇间	约 13 回	2.7
日本 ~ 缅甸间	约 9 回	3.8

补给路愈由我东北伸向我国关内,更延长至西南太平洋,则其所需要船只,愈益增加,具体言之,现在所需要的船只,若与九·一八事变当时比较,即约略增至四倍。这是以单纯伸延为假定的,但是实际上,日本到东北及华北华中华南,仍须继续输送,故若就全部运输计算,现在所需要的船只,应在九·一八事变的 9 倍以上,若再自泰国、越南乃至北太平洋方面的广大外围考虑,则所需要的船只,将更增加多了。

#### 四、日本船只的减少

日寇目前所需要的船只比例数量,较之九·一八事变当时,增加十几倍,确为日寇军事当局头痛的根源,但他方面,运输船只的减少,更为增加这种头痛的剧度。



有据称二大的原因，减少了日寇的普遍运输船只：其一是由于军队的强制征用，其二是作战上的重大损失。

先说因为军队的征用而一般的输送船舶减少罢。

日寇征用一般船舶，主要的有两种种类，都是送到战争的第一线服务军务的。第一种征用船称为“特设海军舰船”，第二种称为“兵站输送船”，因为军队的这种征用而日寇普通的物资运输船减少甚多，其确切数目日方虽未发表，但就一般言，美英两国因此种征用而普通运输船约减50%，日寇因为战线格外延长，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种事实更使日寇的军用船数增加而一般船只减少。第一种事实，是日本粮食及军需资源皆须仰给于侵占区，如米之于安南、缅甸及泰国等地（约占全世界米产90%），橡胶、亚麻、锡、铁、汽油之于南洋各地。第二种事实是日本军队的用品，由于习惯与生产关系，上自飞机、大炮、子弹，下至军服、罐头、酱菜，几乎皆由日本本国输送供给。此两种事实，造成日本作战的南辕北辙的矛盾与困难，其军用船只更为格外的增加，而一般运输船比例地减少了。

日本运输船减少而需要增加的第二种原因，就是在于战争的巨大损失。此点可由两方面说明，其一是普通运输船的损失，其二是军用运输船的损失，尤以后者为巨大。太平洋战争的初期，由于日寇的突击而英美沦陷了南洋各领地，英美为防止这种情势的扩大而采用潜艇战及飞机的轰炸。现在日寇的海军阵容恰好形成一条细长的线状，且其南北两端又处于彼此互相节制的关系之下，英美正好利用

潜艇及飞机,以切断日本南北的联络,所以美英上述战略的发动,对于日寇运输船的打击非常严重。

英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始终着重于运输破坏战,在战争初期,用此种战略阻止日军前进,最近更用以切断日军的联络,打击日本的总战力。近来英美比较着重于攻击日本的中间路线,从夏威夷经威克岛、中途岛、关岛、日本南洋委任统治地、菲律宾群岛以至台湾,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切断战略。

## 五、日航运最近的厄运

(略)——编者注:因原稿模糊不清。

原载 1944 年 1 月 20~21 日《广西日报》



卷 五  
第六辑 其 它

---



## 日本金解禁与中国

“金解禁”已成日本政界和财界的中心问题，自大正十年（即民十）以来，一般人士即颇重视。迄至民政党内阁成立，特别声明将以解决金解禁问题，为其中心政策，于是朝野之士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更加尖锐化，议论纷纷，颇有“山雨欲来风满城”的气象。

溯自大正六年（即民六）九月，日本颁布现金输出的禁止令以来，日本的经济界即发生种种的变化：自货币制度的实质说，日本直是由“金本位制”一跌而至于“纸本位制”；而对外汇价暴落至现金输送点以下。汇兑市价暴落的结果，影响入超国家的日本，每年在贸易上蒙受巨额的亏损。重以其他禁止现金出口的各国，也都先后解除了禁令，于是促成了日本金解禁的事实。

日本实行金解禁之后，将必于其内外经济界，发生种种的影响。至少（一）对外汇价的腾贵，（二）利息的升高，（三）现金的流出，（四）物价的跌落等事实的发生，总必是决定之数。在这些项变化之中，影响中国经济最大的，算是（一）对外汇价的腾贵和（四）物价的跌落。这二项事实影响

中国蒙受很大的亏损。中国因为日金汇价的腾贵所蒙受的亏损,可以由三方面来讲。第一,中国每年由日本输入的人超货金,约在四千五百万中元以上,第二,中国每年必须摊还甲午和庚子的赔款,并须付清各种借款的母息。这些都是依照日金为本位换算的。第三,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在数千或万人以上;每年汇日的学资,也不失为一笔巨款。现在日金汇价比去年高出三分之一有奇,此后中国每年所多付的金钱,所蒙受的亏损,实非小可!

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入超的国家。此后必因金解禁而现金流出,而国内通币收缩;其结果必致引起货币价值腾贵,而物价跌落,于是阻止外货的输入,而促进内货的输出。因日本阻止外货的输入,英美德各国货物之入日本者,必转而拥至中国市场。日本促进内货的输出,其所增加输出品大部分,也必拥至中国市场。其结果,列强对于中国市场的争夺更加尖锐化,而中国民众的负担也必额外加重。

日本金解禁后,必将影响中国蒙受巨大亏损,虽如上述,但中国所以受亏的最大原因,即在中国币制探用(银本位制)。现在采用银本位制的国家,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以金为本位的世界经济漩涡中,独自采用银本位,一切的对外计算都以金为标准,蒙受大亏自是意中事。希望高谈建设的要人们,对于此点多加留意!

## 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

叙述台湾事情，或讨论台湾问题的书籍，不算不多。只就中文说，就有署名汉人君的《台湾革命史》，彭子明君的《台湾近世史》，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台湾》等种。然而，前二种小册子之过于浅薄简单，且类于“记帐式”的叙述固无庸言，即较为详细的后者，还是依然不出此套，缺欠科学的解剖。至若日文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了。不过，关于台湾的日文著作之中，除去二三种比较可观者外，也依然大多不是过于陈旧，就是纯粹的统计材料，不是局部的解释，便是带着民族差别的有色眼镜的，缺欠整个的科学说法，不大合于我们理解整个的现代台湾之用。

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研究台湾问题最适用的书籍，现在可以举出下列四种来。其一，是连雅堂所著《台湾通史》；其二，是伊能嘉矩所著《台湾文化志》（此名是他的遗稿的出版者规定的，本人有意题为《清国治下的台湾》）；



其三,山川均所著《台湾民众的悲哀》(此书已由新亚洲书局翻译出版并附有书后一长篇);其四,就是这里所要介绍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台湾通史》是从文化方面叙述台湾历史的一部汉文佳作。《台湾文化志》,虽题为文化志,但其所叙述的范围包括很广,举凡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宗教、教育、人种、民种、学艺等等,莫不网罗在内,共有三卷,篇幅达3,000页,实是一种解剖日本统治前的台湾问题的大作。《台湾民众的悲哀》,虽是一本小册子,但却握着台湾问题的真髓,从经济,政治及教育三方面,叙述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压迫、榨取和愚化,简明而扼要,其措辞之勇气和立论之公平,且在这里所要介绍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之上。

然因篇幅有限,这三种书的细详介绍和批评,只能俟诸后日,本期只就《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作专件的介绍。

## 二

本书的要点,在于解剖日本统治后的台湾的经济发展,自其时间性说,实在可与解剖日本统治前的台湾的《台湾文化志》,合成姊妹作。正如著者在其序文中所说的,“本书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台湾社会发展的科学的分析”,本书的确不是历史事实的叙述,而是历史问题的解剖和说明。著者鉴于殖民地台湾的特殊情形(即“日本对台湾的经济上的要求,就是决定各种台湾统治政策的原因”之谓),所

以特别注重经济的发展,解剖经济发展的部分,竟占至全书 80%以上的篇幅。

全书的内容,由《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糖业帝国主义》之两篇组成。第一篇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共分五章:一是日本的领有台湾,二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化,三是教育问题,四是政治问题,五是民族运动。在本篇占最重要的台湾资本主义化一章,重分为五节:土地问题,权度及货币制度,资本家型的企业,财政与资本主义,及阶级关系。第二篇的《台湾糖业帝国主义》,也分为四章:其一,糖业与殖民地,其二,台湾糖业的奖励,其三,台湾糖业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四,台湾糖业的将来。在此篇最占重要的第三章,台湾糖业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里分为十节:即新式工场的胜利,混合企业形态,地域的发展,糖业联合会,贩卖及金融,卡笛儿内部的争霸,糖业帝国主义,利润的源泉地,蔗农,及农民组合。

在日本领有台湾的章下,叙述台湾的发见,各国与台湾的关系,及列强对台湾的争夺,以至中国割台湾归日本统治截止。其叙述中含有这样的意思:最初发见台湾者虽是西班牙,但是日本之与台湾发生关系却在西班牙之先;日本之得台湾不是无偿的白得;台湾不为日本所领有,也必入于其他列强之手。第二章的台湾的资本主义化,是本书最有精彩的部分,所以它的内容,等到后面再来作详细的介绍,这里暂为搁置。第三章的教育问题,叙述台湾殖民教育及其他的教育施設。第四章的政治问题,叙述台湾的

各种殖民政治的施行。这二章,或许是由于教育问题是著者的外行,和著者之身充官立大学的教授对于不合理的苛政不便多说或不便说得透彻的原故吧,总觉得言之不详且多含混,不像山川均氏在其《台湾民众的悲哀》里所说的那么痛快淋漓。第五章的民族运动叙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著者对于初期的台湾的暴力革命,视为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述得很简单。至后期的近代式的合法的民族或民众解放运动,始由经济方面应用科学的方法解剖它。这一部分虽在其对于民众党的软化未加指摘是个对日本政客客气的小缺点,但是大体上还可以说是公允。

现在且就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即第二章的台湾资本主义化,依照上面的约束,作个简单的补述。就整个说,本章是在叙述或解剖:日本采用人工的手术,将旧时封建式的台湾,割治整理成为资本主义型的台湾,并且培育扶助它的健全生长至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无论要那一个封建式的地方资本主义化,第一须先确定生产工具的私有权。而土地是生产工具最重要者,所以这种工作就先自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始。日本之把台湾资本主义化,也不出此例第一步,先实行土地调查林野调查,林野整理,以确定土地的所有权。然后依照殖民的目的,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台人旧时的土地所有权,夺与日本人。要某一封建式的地方资本主义化,第二步就是统一度量衡的單位及货币的标准。日本对于台湾也是如此,并且依照日本

内地延长主义，逐渐将台湾的度量衡的单位及货币制度，统一于日本内地的制度之下。这二种事实，是著者在本章第一二两节解剖出来的结果。第三节资本家型企业，叙述日本最先利用关税政策驱逐外国资本，于是日本资本就在台湾发展起来了。日本资本在台的发展，不久就进至独占的阶段，现在且可以向外进出了。第四节叙述财政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日本政府为着财政上收入的增加而确定种种的所有权，并因政府经营事业，其结果促急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长，自又增加财政上的收入，财政与资本主义化二者，实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台湾资本主义化的结果，土地和资本自必兼并或集中，而社会阶级也就渐次分集于二大集团，即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地主与佃农或农业劳工的对立。不过，因为台湾是个殖民地的原故，所以它的阶级的对立，大体上可以说是以民族形态表现的。大资本家自然是日本人，即拥有广大土地的制糖会社又何尝不是日本人？这一点是台湾阶级关系的特殊性。本章的最后（即第六节）解剖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著者在本书中列举四项，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一次，资本的移动，投日本资本于台湾，再吸收台湾民间的资金转投于日本内地及外国。第二项，商品的移动，销纳日本内地的制成品，供给食料和原料。第三节，人口的移动，即销纳日本内地的移民，以解决日本内地因资本缺乏和经济关系而起的人口问题。第四项是财政的价值。日本内地的政府，虽然不直接由台湾得到什么岁收，但是台湾产业

发展的结果，所有利润的大部落入日人资本家的钱袋里，而日本政府征收日人资本家的租税，日本政府也算间接得到台湾的财政上的帮助。

### 三

砂糖制造业是台湾产业的最主要者，所以著者就在本书第二编专论日本统治后台湾糖业的发展。台湾地方栽种甘蔗最适宜，糖业本就有无限希望。只因机器工业不发达的原故，日本统治前的糖业虽不失为台民重要收入的来源，但其制造的规模并不很大。日本经营台湾殖民地，第一就先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规定种种的奖励办法，极力使其发展成为新式的制造业。其结果，旧式的“糖廊”日渐衰落，而新式的机器的制造工场起而代之。到现在旧糖廊既已绝迹。新式的制糖业日渐发达，向横纵两方面膨胀扩大。上自蔗园的经营以运输，贩卖等等，莫不联系在一起，俨然形成了 *Konzern* 的形态。又为避免同业间的竞争起见，采用着糖业地域制度，将台湾全部划成几个地域，分割给各个制糖会社独占。各个制糖会社在其所管辖区域内，不但有权禁止制糖原料的外运，即使用甘蔗于别途，它也可以加以禁止。台湾糖业不但资本雄厚，足以买收或压倒其他的产业（例如改水田为蔗园），其背后且有政治的权威，可用以强制农民栽种甘蔗，以半没收的形式收买甘蔗（例如甘蔗的重量及价格，皆由制糖会社自己一手决定）。台湾糖

业帝国主义云者,容或指此而言吧!但是压力之下必有反抗,所以台湾糖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区域内的蔗农,就有农民组合的组织;蔗农与制糖会社的争议,也就由此滋生不已了。本书不设劳动组合的专项讨论,而设蔗农与农民组合二节,可见在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殖民地,农民运动是比劳动运动占更大的重要性的。这也是本书特到的长处。蔗糖优于甜菜糖,再以地质和气候的适宜,台湾糖业将来的发展,是未可限量的。不过,台湾糖业发展所招来的福利,不但台民不沾润一些,且有反受其害的倾向,这是我们讨论台湾产业问题所不能忽过的。旧糖廊尽是台湾人所经营的,现在已全为新式制糖会社所扑灭。台湾人所经营的新式制糖会社,只有林本源制糖会社和新兴制糖会社二处。林本源制糖自始即在日本人实权管理之下,至昭和二年合并于盐水港制糖,名实完全归隶于日人资本家。新兴制糖,名虽为陈中和氏一家所经营,但其经营实权仍握于台湾银行系的日人资本家手里。此外,糖业发达的结果,水田改成蔗园,而台民在农业经营上,及米商经营上蒙受很大的损失。要而言之,台湾糖业发达所造出的福利,尽为日人资本家所独占,而台民倒因此而蒙不利。这一点是殖民地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特质,是我们研究所有殖民地的经济情形不可忽略的,而本书著者也未轻易放过。

以上大体介绍过本书的长处,但是本书也有两点短处,略述于下:

## 四

(一)体裁的不合适,本书题名虽为《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但是实际上,《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只是一篇之名目而已,而《台湾糖业帝国主义》自成一篇,与之平等齐立。约占全书之半的篇幅且又极其重要的《台湾资本主义化》,只占章的地位,而与“日本”的领有“台湾”及言之不详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等章并立。这些是本书形式上的缺点。著者曾经声明过“本书第一篇载于《国家学会杂志》第42卷第5号至第9号;第二篇载于《经济学论集》第7卷第1号;将此二稿加以修补而成本书。”所以体裁之不能完全合适是难免的。

(二)立论的一二点缺陷。著者是日本人,又是身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日本人,关于日本殖民地的讨论,自然难免有些不敢放言的地方。例如他在日本领有台湾的章里,表露着:台湾原是中国殖民地,日本领有了台湾,无异由中国取得一块本与中国毫无关系的土地。并谓日本与台湾发生关系在中国与台湾发生关系之先。其实根据史籍,中国与台湾发生关系,远在隋朝。中国之经营台湾并未视之为殖民地(经营榨取的泉源),尤其后来独立为一省,更可想见。这或许是由于著者宥于所参考书籍的原故吧!?

总之:本书是一种新鲜材料,解剖方法合于科学的良好作品。虽有微小的缺点,如能加以修改,实是一部研究现

代台湾最合宜的著作。我们已经采用编译的方法,着手于移植的工作。我们打算在体裁方面,分为第一篇绪论(将日本的领有台湾,台湾的教育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及台湾的民族运动包括于此篇),第二篇台湾的资本主义化,第三篇台湾糖业帝国主义。并且参以自己的意思,为备上面我们所指摘两个缺点的参照起见,顺为附加这几句。但是我们还是很诚意地,推荐《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于热心研究台湾问题者。

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原著者 矢内原忠雄 1929年版岩波书店发行。

原载 1930 年 10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0 期



## 中俄复交问题

中俄两国的恢复邦交，酝酿已久，九·一八事变以后中俄复交的传说甚嚣尘上。但是这个酝酿虽经最近政府当局的切实讨论，结果却也不过是“只打雷而不下雨”。他方面，一般民众的舆论则大都主张恢复邦交，各报的论说可以证明。当此远东和平岌岌可危而太平洋形势直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我们认为中俄复交，无论自东方民众解放上说，抑自中国本身的利害关系说，都有充分的必要性。不自感情的，主观的见解，而自利害的，客观的立场，试剖述于下。

### （一）就政治上而论

现在的国际情势，是以诸帝国主义的对立——如日与美，美与法，法与英，英与日等对立——为前景，而以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苏俄的对立为后景，当中又来一个诸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对抗。在这种国际情势之下，苏俄的向背和爱憎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利害，都有很大的影

响。只就中国言，中国能与苏俄提携，则东可以抵制日本之横行，西可以预防英法等国之野心。最近美国之猛进企图与俄复交，用意在于联俄以抗法日。

## (二)就国防上而论

苏俄的铁道环绕于中国的北部，自东北以至西北，苏俄皆敷设铁道网，无论至哪一段上都可以不几小时而深入中国境地，并且，苏俄的大部分军备皆集中于边境，虎视眈眈，既可以自守，更可以攻入。而中国本国的国防设备，目下实在谈不到。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若与苏俄复交而订互不侵犯条约，则自消极方面言，可以避免苏俄的进侵，自积极方面言，可以集中国防力量于西南及东北等方面，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俄能更进一步而缔结攻守同盟，则中国国防的效力必更大。

## (三)就经济上而论

中国边境线的大部分，皆与苏俄衔接，中俄人民不断地交往。人民交往则“通有无”而贸易关系繁杂。中俄的贸易关系不但在未绝交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即在绝交以后中俄民间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并未因为政治上绝交而消灭。北满、外蒙、新疆等地的贸易关系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不如痛痛快快地与苏俄恢复政治上形式上的邦交，以促进两国的贸易。再考，中国现在正为求自由独立而进行反帝国主义，其结果必将引起帝国主义的经济封

锁,欲回避这种危险,除一方面与苏俄复交,一方面自谋经济独立之外,别无他法。

#### (四)就被压迫民族解放立场上而论

现阶段世界情势的转变愈益横断化:诸帝国主义之以均衡的瓜分和协同的共管形式,来统制弱小民族,也带来充分的必然性,现在已显露这种趋势的头角。此时,被压迫民族企图解放,势非以协同的势力抵抗协同的势力不可,联结可以协作的势力以造就整个反帝的营垒,实有十二分的必要性。苏俄虽然曾因某帝国主义之嗾使利用而与中国发生不幸的战争,但是这个不幸的冲突之为帝国主义分化被压迫民族反抗势力的事实,现在已被证明。自大体上言,苏俄尚能平等待遇诸弱小民族,自动放弃特殊权益等等,至少,苏俄可以为诸弱小的朋友,她也希望着与诸弱小为友。再自利害关系上言,苏俄与诸弱小有反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有同被帝国主义压迫进攻的危险性,二者更有协作的必要和可能。在此诸弱小营垒——即缩小言之中国营垒——与帝国主义营垒对立的情势之下,苏俄的向背实有举足轻重的可能。

根据上述各点,中国为被压迫民族解放打算,为自国的利害关系打算,非与苏俄恢复邦交不可。否则,不但没有上述复交后的各种益处,并且可以发生相反的损失。苏俄现在经济建设尚未完成,国基尚未巩固,国防力和进攻力之充分,更谈不到。同时,又处在诸帝国主义积极准备进攻

的威胁之下。此时,介于世界资本主义营垒与社会主义苏俄营垒之间的弱小民族营垒,若不与苏俄合作,她为自己利害打算,必将与利害冲突比较不剧烈的某一资本主义国家提携(俄人最近的舆论,与美复交之意向可以证明)。此时,即使苏俄不助桀为虐,某帝国主义也可灭轻一大敌而积极利用金元来统制中国。其时,帝国主义统制中国的局面成就,中国即欲不亡,不可得也。

最后,再来检讨中国何以与苏俄绝交?何以不敢和苏俄复交?唯一的原因,就是怕苏俄“赤化中国”。怕中国社会因此而共产化。但是这种考虑完全是一种杞忧,并且是一种肤浅的见解。正如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议员 Cutting 引用 Racdk 氏所说的,“革命不是能从旅行者的箱囊中带进来的。革命是不能进口的,革命是由内部产生的”。中国之能否赤化和共产化,完全由中国之政治的,社会的关系来决定的。一切的革命和社会变动皆以本地方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缺陷为酵母。我们相信信奉辩证法唯物论的社会主义的苏俄,岂真全凭主观,不顾事实,故意捣乱东方,使世界革命永陷于沉迷吗?! Cutting 说得好,“谁相信几个第三国际机关能推翻美国人民信仰已经根深蒂固的他们的政府和制度呢”? 他更说得好,“灾难和失望是革命的真正产母! 过去两年(美国)经济和政治的破产,使美国国民中产生了许多共产主义者,这些共产主义者从未与外人的煽惑接触过……”(以上引言皆载于美国《Thanation》杂志 5

月号上)。最近美国对俄的舆论,上下概是如此。原为敌人畏赤俄如蛇蝎的美国人,争取资本主义世界营垒领导权的美国,尚且这样积极企图与俄复交,而与俄处在利害关系许多相同的中国,反畏首畏尾,疑虑不定,这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原载 1932 年 7 月《新东方》第 3 卷第 7 期

# 东方民族运动与中国西北开发

## ——帝国主义侵略的新转变与东方民族运动的新阶段

### 一、引言

资本主义发展至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就完全依靠本国内无产阶级之极度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众之剥削,来维持他的存续,延长他的残喘。因此,帝国主义本国的各种矛盾与无产阶级膏血的涸竭互为因果酝酿成功的大恐慌,对于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众之加紧,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种大恐慌,即对于帝国主义者剥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众的方式,也有使它改变的影响。他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当中,近年来又发生一种新的,尖锐的矛盾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整个营垒与社会主义苏俄营垒的对立。在这两个营垒对立的当中,偏又插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另一个营垒,间隔于其间。于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将来的变化如何,对于这两个对

立营垒的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帝国主义者自然更要加紧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统制。在这种情势之下,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侵略方式,必然地发生一番新的变化。

然则,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的变化如何?恐怕不外乎由从前的“争夺的”,“独占的”方式向“互惠的”,“共管的”,方式的一种转变。虽然,他们当中总免不了多少因分赃不均,而冲突仇视的危险性。在这帝国主义者将以整个阵营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进攻的当儿,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阵营介在资本主义营垒与社会主义苏俄营垒当中的这个时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必发生新的变化,并且应当有新的变化始可。这种新的变化就是现阶段民族运动的新意义。一方面,民族解放的涵义是大多数穷苦民众的解放,他方面,民族运动的方式是反帝国主义的方式。

但在进行这种新意义的民族运动的时候,前面必定遇到险恶的难关,本即以整个的营垒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展开的势力雄厚的帝国主义内部,必定愈加团结坚固。此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就越有团结一致的必要,而其团结方法的研究,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近来渐为国人所注意的中国西北的开发,就是具有这种重要性的方法之一种。

如果我们略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营垒加以考察,我们发见中国是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现阶段最重要而又是最

危险的堡垒。中国前途的变化如何,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前途,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颇有举足轻重的情势。而中国今日处处宰割于帝国主义,沿海一带皆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九·一八事变发生而富冠全国的东北又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现在除西北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而外,几乎没有一块干净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开发西北未始不是挽救目前中国危局,因而坚固被压迫民族整个解放营垒的一个好方法。

我们并且相信开发西北的结果,对于整个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策略上,必定有很大的裨助。严格地说来,所有东方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要有真正的有力的把握,非从无隔阂的真正联系上下手不可;而这种联系非俟中国的西北开发后不能成功。因为现在在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营垒里面,存有地理的问题,交通的问题,产业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习惯的问题,情感的问题,等等,潜伏其间,而这些种问题都可以由西北开发的成功而消灭它们的间隔性。于此,我们充分明悉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同时,开发西北的前程也在我们心目之中;而其详细的得失和各种关系,似乎有俟我们一度检讨和剖述的必要。因此,撰作本文,特就“东方民族运动与中国西北开发的关系”略加讨论。

## 二、帝国主义侵略新变化的检讨

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专靠本国无产阶级的



极度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剥削之两管“补血针”来延长他们的残喘。现在，自1929年秋季世界恐慌的风浪刮遍诸帝国主义的领域以来，他们所赖以苟延残喘的补血针之一管失掉了效用。其结果，帝国主义自然集全精力于剥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另一补血针上。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新矛盾，资本主义整个营垒与社会主义苏俄的对立，更使帝国主义者加紧殖民地统制。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 (一)世界恐慌的风浪

1929年秋季以来的世界大恐慌，一般人皆认为是空前的，特殊的恐慌。其理由则在于此次的世界恐慌具有它的特质。关于世界恐慌的特质，学者之间虽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据我的考察，至少有下列各种。而这种种的特质赋予帝国主义改变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的动机，所以剖述于下：

#### 1、此次恐慌发生于产业合理化实行之后

产业合理化运动，原为振作没落第三期资本主义的不景气市况，为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深化而进行的。其进行的手段就是极度提高生产能率，节省生产本费，使商品物美而价廉，因而促使市况活跃起来。德倡于前，英美法意各国皆效尤于后。最初虽亦获得多少成绩，可惜这种微小的成绩，竟因同业者竞争之激烈而昙花一现，不能继续下去。不久生产极度过剩，失业工人骤增，以及工厂，商店，

银行相继歇业倒闭等相反的现象发生出来,而经济恐慌入于空前的危态中。

## 2、此次大恐慌的演进是慢性的

从前的经济恐慌,大都带有急性的性质。惟其如是,恐慌达到饱和点即便呈现好景气的曙光,而恢复良好的状态。只此次世界大恐慌,无论在农业生产部门,在工业生产部门,抑在金融经济部门,都是缓慢演进下来的。这是由于金融资本家的统制,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但是金融资本家的统制毫无效果,适足以增长恐慌的前进。

## 3、此次大恐慌普及于所有的经济部门

以前的经济恐慌大都限于一二经济部门,例如金融恐慌,商业恐慌,农业恐慌等等,或只限于某种经济部门的特种生产,例如农产里头之大豆生产过剩,或麦粉之需供不调,又如矿产里头之煤产供给涸竭,等等。在这种部门经济的恐慌发生时,大都得由别种经济部门调节过来,而恐慌即归于消灭。但是此次恐慌则普及于整个的经济界,致使由限制生产发生的过剩资本和失业工人,无法移至别的经济部门去。因而同业者之间的竞争愈趋激烈而恐慌不知将伊于胡底了。

## 4、此次大恐慌普及于全世界

本来商品和资本都是流动的东西,商品趋向需要多供给少而价格高昂的地方流办,资本趋向求过于供而利润率高的地方流转。所以,在甲地某种商品过剩或其购买力薄弱而乙丙等地方同种商品的需要大购买力大的时候,该种

商品可由甲地移转于乙丙等地,而恐慌不至于持久。资本也然。但是此次大恐慌则除苏俄而外(苏俄虽是世界恐慌风浪中的独自繁荣的孤岛,可惜它是供给量特别大的国家,只有将商品向外倾销而不能消纳外来的普通商品),各地莫不沐浴于恐慌的风浪中。并且,苏俄的市场又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堡垒所固封,不能分减世界恐慌的多少分量。

#### 5、此次大恐慌中金融恐慌最后到来

此项与上列第2项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是金融资本独霸的时代,当恐慌发生的初期,虽然小企业吞并于大企业,而金融资本家则不但受影响,并且可以利用金钱的魔力,得渔人之利。即在恐慌的风浪增大的时候,它尚可以利用转嫁的方法逍遥于恐慌圈外。但是“树倒猴悲”,等到恐慌的风浪刮遍工商农各界的时候,金融资本家也就难免恐慌的光顾了。

#### 6、此次大恐慌特别深湛

这次大恐慌的深度是从前任何恐慌所没有的。生产指数是经济景气的寒暑表,且就大恐慌前后的生产指数比较看,即可了然。据伐尔卡《世界经济年报》1931年第三季统计,世界生产指数,以1928年为基数,1925年为88.6,1926年为89.9,1927年为95.7,1928年为100,1929年为107.8,1930年则降至93.9,1931年更降至80.8,与恐慌之第一年度比较约降27%,即连欧战后最不景气之1925年还不如。其结果,重要国家的破产数目骤增,1931年与1929年比较美国增加4289,英增加129,德增加

2569,法增加 980。失业数目之大更无庸言。

### 7、此次大恐慌期间特别长

若假定美国交易所的大动乱为此次恐慌的起点,则大恐慌为开始于 1929 年秋初(其实二三国家早在 1929 年上半年期恐慌即已发生),那末,现在已经是恐慌的第四年度了,实额期间也已超过 3 年。这样长期间的大恐慌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并且,现在尚无恢复好况的希望,似乎恐慌没达到最深的程度,证明此种事实的指标:(1)金融恐慌愈益尖锐化;(2)生产指数犹在减退的途上;(3)最近虽因各国的膨胀政策而物价稍见腾贵,但不久即又跌落。

此次的世界大恐慌,因有上列各种特质,所以帝国主义者们在她们自己的领土内求出解决的方法来。只靠她们本国无产阶级的榨取,已经不足以维持她们的寿命。于是,移转锐利的视线至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头上来,企图半殖民地的占领或再分割。不过,在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必然地要有一番变化。

###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最近,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发生了一个新的,决定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整个营垒与社会主义苏俄营垒的对立情势。这种对立情势之尖锐化,不但是决定未来世界史的根本要素,即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方式之变化,也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主义苏俄的斗争理论如何姑置不论,但是他实行

建设的结果,至少给与世界一般人,下列三种印证:

1、国民经济的确可以采用有计划的,有统制的,预算的经济组织来实行,并且可以实行得更有利益——国民全体的利益。由此类推,更广大的世界经济也可以依照同样的经济组织,实行得更于全体人类有益。

2、景气循环说所主张的不可避免的恐慌,实在可以运用人为的,制度的统制而消灭它,至少可以减轻它的猖獗。因为这次世界大恐慌皆发生而且普及于经济组织无计划的,无统制的,无政府生产的资本主义国家,若经济组织有统制的苏俄,则独享其为“世界大恐慌中的繁荣孤岛”的荣誉。

3、由农民和劳工及服务于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居然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挽救日趋沦陷的经济危机。从前自由放任经济学者,对于人为的,有统制的,有计划的经济设施之成功皆不置信,对于不学无术的工农的同种设施之成功,更不用说。不幸,苏俄竟以现实的证明列于他们之前。

上列三种事实给与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莫大的威胁。第一,这三种事实能嗾使帝国主义本国内受到极度榨取的无产阶级,增强反抗统治阶级的自负心;第二,同种事实也可以促使帝国主义统制下,剥削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众,索性与苏俄共同奋斗,以排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本解决一切的问题。因此,诸帝国主义者眼看社会主义苏俄经济建设之逐渐成功,根基渐次巩固,不禁战慄起来。由于这种恐怖而竭力企图及早摧毁之。同时,并且可以占领世界

六分之一的商品和资本的大市场。**一举两得。**

然而，苏俄这个国家土广民众，又在地理上占着优势，实在不容轻视。此项促使帝国主义向苏俄采用共同进攻的方式，并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侵略，改变从前的方式。因为帝国主义整个营垒与社会主义苏俄的营垒当中，有殖民地的营垒介在其间，殖民地革命的动向如何，对于上列二个营垒的胜负，是决定的要素。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侵略方式，必有改变的必要和必然性。

### (三)帝国主义侵略之变化

诸帝国主义内困于没落资本主义第三期的世界大恐慌，外迫于社会主义苏俄建设成功及向殖民地进出的威胁，既不能在其本国内求得解救危机的方法，又不能轻易扑灭劲敌的苏俄，唯一的方法只有再分割世界殖民地，以巩固他们的营垒。对于完全殖民地化的地方，加紧剥削和压迫；对于半殖民地，企图使之完全殖民地化。但是现在，要实行这种企图，从前的争夺方法，已经不能沿用。帝国主义者若采用争夺的方法，以占领殖民地，结果必定引起她们内部的冲突，而终须诉诸武力。而世界现在的情势，束缚他们在自己伙伴的内部用武。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因本国恐慌使其无能力化；二因帝国主义伙伴须巩固自己的营垒以进攻共敌苏俄。

然则诸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究竟怎样转变？他们只有在协定或谅解之下，来实行这种侵略。

其具体的方法,当不外下列二种:

- (1) 平衡的瓜分;
- (2) 共同的管理。

诸帝国主义在协定或谅解之下企图瓜分殖民地的实例,可于他们侵略中国的事实中求得之。英国统制西藏西康,法国势力侵入云南贵州等地,美国经济势力膨胀于中国各地,日本独霸东北,俨然朝鲜第二,这样帝国主义者皆相安不忧。并且这种趋势,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更愈鲜明。日本帝国主义专以暴力侵占了东三省,而其它的诸帝国主义并没有有效的制裁方法。现在执世界之牛耳的美国帝国主义所极力主张的,不过是“门户开放”,“机会均沾”的旧套;现在被羨为最繁荣的法国帝国主义,反与日本缔结秘密条约,公然供给日本以侵略的利器;帝国主义先进的英国与日本之间,也有伦敦日英协定的缔结。

诸帝国主义企图共管殖民地的事例,也无庸征引远例,只于中国求之即足。诸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企图,虽然老早已已露出头角,但其有效的实行则显露于大恐慌发生以后。最近,曾有国际联盟向中国共同投资的酝酿,未及完全实行而引起日本强占东三省的事变。这是由国际共管引出均沾的演变,盖因上述借款投资当中,日本是被除外的,所以日本借侵占东北以相抵制。因此,其他的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的行动,也只有缄默,或放些空炮。最近虽有国联提议共管东北的消息,预料日本不会承诺。不过,由国联出名借款投资于中国而取得共管的实权的计划,现在似乎又在

酝酿中。

但是上列二种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有无实现的可能性？据我看来，诸帝国主义进行这二种侵略的时候，虽然不免有冲突的危险性，但是现在的世界情势却在指示它的很大的可能性。从前，此二种侵略方式之所以不能充分实行，一来因为那时候诸帝国主义尚有余力角斗，二来因为他们的公敌苏俄尚未产生，长成。现在，这二种事项处处皆自诸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打算，督促帝国主义实行该种方式的侵略。瓜分已逐渐进行，香港、台湾、朝鲜、琉球、外蒙古、东北及西藏等地，事实上现在已非我有，西康及新疆滇黔的边陲等地，均已危险万分。共同的管理，诸帝国主义舍名取实，由部分的共管，例如铁路的共管，邮政的共管，矿产的共管，警权的共同执行，以及某特殊地方的共管，等等，往前推进，最终达到“整个”的共管，无论任何人谅都不敢说句“不可能”吧！此次，国联调查之历游中国各地，名义上虽说是为解决中日问题而来的，但其骨子里若说绝对没有含蓄“共管中国的预备工作”的意味，我们实在不敢坚信。

要而言之，在协同或谅解之下实行平衡瓜分及共同管理的侵略方式，确是现阶段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新方式。这种变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变化。

### 三、东方民族运动的新阶段

诸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方式，既



然发生了新的变化,那末,反抗诸帝国主义,企图排脱他们的侵略的殖民地革命运动,自然不能没有新的转变,并且应有新的转变始可。于是,现阶段的民族运动具备了新的意义。民族革命采用新的斗争方式,也是必然的趋向,并且是民族运动策略上的必要。

### (一)民族运动现阶段的意义

民族运动是由实质上,名义上受到别民族的政治支配及经济剥削的民族发动的;它的目的在于排脱别的民族或诸民族的支配而获得自由独立。进行这种运动的民族,普通称为“民族”,即英文之 Nationality;而其所依据的指导原理,就称为“民族主义”(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前者与国民(Nation)对称,后者与国民主义(Nationalism)对称。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截然两样。前者为纯然被支配,被压迫的民族企图解放独立的指导原理;而后者则为在一国内占着优胜地位的民族,一方面对于国内诸弱小民族施行压迫及同化政策,他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或国家表示敌对性以充实其独立民族国家的生存表现欲的指导原理。根据民族主义指导原理的民族运动,目的极其纯洁,除排脱别的民族或国家的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而外,殆无其他的目的。

若就世界的实情加以考察,则上述的意义更可了然。现在诸帝国主义国内莫不包括复数的民族,其中独有一个特别优强的民族,处在支配国内诸弱小的地位,而其他的民族皆处被支配的地位,例如日本帝国内大和民族是支配

的民族，而朝鲜，台湾，琉球，虾夷诸弱小则为被支配的民族。又如大英帝国内盎克洛萨克森民族是支配的民族，而爱尔兰、澳洲、印度、加拿大、纽西兰等地诸弱小民族，都是被支配的民族。大和民族及盎格洛萨克森等民族的国际政治活动的指导原理，应是国民主义；而朝鲜、台湾、爱尔兰、印度等民族政治活动的指导原理，就是民族主义。此外，法国，美国，意国等，也可以类推而得同样的结论。

处在别民族政治支配下及经济剥削下的被压迫民族，企图自由独立，本来在理论上是没有不合的；并且这种民族斗争在集团斗争或社会群斗争的历史上，的确占着相当的过程。最近的历史上，也有根据典型的民族主义以从事于民族斗争而得到成功者。例如日本之排脱欧美诸先进帝国主义的统制而独立，美国（美国的构成虽然不只限于一个民族，但其复数民族在政治上融成一个单位。而同处于被统制的地位）之脱离欧洲的羁绊而独自建设成为单一国家，就是典型民族斗争成功的事例。日美不但排脱了他民族或诸民族的支配，并且一跃而入于支配别民族的帝国主义之林，这可以说是民族斗争成功的极致。

然而，每一历史事实之成就皆有相当的客观条件为其前提，有适宜的环境为之培植。典型的民族主义斗争之所以成功，实由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客观条件有以培成之。现在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一切的客观条件以及国际情形，已经有了激烈的变化。若就本文前节所剖述的推论之，世界的经济豹变，促使国际政治趋于“横断”的情势：一方

面诸帝国主义者联系而成一压迫的营垒,被压迫的诸民族也有联结一气的倾向;他方面诸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群众之国际联系,及诸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联结集团如国际联盟之类,也渐有具体化的趋势。自从社会主义苏俄成立之后,世界政治的横断情势,越发明显。

在这种国际情势已经豹变的新阶段,民族斗争的指导原理,当而且必然地,要发生新的转变。孙中山先生之于民族主义之外,并且发挥民生主义,认为民生主义是目的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是手段,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偏重于工农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或者可以认为此种新转变的先驱吧!中国革命之所以仅仅推倒了满洲政府而不能脱离诸帝国主义的统制,致使中国的民族斗争止步于百步之五步内,原因即在于实际斗争上不能运用适应新阶段的指导原理。民族主义固未完全成功,民生主义更谈不到,其反拨作用适足以造成 20 多年来的“民死状态”。

现阶段的民族运动的指导原理,必须以大多数劳苦群众的利益为前提,所谓民族解放云云,主要的也就是劳苦群众的解放。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原则上实注意此点,后继者苟能于其实行方法上改革光大之,相信中国革命虽不完全成功也相差不远。这项道理本很明显。只自皮相言之,占一民族的大多数分子是劳苦群众,外族所支配所剥削的对象,实质上也只是这劳苦群众。因此,也就只有对于外族的支配和剥削感觉切肤之痛的他们,如能自本身的利害关系,挣扎起来,苦斗起来。印度民族革命过去失败于对

于印度劳苦群众不深切理解的漂动份子之作为,此次淞沪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抗日完全代表中国革命下级群众的民意而获得不少的民族荣誉,等等事实,都是此种新转变的现实楔机。东北在二小时中丧失了重要的城镇,而日军占领已将9个月的现在,犹有多数的义勇军继续苦斗着,印度民族运动由于放弃漂动的态度而渐有生气,这种种事实尤其是尖锐的佐证。

谈民族运动的同志,对于民族解放现阶段的新意义,不能不深加玩味!

## (二)团结反帝之必要性及其必然性

国际情势的激变促使民族解放现阶段发生新的意义。现代的民族解放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笼统庞然的解放。而带上实质性了。并且有许多事实在我们面前证明:此后的民族革命非有此种实质性的解放运动不能成功。这种主旨的新变化,自然造就斗争方式转变的动机。

他方面,又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帝国主义现阶段内外的新情势,改变了他们侵略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方式,放弃从前的争夺互斗的方式,而改取互惠的瓜分及合作的共管二种方式。这种新的侵略方式,将必加重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使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力逐渐消沉,以保障帝国主义统制之成功。在这种情势之下,企图排脱外族的支配而自由独立的民族斗争运动,必然地会采取新的斗争方式。

自主观上来说,现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思达到目的则已,否则,势须采用新的斗争方式。

然则民族奋争的方式是什么?原则上有二点:①应该——并且必然地——扩大斗争的阵营,凡同情援助民族解放者皆尽量容纳联系之;②充实斗争营垒的内容,净化斗争的同志,凡对于真正民族解放认识不清楚而漂动不定的分子,全部排出。由此原则出发可以推论出三方面的开展方向来:

### 1、团结被压迫民族及弱小民族的革命同志

诸被压迫民族如中国、朝鲜、台湾、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叙利亚、巴力斯坦、美索波达美亚、埃及、缅甸、安南、印度、俾路支、澳大利亚、以及南洋各地,等等民族,同处于帝国主义统制之下,本来即有一致团结的必要和可能性。关于此点,作者的朋友曾经站在联络某帝国主义以抵制某帝国主义的立场加以反对。据说,现在中国有联英的必要,若与印度携手则失英国之欢心。但是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即不与印度携手,英帝国也不会作出有利于中国的事情。将来的趋势更必如此。

### 2、接受苏俄善意的帮助及合作

苏俄现在的社会制度,虽与诸弱小民族的不完全一样,诸弱小民族将来的变化是否向此方面进行,虽然可以暂置不论,但自苏俄与资本主义整个营垒之对立,及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营垒之对立推论看,苏俄与诸被压迫民族的利害是一致的。自这一点说来,被压迫民族与苏俄的

提携是有益的。或许很多人考虑到社会制度不同有被赤化的危险性,但这完全是中国外交家的无智。请看最近俄美关系的转变如何?世仇的日本,且有与之谅解之用意(据最近报载)。中国不敢与苏俄接近,大满洲国却在准备派遣驻苏俄的领事呢!

### 3、接受帝国主义国内无产群众的帮助及合作

诸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一方面剥削殖民地,一方面也榨取本国内或本民族的无产群众。因此,她们的无产群众也反对他们。在这一点被压迫民族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内的有觉悟的无产群众合作。关于此点,或许有人以横断情势之空虚反对我们的主张。例如最近日本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导师,赞成日本之侵略满蒙。但是这种潮流是种逆潮,正如日本无产阶级的有见识导师山均川氏所言,“此种狂舞将必止息于应该止息的地点”。并且,赞成的反面还有反对的存在。不过,赞成的是“显在”的潮流,而反对的却是种“潜在”的势力吧了。

联结上列三种势力,以与帝国主义斗争,以向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进攻,必定是将来世界政治变动的趋势。这种新趋势已渐具体化。横断情势之成熟,资本主义营垒的联结,帝国主义国内工农群众运动之国际化,苏俄营垒尖对整个资本主义营垒之布置,诸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诸弱小民族之共同行动化,这些事实都在指示:被压迫民族及弱小民族之革命运动共同化的必然性——不,上列三种势力之联结一致,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是现在与未

来世界社会建动的趋向。

自主观上言,上列三种势力必须一致联结,以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倘不适成国际的新形势,采取一致反帝的方式,而各自为政,甚至自相轧轹,反帝的目的不但不能达到,结果也必因力量之薄弱而终归失败。最近康藏两地之争,印回两民族之斗,都给予英帝国主义得渔人之利的最好机会,日本帝国主义之侵占东北,未始非中俄内讧有以引诱之。赞成日本侵略东北的日本无产群众,结果必定没有好归宿。

### (三)团结反帝国主义的反响

诸帝国主义所压迫,榨取,以至进攻的诸主体,因其利害相同而团结一致进行反帝国主义,虽是国际情势新转变的必然性及必要性,但是诸帝国主义者对于反帝诸势力之如此作为,必不轻易放过。他们将必采取更有效的办法,以坚固帝国主义的营垒,而保障她们对诸弱小的统制。诸帝国主义的更有效的办法,据我的考察,至少也有下列几种:

#### 1、分化反帝的阵营

团结始有力量的原则,帝国主义者非常明白,所以一方面在自己的伙伴企图团结,而他方面对于反帝国阵营采用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的第一步,就是阻碍本国无产群众之与苏俄接近联络,第二步就是固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让苏俄染指而使二种反帝势力不能联络一起。同时,并且阻止本国无产阶级援助被压迫民族。这二种政策,诸

帝国主义早已施行,并且获得相当的效果。分化政策的第三步骤,就是分化诸弱小的联结。这种联结只是最近新东方运动的新趋势,虽未臻成熟的时期而帝国主义的胆已粉碎了。例如充当诸弱小喉舌的《新东方》杂志,乍出而风靡一时时,诸帝国主义即竭力加以摧残,并阻止它和诸弱小的民众会面,日本、朝鲜、台湾、安南、缅甸、印度以及南洋各地,皆禁止入口。

## 2、加倍压迫诸弱小

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之成功,是诸帝国主义的致命伤。因此,他们竭力讲求摧残的方法,运用警察军队的高压手段,经济上的极度剥削政策,及教育上的愚民政策,以期达到目的。日本素来对朝鲜及台湾的压迫,最近英国军警之于印度及缅甸,法国军队之于安南,等等,莫不是这种高压政策之具体化。诸帝国主义对于被压迫民族单独的,薄弱的反抗,尚且如此大作,对于诸弱小之互助团结,手段必更恶辣。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朝鲜农民因同情中国而挡阻日本进军时,即遭几近“洗乡”的剿伐。

## 3、自军事上封锁诸弱小民族

世界现在的被压迫民族大部分集中于亚洲大陆,并且地理上互相联系着,本来是可以利用陆地的交通互通气息的,只因陆地交通之不发达,彼此之来往几乎皆依靠水路。所以,越是靠近海口的地方,其重要性越大。诸帝国主义也颇重视,被压迫民族一旦有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帝国主义者势必运用他们的雄厚海军力加以极度的压迫,实行封锁



政策。其时，诸弱小民族自己既无海军可以抵抗，陆地交通又不发达，不能联结一气，那末，结果就只有为帝国主义所分别征服了。

#### 4、共同统制半殖民地

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诸帝国主义对于尚未完全殖民地化的诸民族的统制。旧殖民地的再分割及其商品资本市场的争夺，等等纠纷，固然也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诸帝国主义的视线，现在几乎完全集中到半殖民地的统制上头。现在世界上尚有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的可能性的地方，只有中国和苏俄这二块肥地，他们正切望着由这二块地方的剥削，来缓和他们的没落。但是，苏俄现在根基已渐巩固，且有渐次发展的趋势，诸帝国主义又虽然正在企图共同的征服，而其成功极其渺茫。只有中国这一块肥肉置在诸帝国主义的刀俎之上。中国一方面在东方诸被压迫民族当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他方面中国最近的民族运动具有最浓厚的反帝色彩。因此。诸帝国主义要统制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必先统制中国。而其统制的方法必以“共同的方式”出之。盖因诸帝国主义争夺的不利及反帝诸势力的雄大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 5、自经济上封锁诸弱小

帝国主义压迫诸弱小民族的有效办法固然很多，但最厉害的应推经济的封锁。诸弱小民族的经济发展皆极落后，各部门产业的生产皆极幼稚。即有多少现代型的产业，也都是帝国主义国内统治阶级的经营，民族资本经营的企

业,几乎可以说没有。自从近年来独占形势锐化以来,诸弱小本民族资本的经营,尤其是惨落,惨败。因此,经济大权操于帝国主义手中,工业制品大部分由帝国主义输入,甚至连食料品也须仰给于他们,充当生产工器的制品,更不用说了。此外,企业资本,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等等,也皆总仰重于帝国主义。稍稍资本主义化的殖民地如此,现代企业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尤其如此。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处在这种事事依人的经济情状之下的诸弱小民族,一旦因急激反抗帝国主义而开始战争时,诸帝国主义必定采用绝断制品、生产工具、技术人才、企业资本,甚至如食料品,等等的供给源泉,以制诸弱小的经济于死命。此种绝断自积极方面看来,似乎可以激发民族产业的发展,但这不是一时马上可以做到的,在战争期中尤其谈不到。

诸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族之联结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固然是民族运动现阶段的必要,同时又是必然性,而诸帝国主义之采用上列有效的方法以保障他们对于殖民地之统制,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现阶段的必然性,并且这种办法对于他们实有非常的必要。到这时候,诸弱小民族如欲保持其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之有效,必须讲求更具体的,根本的计划。据我的意思,这种计划的原则有二:其一为开辟诸弱小民族及同情援助势力之紧束联结的途径;其二为完成诸弱小的独立经济之完成。实现这二种原则的方法,自地理关系言,自经济关系言,自交通关系言,甚至自文化关系言,开发中国的西北部实在是目前的第一道路线。开发西

北的结果,至少可以尖对着上述诸帝国主义统制诸弱小民族更有效的各种办法,而收获①巩固反帝国主义的阵营,②破坏诸帝国主义对诸弱小分别的军事封锁,③紊乱诸帝国主义共同统制半殖民地的步骤,④避免诸帝国主义自经济上封锁诸弱小的危险,⑤减轻帝国主义的加倍压迫。

## 四、开发西北的重要性

### (一)开发西北的意义

我们主张开发西北,应当先道明一个开发西北的理由,换言之,说明开发西北的意义是什么?

开发西北的意义,或许因人而异,因为主张者的见解及所属集团的利害关系而其意义可以有种种的不同。归纳起来,大约可得下列几种:

#### 1、开发西北可以消纳中国本部的过剩人口。

此说着重于中国本部的人口问题的解决,谓中国连年内战不绝,其主要原因即在中国本部的人口密度太高。又因“四万万三千万人民穷蹙拥于内地 18 省者,殆四万万有奇”,“所以困处内地,生计局促,生机遂不能不日益萎缩也”,“吾国人口,自 19 世纪中叶,号称四万万(道光二十二年 18 省人口 413,021,452)当时占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20 世纪之初,仅占四分之一矣,今则四分之一不足,或有谓并五分之一亦不足者……”。因此,“谋吾族之生长发育,必须经营西北”(带引号的句子,皆引自刘镇华氏著《开发西

北计划书》)。

## 2、开发西北可调剂中国人民的经济

主张此说的理由就是“吾国长城内为农业民族繁孳之区,长城外为游牧渔猎(唐努乌梁海今仍专以渔猎为生)民族栖身之所,历数千年,未尝多变,故游牧渔猎者生活日益猛獩,而农业者体躯日益孱弱,长此不更,国固不振,种亦日替”(同上计划书6页)。因此主张开发西北而获下列三种利益:“(a)移内地农业人民,垦种西北荒地,可以使吾塞外之同胞,日沾濡于布帛黍粟之化而改进其猛獩之生活;(b)大规模改进牧畜事业,振兴毛革制造,输入内地,俾吾农业人民,得以肉乳济粟米,呢笔济布帛,一改其饮食服用单调之遗习,庶吾国族体魄乃日进于强健;(c)国内原料及制品,有大量之交换,可以搥破吾民族数千年来呆定之经济状态,骤呈活泼气象,因此促其进步之速率)(同上)。

## 3、开发西北可以获得中国经济上的重要原料

主张此说者意谓现代生产上的天然原料最重要的,是煤,铁,洋油三种,“此三者之矿量,不足敷其国族之需用,在经济上不得为独立国也”,又“依最近地质学家之调查,吾国除煤矿一项,已发见者约供百年之用,可无问题外,油铁两项,均觉缺少。……,”因此之故,更进而主张:“铁油两矿内地之蕴藏,既如此其少,则边区之探寻,实为今日最急之务”。恰好,“由延安迤西至玉门关一带,到处有油苗发见,玉门附近,又有油泉涌出,将来可望其有大量盖藏。天山南路,南北山势雄峻,英吉沙尔,既有铁产,或冀其为板

状大层(中国内地即有多少铁矿,也皆非板状大层,不足供大规模之采冶——作者附引),要之西北五省居全国面积十分之三,万山重垒,矿藏称富……”(同书8页)

#### 4、开发西北可以巩固中国的国防

主张上列各种意义者更谓:“今就西北对境外之关系观察,愈觉西北之经营,其时机尤为迫切”。可见开发西北的国防意义,在一部分人眼中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一部分人之所谓国防者是什么?“中国西北东北,俱邻苏联,介中国本部与欧俄本部之间,南起昆仑,北尽冰洋,东西广延数千里,面积约七百万方英里,其中除辽吉两省,汉人久已繁孳,黑热察绥四省,汉人逐渐移殖外,其余在中国境内者,如外蒙、呼伦贝尔、青海、宁夏、新疆,在苏俄境内者,如西伯利亚,土库门,乌斯伯克等地,皆乌拉阿尔泰族各部落渔猎游牧之所,此地区依现在中国与苏联国界言之,在中国境内者,约二百万方英里,在苏联境内者,约五百万方英里”。而“乌拉阿尔泰族部问题者,数百年过去历史所附予中俄两国间之最大问题,亦即此东西广延七百万方英里土地谁属之大问题也,使中国对西北各区,早已经营,著有成效,而俄国革命后长久混乱,则不但吾境内之新疆蒙古,可保无虞,即境外之喀萨克土库门等等,俱将向化来归,则苏联境内数百万方英里之土地,将连带而隶中华民国之版图”。但是不幸之至,“今俄国对西伯利亚及中亚各地,经营不遗余力,所有乌拉阿尔泰各民族多归牢笼,不但外蒙独立,急切无法收回,恐新疆各部缠回,亦险象环生,岌岌可

危,使此部族者,果皆叛我投俄以去,则我境内数百万方英里之土地,亦将连带而为苏联之领土……”

#### 5、开发西北则西北民众的膏血将为本部人民所吮吸

以上所述四种开发西北的意义,只是中国本部人民或官方所想出的意义。但在西北的人民方面,或许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和估价呢!据久游西北各地者的观察,现在西北的一般民众——大多是回族——对于汉族之移殖,极不欢迎,回族对于汉族采取敌视厌恶的态度。其主要的原因为于西北方面的人民,由于他们数十年来的经验,恐怕中国本部的汉族,又要大批地,大规模地到那里去大肆欺压和剥削。这或者是西北民众一时难免的畏惧,也就是他们顾虑自己利益的一种本部人民的汉族西北开发观。

上列前三种意义实在不能认为开发西北的意义,而只是达到根本的,正确的意义的条件吧了;如果必欲认为意义,也不过是非重要的,非根本的意义而已。尤其可笑者,所谓开发西北的国防意义,只限于北方防御苏俄,而西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康藏、滇桂之岌岌可危,主张者则装聋不知;主张者以“辽吉两省,汉人久已繁孳,黑热察绥四省汉人逐渐移殖”之故而高枕甜梦之满蒙,竟至不入“苏俄之领土”而反为主张者素所装聋不敢正听正视的帝国主义伙伴的日本所侵占。只有第四种意义,在西北开发办法未完全施行以前,暂可充作未证实的意义。其实,西北人民或者太过于杞人忧天,中国本部人民或官方之开发西北,未必包藏这种祸心,一方面固然为着本部的利益,他方面亦

为着西北民众的利益,开发的结果,果能保住利益不外溢,那末,双方皆得均沾利益,是可预言的,最可怕者恐将为了帝国主义者而架桥已耳。

然则我们所认为真正的根本的开发西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根据我们在本文上篇所展开的问题——世界情势俨然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二大营垒,其间又夹着殖民地的营垒;同时反帝国主义立场相同的诸势力有联结一致的必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开发西北的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开拓联结反帝诸势力的道路,增强中国反帝的势力(这种势力不是俗流的西北开发论者的办法所可以造成的)因而增强殖民地反帝的势力,乃至增强整个反帝营垒的势力,希冀借此以达成殖民地的革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

## (二)西北地理境界之商榷

开发西北的根本意义既然决定,西北的地理境界是应该决定的第二点。西北的地理境界,也如开发西北意义之有种种不同的主张,而有种种不同的境界。更切要言之,西北的地理境界之决定,依存于开发西北的意义,有何种意义则有何种境界。兹先介绍一般开发西北论者的境界于下。

《开发西北计划书》的著者,规定西北的地理境界如下:

一、以新疆全省包括天山南北路及新附之塔城阿尔泰

两道,为本案经营之最终一段;

二、以甘肃西北部(兰州以西)及宁夏青海为本案经营之中坚部分;

三、以甘肃东南部及陕西省为本案经营之基础。

约言之,本案所谓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以河南省及陕西关中道已经繁庶之区域为出发之根据地,以现正积极进行之陇海路为进行之第一径途,经甘肃而渐次经营宁夏,青海,新疆之边区也(上引书2页)。

根据上开境界,西边的西藏西康,北边的内外蒙古,吉林黑龙江,未包括在内可知。

又据《开发西北计划书》著者刘镇华氏所创办的西北研究社成立大会关于西北境界的讨论,听说解释西北为“西与北”。若依此种解释,则西北的境界不只限于上列范围,是自明的道理。西边的西藏西康,北边的内外蒙古黑龙江辽吉皆应包括在里头。

我们对于西北的地理境界,赞成后者的范围,约略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西藏、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在这范围内分成下列三区:

一、北区 包括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外蒙古。

二、中区 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康。

三、西区 包括西藏及新疆二大区域。

在上列三区的开发当中列出先后来,则应以中区为根据地,为基础,所以也是西北开发的第一线,出发点;由此



中区开发的完成,西北基础的稳固,再分向北区及西区推进。必须如此始得完成开发西北的真正的,根本的意义。因为只完成刘氏所定境界的西北(约等于我们所定境界的中区)的开发,还不能达成我们所期待联络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乃至反帝国主义诸势力的目的。若西区北区的开发完成之后,则不但可以图谋抵御,排去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等地的势力,并且可以和印度,缅甸等地的殖民地革命势力,以及阿富汗、俾路支、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埃及等中东近东被压迫民族联结起来,苏俄的反帝势力也可以经由新疆而联成一系。北区西北的开发完成之后,又可以藉孙中山先生毕生所主张联络平等待我的民族的苏俄势力与我联结之严密成功,抵抗东边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与苏俄联络的意义上,尚有经济的助力和必要因素存在(关于此点,后面详论)。

### (三) 西北在中国的地位与中国在东方民族运动上的地位

然则包括上节所列地理境界的西北,对于东方民族运动,乃至东方殖民地解放,究有何种作用? 此项应分两方面来讲:第一,西北在中国的地位如何;第二,中国在东方民族运动上的地位如何? 将此两方面的问题分析连贯起来,即可了然于西北对于东方民族运动的作用,或效用。

西北在中国的地位,可由 1、面积广大;2、现代资源丰富;3、各称民族杂处;4、地连苏俄;5、可以联通中东近东,

五点表现出来。兹分述于下：

### 1、面积广大

中国土地的全部面积，约有 430 万方英里，而中国本部 18 省总面积约为 153 万方英里，约占全国总面积八分之三，其余八分之五，约当 253 万方英里的广大面积，几乎可说是西北的土地。换言之，西北土地面积二倍于中国本部的面积以上（统计数目字据大西斋著《支那的现状》4 页）。

### 2、现代资源的丰富

现代资源的丰薄决定其国家或其地方的经济的兴废。现代资源之中最重要者，有煤、铁、煤油、电力、棉花、羊毛以及一般农林产。而西北对于这些现代资源，不但应有尽有，并且产量及埋藏也很丰富，西北的北区东部，素以农业区、天然森林区，及露天煤区负盛名于世，煤、棉花、木材及一般农产皆甚丰富（参阅拙作《日本侵占下之东三省农产》载本刊二周年纪念特刊）。西北的北部西部及中部则以牧畜闻名，羊毛，驼毛的产量很丰富。中区及西区万山重叠，各种矿藏，到处皆有，铁及煤油的出产有无穷的希望。山高之处必有瀑流，电力之制造也是大有望的产业。

### 3、各族杂处

西北各处皆各族杂处，北区有满、蒙、汉三族；中区有回、汉二族；西区有藏、回、汉三族，混然周旋于其间。固然异族杂处的地方，时常发生民族的斗争，因而愈使社会问题重大化。但是这种民族的纠纷，如能调剂过来，使认清公

共的敌人，消灭弱小的自相残杀，则于人类社会造福不小。开发西北实负有这种使命。不但可以融化中国境内的民族纠纷，并且可以由此融化而造就中东及近东各弱小民族的融合。因此，各族杂处之点适成了开发西北重要性之一。

#### 4、地连苏俄

关于西北地连苏俄的重要性，有政治的及经济的二种意义。政治的意义就是：苏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平等待我的民族之一，且在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与被压迫民族（中国在内）的利害相同，所以开发西北可以造成与苏俄联接的捷径。经济的意义就是：中国以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实行反帝国主义的结果，必为诸帝国主义所封锁，而经济上发生窒碍，其时的出路只有向北联络苏俄，苏俄年来经济的发达，必能拯救中国经济被封锁后的种种危机，例如工业制品，生产工具，技术人才，以及资本等等来源的断绝。

#### 5、可以联通中东近东

西北的西区与印度，阿富汗及中亚各地为邻。开发西北的结果，中国反帝的势力可与这些地方的势力联成一片。更可由此进而联结安南、缅甸、波斯、美索波达美亚、土耳其、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的势力，而造成东方反帝的整个势力。西北自地理上及民族关系上言，可以完成这种使命。因此，这一点也是开发西北的重要性之一。

只剖述西北在中国的地位，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尚不足以证明西北开发在东方民族运动上所占的重要性。必

须更进，而究明中国在东方民族运动上的地位，而后西北开发对于东方民族的作用，如能完全毕露出来。中国在东方民族运动上所占的地位，可以由①面积的广大；②人口的众多；③富源之充足；④文化之高；⑤充当诸帝国主义的续命汤，等项表现出来。兹分述于下：

### ①面积的广大

中国国土占亚洲四分之一，北自寒带南至热带，其面积只中国本部 18 省，即已有 1,532,000 多方英里，再加算东三省的 363,000 多方英里，蒙古的 1,367,000 多方英里，新疆的 550,300 多方英里，及西藏的 463,000 多方英里，共有 4,277,000 多方英里。除苏俄的领土而外，东方被压迫诸民族的土地的大部分，皆在中国的国略之内，并且所占的土地均比其他任何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土地肥沃。这一地带的前途如何，影响整个东方民族运动甚巨，可想而知。（数目据上引大西斋的上引著作 4 页）

### ②人口的众多

中国人口的数目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中国的人口总数，为 436,094,953 人，约占亚细人口总数 99,700 万人二分之一，即自世界总人口 180,470 万人看来，也占四分之一弱。亚洲任何部分的人口，和中国人口的这个大数目比较，皆微之又微。这个巨大人口的中国民族运动如果成功，对于世界政治固然有极大的影响，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必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中国人口众多之点，在东方民族运动上所占地位的重要，也可想见（数目据《经济学全

集》第 34 卷《世界经济统计图表》第一表《世界四面积及人口》)。

### ③富源的充足

中国的富源,无论在矿业方面,农林业方面,仰在畜牧方面,渔业方面,皆应有尽有,产量及藏量且极丰富,或前途的发展希望无限。矿产方面有煤、铁、盐、锡、煤油、洋灰、曹达、金等,即就现已开发者而言,1925 年,中国主要矿产的总额合算,已有 32,487 百万多元。农业方面,现有耕地面积已有 92,762,000 多日亩(每日亩等于 17.64 中亩),十五倍于最近占领满洲的日本的耕地面积。主要农产有米、麦、豆类、生丝、棉花、桐油、小米、高粱,等等。占对外贸易品的重要地位的,有生丝(一千七八百万元),豆类豆油(各七八千万元乃至一亿元),棉花(6000 万元),桐油(2500 万元)等等。林业以东三省的天然森林为第一位,木材的产量可以供给世界之用。渔业方面,渔场的面积约在 27 万方海里以上,即在现在渔产极幼稚的状态之下,每年的产额尚在二亿元以上。畜业盛于西北,前途有望。拥有如此富足资源的 中国,对于东方民族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数目字据上引大西斋的著作 229 页至 235 页)

### ④文化之高

中国现在虽是一个弱国,产业虽然落后,而数千年的文化依然存在可观。其文化程度自某种意义看来,并不在西欧之下,与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比较,则仍占第一把交椅。现在所成问题者,只是不知顺风转舵,尽量地接受新潮流,

以应付世界整个危机的逼迫而已。文化程度之高足以领导东方诸被压迫民族,足以匹敌欧美列强(东方的日本更不消说)的中国,对于东方民族运动前途的影响,只视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有觉悟分子的努力和运用为断。

#### ⑤充当帝国主义的续命汤

诸帝国主义争逐于中国疆土已有长久历史,但自1929年世界经济恐慌普及苏俄的繁荣孤岛以外的世界以来,诸帝国主义更切望得中国这块肥肉而后已。并且,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方式,渐有改争夺为协作的倾向,诸帝国主义的焦急可以想见,而中国的危机也愈迫切。具有①②③④各项条件的中国,倘若果为诸帝国主义所吞并,或受实质上的统制,则诸帝国主义可以得暂时稳定,而东方诸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前途,必受到巨大的打击。反之,中国民族若能争气,各方面的企图得法,因而得将争逐于中国的诸帝国主义势力排击出去,则诸帝国主义失去巨大的依据而根基动摇,而东方民族运动得到极大的助力,乃至成功的因素。因此,在中国为帝国主义的争逐场之点,与东方民族运动的前途,有密切的关系。

### 五、开发西北的前程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西北在中国目下的地位,及开发西北对于东方民族运动的帮助了。扼要言之,中国目前的情势,似非完成正当的西北开发则不容易解决中国的问

题；而中国问题未得相当程度的解决或解决希望以前，东方民族的整个运动，必定失掉推动的助力，乃至原动力。开发西北的重要性，自东方民族运动的立场上言，即在于此点。

然则西北开发完成后，可以发生何种效用？换言之，我们所期待于西北开发的前程，是什么？根据上面所讨论过开发西北的真正意义，我们所期待于西北开发者，约有下列五项：

- (一)开辟诸弱小团结的路线；
- (二)与同情弱小者提携；
- (三)融化诸弱小的感情；
- (四)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
- (五)完成中国的独立经济。

逐项简略分论于下。

### (一) 开辟诸弱小团结的路线

现在东方的诸弱小民族，皆受到帝国主义的统制。安南、叙利亚及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都是法国的殖民地，专听法国压迫、榨取，为所欲为。印度、缅甸、新加坡等，为英国的殖民地，固然专听英国压迫、榨取，为所欲为，而尼泊尔、不丹、阿富汗、波斯、俾路支、美索波达美亚、巴力斯坦、埃及、及阿拉伯半岛的汉志王国，也莫受到英国的统制，俨然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占住南洋的菲律宾，近来也渐向中东方面推进他的势力，波斯及阿富汗方面的洋油油

田,已为美国资本所染指。日本帝国主义则独占远东的部分,如朝鲜、台湾及南洋几个小地方,都是他的殖民地,最近尚且向满蒙伸张他的魔手,华北一带也在他唾涎之下。中国境界内的各部分,大多成了诸帝国主义分割或共管的形势,西藏统制于英,香港早割于英,云南及贵州为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一带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近来则渐有转入美国势力范围的倾向。他如外蒙及新疆也渐离中国。东方弱小诸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在这种情势之下,反帝国主义的利害虽相共而形势则四分五裂,既成帝国主义的顺民者不用说,即企图抗拒者也因孤掌难鸣而结果无成。但其所以造成这样分裂孤立的形势的最大原因,在于交通不便,感情本多隔阂,联络更无从下手。若西北的开发成功,必可第一步开辟中国境内的联络线,第二步向西推进,打通联络中东及近东各地的反帝国主义势力。

## (二)与同情弱小者提携

孙中山先生为解放弱小民族的被压迫而提倡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在东方诸民族之中,他所认为平等待我的民族就是苏俄。即就现在的情势看来,利害关系相同并且有充分力量帮助东方诸弱小民族的民族,也只有苏俄一国。苏俄自其本身的利害关系设想,也非帮助被压迫民族以抵抗帝国主义不可。再者,近年来苏俄经济的发达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背道而驰,竟驾诸帝国主义的繁荣而上焉。不但现在已有农产品和制造品,可以和诸帝国主



义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使诸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投卖战粟,并且在最近的将来,预定由自己制造生产工具——各种生产机器——以自给,并供给他国之用。这样一来,对于被压迫民族因反帝而被封锁时的接济,必将有很大的助力。即对于平时的经济开发,也有莫大的意义。因此,联络苏俄是目前被压迫民族企求解放的途径之一。而开发西北成功,正可以由外蒙古黑龙江及新疆,以开辟联俄的康庄大路。

### (三)融化诸弱小的感情

东方诸被压迫民族,或因交通的隔绝,或因宗教人情的不同,或因诸帝国主义的奸滑离间,而时常互相仇视,并且常有互相残杀的事情发生。积如早年外高加索三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rans-Caucersia),包括佐治亚、亚塞尔挥然及亚美尼亚,现已成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互斗,阿富汗民族与北印度民族的对立,去年来印度境内回印两民族的凶斗,最近西藏与西康两地人民的互残,以及普遍而且持久的回汉,回印,藏回等等带宗教种族色彩的不幸事件,差不多是东方诸民族间的家常便饭。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固然差不多每次都有帝国主义的魔手在背后指挥暗算,但是帝国主义这种暗算之所以能奏效,原因即在于诸弱小民族平时的隔阂,及因看目前的利益而各自为政。要补救这种缺陷因而融化诸弱小的感情,开发中国的西北,也是重要办法之一。因为开发西北依赖中国统一的

政权容易办到,西北开发成功则至少可以融化回汉藏三族的感情和利害,由此三族的融洽而向中东及近东推进,东方诸弱小的整个融洽可望成功,而帝国主义的离间阴谋归于无效。

#### (四)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

现在处于诸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东方诸民族,都有悠长的历史和光大的文化。只因近世以来隔绝于交通的不便而或者封闭关门而过孤陋寡闻的生活,或者在最狭隘的范围内继续着民族的斗争,致使在东方的范围内,对内即无团结一致互相推进的动力,对外又少与亚洲以外的地方摩擦而接受较高文化的机会。在这种情势之下,东方诸民族的文化,遂被情景相反而日渐发展的欧洲诸民族,驾而上之。现在,欧美的物质文明,较之东方的任何地方皆远胜多之。不但物质文明如此,即精神文明也较东方高明得多。这一点,除非是赞礼“东方文明”及提倡“东方主义”的人们,如日本的室伏高信,中国的梁漱冥之辈外,都要承认这种事实。但是这些文化落后的东方诸民族,尤其是被压迫民族之中,与欧美来往最繁,关系最切,因而吸收欧美文化的成分最多的,应该推崇中国,尤其是中国本部。因此,开发西北之后,第一步可以输入中国本部的比较进步的文化于中国的西北部,第二步尚可进而推广于中东及近东各民族之间。文化落后的诸民族,得此机会可以提高本地方的文化而改进社会。关于开发西北对于提高文化之点,苏俄文

物制度之影响及传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点。因为开发西北的西区与北区的结果,可以与苏俄密接而直接输入苏俄的文化,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部分。

### (五)完成中国的独立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达是落后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向外发展的无需要,延长了封建社会阶段的长度。就是现在,这种封建社会的残迹还很明显地存在。他方面,欧洲则因殖民地的开拓及其消费品的需要刺激,而发明了各种机器,发见种种动力,因而很迅速地由封建社会过度到资本主义社会,更长驱而入于帝国主义的阶段。“先到者为君”,中国这句陈语说得好,欧美各国既然君临于世界,统制了世界各地的落后民族——残留在封建社会中及古代社会中的诸民族,中国也不出此例外。中国,现在不但经济落后不发达,并且因为受制于诸帝国主义,即欲发达也不容易。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现在处处受到诸帝国主义的掣肘,甚且处处仰赖于诸帝国主义。几乎可以说,中国一旦离开帝国主义,则现代的经济生活无法继续。我们瞧吧!中国的生产工具——机械及器具,固然仰赖于诸帝国主义,即日长的生活必需品也莫不仰给于外国,甚至于粮食问题,“农为国本”的中国,现在也须倚重美国的面粉,西贡及仰光的米,古巴及台湾的糖……来解决。此外,生产上的技术人才及产业资本,等等,也皆非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不能为力。在这种情势之下,东方一旦有事,尤其是在中国及其他诸

被压迫民族积极反帝国主义的场合之下,诸帝国主义对中国采用经济封锁政策时,中国经济只有陷入危机而中国人民坐而待饥毙。此时,中国若有聪明的政府如觉悟的民众,在合理的办法之下开发了西北,先开拓交通,发达重工业,使经济发达的基础稳固,继而发展轻工业及食粮工业,则西北的经济发达完成,而中国的独立经济确立。其时,诸帝国主义即欲借中国海口的封锁及占领沿海各国的势力范围,以执行破坏中国经济独立的工作,中国也可以不至束手无策。何况西北的北区及西区的开发完成,则可以直接联通苏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粮食的来源,可由苏俄代替帝国主义而挫折他们毒辣的封锁政策。中东及近东诸民族,若能联成一气,中国的独立经济更可巩固。在中国沿海殆皆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发展民族的独立经济不容易的今日,尤其是在东北四省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日本并且采用排挤本地住民而加重中国关内的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的今日,借西北开发之完成以奠定中国独立经济的基础,实有千百倍的重要性及千百倍的效用。

## 六、结论——开发西北的政治问题

根据本论文所剖述,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现阶段,反帝国主义的诸势力,尤其是东方的被压迫诸民族,有团结一致以进行反帝工作的必要;在开拓反帝诸势力团结的途径

上,中国西北的开发有非常的重要性;而开发西北的前程极其光明,有希望。我们在理论上所得到的结论,是这样。

然而人类社会的事实,往往出乎理论上的结论之外,有时并且发生相反的结果。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尽管我们所检讨的西北开发,对于东方民族运动及中国殖民地革命,有多么大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前程是多么大的光明,如果我们的政府或民众,弄错了西北开发的方针及办法,西北开发的结果也会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无补,对于中国革命造成恶劣的影响,也未可知。例如开发西北的意义果如西北民众所畏惧的,是开拓榨取西北民众的膏血的途径,那末,开发西北不但对于东方民族运动及中国革命无补,并且反能造成东方民族的纠纷,而延长东方诸民族的殖民地命运。又如开发西北的国防意义,若只限于防御北方的苏俄,而将英国在西藏西康的侵略及构煽,法国在云南贵州南部的进攻,日本在西北北区东部强占,以及美国正在企图取得西北开发的优先权乃至经济政治的支配权,等等事实忘却于九霄云外,则开发西北的结果不能帮助东方民族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成功,并且反能使诸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日益膨胀,由中国沿海及本部侵进西北的内地,其结果中国全部受帝国主义所统制,实质上完全殖民地化,而断绝最大殖民地革命势力的来源,而东方民族的解放,愈益离去事实,延宕至不可捉摸的将来。

开发西北结果的好坏,完全视乎西北开发执行者的中国政府及中国民众的立场及办法而定。谈到这里,问题已

经展开到“经济建设与政治的关系”上头来。政治虽是建设在经济的基础上,但是新的经济建设须俟政治的势力来开拓途径。要有合理的经济建设,须先有革命的政治。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政治要革命的,经济要和平的”(大意如此),其深意当不出此范围之外。这种事实充满着历史的篇幅,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的大革命,苏俄的大革命……莫不含有开拓经济建设础石的政治革命。

我们如果找出和开发西北相类似的最近事例,则我们可以举出苏俄发展西伯利亚东部的计划来。这个计划自经济建设的理论检讨看,实在和开发西北的真正意义,约略相同,甚至很多地方是密合的。例如苏俄为谋苏俄国内各部平均发展而开发西伯利亚,中国也为谋平均发展而企图开发西北。又如苏俄的西伯利亚开发,含有“移民实边”的用意,中国之西北的开发也含有“移民实边”的用意。又如苏俄为发展西伯利亚各种产业以与欧俄的经济互相倚重,中国之开发西北也为发展西北的各种产业以为完成中国独立经济的基石。甚至如苏俄为完成及推进他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计划开发西伯利亚,中国也为进行及完成我们所标榜的“殖民地革命”而计划西北的开发。这两种经济建设,实有很多地方密合的意义存在。所以,苏俄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我们实有借鉴的必要及利益。具体的,详尽的计划,因限于篇幅不能尽量介绍,现在只就苏俄开发西伯利亚东部的意义,办法,及他们所期待的结果,概括地介绍于下,以备注意此问题者,尤其执行西北开发的政府及

民众,用作参考(原文录自6月9日《大公报》)。

(伯力十七日电)据顷间视察西伯利亚东部美记者讯,此次视察结果,得悉西伯利亚东部并无失业,饥谨等事,在近十年来,此间受苏俄漠视,但顷已发现蓬勃苏醒气象,苏俄当局集中全力于建设欧俄与西西伯利亚,以致对此东部广大区域,不能分神,在此滨临阿穆尔之大都会与其南方四百英里之海参崴,市街虽不修整,建筑虽不圯漆,卫生虽不讲求,一切文明设备虽均付缺如,但此种情形,目前已成过去,此为在5000英里外之莫斯科无金钱与精力注意此边远地方时代之情形,查现时此间建筑虽少,工业亦未扩充,但凡此一切已在着手革新,苏俄拟于1932年内,在东部有伟大的努力,增加生产,建筑工厂住房,增添政府与合作农场,令农人均加入集产制,此为本年内拟做之事,不过此仅为来年伟大第二(个)五年计划发端之序幕,此为一种耸人耳目之梦想,但纵令有一部分成功,亦将予远东西伯利亚退化的无智识农民以一种新生命也,查第二(个)五年计划大纲,包括(一)立时施行强迫教育,(二)增加渔业、木材、煤矿、石油、农业等生产三倍半,(三)增加人口一倍,(四)建筑铁道2500英里,自库页岛对面太平洋岸至贝加尔湖北岸,然后折向西南与中亚细亚相通,

开发煤铁各矿暨木材,(五)在煤铁矿附近建设新城市,设制炼工厂,规定能出铁70万吨,钢20万吨,(六)另设工厂,制造农场,修路及开矿用之机器,(七)此外有电力厂,炼糖厂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终了时,须令苏俄各部分能得平均发展,据担任计划本省发展之俄员谈称,纵令在一年期内,亦须有长足进步,据该记者观察,苏俄仰仗各处人民之热忱,以及专家手中之铅笔,将能设计一崭新之世界云。

原载1932年7月8日《新东方》第3卷第7、8期



## 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将来

### 一、站在恐慌第六年度的门口

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人，现在又在经济恐慌的风浪暴烈翻卷的情势之下迎接了1934年。若从1929年度算起，今年已经是恐慌的第六年度了。站在这个恐慌第六年度的门口，资本主义世界一般人的胸中，又都照例充满着“忧喜交集”的情绪。喜的是因为恐慌已经继续了四个整年以上的长期，所以推测经济繁荣或许可以到来。忧的是因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当中，找不出一种可以造成繁荣的事实。只有布尔乔亚及其御用学者，照例，极力放送着“经济繁荣将要到来”的空气罢了。

1934年究竟是否经济繁荣到来的年度？要预测1934年世界经济的动向，须对于1933年的世界经济有精密的分析及正确的把握。1933年曾经给与布尔乔亚及其御用的经济学者，以最大的期待。他们都在1932年的年底，欢天喜地地预言：恐慌已经过去，繁荣即将来临。

然而全部过完了的 1933 年的经济事实，却打掉了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期待完全成了幻想。他们的幻想或许在一时的“假景气”的迷雾中得到了极其微小的欺骗的安慰。但是，真实的幻想却依然是幻想！

1933 年世界经济的经过如何？抽象地说来，春季的情形，比之 1932 年冬季的情形还坏，是不消说的，即比之世界大恐慌爆发以来最深化的时期 1932 年夏季的情形也更加深化。二三月以后，占世界经济 50% 以上的比重的美国，竟又爆发了全国的金融大恐慌；它的信用制度的根本动摇，震撼了全世界的货币及信用制度，切断了世界经济的联系。六七月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最大挣扎所反映的世界经济会议，又在一切国民的面前，证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及协调的空前的失败，并且警告说：此后各国的经济对立更要大规模化，尖锐化！世界经济会议流产后，各国皆急速地奔向各自的前途：通告退出关税停战协定啦，连续提高关税啦，连续厉行倾销啦，更加进行经济部落克(Economic Bloc)的大联结啦，更加大规模地扩充军备，发展军事工业啦，……莫不急向经济的国家主义的方向迈进，莫不忙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英日国际贸易战的激烈化及到处倾销的日货之受到世界的排斥，也是证明世界经济的协调无望的雄辩的事实。

总而言之，世界经济正在各国急向经济国家主义的方向猛进，整个的世界经济急向部落克经济解体的情势之下，送走了 1933 年，迎来了 1934 年。

## 二、春季恐慌的深化

世界经济大恐慌发展到 1930 年秋后，即展开了一个新阶段，就是金融大恐慌的加入。这个金融大恐慌在 1931 年引出了几种大问题：胡佛延付问题，德奥金融恐慌问题，秋后更迫得英国及镑系各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禁止现金出口，而侵占东三省引起世界经济界大恐怖的日本，也终于步着英国的后尘放弃了金本位。于此，世界经济的联络线碎断，而世界经济更加分裂紊乱。1932 年夏季，逐致发现 1929 年恐慌爆发以来未曾有的深度。其后，虽然因为美国胡佛的各种救济政策，造成了一时的所谓“胡佛景气”；又因洛桑协定的成立，德国赔款减至 30 亿马克，缓和德国的经济危机至某程度；因为这二种事实，遂招来了七八月间微小的投机市场的好转。但是这个投机的景气到 10 月以后即呈逆转，一般的希望依然变成泡影。根据德国景气研究所的调查，若以 1928 年为基数，则 1930 年以后的生产及贸易的指数如下：1930 年，90.5, 90.3；1931 年，77.9, 82.0；1932 年，67.3, 69.0；一年不如一年。

然而，1933 年春季世界经济的情形，更不如 1932 年，即连恐慌最深化的夏季，也都不如。经济情形的恶化第一表现在物价的崩落上头。

1933 年春季物价表

	1932 年 6 月	1933 年 1 月	1933 年 2 月	1933 年 3 月	1933 年 4 月
美(1926 年 = 100)	46	43	41	43	45
英(1913 年 = 100)	112	107	105	102	101
法(1913 年 = 100)	490	455	443	417	407
日(欧战前 = 100)	—	147	143	141	140

注：上表所列美英法的指数，根据国际联盟准备局月报，日本的指数则根据日本银行的调查。

春季的物价，不但比之 1932 年 6 月还低，并且是一直的跌落。

此外，世界工业的生产情状，也是步着一直的线状跌落下来的。根据德国景气研究所的调查（1928 年——100），世界工业的生产指数如下：1930 年平均为 90.5，1931 年平均为 77.9；1932 年平均 66.1；1933 年 1 月为 67.5，2 月为 67.3，3 月为 66.6，4 月为 65.8；可说 1933 年 3 月的世界生产状态约如 1932 年的平均状态，而 4 月的衰落则又超 1932 年而过之。

在这种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来未曾有的恐慌深化的情势之下，终于迫成那生产占全世界过半成分的美国，尤其是欧战后执世界经济界之牛耳的美国，爆发了金融大恐慌，空前的金融大恐慌。美国这次的金融大恐慌，不仅仅是美国的信用制度及金融制度根本破产的意义，实质上确是世界信用制度根本动摇，世界经济全体瓦解的意义。这是此次美国

金融恐慌所以当作世界经济一般问题来处理的原因。

自从193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即已在金融危机成长的过程中挣扎着。一方面，停业的银行越来越多，货币越发退藏，现金越发流出，另一方面，则由胡佛的各种救济政策来弥缝并掩饰。而金融大恐慌即在这种掩饰弥缝政策之下，潜伏地长大起来，终至于3月间爆发了美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金融恐慌。美国金融危机成长的情状，可以由美国全国银行的存款总额看出来。美国全国银行存款总额，在1929年10月4日（约当世界经济大恐慌的起点）至1932年底之间，激减了138亿美金元。入1933年以来，依然继续减少，在1月4日至3月1日的短期间，特别往来存款减少了14亿美元（减14%），定期存款减少了5亿美元。

现在正在大刀阔斧地发挥他的独裁手腕的罗斯福大总统，虽然曾在他就任的第二天的3月5日试行现金出口的禁止，但终于不得不在4月19日正式颁布了禁止现金出口令。美国金融大恐慌发展到这时候，不但造成了美国金融恐慌的新阶段，并且造成了世界金融恐慌的新阶段。禁止现金出口及停止金本位制，已经不复是例外的，部分的事实，而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势力。完全靠称为“世界货币”的金来联系的世界信用及商品流通，到这时候更加破坏，此后的世界经济体系更要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所谓通货膨胀政策的发展——由低级的信用膨胀到汇兑膨胀，到更高级的纸币膨胀——确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通货膨胀政策固可以刺激生产及物价上升,但其效力只是一时的兴奋作用,上升的生产及物价,一转瞬间即又跌落。其后的市况,遂呈现动摇不定的投机状态:夏季的市况稍稍上升,但到八九月后却又反跌。

### 三、夏季恐慌深化的缓和

占世界经济过半比重的美国采用了高级通货膨胀政策,施行所谓产业复兴法的结果,激励了美国的投机的景气,美国各部门的工商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呈现一时反涨的气象。因而,世界经济全体也受美国之赐,春季以来越发深化的恐慌,遂得暂时停顿,并且稍微上升了。

自大体上说,夏季的世界工业生产及各种物价,皆有稍微上升的现象。

夏季世界工业的生产指数(1928年=100)

1930年平均	90.5
1931年平均	77.9
1932年平均	66.1
1933年4月	65.8
1933年5月	68.9
1933年6月	75.1
1933年7月	82.3
1933年8月	85.8

注:本表根据德国景气研究所的调查。

世界工业生产指数,自4月以后即渐上升,5月即超过了1932年的平均指数,7月以后又超过1931年的平均指数。实在是世界经济恐慌以来未曾有的好现象。

即以夏季的平均指数与上年同期的平均指数比较,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夏季世界生产指数表

1928年	100
1930年夏季	94
1931年夏季	86
1932年夏季	72
1933年夏季	83

注:据日文《经济往来》1933年12月号小岛清一的报告。

然而世界工业生产的增加,并不是因为实在的需要增加的缘故,而只是因为(一)恐慌太过于深化的春季景气的回光返照,(二)世界经济会议诱致的投机景气,(三)美国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假景气”。因此,夏季世界工业生产微小的上升。尚不足以证明世界经济繁荣之行将到来。事实上这一时期景气的上升,也极其不平衡。考察各国变动的状态,即可明了。4月以后物价的变动,也只有美国的升涨最为显明,由3月的75.1直升到六月的96。日英的升涨极其微小,在3月到6月之间,日本由141涨至143,英国由90涨至98。日英也是受到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的。至若维持金本位的各国,则不但没有升涨,倒反跌落了。法国

的物价指数,由2月的390,减至5月的372。要而言之,本季市况的上升,只是投机景气的表现,只是通货膨胀政策招来的结果(以上数字皆根据日文《经济往来》12月号,日本银行的调查,以欧战前为基数100)。

还有一种事实可以证明夏季上升的市况,是一种假景气。本季的世界贸易,比较以前任何年份的世界贸易都衰退多多,甚至于连恐慌最深化的1932年夏季,也都不如。

1933年夏季世界贸易表(1928年=100)

1930年夏季	98
1931年夏季	83
1932年夏季	66
1933年夏季	62

(注)根据柏林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指数。

贸易的衰退,大体上可以说是对于商品的需要减少了,也就是世界的购买力减低了。只要世界的购买力不增加,那末,世界经济恐慌的消减,乃至经济繁荣的到来,自然是谈不到的。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生产的过剩,在于生产力与购买力的不均衡的发展,更自经济法原则上说来,就是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相适应上头。

#### 四、秋季以后景气的沉落

1933年夏季世界经济恐慌深化的缓和,甚而至于呈



现了微小的上升的气象,完全是世界经济会议和美日等国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引诱激成的。在整个世界经济恐慌越发深化的过程中苦闷着的企业家们,皆认为恐慌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经济对立,所以倘得集合世界各国共同讨论出一个协调的方法,圆满解决各国间的各种经济纠纷,则世界经济立刻可以繁荣起来。在世界经济会议未开幕以前,乃至开会期中,各国企业家对于这个会议,皆抱着热烈的希望,预料世界经济会议必能消除世界贸易上的种种障碍,所以大家争相扩大生产,以备向外推销。这是夏季世界生产所以激增的第一原因。其次,美国在春末夏初,继续采用种种破产救济办法,如银行破产的救济等等,通货膨胀政策,及所谓“产业复兴法”造成投机的景气,物价遂有了显著的增涨,生产也有急速的增加。因为占世界经济过半比重的美国假景气的升涨,遂平摆了恐慌,至于略为升涨的程度;同时也刺激了世界各国,夏季世界生产,遂有上述的良好现象。

然而上述刺激夏季世界经济界的两种原因,到了八九月以后即已失掉效用。世界经济会议经过数十天的长期讨论,不能获得各国经济上的妥协点,倒反暴露了各国经济对立的不可调和性。经济会议终于毫无结果地流产了。(详情参阅拙作《世界经济会议及其后世界经济的动向》)这个协调企图的失败,预告企业家说:各国此后的经济对立更要尖锐化,商品的销路更要狭隘化。另一方面,罗斯福的产业复兴法及通货膨胀政策,也渐失去效用,美国的投机热也渐冷

却,遂致影响世界经济的一般景气反跌下来。不过,这里有一个特色,就是景气的升降动摇不定。这完全是恐慌现阶段上各国通行的恐慌对策的通货膨胀政策促成的现象。

投机景气的消失,第一步表现在一般物价的反跌上。

1933年下半年物价指数表

	美(纽约)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4月	——	99.9	——	——	——
5月	——	96.0	——	——	——
6月	95.7	98.1	687	91.9	——
7月	103.5	98.5	697	92.9	144.8
8月	105.3	98.4	694	94.2	143.1
9月	103.9	98.5	688	94.9	148.0
10月	101.3	97.0	684	93.7	143.5
11月	——	95.3	——	——	142.1

(注)(1)纽约的物价指数根据日文《中央公论年鉴》。(2)英国指数根据 Ecomomist 关于 58 种商品的统计,1914 年 7 月为基准。(3)法国指数根据一般统计局关于 126 种商品的统计,以 1913 年为基准。(4)德国指数根据联邦统计局关于 45 种商品的统计,1913 年为基准。(5)日本指数根据日本银行关于 56 种商品的统计,1914 年 7 月为基准。

根据上表,可知除德国而外,各主要国家的物价都是跌落的。而德国的调查,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即已不可靠了,完全采取欺骗的手段来掩饰德国经济危机的深化。

各国的股票价格也有跌落的趋势。英国 92 种股票价格指数,由 6 月的 108 跌至 11 月的 104(1924 年 = 100)。法国 350 种股票价格指数,也由 7 月的 253 跌至 10 月的 233(1913 年 = 100)。德国 329 种股票,也由 7 月的 68.5 跌至 10 月的 62.1 (1924 年 6 月 = 100)。日本股票的跌价略迟,但自 10 月以后也即大跌,由 10 月的 144.2 跌至 11 月的 115.9(1921 年 4 月 = 100)。美国的股票价格,因为“人为景气”的影响,始终动摇不定。纽约市 30 种工业股票的市价如下:8 月 30 日为 102.35 元,9 月 27 日跌至 93.18 元,11 月 1 日更跌至 89.62 元,其后虽略反涨,12 月 6 日涨至 101.28 元,但至 12 月 13 日又返跌至 100.69 元。(根据日文《世界经济》月刊 1933 年 12 月号及 1934 年 1 月号附表)。

一般物价的跌落必然地引起生产规模的缩小乃至生产限制。因此,在秋季以后世界生产也与物价同样呈现衰退的情状。

1933 年秋季以后的世界生产表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美国	—	75.6	80.7	75.6	71.4	—
英国	609	578	577	560	680	679
法国	85.8	87.4	88.2	87.4	85.6	—
德国	—	99.9	71.4	71.6	72.0	—
日本	121.3	110.5	125.2	115.3	—	—

(注)(1)美国的指数根据《国民经济杂志》55 卷 6 号,(2)英国

的数目单指粗编的生产量,单位千吨。(3)法国的指数根据一般统计局的工业生产指数表,1931年为基准。(4)德国的指数根据柏林景气研究所的工业生产指数,1928年为基准。日本的指数根据三菱经济研究所的调查,1921年5月为基准。

根据上表可知世界一般的生产皆向下衰退,美国的钢铁生产更在证明美国工业往下的趋向:铣铁生产由7月的182.1万吨减至10月的136.4万吨;粗钢生产由7月的325.5万吨,减至10月的214.6万吨。

在世界经济一般的沉落的情势之下,只有一种唯一的好现象,可以说例外的好现象,就是国际贸易的发展。

1933年下半年的国际贸易表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美	出	119.8	144.4	131.5	160.1	194.0	
	入	122.3	143.0	155.0	146.7	151.0	
英	出	33.7	34.2	35.3	35.6	38.7	38.1
	入	53.8	53.7	56.8	57.8	61.8	63.7
法	出	142.8	147.1	144.0	158.5	166.2	
	入	240.4	222.1	214.9	213.1	223.0	
德	出	384.5	385.8	412.5	432.0	445.4	394.0
	入	355.7	360.2	346.8	337.0	347.0	351.0
日	出	16,038	15,872	18,376	18,161	17,188	
	入	13,701	14,104	13,108	13,541	13,900	

(注)上表根据日文《世界经济月刊》本年1月号统计表编制而成的。美单位为百万美金元,英单位为百万镑,法单位为千万法郎,

德单位为百万马克,日本单位为万日元。

一般的世界贸易虽然稍稍上升,但这也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关税休战协定”的赐与。各国为着便利世界经济会议的进行顺利起见,成立了各国的关税停战协定,凡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国家全部加入,所以各国的关税战争自6月以后,入于休战的状态,而世界贸易遂得稍稍流通无碍。但挥关税休战之国的世界贸易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一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而各国声明退出关税休战协定之后,则贸易战争必更尖锐化。所以自10月以后,有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就呈现反落的现象。

## 五、1933年世界经济转动的机契

总观以上各节的分析,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体上总算维持着比较平顺的情势。但是这句话并不是说世界经济已经由恐慌渡到萧条(Depression)的意思(依照景气循环说,恐慌后到来的萧条,就是到繁荣去的阶段)。而只是说1933年经济恐慌的深化,没有1932年以前那样激烈的意思罢了。第一因为这一年中经济的发展既不均衡,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并不适应;第二因为这一年中世界经济的发展忽升忽降,动摇不定;第三因为现在还不能发见世界经济转好的前提条件。实质上,1933年世界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着平顺的情势,完全是由于人为的及暂时的作用。罗列

这些作用,可得下列七种:

- (一) 世界经济会议诱发的投机热;
- (二) 普遍的战争景气的膨胀;
- (三) 美日英等国的通货膨胀政策;
- (四) 美国的所谓产业复兴计划;
- (五) 殖民地统治的强化;
- (六) 关税停战协定的一时作用;
- (七) 日本国际贸易的大活跃。

从现在既定的结果看来,或自那时候洞悉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矛盾的眼光锐利的经济评论家看来,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固然是必然的归宿,但在当时的企业家们则视为长期恐慌的黑暗世界中的救星。诚然,世界经济会议所企图解决的二大问题,通货信用问题及关税问题,倘能获得圆满的解决,则各国的经济对立可以缓和至某程度,世界贸易可以增进,世界的生产也可以随之而增加。世界经济会议对于企业家的投机的引诱性,实在不小。世界的生产及贸易,就在这种投机的引诱之下膨胀了一个时期。

其次,普遍的战争准备也是维持 1933 年世界经济平顺的根本契机之一。世界经济恐慌深化所反映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上及政治上对立的尖锐化,激动各国疯狂的备战。去年一年中轻重工业的生产及国际贸易中,军事工业的生产及军器的买卖,占很大的比重。钢铁的生产不用于生产设备上,而用于枪炮及军用汽车的制造上。例如法国的冶铁生产,虽然提高了 24%,但机器生产却只提高了

8%，所剩的16%全部是军器生产的增加。又如法国的汽车工业的生产提高了17%，而大部分都为军用汽车所占，并且法国几个主要的汽车工厂Rennuot, Hotchikin, Worben, 及Citoron等等，都是兼造坦克炮，机关枪，及军用飞机的。德国的军需工业尤为发展。德国的铸铁及钢铁的生产，虽比前年提高了15%至20%，但生产机器的生产额却反从前年8月的117落到去年4月的114，这在露骨地证明德国去年的工业生产完全为军器生产所维持。此外，如三合土的生产及棉织工业的生产，也和军备有密切的关系，三合土用于要塞的建筑，棉布用于军装的准备。英美日等国也有同样的情势。即据故意掩饰的国际联盟的统计，世界军器的生产也已集中在十大工业国，英美法日德，捷克斯拉夫，瑞典，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去年秋后因为各国皆努力于军备的扩充，军事工业更有急速的发展。各国军事的轻重工业的发展，自然摊平了世界工业生产的衰落。

几乎普遍全世界的通货膨胀政策，也是激动景气的主要动力。自从1931年秋英国开始停止金本位以来，通货膨胀政策即已有高级的发展。同年冬，日本再度禁止金输出，放弃金本位，去年春间，美国也为金融大恐慌所逼迫而步英日之后尘，到这时候，通货膨胀政策已经支配了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并且概由初级的信用膨胀升到了汇兑膨胀，乃至纸币膨胀的阶段。通货膨胀政策对内可以提高物价，增加企业家的利润，减低破产企业的负担及融通资金，因而激动各部门的生产活跃起来；对外可以降低本国货币的

国际价值,阻止外货进口,增高外国货币的国际价值,鼓励本国商品向外输出,更能激动各部门的生产活跃起来。在去年一年中,英国的经济界所以能够维持小康的状态,日本商品所以能够大批地向世界市场进出,以及三四月以后美国经济界所以能够比较显著地活跃起来,完全由于通货膨胀政策的采用。反之,勉强维持着金本位阵垒的各国(法国是个代表国家),经济情形皆极其惨淡。因此,去年世界经济能够维持平顺的状态,实得通货膨胀政策之赐不小。

美国除了大规模地施行通货膨胀政策之外,还施行复兴整个产业界的计划,所谓“产业复兴法”就是这种计划的具体规定。美国产业复兴法适用的范围非常广大,包括着政府的救济,限制生产及管理物价,废除托拉斯的禁止立法,劳动的统制,公共事业的兴办,本国市场的独占等等。这种产业复兴计划运动,在牺牲劳苦群众及中小生产者的条件之下,是可以在相当的程度激动各部门的经济活跃起来的。美国去年3月以后经济界显著的活跃,完全由于这种人为的作用;整个世界经济也大得其赐。但要注意这只是一时的兴奋作用,后节详述。

此外,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加强的压榨,对于经济恐慌深化的缓和,也有极大的作用。这种压榨的根本用意既在于缓和各帝国主义的经济恐慌,事实上也已把恐慌的深化缓和了不少。去年以来,各帝国主义的这种压榨格外地加紧。这种事实表现在所谓集团经济形成的急进上头。英国自从前年洛桑协定成立以后,即先后实现其



独占殖民地及自治领市场的计划,各殖民地对于英本国提高优先地位,对于外国则闭锁市场。美国自经济会议失败以后,更加推进其所谓泛美洲同盟的企图,现在事实上已经达到目的了。日本独占了东四省,实施了所谓“日满经济统制”,野心犹未充分满足,还企图向华北及内蒙古各省侵进。此外,多瑙河流域,近东及非洲各国,不管是完全的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莫不处于诸帝国主义的强度压榨之下。在世界经济恐慌更加深化之下,在外国市场几乎完全被封锁了的情势之下,加紧各自的经济集团内殖民地民众的压榨,遂成了缓和各帝国主义恐慌深化的主要源泉。近年来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性各国的贸易皆相对地增加,而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倒反减少了。各帝国主义向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尤其占重要的地位。在去年一年中,各殖民地性的国家,尤其是发挥了这种作用。

最后,去年五六月以后促进世界贸易进展的两种原因,关税停战协定的一时的效用及日本国际贸易的大活跃,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数年来各国经济上最大的困苦,就是生产过剩,就是商品市场的狭隘,也就是各国市场的封锁造成的国际贸易的极度衰退。所以去年五六月间一旦为着便利世界经济会议的进行而缔结关税停战协定以后,世界的贸易立刻活跃起来。去年下半年世界贸易之所以格外进展,原因完全在这里。再者,去年日本对外贸易的大活跃,也增进世界贸易不少的成分。日本 1933 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之 1932 年增加了日金 10 亿元(据 1 月 10 日

东京路透电)。去年日本物价大跌,所以日本对外贸易的数量必在上列金额所表示的数量以上。各国的对外贸易皆无多大的进展,而独日本的对外贸易有显明的发展。可知日本对外贸易在去年世界贸易发展上占如何的地位。

## 六、此后世界经济的展望

根据以上的剖述,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1933 年的世界经济依然在恐慌的路轨上迈进。即如七八月间一时上升的景气,也不过是一些极不可靠的“契机”所促成的。布尔乔亚及其学者们从 1932 年年底抱怀下来的期待,完全粉碎了,这是事实确定了的。但是此后世界经济的动向究将如何? 将如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的期待,经济繁荣果然到来呢? 抑或经济恐慌继续下去,甚而至于恐慌更加深化? 这是我们的新课题。

要解答这个新课题(展望未来的世界经济),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有一个最根本的指标,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几种矛盾,尤其是帝国主义阶段上的几种矛盾,能否解消。例如最近罗列在我们眼前的生产上的矛盾,流通上的矛盾,国际贸易上的矛盾,货币斗争上的矛盾,信用问题上的矛盾,失业问题上的矛盾,乃至殖民地争夺上的矛盾,等等,倘若无法解决,则经济恐慌只有继续下去,深化下去——即令发生一时的部分的好转。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之中,生产的矛盾算是最

根本最主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社会的一方面竭力推进生产量或生产力之无穷尽的扩大,但另一方面消纳生产物的购买力却相对地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诸法则之一。这个法则即在恐慌期依然适用。日本现在劳动的生产性比之恐慌前增加一倍以上。例如纺织工人每人一天的生产量,在1924年不过10,000码,1933年则增至24,000码;每一人所管的织机台数在同期间,也由1.1台增至2.1台。生产力的发展最落后的日本尚且如此,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各国更不能够例外;轻工业部门的进步尚且如此,重工业部门必有更高度的进步。但在单位生产量增加的反面,却有几乎成比例的工人被挤出生产过程之外,成了失业者。单位生产量虽然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因社会的购买力没有增加,总的生产量也就不能增加,结果只有缩小生产设备,按照劳动生产性增加的比例而造出失业工人。失业工人的增加,更加减少社会的购买力,而成为经济恐慌基本原因的生产过剩更加扩大。

社会购买力之减少,还可以从实质工资的减少上看起来。例如去年在生产及贸易上有显著发展的日本,实质工资尚且减少了许多,1933年10月与1932年同期比较,工资指数只增加0.3%,而小卖物价指数则增加13.3%。这固然是日本独占资本支持下的日本政府假藉通货膨胀政策以加紧劳工的剥削,但是实质工资减少的结果,必更减少社会的购买力,因而生产过剩更加增大。又如限制农业生产以适应生产关系,也是减低社会购买力的一大原因。例

如美国罗斯福以奖励金的方法限制棉麦耕种面积,就是一个著例。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为适应矛盾百出的生产关系而终不得不采用“饮鸩止渴”的政策,实在可怜之至!

生产量增大与社会购买力减少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从胎里带来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政府为消灭这个矛盾而采用的各种政策,却又适足以增大它。只要这个矛盾不能克服,则生产无从增加,经济繁荣也就无从到来。

国际贸易上的矛盾,也是经济发展的大障碍之一;恐慌之所以不能克服,国际贸易之衰落负着相当的责任。国际贸易固然是利润的国际分配的历程,它有促进生产的效力,但在目前各国贸易政策的束缚情势之下,国际贸易却只有一天衰落一天,数年来贸易的衰落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生产衰落的速度。正统派的自由贸易政策,早被各国政府抛到九霄云外,即自由贸易祖国的英国,也弃此政策如敝履了。于是国际贸易的矛盾遂日益深化。各国一方面企图独占本国市场及殖民地市场,另一方面则努力向外国及外国殖民地倾销本国商品。换言之,各国皆企图侵入外国市场,同时却又封锁本国市场。自去年以来这种趋势尤其是显明。各国皆兢兢业业地提高关税,或采用阻止外货入口的方法,如反倾销立法,按分制度及禁止法令;他方面则由政府实施汇兑丹并政策及奖励政策,降低输出商品的价格至国内市价以下,甚至至生产原费以下,以促进输出。各国施行这些政策互相报复的结果,各国的经济对立必更尖锐化,而国际贸易的系联越发碎断。最近,英日,美日,乃至

英法的贸易战可说是空前的激烈,各国虽也感觉这种贸易战的危险,竭力寻觅国际协调的途径,但是去年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正和一切的国际会议一样,指示着各国协调的途径已经是“此路不通”了。此后的国际贸易战只有越发尖锐化,而国际贸易日益衰落,国际经济及各国经济的恐慌更要深刻化。

促进国际贸易衰落的另一原因,就是货币制度及信用制度的大动摇。最近许多主要国家如英日等国皆为阻止现金之外流及增加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放弃金本位制度。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固然因对外汇价的暴跌而增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维持金本位的国家的对外贸易,则大受打击。这就是美国遭受英日该种政策的打击终不得不于去年春间也以同样政策相报复的原因。现在处在英美国该种政策逼迫之下的法德等国,且已有相继放弃金本位制的危险性,国家贸易的障碍只有越发增大。

随伴各国金融恐慌而来到的信用制度的动摇,减低了国际购买国的信用程度,因而减低了国际的购买力。数年来国际资金的流动,不但变化非常,并且偏在几个国家。去年中,这种情形尤其是恶化。金融恐慌爆发以来,各国皆不敢轻易向外放款,长期放款几乎绝迹,短期放款的金额也大减。并且,各国皆呈不安的状态,本月放款来月即提回的事情,也已司空见惯。于是,世界的现金专集中在几个国家如法国,瑞士,及比利时等,造成资本过剩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则有许多国家缺欠着资本。这个矛盾不能克服,则不

但国际贸易不易振兴,世界经济也只有更加瓦解。然而国际货币信用问题——这个问题和关税问题构成去年世界经济会议的最主要议题——的解决,自去年经济会议失败以来即已成了绝望的课题。

本来,生产上的矛盾减低了社会的购买力,造成贸易上及货币信用上的矛盾,而贸易上及货币信用上的矛盾则又具有增加生产上的矛盾的反作用。所以,贸易上及货币信用上的矛盾,若无法解消则世界经济恐慌唯有深化一途。

再者,各国亦皆企图减少失业者数及扩大殖民地,藉以克服本国恐慌。但这两种政策上也有它们本身的矛盾存在。固然不减少失业者数,则社会购买力不能增加,产业也就无从发展,但是资本家的利润欲却要求着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升高,极力减少雇用的劳工。资本家之极力增加劳动的强度,自然要挤出相适应的劳工出了生产过程而变成失业者。因此,希特勒及罗斯福所标榜的提供工作的纲领,并没有减少德国及美国的失业者。又如殖民地的争夺,也有不可消除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固然皆企图扩大殖民地,但是世界的地面原则有限,难以适应各国无穷的要求。现在世界上的殖民地几乎完全被分割殆尽,未被分割的地方也都变成各国的势力圈了。况且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也皆闹着恐慌,究能解救各帝国主义的恐慌至何程度,是一个疑问。各帝国主义要争得殖民地,终须以武力相见,而战争又是造出经济破产的最有效的动力。欲藉以解决恐慌的战

争,只有增大了恐慌,直至发生质的变化,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止。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上述各种不能克服的矛盾,所以各国用尽无数的恐慌对策,依然不能发生效力,此后世界经济的大动向已可窥见一斑,资本主义世界只有照旧循着恐慌的道路前进,“景气循环说”到这时候,很显明地已经起了质的变化,目前即如萧条(Depression)也未发见,繁荣之到来更谈不到。

然而,布尔乔亚政府依然继续他们的挣扎,依然要施行种种的经济政策来缓和或克服恐慌。目前,各国业已施行或将施行的主要对策,有关税政策,倾销政策,通货膨胀政策,统制经济政策,部落克经济的创造政策,乃至军事工业振兴政策,等等。这些经济政策施行的路程及其将必发生的各种结果,也就是最近的将来世界经济的动向。换言之,1934年的世界经济的情势,将循上列各国施行的经济政策的路线以前进,并且以这些政策的结果而发现出来。因此,考察这些经济政策的路线及其必然的结果,更可以预知世界经济的具体的动向。

在这世界贸易日益衰落的情势之下,各国为要维持他们的对外贸易,自然必须采用关税政策提高关税以独占本国市场及殖民地市场。英国自从沃大瓦协定成立以来,即已急激推进这种政策,将来恐怕更要急进,印度,澳洲,南非联邦及加拿大等地的关税墙壁将必筑至外国商品无法进去的高度。其他各国也莫不争先提高关税,并设阻止外

货进口的种种办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又须靠海外市场始能维持其生产。所以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又必须设法向外倾销本国商品,牺牲本国的消费大众以施行倾销政策,遂成了各国经济活动的动向。最近,汇兑丹并政策尤其成了各主要国家的倾销政策的主干。关税政策和倾销政策,遂至互相赛跑。这种赛跑预告我们: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生产只有越发衰落。

其次,通货膨胀政策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各国主要经济政策之一。通货膨胀政策有一时提高物价增加生产的效用,所以最近为恐慌所困扰的国家,皆采用或将采用这种政策,以期克服恐慌。在欧战中,俄德法以及参战各国曾为筹划财政而施行过通货膨胀政策。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来,英日等国更以克服恐慌的意义而施行同样政策。美国也于去年三四月以后,与所谓“产业复兴计划”并行而施行更具体更扩大的通货膨胀政策,英国的该种政策竟扩充到贬低美金元的价值,统制金融,及增发纸币的范围。到这时候,通货膨胀政策已由特殊的部分的政策变成一般的普遍的政策了。即如勉强支撑着金本位制的法德意比波荷等国,处在这通货膨胀的风潮及汇兑丹并政策的冲击当中,恐怕不久也将被卷进这浪潮中去。

但是通货膨胀政策只有一时的兴奋作用,依然不能解决经济恐慌。通货膨胀政策固然可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降低货币价格减轻破产的产业资本家的负担,增加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利输出,但是这种效力不能持久,达到



一定阶段即又返落。通货膨胀政策在国内是以工农等劳动大众及消费大众为牺牲的，结果适足以减低社会的购买力，而物价复又返跌，生产复又减少。从去年四五月升涨的美国的物价及生产，到八九月以后即又返落，就是一个显例。有的时候，通货膨胀政策根本就不能发生作用。例如为膨胀信用而由政府或中央银行放出的借款，不流入生产界（这是因为消费减少而起的生产减缩）而转弯重复回到各银行的储金部。又如为膨胀货币而增发的纸币，不流入商品流通场（这是因为消费减少而起的商品交换的减退）而退藏于银行及各公司的金库里，通货膨胀政策甚至于增深了恐慌的危机以至于爆发金融恐慌。例如美国胡佛的信用大膨胀政策，终于造成去年二三月间美国的金融大恐慌，即如最近各主要国家用为贸易政策的“汇兑膨胀政策”，也有其饱和点。汇兑膨胀政策的效用在于降低汇价，增进输出。但是输出的增进，不但会引起外国的排斥，并且会因出超而汇价增高，而汇兑膨胀政策的效用终了。要而言之，通货膨胀政策除开战时的特殊场合，是不会发生很显著的效用的。要靠通货膨胀政策来缓和或消除恐慌，不过是一种“此路不通”的把戏。

长期为世界经济恐慌所烦恼的资本主义各国，近年来也妙想天开，居然沉醉于所谓“统制经济”的甜梦中了。统制经济源出于“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苏联实施于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很大效果的经济政策。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大都仿效起该种计划经济的办法，但是资本主义各国的

计划经济，本质上到底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同，所以吾人姑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

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政策，现在风行于世界上，英、德、法、意等国早即施行，最近美国和日本的计划经济办法更加具体而且扩大了。此后，业已着手于计划经济的各国，更加扩大其适用的范围，未施行的国家也有效行的倾向。计划经济政策的要点，就是国家的政权伸张到经济上，把原来无组织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经济，改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换言之，就是由国家或政府来管理各部门的经济。更具体地说来，一国的生产，尤其是重要工业的生产、交换、对外贸易、国内外的金融，甚至至消费及劳动，等等，皆由国家或政府依照预定的计划来管理或推进。例如意大利的计划经济及最近着着进行的美国计划经济，规模都非常广大，办法也很周到。

资本主义各国固然皆企图借计划经济以克服恐慌，但是我人则认为是他们的幻想。计划经济在其政策的本质上，固然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但是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却没有实行原本意义的计划经济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根本就不能施行计划经济；即令实行也不会有根本的效力。资本主义各国是在承认经济恐慌根本原因的私有财产制及利润追求的情形之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他们又是在金融寡头统治之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在这种情势之下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究竟能否

以大多数消费大众的需要为前提,能否不顾资本家利润的要求,排脱资本集中及集积的法则的支配,而来真正为全社会的消费以进行生产或分配。这恐怕很难做到!去年春间以来希特勒开给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支票,不但没有兑现,倒反引起了他们的愤恨。罗斯福独裁下的统制经济的效力,也不过是去年八九月以后美国经济活动的反跌,就职劳工事实上并没有增加。

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虽说不能解决经济恐慌,但却对于金融独占资本有很大的利便,因此,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此后必更为各国所采用,甚至至殖民地性的国家也都有采用的大动向。

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适用范围的扩大,扩大至殖民地性的国家或地方来,就产生了一个最大的世界经济的动向。从前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不过适用在主要资本主义各国的本国内,现在则把许多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国家,解体到几个巨大的统制经济体制了中去,形成了更大的统制经济体,这更大的统制经济体,就是所谓“部落克经济”(Bloc Economy)或“经济集团”。例如印度、澳洲、南非联邦、及加拿大等国解体到英国统制经济体当中而形成大英帝国部落克经济。又如日本吞并东四省而企图造成所谓“日满经济集团”。

最近几年风行于世界上的“经济国家主义”,现已更加扩大,直向“部落克经济”迈进。自从前年沃大瓦会议后及去年沃大瓦协定渐次实行以来,大英帝国部落克经济的形

成,遂至具体化,而其他的部落克经济的进展,也渐显著而急进,现在已经形成的部落克经济,至少可以举出五个大部落克来,大英帝国部落克、欧州部落克、美洲部落克、日满部落克、及苏联部落克。在欧洲部落克当中,还可以分成法国部落克及意大利部落克,但在大体上皆处于法国金融资本的统制之下。这些部落克皆以本国、殖民地、及势力范围为构成份子,在各自的部落克经济当中施行统一的有组织经济计划,而与其他的部落克对立,例如排斥外货及外资尤其是政治势力之侵入。

各帝国主义造成部落克经济的根本用意,在以殖民地及势力圈的民众为牺牲来缓和其本国的经济恐慌,及增强本国的实力以与其他各国对抗。这种办法除开加紧殖民地及势力圈的民众的剥削之外,就只有扩大并增大各国的对立和冲突。各部落克内部的统制未必能够圆滑,例如大英帝国部落克内的印度及加拿大等地的经济与英本国经济之间就有许多的矛盾。即使部落克内部没有问题,也不过加深世界经济政治的危机,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早些来临。

去年以来,各帝国主义更加努力扩大各自的部落克及加紧部落克的联结。具体地说,就是扩大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及加紧殖民地的统治。这种动向对外表现为殖民地的争夺战,增大战争的危机,对内表现为被压迫民众与压迫民众对立的尖锐化,激动民族革命运动爆发,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战争的导火线已在燃烧着了——战争是帝国主义阶段口的特质!

各帝国主义也皆觉察这种逼切的战争危机,所以一方面加深这个危机,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战争。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最主要的经济动向,就是“军事工业”的振兴。去年中世界经济恐慌所以不至于急速深化,原因即在于各国军事工业的发展。重轻工业皆有同样的趋势。重工业上,生产机器的生产量减少了,反之,各种军用机器的生产量倒反增加了。棉织工业的生产和军装的准备,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他如修路、架桥、筑港、造飞机场、等等,也可认为军事工业。

此后,各种军事工业还要急速地发展。即令在极密切的暗室内发展,其发展也必表现在缓和恐慌深化的事实上。在无数的资本主义恐慌对策当中,振兴军事工业的办法,是目前最有效力的政策。所谓“战争景气”完全由军事工业造成的。战争景气的确缓和了恐慌深化的趋势。1934年的战争景气必更上升。推测1934年以后的恐慌方向,这个战争景气是个主要的原因。1934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如果恐慌不至深化,或竟引起市况的上升,战争景气更是吾人检讨的对象。

综合以上关于1934年以后世界经济动向的展望,吾人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最近将来的世界经济,还不能迎到繁荣,即连萧条(Depression 一名不景气)也未必能到来,战争景气倒是可靠;(二)资本主义各国为排脱恐慌的

围困必更加推进他们认为有效的政策,更高级的通货膨胀政策,更急进的倾销政策,更周到的关税政策,更扩大更坚固的统制经济政策。(三)这种经济动向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各国法西斯运动的迈进。

我们的中国在这部落克经济的形成急进过程中,恐怕要渐次分裂而解体到各帝国主义统制下的部落克里头去。这是检讨世界经济的中国人,最后应该深刻觉察及考虑的事情!

然而,在世界经济恐慌越发深化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发展,却依然要发挥他那“孤岛繁荣”的本质。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年度的 1934 年,将必照例在其年底,用数目字来向世界证明本年度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

(1934 年 2 月 14 日)

原载 1934 年 6 月《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1 号

## 计划经济之理论的检讨

自从苏联实施第一次五年计划而得到显著的成绩以来，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竟然成了一种流行病，在世界各国蔓延起来。尤其自从1931年“世界计划经济会议”上苏联代表奥辛斯基详细介绍苏联五年计划的进行经过及切实成绩以来，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传染病菌，更加普及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现在，无论是主要的工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或是殖民地性的国家，大多已经实施，或将实施所谓统制经济，也就是计划经济。德意英法美日皆有统制经济的机关和法案，即如我们中国也已设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企图施行种种的统制。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意义之重大，可以想见。近来我国讨论或介绍统制经济的论文，有时也在杂志及报章上见着。即如专著也有一二种，例如拙作《统制经济的基础知识》。但关于统制经济的本质如何？它是否适用于任何国家？乃至它的实施上需要那些前提条件？等等问题，则未见有详细而且正确地谈到的论文。所以写成这篇论文，以贡

献国内关心本问题的同好。

## 一、计划经济的概念

凡要理解一种学问或问题，第一步必须先把握住它的概念。所以在未讲述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以前，有先就其正确的概念分析，解说清楚的必要。但是“计划经济”的概念，极其含混，各派有各派不同的说法，迄今尚无确定的定义。除了计划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名词“统制经济”，时常在各种书籍，报章及杂志上露面。究竟“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是不是同一内容的形态？抑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范畴。这层更使所谓“计划经济”及“统制经济”的概念混乱不明；同时，也更增加明确解释这个概念的必要性。

关于“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概念，有些人以为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是有区别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范畴。若根据这一派人的解释，简单地说来，则所谓计划经济也者是在国民经济上作成整个计划以进行经济活动的办法，而统制经济云云，不过是在国民经济上加以统制罢了。然而理论和事实皆证明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欲行统制，须先计划，欲行计划，须加以统制。计划和统制是相辅为用的，是一种东西的两个面。并且，事实上尚无一个国家不计划而能行统制，或单做计划而不行统制的。

又有一部分人认为计划经济是苏联施行的经济政策，而统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各国施行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种说



法也是不妥当的。可以从两方面指出这种说法的不妥。第一,这两种经济政策在其实施方法上并无大差,自各方面经济的计划开始以至实行统制,二者都是一致的。第二,即在资本主义各国也常用计划经济的名词。照我个人的意思,这两种政策的区别,不在于名词上或实施的方法上,而是在于立场和目的上。若从这意义来区别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则只能得到“社会主义型的计划经济”及“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两种。但这适足以证明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是同一形态,这种形态因为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可以分成两大类罢了。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科学的管理法”就是计划经济。这更错误。因为所谓科学的管理法只适用于一个企业单位的范围内,而计划经济却是适用于国民经济的全体上。从未见过科学的管理法和计划经济,本质上密合的事例。科学的管理法,若无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的条件,出了一个企业单位的范围外,就没有法子实行下去。

然则计划经济的真正概念如何?以下略述我的定义。“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存形态,是生产阶级支持下的国家权利伸张到经济上,做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且依照计划以实行统制的一种经济形态。换言之,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各方面,例如在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方面,又如在工业、商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等方面,做成有系统的、全面的计划,而加以全面的、联系的统制,这种经营形态就是

计划经济。根据上述的定义,可得两种特质:

(一)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统制的经济,正和以前的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的经济完全相反;

(二)计划经济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是全部国民的经济,正和以前个人的、私人的经济不同。

具备上述特质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从理论和实际上说,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始能够适用。换言之,只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始能够适用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此项,请参阅本绪论第四节《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但是近年来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学者竟有主张实施计划经济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即所谓“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并且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府,居然也仿效苏联大规模地实施什么什么计划,什么什么统制。因此,我把这种经济计划,或经济统制,也包括在本书上一并加以检讨,进行比较的研究。但是所谓“资本主义计划化”的计划经济,另外称它作“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以与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型的计划经济”相区别。

## 二、计划经济产生的动因

计划经济是现阶段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由其先的经济形态演进下来的。所以,计划经济有它产生的许多动因,兹列举分述如下:

### (一)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点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本来即有许多矛盾,致使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够顺适地平衡地发展。在这些矛盾当中,和计划经济的产生有密切关系并且是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社会的生产与私人的所有。详细地说来,商品经济的生产是互相依赖的,生产产品通常是体现参与生产的全体体系的人类劳动,同时,各个生产者互为他人的消费而劳动,互相关联着。但是依照这种社会的分业而生产出来的生产产品,却归各个人所私有,一任私人的意志去处理,本质上应该是社会的劳动,却采取私的劳动形态表现出来。由于这个矛盾而促成生产及消费上的无政府,无组织,无计划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生产和消费不调和的结果,而经济恐慌时常发作。这个矛盾的发展终于产生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及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现在,不但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主张计划经济,即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也都觉察资本主义经济无计划的弊害憧憬于计划经济。这是计划经济所以风靡世界的最大原因。

### (二) 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困恼

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是空前的带着危机性的恐慌。这次的经济恐慌不但已经经过了五个年度的长期,它的宽度和深度也都是空前的,一切的经济部门及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莫不为恐慌所袭击,生产减少一半,物价跌落一半以上,国际贸易几乎减退三分之二,失业者增

加到五六千万人。并且到现在截止还见不着恢复繁荣的前兆(即所谓萧条 Depression), 普遍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膨胀政策更要招来一个更深入的恐慌。经济大恐慌只有继续延长下去。在这带有危机性的大恐慌困恼中的各国经济学者、企业家、资本家、乃至政府当局, 皆拼命地寻求克服恐慌的方策。许多经济政策皆被试验过而无效果; 现在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的缺陷, 所以企图改行“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计划经济究竟在资本主义世界能否行得通, 固然是另一问题, 而恐慌的困恼之为实施计划经济的动因, 却很显明。

### (三) 欧战中战时计划经济的经验

在欧洲大战中各参战国家, 皆为着总动员全国的资源及劳动力起见, 对于各自的国民经济, 采取中央集权制度。不但农工业及贸易全归国家管理, 即如分配及消费等事, 各国也设立摊分制度(Ration System)实施统制。与军需有密切关系的各种产业, 不论是轻工业或重工业, 或食粮工业, 其统制办法尤为严密。全国的劳动力不分男女, 均以临时的非常法令, 总动员起来, 用于作战或军需的搬运及再生产上。在这种非常法令强制实行的情形之下, 统制经济政策曾经获得了相当的效果。因此, 资本主义各国经过这次的经验, 竟然异想天开希冀战时非常办法的统制经济, 也可以实施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平常时候。

#### (四)产业合理化运动的激荡

为挽救欧战後世界经济全面的衰落,一部分经济学者及企业家,曾经提倡并实行过一企业内的计划经济,即所谓产业合理化运动。这种运动开始于德国,其後各国争先摹仿。所谓“科学的管理法”,所谓泰拉制度(Taylor system)即其代表。科学的管理法应用在一企业单位的范围内,的确获得了相当的效果,提高了劳动的生产性,增加了资本家的利润。因此,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学者、企业家及政治家,遂认为这种科学的管理法也可以扩大而实施于全面的国民经济上,因而大倡其资本主义的组织化,计划化的主张。

#### (五)苏联五年计划成功的刺激

正当资本主义世界被世界经济大恐慌困恼着的时候,苏联的五年计划却逐步地成功,苏联的经济向着上升的方向,以急速的步骤发展了。从1929年开始而预定在1933年完成的五年计划,竟然以四年三个月的期间提早完成了。并且,国民经济的各方面皆有显著的发展。工业生产额比之五年计划实行前的1928年增加到二倍以上,比之欧战前增加到三倍以上。其中,重工业的发展尤为急速,比之1928年增加到二倍半,比之欧战前增加到四倍以上。农业的发展也很可观。播种面积比之1927~1928年度,增加了2,100万公亩,工业原料的播种面积超过了预定的计划。农业耕种上大多采用机器的经营法。尤其可惊的,就是使用

飞机播种的事实,在几秒间播完几千万顷田地。再自质的方面看,苏联国民经济已经工业化了,农业人口的比率减低,而非农业人口的比率却增加了。农工业皆较前社会化了多多。社会化部分的投资额在总投资所占的比率,在1923~1924年度至1927~1928年度的五年期间,不过占41.9%,而在五年计划实行五年间,增加到87.5%,又社会化部分的投资总额,五年计划期间与1923~1924年至1927~1928年度的期间比较,增加到五倍。苏联经济之量和质的如此急速的进步,实出了资本主义拥护者的意料之外,但却又在反面促使他们坚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伟大的效力。于是他们对于苏联的经济建设完全改变了态度,由冷讽热刺的态度变成惊叹讴歌的态度。所以极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也都主张,移植苏联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到资本主义的田园里。虽说他们所赞赏的只是经营方式,所以他们所移植的也不出经营方式之外。但是无论如何,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在资本主义各国实在掀起很大的波浪,给了莫大的刺激。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仿效苏联计划经济的甜梦中陶醉着——或者可以说是挣扎着。

#### (六)独占资本的要求

在帝国主义向下期(开始于欧战前后)的阶段上,一方面世界恐慌越发深化,带上危机性,一般的平均利润越低降,另一方面金融独占资本支持着政府,操纵了政权。结

果,独占资本家为维持他们高度的利润,或增加更高的利润率,就不惜以中小资本及勤劳大众,消费大众为牺牲,企图采取更具体的更扩大的经营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适用于国民经济全面上的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遂为他们所采用。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不能克服经济恐慌固然非常显明,但是可以一时地维持或增高独占资本的利润,却很可靠。所以,独占资本的要求,成了资本主义各国施行计划经济的又一最主要的原因。

### (七)集团经济的发展

构成最近世界经济大动向之一的集团经济的发展,也是促成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实施的一个主因。因为集团经济和计划经济,是相辅为用的,要在庞大的地盘上实行经济同盟,联成一个经济集团,并且要独占地自给自足地进行经济活动,那末,就非有周密的,完全的计划及统制不可。在任何经济集团内,都包含着帝国主义及殖民地(当然这是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包含工业国家及原料供给地,包含着投资国,商品输出国及提供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家。在这样构成分子及其复杂的经济集团中,要实行独占的自给的经济,自由放任经济是不能够发生作用的。於此,计划经济正和集团经济的发展同时,风靡了全世界。

## 三、计划经济运动的发展

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思想很早即已发生,有很悠久

的来源。它的最初形态产生於德国的新历史学派,为该派代表者的瓦格奈(Wagner)及布连达挪(Brentano)所主倡。他们主张用心理的缓和方法及社会政策去消灭阶级斗争,所以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又因为主张统制的管理的经济政策,所以一般认其为计划经济思想或统制经济思想的第一来源。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思想上的第二来源,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独占组织的思想。那时候,世界各国皆发生了种种利用独占组织如卡特尔或托拉斯等组织去减少资本主义的无计划性,无政府性,消除由这无计划性及无政府性产生的弊害如经济恐慌。

然而上述两种来源,只是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来源,对于实际的经济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的政策上更无若何的表现。计划经济运动到了欧洲大战,才发生了实际的社会意义。因此,我认为欧洲大战期,才是计划经济运动真正开始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实际运动的滥觞。自从欧战以后,计划经济运动始有显明的发展。

实际的计划经济运动或统制经济运动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做三个时期:(一)战时计划经济的试行期;(二)产业合理化运动期;(三)国际的风行时期。

### (一)战时计划经济的试行期

欧洲大战中,计划经济的实施普遍于参战的各国。凡是参战的国家,都为着长久维持战争以得最后的胜利,而



实施所谓“国家的总动员计划”，或称为“全面的战时经济政策”。德英法比俄美意奥等国，都实施这种政策，其中德尤为周密。那时候的战时计划经济的办法，约可以从四方面来分析。

#### (A)国民总动员

参战各国皆制定非常立法，调动全国适当的，健全的国民以补充军队，或从事于军需工业的生产及军需的搬运。这办法称为强制的征兵制及劳动的统制。例如德国的“祖国补助勤务法”，规定满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女，全部征用，其中健康的男女的65%，送到前线服务，其余则全部从事于强制的劳动。

#### (B)产业总动员

参战各国皆施行统制政策于各种产业的生产及一般的消费上。在生产方面有所谓“优先制度”首先集中生产于军需工业上。其次，还有原料统制，价格统制，农业统制，等等办法。在消费及分配方面，也施行所谓“摊分制度”，依照分发的票据分配粮食。

#### (C)交通的总动员

可以分为海运及陆运两方面的统制。在陆运的统制上，铁路、汽车、飞机等交通机关，全部收归国有，或收在国家严格管理之下。即如通信机关也都全部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全部用于军事上。在海运的统制上有贸易统制及船舶统制两种办法。前者适用于军需品输入的统制上，后者则适用于作战及搬运的两方面。

#### (D)金融及财政的统制

欧战一爆发,各国的金融界即大起紊乱。证券市场首先大动摇,军需工业及海运业的股票除外,其他各种股票及债票,皆一落千丈地跌价。各种公司皆继续关门,各银行皆争先收回放款,民间也争相提取存款。此时,国家乃不得不采取非常办法,颁布债务延付令,增发银行券或纸票,并强制通用,维持票据的贴现,维持贷款,管理外国汇兑。另一方面设法集中民间的现金,或加紧强制的扩大再生产,以筹备军费。

上列各种办法都是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实例,综合地看来,也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全面的统制。不过,因为那时候计划经济政策是施行于非常时期,所以认为是试工期。因为后来的计划经济的发展受它的激动甚烈,所以也可以认为是计划经济发展的母胎。

#### (二)产业合理化运动期

欧洲大战是一个空前的大破坏。参战各国,无论是打胜仗或打败仗,其整个的国民经济皆陷于极度的疲敝和衰萎的状态之下。由这种经济的疲敝,又反映成为政治的动乱和社会的动乱。不但劳动阶级的斗争激烈化,即连资本家本身也因利润的低降而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势之下,遂产生一二经济学者如嘉塞尔(G. Cassel)及开恩斯(Keynes)等人,提倡计划经济的理论。再加以欧战中战时计划经济的经验,部分的计划经济的产业合理运动,遂由德国(曾经

设立所谓“经济管理局”)而风行于英美日法意等国,几乎可以说全世界。产业合理化运动,固然很早即已发生,例如1910年代美国的泰拉即已提倡过“科学的管理法”,但是产业合理化运动到1924年顷才带上世界经济的意义,也才略具计划经济的形态。产业合理化,因为是在平时实行的,所以虽说在国民经济上是部分的不联系的办法,但总比较战时计划经济还高一级。

产业合理化的方策,应用在各部门的经济上,有非常纷杂的办法。但是大别之,可得两大类:(A)生产过程上的合理化,(B)流通过程上的合理化。兹略述于下:

#### (A)生产过程上的合理化

这种合理化的第一目标就是降低生产费。所应用的方法,就是采用新技术及新机器,改编劳动组织,增加机器运转的速度以加强劳动强度,造成制品的标准化,定型化,借以增进生产能率,排除浪费。最显著的具体方法,就是采用自动作业机以节省劳动,增大劳动的生产性。所谓“转送制度”(Conveyor System)的采用,改编了旧时的工场组织,使工作单纯化而增加劳动的能率到极度,在生产过程上划一新时代。

#### (B)流通过程上的合理化

这种合理化,简单地说来就是拥有巨大资本的制造业者,为着增高利润而自己设立并扩大贩卖部,缩小商业资本的活动范围,夺回商业利润的方法。此外,为避免竞争,维持或提高价格而组织的卡特尔,托拉斯,及新迪嘉等独

占组织,也是同样方策。流通过程上的独占组织,又与生产过程上的合理化,有交互的作用。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促进独占的形成,独占的形成又促进生产部门的合理化。全面经济的合理化,更加发展无已。

产业合理化运动,无论对于劳动阶级乃至中小资本有多大的害处,但是对于挽救资本家阶级的危机之点却有很大的作用。它增大了各种企业的利润,获得了经营上的利益。欧战后陷入没落期的资本主义,遂得呈现一时的安定化的现象。这个安定化的状况,居然由1924年顷继续到1928年。况且,另一方面尚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应用产业合理化的各种经营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型的计划经济,增大了苏联全国的财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种情形更加引诱资本主义各国深入地埋头于更具体的,更扩大的产业合理化。产业合理化运动,遂发展而成为轰动全世界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

### (三)国际的风行时期

这是一个计划经济政策风行于全世界的时期。不但社会主义的苏联连三接四地实施计划经济于其各阶段的经济建设上,即如资本主义各国也都设立了经济统制的咨询机关及执行机关,企图统制整个的国民经济。

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虽然设立了很多名称不同的经济会议,但是那时候的经济会议大多是政府及国会的咨询机关,而不是执行机关,并没有在全国的经济上进行整个

的计划。到了世界经济大恐慌爆发以后,具体的积极的计划经济,始有显著的发展。这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的。一方面,经济大恐慌日益深化,而独占资本的利润欲却越发强烈。另一方面,1926年以来单一企业内的产业统制,获得了显著的效果,1928年以来的苏联第十五计划实行的结果,尤其在世界上夸耀它那伟大的成绩。资本主义各国受到这两方面事实的压迫和诱惑,而更加需要积极的扩大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遂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论题,各国的经济会议也自那时候起像雨后春笋般增加起来。

计划经济运动在这时期中,有一个划时代的国际事实,就是世界计划经济会议的召集。这个会议是由《国际产业关系协会》(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发起而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开会的。参加会议的份子,有资本家,经济学者,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及各国工会的代表。派代表参加的国家有23国之多,代表人数达300人。世界计划经济会议是1931年秋召集的。开会期间自8月23日到8月29日只有一星期的短期间。在这短期中,各国代表皆有热烈的演讲,极力主张计划经济的重要性,并且提议许多实施的办法。他们的理想甚至于提倡在国际施行计划经济。但是这种高远的理想,终被客观的事实所否决;世界计划经济的讨论,终于得不到若何的结果。但是世界计划经济会议却在另一方面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收获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实施计划经济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世界计划经济会议上,苏联的代表奥辛斯基曾

把苏联五年计划施行的经过及其成绩详详细细地介绍出来。奥辛斯基的演说,竟然使其他各国的代表更加感觉计划经济的必要和效力,加强了他们对于苏联计划经济的信仰和模仿的信念。

自从经过世界计划经济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计划经济的实行,更加猛进,更加扩大。计划经济居然成了国际的流行病。现在世界上已经设立经济统制的机关及制定经济统制法案的国家,已经有十五国之多了。主要的国家有苏联,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法国及日本。此外,如捷克斯拉夫,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墨西哥、乃至殖民地性的中国,也莫不有同样的计划和企图。其中最积极的最大规模的国家,除社会主义苏联而外,就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在许多经济统制机关及统制法案中,最著名的有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意大利的协同组合全国委员会,德国的经济委员会,法国的国民经济审议会,英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国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日本的日满经济统制法案,及美国的产业复兴法案。

#### 四、计划经济实施的前提条件

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虽然以1931年的世界计划经济会议为划分期而风靡了全世界,但是这种情势并不能够证明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在任何经济条件或经济组织之

下都可以通行无碍。虽说科学的管理法曾经在一个企业单位内有效地圆满地施行过,同时,计划经济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实行过,并且得到更伟大的成绩。但是出了私人的个人的企业单位的范围外,科学的管理法是否还行得通,在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地方,计划经济是否还能够施行得有效?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对于这个问题,毋宁给与一个否定的答案。严格地说来,计划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离开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就行不通;行得通真正意义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了。因此,希冀一方面保存资本主义的制度,另一方面施行计划经济,那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幻想,就是独占资本家的欺骗。要而言之,计划经济实施,是有很严格的前提条件的;不具备与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此路不通的。

根据苏联出席阿姆斯特丹世界计划经济会议的代表,奥辛斯基的报告,要实施计划经济于一国的国民经济上,必须具备下列八种条件:

- (1) 劳动者的独裁;
- (2) 一切的生产手段及分配机关社会化;
- (3) 废除阶级;
- (4) 急快提高劳动阶级的经济的、文化的地位及生活标准;
- (5) 产业指导的集中及与此并行的生产集中

和专门化；

(6)消除都市与农村间的矛盾；

(7)消除民族的不平等；

(8)发展一切领域内的文化活动,尤其是科学的调查事业。

即令离开奥辛斯基的意见,单就一般的情形看来,计划经济要能施行得有效,解决了目前社会经济上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至少也要具备下列三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参加计划经济活动的人们和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都要一律平等。

计划经济原来就是一种集团的经营事业,须由集团的意志发动而完成集团的利益。但在集团的意志和利益的反面,还有私人的个人的意志和利益。在通常的情形之下,这两种意志和利益是不容易调和一致的。要这两种意志和利益调和一致,必须每个团员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一律平等,并且互相联系着。私人的意志及利益与团体的意志及利益调和一致之后,集团的精神才能够变成坚固的、整个的,并且是统一的、积极的、主动的。必须如此然后一切的问题才能够圆满地解决。倘若各个国民或各个团员,因为社会条件及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而致各有不同的立场和利害关系,那末,每个人的意志就不会一致,集团的精神无从巩固,集团事业的计划经济如何能行得通呢?即令在意志及利害关系不同的各个人或各阶级之间折衷找出妥协点,



勉强在整个国民经济上施行种种计划或种种统制,但这不是全体一致的、主动的、积极的办法,而只是消极的,受动的罢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计划经济的施行,既不能获得根本的效力,也不能够维持长久。

“第二个原则”经济计划的实行者和计划的指导者,要同一人格。

在计划经济的施行上最要紧的动力就是直接生产者的切实地实行。如果直接生产者不切实地实行,无论有多么理想的计划,结果也只有失败之一途。要直接生产者切实地实行,须有两种条件:其一,一切计划须出自直接生产者的意志;其二,一切的计划须由直接生产者参加大部分的意见。广大的国民经济计划,绝对不是少数人的统制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少数人的统制办法违背了大多数的直接生产者的意见的时候,一切理想的经济计划皆成了幻想。同时,要广泛的复杂的国民经济计划化,必须有完全的精密的计划底案。这种计划底案,又绝对不是生产过程外的人们所能编制成功的。不但要直接参加生产的人们提供详细的精确的材料,并且需要他们参加大部分的意见。这是计划经济实行上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因为每个生产者实行他自己积极地精密地创造出来的计划案,必定坚决、积极,而且顺适。所以,苏联经济的各部门的计划,都是经由直接生产者的劳工及农民审查过、补充过、修正过,然后始成为最后的决定的计划底案。但要作到这一层,必须要计划的实行者与计划的指导者,是同一人格。

“第三个原则”直接生产者必须是一切生产机关的主人。

这个原则含有两重的意义：(一)直接生产者拥有一切生产机关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二)同时，生产出来的生产物也归他们所有、或享受。这是计划经济实行上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又是计划经济的最终目的。如果一切的、至少也要决定部分的生产机关的所有权，不为直接生产者所拥有，那末，直接生产者必不能够任意地自由地为社会全体而从事于生产。没有使用权，更不消说了。同时，如果使用最进步的机器及最新的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性的结果，产生了许多，或更多的无衣无食无工作的失业者——由直接参加生产的人群里挤出的失业者，那末，计划经济必行不通，也没有它的必要。又，如果提高劳动的生产性，增加生产量的结果，依然要毁弃生产物的大部分，正如巴西之弃咖啡于海，美国以小麦及棉花当燃料，为维持马铃薯的贩卖价格而不得不敷设铁路运至海中弃掉，澳洲剪毛的绵羊竟宰以吃肉，古巴制糖原料的甘蔗用作柴火烧用，那末，计划经济不但行不通，并且绝对没有必要。因为真正计划经济的实行，必定提高生产率而激增生产量。若增加出来的生产量，还须花费人工和金钱毁弃它，或用在无益的方面，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因此，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而增加劳动生产性，增加生产物的分量的结果，必须能够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标准，至少也要归他们享受始可。

此外，固然还需要政权的统一，统计材料的完全而正确（没有这两种条件则整个的复杂的国民经济计划无从着

手),及官吏清廉(没有这种条件则在计划进行上容易发生中饱的流弊)等等条件,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条件。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上列三种原则。

要而言之,生产者、所有者、及计划者的统一,或联成一气,则其经营经济就变成计划经济。

## 五、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

根据上节所述,计划经济不是可以无条件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可以适用的。如果社会经济上缺欠必要的前提条件,则计划经济必行不通,也没有行它的必要。这里,重新展开了一个新问题,就是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计划经济究竟在那一种经济制度之下始能行得通。

若严格地说来,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才适用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才具备上节所述各种条件。根本的关键即在于生产和消费之“社会化”。因此,若照原来的意义说来,“计划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

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上就不适合计划经济的施行,虽说计划经济近年来居然风行于资本主义世界。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质使然的。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不能适合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从理论上及实际上列出几种原因:

### (一)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的社会

在阶级社会里头,上节所述各种条件皆不能具备。第一,一切的生产机关不为直接生产者所有,生产出来的生产物自然也不能归他们享受。第二,参加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在经济上抑在社会上,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若就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具体地说来,那末,一切的或主要的生产机关,皆为资本家阶级所独占;他们雇佣劳工以从事于生产,所以生产出来的成果也完全归资本家阶级全权处理。资本家和劳工的社会条件及经济条件,都是不平等、不一律的。在这种社会里,即令折衷而勉强实施计划经济,其计划实行者和计划指导者,必定是两种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人;指导计划的人,必定是支配全国政治经济大权的独占资本家阶级,而实行计划的人,必定是劳工和农民等。

### (二)资本主义本质上的无政府性

资本主义制度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缺陷和矛盾。其中,与计划经济行不通的问题有特别密切关系的,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无政府性。这是从生产手段的私有和利润的追求产生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生产手段的人们,是全为着利润的获得而进行生产的。在这种社会里,若为顾全社会全体的利益而实行计划经济,取消或限制利润——事实上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姑且假定为可行——则改良生产设备及增进生产力的刺激减少,而产业资本势必退出产业界,甚至至流出国外,于是整个国民经济更加大起混乱,

更加衰颓无疑。所谓计划经济如何能行得通呢？

### (三)政治经济大权为少数独占资本家所操纵

现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内,主要的决定的政治经济大权,皆为少数拥有支配的生产手段的独占金融资本家所支配、所操纵。例如美国现在的政治经济大权,完全为四十大资本家所支配。又如日本现在的政治经济大权,也为三井及三菱等少数财阀所操纵。其结果,指挥计划经济的最高经济会议,或实施计划经济法案的执行机关,自然也必归他们支配和操纵。他们专为增高或维持他们的利润而实行计划经济。若此,则计划经济失掉它本来的意义。不如此,则计划经济又无从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冀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化计划化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根本就是一种幻想!

### (四)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只能助长独占

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实质上只是独占组织的更高度的发展罢了。现在,成立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所谓“组织的产业”及“联合公司”等等组织,本质上不过是大托拉斯的组织罢了。大托拉斯组织愈发达愈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因为大独占组织愈发展,企业愈发集中,则各企业单位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必更扩大而尖锐化。因为大资本之间的斗争,比之较小资本之间的斗争,要格外激烈,而且这些大资本绝对不能够发展到单一体的组织。再自另一方面看,独占资本更加发

展的结果,中小资本家必至全部没落,一般的生产者也愈发不幸福。终局,非至影响计划经济行不通不止。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绝对行不通的;即令折衷强制地行下去,结果也必失去本来意义的计划经济的效用,而成了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更扩大的办法。这是很显明的事实。

然而,这里残留下来一个问题,计划经济在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的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国家(例如中国)里,能不能行得通。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计划经济在殖民地性的国家实行的难关,比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更多。除开资本主义国家所遇着的上述根本难关之外,还有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殖民地性国家的经济计划机关及执行机关,必定全部操纵于帝国主义手里,例如满洲统制经济案操纵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或操纵于诸帝国主义手里,例如中国的所谓“中外技术合作”是中国统制经济实施的先声,中国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实上是在国联和美国的支配指挥之下进行一切的统制的。殖民地的计划经济实现,则其殖民地的经济更加成了其所谓母国的附庸,例如去年以来急速发展着的大英帝国统制经济的体系之下的殖民地(如印度等)及自治领(如加拿大,澳洲联邦等)。这是很显明的事例。即如殖民地性的国家,如果实现了计划经济,那末,这个国家实质上就完全殖民地化了。例如现在已经在积极猛进中的所谓“日满统制经济”及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阴谋企图中的所谓“中日满经济同盟”,如果具体地实现,那末,中

国东四省成了完全殖民地化的地方,是不消说的,即华北各省也将全部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像中国这样殖民地性的国家,要实施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自非格外谨慎不可。当这中国统制经济的声浪震撼了全国际会,附述几句,谅也不为无意义。

要而言之,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国家,如果要实施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必须先完成,或同时进行两种主要的前提条件:(一)排除帝国主义的支配和统治;(二)改造社会经济的组织。换一句话说,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国家的真正意义的计划经济,只有在排除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前提条件之下,并且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才能行得通。

(1934年4月27日)

原载 1935 年 1 月《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 号

# 抗战以来日本问题书籍总评

## 一、日本问题著作界的贫乏

我们对日的抗战已经不是一种平常的战争；而是一种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的战争了。这正如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朋友所言：这次的战争应当是总结算东亚过去历史的最后的战争（见武汉 12 团体欢迎鹿地夫妇大会上鹿地亘所引用的谈话）。这次的战争能否把东亚过去的历史总结算一下，完全要看我们能否把疯狂侵略者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困难，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看穿了它这个纸老虎，真正把握住它的弱点和危机，更进一步而利用它那满身疮痍的危机。我常是强调这样一种主张：敌人并不厉害，只是我们太不厉害了；敌人并不可怕，只是我们太怯弱罢了；敌人的内部并不是不分崩离裂，只是我们仍有不甚坚强团结的弱点为敌人所暗算罢了。总括一句话，我们取胜的关键只在于正确认识敌人和适当利用敌人的弱点；以积弱的国家抵抗乍强的



国家,也只有巧妙运用这种办法。

利用敌人的弱点先自研究敌情认识敌人开始。但自抗战发动以来,这种工作实在是最被忽略的一种。政府及军事机关固然也有特设的机关及部门,专作敌情的研究,但还未充分发挥,却又无可讳言。例如全民抗战时期官民合作及军民合作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但是研究敌情及认识敌人的工作,则和其他的工作一样,没有采用这种合理的方式,直至最近还在拒绝这种方式的采用。再就这种工作的成果的运用看,政府或附属于政府的机关,始终没有把所认识的敌人的真面目宣布给一般的民众知道。致使民众的脑海里依然印象着战前的日本,怀着“恐日病”,好一点的,对于敌人的情形丝毫不知,结果对于抗日战争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机械式的无意识的行动。研究敌情认识敌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一般民众普遍地浸透于这种工作的成果中,使个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把握敌人的弱点和必然崩溃的危机而坚强最后胜利的信心;并且能够全体性地有机地利用敌人的弱点。

再看看民间研究敌情认识敌人的工作做得怎么样,特别是将此种工作的成果提供一般国民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这种工作主要的表现,在于出版的书籍定期刊物上;我们只要就全面抗战发动以来的出版界略加检点,则可以看出研究敌情,认识敌人,传布敌国弱点的工作,做得多不充分,就是“文化人”也未免太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工作!固然其中的原因相当的复杂,例如有心研究的人阻于生活问

题,有研究的成果而却找不到适当的出版场所等等。根据本刊的调查,自去年八·一三至今年4月1日,新出版的书籍大小不下二百种,但是专门谈论日本问题的却没有一种,只有三种在谈论抗战问题中稍稍提到日本的一些材料。固然本刊的调查也有遗漏的,例如拙著《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中山文化教育馆去年10月版收于《抗战丛刊》中),可以说是专剖述日本问题的一本书籍。此外,还有一本题为《日本是什么东西》的小册子,作者是一个人种学者,以人种学者而谈论日本政治,社会,经济,甚至于资源等问题,自然也有它独到的地方,或不妥当的地方,但也被本刊的调查所忽略了。再精细调查一下或者还有可以举出些日本问题的书籍,但充其量,抗战以来讨论日本问题的书籍,还是这样寥寥无几,我们文化人对于抗战所有的力量,实在太不够。

这种缺陷直至4月以后始略有弥补。4月间出现于武汉市面的日本问题书籍,骤然增加到十二种之多,5月又出现了二种(皆据本刊《抗战新刊目录》)。这固然是第二期抗战要求的结果,但是这还不能算是可以满意的现象,在十几种新刊的日本问题书籍当中,还参杂着不少莫名其妙的东西在焉。例如《反战运动在日本》一书,内容和名称完全不相符,书店虽然抬出陶希圣先生为领衔作者(本刊调查为陶希坚,当为手民之误),但恐陶先生本人未必知有此事。此外还有一些不相干的小册子,简直值得不得介绍。

## 二、几本主要书籍批评

若就抗战以来出版的几本主要的日本问题书籍列举于下,以为介绍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则有如下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书 店
1	《日本论》	哈耶玛	光明书局
2	《日本经济与经济制裁》	赵洵等译	上海杂志公司
3	《日本战时工业的危机》	宋斐如	中山文化教育馆
4	《日本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	宋斐如	上海杂志公司
5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宋斐如	生活书店
6	《日本国内的革命怒潮》	王纪元等	战时出版社
7	《日本的战时体制》	郑森禹	光明书店
8	《日本国防力的剖视》	一 氓	今日出版社
9	《日本经济能否持久作战》	郑森禹	生活书店
10	《日本军部与法西斯蒂》	柳 仁	上海杂志公司
11	《日本的陆海空军》	包 刚	同 上
12	《日本铁蹄下的东北》	宋斐如	战时读物编译社
13	《被包围的日本》	杨宝琛	同 上
14	《敌兵阵中日记》	田汉等	离骚出版社
15	《日寇开发华北的阴谋》	刘 仁	黎明书店

抗战一年来出版的日本问题的主要书籍,充其量只能马马虎虎地举出上列十五种,实在有点贫乏,这些贫乏的书籍自然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兹逐本加以分析。

第一种《日本论》是一般的性质,它是仿效 Poppov《日本论》的作风,它的篇幅虽然没有 Poppov 的作品多,但是

它的观点却比 Poppov 还正确些。这一点可以说是苏联近年来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观点的进步。它的特点之一,是增设《日本历史概况》一章,简单明了地剖述日本的历史发展,固然没有早川二郎的《日本历史读本》的详尽和新颖,但尚能将要点说出,颇有佐野学当年之笔风。其特点之二,是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质,没有再犯日本“劳农派”的毛病,在第二章《历史概况》的“明治维新”以后的部分,估量日本资本主义的封建性,并且特别在第三章《日本的经济状况》下设《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质》一节,更加明确地阐明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两种特质,军事性和封建性。这一点充分矫正了 Poppov 以前所犯的错误。其特点之三,是在第四章的《国家机构和政治运动》章下,特别提出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君主的作用,反动的军事警察网,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等节,阐明日本国家机构在经济条件——生产样式——决定下残存的封建特质及其最近高一层的发展。这一点也是他比 Poppov 进步的。总之,这本书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说溶化了七八年来风靡日本全国的权威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论点;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及小林良正等人的主张,不但改正了本国劳农派及布尔乔亚学者的错误,并也影响到苏联的日本问题研究界。“讲座派”(因刊行《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而得名)的第一个指导者,山田盛太郎,现在,听说因为日本法西斯政府的严厉压迫而转向了,但其学说却已永垂不朽,自己“刻板枯燥”的作品,现在已经再生产成了流畅通

俗的作品,并且在苏联的日本问题研究界获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

这本书大体上虽是进步的,但尚有一二点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充分的地方。其一,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特殊过程,它和其他的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不但截然不同,并且是颠倒的程序。先进资本主义各国近代产业的发展,是一般的和平工业部门对于特殊的军事工业部门占领导的地位,而在日本则颠倒过来,前者的生产和发展倒反依存于后者。先进帝国主义对外的进出是商品在先,军队和政权继之,日本则军队在先而政权继之,最后商品始随之而来。其占领台湾,朝鲜,以至东三省,都是依着这样的程序。这当然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后进性决定的,但这几点对于认识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把握住它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无法理解现在经济组织的特质,也就无以理解其国家机构及社会组织的正体。但是这一点,哈耶玛氏却没有设专项加以说明。其缺点之二,就是分析日本社会的生活还不够深刻。例如他说明封建时代的阶级构成,只列了四个阶级:“军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原书44页),但是他却忘记了日本还有一种处于更黑暗的“人间地狱”中的所谓“秽多非人”。他们在日本社会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在封建身分的压迫之下必须赤足,不许穿木屐,鞋靴更不消说。一般社会不许他们进入普通的人家,他们所住的房屋及所耕土地,也以“不洁”的理由而被免了贡税。他们虽在明治四年被取消了这种不

洁的名称,但其生活的惨苦却无减于以前,日本资本主义变革的结果,倒反把农民和工商业者一部分,实质上编进了“秽多非人”的队伍去。所以叙述日本社会生活的黑暗,不能忽略了“秽多非人”的生活和最近的演变。这一点是哈耶玛不及 Soqarov 及“讲座派”有些作家描刻之深入。总之,《日本论》可以说是抗战以来最好的一本日本问题书籍。

第二种的《日本经济与经济制裁》,也是抗战中的一本日本问题的佳作。关于日本经济的书籍,还有两种可以一同举出来讲的。其一是第九种的《日本经济能否持久作战》,其二是《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这三种书各有各的特长,其说明的方法和方面,也各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结论却大致相同,可以归结到四点:(一)日本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工业构成,还非常低,(二)日本商品大部分依存于外国的市场,特别是和平营垒家的英美法苏荷等国。(三)日本的主要资源大部分依赖外国来供给,不独军需资源如此,即一般的和平工业的原料也莫不如此;(四)因此,只要各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即可以制日本侵略者的死命,阻止其侵略的行为。《日本经济与经济制裁》一书,特别着重于日本经济对外的发展及其矛盾,以为各国经济制裁的前提,是非常正确而后一部的材料也较新鲜。但这本书是独立的两部分合并成功的,所以难免有点不衔接。《日本经济能否持久》的特色着重于支持战争的能力的分析,《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的内容虽只限于剖述工业部门,但却道破了日本经济最重要而又最为脆弱的部分,其特点在于由工业的

基本构成谈到工业危机的具体条件,更谈到工人恶劣生活的影响。这本书已由国防宣传委员会译成英文向各国宣传,但有一个缺点即去年十月以后的材料尚未补入,所以作者又应国际宣传委员会时要求,续补一章,中文载于《中苏文化》2卷2期,读者可以参考。

关于政治的主要新刊,就是上列第七种的《日本的战时体制》及第十种的《日本军部与法西斯蒂》。前者说明开战后日本政制的演变,由企划厅的改革,说到参议制之新设,直至大本营的成立,都是以动因分析的,是相当的佳作,惟最近近卫内阁的改造,则须倚靠最近的杂志的论文来补续,其主要的有《中苏文化》2卷2期及《时事月报》最近期的拙作,有《世界知识》思慕兄之作及各报有关的社评。《日本军部与法西斯蒂》,顾名思义应该是说明军部与法西斯蒂的关系,但是本书之解说是独立的不关连的——虽说它解说日本政治机构,民间法西斯,乃至最近日本政治的法西化,有相当正确的地方。希望出版界能出刊一本《日本军事法西斯》来补满这个缺陷。我曾经在《世界知识》上登载过一篇《日本军事法西斯论》,但仍嫌言焉不详,且准备好的事实和资料均因限于字数未用上去。

我们全面抗战以来,日寇最严重的一种问题,就是社会的动荡及其危机的深化,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有上列第三、四、五的三本书。《日本国内革命的怒潮》虽是几篇独立的文章集成的,但是材料还算丰富,各文的论点大体上也还正确,这自然和标明陶希圣等著的《反战运动在日本》的

编制自然不同。拙作《日本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具体的材料叙述了前年以来日本工农联合战线的形成及其发展，《日本人民反战运动》说明开战以来日本知识分子，左倾各派工农及一般人民，士兵及殖民地民众等方面的反侵略战争的理论斗争，这两本书正好是姊妹篇，且有不少的特殊材料，特别是前者可以说是很好的文献。

《日本的陆海空军》，估计日本作战的军力；《日本国防的刻视》更加广泛地讨论日本国防上的各种问题，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可以补前者之不足。又《被包围的日本》，是自日本国内外的情势说明日本孤立的危殆，它固然也可以补足上面二书一些，目录也都很新鲜，但终嫌其编排与采择太无标准，太紊乱，结果全书失掉了重心，例如前面谈国际的包围，后面则谈国内的社会危机，又如《拆穿日本纸老虎》的章下更加紊乱了。这种情形是近来我国出版界只顾赢利而胡乱编辑小册子的一种特殊风气的表现。这本小册子材料固然不坏，能够净清一下就好了。

《日本铁蹄下的东北》是我根据东北协会的特殊资料编著的，详述日本野兽怎样压榨，虐待，惨杀东北的同胞。但是开战以来日寇对我的残暴更千百倍于以前，出版界也应该努力出版一本具体刻画日寇残暴的著作。《日寇开发华北的阴谋》叙述日本侵略者继强力占领之后设法开发华北资源及侵营各方经济，是很自然的趋势。不过，我们不但要揭穿他的阴谋，还要设法破坏这种阴谋才好，《敌兵阵中日记》，是以俘获的文件择译出来的，内容很多“厌战”和



“恐华”的记载,这不但是可宝贵的资料,并且是一种有力的宣传品,如其内容能更节略些,更扼要些,其吸引力必更大,其事实宣传的效力也必更大。

### 三、以后的希望

总观以上所介绍的,除了由俄文翻译的第一及第二两种较厚的著作外,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日本问题书籍,尽是小册子,并且非常零乱没有系统化。即连一部日本问题小丛刊也都没有看见过。黎明书店曾经计划出部这类丛书,共十几种之多,要我代为主编,但办法订定后即受到时局的阻碍未得实现。其他的书局也都没有这样的要求和计划,但是抗战的新阶段要求着著作界深入的著作,有系统的专门的刊物。像《当日本作战的时候》那样比较深入的中本书,当是此后的读书及抗战指导者所欢迎的。同时所谈论的范围,也应宽广些,这一年来日本问题的讨论,新编的书籍或定期刊物的论文,大多集中在经济问题的剖述,并且只限于当前的经济问题,未能深入到日本经济的核心,或自其经济的发展过程的正确把握来作,根本的认识,象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那样的书籍,既没有人著作,也没有翻译。又像 Poppov 的《日本经济之技术的及组织的基础》一书,虽是研究日本资源最主要的一本著作,能够再参考别种资料,可以写成一本绝好的关于日本资源的书,但也没有书店知道出版它。即像凌青的《中日实

力的对比》一类的著作，抗战以来也不多见，我希望出版到第5版的这本书的作者，能再来一本《日本实力的新估计》。作战一年后的日本已经暴露了很多战前我们所料想不到的弱点，能再来一次新的估计，自属非常的必要。又如谈论日本社会的危机，单单叙述日本人民的厌战和反战，在一般没有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们，是怀着半信半疑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刻画日本社会生活的黑暗实状，至于政治经济上找出根本的原因来。但是描写日本社会生活黑暗面的书，不但抗战中没有出版过，就是以前也没有出版，我国出版界最缺乏的，就日本社会组织及人民生活状况之类的书。平野义太郎的《日本社会机构》是值得介绍的一本。再如日本社会思想及浅薄的文化，也没有人介绍，户坂润及玉城肇的几本著作，也值得介绍，前者专讨论思想文化，后者写日本的家庭制度。

最使读者失望而遗憾的，是抗战以来竟没有一种定期刊物是专讨论日本问题的。诚然日本问题也是国际问题之一部，《世界知识》，《时事月报》及《中苏文化》也在那里登载论文，但是事实上日本问题自有独特的范围，有它和国际交错的一面，也有它自己独立的一面，而这三种刊物的剖述也只顾到一面，甚至于有些零碎不成体系，抗战前还有一个《日本评论》专介绍并批判日本问题，无论如何总算作了一些，但在抗战后急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今日，倒反没有一种定期刊物可以有系统地连续地讨论日本问题，暴露日本平时所隐蔽的弱点和危机，平时“闲话皇帝”

就要被监禁,战时自然没有这种危险,但是深入刻画日本的勇气并没有增加的样子。抗战的新阶段上,军政及人民各方面都要求看一种这样的定期刊物,最好是军政机关出来创办,否则赞助文化人来出刊。战时日本研究会有创刊《战时日本》半月刊的计划,并且已经付印第一期,希望这一种各方面所需求的定期刊物能够得到各方面的赞助,共同奋斗,继续刊行下去,使认识敌人的正体的常识普遍化,并且经由宣传工作者深入民间和队伍去。

原载 1938 年 7 月《战时文化》第 1 卷第 4 期

## 介绍《日本资本主义论战》

我对于这本书除了作篇将近万言的长序及忠实翻译外没有其他功绩，所以这里要批评或介绍的对象，可以说是原著者的作品。我想必须这样声明，才能免去“自己介绍”的讽刺罢。这本书本身确实有他不可磨灭的价值，同时也是我读后感觉有趣并且有益的许多著作中的一种。在他出以问世的前一晚上，我就得到朋友堀江邑一先生的通知，第二日买到手即便费半天的工夫一气读完。读后首先感觉到的是：这本书确实是理解数年来激烈论争而未得一个结论的一场笔墨官司的索引，同时又是“讲座派”几本有价值但却相当难懂的著作的导言。读了这本书，不但可以了解“讲座派”和“劳农派”的理论及异同，并且可以理解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质的大概。

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认识，的确是一种相当艰难的工作，不但日本各派学者经多年的论争还没有得到一个最正确的定论，就是近年来特别注意日本研究的苏联著作界，

也还常在改变的过程中？博博夫的前后著就是一个证例。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工作，不但“劳农派”的作品散乱，较难给读者以有系统的观念，即有系统地在“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中剖述过这个问题并且就其主要的部分再集刊专书，如山田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平野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以及小林的《日本产业论》等书。也因其叙述法的难测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致使读者乍一读过不能容易了解问题的本质。日本读书界对于“讲座派”的用辞及写法的难测加以非难，就是这种事实的表映，当然讲座派的著作绝对没有因为这点而减低了真实的价值。

内田穰吉能以平易通俗的笔法把讲座派的几部分主要著作介绍出来，作为研究日本资本主义本质或读讲座派全部著作的一个导言，对于讲座派及其作品的爱读者是一桩极有意义的贡献。我们若打一个譬喻，那末，野吕及山田以下讲座派的著作是《资本论》。内田的这本著作就是考茨基的《资本论通谕》了。《资本论通谕》的价值不可抹煞。那末，这本书也自有他的价值了。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其次，内田之介绍日本左翼两派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争，不是单纯的介绍，而是一种带有批判眼光的介绍，所以对于两派的立论皆随时加以严格的批判，并忠实地尽量介绍彼此的批判，但其结果还能使读者读后自己觉出那一派的理论较为“近真”，较合于事实，同时还觉出留下了那些没有理清的问题。这是本书的第二点特色。其他的特点，因

为篇幅所限,不能缕述,请参阅拙作《日本问题著作的一般批评》,载《战时文化》第4期。

不过,本书也有他未作到的一个缺点,就是:本书只集中于经济组织的方面,而完全忽略了政治制度及社会机构的剖述。所以希望作者再来一个姊妹作,否则依然希望读者继续两派关于这两方面的著作,必须如此始能窥见日本资本主义的全豹。

这本书的申译本,原早在抗战前(1937年5月间)完成的,但因上海与南京之弃守,迟延了出版,在武汉时并闻打好的纸版已经遗失,曾经一时大感不快,现在竟然出来见读者了。在还没有更具体的介绍的今日,我所感到的快慰,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希望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多加以注意。

按:《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原著者:内田穰吉,译者:宋斐如,中山文化教育馆编,上海杂志公司印行。

原载 1939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3 期

## 各国劳动力统制政策

各国在战前即已实行“准战体制”对于各部门经济及国民生活，实施相当的统制，至战争爆发而实施全面的统制政策，自是当然的归宿。

实行全面的统制的目的，不消说，是在于推行“全面战争”，而全面战争的最有效力的因素，首推“人的要素”。兵源出自人的要素：物资要能够发挥其效用，也非有人力为之发动不可。一般之所谓军事战、外交战、经济战、思想战，乃至文化战等等，没有一件不是以人为主动力。所以人的质和量的比较，可以决定作战的胜负。惟其如此，所以各国对于人力常采取相当的统制政策，视此统制政策运用的得失，几可以测定那个国家作战能力的强弱。

在人力的运用上，苏联可以说最完全，德国亦实行之甚早，英美发动较迟，但却富有人力的资源。日意两国则不独人力资源缺乏，且其运用也不适宜。所以在实际上，苏联早已成绩卓著，战争爆发后尤有奇效；美国以其富裕的人力，

尚足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德国也以其强制执行，得以弥缝一时；英国虽较缓慢，但也渐渐走上统制的轨道；只有意大利是一般落后，日本则自今年起开始暴露出劳动缺乏搜剥无方的马脚。兹就各主要参战国的劳动力统制政策及其实施的效果，略为剖述介绍于下。

## 一、美国的劳力战线

### (一)美国劳力资源

美国的自由主义国家时代已成过去，现在处于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也在加强其战争体制，在全国各方面皆采取相当的统制政策，劳动力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一面形成美国苦恼中心的失业问题，也与开战同时得到了解决。美国自开战后，即以强烈的力量，急速地成功改变了和平产业为军需产业的计划，在女权高于男权的美国，女子竟占了产业斗士的一半以上。她们出现于工场，甚至于组织了娘子军，其大规模的国民征用，成了现实的问题。美国拥有丰富的现金与物力，总人口超过一亿三千万以上，十八岁至六十五岁的劳动能力者，达七千一百万人（男四千二百万，女二千九百万），美国拥有如是丰富的人的资源，但仍未忽略人的劳力政策的运用。

美国着手于天文学数字的国防计划，始于1940年6月，当时因以合理主义促进生产机器化，产生了九百万的工业失业者，又以大规模农业的发达及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失掉欧洲市场而产生了农村过剩人口二百万人,合计共有一千一百万的失业者群。另一方面又有马上可以动员至产业战线的二百五十万的妇女劳动力,美国可说是“人力的仓库”。但自太平洋大战爆发,为要完成罗斯福总统所发表庞大的飞机、战车、及船舶的生产计划,而人力的需要大为增加。

据美国劳动局的计划,1943年底,美国需要军需劳动者二千万,兵力九百万。这个数字与开战当时的需要比较,增加需要兵力七百万,劳动者一千三百万,合计二千万。为着填补这个缺数,须征用一千万的军需劳动者,一百八十万的失业者,一百四十万的青年,七十万的农民,及六十万的自家经营者的转业。即令此计划实现,也尚有五百五十万的不足。为补足此数而终须动用妇女。

## (二)妇女劳动会

美国战时资源委员会长马克那特,自去年9月即已强调动员多数妇女于战时产业,称道:“从十八岁至四十四岁的主妇当中,每四人抽一人,或每三人抽一人,使其从事于战时产业”。“因鉴于此种情势,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考虑妇女劳动者的训练及动员诸问题及政策”。

“在实行全面的战时生产的此际,多数妇女劳动者的参加,无论如何是必要的。1941年12月,战时生产部内的妇女劳动者,约有一百四十万人,1942年12月一跃而增至四百五十万人,至1943年年底,可以增至六百万人,在

全美的劳动者总数之中,妇女可占至百分之三十”。

其次就劳动者的本质考察,则因美国产业一向着重于和平产业,所以军需产业的熟练劳动者,非常之少,是为军需扩充计划的一大障碍。因此,美国急速设立劳动者养成所及训练所,努力于熟练工人的养成,但因一时赶不上需要而终于不得不采取劳动强化政策。

### (三)放弃八小时劳动制

美国从来的八小时劳动制是法律所规定的,八小时以上的劳动,一般视为罪恶。但是战时需要,已改变了这种观念,去年10月6日罗斯福总统即已布告中止民间航空关系的技术家及劳动者的八小时劳动制,现行陆军部所管辖各工场的劳动者,也已废止了八小时劳动制。甚至如战时生产局长捏尔逊,要求全美的军需工场,作二十四小时的全日生产,此后的劳动强化,将愈彻底。

从来美国的劳动争议,也是世界有名的事物,1937年发生四千七百四十件,其后每年也各有二千五六百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即设“战时劳工局”,拥有强力权限,以代替以前的“国防调停局”,美国的劳动争议的减少,遂破前例,1942年1月至7月之间只有七百二十八件。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即渐采强力的统制政策,强力政治支配了战时的整个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于去年9月,向上院提出“产业总动员计划案,”其要点如下:

- 1、赋予大总统以美国产业全体动员的权限；
- 2、大总统根据上述权限，对于美国国民的  
行动及私有财产，施行近于完全的统制；
- 3、再如各产业组织及设施上的物的资源，也  
得加以统制。

如此对于美国产业，要求作人的及物的总动员，以期战时生产的急速进展。去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总统又广播“炉边谈话”，吐露人手不足的实情，而力主强力的劳力政策，其要点如下：

- 1、为补充农场及工场劳动力的不足，而有重新提出征用政策的必要；
- 2、为着军需品的增产，必须禁止工场劳动者的移动，禁止各工场相互间争夺劳动者；
- 3、征召适龄劳动者离开农场及工场的结果，或须使用男女童工；
- 4、对于各种教育当局，指令学生于学期中或放假期，赴农场或军需工场劳动；
- 5、有一部分国家不愿使用女工与老人，但在现在的美国，已无此偏见的余裕；
- 6、希望设立征用所于全国各地，任命四千五百个人员，以从事于人的资源的扩充。

美国人一向拥有很高的实行力,过去一年中政府劳务人员的进度,也比其他各国为最迅速,妇女之进出产业战线,也非常显著。现在已有三百五十万人的妇女,进出于工业方面,一千四百万从事于农业生产,且有五百万人动员于工业的新计划。在某一军需工场上,其男女劳务者的比率,是男女各半,最近妇女且已进出于矿山。最近男女学生皆受军训,女子毕业于大学或专门学校者,已有数万人受军训,组织了称为妇女补助队的女兵。

要之,罗斯福总统之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总动人力于军备的扩充,生产力的增强,其赫赫战绩,已使日本侵略者闻之而生畏了。

## 二、苏联的劳动阵容

苏联革命后的一种口号,是“不劳动不得食,”无论个人感情如何,总之是一个没有失业的国家。苏联自1928年以来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总动员全国国民于劳动战线上,大规模地把和平工业转变为军需工业,加强了国防体制,皆是事实。

### (一)转向军需产业

就产业部门的劳务考察,则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至1932年),已把农业集体农场化,而将其过剩的人口,集中于重工业的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年至1937年),因为农村人口大不够用,终于求劳动力供给源泉于妇

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年,妇女劳动者数,竟占至全体劳动者的百分之四十。

至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年至1942年),农村人口及妇女的动员,达到顶点,欲再期望量的增加,已甚困难,所以又转而求于加强质的动员,即强化劳动规律,提高生产力,也即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展开。至1941年6月,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此种大动员的倾向,更加加强。

在苏德战争爆发的一年前,苏联即已于1940年6月,大施改革于劳动制度,其要点如下:

- 1、七小时劳动制为八小时劳动制;
- 2、六小时劳动制,除危险的作业以外,全改为七小时劳动制;
- 3、事务的劳动(官厅及其他的劳动)改六小时劳动为八小时劳动;
- 4、六日周间制,改为七日周间制。

又于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6月,对于全国劳动者,课以一日一小时至三小时的定时外的劳动义务。

## (二)征用与强制劳动

苏联又于去年二月,颁布了“劳务征用令,”又于同年四月,对于集体农场的场员,加强义务劳动日数,约为二倍。集体农场场员的义务劳动的最低日数,以前是1939年

所规定的六十至一百日，现在则改为一百至一百五十日。对于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少年，一年间也强制五十日的义务劳动，对于十四岁至十五岁的男子，及十四岁至四十五岁的女子，颁布了“农业征用令”。苏联因丧失谷仓的乌克兰，拖曳车及马匹被征用于战争，中坚劳动者被动员，所以采用这种非常手段，以防粮食的减产。

上述“劳务征用令，”原规定没有从事于国营或私营企业的都市住民，十六岁至五十五岁的男子，及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女子，征用于军需工场或建设工作。但是此项男子，已被调至前线作战，或被动员至劳动战线，因而可以征用的大部分人，只有家庭妇女。加入劳动战线的苏联妇女，至1939年已突破一千一百万人，占全部劳务人员百分之四十一，现在或已占至半数以上。

### (三) 妇女的显著活动

参加劳动部门的妇女，因曾受过三个五年计划的训练，所以一旦在有事之秋，马上可以转移自如，关于此点，报纸曾有如下的报道：

妇女劳动者，占全部劳务者百分之四十，不独限于适合妇女劳动的纤维工业，或工艺手工业，始自道路工程以至机车的运转，所有的生产部门，妇女皆可与男人并肩，就其综合的劳力考察，是个伟大的力量。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征用于战场的预备兵及后备兵的庞大数目，虽然可能给予苏联生产力以相当的影响，但至今日尚未见有大的破

绽。其最大的原因，即在于平时妇女劳动者的比率甚高，高度技术妇女劳动者为数甚多，因而可能劳动的妇女完成了产业后备军的作用。

除了这些后方劳动妇人而外，直接予以参加第一线的妇女，为数也属不少，特别是女军医达到相当的数目。但自大体上说，代替男子以维持后方生产，却是现在课于苏联妇女的最大任务。

### 三、英国的劳力统制

英国现在的勤劳战线问题，也已相当的深刻，英国一向拥有印度、澳洲、加拿大、及其他属地殖民地，故有丰富的资源及劳动力，其本国人大半皆从事商业或其他的和平产业，所以不发生劳务问题，也无对策的需要。

#### (一)战后的非常立法

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事态完全一变。开战初期因为德国势力一时席卷于波兰以至法国，英国曾感相当的危机，因而英国政府特于1941年5月，为期国防力的增强而制定了得以征用人及物，总动员国内资源的“非常时权限法，”及以此为根据的“国家防卫法。”但此两种非常法律，实际上截至1941年，尚未被运用。其原因在于国内尚存有一百五十万的失业，及战争爆发初期因为和平工业停顿而军备扩充所需要的劳动力，还十分够用。

## (二)彻底的转业政策

但是英国的总人口只有四千八百万,十四岁至六十四岁的可能劳动的人口,更只有三千三百万。其战局的扩大及进展,使军需品的需求,愈益增大,终于要求彻底的劳务对策。

其步骤是:第一步先送失业者于战时生产部门,战时的一百五十万失业者,至1940年已用去一半,至1941年5月减至三十万。

与此运用同时,英国政府又采用了转业对策,1939年制定了“供给限制令”,极力减少种种贩卖业及消费的生产工场。1941年又实施“生产集中计划”,集中种种资材及施设于军需生产部门。英国一向从事于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通信事业、印刷业及娱乐等事业上的人数,占职业者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六,所以上项计划,估计可以动员四百五十万人,转向军需工业部门的劳动者,一定达到相当的数目。

## (三)妇女走向工场及兵营

上述可以劳动的英国人口三千三百万之中,一千一百万为妇女,英国政府对于这些妇女,自1941年3月,即开始登记及征用,至去年3月登记者已有五百万人,其中二百五十万从事于兵役及其国防事务,所余的二百五十万从事于军需产业。去年6月又有十六岁至四十一岁的妇女七百万人登记,同月截止的妇女劳动者达五百五十万,比之



战前,增加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之谱。

英国与劳务动员同时施行军务动员,1941年,颁布过“国民役务法”,规定军务以外的国防服役。同年12月,又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扩大兵役义务年龄为十八岁至五十岁。又对于二十至三十岁的未婚妇人六十二万人,强制加入妇女补助国防团、妇女补助空军团、妇女海军服务团,与男子为伍而作勇敢的劳动。

英国劳动大臣曾经发表谈话如下:“在十四岁至六十四岁的男女合计三千三百万人之中,已有二千二百万人从事于军务及产业。

于此可知英国的劳动者已动员至相当限度,所以去年6月遂又登记十六岁至十八岁的青年女子。”

英国内相毛里逊也称:“就人口每一人的生产力言,英国决优于世界各国”。此言并非夸大,英国现在已完全确立劳动力动员体制,其生产额已达战前的二十倍。英国全体国民,皆已乐受战争的牺牲,为完成反侵略战争,争取真正世界和平而献身于生产战。

尤可感动的,就是英国妇女。他们守着大后方,充当车站的夫役及卖票员,不消说,即电犁或军需工场的粗污工作,他们也都担负。英国对于妇女的强制征用,已由未婚妇女,扩展至有子女的妇人,甚而及于兵役的征用。于是出现了满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娘子军,现在从事于高射炮队的观测班。此点,若与东方的情形比较以观,实有隔世之感。

## 四、德国的劳力搜刮政策

### (一)劳力搜刮的开始

轴心国家原自称为“无”的国家，故其物力及人力皆极有限，以有限的人力而作无限制的侵略战争，其将如何搜刮其人力源泉，不言而喻。德国为轴心的首魁，且先考察其搜刮人力的政策如何。

德国造成此次惨烈战争的罪魁希特勒，在十年前的1933年，握得总统的大权，始建设其纳粹党。当时的德国因继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其财力、物力、资源等等，无不穷窘至极，人力也受其影响。当时德国人口大约是六千万，而在此六千万当中，又有六百万人，约占百分之十的失业者（据政府的登记）。德国的疲敝可知。

于是希特勒心怀叵测，乃先树立第一次四年计划（1933～1936年），颁布第一次、第二次“失业缓和法”，大兴土木工事，振作农业，并驱妇女回家去，其结果至第一次四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1936年中期，失业者数激减至一百三十万。

继之，希特勒又于1936年9月，宣布第二次4年计划，其主要方针为使原料自给自足，并扩充生产力，尤其集中全力于制铁业，化学工业，及机器工业上。从此，德国始再踏上再整军备的第一步，其后又继续制定种种劳务管理法令，强化劳务动员体制，以便扩充军备。

其结果，第二次四年计划的初期 1936 年 6 月的失业者数，尚为一百三十万，至 1938 年 6 月，仅余六十万人，反而感觉劳力不足。另一方面又以德国暗中振兴军事产业，农业劳动力遂至渐减而压迫至于平时的生产部门，终于开始采取征用办法。1938 年 6 月公布，翌年 1939 年 3 月扩充收容的“劳力需供确保令”，即为此目的而制定，被征用的数目，达二百万以上。

## (二) 劳动者半数为妇女

德国的劳务政策，起初为着失业者而驱“劳动妇女回家庭”，但其动员男子劳动力的结果，产生了求过于供。劳动力来源，有涸竭之虞。其时德国政府又开始求其劳动力源泉于妇女，而劳务妇女的数目，与年而俱增了。

年次	劳务妇女(万)	在全体劳务者所占比率(%)
1933	470	35
1934	500	32
1935	520	31
1936	550	30
1937	590	31
1938	620	31
1939	700	32
1940	850	37

德国的劳动妇女数目，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更有激急的增加。1941 年 5 月，驱妇女返家庭的希特

勒终于开始向妇女呼吁了：“提供战场所要求一切的武器，一切的必需品，是留守本国第一战线的德国国民的最高义务，此点，余相信德国青年女子及妇人，皆能对国家完成新的贡献无疑。数百万的农村妇女，代替男子从事于激烈的田野工作，又数百万妇人及青年女子，也在工场、办公所、及商店，在尽着他们的义务”（在巴尔干战果的报告中）。

自苏德战争开始后，德国政府为补充男子劳动力之不足，而决定以劳动妇女从事于工场的生产工作。劳动妇女的数目，更有激增的趋势；1941年为一千二百万人，占劳动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1942年增至一千七百万，占百分之四十七，“男子作战，女子生产”的豪语，迫令德国妇女，自认妇女从事生产为当然义务或最高的名誉，而自发地从事于劳动。“拜耳制药工场的男女劳动者数的比例，战前男六女四，但是现在即变成男四女六了。在其他的工场，甚至如飞机制造厂，女工数目也多过男工。即家庭的主妇，若无十四岁以下的小孩，或有女儿帮忙，也都从事于外边的职业”。这是某家报纸的报道，德国妇女之如何被征用可知一般了。

### （三）劳动力源泉的扩大

无限制的黩武主义者希特勒，至大战展开而人力更觉不足时，就异想天开，德国的劳务动员政策，终于运用及于外国人的劳动者，乃至利用俘虏。这又与日本侵略者一鼻孔出气。据调查，德国现在的外国劳动者，波兰人即在一百

万以上,合意大利及其他小国,共有二百多万人。至于俘虏劳动者的数目更大,至1942年2月截止,在其国内劳动的数目,即已达二百万人,在其他战线服务的俘虏数目,恐怕达数百万以上。

但是从事于疯狂战争的德国,男子的动员已达极度,据调查只尚余一千万妇女劳动后备军,于是德国政府终于不得不采取劳务的“质”的管理法,断行更高度的产业合理化,集中劳动于高度能率的工场生产,把成绩不良工场的熟练工人移至生产优越的工场。据军需部部长史伯再所称,“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比之一年前,同一劳动力增产百分之六十,并可节约三分之一的原料。”这或许有点夸大。不过,德国劳动战线的劳工会,积极进出于这种合理化运动,却是值得注意。

## 五、意大利劳力政策的贫弱

轴心最脆弱一环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指导下,以其法西斯党的威力,责成其党员发动全面的战时姿态,故其劳务情形,略与外国不同。据李智组合相的发表,组合员的劳务者数目,农业方面有五百六十六万,工业方面有四百五十九万,商业方面有八十五万,其他部分也有二十一万,合计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二万人,于组合员之外再加算其他普通人,则从事于工业的劳务者数目,为五百五十万人,占全体劳务者总数约三分之一。其中有五十万人被派送德国,从

事于矿业、交通、农工业的劳动。意国自称为协力于建设“德意共同体制”，但事实只不过是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讨好的苦笑罢了！

意大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即于 1940 年 5 月 11 日，在法西斯党本部颁布所谓“劳动的战时体制，”对于全国妇女及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未成年男子，作成动员计划，妇女的半数，被动员于生产部门。意大利为确保其农业生产，以保全其战争的原动力，而置重点于“小麦增产”上。其劳动妇女的一半，即用于此方面。

意大利的农业计划，尤其用心于“战时菜园”的扩大与加强上，开垦未开垦地，努力于农产物的增产，最近甚至于扩充耕地至铁路的两旁，是由铁路从业者及所谓铁路义勇军负责的。意大利在 1942 年又对于农村出身的兵士，实施 15 日“归农兵制”是与日本同。

但是意大利迟至 1942 年 12 月 8 日，始由墨索里尼对于全国产业，声言实施动员令，其中一特色即把十四岁至六十岁的妇女，置于军律军规的管制之下。受此动员令适用的公司，有十五万四千家，其人员达四百万人。如无政府的许可，在职人员不能擅自离职。

意大利的劳力情势，因其产业低级而在初期并不紧张，尚有余裕劳动力供给别地方，但是后来随战争的开展，而渐觉人力的不足。于是终于实施“劳务动员计划”，罗马街上已出现女邮差，渐以妇女代替男子的工作了。

然而法西斯党业已瓦解，墨索里尼出亡于德国，希特

勒虽扬言予以扶持,但事实上只不过是个阶下客,其贫弱的劳动力政策,将更无力。若尚可有多少作用,那末就是替德国征集人力罢了。惨哉墨索里尼的下场,悲哉意大利的劳工!

## 六、日本劳力统制的悲哀

### (一)劳工的缺乏与一般对策

日本年来不断的高喊其“产业报国”、“劳力报国”乃至“协力和亲,以突破这非常时局”等口号。但是总人口只有七千万人(朝鲜及台湾尚不能计算在内),除去了老弱者、病患者、小孩、官吏、海陆空军家庭妇女,以及有闲阶级,究竟还有多少人,可以服务“产业报国”、“勤劳报国”,实一大疑问。要用这贫乏的人力,应付空前的大规模战争所需要的产业配备,尤成问题。日本政府及其代表发言人们,自然难免焦急慌张了。从下面几条消息,吾人可以窥见其内情的大概:

1、日方为促进生产计,已将煤矿工人的工资,特别提高;

2、日本战时工业,尤其是飞机工业的工作时间,最近虽已延长,但东条首相在其视察途中,仍向工人作强烈的呼吁;

3、三菱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已因劳动过度而致

十分疲惫,但该厂总裁仍要求工人增加生产;

4、日本政府下令封闭妓院二千三百家,强令妓女改业,从事于战时生产;

5、日本封闭小店铺约一千五百家,迫令店员从事于制造军火及耕田;

6、日本企划院总裁曾声称:“各政府机关应以妇女任各种劳役,并酌量封闭学校,令教员从事生产。”据 1943年 6 月 16 日伦敦路透社讯。

日本政府对于劳力的搜刮,可说是罗掘俱尽竭泽而渔了。但是日本劳力再编制政策,最近又有更普及于全面产业界的发展。据上述第八十二届议会,所谓“企业整备”所企图的目的有两种,即获得原料与劳力。更确切言之,即为紧要产业部门获得原料与劳力。其具体办法,就是废除日本政府所认为“非战时紧要产业”,而以其机器为废铁,以其劳力移用于所谓“超重点主义”的产业生产上的。

今日日本认为最重要而属于战时紧急产业,除陆海军直辖的军火工厂而外。应首推制铁、炼钢、造船、造机,其次,即为纺织工业,及必需的食品工业了。若商业、造丝工业,乃至玩具、食糖、制纸等工业,日本并不视为重要,而予以废止,或强令裁并,而将其劳动力移用于战时工业。据 1940 年 12 月日本协调会推算,日本中小工商业服务者,约有三百万人,以前因为原料缺乏,大半已停止经营,日本政府此后更将所残存者,命令全部停止。



对于钢铁业、煤炭业及非铁金属矿业，日本虽然重视，但也因为劳动力缺乏而采取裁并办法。钢铁业只保留日本制铁会社及日本钢管会社两家私营公司，其他即悉数裁废。煤炭业也只保留三井、三菱、住友、贝岛及明治等大公司，并采用地域集中制，以肥筑，筑丰及盘城三地为中心，其余小煤矿全部停止工作。非铁金属矿业，指定矿山二百四十五处，集中开采，其余小矿山均予以停止。其次，纺织业被命令停业的成分更多。纺织业原为日本支柱工业，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而棉花来源断绝以来，百分之九十的纺机皆已停动，此后措置将更彻底，仅保留纺机百万锭及织机三百架以上的大公司八家，且此八家大公司又只保留原有机器百分之三十，其将多出的劳力，实在可观。他如人造丝工业，原有十五家大工厂，现只保留五家，而此五家的经营又只允许保留百分之四十。化学工业原有一千三百家工场，现仅保留工场面积三十坪以上的较大工场二百五十家，水泥业也只保留专业及兼业各六家公司。再如造丝业、制纸及制糖业，均以不甚切要而其废止程度更高。生丝原为日本大宗产品，原有造丝工场在数千以上，现只允许保留一百五十家工场。制纸虽为传播文化的工具，但在战时也认为不甚需要，而命令“制业大王”的王子制纸公司在日本内地三十三家工场之中全停六工厂，库页岛一百家工场中，仅保留一厂，制糖业更因其为半奢侈品而命令日本内地工场全停，台湾方面停止大部分。

日本企业这样大规模调整，自可移植不少劳工于战时

紧要的工业生产上,这才实实在在是日本劳力再编制的真相,但总难免有剜肉医疮之讥。

## (二)女工来源的开拓

日本对于劳力的新调整,除了上述剜腿肉补手腕,移此挹彼的方法外,还苦心孤诣地开拓所谓“劳力新给源”,在日本平时的劳力新源泉中,一向以国民学校毕业生,中等学校毕业生,半岛劳务者(朝鲜劳动者),及未就业的妇女为最重要。就中,未就业的妇女,尤为日本政府认为最重要的劳力“新给源”,一般每给予相当大的评价。他们取例于第一次欧战当时各国动员妇女的事实。所以1939年7月日本《第一次劳务动员计划》,妇女的劳力来源占着相当的地位,日本社会才充分注意到妇女的存在。

诚然,日本政府一向并没有重视妇女的存在,日本女工虽在日本支柱工业的纤维工业劳工总数之中占至百分之九十的比率,但自大体上说,日本妇女除了服务家庭工作外,大多数还是闲散的,或者是所谓“不要不急产业”的从业者,例如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娼妓、家庭妇女兼营的所谓“内职”等等,即在日本当局万分焦虑以从事劳动力搜刮的今日,还有许多妇女闲散着。日本政府为着帮助农业生产,曾于农耕季节,发动学校学生及轻伤军人,下乡帮助农家收获或耕耘,而下乡的学生及军人们,发现过农村的姑娘,还有许多涂粉抹胭脂,站在门口卖弄风情,感到大不高兴。这种事实固亦足以说明日本妇女的“劳力新给源”,还非常丰富。

日本对于发动妇女的劳力，固然用了相当的心思，但就其“妇女劳务动员计划”实施的结果考察，则其成绩又不甚佳，统计数字比什么都要雄辩些，且将日本妇女就业者数的比率，按年稽察罢。适用“工场法”的工场女工就业者数，若以 1926 年的平均数为 100，则中日大战爆发的 1937 年，日本女工就业数只有微少的增加，其二比率仅为 100.6。若自战时劳力动员之点言，未免可笑，但是事实大有进者，中日战争第五年度（1941 年），这个指数倒反减退至 90.3，翌年（1942 年）1 月又降至 89.8，2 月降至 89.2，3 月降至 88.8，4 月份虽略有增加，但其后又是反降，4 月之微涨只是受学校毕业生新就职者一时的影响罢了（参阅下表）：

日本战时女工的变动表

年 度	指 数	
	1926 年	平均
1937 年	平均	100.6
1941 年	平均	90.3
1942 年	1 月	89.8
1942 年	2 月	89.2
1942 年	3 月	88.8
1942 年	4 月	94.6
1942 年	5 月	94.3
1942 年	6 月	93.7
1942 年	7 月	93.2

从上述事实考察，日本妇女在劳力动员上的地位，不能估量过高。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妇女一向的操业，并不是日本战时所急需的产业。所以一部分日本论者认为强调日本妇女劳力的泉源，不过是男性的“甘言”而已，甚至有人责骂这种过分估量的人为“大蠢才者”（见东京《日本评论》昭和十八年二月份）。

### （三）劳动力搜刮政策的前途

日本在劳动力异常缺欠的压迫之下，想尽种种搜刮的方法，除了妇女劳动力泉源之外，又曾想到 A 朝鲜劳动力，B 俘虏的利用，C 罪犯的使役，D 中国苦力的征集等等办法，真所谓妙想天开了。但是事实如何？能否达到理想目的？能达何等程度？实是一个大问题。

先自朝鲜劳动力一次加以检讨罢。朝鲜劳动者一向在日本劳动界亦占一重要地位，以前是以殖民地劳动者与内地劳动者的冲突而表现为日本劳动纠纷的一部分，过去是朝鲜劳动者受到日本劳动者的排斥而构成了日本政界的一个问题，现在日本政府固然为着增加劳动力而有欢迎这些所谓“半岛的白衣使者”的倾向，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日本阻止朝鲜劳动者流溢于日本内地的基本精神，一时不易改变，亦无改变的倾向。所以日本政府的方针依旧是移植朝鲜人于中国大陆或南洋新占领区。其次，朝鲜劳动者大部是初级及低级的从业者，精练工人的成分还不多。而今日成为日本劳动力缺欠问题的焦点，是熟练工人而不是粗暴低级

工人。近年来从纤维工业及食品工业，乃至玩具生产解放开来的劳动者，为数尚多，所以难免异国情调之感。

其次，俘虏的利用问题，在原则上似是一种理想的劳动新给源，但究其实际，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一向是以虐待俘虏为原则的，加以日本粮食的缺欠，对于中国俘虏大多杀掉。我国抗战精神在军队中的坚强表现，大多数中国士兵在万一作战失败时宁愿战死或设法自杀。即令此后日本军阀改变俘虏待遇办法，而其可利用数目增加，但是中国士兵在高级工业生产上，仍不能有所裨助，他们不是熟练工人，所以俘虏之利用，又与妇女劳动力及朝鲜劳动力的运用问题，正是一样的可望而不可即，其麻烦反比前者为多。况别国的俘虏能为敌人诚心服役者，究竟不可设想。

再如犯罪的使役，日本统治者在平时即已施行，例如强制使役罪犯于矿业生产的惨苦劳动，就中尤以煤矿的非人劳动为最，使煤矿业资本家获得异常的利润，成了世界劳动界的黑暗异例。但是这种罪犯在战时更进一步的使役，亦属很难的问题，其限界自很严厉。其理由就是一般罪犯大多数为非生产者，更不是熟练工人，即令依旧可以用于煤业等矿业生产的惨苦劳动上，但是今日日本所最急要的劳动力，并不是煤业劳动者。固亦可以短期训练，达到熟练的目的，但是罪犯也不是长期的，一旦刑期满后即成自由的国民，日本政府复又失掉使役的强制性，问题依然不能解决。而且徒然增加一笔无谓的开销。

日本侵略者还欲征召“中国苦力”，补助他们的劳动

力,但是问题却依旧困难,上述各项原因构成本项问题的综合,中国苦力不能有助于日本劳动界。

日本政府对于劳动力的搜刮,业已露出手忙脚乱的马脚,除了原有劳动力的改编及劳动力“新给源”的开拓以外,还想在原有部门的劳动者身上剪“羊毛”,羊毛总要剪在羊身上。

首先就是“吗啡政策”即所谓劳动精神的昂扬政策,“产业报国”、“勤劳报国”、“协力体制”、“和亲协同”等口号,就是他们的吗啡;“出勤奖励”、“技术向上”、“阵头指挥”、“劳动管理机构一元化”,乃至新工资政策的采用等等,又是他们的具体办法。

战争已逾六年,而其困难日益增加,所谓吗啡政策在聪明的日本劳动者,已经失掉效力。于是发动战时科学管理法,即是所谓新泰拉制度,从劳动组织上压榨已经瘦弱不堪的乳牛。因劳动制度而致十分疲敝的工人,不独限于三菱飞机制造厂,对于业已延长工作时间的工人一再呼吁加强劳动强度的人,亦不只限于日首相东条而已。日本工业界已普遍运用上述战时的科学管理法:对于到工厂工作的劳动者给予津贴,对于工作的技术加紧提高。还要由工厂管理者的首脑如经理、董事出头监督,以前分裂不堪统一的劳动管理法,也要整理成为“一元组织”,以便加强劳工的劳动强度;日本政府又在奖励乃至强制工厂主实行新工资制度,改日给工资为月俸了。这一串的新办法无非是要在瘦母牛身上压榨牛奶。

日本政府还在去年 11 月 27 日的定例阁议上决定:在

中央设立“临时生产强制委员会，”在各地方设立“地方各厅联络协议会，”其目的在于：“为期神速实现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而其重要的处理事项，就是劳动强度的极力提高及战时劳动力“新给源”的搜刮。

但是事实决不能尽如所幻想，瘦母牛榨不出更多的奶，是可以断言的。尽日本统治者的代言人，在把日本劳动新管理法诗化，称道：

把油污油染的工作服，  
当作卫国报君的铠甲罢！  
但日本劳动力的搜刮前途，仍然是暗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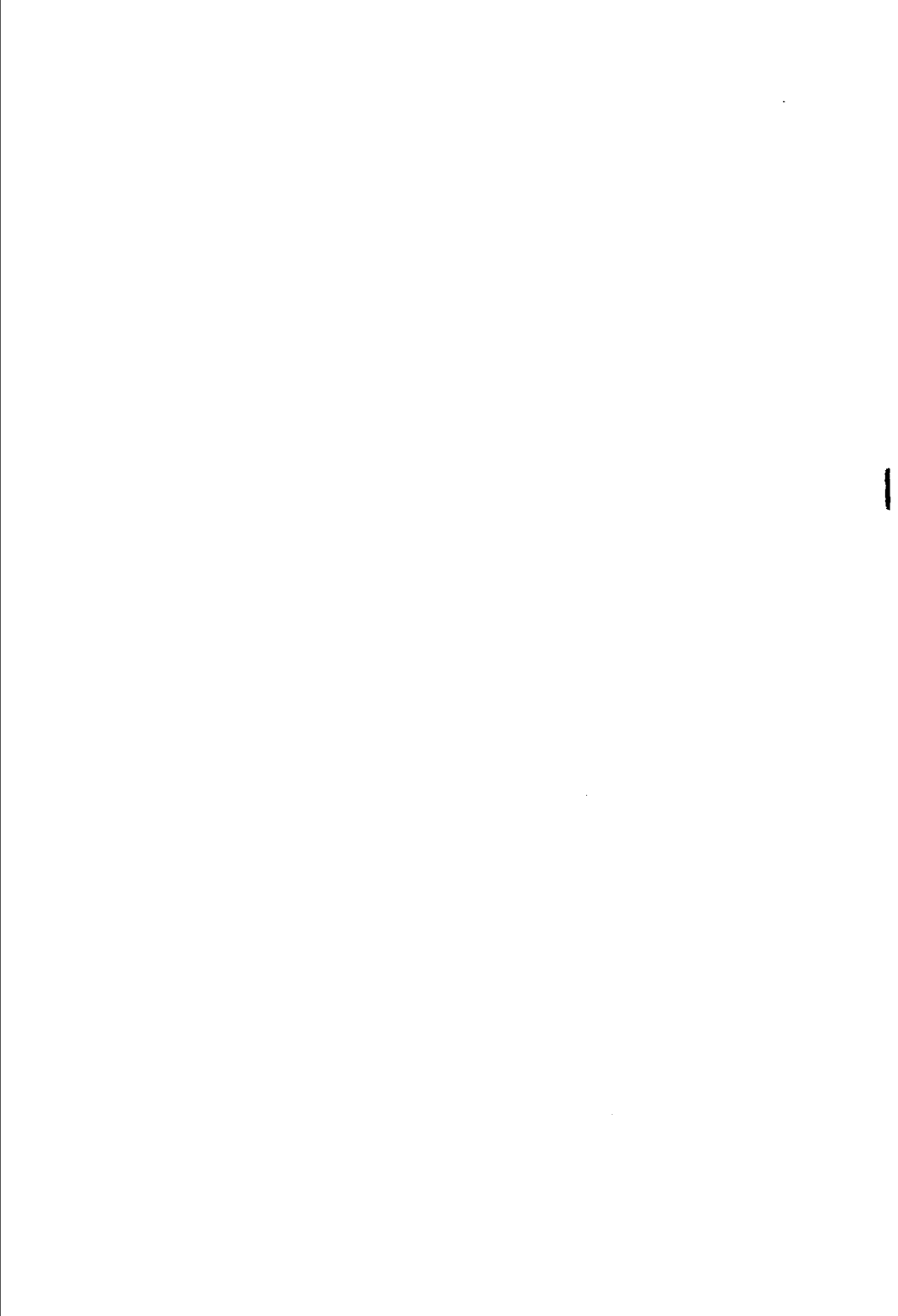
原载 1944 年 1 月《新中华》复刊第 2 卷第 1 期

卷 五

附 录

---





## 悼宋斐如

李纯青

编者按：作者系台湾台北市人，我国著名政论家。抗战期间同宋斐如等在重庆起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返台湾参加接受日本归还台湾的“受降典礼”。生前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

人谁无死，你死得光荣，求仁得仁。

今年二·二八纪念日，我抑不住悲哀泉涌。不久前，从报纸获悉，你的妻子也被国民党杀害，罪名是“煽动学生，反对政府”。你们夫妻都做了烈士，聚首九泉当抱头痛哭，当怀念在人间的你们的孩子们。

三年前，因为参加二·二八起义，你被捕，死得很惨，传说你被装进麻袋，带石沉江；也有人说，你被活埋在圆山之麓。谁也没有见到你的遗体，更不知魂归何处。

你是一个几十年奋斗有成就的文化人。你主编的杂志——《战时日本》，你的著作和译文，在我的书柜里，书桌

上,我每日看见它们,但永远看不见你了。

台湾回归之日,愿找到你的葬身之处,愿抚慰你的孤儿,愿为你复仇。

原载 1950 年 2 月 28 日上海《大公报》

## 怀念二烈士宋斐如、区严华同志

陈文彬

编者按：作者原为台湾《人民导报》主笔，二·二八事件中曾被捕入狱。后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于解放前夕经香港到天津、北京，从事教育和文字改革工作。曾任商务印书馆编审，全国政协委员。

病床心事有谁知？  
廿四年来未息时，  
华姐忠贞成白骨，  
斐兄英烈竟沉尸。  
神州统一期明日，  
故里终归展赤旗，  
孤子成家今有裔，  
志承革命更无疑。

写给宋亮同志，作为纪念。

1973年9月23日

## 杰出的思想家 伟大的爱国者

杨益群

编者按：作者为深圳社会科学院教授、抗日战争文化研究专家。

宋斐如(1902、8、11——1947、3、12)，台湾台南县人，1922年3月毕业于台北台湾商工学校，后至193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文化宣传活动，曾于1927年参加创办《少年台湾》月刊并任后期主编，向台湾岛内宣传祖国状况。1930年又与吕振羽、谭丕模、刘思慕、夏次叔等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并创办会刊《新东方》月刊。1932年至1935年，冯玉祥隐居泰山期间，化名宋瑞华(宋端华)担任冯玉祥的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为冯玉祥及其部属讲授经济学、日文，并介绍日本国情及国际反法西斯形势。1935年至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抗战爆发前夕，返国内满腔热忱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先后在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发起组

织“战时日本问题研究会”、“台湾革命同盟会”，创办、主编《战时日本》，任《广西日报》主笔，“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专任专门委员。1945年10月，随“前进指挥所”人员返台，担任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收台湾的工作。翌月，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兼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计考核委员会教育文化专门委员会委员，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之余，还创办《人民导报》，敢于为人民说话，针砭时政，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所不容，于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中，以“阴谋叛乱首要”、“利用报纸抨击政府施政”等罪名，被当局秘密绑架杀害。其夫人区严华也因掩护进步人士、“煽动台大学潮”罪名，于1950年被当局杀害。根据中央统战部指示，1980年广西区人民政府追认宋斐如夫妇为革命烈士。

宋斐如壮烈牺牲时人届中年，未满45岁，生命虽短暂，却熠熠生辉。其卓著的思想成就和突出的历史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给以应有的评价与地位。尤其今年正值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发表10周年，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台湾的思想家”，这是著名台湾作家、统一联盟创会主席陈映真对宋斐如的评价。对照宋斐如生平的思想政治活动和丰厚的学术著作（约230万字），我们有理由认为，宋斐如不仅是“台湾的思想家”，而且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者。其思想成就突出表现在：

## 一、抗击日本侵略的理论斗士

日寇侵华战争，蓄谋已久，在军事、经济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益显疯狂、残酷。中华民族要打败强大而凶顽的敌人，夺取抗战的伟大胜利，除了同仇敌忾，奋战到底，还应该对日寇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制订相应的战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也。为此，宋斐如以笔当枪，殚精毕力开展日本问题研究。抗战爆发后，他迅速联络返国的留日同学，在汉口发起组织“战时日本问题研究会”，并创办、主编会刊《战时日本》。该刊旗帜鲜明地阐述办刊的宗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目的和任务是“有系统地深入地讨论日本各方面的问题；多方面地、准确地刻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把敌人的弱点和危机，广泛地向国内外宣布；拟议各方面对敌工作实施办法”。内容主要有时事述评和敌军战略与兵力两大栏目。还有敌国资料、敌情研究、敌兵日记、日人论反战、敌后实况、各地通讯、外论选译、漫画、书评、讲座、座谈会、人物素描和本刊资料室等专栏。针对重大问题和不同时期发生的主要事件撰写的“特辑”，如“日寇内部危机”、“战时日本农村的危机”、“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日寇南进问题”、“日寇第四期侵略战的力量”、“战时日本总检讨”、“美日战事”、“苏日协定后的国际形势”、“东北的现状”、“抗战中的华侨”等特辑及“太平洋战争专号”等。针对性强，及时而集中，深获读者欢迎，影响广

泛。作者队伍十分强大,有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郭沫若、张友渔、张铁生、林焕平、许涤新、刘思慕、于毅夫、李纯青、李友邦、谢东闵等;有国民党政要如蒋介石、冯玉祥、孙科、梁寒操等;还有日本、韩国、朝鲜、苏联等各国的反战人士,如鹿地亘、池田幸子、盐见圣策、李斗山等。由于受战争的影响,该刊先后转移到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断续出版,自1938年8月1日创刊至1942年1月15日终刊,历时3年半,坚持出版了6卷共32期,成为我国抗战期间重要的期刊,更是难得的以研究日本问题为主的抗战理论特刊。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战时日本》是个16开本的大型刊物,人手少,从组稿、编辑到出版,大量编务工作都得由宋斐如亲力亲为。“创刊词”、“编后话”及每期固定的“时事述评”和“编辑室”专栏文章,皆出自其手笔。各期的“特辑”或“专号”组文,其中皆有宋斐如撰稿。据初步统计,他在该刊发表近百篇文章,平均每期均在3篇以上。由此可见,《战时日本》的成功出版,是与宋斐如的努力密不可分的。也是其对我国抗战宣传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

宋斐如在呕心沥血主编、出版刊物,积极宣传抗战之余,还争分夺秒继续潜心日本问题研究,共出版有关专著16本,其中有:《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九国公约会议与我们应有的斗争》、《日本铁蹄下的东北》、《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战时外交内幕》、《日本亚洲独霸战》、《日本如何决战》等。译著8本,其中有《日本国家机构略解》、《日



本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太平洋战略论》等。有关的论文不计其数,除了上述提到他在其主编的《战时日本》上发表了近百篇之外,还在其参与的《少年台湾》、《新东方》及其他报刊上,如《时事类编》、《中苏文化》、《时事月报》、《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抗战》、《抗到底》、《抗战文化》、《新中华》、《广西日报》、《大公报》、《力报》、《新华日报》、《扫荡报》、《中国农村》、《半月文萃》、《西南青年》等发表了大批研究日本、宣传抗战的论文。这些论文的特点是:

第一、内容广泛,层层深入。宋斐如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论述全面而深刻。从纵的方面来讲,有政治问题,如《日本战时政治的衰落及其展望》(载《广西日报》1943年3月10至12日)、《现代独裁政治的分析》(载1935年10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冬季号)、《战争第四年日本政治总检讨》(载《战时日本》第4卷第1期)、《日寇国民政治的没落》(载《半月文萃》1943年12月第2卷第5期)等;有军事问题,如《敌寇军事南进的阴谋》(载《西南青年》第2卷第5期)、《日本军事法西斯论》(载《世界知识》第7卷第2期)、《日本最近军事动向》(载《广西日报》1943年11月1日)、《日本南侵北攻下的出丑》(载《战时日本》第2卷第5期)等;有经济问题,如《日本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载《时事类编》第1期)、《日寇通货膨胀的新发展》(载《战时日本》第5卷第3期)、《日本劳力资源的悲哀》(载《广西日报》1943年8月6至8日)、

《日本产业统制的三种制度》(载《广西日报》1943年9月3日)等;有外交问题,如《日本战时外交及其动向》(载《广西日报》1943年1月10日)、《最近日寇的外交动向》(载《半月文萃》1943年第2卷第2期)、《日本最近对美外交剖析》(载《世界知识》第10卷第5期)、《日本军部行动派的外交主张》(载《战时日本》第3卷第6期)、《日本对美国软硬并施》(载《战时日本》第3卷第3期)等;还有社会、文化及其它问题。从横的方面而言,作者又把上述问题各列出几个小问题,由浅入深,条分缕析。以经济问题为例,就分好几个方面:其中包括工业,如《日本战时中小工业的没落》(载《广西日报》1943年9月23日)、《日本侵略战争中工业危机的发展》(载《中苏文化》第2卷第2期)、《日寇最近的钢铁业与造船业》(载《广西日报》1944年6月18日)等;农业,如《日本农村经济的特质》(载《战时日本》第2卷第3期)、《日本粮食增产的政策批判》(载《大公报》1943年9月5日)、《日本半封建的农业经济》(载《战时日本》第4卷第3至6期、第5卷第1、2期)等;金融,如《日本金解禁与中国》(载《新东方》创刊号)、《日本战时金融统制的剖述》(载《广西日报》1943年10月3日)、《日本货币的新攻势》(载《战时日本》第2卷第4期)等;财政,如《日寇南进的财政状况》(载《战时日本》第4卷第6期)、《战争财政论——如何筹划战费》(载《广东省银行季刊》)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斐如的日本问题研究,不论其广度或深度上,堪称是我国抗战文化研究中,屈指可数卓有成就的大家。

第二,爱憎分明,笔力犀利。宋斐如在全面深入研究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问题的同时,也浓墨重笔,义愤填膺地抨击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其中有《日寇在东北的残杀与暴行》(载《民族战线》第八期)、《日本侵略下的东三省农业生产》(载《新东方》“二周年纪念特刊”)、《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载《战时日本》第1卷第2、3期)、《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载《时事类编》第2、3期)等。《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是这方面的力作,写于1937年9月,副标题“为纪念九·一八而作”。全文分为:一、日本占领东北六周年;二、日本狰狞面目的表露;三、“经济统制”下的掠夺;四、武装移民强占民田;五、苛捐杂税;六、毒化政策等。作者满怀对惨遭日寇蹂躏的东北同胞深切同情之心,以大量血淋淋的实例和精确的数字,力透纸背的笔触,愤然控诉日寇对东三省民众的残酷迫害与横征暴敛,并以公开售卖鸦片、广设烟馆妓院、推行奴化教育等手段毒害民众的罪行。读来触目惊心,激发起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坚定了抗日救国意志。对日寇的侵略行径,宋斐如疾恶如仇,痛加揭露,而对于为虎作伥的投降论调,他更是大义凛然,迎头予以抨击声讨。如面对汪精卫的叛逆言行,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立刻撰写了一系列讨汪的战斗檄文,入木三分地揭露其叛国投敌的丑恶嘴脸,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其中有《汪逆兆铭的悲哀》(载《战时日本》第3卷第6期)、《汪逆卖国与我们的觉悟》(载《战时日本》第4卷第1期)、《本多与汪逆的魔

舞》(载《战时日本》第5卷第3期)、《汪伪“参战”前后的乖谬》(载《大公报》1943年8月18日)等。《汪逆卖国与我们的觉悟》中作者指出的六点“觉悟”，一针见血、切中流弊，不啻是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一剂强心针，在当年具有指导鼓动作用，于今也有认识参考价值。

宋斐如在狠揭日寇侵华暴行和痛斥汪逆投降言行之余，还撰写了《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载《战时日本》第1卷第2、3期)、《冀南豫北游击队英勇抗战的一斑》(载《抗战》第67号)、《台湾民主国对日抗战》(载《人民导报》1946年5月26、27日)等一大批文章，热情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战斗精神；撰写了《七年来的教训与进步》(载《战时日本》第1卷第2、3期)、《上海事变的检讨》(载《新东方》第3卷)、《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剖述》(载《中苏文化》第1卷第12期)、《第四期抗战的敌我情势》(载《战时日本》第1卷第4期)、《新年·新阶段·新觉悟》(载《抗到底》第六期)等评论，及时总结各阶段抗战经验教训，指出前进方向；撰写了《对日集中进攻罢！》(载《广西日报》1943年7月8日)、《抗战必胜的理论根据》(载《时事类编》第4期)等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懈抗争，夺取抗日最后胜利。这些文章，对推进我国伟大抗日救国运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第三、意识超前，见解独到。社会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需要敏锐的思辨能力，才具有真知灼见，不致人云亦云。宋斐如在日本问题上卓有建树，既得益

于其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和不折不挠的研究实践,更来自其勇于探索,善于独立思考。这主要表现在其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将抗战期间国际形势的框架,总格局略述于下:

抗日战争八年中的前四年,我国是单独对日作战的。其时苏美两大国尚未卷进到战争漩涡里,英美与日本有矛盾,也有准备与日妥协、牺牲中国的举动。尤其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代表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鼓动了日本在东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气焰。日、美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日趋严重。但美国此时仍幻想置身于战争之外,或尽可能地推迟太平洋战争,便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谋求通过谈判与日本达成妥协。日本虽然也已下决心“南进”,为夺取南洋地区不惜与美国开战,但为麻痹美国,并企图通过日美妥协以尽早结束中日战争,也赞成同美国谈判。于是,1940年底,日美谈判以非官方接触开始。此后,日美谈判虽继续进行,但日本以谈判当作备战之烟幕弹,美国亦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更把它当作远东慕尼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虽然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建议”、“临时协定”等,但谈判毫无进展。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美军损失惨重,日美谈判收场,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此同时,鉴于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的危险性日趋严重(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苏联虽同情中国,但担心日本北进,

为避免在西方和东方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决定对日缓和。而日本亦想集中力量解决对华战争和准备南进，暂时对苏联取中立态度。苏联遂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日寇侵华气焰更加嚣张，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要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身处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中保持头脑清醒，绝不能迷失方向，必须抗战到底。

宋斐如有鉴于此，适时撰写了一系列国际问题研究论文，透过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局势的科学分析，独辟蹊径，廓清流弊，一针见血地揭穿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诡计，警示世人。这些文章中较侧重于论述国际关系，除了“中日关系”，主要还有“日德关系”，如《德意军事同盟与日本》（载1939年《广西日报》）、《日本军事代表团赴德意》（载1939年8月1日《战时日本》第2卷第6期）、《日寇欲勾结德国平分世界》（载1941年6月1日《战时日本》第5卷第2期）等，抨击日本同德国勾勾搭搭，其野心在于与德国平分世界，建立其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在“日苏关系”上，则有《苏日渔约纠纷的前前后后》（载1939年3月16日《战时日本》第2卷第1期）、《日苏最近的纠纷》（载1938年5月20日《时事月报》第18卷第10期）、《日苏谈判及其问题》（载1939年12月16日《世界知识》第10卷第6期）、《苏日会马上爆发战争吗？》（载1943年8月《半月文萃》第2卷第2期）等，阐明日苏两国鉴于各自的需要，不得不暂时掩盖矛盾纠纷，缔结“中立条约”，目前日本不可能进攻苏联，所

谓日本北攻苏联是假,实则蓄意南侵英美等国。上述作者的科学论断,已为后来的事实所佐证,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而在“日美关系”的论述上,尤为突出,如《美国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机会》(载1938年8月16日《战时日本》第3卷第1期)、《日本对美国软硬并施》(载1939年9月16日《战时日本》第3卷第3期)、《日本最近对美外交剖述》(载1939年12月1日《世界知识》第10卷第5期)、《日本南侵北攻下的出丑》(载1939年7月16日《战时日本》第2卷第5期)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均早于日本1941年12月8日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二三年前,正当日本诱惑麻痹并处心积虑备战美国,而美国则毫无觉察甚或助纣为虐之际,作者便不厌其烦地阐明:日本对美国所采取一系列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其意在于对美国施放烟幕弹,为侵美战争作准备。在《美国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机会》一文中,强调指出:“太平洋的血战,自所难免,美国及其软弱的邻邦,将遭遇列强的压迫”,“假使美国也与英国同样屈服于恫吓,日本将更得寸进尺地排挤”。鉴此,“美国绝对不能坐大了日本”,务必主动制裁日本,因为“美国今日制裁日本比苏联容易得多,他可以不动一兵,不发一炮,使倔强的侵略者屈服,因为日本在华的经济开发还没有成功,离开了美国资源及军火的供给,就无法进行战争”。作者进一步告诫美国,指出“美国今日尚可以运用轻而易举的经济制裁办法及与英、法、苏联合外交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就范,若再过些时候,到日本的羽毛丰满之时,美国即欲

保持其本国之安全,也恐怕不可能了”。最后,作者语重心长,强烈呼吁:“我们代表中华民国的全部人民,以极诚恳的态度,敬告美国当局及人民:美国绝对不能坐失制裁日本强盗的机会!”真可谓料事如神,一语中的!可惜当年美国无视这些忠告,预言应验,自吃苦果。

值得我们指出的是,被誉为二战史上经典战例的“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8日),日本仅用了两个多小时便把神秘精良的美国海军基地炸毁,致使美军损失惨重,并蒙受奇耻大辱。可见日本早有准备,战前的情报工作也做得十分准确。两年前我有幸赴夏威夷亲历其境,纪念馆的讲解员告诉我们,说日本当年靠的是大量移居岛上的日本侨民提供美军的情报及日本间谍的策应。而早在1938年8月16日发表的《美国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机会》中,宋斐如便十分清楚地指出:“日本侵略者的魔手,早已伸展到美洲,日本对于美洲移民的积极,及近来日本间谍在美国的活动,其情势之严重并不下于日本四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企图”。这决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作者善于审时度世,具有超前意识。

## 二、力促祖国统一之践行者

台湾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日寇所占领,日寇为了使台湾人“成为忠良的日本人”,即受日本人支配、奴役的忠实奴仆,着手实行所谓“同化政策”,开展奴化



教育的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更变本加厉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加重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精神强制,把台湾民族推进灭种的严重危机之中。

宋斐如自小生活在日寇如此残暴统治之下,虽然被强制奴化教育和训练整整20年,但爱国情怀愈加炽热,向往祖国之心无时不在。终于在1922年摆脱了日寇的魔爪,冒险悄然返回祖国在北大就读,并从此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爱国事业中。1927年,在北大求学期间即与张我军、洪炎秋等进步台湾青年创办期刊《少年台湾》,“架起台湾与大陆间资讯传播的桥梁”,向台湾岛内宣传祖国。抗战期间,宋斐如同谢南光、李友邦、谢东闵、丘念台、李纯青等在重庆发起建立“台湾革命同盟会”,这是台湾知识分子在大陆组成的爱国抗日政党,由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光复团等六个进步党派和团体联合组成。宋斐如为三人常委之一。其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奋斗目标是争取实现台湾的自由、平等、进步和康乐,同盟会在推动大陆和台湾抗日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巨大。抗战胜利后,宋斐如就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期间,提出要“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要教台湾人民以“长江大河、五岳长城的雄壮”,“学习做人、做主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还通过其创办的《人民导报》,号召台湾要搞光复后的经济建设,更要加强祖国的文化教育,和祖国“溶化在一起”。为

两岸的统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宋斐如在促进两岸统一的过程中,不仅运用刊物做好舆论引导作用,而且通过政党和自身职务做了大量组织发动工作,还以饱蘸爱国激情之笔触,撰写了感人肺腑的论文,抒发其热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赤子之心,概括起来,可以分为:

(一)愤怒控诉日寇占领台湾的种种恶行,强调台湾是祖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呼吁祖国毋忘台湾。其中较突出的有:《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载 1930 年 10 月 10 日《新东方》第 1 卷第 10 期)、《日本资本在台湾的发展》(载 1930 年 11、12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1、12 期)、《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载 1942 年 4 月 17 日《新华日报》)、《毋忘台湾》(载 1943 年 12 月 3 日《广西日报》)、《台湾在急激演变中》(载 1943 年 12 月 3 日《广西日报》)、《太平洋战争中的台湾》(载 1943 年 5 月《半月文萃》第 1 卷第 11、12 期)和《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载 1930 年 3、4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3、4 期,译文)、《台湾民众的悲哀》(1930 年 9 月出版,译著)等。

《毋忘台湾》堪称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在历数日寇残暴蹂躏台湾人民诸多罪行之后,着重在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给予揭露抨击。指出:“第一、在政治上,敌人的政治制度本来是很野蛮的,”“而对台湾的统治尤其野蛮,”“在残酷的‘六三法律’支配下,台湾的统治可以说是一种暴君的专制;个人生杀予夺完全操在一个人手上。而这种专制

的统治,是透过警察制度执行的。警察的权力最大,他可以随意对人民加以逮捕或殴打,随便侵入民宅,因此,常常酿成反抗的事件;”“第二,在经济上,敌人不只是实施经济的剥削,而实在是超乎经济以外的掠夺”。对台湾的农副产品实行垄断,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比如“强占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栽种甘蔗”,收获后“数量价格完全由会社规定,由不得老百姓作主”,“所以一般蔗农都叫苦连天,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三,在教育上,敌人所能给我们的只是奴化教育,而待遇上尤有厚薄之分,”中国学生动辄遭欺侮迫害,“所以常常闹出民族的斗争,”“这不过是指其一端,其实在教育上的束缚毒害,又何止待遇上的不平而已。”

接着,作者进一步谈到:“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看,日本统治台湾用的是半封建的野蛮的方式,我们五百多万同胞所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所以48年来,民族解放的武力斗争,始终没有中辍过。但大多数是地下的孤立无援的行动,很少得到祖国同胞的了解。到了今日,才能够向祖国同胞公开提出光复的口号,希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在祖国方面过去四十八年,我们一直表面缄默着,到今天才能公开的呼号,台胞的悲痛,可想而知!”亲爱的祖国,“勿忘台湾”!

文章最后,作者向祖国再次强烈呼吁:“六百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来。我们很清楚,我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更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也有权利要求祖国表示收回台湾的决心,宣布台湾是一块失土,和其他沦陷省份

一样看待。我们更要求祖国赶快完成收复的设施！”

读着读着，我们的灵魂深受震撼，仿佛看到一个濒临水深火热之中的弃儿，正在伤心欲绝地向着他那多灾多难的母亲，诉说着离情别绪，迫切呼唤早日将其从苦海中拯救出来，回到母亲的怀抱中。情真意切，发人遐想！作者正是通过触目惊心的例证，丝丝入扣的论述，如诉如泣的字句，充分表达其将台湾的命运跟祖国的抗战大业紧密联系起来，希望祖国早日打败日寇收复台湾，抒发其热情高涨的爱国情怀。

（二）重申台湾与祖国“血浓于水”的关系，为如何收复台湾出谋献策。其中，尤以《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载《新华日报》1942年4月17日）、《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载桂林《大公报》1943年3月30日、4月1日）、《台湾农民的惨痛》（载重庆《益世报》1942年4月6日）等最为突出。《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系宋斐如在重庆“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上的发言稿，《新华日报》发表时特加编者按语，称“本文系台湾革命同盟会常驻委员宋斐如先生在台湾光复宣传大会的演说，其中叙述台湾人民的战斗经过，并对日寇统治台湾的方式和台湾解放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兹特刊载如下，用供内地同胞的参考”。

宋斐如讲话一开始，便再次深刻阐明台湾跟祖国“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他通过深入系统的论证之后强调指出：“从地理上说，大家都知道，台湾距离福建很近。从厦门

坐船到高雄只要四个钟头,两地相隔不过一衣带水,台湾实是全国的海防屏障。从人口上说,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台湾与祖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从历史上,地理上,人口上这三者观察,都可以证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怎能让它受敌人的宰割呢?”“还有,台湾除了上述三点之外,尚有一个中华民族所不能忽略的特点,就是它始终是抵抗异族统治的坚强根据地。”可见,“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与祖国关系之密切,”血脉相连,无法分开。言简意赅,有理有节,无可辩驳。

宋斐如在讲话中,还再次无比愤慨地控诉揭露日寇摧残毒害台湾人民的血腥暴行和阴险手段,表达台胞“要求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来”的强烈愿望,希望祖国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解放台湾的神圣职责,早日“使五百多万呻吟于敌人魔掌下 48 年的台湾台胞拨开云雾,重见天日”。

为此,宋斐如为祖国收复台湾建言献策,提出:其一,纠正“以为台湾革命运动向来不统一”,要求只有“先统一起来”,方能进行收复准备的“错误观念”。他认为“自去年以来,由于祖国抗战的关系,各团体完全统一,各党派的意见也完全一致,大家都在台湾革命同盟会这一组织下努力进行种种革命工作”。“因为同盟会是代表五百多万同胞的一个总体,所以我们主张在省政府成立以前,它要具有政治机构性质,在省参议会未成立以前,它应该是代表民意的机关”。其二,“要求祖国赶快完成收复的设施,如正式成立省政府,省党部、团部,设置参议会及国民参议员。有了

这些设施才算奠定了未来的基础,集中党、政、军及社会文化教育各界的台湾人才,而发挥更大的力量”。其三,台湾“要求回到祖国”,“工作相当艰巨”,不仅“需要五百多万台湾同胞的努力与奋斗,同时也需要靠祖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协助”。因此,“收复台湾失地,已不只是台湾人民的责任,而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责任,”务必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这些建议,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肯贴切,颇具可操作性和指导性,表现出作者在如何收复台湾,促进两岸统一方面,早醒早觉,深思熟虑。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敬佩。

如果说,宋斐如在上文关于收复台湾的献策中,较偏重于思想认识和设施建构的考虑,那么《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一文,则突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深层探讨。他开宗明义指出:“收复台湾须自收揽台胞人心下手,而收揽人心之妙,在于运用民族主义。”接着,加以深入分析,认为“台湾人民的家族观念极深,每一家或一族,皆与‘唐山’保持着族谱关系。用家族关系去联络台胞,容易亲密混成一片”。而家族和宗族构成了国族,密不可分。“但此台湾宗族与国族的连锁,”却“为日寇离间民族政策所遮断,故欲运用宗族关系以发挥民族主义于台湾,须先接上宗族与国族的联系。其方法就是祖国积极宣布:台湾人即中华民国国民,祖国已为收复台湾而苦心孤诣。首先要着,就是集中台人的力量”;而“收复台湾的第二要着,应该是争取‘台胞内向’。争取台胞内向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民族主义的运用。台胞受治于日寇达 48 载之久,加以政治经济的压迫,其民族精神不无多少变化。故欲争取台胞内向,必须先复活台湾的民族主义。”

最后,宋斐如强烈呼吁我国当局,务必高度警惕日寇的人心争夺战,指出“现在敌人不但在积极谋同化台胞,且欲利用台胞为桥梁,继由宗族关系,来怀柔我沦陷区的同胞”。“其心叵测,良可警惕,愿当局三思现势之转移,考虑适当办法,以相抵制”。

凡此等等,宋斐如有关收复台湾的意见,可谓忠心赤胆,金石之言。在当年团结台湾同胞,争夺抗战胜利上,发挥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今天,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争取台胞民心方面,值得我们记取。而对于承袭日寇衣钵的台独祖师爷李登辉之流的媚日勾当,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迎头痛击。

(三)关心光复后的台湾建设事业,提出要加强祖国的文化教育,和祖国“溶化在一起”。较主要的文章有:《如何推进台湾的生产建设》(载《人民导报》1947年1月9日)、《谈谈台湾农业的改进》(载《人民导报》1946年9月29日)、《台湾教育施设的现阶段》(载《人民导报》1946年9月22日)、《台胞应踊跃参加师范教育》(载《人民导报》1946年3月29日)、《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载《人民导报》1946年1月11、12日)、《如何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载《人民导报》1946年12月2日)、《台湾心理建设问题》(载《人民导报》1947年2月23日)和《我们要溶化在

一起》(载《人民导报》1946年5月31日)等。以最末这篇文章为例,这是作者抗战胜利后在台湾省训团上的讲话。篇幅不长,立意高远,开启心扉。开头介绍其本人早年离台赴祖国大陆的原因和目的。他说:“兄弟是本省南部人,从小就离开台湾有25年之久,”“因为我们不满意日本政府,到祖国去发动抗日的工作,另与台湾方面时时取得联络,做复兴台湾的运动,日本政府很注意我们,”“这期间在国内奔走呼号的同志们很苦,”“但一回到台湾同胞受日本政府的欺侮压迫,其痛苦自比我们更多,”因此,“兄弟在国内二十多年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因为台湾的人民,也就是祖国的人民,台湾的土地,也就是中国的版图。”一言以蔽之,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毕生为之奋斗之目的,便是让台湾回归祖国,实现两岸的统一。

宋斐如接着谈到,抗战胜利了,“台湾已重返祖国,亲兄弟‘久别重逢’,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但是,“台湾过去50年离开了祖国,在历史的认识上难免有一部分脱节”。加之沦为“日人殖民地受了教育的影响”,“日人实行文化封锁政策致使大家对祖国文化不大明了”。其实,“祖国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吸收世界进步的思想,实是光辉灿烂文化”,即使近50年来,“各方面都有进步”,如“从社会思想来讲,有五·四运动”,“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这种文化运动的成果值得我们来接受”。总之,“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是这般光



荣悠久,我们更要去接受”。为此,他提出在进行战后台湾积极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台湾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要加强祖国文化教育,“更要虚心接受祖国的文化”。

在这篇讲话中,宋斐如还特别指出抗战胜利后,台湾出现的不和谐现象:“近来在社会上舆论上,看到本省人与外省人有些隔膜,国内同胞对台胞有种种批评,而台湾同胞对外省同胞也有许多不满”。他认为,虽然“两方面都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许多往往不能为我们理解,这是难免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否让它继续存在,或是想办法来消除呢?”答案是后者而决非前者。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宋斐如先引用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教导:“构成民族的要素,就是血统关系,国家是由家族到宗族,再由宗族到国族结成的。”接着指出:“我们可以说普通台胞家族的族谱中,看出从前台胞一部分是从福建漳泉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广东潮州梅县来的,我们之所谓‘唐山’就是我们的祖家。我们的所谓‘唐山人’就是指内地人,这就可以证明我们同胞是一个血统,同是一个民族。”结论是,要消除台湾光复后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今后要互相亲爱,互相团结”,更要和祖国“溶化在一起!”

宋斐如这些铿锵有力的爱国诤言,充分表现了他既爱台湾,更爱祖国,始终坚持把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富强紧密相连。虽然已逾半个多世纪,但今天仍光芒闪烁。尤其对于目前台独分子煽动、挑拨台湾族群的对立冲突,以达到其分裂祖国的野心,更是一面照妖镜。至于他们硬把二·二

八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治的爱国民主运动,扭曲成“台湾人反抗外省人的流血大冲突”,企图借宋斐如等人被杀一事来为其分裂活动造势,这是对宋斐如的无耻亵渎,不值一驳!

综上所述,宋斐如一生为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为驱赶日本侵略者,收复台湾,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大业奔走呐喊,献青春,洒热血,功标青史,不愧为台湾人民的优秀儿子,炎黄子孙的精英!确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者。但鉴于时间关系和水平限制,未能阅读其全部著作,细心领会其精髓,难免遗珠断璧,甚或错误,有待日后补正。

2005年4月急就于深圳益雅斋

## 冯玉祥与宋斐如相处的日记摘录

冯玉祥

**1931年**

**2月21日**

不看新书、新报如何不落后？须赶紧设法去购买，如《大公报》、《商报》、《京报》，如《新东方》，如《新亚洲》，如《青年使命半月刊》等，定好寄至某商号转最好。

**1932年**

**4月30日**

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企图与日寇协调对我实行瓜分共管，他们还欢迎，我真痛恨！

**5月25日**

此次到泰山，主要的为了求学，充实革命理论。

7月4日

见宋(宋斐如,编者注,下同)先生等,谈政治经济报告的事,定为每星期一、三、五来谈,下次将谈研究的纲领及其办法。

7月11日

读经济学一段。宋说经济学的动静两点,颇有意思。

7月13日

同宋谈经济学,同邹谈唯物史观。时间虽只一小时,然获益不少也。

7月22日

宋先生谈了许多的实际问题,都是关于经济的,很有道理,同时又很引发兴趣。

8月16日

同宋先生谈经济学,极有意思。读过的书要时常复习,以免忘记。……托邓友仁先生订购日本经济杂志。

8月20日

同宋先生谈洛桑会议及沃大瓦会议之事。知道这两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心中非常高兴。这些国际事件都得用心研究。

**8月27日**

宋先生报告国际政治、经济情形甚详，又谈及南美洲等地革命浪潮之高涨，有一日千里之势，堪为注意。我以为这是好现象，不革命没有出路。

陈豹隐先生来谈蒋、张、汪三同志情形甚详。

**8月29日**

本日开始听陈先生讲书，又听宋先生教日文。

**8月30日**

在午前十时听陈先生讲书后，拟赴卧云台听宋先生讲日文，殊因宋先生之夫人来此，宋先生已去车站矣，故未学习。

**8月31日**

今日听陈先生讲政治，又听宋先生讲日文。

**9月1日**

早七点至十点，听陈豹隐先生讲书。十一点至半点，读日文。见宋先生的夫人，系师大毕业。

**9月6日**

日文因宋先生上山，未讲。

### 9月7日

早七点半至十点半,读书。未学日文……

宋来谈二事,一、其夫人教书事,二、住的地点事。均说了个大概,唯未说明月津若干,不妥,必须说明为好。

### 9月8日

十一点至十二点,听日文,本日与宋先生谈,请其夫人教弗矜、理达之书,每日教三点钟,唯月津未定耳。

### 9月11日

十二点,同陈(陈豹隐,编者注)、余(余心清,编者注)、雷(雷季尚,编者注)、张、孙、宋六位共餐,谈些各方情形,至午后二点多始散。陈先生走,回北平了。

### 9月13日

早七点半至九点半学日文。十点至十一点经济学。

……如五贤祠收拾好,宋先生等四人均移来,则近的多,谈话亦方便。

### 9月16日

本日八点学日文至九点半。十点至十一点半,宋作经济报告,甚详。

午后三点,宋往北平,带洋一百五十元。观其发信找人一点,不免有阅历尚浅之处,某既请准其又婉拒之,可以证

明也。

**9月24日**

午后未开会,因宋先生未来故也。

**9月26日**

宋先生夫妇及杨先生来,杨(杨遇夫,编者注,下同)系长沙人,谈文法等事件。

**9月30日**

本日学日文,学汉文。午后同徐、宋、张、邹开讨论会,……宋、邹、张、徐、杨之讲书,我以为极好。

**10月1日**

早起,学日文至十点,至十二点学文法。……

午后四点,讨论会,宋、张、徐、邹、邓六人,详谈印度洋及德国之事。

**10月4日**

本日学日文,学经济学、国文、学社会进化史。

我同宋先生、杨先生均谈时间不少。

**10月10日**

本日读书虽按表进行,然徐因方来,午前未能讲课,而

宋先生亦未讲。……四点至六点，开会讨论调查团报告书。

10月26日

张、宋、徐三位来，讨论反调查团书的写法。

11月12日

刘纯德往北平，给宋带五十元，邹一百元，为医费，连前有二百元了。

11月14日

我近日因张、宋、邹之走，读书太少了，自本月应另改表也。

11月19日

自十点同徐、王、宋、张四位读《反调查团报告书》，自绪言至本文四章，均张先生（张勃川，编者注）写的。自五章至十章，均宋先生写的。因为九、十两章关系太大，故改为携回详看，至六点半始散。

徐先生颇细。张先生心似略。宋先生文字活而轻视人，人似尚慎重。

11月30日

就在这里把本月的事清算一下吧！写出如次：

一、……



二、作《反调查团报告书》，宋、张两先生颇努力。

12月5日

宋先生及其余诸位均搬到本院来住，为防有事发生之不便可免也。

12月15日

宋先生讲日文，我觉得他只愿教的快，我则以为慢点好，因少了可熟也。……

宋先生午后讲经济学，是用政治经济学教程，系李达同某译的，先讲生产力及生产关系。

12月24日

午后三点开会，张、徐、宋、邹均到。宋报告国际经济后，邹竭力批评，颇有不相上下之势。张之报告亦有意思，我均记有笔记也。

1933年

1月8日

《反调查报告书》换面已成。

1月16日

……宋先生买来好多日本文的书，不知自己几时方能

看完,努力呵,努力!

**2月11日**

谈谈决心革命之所以。宋先生来谈,我请他在政治、经济、法律、白话文四事上设法找人,定妥后他回北京,亦给了他三十元川资。

**2月22日**

见宋先生端华同白若水、粟寄沧(法学院)、陈君平(北大)三先生,皆陈先生介绍来的。陈为望都人,白为湖南人,粟为广西人也。

**2月23日**

宋先生带三人昨日到。

**2月25日**

见宋先生,谈找人讲法律、讲白话文的事。

**2月27日**

午后读社会进化史。因宋先生昨晚回平,带洋百二十元。

**2月28日**

……这一个月做了些什么事呢?……—请妥了宋、陈、白、粟四位先生来讲书。

3月15日

……宋先生回来。

3月24日

去年本日住泰山，今一年矣，山海关失守了，热河失了……

8月18日

我们在张恒之口号是“抗日救国”，现在泰山口号是“读书救国”。

8月25日

……午后三时，宋端华先生与陈定民先生至。宋先生谈现代世界潮流与我等今后应负之责任。

8月26日

早饭后8时，会宋端华先生。余问陈豹隐先生近况，最近可否来泰岳一游，渠详为余告之，余先渠曰：陈先生为人做事，勤劳耐劳，惟待人太为谦逊，有时使人不安。陈先生有暇，拟再请之来山授学，渠允转达。

8月27日

八时至九时半，宋端华先生讲日文、经济学。

九时五下分至十一时，陈定民先生讲作文与修辞……

**8月29日**

七时早餐。宋端华先生在卧云台讲日语、经济学。

**8月30日**

七时至八时,宋先生讲日语、经济学。八时至九时,陈先生讲普罗文学。

**8月31日**

六时早餐。七时……。德全自本日起随宋先生学日文。

**9月6日**

六日午后讲《春秋》,范枢铭先生。《资本论》,宋先生。白话文,陈先生。

**9月7日**

……本日给范先生送洋百元,帛二匹。宋一百五十,陈一百,为上月的。

**9月19日**

午正,同宋端华先生谈研究室的办法:一、须有长久性。二、须有一固定地方。三、如何能推进一切。四、注重研究讨论。五、找人才。我以为此事关系极重大也。

9月22日

早起,宋先生报告世界经济会议之始末,极详细。我虽看报,并不能详细,还是有人讲说为好。

9月23日

早起,宋先生未作报告。读白话文,……

10月7日

本日宋、赵、徐均有报告。宋的报告写完了。

10月11日

同宋谈研究室的办法,拟确实去办,不知如何。

10月13日

报告的事,宋先生说罗斯福之复兴计划。赵先生报告是中东路之出卖台湾等。……

10月15日

请宋先生等作30篇白话文讲演文章,30篇为中初级,30篇为高级将领,或作或选,均无不可,惟限于抗日,不怕死之题目,不知如何?

10月20日

……四、报告事件须自己拟些题目,并同先生们商议

一次,按之报告。

**10月25日**

宋先生讲货币……

**10月27日**

本日粟先生报告农村复兴事……

宋先生报告西木拉会议事。……午后苏先生讲西洋史

……

**10月28日**

本日是徐、赵两位报告新疆事件之危险……

宋、徐、赵、粟、陈五位费用,本日送交……

**11月15日**

本日读书,宋讲“经济学”,陈讲散文,范讲《左传》。

**11月18日**

……宋端华先生由北平来,谈陈先生的意见。约六七点钟之谈话,写来对我说了二个钟点,非有不能办国家的事。

**11月30日**

算算这一月作的什么事……三、研究班已成立。

12月6日

早读《资本论》，宋先生讲的。

12月24日

经斗母宫、白杨山口到三阳观，同粟先生及宋先生等午餐。

12月27日

本来约宋先生在午后讲书，因到三阳观来，故未讲，午后六点，崔贡琛先生来山上讲书，为大战史。

12月30日

午正，请宋、粟、赵、陈、徐、孟宪章诸先生用饭。

1934年

1月6日

早起读书，粟先生报告土地，宋先生驳他，不觉有什么意思。

1月8日

早读书，宋讲《资本论》。陈定民先生讲李大钊先生的论文。

1月12日

归来即听宋先生报告通货膨胀事。……我在研究班读了“经济学”八篇，“政治学”七篇。

1月13日

本日仍是报告。宋的报告为通货膨胀。……午后研究班来谈武术。

1月15日

早起，宋讲《资本论》的目录。……我同研究班讲革命的爱……

1月17日

宋、赵二位所讲的经济、政治篇子，须要三份来仔细看看。

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此三事拟请人来讲一讲。世界地理亦想请人来讲一些。

星期五、六报告改为二次，共四次，每次一点半至三点，定可有个结果。如此即不单一二三四之功课，亦无不可也。

1月18日

赵先生讲“进化史”……同宋先生往接李季谷先生去。李先生绍兴人，国内毕业到日本师大，回来教书后又到英



国,又回来教书。此次……

**1月26日**

宋及赵、徐、陈报告《一九三三年之世界经济回顾》。

**2月6日**

李先生讲中日战史……《春秋》今日讲完……同宋先生规定讲书办法,另拟一表。

**2月23日**

陈定民先生已走,宋先生往北平买书及作书架二事尚未办,不可忘也。

**3月2日**

午后,宋先生报告世界经济之事。后赵先生报告西藏之情形……

**3月3日**

宋先生等午后二点报告。……后陈先生均平报告美银提高之事甚详,宋有所补充。新买的三百多元的书渐渐来了。……在普照寺门前见宋先生之友瞿某、袁某,未多谈。闻陈先生谈瞿某同美人某同学于清华学校,因瞿较美人所考皆优,美人某在清华为教育科,故不请瞿云云。中国人之脑子不劣于外国人也,明矣。

**3月5日**

宋先生讲《资本论》之复习。……午后五点，同研究班讲话，……

**3月9日**

范先生来讨论宪法稿，但未发言。陈先生对应字提出讨论。

孙、崔、陈、徐、宋都有意见发表。

**3月12日**

早起读书，是宋先生讲《资本论》剩余价值论。

十一点读“国际政治”……午后二点，范先生来谈《春秋》……午后三点半，陈定民先生谈梁启超的“知不可为而为”……胡适的《为什么读书》。

**3月19日**

本日是读宋先生等要印的书。至十一点……

**3月26日**

读书，午前时间宋、赵来谈中国政治，一九三三年的。

**4月13日**

早起即读书，赵先生、宋先生报告。宋为计划经济事，赵为云南事，……

4月22日

同宋先生谈，得悉唐某在广西之事。

4月29日

我在近贤村同宋先生谈台湾人之不自由的情形及我的三点意思：一、经济学的如何写，纲目如何，有何意见，二、文章的写法。三、陈先生出国的事。又说到请心理学先生之事。约有一个钟头的时候。

5月10日

同宋先生谈两次话，有些很有意思的事。

6月4日

早起后即见崔、王、宋三人，谈拟写《历年作战之回顾》，……

6月14日

宋先生本日回来，谈陈、白、许、黄、李五位的情形。

7月27日

午前同宋、徐、郑三位商功课办法，并将陈先生留下之五条研究一回，宋先生即开始报告意大利的种种情形。未完。

8月3日

早五点半开讨论会,宋、徐、郑三位到。宋续前次之意大利的统制经济。

8月17日

八点半开讨论会,宋报告各国经济情形,甚详。

8月20日

早八点,宋先生来讲经济学,至十点。

8月27日

陈豹隐先生回北京,……同宋先生谈些功课的事。

8月30日

一、物理先生尚未回。二、教理化教员已上课。三、宋先生送来《胶东游记》序文。……

8月31日

昨夜读宋先生赠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看了七封信,并加以圈点,以期有些印象留于脑海中。

9月19日

陈豹隐先生赠讲话二本,宋端华自北平回来,谈国语先生的事。

**9月21日**

早8点讨论会,郑先生政治经济报告为《国联与中国之政治》,合作内的不成,外的不成,一条一条的分析,很有意思,须要特别注意。末了宋先生补充的事亦有些意思。

**9月22日**

本日午前8时开讨论会,先是赵先生报告日英同盟之复活的分析……。宋先生报告C国加入国联之分析,归结中国之日坏,此后更不能有任何好处。

**10月2日**

十点半,宋先生讲日文法。

**11月1日**

午前宋先生来,谈《胶东游记》,规定改后专人送印办法。

**11月14日**

宋、郑、高均按所定时刻教书。

**12月10日**

宋、高二位均未上课。

12月11日

宋先生午后往北平去。

1935年

1月1日

宋先生的信中，装了黄、薛二位的信中，黄说只见“营私忌才”四字。……

1月11日

宋先生本日由平回来。

1月13日

宋先生同田先生、赖先生来，田为安平人，赖为内江人。谈在今日政府之下，国家民族所吃之大亏，又说道说实话之得罪人。午后，把读书之事又重新定规一次。（赖先生即赖亚力，宋斐如去日本留学后，由赖亚力接替宋斐如任研究室负责人。编者注）

1月31日

……二十二、《胶东游记》印出。……

2月1日

同宋先生端华谈其到南京的事及见孙（孙哲生，编者注）、邓等事。

**2月13日**

宋先生由北平来了,谈了些书的事。

**2月14日**

同宋先生谈甚久,为新书的事。

**2月15日**

同宋先生谈新写之书约二个钟头,有些结果。

同宋先生对新书,我写了十七条意见,以打鬼为主,其次则为不可做图表也。

**2月16日**

同宋先生对书二次,所谈甚有意思。王先生去,赠……,宋、何二位送至车站,我送至山下三叉路口。

**2月17日**

宋端华先生来对书毕,又谈读书各事:一、注重军民之希望常新,以拿破仑为比方。二、生活一切须坚持。三、读书时间宜少,尤须在社会科学,注重实际有用。四、我把信五封均写李、孙、简、梁、马五位,均为介绍宋的。

**2月18日**

八点半开始上课,为经济学,详论货币的情形。九点半同宋先生谈他走的事情。我写的五封信介绍给孙、李、梁、

马、简五位，有无效果，诚不敢肯定。

### 2月19日

何、宋二位来，把写的书拿去，我亦说了些意见，告知他们二位。

读经济学和比较宪法，赖、郑二位均能按书详说。

### 2月28日

算计算计这一月办的……都是什么：……五、宋的留学去，……均办了。

### 3月15日

宋斐如自上海、南京回来，已同中山文化馆定有二年的合同，月支一百五十元，聘为日本政治经济研究员云。

……

宋谈话如下：一、见孙（孙科，编者注），谈□次话，看他写的东西。二、见马超俊，谈话数次，并有精神团结事。三、见杨某，谈话，是三民主义的理论家。四、见李石曾，谈话。五、见薛德煜先生，谈话。

### 6月9日

宋先生往济南，不知何事。



**6月20日**

宋斐如先生自日本来函，并有剪报，详说良心之不安，并问我之所以。

**8月23日**

陈……讲书，赵先生澄之已走矣。……说到宋的事，只说到写书的纲目，给他看，未及他事。我同陈先生谈提案甚久，陈先生谈青年之病甚详，一点不假，对于写书的见解亦甚是……

**9月24日**

宋端华先生来自日本，定规自明日起讲书。

**9月25日**

早八点，请宋端华先生讲其到日本所研究之心得，言语之间，问其所以，彼对日本史不十分清楚。可见史书之重而且要也。

**9月27日**

宋先生讲日本农村情形。

**9月30日**

六、宋端华先生来此。……午前宋先生讲在日本之所  
得。

10月2日

为的要同宋先生谈其所讲的课程,至十点始完,把日本的政治、社会各情形,均详述了一次。

10月3日

同宋先生谈他走的事,我赠他鲁绸二匹,又介绍信二封,并谈了些话。

1937年

2月28日

见宋端华先生夫妇,谈他在东京的近来情形,又言中山文化馆,至三月满期,初级负责为冯朝(超?)俊先生,主持者为哲生先生也。

3月3日

宋、张、李(等)共八人会食,宋由日本归来,读(谈)些日本社会之困难情形,大量卖儿卖女,大量向外租十八岁的女儿,租不出去,又谈些日本军阀之罪恶。

3月4日

见宋端华先生,谈他以后之工作的办法,我同他商妥之事:一、准备报告在日本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二、对于我的研究改进;三、研究室此后的进行。

### 3月20日

宋端华先生同孙继颜来到，谈些研究室的情形，孙来带到桐子及柏子一些，桐秧五千株，不日可到，云云。

### 3月23日

本日同宋端华先生谈两次，皆他在日本见闻，说来很有条理，记之如下：一、日本轻视中国；二、中国的学生太自害自己了；三、好的学生很不少；四、在某次大会上，有中国学生唱梅兰芳的戏，使人轻看；五、又有洋服学生挟了红衣女子在街上走，日人很轻视的，然他还觉得很有意思的；六、日本左派如……等。多无故被抓，至今无放出来，其待人，用火烧博士们，是真的；七、日本宪兵警察无不知法，然对中国人不合用，因为中国人不配用的，云云；八、日本右派人们更轻视中国人。

### 3月24日

宋先生端华把在日本见闻说完之后，又说了他的些意见好几点，均甚重要，一、努力抗日；二、同情青年；三、促成政府抗日与人民感情日亲；四、与学者有些交通，五、有一研究团体及刊物。

我说我赞成到广西走一次。

午后，宋先生说日本的近况后，我即在雪中照活电影去了。

3月27日

本人九时,同宋先生详谈抗日救国的实施办法,记之如下:……

4月1日

我同宋端华先生谈日本封建之色彩甚为浓厚。……  
为宋端华先生给哲生先生写一封介绍信,意在找事。

4月24日

早九点,到小(晓)庄开讨论会,至11点始完。到的人有刘允丞先生、宋、赖、董、郑君、王共6位。加德全夫人同我共九人,题目为日本此次之政变,报告者为宋端华先生,其大要如下:一、日本军部为特别势力;二、日财阀在军部之后;三、一切办法以军为先;四、政党有点势力,不过是不很大;五、归期仍以军部之主张为主张;六、对中国之办法,表面上改换一点,内容仍旧;七、中国既不能与之开仗,此时可分二步办理:甲、凡与中国有利的事,可与之谈,否则不谈。乙、刻刻须准备大战而不懈怠;八、孙哲生先生之谈话。

4月26日

早九点,到峨眉路开讨论会,为赖先生报告,很有条理。

我先把今天早起马超俊先生来的话说了一遍如下:即是宋先生为研究员,不久可为一组长,云云。

6月1日

休息之后,我同宋端华先生,薛德?先生同车到国立编译馆去见辛树之先生,前国立编译馆馆长,今为陕西兴平农业院院长,……

11月11日

十一时,宋端华先生偕同信社之司徒德先生来见,谈以该社创办“抗战”刊物之经过,并索取诗以备登载。我诗二首送之。

11月17日

九时,宋端华先生(来),我请其看致韩向方等之函稿,请其斧正。并赠《新大学》十本,请其写一跋辞,并将书内二要点举以告之:一、旧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衍成数千年来我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之观念。具体言之即养成自私自利之个人观念。而新大学之道,则力去其弊而以民族国家观点为出发;二、所谓“善终”二字,吾人解为安死家乡,而殊不知如关公、岳飞之死,为民族为国家之死,为正义而斗争之死方为善终,否则安死家中不过臭死而已。

11月23日

7时,请宋端华先生来谈话如下:给山东诸将领信,已寄报馆发表,不日可登出。

12月3日

十时见宋端华先生。

12月22日

请宋端华先生来，谈以抗战以来不少部队军纪之欠缺，殊出人意表，推其原因，不外平日精神教育缺欠所致，故余制定“军人问答”二十七条，以匡其失，曾经多人之增删，并送蒋先生一阅，今请宋先生加以删改，并作引言一篇，以叙其动机及目的。

12月25日

今日为协和先生云南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我请文化界人士二时聚餐，计到有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王迄时、李公仆、杜仲(重)远、范长江、刘清扬、张申府、王炳南、彭汉民、张志让、张仲实。钱俊瑞、金仲华、沈兹九、石筱山、孙良成、张维玺、黄文植、张含清、舒舍予、何容、赵望云、张雪山、董志诚、宋端华、叶镜元、李协和等二十余人，餐间，协和先生首起致辞，继由我起立致辞。继由沈钧儒先生致辞，王迄时先生致辞。……二时许散去。

12月26日

六时许，拟请老向、老舍、宋端华诸位先生用饭。皆在家。乃与张雪山、叶先生同餐。

**12月27日**

八时许……,请宋端华先生来,我请其根据我目前所写纲领,编一“民众问答”,使人民知发动民众,究为何因,所作究为何事。

……十一时王冠来开会……

宋端华请为黎明书店编辑陈文杰先生所著《抗日战争之将领》题字,我题字与(序)之,十二时复介绍来见,乃留与王冠同、李协和先生同进午餐,席间询及军事失败之原因与今后抗战之意见。

**12月29日**

六时晚餐。宋端华、刘思慕两位先生来见,谈以抗战问题久之。

**1938年**

**1月3日**

八时,宋端华先生来会,谈以木刻之事,继谈以“民众问答”六十条已草竣,我谓俟我先阅读一过再谈。

**1月5日**

三时半,见宋端华、刘思慕两先生。

**1月8日**

九时,王向晨先生招请与《抗到底》有关诸友茶会,计

到有老舍、何容、赵望云、宋端华、刘思慕、张克侠、吴组襄（湘），赵望云、张雪山、王德宽、尹心田、叶镜元、赵虚吾等十数人，首由王向晨先生报告筹备经过，……继，王先生请我讲话。（《抗到底》1938年1月1日在武汉创刊，宋斐如在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编者注）。

### 1月15日

王向晨、舒舍予、赵望云、刘思慕、宋端华等来谈。王先生携《抗到底》、《战时教育》、《文摘半月刊》来，中皆有余所写文字。

### 1月16日

二时，会宋端华、刘思慕及罗时觉先生，谈杨渠统军长事甚久。

### 1月23日

接国际和平会函，今日下午一时于汉口商会开成立大会，请余届时出席，并致演辞。（编者注：此会由宋斐如代表冯玉祥参加并发表演说，详见《武汉日报》1938年1月24日的报道。）

### 1月27日

一时，请宋端华先生来，为余撰一演辞，为二月六日国民外交协会向世界广播，至其内容似应稍涉宗教，余可请



一二教中朋友来略事商谈。

三时讨论会，宋先生报告日本之近况，嗣由刘思慕先生、张铁生先生加以补充。我对彼等谈以昨日蒋先生召集留汉中央委员茶会之情形及蒋先生发表之谈话，均甚诚挚。

1月31日

七时，宋端华先生介绍张效良先生来见，谈以潜山一带民众工作之情形，武进流亡同学所组织的服务团之勤状况。

2月10日

三时，宋端华、董志诚两先生先后来谈，我告以宋明轩处，曹福林处，以及谷良民处，应派人赴彼长川居住，既不领钱，复不求官，惟日与彼等见面即行，谈以国际现势，抗战情形，当能使彼等彻悟也云。

4月1日

十时起，开讨论会，首由宋端华先生致开会词，并介绍罗军长(卓英)部之战地服务团团团长胡兰畦女士，报告其抗战以来在东战场艰苦工作经过。

4月13日

后请赖先生、宋先生来谈讨论会事。

12月4日

十时与赖、宋二先生谈话，一、速起电稿，连前天之十条凑够二十条，为兵役事给委员长；二、苗夷问题太重要，要多与贵省士绅谈话，能多知一点事，即能多尽一点力也；三、赖、汪二先生之社会调查报告真好，这是咱们的伟大工作，宝贝东西，我希望咱们能更慎密地进一步调查更好。

1940年

2月20日

巴中(巴县中学,1938年冯玉祥到重庆后,先后住过陈家桥、巴县中学、沙坪坝文化区、南开中学、白鹤场等地方,编者注)李炘、赵普炬、宋端华三位先生来谈。

10月8日

宋斐如先生同两位朝鲜金若山、韩志诚来巴中,我说,你们的精神使我真是钦佩到了万分。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把日本赶出中国去,才算是真英雄。他说:今后如何促进中韩友谊也是要紧的,我们为报效祖国,要努力,一切照你说的去做。

原载《冯玉祥日记》,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 追忆父亲宋斐如

宋 亮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清明，我多么想亲自到台湾父亲墓前拜祭他，可至今我仍不知道他魂归何处？尸在何方？前台盟中央副主席李纯青伯伯 1950 年曾著文《悼宋斐如》说：“……你被捕，死得很惨，传说你被装进麻袋，带石沉江；也有人说，你被活埋在圆山之麓，谁也没有见到你的遗体……。”80 年代末期，海峡两岸的坚冰解冻后，远在台湾的堂侄子前来探望我，谈起先父，他哽咽着说：“当年，六叔公是由我父亲帮忙安葬的，连尸首都没有，葬的是衣冠。”我和他叔侄俩满含泪水，只有四目对望，妻子也在旁边陪着垂泪。

1947 年，父亲在台湾二·二八事变中被当局杀害时，我还不到一岁半，而 1950 年 1 月 11 日母亲因“掩护进步人士，煽动台大学潮”罪名被台湾当局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时，我也还不满五岁。可以说，在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父亲记忆；对于母亲的被害也只依稀记得。随着

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父辈的叙述,我才开始认识到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渐知父亲年轻时从台湾到祖国大陆北京大学念书,而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曾任冯玉祥在泰山的读书研究室主任;抗战期间在国内从事抗日活动,办过抗战刊物《战时日本》;当过光复后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台湾《人民导报》社社长。

为了弄清父亲到底是如何一个人,为何被台湾当局杀害?自1982年始,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寻访了父亲生前的好友、同事以及他们的后辈。并先后拜访台盟中央、省台盟的各位领导,得到热情支持,我与妻子为寻觅父亲足迹,跑遍祖国各地,北京、重庆、南京、上海、昆明、桂林、武汉……乃至香港、台湾。共收集了父亲的近20本著(译)作及发表在《新东方》、《战时日本》、《时事类编》、《中苏文化》、《新华日报》、《世界知识》、《时事月报》、《大公报》、《广西日报》等二三十种抗战刊物上声讨日寇之檄文200多篇,共计约200多万字,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此时,我才深深理解李纯青伯伯在《悼宋斐如》一文中所写的“你是一个几十年奋斗有成就的文化人”的含意,说我父亲“一生著作甚丰”之所指。父亲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愈来愈清晰。

## 办刊撰稿 抗日救国

承蒙离休老干部何标大哥对我的关爱,把秦贤次先生觅自日本的《少年台湾》创刊号复印本赠送与我,我才得知

父亲早在北大念书时就与其令尊张我军及洪炎秋、吴敦礼等几位台湾来京留学的青年学生开始创办刊物《台湾少年》，父亲任后期主编，该刊反映日寇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状况和介绍祖国新文化运动进展，率先“架起台湾与大陆间资讯传播的桥梁”。

记得1984年夏，我和妻子第一次到北京刘思慕伯伯（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家里拜访时，刘伯伯和刘伯母待我们就好像是远方的儿女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嘘寒问暖，爱护有加。刘伯伯还用广东话对我说：“好多得你阿爸，不然的话，就没有我的今天了”。我知道，刘伯伯指的是1935年5月，父亲曾通过冯玉祥将军救助过刘伯伯、伯母。接着，刘伯伯又告诉我：“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了，1930年，在北京创立‘东方问题研究会’、创办会刊《新东方》时，我们就在一起了；在泰山冯玉祥读书研究室工作时，我们在一起；1938年，在汉口抗日时，我们又在一起了。”临走时，刘伯伯还说：“待到二·二八40周年（即1987年）纪念时，我要写一篇悼念你父亲宋斐如的文章。”遗憾的是因刘伯父的逝世我无法得到他的赐文。

在山东泰山时，父亲任冯玉祥将军的读书研究室主任，与冯先生拟定了建立研究室五个办法：长久性，有一固定地方，推进一切，注重研究讨论，找人才。父亲联络了众多进步学者为冯将军及其部属讲授各类课程，自己主讲政治经济学、日文、《资本论》，介绍日本国情及世界经济，把泰山读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普照寺旁是学府，五原祠下

人才济”——这就是当年的泰山读书活动写照。此外，父亲还为冯先生书写了各类文稿、讲演文章，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与张勃川合作）、《胶东游记》序、《对初、中、高级将领讲话》集、拟订《军人问答二十七条》及引言、编《民众问答》等等，深得冯先生的赞赏与信任。

在冯玉祥与吉鸿昌组织的察哈尔抗日战斗中，父亲与研究室成员也随同前往协助工作，宣传抗日。1938年1月23日，父亲作为冯副委员长的代表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冯先生还介绍父亲到南京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任日本问题研究员。抗日救国、复兴民族的共同理念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誓不臣倭》一书中介绍“驰骋在抗日疆场”的台湾同胞时，称父亲宋斐如为“冯玉祥的密友”。2001年，泰山冯玉祥抗战展览馆原展馆主任王新丰，得知我是宋斐如的后代，热情接待我们，并述及展馆的大部分展品已运南京第二档案馆，此处仅留下部分照片。他熟悉当时研究室主任宋斐如的活动，因为冯玉祥的日记里常常提到。在泰山普照寺——研究室旧址，瞻仰着父母亲及当年研究室部分成员的照片，我们浮想联翩，对先辈们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当我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台湾馆）看到父亲主编的《战时日本》杂志、《广西日报》主笔的委任状以及父亲参加抗战的证件、证章摆在展柜里，我明白父亲为何在1937年中断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研修，毅然回国，

奔忙于汉、粤、港、桂、闽、云、贵、川、渝，不辞劳苦，呼唤抗日，矢志不渝。如在汉口，发起组织“战时日本研究会”任总干事，创办、主编会刊《战时日本》。他以笔当枪，深刻揭露日本殖民主义者侵略暴行，剖析日本军国主义本质，多方面地、准确地刻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坚持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在父亲的操持和众多抗战志士的支持下，《战时日本》因其内容翔实、鲜明、尖锐等特点，“出版不久即已售罄”。还得到了海外众多华侨大力襄助，“只菲律宾一地即有1800多份赞助订户”，赞助金额五元、十元、数百元不等。先后由华侨革命家庄希泉（庄一中）、宋渊源任发行人或赞助督印，为杂志募捐，筹集资金。除国内发行外，还在南洋各地设总经售，成为一份脍炙人口、颇具影响力的抗战刊物。正如《大公报》读者顾问评曰：“《战时日本》这个杂志，并没有在报摊乱摆，也没有往字篓里乱丢，它主要的不是给一般读者认识各种敌情，而且是给中国各抗日高级机关作重要参考的典籍，内容很丰富、翔实、泼辣。”立法院长孙科曾赞誉曰：“细读各期内容，其资料之丰富，观察之透彻，与夫论断之正确也。《战时日本》主编宋斐如兄研究问题之精博与作事之负责，为我所熟悉，故自策划创办时期即予以相当之赞助。”读者认可《战时日本》是唯一研究敌情、使一般人铲除恐日病之抗战刊物，千千万万人已经受了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41年，为配合抗日斗争和台湾光复的需要，父亲与谢南光、李友邦联合在大陆进行抗战活动的台湾知识分子

和团体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并担任执委兼常委，培训台湾抗日骨干。会同韩国抗日志士组织“中韩文化协会”，参与组织了“中国日本朝鲜台湾反法西斯联盟”，会同众多的抗战人士在共同目标下积极进行抗战活动。父亲与前来祖国大陆进行抗击日寇的台湾乡亲许地山、李纯青、李万居、李友邦、张我军、谢南光、连震东、谢东闽等经常聚首，他们议论抗日救国，“诉说一个不可移易的信念——彻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故土。”

1942年，在重庆的“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上，父亲代表“台湾革命同盟会”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的演讲，读着这篇文章和当年的有关报道，我仿佛看见父亲正在沉痛地诉说着台湾同胞几十年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统治的种种苦难。他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剖析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如何统治台湾、蹂躏台湾人民，继而他代表着六百多万台胞在大会上高声呼唤：“我们今天的要求（目标）很简单，台湾和别的沦陷区不同，六百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来。我们很清楚，我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更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我们也有权利要求祖国表示收回台湾的决心，宣布台湾是一块失土，和其他沦陷省份一样看待。”赤子之心，苍天可鉴。

### 倔强“狠心” 心系台湾

父亲的朋友很多，竹马之友、时任台北建国中学校长



陈文彬伯伯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这不仅仅因为陈伯伯一家是在我母亲的帮助下才逃离虎口的（后来成了我母亲被杀害的“罪状”之一），还因为陈伯伯是《人民导报》的总主笔，当年，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曾和父亲共同战斗过，志同道合。二·二八事变中，他为营救学生而被捕，后来妈妈又邀他们一家在台北我们家中居住过一段日子。1957年，也是陈伯伯写报告给中央统战部把我——宋斐如的遗孤从香港接回祖国大陆读书。所以，我是他家的常客，而几乎每次会面，他都会沉痛地对我说：“小亮呀，当年你爸爸要是肯听我的劝告，暂时到香港避一阵，也许就躲过这一劫了。当年，在你爸爸召集的会议上，我是极力主张他离开台湾的，因为他办的《人民导报》太锋芒毕露了。可他总是说：‘我又没干坏事，我为什么要离开呀？我怕什么呀？！再说，我也离不开呀！’他真是太执着、太倔强了。”

我常想，父亲不肯离开台湾，自然有他的道理。几十年来，他为抗战付出了心血。回到台湾后，他白天到教育处上班，为恢复祖国文化教育、台湾的真正“归宗”而不懈努力。下班后又和其他有志之士为《人民导报》不倦操持，也是为了“启发过去的闭塞，发扬固有的祖国文化，沟通国内外的消息”，这有何过错？！父亲虽身为“半山”（当时台湾人对自大陆归台的台湾人的称呼），回到家乡当了“官”，且是当时台籍人士中“官位”最高者，但父亲并不像某些“劫收大员”那样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李纯青夫人谈家芳经常说“你父亲没有钱，是个穷书生”，确实，办报的经费还是从民间筹

集的。父亲之所为只不过是真实报道而已，“公正的报纸就是报达民情的机关。”何错之有？！

多年来，听着外婆、舅舅、舅母及阿姨的回忆，我对父亲的了解逐渐加深。父亲真是个倔强而执着的人。1945年10月5日，我来到这个世上才十三天，他就“狠心”地留下我和尚在坐月子的妈妈，而随“前进指挥所”的人员匆忙赶回台湾。这在别人看来确实太不近人情，但母亲理解自己的丈夫，她说：“他是为了祖国接收台湾做准备工作的”。父亲在台湾省训团讲话中已说得一清二楚：“兄弟在国内工作二十多年的目的，就是要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为台湾的人民，也就是祖国的人民，台湾的土地，也就是中国的版图。”奋斗了二十多年，终于迎来了台湾光复，就像一个被卖出去的孩子，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能不激动、能不焦急吗？！

父亲虽然走得十分匆忙，但他却没有忘记交代母亲带上他们结婚时朋友们所送之礼物，这礼物并非金银珠宝，也非价值连城之古董，而是一块四五十厘米见方的白绸布，上面画着一枝梅花，除了书有“勿忘台湾台南开元寺的古梅”外，还有诸位朋友的签名。父亲没有忘记朋友、同事的嘱托，无论是在抗击日寇的征途中，还是在回台从事恢复国民教育的工作中，他已向台湾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父亲的确是个既执着又“狠心”的人，记得外婆曾对我说过，我周岁生日那天，母亲从“法制室”下班回来，亲自下

厨准备饭菜,等着丈夫回来给他们的爱子做生日,可那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就是等不到父亲。深夜,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进门。听到开门声,已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的母亲马上站起来,接过父亲手中那沉沉的皮包。父亲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太对不起了!”接着又说:“报社的事情要处理,实在是脱不开身。”水都没有喝一口,父亲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我的卧室,望着熟睡的我深情地说:“小乖乖,明年爸爸一定给你做生日。”接着又在我的小脸蛋上亲了亲。可谁能想来年三月份,上海《大公报》就已刊出“台北报界遭逢厄运,五家报馆封闭,负责人全部被捕,生死不明,日本问题专家宋斐如传已枪决”。

父亲永远不会回来给我过生日了,倔强而执着的他终于倒在了二·二八的血泊中。那一年,我才一岁五个月。据妈妈当年给当局的“陈情书”中所述:1947年3月11日下午2时左右父亲被便衣六人从家中挟持上了持73号特别通行证、车牌号为02039号的汽车,从此下落不明。

父亲的确是个倔强而执着的人,外婆曾多次对他说过:“斐如呀,你既做‘官’又骂官,你的《人民导报》几乎天天都在抨击政府施政,这样下去,恐怕官位难保,或会招致更大的麻烦也未可知。”父亲总是坚定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呀,这也是我办报的宗旨。说违心话,我实在做不到。就是撤职,我也在所不惜!”这真是被父亲不幸言中了(其实,也是意料之事),1947年2月19日,才当了15个月“官”的父亲就接到当局“免职,另候任用”之命令了。父亲

回台后在韩籍官兵集训队(日语讲演)中讲过对台湾建设的设想：“一、在政治上必须确立民主政治。二、经济方面，不能像日本那样只肥大财阀，而应为多数国民的幸福谋发展。三、社会性方面，更加注重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父亲的这些理想、抱负尚未实现就“失踪”了。真是壮志未酬身被害，令人扼腕长叹息！

### 新朋老友 缅怀志士

在《人民导报》社过去的众多记者中，我们能觅到并保持密切联系的是吴克泰、周青、戴青田等几位前辈。他们的诉说，更是加深了我对《人民导报》、对父亲的了解。吴克泰叔叔曾告诉我：“当年，你爸爸总是下班后才来报社，有时就全家在报馆吃晚饭，边吃边聊，讲存在决定意识、讲如何采访及报道。讲记者耳朵要‘长’，消息要灵，报道要真实。我写的那篇台湾农民运动老前辈李伟光访问记，你父亲看了很喜欢，辟专栏分几天刊载。”

1992年3月，我妻子出差北京，周青叔叔带她去拜访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吴克泰叔叔，吴叔叔把她介绍给出席大会的其他台胞委员：“这是宋斐如的儿媳妇，”并说：“宋斐如在祖国二十多年，抗战期间做了许多工作，回台后积极从事民族文化复兴工作，可惜在二·二八中牺牲了。他是我们台湾人的优秀分子，台湾人的骄傲。”这令她十分感动。周青叔叔对我说：“你父亲被害，是因为他的报纸始终

坚持正义立场,坚持真实报道,为民喉舌,我的那篇湾子内农民反抗大地主剥削,遭到大地主区长勾结警察局打手镇压的报道,引起了有名的‘王添灯笔祸事件’,当局对你父亲极为不满。”我听多位前辈说过,父亲因办《人民导报》,常常受到当局的警告,但他仍不改初衷。

戴青田叔叔对父亲的敬仰更是令我感动不已,2003年,我们去辽宁拜访戴叔叔的令郎戴高尔兄弟时,高尔兄弟竟能说出许多父亲的往事,我惊奇地问他为何能如此清楚?他说:“我父亲经常对我讲宋老前辈的事情,就是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我父亲还说比起宋斐如老师,我受的这点苦,算不了什么。”由于父辈的关系,我和高尔真是一见如故,他把其父发表在《团结报》上的悼念宋斐如的文章以及尚未来得及发表的文章、诗等等都送给了我。至此,我方明白戴青田叔叔为什么在1983年就提出要协助我出一本纪念宋斐如的文集。可惜那时我并不如今天这样了解父亲嫉恶如仇、铁骨铮铮的性格和一生为抗击日寇及台湾回归祖国不遗余力的抱负。今日,每忆及此,仍感愧对先父在天之灵。

几经努力,去年10月,我和妻子终得以回到阔别五十五载之故乡——台湾探亲,少小离家老大回,激动之情难言表,凝视延平南路《人民导报》社旧址,漫步新生南路,寻访开南商工学院——这些父亲当年曾经工作、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我仿佛看见父亲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正在电台播讲《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他正在向台湾的

父老乡亲述说对于教育的设想：“应该教育六百万台胞，变成‘主人翁’”。“使‘归宗’二字名副其实……，使得择其善者而学之，其不善者而弃之。”“应该培养台胞成为‘世界人’。”“台胞也必须从此三大原则去学习作人、作主人、作中国人、作世界人，……然后才不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父亲这铿锵之音仍然回荡在故乡台湾的上空。

虽然在台湾仅仅逗留一个月，但却得到了众多热心人士的大力襄助，陈映真教授介绍认识了曾健民医生（业余时间从事光复后的台湾历史研究）和夫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父亲回台湾后发表在《新生报》、《政经报》、《和平日报》的文章及全套《人民导报》复制版，台湾史学家秦贤次先生指点我们寻找父亲著作的捷径，借给我们许多参考书，使先父的遗著收集工作意外顺利，如愿以偿。拜读当年的《人民导报》，我们也才得以进一步了解父亲回台后为恢复台湾的国民教育、宣传祖国文化，反映民情，为台湾的生产建设及发展而日夜奔忙、竭尽全力。

台湾抗日义勇队队长李友邦伯伯的夫人——八十高龄的严秀峰女士，虽身体欠安，但仍接我们到她家里，向我们介绍父亲与李伯伯在一起的战斗历程，介绍他们之间的友谊，谆谆告诫我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收集父亲的资料，一则还历史公道，二则以史为鉴，告诫后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团结、不要分裂！”同时，严女士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为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资料，让他们知道：从九·一八算起，祖国大陆是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抗战才取得胜利的，而台湾则是经过

五十年的抗争才得以重回祖国怀抱的。这其中,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付出了血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祖国的抗战中,我们台湾人民没有缺席。你父亲和李伯伯是台湾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为抗战、台湾的回归、台湾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付出了很多很多……”

先辈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骨肉团圆奋斗了几十年。无数台湾抗日爱国志士前仆后继参加抗战活动,只是为了一个“魂牵梦萦”的祖国——中国,父亲宋斐如只是这千千万万之一。今日,海峡两岸虽尚未统一,但海峡两岸是血肉相连一家人,诚如先严所说,台湾和祖国人民“血浓于水”,“台湾的人民,也就是祖国的人民,台湾的土地,也就是中国的版图。”谁要否认这个亘古不变的事实,妄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只不过是小丑跳梁之举罢了。

纪念是为了缅怀过去,面向未来。父辈的遗愿尚未了却,作为宋斐如的后代,一个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人,应为完成先辈未竟之事业,为了统一团结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须努力,再努力!

2005年6月

## 沉尸之冤何日申

何 标

“华姐志贞成白骨，斐兄英烈竟沉尸。”这是二·二八起义前担任台北建国中学校长的陈文彬先生，生前所作悼念宋斐如、区严华夫妇的诗句，宋先生曾任台北《人民导报》社社长，1947年二·二八起义被镇压时遭特务绑架失踪，据传被装入麻袋沉入大海。3年后，区严华女士又在白色恐怖时期惨遭杀害。独子宋亮当年不足6岁，顿成孤儿，后由亲戚带来大陆，现已年届半百，供职于深圳市。

两年前在北京的一次集会上，我同宋亮邂逅。当得知他的父亲就是家父张我军早年挚友宋斐如时，我就把刚从台湾友人处得到的《少年台湾》创刊号复印本相赠。这本刊物是60多年前由在北京读大学的几位台湾青年创办的，宋斐如主编，家父为主要执笔人。它的出版，曾成为连结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和日本占领中的台湾的一座文化桥梁。把这本具有历史意义而绝版半个多世纪的父辈合作结晶赠



送宋亮,是为了表达我对斐如老伯伉俪的怀念和敬意。

斐如先生比家父小1岁,他们当年都是生长在台湾的热血青年,为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远离家乡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接受祖国的高等教育。斐如先生在滞留大陆的20多年当中,追随过爱国进步将领冯玉祥将军,在武汉、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创办过多种报刊,宣传抗日爱国,撒播进步思想。日降后,由他担任社长的台北《人民导报》,敢冒当政者的大不讳,揭露黑暗统治,报道内战真相,替台胞百姓说话,而深遭当局之忌。宋先生学识渊博,一生为国家、民族和家乡父老漂泊奋斗,遇害时年仅45岁。这样一位台湾菁英竟遭不幸,使广大台胞至今悲愤难消。

宋先生被绑架后,区严华女士随即致函地方当局,陈述宋先生于1947年3月11日下午2时左右,被乘坐挂着02039号车牌和73号特别通行证汽车的6名便衣人员拘捕而去,要求查明开释。3个多月后,台“警备司令部”做出答复,矢口否认逮捕过宋先生,甚至说连通缉名单也未被列入;声称所指出的车牌号为某商人所有,特别通行证号为某银行之车所用。他们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其实不过是极其拙劣的抵赖而已。

据当时报载,宋斐如被当局诬为“奸伪要角”,冠以两大“罪状”:一是“阴谋叛乱首要”;二是“利用报纸抨击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点”。这两大“罪状”有无事实根据和是否能构成犯罪暂且不论,既然加以如此严重罪名,为何既不通缉又不逮捕?这岂非自相矛盾?当时全岛正实施“戒

严”，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多人公然乘汽车从家里把宋先生抓走，除了特务分子，谁又能如此横行霸道、胆大妄为？至于车牌和特别通行证的所属人，倘确如“警司”的解释，不过是证明特务机关以假冒的牌、证隐匿身份，以逃脱罪责。这种种掩饰和托词，对密捕暗害宋斐如的事件，只能是欲盖弥彰。

区严华女士于1949年9月被捕，经连续五天五夜的疲劳审讯后，于1950年1月被扣上“匪谍”的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随意抓人和滥施刑讯已司空见惯，无论是否被屈打成招，只要用“匪谍”帽子一扣，想杀就杀，谁敢出来问个明白？何况宋家只剩了一个还不懂事的孤儿呢？

40多年过去，台湾岛世道大变。在为二·二八起义参加者平反昭雪、为白色恐怖时期含冤者招魂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台当政者一再表示要“走出二·二八事件的历史阴影，抚平事件造成的创伤”。但在最近台官方公布的“2·28”事件死亡失踪名单中，宋斐如仍被列为“失踪”，可见台当局仍企图继续掩盖事实真相。对这样的大案要案都如此讳莫如深，又怎能对所有受害者公正进行“受难者评定”和“抚慰赔偿”呢？至于白色恐怖时期涉嫌“叛乱”被处死者，据估计有三四千人，申冤更属遥遥无期了。

今年2月，台当局一位高官对要求重新调查二·二八事件的答复是：“应以慈悲心及向前看的态度，面对此一不幸事件。”大慈大悲是佛祖之心，真乃“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如果确有此心，宋斐如失踪之谜就应立即大白于天下，并平反昭雪、妥为善后。所有冤案都照此办理，受难受害者及其家属自然会回过头“向前看”。否则，头怎能回的过来呢？

原载 1994 年《台声》杂志第 6 期

## 忆宋斐如先生

戴青田

编者按：作者系当年台湾《人民导报》记者、总编，此诗由作者儿子戴高尔提供。

—

阅墙惊作天涯客，  
孤岛飘蓬谁肯收？  
相识自怪今生晚，  
逢君如遇韩荆州。

二

棕影迷离白云悠，  
当年俊杰几人留？  
思君难忘刀剑处，  
长哀不忍过荒丘。

## 访宋斐如副处长

丁文治

他说：“过去日人在台所施的‘皇民化’教育，现在业已证明是全失败了！”

**【本报专访】**记者此次往草山参加“全省教育行政会议”，首次晤到教育处宋副处长。宋副处长着西装，戴金丝框眼镜，待人接物，一团和气。讲起话来很有条理，通常在讲话中停一小节，使听的人有一点思索和回想的余地，宋副处长首次和记者见面，他给记者的印象，完全是一位温文尔雅，标准教育家的风度，在宋副处长的身上，我们不能看到丝毫官场中常有的官僚习气。

“全省教育行政会议”闭幕后，宋副处长于本月2日莅临台中视察，宋副处长的事务很忙，他除了须视察本市的各个中等学校以外，还得出席各种座谈会、茶话会，其主旨在宣达省方所确定的教育方针，并报告此次教育行政会议中所议决的几项重要案件，同时更重要的是“听取当地各

界名流对教育方面的意见”。宋副处长有时要忙到深更半夜才能够休息,就在宋副处长这样的事务繁忙中记者也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和他会晤,而且作了一次超过一小时以上的长谈。

记者首先询问宋副处长对于视察本市教育的感想。宋副处长约略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不但台中,就是整个台湾,教育事业的普及,是颇足称道的。在战争期中,台中各校没有受到任何炮火的摧残,而且省方派来台中主持教育事业的人,如周校长、金校长、余校长、薛校长等,又都是国内知名的教育家,所以对台湾目前的教育事业,就一般来讲,是颇足令人满意的。”他略为间断了一下,然后说:“我这一次到台中来,当地有很多名流对我贡献了不少关于改进教育的珍贵意见,等我回台北后,我决定把这些意见,代为转达省方,台中一般人士对教育事业等的热心与协力是颇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话题转到全省教育行政会议方面,我问宋副处长对这一次会议的看法如何?他笑了,他似乎在说,站在我的立场,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不过他终于用一种严肃的口吻说:“的确,这一次全省教育行政会议的成就不能说不大,它在台湾的教育史上,将要占据划时代的一页,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中通过了更改学制和改用国定本的两项议举,这将是台湾教育彻底‘中国化’的一个转折点”。

随后他并若有所思的说:“一般人的看法,尤其是省外不明了台湾实际情形的人,他们都认为台湾什么东西,都

有其特殊性,所以应付这些特殊性的东西也都得用特殊的方法,这真是一种要不得的错误观念。”他说:“台湾有什么特殊呢。台湾同胞都是黄帝子孙,他们每一个人的血管里都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宋副处长的话说得很激动,他的拿着一只水果的手有点颤抖。

我们不愿意把讨论的范围扩大。我问宋副处长对日本时代的教育方针、观感如何。提到这一点,他的话像决了堤的潮水一样,滔滔不绝的往下流。他从日本人在台湾所推行的“差别教育”和说到“皇民化教育”。最后他用一种快愉的口吻下了一个结论:“日本的这种教育方针是失败了,现在就连他们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这样承认。”他说:“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说,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初,他们决定了在台湾推行一种差别教育,他们把日本人、汉人和高山族土人,分成三种阶级,而分别推行三种不同的教育。这是一种变相的愚民政策,他们使台胞很少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想永远把台胞当奴隶看待。所以当时的青年学生,欲求深造,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投到祖国的怀抱里去,一种就只有到日本去,但当时因为交通经济等种种原因,结果还是以到日本去求深造占多数。这种差别教育推行的结果,在他们日本人看来也许是认为很成功的,但都因此养成了台胞一种很浓厚的民族思想。台湾同胞不愿意再做奴隶,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距今二十余年前,台湾便发生一次规模很大的请愿运动,这是一种民族斗争的雏形,这一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对台湾同胞重新估价,

不得不改善其在政治、经济、教育上的许多差别待遇。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数年，日本人便极力在台湾推行所谓‘皇民化’教育，这是日本时代台湾教育事业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强迫每一个台湾同胞都更改为日本姓名，他们希望每一个同胞都忘去了祖国，都变成他们大和民族的一份子，但日本人的这种教育方针是更失败了。”宋副处长举了一个例说：“在被强迫更改姓名的时候，台胞中有很多姓‘林’的都自动改成了‘小林’，这表示他们对于祖国的依恋，但即使这样，这种‘小林’仍旧有台湾‘小林’和日本‘小林’之分的，台湾同胞永远是黄帝子孙，他们永远不能变成大和民族。日本人过去禁止台胞使用台湾话，但台湾话到现在为止，依旧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被保存着。这说明了台胞过去虽在日寇压迫之下，但对祖国的向心力并不曾有过丝毫的更动，同时这也说明了我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

“现在台湾光复了”，宋副处长在休息了一分钟之后，继续说下去：“我们对于日本过去推行‘皇民化’教育的遗毒，固然要加以肃清，同时对于那种差别教育制度也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更改，我们对于阶级和种族的观念也必须完全打破，过去日本人对高山族同胞推行所谓番民教育的，我们要废除这种方法，我们要使得高山同胞和台胞有同一的受教育的机会。”

宋副处长继续从台湾目前的教育现况，谈到省教育当局对发展本省的教育计划。谈话的时间已经很长，宋副处



长还有很多重要的公务须要处理,为了不便多耽误他宝贵的时间,记者便告辞退出。

在归途中,我在默默的想着如何使台湾教育彻底“中国化”的问题。

原载 1946 年□月 4 日台湾《和平日报》

## 忆台湾民主战士宋斐如先生

戴青田

刘思慕同志在《冯玉祥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刊《团结报》581号第四版),曾提到台湾籍著名民主战士宋斐如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勾起我的回忆。宋先生不幸为国捐躯已有35年了,至今很少有人报刊上提到他。我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也算是一点小小的纪念吧。

我跟宋先生相处,是从抗战胜利后,他回故乡在台北创办《人民导报》开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那时,内战枪声已经响起来了,举国骚然。我因在上海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民主》周刊写了两篇文章,惹出了麻烦,经开明书店总编辑郭绍虞先生介绍,到台湾嘉义女子中学当教员。后来才到宋斐如先生主持的《人民导报》当记者。可是只跑了几天新闻,赶上总编辑得病,须长期休养,宋先生就把总编辑的担子压在我的肩上了。那时我才27岁,还是个学识浅薄、历事不深的人;虽然在新闻界作过几年事,比起著名老将来,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卒而已。宋先

生却敢委以重任,把我当栋梁使用,真可谓“魄力非凡”。

宋先生是个有大作为的人;是五四以后,由台湾爱国青年中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在一条小胡同里创办了著名的亚洲书店,在揭露日本侵华方面尽过不少力量,是国际上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抗战胜利后,家乡父老对他期望甚殷。当他久别归来,一时轰动全岛,民众扶老携幼,都从老远赶到台北机场来欢迎。他下飞机第一句就说:我是回来为家乡服务的,不是来作官的。

当时在台湾主政的陈仪,想借重他的声望装饰门面,请他当教育处副处长。他表面上虽不得不去应付差使,但把全部精力放在《人民导报》上。

当时台湾有三大报鼎足而立。堂而皇之的《新生报》,是陈仪的宣传工具,日销二十四万份,规模最大,条件最好。其次是《中外日报》,是财阀林宗贤出钱办的,销数虽然不多,也没有什么特色,但阔气得不得了。只有《人民导报》最穷,显得最破落。宋先生囊空如洗,办报全是他由民间凑的钱。报社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他在台北借了一座临街的旧楼房。那木板楼梯已经年久朽烂,不堪负重了;一有人登临,就连声叹息地咯吱咯吱响一阵。而且也没有印刷设备,得委托离五六里远的一家印刷厂代印。因为是平版印刷,仅日销万份就忙得不可开交。

宋先生办报的口号是“一切为人民”。《人民导报》成了民众唯一的喉舌。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就是不诬称

中共为“匪”，凡是遇“中央社”电讯中称“匪军”的字样，一律改称“共军”。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对贪官揭得猛。那时台湾民众对贪官谑称为“中山袋”。意思是说，中山装的衣袋很大，正好便于贪官来装民脂民膏。于是流行起来，“中山袋”就成了贪官的代名词。《人民导报》几乎天天闯祸，除非由宋先生顶着，能勉强出版，不然三天也挺不过。

宋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能感动所有员工在极艰苦的生活中都齐心跟着他奋斗。为了节省开支，施行“半薪制”就是一例。这也是《人民导报》与众不同之处。规定凡是台湾籍人，不论职位高低，连宋先生也在内，只能实得工资的半数。只有我一个是北方人，不在此限。别看那里的实得工资比别处低一半，员工们却没有暗自叫苦或工作懈怠的，都是精神抖擞，干得很欢。于是就有这样的谣言，说宋先生跟共产党有关系，用“半薪制”办报，就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办法。

到1947年初，宋先生被迫辞去教育处副处长职，以全部精力办报。每天到报社，他总是笑容可掬，根本没把前面会有什么险事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忙到十点多钟他还不走，编辑部收到最后一批电稿，发现有一条消息说，华北战况紧急，共军撤出了张家口。他主张写篇社论，指出共军撤离的意义，强调胜败兵家常事，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以免台湾民众悲观。

没想到，紧接着就卷起了二·二八大风暴。素孚众望的宋先生再也不能分身到报社来了。一直到三月中旬报社被

封,我也没再见到他。危难中,我躲到朋友家住了些日子。随时打听宋先生的消息,但总是传说纷纭,凶多吉少,很可能是牺牲了。至四月间我不得不逃出台湾。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深沉怀念宋先生,总觉得心头有一种说不尽的哀情。但又觉得他似乎还活着,不定哪天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他……。

原载 1983 年 2 月 19 日《团结报》

## 宋斐如殉难经过

宋洪涛 刘昌智口述

编者按：题目系编者所加，宋洪涛系宋斐如长子。刘昌智为宋斐如的司机。

宋洪涛口述：

家父宋斐如民前九年七月八日生于台湾台南县仁德乡，原名宋文瑞，早岁负笈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监委白鹏飞介绍任教于北平大学，并担任副委员长冯玉祥之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其后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正研究员，派赴日本工作，并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惟心直口快，当面指正别人，不会圆滑留人颜面，易得罪人。

抗战前返国，任职于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兼任中央干部训练团指导员等职，热心党国工作。

台湾光复，家父返台被任命为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因鉴于台湾沦日五十一载，一切与祖国隔阂，尤以文化教育为甚，因而利用公余，并经签奉长官陈仪核准，创刊

《人民导报》，惟后因与林茂生的《民报》竞相以揭露社会黑暗面，抨击时弊，因而颇受当局瞩目。

民国三十六年元旦，时值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及《人民导报》成立之一周年，家父为此发表《本报创刊周年纪念感言》，因而受到更大压力，于二月二十一日副处长官位不保，接“免职”另候任用之命令。

家父曾发起募款修建介寿馆（学生献金部分，业经募足金额），且在二·二八事件绝未参加任何活动，而所写文章及报纸等亦于事件中停刊。于事件中除应参谋长柯远芬召见，及拜访大安区长，于10日晚与连秘书长（省参议会）通电话外均居家思过，并未离开家门半步。

三月十一日下午时，突有便衣人员六人，持枪乘坐车牌号码02039及特别通行证73号汽车到宅，将家父拘捕，后来家母区严华（任职于长官公署法制室）透过各种管道加以营救，均无法如愿，住宅（报馆）亦被查封。

家母区严华于民国三十九年一月亦以参加共产党罪名被枪决，我不得不辍学当学徒，无“厝”可住，有时就在火车站或新公园度夜。光复当初，台籍最高阶公务员的下场，竟是家破人亡，真是令人不禁唏嘘！

刘昌智口述：

本人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战争结束二个多月后返回台湾，一道被征调至南洋服役之本省同胞，对于战后祖国遣返作业之迟缓，以及粮食供应之短缺本就普遍不满，加

上回到故乡后，发现来自战胜的祖国国军毫无军纪、胡作非为、强暴妇女、仪容不整，与战败的日本军人相较甚感“漏气”，因此我对国军印象恶劣到极点。

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年后，我前往长官公署应征司机，被分派担任教育处副处长座车司机，时值年轻力壮，故尚能胜任每天长时间之驾驶工作。

宋先生日语并不很流利，大多用北京话和闽南语与人交谈，与当时政坛闻人黄朝琴、连震东、林茂生、王添灯……等人颇有交情，惟与陈仪长官死对头，宋先生创办《人民导报》批评时弊，反映社会真相，深获读者好评，惟颇受当局压力，当然陈仪视之为眼中钉。最后陈问宋要继续办报或担任教育处副处长，二择其一，宋只好选择前者。

宋辞职一个月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驾其座车载送报社记者至台北圆环附近密集采访新闻，洞悉被取缔私烟女贩林江迈与当地角头老大同居，以致林女遭专卖局缉私员傅学通取缔及“欺侮”时，星星之火立即燎原，加上角头老大弟弟陈文溪遭傅学通有意或无意开枪击毙，群情更为激愤。

二月二十八日当天整座台北城，锣鼓喧天，后来因专卖局对面城门及长官公署，以机关枪扫射游行民众，造成更多的死难，一时秩序大乱，场面失控，凡是穿着长袍马褂者一律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抱头鼠窜，许多客家人遭受无妄之灾，新竹县长朱文伯北上公干，亦莫名其妙遭围殴，座车被掀倒焚毁，另外国大代表谢娥昧着良心上广播电台说谎话，其位于延平北路住家遭到群众焚毁不少家具。



我的主人宋先生在三月十一日中年时分被当局派员拘捕,其妻区严华通过各种管道极力营救,仍“回天乏术”,迄今,尸首不知在何方,同时位于延平南路的报社亦被查封,迄今,人去楼空尚由警备总部人员代管,个人认为此乃人民财产,理应尽早归返宋氏家属才对。

至于我本人在事件后惟恐遭受波及,亦远避乡下近半年之久,后来至警总应征参谋长座车司机,派出所警察始未再上门找麻烦。

原载 1993 年 2 月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历史》第 4 期

## 宋斐如著作年表

梁汝雄 张雅芳整理

### 编例：

- 一、本年表基本上以宋斐如著作初版的时间先后为序；
- 二、除“宋斐如”、“斐如”不加署名外，其他均署以笔名或曾用名；
- 三、作品体裁，除注明者，均为论文。

### 1925 年

《王悦之氏之谬谈与北大台湾同人》

载 1925 年 11 月《台湾民报》第 77 期

署名：宋文瑞

### 1927 年

《敬神吗？民族自杀！》

载 1927 年 3 月《少年台湾》创刊号

署名：奔流

## 1929 年

《高鲁素之的资本主义功过论》(译文)

原作者:(未署名)

载 1929 年 7 月《东方杂志》第 26 卷第 14 期

《欧美联邦计划及其经济的背景》(译文)

原作者:平尾弥五郎

载 1929 年《三民半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

## 1930 年

《日本金解禁与中国》

载 1930 年 1 月《新东方》第 1 卷创刊号

署名:沉底

《东方各民族的转动及其现状》

载 1930 年 1 月《新东方》第 1 卷创刊号

署名:沉底

《印度问题之史的考察与印度解放运动》

载 1930 年 3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3 期

署名:沉底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译文)

原作者:山川均

载 1930 年 2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2 期

署名:蕉农

《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

载 1930 年 7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5、6、7 期合刊

署名:沉底

《安南独立运动的研究》(译文)

载 1930 年 8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8 期

原著者:满川归太郎

署名:蕉农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译文)

载 1930 年 9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9 期

原著者:泉哲

署名:沉底

《土地国有论》(译述)

载 1930 年 9 月《三民半月刊》第 5 卷第 1、2 期合刊

原著者:安部矶雄

署名:宋蕉农

《台湾民众的悲哀》(译著)

1930 年 9 月 北平新亚洲书局出版

原著者:山川均

署名:宋蕉农

《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载 1930 年 10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0 期

署名:沉底

《“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动》

载 1930 年 11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1 期

署名:沉底

《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满廿年的朝鲜》

载 1930 年 11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1 期

署名:沉底

《日本资本在台湾的发展》(编译)

载 1930 年 11、12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1、12 期

署名:永瑞

《日本无产政党研究》

载 1930 年 11、12 月《新东方》第 1 卷第 11、12 期

署名:蕉农

## 1931年

《日本新内阁前途的暗淡》

载 1931年1月《新东方》第2卷《周年纪念特刊》

署名：沉底

《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载 1931年1月《新东方》第2卷《周年纪念特刊》

署名：沉底

《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衰落与东北事件》

载 1931年12月《新东方》第2卷《最近远东问题专号》

署名：蕉农

《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

载 1931年12月《新东方》第2卷《最近远东问题专号》

署名：沉底

《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

载 1931年12月《新东方》第2卷《最近远东问题专号》

署名：剑华

《罗马尼亚的土地政策》(译文)

载 1931年《朝大季刊》

原著者：泽村康

## 1932 年

《普鲁士的国内殖民政策》

载 1932 年《三民半月刊》第 7 卷第 5、6 期

《上海事变的检讨》

载 1932 年 4 月《新东方》第 3 卷《二周年纪念特刊》

署名:沉底

《日本侵略下东省的农业生产》

载 1932 年 4 月《新东方》第 3 卷《二周年纪念特刊》

署名:蕉农

《中俄复交问题》

载 1932 年 7 月《新东方》第 3 卷第 7 期

署名:沉底

《东方民族运动与中国西北开发——帝国主义侵略的新转变与东方民族运动的新阶段》

载 1932 年 7、8 月《新东方》第 3 卷第 7、8 期

署名:沉底

《日本帝国主义论——满蒙问题之一考察》(译文)

载 1932 年 7 月《新东方》第 3 卷第 7 期

原著者:高桥正雄

署名:蕉农

《印度革命新趋势之片影——未来印度的指导者芮鲁》(译文)

载 1932 年 8 月《新东方》第 3 卷第 8 期

原著者:印人萨巴瓦鲁

署名:蕉农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

载 1932 年 11 月《新东方》第 3 卷附录

署名:沉底

《土地政策研究》(著作)

北平西北书局发行 1932 年 11 月初版

### 1933 年

《统制经济的基础知识》(译著)

上海民智书局发行 1933 年 10 月初版

与盛导吾合译

### 1934 年

《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将来》

载 1934 年 6 月《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1 号



### 1935 年

《计划经济之理论的检讨》

载 1935 年 1 月《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 号

《现代独裁政治的分析》

载 1935 年 10 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冬季号

### 1936 年

《日本社会教育的批判》(译文)

原著者:赖阿佐夫

载 1936 年 11、12 月《时事类编》第 4 卷第 20、21 期

### 1937 年

《日本战时经济编制中的原料问题及其政策的动向》

载 1937 年 1 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春季号

《三木清论》(译文)

原著者:户坂润

载 1937 年 2 月《时事类编》第 5 卷第 4 期

《日本宪法论》(译文)

原著者:泷本英雄

载 1937 年 2、3 月《时事类编》第 5 卷第 4、5 期

《日本思想界及思想家》(译文)

原著者:户坂润

载 1937 年 6 月《时事类编》第 5 卷第 11 期

《日本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

载 1937 年 9 月《时事类编》特刊第 1 期

《九·一八 6 周年》

载 1937 年 10 月《时事类编》特刊第 2 期

《日本铁蹄下东北同胞的生活惨状——为纪念九·一八而作》

载 1937 年 10 月《时事类编》特刊第 2、3 期

《抗日必胜的理论根据——〈封建的军事性的日本帝国〉自序》

载 1937 年 11 月《时事类编》特刊第 4 期

《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著作)

抗战丛刊 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 1937 年 10 月初版

《九国公约会议与我们应有的斗争》(著作)

抗战丛刊 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 1937 年 12 月初版

《日本国家机构略解》(编译著作)  
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937年12月

《日本工业经济危机论》(著作)  
祖国书店

### 1938年

《新年·新阶段·新觉悟》  
1938年1月《抗到底》第1期

《日本铁蹄下的东北》(著作)  
战时读物编译社出版、发行 1938年1月初版

《日寇在东北的残杀与暴行》  
载1938年1月《民族战线》第8期

《一年来的日本》  
载1938年1月《时事月报》第18卷第1期

《日本军事法西斯论》  
载1938年1月《世界知识》第7卷第2期

《最近日寇的外交动向》  
载1938年2月《时事月报》第18卷第3期

《中国抗战与日本民众反战》

载 1938 年 3 月《抗到底》第 6 期

《日寇对我侵略战争中的劳动问题》

载 1938 年 3 月《世界知识》第 7 卷第 7 期

《日本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译著)

原著者:劳动调查部

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1938 年 4 月初版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载 1938 年 4 月《世界知识》第 7 卷第 8 期

《冀南豫北游击队英勇抗战的一斑》(散文)

载 1938 年 4 月《抗战》三日刊第 67 号

《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剖述》

载 1938 年 5 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 1 卷第 12 期

《日本右翼运动最近的狂态》

载 1938 年 5 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 2 卷第 1 期

《日苏最近的纠纷》

载 1938 年 5 月《时事月报》第 18 卷第 10 期

《日本侵略战争中工业危机的发展》

载 1938 年 6 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 2 卷第 2 期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与军部法西斯政府的确立》

载 1938 年 6 月《中苏文化》抗战特刊第 2 卷第 3 期

《近卫内阁改组与今后动向》

载 1938 年 6 月《时事月报》第 18 卷第 11 期

《美国新经济恐慌对于日本的影响》

载 1938 年 6 月《世界知识》第 7 卷第 11 期

《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著作)

世界知识战时丛刊 生活书店发行 1938 年 6 月初版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载 1938 年 7 月《世界知识》第 8 卷第 2 期

《抗战以来日本问题书籍总评》

载 1938 年 7 月《战时文化》第 1 卷第 4 期

《战时日本》创刊词

载 1938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1 期

《日本反战运动的国际化》

载 1938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1 期

《战时日本社会危机的发展》

载 1938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1 期

《战时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基调》

载 1938 年 10 月《世界知识》第 8 卷第 7 期

《七年来的教训与进步》

载 1938 年 10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

《日寇七年来在东北的经济掠夺》

载 1938 年 10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

《东北义勇军的母亲——赵老太太》(散文)

载 1938 年 10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

《日本军队的莫斯科》

载 1938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4 期

《第四期抗战的敌我情势》

载 1938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4 期

## 1939 年

日台韩反战与《香港日报》

载 1939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5 期

《日本进攻英国吗?》

载 1939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5 期

《日本资本主义论战》(译著)

原著者:内田穰吉

上海杂志公司刊行 1939 年 2 月

《日本再度向苏联屈膝》

载 1939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1 期

《日本排英运动》

载 1939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1 期

《苏日渔约纠纷的前前后后》

载 1939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1 期

《劳动节寄日本劳工》

载 1939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1 期

《战时日本研究会财务报告》

载 1939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1 期

《日本工潮新阶段的开始》

载 1939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2 期

《“日本问题”信箱》

载 1939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2 期

介绍《日本资本主义论战》

载 1939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2 期

《日本对第三国政策的二元性》

载 1939 年 6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3 期

《日本为什么没有参加德意同盟》

载 1939 年 6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3 期

《日本农业经济的特质》

载 1939 年 6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3 期

《德意军事同盟与日本》

载 1939 年 6 月 9 日《广西日报》



《莫洛托夫的演说与远东》

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4 期

《日本货币政策的新攻势》

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4 期

《“日本问题”信箱》

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4 期

《美苏亲善与远东的关系》

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5 期

《日军南侵北攻下的新出丑》

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5 期

《“日本问题”信箱》

载 1939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5 期

《美国废除美日商约的壮举》

载 1939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6 期

《日本军事代表团赴德意》

载 1939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6 期

《二年来没落过程上的日本内政》

载 1939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2 卷第 6 期

《美国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机会》

载 1939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1 期

《美苏关系的进展与远东》

载 1939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1 期

《欧战与中国》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2 期

《美日斗争的新开展》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2 期

《苏德协定与日本》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2 期

《美国排日运动的概况》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2 期

《日本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意义》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3 期

《日本对美软硬并施》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3 期

《欧洲大战与日本》

载 1939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3 期

《日本帝国本质论——军阀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

载 1939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1 卷第 5 期至 1939 年 9 月第 3 卷第 3 期

《美日谈判的前途》

载 1939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

《日本外交往何处去——亲英美可能吗？》

载 1939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

《日本外务省派阀斗争及其背景——战时斗争激烈化的秘密》

载 1939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

《日本最近对美外交的剖述》

载 1939 年 12 月《世界知识》第 10 卷第 5 期

《日苏谈判及其问题》

载 1939 年 12 月《世界知识》第 10 卷第 6 期

《汪逆兆铭的悲哀》

载 1939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6 期

《日本急于与苏联谈判的目的》

载 1939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6 期

著名:端华

《美国孤立派波拉先生的错觉》

载 1939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6 期

《日本军部行动派最近的外交主张》(编译)

载 1939 年 12 月《战时日本》第 3 卷第 6 期

## 1940 年

《泥塘中的日本内政》

载 1940 年 1 月《世界知识》第 10 卷第 7 期

《汪逆卖国与我们的觉悟》

载 1940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1 期

《提防日阀制造“东方慕尼黑”的阴谋》

载 1940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1 期

《战争第四年日本政治总检讨》

载 1940 年 4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1 期

《日本战时外交内幕》(著作)

时代书局出版 1940 年 4 月初版

《战时日本·渝版发刊词》

载 1940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2 期

《论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

载 1940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2 期

《美英不能再姑息日本》

载 1940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2 期

《评日人“世界四分论”》

载 1940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2 期

《日寇南进与对华策略——日寇结束中日战争三部曲》

载 1940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2 期

## 1941 年

《欢迎居里先生与中美合作》

载 1941 年 2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5 期

《日寇南进呢？西进呢？》

载 1941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6 期

《日寇东西圈外的圈圈》

载 1941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6 期

《日寇南进的财政状况》

载 1941 年 3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6 期

《战时日本·卷头语》

载 1941 年 5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1 期

《再论日寇南进呢？西进呢？》

载 1941 年 6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2 期

《日寇欲勾结德国平分世界》

载 1941 年 6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2 期

《日本半封建的农业经济——解开日本帝国特质之谜  
的一把钥匙》

载 1941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4 卷第 3、4 期合刊至  
1941 年 6 月第 5 卷第 2 期

《德国侵苏与远东前途》

载 1941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3 期

《本多与汪逆的魔舞》

载 1941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3 期

《日寇通货膨胀的新发展》

载 1941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3 期

《日寇的物产及动力总剖述》

载 1941 年 7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3 期

《欢迎拉铁摩尔先生》

载 1941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4 期

《中苏美英的共运与协力》

载 1941 年 8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4 期

《日寇战时的死亡问题》

载 1941 年 9 月《战地党政月刊》创刊号

《正义的和平与胜利的和平》

载 1941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5 期

《福建新政与抗战建国》

载 1941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5 期

《日寇特殊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

载 1941 年 9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5 期

《美日谈判的展望》

载 1941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6 期、第 6 卷第  
1 期合刊

《日本新动向中的旧动向》

载 1941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6 期、第 6 卷第  
1 期合刊

《日本的钦定宪法与阴性议会》

载 1941 年 11 月《战时日本》第 5 卷第 6 期、第 6 卷第  
1 期合刊

**1942 年**

《读丘吉尔首相的演说》

载 1942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6 卷第 2 期



《英美战略上当务之急》

载 1942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6 卷第 2 期

《论东方民族联盟组织》

载 1942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6 卷第 2 期

《日本特殊选举制与官僚政党》

载 1942 年 1 月《战时日本》第 6 卷第 2 期

《台湾农民的惨痛》

载 1942 年 4 月 6 日《益世报》

《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

载 1942 年 4 月 17 日《新华日报》

《毋忘台湾》

载 1942 年 6 月 17、18 日《广西日报》

《太平洋战略论》(编译著作)

原著者:池歆崎忠孝 伊藤正德等人  
五十年代出版社发行 1942 年 7 月

《东条内阁内外动向的检讨》

载 1942 年 9 月 20 日《广西日报》

## 1943 年

《日本战时外交及其动向》

载 1943 年 1 月 10 日《广西日报》

《日本的军事动向与我们的警惕》

载 1943 年 2 月 7 日《广西日报》

《论太平洋集体安全与中国的关系》

载 1943 年 2 月 21 日《广西日报》

《日本战时政治的衰落及其展望》

载 1943 年 3 月 10 ~ 12 日《广西日报》

《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

载 1943 年 3 月 30 日、4 月 1 日《大公报》

《太平洋战争中的台湾》

载 1943 年 5 月《半月文萃》第 1 卷第 11、12 期合刊

《日本人口问题与移民政策》

载 1943 年 5 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 8 卷第 11 期

《日本最近军事动向》

载 1943 年 6 月 2 日《广西日报》

《对日集中进攻罢！》

载 1943 年 7 月 8 日《广西日报》

《日本劳力资源的悲哀》

载 1943 年 8 月 6~8 日《广西日报》

《苏日会马上爆发战争吗？》

载 1943 年 8 月《半月文萃》第 2 卷第 2 期

《汪伪“参战”前后的乖谬》

载 1943 年 8 月 16 - 18 日《大公报》

《日本产业统制的三种制度》

载 1943 年 9 月 3 日《广西日报》

《日本粮食增产政策的批判》

载 1943 年 9 月 5 日《大公报》

《日寇的“超重点”产业》

载 1943 年 9 月 8 日《广西日报》

《日本战时中小工业的没落》

载 1943 年 9 月 23 日《广西日报》

《日本战时金融统制的剖述》

载 1943 年 10 月 3 日《广西日报》

《美国战时劳动力政策》

载 1943 年 10 月 19 日《广西日报》

《日寇空军现势研究》

载 1943 年 11 月 1 日《广西日报》

《德国如何搜括劳动力》

载 1943 年 11 月 2 日《力报》

《日寇的悲鸣——所谓“一亿国民走向第一线”》

载 1943 年 11 月 26 日《广西日报》

《台湾在急激演变中》

载 1943 年 12 月 3 日《广西日报》

《太平洋战争两年的日寇动向》

载 1943 年 12 月 9 日《广西日报》

《从太平洋中路进攻日寇——先射日本的阿溪里足踵  
的台湾》

载 1943 年 12 月 14、15 日《广西日报》

《日寇国民政治的没落——国民政治组织的纠纷》

载 1943 年 12 月《半月文萃》第 2 卷第 5 期

## 1944 年

《各国劳动力统制政策》

载 1944 年 1 月《新中华》复刊第 2 卷第 1 期

《美国雄厚生产威胁下——日本船运的苦难》

载 1944 年 1 月 20、21 日《广西日报》

《日本战时议会本质的检讨》

载 1944 年 1 月 23—25 日《广西日报》

《日寇一年来的决战设施》

1944 年 3 月《新中华》复刊第 2 卷第 3 期

《日本亚洲独霸战》(著作)

三文出版社发行 1944 年 3 月初版

《论台湾的革命战略》

载 1944 年 4 月 17、20—22 日《大公报》

《日寇最近的钢铁业与造船业》

载 1944 年 6 月 18 日《广西日报》

《日本最近飞机生产的检讨》

载 1944 年 6 月 22 ~ 24 日《大公报》

《日本如何决战》(著作)

战时日本研究社出版 1944 年 7 月初版

### 1945 年

《日本失败的实况》

载 1945 年 11 月 25 日《新生报》

《民族主义在台湾》

载 1945 年 12 月《政经报》第 4 期

### 1946 年

《〈人民导报〉发刊词》

载 1946 年 1 月 1 日《人民导报》

《如何铲除日本军权政治》

载 1946 年 1 月 8、9 日《人民导报》

《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播讲)

载 1946 年 1 月 11、12 日《人民导报》

《中韩两民族的关联性》(日文)

载 1946 年 1 月 20—24 日《人民导报》

《日本军权政治终结与日本人民应有之努力》

载 1946 年 1 月 27 日《人民导报》

《论台湾基本人权——并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载 1946 年 3 月 17 日《人民导报》

《国家为什么要保障人民自由》

载 1946 年 3 月 19 日《人民导报》

《台胞应踊跃参加师范教育——为台湾师范教育宣传周而作》

载 1946 年 3 月 29 日《人民导报》

《“台湾日”的回忆》

载 1946 年 4 月 6 日《人民导报》

《台湾民主国对日抗战》

载 1946 年 5 月 26、27 日《人民导报》

《反抗满清统治的暴动》

载 1946 年 5 月 29 日《人民导报》

《我们要溶化在一起——五月十二日在省训团精神讲话》

载 1946 年 5 月 31 日《人民导报》

《日本失败的教训——8 月 15 日对全体学员精神讲话记录》

载 1946 年 8 月 25 日《人民导报》

《孔夫子的伟大》

载 1946 年 8 月 27 日《新生报》

《报人的使命——为纪念记者节而作》

载 1946 年 8 月 31 日《人民导报》

《台湾教育设施的现阶段——全省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闭幕感言》

载 1946 年 9 月 22 日《人民导报》

《谈谈台湾农业的改进——祝中华农学会成立》

载 1946 年 9 月 29 日《人民导报》

《推行合作事业的检讨——并祝台湾合作事业健全发展》

载 1946 年 10 月 6 日《人民导报》



《成功之道——在成功中学训话记录》

载 1946 年 10 月 8、9 日《人民导报》

《国父与国庆》

载 1946 年 10 月 10 日《人民导报》

《回顾与希望》

载 1946 年 10 月 25 日《人民导报》

《学生深造的第一步——延平学院训话记录》

载 1946 年 11 月 10 日《人民导报》

《如何恢复台湾话的方言地位》

载 1946 年 12 月 2 日《人民导报》

**1947 年**

《本刊创刊周年纪念感言》

载 1947 年 1 月 1 日《人民导报》

《如何推进台湾生产建设——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省训团对全体学员精神讲话》

载 1947 年 1 月 9、10 日《人民导报》

《台湾心理建设问题——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对青年团  
干部训练班学员演讲》

载 1947 年 2 月 23 日《人民导报》

以下著作、译著出版日期、出版社或刊载期刊  
不详：

《政治的社会基础》(原著者:大山郁夫,与郑应瑞合译)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译著)》(原著者:李雅矢谦克)

《战争财政论——如何筹划战费》(编译)

载《广东省银行季刊》

《敌寇军事南进的阴谋》

载《西南青年》第 12 期

《日本果非侵外则不能存立吗?》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方法》

《美日战争论》(译)

《台湾民众运动史论》(许地山作序)

《封建的军事的日本帝国》

《日本帝国主义研究》

《日本战时政治内幕》

《台湾问题与台湾革命》

《日本帝国本质论》

《工业经济危机论》

《日本近世产业史论》

《朝鲜问题的真髓》

《日本的台湾土地政策》

《世界经济会议及其后世界经济的动向》

## 宋斐如生平简介

翁晓波 梁汝雄

宋斐如,原名文瑞,字斐如,曾用名宋瑞华、宋端华,笔名:蕉、蕉农、宋蕉农、沉、沉底、永瑞、剑华、奔流等。生于1902年农历七月初八,台湾省台南县仁德乡人(日据时期家庭住所为台南厅文贤里大甲庄二五二番地),祖籍福建同安。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中,遭当局秘密绑架、杀害。时年45岁。

1922年3月,毕业于(台北)台湾商工学校(现台北开南高级商工职业学校),翌年9月毅然奔赴祖国大陆,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25年,发表《王悦之氏之谬谈与北大台湾同人》(刊登在《台湾民报》第77期上)文章,反驳王悦之氏关于台湾来京的留学生只不过是“骗骗父母之金钱,到北京漫游而已”的不实之说。在校期间与张我军、洪炎秋等进步台湾青年学生创办《少年台湾》月刊,任该刊后期主编,向台湾岛内介绍、宣传祖国状况,“架起台湾与大陆间资讯传播的桥梁”。

1930年1月与刘思慕、吕振羽、夏次叔等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创办并主编会刊《新东方》月刊，研究东方问题，“团结融合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以共筹解决整个东方问题的方略”，1930年9月毕业留校任教。

1930年至1932年间，发表了《“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动》、《东北事件的经济解释》、《东北事件与帝国主义战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批判》等二十多篇文章及近十篇译文，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东北及台湾，企图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滔天罪行。

1932至1935年，追随爱国抗日将领冯玉祥赴察哈尔抗日，负责抗日宣传工作，担任泰山读书研究室主任，组织进步教授、学者（李达、陈豹隐、陈定民、赖亚力、范枢铭、李季谷、吴祖湘等）为冯将军及其部属讲授唯物辩证法、世界经济、《资本论》、日语，介绍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及日本国情，报告国际政治、经济情势等等。期间曾掩护地下工作者刘思慕夫妇脱险泰山，担任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日本问题研究员。1935年至1937年，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深造，潜心研究日本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政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斐如毅然返回祖国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发动民众、宣传抗战。

1938年1月，在汉口发起组织“战时日本问题研究会”任总干事，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创办《战时日本》期刊，担任主编。为该刊撰稿的有：国内著

名的专家、学者郭沫若、张友渔、张铁生、许涤新、刘思慕、李纯青、李友邦、谢南光、谢东闵等，还有日本、韩国等国际反战人士鹿地亘、盐见圣策、青山和夫等等。国民党政要如冯玉祥、孙科、梁寒操等的文章也常见于报端。随着国土的沦陷，该刊先后转移到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坚持出版，自1938年8月1日创刊至1942年1月15日终刊，历时3年半，坚持出版了6卷共32期。

抗战期间，出版专著《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九国公约会议与我们应有的斗争》、《日本铁蹄下的东北》、《日本战时外交内幕》、《日本亚洲独霸战》等16本；译著《日本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太平洋战略论》等8本。有关的抗战论文甚多，除了在其主编的《战时日本》上发表了近百篇之外，还在其他抗战刊物《时事类编》、《中苏文化》、《时事月报》、《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抗到底》、《新中华》、《力报》、《新华日报》、《半月文萃》等发表了大量研究日本、宣传抗战的论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41年2月，与台胞爱国抗日将领李友邦、谢南光发起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任常委兼执委。

1942年4月5日，在重庆举行的“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上代表“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题为《台湾的惨状与祖国的责任》的演说，明确指出“六百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来”，表达了台湾同胞渴望回到祖国和光复台湾的决心。

1943年8月,任广西日报主笔。期间,在《广西日报》、《大公报》、《西南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毋忘台湾》、《论台湾的革命战略》、《如何收复失地台湾——血浓于水台湾必须收复》等三十多篇有关抗战及收复台湾的论文。

1945年1月,被聘任为“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专任专门委员,10月,与李纯青、李万居、黄朝琴、游弥坚等十几位台湾籍人士一起随“前进指挥所”人员从陪都返台,为接收台湾、日本受降仪式做准备工作。同年11月,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计考核委员会教育文化专门委员会委员。当时,宋斐如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中职位最高的台籍人士。

1946年1月,与苏新、白克、郑明祿等人创办《人民导报》,始终坚守着“人民第一”的原则,为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针砭时政,大胆揭露当局的黑暗、腐败,令当局极为不满。5月8日,被迫辞去《人民导报》社社长职务,改聘任为顾问;7月中旬,被聘为台湾省立法商学院专修科兼任教授,9月,复任《人民导报》社社长。

1947年2月19日,被当局免去教育处副处长之职。二·二八事变后,3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在台北新生南路一段145巷21号寓所内被当局绑架,下落不明。后经查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罗列的“罪名”是:(1)阴谋叛乱首要,组织台湾民主联盟;(2)利用报纸抨击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点。

宋斐如从1945年10月至1947年3月回到台湾一年

多的时间里,先后在《新生报》、《人民导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如何铲除日本军权政治》、《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我们要溶化在一起》、《如何推进台湾的生产建设》、《谈谈台湾农业的改进》、《台湾心理建设问题》等三十多篇文章,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及生产建设不遗余力。

宋斐如一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驱赶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台湾,为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奔走、呐喊。他既爱台湾更爱祖国,坚持把台湾人民的命运与民族复兴及祖国的富强紧紧联系起来,把青春与热血献给了台湾人民和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他是台湾人民的优秀儿子!也是我中华民族坚实的脊梁!

宋斐如罹难后,其夫人区严华也因掩护进步人士、“煽动台大学潮”罪名,1950年被当局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宋斐如啓事** 本人學經濟

而從事文化工作經念餘年、此次返臺、因鑒於漢明文化需要振興、官民感情需要溝通、故創辦「人民導報」以爲文化之搖雷艇、播種機。創辦以來尙能一本原則、爲民喉舌、基礎漸趨穩固、發展可期、本人創辦初旨經已完成、特辭社長之職、以專力從事別部門之創設、此啓。

**本社啓事** 本社改聘王

添灯先生爲社長、負責處理社務、此啓。

**本社啓事** 本社敦聘宋

斐如先生爲顧問、此啓。

1946年5月8日,宋斐如被迫辞去《人民导报》社长职务启事。

# 本社啓事

本社因于添灯先生辭退社  
長職其後職務由宋斐如負  
責自理此啓

# 本社啓事

本社敦聘王井泉先生爲發  
行人此啓

1946年9月17日,宋斐如重任《人民导报》社长职务启事。

## 宋斐如啓事

本人因協辦人民導報，對於教育處工作，或有遺誤矛盾之處，昨接「免職另候任用」之命令，經即辦理移交，介壽館學生獻金事宜，亦經募足金額，正由統計組及文書組會辦結報手續，此後親友通訊，請寄本報社爲荷！

二月廿二日

1947年2月22日，宋斐如被免職(教育處副處長)之啓事。

# 宋斐如鳴謝啓事

自本人離開教育處消息傳出以來，謬蒙各方親朋來函或登門慰問無任感激。惟官場之人事調動，原屬常事，本人一向淡薄厭煩勾心鬪角，此後擬繼續讀書（如答中央社採訪組長然），以補一年半來學術之荒蕪。至事情發生之真相與真因，無已時，當公開表白，以慰親友；先此誌謝！

宋斐如被免職后对各方慰问之鸣谢启事。



## 后 记

在宋斐如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极其丰硕珍贵的著作。但鉴于多种因素,能掌握到的寥寥无几。为了及时加以抢救整理,2002年台盟深圳支部决定出版台湾人民抗日爱国志士《宋斐如文集》。翌年9月起,由台盟深圳支部主委宋亮,副主委陈美芬、翁晓波及盟员家属梁汝雄、乔来丽等组成调研组,先后多次到过重庆、北京、南京、济南、泰安、桂林、昆明、武汉、广州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拜访了宋斐如当年的同事及其家属。宋斐如的遗孤宋亮、梁汝雄伉俪还特地赴台湾调研。历时二年,在这些有关部门和人士的热心帮助下,获取了宋斐如大量著作、资料,并进行初步整理。今年元月,聘请抗日战争文化研究专家、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杨益群、张雅芳伉俪,对这些著作和资料反复认真地进行爬梳、勾沉、订正、筛选,编成《宋斐如文集》。

本书在资料搜集、编选过程中,始终是在台盟中央、台盟广东省委、台海出版社及深圳市委统战部、市台办的大

力关心支持下进行的。台海出版社还特地将此书列入“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 60 周年”纪念丛书出版规划。先后得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无私帮助，尤其是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重庆、江苏、桂林、云南、湖北、武汉等省市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第二档案馆、山东泰安冯玉祥纪念馆等单位帮助。热心人士大陆有谈家芳、戴高尔等先生；台湾有秦贤次、蓝博洲、严秀峰等先生，特别是著名的台湾学者陈映真伉俪，不仅热情接待安排到台湾的调研，还从百忙中抹暇为本书写序。曾健民先生则不辞劳苦，亲自将其珍藏的当年宋斐如为台湾主编的七大本《人民导报》送到赴台调研组住处。还有台盟深圳支部的盟员及其家属，深圳电信局部分同志，为本书的校订给予热情协助。值《宋斐如文集》即将问世之际，特此一并致谢！

编者

2005 年 7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斐如文集 / 深圳台盟主编. 杨益群执行主编(特邀)—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5.9

ISBN 7-80141-420-9

I. 宋... II. ①深... ②杨... III. 宋斐如-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8027 号

书 名 / 宋斐如文集

主 编 / 深圳台盟

执行主编 / 杨益群(特邀)

责任编辑 / 吕 莺

特邀编辑 / 梁汝雄

封面设计 / 雪 冬

发 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张 / 52.625

字 数 / 1600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420-9

定价: 220.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